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十四卷

人 民 出 版 社

1964年 北京

ИНСТИТУТ МАРКСИЗМА-ЛЕНИНИЗМА при ЦК КПСС

К. МАРКС
И
Ф. ЭНГЕЛЬС
СОЧИНЕНИЯ
ТОМ
14

Издание втор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 1959

根据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 1959 年版译出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十四卷

*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阳門大街 320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 1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900×1220 毫米 $\frac{1}{32}$ · 印张 $32\frac{1}{8}$ · 插页 10 · 字数 788,000

1964 年 8 月第 1 版

1964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01·578 定价(四)4.10 元

目 录*

第十四卷說明.....	IX—XXXII
弗·恩格斯。軍隊 (ARMY)	5—50
弗·恩格斯。副官 (ADJUTANT)	51—52
弗·恩格斯。阿耳布埃拉 (ALBUERA)	53—54
弗·恩格斯。阿爾馬 (ALMA)	55—59
弗·恩格斯。明火槍 (ARQUEBUSE)	60—62
弗·恩格斯。艾雷 (AIREY)	63
弗·恩格斯。阿斯佩恩 (ASPERN)	64—70
弗·恩格斯。攻擊 (ATTACK).....	71—75
弗·恩格斯。阿富汗 (AFGANISTAN).....	76—85
弗·恩格斯。鹿砦 (ABATIS)	86
弗·恩格斯。炮座 (BARBETTE)	87
弗·恩格斯。稜堡 (BASTION)	88—89
弗·恩格斯。刺刀 (BAYONET).....	90—91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巴克萊-德-托利 (BAR- CLAY DE TOLLY)	92—94
卡·馬克思。貝爾蒂埃 (BERTHIER)	95—98

* 括号中是“美国新百科全书”刊载的条目的原文标题。——編者注

-
- 弗·恩格斯。阿尔及利亚(ALGERIA)99—110
- 弗·恩格斯。彈药(AMMUNITION)111
-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卞尼格先(BENNIGSEN).....112—115
- 卡·馬克思。勃魯姆(BLUM)116—118
- 卡·馬克思。布里昂(BOURRIENNE).....119—120
- 弗·恩格斯。会战(BATTLE)121—124
- 弗·恩格斯。BATTERY125—127
- 弗·恩格斯。露營(BIVOUAC).....128
- 弗·恩格斯。掩障(BLINDAGE)129—130
- 弗·恩格斯。垛墙(BONNET)131
-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貝姆(BEM)132—135
- 卡·馬克思。貝西埃尔(BESSIÈRES)136—137
-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博斯凱(BOSQUET)138—139
- 卡·馬克思。布律恩(BRUNE)140—143
- 弗·恩格斯。爆炸彈(BOMB)144—145
- 弗·恩格斯。炮手(BOMBARDIER)146
- 弗·恩格斯。炮击(BOMBARDMENT)147—148
- 弗·恩格斯。两桅小炮艇(BOMB-KETCH).....149
- 弗·恩格斯。炮艇(BOMB-VESSEL)150
- 弗·恩格斯。防彈工事(BOMB-PROOF)151
- 弗·恩格斯。軍用桥(BRIDGE MILITARY)152—156
- 卡·馬克思。貝尔納多特(BERNADOTTE)157—167
-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西班牙舰队(ARMADA)168—171
-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艾阿庫裘(AYACUCHO).....172—173
-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布呂歇爾(BLÜCHER).....174—192

-
- 弗·恩格斯。炮兵(ARTILLERY)193—220
- 卡·馬克思。毕若(BUGEAUD)221—224
- 卡·馬克思。玻利瓦尔-伊-龐特(BOLIVAR Y
PONTE)225—241
- 弗·恩格斯。战局(CAMPAIGN)242—243
- 弗·恩格斯。CAPTAIN244—245
- 弗·恩格斯。馬枪(CARABINE)246
- 弗·恩格斯。卡倫炮(CARRONADE)247—248
- 弗·恩格斯。霰彈(CASE SHOT)249—250
- 弗·恩格斯。燃燒彈(CARCASS)251—252
- 弗·恩格斯。药筒(CARTRIDGE)253—254
- 弗·恩格斯。崖路(BERME)255
- 弗·恩格斯。布倫海姆(BLENHEIM)256—257
- 弗·恩格斯。博罗迪諾(BORODINO)258—263
- 弗·恩格斯。比达索阿(BIDASSOA)264—269
- 弗·恩格斯。布达(BUDA)270—273
- 弗·恩格斯。桥头堡(BRIDGE-HEAD)274—275
- 弗·恩格斯。彈射器(CATAPULT)276
- 弗·恩格斯。野营(CAMP)277—280
- 弗·恩格斯。庫霍尔恩(COEHOORN)281—283
- 弗·恩格斯。布里西亚(BRESCIA)284—286
- 弗·恩格斯。緬甸(BURMAH)287—294
- 弗·恩格斯。博馬尔松德(BOMARSUND)295
-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貝雷斯福德
(BERESFORD)296—297

弗·恩格斯。騎兵(CAVALRY)	298—326
弗·恩格斯。筑城(FORTIFICATION)	327—353
一、永备筑城	327
二、圍攻	349
三、野战筑城	351
弗·恩格斯。步兵(INFANTRY)	354—381
一、希腊步兵	354
二、羅馬步兵	359
三、中世紀的步兵	363
四、步兵的复兴	365
五、十六和十七世紀的步兵	368
六、十八世紀的步兵	373
七、法国革命时期和十九世紀的步兵	377
弗·恩格斯。海軍(NAVY)	382—396
卡·馬克思。福格特先生	397—754
前言	401—403
一、硫磺帮	404—415
二、制刷匠帮	416—426
三、警察作風	427—459
1. 自供	427
2. 穆尔頓革命代表大会	430
3. 舍尔瓦尔	437
4. 科倫共产党人案件	447
5. 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洛桑中央节(1859年6月26日 和27日)	451
6. 其他	456

四、泰霍夫的信	460—487
五、帝国摄政和普法尔茨伯爵	488—490
六、福格特和“新莱茵报”	491—500
七、奥格斯堡战役	501—525
八、达-达·福格特和他的研究	526—587
九、代理机构	588—622
十、庇护人和同謀者	623—674
十一、一件訴訟案	675—716
十二、附录	717—754
1. 席利被驅逐出瑞士	717
2. 穆尔頓革命代表大会	724
3. 舍尔瓦尔	725
4. 科倫共产党人案件	726
5. 誹謗	735
6. 老鼠与青蛙之战	736
7. 反对帕麦斯頓的論战	739
8. 安·謝尔策尔先生的声明	739
9. 刊登在 1859 年 5 月 27 日“自由新聞”上的布林德 的文章	741
10. 奥尔格斯先生的信	741
11. 反对卡·布林德的通告信	742
12. 費格勒的 Affidavit	743
13. 維耶的 Affidavit	744
14. 摘自訴訟文件	746
15. 丹屠出版的小册子	749
16. 补遺	751
(a) 卡尔·福格特和“水泥”公司	751

(b)科苏特	752
(c)艾德門·阿布“一八六〇年的普魯士”	753
卡·馬克思。給“总汇报”編輯的信	755
卡·馬克思。致“改革报”、“人民报”和“总汇报”編輯部 的声明	756—759
卡·馬克思。致“总汇报”編輯部的声明	760—761
卡·馬克思。对“奥格斯堡报”的訴訟	762—764
卡·馬克思。致德国报纸編輯部的声明	765—766
卡·馬克思。給“每日电讯”报編輯的信	767
卡·馬克思。給“总汇报”編輯部的信	768—769
卡·馬克思。給“自由射手”和“改革报”編輯部的信	770
卡·馬克思。致“总汇报”和其他德国报纸編輯部的 声明	771—772
注釋	775—896
人名索引	897—970
期刊索引	971—975
地名索引	976—995
譯后記	996

插 图

“美国新百科全书”第一卷的扉頁	3
阿尔馬河会战(1854年9月20日)	57
阿斯佩恩会战(1809年5月21—22日)	67

阿富汗(1838—1842年第一次英阿战争时期).....	82—83
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运动(十九世纪上半叶).....	105
中欧的军事行动(1813年8月13日—1814年4月1日).....	188—189
拉丁美洲各国的独立斗争(玻利瓦尔军队的进军).....	236—237
博罗迪诺会战(1812年9月5—7日).....	258—259
比达索阿河会战(1813年8月31日和10月7日).....	265
弗·恩格斯在写“比达索阿”条目时画的草图.....	268—269
“福格特先生”一书第一版的扉页.....	399

第十四卷說明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四卷收集了他們給資產階級的進步出版物“美國新百科全書”寫的一系列條目和馬克思的論戰性巨著“福格特先生”。從寫作時間（1857年7月—1860年11月）來看，這些著作同編入本版第十二卷，第十三卷的著作和第十五卷的部分著作是相銜接的。

收入本卷的著作同這個時期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其他著作一樣，是無產階級運動和民主運動開始活躍時期的著作。資本主義經濟史上第一次世界經濟危機（1857—1858年）為已開始的無產階級的革命階級鬥爭的新高潮、為一系列國家的反封建的人民運動和被壓迫民族的民族解放鬥爭的加強準備了基礎。消滅封建主義的殘余、消滅民族壓迫、統一政治上被分裂的國家——德意志和意大利，這些任務又特別尖銳地提出來了。由於資產階級日益走向反革命，歐洲無產階級就成了革命地解決這些任務的主要戰士。對於歐洲無產階級來說，完成由於1848—1849年革命的失敗而沒有實現的資產階級性的改造是走向無產階級革命的必要步驟。

革命事變的臨近，孕育着大規模的軍事沖突（如1859年法國和皮蒙特對奧地利的戰爭所表明的）的複雜的國際形勢，促使工人階級的領袖馬克思和恩格斯加強了在準備國際無產階級進行新的階級戰鬥方面的活動。在這種情況下，馬克思和恩格斯對革命理

論的制定，他們為建立無產階級政黨而進行的鬥爭，他們對無產階級在各個不同國家的國內和國際形勢的根本問題上的策略的論證，對國際衝突和戰爭的起因和階級性質的闡述，對武裝鬥爭的規律性的揭示，以及他們對工人階級的思想敵人的猛烈駁斥，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第十四卷發表的著作反映了這個時期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革命理論活動和革命實踐活動的許多方面。抨擊性著作“福格特先生”是馬克思捍衛形成中的無產階級政黨，反對資產階級營壘中的誹謗者和誣蔑者的卓越言論。馬克思和恩格斯給“美國新百科全書”撰稿（這在當時對馬克思來說是維持生活的一個來源，而對恩格斯來說則是幫助偉大戰友的一種手段）就像給“紐約每日論壇報”寫通訊一樣，是利用它們作為宣傳（往往必須採取隱蔽的形式）革命的唯物主義思想的合法機會。既然這是由馬克思和恩格斯決定的，他們也就竭力選擇那些對於無產階級的理論武裝有重要研究價值的問題給百科全書撰寫條目。

“美國新百科全書”上的條目是本卷前半卷的內容。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寫作這些條目時曾經不斷地同百科全書的編輯（查·德納等）的階級局限性發生衝突，因為後者以虛偽的資產階級客觀主義精神向作者提出要求——不表現黨派傾向。儘管任意刪改作者原文的編輯部提出了這種要求，儘管這一出版物的特殊的參考性質對革命的政論作品有一定的限制，馬克思主義創始人仍然善於在具有嚴整的百科全書的形式和體裁的文章中發揮革命無產階級的观点。

給百科全書寫的條目大部分是恩格斯執筆的，雖然馬克思被認為是正式撰稿人。恩格斯承擔了這一工作的主要部分，使馬克思騰出時間去研究經濟問題，因為創立無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是

无产階級領袖当时的主要理論任务。許多条目是由这两位馬克思主义創始人密切合作写成的。他們通过各种形式互相帮助，这种帮助往往具有直接合写的性质。

在恩格斯写的条目中，关于軍事問題的文章，如“軍隊”、“步兵”、“騎兵”、“炮兵”、“筑城”、“海軍”等占着中心地位。这些文章是恩格斯对战争的历史（远溯古代）、軍隊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深刻概括的結果，也是对他那个时代的武装力量的組織和状况、战争和战斗的方法和形式进行分析的結果；这些文章和恩格斯的其他軍事著作一样，为馬克思主义軍事科学和真正科学的軍事学术史奠定了基础。在这些文章中，恩格斯根据大量的实际材料，揭示了战争和武装力量的产生的历史条件，彻底研究了軍隊发展的最重要的阶段和特点，指出了軍隊的組織、战略和战术在不同历史时代的变化。恩格斯給“美国新百科全书”写的关于軍事問題的总结性文章完全反映出他作为无产階級第一个軍事理論家和杰出的軍事学术历史学家，作为軍事科学和軍事历史科学方面的革命家和革新家的作用。在对許多知識部門进行有成效的研究并使自己的科学活动服从于无产階級革命斗争的利益的时候，恩格斯把“研究軍事問題”——如馬克思在1859年2月25日給拉薩尔的信中所指出的——作为自己的专门學問之一。弗·伊·列宁把恩格斯称为偉大的軍事专家。

恩格斯的巨大功績是，他第一个用唯一科学的方法，即辯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研究軍事史和分析当时的軍隊。恩格斯与那些不能把武装力量的发展看做規律性的过程的資產階級唯心主义历史学家不同，他指出，这种发展和其他社会現象一样，归根到底是由构成社会經濟基础的物质生产方式的变化决定

的。馬克思讀了恩格斯的“軍隊”一文后，于1857年9月25日写信給恩格斯說：“軍隊的历史比任何东西都更加清楚地表明，我們对生产力和社会关系之間的联系的理解是正确的。”

恩格斯第一个在軍事历史科学中充分揭示了以下事实：武装力量的性质和类型以及它們的特点、装备和战术，部队的編制和訓練方法，取决于生产发展的水平，取决于社会制度和社会的阶级結構。恩格斯根据大量的历史实例，揭露了从古代东方奴隶占有制国家出現最初的有組織的武装力量以来軍隊的阶级性。恩格斯在辯证地研究武装力量的发展时，把这种发展同社会經濟形态的历史具体地联系起来。他指出，軍隊的盛衰取决于某一形态的形成和瓦解的过程。恩格斯強調指出，古希腊的軍隊及其方陣战术，古羅馬的軍隊及其較进步的軍团制度趋于衰落是奴隶占有制社会內部促使該社会崩潰的那些矛盾发展的結果。封建制度的瓦解，造成封建軍事体系解体，使得已經丧失了战斗力的騎士队消亡。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在資本主义形成时代，武装力量经历了从雇佣軍隊到根据普遍义务兵役制編成的群众性軍隊的重大演变，这种演变反映了资产阶级社会形成和发展的过程。

恩格斯认为某一种社会經濟形态由另一种进步的社会經濟形态代替的时期，革命地摧毁陈腐的社会制度和建立新的社会制度的时代，对軍事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恩格斯在著作中指出，这样的时代特別有力地推动了軍事方面的进步，而这些进步的变化的倡导者和代表者就是对社会衰朽势力进行斗争的革命阶级。恩格斯根据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的例子，首先根据十八世紀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革命的法国对欧洲各封建专制国家同盟的战争的例子，来揭示这一規律性。他指出，正是在这些战争中突出地表现了

武装斗争的直接参加者人民群众的军事创造性，他们不断寻找并且终于找到了适合于新条件的新的战斗形式和新的战术布势的形式。后来，这一点在军队的组织和条令中固定下来，并且由于军事领导人员和指挥人员等的活动形成了体系。恩格斯认为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的解放斗争，例如，瑞士人反对奥地利封建主和勃艮第封建主的战争、十六世纪尼德兰人反对西班牙统治的战争、十八世纪末英国的北美殖民地的独立战争、十九世纪初欧洲人民反对拿破仑压迫的战争、1848—1849年匈牙利的民族解放战争等，具有重大意义。恩格斯不仅在给百科全书写的长条目中，而且在一系列短条目中（“阿耳布埃拉”“布达”等）都谈到了这些战争的历史。

恩格斯的军事文章驳倒了许多资产阶级军事理论家所谓军事学术原则的不变性和永恒性的观念。恩格斯在揭示战略和战术所固有的辩证的规律性时强调指出，适合于一定历史条件的战略和战术规则，如果运用到已经变化的情况中就要破产。例如，在“布伦海姆”的条目中，恩格斯在分析十八世纪初的一次大会战时注意到，在当时实行线式战术的条件下成为法军失败原因的情况，在十九世纪，即在采取散开的队列和纵队相结合的时期则被认为“最有利的条件之一”（见本卷第257页）。恩格斯把军事学术的发展整个看成不断完善的复杂的发展过程。他揭示了这一过程的各个不同方面的彼此密切的联系。恩格斯在文章中指出不同兵种的协同动作在军事上的作用和它们的历史发展的相互制约性。

恩格斯写的条目包括了军事的各个领域。其中对于军队的形成、组织和装备、补充和训练、指挥管理等问题，战略和战术，地面部队各兵种和海军的组织 and 战术，筑城工事的构造以及其他包括

部队的物质保障和供应(見“彈药”、“艾雷”等条目),部队的宿营(“露營”、“野营”等条目)等許多問題,都作为历史发展的規則而加以研究。恩格斯非常重視軍事技术。在上面已經提到的长条目中,恩格斯彻底地研究了軍事技术历史的各个最重要的方面,而某些細节在論述各种武器(“彈射器”、“刺刀”、“明火枪”、“馬枪”、“卡倫炮”、“爆炸彈”、“霰彈”等),各种进攻和防御的战斗手段(«Battery»、“炮艇”、“棱堡”、“掩障”、“防彈工事”等)和輔助的技术手段(“軍用桥”等)等一系列短条目中加以闡述。恩格斯根据大量实例揭示最重要的技术发明(火药的发明、火器的使用和改进、炮兵学和軍事工程学的进步、蒸汽机在海軍中的使用),对武装力量和軍事学术的发展具有革命化的影响。正如恩格斯在文章中所证明的,战术对軍事技术的从屬性,战斗的战术形式随着新式的大規模武器的出現而必然产生的变化,是反映着社会經济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对軍事的作用的規律之一。

但是,恩格斯并不把武装斗争的規律仅仅归結为軍事技术对战斗方法的影响。他強調指出,某一軍队的状况和它的战斗力,首先取决于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取决于軍队产生和活动的社会条件。某一軍队的战斗素质,同装备一样,取决于軍队的組成,軍队招募的社会成分,战斗訓練的程度,战士的觉悟水平和精神面貌,而后者在許多方面是由战争的性质决定的。恩格斯认为軍队的士气有很大意义。因此,恩格斯在談到騎兵会战时強調指出,在两支强大的騎兵部队冲突的紧急关头,“精神因素,勇敢,在这里立即化为物质力量”(見本卷第 319 頁)。恩格斯还指出在战斗中起作用的其他因素:地形的影响,預备队的存在,指揮的灵活性,統帅的艺术。

恩格斯在著作中以很大的篇幅評價了卓越的統帥、軍事改革家、工程師和發明家的活動，在評價中對於群眾和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作了真正科學的解釋。恩格斯指出，傑出的統帥的活動決不取決於他們幻想的任意創造，而首先取決於不依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物質前提。恩格斯強調指出，統帥的作用在於善於運用武裝力量的客觀歷史發展所提出來的進行戰爭和戰鬥的方式和方法，並且最合理地利用新的技術裝備和由於社會制度的改變而發生的軍隊的組成和戰鬥素質方面的變化。例如，恩格斯認為拿破侖的功績就是他把十八世紀末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所產生的新的作戰方法變為“一套正規的制度”（見本卷第 39 頁）。同時恩格斯反對資產階級編纂歷史的典型方法，即迷信統帥並把他們偶像化；他指出甚至卓越統帥的活動都具有本人階級根源所帶來的局限性和矛盾性的特點。例如，他指出，弗里德里希二世雖然取得了軍事上的成就，但是他“不僅給普魯士人從此以後所特有的呆板和機械練兵方法奠定了基礎，而且實際上造成了他們以後在耶拿和奧埃爾施太特蒙受空前恥辱的原因”（見本卷第 376 頁）。恩格斯強調指出拿破侖在戰略和戰術上的冒險主義成分，片面決定和失策，如龐大的縱隊隊形“曾使他在會戰中不止一次地遭到失敗”（見本卷第 323 頁）。

本卷發表的恩格斯論述軍事的短條目使他的長條目的內容得到充實和具體化。其中某些條目如“阿爾馬”、“阿斯佩恩”、“比達索阿”、“博羅迪諾”等，分析了個別會戰。一部分條目是恩格斯為了解釋一系列軍事術語和軍事技術用語而寫的。在恩格斯的“戰局”、“會戰”和“攻擊”等條目中，包含了有關作戰的方式和方法、不同戰鬥隊形和預備隊的運用的重要的軍事理論結論。其中有許多

从战略和战术观点来看是很宝贵的原理。

恩格斯在军事文章中分析了不同时代首先是资本主义时代的战争历史的经验。他批判地整理了并总结了从古代军事著作家到他那个时代的资产阶级军事理论家和军事历史家的军事理论思想上的成就。恩格斯探讨了許多民族的军队发展情况，竭力想把其中每一个民族对军事科学和军事学术的贡献反映出来。恩格斯所做的概括和结论以及他所采取的研究军事历史事件的方法，都具有不可估价的理论意义和政治意义。恩格斯在各条目中对武装力量进一步发展的某些方向所做的预测，例如他对于在枪械效果增大的影响下步兵战术上将有的变化（“步兵”条目）以及由于军舰上枪炮装备能力不断增大而在海战战术和舰船类型上将有的变化（“海军”条目）的意见，作为科学预见的典范是非常有意思的。同时应该考虑到，恩格斯是生活在垄断资本主义以前的时代，在他的著作中总结的是大规模使用机器技术装备和自动化武器时期以前的战争经验。因此不能把恩格斯反映帝国主义以前的时代的军事特点的某些原理和论断机械地搬到现代条件或者毫无保留地用于现代的战略和战术上。

还应该指出，由于当时許多国家的军事学术史都没有整理出来，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恩格斯考虑到許多民族的军事经验。例如，恩格斯在他写的条目中只是粗略地谈到俄国的军事学术，主要是在他同马克思合写的俄国某些军事活动家传记里提了提俄国军队的历史（“巴克莱-德-托利”、“卞尼格先”等条目）。在个别场合下，恩格斯由于利用西欧历史学家有偏见的著作而又没有可能把这些著作同更客观的学术著作进行对照，对俄国军事历史的某些方面阐述得不够确切。例如，在“博罗迪诺”这一条目中就有不确

切的地方。这一条目对博罗迪諾会战的結果作了片面的估价，并且像“巴克萊-德-托利”这一条目一样，貶低了偉大的俄国統帥米·伊·庫图佐夫的作用。恩格斯虽然在他的著作的許多地方指出了中国发明火药以及中国人、印度人和阿拉伯人在火器使用方面的許多发明的偉大历史意义，但是由于当时軍事历史科学的状况，他不可能全面地反映东方各族人民对軍事学术的貢獻。

恩格斯給“美国新百科全书”写的許多文章都是談已經成为欧洲資本主义国家侵略对象的东方各国的。这些文章都是反对經濟发达国家的資產階級奴役并剝削亚非各国人民的掠夺制度，反对殖民侵略者和殖民冒險者的政策的。这些文章是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关心东方各族人民的命运，关心他們的民族解放运动的证明之一。

在“阿富汗”、“阿尔及利亚”、“緬甸”等条目中，恩格斯指出这些国家的自然資源引起了資本主义掠夺者的殖民欲望，他們利用这些国家的經濟落后和半宗法制度，把它們变成殖民掠夺的場所。恩格斯指出，第一次和第二次英緬战争（1824—1826, 1852）的結果，英国殖民者掠夺了緬甸，使它“失去了最富饒的領土”，占領了它的出海口（見本卷第 287 頁）。恩格斯揭露了在阿富汗的英国派駐官吏的阴謀詭計，揭露了英国殖民者对这个国家的內政的粗暴干涉以及他們为了发动旨在对阿富汗进行殖民侵略的 1839—1842 年英国阿富汗战争而采取的各种阴險毒辣和挑撥离間的方法。恩格斯把英国人侵占阿富汗看做是英国在中亚細亚进行殖民扩張的組成部分。恩格斯以法国侵占阿尔及利亚为例，特別清楚地揭露了殖民統治的野蛮方法和殖民奴役的后果。恩格斯在談到法国殖民者的行为时写道：“从法国人最初占領阿尔及利亚的时候

起到現在，这个不幸的国家一直是不断屠杀、掠夺和使用暴力的場所。征服每一座大城市或小城市，每一寸土地都要付出巨大的牺牲。把独立視為珍宝、把对外族統治的仇恨置于生命之上的阿拉伯和卡拜尔部落，在殘暴的襲击下被鎮压，他們的住宅和財產被焚毀和破坏，他們的庄稼被踐踏，而幸存的受难的人不是遭到屠杀，就是遭到各种奸淫和暴行的慘禍。”（見本卷第 104 頁）

恩格斯热切同情受殖民压迫或者受殖民奴役威胁的各族人民，他在条目中強調指出了这些民族对殖民者的反抗的解放性质和广泛規模。他滿意地指出英国在阿富汗的冒险行为的可耻失敗，詳細地談到了 1840 年阿富汗人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总起义。这次起义的結果，正如恩格斯对阿富汗人民所作的評論那样，“勇敢、剛毅和爱好自由的人民”給了殖民者一次严厉的教訓，消灭了他們的軍隊，并把他們赶出国境。恩格斯在指出阿尔及利亚当地居民不断起来反对殖民統治时說，尽管法国进行了三十年的血腥战争（从 1830 年开始），尽管法国投入大批軍隊、花了大量金錢去征服阿尔及利亚，但是由于阿尔及利亚人的反抗，法国在这个国家的統治“是完全虛假的，如果不算沿海地区、城市及其郊区的話”，而阿尔及利亚的各部落还在“繼續捍卫自己的独立和仇視法国的制度”（見本卷第 109 頁）。

“阿尔及利亚”和“阿富汗”两个条目充滿了作者对反对殖民者的解放运动的日益壮大和不可阻擋的信心。正如恩格斯指出的，这种运动在仇恨殖民压迫、渴望自由的人民群众中深深地扎下了根。这些条目虽然是为资产阶级的出版物写的，但是，是站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場的。它們反映了无产阶级的偉大領袖們对殖民主义所作的斗争，反映了他們要教育宗主国劳动人民同情殖民地

和附屬國的爭取解放的人民的崇高願望。

在“美国新百科全书”上，除了恩格斯写的条目外，还发表了馬克思写的許多条目。这主要是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上半叶的軍事活动家和政治活动家的傳記。其中許多条目，如“巴克萊-德-托利”、“卞尼格先”、“貝姆”、“博斯凱”、“布呂歇尔”、“貝雷斯福德”等，都是馬克思在恩格斯参加下写成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条目还有“西班牙舰队”和“艾阿庫裘”(后一个条目論述拉丁美洲各国反对西班牙統治的解放战争中的一次决战)。

本卷发表的傳記性文章，是对各个不同的軍事和政治事件的参加者进行卓越的历史評述的典范，是善于从个别人物的生平中不仅突出个人特点，而且突出那些反映时代、时代精神和这些活动家所代表的那个階級的本质的特征的典范。这些傳記表明，馬克思和恩格斯——无产階級历史科学的奠基人——是描繪历史肖像的巨匠。

在馬克思的“貝尔蒂埃”、“貝尔納多特”、“布律恩”、“貝西埃尔”、“布里昂”等条目中，描繪出拿破侖法国的軍事活动家和国家活动家的群像。正如馬克思指出的，其中許多人的生活道路反映了1789—1794年参加革命事件而后来成了反革命波拿巴政体的支柱的法国資產階級集团的演化。这些活动家大多数完全依靠“为軍事人才开辟了广闊的道路”(見本卷第95頁)的革命，而在軍事上或外交上飞黃騰达起来。在确立了反革命大資產階級的統治的条件下，他們成了貪得无厌和追逐暴利之徒(布里昂、布律恩)，成了渴求官职、封号和“空缺”王位的野心家(貝尔納多特)，成了願为任何制度效忠的不擇手段的钻营家(貝尔蒂埃)。馬克思所写的一些拿破侖的元帅的傳記，提供了关于拿破侖第一帝国資產階級

上层的习气的清晰概念。

在“毕若”条目中，馬克思鮮明地刻划了一个愚蠢而又殘忍的反动分子——资产階級七月王朝制度的忠实奴僕——的嘴臉；这个反动分子以血腥鎮压法国工人、用背信棄义和殘暴的方法征服阿尔及利亚和在摩洛哥从事殖民冒險著称。当时另一个典型的反革命人物就是英国將軍貝雷斯福德，他領導了一系列殖民掠夺性远征并参与鎮压巴西和葡萄牙的革命运动。

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写的布呂歇尔元帥傳記是一幅廣闊的历史画面。在傳記中，这位卓越的德国統帥和爱国者的活动是以德国人民和其他国家人民反对拿破侖統治的解放战争为背景展現出来的。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了布呂歇尔在1813—1815年反拿破侖法国的战争中的重大作用，強調他“与民众同样地仇恨拿破侖”并且“由于他对庶民抱有同情心”而在群众中享有声望，他們认为“对于1813—1815年带有半正規半游击战争性质的战斗行动來說，布呂歇尔是最合适不过的將領了”（見本卷第191—192頁）。

馬克思的“勃魯姆”以及他同恩格斯合写的“貝姆”等条目，都是写革命活动家的傳略的。对于在反革命恐怖下牺牲的1848年革命的著名活动家罗伯特·勃魯姆的描述表明，馬克思在清楚地認識到德国小资产階級民主派代表者的观点的局限性和温和性的同时，高度地評價了其中那些与庸俗民主派截然不同的忠实于人民利益的人。在描写約瑟夫·貝姆的文章中，指出了这位波兰將軍卓越的統帥艺术，后者在1849年匈牙利革命战争时期显出“在游击战和小規模的山地战中是第一流的統帥”（見本卷第134頁）。在“玻利瓦尔-伊-龐特”一文中，馬克思指出了在拉丁美洲各国反西班牙殖民統治的斗争中（1810—1826）人民群众的作用，并且指

出了这次斗争的革命解放性质。但是，由于根据当时流行的有偏见的书刊的错误材料，马克思对拉丁美洲人民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西蒙·玻利瓦尔的活动和他本人作了片面的评价。在这些年代，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政论的反波拿巴方针、他们的力求揭穿对拿破仑第一及其仿效者的反动崇拜的意图，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马克思对这位活动家采取否定态度；他根据自己的资料（当时他不可能相信这些资料是不客观的）把玻利瓦尔也算在拿破仑第一的仿效者之列。

本卷后半卷的内容是卡·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这一卓越的文献反映出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而进行的斗争，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为了保护无产阶级革命家不受资产阶级思想家和代理人的恶毒攻讦而发表的言论。马克思的这部用尖锐的讽刺形式写成的作品，是对那些采用诽谤和捏造事实等卑鄙手段攻击无产阶级运动的敌人进行致命反击的典范。

马克思的这一著作是在国际工人运动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初期写成的，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加强了他们的集合、团结和培养无产阶级战士干部的活动。他们依靠 1852 年共产主义者同盟解散以后保留下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核心，努力扩大和加强国际无产阶级的联系。马克思寻求更广泛地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新的方法和机会，寻求适应情况改变后的党的活动的新的组织形式。马克思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而进行斗争，这个政党应是共产主义者同盟——这样一个政党的胚胎——的历史继承者和思想继承者。但是同时，马克思却决不认为这个政党只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恢复。他认为必须建立一个更广泛，更有战斗力，更密切联系群众的组织，它能够担负起无产阶级群众革命运动的领导者这一具有全世

界历史意义的任务，并把这个运动引向胜利。馬克思在这些年中談到无产階級政党的时候，指出他所指的不是共产主义者同盟，他所理解的无产階級政党是“按偉大历史意义上來讲的政党”（見馬克思于1860年2月29日写給斐·弗萊里格拉特的信）。

在建党斗争的这一个阶段，馬克思认为特別重要的是不使正在形成、还未巩固的党的队伍受到誹謗性攻击，这种攻击会在工人运动中起瓦解作用并破坏工人对自己的領袖的信任。为了巩固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和威信，馬克思努力使工人和劳动群众对无产階級革命家、他們过去和現在的活动、他們的道德品质、他們的观点和目标得到真正的而不是被誹謗所歪曲了的了解。使群众彻底認識到无产階級政党的事业的偉大和純洁，不让无产階級的敌人誣蔑和詆毀——这就是馬克思要写出“福格特先生”这一著作的崇高动机。

馬克思写这一著作，是为了回答1859年12月出版的卡尔·福格特的誹謗性小册子“我对‘总汇报’的訴訟”。福格特在这本小册子里不惜歪曲事实、睜眼撒謊，拚命对馬克思及其战友散布大量恶毒骯髒的謠言，对他們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的活动大肆歪曲，誣蔑他們怀着自私自利的、几乎是犯罪的动机。福格特的造謠中伤，是同普魯士警探于1852年进行科倫挑衅性审判时对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活动家捏造的罪名，同敌視无产階級的小資产階級流亡者領袖們屢次对馬克思及其战友进行的誣蔑遙相呼应的。德国的資产階級报刊响应了福格特的誹謗。工人运动的凶恶敌人广泛地利用了——而且后来繼續利用福格特的小册子。

馬克思认为由福格特再次掀起的这场对无产階級革命家的进攻，表明資产階級力图給正在形成中的无产階級政党以致命的打

击，并从道义上使它在社会人士的心目中破产。馬克思在“福格特先生”这一著作中写道：“統治階級的告密者們也隨時隨地在同樣無耻地对捍衛被壓迫階級利益的先進政治戰士和作家造謠中傷。”（見本卷第 453 頁）福格特的言論之所以具有極大危險性，還在于這本誹謗性小冊子的作者挂着民主派招牌，在民主派中間有影響，在資產階級公眾中間享有自然科學家和政治活動家的聲譽。在德國，無產階級革命家當時面臨爭取全國革命民主統一的尖銳鬥爭，必須加強無產階級革命家在群眾中的影響，因而揭露福格特和他的應聲蟲的面目就特別重要。馬克思于 1860 年 2 月 23 日給弗萊里格拉特寫信說，同福格特的鬥爭“對於黨在歷史上的聲譽和它在德國的未來的地位具有決定性意義”。可見，在駁斥福格特的這場論戰中，馬克思不僅維護了無產階級革命家過去的革命活動，而且也維護了無產階級政黨的未來。

馬克思在這一著作中揭穿了福格特的所有說法都是謊言，揭露了他這個處心積慮的捏造者和誹謗者的嘴臉。針對福格特的歪曲捏造，馬克思敘述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以及共產主義者同盟的產生和活動的真實情況。在該著作的第四章（“泰霍夫的信”）里，馬克思對第一個國際共產主義組織的歷史作了簡短的但內容非常充實的介紹。在這一章以及其他幾章（第三章“警察作風”、第六章“福格特和‘新萊茵報’”）里，馬克思描述了共產主義者同盟進行活動的歷史條件，指出了同盟的性質和目的，說明了無產階級這一派在同盟中同宗派主義分子的鬥爭。談到維利希—沙佩爾集團的非組織活動在共產主義者同盟中引起分裂的原因時，馬克思強調指出這個宗派集團採取的冒險密謀策略的危險性，並證明這種策略同無產階級政黨的真正任務是不相容的。馬克思舉

出科倫审判案，即对“新萊茵报”編輯們的陷害以及其他許多迫害共产主义者同盟活动家的法令來做例子，揭露普魯士警察国家、德国以及其他国家的統治階級为了对付共产主义运动而采取的卑鄙手段。

馬克思的“福格特先生”一书，在馬克思主义文献中，第一次完整地描述了馬克思主义創始人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的早期阶段。这本书是为真正科学地研究共产主义者同盟历史奠定了基础的著作之一。它同馬克思所写的小册子“揭露科倫共产党人案件”和恩格斯写的文章“最近的科倫案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领域中开创了馬克思主义的历史編纂学。

馬克思揭露福格特是一个恶毒的誹謗者和居心險恶的人时，揭示了德国庸人和流亡小市民人士中間的这位英雄的令人討厭的整个面目。他揭穿了福格特的假民主主义，指出了福格特在1848—1849年德国革命时期以及在流亡瑞士的人士中間所扮演的那种不光彩的角色。在揭露福格特的时候，馬克思巧妙地嘲笑了他作为法兰克福議会左派小资产阶级党团的典型的怯懦而狹隘的領袖之一，作为在革命后期由“殘闕”議会搞的那个短命政府（“帝国摄政政府”）的成員所进行的活动。在第六章“福格特和‘新萊茵报’”中，馬克思指出福格特在1848—1849年的活动实际上带有反革命的性质。馬克思在这一著作的許多章节里引用文献資料证明，誣指无产阶级革命家同警察有联系的福格特自己，在反革命的瑞士当局同工人組織、民主組織进行的斗争中，多次为瑞士当局效劳，干过警探干的勾当。馬克思的这一著作充滿尖銳的嘲諷，鞭笞福格特的世界观，即貫穿在他的自然科学著作中的那种肤淺的庸俗唯物主义。这些嘲諷不仅击中了福格特的要害，而且也击中了

整个德国庸俗唯物主义者这一派(毕希納、摩萊肖特等等)的要害。

馬克思这一著作的中心点，是在揭露福格特在五十年代就已成了波拿巴雇用的代理人。本书第八、九、十各章(“达-达·福格特和他的研究”、“代理机构”、“庇护人和同謀者”)就是闡明这一問題的。馬克思根据 1859 年 3 月，即法国和皮蒙特对奥地利战争的前夜福格特所出版的“欧洲现状研究”以及他的其他一些口头的和发表于报刊的言論，断定福格特同波拿巴集团有密切的联系。馬克思在自己的著作里证明，福格特的“研究”不过是把第二帝国的官方报纸“通报”和巴黎丹屠出版社出版的宣傳波拿巴主义的小册子上的东西用德文轉述出来而已。馬克思強調指出，福格特在报刊上发表的言論正是他的主子們所需要的，他們用这些言論來在思想上影响欧洲特别是德国的社会輿論，以便于拿破侖第三推行他的投机冒險的对外政策。按照馬克思的精确說法，“福格特不过是土伊勒里宫里能操腹語的小丑手中的无数外語傳声筒之一”(見本卷第 558 頁)。

馬克思指出，福格特同第二帝国的头目們在国外分設的代理机构有联系。福格特扮演着波拿巴代理人的招募者的角色，他把“法国食槽”放到招募來的人的面前。馬克思以无与倫比的諷刺笔触勾画了福格特的“庇护人和同謀者”的嘴臉，其中也有像日內瓦政府首脑詹姆斯·法济这类人物，他直接同拿破侖第三进行勾結，出卖瑞士的民族利益。馬克思揭露出福格特及其同伙是执行拿破侖第三阴謀詭計的鷹犬，指出福格特的全部政治活动就是在民主派人士中間充当执行波拿巴阴謀詭計的工具；同时，馬克思提出警告說，波拿巴代理人有钻进民主派和无产階級队伍中來的危險。执政的資產階級至今仍在广泛采用收买雇用代理人、御用文人和

記者等手法，进行反动宣傳和破坏活动，而馬克思的抨击波拿巴代理机构的这一作品，在揭露这些手法方面，到今天还是一个典范。

馬克思认为福格特是波拿巴雇用的代理人，他在写这一著作时并不知道的、后来才公布的一些文献完全证实了他的这种看法是正确的。第二帝国崩潰以后法国政府公布的关于路易-拿破侖的秘密費用开支的材料，說明福格特在 1859 年 8 月从这笔秘密費用中得到了 4 万法郎。

馬克思在这一著作中从揭露福格特同波拿巴集团的联系进而广泛地全面地揭露了法国的波拿巴制度。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波拿巴的法国在当时是欧洲反动势力的主要支柱之一。而且，波拿巴主义“是一种統治形式，是由于资产階級在民主改革和民主革命的环境里轉向反革命而产生的”（“列宁全集”中文版第 25 卷第 245 頁），当时不仅出现在法国，而且是一种国际現象。第二帝国在全欧洲都布下了罗网，有一系列小国的政府追随它的政策。許多国家——撒丁、普魯士等——的統治階級都表现了波拿巴主义傾向，露出了摹仿第二帝国的統治者們的苗头。馬克思和恩格斯把同波拿巴主义作斗争看做是国际无产階級的主要任务之一。

馬克思在“福格特先生”一书中似乎是对自己的許多反对拿破侖第三制度的政論文章作了总结。馬克思发挥了他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一著作中就作过的对于波拿巴主义实质的深刻的分析，指出波拿巴制度的特征是：在各階級之間进行看風使舵的政策、国家政权的表面独立、蠱惑性地向社会各阶层呼吁以掩盖它的维护上层剝削分子利益的行为、利用軍隊中最反动的分子做主要支柱。馬克思揭露反革命大资产階級采取波拿巴独裁政权形式进行統治的各种方法，指出第二帝国制度是警察恐怖、投机倒

把、軍閥和无耻的冒險分子橫行的王國，指出這一制度所使用的大量政治手段中包括訛詐、收買、露骨的煽惑、對民族運動和革命運動採用表面討好和玩弄兩面派手法、用小恩小惠腐蝕某些社會階層、利用刑事犯罪分子等等。

馬克思徹底揭露了被內部矛盾弄得四分五裂的法國波拿巴制度的腐朽和脆弱，同時指出拿破侖第三的反人民的內外政策在五十年代末已經走上絕路，第二帝國的統治集團希望用發動對奧地利的“局部”戰爭的辦法找到出路。同福格特和其他波拿巴主義宣傳者的一切論斷相反，馬克思指出，這場戰爭根本不是為了使意大利從奧地利統治下解放出來。路易·波拿巴及其集團偽善地用這面旗幟掩飾他們作戰的目的，實際上是想用廉價買得的勝利來鞏固法國的波拿巴制度，侵占意大利的土地以擴大法蘭西的版圖，並阻撓意大利革命運動的發展。馬克思徹底揭穿了波拿巴集團玩弄的聲名狼藉的“民族原則”這一騙人把戲的實質。路易·波拿巴冒充“民族的保衛者”，用民族利益進行投機，想把民族運動引上反革命的軌道並利用民族運動來鞏固法國的領導權和擴大它的疆界。事實上，路易·波拿巴對意大利的政策已經表明，第二帝國是真正民族解放運動的最凶惡的敵人。馬克思認為，民族解放運動的某些領袖聽信了波拿巴的欺騙宣傳，是對被壓迫的各族人民利益的嚴重威脅。

馬克思也痛斥了對世界政治有影響的歐洲其他反動勢力。特別是，他揭露了路易-拿破侖同英國資產階級貴族寡頭的代表帕麥斯頓的勾結，後者幫助拿破侖第三放手進行對意大利的冒險。馬克思也揭露了為同樣目的服務的波拿巴法國和沙皇俄國之間所簽訂的協議。

“福格特先生”这一抨击性著作中有关揭露波拿巴主义的部分，是反对反动势力企图恢复和利用已遭历史譴責的波拿巴主义傳統、波拿巴主义政治的反人民手法的犀利的战斗武器。

馬克思和恩格斯抨击波拿巴主义的言論，是同他們为了以革命民主方式解决德国統一和意大利統一問題而进行的斗争紧密联系的。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波拿巴的法国及其在欧洲的领导权，是上述两国的民族統一和在国内实施必要的革命民主改革的主要障碍之一。馬克思在“福格特先生”这一抨击性著作中揭露了福格特在这个問題上的亲波拿巴的立場。馬克思还指出，这种立場同受到自由資產階級支持的普魯士統治集团在意大利危机时期所执行的反人民反革命的政策是一致的，普魯士統治集团一心想利用奥地利的削弱通过容克普魯士领导下的王朝道路統一德国。馬克思在德国統一和意大利統一問題上抨击福格特及其同伙的言論，也是对向普魯士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方面搖摆的“普魯士皇家社会主义者”拉薩尔的一种答复。拉薩尔在他的“意大利战争和普魯士的任务”这本小册子中，实质上是为拿破侖第三在意大利的政策进行辯护，并对普魯士主义的自由資產階級所宣揚的統一德国的王朝道路表示支持。馬克思在1859年11月26日給恩格斯的信中写道，拉薩尔实际上“是同福格特一鼻孔出气的”。馬克思在自己的书中沒有公开指出拉薩尔的名字，但是批判了他。馬克思主义創始人提出了同拉薩尔的反无产階級观点相对立的計劃，就是通过人民革命和推翻反动的君主制度的途徑用革命民主的方法統一德国和意大利。同指望普魯士胜利而不相信德国革命民主力量的拉薩尔的策略相反，馬克思“提倡和发揚独立的、彻底民主的、反对民族自由主义懦弱行为的政策”（“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

120 頁)。

馬克思在駁斥福格特的准波拿巴主义对外政策观念的同时，在自己的著作中——特别是在第八章（“达-达·福格特和他的研究”）里——用了大量篇幅來揭示从十八世紀中叶到十九世紀六十年代欧洲各国对外政策的真正性质。馬克思主义創始人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最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掌握国际政治的秘密，以便能揭露統治阶级的外交阴谋和掠夺計劃。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能够积极地反对統治阶级的沙文主义政策和侵略政策，并強調指出无产阶级在国际冲突中必須执行自己的革命路綫，即爭取完全实现欧洲的资产阶级民主改革、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并为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准备条件。馬克思在“福格特先生”这一著作中，也正是从这种立場，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場出发來闡明各种国际問題的。他坚决譴責掠夺和吞并的政策，揭露統治阶级外交所采用的恫吓和詭詐、粗暴地干涉小国内政、唆使一些民族反对另一些民族的手法。

在“福格特先生”这一著作中（第十章“庇护人和同謀者”），馬克思把资产阶级报刊的性质闡述得清清楚楚：资产阶级报刊的任务就是充当統治阶级反动政策的兜售者和对革命运动活动家的誣蔑、謠言的傳播者。馬克思无情地揭露了波拿巴派报刊的卖身投靠、毫无原則和卑鄙下流；这些报刊的代表人物“所有这一帮人都毫无例外地从同一位圣上的金庫中汲取灵感”（見本卷第 619 頁）。馬克思也揭露了德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报刊。馬克思认为英国“自由派的”报刊“每日电訊”是集社会髒物之大成的一个“紙制的藏垢納污的大中心”，他指出对于这家典型的资产阶级报纸的这种估价可以推而广之，适用于德国、英国、法国、瑞士等国的許多其他

报刊。馬克思揭露了資產階級报刊的下流作風，并刻画了那些文僮、老奸巨猾的政客和支配資產階級新聞界的狡猾的企业主的嘴臉。这是“福格特先生”这一著作强有力的、尖銳性和准确性达于极点的揭露面之一。

揭露被馬克思划为庸俗民主主义者一类的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分子，在“福格特先生”一书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見他在1860年1月28日和2月3日写給恩格斯的信）。馬克思在这一著作的前言中說，他所以要駁斥福格特，原因之一就是这能够把福格特所屬的整个政治流派都揭穿。馬克思这里所指的就是德国的庸俗民主派。在馬克思看来，之所以必須駁斥庸俗民主派，是因为当时特别要紧的是捍卫正在形成中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立場和策略立場的独立性，使它不受小資產階級的影响，也因为当时德国民主派中的大多数人都有向右轉的趨勢。从1848—1849年革命时起，德国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其代表人物中有許多当时实质上已經干着叛卖的勾当）經歷着分化和蛻变的过程。德国国内的以及流亡国外的民主派有相当大一部分墮落成为資產階級自由派的附屬物。他們之中有很多人像福格特一样充当波拿巴集团和德国反革命資產階級的应声虫。过去同恩格斯一起揭露过德国小資產階級許多領袖們的庸俗民主主义（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流亡中的大人物”）的馬克思，认为再次严厉地批判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自己对党的責任。馬克思看得清清楚楚，在誹謗家福格特的背后，除自由派以外还有許許多多的庸俗民主主义者。

在第四章和第十二章（“泰霍夫的信”、“附录”）里，馬克思以幽默卓絕的笔触嘲笑了庸俗民主主义者——德国小市民的思想家和代表人物的狹隘、鄙陋、庸俗和政治上的不穩定。談到小資產階級

流亡者金克尔、席梅尔普芬尼希、戈克、卢格等人的“革命貸款”的投机冒險計劃以及其他類似的計劃時，馬克思指出，他們的那種離不開無謂的瑣碎爭吵的冒牌革命活動，實質上正好迎合反革命勢力的口味。

“福格特先生”這一著作的特色不僅在於內容深刻而豐富，而且還在於其出色的形式。就藝術價值而言，這一著作是屬於世界諷刺文學優秀典範之列的。馬克思在這一著作里所引用的許多著名和不著名的藝術作品中的警句和藝術形象，使得他對福格特以及其他工人運動敵人的批判更加尖銳和準確。“福格特先生”證明了馬克思在藝術方面的高深造詣。恩格斯在1860年12月19日寫給馬克思的信中談到這一著作說，“這是你所寫過的最好的論戰性作品”。

馬克思的“福格特先生”這一著作是充滿了黨性和對無產階級運動的敵人的不可調和的戰鬥精神的作品。第二國際和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機會主義首領們那樣貶低這一著作的主要原因也就在此。“福格特先生”這一著作反映了馬克思為使無產階級擺脫小資產階級思想影響、為建立無產階級政黨而鬥爭的一個重要階段，它所以保持着巨大的意義，不僅因為它是研究國際工人運動史和馬克思、恩格斯反對波拿巴主義以及其他反動勢力的各種言論的重要資料，而且是熱烈捍衛工人階級利益和堅決回擊共產主義的凶惡敵人的典範。

* * *

本卷收有全集第一版沒有收入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給“美國新百科全書”所寫的四十二個條目以及馬克思針對福格特的誹謗而發表的四篇聲明。這些條目中，“軍用橋”以及“阿爾及利亞”這一條

目的片断曾譯成俄文在苏联杂志上发表过，而这几篇声明曾作为附录收入 1936 年出版的“福格特先生”单行本；其余各条目都是第一次譯成俄文发表的。第一版所刊載的“奥斯特利茨”是他人写的，“奥热罗”和“巴达霍斯”两个条目也沒有充分根据证明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写的，因此本版都沒有收入。1940 年的“軍事历史杂志”第 11 期上刊載的“武器”这一条目，由于不能确证是恩格斯写的，也不在这里发表。

“美国新百科全书”中的条目，除总論性的条目“军队”排在卷首外，都按写作日期順序排列，而不是像百科全书上那样按标题字母的順序排列。“美国新百科全书”編輯部曾对恩格斯的某些条目有所增补，本版已删去，有关情况都在注釋中加以說明。为了帮助讀者閱讀百科全书的条目原文，在个别場合下也附有增补的段落。馬克思在“福格特先生”这一著作中援引的非德文的文献，也同全文一样以俄譯文刊印，原文在脚注中注出。如馬克思引用文献时既用德文又用原文，原文則予以保留。

在“美国新百科全书”的各个条目中和“福格特先生”这一著作中，印錯了的人名、日期、地名、引文等，已根据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过的資料和实际材料加以核对，并作了更正。

关于会战和条約，重复出現时不再加注，有关的頁碼在地名索引中注明。

苏共中央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

卡·馬克思

和

弗·恩格斯

1857年7月—1860年11月

THE NEW
AMERICAN CYCLOPÆDIA:

A

Popular Dictionary

OF

GENERAL KNOWLEDGE.

EDITED BY

GEORGE RIPLEY AND CHARLES A. DANA.

VOLUME I

A-ARAGUAY.

NEW YORK:

D. APPLETON AND COMPANY,

346 & 348 BROADWAY.

LONDON: 16 LITTLE BRITAIN.

M.DCCC.LVIII.

“美国新百科全书”第一卷的扉页

弗·恩格斯 軍 队¹

軍隊是國家為了進攻或防禦而維持的有組織的武裝集團。在古代世界的軍隊中，我們有比較可靠史料的第一支軍隊是埃及軍隊。它的光榮時代正好是拉美西斯二世(Sesostris)統治時期；在他統治的那個時期的許多遺迹上有記述他的功業的繪畫和碑文，這些都是我們考證埃及軍事狀況的主要的資料來源。埃及軍隊分為兩級：赫爾莫提布[hermotybi]和卡拉西爾[calasiri]；在最盛時代前者有16萬人，後者有25萬人。這兩級大概完全是以年齡或服役期限的長短而相互區分的，所以服滿一定的年限後，卡拉西爾就轉為赫爾莫提布或轉為後備兵。整個軍隊都分駐在各個特別的軍屯內，而且每個軍人獲得一大塊土地作為對他服役的報酬。這些軍屯主要分布在國家的北部，因為那里可能遭到亞洲鄰國的攻擊；只有少數幾個軍屯設立在尼羅河上游，因為埃塞俄比亞人不是很可怕的敵人。軍隊的力量在於它的步兵，特別是在於它的弓箭手。除後者外，軍隊還有使用不同武器而且按武器類型分編為營²的各種步兵隊：長矛隊、短劍隊、狼牙棍隊、投石隊等。步兵有許多戰車支援，每輛戰車上有武士二人：一名馭手，一名射箭手。在古迹中沒有看到描繪騎兵的畫。描繪騎馬的人的唯一圖畫屬於羅馬時代，看來埃及人從他們亞洲鄰國那里學會騎馬和使用騎兵的這種假定

是正确的。在較后的时期，像从古代历史学家关于这个問題的一致記載中所确切证实的那樣，埃及人有了許多騎兵，它們和古代的一切騎兵一样，在步兵的两翼上行动。埃及人的护身器具是由不同材料制成的盾牌、头盔、胸甲或鎖子甲。他們攻打城堡的方法有許多是希腊人和羅馬人所熟知的方法和計謀。他們有 *testudo* 或攻城槌、接近車³ 和云梯；加·威金逊爵士认为他們还懂得使用活动碉楼并善于挖掘地道，但这种說法只不过是一种假設罢了⁴。埃及人从薩美提克时代起就有了希腊雇佣兵，也屯田在下埃及。

亞述給我們提供了亚洲軍隊的最早的典型，这些亚洲軍隊为爭夺地中海和印度河之間的大片地区，曾打了一千多年仗。在这里和在埃及一样，我們主要的資料来源也是古物。根据这些古物判断，步兵装备和埃及的相似，虽然弓的作用似乎小一些，但护身器具和攻击的武器通常都制造精良，而且外表比較美观。此外，还因为帝国幅員广大，所以这里的武器种类繁多。主要的武器是长矛、弓、劍和匕首。薛西斯的軍隊中的亞述人，从繪画上来看，也是手持外包铁皮的狼牙棍。护身器具是头盔（常常做得很别致）、毡甲或皮甲和盾牌。战車依然是軍隊的重要部分；战車容納二人，而且馭手要用盾牌掩护弓箭手。在繪画上可以看到許多战車兵都是披着长鳞甲的。此外还有騎兵，我們正是在这里第一次看到了騎兵。在較早的雕塑品上，騎手是騎在不备鞍子的馬背上的；后来才采用一种像軟馬鞍一样的东西；而在一件雕塑品上則可看到像現今东方所使用的一种高馬鞍。这些騎兵同波斯人以及后来东方民族的騎兵未必有重大的差別。这是一种輕装的、非正規的騎兵，冲鋒时乱成一团，很容易被装备精良而沉着应战的步兵所击退，但对于已經混乱或潰敗了的軍隊却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因此，在繪

画上，騎兵在队形中位于战車兵之后，而战車兵看来是一种貴族兵。步兵战术在运动的規則上和队形的排列上显然取得了某些进步。弓箭手或是站在前面作战，这时他們每一个人都由盾牌手来掩护；或是站在后列，这时，第一和第二列的长矛手弯下腰或跪下来，以便弓箭手射箭。在圍攻城堡时，亚述人无疑是懂得使用活动碉楼和挖掘地道的，而从“以西結书”⁵中也許可以断定，他們构筑了一种类似土堤或土崗的东西——羅馬 agger〔堡垒〕的雛形，以便瞰制被圍的城堡。他們的活動碉楼和不动碉楼筑得和被圍要塞的圍牆一样高，或者更高些，以便瞰制圍牆。亚述人也使用攻城槌和接近車；因为他們的軍隊人数很多，所以他們能够把整条小河改道，以便接近所攻击的要塞的薄弱部，或利用干涸了的河床，作为进入这个要塞的通路。巴比倫的軍隊似乎也和亚述軍隊差不多，但沒有关于它們的具体的詳細材料。

波斯帝国的偉业归功于它的奠基者，即現今法尔西斯坦这个出騎手的地方的尙武的游牧民族，在这里騎兵一下子就获得了統治地位，在东方各国軍隊中騎兵从那时起一直到这些軍隊不久前采用現代欧洲式的軍事訓練时为止都占居这种地位。大流士·希斯塔斯普建立了常备軍，以控制被征服的各郡和防止各郡的薩特拉普即总督的頻繁的叛乱。这样，各郡都駐有在特派长官指揮下的警备队；此外，各城堡也駐有部队。供养这些部队的費用要由各郡担負。这支常备軍中还包括皇帝的近卫軍——1万名精选的、披着金碧輝煌的盔甲的步兵（“敢死队” Athanatoi）；出征时，一长列載着妻妾和僕役的車輛，还有載运粮秣和彈药的駱駝队伴随着他們；此外，在皇帝近卫軍中，还有1000名戟兵，1000名近卫騎兵和許多战車，并且其中有些战車还备有尖叉。大規模远征时，这

些兵力尚不敷使用，还要在帝国各郡普遍征兵。这些各式各样的队伍汇合成为一支真正的东方式军队，它包括了在装备和作战方法上不同的各种部队；有庞大的辎重队和无数的僕役随从。我们认为，希腊人所說的波斯军队人数众多，就是因为有这些僕役的缘故。士兵根据不同的民族，分别武装以弓、梭鏢、长矛、劍、狼牙棍、匕首、投石器等。各郡的部队有各自的指揮官；据希罗多德說，这些部队似乎分为十人队、百人队、千人队等，而且每由 10 人組成的战斗单位就有一名軍官来指揮。⁶ 大部队或各路军队通常由皇亲国戚統率。在步兵中，由波斯人和其他雅利安族人（米甸人和巴克特利亚人）組成 élite [精兵]。他們武装以弓、中等长度的矛和短劍等；头上纏着类似头巾的东西，身穿铁頁甲；盾大部分用柳条編成。但是，这些 élite 同波斯的其余步兵一样，每次遇到人数极少的希腊部队，总是遭到惨敗。这群动作迟鈍的烏合之众只能对斯巴达人和雅典人的最初的方陣作消极的抵抗，馬拉松会战、普拉迪会战、米卡列会战和温泉关会战⁷ 可以证明这一点。历史上最后一次出現在波斯军队中的战車，在极为平坦的地形上对付像波斯步兵本身那样的烏合之众可能还有用，但对付希腊人密集的长矛队或者对付适于在起伏地上行动的輕装部队，就毫无用处了。最小的障碍就可擋住战車。在交战的时候，馬匹惊馳，不服駕馭，反而踐踏自己的步兵。至于騎兵，那末在帝国較早的时期我們也很少有证据來說明它的质量很高。在适于騎兵作战的馬拉松平原上，波斯人有 1 万名騎兵，但他們沒有能够冲破雅典人的陣列。在較晚的时期，騎兵在格拉奈卡斯会战⁸ 中大显身手，那时它列成一綫，突然襲击徒涉过河后登上河岸的馬其頓纵队的先头部队，趁他們还没有来得及展开就把他們击退了。騎兵就这样在很长时间内

胜利地抵御了托勒密指揮下的亚历山大军队的前卫，一直到主力开到，輕装部队出现在它的两翼时为止，以后它由于沒有第二綫部队或預备队而不得不退却。但是在这个时期，波斯军队由于吸收了希腊成分，即由于薛西斯死后不久各个皇帝雇来了希腊雇佣兵而得到了加强；同时麦姆农在格拉奈卡斯会战中采用的騎兵战术也显然不是亚洲式的，即使我們沒有可靠的史料，也可以大胆地說，它受了希腊的影响。

希腊各国的军队是我們在军队組織編制方面具有丰富而确实史料的第一批军队。可以說，战术史，特别是步兵战术史，是和他們一同开始的。我們不去讲荷馬所描写的希腊英雄时代的軍事制度，那时还没有人知道騎兵，显貴和头領跟同样显貴的敌人在战車上相斗或下車决斗，而步兵似乎也不比亚洲步兵强多少；現在我們就从雅典极盛时代的军队談起。在雅典，每一自由民出身的男子都必須服兵役。只有那些担任公职的人，而在較早的时期，則还有第四等級即最貧穷的自由民，才能免服兵役。⁹ 这是以奴隶制为基础的民兵制度。凡是年滿 18 岁的青年都必須服兵役两年，特别是要担任边防勤务。在这个时期內，他們完成軍事訓練，以后一直到 60 岁都有服兵役的义务。战争爆发时，公民大会規定应征人数；只有在极端紧急的情况下才实行 levées en masse [全民武装] (panstratia)。每年由人民选举將軍 [strategi] 十人負責征召和建立这些部队，同时每一部落即菲拉 [phyle] 的成員則在一个專門的菲拉尔赫 [Phylarchus] 指揮之下編成支队。菲拉尔赫和塔克色阿赫 [taxiarchus] 即連长一样，也是由人民选举的。所有应征的人編为重步兵 (hoplitae)，用来編成方陣即有纵深的长矛手橫队；最初军队完全由这种重步兵組成，后来增加了輕装部队和騎兵，重步兵

就成为军队的主要核心——决定会战结局的兵种。方阵有各种不同的纵深；我们发现有关于纵深为 8、12、25 列的方阵的记载。重步兵的装备包括：胸甲或甲冑、头盔、椭圆形的盾、长矛和短剑。雅典方阵的威力在于攻击；它以猛烈的进攻出名，特别是自从米太雅第在马拉松会战中规定攻击时要加快步伐因而步兵以跑步冲向敌人以后，就更是如此。但是在防御上雅典方阵不如比较坚实而密集的斯巴达方阵。在马拉松会战中，雅典的整个军队由 1 万名重步兵构成重装方阵，而在普拉迪会战中他们除 8 000 名重步兵外，还有同样数量的轻步兵。由于波斯入侵的巨大危险，雅典不得不增加服役的人数；最贫穷的阶级——贫民——也列册当兵。后者组成轻装部队（*gymnetae, psili*）；他们或者完全没有护身器具，或者仅有一面盾；他们的武器是长矛和梭镖。随着雅典权势的扩大，他们的轻装部队便为同盟者的军队¹⁰，甚至还为雇佣兵所加强。以射箭手和投石手著称的阿卡尔纳尼亚人、埃托利亚人和克里特人加入了军队。此外，并组成了介乎轻装和重装之间的部队——培尔塔斯特 [*peltastae*]，他们装备得像轻步兵一样，但能攻占和扼守阵地。然而，这种部队直到在伯罗奔尼撒战争¹¹后被伊菲克拉特改编时，才有了很大的作用。雅典的轻装部队无论在定下作战决心时或者在执行决心时都因敏捷和迅速而享有很高的声望。在某些场合，可能是在起伏地上，他们甚至可以成功地与斯巴达方阵相抗衡。雅典建立骑兵是在共和国已经富强的时代。阿提卡的山地虽不利于这一兵种，但由于与盛产马匹因而最先建立骑兵的地区——特萨利亚和贝奥提亚——为邻，所以不久希腊的其他国家也都建立了骑兵。雅典骑兵最初有 300 人，以后增到 600 甚至 1 000 人，由最富有的公民组成，甚至在平时也是经常存在的。

这是军队中战斗力最强的部分，非常机警、敏捷和主动。在战斗中，骑兵和轻步兵一样，通常都配置在方阵的两翼。在较晚的时期，雅典人还编成了一支有 200 名马弓手(hippotoxotae)的雇佣兵部队。直到伯利克里时代为止，雅典军人是不领任何薪饷的。以后，他们才领到两个奥波尔（此外还发给两个奥波尔作为伙食费，伙食由军人自行解决），有时重步兵甚至可以领到两个德拉马。军官领双饷，骑兵领三份，高级军官领四份。仅重装骑兵在平时每年就花费 40 塔兰特（4 万美元），在战时则花费更多。战斗队形和战法都非常简单：方阵居中，兵士伸出长矛，并用盾牌掩护整个正面。他们向敌人的方阵进行全正面攻击。如果第一次攻击不能打乱敌人的战斗队形，则以剑进行格斗解决战斗。这时，轻步兵和骑兵或者是攻击敌人的轻步兵和骑兵，或者是在敌人方阵的翼侧和后方奋战，利用敌人队伍中任何小的混乱。如取得胜利，他们就进行追击，如遭到失败，则尽可能掩护退却。他们还被利用来进行侦察和袭击，在敌人行军时，特别是通过隘路时，扰乱敌人，力图截获敌人的辎重和捕捉掉队人员。因此，战斗队形非常简单，方阵总是作为一个整体来行动；方阵的较小单位之区分并不具有战术意义；这些单位的长官的任务只是监视方阵的队形，使其不致破坏或者在万一被破坏时可以迅速恢复。从上面举的几个例子中，我们已指出雅典军队在波斯战争时期的数量。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初期，参加野战的有 13 000 名重步兵，担任守备的有 16 000 人（这是些最年轻和最年老的兵士），另外还有 1 200 名骑手和 1 600 名弓箭手。根据倍克的计算，雅典派往叙拉古的军队有 38 560 人，后来去增援的达 26 000 人，共计约有 65 000 人。雅典在这次远征¹² 完全失败后所遭受的损失，确实不亚于法国在 1812 年俄国战局中所遭受

的損失。

在希腊各国中，斯巴达是 *par excellence* [最] 尚武的国家。如果说雅典人的普遍体育训练是锻炼技巧和增强体力同时并重，那末斯巴达人则着重增强军人的体力、培养坚韧不拔和刻苦耐劳的精神。他们把坚毅精神和保持军人荣誉看得比机警灵巧更为宝贵。虽然雅典人受到了在重装方阵的严格规定的位置上作战的训练，但需要时他们也能在轻装部队中作战。相反，斯巴达人仅仅受到在方阵中作战的训练。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出，在方阵决定战斗结局时，斯巴达人最后总是占上风的。在斯巴达，每一自由公民从 20 到 60 岁都列入军队的花名册。监察官 [ephoroi] 确定应征的人数，通常是从 30 到 40 岁的中年人中募集。和雅典一样，同一部落或同一地方的人员编在同一部队。军队的编制以莱喀古士所定的小队 (*enomotiae*) 为基础；两个小队组成一个中队 [pentecostes]，两个中队合成一个大队 [lochos]，8 个中队即 4 个大队组成一个联队 [mora]。色诺芬时代斯巴达军队的编制就是这样；而在较早时期，编制则似乎不同。联队的人数不定，由 400 人到 900 人；据说有一个时期曾有 600 个联队。这些自由斯巴达人的各种不同的队伍编成方阵；构成方阵的重步兵武装以长矛、短剑和系在脖子上的盾牌。以后，克利奥米尼采用了加里亚的一种用带子缚到左肘上的宽盾，使兵士的两手能自由活动。斯巴达人认为，他们的兵士在战败归来时丢失盾牌是耻辱的；保存盾牌就证明：退却是完全有秩序的，方阵是完整的；而单个的逃跑者要逃命时，当然就不得不丢掉他那笨重的盾牌。斯巴达方阵一般纵深有 8 列，但有时可把一翼配置在另一翼之后，使方阵纵深增加一倍。兵士大概走得很整齐，也能作一些极简单的队形变换，例如，每一兵士向左右转来变

換正面，以左右轉弯使一翼向前或者向后移动等，但是这些队形变换似乎是在較后的时期才采用的。斯巴达的方陣和雅典的方陣一样，在它們极盛时代只是进行全正面攻击。方陣各列之間的距离如下：行軍时为 6 英尺，攻击时为 3 英尺，而在迎击时則为 $1\frac{1}{2}$ 英尺。軍队由一个国王指揮，他和他的侍从武士(damosia)位于方陣的中央。以后，当自由斯巴达人大为减少时，方陣的人数就由无全权的珀里俄科〔perioeci〕¹³ 中選擇的武士来补充。騎兵从来不超过 600 人，每 50 人成一支队(ulami)。騎兵只掩护方陣的两翼。此外，还有由 élite〔精选的〕斯巴达青年騎手 300 名組成的一种队伍，但是他們下馬作战，形成一种保卫国王的重装卫队。在斯巴达的輕装部队中有斯基里特人——阿尔卡迪亚附近山地的居民，他們通常掩护左翼；此外，方陣的重步兵还带有僕役——赫罗泰¹⁴，后者在战斗中应起先驅兵的作用。例如，在普拉迪会战中，5 000 名重步兵就帶了 35 000 名輕装的赫罗泰，但是在历史上我們沒有看到有关他們行动的任何資料。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后，希腊人的简单的战术有了很大的变化。在列夫克特累会战¹⁵中，埃帕米农达斯曾以人数不多的忒拜軍队与人数极多而从沒有打过敗仗的斯巴达方陣相周旋。在这里如采取通常的全正面攻击就意味着肯定的失敗，因为这样会使埃帕米农达斯的两翼遭到正面較寬的敌人的包圍。因此，埃帕米农达斯不采用橫队进攻，而把自己的軍队排成长纵队，向斯巴达方陣中国王所在的那一翼攻击。他在这一决定性的地点上成功地突破了斯巴达軍队的陣綫；然后他調轉軍队向突破口的两側运动，他从两翼迂迴了方陣的被突破的陣綫，使方陣不打乱它的战术部署就不能形成新的正面。在曼提涅亚会战¹⁶中，斯巴达軍队增大了自

己的方陣的纵深，但忒拜纵队仍然又突破了它。斯巴达的阿革西拉烏斯、雅典的提摩太、伊菲克拉特和哈布里也在步兵战术上作了改变。伊菲克拉特改善了培尔塔斯特的編制，后者是一种輕步兵，但必要时能够成橫队作战。他們手持不大的圓盾和木柄的长矛，身穿結实的麻布甲冑。哈布里使方陣的前几列兵士在防禦中以跪姿迎击敌人的攻击。当时采用了充实的方队以及其他形式的纵队等，随之，各种战斗队形的展开，就成为初級战术的組成部分了。同时，各种輕步兵受到了更大的重視；希腊人还襲用了他們野蛮和半野蛮邻邦的各种武器，采用了馬弓手、步弓手、投石手等等。这时期大多数兵士都是雇佣兵。富有的公民自己不服兵役，乐于花錢雇人代替。原来方陣主要是軍隊中只允許自由公民加入的民族部分，現在却混入了无公民权的雇佣兵，因而质量就降低了。在馬其頓时代的前夜，希腊和它的殖民地，如同十八和十九世紀的瑞士一样，是兵痞和雇佣兵的市場。埃及法老在早期就成立了希腊部队。后来波斯国王把希腊雇佣兵部队編入自己的軍隊，使軍隊具有相当的稳定性。这些部队的头目真正成了十六世紀意大利雇佣兵队长式的人物。在这个时期，特别是雅典人，已采用了投擲石块、梭鏢和火球的各种軍用器械。伯利克里在圍攻塞莫斯城¹⁷的时候就已經使用了一些这样的器械。在进行圍攻时，在被圍城堡周圍构筑一道带有壕沟或护牆的包圍綫，同时把各种軍用器械配置在城牆附近的瞰制陣地上。为了破坏城牆通常需要挖掘地道。在强攻时，纵队列成森納斯皮斯姆〔synaspismus〕式的战斗队形，也就是外面的几列兵士把盾拿在前面，而里面的几列兵士則把盾举在头上，这样就形成一种防避敌人石彈的屏障（羅馬人把这种屏障叫做 *testudo*）。

正当希腊兵法如此首先致力于用可随意摆布的雇佣兵建立各种新的灵巧的部队，致力于仿效或创立各种新的轻装部队而废弃古老的多立斯重装方阵(在那个时代是唯一能够却敌致胜的)的时候，又兴起了一个帝国，它吸取了所有真正的改革成果，创立了一支由重步兵组成的军队，其规模非常之大，使得任何一支军队同它作战时，都不能抵御它的攻势。马其顿的菲力浦建立了一支拥有3万步兵和3000骑兵的常备军。这支军队的主要部分是大约有16000或18000人的大方阵，这种方阵是按斯巴达方阵的原则编成的，但装备比较好。希腊式小盾牌为加里亚式长方形大盾牌所代替，中等长度的矛也为长24英尺的马其顿长矛(sarisa)所代替了。这种方阵的纵深在菲力浦时代为8到10、12、24列。由于马其顿长矛很长，前6列中每一列如把长矛端平，就可使矛尖突出在第一列的前面。要使1000—2000人这样宽的正面整齐前进，就得有很好的基本训练，因此他们不断地进行操练。亚历山大最后健全了这种组织。他的方阵通常有16384人，纵深16列，每列1024人。16人一行，叫做洛赫[lochus]，由站在前列的洛赫果斯[lochagus]带领。2个洛赫为1个第洛赫[dilochus]，2个第洛赫为1个泰特拉赫[tetrarchy]，2个泰特拉赫为1个塔克色阿赫[taxiarchy]，2个塔克色阿赫为1个克森纳加[xenagy]即辛塔格马[syntagma]，也就是纵横各为16人的一种队形。这是编队的单位；军队行军时，按克森纳加排成纵队，正面16人。16个克森纳加，即8个潘特科西阿赫[pentecosiarchies]或4个希利阿赫[chiliarchae]或2个泰拉赫[telarchies]，组成1个小方阵；2个小方阵组成1个中方阵，而4个小方阵则组成1个大方阵，即所说的方阵。所有这些单位各有自己的指挥官。右翼的中方阵称为方阵

之首，左翼的中方陣称为方陣之尾或末。每当方陣需要特别稳定的时候，左翼即在右翼后占领位置；排成横 512 人和纵 32 人的队形。另一方面，后 8 列展开在前 8 列之左时，正面就加宽了一倍，纵深则减为 8 列。列与列、行与行之间的距离与斯巴达的方陣相同，但密集队形很密，以致在方陣内单个兵士无法转动。交战时，方陣各单位之间不许有间隔；方陣形成一个绵密的正面，en muraille〔像一堵墙似地〕向敌人进攻。方陣完全由馬其頓志願兵組成，但在征服希腊¹⁸以后，希腊人也同样可以加入。所有的兵士都是重步兵。除盾牌和长矛以外，他们还佩带头盔和劍，虽然在这长矛如林的攻击之后，并不常常需要用短劍进行白刃格斗。但是当方陣和羅馬軍团相遇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整个方陣体系，自多立斯时代的早期起一直到馬其頓帝国灭亡止，都有一个很大的缺点，那就是缺乏灵活性。这些纵深和正面都很大的行列只能在平坦而开阔的地形上保持队形，并整齐地移动。每遇障碍，方陣就得排成纵队，但采取这样的队形，方陣就不能作战。此外，方陣沒有第二綫或預备队。因此，如果方陣所遇到的敵軍分成为小部队，能够不打乱战斗队形即繞过起伏地，而且排成几綫，可以相互支援，那末在这样的情形下，方陣就不得不在起伏地作战，在这里这个新的敌人就会把它各个击破。但是对于像亚历山大在阿尔貝雷会战¹⁹中所遇到的那样的敌人，他的两个大方陣显然是无敌的。除了重装的基干步兵外，亚历山大还有由 6 000 名希拉斯皮斯特〔hyraspistae〕編成的近卫軍，他們的装备更重：盾更大，矛更长。他的輕步兵由手持較小的銀盾的阿尔革拉斯皮特〔argyraspidae〕和許多培尔塔斯特組成；这两种兵編成半方陣，其人数通常为 8 192 人；他們既可以成散开队形作战，又可以像重步兵一样成横队作

战，他們的方陣常常也能做到这一点。馬其頓騎兵从馬其頓和特薩利亚的貴族青年中招募；后来希腊本土的騎兵队也加入了。騎兵分为連(ilae)，仅仅馬其頓貴族就編成 8 个騎兵連。这种騎兵是我們可以称之为重騎兵的那一类；他們戴头盔、披鎧甲并有铁頁护脛，佩长剑，持长矛。馬也有铁甲护头。这种騎兵叫做卡塔夫拉克特 [cataphractae]，深为菲力浦和亚历山大重視；后者在阿尔貝雷会战中曾用这种騎兵进行决定性的机动：他先击潰波斯軍的一翼，并进行追击，然后繞过他們的中央，从后方襲击另一翼。这种騎兵在攻击时采用各种队形：橫队，普通的长方形纵队，菱形或楔形纵队。輕騎兵沒有护身器具，持梭鏢和輕的短矛；还有一种阿克罗巴利斯特 [acrobalistae]，即馬弓手队。这种兵担任警戒、巡邏、偵察等任务，总之是担任非正規的战斗行动。这种兵在色雷斯和伊利亚部落中招募。此外，这两个部落还有几千人充当非正規步兵。亚历山大創立了一种新的兵，叫做第馬赫 [dimachae]，这是一种既可乘馬作战又可徒步作战的騎兵。这一兵种所以引起我們的注意，是因为它曾为后人所仿效。十六世紀及其以后几世紀的龙騎兵就完全是对这一兵种的摹仿，我們在下面还将談到这一点。但是，我們沒有任何材料可以证明，这种古希腊时代的两用兵比現代的龙騎兵能更順利地完成它的双重任务。

亚历山大用来征服从地中海至奥克苏斯河和薩特里日河之間地区的那支軍队的編成就是这样。这支軍队的人数，在阿尔貝雷会战时，有两个重步兵的大方陣(約 3 万人)、两个培尔塔斯特的半方陣(16 000 人)、4 000 騎兵和 6 000 非正規軍，总共約 56 000 人。在格拉奈卡斯会战时，这支包括各兵种的軍队共計 35 000 人，其中包括 5 000 騎兵。

关于迦太基军队的詳細情况我們一点也不知道；甚至关于汉尼拔曾率領多少军队越过阿尔卑斯山也有爭論。同亚历山大創建的編制相比較，他的后继者的军队并沒有任何改进。在战斗中使用战象只有很短一个时期，因为这种动物怕火，它們对自己军队的危害甚于对敌人的危害。最后时期(亚該亚同盟²⁰时期)的希腊军队一部分是按照馬其頓的样式，一部分是按照羅馬的样式組織起来的。

羅馬军队提供了在尚不知如何使用火药的时代所发明的最完善的一套步兵战术。它保持重步兵和密集編队占优势，还做到：各个小的单位具有机动性；能在起伏地上作战；依次配备成几綫，一部分用于支援和替换，一部分用作强大的預备队；最后，采用了一种比斯巴达的訓練方法目的性更明确的单个兵士的訓練方法。因此，羅馬军队战胜了同他們作战的一切军队——无论是馬其頓方陣或者是努米迪亚騎兵。

在羅馬，凡年龄在17到45或50岁的公民，只要不是屬於最低的一級或者还没有参加过20次步兵战斗或10次騎兵战斗，就都有服兵役的义务。但是通常选入军队的只是比較年輕的人。对兵士的訓練是非常严格的，目的在于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增强兵士的体力。除了使用武器和作各种运动的正規訓練以外，还广泛地练习跑步、跳跃、撑竿跳高、攀登、格斗、游泳——先脫去衣服游泳，然后携带全副装备游泳。每个兵士携带40—60磅的全副行軍装备，以每小时4英里的速度作长时间的行軍。軍事訓練中也包括练习使用掘壕工具以及迅速地构筑营垒。不仅新兵，而且軍团的老兵都必須进行这些练习，以便保持充沛的体力和灵巧，养成吃苦耐劳的习惯。这样的兵士确实能够征服世界。

在共和国的极盛时代，通常有两支执政官的军队，而每一支军队又由两个军团和同盟者的部队（其步兵人数与罗马同，骑兵比罗马多一倍）组成。招募新兵在卡皮托里山或马尔斯广场的公民大会上进行；从每一特里布斯²¹中挑选出同样的人数；这些新兵平均分配到4个军团里，使之满额。有些因年龄或多次参加战斗而免除兵役的公民常常重新志愿入伍。新兵举行宣誓后，即解散回家听候召集。召集时，最年轻的和最贫穷的编入轻装兵〔velitis〕，其次的则按年龄和财产状况编入长矛兵〔hastati〕和主力兵〔principis〕，最年长的和最富的则编入后备兵〔triarorum〕。每一军团有1200轻装兵、1200长矛兵、1200主力兵、600后备兵和300骑兵（骑士²²），共4500人。长矛兵、主力兵和后备兵又各分为10个中队〔manipuli〕即连，而每一个中队又补充以同一数额的轻装兵。轻装兵（rorarii, accensi, ferentarii）^①编成军团的轻步兵，与骑兵一起列于军团的两翼。长矛兵列为第一线，主力兵列为第二线；他们最初都装备长矛。后备兵为预备队，装备投枪〔pilum〕，这是一种较短的、但是非常沉重和厉害的标枪。他们在用短剑同敌人进行白刃格斗之前先向敌人的前列投标枪。每一中队由正百人长〔centurio〕指挥，副百人长则作为他的助手。百人长的等级由他在军团中的位置来决定；最低的是最后一个即第十长矛兵中队的副百人长，最高的是第一后备兵中队的正百人长（primus pilus），军团的指挥官不在时，他甚至负责指挥整个军团。通常 primus pilus 指挥所有的后备兵，同样，primus princeps（第一主力兵中队的正百人长）则指挥所有的主力兵，primus hastatus〔第一长矛兵中队

① 站在后备兵后面的轻装部队、轻装辅助部队、弓箭手。——编者注

的正百人长] 則指揮軍團所有的长矛兵。在比較早的时期，軍團由 6 个軍事护民官輪流指揮，每人指揮两个月。在第一次国内战争²³ 以后，每个軍團都設有次帥，他是軍團的常任长官；护民官这时大部分成为担任參謀或行政职务的人物。三綫兵士在武器上的差別到馬利烏斯时代就消失了。投枪开始装备給軍團三綫的所有兵士，从此以后它就成为羅馬人的民族武器了。以前由于年龄和服役年限长短而产生的三綫兵士在质量上的差別不久也消失了。照薩呂斯提烏斯的說法，长矛兵、主力兵、后备兵最后一次出現是在梅泰魯斯同尤古尔塔会战²⁴ 中。馬利烏斯把軍團的 30 个中队縮編为 10 个大队 [cohortis]，分为两綫，每一綫 5 个大队。同时，大队的額定人数增加到了 600 人；在 primus pilus 指揮下的第一大队持有軍團的鷹徽²⁵。騎兵像从前一样分編为小队 [turma]，每一小队有兵士 30 人和十人长 [decurio] 3 人，其中第一人指揮小队。羅馬步兵的护身器具是长 4 英尺寬 2 1/2 英尺的橢圓形的木盾，外包皮革，用铁釘鉚合，中間有突起部分 (umbo) 以抵擋长矛的刺击。头盔是銅制的，一般后部較长以掩护頸部，用包有銅頁的皮带系在头上。約一英尺見方的胸甲，用鱗狀的皮带由肩上套下，系在皮鎧甲上。百人长的护身器具是包有銅頁的鎖子甲。右腿由于伸出时易受到佩劍的碰撞，因此用銅頁包裹着。短劍用于刺杀比用于砍劈更多，所以除短劍外，兵士还携有一种重投枪，这种投枪的杆长 4 1/2 英尺，铁尖长 1 1/2 英尺，因此全长約 6 英尺，杆的横断面为 2 1/2 平方英寸，重約 10 或 11 磅。这种投枪投擲 10—15 步远的距离，它常常可以穿透盾和胸甲，因此几乎总能击倒敌人。輕装兵装备較輕的短梭标。在共和国的后一时期，当蛮族組成的輔助部队开始执行輕装部队的勤务时，这种步兵就完全消失了。騎

兵装备有和步兵相同的护身器具，并持有矛和較长的劍。但是羅馬的民族騎兵并不是十分出色的騎兵，它們宁願在徒步队形中作战。后来，它就完全被廢除了，为努米迪亚、西班牙、高卢和日耳曼的騎兵所代替。

羅馬軍队的战术队形具有很大的运动性。列队时中队之間的間隙同每一中队正面的寬度相等，中队的纵深在 5、6 列到 10 列之間。第二綫各中队配置在第一綫各中队的間隙的后面；后备兵站得更靠后些，但正面已經是綿密的。根据情况，每綫的各个中队可靠攏而形成綿密的正面，或者第二綫的各个中队前出并填补第一綫的間隙，最后，如果有較大的纵深时，每个主力兵中队站到相应的长矛兵中队的后面，使纵深加倍。当被迫同皮洛士的战象交鋒²⁶时，所有三綫都留有空隙，以便給战象空出一条穿过整个战斗队形的直路，而且每个中队都掩护前面的一个中队。这种队形在一切方面順利地克服了方陣动轉不灵的缺点。軍团能在方陣不敢去的地形上前进和机动而不攪乱战斗队形，并且不致冒很大的危險。繞过障碍物时，通常至多只需要一两个中队縮小正面，而且在几分钟內正面即可恢复。軍团能用輕装部队掩护整个正面，因为他們能够在各綫中队前进时通过間隙向后撤退。但主要的优点是軍队排成了几綫，可根据情况依次投入战斗。而采用方陣体系时，战斗的結局决定于一次突击。預备队內沒有在失利时能加入战斗的生力軍，——实际上这种情况根本沒有預見到。軍团可使用自己的輕装部队和騎兵，同敌人全綫接战；它可以用第一綫的长矛兵抵御敌人方陣的攻击，而长矛兵却不是那样容易被击败的，因为这首先必須把 10 个中队中的至少 6 个中队各个击破；它还可以出动主力兵疲憊敌人，而最后用后备兵去取得胜利。这样，統帥

就掌握了对军队和会战进程的指挥，而方阵则一旦交锋，就把全部力量拖入其中，并且必须把战斗进行到底。如果罗马的统帅想要中止会战，军团的组成使他能够以预备队占领阵地，然后已投入战斗的部队可由间隙后撤，自行占领阵地。在一切情况下，总有一部分军队保持完整的队形，因为即使后备兵被击退，但他们后面仍有已排列起来的第一、二两线。当弗拉米尼努斯的军团在特萨利亚平原同菲力浦的方阵作战²⁷时，他们第一次攻击一下就被击退了，但攻击一个接着一个；马其顿军队开始疲惫了，他们的严整的战斗队形部分地被削弱了；凡是显露紊乱征候的地方，就有企图楔入这个笨拙不灵的人群中的罗马中队出现。最后，当20个中队自翼侧和后方攻击方阵时，战斗队形就不可能保持住了，纵深的队形瓦解了，变成了四处逃窜的人群，会战终于失败。为了对付骑兵，军团排列成 *orbis*——一种以辎重居中的特殊的方队。行军中可能遭到攻击时，军团则排列为 *legio quadrata*——一种以辎重居中而正面宽大的特殊的长纵队。当然这只有在开阔的平原上，在可以照直运动的地方才能应用。

在凯撒时代，军团多半是在意大利利用招收志愿兵的方法来补充的。在同盟战争²⁸以后，公民权以及随之而来的服兵役的义务扩大到了整个意大利，因此，这时适于服兵役的人员便大大超过了需要。军餉几乎等于雇工的工资；因此，新兵绰绰有余，甚至不需要实行强迫征兵的办法。只有在特殊的情况下，军团才在各省招募新兵；例如，第五军团就是凯撒在罗马高卢²⁹招募的，但后来这个军团的兵士 *en masse* [毫无例外地] 都取得了罗马的公民权。军团绝对没有达到过4500人的编制人数；例如，凯撒的各个军团就很少超过3000人。他们宁愿把新兵编成新军团 (*legiones tiro-*

num——〔新兵軍团〕),而不願把新兵和老軍团的老兵混編在一起;这些新編的軍团最初不允許参加野战,主要使用它們来警卫兵营。軍团分为 10 个大队,每一大队有 3 个中队。长矛兵、主力兵、后备兵等名称仍然保存,它仅仅是为了按上述制度表明指揮官的等級;对于普通兵士來說,这些名称已沒有任何意义了。每个軍团第一大队的 6 个百人长有权参加軍事會議。百人长都是普通兵士出身,很少取得比这更高的地位;由受过教育的青年人組成的主帅本人的参謀部是培养高級軍官的学校,这些青年人会很快地提升到軍事护民官一級,然后又提升到次帅〔legatus〕一級。兵士的武器仍然是投枪和短劍。除了装具外,兵士还要背負 35 到 60 磅的行李。携带行李的用具非常笨重,以致兵士在准备战斗时必须先把行李卸下。部队野营的用具由驢馬馱載,一个軍团需要 500 匹左右。每一軍团都有自己的鷹徽,每一大队都有自己的旗帜。凱撒从自己的軍团中选拔一定数量的兵士 (antesignani) 担任輕步兵,这些人員既要适于担任輕装部队勤务,又要适于在橫队中进行近战。此外,他还有各省的輔助部队:克里特島的弓箭手,巴利阿里群島的投石手,高卢和努米迪亚部队以及日耳曼雇佣兵。他的騎兵一部分由高卢部队組成,一部分由日耳曼部队組成。羅馬的輕装兵和騎兵在这以前不久就消失了。

軍队的参謀部由元老院任命的次帅組成;他們是主帅的助手,主帅派他們担任各独立部队或战斗单位的指揮官。凱撒第一次委派特任次帅为軍团的常任指揮官。如次帅不敷分配,則由財務官〔quaestor〕担任軍团的指揮。他本人主管軍队的財務和軍需,同时有許多官吏和傳令官〔apparitores〕帮助他。参謀部还有派来担任副官和值日官的軍事护民官和上述志願入伍的青年 (contuber-

nales, comites praetorii——〔主帅的随从人员〕；但在会战时他们和普通兵士一样，加入由大本营的执法官〔lictoris〕、官吏、僕役、密探 (speculatores) 和傳令官組成的 cohors praetoria〔主帅的随从大队〕作战。此外，主帅还有一种由老兵組成的私人卫队，这些老兵是应自己的老长官的召唤而重新志願入伍的。这种卫队在行軍中乘馬，但徒步作战，他們被认为是軍队中的 élite〔精兵〕；他們掌管和保护 vexillum——作为全軍标志的旗帜。作战时，凱撒通常把軍队列为三綫：每一軍团的 4 个大队为第一綫，第二和第三綫各 3 个大队；同时第二綫各大队位于第一綫各大队的間隙之后。第二綫必須支援第一綫；第三綫是对敌人正面或翼側进行决定性机动以及击退敌人决定性突击的总預备队。如果一旦因敌人向翼側迂迴而必須延长正面时，則軍队只列为两綫。至于列为一綫 (acies simplex〔普通的战斗队形〕)，則只在万不得已时才这样做，那时在大队之間不留間隙；但是在保卫兵营时，这种队形就成了常規，因为一綫的纵深也仍然有 8—10 列，可以由垒墙上排列不下的兵士組成預备队。

奥古斯都完成了把羅馬軍队变为常备的正規軍的事业。他把 25 个軍团分駐在整个帝国境内：8 个軍团配置在萊茵(他們被視為全軍的主力——praecipium robur)，3 个軍团配置在西班牙，2 个軍团配置在非洲，2 个軍团配置在埃及，4 个軍团配置在叙利亚和小亞細亞，6 个軍团配置在多瑙河流域各省。駐在意大利的軍队全部是在意大利本土征召的精銳部队，是皇家近卫軍；近卫軍起先由 12 个大队組成，以后由 14 个大队組成；此外，羅馬城还有原先被解放了的奴隶組成的市警备队 (vigiles〔武装守卫〕) 7 个大队。除了这支正規軍以外，各省仍必須編成輕装的輔助部队，这时他們大

部分已变成一种担任警备和警察勤务的民兵了。但是在受到袭击威胁的边境上,不仅使用这些辅助部队,而且使用外籍雇佣兵来担任战斗勤务。在图拉真时代,军团的数量增加到 30 个,及至赛普提米乌斯·谢维路斯时代又增加到 33 个。军团除番号以外,还按其驻地命名(L. Germanica, L. Italica [日耳曼军团、意大利军团]),按皇帝称号命名(L. Augusta [奥古斯都军团]),按神名命名(L. Primigenia, L. Apollinaris [丘必特军团、阿波罗军团])或按授予他们的奖章命名(L. fidelis, L. pia, L. invicta [效忠军团、虔信军团、无敌军团])。军团的编制有了一些改变。这时,指挥军团的人叫做司令官 [praefectus]。第一大队在人数上增加了一倍 (cohors milliaria [千人队]),军团的额定人数增加为步兵 6 100 人,骑兵 726 人;这是最低限额,必要时尚可增补一个或一个以上的 cohors milliaria。Cohors milliaria 由军事护民官指挥,其余的大队则由护民官或 praepositi [长官] 指挥;因此,百人长的官衔这时就成为下级指挥官的官衔了。通常参加军团的是释放了的奴隶、奴隶和各省居民,总之是各色各样的人。在意大利,只有禁卫兵才必须是罗马公民,但是以后这一规定也取消了。因此,军队中的罗马人很快地就被淹没在野蛮的和半野蛮的、罗马化的和非罗马化的成分的洪流之中了;只有指挥官仍然是罗马人。军队成分的这种恶化也立即反映在它的装备和战术上。重胸甲和投枪被取消了;造就世界征服者的疲劳的训练制度开始为人们厌弃;僕役和豪华奢侈对军队已成为必需,impedimenta(辎重)随着军队吃苦耐劳的精神的削弱而增加了。就像在希腊一样,衰落的特点表现在轻视重装的基于步兵,迷恋各种轻武器和搬用野蛮人的武器和战术。因此,出现了许多装备有各种各样的投掷武器的轻装兵(如 auxiliatores,

exculcatores, jaculatores, excursatores, praecursatores, scutati, funditores, balistarii, tragularii〔輔助兵、前卫部队、长矛投擲手或梭鏢投擲手、偵察兵、先驅兵、盾牌手、投石手、弩炮手、带索长矛投擲手〕，而据維格齐說，騎兵改进的方向是仿效哥特人、阿兰人和匈奴人³⁰。最后，羅馬人和野蛮人之間在装具和武器上的一切差別都消失了，而在体力上和精神上都占优势的日耳曼人就跨过已丧失羅馬特征的軍团的遺骸而前进了。

因此，同日耳曼人对西方的征服相抗衡的，就只有古羅馬战术微弱的傳統、它的可怜的殘余了；但是甚至这点可怜的殘余这时也一扫而光了。整个中世紀在战术发展方面，也像在其他科学方面一样，是一个毫无收获的时代。封建制度虽然按其起源來說也是一种軍事組織，但本质上却是和一切紀律不相容的。大諸侯及其軍队的暴动和叛离是寻常的現象。給各首領下达命令常常成了喧嚷不休的軍事會議，因而要进行任何大規模的軍事行动是不可能的。所以，战争很少在决定性的地段进行；为了爭夺某一地点，需要許多次征战。在整个这一时期（概略地指六世紀至十二世紀这个混乱时期），唯一大規模的軍事行动是德意志皇帝对意大利的远征和十字軍远征³¹，而且無論这一次或那一次的軍事行动都同样没有什么結果。

由封建的僕役和部分农民补充的中世紀的步兵，主要是些长矛手，他們大都无济于事。单枪匹馬冲入这个沒有保护的人群之中乱劈乱杀，这是从头到脚裹以铁甲的騎士的拿手好戏。当欧洲大陆上的一部分步兵装备以弩的时候，英国农民的民族武器則是大弓。这种大弓是一种非常可怕的武器，它使英国人在克雷西、普瓦提埃和阿津庫尔等会战³²中取得了对法国人的优势。雨水常常

会使弩失效，而这种大弓却不怕雨，它可以把箭射出 200 碼以外，只比旧式滑膛火枪的射程稍小一些。箭可以穿透一英寸厚的木板，甚至可以穿透胸甲。因此，大弓甚至对最初的輕火器也还长期保持着它的优势地位，不仅如此，当时的火枪每装填和发射一次，大弓就可以連射六次；甚至在十六世紀末，伊丽莎白女王还企图重新把这种民族的大弓列为战斗的武器。这种大弓对付騎兵特別有效，即使重装騎手的披甲可以防避箭矢，但箭矢却可以射伤或者射死馬匹，从馬上摔下的騎士会因此而无法战斗，并且常常被俘。弓箭手或者成散开队形，或者成橫队作战。在中世紀，騎兵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兵种。全身披甲的騎士是历史上首次出現的一种有战斗力的、采用正規队形攻击的重騎兵。亚历山大的卡塔夫拉克特虽然也曾决定过阿尔貝雷会战的結局，但究竟是例外，所以在那以后我們就再沒有听到它的傳說了，而且在古代史的整个后一时期，步兵始終在戰場上保持着自己的优势。因此，中世紀所賜給我們的唯一进步是騎兵的創立，我們时代的騎兵就是从那个时代的騎兵直接傳下来的。然而这种騎兵的笨重程度，可以由下列事实来证明：在整个中世紀，騎兵是装备笨重、行动緩慢的兵种，而一切輕装部队的勤务和迅速的运动都是由步兵来担任的。不过，騎士并不常常成密集队形作战。他們宁願一个对一个地决斗或者驅入敌人的步兵群中；因此，作战方法就又回复到荷馬时代了。当騎士成密集队形行动时，他們就或者成橫队（騎士在第一列，比較輕装的侍从兵在第二列），或者成长纵队攻击。通常，这种攻击只有用来对付敵軍的騎士（重装騎手）；如果对付步兵，这种攻击就是白白浪費兵力。馬匹本身的披甲和騎手的披甲加重了馬匹的負擔，使它只能緩慢地作短距离的运动。因此，在十字軍远征以及在波兰和西

里西亚同蒙古人作战的时期³³，这种行动缓慢的騎兵經常处于极端疲憊的状态中，最后终于被东方的行动迅速的輕騎兵击败。在奥地利和勃艮第对瑞士的战争³⁴中，重装騎手在难通行的地形上陷于困境，不得不徒步而行，并构成比馬其頓方陣更为动轉不灵的方陣；在狭谷中，敌人从山上往下滾木礮石，結果方陣的战术队形紊乱了，而后就被敌人坚决的攻击所打散。

到十四世紀，有了一种比較輕便的騎兵，一部分弓箭手为了便于移动，也乘馬行进；但是由于使用了那种注定使整个作战方法改变的新因素——火药，这些和其他一些改进，不久就成为无用的东西而被廢棄或者具有另一种意义了。

法国和欧洲其他国家是从西班牙的阿拉伯人那里得知火药的制造和使用的，而阿拉伯人則是从他們东面的各国人民那里学来的，后者却又是从最初的发明者——中国人那里学到的。在十四世紀上半叶，欧洲軍隊最先开始采用火炮；这是一种发射石彈的笨重的大火炮，只适用于圍攻战。但是不久就发明了輕火器。1364年，意大利的佩魯賈城有了500支輕火器，它們身長約8英寸；这种火器后来就发展为皮斯托尔（即手枪，因托斯卡納省的皮斯托亚城而得名）。不久以后，又制造出較长和較重的輕火器——明火枪，和我們現在的枪相仿；但是，由于枪身短而重，明火枪只能射到很短的距离，而导火索是准确瞄准的几乎不可克服的障碍；此外，它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缺点。到十四世紀末，在西欧任何一国軍隊都已有炮兵和装备明火枪的部队了。但是，新武器对整个战术的影响是极不显著的。無論是火炮或者是輕火器装填彈药都需要很长的時間，而且又非常笨重和昂貴，因此甚至到1450年也还不能代替弩。

但是封建制度的总崩潰和城市的兴起促使军队的成分发生了变化。大諸侯或者像在法国那样臣服于中央政权，或者像在德国和意大利那样变成了类似独立君主的君主。下层貴族的力量为联合城市共同行动的中央政权所粉碎。封建的军队不再存在了，新的军队开始由大批的雇佣兵編成，因为封建制度的瓦解使得雇佣兵获得了誰出錢就为誰服务的自由。这样就产生了一种类似常备军的军队；但是这些雇佣兵，这些来自各民族的人們，很难使他們服从紀律，而且又不能很按时給他們发薪餉，所以惹出了很大的乱子。因此，法国国王查理七世成立了由本国人組成的常备军。1445年，他征召了15个compagnies d'ordonnance^①，每連600人，共有騎兵9000人，分駐在王国的各城并按时領取薪餉。每連分为100个长矛手組，长矛手組由重装騎手1人、弓箭手3人、侍从兵1人和侍童1人組成。可見，他們是重騎兵和馬弓手的混合体，当然这两种兵在会战中都是单独行动的。1448年，他增补16000名自由射手归4个將軍指揮，每人指揮8个連，每連500人。所有的弓箭手都备有弩。他們由教区征召和武装起来，而且被免除了一切捐稅。这种军队可以說是近代的第一支常备军。

到現代战术发展的这个最初阶段的末期，战术仍然是它脱离中世紀混乱状态时的那个样子，当时的情况大致如下：由雇佣兵組成的大部分步兵装备有长矛和短劍、胸甲和头盔。他們在交战时密集成群，但是由于装备和訓練都比封建的步兵好，所以在战斗中比較坚定而有秩序。定期征召的新兵和以当兵为职业的雇佣兵，显然比偶尔征召的新兵和封建僕役的烏合之众高出一筹。这时，

① 敕令連——根据国王的敕令而成立的騎兵連。——編者注

重騎兵也往往认为必須以密集的队形攻击步兵。輕步兵仍然以弓箭手为主，但在先驅兵中已广泛使用輕火器了。騎兵还是主要的兵种；重騎兵——裹以铁甲的重装騎手——已經不是在任何时候都必須由貴族担任，而且已从过去的騎士式和荷馬式的作战方法轉而采用密集队形的比較单調的攻击了。不过这时大家都认为这种騎兵过于笨重，于是就开始想出各种办法来建立一种比較灵便的騎兵。如上面所說的，馬弓手势必已經部分地弥补了这个缺陷；意大利和它的邻国开始采用一种非正規兵斯特拉底阿特〔stradioti〕——由波斯尼亚和阿尔巴尼亚雇佣兵組成的土耳其式的輕騎兵。人們非常害怕这种騎兵，特别是在追击时。波兰和匈牙利除了模仿西方建立的重騎兵以外，还保留着本民族的輕騎兵。炮兵仍处于幼年时代。那时的重炮固然曾經运到战场上，但一經占领陣地，就无法轉移了；火药很坏，彈药的装填既困难又緩慢，而用石彈发射，則仅能发射到很短的距离。

十五世紀末和十六世紀初立刻在两个方面有了进步：法国人改良了火炮，西班牙人使步兵具有了新的特性。法国国王查理八世使火炮变得相当灵便，不仅可以把它拉到战场上，而且可以在战斗时变换陣地，在軍隊移动时随軍隊前进（不过那时軍隊的移动并不很迅速）。因此，查理八世是野战炮兵的創始者。他的火炮装置在带車輪的炮架上，由許多馬匹拉曳，比意大利人的笨重的旧式火炮（用犍牛馱运）不知要强多少倍。这种火炮給意大利步兵的长纵队造成极大的損失，以致馬基雅弗利写他的“兵法”³⁵一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想出一种队形来防止这种炮兵对步兵的杀伤。在馬利尼亞諾会战³⁶中，由于这种火炮射击效果好、移动灵便，并且从翼側陣地对瑞士軍隊的战斗队形进行轰击，法国国王弗朗斯瓦一

世才得以击潰瑞士的长矛队。然而，长矛在步兵中的优势消失了。西班牙人改良了当时通用的輕火器（明火枪），并用以装备正規的重步兵。他們的火枪（hacquebutte）是一种重的长管武器，枪膛可容納重 2 盎斯的子彈，发射时架在叉架上。这种火枪所发射的子彈可以穿透最坚固的胸甲，因此它在同重騎兵战斗时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一当騎手落馬，重騎兵就陷入混乱之中。每一长矛手連配备 10—15 名火枪手，在帕維亞会战³⁷ 中，他們射击的效力使联军和敌人都感到惊異。弗龙茲堡曾說，在这次会战中，这种火枪发射一次通常就射死几个人和几匹馬。从此以后，西班牙步兵的优势就开始了，并且繼續了一百多年。

由尼德兰起义引起的战争³⁸ 对軍队的編制有重大的影响。不論是西班牙人或是荷兰人都大大改善了各兵种。在这以前，每一个願意加入雇佣軍的人都必須自备全套装具和武器，并会使用自己的武器。但是在不大的地区持續了 40 年之久的這場长期战争中，这种合适的新兵很快就感到不够用了。荷兰人不得不满足于他們所能搜罗到的体格适合的志願兵，而且政府也不得不对他們进行訓練。拿騷的摩里茨編写了近代第一部操典，从而为整个軍队的統一訓練奠定了基础。步兵又重新开始操练步伐了；他們已經变得更整齐划一和紧密了。这时他們被編为較小的单位：过去每一連有 400—500 人，这时减少到 150—200 人，并且 10 个連編成一个团。改良的火枪排挤了长矛；整个步兵有三分之一是火枪手，和长矛手混編在一个連內。长矛手只有在白刃格斗中才需要，他們仍然保留了头盔、胸甲和铁护手，火枪手則沒有任何护身器具。长矛手通常排为两列，火枪手排为 5—8 列；第一列齐射后即后退，重新装彈。騎兵的变化更大，在这方面拿騷的摩里茨再次起

到了主导的作用。由于不可能建立由重装騎手組成的重騎兵，他就建立了輕騎兵。这种騎兵是他在德国招募的，装备以头盔、胸甲、护肘、铁护手和高筒靴；但是他們只有长矛，不能同重装的西班牙騎兵相抗衡，所以他就給他們装备双刃刀和长手枪。这种同我們現代的胸甲騎兵相近似的新式騎兵，很快就表明他們比人数較少和不太灵便的西班牙重装騎手优越，因为新式騎兵在这一群行动緩慢的重騎兵向他們猛扑之前，就可以射杀重騎兵的坐騎。拿騷的摩里茨像訓練步兵一样精心地訓練胸甲騎兵；他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他敢于在会战中变換正面和以小股或大股騎兵作其他的机动。阿尔巴不久也认为必須改善自己的輕騎兵；在这以前，輕騎兵只适合于成散开队形作战和单个格斗，但是在他的統率之下，这种騎兵不久就学会了像重騎兵那样成密集队形攻击。騎兵仍和从前一样，排成5—8列。大約在这同一个时期，法国国王亨利四世建立了一种新式騎兵——龙騎兵；在最初这不过是一种专门为了比較迅速的移动而乘馬的步兵；但是經過了几年，当他們装备了适于步騎两用的装具后，人們就把他們当作騎兵一样来使用了。他們沒有任何护身器具，也沒有高筒靴，但是装备了騎兵用的双刃刀，有时也持长矛；此外，他們还带有步兵用的火枪或者較短的馬枪。但是这种軍隊並沒有实現在創建时所寄予他們的希望；他們不久就成为正規騎兵的一部分，不再当作步兵来作战了（俄国皇帝尼古拉企图恢复原先的龙騎兵，編成了既适于騎馬作战又适于徒步作战的16 000人的一个軍；但是他們从来沒有一次徒步作战过，一直用作騎兵，因此这个軍現在已改編，作为騎馬的龙騎兵而合并到俄国的其他騎兵中去了）。法国人在炮兵方面保持着他們已取得的优势。大約在这个时期，他們发明了一种牵引索，

而亨利四世还采用了霰彈。西班牙人和荷兰人也同样使他們的火炮簡便并比較輕巧一些了，但它們仍然是笨重的，而口徑和射程都适于进行有效射击的輕便火炮，那时还没有发明。

三十年战争³⁹开始了十七世紀偉大的軍事改革家古斯达夫-阿道夫的时代。他的步兵团三分之二由火枪手組成，三分之一由长矛手組成。有一些团則完全由火枪手組成。火枪制作得非常輕便，射击时用的枪架已經成为多余的了。古斯达夫-阿道夫还采用了一种紙造的彈壳，使得装填大为簡便。纵深的队形廢除了；长矛手排为 6 列，火枪手則只排为 3 列。这些火枪手受按排和按列射击的訓練。人数达 2 000 或 3 000 名的龐大的团减少到 1 300 或 1 400 人，編为 8 个連，而且两个团編成一个旅。他采用这样的队形，打敗了常常編为 30 列（类似纵队或方队）的密集成群的敌人，他的炮兵使敌人受到了惨重的損失。騎兵也根据这样的原則进行了改編。重装騎手被完全廢除了。胸甲騎兵取消了护肘和其他无用的护身器具，这就使他們更加輕便灵活了。古斯达夫-阿道夫的龙騎兵几乎总是当作騎兵来作战的。無論是胸甲騎兵或者是龙騎兵都只排为 3 列，并且奉有严格的命令，不得因射击耽誤時間，而应当立即持双刃刀冲鋒。他們分編为騎兵連，每連 125 人。炮兵也因为有了輕炮而改进了。虽然古斯达夫-阿道夫的蒙皮炮曾聞名一时，但是没有維持多久。它們为四磅铁炮所代替，这种铁炮非常輕便，用两匹馬即可运走；在火枪手发射两次的時間內，这种铁炮能发射 6 次；每个步兵团都有两門这样的火炮。这样一来，野战炮就分为輕炮和重炮两类；輕炮随伴步兵作战，而重炮則留作預备队或者在整个会战期間占領某一陣地。在这一时期的軍隊中已开始显示出步兵对騎兵的日益增长的优势了。在 1631 年萊比錫会

战中，古斯达夫-阿道夫有步兵 19 000 人、騎兵 11 000 人，梯利有步兵 31 000 人、騎兵 13 000 人。在 1632 年呂特岑会战中，华倫斯坦有步兵 24 000 人、騎兵 16 000 人(170 个連)。火炮的数量也因为采用了輕炮而增加了；瑞典軍隊通常每一千名兵士有 5—12 門火炮；而在雷赫河会战中，古斯达夫-阿道夫在 72 門重炮的火力的掩护下强渡了該河⁴⁰。

在十七世紀下半叶和十八世紀上半叶，随着步兵普遍地采用刺刀，长矛和各种护身器具就完全廢除了。大約在 1640 年法国发明的刺刀曾不得不和长矛相爭 80 年之久。奥地利人最先用刺刀装备了他們的全体步兵，随后是普魯士人；法国人把长矛一直保持到 1703 年，俄国人則保持到 1721 年。燧发机和刺刀几乎同时在法国发明，也是到 1700 年才逐渐为大多数軍隊所采用。它大大縮短了装彈过程，在某种程度上还能保护火門上的火药免受雨淋，这就更加有助于廢除长矛了。但是，射击仍然进行得很慢，兵士在整个会战期間通常最多能发射 24—36 发子彈；只是在这个时期的后半期，由于操典的改进，訓練的改善，輕火器构造的进一步改良(特别是由于普魯士最初采用的装彈铁探条)，才使得兵士能以相当大的速度来射击。这就使得队形的纵深必須更加縮小，所以这时步兵仅仅排为 4 列。当时建立了一种 élite [精选的] 步兵——擲彈兵連，他們原先是用来在进行白刃格斗以前投擲手榴彈的，但不久就只用火枪作战了。某些德国軍隊在三十年战争期間就已經建立了一种装备綫膛枪的猎兵，而綫膛枪是 1498 年在萊比錫发明的。这种武器这时与普通的枪并用，每个連的优秀射手都装备了这种武器；但是除了在德国以外，这种武器并不享有很大的声誉。奥地利人也建立了一种輕步兵，叫做潘都尔[pandours]。这是来自与土

耳其接壤的边屯区⁴¹的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的非正规部队，他们适于奔袭和追击，但从当时的战术观点来看，由于他们毫无训练，他们在正规的会战中就不适用。法国人和荷兰人为了同样的目的建立了一种非正规步兵，叫做 *compagnies franches* [自由连]。在各国军队里，骑兵的装备也减轻了。重装骑手完全消失了，胸甲骑兵只留有胸甲和头盔；在法国和瑞典，甚至连胸甲也废除了。步兵的射击效力和射速的日益提高，对于骑兵是非常不利的。不久，人们都认为这一兵种完全不适于持双刃刀向步兵冲锋；关于无法通过火线的观点当时非常流行，以致骑兵也养成了比使用双刃刀更多地使用马枪的习惯。因此，在这一时期中常常发生这种情况，就是双方的骑兵如同步兵一样在相互之间进行火力战斗；骑马冲至距敌人 20 码的地方，放一排枪，然后全速猛冲，这被认为是非常勇敢的行为。但是查理十二坚持了他的伟大的先辈^①规定的原则。他的骑兵从不停顿下来射击；不管当面的是骑兵、步兵、炮队还是战壕，他们总是手持双刃刀冲锋，而且向来都是胜利的。法国人也放弃了新的战法，又单靠双刃刀来作战了。骑兵战斗队形的纵深更加缩小，由 4 列减到 3 列。此时炮兵减轻火炮的重量、使用弹筒和霰弹已成为普遍现象。另一个重大的新措施是把这一兵种列入军队的编制。在这以前，虽然火炮属于国家，但是操作火炮的人却不是兵士，他们组成了一种行业，炮兵不算是一个兵种，而算是一种手艺。炮兵军官没有军阶，与其说把他们归入有军官特权的贵族，不如把他们归入像裁缝和木匠一类的手艺人。但是，在这个时期前后，炮兵成了军队的组成部分，并且开始分编为连和营；操作

① 古斯塔夫-阿道夫。——编者注

火炮的人成了正规的兵士，而军官也有了和在步兵及骑兵中一样的军阶。由于这种改革而造成的炮兵的集中使用和人员的固定，就给在旧制度下不能发展的炮兵学开辟了道路。

由纵深队形到綫式队形的过渡，由长矛到火枪的过渡，由骑兵的优势到步兵的优势的过渡，是到弗里德里希大帝开始征战并随之开始了綫式战术的极盛时期才逐渐完成的。他把步兵排为3列，使射击每分钟达到5发。在莫耳維茨⁴²的最初的几次战斗中，这种步兵就展开成一綫，在奥地利骑兵刚刚击溃了普鲁士骑兵后，即以速射击退奥地利骑兵的各次攻击；消灭了奥地利骑兵以后，普鲁士步兵攻击了奥地利步兵，击败了他们，因而赢得了会战的胜利。在大的会战中从来不用方队去抵抗骑兵，即使采用的话，也只是限于步兵在行军中突然遭到骑兵袭击的场合。在会战中，步兵的外翼如果受到骑兵的威胁，通常认为只要延伸和折成 *en potence*〔拐子形〕也就行了。为了同奥地利的潘都尔作斗争，弗里德里希建立了一种类似的非正规的步兵和骑兵，但是在正规的会战中从来不依靠他们，他们很少参加会战。进行射击的横队缓慢地向前推进，就能解决会战。以前为他的前辈^①所忽视的骑兵，这时经历了充分的改革。它只排为两列，除了在追击敌人的场合以外，严格禁止射击。马术训练过去一直很少为人注意，而这时则受到极大的重视。各种队形变换必须跑步进行，因此要求兵士特别注意保持密集队形。弗里德里希的骑兵经过澤德利茨的努力压倒了当时的其他一切骑兵或者以前任何时代的骑兵：他们步伐的矫健、队形的整齐、攻击的勇猛、集合的迅速，这也是以后许多时代的骑兵

① 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编者注

无法和它相比的。炮兵变得非常轻便，以致有些大口徑的火炮經受不起全装药的射击，因此后来不得不廢除了。但是，重炮兵由于炮架质量不好而又笨重，組織也不完善，所以运动仍然十分緩慢和不灵活。会战一开始，他們就占領自己的陣地，有时虽向前变换陣地，但不能作任何机动。輕炮兵（編入步兵的团炮）配置在步兵橫队的前面，即在营与营的間隔前 50 步的地方；它們和步兵一同前进，火炮由兵士拖着，在 300 碼的距离用霰彈射击；炮的数量很多，每一千名兵士有 3—6 門。步兵和騎兵一样分編为旅和师；但是在接战后，軍隊几乎完全不进行机动，而且每一营都必須在总的橫队中占領自己的位置，所以这种区分沒有任何战术意义；至于騎兵，那末在攻击中，旅长在某种場合下可以机断行事；然而在步兵中不可能有这种情况。綫式队形（步兵成两綫居中，騎兵成两綫或三綫居于两翼）同以前几个时代的纵深队形相比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这种队形使尽可能多的人員能同时参加作战，因而發揮了步兵火力以及騎兵攻击的最大效力；虽然它在这方面很完善，但是正由于这种緣故，它就像紧身服一样束縛了整个軍隊。每个騎兵連、步兵营和每門火炮在战斗队形中都有固定的位置；这种队形無論在什么地方遭到破坏或者稍有混乱，就必定会影响到整个軍隊的战斗力。因此，在行軍中必須很好地予以組織，以便当軍隊为了宿营或者作战而展开时，每一单位正好处于預先規定的位置。因此，如果需要完成某种机动，就得全部軍隊都来进行；在只适于成綫式队形作战的軍隊行动如此緩慢而且战斗队形又如此不灵活的条件 下，要派遣部分兵力进行側击或者建立專門的預备队以使用优势兵力进攻某一个弱点，那是不可能的和錯誤的。此外，在作战时，这种寬橫队为了不破坏队面的整齐，前进得非常緩慢。帳篷总是

随军队前进，并且每晚都得打开；营地周围还得构筑轻型工事。军队由兵站来补给粮食，大量的野战面包房随军行进。总之，所携带的物资和其他辎重十分累赘，给军队的运动造成了现今不可想像的困难。但是，虽然有这一切缺点，弗里德里希大帝的军事组织还是当时最好的，其余所有的欧洲政府都热心地仿效它。军队的兵员补充几乎到处是用招收志愿兵的方法，并辅之以欺骗和强迫的征集；只是在受到很严重的损失后，弗里德里希才在各省实行强迫征兵的办法。

同盟国对法兰西共和国的战争⁴³开始后，法国军队由于军官的损失而瓦解了，军队总数不到 15 万人。敌军的人数多得多；于是法国就必须再行招兵，而且是以招收国民志愿兵的形式大规模地进行的；1793 年，这样的志愿兵大概至少有 500 个营。这些部队均未经过训练，而且也没有时间按照复杂的线式战术进行训练，并使它们达到成线式队形运动时所要求的那样完善的程度。尽管法国军队在数量上占很大的优势，但是同排成线式队形的敌人较量的一切企图都完全失败了。这就需要创立一套新的战术。美国革命⁴⁴表明，采用散开队形和散兵进行速射，即使是训练不好的军队也可以取得很大的优势。法国人仿效了这种方法并且以长纵队支援散兵，当大部分军队仍紧密地在一起的时候，在这种纵队里小的混乱不会有很大的危害。法国人由于采取这种队形，以自己在数量上占优势的兵力向敌人猛扑而常常取得了胜利。由于采用了这种新的队形，由于军队缺乏经验，就促使他们在起伏地、在乡村和树林中作战，因为在这些地方他们不但能找到避开敌人火力的掩蔽地，而且敌人的线式队形到这些地方也必然发生混乱；法国人没有帐篷、野战面包房等，这就使它们必须露营，靠从周围地区取得

的东西为生。这样，他們就有了一种运动性，这是为帳篷和各种輜重所累的敵軍所沒有的。革命的战争創造了像拿破侖这样的人物，他把这种新的作战方法发展为一套正规的制度，并吸取旧制度中有益的部分，因而立即使这种新方法达到像弗里德里希使綫式战术所达到的那样完善的程度，这时候，法国军队几乎无敌于天下，一直到他們的敌人学会他們的經驗并按新形式編組自己的军队时为止。新制度的主要特点如下：首先恢复了旧的原則，即每一公民必要时应当应征入伍，保卫国家，結果在全体居民中用大規模或小規模地强迫征兵的方法补充军队，——这种改变立刻使军队的平均人数比弗里德里希时代增加了两倍，并且必要时还可大大增加；其次，廢除了野营用具，停止由兵站仓库供应军队的給养，实行了露营并采取了以战养战的方針。军队的运动性和独立性因而增大了，其程度不低于因实行普遍兵役制而造成的数量的增长。在战术編制上，把步兵、騎兵和炮兵合編到军队的較小的单位(軍、师)中的原則已成了常规。因此，每一个师就成为能单独作战、甚至对占数量优势的敌人也具有相当抵抗力的一支真正的小型军队了。这时，纵队成为战斗队形的基础；纵队作为貯藏所，散兵由那里派出，又回到那里去；纵队成为向敵軍綫式队形某一点攻击的楔形密集集团；如果地形和战斗情况有利于采取散开队形对付敌人时，纵队可作为接敌和以后展开的一种形式。由于三个兵种合編在一个較小的军队单位里，各兵种間的相互支援达到了最大的限度，再加上三种战斗形式——散开队形、横队和纵队——的配合使用，这就形成現代军队巨大的战术优势了。因此，現在任何地形都适于战斗；迅速判定地形的一切利弊，根据地形特点迅速地配置自己的军队，成了对指揮官的主要要求之一。同时这种才干以及独

立指揮的一般能力不仅为总司令所必需，而且为下級軍官所必需。軍、師、旅、獨立部隊經常处于使他們的指揮官不得不冒險行事的境地；戰場已經不是配置在廣闊的平地上、兩翼有騎兵的連綿不斷的步兵綫了；現在，獨立的軍和師排成縱隊，隱蔽在村莊、道路或丘陵的後面，彼此保持看來相當大的間隔，而在決定性時機到來之前，實際上只有較小的一部分部隊參加互射和炮兵的決鬥。戰鬥隊形由于軍隊人數的增多和這種隊形的採用而拉長了；從此再不必在敵人面前派一列部隊去填補每一間隔了，因為部隊控制在手中，可以在需要時占領必要的位置。迂迴翼側現在已成為普通的戰略機動；比較強大的軍隊可以整個楔入比較弱小的軍隊及其交通綫之間，因此一個敗仗就能使全軍復沒和決定戰局的命運。當時慣用的戰術機動是：當情況表明敵人已把最後的預備隊投入戰鬥時，即以生力軍進行中央突破。預備隊在綫式戰術時期是不適用的，而且只會在決戰的時機削弱軍隊的戰鬥力量，而現在却成了借以解決戰鬥的主要手段。戰鬥隊形不僅沿正面延伸，同樣也向縱深擴展，從散兵綫到預備隊配置地點常常有 2 英里和 2 英里以上。總而言之，如果說新制度較少地要求機械式的教練和閱兵式的形式主義，那末它卻要求上自總司令下至普通兵每個人都非常敏捷地行動，花費更多的精力，發揮高度的機智；而自拿破侖以來，制度的每一次革新都是朝着這個方向發展的。

兵器在這一時期的變化是不大的；連年不斷的戰爭使各國軍隊很少有時間進行這種需要時間的改革。法軍在革命前不久會有兩個很重要的革新。他們裝備了一種縮小口徑和縮小彈丸在槍膛內的空隙的新式步槍，同時這種步槍的槍托是彎的，代替了從前使用的直槍托。這種製造比較精良的武器，大大促使法國獵兵占據

优势地位，同时它还成为步枪的典型，在击发机发明以前，其余各国军队中所使用的步枪都是按照这种式样稍加改变而制成的。其次是格里博瓦尔简化和改进了火炮的构造。法国炮兵在路易十五时代完全处于无人过问的状态；火炮有各种各样的口径，炮架是过时的，甚至构造的式样也是不统一的。格里博瓦尔在七年战争⁴⁵时期曾在奥军中服务，并在那里见过一些精良的火炮，所以他减少了口径的种类，使它们比较统一，改进了样式，而且大大地简化了整个火炮的构造。拿破仑就是用他所发明的火炮和炮架来作战的。在对法战争爆发时，英国的炮兵是最坏的，但以后也大有改进，虽然这种改进是逐渐的而且是缓慢的；他们首先采用了单尾炮架（后来为欧洲大陆的许多军队所仿效）和一种使步炮兵搭乘在前车和弹药车上的装置。弗里德里希大帝所创建的骑炮兵在整个拿破仑时代被大力采用，特别为拿破仑本人所大力采用；骑炮兵所特有的战术也是在那时第一次制定出来的。当战争结束时，就发现英国人的这一兵种是最有效的。在欧洲各大国军队中，只有奥地利军队以一种炮兵连代替了骑炮兵，在这种炮兵连中，炮手乘坐在专用的车辆上。

德意志各邦的军队仍然保存着装备线膛枪的特种步兵，而成散开队形作战的新战法使这种武器具有了特殊的意义。这种枪特别流行，在1838年法国人加以仿造，因为他们在阿尔及利亚需要远射程的步枪。他们先建立了 tirailleurs de Vincennes [文森猎兵]，以后又建立了 chasseurs à pied [猎步兵]；这两种猎兵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他们的建立推动线膛枪大大地改良了，因此不仅射程，而且射击精度都空前提高了。这些改进使得德尔文、图温南和米涅闻名于世。在1830年到1840年间，大多数军队的步

兵都采用了击发机，而落在后面的照例是英国人和俄国人。同时，各国都努力于进一步改良輕火器和制造射程更远的可以装备所有步兵的枪。普魯士人采用針发枪——一种由枪尾装填、射速大而且射程远的綫膛枪；这种枪最初是比利时发明的，普魯士人又大大加以改良。普魯士軍隊所有的輕装营都装备了这种枪；在这以前不久，其余的步兵都装备着老式的枪，这些枪略加改造就成了米涅式步枪。英国人这次最先用最完善的步枪即恩菲耳德式步枪装备了所有步兵，这种步枪是米涅式步枪稍加改良而成的；它的优点在克里木战争中完全得到了证实，并且在因克尔芒会战⁴⁶中挽救了英軍。

在步兵和騎兵的战术方面，如果不把法国猎兵对輕步兵的战术作很大的改进这一情况和普魯士采用的新的連纵队制計算在內，那是没有什么重大改变的；这种新的連纵队制由于具有巨大的战术优点，如稍加改变，不久就一定会成为普遍采用的一种队形。俄国軍隊和奥地利軍隊仍然保持着三列橫队，英国軍隊自拿破侖时代起一直采用二列橫队；普魯士軍隊在行进中采用三列橫队，而在作战时則大部分采用二列橫队，另一列橫队則由散兵和他們的支援队构成；法国軍隊以往采用三列橫队，在克里木战争中改用二列橫队，而这个队形現在正在全軍中采用。在騎兵方面，关于俄国恢复十七世紀龙騎兵的尝试及其失败，我們在上面已經說过了。

在各国軍隊的炮兵中，火炮的部件大有改进，口径、車輪的式样、炮架等也都簡化了。炮兵学大大地向前迈进了。但是沒有任何重大的改革。大陆各国的軍隊大多数装备着六磅和十二磅炮；皮蒙特軍隊装备着八磅和十六磅炮，西班牙軍隊装备着八磅和十二磅；过去一直使用八磅和十二磅加农炮的法国軍隊，現在采用所

謂路易-拿破侖式的发射爆炸彈的加农炮——一种能发射較小的爆炸彈的普通的輕型十二磅加农炮，用来代替其他各种野炮。英国軍队在殖民地使用的是三磅和六磅炮，但派往国外的軍队現在只使用九磅、十二磅和十八磅炮。在克里木英軍甚至有三十二磅炮的野炮連，但这种野炮經常深深地陷入土中。

現代各国軍队的一般組織都是极相似的。除英国和美国以外，軍队都是由强迫征召的兵士来补充的，这里有两种制度：一种是征兵制，即人員在軍队中服滿一定的期限后，就永不再服役；另一种是預备兵制度，即現役期限短，但退为預备役后，将来还要在一定期限内再次应征入伍。法国是第一种制度的最明显的例子，普魯士是第二种制度的最明显的例子。甚至在无論正規軍或民軍通常都是由志願兵来补充的英国，法律規定，如志願兵不足，民軍可采取征兵制（即抽签制）来补充。瑞士根本沒有常备軍，整个武装部队由只經過短期訓練的民兵組成。外籍雇佣兵的招募至今在某些国家中仍然是常例：那不勒斯和羅馬教皇甚至目前还保持着瑞士籍的团队；法国还有外籍軍团，英国在大战时通常也不得不采取这种方法。現役的期限是极不相同的：瑞士是2周，德意志各小邦是1年半到2年，普魯士是3年，法国是5—6年，英国是12年，俄国是15—25年。軍官用各种不同的方法补充。在大多数国家的軍队中，目前对于由普通兵士晋升軍官沒有任何法律上的障碍，但实际上这样的障碍是很多的。在法国和奥地利，一部分軍官必須从士官中补充；在俄国，由于缺乏足够数量的受过教育的候补軍官，所以这种办法是必要的。在普魯士，平时要經過考試才能取得軍官官銜证书，这种考試就成为受教育不多的人的障碍；在英国，由普通兵士提升为軍官是极个别的現象。为了培养另一部分軍

官，大多数国家都設有軍事学校，可是除法国以外，各国的軍官并不是非經軍事学校訓練不可的。在軍事教育方面法国軍官走在前面，在一般教育方面則是普魯士軍官走在前面；英国軍官和俄国軍官則無論在哪一方面都落后。至于軍队所需的馬匹，据我們所知，普魯士是馬匹也要强迫征集的唯一的国家，同时馬匹所有者可以取得一定的报酬。除了上述的例外情况，現代軍队的装备和装具目前几乎到处是相同的。当然，在武器的质量和裝飾方面是大不相同的。在这方面，俄国人是落后的，而英国人由于真正享有工业发达之利，則占居首位。

在各国的軍队中，步兵都分为基干步兵和輕步兵。現在，前者通常都是步兵的主要部分；真正的輕步兵在各国都是少数。目前，法国輕步兵被公认为质量最好、数量最多的輕步兵，它有 21 个猎兵营，9 个朱阿夫兵营和 6 个阿尔及利亚土著猎兵营。奥地利輕步兵，特别是猎兵，同样是非常好的；它有 32 个营，普魯士有 9 个猎兵营和 40 个輕步兵营；但是后者不完全适应它們特殊的使命。如果不把 6 个猎兵营計算在內，英国是沒有真正的輕步兵的；除了俄国的以外，无疑要算英国的輕步兵最不适于执行这种勤务了。可以說，俄国是沒有什么真正的輕步兵的，因为它現有的 6 个猎兵营在它的龐大的軍队中是微不足道的。

各国的騎兵同样分为重騎兵和輕騎兵。胸甲騎兵始終都列为重騎兵；驃騎兵、猎騎兵、chevaux-legers〔輕騎手〕算作輕騎兵。龙騎兵和枪騎兵在某些軍队中被視為輕騎兵，而在另外一些軍队中則被視為重騎兵；俄国如果沒有哥薩克，那末可以說根本沒有輕騎兵。最好的輕騎兵当然是奥地利輕騎兵，即匈牙利和波兰族的驃騎兵。炮兵也是这样区分的，只有法国例外，因为上面已經讲过，

他們只有一种口径。在其他国家的军队中,根据火炮口径的大小,至今还区分为轻炮连和重炮连。轻炮兵又分为骑炮兵和步炮兵两种,而且前者是专门用来与骑兵共同行动的。如上所述,奥地利军队没有骑炮兵;英国和法国军队没有真正的步炮兵,他们的炮手都乘坐在前车和弹药车上。

步兵编成连、营、团。营是战术单位;除少数特殊情况外,它是军队进行战斗的组织形式。因此,营在人数上不应当过大,以便营长能用口令和目力联络信号来指挥,同时也不应当过小,以便它能够在战斗中作为独立单位行动,甚至在战斗中遭受损失后也能够独立行动。因此,营的人数在 600 到 1 400 人之间,平均是 800—1 000 人。营分为连的目的是为了固定各个机动单位、更好地对兵士进行基本的军事训练和更便于行政管理。实际上,连只有在对射中才起到独立单位的作用,而在普鲁士军队中则只有当排列成连纵队时,也就是当 4 个连中每一连都按 3 个排编成纵队时,连才具有独立单位的作用;这种队形要求每连有很多的人数,在普鲁士,每连有 250 人。营内连的数目是不固定的,就像连的人数不固定一样。在英国,每营有 10 个连,每连有 90—120 人;在俄国和普鲁士,每营有 4 个连,每连 250 人;在法国和奥地利,每营有 6 个连,每连人数不等。营合编为团,这与其说是为了战术目的,不如说是为了行政管理上的方便以及为了进行统一的训练;因此在战时同一团的各营常常彼此分离。在俄国和奥地利每团有 4 个营,在普鲁士有 3 个营;在法国有 2 个营,后备部队除外;在英国平时大多数团仅有 1 个营。骑兵分为连和团。每连有 100—200 人,是战术单位和行政单位,只有在英国,为了行政管理的方便,才把骑兵连分成 2 个排〔troops〕。每个骑兵团通常有 3—10 个骑兵连。在英

国,平时每团只有3个連,每連大約120名騎手;在普魯士,每团有4个連,每連有150名騎手;在法国,每团有5个連,每連有180—200名騎手;在奥地利,每团有6个或8个連,每連有200名騎手;在俄国,每团有6—10个連,每連有150—170名騎手。在騎兵中,团是战术单位,因为它拥有进行独立攻击所需的兵器,而且各連相互支援;因此騎兵团的人数較多,共有500—1600人。只有在英国,騎兵团的人数很少,因而他們不得不把四五个这样的团合編成一个旅;而奥地利和俄国的騎兵团在許多場合却又有中等旅那样多的人数。法国的騎兵团名义上人数很多,但是在戰場上过去一直以較小的編制出現,这是因为他們馬匹不足。炮兵編成連,只有在平时才編成团和旅,因为在战时炮兵連几乎在任何場合都是相互分离而且也总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使用的。每連至少有4門火炮,但在奥地利,每連有8門火炮;在法国和英国,每連有6門火炮。猎兵和其他真正的輕步兵通常只編成营和連,而不編成团;这种兵的性质使他們不适于編成大的单位。工兵-地道爆破兵也是如此,而且他們只是軍隊中极小的一部分。目前只有法国軍隊例外,但是他們的3个工兵-地道爆破兵团一共只有6个营。在平时,大多数軍隊的最高編制单位通常是团。較大的单位——旅、师、軍——多半在战争爆发时才組成。只有俄国和普魯士在平时也同战时一样保持有組織完全的、配备了高級指揮官的軍隊。但是在普魯士,至少在沒有动員整个軍(这需要征集整个省的后备軍)以前,这只是純粹幻想中的东西;在俄国,如果部队真正縮編为团,那末最近的一次战争^①仍然表明,原来的师和軍很容易混同在一起,

^① 1853—1856年的克里木战争。——編者注

所以这种編制的优点与其說在战时，不如說在平时更有意义。

在战时，若干个步兵营或騎兵連合成一个旅：步兵由 4—8 个营合成，騎兵由 6—20 个連合成。軍隊如編有大的騎兵团，則这些团就完全可以代替旅；但是由于团必須派出一些部队执行师的任务，所以团的人数經常减少。輕步兵和基于步兵合成 1 个旅是有一定好处的，但輕騎兵和重騎兵却不能这样作。奥地利人几乎經常給每 1 个旅配屬 1 个炮兵連。几个旅編成 1 个师。在大多数国家的軍隊中，师由 3 个兵种組成，例如：由 2 个步兵旅、4—6 个騎兵連和 1—3 个炮兵連組成。法国軍隊和俄国軍隊完全不把騎兵編入师，英国的师是全由步兵組成的。因此，如果这些国家不願意在对他們不利的条件下作战，他們应当一有机会就把騎兵（相应地还有炮兵）配給师，但这一机会很容易錯過，或者常常难于利用甚至无法利用。但是师屬騎兵所占的比例在各国都是不大的，因此这一兵种的其余部分为了建立騎兵預备队都編为騎兵师，每师 2 个旅。在較大的軍隊中，2 个或 3 个师、有时 4 个师編成 1 个軍。甚至在师里沒有騎兵和炮兵的时候，在这样的軍里也經常有自己的騎兵和炮兵；而当师混合編成时，也仍然有由騎兵和炮兵組成的預备队，归軍长掌握。拿破侖最先建立了軍預备队，他不以此为滿足，还把全部編余的騎兵編成預备队騎兵軍，包括 2 个或 5 个配有騎炮兵的騎兵师。俄国的預备队騎兵保持着同样的編制；尽管已經取得的效果同因这种編制而集中于一地的大量騎兵很不相称，但是看来其余国家的軍隊在大战时也将重新采用这一編制。战斗部队的現代編制就是这样。但是，尽管廢除了帳篷、兵站倉庫、野战面包房和粮秣車，軍隊为了在作战中保证战斗力，仍然有由非战斗人員和車輛組成的大批輜重。为了概略地說明这一問題，我

們不妨指出，根据現行的操典，普魯士軍隊 1 个軍究竟需要多少輜重：

炮兵纵列： 6 个車队，每队 30 辆； 1 个制药室，由 6 辆車載运；

舟桥纵列： 材料車 34 辆，工具車 5 辆，鍛工車 1 辆；

步兵輜重： 車 116 辆，108 套馬；

卫生輜重： 車 50 辆(供 1 600 或 2 000 名病員使用)；

預备軍需輜重： 車 159 辆；

預备輜重： 車 1 辆，备用馬 75 匹；

共 計： 車 402 辆，馬 1 791 匹，人員 3 000 名。

为了使軍团司令、軍长和师长能够在自己的职权範圍內指揮所屬軍隊，除英国軍隊外，所有国家的軍隊都設有全由軍官組成的一種專門的業務机关，叫做司令部。这些軍官的任务是对軍隊行軍所經過的或者可能經過的地形进行偵察和目測；帮助制定作战計劃并且明确計劃的各个細節，使軍隊不致喪失时机，不致引起混亂，不致白白地消耗体力。因此，这些軍官所处的地位极为重要，他們必須受过完備的軍事教育，熟悉每一兵种在行軍和战斗中的能力。因此，在各国，这些軍官都是从最有才干的人員中选拔出来的，并在高級軍事学校中受严格的訓練。只有英国人认为，軍隊中任何一个尉官或校官都能担任这种职务；正因为如此，英軍司令部的水平最低，軍隊只能作最緩慢和最簡單的机动，而指揮官如果一般地說办事很認真的話，他便不得不亲自动手做全部參謀工作了。师很少有一个以上的參謀，軍有它自己的司令部，由一个參謀主任或參謀来掌管，而軍团則有完備的司令部，由几个將軍在專职的參謀長的領導下來負責这个工作，參謀長在必要时可以用軍团司令的名义下达命令。在英国軍隊中副官长和副參謀長隶属于參謀

长；在其他的军队中副官长同时就是参谋长。在法国，参谋长一人担任这两种职务，而为了执行每一种职务，又各有其特设的机关。副官长是军团全体人员的长官，他听取所属各机关和部队的报告并掌管纪律、训练、编制、装备、武器等方面的事务。所有的部属都是通过他与军团司令发生联系的。如果他同时又担任参谋长的职务，那末他就和军团司令共同制定本军团的作战和行军计划。至于进一步详细制定行军计划，则是副参谋长的职责，他负责详细计划行军、宿营、野营等具体事项。大本营里设有必要数量的参谋来侦察地形，草拟防御或进攻计划。此外还设有炮兵总监和工兵总监，分别管理所属部门；同时还有几个参谋长助理，在战场各地代表参谋长，还有一些联络参谋和传令官，负责传送命令和报告。大本营还设有军需总监和他的办事人员、财务官、医务官以及军事检察官即军法官。军和师的司令部都是按这个样子组成的，但要简单得多，人员也很少；旅司令部和团司令部的人数更少，而营部则仅由营长、副官、一个军需官、上士文书、鼓手或号兵组成。

大国为了维持军队和保障军队的指挥，除上述机构外，还需要许多其他机构。有负责征兵的官员和补充军队马匹的官员，后者还常常和国家管理养马场的机关保持联系；有军官学校、士官学校、步兵教导营、骑兵教导连、炮兵教导连、骑兵学校和兽医学校等。大多数国家都有国家铸造所以及制造轻火器和火药的工场；有各种兵营、军火库、仓库、要塞，它们不仅有自己的设备而且有负责管理的军官；最后，还有总军需部和总参谋部，它们管理全国的武装力量，因此比个别的作战军队的司令部和军需部有更多的人员和更为重要的职能。总参谋部担负着最重要的职责，它通常下设战史处（搜集战史、过去和现在的军队编制等方面的材料）、测绘

处(負責繪制全国的地图和进行全国地形測量)、統計处等。統管所有这些机关以及整个軍隊的是陸軍部。各国的陸軍部編制都是不同的,但从上面所說的可以看得很清楚,它的职务范围却极广。現在試举法国陸軍部的編制作为例子。它有七个部:(1)人事部,(2)軍械部,(3)工程要塞部,(4)軍需部,(5)阿尔及利亚事务部,(6)軍务部(包括战史处、測繪处以及各科室),(7)财务部。直屬陸軍部的,有由将官、校官和专家組成的下列諮詢委员会:步騎炮兵人事委员会,要塞勤务委员会,軍医委员会,兽医委员会和民事委员会。这个龐大的机构就是如此,它負責現代头等軍隊的人員和馬匹补充、給养、指揮和經常的扩充。这样的机构是和軍隊征集的人員的巨大数量相适应的。虽然从来沒有一支軍隊曾超过拿破侖在1812年拥有的那支龐大的軍隊(当时他有20万人在西班牙,20万人在法国、意大利、德国和波兰,有45万人和1300門火炮侵入俄国),虽然我們很可能再看不到在仅仅一次軍事行动中集中45万人这样一支大軍,但是欧洲大陆上任何一个大国,包括普魯士在內,都能够召集、装备和訓練一支50万人甚至更多的軍隊;虽然这些国家的軍隊不超过他們全部人口的1.5—3%,但是在历史上他們从来都沒有达到这样的規模。

美国的軍事制度是主要依靠各州的民軍和在情况需要时召集的志願軍来保卫国家的;主要用来維持西部印第安部落秩序的常备軍,根据1857年陸軍部长的报告,仅仅約为18000人。

弗·恩格斯写于1857年8月一
不迟于9月24日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載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
版第2卷

弗·恩格斯 副官

副官 [Adjutant] ——軍隊中大小單位的指揮官的助手或 aide-de-camp。每個步兵營或騎兵團的指揮官通常都有一名副官；旅和師的指揮官、corps d'armée [軍] 的司令官以及總司令根據其軍銜有一名或一名以上的副官。副官的職責是傳達長官的命令、監督執行這些命令以及接受或匯集給長官的報告。因此，他所管理的多半是本軍事單位的內務秩序。他規定本單位各部分的值勤次序，下達日令；同時他又像是長官的秘書，草擬給上下級指揮官的公文函件，把每天書面報告和口頭報告加以綜合，填寫本單位的日志和統計表。目前，在軍隊的較大單位中通常都設有總參謀部派出的常設司令部，由“參謀長”領導，參謀長擔負副官的較複雜的任務，而讓副官只傳達命令和調整本單位的內部勤務。但是在這種場合職責的劃分在各國軍隊中是大不相同的，所以這裡簡直不可能作概括的說明。例如還舉不出兩個國家的軍隊，它們的 corps d'armée 司令官的副官的職責是完全一樣的。除了這些名副其實的副官之外，在幾乎所有的歐洲國家里，根據君主制度的需要，設有許多伴隨君主的侍衛長 [general adjutant]，他們除了侍奉

君主一人以外,沒有其他任何職責,而且就連他們的職權也純粹是一種形式。

弗·恩格斯寫于 1857 年 7 月 11 日
和 8 月 10 日之間

載于“美國新百科全書”1858 年版
第 1 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美國新百科全書”

俄譯文第一次發表

弗·恩格斯 阿耳布埃拉

阿耳布埃拉——西班牙埃斯特勒馬杜腊省的一个村庄和一条小河的名称，在巴达霍斯东南 12 英里。1811 年春天，英軍包圍了当时在法軍手中的巴达霍斯，对这座要塞进行了极其猛烈的圍攻⁴⁷。貝雷斯福德率領約 1 万名英軍和德軍以及 2 万名西班牙軍和葡萄牙軍在阿耳布埃拉附近掩护圍攻。苏尔特則率領一部分可以用于进攻的安达魯西亚部队，在 5 月 16 日攻击貝雷斯福德。英軍的右翼配置在圓形高地上，英軍的中央和左翼配置在它的鞍形延伸部分。阿耳布埃拉河从正面掩护陣地。苏尔特一眼看出这一圓形山岡是制高点，是整个陣地的鎖钥；所以他只在中央和左翼的对面占据陣地，而准备 en masse〔以主力〕攻击英軍的右翼。貝雷斯福德不顾軍官們的反对，把几乎全部英軍和德軍配置在中央和左翼，这样，山岡就几乎完全依靠西班牙的新兵防守。所以，当苏尔特的步兵以密集的纵队向山岡冲锋时，西班牙軍很快就退却了，英軍的整个陣地立即处于被包抄的境地。在这个紧急关头，貝雷斯福德还一再拒絕将英国或德国部队派往右翼，于是他手下的一名參謀^①自动命令約 7 000 名英軍进攻。英軍在鞍形高地的后

^① 哈丁。——編者注

面展开，进行射击，消灭了法军最前面的几个营；当他们接近高地时，发现占领高地的成长纵队的兵群没有地方可以展开，十分混乱。英军就向这些纵队推进。他们以横队的火力给予密集的兵群以杀伤；最后，当英军转入刺刀冲锋时，法军狼狽向山下逃窜。这一最后的冲击使英军付出了大约五分之四的兵员的代价——这也就是它的伤亡人数。但会战结局已定，并且苏尔特撤退了，虽然几天以后对巴达霍斯的包围也撤除了。

弗·恩格斯写于1857年7月11日
和8月10日之间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
第1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阿尔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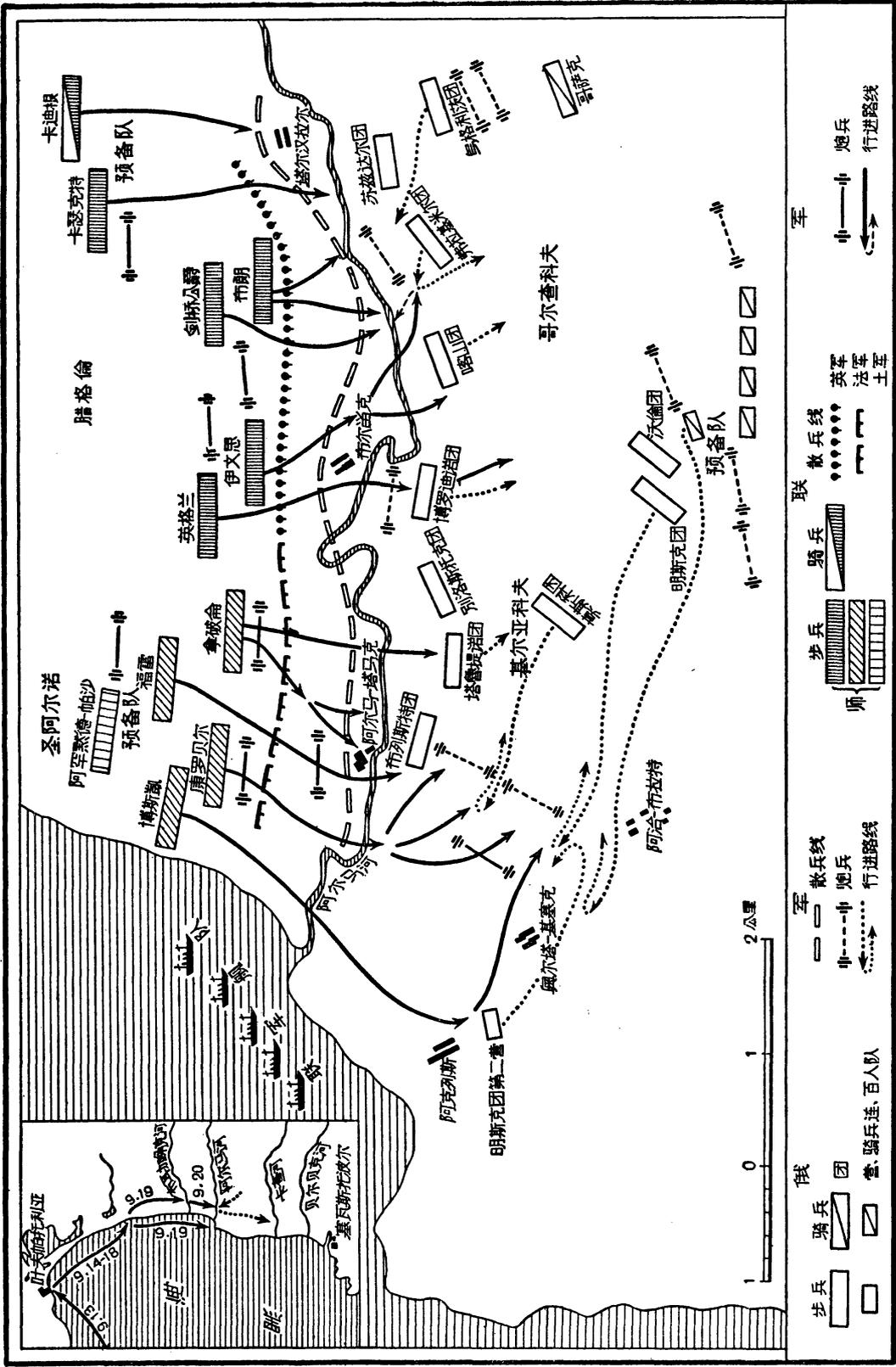
阿尔馬——克里木的一条小河，从巴赫契薩賴城郊的高地向西流入塞瓦斯托波尔和叶夫帕托利亚之間的卡拉米特灣。河的南岸靠近河口那一带地勢陡峭，整个南岸瞰制着对岸。在上次俄土战争中，緬施科夫公爵曾选择南岸为防御障地来抗击联军在克里木登陆后馬上就发动的进攻。

緬施科夫所指揮的军队有 42 个步兵营，16 个騎兵連，1 个哥薩克百人队，96 門火炮，共 35 000 人。1854 年 9 月 14 日，联军有 28 000 名法軍（4 个师），28 000 名英軍（5 个步兵师和 1 个騎兵师）和 6 000 名土軍在阿尔馬河稍北的地方登陆。联军炮兵的火炮和俄軍的一般多——法軍 72 門，英軍 24 門。俄軍障地看来很坚固，但是实际上有許多薄弱地点。障地的正面几乎寬达 5 英里，这对緬施科夫的数量不多的军队來說是太寬了。右翼沒有任何依靠，而左翼（由于联军舰队的火力控制了海岸）不能把障地伸展到海边，因而有同样的缺陷。联军的計劃就是根据这种情况制定的。他們打算以正面佯攻轉移俄軍的注意力，同时法軍应在 5 个区舰队的掩护下迂迴俄軍的左翼，英軍則应在騎兵的掩护下迂迴其右翼。

攻击是在 20 日发起的。原定在拂曉开始攻击，但是由于英軍

行动迟缓，法军不敢先行渡河。在法军的极右翼，博斯凯师渡过了河（这一条河几乎到处都可以徒涉而过）并且登上了南岸陡坡，没有遇到任何抵抗，而且费了很大的力气把 12 门火炮运上了台地。在博斯凯左边，康罗贝尔率领他的师渡过了河，并在台地上展开了。而拿破仑亲王的师肃清了阿尔马村的果园、葡萄园和房屋里的俄国兵。所有这些攻击是用 29 个营的兵力进行的，施科夫派去抗击的兵力在第一线和第二线上只有 9 个营，不久又派出 7 个营去增援。这 16 个营在 40 门火炮和 4 个骠骑兵连的配合下必须抵抗住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法军（不久又得到福雷师的其余 9 个营的增援）的攻击。这样，除了留作预备队的土军以外，圣阿尔诺元帅的全部军队都投入了战斗。结果很快就揭晓了。俄军渐渐支持不住，他们尽可能有秩序地退却了。同时英军开始攻击。大约在 4 时，在俄军阵地的左翼博斯凯的火炮从台地顶上进行齐射，这表明激烈的战斗开始了；大约一小时后，英军的散兵线向俄军的散兵线攻击。英军放弃了迂回俄军右翼的计划，因为俄军骑兵（不把哥萨克算在内也比英国骑兵多一倍）掩护着右翼，甚至威胁着英军的左翼。因此，腊格伦勋爵决定向俄军直接进行正面攻击。他以布朗的轻步兵师和伊文思师为第一线向俄军中央猛攻。剑桥公爵和英格兰将军的两个师组成第二线，而预备队（卡瑟克特师）在骑兵的配合下跟在左翼的后面。第一线展开后，攻击前面的两个村庄，结果赶走了俄军并渡过阿尔马河。这里双方的说法不同。英国人坚决认为他们的轻步兵师曾到达俄军掩护重炮的胸墙，但在这里被击退。而俄国人却断言，轻步兵师甚至没有能够全部渡过河，更不用说到达筑有胸墙的陡坡了。但不管怎样，英军第二线是直接在线后面运动的；它展开后必须再成纵队，以便渡过阿

阿尔马河会战 (1854年9月20日)



- | | | | |
|--|-----|--|-----------|
| | 步兵 | | 骑兵连、百人队 |
| | 骑兵 | | 营、骑兵连、百人队 |
| | 步兵 | | 步兵 |
| | 骑兵 | | 骑兵 |
| | 散兵线 | | 散兵线 |
| | 炮兵线 | | 炮兵线 |
| | 步兵 | | 步兵 |
| | 骑兵 | | 骑兵 |
| | 预备队 | | 预备队 |
| | 步兵 | | 步兵 |
| | 散兵线 | | 散兵线 |
| | 炮兵线 | | 炮兵线 |
| | 步兵 | | 步兵 |
| | 骑兵 | | 骑兵 |
| | 散兵线 | | 散兵线 |
| | 炮兵线 | | 炮兵线 |
| | 步兵 | | 步兵 |
| | 骑兵 | | 骑兵 |
| | 散兵线 | | 散兵线 |
| | 炮兵线 | | 炮兵线 |
| | 步兵 | | 步兵 |
| | 骑兵 | | 骑兵 |
| | 散兵线 | | 散兵线 |
| | 炮兵线 | | 炮兵线 |
| | 步兵 | | 步兵 |
| | 骑兵 | | 骑兵 |
| | 散兵线 | | 散兵线 |
| | 炮兵线 | | 炮兵线 |
| | 步兵 | | 步兵 |
| | 骑兵 | | 骑兵 |
| | 散兵线 | | 散兵线 |
| | 炮兵线 | | 炮兵线 |
| | 步兵 | | 步兵 |
| | 骑兵 | | 骑兵 |
| | 散兵线 | | 散兵线 |
| | 炮兵线 | | 炮兵线 |
| | 步兵 | | 步兵 |
| | 骑兵 | | 骑兵 |
| | 散兵线 | | 散兵线 |
| | 炮兵线 | | 炮兵线 |
| | 步兵 | | 步兵 |
| | 骑兵 | | 骑兵 |
| | 散兵线 | | 散兵线 |
| | 炮兵线 | | 炮兵线 |
| | 步兵 | | 步兵 |
| | 骑兵 | | 骑兵 |
| | 散兵线 | | 散兵线 |
| | 炮兵线 | | 炮兵线 |
| | 步兵 | | 步兵 |
| | 骑兵 | | 骑兵 |
| | 散兵线 | | 散兵线 |
| | 炮兵线 | | 炮兵线 |
| | 步兵 | | 步兵 |
| | 骑兵 | | 骑兵 |
| | 散兵线 | | 散兵线 |
| | 炮兵线 | | 炮兵线 |
| | 步兵 | | 步兵 |
| | 骑兵 | | 骑兵 |
| | 散兵线 | | 散兵线 |
| | 炮兵线 | | 炮兵线 |
| | 步兵 | | 步兵 |
| | 骑兵 | | 骑兵 |
| | 散兵线 | | 散兵线 |
| | 炮兵线 | | 炮兵线 |
| | 步兵 | | 步兵 |
| | 骑兵 | | 骑兵 |
| | 散兵线 | | 散兵线 |
| | 炮兵线 | | 炮兵线 |
| | 步兵 | | 步兵 |
| | 骑兵 | | 骑兵 |
| | 散兵线 | | 散兵线 |
| | 炮兵线 | | 炮兵线 |
| | 步兵 | | 步兵 |
| | 骑兵 | | 骑兵 |
| | 散兵线 | | 散兵线 |
| | 炮兵线 | | 炮兵线 |
| | 步兵 | | 步兵 |
| | 骑兵 | | 骑兵 |
| | 散兵线 | | 散兵线 |
| | 炮兵线 | | 炮兵线 |
| | 步兵 | | 步兵 |
| | 骑兵 | | 骑兵 |
| | 散兵线 | | 散兵线 |
| | 炮兵线 | | 炮兵线 |
| | 步兵 | | 步兵 |
| | 骑兵 | | 骑兵 |
| | 散兵线 | | 散兵线 |
| | 炮兵线 | | 炮兵线 |
| | 步兵 | | 步兵 |
| | 骑兵 | | 骑兵 |
| | 散兵线 | | 散兵线 |
| | 炮兵线 | | 炮兵线 |
| | 步兵 | | 步兵 |
| | 骑兵 | | 骑兵 |
| | 散兵线 | | 散兵线 |
| | 炮兵线 | | 炮兵线 |
| | 步兵 | | 步兵 |
| | 骑兵 | | 骑兵 |
| | 散兵线 | | 散兵线 |
| | 炮兵线 | | 炮兵线 |
| | 步兵 | | 步兵 |
| | 骑兵 | | 骑兵 |
| | 散兵线 | | 散兵线 |
| | 炮兵线 | | 炮兵线 |
| | 步兵 | | 步兵 |
| | 骑兵 | | 骑兵 |
| | 散兵线 | | 散兵线 |
| | 炮兵线 | | 炮兵线 |
| | 步兵 | | 步兵 |
| | 骑兵 | | 骑兵 |
| | 散兵线 | | 散兵线 |
| | 炮兵线 | | 炮兵线 |
| | 步兵 | | 步兵 |
| | 骑兵 | | 骑兵 |
| | 散兵线 | | 散兵线 |
| | 炮兵线 | | 炮兵线 |
| | 步兵 | | 步兵 |
| | 骑兵 | | 骑兵 |
| | 散兵线 | | 散兵线 |
| | 炮兵线 | | 炮兵线 |
| | 步兵 | | 步兵 |
| | 骑兵 | | 骑兵 |
| | 散兵线 | | 散兵线 |
| | 炮兵线 | | 炮兵线 |
| | 步兵 | | 步兵 |
| | 骑兵 | | 骑兵 |
| | 散兵线 | | 散兵线 |
| | 炮兵线 | | 炮兵线 |
| | 步兵 | | 步兵 |
| | 骑兵 | | 骑兵 |
| | 散兵线 | | 散兵线 |
| | 炮兵线 | | 炮兵线 |
| | 步兵 | | 步兵 |
| | 骑兵 | | 骑兵 |
| | 散兵线 | | 散兵线 |
| | 炮兵线 | | 炮兵线 |
| | 步兵 | | 步兵 |
| | 骑兵 | | 骑兵 |
| | 散兵线 | | 散兵线 |
| | 炮兵线 | | 炮兵线 |
| | 步兵 | | 步兵 |
| | 骑兵 | | 骑兵 |
| | 散兵线 | | 散兵线 |
| | 炮兵线 | | 炮兵线 |
| | 步兵 | | 步兵 |
| | 骑兵 | | 骑兵 |
| | 散兵线 | | 散兵线 |
| | 炮兵线 | | 炮兵线 |
| | 步兵 | | 步兵 |
| | 骑兵 | | 骑兵 |
| | 散兵线 | | 散兵线 |
| | 炮兵线 | | 炮兵线 |
| | 步兵 | | 步兵 |
| | 骑兵 | | 骑兵 |
| | 散兵线 | | 散兵线 |
| | 炮兵线 | | 炮兵线 |
| | 步兵 | | 步兵 |
| | 骑兵 | | 骑兵 |
| | 散兵线 | | 散兵线 |
| | 炮兵线 | | 炮兵线 |
| | 步兵 | | 步兵 |
| | 骑兵 | | 骑兵 |
| | 散兵线 | | 散兵线 |
| | 炮兵线 | | 炮兵线 |
| | 步兵 | | 步兵 |
| | 骑兵 | | 骑兵 |
| | 散兵线 | | 散兵线 |
| | 炮兵线 | | 炮兵线 |
| | 步兵 | | 步兵 |
| | 骑兵 | | 骑兵 |
| | 散兵线 | | 散兵线 |
| | 炮兵线 | | 炮兵线 |
| | 步兵 | | 步兵 |
| | 骑兵 | | 骑兵 |
| | 散兵线 | | 散兵线 |
| | 炮兵线 | | 炮兵线 |
| | 步兵 | | 步兵 |
| | 骑兵 | | 骑兵 |
| | 散兵线 | | 散兵线 |
| | 炮兵线 | | 炮兵线 |
| | 步兵 | | 步兵 |
| | 骑兵 | | 骑兵 |
| | 散兵线 | | 散兵线 |
| | 炮兵线 | | 炮兵线 |
| | 步兵 | | 步兵 |
| | 骑兵 | | 骑兵 |
| | 散兵线 | | 散兵线 |
| | 炮兵线 | | 炮兵线 |
| | 步兵 | | 步兵 |
| | 骑兵 | | 骑兵 |
| | 散兵线 | | 散兵线 |
| | 炮兵线 | | 炮兵线 |
| | 步兵 | | 步兵 |
| | 骑兵 | | 骑兵 |
| | 散兵线 | | 散兵线 |
| | 炮兵线 | | 炮兵线 |
| | 步兵 | | 步兵 |
| | 骑兵 | | 骑兵 |
| | 散兵线 | | 散兵线 |
| | 炮兵线 | | 炮兵线 |
| | 步兵 | | 步兵 |
| | 骑兵 | | 骑兵 |
| | 散兵线 | | 散兵线 |
| | 炮兵线 | | 炮兵线 |
| | 步兵 | | 步兵 |
| | 骑兵 | | 骑兵 |
| | 散兵线 | | 散兵线 |
| | 炮兵线 | | 炮兵线 |
| | 步兵 | | 步兵 |
| | 骑兵 | | 骑兵 |
| | 散兵线 | | 散兵线 |
| | 炮兵线 | | 炮兵线 |
| | 步兵 | | 步兵 |
| | 骑兵 | | 骑兵 |
| | 散兵线 | | 散兵线 |
| | 炮兵线 | | 炮兵线 |
| | 步兵 | | 步兵 |
| | 骑兵 | | 骑兵 |
| | 散兵线 | | 散兵线 |
| | 炮兵线 | | 炮兵线 |
| | 步兵 | | 步兵 |
| | 骑兵 | | 骑兵 |
| | 散兵线 | | 散兵线 |
| | 炮兵线 | | 炮兵线 |
| | 步兵 | | 步兵 |
| | 骑兵 | | 骑兵 |
| | 散兵线 | | 散兵线 |
| | 炮兵线 | | 炮兵线 |
| | 步兵 | | 步兵 |
| | 骑兵 | | 骑兵 |
| | 散兵线 | | 散兵线 |
| | 炮兵线 | | 炮兵线 |
| | 步兵 | | 步兵 |
| | 骑兵 | | 骑兵 |
| | 散兵线 | | 散兵线 |
| | 炮兵线 | | 炮兵线 |
| | 步兵 | | |

尔馬河和登上高地；然后再展开，經過几次齐射后进行冲击。首先去援救輕步兵师的正是劍桥公爵的师（近卫軍和苏格兰軍）。伊文思虽然运动緩慢，但仍然沒有被击退，所以在他后方运动的英格兰师就未必需要給予任何援助。胸墙被近卫軍和苏格兰軍占領，經過短暫而激烈的战斗之后，俄軍放棄了陣地。俄軍的 18 个步兵营在这里与同样营数的英軍作战，如果說英軍的步兵营每营人数比俄軍的步兵营大約多 50 人，那末俄軍以炮兵的优势和陣地的坚固綽綽有余地弥补了人数上的劣勢。然而素以杀伤力强著称的英国步兵的火力，在这次战斗中特別猛烈。参加会战的大部分軍队都装备了米涅式步枪，这种步枪的射彈侵彻力可以一下子杀伤整行人，对于俄軍的长纵队是特別致命的。除 6 个步兵营外，俄軍全部步兵都投入了战斗，但他們不能期望击退再一次的冲击，于是退出了战斗；在騎兵、輕炮兵和一小部分步兵預备队的掩护下順利地完成了退却。无可爭辯，英軍在这次会战中打得比其他軍队出色，但是他們应用了他們慣用的那种笨拙的机动方法：展开，排成纵队，然后在敌人的火力下沒有任何必要地展开；因此他們既丧失了时机，又損失了人員。这次会战的結果，联軍在俄軍还没有得到增援以前完全控制了克里木的不設防地区，并且打开了通向塞瓦斯托波尔的道路。联軍从前一种优势中沒有得到任何好处，然而他們立即利用了后一种优势。

弗·恩格斯写于 1857 年 7 月 11 日
和 8 月 10 日之間

載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 年版
第 1 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弗·恩格斯 明火枪

明火枪 [Arquebuse] ——源出于法文 arquebuse, 但有时誤写为 harquebuse, 而在英国人那里, 特别是在苏格兰境内誤称为 hagbut 或 hackbut ——是最早的一种真正适于在战场上为军事目的使用的火枪。早在 1485 年博斯威尔特会战⁴⁸ 中就已使用这种枪, 当时叫做輕火器。它不过是一个铁制的短圓筒, 一端被类似枪尾部的东西封住, 有一个导火管; 它固定在类似矛杆或戟杆的坚硬的木托頂端。这种輕火器或者說小型火炮使用的是形状不規則的彈丸, 即不大的实心彈, 它紧貼大粒火药制成的装药, 借紧挨导火孔的火绳发射。这种武器放在前排兵士 (长矛手或持戟手) 的肩上, 靠把手調整方向, 由后排兵士发射, 发射时当然是不进行瞄准的。根据霍尔編年史⁴⁹ 的記載, 甚至在更早的时期, 即在阿津庫尔战役时期, 不列顛军队就装备有“輕火器”。然而这种古老的火器十分笨重, 移动非常不便, 尽管响声很大, 外形别致, 但效果不大, 或者毫无效果。在亨利八世时代, 虽然在其前期曾依靠西班牙明火枪手的火力取得了帕維亚会战的胜利, 但是大弓由于射击精度高, 射程远, 侵彻力强, 仍然不失为优良的武器。甚至在伊丽莎白时代, 大弓仍被称为“武器之王”, 尽管她的军队中已有火枪手, 而

且她會派詹姆斯上校(著名小說家^①的祖先)率領一隊騎馬的明火枪手去援助法王亨利四世。在伊丽莎白时代,这种武器已經大有改进,不过依然又长又笨,只有放到射击前插入土里的叉架上才能进行射击;这种必要的設備有时安上矛头或戟头,以便可以牢牢地斜插在土里,当做木柵使用。

这种古老的明火枪的枪身特別长,是用很坚固的金屬制成的,一般口徑不大,有些已有膛綫,例如,在苏格兰汉密尔顿宮中至今保存的明火枪便是这种枪。1570年博特威尔霍的汉密尔顿曾用它击毙了墨萊摄政王。这种枪依靠大麻制成的火绳,即导火索发射,导火索通到与现代燧发枪机用的机头相类似的机头下面;扣动扳机时,导火索燃着的一端即伸向药池,点燃明火枪。后来,明火枪机让位于輪发枪机。輪发枪机是把燧石固定在药池上,外周有刻綫的小輪借助于彈簧迅速轉动,向放置在它下面的火药噴出火花。继輪发枪机之后,出現了所謂彈簧枪机。这是鋼制燧发枪机的粗糙的前身。这种枪机由約瑟夫·曼頓作过很大改进,它完全被子彈火門(这是人們能够想像的最快和最可靠的发火具)排斥也只有几年功夫。在英国内战⁵⁰时期,小手枪、猎枪和精制的小火枪上曾采用彈簧枪机,但是这种枪稀少而昂貴,所以沒有广泛应用;它們只有貴族和軍官才使用,而明火枪依然是兵士的武器。值得注意的是,从完善的明火枪問世直到不久以前,在枪身的制造和子彈飞行方向的精度方面,远沒有达到人們所預期的那样的进步。精确瞄准的困难看来完全是射击方法不完善、武器笨重和发火极为緩慢所造成的,因为許多年代久远的、特別是西班牙制造的明火

① 乔治·潘·雷·詹姆斯。——編者注

枪枪身,根据击发原理加以改造,安上新的枪托,并适当地改短后,射击十分精确,甚至在較远的距离上具有不寻常的侵彻力。

弗·恩格斯写于 1857 年 7 月 11 日
和 8 月 10 日之間

載于“美国新百科全书” 1858 年版
第 2 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艾雷⁵¹

艾雷，理查爵士，二級巴斯勳章获得者——少将，現任英軍軍需總監。1821年入伍时当准尉，1825年升为上尉，1851年为中校，1854年任派往东方的一支軍隊的中校旅长。1854年9月，在克里木远征軍从瓦尔那出发的前夕，他被任命为远征軍軍需长；在担任这个职务期間，他是受指責的六名或八名軍官之一，他們被指責在腊格倫勳爵率領下墨守陈規、形式主义地执行职务、缺少健全的理智、消极懈怠，以致把英軍弄到毀灭的地步。当时艾雷負責規定各种行軍装具（帳篷、大衣、被褥、靴鞋）在各团間分配的标准。据他本人說（向切尔西的調查委员会）：

“从1854年12月的第一个星期起，在巴拉克拉瓦沒有一天不儲存大量寒衣，但是就在这时候，在前綫战壕里有些团却正由于缺乏这些东西在大吃苦头，而这些东西就給他們存放在不过七八英里以外的地方。”

但是，他說这不是他的过錯，因为要他批准分发这些东西，是从来沒有一点困难的。相反，他认为自己有功：無論批准、部分滿足或者拒絕师和团向他提出的申請，他都尽可能簡化規定的手續。

弗·恩格斯写于1857年7月11日
和8月10日之間
載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
第1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阿斯佩恩

阿斯佩恩和埃斯林是多瑙河北岸的一个城镇和一个村庄，在维也纳的下方；前者距维也纳约半里格^①，后者距维也纳约两里格。这两个地方都位于多瑙河与多林的比赞贝尔格山之间的大片盛长牧草的马尔希斐特平原上。1809年5月21日和22日，法军与奥军在这里进行了历时两天的激烈的会战，拿破仑皇帝初次受挫，被卡尔大公击败而被迫退却，这两个地方从此便出名了。

战争开始时，拿破仑率领大军⁵²经提罗耳溯音河和伊扎尔河而上，在埃克缪尔附近击败了卡尔大公，然后以强攻夺取了累根斯堡，迫使卡尔大公在这里越过多瑙河退往波希米亚山脉，这样就占领了奥军与奥地利首都之间的障地。⁵³然后，拿破仑派达武率兵4万以吸引这位奥国将军的注意力，自己则顺多瑙河而下，攻占了维也纳。同时，他的助手欧仁·博阿尔奈和麦克唐纳正从意大利经由达尔马威亚、克莱纳，沿木尔河谷而上（在此处击溃了耶拉契奇），胜利挺进，准备同自己的总司令会师。卡尔大公在埃克缪尔战败后，这时正缓缓沿多瑙河北岸而下，他希望能有机会进行一次成功的会战，以便在首都城下拯救帝国，因而率领军队在洛鲍岛和

^① 1里格等于4.83公里。——编者注

另一小島(这两个島把这一段多瑙河分成了4条河道)的上方,在比贊貝尔格占領了陣地。

率領10万軍队的卡尔大公时刻盼望他的弟弟約翰大公率領4万軍队前来会合。如果約翰大公能按照所得到的准确命令同科洛夫拉特在林茨会合,他的軍队便可增加到6万,并且应当在拿破侖后方的最高地点,在他的主要交通綫上占領陣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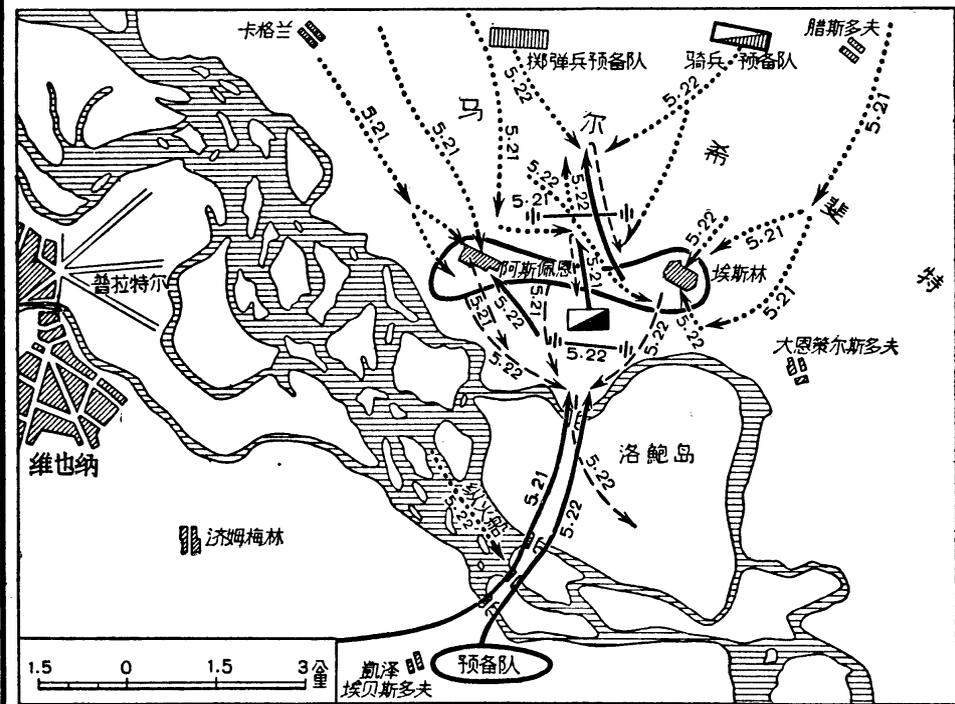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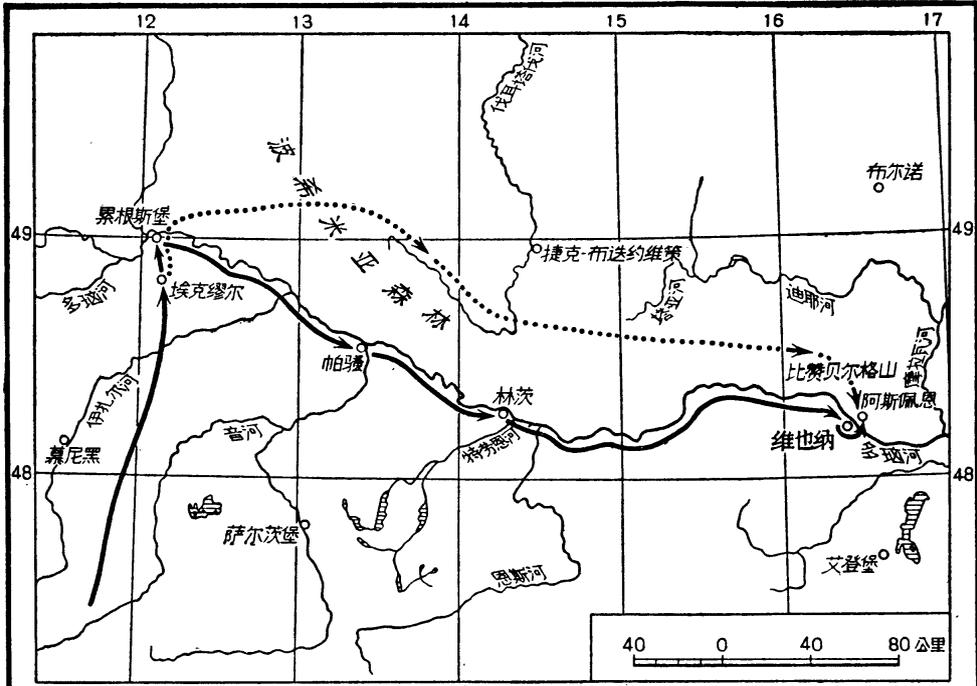
拿破侖亲自率領8万做好战斗准备的精兵,其中包括皇家近卫軍和貝西埃尔的騎兵預备队,打算渡过多瑙河同卡尔大公会战,并企图在他援兵到达前将他歼灭。为此,他下令在多瑙河的右岸和洛鮑島之間用68条大船和9个大木筏,鋪上最坚固的材料架桥,而从洛鮑島到馬尔希斐特(即在阿斯佩恩和埃斯林两居民点之間的地方)則架設較为輕便的浮桥;21日晨,他开始全力以赴地、周密地組織部队渡河。奥軍司令官从高处的高地上看見法軍行动輕率:皇帝使自己龐大的軍队从唯一的一座桥上通过湍急的大河,因此各兵种只能依次緩慢地通过狹长的桥,騎兵过河已感困难,炮兵則更加困难了;一旦軍队被迫退却,这座桥就未必能够拯救他們。他看到这一点后,立即决定利用这一时机,趁法軍的一半兵力还在忙于渡河或者仍在南岸时,就消灭已渡到北岸的另一半法軍。这位大公命令在上游的部队的指揮官科洛夫拉特、諾德曼等准备好船只,装上重物和纵火物,以便在适当的时机破坏桥梁,同时他把自己的主力隱蔽起来,命令騎兵和前哨佯作抵抗,然后在馬森納率領的法軍进攻时实行退却。到12时,敌人已相当深入——4万多法軍已渡到北岸,——卡尔大公可以夺取主动权了。这时,他率領8万人,其中包括14000名精銳騎兵和288門火炮,从多林的比贊貝尔格山下来,以拿破侖两翼的两个居民点——阿

斯佩恩和埃斯林为主要攻击目标，冲向敌人；这两个据点之间的中央地区、石质建筑物、筑有围墙的花园和许多栅栏，被强大的奥军炮队占领，它们主要由骑兵掩护，而霍亨索伦的步兵则作为预备队留在后方。在奥军进行翼侧攻击时，两翼展开了惊心动魄的战斗，攻击的猛烈和防御的顽强在战史上几乎都是没有前例的。两个居民点几度易手，而奥军炮兵则大量地杀伤了法军，以致拿破仑命令骑兵发起总攻，企图夺取奥军的火炮。法军优秀的近卫胸甲骑兵以自己素有的勇猛和大胆精神进攻并击退了奥军骑兵。如果奥军不是迅速把火炮撤走，不是把步兵编成方队（这种方队像以后在滑铁卢会战⁵⁴中一样，粉碎了一切要突破它们这种无法攻破的队形的企图），那末火炮就可能被法军缴获了。最后，方队击败了骑兵，使他们遭到惨重的损失，狼狈不堪地退回自己的阵线。这时，阿斯佩恩已为奥军攻克；尽管法军胸甲骑兵是那样英勇，不怕牺牲，在人数愈来愈少的情况下仍反复攻击，孤军阻止敌人突破阵线，但是奥军的中央仍然逐渐地、但不可阻挡地向前挺进。

黑夜使战斗暂时停止了。可是法军在这次决战中已遭到了明显的失败，左翼已被迂回，中央几乎被击退到了桥头；右翼的埃斯林，由于朗恩的英勇顽强，虽然还没有失守，但已被奥军包围，而这些奥军就在法军的尸体之间倚枪打盹，准备一到拂晓就再次进攻。

可是，这一整夜，生力军不断地过桥到达马尔希斐特，因此到拂晓时，除去第一日战斗的全部损失外，拿破仑还整整拥有7万人，而已经开始渡河的由达武指挥的3万人还不计在内。会战一开始，又恢复了对两个争夺中的居民点的攻击；埃斯林为奥军攻克，而阿斯佩恩则重新被法军占领。一整天，两个居民点成了决斗的场所，双方都用刺刀冲杀，两地反复易手，但最后还是被奥军

阿斯佩恩会战 (1809年5月21—22日)



占領了，他們在傍晚時把炮兵調到這兩個居民點，對法軍的後方進行交叉射擊。但是在這場血戰中，拿破侖依靠強大的援兵擺脫了守勢，採取了自己慣用的戰法——對敵軍中央進行殲滅性的攻擊。他派朗恩和烏迪諾率領一支擁有 2 萬多步兵、前有 200 門火炮、後有大量騎兵的龐大縱隊，直撲奧軍的中央，即霍亨索倫的左翼和羅森堡的右翼之間的、看來是他們戰綫的最弱的部分。起初，這次來勢凶猛的攻擊似乎已完全成功；奧軍的防綫已被突破，在霍亨索倫和羅森堡的部隊之間已經形成了一個很大的缺口，法軍的騎兵凶猛地沖入了這個缺口，打開了一條深入後方直到羅伊斯公爵預備隊陣地的道路；到處傳說奧軍敗局已定，但卡爾大公卻能夠沉着應變：預備隊的擲彈兵兼程趕往突破口，排成棋盤形配置的許多方隊；隨擲彈兵之後疾馳而來的是利希頓施坦公爵的大量龍騎兵，這位勇敢的公爵手持察赫因旗，恢復了態勢。

朗恩的強大縱隊不能繼續前進，於是停下來開始同方隊進行互射，但是由於無法展開，所以被炮隊從相當於火槍射程一半的距離上進行的集中射擊擊潰了。他的騎兵攻擊方隊，向刺刀硬沖，沒有成功；任何一個方隊都沒有動搖，沒有被擊破。最後，奧軍預備隊的龍騎兵吶喊著向法軍的胸甲騎兵攻擊，擊潰了他們，迫使他們慌亂地奔向自己的步兵，終於使全軍都陷於混亂之中。霍亨索倫在擊退攻擊之後，立即率領 6 個匈牙利擲彈兵團在中央的右方突破了法軍的陣綫，攻佔了直到埃斯林後方的整個地區，這時埃斯林和阿斯佩恩已被奧軍最後攻佔。當奧軍中央不顧向洛鮑島全面退却的法軍的奮勇抵抗而勝利前進的時候，奧軍炮隊也從這兩個居民點對橋進行了殲滅性的交叉射擊，每一發炮彈都殺傷了大群密集的人馬。

法軍除遭到了以上这一切灾难外，连接洛鮑島和南岸的桥这时也被奥軍的纵火船和木筏破坏了，因而暂时失去了从該島后撤的一切可能。尽管如此，法軍的后卫仍然非常坚定地战斗到半夜，抵擋奥軍，直到法軍最后一批部队撤离战场退到島上，直到奥軍炮队停止了轰击，而被这史无前例的、光荣的一天的紧张战斗弄得疲憊不堪的炮兵在火炮旁入睡时为止。

法軍有 7 000 人被胜利者埋葬在战场上，有 29 793 名伤兵和俘虏被送往維也納。朗恩和圣伊雷尔受了致命的重伤，几天后便死去了。奥軍战死的高级军官 87 人，兵士 4 200 人；負伤的 16 300 人。可是这次在首都城下、而且几乎就在首都的视界以内所取得的胜利却是一次全面的胜利；敌人惨遭挫敗，士气沮丧，被圍在洛鮑島那一小块地方。假如約翰大公能按照命令的要求，在法軍于阿斯佩恩潰敗后的第二日早晨率領 6 万生力軍赶到法軍的后方，那末結果怎样就不难断言了。

可是拿破侖的末日还没有到来，各国人民还要忍受四年苦难，直到这个軍事巨人在萊比錫⁵⁵和滑铁卢的战场上最后倒下来的时候，才重新获得了自由。

弗·恩格斯写于 1857 年 7 月 14 日
和 8 月 10 日之間

載于“美国新百科全书” 1858 年版
第 2 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弗·恩格斯

攻 击

“攻击”这一术语，就其总的战略意义来说，是指在任何一次大小战斗或决战中夺取主动权的行动；而且，在任何场合，开始时总是一方进攻而另一方防御。一般认为，进攻能获得更大胜利。因此，采取守势即进行完全防御性的战争的军队，常常发起进攻战局，甚至在防御战局中也进行进攻战。在前一种场合，防御军队的任务是：改变态势和战区，打乱敌人的计划，引诱敌人远离其作战基地，并迫使敌人在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没有准备的、而且肯定会对他不利的时机和地点进行会战。

在完全防御性的战局中进行进攻战和不断攻击的最出色的例子，是拿破仑的两个卓越的战局——1814年战局和1815年战局，虽然前者以拿破仑被流放到厄尔巴岛而告终，后者以滑铁卢的失败和巴黎的陷落而结束。在这两个著名的战局中，这位完全为了保卫遭到敌人侵犯的国家而战的统帅，在一切地点一有机会就向敌人进行攻击；虽然整个说来兵力始终比入侵的敌人少得多，但是他每次在攻击地点都能够造成优势，而且通常都获得了胜利。这两个战局的不利结局丝毫不贬低它们在总的意图方面的优点或其中局部行动的意义。这两个战局之所以失败，完全不是计划本身或计划执行上的原因，而是政治方面和战略方面的原因；其中主

要的原因就是同盟国方面在兵力上占有巨大优势，一个在四分之一的世紀內連年战争因而力量消耗殆尽的国家，已不可能单独抵抗整个武装起来的世界对它的进攻。

有一种观点，认为两軍在战场上相遇时，誰先夺得主动权，或者換句話說，誰先**攻击**，誰就取得决定性的优势。不过，持有这种观点的人，看来是受了几个偉大統帥和一两个軍事强国取得的光輝成就的强烈影响，因为这些統帥和强国都把自己的胜利归功于大規模的攻击。这种看法显然需要大大地修正。埃帕米农达斯、亚历山大、汉尼拔、凱撒，最后（按年代先后，而不是按作用大小）还有拿破侖第一，都是特別喜爱攻击的統帥；他們所有的重大胜利都是在自己掌握主动权的軍事行动中取得的，而所有的巨大挫折也大多是在自己掌握主动权的軍事行动中遭到的。法国人把自己的一切胜利都归功于几乎是銳不可当的勇猛攻势，归功于迅速判断情况、扩大战果和彻底粉碎敌人的才能。可是，在防御时法国人就远非如此强大。在我們看来，世界上各次大会战的历史都证明，在下列情况下，即被攻击的軍隊具有坚定沉着的精神，足以进行不断的抵抗，直到攻击者的火力开始减弱、兵力行将耗尽，然后轉为进攻，进行攻击，防御的战法才是最可靠的。但是，善于这样作战的軍隊以至民族为数不多。就以羅馬人來說，他們虽然出色地防守过城堡和在野战条件下卓越地进行过进攻战，但是从来沒有在防御战中显过身手。在他們的历史上找不到任何一次会战是在不利的条件下进行了整日的防御战以后再最后轉为攻击而贏得胜利的。至于法国軍隊及其統帥，在总的方面也可以說是如此。相反地，希腊人进行的許多最成功的会战，例如馬拉松会战、温泉关会战、普拉迪会战等，特別是普拉迪会战，則是按照下述方法进行的：他們先

抗击敌人的猛攻，直到敌人力量削弱，然后再出其不意地攻击敌人的消耗了一半的部队。这样的战法，英国人曾采用了許多世紀，瑞士人和德国人也曾广泛地采用过；它通常都給这些民族的军队带来了胜利，而在較后的时期它也被美国人成功地运用了。克雷西会战、普瓦提埃会战、阿津庫尔会战、滑铁卢会战、阿斯佩恩和埃斯林会战^①，以及不胜枚举的其他許多会战，都是准确地按照这种战法进行的。这里还可以补充一点，即在1812—1814年的战争⁵⁶中，美国人成功地使用了英国人的战法来对付英国人，这种战法曾为英国人极其有效地用来对付过法国人，而且不久以前还在对俄战争中得到了檢驗，而英国人几乎始終不变地攻击美国人，并且还違背他們自己的慣例成纵队攻击。

在战争中当两軍对峙并准备会战时，通常使用下列几种攻击方法：第一、全正面攻击，这是最簡單的方法，即攻击者在从这一側到另一側的整个正面上同时进行攻击，并只以硬攻来解决会战。第二、翼側攻击，即以两翼同时攻击，或先以一翼，后以另一翼攻击，而将中央的兵力控制在稍后的地方。这是拿破侖喜用的战术。他往往迫使敌人减弱中央的兵力去加强两翼，而自己却把中央的兵力挪后，以龐大的騎兵預备队来加强它，最后，迅速冲入在敌人中央形成的缺口，以歼灭性的突击解决会战。第三、中央攻击，这时两翼挪后作为預备队。在这三种攻击方法中，最后一种缺点最多；它很少被采用，而且正如大家所认为的，它从来没有成功过。假如军队被迫摆成这种陣势，通常会被包围以至消灭，在坎訥进行攻击的羅馬军队就是这样^②。相反，这种陣势用于防御却极为适

① 关于这次会战，見本卷第64—70頁。——編者注

② 見本卷第303—305頁。——編者注

宜。第四种方法——斜形攻击，这是埃帕米农达斯的创造，他在列夫克特累和曼提涅亚会战中采用这种战法而取得了辉煌胜利。这种战法就是攻击敌人的一翼，并秘密地逐渐加强自己的一翼兵力，而中央和另一翼这时稍向后移，但随时机动，使对方经常受到攻击的威胁并且无法及时加强其薄弱地点，以致防御终被突破。这就是奥地利人克累尔费和弗里德里希大帝喜用的战法。克累尔费运用这种战法经常击溃土耳其人；弗里德里希大帝在谈到自己最辉煌的胜利时常说，“他只不过是重演埃帕米农达斯的战法而已”。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希腊人、法国人，同样还有俄国人和奥地利人，在他们所有出色的会战中，通常都是采用纵队攻击而赢得胜利的。这种纵队只要不遇到真正的障碍并不为敌人所阻，就可以突破敌人中央而长驱直入。罗马人、英国人和美国人过去不论在进攻或防御中都几乎始终不变地成横队作战，而英国人和美国人现在也仍然如此；他们常常成这种队形以中央兵力去抗击敌人纵队的猛攻，阻止住敌人，直到自己的两翼前出，包围敌人的两翼，粉碎敌人为止。必须指出，每当英国人放弃这种可以说是民族的两列横队攻击方法，而像在丰特努瓦会战和契珀瓦会战⁵⁷那样用纵队攻击时，他们就遭到了失败。对于坚定沉着的敌军，用纵队攻击中央的法法是根本错误的，这几乎已成了定论，虽然对于体质和纪律都较差的敌军，特别是士气沮丧的敌军，用这种方法仍有把握取得胜利。

对于只有步兵防守的多面堡——野战工事，可以立即攻击；如果多面堡还有炮兵防守，攻击者就必须首先用火炮压制住防御者的火炮。炮兵火力应破坏防栅，击毁敌人的火炮，摧毁胸墙，从而迫使防御者把火炮撤到工事内部去。在炮兵完成任务后，轻步兵，主要是猎兵，绕过工事的一部分，向胸墙顶进行射击，使防御者完全

不敢露头或不得不仓促射击。猎兵逐渐接近多面堡，在預定的地点集中，这时組成强攻纵队，由携带板斧和云梯的兵士走在纵队的前面。纵队的第一列可能还携带束柴，把束柴当作盾牌使用，同时也把它用来填护堡壕。这时，多面堡的加农炮会退而对付强攻纵队；而参加攻击的猎兵应加强火力，以射击防御地点的炮手为主，因为他们可能企图給自己的火炮重新装填炮弹。如果攻击者能进到护堡壕，那末很重要的是，在进攻时协调一致地行动和从四面八方同时冲向多面堡。因此，攻击者应在护堡壕边停留一下，等待规定的信号。当他们攀登胸墙时，防御者会用榴弹炮的爆炸弹和滚木礮石迎击他们，而在胸墙頂上，将用刺刀和枪托来对付他们。虽然陣地的有利条件仍在防御者方面，但是进攻的銳气使攻击者在精神上具有很大的优势。如果多面堡两侧沒有其他工事掩护，那末，通常正是在这个时候击退敌人坚决的进攻是困难的，虽然也并非完全不可能，某些战例就证明了这一点。对于非永久性的工事，可以进行突然攻击或者进行硬攻，在这两种場合，指揮官首要的职责，就是通过間諜或偵察获得尽可能完整的关于工事的性质、它的守軍、防御兵器和各种物资的情报。在攻击时步兵时常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器材，这时兵士需要发挥自己的創造性：用干柴燒毀鹿砦，用草捆填平不大的壕沟，在猎兵掩护下使用云梯攀越防栅，以及用火药包爆破堵塞的門窗等。步兵只要坚决大胆地使用这些器材，通常就能够克服任何一种普通障碍物。

弗·恩格斯写于 1857 年 7 月 14 日
和 8 月 10 日之間
載于“美国新百科全书” 1858 年版
第 2 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弗·恩格斯 阿富汗

阿富汗——亚洲的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位于印度的西北，介于波斯和印度之间，而在另一方向上则介于兴都库什山脉和印度洋之间。过去，波斯的行省霍拉桑和科希斯坦连同赫拉特，以及俾路支、克什米尔、信德和旁遮普的很大一部分，都归入阿富汗的版图。目前全国有将近 400 万居民。阿富汗的地势极不平坦，有高原和大山，有盆地和深谷。像所有多山的热带国家一样，气候差异很大。兴都库什山的山峰终年积雪，而盆地的温度高达 130 度^①。东部地区较西部地区炎热，但是一般说来，气候比印度凉爽。尽管冬夏之间和昼夜之间温度相差很大，但是总的说来，这个国家的气候是有益于健康的。主要的疾病有热病、胃炎和眼炎。有时天花造成极为荒凉的景象。阿富汗土壤非常肥沃。沙漠的绿洲密密麻麻地生长着海枣，炎热的盆地出产甘蔗和棉花；而在 6 000 或 7 000 英尺高度以下的山坡的梯田上则盛产欧洲的水果和蔬菜。山上全是茂密的森林，熊、狼和狐狸经常出没其中，而狮、豹和虎等栖息在适于它们生活的地方。同时也不乏有益的动物。这里有良种波斯羊即肥尾羊。有高大的良种马。骆驼和驴当做驮畜使用；山羊、狗

^① 华氏。——编者注

和猫都很多。除喜馬拉雅山的延伸部分兴都庫什山脉之外，在西南部还有索利曼山脉，而在阿富汗和巴耳赫之間橫貫着帕勒帕迈塞斯山脉，但欧洲人对这个山脉知道得很少。河流不多，其中最大的是赫尔曼德河和喀布尔河。它們都发源于兴都庫什山，喀布尔河向东流，在阿托克附近入印度河，而赫尔曼德河向西流，經過錫斯坦省入济腊盐沼。赫尔曼德河的特点是，它像尼罗河一样，每年泛濫，使两岸的土壤肥沃，而在泛濫地区以外則是沙漠。阿富汗的主要城市是它的首都喀布尔、加茲尼、白沙瓦和坎大哈。喀布尔是喀布尔河上的一座非常美丽的城市，位于北緯 34 度 10 分，东經 60 度 43 分。城內的房屋是用木材建造的，整洁而舒适，城市四周有綺麗的园圃，景色引人入胜。喀布尔被村庄所包圍，处于丘陵环抱的广闊的平原的中央。城中的主要古迹是巴卑尔皇帝的陵墓。白沙瓦是拥有 10 万居民的大城市。加茲尼是自古聞名的城市，一度为馬茂德大苏丹的都城。它已經失去了昔日的光輝，現在显得破旧不堪了。在离加茲尼城不远的地方有馬茂德的陵墓。坎大哈建立較晚(1754 年)，座落在一个古城的旧址上。它在好几年內曾是首都，但在 1774 年政府所在地迁到了喀布尔。据估計，坎大哈有 10 万居民。离城不远有該城的奠基人阿罕默德-沙赫的陵墓。这里是非常神圣的避难地，就連国王也不能捉拿躲藏在陵墙里面的犯人。

阿富汗的地理位置和民族特征，使这个国家在中亚細亚的事务中具有非常重大的政治作用。政体是君主制，但是国王对他的勇敢而不安分的臣民的統治具有个人独裁的性质，而且极不巩固。王国划分为若干省，每省都由国王的代表管轄，他們征收捐稅并把捐稅送往京都。

阿富汗人是勇敢、剛毅和愛好自由的人民。他們只從事畜牧業或農業，想方設法避開手工業和商業，他們抱着鄙視的態度讓印度人和其他城市居民去從事這些行業。戰爭對他們說來是一種消遣和擺脫單調的營生的休息。阿富汗人分為若干克蘭⁵⁸，大大小小的首領對他們實行類似封建的統治。只是他們對國家政權深惡痛絕，愛好各自獨立，才妨礙他們成為一個強大的民族。而正是這種自發性和反復無常的行為使他們成了危險的鄰居，他們受一時的情緒支配並且容易為那些能巧妙地引起他們激情的政治陰謀家迷惑。主要的部落是都蘭尼人和吉爾采人，他們一貫相互敵視。都蘭尼部落較為強大，由於它占優勢，它的艾米爾即可汗就成了阿富汗的國王。國王的收入大致相當於1 000萬美元。他只是在自己的部落中行使全部權力。兵員主要由都蘭尼部落提供；軍隊的其餘部分由其他的克蘭補充，或者是由那些為了薪餉或搶劫而來服役的軍事冒險者補充。法官在城市里行使司法權，但是阿富汗人很少求助於法律。可汗有權制定包括死刑在內的刑罰。報殺親之仇是氏族的義務。然而，阿富汗人素以慷慨寬大的民族著稱，只有在受人挑撥的狀況下才例外；好客的規矩在他們中間非常神聖，哪怕是一個使用奸計而成為座上客的死敵，也不會受到報復，甚至還可以要求主人保護他不遭到任何其他危險。阿富汗人信奉伊斯蘭教，屬遜尼派，但是他們不愛搞表面的虔誠。遜尼派和什葉派⁵⁹之間通婚是常見的現象。

阿富汗曾先後受莫臥兒⁶⁰和波斯人的統治。在不列顛人來到印度海岸以前，印度斯坦平原受到的外敵入侵總是來自阿富汗。馬茂德大蘇丹、成吉思汗、塔梅爾蘭和納迪爾-沙赫，都是走這條道路。1747年，納迪爾死后，在這個軍事冒險家的手下學會了兵法

的阿罕默德-沙赫，决心掙脫波斯人的枷鎖。在他治理下，阿富汗达到了它在近代最輝煌和繁荣的地步。他屬於薩多扎伊氏族，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占有他的已故統治者在印度掠夺的东西。1748年他把莫臥儿总督逐出喀布尔和白沙瓦，然后渡过印度河，神速地攻入旁遮普。他的王国从霍拉桑扩展到德里，他甚至同馬拉提人⁶¹的国家較量。但是这些偉大的軍事业績并没有妨碍他关心各种和平艺术的发展，他享有詩人和历史学家的声誉。他于1773年逝世，把王位傳給儿子帖木儿，但是帖木儿不胜任他所担負的重任。他离开了他父亲所建造的、并且在几年內就已变成富裕而人口稠密的中心坎大哈城，把政府所在地迁回喀布尔。曾被阿罕默德-沙赫的铁腕遏止了的部落間的內部糾紛在他統治期間又发生了。1793年帖木儿逝世，由澤曼继位。这位国王打算巩固穆斯林在印度的統治权，这个会严重威胁不列顛領地的計劃引起极大的注視，因此約翰·馬尔科姆爵士被派往边境，以便在阿富汗人采取任何行动时制止他們，同时开始同波斯談判，企图借助于波斯使阿富汗人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但是这些預防措施用不着了；由于国内的密謀和混乱，澤曼-沙赫遇到很多的麻煩事，他的龐大計劃就胎死腹中了。国王的兄弟馬茂德举兵攻入赫拉特，企图建立一个独立的公国，但是遭到了失敗，并逃往波斯。澤曼-沙赫当初是在以薩腊弗腊兹汗为首的巴拉克查依氏族的支持下获得王位的。澤曼任命一个不孚众望的人当大臣，引起了他过去的拥护者的仇恨，他們策划了一个密謀；密謀被揭露了，薩腊弗腊兹被处死。在这以后，密謀者将馬茂德从波斯請回，澤曼被俘并被挖去双目。为了反对都兰尼人所支持的馬茂德，吉尔采部落从自己这方面推举舒扎沙赫，舒扎沙赫当了一个时期的国王；但是主要由于他自己的拥

护者的背叛，他最后遭到了失败，于是不得不到锡克教徒⁶²那里避难。

1809年拿破仑派加丹将军去波斯，打算怂恿沙赫^①入侵印度，而印度的英国当局也派代表^②去觐见舒扎沙赫，策划对波斯的抵抗。这时，朗吉特·辛格已经确立了政权，而且声名远扬。他是锡克教派的首领，凭着自己的才干使旁遮普脱离阿富汗人而独立，在该地区建立了一个王国，自称摩诃拉扎(大拉扎)，使得英印政府不得不看重他。而篡位者马茂德注定不能久享胜利之福。他的大臣法特赫汗(动摇于马茂德和舒扎沙赫之间，受虚荣心和一时的利益驱使，时而倒向这边，时而倒向那边)被国王的儿子卡姆朗捉住，双目被弄瞎，后来被残酷处死。被害大臣所属的强大氏族誓为死者复仇。傀儡舒扎沙赫又被推上台，马茂德被赶走。但是舒扎沙赫由于举止傲慢，不久就被推翻，由他的另一个兄弟即位。马茂德逃到赫拉特，继续统治这个地区，1829年他死后，他的儿子卡姆朗继承了这个地区的统治权。这时巴拉克查依氏族获得了最高权力；它的代表人物彼此划分了地盘，但是由于民族风气开始了内讧，并且只有面对共同的敌人才联合起来。有一个兄弟穆罕默德汗统治白沙瓦城，并为此向朗吉特·辛格纳贡；另一个兄弟统治加兹尼城，还有一个兄弟统治坎大哈，而统治喀布尔的是氏族中最有权势的代表人物——多斯特-穆罕默德。

1835年，亚历山大·白恩士上尉被派到这位国君那里当大使，这时正是俄国和英国在波斯和中亚细亚彼此勾心斗角的时期。他向多斯特建议缔结同盟，这原是多斯特非常乐意的；但是英印政府

① 费特赫-阿利-沙赫。——编者注

② 蒙·埃耳芬斯顿。——编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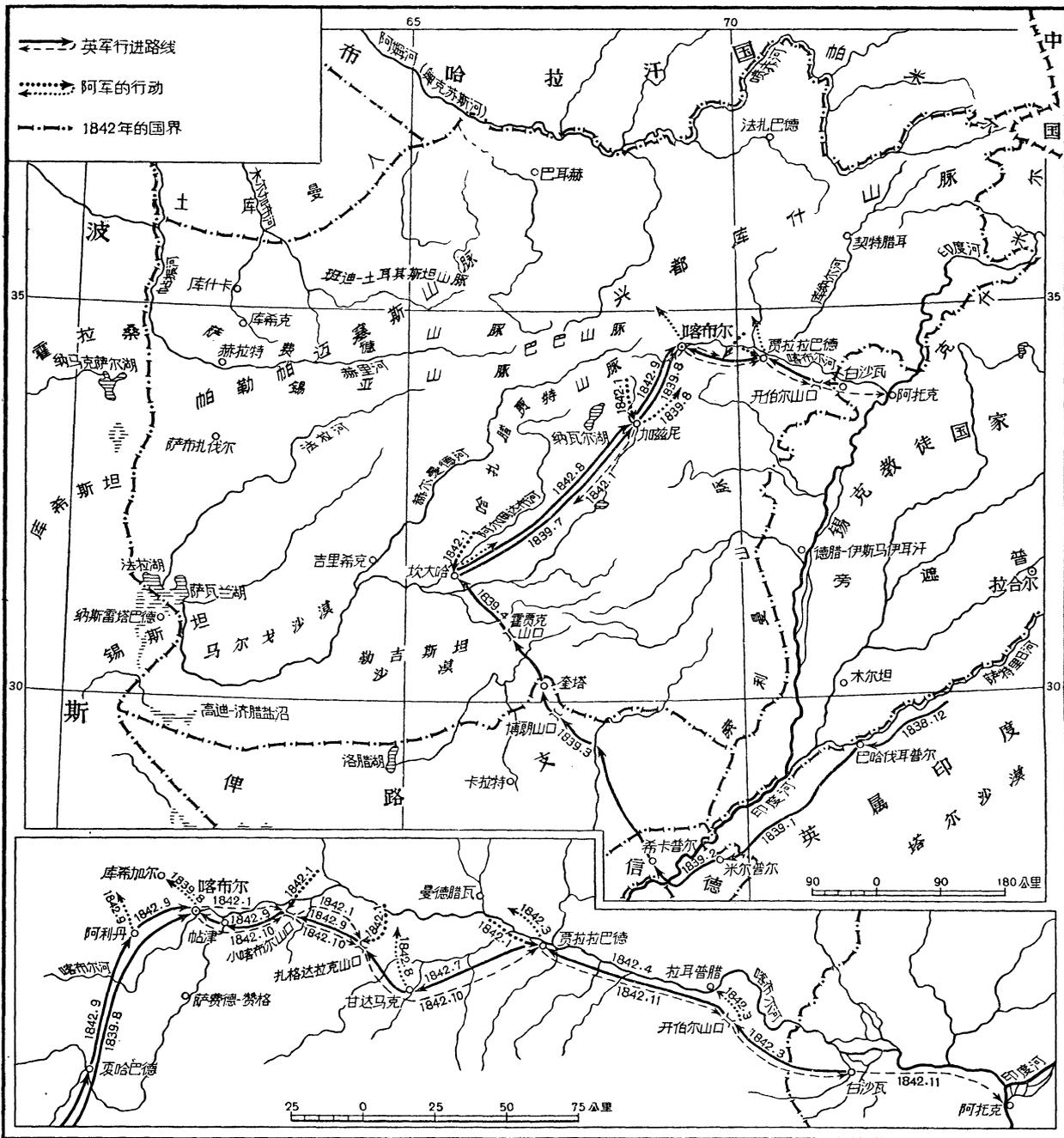
尽可能地向他提出各种要求，而自己却不提供任何东西作为交换。同时，波斯人于 1838 年在俄国人的帮助和劝说下包围了通向阿富汗和印度的要地赫拉特⁶³，波斯和俄国的代表来到喀布尔，而多斯特由于英国人始终拒绝承担任何明确的义务，终于被迫接受另一方提出的建议。白恩士离开了喀布尔，于是印度总督奥克兰勋爵在他的秘书威·麦克诺顿的影响下，决定惩罚多斯特·穆罕默德的这种行动，而这种行动正是他自己迫使多斯特采取的。奥克兰决定推翻多斯特，让当时领取印度政府津贴的舒扎沙赫代替他。英国人同舒扎沙赫和锡克教派订立了条约，沙赫开始招募军队，由英国人出钱并由英国军官指挥，而英印军队在萨特里日河地区集中。麦克诺顿以白恩士为助手，作为驻阿富汗公使随军远征。这时，波斯军队已经在赫拉特撤围，这样，干涉阿富汗事务的唯一有力的借口就不存在了。尽管如此，1838 年 12 月英军仍然开进信德，强使该地区屈服并向它征收军税以供锡克教徒和舒扎沙赫。⁶⁴ 1839 年 2 月 20 日英军渡过印度河。他们约有 12 000 名兵士和 40 000 多名服务人员，此外还有沙赫的新兵。3 月英军越过博朗山口；粮秣已感不足；骆驼成百地死亡，辎重的大部分都损失了。4 月 7 日英军逼近霍贾克山口，并且在没有遇到抵抗的情况下越过山口，4 月 25 日进入阿富汗的统治者即多斯特-穆罕默德的兄弟们所放弃的坎大哈。经过两个月的休整，英军司令约翰·吉恩爵士将诺特指挥的一个旅留驻坎大哈，自己率领主力部队向北进发。由于一个投敌分子泄露了所有城门中只有喀布尔门没有筑防栅的消息，阿富汗的不可攻克的要塞加兹尼于 7 月 22 日被攻占；城门被炸开，要塞在强攻下被占领。多斯特-穆罕默德所招募的军队在这次惨败后就都逃散了，8 月 6 日喀布尔也打开了城门。

舒扎沙赫以应有的仪式登上了王位，但是真正的权柄掌握在麦克諾頓手中，而麦克諾頓也从印度国库中支付舒扎沙赫的一切費用。

对阿富汗的征服似乎已經完成了，大部分军队被調回。但是阿富汗人决不甘心受 Feringhee Kaffirs（欧洲異教徒）的統治，1840 年至 1841 年間全国各地接二連三地爆发起义。英印军队不得不經常調动。然而麦克諾頓宣称，阿富汗社会的情况通常就是如此，并且向英国报告，情况良好，舒扎沙赫的政权是巩固的。英国军官和其他派駐官吏的警告都是徒劳。1840 年 10 月，多斯特-穆罕默德向英国人投降，并被解往印度；在 1841 年夏季，所有起义都被順利地鎮压下去了；而到 10 月，麦克諾頓被任命为孟买总督，他打算率領另一批部队开赴印度。可是这里突然起了風暴。对阿富汗的占領每年要印度国库花費 125 万英鎊：支付駐阿富汗的 16 000 名英印军队和舒扎沙赫军队的薪餉开支；还有在信德和博朗山口的 3 000 名军队；舒扎沙赫的帝王的豪华生活費用、他的官員們的薪俸以及他的宮廷和政府的全部費用由印度国库开支；最后，津貼或者确切些說收买阿富汗的首領們，使他們不采取敌对行动，这一笔費用也从同一来源中支付。有人对麦克諾頓說，花費这么多的錢长此以往是不行的。他試圖厉行節約，但是唯一可行的節約办法就是停止对首領們的津貼。就在他試行这项措施的那一天，首領們策划了一个旨在消灭英国人的密謀，这样，麦克諾頓本人就成了联合这些反叛力量的工具，而在此以前这些力量反对侵略者的斗争是单独进行的、不統一的；不过有一点也是毫无疑問的，即当时阿富汗人对不列顛人統治的仇恨已达到了頂点。

駐喀布尔的英軍是由埃耳芬斯頓將軍指揮的，他是一个患痛風病、毫无才能而又优柔寡断的老头子，他的命令常常互相矛盾。

阿富汗 (1838—1842 年第一次英阿战争时期)



部队占据的地方类似一个营垒，非常宽广，以致守备部队几乎不够防守垒墙，至于要派部队到开阔地作战，那就更不够了。防御工事极不完善，塹壕和胸墙可以骑马越过。好像是为了补足这一切不幸似的，瞰制营垒的高地几乎处于枪弹的射程之内；而整个部署中最荒唐的是：所有粮食和药品的储备都放在离营垒有一段距离的两个独立堡垒内，在它们同营垒之间隔着一些围有籬笆的园圃和另外一个未被英军占领的小堡垒。喀布尔的城砦，即巴拉吉萨尔本来可以作为整个军队的一个安全的、极好的冬季驻扎地，但是为了迎合舒扎沙赫的心意而没有加以占领。1841年11月2日，起义爆发了。亚历山大·白恩士在城内的住宅遭到袭击，他本人被杀。这个不列颠将军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起义由于没有遇到抵抗而声势更大了。埃耳芬斯顿恐慌万分，盲目地听从了各种各样互相矛盾的意見，不久就把一切弄得混乱不堪，拿破仑曾用三个词概括了这种混乱状况：ordre, contre-ordre, désordre [命令，反命令，混乱]。甚至这时巴拉吉萨尔还没有被占领。只派了几个连去对付几千名起义者，当然被击溃了。这就使得阿富汗人更加勇敢了。11月3日他们占领了靠近营垒的堡垒。11月9日存放军需品的堡垒被阿富汗人占领（堡垒守军只有80人），这样，英军就势必要挨饿。11月5日埃耳芬斯顿就已经谈论要出钱换取不受阻碍地撤出该国的权利。实际上到11月中旬，由于他的优柔寡断和无能，军心已经非常涣散，不论欧洲兵或是西帕依⁶⁵都已经无法同阿富汗人进行野战。于是就开始了谈判。在谈判过程中，麦克诺顿在一次与阿富汗首领们的会晤中被杀。这时已经遍地冰雪，粮食缺乏。1月1日终于签订了投降协定。全部现金19万英镑必须交给阿富汗人，此外，还签署了14万英镑的期票。除6门六磅炮和3门

山炮外，全部火炮和彈药都留給了阿富汗人。英軍必須全部撤出阿富汗。首領們答应保证安全，提供粮食和馱畜。

1月5日英軍开始撤退，它的队伍計有4500名兵士和12000名服务人員。仅仅走了一天的路程队伍就毫无秩序了；兵士与服务人員混杂在一起，出現了一种无可救药的混乱状态，使得任何抵抗都成为不可能。寒冷、冰雪以及粮食不足的情况，就像拿破侖从莫斯科撤退时一样。但是使英国人提心吊胆的不是离他們相当远的哥薩克，而是装备有远射程火枪和占据着每一个高地的頑强的阿富汗狙击手。签订投降协定的那些首領是不能而且也不願制止山地部落的。小喀布尔山口就成了几乎是全軍的坟墓，而它的一小股殘余部队(不到200名欧洲人)被歼灭在扎格达拉克山口的入口处。只有布賴登医生一个人逃到賈拉拉巴德，讲述了經過情况。許多軍官被阿富汗人所擒，作了俘虏。賽尔指揮的旅一直坚守賈拉拉巴德。人們要求他投降，但他拒絕退出城市；諾特在坎大哈也是这样。加茲尼被攻陷；在这个城市里連一个稍微懂得一点火炮的人都沒有，而作为守軍的西帕依又經受不了这里的气候。

这时，不列顛边境当局一得到喀布尔慘敗的消息，就在白沙瓦集結部队，以便援救在阿富汗的几个团。但是运输工具不足，在西帕依中病号又很多。1842年2月，波洛克將軍接任指揮官，3月底他得到了新的增援部队。于是他强行通过开伯尔山口，前往賈拉拉巴德解救賽尔，但是賽尔在几天以前已在該地把包圍他的阿富汗軍队完全击败。新任印度总督埃倫伯勒勛爵命令英軍撤退，但諾特和波洛克都借口他們缺乏运输工具而婉言拒絕服从。到了7月初，印度輿論終于迫使埃倫伯勒勛爵采取某些措施以挽回英国軍队的民族荣誉和威信；因此他批准从坎大哈和賈拉拉巴德同

时向喀布尔进军。到了8月中旬，波洛克和諾特彼此商定了作战计划，8月20日波洛克向喀布尔进发，到达了甘达馬克，并于23日击潰了阿富汗人的一支部队；9月8日他夺取了扎格达拉克山口，13日在帖津附近击潰了敌人的联合部队，15日在喀布尔城下扎营。与此同时，諾特于8月7日离开坎大哈，率领他的所有部队向加茲尼进发。经过几次小冲突，他于8月30日击潰阿富汗人的一支大部队，9月6日占领敌人放棄的加茲尼，破坏了工事和城市，在阿利丹附近阿富汗人的一个坚固陣地上，又一次击败阿富汗人，9月17日兵临喀布尔城郊，在这里波洛克立即同他建立了联系。早在这以前，舒扎沙赫已被一个首領杀害，从那时起阿富汗已經沒有真正的政府；名义上的国王是他的儿子法特赫·琼格。波洛克派了一个騎兵部队去营救喀布尔的被俘人員，但是后者已經买通了看守人，所以他們在中途与部队相遇。为了报复，英軍破坏了喀布尔的市場，同时，洗劫了城市的一部分，屠杀了許多居民。10月12日英軍放棄喀布尔，经过賈拉拉巴德和白沙瓦开往印度。法特赫·琼格处于絕境，就跟随英軍而去。这时，多斯特-穆罕默德被釋放，返回了自己的王国。英国人在阿富汗扶植傀儡国王的尝试就这样結束了。

弗·恩格斯写于1857年8月10日
左右

載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
第1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弗·恩格斯 鹿 砦

鹿砦，abattis（軍事用語）——用砍倒的樹構築的障礙物，在山地戰中常常被當做最簡單的手段使用。在緊急的情況下，把樹縱向放倒，樹枝朝外，以阻礙敵人前進，而樹干則用做防禦者的胸牆。如果事先構築鹿砦（例如當做防守山隘的手段），那就要把樹枝去葉削尖，把樹干埋進土里，再把樹枝編成一種類似 chevaux de frise〔拒馬〕的東西。

弗·恩格斯寫於 1857 年 8 月 10 日
左右

載於“美國新百科全書”1858 年版
第 1 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美國新百科全書”

俄譯文第一次發表

弗·恩格斯 炮座

如果要把炮台上的火炮架高到足以超越胸墙顶进行射击，而不是像通常那样，通过射孔进行射击，一般认为火炮就要 en barbette [用炮座]配置。要使火炮炮位达到这样的高度，可采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在野战工事里，胸墙后面的土平台可以作为安置火炮的地方。在永备工事里，利用一般的高滑动炮架或旋转台把炮放到必要的高度。en barbette 配置的火炮不像通过射孔射击的火炮那样，有防御敌人火力的掩护；所以，只有在怕严重损坏胸墙而不能开射孔或希望不受射孔限制而向左右两侧扩大火力作用范围的情况下，火炮才配置炮座。因此，en barbette 配置火炮的方法适用于野战筑城、凸角工事和射击军舰的岸防炮台，尤其适用于有石砌胸墙的工事。为了掩护火炮不受到纵射火力，必要时可构筑横墙和垛墙。

弗·恩格斯写于1857年9月14日
左右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
第2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棱堡

在古代筑城中，城墙是用圆形塔楼或方形塔楼从侧面防守的，当强攻的敌人遇到护城壕被迫停止前进时，被围者可以从塔楼向敌人射箭，并利用军用器械发射投掷物。欧洲出现炮兵以后，这种塔楼开始建造得相当大，十六世纪初，意大利工程师们终于将圆形或方形塔楼改为多角形塔楼，这样就建成了棱堡。棱堡是不等边的五角形工事，它的一边面向要塞内部，因此对面的凸角向开阔地突出。形成凸角的两条长边称为正面，而把两条长边同城墙或垒墙连接起来的两条短边称为侧面。正面对付敌人的远程火力，而侧面以自己的火力掩护护城壕。最初的意大利棱堡还带有它的前身古代塔楼的痕迹。它构筑在离主墙很近的地方，凸角很钝，正面短，胸墙的表面用石块一直砌到顶端。这种小型棱堡的侧面主要是用来掩护连接两个棱堡的中堤前面的护城壕的。因此侧面和中堤垂直。这些棱堡位于多角形要塞围墙的每个角上，或者，如果多角形要塞的一边过长，这条边的一部分处在两个突出侧面的步枪有效火力范围以外，那末就在中间构筑中间棱堡，这种棱堡叫做 *piatta forma* [台堡]。

随着十七世纪攻城炮的改进，需要有更大的棱堡，中堤很快失去了它的意义，因为这时攻击的主要对象是棱堡。侧面的作用也

有改变：这时侧面必须主要沿着邻近棱堡的正面前的护城壕进行纵射，并且侧面已不再和中堤垂直，而是和邻近棱堡正面的延长线（称为防守线）垂直。垒墙的石砌部分的高度减低了，这是为了使斜堤或者较低的外围工事的胸墙能够掩护它以防避敌人的平射火力。因此，老的法国派和德国派的代表们，以后的沃邦和库霍尔恩都曾对棱堡的形式和规模做了多次的改变，直到大约 1740 年科尔蒙太涅发表了他关于棱堡筑城体系的著作⁶⁶为止；科尔蒙太涅的筑城法通常被认为是棱堡筑城体系中最完善的。科尔蒙太涅的棱堡具有尽可能大的规模；它的侧面和防守线接近垂直，而不完全垂直；外围工事也相当完善。

棱堡有实心的或空心的两种。实心棱堡的整个内部填实到土堤的高度，而空心棱堡是沿着棱堡的内边筑土堤，土堤很宽，足以放置火炮，而工事的中心是空的。在实心棱堡里有时构筑封堞，这是一种各边与棱堡的各边相平行的工事，它们构筑得很高，以便火炮从这里可以超越棱堡的胸墙进行射击。由于这种封堞的制高位置，通常在封堞里放置射程最远的火炮，以便从远距离用炮火骚扰敌人。

自十六世纪起，以棱堡为基础的筑城体系是唯一被公认的体系，直到十八世纪末，蒙塔郎贝尔才提出了一些不设棱堡的新的筑城方法。其中最受赞许的是构筑远离海岸的要塞的多边形体系或侧防暗堡体系，以及配置几层火炮的穹窿岸防炮台体系。

弗·恩格斯写于 1857 年 9 月 14 日
左右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 年版
第 2 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刺 刀

通常认为,目前所有基于步兵使用的这种武器是1640年前后在法国发明的(大概是在贝云 [Bayonne], 其名称即由此而来^①)。根据另外的资料,马来人把他们的«kris»,即短剑固定在火枪上,荷兰人从马来人那里学会使用这种武器,而法国则在1679年前后使用这种武器。在此以前,火枪手没有有效的白刃战武器,所以,为了在白刃战中保护火枪手,只好把他们同长矛手结成一体。刺刀使火枪手有可能抵御骑兵或长矛手,因而就逐渐排斥了后一种兵。最初,刺刀固定在木棍上,并和木棍一起插入火枪枪管,但是因为这使得兵士上刺刀后无法射击,后来就发明了一种套在枪管上的套箍。虽然如此,长矛仍然作为步兵武器保留了半个多世纪。奥地利人首先在所有基于步兵中采用带刺刀的步枪以代替长矛;普鲁士人在1689年仿效了他们;法国人在1703年,而俄国人在1721年,才完全废除长矛。在1703年斯拜尔巴赫会战中,步兵第一次上刺刀冲锋。⁶⁷目前在轻步兵中,刺刀通常被又直又尖的短剑代替,它利用活动刺刀座固定在步枪枪口的一侧。这当然不太牢

^① “刺刀”英语为«bayonet»(源出于法语«baionnette»)。——编者注

固,但是輕步兵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成密集队形冲锋,所以人們认为,这个缺点可以由这种武器的多样的使用方法来弥补。

弗·恩格斯写于 1857 年 9 月 14 日
左右

載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 年版
第 2 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 巴克萊-德-托利⁶⁸

巴克萊-德-托利，米哈伊尔——俄国公爵和元帅；1759年生于利沃尼亚，1818年5月25日死于东普魯士印斯特堡。1769年未滿11岁时他就加入俄国军队，在入伍的29年中，他参加了对土耳其人、瑞典人、波兰人的各次战争，但在1798年以前他的军衔一直是不高的。在1806年的战局中他立了功。1807年他率领俄国先头部队以非凡的英勇保卫了普路西什-埃劳⁶⁹，在这座城市的街道、教堂和墓地进行了长期抵抗，从此他便有了军事上的声望。1808年他迫使瑞典人退到卡列里亚，1809年他当步兵上将，指挥12000名俄军携带火炮、弹药、粮食和辎重渡过了冰封的波的尼亚灣，从而在更大的规模上重复了查理-古斯达夫横渡封冻的小貝耳特海峽的著名进军。他占领了烏默欧，他的到来促进了酝酿中的反古斯达夫四世的政变，迫使瑞典人求和。⁷⁰ 1810年以后，他受命主管俄国陆军部。

1812年他担任第一西方军团司令。由他直接指挥的该军团的主力，根据夸大的官方报道似乎有55万人，可是实际上只有104000人，而驻扎在波罗的海沿岸和普魯特河之间的军队总数不超过20万人。因此，俄军的撤退在当时不是自由选择而是绝对必要的问题（拿破侖在圣海倫島写的回忆录⁷¹中錯誤地认为最初的

撤退計劃出自巴克萊-德-托利之手，其實這個計劃是普魯士將軍富爾遠在俄法決裂以前就制定的⁷²，而在宣戰以後，貝爾納多特在亞歷山大面前重新堅決主張實行這個計劃。巴克萊-德-托利的偉大功績在於，他不向荒謬的出戰要求讓步，不管這種要求來自俄軍普通兵士還是大本營；他撤退得十分巧妙，不斷地把他的一部分部隊投入戰鬥，使巴格拉齊昂公爵有可能同他会合，并使契查哥夫海軍上將易于進攻敵人的後方。當他像在斯摩棱斯克所發生的情況⁷³那樣被迫進行會戰的時候，他就占領一個不使會戰成為決戰的障地。當撤退到離莫斯科不遠的地方，已經不能避免決戰的時候，他就在格查茨克附近選擇了一個堅固障地⁷⁴，這個障地從正面攻擊幾乎是不可能的，而且只有繞行很長一段路程才能包抄。當庫圖佐夫到來時，巴克萊-德-托利已把軍隊部署好，由於俄軍將領們的傾軋和俄軍對於由外國人指揮神聖戰爭的不滿，最高指揮權轉到庫圖佐夫的手里。庫圖佐夫故意使巴克萊-德-托利難堪，放棄了格查茨克障地。這樣，俄軍不得不在博羅迪諾附近的不利障地應戰。在8月26日這次會戰^①中，指揮右翼的巴克萊是唯一堅守障地的將軍，他堅守到27日，從而掩護了俄軍的撤退，要不是他，俄軍就會全軍覆沒。在從博羅迪諾向莫斯科方向撤退以後，正是巴克萊-德-托利再次警告不要進行任何保衛神聖首都的無益嘗試。

1813年戰局期間，巴克萊於4月4日攻占托恩要塞，在科尼斯瓦爾塔附近擊潰洛里斯頓；5月8日包岑會戰失敗後，他掩護同盟國軍退却，取得格爾利茨會戰的勝利，促使萬當投降，並且在萊

① 按舊曆；關於會戰，見本卷第258—263頁。——編者注

比錫会战中立下战功。⁷⁵ 在 1814 年战局期間，他已不指揮独立的兵团，他的活动主要在行政和外交方面，而不在軍事方面。他所直接控制的軍隊紀律严明，这使他在法国居民中博得了极好的声誉。在拿破侖从厄尔巴島回来以后，他从波兰来得太晚沒有能够参加滑铁卢会战，但参加了第二次入侵法国。他在去卡尔斯巴德的航途中逝世。晚年受人誹謗，郁郁不乐。他无疑是亚历山大的优秀将領，他朴实、頑强、果断而又明智。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57 年
9 月 10—15 日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載于“美国新百科全书” 1858 年版
第 2 卷

卡·馬克思 貝爾蒂埃

貝爾蒂埃，路易·亞歷山大——法國元帥，紐沙特爾公爵，瓦蘭壬公爵，瓦格拉姆公爵；1753年11月20日生于凡爾賽，1815年6月1日在班堡被害。他的父親是路易十六時代的地形測量工程兵團司令，他在父親的關懷下受到軍事教養。他是從皇家地形測量局轉入軍隊的，最初為總參謀部中尉，後為龍騎兵上尉。他曾在拉斐德的率領下參加美國獨立戰爭⁷⁶。1789年路易十六任命他為凡爾賽國民自衛軍司令，他在1789年10月5日和6日以及1791年2月19日⁷⁷為王室出了不少力。但是他明白，革命為軍事人才开辟了廣闊的道路，而且我們看到他先後在拉斐德、呂克納爾和居斯丁的手下當總參謀長。他在萬第戰爭中表現出極大的熱忱，所以在恐怖時期避免了嫌疑。1793年6月12日索繆爾保衛戰⁷⁸中他所表現的那種英勇精神，在國民公會委員的報告中得到好評。熱月九日⁷⁹後，他被委任為凱勒曼的總參謀長，在他堅持下法軍占領博爾格托一綫，使敵人暫時停止了進攻。可見，還在波拿巴提升他為總參謀長以前，他已經有了作為一個總參謀長的聲譽。在1796—1797年的戰局里，在蒙多維會戰（1796年4月22日）、洛迪會戰（1796年5月10日）、科多尼約會戰（1796年5月9日）和里沃利會戰（1797年1月14日）中⁸⁰，他也表現出自己是一個優秀的

师长。

貝尔蒂埃意志薄弱，但是頑强而有活力，具有海格立斯般的体魄，可以連續工作八夜；对作战的一切細节，例如各个軍的运动，部队人数、宿营和指揮人員，他具有惊人的記憶力；他执行任务迅速，对他永远可以信賴；他仔細認真，非常善于使用地图，能十分銳利地判断地形的特点，擅长以簡明的語言报告最复杂的軍事行动；他經驗丰富，十分机智，在战斗时知道應該向哪里下达命令，并且能够亲自监督执行这些命令；在戰場上，他是司令官的活电报，在司令部的办公桌旁，他是司令官的不知疲倦的自动打字机；他是总攬司令部一切高級职权的將領的一个模范参謀。1798年波拿巴不顾他的反对，派他率領軍隊攻取羅馬、在那里宣布成立共和国和俘擄教皇。⁸¹他既沒有力量防止法国的將軍、軍需官和供应人員在羅馬进行搶劫，又沒有力量制止法国兵士的嘩变，所以把指揮权交給馬森納將軍后就到米兰去了，在那里他爱上了美丽的維斯康蒂女士；他长期痴情地热恋她，因而在远征埃及⁸²的时期得到了 *faction des amoureux* [多情派] 首領的綽号，并把最高統治者在各个时期賞賜給他的 4 000 万法郎大部分花掉了。

从埃及回来以后，他支持波拿巴雾月 18 日和 19 日的陰謀⁸³，后来被任命为陸軍部长，这个职务他一直担任到 1800 年 4 月 2 日。他在第二次意大利战争时期又被任命为总参謀长，他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波拿巴相信了关于奧軍的行进路綫和配置情况的不确实情报而在馬連峨陷入显然尷尬的境地⁸⁴。胜利后他同梅拉斯將軍簽訂了停战协定，完成了一系列外交使命，然后重回陸軍部，直到帝国宣布成立。此后他一直在皇帝身边，他以大軍⁸⁵少將銜总参謀长的身分跟随皇帝参加了历次的战争。拿破侖慷慨地賜予他

許多封号、头衔、奖章、津貼和礼品。1804年5月19日他晋升为帝国元帅，获得荣誉軍团大十字勳章带，并取得法国大狩猎官的称号。1805年10月17日，他荣幸地参加了同馬克制定烏尔姆地区投降条款。⁸⁶他从1806年普魯士战局中获得紐沙特尔和瓦兰壬主权公爵的封号回国。1808年，他受命与巴伐利亚国王^①的侄女瑪丽-伊丽莎白·巴伐利亚-比肯斐特公主結婚，并获得法国次帅的称号。1809年拿破侖任命他为从巴伐利亚进攻奥地利的大軍总司令。他于4月6日宣战，而15日就已使整个战争陷于危险的境地。他把軍隊分成三部分，派达武率領一半法軍駐累根斯堡，派馬森納率領另一半法軍駐奧格斯堡，而把巴伐利亚軍隊配置在他們之間的阿本斯堡，这样，卡尔大公只要推进得快，就能把这三部分軍隊各个击破。奧軍的行动緩慢和拿破侖的到达拯救了法軍。但是由于在自己的长官的直接监督下并且担任了与自己才能比較相称的职务，他在这次战争中出色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而在他长长的封号单上又增添了瓦格拉姆公爵的封号⁸⁷。

在俄国战争时期，他連总参謀长也不能胜任。在莫斯科大火以后，他甚至不能正确解釋自己的长官的命令；虽然他一再請求准許他随同拿破侖回法国，但后者命令他同軍隊一起留在俄国。在法軍不得不同强大的优势兵力作战的条件下，就完全暴露出他的才智有限和墨守陈規。他按照他的习惯对后卫部队的营，有时对后卫部队的連发布老一套的命令，就好像后卫部队仍然有3万人似的；他把陣地划給早已不存在的团和师，而为了弥补自己的无所作为，他就增加信使和命令。1813—1814年期间，我們又看到他

① 馬克西米利安一世·約瑟夫。——編者注

担任了他的老职位^①。参議院宣布拿破侖下台后，貝尔蒂埃以虛偽的借口悄然离开了他的庇护人，并且还在他退位以前，就宣称自己忠于参議院和临时政府⁸⁸，而后来率領帝国的元帅們到貢比臬去奴顏婢膝地欢迎路易十八。1814年6月4日，路易十八封他为法国的貴族，并任命他为新建的国王近卫軍的連长。他把他的紐沙特尔公国让給普魯士国王，以換取34 000弗罗倫的津貼。拿破侖从厄尔巴島回来以后，他随同路易十八到根特。但是，由于隱瞞了拿破侖的来信，他失寵于国王，便到班堡去了，1815年6月1日在那里遇害，有六个带面具的人把他从他岳父的宮殿的窗口扔了出去。貝尔蒂埃的回忆录⁸⁹于1826年在巴黎出版。

卡·馬克思写于1857年9月15日
左右

載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
第3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① 即总参謀长的职位。——編者注

弗·恩格斯 阿尔及利亚⁹⁰

阿尔及利亚——北非的一部分，过去是土耳其的阿尔及尔帕沙轄区，从1830年起为法国的一个海外領地。它北临地中海，东与突尼斯接壤，西与摩洛哥毗邻，南与撒哈拉大沙漠相連。它的領土从东到西，最长距离为500英里，从北到南，为200英里。阿特拉斯山脉构成这个国家自然地理的重要特点，它把沿海的可耕地同沙漠隔开。同时它也是南北河流的分水岭。主要的山脉从东向西延伸，而中央山脉的支脉在全国纵横交叉。西部的瓦納日里斯山（托勒密叫 Mons Zalacus）以及东部的朱尔朱腊山和奥雷斯山最高。这些山几乎高达7000英尺。最重要的河流是舍利夫河。还有一些很大的河流，它們从阿特拉斯山脉的南坡流入沙漠。这些河流沒有一条可以通航。夏季这些河流几乎是干涸的，但是春季河水淹沒很大一部分地区，使得土壤肥沃。

某些旅行家不认为这里的气候对健康有害。眼炎和皮肤病非常流行。有人說，沒有地方性热病，但法軍大批病死看来为另外的結論提供了根据。空气极其清新，夏季炎热；冬季有时很冷，山区尤其如此。在与沙漠相連的地方是多沙的不毛之地，但是在两山之間，特别是在河流附近的地方，土壤肥沃。阿尔及利亚生长各种谷物，欧洲和热带的水果，異常美丽的花卉（特别是玫瑰花）以及甘

蔗（这种甘蔗被认为是所有出名的品种中最粗大、含糖量最多的一种）。各种家畜很多。馬无疑是好馬；驴是良种驴，普遍用于乘騎。阿尔及利亚的駱駝和单峰駱駝是头等的。这里是美利奴羊的故乡，美利奴羊最先是从小阿尔及利亚移入西班牙的。努米迪亚獅、豹、駝鳥、蝎子、蛇以及其他有毒的爬虫都很多。

阿尔及利亚的土著居民据說是柏伯尔人，也叫卡拜尔人或馬威德人（他們的这三个名称都通用）。关于这个种族的歷史，資料很少，人們只知道他們曾經占据非洲的整个西北部，現在在东部的沿海地区也能看到他們。卡拜尔人居住在山区。其余的居民是阿拉伯人，即穆斯林征服者的后裔。在阿尔及利亚还有摩尔人、土耳其人、庫魯格魯人⁹¹、犹太人、黑人以及法国人。1852年全国人口有2 078 035人（10万名軍隊除外），其中134 115人是欧洲各族人。卡拜尔人热爱劳动，居住在一般的村庄里；他們是出色的庄稼人，但也在矿場、金屬加工企业以及粗毛和棉花加工工場做工。他們制造火药和肥皂，采集蜂蜜和蜂蜡，供应城市家禽、水果和其他产品。阿拉伯人沿襲他們祖先的习惯，过着游牧生活；他們根据对牧場的需要或其他情况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居民中最不受尊敬的大概是摩尔人。他們住在城市里，生活过得比阿拉伯人和卡拜尔人舒适，由于一直受土耳其統治者的压迫，他們非常胆怯，可是仍然很殘酷并且好报复；他們的道德水平也很低。

阿尔及利亚的主要城市是：首都阿尔及尔、約有2万居民的君士坦丁和沿海的設防城市崩港（1847年約有1万居民）。崩港附近有珊瑚場，常有做珊瑚生意的法国人和意大利人光顾。布日伊位于布日伊灣。卡拜尔人曾在布日伊附近把法国的一艘两桅橫帆船

的錨索砍断，使船擱淺，然后杀死船員，把船洗劫一空。由于这种暴力行为，法軍提前占領了这个地点。

在这个国家里，尤其在君士坦丁省有一些古迹，例如拉姆別薩古城的遺址，那里还有城門的殘迹、圓劇場的殘骸和用科林斯柱支撐的陵墓。科勒阿和舍尔舍耳(古代的尤利亚·凱撒里亚城)位于海濱，后者对法国人來說是有一定意义的地点。这里曾是尤巴的駐在地，附近有古代的遺迹。奥兰是一个設防的城市，1792年以前一直由西班牙人統治。特累姆森曾是阿布德-艾尔-喀德的駐在地，位于肥沃地带，旧城于1670年被焚毀，而新城几乎完全被法軍破坏。这里生产地毯和毛毯。扎布，即古代的格土利亚，位于阿特拉斯的南面。最重要的地点是比斯克拉，該地居民很和善，他們在北方各港口当差役和搬运工很受人欢迎。

阿尔及利亚先后被羅馬人、汪达尔人和阿拉伯人征服。当1492年摩尔人被赶出西班牙时，斐迪南派远征軍去征討阿尔及利亚，他占領了奥兰、布日伊和阿尔及尔，已威胁到阿尔及利亚的存亡。阿尔及尔城附近的肥沃的麦提扎平原的艾米尔塞里姆·庫泰米无力抗击强大的征服者，就求助于土耳其人。著名的海盜巴巴罗薩·奥魯治被派去支援。奥魯治于1516年到达，他首先亲手杀死塞里姆·庫泰米，把这个地区据为己有，然后向西班牙人进攻。在一場时胜时敗的战争之后，他不得不躲藏在特累姆森，在該地他被西班牙軍队包圍，后来被俘并于1518年处死。他的哥哥海尔-艾德-丁成了他的继承人。海尔-艾德-丁向苏丹塞里姆一世求援，并且承认这个君主为自己的最高掌权者。这样，塞里姆就任命海尔-艾德-丁为阿尔及尔的帕沙，并派軍队給他，使他能够击退西班牙人而最后成为阿尔及尔的主宰。由于他在地中海抗击基督教徒

有功，苏里曼一世封他为卡普坦-帕沙^①。查理五世试图重新建立西班牙人的统治，于1541年派遣一支由370艘战船和3万人组成的强大远征军横渡地中海。但是凶猛的风暴和地震将舰队打散，使得舰队和陆军之间失去了一切联系。部队没有掩蔽所，又受到勇猛的敌人的疲劳攻击，因而只得回到船上逃走，损失了8000人、15艘军舰和140只运输船。从此，贝尔贝莱国家⁹²与马尔他骑士之间就不断发生战事，这就产生了海盗行为，因此阿尔及利亚海盗在地中海造成很大的恐怖，而基督教国家则在很长时期内不得不屈服于这种海盗行为。布莱克统率的英军、杜肯统率的法军、荷兰军队以及其他国家的军队在不同时期都进犯过阿尔及尔；杜肯两度炮击阿尔及尔，事后，德依^②派人去请法国领事（路易十四的代表），从他那里得知炮击花了多少钱后，便嘲笑说，如果给他这些钱的一半，他自己就把这个城市烧毁。

尽管欧洲国家不断进行抵抗，但是海上掠夺行为还是继续存在，甚至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海岸有时也遭到专门从事这种恐怖活动——战争和掠夺——的暴徒的袭击。成千上万沦为奴隶的基督徒在阿尔及利亚一直受着折磨。虔诚的教徒曾建立一些团体，专门为了每年往返阿尔及尔，用俘虏亲属拿出的钱把俘虏赎回来。这时，土耳其政府的统治已有名无实了。由近卫军推举的德依纷纷宣布脱离土耳其政府而独立。1705年伊布拉吉姆德依把最后一个土耳其帕沙赶走了；近卫军在热烈的选举中选出了新的首领，而他们往往又在自己的暴动中把这些首领杀死。近卫军是从土耳其的移民中招募来的，当地的居民，甚至近卫军兵士与当地妇女所生

① 卡普坦-帕沙是奥斯曼帝国海军指挥官的称号。——译者注

② 1671—1830年期间阿尔及利亚的土耳其封建统治者的称号。——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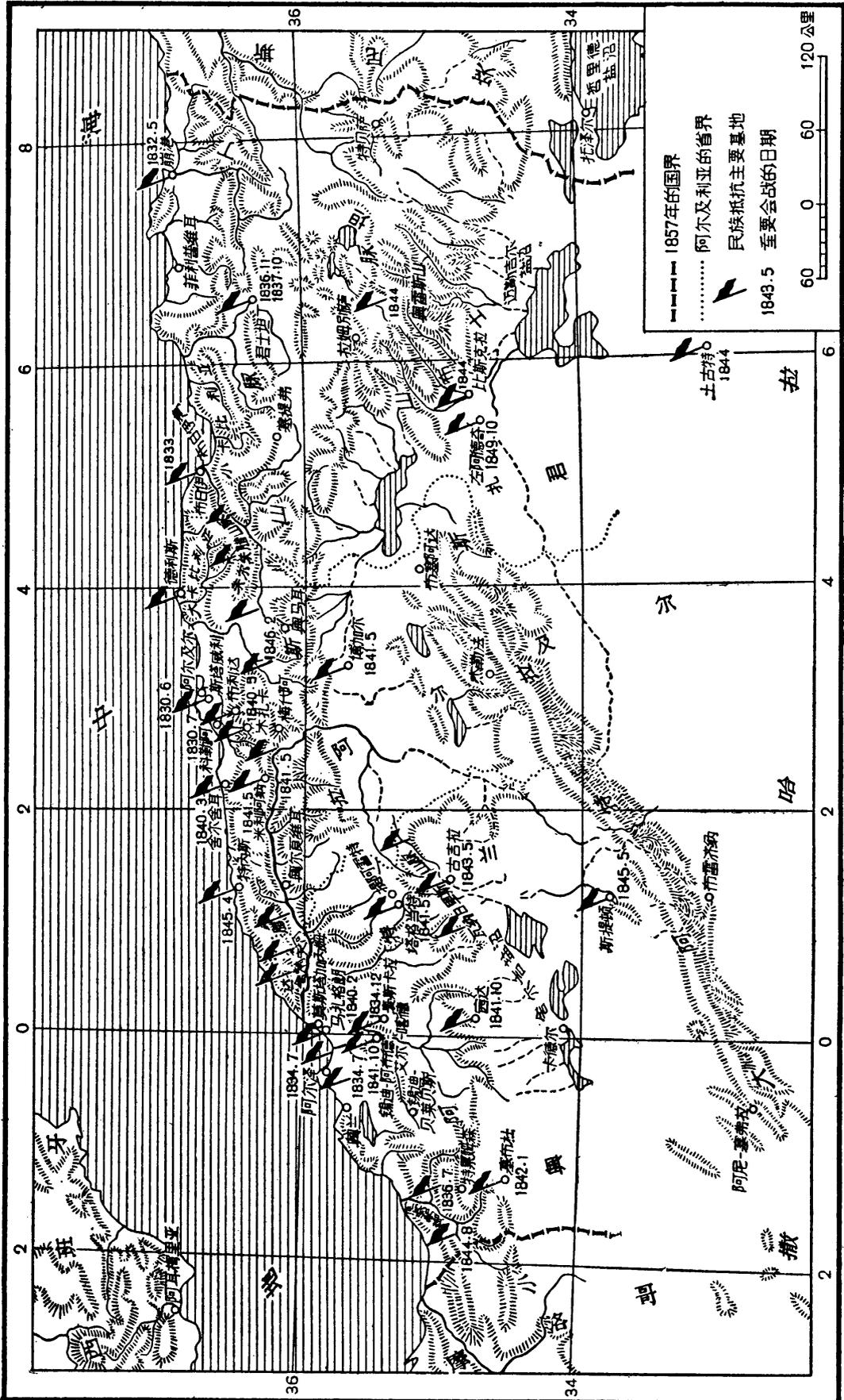
的儿子都不准加入他們的队伍。德依有时向君士坦丁堡送礼，以表示其名义上的藩屬关系，但經常性的貢賦已完全停止了，同时，土耳其人被自己同俄国的无休止的斗争所牵制，沒有力量去镇压远方省份的暴乱者。指明消灭駭人听闻的暴行的道路的这一使命落到了年輕合众国的身上。法国革命战争和拿破侖战争期間，有地中海的强大舰队保护貿易，因而阿尔及利亚人不得不暂时停止他們非法的勒索行为。恢复和平以后，阿尔及利亚人又从事掠夺；美国人在1795年为了維持和平曾經不得不仿效欧洲各国向德依繳納补助金，而現在已不再支付这笔貢款了。1815年海軍准将迪凱特在与阿尔及利亚的分舰队的战斗中卤获了一艘巡航舰和一艘两桅横帆船，并且进入阿尔及尔港口，迫使德依交出所有的美国俘虏并放棄以后对貢款的任何要求。英国人仿效这种勇敢的做法，于1816年在埃克斯毛思勋爵的統率下炮击阿尔及尔城，把它化为灰烬，迫使德依交出英国俘虏。但是这毕竟只是惩罚的措施，因为海盗行为並沒有絕迹；1826年阿尔及利亚人又公开在地中海掠夺意大利船只，甚至侵入北海。1818年侯賽因-別依执政；1823年，由于法国領事的住宅被搶劫和悬挂法国国旗的船舶受到多次襲击，法国向侯賽因提出赔偿損失的要求，但沒有結果。最后，阿尔及尔的德依亲自侮辱了法国領事，并对法国国王使用了不尊敬的語言，因为国王沒有答复德依就法国政府欠犹太商人的債（而犹太商人又是侯賽因的債務人）的問題所写的信⁹³。为了迫使德依道歉，法国派出分舰队封鎖了阿尔及尔。法国、穆罕默德-阿利和土耳其政府之間开始談判，在談判过程中，穆罕默德-阿利在法国的支持下准备征服阿尔及尔，并作为阿尔及尔的总督向苏丹繳納經常性貢款。但这个計劃沒有实现，一方面是因为英国反对，另一方

面是因为法国和穆罕默德-阿利在实行这个计划的具体措施上未能达成协议。于是，查理十世的政府独自去远征阿尔及尔，1830年6月13日布尔蒙将军统率的38000名步兵和4000名骑兵在阿尔及尔城附近登陆。侯赛因-别依虽然招募了6万人与这支军队作战，但是既然让法军登了陆，就无法对法军进行有效的反抗了；7月4日，阿尔及尔在如下的条件下投降：居民的私人财产和他们的宗教受到尊重，德依和他的土耳其侍从们必须离开。法军占领了城市。在他们的战利品中有12艘军舰、1500门铜炮和价值约1000万美元的硬币。他们在阿尔及尔立即配置了驻防军，并且实行军事管制。查理十世的政府打算把阿尔及尔移交给苏丹，当查理十世的王位被1830年七月事变推翻的时候，这个指令已在去君士坦丁堡的途中⁹⁴。他的继位者^①首先采取的一个行动，就是决定保留已征服的地方，并且任命克洛塞尔为总司令去阿尔及尔接替布尔蒙。

从法国人最初占领阿尔及利亚的时候起到现在，这个不幸的国家一直是不断屠杀、掠夺和使用暴力的场所。征服每一座大城市或小城市，每一寸土地都要付出巨大的牺牲。把独立视为珍宝、把对外族统治的仇恨置于生命之上的阿拉伯和卡拜尔部落，在残暴的袭击下被镇压，他们的住宅和财产被焚毁和破坏，他们的庄稼被践踏，而幸存的受难的人不是遭到屠杀，就是遭到各种奸淫和暴行的惨祸。法国人不顾人道、文明和基督教的一切准则，顽固地奉行这种野蛮的作战方法。为了替自己辩护，法国人硬说卡拜尔人残暴，他们嗜杀成性，他们拷打俘虏，并说什么对野蛮人宽容是一

① 路易-菲力浦。——编者注

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运动（十九世纪上半叶）



种錯誤。但是文明政府采取 *lex talionis* [复仇法] 的政策未必能够证明正确。如果按果实来評判树木的話，那末可以說，虽然花費了大約一亿美元和牺牲了几十万人，阿尔及利亚只不过成了法国將軍和兵士們的軍事学校，因为所有在克里木戰爭中获得荣誉的法国軍官都是在这里受到軍事訓練和取得作战經驗的。至于殖民化的嘗試，那只要把欧洲人的人数和当地居民的人数作一比較，就可以证明这种嘗試目前已經几乎完全失敗了，而且这发生在世界最富饒的国家之一，即离法国有 20 小时路程的意大利古代谷仓，那里只缺少一种东西，即生命和財產的安全，不論朋友-軍人或敌人-野蛮人都威胁着这种安全。能否說这种失敗是由于法国人性格上的一种先天的缺陷而使他們不适于移民，或者是由于地方行政当局的不明智，这不是我們應該判断的事情。所有重要的城市——君士坦丁、崩港、布日伊、阿尔澤、莫斯塔加內姆、特累姆森——都是被强攻占領的，它們遭受了强攻所带来的一切災禍。当地居民會怀着很深的敌意屈从于土耳其統治者，而土耳其統治者至少还有一点可取之处，即他們是同教者；但是，他們在新的統治的所謂文明化中却看不到任何好处，并且由于宗教狂热还对这种統治深恶痛絕。每个新总督上任无非是为了重复他的前任的一切暴行；文告中表示的是最善良的意願，但是占領軍、部队的調动以及双方的駭人的殘酷行为，都推翻了关于和平和善良願望的声明。

1831 年比松男爵被任命为民政长官；他試圖建立与軍事管理机构并列的民政管理系統，但是，因为他的措施会导致对总司令的監督，所以激怒了前拿破侖警务大臣罗維戈公爵薩瓦里，于是按照他的建議，把比松召回。阿尔及利亚在薩瓦里的統治下变成了所有在政治或社会方面有嫌疑而受到法律制裁的人的流放地；外

籍軍团开入了阿尔及利亚，它的兵士被禁止进入城市。1833年有人向众議院递交了一份請願书，請願书上写道：

“三年来我們忍受了各种不公正的待遇。只要向当局提出申訴，所得到的答复就是新的暴行，而暴行首先是針對那些提出申訴的人。結果，沒有人敢做什么了；正因为如此，这份請願书没有署名。先生們，我們恳求你們为了人道而把我們从这种毁灭性的暴政中解放出来吧，把我們身上的奴隶的鎖鏈解下来吧！如果这个国家仍然保持軍事状态，如果这个国家不实行文治，那末我們就活不成了；我們就永远得不到和平。”

这份請願书促使調查委员会成立，結果民政管理机关建立了起来。薩瓦里死后，在瓦罗尔將軍 *ad interim* [临时] 执政时期，为了平息民憤，开始采取了一些措施：排干沼澤地，修筑道路，建立地方警察。但是一当曾經統率軍队向君士坦丁进行过第一次也是十分不成功的一次远征⁹⁵ 的克洛塞尔元帅回到阿尔及利亚，所有这些措施都停止了。他的治理极其不能令人滿意，結果在1836年有一份由54个知名的領導人物签名的請願书送到巴黎，要求調查他的濫用职权行为。这終於使克洛塞尔辞职了。在路易-菲力浦执政的整个时期，一直进行殖民化，但是殖民化的唯一結果是土地投机；建立軍事移民区的嘗試也毫无成效，因为种地的移民只有在距离他們的碉堡的火炮不远的地方才是安全的；同时，还試圖向阿尔及利亚东部移民并把阿布德-艾尔-喀德从奥兰和阿尔及利亚西部赶出去⁹⁶。由于这位孜孜不倦和大胆无畏的領袖的失敗，这个国家被制服了，以致加米安-加腊勃大部落立即表示了归順。

1848年革命时期，卡芬雅克將軍接替奧馬尔公爵任阿尔及利亚总督。不久，他和也在阿尔及利亚的茹安維尔亲王一起离职。但是对这个省的統治，共和国并不比君主国順利。在共和国存在

的短短时期中，总督一再更换。移民被送到阿尔及利亚耕种土地，但是他们不是死亡就是厌恶地抛棄了已經开始的工作。1849年佩利西埃將軍襲击一些部落和貝尼·錫勒姆的村庄；他們的庄稼和一切搶走的財物照例都被焚毀或毀坏，因为他們拒絕納稅。在札布——与沙漠接壤的一个富庶地区，在一名馬拉布特⁹⁷的鼓动下发生了大規模的騷动；1 200名远征軍开赴該地，但是被起义者击潰。看来起义的規模很大，起义的鼓舞者是叫做“西迪·阿勃迭腊赫曼”的秘密組織，它的主要宗旨是歼灭法国人。起义者只是在康罗貝尔和埃尔比昂將軍率領的远征軍派去鎮压他們以后才被击败；而对阿拉伯城市左阿德奇的圍攻也表明，土著居民絲毫沒有丧失勇气，对征服者絕无好感。这个城市在51天中击退了圍攻者的多次进攻，最后才被强攻占領。小卡比利亚直到1851年才投降，圣阿尔諾將軍在这一年征服了它，因而建立了菲利普維耳和君士坦丁之間的交通綫。

法国的通报和报纸滿篇都是关于阿尔及利亚和平和繁荣的言論。但这是民族虛荣心的表現。到目前为止这个国家的內地同过去一样沒有被殖民化。法国人的統治是完全虛假的，如果不算沿海地区、城市及其郊区的話。各部落繼續捍卫自己的独立和仇視法国的制度，而对他們的野蛮襲击方法仍然在运用。例如，1857年朗东元帅对尙未屈服的卡拜尔人的村鎮进行了一次胜利的襲击，企图把他們的土地并入法国領地。当地居民一直被铁腕統治着，但是不断的起义說明，法国的占領是不穩固的，以这种手段維持的和平是虛假的。如1857年8月在奧兰审判了一起案件，在該案中 Bureau Arabe⁹⁸ 长官杜瓦諾上尉被认定是杀害当地一位著名富豪的罪犯；这起案件表明，法国的官員，甚至下級官員平时依

仗自己的权势，专横暴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不能不引起全世界的注意。

目前总督管轄区分为三个省：东部的君士坦丁省，中央的阿尔及尔省和西部的奥兰省。这个国家由兼总司令的总督管轄；他的助手是秘书和民政长官；在总督下面还設有由內务部門的领导人、海軍司令、陆軍司令以及司法部門的领导人組成的委员会；委员会的职責是批准总督的命令。Conseil des contentieux〔訟事审理委员会〕审理民事和刑事方面的違法行为。在建立了民政管理机构的省，有市长、法官和警官。信奉伊斯兰教的部落仍然有他們自己的法官；但他們那里有他們似乎比較喜欢的仲裁法庭制度，并且有专门負責在法国法庭上为阿拉伯人利益辯护的官員（l'avocat des Arabes〔阿拉伯人的律师〕）。

据調查，阿尔及利亚的貿易从法国占領时起大大发展了。进口价值約为 2 200 万美元，出口价值約为 300 万美元。进口的是棉織品、毛織品、絲織品、谷物、面粉、石灰和精制糖；出口的是未加工的珊瑚、皮革、小麦、植物油、原毛以及其他某些小商品。

弗·恩格斯写于 1857 年 9 月 17 日
左右

載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 年版
第 1 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第一次用俄文部分地发表于
1958 年“苏联东方学”杂志
第 5 期

弗·恩格斯 彈 药

彈药——使用火器所必需的彈头、装药和点火具，并且这个术语通常是指这三者已可使用的成品。例如，枪械的彈药是子彈和火帽（当然，燧发枪或針发枪是不用火帽的）；野炮的彈药是实心彈、爆炸彈、霰彈、榴霰彈、装药、信管、导火索和点火具等以及火箭連所使用的火箭。在要塞里和在圍攻时，火药一般存放于桶中，需要时将它制成装药；圍攻时所需的各种混合火药也同样处理；空心彈也是就地装填的。作战军队的彈药数量根据情况而定。步兵一般随身携带 60 发子彈，有时多一些；随軍車輛也为每个兵士載运同样数量的子彈；其余的儲备子彈存放在后面的車队（相距一两天的路程）。在野战炮兵里，炮兵連的每門火炮总是有 150—200 发炮彈，一部分装在火炮前車的彈药箱里，另一部分装在彈药車里；另外，在軍团的彈药儲备中每門火炮通常还有 200 发炮彈，其他的炮彈則存放在車队。在大多数文明国家的軍隊中一般都这样，当然，这只是在战局开始的时候；經過数月作战，彈药的儲备一般就消耗殆尽了，有时在几次会战失利后就完全沒有了，而彈药的补充往往是困难而緩慢的。

弗·恩格斯写于 1857 年 9 月 17 日左右
載于“美国新百科全书” 1858 年版
第 1 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 卞尼格先⁹⁹

卞尼格先，列文·奧古斯特·泰奧菲爾公爵——俄國將軍，1745年2月10日生于不倫瑞克（他父親在這裡任近衛軍上校），死于1826年10月2日。他在喬治二世的漢諾威宮當了五年侍從；後來參加漢諾威軍隊；在晉升為步兵近衛軍上尉以後，他參加了七年戰爭的最後一個戰局。當時，他追求女性的狂熱比他的戰功引起更多的議論。為了娶漢諾威駐維也納宮廷的大使施泰因貝爾格男爵的女兒，他辭去軍職，回到他在漢諾威的莊園班特恩；由於揮霍無度，他困于債務而不能自拔，妻子死后，他決計到俄國軍隊里供職以重振家業。叶卡特林娜二世提升他為中校，他先在魯勉采夫部下同土耳其人作戰，後在蘇沃洛夫部下鎮壓起義者普加喬夫。他曾告假去漢諾威向美貌出名的馮·施維格耳特小姐求婚。回俄國後，由於魯勉采夫和波特金的提拔，他當了團長。1788年他在奧查科夫的圍攻戰¹⁰⁰中立了功，被委任為旅長。1793—1794年波蘭戰爭期間，他指揮一支輕裝部隊，在奧什米亞納戰役和索雷戰役以後被提升為將軍；他曾率領騎兵突破了波蘭軍隊的中央，保證了維爾諾會戰的勝利¹⁰¹，而由於他在尼門河下游兩岸成功地進行了几次大膽的偷襲，叶卡特林娜二世獎給他聖弗拉基米爾勳章、榮譽武器和200名農奴。波蘭戰爭時期，他表現出了優秀騎兵軍官的素

质——热情、勇敢、敏捷，但是没有显露出军队指挥官所必需具备的更高的天赋。波兰战争以后，他被派到在波斯作战的军队中，他以10天的炮击迫使里海的杰尔宾特投降¹⁰²。圣乔治三级勋章是他从叶卡特林娜二世那里得到的最后的奖赏。叶卡特林娜二世死后，他被召回，遭到她的继位者的贬黜。

那时，圣彼得堡的军事总督帕连公爵正策划刺杀保罗的密谋。帕连知道卞尼格先很果敢，所以就把这个秘密告诉了他，并且交给他一个光荣的任务——把密谋者引进皇帝的卧室。正是卞尼格先把躲藏在壁炉里的保罗拖了出来，当保罗拒绝退位，其他阴谋分子开始犹豫时，卞尼格先喊道：“还说什么！”解下肩带，向保罗扑去，在其他人的帮助下经过一场搏斗，终于将受害者掐死。为了快些结束此事，卞尼格先又用沉重的银烟盒砸保罗的头。亚历山大一世即位以后，卞尼格先立即获得了驻立陶宛的司令官的职位。

1806—1807年的战局初期，他指挥卡缅斯基所率的第一军团的一个军，第二军则由布克斯格夫登指挥。在掩护华沙以抗击法军的尝试失败后，他被迫撤退到那累夫河畔的普乌土斯克，1806年12月26日他在这里击退了朗恩和贝尔纳多特的进攻，因为拿破仑的主力在进攻俄国第二军团而使他在兵力上占有优势。卞尼格先向亚历山大虚报战功，并且由于他暗中打击卡缅斯基和布克斯格夫登，不久便被任命为将同拿破仑作战的军团总司令。1807年1月底，他对驻扎在冬季营地的拿破仑军队采取了进攻性机动，并完全偶然地避开了拿破仑给他设下的圈套，在这以后他和敌人在埃劳进行了会战。埃劳于2月7日陷落，而2月8日，卞尼格先曾为了遏制拿破仑的猛烈追击而进行了一次决战。俄军的坚韧不拔，莱斯托克所指挥的普军的到达，以及法国某些军的迟迟开抵战

場，使勝利成了問題。雙方都自命為勝利者，但不管怎樣，據拿破侖本人說，埃勞戰役是他歷次戰役中流血最多的一次。卞尼格先唱了 Te Deum [謝恩贊美詩]，從沙皇那里得到了一枚俄國勳章、12 000 盧布補助金和一封贊揚他為“常勝將軍”的賀信。

春天，當一路法軍對但澤圍攻¹⁰³時，他在海爾斯貝爾格修築防禦工事，放過了攻擊拿破侖的機會，但是在但澤失陷和各路法軍會合以後，他認為攻擊的時機到了。一開始，拿破侖的先頭部隊（其人數僅相當於他的部隊的三分之一）就把他堵住了，不久拿破侖的機動又迫使他退回到他的營壘。在這裡，拿破侖於 6 月 10 日共以兩個軍和幾個近衛營的兵力向他進攻，沒有結果，但是次日迫使他放棄營壘後撤。然而卞尼格先不等已經到達提爾西特的 28 000 人的一個軍開到，就出敵不意地重新轉入進攻，占領了弗里德蘭德，在那裡配置了他的軍隊，背靠阿累河並以弗里德蘭德橋為唯一的退路。他不在拿破侖集結軍隊以前迅速向前推進，而讓朗恩和莫爾蒂埃拖住了五六個小時，直到拿破侖 5 點鐘把部隊部署好並命令他們轉入進攻。俄軍被擊退到阿累河，弗里德蘭德被攻占，而弗里德蘭德橋被俄軍自己破壞，雖然俄軍整個右翼還在河的对岸。6 月 14 日弗里德蘭德會戰就這樣失敗了，俄軍損失了 2 萬多人。據說，卞尼格先當時是受了他波蘭籍妻子的影響。在整個這次戰局期間，卞尼格先接二連三地犯錯誤，他的全部行為是輕舉妄動和優柔寡斷的奇妙結合。

1812 年戰局期間，他大部分時間是在亞歷山大皇帝的大本營工作，他在大本營里陰謀排擠巴克萊-德-托利，企圖占據他的位置。1813 年戰局期間，他指揮俄國後備軍團，在萊比錫戰場作戰時被亞歷山大封為伯爵。在這以後，他奉命把達武逐出漢堡，他包

圍了达武，直到 1814 年 4 月拿破侖退位，軍事行动結束为止。当时，他沒有作战就占領了汉堡。为此，他要求給他新的荣誉和奖賞，結果都得到了。1814 年到 1818 年卞尼格先在貝薩拉比亚指揮南方軍团，最后，他回到他在汉諾威的庄园，在那里去世，去世前他把大部分家产都揮霍掉了，并把他的貧穷的孩子留在俄国服务。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57 年
9 月 10—22 日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載于“美国新百科全书” 1858 年版
第 3 卷

卡·馬克思 勃魯姆

勃魯姆，罗伯特——德国革命的蒙难者之一；1807年11月10日生于科倫，1848年11月9日在維也納被处死。他是貧苦的箍桶匠帮工的儿子，箍桶匠于1815年去世，遺下孤苦无依的三个孩子和寡妇。1816年寡妇改嫁給一个駁船上的普通装卸工。这次改嫁并不幸福，在1816—1817年的饥荒年头，这一家穷困到了极点。1819年，年幼的天主教徒罗伯特，得到了一个在教堂里打杂的位置；后来，跟鍍金匠当学徒，稍后，又跟腰带匠当学徒，并且当了德国常見的流动帮工，但是他干不了这一行，在短時間的外出奔走以后不得不回到科倫。在科倫他在一个制灯厂里找到了工作，并且博得了老板的好感，老板提拔他在办公室工作；他得到了陪伴厂主到南德意志各邦旅行的机会，1829—1830年他同厂主住在柏林。在此期間，他以頑强的努力获得了广博的知識，但并没有表现出对某一具体科学領域具有显著的天賦或出众的才能。1830年他应征服兵役（这是每个普魯士臣民的义务），他与他的庇护人的关系也就中断了。六个星期后，他被开除出軍隊，失去了安身之地，他几乎是在他两次离开科倫时所处的那种情况下回到了这个城市。双亲的貧困和他本人的絕望处境，迫使他从科倫剧院的經理林格尔加特那里接受剧院跑腿的差使。勃魯姆虽然是个小职员，

但是他同舞台的关系使他对戏剧創作特別注意，而法国七月革命在整个萊茵普魯士所造成的活跃的政治局面，給他提供了参加某些政治团体的机会，并使他有可能在当地的报纸上发表他的詩作。

1831年，当时已移居萊比錫的林格尔加特让勃魯姆当萊比錫剧院的出納員和秘书；这个职位他一直担任到1847年。1831年到1837年間，他在“彗星”、“晚报”¹⁰⁴等这样一些供家庭閱讀的萊比錫报纸上撰稿，并且出版了“戏剧百科”、“宪法之友”、“前进”文集以及其他书刊。他的著作带有某种小市民的庸俗色彩。其中后期的著作甚至还充滿低級趣味。他的政治活动是在1837年开始的，当时他以萊比錫市民代表团代表的身分把荣誉礼品贈給薩克森議会的两个反对派議員。1840年他成了席勒协会和德国文学家联合会¹⁰⁵的創始人之一，而1841年成了这两个組織的领导人之一。他在政治性报纸“薩克森祖国报”¹⁰⁶上撰稿，这使他成了薩克森最有声望的新聞記者和政府专门迫害的对象。所謂的德国天主教¹⁰⁷把他看做是热烈的拥护者。他在萊比錫創建了德国天主教协会，1845年成了該协会的精神上的首領。1845年8月12日，武装的市民和大学生在萊比錫的猎兵营房前面举行大会，声言要搗毀营房，以报复前一天猎兵連所制造的流血事件¹⁰⁸，这时勃魯姆凭借他所固有的人人喜爱的口才說服激动的群众不要放棄法律所許可的反抗方法，并提議上告法院要求合理的賠償。薩克森政府为了奖賞他的努力，又对他进行了迫害，結果，在1848年封閉了“祖国报”。

当1848年二月革命爆发时，勃魯姆已成为薩克森自由派的中心人物；他創立了祖国联合会¹⁰⁹（該会很快就拥有4万多名會員），并且总是表现出是一个孜孜不倦的鼓动家。他由萊比錫市派

到預備議會，在預備議會中擔任副議長的職務，他防止了反對派 en masse〔大批〕退出，从而使這個機構保存了下來。在預備議會解散以後，他是保留下來的一個委員會的委員，後來是法蘭克福議會議員，是這個議會里溫和的反對派首領。¹¹⁰ 他的政治見解是要把德國建成一個共和國，而這個共和國有各種傳統的王國和公國等作為它的基礎，因為在他看來只有這些王國和公國才把他認為是德國社會最美好的特點的那種東西原封不動地保存下來，也就是使得德國社會的各個不同階層能夠獨立發展。作為演說家，他說話明白易懂，繪聲繪色，享有很大聲譽。

當維也納起義¹¹¹ 的消息傳到法蘭克福時，他受委託同德國議會的其他幾位議員一起把議會反對派所寫的賀信帶到維也納去。1848年10月17日，他以代表團代表的身分向維也納市議會遞交賀信。他參加學生軍的隊伍並在戰鬥中指揮街壘。文迪施格雷茨占領維也納後，他鎮靜地坐在旅館里談話，突然旅館被兵士包圍，于是他本人被逮捕。在軍事法庭上，他不願背棄自己的言行而損害自己的尊嚴。他被判處絞刑，後來絞刑改為槍決，黎明時在布里吉特瑙執行。

卡·馬克思寫於1857年9月22日

載於“美國新百科全書”1858年版
第3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美國新百科全書”

卡·馬克思 布 里 昂

里昂, 路易·安都昂·福韦勒——拿破侖的私人秘书; 1769年7月9日生于桑城, 1834年2月7日死于卡昂附近。1778年他进布里恩的軍事学校, 在那里渡过了大約六年, 他是拿破侖的同学。1789年到1792年, 他在法国駐維也納大使館当随員, 在萊比錫研究国际法和北方各民族的語言, 在华沙波尼亚托夫斯基的宮殿呆了一个时候。他回到巴黎后, 恢复了同拿破侖的亲密关系, 当时拿破侖是个穷軍官, 而且沒有朋友; 但是在1792年6月20日以后革命事态有了决定性轉变¹¹², 里昂被迫回到德国。1795年他重返巴黎, 和拿破侖再次会面, 但是拿破侖对他很冷淡; 而到1796年底, 里昂再次拜会拿破侖以后, 他被召到大本营, 立即被任命为拿破侖的私人秘书。第二次意大利战争¹¹³以后, 里昂获得了国务會議委員的头銜, 住在土伊勒里宮, 并且成为第一执政家里的常客。里昂是供应軍用物資的庫侖商行的秘密股东, 他曾为这家商行作成了一笔供应全部騎兵装具的有利交易, 1802年这家商行亏空300万而宣告破产。商行負責人躲藏起来了, 而里昂被調往汉堡。1806年他奉命监督汉堡严格遵守拿破侖的大陆体系¹¹⁴。里昂征收了汉堡參議會200万法郎, 并向亚历山大皇帝的亲戚梅克倫堡公爵罰了款, 汉堡參議會和亚历山大皇帝便控告他盜窃

公款；拿破侖派了一个委员会去調查他的行为，并且命令他归还皇帝金庫 100 万法郎。

布里昂因此失寵并破了产，在巴黎一直住到 1814 年拿破侖垮台；拿破侖垮台后他又露面了，从法国临时政府¹¹⁵索回了他的 100 万法郎，并且被任命为邮政总局局长。路易十八曾免除他的这个职务，但一听到拿破侖从厄尔巴島回来的風声，就又任命他为巴黎警察局局长；在这个职位上他呆了八天。因为拿破侖于 3 月 13 日在里昂签署的命令中，沒有把他列为应该大赦的人，所以他跟随路易十八到比利时，从那里被派往汉堡，而在回到巴黎以后被委任为国务會議委員，后来又被任命为大臣。1828 年，經濟上的困难迫使他躲藏在比利时离沙勒罗瓦不远的封丹-勒韦克的布朗卡公爵夫人的庄园里。在这里，他在德·維耳馬雷先生等人的协助下写成了一部“回忆录”（八开本，十册）¹¹⁶，这部书于 1829 年在巴黎出版，曾轰动一时。他死在瘋人院里。

卡·馬克思写于 1857 年 9 月 22 日

原文是英文

載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 年版
第 3 卷

俄文譯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弗·恩格斯 会战

双方军队的主力，或至少是在单独的战区內独立行动的两军集团之间的冲突，叫做会战。在使用火药以前，会战的结局是通过真正的白刃格斗来决定的。希腊人和馬其頓人排成戈矛林立的密集方阵进行攻击，随后用劍进行短促的格斗，来决定胜负。罗马人则将軍团列成三綫，这样在进攻时就可以用第二綫的兵力再次攻击和用第三綫的兵力进行决定性的机动。第一綫进到距敌人 10—15 碼处，即向敌人投擲一种很重的矛即投枪，接着就用劍进行格斗。如果第一綫被击退，第二綫就通过第一綫的間隔向敌人进攻；如果这时还不能击破敌人的抵抗，那末第三綫，即預备队，就猛攻敌人中央或某一翼。在中世紀，主要战斗的结局是由铁甲騎士队的攻击来决定的，这种情况一直到使用了炮兵和輕火器使步兵重占优势时才起变化。此后，軍队在火器的数量和构造上的优势就成为会战中的主要因素，直到十八世紀欧洲各国的軍队都給步兵装备了火枪，并且火器质量大致相等时为止。正是在这时候，在一定的平均射击精度的条件下，火器在一定時間內发射的彈数成了决定性的因素。步兵开始排成三列寬横队，并受最严格的訓練，以保证能不断地射击和达到每分钟 5 发的射速。双方的寬横队不停地互射，在发射霰彈的炮兵支援下，彼此相向地緩慢地前进。最后其中的一

方因遭受損失而動搖，另一方就乘機猛撲，進行白刃格鬥，通常就是這樣來解決戰鬥的。如果一方還在會戰開始前就佔領了陣地，那末另一方通常力圖與敵軍陣綫成銳角攻擊，以便從翼側迂迴，然後包圍其一翼；這樣，被圍的一翼以及中央的與其相連的部分就被優勢兵力所打亂而擠成一團；這時，進攻的一方便用重炮予以襲擊。這是弗里德里希大帝所喜用的戰法，他在萊滕會戰¹¹⁷中運用得特別成功。此外，進攻的一方有時還用騎兵向已經動搖的敵人步兵攻擊，並且在許多場合都獲得了輝煌的勝利。但是，總的說來，會戰的結局仍是以步兵橫隊的速射來決定的，而這種火力竟如此有效，以致當時的會戰成了近代流血最多的會戰。例如，弗里德里希大帝在科林會戰中全軍 18 000 人，損失 12 000 人，在庫奈斯多夫會戰中全軍 3 萬人，損失 17 000 人。¹¹⁸ 然而，在拿破侖各次戰局中最大的一次血戰，即博羅迪諾會戰^①，俄軍的傷亡却稍少於全部兵力的一半。

法國革命和拿破侖完全改變了會戰的情況。軍隊分編成若干師，每師約一萬人，包括步兵、騎兵和炮兵；它不僅成橫隊作戰，而且還成縱隊和散開隊形作戰。在採用這些戰鬥隊形時，已沒有必要只選擇開闊的平地作為戰場，而開始側重選擇森林、村鎮、莊園以及各種起伏地作戰。自從這種新的戰鬥隊形為各國軍隊採用以後，會戰與十八世紀的會戰比較起來就完全不同了。那時，軍隊雖然通常排成三綫，可是，只要一次攻擊，或至多連續兩三次攻擊，就決定了會戰的勝負。然而，現在會戰却可能持續一整天，甚至兩三天，而且在這整個期間，攻擊、反擊和機動反復交替，雙方互有勝負。目前，會戰通常是由進攻一方的前衛開始的。前衛向前方派

① 見本卷第 258—263 頁。——編者注

出散兵和他們的支援队，散兵一遇到严重的抵抗(这通常发生在有利于防御的地形上)，輕炮兵便在散兵和小队騎兵的掩护下向前推进，而前卫主力則占領陣地。然后，就照例开始炮击，其中一定数量的炮弹用来协助偵察并迫使敌人暴露其兵力。就在这时，各师相继开到，根据业已查明的敌情占領陣地。在便于攻击的地点向前派出散兵，必要时还派出基干步兵和炮兵予以支援；两翼进行攻击准备，部队被集中来攻击敌人主要陣地前的要点，而敌人也采取相应的措施。此外，还进行一系列的机动，以威胁敌人的防御陣地或者针对敌人可能的攻击而使他有遭到反击的危險。军队逐渐地接近敌人，攻击地点终于确定，而突击队便从一直占領着的隐蔽陣地出动。在战斗的这一阶段主要是基干步兵和炮兵向預定的攻击地点射击；然后，担任攻击的部队开始出动，同时小队騎兵也間或进行攻击。于是开始了要点的爭夺战，双方反复爭夺，并不断投入新的兵力。各要点之間的空隙地这时就成了已展开的步兵橫队的戰場，有时也成了刺刀冲鋒的場所。不过，这很少会形成真正的白刃格斗，而在村鎮、庄园、壕沟內和其他地方真正使用刺刀却是相当經常的。在这种開闊地上，騎兵一有机会也向前猛冲，而炮兵則繼續进行射击，并前进到新的陣地。当会战双方相持不下，互有胜負时，交战双方军队的意图、部署，特别是兵力就愈来愈清楚了；投入会战的兵力也愈来愈多了，因此不久就显示出，哪一方拥有更多的未动用的預备队，以进行最后的决定性的攻击。或者是进攻的一方在这时获得了进展，因而敢于用自己的預备队猛攻防御一方的中央或翼側；或者是攻击都被击退，并且不可能得到生力軍的增援，在这种場合防御的一方就可出动自己的預备队，以猛烈的攻击击退以至粉碎敌人。在多数場合，决定性的攻击是针对敌人正面

的某一地段进行的，以达到突破的目的。面对选定的地段集中尽可能多的炮兵；步兵成密集的战斗队形前进，攻击一經成功，騎兵就迅速冲入这样形成的突破口，轉向左右兩側，从翼側和后方攻击敌人的陣綫，迫使他們向兩翼收縮。但是，要使这种攻击真正能够成为决定性的，就必须使用大量兵力，并在敌人把他們最后的預备队投入战斗以后再进行，否則将得不偿失，而且甚至可能成为会战失敗的原因。在大多数場合，当会战出現显然不利的局面时，一个統帅宁可中断会战，也不願动用自己最后的預备队和坐待敌人决定性的突击。在現代軍队的編制和战术条件下，这往往用較小的代价就能办到，因为在激烈的会战以后敌人通常也大大丧失了元气。預备队和炮兵在后方占領新的陣地；在他們的掩护下部队依次撤出战斗，进行退却。能不能有秩序地退却，在这种場合就要看追击的速度而定。对企图退出战斗的部队，敌人会派出騎兵拦击，因此，为支援这些部队，也应准备騎兵。但是，如果退却一方的騎兵被击潰，而步兵在尚未摆脱敌人以前就被敌人赶上，那末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全面潰敗，这时后卫在天黑以前在新的防御陣地上的处境通常是十分困难的。

这就是在双方兵力和指揮水平大致相等的条件下現代会战的一般情况。如果其中的一方拥有明显的优势，整个問題就簡單多了，而作战情况則是錯綜复杂的。但是，不論在什么情況下，現代各文明国家軍队之間的会战整个說来都具有上述的特点。

弗·恩格斯写于1857年9月21日
左右

原文是英文

載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
第2卷

俄文譯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弗·恩格斯 BATTERY¹¹⁹

这个术语在野战炮兵中是指通常用于协同作战的一定数量的火炮(4—12 門)以及必要数量的馬匹、人員和装具。英国人和法国人的 battery 有 6 門炮,普魯士人和奥地利人的 battery 有 8 門炮,俄国人的 battery 有 8 門或 12 門炮。field battery〔野炮連〕分为 light battery〔輕炮連〕、heavy battery〔重炮連〕和 howitzer battery〔榴彈炮連〕;有些国家还有 mountain battery〔山炮連〕。在記述战斗陣地时,battery 一詞还用来表示任何一个放列火炮的地点。在要塞炮兵中,battery 是指配置火炮的一个要塞正面,而在攻城炮兵中,則专指配置在一条綫上向要塞射击并有胸墙掩护的一定数量的火炮。构筑 battery 正是指修筑这种胸墙和炮位。battery 就其外形而言,有凸起的、半凹进的和凹进的;就其装备而言,有 guns battery〔加农炮的炮台〕、howitzer battery〔榴彈炮的炮台〕和 mortar battery〔臼炮的炮台〕;就其掩蔽方式而言,有 battery with embrasures〔射孔式炮台〕、barbette battery〔炮座式炮台〕(沒有射孔)和 casemated battery〔穹窿式炮台〕(有防彈掩体)。就其用途而言,有 dismounting battery〔破坏炮队〕、ricochetting battery〔跳彈炮队〕、mortar battery〔臼炮队〕、breaching battery〔破城炮队〕和 counter battery〔反炮台炮队〕。破坏炮队用

来击毁与它平行的要塞正面上的火炮；跳弹炮队配置在一个正面的延长綫上，用来对这个正面进行纵射，它的实心弹和爆炸弹恰好越过胸墙，沿正面飞行，而且跳离地面不高；臼炮队用来轰击棱堡内部和要塞内的建筑物；破城炮队用来破坏要塞围墙内岸的石砌墙壁；反炮台炮队配置在对着侧面的斜堤頂上，用来压制从掩护缺口前面的壕沟的侧面来的火力。strand battery〔岸防炮台〕是构筑在海岸的一定地点以对付敌人军舰的工事；它或者是永备工事或者是临时土质工事。永备工事通常用石块构筑，一般設有穹窖，穹窖内配置几层火炮；临时土质工事通常在炮座上放列火炮，以保证較大的射界；这两者后面通常都有掩护，以防止登陆的步兵突然袭击。

构筑土质的 battery 时，应进行主要尺寸的定綫，而所用的泥土取自未来的胸墙前面或后面的壕沟。胸墙的外斜面不用复盖，但内斜面和侧面即射孔的内侧須用束柴、堡篮、编条、土桶、沙袋或草土块加以复盖，这样，泥土即使在陡峭的斜面上也不致塌落。在胸墙的外斜面和在前面的壕沟之間通常要留崖徑即水平凸起部以巩固胸墙。在 battery 内射孔之間应筑踏垛，其高度要使人站在上面可以观察胸墙外面。为了掩护 battery 不受侧射火力的危害，常常在其一侧或两侧修筑肩墙，即与 battery 的胸墙成钝角的胸墙。在 battery 可能受到纵射火力的地方，必須在火炮之間修筑横墙或肩墙。在炮座式炮台上，这种掩蔽工事的加固办法就是使横墙高出胸墙几英尺；这一凸起部分横过胸墙，一直延伸到胸墙的外棱綫上，这就是所谓的垛墙。火炮放列在用木板、枕木或其他木质材料做成的平台上，以保证火炮平稳。弹药一部分放在胸墙脚的崖孔内，另一部分放在地下的、用土复盖的木质防弹工事里。

为了掩护炮兵不受步骑枪火力的杀伤，常用坚固的木板制成的掩障遮住射孔，火炮移动时，则将掩障向两边敞开，或者在掩障上穿个孔，使炮口伸出去。圆木做成的掩障用来防避敌人的火力，它的一端靠在胸墙内棱线上，另一端则斜支在地上。榴弹炮的炮台的射孔底边从下向上倾斜，而不是从上向下倾斜；臼炮的炮台根本没有射孔，因为大射角可以保证实心弹飞越胸墙顶。为了有效地防避重炮火力，胸墙至少应该有 17 或 18 英尺厚；如果敌炮的口径很大，而胸墙的土质又不好，则可能需要 24 英尺厚。胸墙有七八英尺高就足以防避火力危害。各炮之间应有 10—14 英尺的间隔；如果需要横墙，胸墙就应相应地延长。

弗·恩格斯写于 1857 年 9 月 28 日
左右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 年版
第 2 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露 营

露营 [Bivouac] (法語, 可能来源于德語 bei 和 Wache^① 两詞)——軍隊不用帳篷露天宿營, 兵士把武器放在身旁和衣而睡。古代戰爭時武士在帳篷中宿營, 這些帳篷就好像一座游動的城市。在中世紀, 封建主和國王的軍隊以行軍途中遇到的城堡和寺院作為宿營地。受宗教熱情驅使而參加十字軍遠征亞洲¹²⁰ 的人民群眾, 與其說是軍隊, 不如說是一群烏合之眾; 除了首領們——騎士和國王——及其隨身侍從外, 這一大群人就像亞洲平原上的野蠻的游牧部落一樣, 完全在野地上露營。當重新採取正規戰爭時, 又用帳篷扎營了, 而且最近兩個世紀以來在歐洲已成為普遍的現象。但在大規模的拿破侖戰爭時期, 有人得出結論說, 移動的速度比兵士的健康更為重要, 於是, 除了英國軍隊偶爾使用外, 帳篷作為一種不必要的奢侈品從歐洲戰場上消失了。所有的軍隊都在篝火旁露營, 如果位於敵人附近, 即不用篝火; 他們睡在干禾秸上, 有時也可能睡在光地上, 同時由一部分兵士守衛。歷史上沒有一次露營像奧斯特利茨會戰¹²¹ 前夕的露營那樣為詩畫所頌揚。

弗·恩格斯寫於 1857 年 9 月 28 日左右
載於“美國新百科全書” 1858 年版
第 3 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美國新百科全書”
俄譯文第一次發表

① «bei»——“在”; «Wache»——“警衛”, “守衛”, “警戒”。——編者注

弗·恩格斯

掩 障

掩障(筑城用語)——不让敌人看到某处情况的一种设备，例如，放在炮台内棱线上的、在射孔上方突出的束柴便是这种设备；束柴使人难于在一定距离内通过射孔进行观察。有时射孔处装上较复杂的掩障，它由两块厚木板做成，从两边沿着槽沟闭合，可以完全遮住射孔。如果射向始终不变，则在推动火炮时不必将它敞开，因为在掩障上可为炮口穿孔。必要时，这个孔可用活动挡板遮住。另一种掩障用于掩护炮台的炮手，以防避曲射火力的杀伤。它用光滑坚固的圆木做成，一端靠在胸墙内棱线上，另一端支在地上。如果炮弹不十分大，而且不是近于垂直地落下，就不会打穿这种掩障，而只能撞上掩障并以一定角度跳开。在修筑塹壕时，用一种特殊的掩障来掩护工兵不受火力杀伤；它借助于滚轮移动并随着挖壕的进展而向前挪动。如要抵御步骑枪的火力，只需一块用硬木板做成的护板，向外的一面包上铁皮，再用粗圆木做支柱。如要抵御火炮的火力，则需要有装满泥土的大方箱或方框、沙袋或束柴。最普通的一种工兵掩障是个很大的堡篮，或放满了束柴的圆筐，作业班在工兵前面滚动它们。当需要从上面掩护对壕时，掩障按下面的方法构筑：将方木梁放在上面，铺上束

柴，再撒上泥土，这样，方木梁就能十分可靠地抵御实心彈和爆炸彈。

弗·恩格斯写于 1857 年 9 月 28 日
左右

載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 年版
第 3 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堞 墙

堞墙 [Bonnet] (筑城用語)——胸墙的横向凸起部分,也就是为了不使敌人有可能从高处看见工事内部,或者为了掩护炮座式炮台的炮手和火炮不受侧射火力的伤害而构筑的横墙和胸墙。在炮座式炮台上,火炮的火力要越过胸墙顶,火炮必须架设在高旋转台上,装置在旋转台上的炮架可前后移动。所以,炮兵操纵火炮时不能完全避免敌人的射击,而侧面射击或跳弹射击对他们尤其危险,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敌人射击的目标比在有射孔和低炮架的炮台上的目标几乎高出一倍。为了防止这种危险,必须在火炮之间构筑横墙或横向胸墙,并且胸墙必须筑有高出于胸墙的堞墙,以便平台上的炮手完全得到掩护。这一上部构筑从横墙横过胸墙。如果火炮的两侧都有堞墙,火炮的水平迴转角度就会被限制在 90 度到 120 度之间。

«Bonnet-à-Prêtre» 或 «Queue d'Hirondelle» (燕尾堡,野战筑城用語)——具有两个凸角并在凸角之间有一个凹角的工事。凹角经常为 90 度,两个凸角通常为 60 度,这样,两个外正面长于两个内正面,并且向后延伸。这种工事有时用来做小的桥头堡,或在其他情况下,用来防守隘口。

弗·恩格斯写于 1857 年 9 月 28 日左右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 1858 年版
 第 3 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 貝 姆¹²²

貝姆，約瑟夫——波兰將軍；1795年生于加里西亞的泰爾諾夫，1850年12月10日逝世。他一生極端仇恨俄國。在拿破侖的勝利和宣言喚起復興波蘭的信心的時代，貝姆進入華沙的陸軍幼年學校，並在佩勒蒂埃將軍領導的炮兵學校受軍事教育。他在炮兵學校畢業後，被任命為騎炮兵中尉，在1812年戰局中，他在達武和麥克唐納部下當騎炮兵中尉；他因參加但澤保衛戰¹²³而獲得榮譽軍團十字勳章，這個要塞失陷後，他回到了波蘭。因為沙皇亞歷山大假充波蘭民族的熱烈的同情者，改編了波蘭軍隊，貝姆於1815年加入波蘭軍隊當炮兵軍官；但是不久因同一個上級軍官決鬥而被免職。後來他又被任命為華沙炮兵學校軍事學教員，并被提升為上尉。他使康格里弗火箭在波蘭軍隊中得到使用，并把這方面的經驗寫成一本書¹²⁴，這本書最初用法文出版，後來譯成德文。他容易激怒，不願服從，從1820年到1825年曾幾次被交付軍事法庭，被判處徒刑，釋放後，重又入獄，最後被押送到波蘭的一個偏僻的村莊科茨克，在警察的嚴密監督下虛度歲月。在亞歷山大死後，彼得堡的起義¹²⁵使康斯坦丁對他無暇顧及時，他才脫離了波蘭軍隊。貝姆離開俄屬波蘭後到了列姆堡，在一家大釀酒廠當經理，並且寫了一本關於酒精蒸餾法的書。

當1830年華沙爆發起義時，他參加了起義，幾個月後他被提升

为炮兵少校；1831年5月他参加沃斯特罗侖卡会战，他在同占优势的俄国炮队作战中表现出非凡的作战艺术和坚毅精神。¹²⁶当波兰军队对俄军的攻击最后被击退，俄军渡过那累夫河时，他勇敢地率领他的全部炮兵向前推进，以掩护波军撤退。在这以后，貝姆升为上校，不久又升为将军，并且被任命为波兰炮兵司令。当俄军强攻华沙时，他作战是很勇敢的，但作为一个指挥官，却犯了错误，没有发挥他的40门炮的作用，使俄军占领了主要防御地点沃利亚。华沙淪陷后，他带领残余部队退到普鲁士，他说服兵士不向普军缴械，结果引起了当时称为菲紹会战的一次无谓的流血冲突。后来，他离开军队，在德国组织了波兰流亡者救济委员会，以后他就到了巴黎。

他那异乎寻常的性格——爱好劳动和喜爱精密科学同强烈的事业心结合在一起——促使他心甘情愿地去干冒险的事，而一旦遭受挫折就给他的敌人以可乘之机。例如，1833年他独自负责为唐·彼得鲁招募波兰军团¹²⁷，但是没有成功，当时有人指责他背叛；当他去布尔日招募波兰人加入他的军团时，有一个对他失望的同胞向他开枪。1834年到1848年期间，他在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比利时和法国各地游历。

1848年，奥属波兰一出现革命迹象，他就赶到列姆堡，10月14日又从那里去维也纳。在维也纳为加强防御工事和组织革命力量所做的一切，都是他个人的努力的结果。他所领导的维也纳流动自卫军¹²⁸的出击于10月25日以溃逃而告终，这使他不得不提出一系列严厉的指责；而回答他的是公开指控他叛变。这种指控尽管是完全荒谬的，但是性质十分严重，若不是惧怕波兰军团暴动，他就有可能被送交军事法庭。在他10月28日出色地保卫猎人街的大街垒以及维也纳市议会和文迪施格雷茨公爵之间开始谈

判以后，他就躲藏起来。他的悄然失踪引起了人們更大的怀疑，这种怀疑从維也納一直跟踪他到佩斯，在佩斯，由于他向匈牙利政府提出不准組織特別的波兰軍团的合理建議，一个名叫科洛迭茨基的波兰人把他当做叛徒向他开枪，他負了重伤。

匈牙利政府委派貝姆指揮特兰西瓦尼亚战争，但由他自己想办法招兵买馬来进行这次战争。这次战争是他軍事活动的一个最重要时期，而且显示了他的指揮艺术的独到之处。1848年12月底，貝姆开始进行第一个战役，他統率一支約有8000人組成、装备很差并由各种各样的人（未經訓練的馬扎尔新兵、洪韦德¹²⁹、維也納的流亡者和一小部分波兰人）临时拼凑起来的队伍，这支混杂的軍队在特兰西瓦尼亚行进中又不断从塞克列人¹³⁰、薩克森人、斯拉夫人和羅馬尼亚人那里得到补充。大約經過两个月時間，貝姆結束了这次战役，战胜了普赫納所率的2万名奥軍、恩格尔加尔特所率的6000名俄国輔助部队以及烏尔班所率的强盜队伍。他迫使烏尔班逃到布柯維納，普赫納和恩格尔加尔特退到瓦拉几亚，于是占領了除一座小要塞卡尔斯堡以外的整个特兰西瓦尼亚。勇敢的突然襲击，大胆的机动，强行軍，以及由于他以身作則、巧妙地選擇隱蔽地段和在紧要关头一貫能够保证炮兵的支援而贏得他的部队对他的由衷的信任——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他在第一个战役所进行的游击战和小規模的山地战中是第一流統帅，同时他还表現出他是一个善于迅速組織和訓練軍队的能手；可是，他滿足于初步的一般的組織，忽視建立由精銳部队构成的核心（这是絕對必需的），所以，他的临时組成的軍队一旦遭到严重的挫敗，就必定像幽灵那样消失。

当特兰西瓦尼亚为他控制的时候，他防止了馬扎尔人特派員

打算采取的毫无意义的和不讲策略的殘酷手段，因而受到人們的尊敬。敌对民族的和解政策使他的軍隊人数在几个月內就增加到4—5万人，而且使他有了足够的騎兵和炮兵。如果說貝姆率領这支人数众多的軍隊远征巴納特¹³¹ 虽有过几次出色的机动但沒有取得巩固的战果，那末就應該注意到：他由于必須同无能的匈牙利將軍协同作战而被束縛住了手脚。

俄国大軍侵入特兰西瓦尼亚和随之而来的馬扎尔人的失敗，迫使貝姆回到他进行第一个战役的戰場。他用攻入莫尔达維亞以騷扰敌人后方的嘗試失敗以后，又回到特兰西瓦尼亚，7月29日在舍斯堡附近被利迭尔斯指揮的人数比他多两倍的俄軍击潰，而他自己由于陷入了沼澤地，偶然被几个潰散的馬扎尔驃騎兵救了出来，才沒有被俘。他重整殘部，于8月5日再次以強攻占領了海尔曼施塔特，但是因为沒有得到增援，不久只好放棄这个地方；在8月7日的战斗失敗以后，他又去匈牙利，在那里恰好亲眼看到决定性的泰梅希瓦拉会战¹³² 的失敗。他率領馬扎尔殘部在卢果日进行最后抵抗失敗后，他又进入特兰西瓦尼亚，繼續同占很大优势的兵力作战，直到8月19日他才被迫到土耳其避难。

为了給自己开拓新的反俄活动領域，貝姆入了伊斯兰教，被苏丹封为阿穆腊特帕沙，担任了土耳其軍隊的指揮官；但是由于欧洲列强的反对，他被派到阿勒頗。1850年11月他在那里有效地制止了穆斯林居民的流血事件¹³³，这次事件的受害者是当地的基督教徒；大約一个月后，他因拒絕就医而死于严重的热病。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1857年
9月下半月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載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3卷

卡·馬克思 貝西埃爾

貝西埃爾，讓·巴蒂斯特——法蘭西帝國元帥；1768年8月6日生于洛特省的普勒塞克，1813年5月1日在呂特岑附近陣亡。1791年他加入路易十六的“立憲自衛軍”¹³⁴，在駐比利牛斯山的獵騎兵團當軍士，不久獲得獵兵上尉軍銜。1796年9月4日，羅韋雷托會戰勝利後，波拿巴在戰地就提升他為上校。在1796—1797年意大利戰局期間，他是總司令的吉德¹³⁵隊長；貝西埃爾在埃及當吉德團團長，他一生的大部分時間都和這種部隊有關係。1802年他升為師長，1804年獲得帝國元帥的稱號。他參加過羅韋雷托會戰、里沃利會戰、聖讓得阿克會戰、艾布基爾會戰、馬連峨會戰（在這次會戰中他曾指揮騎兵的最後一次決定性攻擊）、奧斯特利茨會戰、耶拿會戰、埃勞會戰和弗里德蘭德會戰¹³⁶。1808年他被任命為駐西班牙薩拉芒卡省的一個師（有18000人）的師長；當他到任時，庫埃斯塔將軍已經占領伐利亞多利德和布尔果斯之間的陣地，威脅了馬德里和法國之間的交通綫。貝西埃爾向庫埃斯塔將軍攻擊，在梅迪納-德-里歐-塞科附近取得了勝利。在英軍的伐耳赫倫遠征¹³⁷失敗後，拿破侖任命貝西埃爾為駐比利時的法軍司令，以接替貝爾納多特。同年（1809年），貝西埃爾獲得伊斯的

利亚公爵的封号。在埃斯林会战^①中，他指揮騎兵師，打敗了奧地利的霍亨索倫將軍。俄國戰局時期，他是近衛騎兵司令，當 1813 年德國戰局開始時，他擔任法軍騎兵司令。在呂特岑會戰¹³⁸前夕，他在進攻薩克森的里帕赫峽谷時陣亡。他陣亡的消息被認為在一段時期內不宜向全軍宣布，由此可見他在兵士中享有多麼大的威望。

卡·馬克思寫於 1857 年 9 月 29 日
左右

載於“美國新百科全書”1858 年版
第 3 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美國新百科全書”

俄譯文第一次發表

① 見本卷第 64—70 頁。——編者注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 博 斯 凱¹³⁹

博斯凱，瑪麗·約瑟夫——法國元帥，1810年生于下比利牛斯省的波城。1829年入巴黎綜合技術學校，1831年入麥茨軍事學校，1833年升為炮兵少尉，1834年仍任少尉，隨同第十炮兵團前往阿爾及利亞。有一次，法軍的一支小部隊在那里處境非常危急，而指揮官驚惶失措，不知如何脫出戰鬥，這時年輕的博斯凱出面獻策，結果敵人遭到了徹底失敗。1836年博斯凱被提升為中尉，1839年為上尉，1842年為少校，1845年為中校，1848年為上校，後來在共和國政府時期為準將。在1851年卡比利亞戰役^①中，他率領他的旅攻擊莫納加爾峽谷時負傷。由於他對路易-拿破侖的態度矜持，他一直未被提升為師長，但是，當戰爭爆發，開始派軍隊到土耳其去的時候，他被任命為第二師師長。

在阿爾馬河會戰^②中，他指揮法軍右翼向俄軍左翼進行側面攻擊，其行動之迅速和有力，連俄國人也給予很高的評價；博斯凱甚至使炮隊通過沒有道路的而且被認為是無法通過的峽谷到達了台地。但是應該指出，在這次戰鬥中他的部隊的人數大大超過敵軍。在巴拉克拉瓦會戰時，他及時趕去解救英軍右翼，使英國輕騎

① 見本卷第108—109頁。——編者注

② 見本卷第55—59頁。——編者注

兵的殘存部队能够在他的部队的掩护下撤退，而俄軍不得不停止追击。¹⁴⁰ 在因克尔芒会战中，他在清晨就表示願意派 5 个步兵营和 2 个炮兵連去支援英軍。当这个建議遭到拒絕时，他把法軍 3 个旅作为預备队配置在英軍右翼后面。上午 11 时，他将其中的两个旅調往火綫，从而迫使俄軍退却。如果沒有他的支援，英軍将彻底失敗，因为英軍全部投入了战斗，沒有留下任何預备队，而俄軍却还有 16 个未动用的营。博斯凱作为必須对部署在陡峭的黑河河岸的联軍进行掩护的一个軍的指揮官，始終非常敏捷、机警和主动。他参加了强攻馬拉霍夫岡¹⁴¹ 的战斗，在这次战事以后，他被提升为元帅，1856 年当了参議員。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57 年

9 月 22—29 日

載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 年版

第 3 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卡·馬克思 布律恩

布律恩，吉約姆·瑪麗·安——法兰西帝国元帅，1763年3月13日生于布里夫-拉-盖阿尔德，1815年8月2日死于阿維尼翁。他的父亲送他到巴黎去学习法学，但他离开大学后因經濟困难不得不当了印刷工人。革命初期，他同哥提埃、茹尔尼亚克·德·圣梅阿尔一起出版“农村和城市总汇报”¹⁴²。不久他加入革命政党，报名参加了国民自卫軍，并且成为科尔德利俱乐部¹⁴³的热心的會員。他那魁梧的身材、威武的仪表和强烈的爱国心，使他成了1791年馬尔斯广场示威时人民的軍事領袖之一，这次示威被拉斐德的国民自卫軍鎮压下去¹⁴⁴。当他被囚在獄中，人們开始傳說保皇派企图以卑鄙手段除掉他的时候，丹东把他营救了出来。他成了丹东的著名的拥护者之一；由于丹东的保荐，布律恩在1792年著名的九月的日子¹⁴⁵里就任軍事职务，10月12日出人意外地被擢升为上校和副官长。他在比利时杜木里埃的手下服务；他曾被派去对付在普伊澤將軍指揮下进攻巴黎的卡耳瓦多斯省的联邦派，而且轻而易举地打败了他們。后来，他晋升为准将并参加了岡德斯霍特会战¹⁴⁶。社会拯救委员会委派布律恩去平定吉倫特叛乱¹⁴⁷，他极其严厉地执行了这个任务。

当丹东被监禁时，人們以为布律恩会赶紧去营救他的朋友和

庇护人，但是一露出危险的苗头，他便审慎地站在一旁观望，并在恐怖时期巧妙地保全了自己。热月九日后，他又归附当时已取得胜利的丹东派¹⁴⁸，并且随同弗莱隆去马赛和阿维尼翁。葡月13日（1795年10月5日）他作为波拿巴的一名将领去镇压巴黎市区的叛乱¹⁴⁹。他帮助督政府粉碎格列涅尔兵营的密谋（1796年9月9日）¹⁵⁰以后，加入了意大利军团的马森纳师，并且在整个战争期间表现得非常英勇。波拿巴为了笼络科尔德利派首领们，把他在里沃利会战中的一部分功绩归之于布律恩的努力，在战地就提升他为师长，而当意大利军团第二师师长的职位因奥热罗去巴黎而空缺的时候，波拿巴便促使督政府委派布律恩担任这个职务。

康波福米奥和约¹⁵¹签订以后，督政府交给他的使命是首先麻痹瑞士人，使他们感到可以高枕无忧，然后分裂他们的委员会，最后，集结军队进攻伯尔尼州和夺取它的公共金库；当时布律恩忘记了把掠夺来的财物登记造册。此外，他采取了与其说是军事手段，不如说是外交手段，迫使法国的假同盟者撒丁国王卡尔·艾曼努尔把都灵的城砦交给他（1798年7月3日）。持续了大约两个月的巴达维亚战役¹⁵²在布律恩的军事生涯中是重大的事件。在这次战役中，他击败了约克公爵所指挥的英俄联军，约克公爵向他投降并保证遣返反雅各宾战争开始以来被英军俘虏的全部法军战俘。雾月十八日 coup d'état [政变] 以后，波拿巴委任布律恩为新成立的国务会议委员，随后又派他去镇压布列塔尼的保皇党人。

1800年被派到意大利军团的布律恩占领了三个敌人营垒，在沃尔塔河地区构筑工事，把敌人赶过了河，并且采取了立即强渡该河的措施。根据他的命令，军团必须在两个地点渡河：杜邦将军指挥的右翼在沃尔塔河畔的磨坊和波察洛村之间渡河；布律恩本人

指揮的左翼在蒙博戎附近渡河。当后面这部分部队渡河遇到困难时，布律恩下令推迟 24 小时进行，虽然在另一地点开始渡河的右翼已經同兵力强大得多的奥軍接火。全靠杜邦將軍的努力，右翼才沒有被歼灭或做俘虏，否則对整个战争的成败就有很大的影响。布律恩因这次錯誤被召回巴黎。

从 1802 年到 1804 年，布律恩在君士坦丁堡任大使时沒有起多大的作用，因为在那里他的外交才能不像在瑞士和皮蒙特有刺刀作后盾。1804 年 12 月他返回巴黎以后，拿破侖提升他为元帅，对他比对勒庫尔布那样的將軍們更为重用。他当了一段时期的布倫兵营¹⁵³ 司令官之后，于 1807 年被派到汉堡担任汉撒各城市的总督兼大軍的后备軍司令。他在担任这个职务期間，曾大力帮助布里昂窃取国家資財。为了解决在施拉赫坦与瑞典簽訂的停战协定中的某些爭执点，布律恩曾与古斯达夫国王进行了长时间的私人会談，古斯达夫实际上建議他出卖自己的皇上。他拒絕这个建議所采取的方式引起了拿破侖的怀疑；布律恩在草拟关于呂根島移交法軍的协定时只把法軍和瑞典軍称做締約双方，而根本不提“皇帝陛下和国王陛下”，于是拿破侖大发雷霆。布律恩立即被貝尔蒂埃去信召回。貝尔蒂埃根据拿破侖的特別指示在信中指出：“自法拉蒙德时代以來，还不曾有过这样荒唐的事情。”

布律恩回到法国以后，就钻到个人生活里去了。1814 年布律恩向参議院的法令¹⁵⁴ 宣了誓，并且从路易十八那里获得圣路易十字勳章。百日¹⁵⁵ 时期，他又成了波拿巴分子，并被任命为駐瓦拉河地区的監視軍司令官。他在那里像他当年当雅各宾派那样无情地、坚决地打击保皇党人。滑铁卢会战以后，他宣布自己是国王的拥护者。他从土倫去巴黎的途中，于 8 月 2 日到达阿維尼翁，当

时这个城市已被保皇派恶棍們控制，他們进行了 15 天燒杀。布律恩被人认出后遭到枪杀。一群人拖着他的尸体沿街走，并把它抛入了罗尼河。拿破侖在圣海倫島時曾說：“布律恩、馬森納、奧熱羅以及其他許多人都是大无畏的破坏者。”而关于布律恩的軍事才能，他指出：“他有一定的功績，但是总的說來，与其說他是令人生畏的軍人，不如說他是 général de tribune [看台上的將軍]。”1841 年，在他的故乡为他树立了一座紀念碑。

卡·馬克思写于 1857 年 9 月 23—
29 日

載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 年版
第 4 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爆炸彈

爆炸彈，或爆炸的炮彈——重炮和臼炮使用的一种內装火药的空心铁彈；它以大射角发射，具有降落的力量和爆炸的力量。爆炸彈是所使用的炮彈中最大的一种，因为臼炮比其他任何一种火炮短，可以有相当大的直徑即口徑。目前爆炸彈的直徑通常为 10、11 和 13 英寸；1832 年，法軍圍攻安特卫普¹⁵⁶ 时使用了比利时鑄造的臼炮和口徑为 24 英寸的爆炸彈。爆炸彈內的火药由炮彈信管引起爆炸，炮彈信管是装满緩燃药的空心圓管，在臼炮发射时着火。这种信管的作用是使爆炸彈在到达目标时尽快爆炸，有时使爆炸彈着地直前爆炸。除了火药外，爆炸彈中有时放入几份瓦朗西恩剂¹⁵⁷，以点燃可燃物，但是有人认为，瓦朗西恩剂沒有用处，因为它在爆炸彈爆炸时成了很多微粒，而且沒有它也絲毫不影响爆炸的炮彈的燃燒作用。发射爆炸彈的射角为 15 度到 45 度，而一般为 30 度到 45 度，用減装药的較大的爆炸彈在射角为 45 度时有較远的射程，而用增装药的較小的爆炸彈在射角为 30 度或 30 度左右时也有較远的射程。在一切情况下装药量都是比較少的：臼炮在发射 200 磅重的 13 英寸的爆炸彈时，如果射角为 45 度，火药装药为 3 1/2 磅，其射程可达 1 000 碼，而如果装药为 20 磅（即相当于爆炸彈重量的十分之一），其射程可达 4 200 碼。这种从高处

落下的爆炸彈，如果遇到易于破坏的目标，則其破坏力是很大的。它能穿透任何层的楼房和坚固的拱楼板；13 英寸的爆炸炮彈虽然只装大約 7 磅火药，但是它的爆炸效果犹如地雷，如不遇障碍，其碎片可飞出 800 和 1 000 碼。但是，爆炸彈如果落到松軟的土地上，則可陷入 8 到 12 英尺深，或者熄灭，或者爆炸，但已不能为害。同时，爆炸彈常常被用做小地雷或应用地雷——在敌人必經之地把它埋入大約一英尺深的土里；用緩燃火绳或导火索使之爆炸。这就是最初使用爆炸彈的方法。据中国編年史家記載，中国人早在公元前几百年就已使用一种装满爆炸药和金屬碎片的金屬球，这种金屬球借助于緩燃火绳爆炸。中国人在防守隘路时使用它，当敌人逼近时把它埋在那里。1232 年在开封府保卫战中，中国人在遭到猛攻时常常从胸墙上把爆炸性火器向强攻要塞的蒙古人滾下去。古札拉特沙赫馬茂德在 1484 年圍攻查姆帕尼尔时曾向城內扔爆炸彈。在欧洲，占領西班牙的阿拉伯人和步其后尘的西班牙人沒有仿效先前不甚可信的例子，从十四世紀初起就用火炮发射爆炸彈和燃燒彈，但是空心彈由于价格昂貴和不易制造而长期沒有得到广泛采用。只是从十七世紀中叶起，它才成为攻城炮的重要組成部分。

弗·恩格斯写于 1857 年 10 月 5 日
左右

載于“美国新百科全书” 1858 年版
第 3 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炮手

炮手——最初是臼炮連里操纵臼炮的兵士；但是目前在某些国家的军队中，这个用語是指稍低于中士的炮兵軍士。炮手的主要职责通常是瞄准。奥地利曾經建立炮手团作为训练炮兵軍士的学校，这个机构对制定火炮的有效而科学的操纵方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奥軍的这一兵种以这种方法而闻名。

弗·恩格斯写于1857年10月5日
左右

載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
第3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炮 击

炮击——为了引起火灾而向城市或要塞发射爆炸弹。炮击有非正规的和正规的两种。非正规的炮击是军舰、野炮连和较少量的攻城炮队向某地点发射爆炸弹，以便恫吓居民和守军，使之早日投降，或者为了别的什么目的。正规炮击是攻击要塞的方法之一。1815年，在滑铁卢会战以后，普军围攻法国北部的要塞时首次采用正规炮击来攻击要塞。由于法军和波拿巴的拥护者当时士气非常低落，而其余的所有居民又都渴望和平，普军便决定抛弃按部就班的旧的围攻形式，而以短时间的猛烈炮击代替它，这样就可以引起火灾和火药库爆炸，使要塞的全体居民夜不成眠，从而造成居民对司令部的道义上的压力，或者造成大规模的实际破坏和守军极度疲劳，促使要塞早日投降。虽然用平射对防御工事进行正规攻击的方法还继续被采用，但是它与重榴弹炮用爆炸弹进行曲射相比，已成为次要的方法了。在某些情况下只要非正规的炮击就够了，在另外的情况下则必须采取正规炮击，而这两者都肯定能达到目的，所以目前人们认为围攻理论中的一个原则是：用曲射火力消灭敌人的兵员和物资，借此使留在要塞里成为危险的事，正像用平射和跳弹射击毁坏外圈工事一样重要（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话）。对人口众多的中等要塞进行炮击效果最大，因为炮击造成的道义上

的影响是迫使司令部投降的手段之一。对大要塞进行炮击需要大量的弹药。对塞瓦斯托波尔的围攻¹⁵⁸ 便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当时消耗了空前多的炮弹。就是这次战争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正规炮击的最鲜明的例子:英法臼炮艇攻击斯维阿波尔格要塞¹⁵⁹ 时,曾发射了 5 000 多枚爆炸弹和同样多的实心弹。

弗·恩格斯写于 1857 年 10 月 5 日
左右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 年版
第 3 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两桅小炮艇

两桅小炮艇——这个术语现在通常是指较老式的臼炮艇(galliotés à bombes)。这种臼炮艇建造得十分牢固,能够经受住臼炮后坐所产生的震动,艇身长60—70英尺,载重100—150吨,吃水8—9英尺,通常有两个桅杆。艇上装有两门臼炮和若干门火炮。当然,这种舰艇的航海性能是很差的。它们由一艘辅助舰(通常是两桅横帆船)随伴;在战斗开始前,炮手和大部分弹药都在辅助舰上。

弗·恩格斯写于1857年10月5日
左右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
第3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炮艇

炮艇，即臼炮艇——这个术语是指一种较现代化的、用臼炮装备的军舰。俄国战争^①以前，不列颠舰队的这种军舰吃水8—9英尺，舰上除2门10英寸臼炮外，还装置4门六十八磅炮和6门十八磅卡伦炮。对俄战争使得舰队必须在浅水处和弯曲的水道行驶，而军舰的任何正面进攻所无法攻克的强大的俄军岸防要塞又要求使用臼炮艇，于是就不能不发明一种新式炮艇。这种新式军舰长约60英尺，很宽，舰首呈圆形，舰底像荷兰平底船一样，是平的，吃水6—7英尺，以蒸汽发动。它装备2门10英寸或13英寸臼炮和几门野炮或卡伦炮，以使用霰弹击退前来进行接触战的队伍；舰上没有重炮。它从4000码的距离上射击斯维阿波尔格要塞，取得了很大的效果。

弗·恩格斯写于1857年10月5日左右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3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① 1853—1856年的克里木战争。——编者注

弗·恩格斯 防彈工事

防彈工事——十分堅固足以抵禦命中的爆炸彈的沖擊的某種結構的頂蓋。在現有直徑極大的爆炸彈的情況下，要使大多數防彈建築完全不受曲射火力的危害幾乎是不可能的，顯然也是不適宜的。拱心石所在處厚度為 3 1/2 英尺的圓拱頂能經得住大多數的爆炸彈，甚至一枚 13 英寸炮彈也穿不透它，但是第二枚多半可以穿透。因此，只有火藥庫、實驗室等才有絕對防彈的工事，在這些地方一枚爆炸彈即可造成大爆炸。上面復有 3—4 英尺厚的泥土的堅固拱頂最為安全。一般穹窿的拱頂不必這樣堅固，因為爆炸彈兩次命中同一點的可能性是很小的。臨時性防彈工事是用一根根并放在一起的堅固木梁做頂蓋，放上束柴，鋪滿垃圾，最後再鋪上一層泥土。由於採用穹窿式炮台和穹窿式堡壘，以及穹窿式防禦營房（通常沿着壘牆的內斜面和離壘牆不遠的地方構築），要塞里的防彈工事就大大增多；在目前對要塞採用正規圍攻與晝夜不停的猛烈炮擊相結合的方法的條件下，守軍如果沒有可靠的掩體供換下來的部隊休息和恢復體力，要經受住這種圍攻的確是不能想像的。因此，在修建現代化要塞時，這種工事必定會愈來愈多。

弗·恩格斯寫於 1857 年 10 月 5 日左右
載於“美國新百科全書”1858 年版
第 3 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美國新百科全書”
俄譯文第一次發表

弗·恩格斯 軍用橋¹⁶⁰

軍隊渡過大河和狹窄海峽用的臨時橋的架設技術，古代的人們早已掌握了，他們這種建築的規模之大有時是令人驚訝的。大流士曾經渡過波斯普魯斯海峽和多瑙河，薛西斯曾經用舟橋渡過赫勒斯滂海峽；希羅多德的著作¹⁶¹ 里有這種橋的記載。薛西斯的軍隊曾架設兩座橫跨達達尼爾海峽的橋。第一座橋是用 360 只船築成的，這些船被船首錨和船尾錨固定，舷接觸地並列在一起，龍骨順着水流；它們靠牢固的纜連接起來，上面鋪上木板，兩側用橫木連接，並蓋上一層土。第二座橋是用 314 只船築成的，建造的方法同上。據阿利安的記載，亞歷山大軍隊有輕便船隻組成的常備舟橋縱列。¹⁶² 羅馬人有一種用獸皮包裹的荊條船，用來支撐橋的木板面；帝國崩潰以前，這種船一直是軍隊輜重的一部分。不過，如果需要渡過湍急的河流的話，羅馬人也會建造更為牢固的軍用橋；凱撒渡萊茵河¹⁶³ 時用的著名的木樁橋就是這一點的證明。

我們沒有找到關於中世紀軍隊有專用的渡水橋梁器材的資料，但是，在三十年戰爭時期，作戰軍隊曾攜帶在德國的大河上架橋的器材。當時所用的船很重，多半用柞木製成。橋板面由豎在這種船的船底的叉形架支撐住。荷蘭人首先使用比較輕型的平底船，船舷近於垂直，船頭和船尾是尖的，兩端以一定的角度高出水

面。这种船用包着白铁皮的木骨架制成，称为浮桥船。根据福拉尔的說法¹⁶⁴，法国人也认为自己是浮桥船的发明者，不过壳板是銅的，同时他指出，法国人在 1672 年前后就有了完备的舟桥纵列。到十八世紀初，欧洲各国的军队都有了浮桥船，它們通常是由白铁皮或銅皮，皮革或浸油帆布包裹的木骨架。俄国人使用的是浸油帆布。船不大，为了使桥在一定程度內保持在水面上，必須使船互相靠近，使它們的間隔不超过 4—5 英尺；这就严重地阻碍水的流通，使桥的安全受到威胁，并且使敌人有可能放可浮物来破坏桥。

目前欧洲大陆上的各国军队所使用的浮桥船較大，但基本上和一百年前使用的相似。从 1829 年起，法国人使用平底船，这种船的船舷近于垂直，船头很尖，而船尾尖度稍差，船的两端高于船緣，像舢板船那样翘起。船的大小如下：长 31 英尺，上寬 5 英尺 7 英寸，底寬 4 英尺 4 英寸。骨架是柞木的，上面包有一层云杉板。每只浮桥船重 1 658 磅，浮力（船吃水到船緣上端时的負荷力）为 18 675 磅。架桥时，船緣与船緣的間隔为 14 英尺。桥面寬 11 英尺。军队的先头部队在渡不大的河流时使用較小的浮桥船。奥地利浮桥船与較大的法国浮桥船相似，但是为了便于搬运，这种船被从中間横断为两部分，这两部分在水上連成一体。两只船舷接舷地并列，用短方木連接，并且用纵梁支撑桥板面的横梁，构成浮托桥墩。这种浮桥船是比拉戈发明的，1825 年首次被采用。俄国人的浮桥船是木骨架的，这种骨架的中間横梁或支柱可以拆卸；骨架上棚着浸油帆布或上胶的帆布。每只浮桥船长 21 英尺 9 英寸，寬 4 英尺 11 英寸，高 2 英尺 4 英寸，重 718 磅。桥面寬 10 英尺。两船的間隔为 8 英尺。俄国人还有一种浮桥船，它也是木骨架，但是用皮革包裹。有人肯定地說，普魯士人最先用横隔板把浮桥船隔

成若干部分，使船不致因一处漏水而沉沒。普魯士人的浮桥船是木制的平底船。架桥时，他們根据情况在浮桥船之間留下 8—16 英尺寬的跨度或間隔。荷兰人（从 1832 年起）和皮蒙特人的舟桥纵列与奥地利軍队的相似。比利时的浮桥船船头是尖的，但船尾并不尖。大陆各国軍队的舟桥纵列都配备有載錨的小船。

英美軍队的舟桥纵列完全不用船，而是用輕质材料制成的密封的空心圓筒支撐桥梁。1836 年英国采用两端为圓錐形的、半球形的或抛物綫形的浮筒代替其他各种类型的浮桥船，这种浮筒是布朗沙德上校于 1828 年設計的。英国的大浮筒长 $24\frac{1}{2}$ 英尺，直徑为 2 英尺 8 英寸。它是这样制成的：在一連串以空心的白铁管作輪輻的白铁輪子上包白铁皮；一个較大的直徑为 $1\frac{3}{4}$ 英寸的白铁管作为它們共同的軸，通过整个浮筒。

美国曾試驗用橡皮浮筒。1836 年累恩上尉（后为上校）用这种浮筒在亚拉巴馬的一条深而湍急的河流上架起了桥，1839 年阿姆斯特朗先生設計了一种与此相似的浮筒，每个充气的浮筒长 18 英尺，直徑为 18 英寸，重 39 磅；三个浮筒构成一个桥节。1846 年美国軍队在与墨西哥作战¹⁶⁵中使用了充气的橡皮浮筒。这种浮筒由于輕，折叠后所占的地方不大，所以极便于搬运，但是經過砂礫等等的磨擦便会損坏和不能使用。它还具有各种浮筒都有的缺陷。这些缺陷是：浮筒沉到水中一半时，在增加等量載重的情況下，它們吃水深度愈来愈大，而人們需要的却相反；其次，浮筒两端容易阻留各种可浮物；最后，为了使它們在水中移动，必須預先用桥板把它們一对对地連結起来，构成筏，而浮桥船却能像普通船一样单独在水上移动，而且可以用桨迅速地載运部队过河。下面的材料就足以比較出浮筒和浮桥船的浮力：法国浮桥船可支撐大約 20 英

尺长的桥，浮力(桥梁上部结构除外)为 150 多英担^①；英国的两浮筒筏大致也可支撑同样长度的桥，但浮力(上部结构除外)只不过 77 英担，而可载量则只有其浮力的一半。

除了浮桥船外，舟桥纵列还包括桨、篙、锚、纜以及浮桥船在水上移动和在一处固定所必需的其他用具，也包括铺桥面用的木梁和壳板(木板)。浮桥船通常是首先在現場一个个地摆好，然后用木梁和木板連結起来；而浮筒则是一对对地連結在一起，构成筏，然后在离桥的一端的适当距离上下碇，并且用木梁和木板与桥的一端連結起来。如果情况允许，可在預定的筑桥地点的上方的隐蔽地带，将三、四个或五个浮筒用桥板連結成一整个桥节，然后将桥节一个个地浮运到預定的筑桥地点。在某些场合，加上有經驗丰富的架桥兵，整个桥就可以在河的一岸筑好，渡河时借水流的力量推送过去。在瓦格拉姆会战前夕，拿破侖军队渡多瑙河时用的桥就是这样架設的。整个这次战局从在敌人的視野内用軍用桥横渡大河这一点来看，是极有教益的。

但是舟桥纵列并不总是現成的，所以軍事工程师必須在必要时沒有舟桥纵列也能够在河上架桥。为此有各种筑桥材料和筑桥方法。一般在通航的河道上航行的大船，都可用来做舟桥。如果找不到船，而河的深度或河底的形状要求建造浮托桥墩，則可利用木筏、浮桶以及其他可浮物架桥。如果河小，河底坚固而又相当平坦，則可建造固定的木桩桥墩或支架桥墩。木桩桥墩可以保证建造最牢固可靠的桥，但需要花很多时间和劳力；而建筑支架桥墩迅速而又容易。有时，可把装满束柴等物的大車沉入河的較深处作

^① 1 英担等于 112 磅或 50.8 公斤。——編者注

为鋪桥的桥墩。跨越水淹地和沼澤地等的桥可用堡籃建造。如果只是步兵要通过狭窄的河流或山谷,則可以采用各种吊桥;吊桥一般用牢固的粗繩索悬吊。

目前,在敌人的有效火力控制下是很少建造軍用桥的,虽然必須时刻預見到击退敌人的可能性。所以,桥通常在河流的凹进地段修筑,这样左右两边的火炮就可以射击到对岸的桥头附近,借以掩护架桥。此外,凹进地段的河岸一般高于对岸,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它兼有交叉火力的优点和制高位置的优点。步兵可乘船或浮桥船划到对岸,并在桥头占領陣地。有时建造門桥以渡运少量的騎兵和一些輕火炮。把河分成几条支流的島屿或任何小河汇流点以下的地方,也有許多优点。在后一种情况下或有时在前一种情况下,都可以在河流的隱蔽地带把各个桥节造好,順流浮运。进攻的一方通常可以在很长一段河流上选择許多合适的地点,他們容易以佯攻迷惑敌人,然后在某个遙远的地点真正渡河;而对防御者來說,在很长一段河流上分散自己的兵力是非常危險的,所以,目前多半是在离河較远的地方集中兵力,一当查明真正的渡河地点并且早在敌軍全部渡河之前,将全部兵力投向真正的渡河地点。法国革命以来在任何一次战争在欧洲的任何一条大河上筑桥都沒有遇到严重抵抗,其原因就在这里。

弗·恩格斯写于1857年10月14日
左右

載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
第3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1940年
“軍事历史杂志”第11期

卡·馬克思 貝爾納多特¹⁶⁶

貝爾納多特，让·巴蒂斯特·茹尔——法兰西帝国元帅，蓬特科尔沃的公爵，瑞典和挪威的国王，称为查理十四·約翰；1764年1月26日生于下比利牛斯省的波城，1844年3月8日死于斯德哥尔摩的王宮。他是律师的儿子，受过这个职业的必要訓練，但是由于他喜爱軍事，他于1780年秘密参加皇家海軍陆战队，到法国革命爆发的时候，他已在那里获得士官的軍銜。从这时起，他提升很快。1792年他在居斯丁的軍团里已当了上校，1793年指揮半旅，同年由于克累貝的保举，升为准将，并担任松布尔—麦士軍团的师长，他在克累貝和茹尔丹的指揮下，促进了1794年6月26日弗略留斯会战的胜利、在幽里希的胜利和馬斯特里赫特的投降¹⁶⁷。他还在1795—1796年反对奥地利的克累尔費將軍、克賴將軍和卡尔大公的战争中立了大功。1797年初，他奉督政府的命令，率領2万人增援意大利軍团；在意大利他第一次同波拿巴会面，而这次会面决定了他們后来的关系。波拿巴虽然心胸开闊，但他对萊茵軍团及其將領却抱有狹隘的嫉妒和猜疑态度。他馬上了解到，貝爾納多特有很大的个人野心。而貝爾納多特又是个地道的加斯科尼人，他不能正确衡量像波拿巴那样的天才和像他自己这样的只有一般才能的人之間的距离。由此产生了他們互相之間的不和。

在入侵伊斯的利亚¹⁶⁸ 期間，貝爾納多特在指揮先頭部隊渡過塔臘門托河以及在 1797 年 3 月 19 日攻占格腊迪斯卡要塞時立下了戰功。

在所謂果月十八日革命¹⁶⁹ 以後，波拿巴命令他的將領們向所屬各師收集支持這次 coup d'état [政變] 的賀信；但是貝爾納多特一開始就反對這樣做，接着又示威式地表示自己絕對不願執行這一命令，最後給督政府送去了賀信，但其內容同所要求的完全相反，而且沒有通過波拿巴就送發了。波拿巴在去巴黎向督政府遞交康波福米奧條約的途中，曾到烏迪訥大本營中去拜訪貝爾納多特，對他大加吹捧，但第二天卻從米蘭下令，把萊茵軍團中他的一師兵力縮減一半，而命令另一半人調回法國。在分歧和新的糾紛經過長期的勸解和調停之後，貝爾納多特終於被說服接受了駐維也納大使的職務。在這裡，他按照達來朗的指示行事，採取了和解的立場，但巴黎報紙在波拿巴及其一伙人的教唆下宣稱這種立場充滿保皇主義傾向，為了證明這一指責，還廣泛地散布了流言，說貝爾納多特取下了挂在他邸宅門口的三色旗和下屬帽子上的共和國帽徽。貝爾納多特因此遭到督政府的譴責以後，於 1798 年 4 月 13 日，即在維也納反雅各賓示威遊行周年紀念那一天，升起了寫有“自由、平等、博愛”的三色旗，結果他的邸宅遭到維也納人群的襲擊，旗子被燒毀了，而他的生命也受到了威脅。由於奧地利政府拒絕了他提出的要求，貝爾納多特偕同使館全體人員離開維也納去拉施塔特；然而督政府卻遵照親自插手搞這一丑事的波拿巴的意見，壓下這件事，從而使自己的代表得不到支持。

1798 年 8 月，貝爾納多特同馬賽商人的女兒，即約瑟夫·波拿巴的姨子德吉烈·克拉里小姐結婚，從此他同波拿巴家族有了

亲戚关系；但这看来只加深了他对拿破侖的敌意。1799年，他担任上萊茵監視軍司令官的职务，但他不能胜任所担負的职責，这样一来就預先证明了拿破侖的意見是正确的，拿破侖在圣海倫島說过，貝爾納多特只能当部下，而不适合担任总司令。在督政府牧月三十日 *emeute* [政变]¹⁷⁰ 以后，他主管陸軍部，他的本事主要不表现在作战計劃上，而表现在勾結雅各宾派的陰謀活动上，他依靠雅各宾派重新抬头的勢力，企图在軍隊中給自己收罗追随者。結果在1799年9月13日那天早晨，他在“通报”讀到自己退職的消息，而他根本沒有呈請辞职这回事。这是督政府中与波拿巴有关系的成員西哀士和罗日·杜科同他开的玩笑。

貝爾納多特在担任西方軍团司令时，鎮压了万第暴动的最后几个策源地。在宣布帝国以后，帝国授与他元帅称号，并委任他指揮汉諾威軍团。他在担任这个职务期間，以及后来担任北德意志軍团司令时期，竭力在北部的人民中树立个人声望，标榜自己是独立的、温和的和擅长行政管理的人。他率領駐汉諾威的一个軍，即大軍的第一軍，参加了1805年对奥地利人和对俄国人的战争。他被拿破侖派到伊赫劳去監視斐迪南大公在波希米亚的移动；后来被調回布隆，在奧斯特利茨会战期間，他的軍部署在苏尔特和朗恩之間的中央，协助粉碎了同盟国軍右翼从翼側迂迴法軍的企图。1806年6月5日，他获得蓬特科尔沃公爵的封号。在1806—1807年对普魯士战争期間，他指揮第一 *corps d'armée* [軍]。他得到拿破侖的命令，要他从璫堡开往多恩堡，而当时也在璫堡附近的达武，則应向阿波耳达前进；在达武接到的命令中附有这样的話：如果貝爾納多特已經同他会合，那末他們可以一同开往阿波耳达。达武偵察到普軍移动的方向，确信在去多恩堡的途中决不可能遇

到敵軍，因而建議貝爾納多特共同向阿波耳達進軍，甚至表示願意服從他的指揮。但是貝爾納多特固執地堅持從字面上解釋拿破侖的命令，仍向多恩堡前進，整天也沒有遇到一個敵人，然而達武却不得不在奧埃爾施太特會戰¹⁷¹中單獨承受敵人的主攻，這次會戰由於貝爾納多特沒有參加，最後沒有能夠取得決定性的勝利。全虧從奧埃爾施太特附近和從耶拿附近來的兩股潰軍的衝突，以及拿破侖在戰略上的計謀，才防止了貝爾納多特明知故犯的嚴重錯誤所造成的後果。拿破侖本來已經簽署了把貝爾納多特提交軍事法庭的命令，但是作了進一步考慮以後又撤銷了這項命令。耶拿會戰以後，貝爾納多特會同蘇爾特和繆拉特於10月17日在哈雷擊潰了普軍，把普魯士的布呂歇爾將軍追逐到盧卑克，促使他於1806年11月7日在拉特考投降。1807年1月25日在離托恩不遠的莫龍根平原他還擊潰了俄軍。

在提爾西特和約以後，根據拿破侖同丹麥簽訂的同盟條約的條款規定，法國軍隊應當佔據丹麥的島嶼，以便從那里進攻瑞典。¹⁷²因此，1808年3月23日，也就是俄國入侵芬蘭的同一天，貝爾納多特奉命向西蘭島推進，以便會同丹麥軍隊攻入瑞典，推翻國王^①，並把這個國家瓜分給丹麥和俄國——這對於被指定在不久的將來統治斯德哥爾摩的人來說是個奇怪的使命。他率領32000人的法國、荷蘭和西班牙軍隊渡過貝耳特，抵達西蘭島；但是1萬名西班牙軍隊在羅曼納將軍指揮下依靠英國艦隊的幫助脫離了貝爾納多特的軍隊。貝爾納多特在他留駐西蘭島期間毫無作為，也毫無收穫。此後他被調到德國，參加法國和奧地利之間的新的戰

① 古斯達夫四世·阿道夫。——編者注

爭，他奉命指揮主要由薩克森人組成的第九軍。

1809年7月5日和6日的瓦格拉姆會戰又引起他同拿破侖之間的不和。會戰的第一天，歐仁·博阿爾奈退出緊靠瓦格拉姆的隘口，插入敵軍後備軍的中央，但沒有得到貝爾納多特應有的支援，因為貝爾納多特的部隊參加戰鬥太晚而且太不主動。遭到正面和翼側攻擊的歐仁被有力地擊退到拿破侖的近衛軍那里；因此法軍進攻的第一次猛攻由於貝爾納多特行動緩慢而遭到挫折，當時貝爾納多特佔據了阿德勒克拉村，該村在法軍陣地的中央，但在法軍的正面稍前一些。第二天早晨6點鐘，奧軍集中兵力發動進攻，貝爾納多特沒有設防固守這個村莊，把它控制在自己的正面上，他却在阿德勒克拉前面展開了自己的部隊。他認為奧軍的迫近使他所選定的陣地非常危險，所以放棄阿德勒克拉，退到它后面的台地，於是阿德勒克拉立即被貝爾加爾德的奧軍佔領。這樣一來，法軍中央處於危急狀態，它的司令官馬森納派出一個師到前面去，以便重新佔領阿德勒克拉，但是這個師又被達斯普雷的擲彈兵從該地打出來。正在這個時候，拿破侖親自來了，他負責總指揮，制定了新的會戰計劃，破壞了奧軍的機動。可見，貝爾納多特又像在奧埃爾施太特那樣，使會戰的勝利又一次受到威脅。而他則不滿意拿破侖違反一切作戰規則，命令杜帕將軍（杜帕將軍的法國師是屬貝爾納多特軍指揮的）採取行動，而不考慮他的命令。當拿破侖發現貝爾納多特對薩克森人發布的命令在內容上同皇帝的通告不一致之後，就接受了他提出的辭呈。

貝爾納多特回到巴黎後，開始同富歇搞陰謀活動，不久，伐耳赫倫島的遠征¹⁷³（1809年7月30日）迫使法國內閣在皇帝不在的時候委派他去防守安特衛普。英軍的大錯誤使他所採取的任何行

动都成为多余的了；但是他利用这个机会，在告自己的官兵书里，字里行间指责拿破侖忽视采取应有措施来防守比利时沿岸地区。他被免职了；回到巴黎以后接到命令，要他离开首都，回到自己的蓬特科尔沃領地去，他拒絕服从这个命令，因而被召到維也納。他同拿破侖在雪恩布龙¹⁷⁴ 经过几次激烈和尖銳的談話以后，接受了羅馬区总督的职务——这是一种光荣的流放。

他当选为瑞典王儲的原因，甚至在他死后很长时期都沒有完全弄清楚。查理十三在收查理-奧古斯特（奧古斯滕堡公爵）为义子并承认他为瑞典王位继承人以后，派了弗雷德伯爵去巴黎，为公爵向律西安·波拿巴的女儿夏綠蒂郡主求婚。1810年5月18日，奧古斯滕堡公爵突然死亡，俄国坚决主張查理十三收奧登堡公爵为义子；而拿破侖則支持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六世的要求。年老的国王本人主張宣布死者奧古斯滕堡的兄弟为继承人，他派了默尔納男爵带了指令去見弗雷德將軍，要求弗雷德去事先取得拿破侖对国王提出的人选的同意。但默尔納这个年輕人屬於瑞典极有势力的一派，他們当时以为只有紧密联合法国才能复兴自己的国家。默尔納到了巴黎，同年輕的法国軍事工程师拉比、瑞典总領事辛紐尔和弗雷德伯爵本人磋商以后，提議貝尔納多特为瑞典的王位候选人，他們竭力不让在土伊勒里宮的瑞典大使拉格尔比埃尔克伯爵知道自己的步驟；而且他們抱有一系列被貝尔納多特所巧妙支持的錯誤看法，他們坚信貝尔納多特事实上是拿破侖心目中的候选人。因此，弗雷德和辛紐尔于6月29日在給瑞典外交大臣的急电中报告說，如果王位继承人的高位能給拿破侖的亲戚和助手，拿破侖将感到非常高兴。虽然查理十三表示反对，但是厄勒布魯的全国議會于1810年8月21日选举了貝尔納多特为瑞典的王

儲。国王也就被迫把他收为义子，起名查理-約翰。拿破侖很不乐意和很不高兴地命令貝尔納多特去接受給予他的高位。貝尔納多特于1810年9月28日离开巴黎，10月21日抵赫尔辛堡，在这里宣布脱离天主教，11月1日抵达斯德哥尔摩，11月5日出席等級會議，并从这时起他掌握了政权。自从簽訂倒霉的弗里德里希斯哈姆和約¹⁷⁵以来，瑞典普遍主張重新占有芬兰，一般都认为，沒有芬兰，就像拿破侖在1811年2月28日給亚历山大的信中所說的，“瑞典就不能生存”，至少是不能作为一个摆脱俄国控制的国家。瑞典只有紧密联合拿破侖才能指望收回这个地区。正因为人們坚信这一点，貝尔納多特才得以当选。在国王患病期間（1811年3月17日至1812年1月7日），查理-約翰被任命为摄政王，但这个任命只是仪式問題，因为他从到达瑞典那天起就已經領導一切事务了。

拿破侖本人是一个十足的暴发戶，他是不会去照顾自己老部下的自尊心的，因此他强迫貝尔納多特——違背以前的协定——于1810年11月17日参加大陆体系和对英宣战。他还取消了貝尔納多特作为法国公爵所应得的收入，并借口貝尔納多特是“和他不相等的国王”，而不接受貝尔納多特直接給他的信件，并退回查理-約翰贈送給新生的羅馬国王^①的六翅天使勳章。这些无謂的刺伤不过使貝尔納多特有理由根据早就作出的决定来行动。他剛迁入斯德哥尔摩，就公开接見俄国苏赫帖連將軍（这位將軍因收买斯維阿波尔格的要塞司令而被瑞典人所痛恨），甚至同意派这个人為駐瑞典王宮的大使。1810年12月18日他同車尔尼曉夫會談，

① 雷希施塔特公爵，拿破侖第一之子。——編者注

在會談中他表示“熱烈希望得到沙皇的高見”，並同意永遠放棄芬蘭，條件是挪威要脫離丹麥而併入瑞典。他通過車爾尼曉夫給沙皇亞歷山大一封極為諂媚的信。當他因此同俄國的關係密切起來的時候，那些推翻古斯達夫四世和促成貝爾納多特當選的瑞典將領們不再支持他了。1812年1月27日法國師侵入瑞典的波美拉尼亞（這是拿破侖根據來自斯德哥爾摩的秘密建議而採取的措施），終於使查理-約翰有了正式宣布瑞典中立的名正言順的借口，這時候，在軍隊和人民中間得到響應的瑞典將領們的對立立場，已經對他是一種嚴重的威脅了。然而他背着議會同亞歷山大於1812年3月27日在聖彼得堡秘密簽訂了反對法國的進攻同盟條約，條約還規定挪威併入瑞典。

拿破侖的對俄宣戰，使貝爾納多特一時成為主宰歐洲命運的人物。拿破侖向他提議，只要他派4萬名瑞典軍隊進攻俄國，就答應給他芬蘭、梅克倫堡、施特廷以及在施特廷和沃耳加斯特之間全部地區。貝爾納多特本來能夠決定戰爭結局並在拿破侖進入莫斯科以前占領聖彼得堡。他卻寧願在英國、俄國同他一起組成的三執政中扮演雷必達的角色。他慫恿蘇丹批准布加勒斯特和約¹⁷⁶，從而使俄國契查哥夫海軍上將得以從多瑙河沿岸撤走自己的軍隊，並在法軍的翼側採取行動。他還是1812年7月18日在厄勒布魯簽訂的以英國為一方和以俄國、瑞典為另一方的和約¹⁷⁷的中間人。亞歷山大被拿破侖最初的勝利吓破了膽，他邀請查理-約翰會晤，同時建議他擔任俄軍總司令的職務。查理-約翰很機智地拒絕了這一建議而接受了會晤的邀請。他於8月27日到達亞波，在該地會見了亞歷山大，當時亞歷山大灰心喪氣，竭力想求和。而查理-約翰本人卻完全不同，毫無退讓之意，他激發了動搖的沙皇的

勇气，向沙皇指出，拿破侖表面的胜利必将导致他的灭亡。会晤的結果签订了所謂亞波条約¹⁷⁸，条約中附有秘密条款，从而使同盟具有家庭協議的性质。实际上，查理-約翰除了得到諾言以外一无所得，而俄国却没有付出任何代价获得了在当时极为寶貴的同瑞典的同盟。不久以后，根据正本的文件证明，芬兰归还給瑞典的問題当时完全取决于貝爾納多特；但是这个統治者——加斯科尼人——却被亚历山大的諂媚的諾言迷惑，亚历山大說：“总有一天，从拿破侖头上掉下的法国皇冠会落在他的头上”，因此，他把瑞典也仅仅看成是 *pis aller* [不得已而占有的地方]。

法軍撤出莫斯科以后，他同法国正式断絕外交关系，而当英国在1813年3月3日的条約¹⁷⁹中保证他得到挪威的时候，他加入了反法同盟。他在英国的資助下，于1813年5月率領約25 000名瑞典軍队在施特腊耳宗德登陆，并开始向易北河推进。在1813年6月4日實現的休战¹⁸⁰期間，他在特拉亨貝尔格的会晤中起了重要作用，在这里，亚历山大把他介紹給了普魯士国王^①，并通过了总的作战計劃。他在担任北方軍团（由瑞典、俄国、普魯士、英国、汉撒和北德意志等部队組成）总司令的时候，通过一个以朋友身分經常到他的大本营拜訪的人，同法軍保持了非常曖昧的联系；他保持这种联系是根据这样的設想：只要他向法国人证明自己的寬容和仁慈，那末他們就会心甘情愿舍棄拿破侖而換貝爾納多特来統治。因此他阻撓部下將領轉入进攻，而当毕洛夫不顾他的命令，在大貝倫和登內維茨两次战胜法軍的时候，他还制止追击潰軍。当布呂歇尔为了促使他采取行动而向易北河进军，并同他会

①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編者注

合的时候，只是因为他的军团中的英国全权代表查理·斯图亚特爵士以停止供应相威胁，他才不得不向前推进。然而瑞典军队在萊比錫戰場出現，不过是装装样子，他們在整个战争期間伤亡还不到 200 人。当同盟国軍进入法国的时候，貝尔納多特让瑞典軍隊在法国边境按兵不动。拿破侖退位以后，他亲自前往巴黎，以便向亚历山大提醒他在亚波所許下的諾言。达来朗向同盟国国君會議声明說，“只能在波拿巴和波旁王朝之間进行选择，其他一切都是阴谋”，这就一下子打破了他的幼稚的希望。

在萊比錫会战以后，查理-約翰率領了由瑞典人、德国人和俄国人組成的軍隊侵入什列斯維希和霍尔施坦两公国，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六世面临敵軍的优势兵力，被迫于 1814 年 1 月 14 日簽訂基尔和約，和約規定，挪威割給瑞典。但是挪威人不願任人如此无礼地摆布，于是在丹麦王儲克里斯提安-弗雷德里克领导下宣布挪威独立。国民代表于 1814 年 5 月 17 日在埃德斯沃尔集会，通过了直到今天还有影响的、現代欧洲最民主的宪法。查理-約翰調动瑞典陆海軍，占領了控制通向克利斯提阿納的要冲的弗雷德里克施塔德要塞，然后同挪威人进行談判，同意把挪威当作独立国家看待，并承认埃德斯沃尔宪法；他在 10 月 7 日得到这个議会的同意以后，于 1814 年 11 月 10 日前往克利斯提阿納，以他自己的名义和国王的名义向宪法宣誓。

1818 年 2 月 5 日，查理十三逝世，称为查理十四·約翰的貝尔納多特就被欧洲承认为瑞典和挪威的国王。这时他企图修改挪威宪法，恢复已被廢除的貴族阶层，掌握絕对的否决权以及撤換一切文武官員的权力。这种企图引起了严重的冲突，甚至引起了 1828 年 5 月 18 日騎兵襲击庆祝宪法周年紀念日的克利斯提阿納

居民的事件。大暴动看来是不可避免的了,但是 1830 年的法国革命迫使国王暂时采取和解的步骤。为了得到挪威,他曾经不惜一切牺牲,而挪威在他整个统治期间始终是造成困难的经常根源。从 1830 年法国革命的最初日子起,欧洲只有一个人认为瑞典国王是法国王位的合适追求者,这个人就是貝爾納多特自己。他不止一次地向斯德哥尔摩的法国外交代表说:“怎么拉菲特没有想到我呢?”欧洲形势的改变,首先是波兰的起义,一度促使他产生建立反俄同盟的想法。他根据这种想法向帕麦斯顿勋爵提出建议,但遭到坚决的拒绝,因此他不得不于 1834 年 6 月 23 日同尼古拉皇帝签订同盟公约(这个公约使他成为俄国的陪臣),以此为自己有过短时间的闹独立的思想赎罪。从这时起,他在瑞典的政策具有如下特点:蓄意侵犯出版自由,迫害犯 *lèse majesté* [侮辱国王] 罪的人,反对进步措施,甚至连那些要使工业摆脱行会和同业公会的陈规束缚的措施也在反对之列。他利用参加瑞典议会的各阶层的角逐,长期有效地破坏了各种运动;但是议会于 1844 年通过的自由主义决议(根据宪法,议会在 1845 年应使这些决议成为法律),使他的政策有彻底破产的危险;但正好在这个时候他死了。

如果说,在查理十四统治期间,瑞典从一个半世纪的苦难和挫折中有些恢复的话,那末这决不能归功于貝爾納多特,而要完全归功于人民本身天赋的毅力和长期和平的作用。

卡·马克思写于 1857 年 9 月 17 日—
10 月 15 日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 年版
第 3 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 西班牙艦隊¹⁸¹

西班牙艦隊——1588年西班牙國王菲力浦二世為征服英國而派出的一支龐大的海軍，其目的是

“為天主效勞，使許多受異教徒——我們神聖天主教的敵人壓迫的飽受痛苦的人們回到天主教會的懷抱里來，異教徒強迫他們服從自己的教派，使他們受盡折磨”（“西班牙遠征英國的真實記述”¹⁸² 公元1588年版）。

幾乎在與艦隊出發的同時，根據菲力浦的命令出版了一本書，書名是“1588年我國元首唐·菲力浦國王命令在里斯本港集結的最幸運的艦隊。彼得羅·帕斯·薩拉斯著”¹⁸³；在這本書里，對這支海軍作了最充分的說明。柏里助爵弄到了這一本書，因此英國政府預先知道了遠征的一切詳情細節。（這本書包括了一直到1588年3月的資料，目前保存在英國博物館里。）該書指出，艦隊擁有65艘大帆船和大軍艦、25艘大運輸船（每艘排水量為300至700噸）、19艘輔助船（排水量為70—100噸）、13艘小型巡航艦、4艘小帆船和4艘橈船——總共130艘艦船，總噸位為75 868噸。艦船裝置了2 431門火炮，其中有1 497門青銅炮——大部分是最大型的加農炮（四十八磅的）、長炮（三十磅的和二十磅的長管炮）等；彈藥有123 790發球形實心彈和5 175英担^①火藥，每門火炮

① 1英担等於112磅或50.8公斤。——編者注

配备约 50 发炮弹，装药平均为 $4\frac{1}{2}$ 磅。全部舰员共有 8 052 名水兵；此外，舰上还载有 19 295 名兵士、180 名神甫和修道士。舰上还有上岸后牵引野炮用的骡子和炮车。根据上述资料，这次远征备有 6 个月的粮食。这支在当时是举世无双的舰队应开往佛来米海岸，以便掩护帕尔马公爵指挥的 3 万步兵和 4 000 骑兵组成的另外一支军队登上专门为此目的建造的平底船（这些平底船的船员由波罗的海的水手补充）。在这以后，全部舰船就向英国前进。

在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竭尽全力扩充自己的舰队，最初有 30 艘军舰，将近 180 艘船；舰船的大小不一，一般地说，规模不及西班牙军舰。但是在英国舰船上有 17 500 名水兵，因此在人数上大大超过了西班牙舰队。英国的武装力量分为两支军队：一支为 18 500 人，由莱斯特伯爵指挥，任务是直接抵抗敌人，另一支为 45 000 人，担任女王的私人警卫。此外，根据英国博物馆保存的题为“为对付西班牙舰队而召集的英国兵力的详细记述”的手稿¹⁸⁴（手稿部，书目 18，第 21 章）来看，还可从尼德兰得到 2 000 名步兵的增援。

西班牙舰队原定 5 月初从里斯本出发，但因舰队司令桑塔·克鲁斯和副司令去世便延期了。继任舰队司令的是麦迪纳-西多尼亚公爵，他对海军业务完全外行；但是副司令马丁涅斯·德·雷卡尔德是有经验的海军宿将。1588 年 5 月 29 日，舰队在从里斯本到科鲁尼亚装运弹药的航途中被大风暴打散了，虽然所有的军舰（除了 4 艘以外）都在科鲁尼亚集合了，但它们被烈风严重损坏，需要修理。由于西班牙舰队已经完全不能使用的消息传到了英国，英国政府就命令自己的军舰也不出动；但是舰队司令霍华德勋爵

違抗這一命令，乘船前往科魯尼亞，弄明白了真實情況回來以後繼續作戰準備。此後不久，他便得到了在海面上出現西班牙艦隊的消息，他即下令起錨，在拉芒什海峽尾隨西班牙艦隊前進，沿途一有好機會就對西班牙艦船進行騷擾。當時西班牙人向弗蘭德海岸前進，艦船相互之間儘可能靠緊。在這時發生的各種小戰鬥中，英國人因為自己的軍艦比較靈活，人數比較多，艦員對業務比較熟悉，所以經常戰勝不靈活的艦員配備不足的（儘管船上擠滿了陸軍兵士）西班牙大帆船。此外，西班牙炮兵沒有好炮手，往往瞄準得太高。西班牙艦隊在加來附近拋錨，等待帕爾馬公爵的艦船離開佛來米港灣；但是不久得到消息說，帕爾馬的不適於戰鬥的艦船，在西班牙艦隊渡過海峽並趕走進行封鎖的英荷分艦隊以前不能離開該處。因此西班牙艦隊就重新起錨，但是在敦克爾克附近碰上了無風天氣，被迫停在英國艦隊和荷蘭艦隊之間。霍華德勳爵準備了縱火船，於8月7日夜間起風的時候，向敵艦放出了8艘縱火船。縱火船在西班牙艦隊中引起了極大的驚慌。有些軍艦起了錨，另一些軍艦砍斷了繩纜，聽任風勢擺布；整個艦隊亂成一團，有些軍艦自相碰撞而損毀了。到第二天早晨，秩序還沒有恢復，而西班牙艦隊的各個區艦隊分散在遼闊的海洋上。當時霍華德勳爵得到了那些由有爵位的貴族和無爵位的貴族擔任艦員的軍艦和由拜倫勳爵指揮的進行封鎖的分艦隊的支援，並在弗蘭西斯·德雷克爵士的巧妙協助下，於拂曉4時開始同敵人作戰。這次戰鬥，或者更正確地說是獵捕（因為英國人在一切攻擊地點都占有明顯的優勢）一直進行到天黑。西班牙人作戰勇敢，但是他們的笨重的軍艦不適宜在狹窄的海峽里航行和進行機動的戰鬥。西班牙人遭到了徹底的失敗，損失慘重。

这样一来，同帕尔馬公爵的运输船的会合是不可能的了，至于单靠舰队的兵力在英国海岸登陆，就更談不上了。当时舰上儲存的粮食已大部分用完，而通向西班牙佛兰德的道路这时已被截断，除了回西班牙去补充食物以外，就别无出路。（見“来自爱尔兰的关于西班牙舰队在爱尔兰海岸附近遭到的損失和災难的确实报道”1588年倫敦版。¹⁸⁵艾曼努埃尔·弗雷莫薩的供詞。此人曾在雷卡尔德海軍上将的排水量为1100吨的旗舰——“圣璜号”上服务过。）因为拉芒什海峽的通道也遭到英国舰队封鎖，所以只剩下一条出路即繞道苏格兰回国。被派去追逐的西摩尔勋爵的舰队对西班牙舰队仅仅騷扰了一下，因为他們彈药不足，不敢进攻。然而在西班牙人繞过奥克尼群島以后，海上起了大風暴，打散了整个舰队。有些軍舰被風暴刮回到挪威海岸触了礁。另一些在北海沉沒，或者在苏格兰海岸附近和赫布里底群島一带触礁而毀坏。在这以后不久，西班牙人在爱尔兰西部海岸又一次遭到風暴的襲击，在那里沉沒了30多艘軍舰。那些好不容易才游到岸边的舰員也大部分被打死；約有200人根据爱尔兰总督^①的命令被处死。整个舰队剩下不过60艘破烂不堪的舰船，而且船員受尽了飢餓折磨；它們大約在9月中旬到达桑坦德，这时西班牙才最后放棄了入侵英国的計劃。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1857年
7月底和10月23日之間
載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
第2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① 菲茨威廉。——編者注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 艾阿庫裘¹⁸⁶

艾阿庫裘——秘魯共和国的一个省；人口 131 921 人。在它的主要城市(也叫艾阿庫裘)附近曾发生过一次最終保证了西屬南美洲独立的会战。胡宁会战(1824 年 8 月 6 日)¹⁸⁷以后,西班牙总督拉·塞尔納將軍企图采取各种机动来切断苏克萊將軍指揮的起义軍队的交通綫。总督沒有达到这个目的,最后他誘使敵軍进入艾阿庫裘平原,在这里西班牙軍隊占領了一个高地上的防禦障地。他們的兵力有 13 个步兵营(配有炮兵和騎兵),共 9 310 人。1824 年 12 月 8 日双方的先头部队进入战斗。次日,苏克萊率領 5 780 人发动进攻。科尔多巴將軍指揮的哥倫比亚第二师进攻西班牙軍隊的左翼,一下子把他們打得潰不成軍。在左翼的拉·馬尔將軍指揮的秘魯师遭到比較頑强的抵抗,他們在拉腊將軍的預备队开到以前无法向前推进。在这以后,敵軍全綫退却,騎兵就立即进行追击,打散了西班牙騎兵并击潰了步兵。西班牙軍隊有 6 名將軍被打死;打死打伤和被俘人数达 2 600 人;总督也被俘擄了。南美洲軍隊的損失如下:打死 1 名將軍和 308 名軍官和兵士,打伤 520 人(其中有 6 名將軍)。次日,康太腊克將軍(西班牙軍隊这时已由他指揮)签字投降;根据投降条件,不仅他和他所有的部队都成了战俘,而且在秘魯的全部西班牙軍隊和全部崗哨、火炮、倉庫以及

还在西班牙人手中的全部秘魯領土（庫斯科、阿雷基帕、普諾、基尔卡等地）都交給了起义軍。由此成为战俘的軍隊人数总共几乎达到 12 000 人。西班牙的統治就这样最終地結束了；1825 年 8 月 25 日丘基薩卡代表會議宣告了玻利維亞共和国的独立。

在西班牙，人們給埃斯帕特罗和他的軍隊中的党羽起了“艾阿庫裘派”的綽号。聚集在埃斯帕特罗周圍的一部分軍人奸同他一起参加了鎮压南美洲起义者的战争。在这次战争中使他們联合在一起的不仅是战友之誼，而且是他們对冒險事业的共同爱好；在这次战争期間，他們彼此保证回到西班牙以后在政治活动中互相支持。他們极认真地履行了这个对彼此都有很大好处的保证。人們給他們起“艾阿庫裘派”的綽号，暗示这次会战的不利結局实质上是由埃斯帕特罗和他的党羽促成的。但这种說法不对，尽管它流傳很广，甚至現在在西班牙通常也都相信这种說法。埃斯帕特罗不仅沒有在艾阿庫裘戰場出現过，而且当会战进行时他甚至不在美洲，因为当时他还没有結束他的西班牙之行——拉·塞尔納總督派他到西班牙去給斐迪南七世送紧急报告。1824 年 6 月 5 日，他在基尔卡搭乘英国两桅橫帆船“台伯号”，于 9 月 28 日到达加迪斯，10 月 12 日抵馬德里，并于 1824 年 12 月 9 日，也就是在艾阿庫裘近郊发生会战的那一天，从波尔多乘船返美洲。（見唐·霍賽·塞貢多·弗洛雷斯“埃斯帕特罗”四卷集，1844 年馬德里版；以及普林西佩“埃斯帕特罗”，1848 年馬德里版）¹⁸⁸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57 年
9 月 21 日和 10 月 23 日之間
載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 年版
第 2 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 布呂歇爾¹⁸⁹

布呂歇爾，格布哈爾德·勒勃萊希特·馮，瓦爾施塔特公爵——普魯士元帥，1742年12月16日生于梅克倫堡-施韋林的羅斯托克，1819年9月12日于西里西亞的克里布洛維茨逝世。1754年，布呂歇爾還是少年的時候，便被送到呂根島，在這裡他秘密加入了瑞典驃騎兵團，任下級軍官，參加對普魯士國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的戰爭。在1758年戰爭中，布呂歇爾被俘，在被俘整整一年和開除瑞典軍籍後，經人說服參加了普魯士軍隊。1771年3月3日，他被任命為騎兵上尉。1778年，當馮·施韋特封疆伯爵的非婚生子馮·耶格爾費耳德上尉而不是他補上了少校的空缺時，布呂歇爾即上書弗里德里希二世：

“陛下：耶格爾費耳德除了是馮·施韋特封疆伯爵之子外，別無任何功勳，竟先我而被提升。請陛下准我退伍。”

為此，弗里德里希二世下令將他關入監獄，但是當他不顧相當長期的監禁，拒絕撤回自己的呈文時，國王便同意滿足他的請求，批示如下：“馮·布呂歇爾上尉可以滾蛋。”於是，布呂歇爾遠走波蘭的西里西亞，不久便結了婚，開始從事農業，並在波美拉尼亞弄到了一個不大的莊園。弗里德里希二世逝世後，他重返自己原來的團隊，任少校，但是有一定的條件——他的任期應從1779年算

起。数月后他的妻子去世。布呂歇爾曾参加对荷兰的不流血的入侵¹⁹⁰，并在1788年6月3日晋升为中校，1790年8月20日升为上校和驃騎兵团第一营营长(早在1760年他就加入了該团)。

1794年布呂歇爾在普法尔茨对共和制法国作战时，出色地表现了一个輕騎兵指揮官的才干。1794年5月28日，在基尔魏勒战斗获胜后，他晋升为少将，而在卢森堡、凱則尔斯勞頓、莫尔施海姆、魏登塔耳、埃德斯海姆、艾登科本等地的战斗，使他的名望越来越高。当他以勇猛的 coups de main [坚决的攻击]和成功的奇襲不断地惊扰法軍的时候，他从未忘記向大本营报告关于敌人調动的最确切的情报。他在这次战局中所写的日志¹⁹¹，于1796年由他的副官哥尔茨伯爵公布。这本日志虽然在修辞上有缺点，但仍不失为一部有关前卫勤务問題的名著。巴塞尔和約¹⁹²签订后，他再次結婚。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即位后把他提升为中将，他在任中将期間占領了爱尔福特、繆尔豪森和閔斯德，并作为总督来管理这些地区。1805年，他被調到一个人数較少的軍担任軍长，該軍集中在拜罗伊特，監視奧斯特利茨会战以后所造成的直接关系到普魯士的局势，即監視貝尔納多特軍进占安斯巴赫公国。

1806年布呂歇爾在奥埃尔施太特会战中指揮普魯士軍隊的前卫。但是他的攻击被达武的猛烈的炮火击退了，而他的关于投入全部騎兵、以生力軍再次攻击的建議也被普魯士国王拒絕了。普軍在奥埃尔施太特和耶拿两地战敗以后，布呂歇爾順易北河向下游退却，而拿破侖却勢不可当地追击普軍的主力，从耶拿不停地追到施特廷。布呂歇爾在退却中收容各軍殘部，因而使他的軍隊增加到将近25 000人。他在苏尔特、貝尔納多特和繆拉特的联合部队的猛攻下向卢卑克的退却，是德国这一屈辱时代中有数的光

輝事迹之一。因为卢卑克是中立地区，所以布呂歇尔把这个不設防的城市的街巷变成殊死奋战的場所，使該城遭到法国兵三天的洗劫，这件事便成了对他进行激烈的攻击的口实。但是，在当时情況下重要的是給德国人民做出哪怕是一个頑强抵抗的榜样。布呂歇尔被逐出卢卑克后，于1806年11月7日在拉特考平原被迫投降，但以书面证明他投降的原因是“彈尽粮絕”为条件。他在宣誓后获釋，前往汉堡，同儿子們在一起打牌、抽烟、飲酒，消磨时光。在和維克多將軍相交換以后，他被任命为波美拉尼亚总督。但是，普魯士和拿破侖在1812年2月24日締結的同盟条約秘密条款之一規定，应当像对待夏恩霍斯特和其他杰出的普魯士爱国人士一样，解除布呂歇尔的职务。国王为緩和这一公开的不愉快的事件，秘密地将西里西亚富饒的孔岑多夫領地賜給了布呂歇尔。

从簽訂提尔西特和約到德国解放战争这一过渡时期的年代里，“道德协会”¹⁹³的領導者夏恩霍斯特和格奈澤瑙力图推举一位人民英雄登上舞台，他們选中了布呂歇尔来充当这个角色。他們成功地在群众中扩大了他的声望，因而当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在1813年3月17日发表宣言号召普魯士人拿起武器时，他們已經充分准备了条件来迫使国王任命布呂歇尔为普軍总司令。在同盟国軍队虽然頑强抵抗、但仍然失利的呂特岑和包岑会战中，布呂歇尔曾在維特根施坦指揮下作战。同盟国軍队从包岑向施魏德尼茨退却时，他曾在海瑙附近設伏，率領自己的騎兵痛击了梅桑指揮的法軍前卫，使梅桑在这次战斗中損失1500人和11門火炮。¹⁹⁴布呂歇尔的这一意外的胜利振奋了普軍士气，并使拿破侖在追击时不得不极为小心。

1813年8月10日特拉亨貝尔格休战协定¹⁹⁵期滿后，布呂歇

爾開始指揮一個獨立的軍團。這時，同盟國的君主們將同盟國軍隊分編為三個軍團：北方軍團，由貝爾納多特指揮，配置在易北河下游；主力軍團，經波希米亞進軍；西里西亞軍團，由布呂歇爾統率，協助他的有他的參謀長格奈澤瑙和副參謀長繆弗林。這兩個人一直在布呂歇爾手下擔任該職直到 1815 年締結和約時為止，他們幫他制訂了所有的戰略計劃。而布呂歇爾本人，據繆弗林說：

“對軍事行動的戰略指導一無所知，或者知道得極少，以致將任何一個作戰計劃、甚至是極小的作戰計劃送呈他批准時，他都不能從中得出多少一點明確的概念和判斷計劃的好壞”¹⁹⁶。

他同拿破崙的許多元帥一樣不識地圖。西里西亞軍團包括三個 corps d'armée [軍]：蘭熱朗伯爵指揮的俄軍 4 萬人；馮·薩肯男爵指揮的 16 000 人；約克將軍指揮的普魯士軍 4 萬人。布呂歇爾率領這個不同民族組成的軍團是異常困難的。蘭熱朗曾經擔任過獨立的司令官，不願聽從外國將軍的指揮；加之他知道布呂歇爾會接到僅採取守勢的密令，但是完全不了解布呂歇爾 8 月 11 日在賴辛巴赫同巴克萊-德-托利會晤時得到見機行事的許可。因此，當他覺得總司令違背早先商妥的計劃時，他認為自己有权不執行命令，而約克將軍也竭力支持他的這種反抗行為。

由這種情況產生的危險越來越嚴重，但是在這時發生了卡茨巴赫河會戰，結果使布呂歇爾在他的軍團中獲得很高威望，從而保證了他的軍隊一直打到巴黎的大門口。麥克唐納元帥遵照拿破崙的旨意應將西里西亞軍團逐向西里西亞腹地，他於 8 月 26 日開始了會戰，攻擊布呂歇爾配置在奈塞河與卡茨巴赫河匯合處普勞茲尼茨與克羅奇之間的前哨。所謂卡茨巴赫河會戰實際上是四次不同的戰鬥，其中第一次戰鬥是以刺刀沖鋒趕跑了奈塞河右岸山嶺

后面台地上約 8 个营的法軍（这几乎还不到敌人十分之一的兵力），而所造成的結果却完全超出了它原来的意义。这是因为丟棄台地逃跑的法軍沒有在下克賴恩集合，也沒有配置在卡茨巴赫河对岸的克罗奇附近而造成的；当时假如这样作的話，他們逃跑就不会对法軍的其余部分发生任何影响了。其次，是因为配置在奈塞河左岸的薩肯和兰热朗两軍在天黑時曾數度挫敗敌人，还因为在奈塞河左岸亲自指揮的麦克唐納元帥到下午 7 時已难于抵擋兰热朗的攻击，在日落后就立即将自己的軍隊帶到哥耳德貝克，当时他們已經筋疲力竭，不能繼續作战，因而必然会落入敌人的手中。最后，是因为暴雨季节使得逃跑的法軍所必經的一些平时不大的河流——奈塞河、卡茨巴赫河、得伊赫謝耳河及博伯尔河——变成了波濤汹涌的巨流，同时使得道路几乎无法通行。結果在西里西亞軍团左側山区活动的地方民軍协助下，本身意义不大的卡茨巴赫河会战以生俘法軍 18 000—20 000 人、繳获火炮 200 余門和彈药 300 余箱以及救护車和輜重車等而結束。

在会战后，布呂歇尔采取了一切措施使他的軍隊尽全力追击敌人，并正确地向他們指出：“如果多辛苦一些，他們就可能避免一次新的会战。”9 月 3 日，他率領自己的軍团强渡奈塞河，4 日，通过比碩夫斯韦尔达，以便到包岑集中。他的这一行动挽救了主力軍团，后者于 8 月 27 日在德勒斯頓城下失敗而不得不退到厄尔士山脉以后，現在完全脫离了敌人¹⁹⁷；而拿破侖則不得不率領援兵向包岑前进，以便收集在卡茨巴赫河被击潰的軍隊，并同西里西亞軍团会战。布呂歇尔在停留易北河右岸薩克森东南部期間，采取了一系列后退和前进的机动，始終避免同拿破侖会战，但是在同法軍个别部队遭遇時則經常进入战斗。9 月 22、23 和 24 日，他在敌

人右側實行側敵行軍，挺進到易北河下游，靠近北方軍團。10月2日，他在易北河上埃耳斯泰爾附近架設浮橋，而在10月3日晨他的軍團渡過易北河。這一行動不僅是大膽的，甚至是冒險的，因為布呂歇爾完全不顧交通綫的安危。這一行動是由最高的政治意圖決定的，並終於導致了萊比錫會戰。如果不是布呂歇爾的話，行動遲緩而又過分謹慎的主力軍團是永遠不敢冒險進行這一會戰的。

由貝爾納多特任總司令的北方軍團，共約9萬人，因此，使該軍團向薩克森進軍極關重要。布呂歇爾因為同北方軍團內普軍軍長畢洛夫和俄軍軍長文秦格羅迭保持密切聯繫，所以獲得了最確凿的證據，證明貝爾納多特向法國人獻媚，並且當他仍然單獨在一個獨立的戰區時，是無法促使他採取稍許積極的行動的。畢洛夫和文秦格羅迭曾表示願意不按貝爾納多特的意圖行事，但他們為此要求有10萬人的軍隊來支援他們。正因為如此，布呂歇爾才決定側敵行軍，而不顧君主們讓他向左，即向波希米亞方向前進，同他們靠攏的指示。貝爾納多特甚至在西里西亞軍團渡過易北河之後還不斷地刁難布呂歇爾，但是這些刁難也沒有使他放棄這個意圖。他在離開包岑之前，曾派遣一名信使去通知貝爾納多特：既然北方軍團兵力過弱，不能在易北河左岸單獨作戰，他將率領西里西亞軍團前來，並將於10月3日在埃耳斯泰爾附近渡河；因此，請貝爾納多特與他同時渡過易北河，共同向萊比錫進軍。由於貝爾納多特對這一信件置之不理，而敵人又占領了埃耳斯泰爾對岸的瓦滕堡，因此布呂歇爾便首先驅逐了敵人，爾後，為了能在拿破侖傾全力向他猛攻時進行防禦，便開始在瓦滕堡到布累丁一綫構築營壘。他從這裡前進到了木耳德河。

10月7日在同貝爾納多特會面時曾經約定，兩個軍團共同向萊比錫進軍。10月9日，當西里西亞軍團準備進軍時，貝爾納多特得到關於拿破侖從麥生沿大道開來的情報，就堅持退到易北河對岸，只有當布呂歇爾決定協同他渡過薩利河以便在該河對岸占領陣地時，才同意留在易北河左岸。儘管由於這一行動西里西亞軍團會重新喪失自己的交通綫，布呂歇爾還是同意了，因為否則同盟國就會實際上失掉北方軍團。10月10日，整個西里西亞軍團同北方軍團會師，抵木耳德河左岸，河上橋梁已被破壞。當時，貝爾納多特又提出必須退到貝恩布克，而布呂歇爾僅僅為了不讓他撤回易北河右岸，又作了讓步，條件是貝爾納多特在韋廷附近渡過薩利河並在那里占領陣地。10月11日，正當西里西亞軍團的縱隊越過馬格德堡至哈雷的大道時，布呂歇爾获悉貝爾納多特違背了自己再三保證的諾言，沒有在韋廷架橋，於是決定沿這條大道實施強行軍。

拿破侖看出北方軍團和西里西亞軍團避开他在杜賓附近集中兵力這一行動所發出的挑戰，又知道他們除非退到易北河對岸就不可能避免會戰，同時，也了解他只剩下四天的時間就將同主力軍團遭遇，而這將使他處於兩面夾攻的境地，於是，決定向易北河右岸維登堡方向開進，以使用這個佯動誘使北方軍團和西里西亞軍團渡到易北河對岸，然後再向主力軍團進行迅猛的突擊。果然，貝爾納多特由於擔心他与瑞典之間的交通綫而命令自己的軍團立即通過在阿肯架設的橋梁，撤到易北河右岸，並在當日，即10月13日，通知布呂歇爾說，亞歷山大皇帝出於某些重要考慮已將他（布呂歇爾）置於他的指揮之下。為此，他要布呂歇爾儘可能不失時機地率西里西亞軍團隨他之後開到易北河右岸。假如布呂歇爾這時

优柔寡断，追隨于北方軍團之后，那末战局就会失敗，因为总数約 20 万人的西里西亞軍團和北方軍團就不会出現在萊比錫戰場上了。布呂歇爾复函貝爾納多特，說明根据他所掌握的一切情报看来，拿破侖絲毫沒有把戰場轉移到易北河右岸的意图，只不过是企图迷惑他們而已。同时，他懇求貝爾納多特放棄渡过易北河的打算。另一方面，由于他一再劝导主力軍團向萊比錫进军，并提出在該地迎接它，他终于在 10 月 15 日得到了期待已久的邀請。他当即开往萊比錫，而貝爾納多特却撤到彼得斯堡。10 月 16 日，布呂歇爾在从哈雷至萊比錫途中，在默克恩激战中击潰了法軍馬尔蒙指揮的第六軍，繳获 54 門火炮。他立刻把这次战斗結果，通知了在萊比錫会战第一日沒有在戰場的貝爾納多特。会战第二日，即 10 月 17 日，布呂歇爾驅逐了帕尔特河右岸的敌人；敌人手中只剩下哈雷关卡附近的一些房屋和野战工事了。18 日拂曉布呂歇爾同貝爾納多特在布拉亨斐特举行會議，貝爾納多特提出，倘若布呂歇爾当天不从西里西亞軍抽調 3 万人給他，他就不能攻击帕尔特河左岸的敌人。布呂歇爾完全是为了顾全大局而毫不猶豫地同意了，但是以他仍然亲自率領这 3 万人，以保证他們有力地协同攻击为条件。

在 10 月 19 日获得最后胜利后以及在拿破侖从萊比錫向萊茵河退却的整个过程中，唯有布呂歇爾一人認真地进行了追击。当 10 月 19 日指揮各部队的將軍們在萊比錫集市廣場上迎接君主們，而将寶貴的时间浪費在互相道賀上的时候，布呂歇爾的西里西亞軍團已向呂特岑方向追击敌人了。布呂歇爾从呂特岑向魏森費耳斯挺进时，普魯士威廉亲王赶上了他，并把授予他普魯士元帅称号的证书交给了他。同盟国君主們让拿破侖赢得了一段距离，这段

距离同盟国军队始終沒有能弥补上。但是布呂歇尔从爱森納赫起以后每次都是下午到达拿破侖当天早晨才撤离的地方。正当布呂歇尔打算向科倫进发以便从那里渡过萊茵河时，他被召回并奉命去封鎖萊茵河左岸的美因茲城。他迅速追击敌军直到萊茵河的結果，使萊茵联邦¹⁹⁸瓦解；联邦的军队脱离了在这以前他們所屬的法軍各师。西里西亚军团的大本营駐在赫希斯特时，主力军团进到了上萊茵。1813年战局就此結束。这次战局所以获胜，全賴布呂歇尔具有大胆的进取心和铁一般的剛毅精神。

至于下一步的行动計劃，同盟国之間意見分歧；一派主張停留在萊茵河上并采取守勢，另一派則主張渡过萊茵河向巴黎进军。君主們久久犹豫不决，最后，布呂歇尔和他一派的人占了上风。于是决定向巴黎分进合击：主力军团从瑞士出发，毕洛夫从荷兰出发，而布呂歇尔率領西里西亚军团从中萊茵地区出发。为进行新的战局，曾增撥三个軍归布呂歇尔指揮，即克萊斯特軍、黑森选帝侯軍和薩克森—科堡公爵軍。布呂歇尔留下兰热朗軍的一部圍困美因茲城并命令新調来的各軍作为第二梯队随后跟进，于1814年1月1日在曼海姆、考布和科布倫茨三地渡过萊茵河；在摩塞尔河谷将馬尔蒙逐过了佛日和薩尔河，然后将約克軍配置在摩塞尔河各要塞之間，并率領一支由薩肯軍和兰热朗軍一个师組成的28 000人的部队，經沃庫略尔和茹安維尔向布里恩挺进，以便自己的左翼同主力军团会师。1月29日，在布里恩附近他遭到拿破侖約4万人的攻击。这时，約克軍仍远离西里西亚军团，而为数11万人的主力军团还剛剛到达肖蒙。这样，布呂歇尔便不得不与拿破侖的很大优势的兵力周旋。然而，拿破侖在这次攻击中缺乏他素有的剛毅精神，并且甚至让布呂歇尔毫无阻碍地（如果不算騎兵的几次小战

斗的話)退到特拉納。假如拿破侖占領布里恩,以部分軍隊配置在與它毗鄰的地方,並以三個軍分別占領迪昂維耳、拉羅提埃爾和肖美尼耳,那末他就能夠在1月30日以優勢兵力猛攻還在等待援軍的布呂歇爾。可是,拿破侖却採取消極戰術,而同盟國的主力軍團已在奧布河岸巴爾集中,並以部分兵力前來增援布呂歇爾右翼。這位皇帝所以如此消極,是因為他把希望寄托在夏提榮會議的和談¹⁹⁹上;他成功地使和談開始了,他指望利用和談贏得時間。果然,主張同拿破侖進行外交談判的人們在西里西亞軍團同主力軍團會師以後,堅持在會議進行和談期間只要裝裝打仗的樣子就行了。施瓦爾岑堡公爵為此曾派遣一名軍官謁見布呂歇爾,以便取得他的同意,而布呂歇爾讓軍官帶回的答復如下:

“我們必須向巴黎進軍。拿破侖曾拜訪了歐洲各國的首都,我們豈能失禮?簡單地說,他必須退位。不推翻他,我們就不能安心。”

布呂歇爾堅決地指出,假如在拿破侖還沒有能夠把他的其餘部隊調來的時候就在布里恩附近向他進行攻擊,同盟國軍就可以獲得很大的優勢,並且他親自承擔這一任務,只要在約克軍未來之前能夠得到援軍。貧瘠的奧布河谷無法供養軍隊,若不前進,必得後退,——這個理由使他的建議占了上風。於是決定發起會戰,但是,施瓦爾岑堡公爵沒有率領他手下的聯合部隊向敵人進攻,只將維爾騰堡王儲軍(4萬人)、居萊軍(12 000人)和弗雷德軍(12 000人)配屬給布呂歇爾。另一方面拿破侖却什麼也不知道,並且也沒有懷疑過主力軍團的來到。2月1日下午1時左右向他報告布呂歇爾已經進攻時,他竟不願相信。在查明情況屬實後,他騎上馬打算避開會戰,並給貝爾蒂埃作了相應的指示。但是,當他在布里恩-拉-維伊和羅提埃爾之間追上新近衛軍²⁰⁰時(新近衛軍在聽到

越来越近的炮声后已作好了战斗准备),他受到了近卫军的狂热欢迎,于是他决定利用这种情绪,就高呼«L'artillerie en avant!»[“炮兵,前进!”]。这样,4时左右在拉罗提埃尔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但是,在初次失利后拿破仑就没有再亲自参加战斗。他的步兵冲入了拉罗提埃尔村,开始了持久而顽强的战斗,以致布吕歇尔不得不调来自己的预备队。只是到夜间11时,拿破仑在伤亡了4000—5000人,被俘2500人,损失火炮53门之后,命令军队退却时,法军才被逐出该村。这时同盟国军队距离巴黎仅仅六日行程,如果全力挺进,则拿破仑必然抵挡不住同盟国军队巨大的优势兵力。然而君主们却仍然怕妨碍拿破仑在夏提荣会议上媾和,竟让主力军团总司令施瓦尔岑堡公爵利用种种借口避免采取坚决的行动。

当拿破仑命令马尔蒙朝朗律特方向前进,返回奥布河右岸,而他自己则侧敌行军退向特鲁瓦的时候,同盟国军队分成了两个军团:主力军团和西里西亚军团。主力军团开始缓慢地向特鲁瓦前进,而西里西亚军团向马尔纳河进发。布吕歇尔预计在马尔纳河同约克军以及兰热朗和克莱斯特两个军的一部分会合,这样,他的兵力总共可以增到5万人左右。布吕歇尔的计画是追击这时到达马尔纳河下游的麦克唐纳元帅,直捣巴黎,而施瓦尔岑堡则应在塞纳河箝制法军的主力。但是,拿破仑看出同盟国军队不懂得如何利用既得胜利,同时深信自己在同盟国的主力军团能向巴黎方向深入之前来得及返回塞纳河,便决定猛攻较薄弱的西里西亚军团。因此,拿破仑把维克多和乌迪诺率领的一支2万人的部队留下对付10万人的主力军团,自己则率莫尔蒂埃和奈元帅两个军共4万人向马尔纳河方向进发,在诺让附近又带上马尔蒙军,于2

月9日率領这支联合部队进抵塞臧。与此同时，布呂歇爾沿通往巴黎的小道經圣烏昂和索姆皮伊前进，2月9日将他的大本营設在韦尔杜小鎮上。他的兵力部署如下：約1万人在大本营附近；約克率18000人在多尔芒至梯叶里堡之間，追击沿埃佩尔訥至巴黎的驛道退却的麦克唐納；薩肯率3万人在蒙米賴至茹瓦尔河岸拉費尔特之間，防止塞巴斯提昂尼的騎兵同麦克唐納会合，切断麦克唐納通往茹瓦尔河岸拉費尔特渡口的道路；俄国奥尔苏費也夫將軍率5000人把守尙波貝尔。这种錯誤的兵力部署，使得西里西亞軍团 en échelon [层层] 分散在漫长的战綫上，这是布呂歇爾出自两个彼此矛盾的动机的結果。一方面，他力图切断麦克唐納的道路，不让他同塞巴斯提昂尼的騎兵会合；另一方面，他想把克萊斯特和卡普策維奇两个軍編入自己的序列，因为这两个軍已从夏龙出发，預計在9日或10日同他会合。一个动机促使他放慢步伐，另一个动机却促使他急速前进。

2月9日，拿破侖在尙波貝尔攻击奥尔苏費也夫，并击潰了他。当时克萊斯特和卡普策維奇两个軍已到达，但大部騎兵未到，布呂歇爾即率領这两个軍向奉拿破侖的命令开来的馬尔蒙进攻，并在后者向拉費尔-尙佩努瓦茲退却时跟踪追击，但在获悉奥尔苏費也夫潰敗的消息后，于当夜率領他的两个軍返回伯热尔，以便在这里掩护通往夏龙的道路。2月10日，薩肯在战斗获得胜利以后，在特里耳波尔附近把麦克唐納逐过馬尔納河，但当日夜間听說拿破侖进攻尙波貝尔后，即于11日仓卒向蒙米賴后退。当他还没有到达蒙米賴时，就不得不在維厄-梅宗展开战斗队形，来对抗这位从蒙米賴方向迎面而来的皇帝。薩肯在同約克会合前即被击败，損失惨重。两位將軍在維福尔会合，2月12日退到梯叶里堡，在該

地約克被迫进行了后卫战，遭到重大損失，这以后就退到于烏希-拉-維耳。拿破侖命令莫尔蒂埃沿菲姆大道追击約克和薩肯后，13日进抵梯叶里堡。2月11日和12日，布呂歇尔因不知約克和薩肯的确实位置和战斗結果，便在伯热尔靜观在埃托日占領陣地与他对抗的馬尔蒙的动态。13日他获悉两位將軍失敗的消息后，推測拿破侖已去寻找主力軍团作战，并誤认馬尔蒙为拿破侖的后卫，因而一心想吞食馬尔蒙。布呂歇尔进到尚波貝尔，他迫使馬尔蒙退往蒙米賴；2月14日拿破侖在該地同馬尔蒙会合；这时，拿破侖便轉而对付布呂歇尔，中午在沃尚附近同他遭遇；当时布呂歇尔有2万人，但几乎没有騎兵。拿破侖向他进行了攻击，以騎兵包圍了他的纵队，以巨大的代价将他击回尚波貝尔。西里西亞軍团在从尚波貝尔退却时，本来可以在天黑前不受到特別的損失就到达埃托日，可是布呂歇尔却有意緩慢地退却而自找苦吃。因此他在整个退却过程中不断地遭到攻击，而且他的一支部队——普魯士亲王奥古斯特师——在經過埃托日时再次被沿着該城兩側街道运动的敌人所包圍。近午夜时分，布呂歇尔才到达伯热尔的营地，休息数小时后即向夏龙进发，2月15日将近正午时到达夏龙。16日和17日，約克和薩肯的部队先后同他会师。在尚波貝尔、蒙米賴、梯叶里堡、沃尚、埃托日等地的各次零星的战斗中，布呂歇尔共損失15 000人和27門火炮。对于造成这种失敗的战略上的失策，完全应由格奈澤瑙和繆弗林負責。

拿破侖留下馬尔蒙和莫尔蒂埃对付布呂歇尔后，帶領奈元帅以强行軍返回塞納河（施瓦尔岑堡在这里迫使維克多和烏迪諾退过了耶尔河），并在該地将麦克唐納率領的12 000人及从西班牙調来的一些增援部队編入自己的軍隊。2月16日，同盟国軍因拿

拿破侖突然出現而感到措手不及。17日拿破侖的軍隊隨後開到。拿破侖同他的元帥們會師後，急促地發起了對施瓦爾岑堡的攻擊，當時施瓦爾岑堡正佔領以諾讓、蒙特羅和桑城為依托的一個大三角形的陣地。施瓦爾岑堡公爵在他所屬的將領維特根施坦、弗雷德和維爾騰堡王儲一一為拿破侖擊敗後，轉身逃跑，退到特魯瓦，並通知布呂歇爾，請他會合，以便共同在塞納河同拿破侖會戰。布呂歇爾這時已獲得新增援的部隊，當即表示同意；2月21日他進抵梅里，22日整天在那里等待關於約定的會戰的命令。晚上他得知通過利希頓施坦公爵已向拿破侖提出休戰建議，但遭拿破侖堅決拒絕。布呂歇爾立即派遣一名信使到特魯瓦，懇請施瓦爾岑堡出戰，甚至表示願意親自出動，只要主力軍團同意作為後備隊即可。但是施瓦爾岑堡得知奧熱羅把布伯納將軍逐到瑞士，就更加驚慌而下令向蘭格爾退却了。布呂歇爾當時立刻認識到向蘭格爾的退却必將導致向萊茵河對岸的退却，而為了把拿破侖引開，不讓他去追擊士氣沮喪的主力軍團，便決定再次直接向巴黎方向進軍，向馬爾納河挺進；在那里他這時可以指望聚集10萬人的軍隊，因為文秦格羅迭已率領25000人進抵蘭斯郊區，畢洛夫率領16000人開向郎城，克萊斯特軍的殘部可從愛爾福特開來，蘭熱朗軍的殘部由聖普里指揮，可從美因茲城附近開來。

正是布呂歇爾再度離開主力軍團的這一行動決定了拿破侖的命運。假如拿破侖開始去追擊退却的主力軍團，而不去攻擊前進的西里西亞軍團，那末同盟國軍就會遭到失敗。2月24日，布呂歇爾在拿破侖尚未前來攻擊他的時候，在昂格呂爾架設浮橋渡過奧布河，完成了他進軍途中唯一的艱巨任務。拿破侖派遣烏迪諾和麥克唐納率領約25000人尾追主力軍團後，在2月26日同奈元

帅和維克多一起离开了埃尔比斯去追击西里西亚軍团。这时，主力軍团面前只有两个元帅，施瓦尔岑堡按照布呂歇尔的建議停止了退却，鼓起了勇气，轉身攻击烏迪諾和麦克唐納，并在2月27日和28日击败了他們。布呂歇尔企图将自己的軍队集中在尽可能靠近巴黎的某个地方。馬尔蒙率領他的部队仍然駐在塞臧，而莫尔蒂埃則在梯叶里堡。当布呂歇尔逼近时，馬尔蒙就退却了，于26日在茹瓦尔河岸拉費尔特附近与莫尔蒂埃会合，一同退到莫市。布呂歇尔接連两日企图渡过烏尔克河，将战綫大大地向前推进，迫使两个元帅同他会战，但是都沒有成功，于是不得不沿着烏尔克河右岸前进。3月2日，到达烏希-勒-夏托，3月3日晨获悉毕洛夫和文秦格罗迭已迫使苏瓦松城的法軍投降，布呂歇尔即于当日渡过安納河，而把自己的全部軍队集中在苏瓦松附近。拿破侖在茹瓦尔河岸拉費尔特渡过馬尔納河后，距离布呂歇尔有两昼夜强行軍的路程，即向梯叶里堡和菲姆方向前进，在他的一支部队再度攻占兰斯后渡过了韦耳河，并于3月6日在貝里-奧-巴克渡过安納河。布呂歇尔本来打算在拿破侖渡安納河后，在河的对岸同他会战，并为此調集了軍队。可是当他得知拿破侖向菲姆和貝里-奧-巴克进发，企图从左側迂迴西里西亚軍团时，即决定布成斜角陣势，一俟拿破侖走出貝里-奧-巴克峽谷，立刻从克朗向他的翼側攻击，迫使他在背后仅有一条隘路的情况下出来作战。布呂歇尔在从苏瓦松到克朗的中途以右翼依托安納河、左翼依托累特河部署好兵力后，获悉文秦格罗迭竟让拿破侖于6日順利通过了貝里-奧-巴克，后者甚至还派遣了一支部队沿大道向郎城挺进，于是便放棄了这一卓越的計劃。这时，布呂歇尔认为除郎城外在任何地点都不宜进行决战。

拿破侖如果从兰斯出发沿着公路經科尔貝尼，就能像从克朗出发的西里西亚軍团那样迅速地到达郎城，因此，布呂歇尔为了阻碍拿破侖，便将沃龙佐夫軍配置在安納河与累特河之間設有坚固陣地的克朗台地上，同时，派文秦格罗迭率騎兵 1 万人經費特厄向科尔貝尼方向进发，当拿破侖一开始向沃龙佐夫进攻，就立刻攻击拿破侖的右翼和后方。然而，文秦格罗迭沒有完成規定的任务，因此拿破侖在 3 月 7 日将沃龙佐夫逐出了台地，不过他自己損失了 8 000 人，而沃龙佐夫損失 4 700 人，却未潰敗，秩序井然地退却了。3 月 8 日，布呂歇尔在郎城附近集中了自己的軍队，而郎城会战应当决定两軍的命运。除西里西亚軍团在数量上占优势外，郎城前面广闊的谷地也特別便于該軍 2 万騎兵展开；同时，郎城本身位于一座山崗的平頂上，四周坡度为 12、16、20、30 度不等，山麓有四个村庄，無論对于进攻或是防御，地形都十分有利。这一天，拿破侖亲自指揮的左翼法軍的进攻被击退了，而馬尔蒙指揮的右翼法軍在入夜后露营时遭到了奇襲和严重的失敗，以致一直退到菲姆，这位元帅才制止了自己軍队的逃窜。拿破侖及其总数仅为 35 000 人的左翼軍完全陷于孤立，被困在不利的陣地上，看来应当在为胜利所鼓舞的、拥有相当优势兵力的敌人面前投降了。但是，次日晨布呂歇尔突患寒热病，双目发炎，不能指揮作战，而拿破侖仍然在原先的陣地上摆出挑战的姿态。这吓坏了当时指揮作战的將領，他們不但停止了已开始的进攻，而且还让拿破侖在夜間安然撤向苏瓦松。

虽然如此，郎城会战却損伤了拿破侖的兵力和士气。3 月 13 日，他企图偷襲落入圣普里手中的兰斯城，以恢复原态势，但沒有成功。这时，他的处境已显而易见，因此当他在 3 月 17 日和 18 日

向奥布河岸阿尔西的主力軍团进攻时，甚至施瓦尔岑堡本人也不顾自己只有不足 8 万人的兵力可用以对抗拿破侖指揮的 25 000 人，而敢于停下来进行会战，这个会战到 3 月 20 日和 21 日仍在繼續。当拿破侖停止会战时，主力軍团尾追至維特里，并在他的后面同西里西亚軍团会师。拿破侖在絕望中采取了最后的手段——退到圣迪济埃，企图用这种方法以他的一小撮兵力切断同盟国軍隊的主要交通綫及兰格尔与肖蒙之間的退路，来威胁龐大的同盟国軍隊。同盟国軍隊以直取巴黎回答了这一行动。3 月 30 日，战斗在巴黎近郊发生了，西里西亚軍团猛攻蒙馬特尔。布呂歇尔自郎城会战患病以来虽然尚未复原，但他还是騎在馬上，遮住眼睛以免阳光刺激，短时地亲临戰場督战，而在巴黎城投降以后，就辞去了总司令的职务。他辞职的借口是患病，但真正的原因是：不隱諱自己对法国人的仇恨的布呂歇尔，不同意同盟国君主們认为需要采取的装样子的外交手腕。因此，3 月 31 日布呂歇尔是以私人身分来到巴黎的。在整个 1814 年战局中，他是同盟国軍隊中唯一力主进攻的人物。他以拉罗提埃尔会战打破了夏提荣妥协派的計劃，继而在梅里表現了果断精神，把同盟国軍隊从毁灭性的退却中救了出来，最后又以郎城会战預定了巴黎的第一次投降。

在締結第一次巴黎和約²⁰¹后，布呂歇尔伴随亚历山大皇帝和普魯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訪問了英国，在那里人們把他当做一位当代英雄来欢迎它。他受到了許多奖賞，获得了欧洲的一切战功勛章。普魯士国王特为他制作了铁十字勳章；英国摄政王^①将自己的肖像贈送給他，牛津大学授予他教会法和民法博士学位。

① 乔治。——編者注

1815年布呂歇爾再次決定了对拿破侖最后一次战争的結局。布呂歇爾虽然已經73岁,但在6月16日利尼会战中遭受惨败后,仍能收拾殘軍,重整旗鼓,尾随拿破侖之后前进,因而能于6月18日傍晚出現在滑铁卢戰場上。这是战史上空前的功績。滑铁卢会战后,布呂歇爾将逃竄的法軍从滑铁卢一直追击到巴黎,这在以往只有过一次类似的情况,即拿破侖曾同样出色地将普軍从耶拿一直追击到施特廷。这次,布呂歇爾是亲率他的軍队进入巴黎的,他甚至还任命了他的副參謀长繆弗林为巴黎的軍事总督。布呂歇爾曾竭力主張枪决拿破侖,炸毀塞納河上的耶拿桥,以及将法軍从欧洲各国首都劫夺来的珍宝归还原主。他的第一个願望遭到威灵頓的阻撓,第二个願望遭到同盟国君主們的阻撓,仅仅最后一个願望才得到了实现。他在巴黎居住了三个月,常常出現在賭桌旁玩«rouge et noir»^①。在卡茨巴赫河会战周年紀念的时候,他訪問了故乡罗斯托克城,該城居民集資为他树立了一座紀念碑。布呂歇爾逝世时,全普魯士軍队哀悼8天。

拿破侖把布呂歇爾称为 *Le vieux diable* [老鬼],西里西亚軍团的俄国兵給他起了一个“前进元帅”的綽号。其实,布呂歇爾是一位騎兵將軍。他在騎兵专业方面是出类拔萃的,因为这門专业只要求有战术技巧,并不需要有战略知識。他与民众同样地仇恨拿破侖和法国人,由于他对庶民抱有同情心,有健全的理智,作風朴实,談吐粗魯,而在必要場合也善于慷慨陈詞,所以在群众中享有威望。他是一名模范軍人。在战斗中无比英勇,在需要緊張的时候,他不知疲倦;他在普通士兵中有强烈的影响;他既有非凡的

① “紅与黑”(一种紙牌賭博)。——編者注

勇敢，又善于細致地判断地形，危急中能当机立断，在防御中沉着頑强，在进攻时勇猛坚决；遇到較简单的情况，他具有足够的智慧来独立确定正确的行动方式，遇到較复杂的情况，則依靠格奈澤瑙，——因此，对于 1813—1815 年带有半正規半游击战争性质的战斗行动來說，布呂歇尔是最合适不过的将領了。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57 年
9 月 22 日—10 月 30 日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載于“美国新百科全书” 1858 年版
第 3 卷

弗·恩格斯 炮 兵

現在几乎所有的人都承认，发明火药并用它朝一定方向抛射重物的，是东方国家。在中国和印度，土壤中含有大量的天然硝石，因此很自然地，当地居民早就了解了它的特性。在中国，还在很早的时期就用硝石和其他引火剂混合制成了烟火剂，并把它使用在軍事上和盛大的典礼中。我們沒有資料說明，究竟在什么时候人們知道用硝石、硫磺和木炭配成一种特殊的混合物，这种混合物因其爆炸性而具有重大的意义。据帕拉韦先生 1850 年在法国科学院的一个报告²⁰²中所引证的中国某些編年史資料看来，在公元前 618 年就有了火炮；在中国古代的其他史料中，記載着用竹筒发射的燃燒性火器以及类似爆炸彈的火器。但不管怎样，火药和火炮在軍事上的应用，看来在中国早期並沒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因为只是到公元 1232 年才确实第一次大量使用它們，当时被蒙古人圍困在开封府的中国人，曾使用了抛射石彈的火炮来抵御敌人，并且还使用了爆炸性火器和其他利用火药的火器。

根据希腊著作家埃利安努斯、克提西阿斯、菲洛斯特拉特和泰米斯提烏斯提出的证据，印度人似乎在亚历山大大帝时代就已在軍事上使用某种烟火剂。这种烟火剂虽然含有大量硝石，但絕不是火药。在印度法典中大概有关于某种火器的說明；其中无疑地

曾提到火药,而按照霍·海·威尔逊教授的说法,在印度古代的医书中载有火药的配方。但是,关于火炮的最初记载,在时间上几乎和已确凿证实的中国最早出现火炮的时期完全一致。大约写于1200年的哈泽德诗篇中,曾提到实心弹发射器,它的响声在10考司(1500碼)內可以听到。我們曾讀到,德里統治者大約在1258年使用过車子炮。一百年以后,印度已广泛使用火炮,在1498年葡萄牙人到印度的时候,发现印度人在使用火器方面竟和他們一样先进。

阿拉伯人从中国人和印度人那里学会了提取硝石和制造烟火剂。在阿拉伯人对硝石的叫法中,有两种叫法的意思就是**中国盐**和**中国雪**。古代阿拉伯的著作家曾提到“中国紅火和白火”。阿拉伯开始使用纵火器的时期几乎也就是他們大举侵入亚洲和非洲的时期²⁰³。拜占庭的希腊人最初从他們的敌人阿拉伯人那里学会制造烟火剂(以后发展成为“希腊火”),这一事实是不容怀疑的,至于maujanitz——据傳說是穆罕默德所知道和使用的一种几乎神話般的火器——則更不用說了。九世紀的著作家馬可·格雷克提到一个配方——六分硝石、二分硫磺、一分木炭,这和真正的火药成分是非常近似的。²⁰⁴在欧洲的著作家中,罗吉尔·培根大約在1216年在他的“論魔法的荒誕”²⁰⁵一书中最先提出了相当精确的火药配方,但是在这以后整整一百年,西方各国还不知道使用火药。阿拉伯人看来很快就丰富了从中国人那里得到的知識。根据孔代所写的“摩尔人在西班牙的历史”,在1118年薩拉哥沙圍攻战时期就使用火炮了,而在1132年,西班牙除制造其他火炮外还鑄造了四磅长炮。²⁰⁶大家知道,1156年阿布德-艾尔-穆敏利用火器夺取了阿尔及利亚崩港附近的穆罕默迪亚,而在次年利用发射箭矢和石

块的火器击退了卡斯提尔人，守住了西班牙的涅布拉城。如果說阿拉伯人在十二世紀使用的发射器的特点至今还不清楚的話，那末下列事实却是不容置疑的，即在1280年已使用火炮攻打哥多瓦，而到十四世紀初火炮的知識就由阿拉伯人傳給了西班牙人。1308年，斐迪南四世利用火炮夺取了直布罗陀。1312年和1323年在巴薩、1326年在馬尔托斯、1331年在阿利康特的强攻中都使用了火炮；在上述圍攻战中几次火炮还发射了燃燒彈。使用火炮的知識又从西班牙人那里傳到欧洲其他国家。法国人在1338年圍攻吉約姆山时使用了火炮，同年，普魯士的德意志騎士²⁰⁷也使用了火炮。到1350年，火器已流傳到西欧、南欧和中欧各国。火炮起源于东方这一点，还可以从欧洲最古的火炮的制造方法中得到证实。那时，火炮是用鍛铁条焊成圓筒、外面用大铁箍箍紧而制成的。火炮由几部分组成，可拆卸的炮尾部是在射击时待火炮装填完毕后才装在炮筒上的。中国和印度最古的火炮也完全是这样制造的，它們同欧洲最古的火炮屬於同样早的年代，甚至更早。大約到十四世紀，不論是欧洲的或是亚洲的火炮，构造都非常簡陋，这說明炮兵当时还处在幼年时代。这样，火药的发明及其用于火器上的時間虽然还不能肯定，但是我們至少可以确定它最初成为軍事上的重要因素的時間；在十四世紀，不論什么地方的火炮都很笨重，这說明那时的火炮还剛剛开始作为常备武器。欧洲十四世紀的火炮是很笨重的。大口徑火炮只有拆卸成几部分才能搬运，而且每一部分要占用一辆馬車。甚至小口徑火炮也異常笨重，因为那时还不知道火炮和炮彈之間以及炮彈和装药之間的正确比重。火炮放置在陣地上时，还要为每門火炮設置一个木架或垫板之类的东西，以便将火炮架在上面射击。根特城內有一門炮，連同

它的墊板，共長 50 英尺。當時人們還不知道炮架。在大多數場合下，火炮和我們現在的臼炮一樣，是以很大的射角進行射擊的，因此在使用爆炸彈以前，射擊效果一直是很小的。火炮通常發射球形石彈，而小口徑火炮有時則發射鐵箭。雖然火炮有上述缺點，但是它不僅在攻城和守城時使用，而且在野戰中和軍艦上也使用。早在 1386 年，英國人就繳獲了兩艘裝備有火炮的法國軍艦。如果以“瑪麗-玫瑰號”（於 1545 年沉沒）上取下的火炮為例，那就可以看出，這些最初的艦炮架設在特制的木座上，並且固定在上面，因此不可能有不同的射角。

在十五世紀，火炮的構造和使用都有了很大的改進。火炮開始用生鐵、銅或青銅鑄造。可拆卸的炮尾部逐漸被淘汰，這時火炮已鑄成一個整體。最好的鑄造廠是在法國和德國。法國人還首先嘗試在攻城時把火炮調到前面，在掩護下架炮。約在 1450 年出現了類似塹壕的工事，不久畢羅兄弟便建立了第一批破城炮隊；法國國王查理七世依靠這些炮隊在一年內就把英國人以前奪去的全部要塞奪了回來。但是作了最大改進的是法國國王查理八世。他徹底取消了可拆卸的炮尾部，開始鑄造完整的青銅火炮，採用了炮耳軸和帶車輪的炮架，並且只使用生鐵實心彈。他還統一了火炮的口徑，通常把較輕的火炮用於野戰。在這些火炮中，雙管炮裝置在用 35 匹馬牽引的四輪炮架上，其餘的火炮則裝置在用 2 匹到 24 匹馬牽引的雙輪炮架上，炮架尾部拖在地上。每門火炮都固定有一組炮手，炮兵勤務有了專門的組織，這就使野戰炮兵第一次成為一個特殊的兵種。小口徑火炮相當靈便，在作戰時可以和其他部隊一起移動，甚至不會落在騎兵的後面。正是這一新的兵種保證查理八世在意大利取得了驚人的勝利。當時意大利的火炮仍然用

犍牛馱运，由几个部分组成，在选定了陣地以后还得架設在垫板上；它們发射石彈，一般都很笨重，因此法国人一小时发射的炮彈比意大利人一整天发射的还要多。法国人依靠野战炮兵取得了胜利的福尔諾沃会战（1495年）²⁰⁸，震动了整个意大利，于是这一新兵种便被认为是无敌的。馬基雅弗利的著作“兵法”²⁰⁹，就是专门論述如何巧妙地配置步兵和騎兵以防止这个新兵种的杀伤的。查理八世的继承者路易十二和弗朗斯瓦一世繼續改进自己的野炮，并使它們更加輕便。弗朗斯瓦把炮兵組成一个特殊部門，屬炮兵总监指揮。他的野炮在馬利尼亚諾会战（1515年）中粉碎了一向无敌的、人数众多的瑞士长矛队；它們从一个翼側陣地迅速轉移到另一个翼側陣地，就这样决定了会战的結局。中国人和阿拉伯人知道爆炸彈的制造和使用方法，这方面的知識可能就是从他們那里傳到欧洲各国的。但是在欧洲开始使用这种炮彈和臼炮（現在臼炮就发射这种炮彈）仍然不早于十五世紀下半叶；一般认为这种炮彈和炮的采用应归功于里米尼的长官龐多尔福·馬拉特斯塔。最初的爆炸彈是两个空心的金屬半球体旋在一起制成的；鑄造整个的空心爆炸彈的方法只是以后才发明的。

查理五世皇帝在野炮的改进方面并不落后于他的对手法国人。他采用了前車，这样两輪炮架在轉移时就成为四輪炮車，有利于更快地运动和通过起伏地。例如，在1554年的朗蒂会战²¹⁰中，牵引这些輕炮的馬匹就是跑步前进的。

关于炮兵以及炮彈飞行問題的理論研究，也是在这个时期开始的。人們认为意大利人塔尔塔利亚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 *in vacuo* [在真空中] 45度的射角可使炮彈达到最大的飞行距离。西班牙人科耳亚多和烏凡諾也进行了类似的研究。这就奠定了炮兵

学的理论基础。几乎在同一时候，万諾乔·比林古乔对鑄造技术的研究（1540年），大大改进了火炮的制造法，而哈特曼又发明了口径比例表，用它可以按火炮各部分与炮口径的比例去计算火炮各部分的尺寸，这就为火炮的构造提出了一定的标准，并为制定可靠的理论原则和以经验为基础的一般规则开辟了道路。

火炮改进的最初结果之一，是筑城法的彻底变革。从亚述和巴比伦王朝时代以来，筑城法只有很小的发展。但是，当时新式火炮已能在旧式石墙的任何地方打开缺口，因此就需要发明一种新式工事。防御工事的构造应当使暴露于围攻者火炮平射火力之下的石质部分尽量减少，并使强大的火炮能够配置在土堤上。旧式石墙被仅用石块做复盖的土堤代替，而不大的侧防塔楼则改为大的五角棱堡。工事上的一切石砌部分，开始逐渐得到外圍土质工事的掩护，以免受到敌人的平射火力；到十七世纪中叶，要塞防御手段又胜过了进攻手段，直到沃邦再度使后者占居优势为止。

在这以前，装填的方法是直接把散装的火药填入火炮。大约在1600年，开始使用药包，即装有定量火药的粗麻口袋。这样，装填所需的时间就大大缩短，并且由于装药量更加一致而保证了更大的射击精度。大约在同一时期，还有另一项重要的发明，即鏈式霰弹和普通霰弹的发明。而能用来发射空心弹的野炮，也是在这一时期制造出来的。在西班牙对尼德兰的战争²¹¹时期进行的多攻，大大促进了防守和攻击要塞用的火炮的改进，特别是促进了臼炮和榴弹炮、爆炸弹、燃烧弹和炽热的实心弹的使用方法的改进，以及点火具和其他的军用烟火器材的制造方法的改进。十七世纪初，人们还使用着各种口径的火炮——从四十八磅炮到口径最小的、只能发射半磅实心弹的鷹炮。野炮虽然有了许多改进，但

毕竟还很不完善，因此必须有所有上述各种口径的火炮，才能大致上取得我们今天用少量六磅到十二磅中口径火炮所达到的效果。那时，小口径火炮灵便，但是威力小；大口径火炮威力很大，但是不灵便；而中口径火炮无论就威力或灵活性而言都不足以完成所有的任务。因此，当时保留了各种口径的火炮，并且把不同的火炮编在一起，每个炮兵连通常拥有常用的各种口径的火炮。火炮的射角用高低楔来确定。炮架仍和以前一样笨重，当然，每种口径的火炮仍需要有专门的炮架，所以在战场上几乎不可能携带备用的车轮和炮架。车轴是木制的，其尺寸根据火炮的口径而定。而且同一口径的火炮及其炮架的大小也都不一样，因为各地还保留着许多旧式火炮，此外，一个国家中不同工厂制造的火炮在构造上也不相同。药包仍然只用于要塞炮；而在战场上是用小锤将散装火药装进火炮，然后再装上药塞和炮弹的。点火孔内也要装填散装火药。整个装填过程非常缓慢。炮匠不算作正规军的兵士，他们组成一个特殊的行会，招收学徒，并且宣誓不泄露本行的秘密。当战争爆发时，作战双方都尽可能招募更多的、比平时要多得多的炮匠。招募来的每个炮匠或炮手指挥一门火炮，配有一匹乘马和一个学徒，并按他要求的数量配备专业助手，而搬运重炮所需的人员还不包括在内。炮手的报酬比兵士多三倍。当战争爆发时，炮兵用的马匹由承包人供给，承包人还按照合同提供挽具和驭手。在会战中，火炮成一线配置在阵线前面，这时火炮从前车上卸下，马匹则卸套；接到前进的命令时，火炮架上前车，套上马前进；口径较小的火炮在短距离内有时就用人力转移。火药和炮弹用另外的车辆运送；前车上还没有弹药箱。移动、装填、装导火药、瞄准和射击，所有这些操作过程从我们现代的观点看来都是极端缓慢的，而

且在技术这样不完善、对于炮兵学几乎完全缺乏科学研究的条件下，命中率必然是很小的。

在三十年战争时期，古斯塔夫-阿道夫攻入德国，标志着炮兵学的巨大进步。这位伟大的统帅取消了口径过小的火炮，最初代之以他的所谓蒙皮炮，即用绳子和皮革包扎着的轻锻铁管。这种炮只用来发射链式霰弹，这样，链式霰弹就第一次用于野战；而在这以前，链式霰弹只用来保卫要塞的壕沟。古斯塔夫-阿道夫除了链式霰弹和普通霰弹外，还在自己的野战炮兵中使用了药包。由于蒙皮炮不够坚固，后来就代之以生铁制的四磅轻炮，它的长度是口径的16倍，加上炮架共重6英担，用双马牵引。每个步兵团配有这种炮两门。这样，由于用新式火炮代替了口径虽小但比较笨重的旧式火炮，就出现了团炮，它在许多国家的军队中一直保持到本世纪初。团炮最初只用来发射霰弹，但是很快也能用来发射球形实心弹了。重炮则单独编为强大的炮兵连，在军队翼侧上或中央前占据有利的阵地。这样，轻炮和重炮的这种区分和炮兵连的编成，奠定了野战炮兵战术的基础。瑞典炮兵总监托尔斯顿森将军大大推动了这些革新，由于这些革新，野战炮兵第一次成为一个独立的兵种，遵循着它自己特殊的用于战斗的原则。大约也在那时，还有两项重要的发明。约在1650年发明了水平调整螺杆，它使用到格里博瓦尔时代；约在1697年，开始采用装满火药的管子作为起爆管，以代替点火孔内的散装火药，这样，瞄准和装填过程都简便多了。另一个重大的改进是发明了近距离内转移火炮用的牵引索。在十七世纪，战场上使用的火炮数量很多。在格累芬哈根会战中，古斯塔夫-阿道夫率领2万名兵士，共有火炮80门，在奥得河畔法兰克福会战中，18000名兵士共有火炮200门。²¹²

在路易十四战争时期，拥有 100—200 門火炮是通常的現象；在马尔普拉克会战²¹³ 中，作战双方都有近 300 門火炮；这在当时說来是在一个战场上集中的火炮的前所未有的最大数量。这一时期在野战中使用臼炮是相当經常的。法国人仍然保持了在炮兵方面的优势。他們在 1671 年建立了炮兵团，規定了不同的軍官职务和等級，从而首先廢除了旧的行会制度，把炮匠編入軍队作为基干兵。这样一来，这部分武装力量就被认为是一个独立的兵种，而它的軍官和兵士的訓練也就由国家掌管了。1690 年，法国創辦了一所炮兵学校，它至少在成立后的五十年內是世界上唯一的炮兵学校。1697 年，圣雷米出版了一本炮兵学手册²¹⁴，这在当时是一本很好的书。但是，由于炮兵方面的“秘密”仍然保守得非常严，因此其他各国进行的許多改革，法国还不知道；而且欧洲各国的火炮构造和炮兵編成也有很大区别。例如，荷兰发明的榴彈炮，到 1700 年已为大多数国家的軍队所采用，但是法軍还没有装备这种火炮。拿騷的摩里茨伯爵首先采用的装置在前車上的彈药箱，法国并不知道，而其他各国也很少采用。因为火炮、炮架和前車都过于笨重，已經无法再加上彈药的重量了。口径最小的火炮，包括三磅炮在內，实际上已不用了，但是法国还没有輕型的团炮。在上述各时期，火炮装药一般都很重，最初装药和实心彈的重量是一样的。虽然当时火药的质量不好，但是这些装药产生的力量仍然比現在用的装药所产生的力量大得多。这就是火炮笨重的主要原因之一。为了經受住这种装药的爆炸作用，青銅加农炮的重量往往是炮彈重量的 250—400 倍。但是，加农炮的重量必須減輕，这就要求把装药逐渐减少；大約到十八世紀初，装药的重量通常就只有炮彈重量的一半了。臼炮和榴彈炮的装药量視目标距离而定，通常都

不大。

在十七世紀末和十八世紀初，大部分国家的炮兵都編入了军队，失去了中世紀的行会性质，被认为是一个特殊的兵种，因此也就有了正常的和迅速的发展的可能。結果，几乎立即有了非常显著的改进。火炮的口徑和种类既杂乱又繁多，一切已有的、凭經驗得来的規則并不可靠，而确定不移的原則又根本沒有，这种种情况这时已引起人們注意，并且再也不能容忍了。因此，到处都大規模地进行試驗，试图确定：各种口徑的火炮的作用；口徑同装药量、同火炮重量及火炮长度的关系；火炮各部分金屬重量的比例；射程以及后座力对炮架的作用等等。在1730—1740年这一时期，貝利多尔在法国拉費尔，罗宾斯在英国以及帕帕契諾·丹东尼在都灵都領導了这种試驗。結果，火炮的口徑大为統一，火炮各部分的金屬重量的比例更加适当，装药量普遍减少，装药的重量是炮弹重量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在发展炮兵学原理方面，也取得了像上述改进那样大的进步。伽利略奠定了拋物綫理論的基础，他的学生托里拆利以及安德森、牛頓、布朗德尔、別尔努利、沃尔弗和欧勒等人則进一步研究了炮弹的飞行、空气的阻力和炮弹偏差的原因。上述这些炮兵实驗家对炮兵学中数学方面的发展也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在弗里德里希大帝时代，普魯士的野炮又一次大大減輕了。团屬短管輕炮的长度不超过口徑的14倍、16倍或18倍，重量是炮弹重量的80—150倍；在当时主要由步兵火力决定战斗結局的情况下，这样的輕炮被看做是具有足够射程的火炮。因此，这个国王便按照上述长度和重量方面的比例改造了他所有的十二磅炮。奥地利人在1753年仿效了这种做法，其他大多数国家也这样做了；

但是弗里德里希自己却在他統治的后半期又用强大的长管炮装备了預备队炮兵，因为萊滕会战的經驗使他相信了这种炮的火力的优越性。弗里德里希大帝让自己的一部分炮兵連的炮手乘馬，从而建立了騎炮兵这样一个新的兵种，騎炮兵用来支援騎兵，就像步炮兵用来支援步兵一样。这一新兵种具有很大的威力，因而很快就被大多数国家的軍队所采用；在某些国家的軍队，如奥地利軍队中，炮兵不是乘馬，而是乘在一种特制的車輛上。在十八世紀，各国軍队的火炮数量还是很多的。弗里德里希大帝拥有的火炮数量是：1756年在7万名兵士中有206門，1762年在67 000名兵士中有275門，1778年在18万名兵士中有811門。这些火炮除团炮随各营行动外，都編成大小不同的炮兵連，每个炮兵連有6至20門火炮。团炮随同步兵一起前进，而炮兵連則在选定的陣地上进行射击，有时还前进到下一个陣地，但是通常就停在这里，直到会战結束。在运动性方面，这些火炮都还远不能令人滿意，庫奈斯多夫会战之所以失敗，就是因为不能在决定性时刻把火炮調来。普魯士將軍泰佩尔霍夫还建立了野战臼炮連，輕臼炮是用騾子馱載轉移的；但是1792年和1793年的战争证明这种臼炮沒有用处，此后不久它就被淘汰了。这一时期，炮兵学在德国有了特別重大的发展。斯特倫澤和泰佩尔霍夫在这一方面写了一些有益的著作²¹⁵，但是当时最卓越的炮兵专家是夏恩霍斯特。他所写的炮兵手册是炮兵学方面第一部全面的、真正的科学著作，而早在1787年就已出版的他的一本軍官手册中，就已开始科学地論述了野战炮兵的战术²¹⁶。夏恩霍斯特的著作虽然在許多方面已經过时，但是至今仍然是权威的著作。奥地利的維加將軍、西班牙的摩尔拉將軍、普魯士的霍伊尔和魯弗魯瓦也都写了有价值的炮兵学著作²¹⁷。1732

年，法国人采用瓦耳埃尔的办法改編了炮兵；他們保留了二十四磅、十六磅、十二磅、八磅和四磅加农炮，并采用了 8 英寸榴彈炮。但是他們的火炮在結構上仍大不相同；加农炮的长度为口徑的 22 倍到 26 倍，重量大約为炮彈重量的 250 倍。格里博瓦尔將軍在七年战争时期曾在奥地利軍隊服役，知道普魯士和奥地利新編炮兵的优越性，因此终于在 1774 年使法国炮兵采用了他提出的新編制。攻城炮兵与野战炮兵彻底区分开了。攻城炮兵由十二磅以上的全部火炮和全部旧式的十二磅重加农炮編成。野战炮兵則由十二磅、八磅和四磅加农炮（长度均为口徑的 18 倍，重量均为炮彈的 150 倍）以及 6 英寸榴彈炮編成。加农炮的装药量最后确定为炮彈重量的三分之一，并采用了高低調整螺杆，炮和炮架的每一部分都是按照規定的型式制造的，以使用庫存的預备品来替換。法国炮兵所使用的各种运输工具只需 7 种車輪和 3 种車軸就够了。虽然大多数国家的炮兵都知道使用前車上的彈药箱来运送彈药，但是格里博瓦尔在法国沒有采用这种彈药箱。四磅加农炮配屬給步兵，每个步兵营有这样的炮两門；八磅和十二磅加农炮則編成单独的炮兵連，作为預备队炮兵，每个炮兵連有一个野战铁工場。組成了輜重队和工役連。总的說来，格里博瓦尔的炮兵是第一个根据当代的要求建立的。他的炮兵在火炮各部分的比例上、在兵器和編制上，都证明自己比当时任何一个国家的炮兵优越，而且在許多年內一直是各国炮兵的榜样。

由于格里博瓦尔的各种改革措施，法国炮兵在革命战争时期比其他各国的炮兵都强大，并且很快地成为拿破侖手中的威力空前强大的一支兵力。1799 年法国最后取消了团炮，同时，由于欧洲各地使用了大量六磅和三磅加农炮，法軍也装备了这两种火炮；除

了这两种情况外，法国炮兵沒有发生任何变化。所有的野战炮兵都編成炮兵連，每連有 6 門火炮，其中 1 門通常是榴彈炮，其余 5 門則是加农炮。但是，如果說在炮兵的兵器方面沒有或几乎沒有发生任何变化，那末在炮兵的战术方面則有很大的改变。虽然火炮的数量由于团炮的取消而稍有减少，但是火炮在战斗中的作用由于火炮得到了巧妙的使用而增强了。当时，拿破侖使用配屬給步兵师的一些輕炮来达到发起战斗和迫使敌人暴露兵力等目的，而把大部分炮兵留作預备队，直到决定了主要攻击目标时为止；等到主要攻击目标一确定，这些炮兵就出敌不意地編成龐大的炮队，共同襲击这一目标，从而以猛烈的轰击为步兵預备队最后的攻击作准备。在弗里德兰德会战^①中有 70 門火炮，在瓦格拉姆会战中有 100 門火炮，都是按照这种方法排成一綫的；在博罗迪諾会战^②中，由 80 門火炮編成的炮队为奈元帅向謝明諾夫村攻击作了准备。另一方面，拿破侖編成的大量騎兵預备队需要相应的騎炮兵部队来支援，于是騎炮兵又受到了很大的重視。法軍有大量的騎炮兵，而且在實踐中首創了騎炮兵所特有的战术使用方法。如果沒有格里博瓦尔的改革措施，就不可能产生炮兵的这种新的使用方法；而改变战术的必要性，則促使欧洲大陆所有国家的軍队逐漸地、稍加改变地采用了这些改革措施。

截至法国革命战争初期，英国炮兵一直处于无人过問的境地，远远落后于其他各国的炮兵。英軍每个营有两門团炮，但是根本沒有預备队炮兵。炮車用单馬纵列挽曳，而馭手持长鞭随車步行。馬和馭手都是雇来的。火炮的构造非常落后，火炮在轉移时，除了

① 見本卷第 114 頁。——編者注

② 見本卷第 258—263 頁。——編者注

很近的距离外，馬只能慢步前进。他們还没有騎炮兵。但是，自从1800年經驗表明原有的炮兵不能令人滿意以后，斯皮尔曼少校对炮兵进行了根本的改革。前車改用双馬纵列挽曳，火炮編成6門制炮兵連，总之采用了大陆各国已經采用了一个时期的改革措施。由于不惜金錢，英国炮兵很快就成为衣着最讲究、装备最优良最齐全的一支炮兵了。新建立的騎炮兵很受重視，它很快就表现出勇敢、迅速和动作准确的特点。至于炮兵兵器方面的革新，則仅限于炮車构造的改进。单尾炮架和带有彈药箱的前車，后来为大陆上大多数国家所采用。

在这一时期，炮兵和軍隊其他各組成部分的比例稍微固定一些。火炮数量最多的是皮尔馬森斯会战²¹⁸中的普魯士軍隊——1000名兵士中就有7門火炮。拿破侖认为每1000名兵士有3門火炮就足够了，而这一比例就成了一种常規。这时还規定了每門火炮应有的炮彈数量，即一門炮的炮彈不少于200发，其中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是霰彈。在拿破侖垮台后的和平时期内，欧洲列强的炮兵都逐步进行了改革。各地都取消了三磅和四磅輕炮，大多数国家采用了英国炮兵的經過改进的炮架和彈药箱。几乎到处都規定装药的重量为炮彈重量的三分之一，火炮的重量为炮彈重量的150倍或接近150倍；火炮的长度則为口径的16—18倍。法国人在1827年改編了自己的炮兵。他們給野炮規定了以下标准：八磅和十二磅炮，长度为口径的18倍，装药量为炮彈重量的三分之一，火炮的重量为炮彈重量的150倍。他們采用了英国式的炮架和彈药箱；这种前車上的彈药箱，法軍还是初次采用。八磅和十二磅炮連的編成中分別包括有口径为15厘米和16厘米的两种榴彈炮。野战炮兵这种新編制的特点是非常簡單。在法軍野炮連所使

用的一切运输工具中，只有两种炮架、一种前車、一种車輪和两种車軸。此外，他們还建立了特种山炮兵，它由口徑为 12 厘米的榴彈炮組成。

現在，英国野战炮兵几乎完全由九磅炮組成，这种炮的长度为口徑的 17 倍，重量按炮彈重 1 磅、炮重 $1\frac{1}{2}$ 英担計算，装药量是炮彈重量的三分之一。每个炮兵連有两門 $5\frac{1}{2}$ 英寸的二十四磅榴彈炮。在不久以前的对俄战争^①中，六磅和十二磅加农炮根本没有調到戰場上去。他們使用两种車輪。不論英国或法国的步炮兵，炮手都是乘在带有彈药箱的前車上轉移的。

普魯士軍隊装备有六磅和十二磅加农炮，炮的长度为口徑的 18 倍，重量为炮彈重量的 145 倍，装药量为炮彈重量的三分之一。榴彈炮的口徑是 $5\frac{1}{2}$ 英寸和 $6\frac{1}{2}$ 英寸。每个炮兵連有 6 門加农炮和 2 門榴彈炮。他們使用两种車輪和車軸以及一种前車。炮架是格里博瓦尔式的。在步炮兵中，为了迅速轉移，5 名炮手（足够操炮的人数）坐在前車上和騎在轅外馬上轉移，其余 3 名炮手則各自随火炮前进。因此，彈药箱不像法国軍隊或不列顛軍隊那样，和火炮連在一起，而是单独組成一个纵队，作战时配置在敌人射击范围以外的地方。在 1842 年，采用了英国式的經過改进的彈药箱。

奥地利炮兵装备有六磅和十二磅加农炮，炮的长度为口徑的 16 倍，重量为炮彈重量的 135 倍，装药量为炮彈重量的四分之一。奥地利的榴彈炮和普魯士軍隊使用的榴彈炮相似。一个炮兵連由 6 門加农炮和 2 門榴彈炮組成。

俄国炮兵装备有六磅和十二磅加农炮，炮的长度为口徑的 18

① 1853—1856 年的克里木战争。——編者注

倍，重量为炮弹重量的 150 倍，装药量为炮弹重量的三分之一。榴弹炮的口径是 5 英寸或 6 英寸。根据口径和任务的不同，炮兵连由 8 门或 12 门炮组成，其中加农炮和榴弹炮各占一半。

撒丁军队装备有八磅和十六磅加农炮以及口径与此相同的两种榴弹炮。德意志各小邦的军队都装备有六磅炮和十二磅炮；西班牙军队装备有八磅炮和十二磅炮；葡萄牙、瑞典、丹麦、比利时、荷兰和那不勒斯的军队则装备有六磅炮和十二磅炮。

英国炮兵在斯皮尔曼少校的改革措施的基础上得到的发展，以及因此而引起的炮兵界对于进一步采取改革措施的兴趣，还有大不列颠庞大的海军炮兵的存在为炮兵的进步所提供的十分有利的条件，这一切促成了许多重要的发明。英国的烟火剂和火药比其他各国都好，而英国的空炸信管的准确性也是无与伦比的。英国炮兵不久以前的一个重要发明，就是榴霰弹（一种装满弹子、在飞行过程中爆炸的空心弹），因此，霰弹的有效射程就和球形实心弹的射程一样远了。不管法国的设计家和组织者的本领多么大，法军恐怕是唯一未能采用这种威力巨大的新式炮弹的军队。他们还会配制空炸信管所需的药剂，而这正是全部问题的关键。

路易-拿破仑提出了一种新式野炮，看来法国现在正在逐渐采用这种野炮。目前装备的四种加农炮和榴弹炮，全部要用这种轻型的十二磅加农炮来代替，它的长度是口径的 15.5 倍，重量是炮弹重量的 110 倍，装药量是实心弹重量的四分之一。在用减装药时，这种加农炮应当发射 12 厘米的爆炸弹（目前山炮用这种炮弹），这样就可以代替专门发射空心弹的榴弹炮。法国四个炮兵学校进行的各次试验都很成功，而且法国人还肯定地认为，在克里木战争中这种加农炮显然优越于大部分是六磅炮的俄国加农炮。但是，

英国人确信他們的九磅长管加农炮在射程和射击精度方面都优于这种新式加农炮。这里必須指出，他們首先使用过这种装药量为炮弹重量四分之一的輕型十二磅加农炮，但不久就放棄了。路易-拿破侖的炮显然就是这种炮的仿造。用普通加农炮发射爆炸彈的方法，則是向普魯士軍隊学来的，普魯士軍隊在圍攻时用二十四磅加农炮发射爆炸彈来完成一定的任务。但是路易-拿破侖的这种加农炮的质量仍然有待实践的檢驗，而由于沒有专门公布过关于这种火炮在最近一次战争中的作用的任何資料，我們在这里也就不可能对这种火炮的优劣作出定論。

炮兵学的研究对象包括：火炮用实心彈、空心彈和其他炮弹进行射击的規律以及通过試驗而确定的射击規則；炮弹飞行距离、射角和装药量之間的已知的关系；炮弹与膛壁之間的空隙所起的影响和造成射彈偏差的其他原因所起的影响；命中率以及战时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in vacuo〔在真空中〕朝非垂直方向拋擲任何重物，都会形成一条抛物綫，这一事实虽然是炮兵学的基本原則，但是随着运动物体速度的增长而不断增大的空气阻力，却使抛物綫理論在炮兵方面的实际运用中发生极大的变化。例如，炮弹初速为每秒 1 400—1 700 英尺的火炮，其彈道和理論上的抛物綫相差很大，以致只要成 20 度左右的射角射击，就能达到最大的飞行距离，而按照抛物綫理論，这一射角却应当是 45 度。人們根据实验的結果相当准确地断定了这种偏差量，并依此确定了每种火炮在采用一定的装药向一定的距离射击时应有的射角。但是，影响炮弹飞行的还有許多別的因素。首先是存在着空隙，即炮弹直徑和炮膛直徑有差別，因为为了便于装填，炮弹直徑应小于炮膛直徑。这种空隙，第一使装药爆炸时膨脹的气体漏掉，換句話說，使爆炸

力量减弱；第二使炮弹不能在赋予的方向上正确飞行，结果发生方向偏差或高低偏差。其次，装药的重量和它在发射时的状况必然是不一样的；炮弹由于其重心与圆心不一致而产生的偏心现象，也引起各种偏差，偏差的大小则决定于发射时重心与圆心的相对位置；此外还有许多别的因素，使炮弹虽然看来是在同样的条件下飞行，但是产生的结果却不相同。我们已看到，各国野炮的装药量几乎都是炮弹重量的三分之一，而野炮的长度都是口径的 16—18 倍。在采用这种装药量时，野炮如果进行直射（那时炮身处于水平状态），那末炮弹约在 300 码的距离上落地；如果增大射角，射程可增至 3 000 或 4 000 码。但是距离这样远时，炮弹即失去命中目标的任何可能性；因此野炮的有效射程不超过 1 400 码或 1 500 码，而且即使在这样的距离上，6 发或 8 发炮弹中也只可能有 1 发命中目标。在用实心弹和爆炸弹射击时，加农炮能起决定性作用的距离（即对战斗的结局能起影响的距离）是 600 码到 1 100 码；在这样的距离内，命中率的确要大得多。例如，据计算，六磅加农炮对标示步兵营强攻纵队正面的靶子（长 34 码，高 2 码）射击时，在 700 码距离上的命中率约为 50%，在 900 码距离上的命中率约为 35%，在 1 100 码距离上的命中率约为 25%。九磅和十二磅加农炮的射击效果比较好一些。1850 年在法国进行的试验中，用当时装备的八磅和十二磅加农炮对长 30 米、高 3 米的靶子（标示骑兵团）射击时，取得了以下成绩：

距离(米)	500	600	700	800	900
命中率 十二磅加农炮·····	64%	54%	43%	37%	32%
八磅加农炮·····	67%	44%	40%	28%	28%

虽然这个靶子比上述靶子高出二分之一，但是射击成绩平均

來說低于上述成績。野战榴彈炮的装药量与炮彈重量的比例，比加农炮的要小得多。这是因为炮身短（炮身长度是口径的7倍到10倍），而且射击时必须采用大射角。榴彈炮在以大射角进行射击时，如果采用重装药，冲向后下方的后座力会使炮架受到很大的压力，以致在几次发射后炮架就会损坏。由于这一原因，在大多数大陆国家的炮兵中，一門野战榴彈炮有重量不同的几种装药，这样，炮兵就能用不同的装药配合不同的射角来保证向所要求的距离射击。在不采用这种方法的地方，例如在英国炮兵中，榴彈炮的射角必然很小，只稍稍大于加农炮的射角；英国二十四磅榴彈炮在采用 $2\frac{1}{2}$ 磅装药和4度射角时，其射表中所标示的射程不超过1050碼；九磅加农炮如以这种射角射击，則其射程达1400碼。在德意志各邦的軍隊中，大多数都采用一种特殊的短管榴彈炮，这种炮可以采用16度到20度的射角，因此与臼炮相似；它的装药量必须小些。这种榴彈炮和普通的长管榴彈炮比較起来，它的优越性在于可以用爆炸彈轰击地褶后面的隐蔽陣地等目标。但是当射击移动的目标，如軍隊时，这种优越性就值得怀疑了；尽管当平射火力达不到的目标固定不动时，它仍然有很大的作用。至于进行平射，这种短管榴彈炮則因为炮身短（相当于口径的7—16倍）、装药少而完全不适用了。在根据面临的任務（平射或曲射）而以一定的射角射击时，为了达到不同的射程，装药量应当是各不相同的；普魯士野战炮兵也使用这种短管榴彈炮，它們采用的装药不少于十二种。一般說来，榴彈炮是一种极不完善的火炮，因此愈能早日用效果良好的、发射爆炸彈的野战加农炮来代替就愈好。

在要塞中、在圍攻时以及在軍艦上使用的重炮，有不同的类型。在最近一次对俄战争以前，圍攻时一般不使用比二十四磅加

农炮更重的火炮；只在万不得已时才使用少数三十二磅加农炮。但是，从塞瓦斯托波尔尔围攻战起，就不再区分攻城炮和舰炮了，或者更确切地说，忽然发现重型舰炮在轰击塹壕和土质工事时的作用比一般轻型攻城炮大得多，所以从此以后这种重型舰炮在很大程度上应该是围攻战中的决定性武器。在攻城炮兵和海军炮兵中，往往同一种口径的加农炮有不同的类型，有短管轻炮和长管重炮。由于在这种情况下，运动性的意义较小，所以往往为了专门的目的而制造一些长度相当于口径 22—25 倍的火炮，其中有些火炮由于炮身长，射击时竟和步枪一样准确。在这类较好的加农炮中，有一种就是普鲁士的二十四磅青铜炮，它的长度是 10 英尺 4 英寸，即口径的 22 倍，重 60 英担；围攻时没有任何一种加农炮在击毁敌人火炮方面能和它相比。但是，人们认为，火炮长度为口径的 16—20 倍，就完全足以完成大多数的任务了；通常，人们宁愿把火炮口径造大些，而不愿过分提高射击精度，因而，用 60 英担的生铁或铸炮青铜来铸造长度为口径 16—17 倍的三十二磅重炮照例是最合适的。用生铁铸造的长 9 英尺、重 50 英担的新式三十二磅长管炮，是不列颠海军最好的火炮之一，它的长度为口径的 16.5 倍。有一种可旋转的、重 112 英担的六十八磅长管炮 [pivot-gun]，装备在全部的有 131 门火炮的螺旋推进器大型军舰上，它的长度是 10 英尺 10 英寸，即略大于口径的 16 倍；另一种可旋转的、重 98 英担的五十六磅长管炮，长 11 英尺，即为口径的 17.5 倍。直到现在，军舰仍然装备有大量威力较小的火炮，如长度仅为口径 11 倍或 12 倍的、炮筒是旋凿而成的火炮以及长度为口径 7—8 倍的卡伦炮。但是还有另一种海军火炮，它是佩克桑将军在三十五年以前发明的，而且从那时起就具有很大的作用，这就是发射爆炸弹的加

农炮。这种火炮經過了很多改进；目前，法国的发射爆炸彈的加农炮是与佩克桑設計的火炮最近似的一种，它仍保留着圓柱形药室。而英国海軍中，这种炮或者根本没有药室，或者有一个稍小于口徑的短截錐形药室；这种火炮的长度是口徑的 10—13 倍，只用来发射空心彈；但是上面提到的六十八磅和五十六磅长管炮，則既可发射实心彈，也可发射爆炸彈。在合众国海軍中，达尔格倫上校設計了一种新式的发射爆炸彈的加农炮，这是一种口徑很大的短管炮（口徑为 11 英寸或 9 英寸）；这种炮一部分已用来装备若干艘新式巡航舰。它的优越性尚待在战斗實踐中檢驗，實踐会证明，它能否保证大型爆炸彈發揮巨大的威力，而射击精度又不致受到影响；但是为了达到远射程，必然要采用大射角，而这就不能不影响到射击精度。在攻城炮兵和海軍炮兵中，有各种不同的装药，就如同火炮本身有不同的构造和不同的目标一样。为了在石质工事上打开缺口，要采用最重的装药，有些很重的大口徑火炮的重装药量达到炮彈重量的二分之一。但是相当于炮彈重量四分之一的装药，一般說来，完全可以认为是对圍攻目标使用的中等装药，它的重量有时增到炮彈重量的三分之一，有时則减到炮彈重量的六分之一。在軍舰上每种火炮通常有三种装药：大号装药用于对远距离目标和逃敌等射击，中等装药用于海战中对中距离目标进行有效射击，减装药用于接舷战斗和发射鏈彈。三十二磅长管炮的装药有相当于炮彈重量十六分之五、四分之一和十六分之三的三种。对于短管輕炮和发射爆炸彈的加农炮來說，装药和炮彈重量的比例当然还要小些；而且发射爆炸彈的加农炮所使用的空心彈比实心彈輕。除普通加农炮和发射爆炸彈的加农炮外，在攻城炮兵和海軍炮兵中还有重榴彈炮和臼炮。榴彈炮是一种短管炮，以 12 度到 30 度

的射角使用爆炸彈进行射击，它固定在炮架上；臼炮則是一种更短的火炮，固定在托架上，通常以20度以上的射角，有时甚至以60度的射角使用爆炸彈进行射击。这两种火炮都是带药室的火炮，就是說在这两种炮上都有一个药室，即用来填放装药的那部分炮膛，其直徑小于炮管，即炮膛的主要部分。榴彈炮的口徑很少超过8英寸，但是臼炮的口徑达13英寸、15英寸或更大一些。臼炮发射爆炸彈时，由于装药量少（相当于爆炸彈重量的二十分之一到四十分之一），射角大，炮彈在飞行时受到的空气阻力較小，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拋物綫理論就可以用于炮兵射击的計算，而不致同实际結果相差很远。臼炮的爆炸彈可以起爆炸作用，也可以当做燃燒彈使用，即从炮彈的孔眼中噴出火焰使易燃物着火，它还可以靠自身的重量穿破拱形的和其他形式的工事掩盖；在最后这种場合，最好采用大射角，因为这能使炮彈飞得更高，因而在落下时能产生最大的慣力。榴彈炮的爆炸彈首先是用来起侵彻作用，其次是用来起爆炸作用。臼炮由于射角大，炮彈初速小以及由此所决定的空气阻力不大，它的射程比其他任何一种火炮都要远。由于射击目标通常是整个城市，不要求火炮有很高的射击精度，因此，重臼炮的有效射程有时达到4000碼以上；英法的臼炮艇就在这种距离上轰击了斯維阿波尔格。

圍攻时各种火炮、炮彈和装药的使用問題，将在有关的条目^①中論述；海軍炮兵的使用問題几乎是海軍基本战术中有关战斗行动部分的全部內容，因此不屬於本条的範圍。所以我們在这里只就野战炮兵的使用和战术問題提出几点意見。

① 見本卷第349—351頁。——編者注

炮兵沒有进行白刃战的武器；它的全部威力在于能从一定距离进行射击。此外，只有当它占据陣地的时候，才保持着战斗准备；而当火炮架在前車上或連上牵引索轉移时，就暂时失去了战斗力。由于这两个原因，在三个兵种中，炮兵比其他兵种具有更大得多的防御特性；它的进攻能力实际上非常有限，因为进攻本身是一种前进运动，而进攻的最高潮是白刃格斗。因此，在敌人火力下前进、占据陣地以及进行射击准备，对于炮兵来说是危險的时刻。炮兵的展开和射击前的运动应当利用地褶或步兵橫队来掩护。所以，炮兵应先配置在与規定占据的陣地相平行的一綫上，然后朝着正对敌人的方向进入陣地，这样做是为了使自己避免遭到敌人的側射。炮兵陣地的选择，不論从保证炮兵連的射击效果来看，或者从避免敌人对炮兵連的射击来看，都是极其重要的事情。自己火炮的配置应当保证使敌人最容易感受到火炮的威力，这是一項首要的任务；另一項任务則是保证自己不受敌人火力的伤害。良好的陣地应当設置在土质坚硬而又平坦、便于放置車輪和架尾的地方；如果車輪停放不平，火炮就不可能准确地进行射击，同时如果架尾陷入土中，后座力很快就会使炮架损坏。此外，陣地应当有開闊的視界，便于观察敌人占领的地形，并能保证最大的机动自由。最后，陣地前的地形，即炮兵連和敌人之間的地形，应当便于我方火炮射击，而尽可能不利于敌人。坚硬而平坦的地面是最有利的地形，它有利于跳彈作用的发挥，此时射彈即使是近彈，一接触地面也能跳起飞向敌人。不同性质的土壤对于炮兵射击的效果影响之巨大是令人惊讶的。在松軟的土壤上，炮彈一触及地面，即使一般地说不会立刻陷入土中，也必定会离开自己的飞行方向，或者开始不規則地跳动。耕地壟沟的方向对于射击，特别是对于用霰彈或

榴霰彈进行的射击，有很大影响；如果壕沟是橫的，那末大部分炮彈将陷入土中。如果我方陣地直前是土质松軟的波状起伏地形，而再往前靠近敌方陣地是土质坚硬的平坦地形，那末这种地形将有利于我炮兵射击，并保护我方不受敌方火力的杀伤。在5度以上的斜坡向下或向上进行射击，或者从一个山岡的頂部向另一山岡进行射击，是非常不利的射击条件。至于掩蔽自己，不受敌人射击的問題，那末甚至很小的物体也有利于这一点。勉强能掩蔽我方陣地的稀疏的栅栏、树丛或高杆作物，都能妨碍敌人进行正确的瞄准。利用陡峭的小土堤配置火炮，就能够免遭敌方最危险的炮彈的襲击。壕沟能成为很好的胸墙，而起伏不大的地形上的棱綫則具有最好的防护作用，我們可以把火炮配置在棱綫后面，使敌人只能看到火炮的炮口；如果选择这样的陣地，那末落在陣地前面的每一发炮彈，都将从我方陣地上面高高地跳过。如果在棱綫上面为火炮挖掘一个深約2英尺的炮床，并朝反斜面方向开一平坦的进出口，从而保证火炮能控制山岡的整个正斜面，那末这样的陣地就更好了。拿破侖时代的法国人善于特別巧妙地配置自己的火炮，其他各国人就是从法国人那里学会这种技能的。炮兵陣地应当这样选择：对敌人說来，它是敌人側射和纵射火力达不到的地方，而对自己的軍隊說来，它不应当造成他們运动的困难。火炮配置成橫队时，各門火炮一般相距20碼，但是沒有必要死守这种练兵場上的規則。当火炮进入陣地时，前車配置在火炮的直后，但是某些国家的軍隊的彈药車仍留在掩蔽地內。如果彈药車用来載运炮手，那末它也不得不冒险停放在敌人的有效射击范围內。炮兵連的火力应指向当时对我陣地威胁最大的那部分敌人；如果我步兵即将开始攻击，那末炮兵連应当向敌炮兵射击（如果他們尚未被

压制的話),或者向大群步兵射击(如果他們已暴露的話);但是,当敌人部分兵力发起攻击时,炮兵連就应当不顾对我射击的敌人的炮兵,而对向我攻击的敌人射击。对敌人炮兵射击最有效的时机,是在敌人炮兵不能进行还击的时候,也就是在敌人火炮架上前車、正在轉移或者正从前車上卸下的时刻。这时进行几次准确的齐射,就能在敌人中間造成极大的混乱。过去曾有一項規則,即炮兵非万不得已不应当接近到距敌人步兵 300 碼以內,也就是說不应当接近到步枪的射程以內;現在这一規則很快就要过时了。在現代步枪的射程不断增大的情况下,野战炮兵在步枪的射击范围以外已經不能順利地行动,而火炮及其前車、馬匹和炮手形成相当大的一个目标,步兵用米涅式步枪或者恩菲耳德式步枪从 600 碼的距离上就可以对这个目标进行射击。很久以来人們一直认为,誰想活得久一些,誰就去当炮兵,这种看法現在看来已經不符合实际情况了,因为步兵从远距离进行射击,这在将来显然是对炮兵作斗争的最有效的方法。而在任何一个战场上,步兵在距离炮兵陣地 600 碼的地方难道还会找不到可靠的掩蔽地嗎?

炮兵对进攻的步兵橫队或纵队一向是具有优势的;用霰彈进行几次成功的齐射或者向长纵队发射两三个实心彈,就能大大挫伤敌人的士气。攻击者离炮兵愈近,炮兵的射击就愈有效;即使在最后的时刻,炮兵也能够容易地轉移,摆脱如此緩慢前进的敌人,尽管成散兵綫 *pas gymnastique*〔跑步〕进攻的 *chasseurs de Vincennes*〔文森猎兵〕是否能在火炮架上前車以前追上炮兵,仍然是个問題。

在与騎兵作战时,炮兵沉着应战就能保持优势。如果炮兵在敌人前进到 100 碼以前不射击,然后用霰彈进行准确的齐射,那末

当烟尘消散的时候，騎兵离开炮兵还远。在任何情况下，将火炮架上前車并企图退走，是最坏的做法，因为这时騎兵就肯定能截获火炮。

在炮兵对炮兵的战斗中，决定胜败的是：地形特点、火炮的口徑、火炮的数量以及双方使用火炮的技能。然而必須指出，虽然大口徑火炮在远距离上射击具有不容置疑的优势，但是小口徑火炮随着距离的縮短，其作用就与大口徑火炮逐渐接近，而在近距离上則几乎与大口徑火炮的作用相等。在博罗迪諾会战中，拿破侖的炮兵主要是由三磅炮和四磅炮組成的，而俄国人的火炮大部分是十二磅炮，但是法国人的小型火炮却对俄国十二磅炮具有决定性的优势。

炮兵支援步兵或騎兵时，应当始終在他們的翼側占据陣地。步兵进攻时，炮兵应当以半連或排为单位与散兵綫一起前进，有时甚至稍稍在散兵綫之前前进；当大群步兵准备刺刀冲鋒时，炮兵应立即快步前进到离敌人 400 碼的地方，用霰彈进行急促射，为冲鋒作准备。如果冲鋒被击退，炮兵应对追击的敌人射击，直到不得不退却时为止；如果冲鋒成功，那末炮兵的火力就能有力地促成战斗的胜利結束，这时一半火炮繼續射击，另一半火炮前进。騎炮兵作为支援騎兵的一个兵种，能够使騎兵具有它原来当然完全沒有的那种防御能力；現在，騎炮兵已成为各国最喜用的兵种之一，而且在欧洲各国軍隊中都已經发展到了十分完善的地步。虽然騎炮兵的任务是在騎兵便于行动的地区和騎兵一起作战，但是，世界上还没有騎炮兵不能跑步通过騎兵所能通过的地形，只不过不能保持队形的整齐一致罢了。各国騎炮兵都是由軍隊中最勇敢、最熟练的騎手組成的；在各次大規模演习中，这些騎炮兵神气十足地不顾

障碍、炮火以及可能使騎兵受阻的种种情况，勇猛地向前冲去。騎炮兵的战术在于勇敢和沉着。迅速行动、突然出现、急速射击、随时准备轉移并在騎兵难以通行的道路上运动，这些都是优秀的騎炮兵的基本素质。騎炮兵由于經常变换位置，所以不必专门去选择陣地；凡是离敌人近而敌人騎兵又不能到达的陣地，都是好陣地；炮兵要在騎兵搏斗的高潮和低潮中随着馬群冲上去和退下来，正是在这种时候需要时刻表现出高超的騎术和奋发的精神，在并不是所有騎兵都敢于冒险到达或者願意跟踪前往的任何地形上，出入于汹涌澎湃的战海之中。

在攻击和防守据点时，炮兵也采用同样的战术。炮兵的主要作用始终是：在防御中向对我方威胁最大而又最直接的地点射击，在攻击中向敌方最能成功地击退我方进攻的地点射击。炮兵的任务还包括破坏坚固的障碍物，这时，应根据火炮的特点及其作用而使用不同口径和不同种类的火炮：榴彈炮用来燒毀建筑物，重炮用来破坏要塞大門、城牆和街垒。

所有这些意見都是就各国軍隊中的师屬炮兵来談的。但是，在具有决定意义的大規模会战中，最重大的战果都是靠預备队炮兵取得的。預备队炮兵在战斗过程中大部分時間配置在后面，在敌人視界和射击范围以外，只是在进行最后突击的关头才調到前面，集中轰击有决定意义的地点。預备队炮兵配置成长一英里或一英里多的半月形队形，然后集中火力向較小的地段进行破坏性射击。如果敌人不能以威力相当的炮兵进行回击，那末半小时的急速射就解决问题了。在呼嘯的彈雨下，敌人的兵力开始削弱，这时新銳的步兵預备队投入战斗，进行最后一場激烈而短促的搏斗，并取得胜利。拿破侖在瓦格拉姆会战中就是这样为麦克唐納的冲

鋒作好准备的，因而成纵队进攻的 3 个师还没来得及放一枪或进行白刃格斗，敌人的抵抗就被粉碎了。因此，可以认为，只是从这些伟大的日子起才有了野战炮兵的战术。

弗·恩格斯写于 1857 年 10 月中旬—
11 月 26 日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 1858 年版
第 2 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卡·馬克思 毕 若²¹⁹

毕若·德·拉·比貢利，托馬·罗伯尔，伊斯利公爵——法国元帅；1784年10月生于里摩日，1849年6月10日死于巴黎。1804年他参加法国军队当列兵，1805年战争时期是下士，在普魯士和在波兰战争时期(1806—1807年)成为少尉，1811年参加列里达、托尔托薩和塔腊果納圍攻战时是少校軍銜，在卡塔卢尼亚的奥尔达耳会战²²⁰以后升为中校；在波旁王朝第一次复辟以后，毕若上校用蹩脚的詩歌頌白百合花²²¹，但是因为他的詩作受到人們很大的鄙視，所以他在百日²²²时期又投奔拿破侖了。拿破侖派他去阿尔卑斯軍团领导第十四基干团。在波旁王朝第二次复辟时期，他去埃克西迪他父亲的庄园。在昂古列姆公爵干涉西班牙²²³时期，他表示願为波旁王朝效劳，但因为这个要求被拒絕了，所以他就成了自由派，并且参加了最后促成1830年革命的运动。

1831年毕若当选为众議院議員，并被路易-菲力浦提升为少将。1833年他被任为布累城堡司令，受命監視貝里公爵夫人；但是他执行这项使命所采用的方法使他很不光彩，因此以后他就被人称为“布累城堡的前任獄吏”。1834年1月16日，在众議院进行辯論的时候，拉腊比先生指責苏尔特实行軍事独裁，毕若打断他的話說：“服从是軍人的天职”，另一个議員杜隆先生嘲弄地問道：“要

是命令他去当獄吏，那怎么办呢？”这场冲突引起了毕若和杜隆之間的决斗，杜隆在决斗中被打死。这件事使巴黎人民极其憤慨，并且由于毕若参加镇压 1834 年 4 月 13 日和 14 日的巴黎起义²²⁴，这种憤慨情緒就更加强烈了。镇压起义的部队分为三个旅，其中一个旅由毕若指揮。14 日早晨，当主要的战斗已經結束的时候，在特朗斯諾南街上几个还在坚守街垒的热情的起义者却遭到了优势敌人的殘杀。虽然这条街不是毕若旅的活动地区，因而他并没有参与这次暴行，但由于人民的痛恨，还是把他的名字同这个可耻的事件連在一起，并且不管怎样反駁，还是坚决地痛斥他，給他取了“特朗斯諾南街的英雄”的綽号。

1836 年 6 月 6 日，毕若將軍被派到阿尔及利亚担任奥兰省司令，这个职位几乎不受总督管轄。他在接到同阿布德-艾尔-喀德作战并派出强有力的军队迫使阿布德-艾尔-喀德屈服的命令之后，签订了塔弗納条約²²⁵；这样一来，他就放过了展开軍事行动的机会，使自己的军队在开始行动以前就处于危急状态。在签订这个条約以前，毕若曾进行过几次会战。沒有列入条約正文的秘密条款規定偿付毕若將軍 3 万布若(約 12 000 美元)。他被調回法国以后升为中将，并成为获得荣誉軍团勋章的高级將領。塔弗納条約的秘密条款被人知道以后，路易-菲力浦准許毕若出資建筑几条公用道路，以提高毕若在选民中的声誉和保持他在众議院的席位。

1841 年初，毕若任阿尔及利亚总督，在他統治期間，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政策有了根本的变化。他是第一个这样的总督：統率了足以执行自己面临的任务的军队，拥有对所屬下級將領的绝对的权力，并且长久地担任这个职务，以致可以按照一个需要多年才能实现的計劃来进行活动。在伊斯利会战（1844 年 8 月 14 日）

中，他以劣势兵力击溃了摩洛哥皇帝^①的军队，他之所以取得了胜利，是因为他在谈判结束的前夜不宣而战地对穆斯林进行了突然的袭击。²²⁶ 毕若在1843年7月17日，就已获得法国元帅的称号，在这次会战以后，他获得了伊斯利公爵的封号。因为在他回法国以后阿布德-艾尔-喀德重新集结军队，所以他又被派回阿尔及利亚，迅速地镇压了阿拉伯人的起义。他不顾内阁命令，远征卡比利亚，因而同基佐发生了分歧²²⁷，结果他被奥马尔公爵接替，并且按照基佐的说法，他“获得了回到法国和享受荣誉的机会”。

由于基佐的秘密的建议，路易-菲利浦于1848年2月23日夜間召见了毕若，并任命他为全部武装力量（包括常备军和国民自卫军）的最高统帅。24日早晨，毕若在吕利埃尔、貝多、拉摩里西尔、德·薩尔、圣阿尔诺以及其他将军的陪同下，到土伊勒里宫的总参谋部隆重地接任奈穆尔公爵的最高统帅职位。他对在场的军官们说，他这个将要带领他们去镇压巴黎革命者的人，“无论在战场上或在镇压起义的时候，是从来没有遭到过失败的”，他保证这一次也要迅速除掉“暴民”。然而任命他的消息一传出，情况就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国民自卫军对任命他担任最高统帅尤为不满，他们高呼：“打倒毕若！”，“打倒特朗斯诺南街的英雄！”——国民自卫军坚决表示，他们将不服从他的命令。路易-菲利浦被这次示威吓破了胆，只得收回成命，并花了一整天时间进行了没有结果的谈判。2月24日毕若成了路易-菲利浦的顾问中唯一坚持不惜牺牲继续进行斗争的人了；但是国王已经认为，只有牺牲元帅才能同国民自卫军取得和解。因此统帅权转入他人手中，而毕若被免职了。

① 阿布德-艾尔-拉赫曼。——编者注

两天以后,毕若表示願为临时政府²²⁸ 效勞,但是沒有被接受。

路易-拿破侖当总統的时候,他任命毕若为阿尔卑斯軍团司令;毕若同时在下夏朗德省当选为国民議會議員。毕若发表过一些主要是关于阿尔及利亚的著作²²⁹。1852年8月,在阿尔及尔城为他树立了一个紀念碑,另一个紀念碑建立在他出生的城市。

卡·馬克思写于 1857 年 11 月 27 日

原文是英文

載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9年版
第4卷

俄文譯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卡·馬克思 玻利瓦尔-伊-龐特²³⁰

玻利瓦尔-伊-龐特，西蒙——哥倫比亞的“解放者”；1783年7月24日生于加拉加斯，1830年12月17日死于圣馬尔塔附近的圣彼德罗。他出身于 familias Mantuanas〔曼都亚家族〕，这个家族在西班牙統治时期是委內瑞拉的克里奥洛貴族。按当时美洲有錢人的习惯，他还在14岁的少年时期就被送到了欧洲。他从西班牙移居法国，在巴黎住了几年。1802年他在馬德里結婚，随即回到了委內瑞拉，在那里他的妻子患急性瘧疾突然死去。在这以后，他再度去欧洲；于1804年参加了拿破侖称帝的加冕典礼²³¹，又于1805年参加了拿破侖給自己戴上倫巴第的铁制王冠的仪式。1809年玻利瓦尔回到祖国，虽然他的亲戚霍賽·費里克斯·里巴斯再三請他参加1810年4月19日在加拉加斯爆发的革命²³²，但他还是拒絕了。然而在这个事件以后，他接受了去倫敦购买武器和請求不列顛政府保护的委托。他受到了当时的外交大臣威尔斯里侯爵表面上的殷勤接待，他除了得到許可在現款交易和繳納高額关稅的条件下自由輸出武器之外，一无收获。他自倫敦回国以后再度脫离政治，直到1811年9月，他由于当时担任起义部队陆海軍总司令的米兰达將軍的劝說而接受了司令部中校軍銜和委內瑞拉最强固的要塞卡柏略港的要塞司令的职务。

当西班牙战俘(米兰达通常把他們解到卡柏略港,扣押在城砦里)突然襲击武装看守取得胜利,占領了城砦的时候,玻利瓦尔虽然拥有一支人数众多的守备部队和大批的軍需仓库,而他的敌人手无寸铁,但是他却不預先通知自己的部队就連夜带了8名軍官匆忙搭上軍舰,于黎明到达拉瓜拉,随后又到圣馬特欧自己的庄园去了。守备部队得悉自己的司令官逃跑以后,就秩序井然地撤离了要塞,而这个要塞立即被蒙特威尔德指揮的西班牙軍隊占領。这一事件造成有利于西班牙人的形势,迫使米兰达按照議会的委托于1812年7月26日在維多利亞簽訂条約,委內瑞拉因此重新受西班牙統治。米兰达于7月30日到达拉瓜拉,打算在那里搭乘英国軍舰。他在訪問該城要塞司令曼努埃尔·馬利阿·卡薩斯上校的时候,碰到一伙人,其中有唐·米格尔·佩尼亚和西蒙·玻利瓦尔;他們劝他至少在卡薩斯上校家里过一夜。翌晨2时,正当米兰达酣睡的时候,卡薩斯、佩尼亚和玻利瓦尔領了四名武装士兵走进他的房間,先夺取了他的佩劍和手枪,然后叫醒他,粗暴地命令他起床穿衣,給他带上鐐铐,最后把他交給了蒙特威尔德,蒙特威尔德把他押到加迪斯,他在那里被囚禁了几年以后死于監獄。以米兰达在維多利亞投降敌人、背叛国家为借口而采取的这一行动使玻利瓦尔获得了蒙特威尔德的特別欢心,因此当玻利瓦尔請他签发护照的时候,蒙特威尔德說过:“玻利瓦尔上校的請求应予滿足,以答謝他交出米兰达,为西班牙国王效劳”²³³。

因此,玻利瓦尔获准去庫拉索,他在那里住了6星期,然后同自己的亲戚里巴斯一起从那里前往卡塔黑納小共和国。在他們到达以前,过去受米兰达將軍指揮的大量士兵就已逃到了这里。里巴斯建議他們远征委內瑞拉去討伐西班牙人并承认玻利瓦尔为他

們的总司令。他們非常兴奋地接受了前一建議，而反对后一建議，最后还是同意了，但必須由里巴斯担任副司令。因此应募加入玻利瓦尔队伍的士兵有 300 人，卡塔黑納共和国总统曼努埃尔·罗德里格斯-托里塞斯也将他的亲戚曼努埃尔·卡斯提耳奧指揮的 500 人并了进去。远征軍于 1813 年 1 月初出发。由于玻利瓦尔和卡斯提耳奧因爭夺最高指揮权而鬧意見，卡斯提耳奧突然帶領自己的格拉納達人离开了。玻利瓦尔也提出要仿效卡斯提耳奧，回到卡塔黑納去，但是里巴斯终于說服他至少繼續進軍到波哥大，因为新格拉納達議會当时正在那里开会。他們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并得到了种种支援；他們两人被議會擢升为將軍；他們把自己的这支小軍隊分为两路，按不同的路綫向加拉加斯进发。他們愈向前推进，他們的力量也愈增强；西班牙人殘暴的破坏行为到处起了替爭取独立的軍隊招募新兵的作用。西班牙人的抵抗力量已經被摧毀了，一方面是因为他們軍隊的四分之三的士兵由当地居民組成，这些士兵在每次小战斗中都投到敌人那边去，另一方面是因为像提斯卡尔、卡希加尔和菲埃罗这样一些將領胆小怕死，他們每次战斗都离开自己的部队。因此，一个不識字的少年圣地亚哥·馬里尼約，才能够在玻利瓦尔向西部各省推进的时候把西班牙人赶出了庫馬納省和巴塞洛納省。里巴斯的那一路部队遭到了西班牙軍隊的唯一的一次頑强抵抗，但里巴斯在洛斯-塔古阿涅斯击潰了蒙特威尔德將軍，迫使他率領殘部困守在卡柏略港。

加拉加斯总督菲埃罗將軍听到玻利瓦尔逼近的消息以后，派了代表去向他提出簽訂投降协定，协定在維多利亞簽訂；但是張皇失措的菲埃罗沒有等到自己的代表回来，就在夜間偷偷逃跑了，留下 1 500 多名西班牙士兵听凭敌人处置。这时公众为玻利瓦尔举

行了凱旋式。玻利瓦尔站在凱旋車上，凱旋車由加拉加斯名門望族的12名年輕婦女牽拉，她們穿着配上国旗顏色的白衣服，玻利瓦尔沒戴帽子，身穿礼服，手拿小杖，从城門到他府邸化了半个小时左右。他宣布自己为“委內瑞拉西部各省的执政者和解放者”，——而馬里尼約接受了“东部各省执政者”的封号，——他制定了“解放者勳章”，建立了一支称之为禁卫軍的精銳部队，他过着国王般的豪华生活。但是他像大多数自己的同胞一样，不能长期努力奋斗，他的独裁不久就变成了軍事无政府状态；他把最重要的事务托付給亲信，可是他們濫用国家的錢，后来为了抵补这笔錢，又采取卑鄙的手段。因此，人民原先的热情很快就变成了不滿，而敌人的分散的兵力又有了重新集結的可能。1813年8月初，蒙特威尔德困守卡柏略港要塞，西班牙軍隊手中只剩下委內瑞拉西北部的小块領土，从那时起仅仅过了三个月，在12月解放者就已經丧失了自己的威信，連加拉加斯本身也因邻近突然出現由博韦斯指揮的进展順利的西班牙軍隊而受到威胁。玻利瓦尔为了巩固搖搖欲墜的政权，于1814年1月1日召集了由加拉加斯最有势力的居民組成的洪达，并宣称他再也不願担負执政者的重担了。但是胡尔塔多·孟多薩在长篇演說中却坚决主張，

“在新格拉納达議會召开和委內瑞拉有一个統一的政府領導以前，必須仍旧由玻利瓦尔將軍掌握最高权力”²³⁴。

这个建議被通过了，独裁从而取得了一种似乎合法的批准。

在一个时期里，对西班牙人的战争带有小战斗的性质，双方都不占絕對优势。1814年6月，博韦斯率領自己全部兵力从卡拉博索开往拉普厄尔塔，而玻利瓦尔和馬里尼約这两个执政者的部队已經在那里会合了；博韦斯同他們遭遇，就命令自己的部队立刻向

他們进攻。玻利瓦尔略作抵抗以后，就逃到加拉加斯去了，而馬里尼約朝着庫馬納方向逃之夭夭。卡柏略港和瓦倫西亚落入博韦斯手中，他随即把军队分成两路（其中一路由岡薩勒斯上校指揮），向加拉加斯推进。里巴斯企图阻止岡薩勒斯的进攻，但沒有成功。1814年7月17日，加拉加斯向岡薩勒斯投降，这时玻利瓦尔撤出拉瓜拉，他命令停泊在該城港灣的軍艦駛往庫馬納，并率領自己的殘部向巴塞洛納退却。1814年8月8日，博韦斯击败了阿尔圭塔的起义者，玻利瓦尔就在当天夜間偷偷离开了自己的部队，繞道赶往庫馬納，在那里他不顾里巴斯的憤怒的抗議，立即偕同馬里尼約以及其他几个軍官一起搭乘“比安基号”軍艦离去。如果里巴斯、帕埃斯和其他將領也追隨执政者逃跑的話，那末一切都完了。他們到达馬加里塔島的胡安格里耶哥，阿里斯門迪將軍把他們当做逃兵对待，命令他們离境，他們就前往卡魯帕諾，但在那里也受到貝尔穆德斯上校同样的对待，因而又轉程去卡塔黑納。在这里，他們为了冲淡逃跑所造成的印象，发表了措詞冠冕堂皇的表白性的文告。

玻利瓦尔由于参与为推翻卡塔黑納政府而策划的密謀活动，不得不离开这个小共和国，轉到通哈，新格拉納达联邦共和国²³⁵的議會正在那里举行會議。这时孔迪納馬卡省领导了一些不承认格拉納达联邦条約的独立省份，而基多、帕斯托、圣馬尔塔和其他一些省还处于西班牙人統治之下。玻利瓦尔于1814年11月22日到达通哈，被議會任命为联邦军队的总司令，并接受了两重任务——先迫使孔迪納馬卡省的主席承认議会的权力，然后向还控制在西班牙人手里的新格拉納达唯一設防海港圣馬尔塔进发。前一任务毫不費力地完成了，因为这个表示不滿的省份的首府波哥

大是沒有防禦的城市。尽管波哥大已經投降，玻利瓦尔仍然允許自己的士兵洗劫这个城市 48 小时。在圣馬尔塔，西班牙的蒙塔尔沃將軍只有一支不到 200 人的弱小守軍和一个防禦工事极为薄弱的要塞，他为了保证自己能够逃跑，已經租定了一艘法国船；而該城居民通知玻利瓦尔說，在他来到的时候，他們将打开城門，并赶走守軍。但是玻利瓦尔沒有按照議会对他的指示去进攻盘据在圣馬尔塔的西班牙軍隊，却在敌視卡塔黑納城防司令卡斯提耳奥这种感情支配下，擅自率領部队去进攻这个业已加入联邦共和国的城市。他被击退后就在拉波帕——大約位于卡塔黑納火炮射程以內的一个大山岡——扎了营，并安下仅有的一門小火炮作为对付拥有大約 80 門火炮的要塞的炮台。然后他由圍攻轉为封鎖，封鎖一直持續到 5 月初，除了他自己的軍隊因逃跑和患病而由 2 400 人大概减少到 700 人之外，沒有别的結果。就在这个时候，莫里耳奥將軍指揮的一支龐大的西班牙远征軍于 1815 年 3 月 25 日从加迪斯到达馬加里塔島；远征軍向圣馬尔塔增派了大批援軍，然后立即占領卡塔黑納。但在这以前，玻利瓦尔于 1815 年 5 月 10 日已在大約 12 名軍官的伴随下乘了英国軍用两桅橫帆船前往牙买加。到达这个安全地点以后，他又发表了文告，說自己被某一秘密敌人或集团所陷害，并为自己在西班牙軍隊迫近时逃跑辯护，把自己說成是为了保持社会安宁才放棄指揮的。

在玻利瓦尔逗留在京斯敦的 8 个月中，被他拋棄在委內瑞拉的將領以及馬加里塔島的阿里斯門迪將軍都对西班牙軍隊进行了頑强的抵抗。但是，里巴斯（玻利瓦尔依仗他才博得声誉）在馬土临失陷后被西班牙人枪决了，接替他上台的是另一位具有更大才能的人，这个人因为是外国人，在南美革命中不能起独立自主的作

用，所以他最后决定在玻利瓦尔领导下进行活动。这个人就是路易·布里昂。他为了援助革命者，乘了二十四炮式的輕巡航舰从倫敦駛往卡塔黑納，这艘軍艦大部分是由他自己出資装备的，舰上載運了 14 000 套武器和大量軍用物資。因为他来得太迟了，对这个地区的起义者已經用不上了，所以他就从这里駛往海地²³⁶ 的凱斯，因为在卡塔黑納投降以后許多流亡的爱国者已聚集到这个地方来了。同时玻利瓦尔也从京斯敦前往太子港，在太子港，海地總統佩蒂昂为了响应他提出的解放奴隶的諾言，表示願意給予他一切物质的支援，以便他重新組織远征軍去討伐在委內瑞拉的西班牙人。他在凱斯遇見了布里昂和其他流亡者，在全体大会上，他提議让他担任新的远征軍司令官，条件是在共同的議會召开以前，民政权和軍权統一归他掌握。大多数人接受了他的条件，1816 年 4 月 16 日远征軍出发了，以玻利瓦尔为司令官，布里昂为海軍司令。在馬加里塔島，玻利瓦尔把当地部队指揮官阿里斯門迪吸收到了自己这方面来，阿里斯門迪已經使西班牙人在島上只占有一个据点，即潘帕塔尔。阿里斯門迪取得了玻利瓦尔的正式諾言：他一控制国家，就在委內瑞拉召开国民議會，因此阿里斯門迪在拉-維利亚-德尔-諾尔特城的教堂里召开了洪达，公开宣布玻利瓦尔为委內瑞拉和新格拉納达共和国总司令。1816 年 5 月 31 日，玻利瓦尔在卡魯帕諾登陸，但是他沒有坚决阻止馬里尼約和皮阿尔离开他，讓他們自担風險地去攻打庫馬納。他因这次分离而削弱，便按照布里昂的劝告，开往奧庫馬雷，他率領 13 艘舰船(其中只有 7 艘是武装的)于 1816 年 7 月 3 日抵达該地。他的軍隊共 650 人，由于招募了他已宣布解放的黑人，大約增加到 800 人。在奧庫馬雷，他又发表文告，提出“消灭暴君”和“把人民召集起来，由人民委派

自己的代表参加議會”的諾言。当他向巴倫西亚推进的时候，他在离奧庫馬雷不远的地方，遭遇了率領一支約 200 名士兵和 100 名民团的队伍的西班牙莫拉勒斯將軍。当莫拉勒斯的猎兵驅散了他的先头部队的时候，据一个目击者說，他失去了

“任何一点鎮靜；一句話不讲，就迅速掉轉馬头，向奧庫馬雷飞奔而去，經過村庄，到了邻近的港灣，跳下馬，坐上小船，再登上‘迪安努号’軍艦，并命令整个分舰队跟随他去博內尔小島，而把自己的战友全都丢下不管了”²³⁷。

他在布里昂的指責和規劝的影响下，又去联合庫馬納沿海地区的其他指揮官了，但是遭到他們的严厉对待，而且皮阿尔威胁要把他送交軍事法庭以逃兵和胆小鬼論罪，因此他又立即前往凱斯。布里昂經過几个月的努力，終于說服了大部分感到必須有一个哪怕是名义上的中心的委內瑞拉軍事长官重新承认玻利瓦尔为总司令，但他必須召开議會和不干預民政管理。1816 年 12 月 31 日，他帶了佩蒂昂提供的武器、彈药和粮食到达巴塞洛納。1817 年 1 月 2 日，阿里斯門迪投奔了他，1 月 4 日，他宣布处于战时状态，并把全部政权集中在自己手里；但是过了五天，阿里斯門迪中了西班牙人的埋伏，这位执政者就逃回了巴塞洛納。部队重新在巴塞洛納集合，布里昂还給玻利瓦尔調来了火炮和增援部队，因此他又立即建立了一支 1 100 人的新队伍。4 月 5 日，西班牙人占領巴塞洛納城，爱国者的部队退到巴塞洛納城外的养老院大楼，該建筑物按照玻利瓦尔的命令构筑了防御工事，但是它不能在猛攻情况下用来掩护 1 000 人的守軍。4 月 5 日夜間，他离开部队，把指揮权交給了弗萊特斯上校并告訴他說，他出去寻找新的部队，很快就回来。弗萊特斯相信了他的話，拒絕了劝降，因此在敌人强攻以后，他和全体守軍都遭到了西班牙人的屠杀。

皮阿尔是有色人，生于庫拉索，他企图征服并征服了圭亚那，而布里昂海軍司令用他的炮艇来支持了他的这一行动。7月20日，在西班牙人退出圭亚那全省以后，皮阿尔、布里昂、塞亚、馬里尼約、阿里斯門迪等人在安哥斯土拉召开了省議會，推举三执政来领导政府；布里昂憎恨皮阿尔，他特别关心玻利瓦尔的成就，并为此花了大笔私产，力求使玻利瓦尔（虽然他不在）被任命为三执政的成員。玻利瓦尔得到这个消息以后，离开了躲避的地方，来到安哥斯土拉，在那里他受到布里昂的鼓励，解散了省議會和三执政，用他本人领导的“国家最高委员会”来代替它們，而布里昂和弗朗西斯科·安东尼奥·塞亚分别成为軍事部和政治部的领导人。然而，曾經威胁要把玻利瓦尔送交軍事法庭以逃兵論罪的圭亚那的征服者皮阿尔百般諷刺“退却的拿破侖”。因此，玻利瓦尔想除掉他。根据捏造的所謂皮阿尔阴谋反对白人、企图杀害玻利瓦尔、夺取最高权力的罪名，皮阿尔便受到布里昂主持的軍事法庭的审讯，定了罪，判处死刑，并于1817年10月16日枪决。他的死使馬里尼約胆战心寒。馬里尼約完全知道，沒有皮阿尔，自己就微不足道，他在一封用奴顏婢膝的口吻写的信里公开誹謗自己被害的朋友，否定了自己同解放者竞争的做法，祈求玻利瓦尔寬宏大量，对他开恩。

皮阿尔征服圭亚那，使情况起了有利于爱国者的根本变化；仅仅这一个省給他們提供的資源就比委內瑞拉所有其他七省的总和还要多。因此人們普遍地期望，玻利瓦尔以新文告宣布进行的新战争能把西班牙人彻底赶走。第一份公报把几支退出卡拉博索的西班牙馬秣采购兵的小队伍，渲染为“一見我們常胜軍就逃跑的軍隊”，不言而喻，这是为了不使人們的希望落空。玻利瓦尔有9 000

多人，他們的武器精良，装备齐全，并得到战争所必需的一切东西的大量供应，而他們的手西班牙军队大約只有 4 000 人，而且莫里耳奥还没有来得及把他們集中起来。可是在 1818 年 5 月底以前，玻利瓦尔却打了大約十二次敗仗，俄利諾科以北的所有省全被丢失。因为他分散了自己在数量上占优势的兵力，所以他的部队往往被各个击破。他让帕埃斯和其他的部下去作战，而自己溜到安哥斯土拉去了。接連不断的丧师失地，看来快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了。正在这个紧要关头，各种有利情况的凑合，使形势再次起了变化。玻利瓦尔在安哥斯土拉遇到新格拉納达人桑坦德，他請求玻利瓦尔帮助他攻入該地，因当地居民已經准备好了反西班牙人的总起义，玻利瓦尔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这一請求。当时英国提供了人力、船舶和軍用物資等大量的援助，英国、法国、德国和波兰的軍官也从四面八方涌向安哥斯土拉。最后，曾因南美革命遭到挫折而失望的赫尔曼·罗西奥博士也出現了；他对玻利瓦尔发生了影响，促使他于 1819 年 2 月 15 日召开国民議會，仅仅国民議會的名义就成了建立一支 14 000 人左右的新军队的极有力工具，这样，玻利瓦尔才得以恢复进攻行动。

外国軍官們向玻利瓦尔提出了一个計劃，按照这个計劃他必須假装打算进攻加拉加斯并要把委內瑞拉从西班牙桎梏中解放出来，从而迫使莫里耳奥削減他在新格拉納达的兵力，把兵力集中去防守委內瑞拉，而他（玻利瓦尔）应趁这个时机突然轉向西面同桑坦德的游击队会合，进軍波哥大。为了实现这个計劃，玻利瓦尔于 1819 年 2 月 24 日离开安哥斯土拉，任命塞亚在他不在期間为議会的議長和共和国的副总统。由于帕埃斯的机动，莫里耳奥和拉·托雷在阿查古阿斯被击潰，如果当时玻利瓦尔能使自己的部

队同帕埃斯和馬里尼約的队伍会师的話，那末他們就会被完全消灭。不管怎样，由于帕埃斯的胜利才占領了巴里馬省，这就为玻利瓦尔打开通向新格拉納达的道路。当桑坦德在这里把一切准备就绪以后，主要由英国人組成的外籍軍队以7月1日、23日和8月7日在通哈省取得的一系列胜利²³⁸决定了新格拉納达的命运。8月12日，玻利瓦尔胜利进入波哥大，而西班牙人由于格拉納达的所有省都举行起义，而不得不困守在設防城市莫姆波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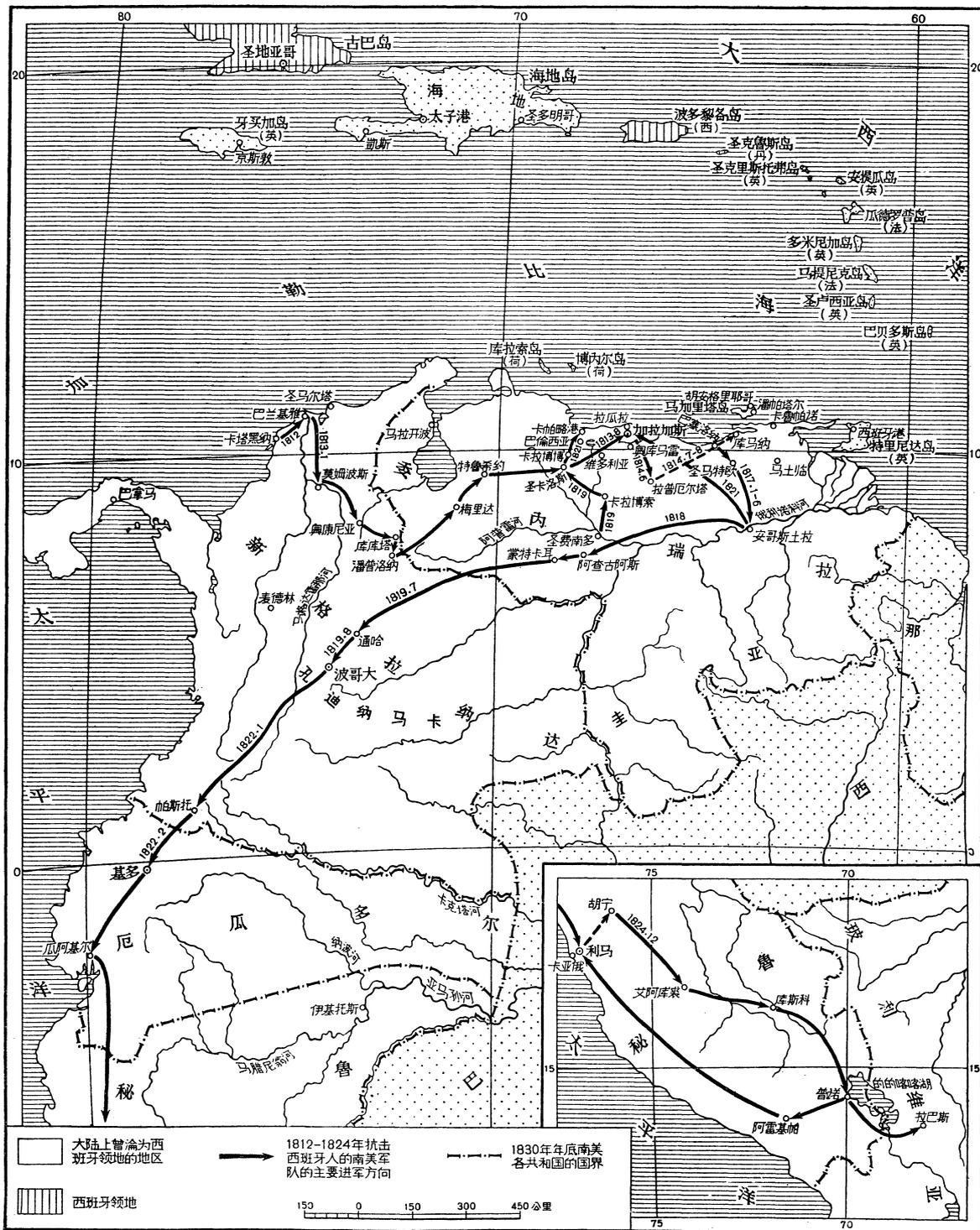
玻利瓦尔在波哥大組織格拉納达議會，并任命桑坦德將軍为总司令之后，前往潘普洛納，在那里，他在宴会和舞会中消度了約两个月。11月3日他到达委內瑞拉的蒙特卡耳，命令当地具有爱国心的軍事长官和他們的部队集結起来。这时他掌握約200万美元的款項（这是通过强制性的軍稅从新格拉納达居民征收来的），拥有一支人数約9000名的整装待发的軍队（这支軍队三分之一由紀律非常严明的英国、爱尔兰、汉諾威和其他外籍軍队組成），而他面前的敌人則已丧失了一切手段，名义上的兵力也只有約4500人，其中三分之二是西班牙人所不能信賴的当地居民。由于莫里耳奧从阿普雷河岸的圣費南多撤到圣卡洛斯，玻利瓦尔一直追击到卡拉博索，这样敌对双方的大本营相距只有两天的行程。如果玻利瓦尔勇敢地向前推进，那末单靠他的欧洲部队也可以粉碎西班牙軍队，但是他宁願把战争再拖延五年。

1819年10月，安哥斯土拉的議會迫使他的代理人塞亚辞职，选出阿里斯門迪代替他。玻利瓦尔得到消息以后，突然把自己的外籍軍团派到安哥斯土拉，使阿里斯門迪措手不及（他只有600名当地居民組成的士兵），把阿里斯門迪赶到馬加里塔島，使塞亚恢复了原职。經過罗西奧博士（以中央集权的前景吸引了玻利瓦尔）

的說服，他宣告成立了包括新格拉納達和委內瑞拉的“哥倫比亞共和國”，頒布了由羅西奧本人起草的新國家的根本法，並同意成立兩個地區的共同的議會。1820年1月20日玻利瓦爾重新回到阿普雷河岸聖費南多。西班牙人害怕外籍軍團更甚於害怕十倍數量的哥倫比亞人，玻利瓦爾突然撤走外籍軍團，就使莫里耳奧重新有可能集結增援部隊，而且在這個時候有消息說，西班牙準備派出一支由奧當奈爾指揮的大規模的遠征軍，這一消息提高了西班牙部隊已經低落的士氣。玻利瓦爾雖然擁有優勢兵力，但是在1820年的戰爭期間竟毫無進展。就在那個時候，從歐洲傳來消息說，累翁島的革命²³⁹以暴力制止了原定的奧當奈爾指揮的遠征。在新格拉納達，22個省中有15個加入了哥倫比亞政府，控制在西班牙人手裡的只有卡塔黑納要塞和巴拿馬地峽。在委內瑞拉，8個省中有6個服從哥倫比亞的法律。在這樣的形勢下，玻利瓦爾卻接受了莫里耳奧所誘使的談判，結果於1820年11月25日在特魯希約簽訂了為期6個月的休戰協定。在休戰協定中甚至不提哥倫比亞共和國，雖然議會已經明確規定，西班牙司令官不先承認共和國的獨立，就不准同他們簽訂任何條約。

莫里耳奧因急於參預西班牙的事務，於12月17日乘軍艦去卡柏略港，把總指揮權交給了米格爾·德·拉·托雷，而玻利瓦爾於1821年3月10日寫信通知拉·托雷說，30天過後，就要恢復軍事行動。西班牙人在卡拉博博（這個村鎮大概位於從聖卡洛斯到巴倫西亞的中途）佔據了堅強的障地；但是拉·托雷沒有在這裡集合他的全部兵力，而只集中了第一師，即2500名步兵和1500名左右的騎兵，然而玻利瓦爾擁有6000名步兵（包括不列顛軍團1100人在內）和帕埃斯指揮的3000名草原牧民²⁴⁰所組成的騎

拉丁美洲各国的独立斗争 (玻利瓦尔军队的进军)



兵。玻利瓦尔非常害怕敌人的陣地，因此他向軍事會議建議簽訂新的休战协定，但是被他的部下拒絕。帕埃斯指揮主要由不列顛軍團組成的纵队，沿着小路迂迴敵軍右翼；在他胜利地完成了这个机动之后，拉·托雷在西班牙人中第一个逃跑了，一直逃到卡柏略港，他和殘余部队一起在那里困守。如果胜利的軍隊当时迅速逼近，那末卡柏略港的要塞本身也势必投降，但是玻利瓦尔由于在巴倫西亚和加拉加斯举行人民晋謁盛典而丧失了时机。1821年9月21日，坚固的卡塔黑納要塞向桑坦德投降了。委內瑞拉的最后战绩——1823年8月的馬拉开波海战和1824年7月的卡柏略港的被迫投降，都是帕迪利亚的功劳。阻止了奥当奈尔出发远征的累翁島革命和不列顛軍团的援助显然保障了哥倫比亞人取得最后的胜利。

哥倫比亞議會于1821年1月在庫庫塔召开會議；議會于8月30日頒布了新宪法，而在玻利瓦尔再次假装辞职之后，又恢复了他的全权。玻利瓦尔签署了新宪法，并获准向基多省进军（1822年），而西班牙人由于普遍的人民起义²⁴¹而被赶出巴拿馬地峽以后就撤退到該省。这次战争以基多、帕斯托和瓜阿基尔归并哥倫比亞而告終，在这次战争中名义上由玻利瓦尔和苏克萊將軍領導，但是，远征部队所以能取得不多的胜利，还全应归功于包括桑茲上校在內的英国軍官。在1823—1824年同上秘魯和下秘魯的西班牙人作战^①期間，玻利瓦尔就已认为不需要再充当統帥了，就把整个軍事領導权授与苏克萊將軍，而自己仅限于参加凱旋的入城式、发表宣言和宣布宪法。他依靠他的哥倫比亞禁卫軍，对利馬議會

① 見本卷第172—173頁。——編者注

的表決施加影响，利馬議會于 1823 年 2 月 10 日委任他为执政者，而他又提出辞职声明以便使自己重新当选为哥伦比亚总统。同时，由于英国正式承认新国家和苏克莱将军占领上秘鲁各省（苏克莱把这些省合并成独立的玻利维亚共和国），玻利瓦尔的地位得到了巩固。玻利瓦尔在苏克莱武力控制的这个地区充分发展了他对专制统治的喜爱，例如他模仿 Code Napoléon²⁴² 而制定了“玻利维亚法典”。他打算推广这个法典，使它从玻利维亚传到秘鲁，再从秘鲁传到哥伦比亚，同时他利用哥伦比亚军队控制前两个国家，而利用外籍军团和秘鲁士兵控制哥伦比亚。他凭借武力和阴谋确实把自己的法典强加给了秘鲁，至少有几个星期。他，哥伦比亚的总统和解放者、秘鲁的保护人和执政者、玻利维亚的教父，这时已经到达了荣誉的最高峰。但是在哥伦比亚，中央集权派，即玻利瓦尔派同军事无政府状态的反对者和玻利瓦尔的军事对手联合组成的联邦派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在玻利瓦尔的教唆下，哥伦比亚议会提出了对委内瑞拉副总统帕埃斯的控诉书。在这以后，帕埃斯就公开叛乱，而这个叛乱是得到玻利瓦尔本人秘密的支持和鼓励的，因为他需要利用暴动来作为撕毁宪法和重新获得独裁权力的借口。玻利瓦尔从秘鲁回来，除了自己的禁卫军以外，还带来了 1 800 名秘鲁兵，似乎是要镇压联邦派的叛乱。但是，他在卡帕略港同帕埃斯会了面，他不仅批准帕埃斯继续留在委内瑞拉的指挥岗位上，对所有的叛乱分子宣布特赦，而且还公开站在他们这一边，谴责宪法拥护者；根据 1826 年 11 月 23 日在波哥大颁布的法令，他掌握了独裁全权。

从 1826 年起他的统治开始衰落，这一年他争取到召开巴拿马会议²⁴³，会议在名义上是为了制定国际法的新的民主准则而召开

的。哥伦比亚、巴西、拉普拉塔、玻利维亚、墨西哥、危地马拉等的代表都到会了。实际上，玻利瓦尔竭力想使整个南美洲变为一个联邦共和国，并打算由自己担任共和国的执政者。正当他还充满幻想，要使整个半球同他的名字连在一起的时候，他的实际统治权却很快就从他的手中滑脱了。在秘鲁的哥伦比亚军队得知他准备实施玻利维亚法典之后就开始起义。秘鲁人选出拉·马尔将军为共和国总统，并援助玻利维亚人把哥伦比亚军队赶走，甚至对哥伦比亚进行了胜利的战争，结果签订了条约，规定哥伦比亚回到原先的疆界，建立两国平等关系和分开两国的国债。玻利瓦尔为了修改宪法以巩固他的独裁统治而在奥康尼亚召开了议会，议会于1828年3月2日开幕，会上宣读了一个长篇报告，报告中证明政府迫切需要新的特权。但是，当大家清楚地看出，宪法修改草案通过后必将同它原来的面目完全不一样的时候，玻利瓦尔的朋友们就不再出席会议，使议会得不到法定人数，从而迫使议会停止了活动。玻利瓦尔去到离奥康尼亚有几英里远的他的庄园，发布了另一个宣言，他在宣言中对他的朋友们的做法佯装不满，同时攻击议会，号召各省采取非常措施，并宣称他愿意接受将加在他身上的任何一种权力重担。在他的武力胁迫下，加拉加斯、卡塔黑纳以及他当时去到那里的波哥大等地的国民大会再一次授与他独裁统治权。在波哥大，他在卧室里遇刺，幸亏他在黑暗中从阳台跳下，躺在桥下隐藏才脱了险，这一事件促使他在短期内实行类似军事恐怖的措施。虽然桑坦德参加了这次阴谋，但是玻利瓦尔没有触犯他，却把帕迪利亚将军判处死刑，帕迪利亚的罪名根本没有得到证实，但他是一个有色人，不能为自己申辩。

由于1829年激烈的派系斗争震撼了共和国，玻利瓦尔再次在

告公民书中，要求他們坦率表明对宪法应当如何修改的意見。加拉加斯的名流會議对此的回答是，譴責他貪图功名，揭露他行政管理上的弊病，并宣布委內瑞拉脫离哥倫比亚，推举帕埃斯領導共和国。哥倫比亚的參議院支持玻利瓦尔，但是各地再次爆发了起义。他于1830年1月第五次引退，随后又担任总統，并离开波哥大，用哥倫比亚議會的名义去討伐帕埃斯。1830年3月底，他率領8000人开始进攻，占領了爆发起义的卡拉庫塔，然后向馬拉开波省进攻，帕埃斯带了12000人在該地严陣以待。他一知道帕埃斯打算同他認真較量，他就失去了勇气。他一度甚至想向帕埃斯屈服并宣布自己反对議會；然而这时他的拥护者在議會中已經喪失了自己的影响，他也就不得不辞职，而且人們向他示意，这一次他必須認真地对待辞职，如果同意出国，可以得到年金。因此他于1830年4月27日向議會递交了卸去全权的声明书。但是玻利瓦尔指望依靠他的拥护者的影响重新恢复权力，并利用哥倫比亚新总統华金·莫斯克腊所遭到的反对，尽量拖延自己离开波哥大的日子，并且在种种借口下把自己停留在圣彼德罗的时期延长到1830年年底，但就在这个时候他突然死了。

杜庫德雷-霍尔施坦对玻利瓦尔作了如下的刻划：

“西蒙·玻利瓦尔身高5英尺4英寸；长圓臉，两腮凹陷，皮肤黝黑而发青。有一双不大不小的深陷的眼睛，头发稀少。鬍子使他显得阴沉和粗野，特別在他激动的时候。他的体格瘦弱。从他外貌上看有65岁。他在走路的时候老是摆动双手。不能走很多路，极易疲倦。他喜欢在吊床上坐着或躺着。他常常勃然大怒，这时他就馬上失去理智，跳上自己的吊床，咒罵周圍一切人。他以刻薄地嘲笑不在場的人为乐事；他只閱讀輕松的法国小說；他是个勇敢的騎手，酷爱华尔茲舞。他非常欣賞自己的演說，喜欢举杯致詞。他在倒霉的时候，或者在他急需別人帮助的时候，他就一点也不激动，也不冒

火。他变得温和、有耐性、随和、甚至是馴服的人了。他极力掩飾自己的缺点，装作是受过所謂 beau monde [上流社会] 教养的彬彬有礼的人，他几乎具有亚洲人的装模作样的才能，他比他的大多数的同胞都更了解人的本性。”²⁴⁴

根据新格拉納达議会的法令，玻利瓦尔的遗体于 1842 年运送到加拉加斯，在那里为他树立了一个紀念碑。

見“玻利瓦尔的生平。杜庫德雷-霍尔斯坦將軍著，并由阿尔丰斯·維奧累續写到玻利瓦尔逝世”(1831 年巴黎版)；“約翰·密勒將軍(曾在秘魯共和国的軍隊中供职)回忆录”；希皮斯利上校的“俄利諾科游記”(1819 年倫敦版)²⁴⁵。

卡·馬克思写于 1858 年 1 月 8 日
左右
載于“美国新百科全书” 1858 年版
第 3 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弗·恩格斯

战局

战局——这一术语往往是指战争时期在一年内所进行的军事行动。但是，如果这些军事行动是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独立的战区內进行的，那末把它们看做一个战局就未必合乎逻辑了。例如，人们不按照这个词的严格含义而称为 1800 年战局的，却是两个毫不相关的独立的战局：意大利（馬連峨）战局和德国（霍根林登）战局²⁴⁶。另一方面，自从各国军队几乎都不再调回冬季营地以来，年终就不一定是一系列明显相关的军事行动的结束和另一系列军事行动的开始的界限了。现在，在战争中有许多其他的军事和政治情况比季节的变换所起的作用更重要得多。譬如，1800 年的两个战局都分为两个独立的阶段，这是因为 7 月到 9 月的全面停战的缘故，而且德国战局虽然在 1800 年 12 月结束了，但是，意大利战局到 1801 年 1 月整个上半月还在继续着。克劳塞维茨正确地指出，1812 年战局显然不是在该年的 12 月 31 日结束的，因为当时法军还在尼門河地区，他们正处于退却高潮。这个战局只是在 1813 年 2 月法军渡过易北河，在那里重新积聚兵力时才结束的，因为把他们赶回本土的军队这时已停止行动²⁴⁷。然而，在我们居住的纬度地带，冬季终究仍是作战军队因疲惫和艰困而力量特别薄弱的季节，所以这个季节往往正是双方休战和养精蓄锐的时期。

战局这个词,虽然就严格的含义来说是指根据一个战略计划、为达到一个战略目的而进行的一系列的军事行动,但是,为了方便起见在多数场合也不妨以其中主要的战斗行动发生的年代来命名。

弗·恩格斯写于 1858 年 1 月 7 日
左右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9 年版
第 4 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CAPTAIN

Captain——步兵連、騎兵連或騎兵半連的指揮官以及軍艦指揮官的軍銜。在欧洲大陆大多数国家的軍隊中，*captain* 屬於尉官一級；在英国軍隊中，*captain* 是介乎校官和尉官之間一級的軍官，因为在英国，列入尉官這一級的仅仅是那些具有軍官毕业证书、但按其軍銜并不履行直接的和固定的指揮职权的人。在美国軍隊中，*captain* 負責本連的武器、彈药、軍服等。在海軍中 *captain* 的職責非常广泛，并且他的职位是最負責的职位之一。在英国海軍中，*captain* 按軍銜來說相当于陸軍中的中校，他获得这个軍銜以后經過三年就相当于陸軍中的上校。在旧时法国海軍中，*captain* 是不准离开自己軍艦的，違者处以死刑，因此他宁願把軍艦炸毀也不使它落入敌手。称 *captain* 的还有商船船长、客船船长和战列艦的各种海軍軍士长，例如：*captain of the forecastle* [前甲板軍士长]、*captain of the hold* [艙段軍士长]、*captain of the main and fore tops* [中下桅桅楼长]等。《*Captain*》一詞源出于意大利文^①，

① 意大利文是《*capitano*》。——編者注

意即居于领导地位的人，因此这个词经常被用作“总司令”的同义词，特别是指他作为统帅的才能而言。

弗·恩格斯写于 1858 年 1 月 7 日
左右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 1859 年版
第 4 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馬槍²⁴⁸

馬槍(carabine 或 carbine)——騎兵使用的一種短管槍。為了便于在馬鞍上裝彈，它的槍管的長度不應超過 2 英尺 6 英寸(只要它不是後裝的)；為了便于單手使用它，它必須比步兵用的槍輕。在大多數國家的軍隊中，馬槍的口徑也比步兵用的火器的口徑略小。馬槍可以分為滑膛的和綫膛的兩種；在前一種情況下，它的射擊效果比普通槍低得多；在後一種情況下，按平均距離上的射擊精度來說，馬槍超過普通槍。在英國軍隊中，騎兵裝備滑膛馬槍；在俄國騎兵中，全部輕騎兵裝備綫膛馬槍，而胸甲騎兵只有四分之一使用綫膛馬槍，其餘四分之三使用滑膛馬槍。在某些國家的軍隊(特別是法國軍隊和英國軍隊)中，炮兵也使用馬槍；在英國，馬槍是按恩菲耳德新式步槍²⁴⁹的原理製造的。有一個時期，馬槍射擊曾是騎兵戰鬥的主要形式，但現在，馬槍主要在執行警戒勤務和騎兵對射時使用。在法國的軍事著作中，«carabine»一詞總是指步兵用的綫膛槍，而以 «mousqueton»[“短火槍”]這個詞表示騎兵用的馬槍。

弗·恩格斯寫于 1858 年 1 月 21 日
左右

載于“美國新百科全書”1859 年版
第 4 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美國新百科全書”

俄譯文第一次發表

弗·恩格斯 卡倫炮

卡倫炮——短管铁炮，最初于 1779 年在卡倫(苏格兰)是为了供应英国舰队而鑄造的，在对美战争²⁵⁰ 中第一次使用。卡倫炮沒有耳軸，依靠炮身中部下面的卡箍安装在炮架上。炮膛有药室，炮口像碗口那样大。这种炮很短、很輕便：每 60—70 磅重的炮使用 1 磅重的实心彈，它的长度相当于口徑的 7—8 倍。因而装药不能不是少量的，只占实心彈的重量十六分之一至八分之一。

卡倫炮在最初采用的时候，极受水兵欢迎。它的重量輕，后座小，在当时的小型軍舰上能大量装置。卡倫炮射程比較远的原因是：(1) 炮彈在炮膛中的間隙小，(2) 由于炮尾的金屬厚和炮身短，炮膛的軸綫和瞄准綫之間的角度大；卡倫炮发射的炮彈重量大，所以它在近距离上是一种威胁性极大的武器。美国舰队于 1800 年左右使用卡倫炮。但很快就查明，这种型式的炮比不上使用全装药和按小射角进行射击的、炮管更长的重炮。例如，已經查明，英国軍队的普通长管炮在按 2 度射角(发射爆炸彈的加农炮則按 3 度射角)进行射击时，同相应口徑的卡倫炮在按 5 度射角进行射击时，它們的射程是一样的(即 1 200 碼左右)。因为射角大，命中率就小，所以卡倫炮按 5 度射角进行射击，射程决不可能超出 1 200 碼，而长管炮最有效的火力則可达到 1 英里，甚至 2 000 碼。

例如 1812—1814 年英美战争²⁵¹ 时期，在伊利湖和安大略湖两支敌对的分舰队的行动就完全说明了这一点。当时美国舰船装备长管炮，而英国舰船主要装备卡伦炮。美国人在英国卡伦炮的火力范围以外进行机动，他们又用长管炮射击，使敌舰舰体和索具遭到严重的损毁。由于卡伦炮有这些缺点，现在不再使用它了。在陆地上英国人有时把卡伦炮安置在棱堡的侧面和穹窿里，因为只要利用一小段壕沟就可以从那里进行侧射，而且大部分采用霰弹。法国军舰采用带有耳轴的卡伦炮(carronade á tourillons)；但这在实质上已是大威力火炮了。

弗·恩格斯写于 1858 年 1 月 21 日
左右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9 年版
第 4 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霰 彈²⁵²

霰彈(case shot 或 canister shot)——裝入圓柱形白鐵彈殼中的一系列由鍛鐵制成的球形彈丸。供野炮使用的彈丸通常是一層一層地裝的，但大多數攻城炮和海軍炮使用的彈丸只是倒入圓筒，裝滿以後把蓋板焊接上。在圓筒底部和裝藥之間插放木彈座。彈丸的重量根據炮的類型和各國軍隊規定的標準而有所不同。英國人在重型海軍炮上使用的是重量為 8 盎斯至 3 磅的彈丸；在九磅野炮上使用的是重量為 1.5 盎斯和 5 盎斯的彈丸；而且用這種炮發射一次，圓筒內需相應地裝 126 顆彈丸和 41 顆彈丸，普魯士人裝 41 顆彈丸，而且每一顆彈丸的重量為相應球形實心彈的重量的三十二分之一。法國人在 1854 年以前幾乎也是採用這種裝法；至於因裝備發射爆炸彈的新式加農炮而在这方面可能引起變化的問題，我們現在還沒有什麼可談的。攻城炮和要塞炮使用的球形彈丸有時裝在突出於木彈座上的心軸周圍，它們或者像一串葡萄似的裝在袋子里（因而有 «grape shot»^① 之稱），或者一層一層排均勻，中間用圓的木片或金屬片隔開，再整個套進帆布袋。

最新型的霰彈是球形霰彈，以它的發明人英國將軍施拉普奈爾的名字命名，稱為施拉普奈爾爆炸彈。這種炮彈具有薄的生鐵

① «grape»——“一串葡萄”；«grape shot»——大霰彈，通常由 9 個球形彈丸組成的鏈式霰彈。——編者注

的彈壳(厚度为 $\frac{1}{3}$ — $\frac{3}{4}$ 英寸),中間帶有膜片或隔椽。底部用來裝置爆炸裝藥,上部裝置鉛制球形槍彈。在炮彈中放有裝滿精制起爆藥的炮彈信管,這種起爆藥能保證準時燃燒。為了不使球形彈丸移動,在彈丸之間的空隙處填滿了特製藥劑。在野戰中使用時,把炮彈信管截斷成射程所需要的那樣大小,再裝入炮彈中。信管的起爆藥在離敵人 50—70 碼的地方燒完,炮彈隨即爆炸,而向敵人那邊散射彈丸恰好是在發射普通霰彈時炮彈爆炸的地方。現在在某些國家的軍隊中,炮彈信管作用的精確度非常高,因此這種新炮彈使炮手可以在過去只有使用球形實心彈才能達到的距離上進行霰彈射擊而取得預期的效果。普通霰彈在 200 碼以內的距離上具有最大的威力,但在 500 碼以內的距離上也可以使用;在近距離上用它對付以橫隊進攻的步兵或騎兵,它的殺傷作用極大;但用它對付散兵綫,效果很小;對付縱隊用得更多的是球形實心彈。至於球形霰彈,它在 600 至 1 400 碼的距離上效果最大,如果有適當的射角和長的炮彈信管,那末即使在更遠的距離上也能奏效。因為球形霰彈在敵人附近爆炸,它向敵人猛烈散射的彈丸的密集度很大,所以可以用它來有效地對付幾乎除了散兵綫以外的所有戰鬥隊形。球形霰彈出現以後,幾乎所有歐洲國家的軍隊都採用了它,因為其中每一個國家都發明了自己特有的炮彈信管的起爆藥,而沒有起爆藥就不可能使用球形霰彈。在歐洲強國中只有法國還沒有掌握這一細部。但是今後的試驗(或者僥倖成功,或者通過收買),毫無疑問會使這個強國掌握這一秘密的。

弗·恩格斯寫於 1858 年 1 月 21 日左右

載於“美國新百科全書”1859 年版
第 4 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美國新百科全書”
俄譯文第一次發表

弗·恩格斯 燃 燒 彈

燃燒彈——裝滿易燃劑的炮彈，它在燃燒的時候，火焰通過三四個噴火孔射出來，火力極猛，很難把它撲滅。用臼炮、榴彈炮和加農炮發射這種炮彈就像發射普通爆炸彈一樣，它們的燃燒時間為8分鐘至10分鐘。這種藥劑或者用火熔化，在熾熱的時候注入炮彈，或者用液體潤滑脂把它做成濃密的物體，然後裝入炮彈。燃燒彈的彈孔用軟木塞或木塞堵住，裝滿了易燃劑的中心管通過這些塞子進入炮彈內部。以前這種炮彈內部裝有隔橡膠膜片，就像現代榴霰彈那樣；而且底部用來安置火藥這種爆炸裝藥；但現在不採用這種複雜的裝置了。從前還使用另一種類型的燃燒彈，形狀像輕的實心彈，由兩個圓形的互相交錯成直角的鐵環做成，在鐵環上緊裹粗麻布；因此形成不十分勻稱的球形體，內部裝滿像現在所使用的那種藥劑（主要的成分是火藥和樹脂）。但是這種燃燒彈現在已經不再使用了，因為它的重量極輕，幾乎不能用在稍遠的距離上進行比較準確的射擊。現在的燃燒彈所裝的藥劑很不相同，但所有這些藥劑的主要成分都是摻上含膠物質或含油物質的硝石和硫磺。例如普魯士軍隊，他們採用75分硝石、25分硫磺、7分碾碎的火藥和33分松香。英國人採用100分硝石、40分硫磺、30分樹脂、10分錫、10分油脂和10分松節油。燃燒彈主要是

在进行炮击的时候使用，有时用来轰击舰船，虽然在后一种情况下，燃烧弹几乎完全被炽热的实心弹代替了，因为这种炽热的实心弹制造比较容易，能进行比较精确的射击，燃烧的作用也大得多。

弗·恩格斯写于 1858 年 1 月 21 日
左右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9 年版
第 4 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药筒

药筒——紙的、羊皮紙的或絨布的套子或袋子，里面装有严格定量的、用作火器装药的火药；有时彈丸或炮弹同药筒連在一起。枪械的空包彈与軍用子彈不同，它不包含彈丸。在枪械的各种药筒中，把塞入內部的紙当药筒盖使用。法国米涅式步枪和英国恩菲耳德式步枪的药筒一端浸透滑油以便于填塞。普魯士針发枪的药筒还装有起爆药，它受击針的作用而爆燃。火炮的药筒通常是用絨布或輕而薄的毛織物做的。在某些国家的軍隊中，至少是野炮，药筒利用木彈座同炮弹連在一起（如果这是可能的話），法国人甚至在他們的海軍中也部分地采用这种方法。在英国軍隊中，無論野炮、海軍炮和攻城炮，药筒始終是同炮弹分开的。

在英国烏里治的皇家軍火庫中，不久以前采用了巧妙的方法制造无縫紙药筒。他們在金屬制成的空心圓柱型（它的大小正好能装进药筒）上，钻許多小孔，把这些圓柱型浸在做药筒紙用的稀紙浆里，然后把它們同抽出了空气的空气泵的套子連在一起，这时它們就糊上了薄薄的一层紙浆。这层紙浆干了以后就制成了一个紙筒。在制造药筒时是同时使用大量圓柱型的；把每一个圓柱型放在毛套里（就像套手指头那样），再使毛套粘上紙浆；这个毛套連紙层一起从圓柱型上取下来，就成为装配最好的药筒的衬垫。

猎枪使用的那种药筒是用金属网制成的,药筒里面只装霰弹。它们装置在纸的外壳里。霰弹的装药为了更稠密就拌上骨粉。用这种枪进行射击,霰弹不流散,而且比用其他任何装药射得更远。

弗·恩格斯写于1858年1月21日
左右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9年版
第4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崖路

崖路(筑城用語)——某一工事的壕沟內岸和胸墙外斜面之間的一條橫面土堤。它通常約有3英尺寬。它的主要用途是：加固胸墙和防止胸墙的泥土因暴雨、解冻或其他原因而坍塌到壕沟里去。崖路有时也能当作工事周圍的外部通路使用。然而不可忽視，崖路也是强攻部队和攀城部队休息和集中的最合适的地方，因此在很多永备工事体系里完全不采用它，而在另一些工事体系里，則用形成步兵射击时的掩护綫的齿形墙来保护这种崖路。在野战筑城中或在构筑前面帶有壕沟的攻城炮台时，通常是非有崖路不可的，因为壕沟的內岸几乎从来不砌面，而如果沒有这种空間，那末無論內岸或胸墙一受到天气变化的影响就会很快地崩坏。

弗·恩格斯写于1858年1月28日
左右

載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
第3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布倫海姆

布倫海姆（或称**布林德海姆**）——巴伐利亚的一个村庄，距奥格斯堡約 23 英里。1704 年 8 月 13 日，馬尔波罗和奥伊根亲王指揮的英国軍队和奥地利軍队同塔拉尔元帅、馬尔散和巴伐利亚选帝侯^①指揮的法国軍队和巴伐利亚軍队，在这里进行了一次大会战。当时由于奥地利各省受到敌人經德国直接入侵的威胁，馬尔波罗便从弗兰德出发前往援助它們。英奥两国商定在意大利、尼德兰和萊茵河下游采取防御行动，而把全部主力集中在多瑙河。馬尔波罗对謝倫山上的巴伐利亚軍的工事进行了强攻以后，渡过多瑙河与奥伊根亲王会师，随后这两支軍队立即开始向敌人进攻。他們发现敌人在涅貝尔河对岸，而在敌人的两翼前有布倫海姆和基青根这两个被敌軍固守的村庄。法軍为右翼，巴伐利亚軍为左翼。两軍防守几乎 5 英里的正面，各把騎兵配置在自己的两翼，因此一部分中央陣地就处于法国騎兵和巴伐利亚騎兵的共同防守之下。但是他們仍然沒有按照当时通用的战术規則来占领陣地。全部法国步兵共 27 个营，拥挤在布倫海姆；这对于按照当时編制組成的、只受过成綫式队形在平地作战的訓練的軍队來說，意味着陷

^① 馬克西米利安第二·艾曼努尔。——編者注

入了絕境。就在如此危險的情況下，他們遭到了英奧軍隊的突然攻击，馬尔波罗很快就利用了这种情况所造成的一切有利条件。对布倫海姆的攻击被击退后，他便突然将自己的主力調到中央，用他們突破了敵軍的中央。奧伊根亲王完成了粉碎孤立的巴伐利亞軍隊这个不太困难的任务，轉入了全面追击，而馬尔波罗則完全截断了被困在布倫海姆的 18000 名法軍的退路，迫使他們（包括塔拉尔元帅在內）繳械投降。法軍和巴伐利亞軍伤亡和被俘的共計 3 万人；胜利者損失約 11 000 人。这次会战是整个战局的决定性会战。巴伐利亞落到了奧地利人的手中，而路易十四則威信扫地了。

这次会战从战术观点来看具有特殊的意义。它极其清楚地說明了当时的战术同現代战术之間的巨大差別。同一种情况，即两翼前有两个居民点，这在今天会被认为是防御陣地的最有利的条件之一，而对于十八世紀的軍隊却成了失敗的原因。在当时，步兵完全不适于进行具有明显的非正規性质的散兵战，而在今天，散兵战却能使精銳部队防守的磚石房屋居民点成为几乎不可攻克的。在法国，一般在整个大陆，都根据邻近一个小鎮的名称而把这次会战称为霍赫施泰特会战，这个小鎮由于上一年 9 月 20 日在那里进行过一次会战²⁵³ 而早已聞名了。

弗·恩格斯写于 1858 年 1 月 28 日

左右

載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 年版
第 3 卷

原文是英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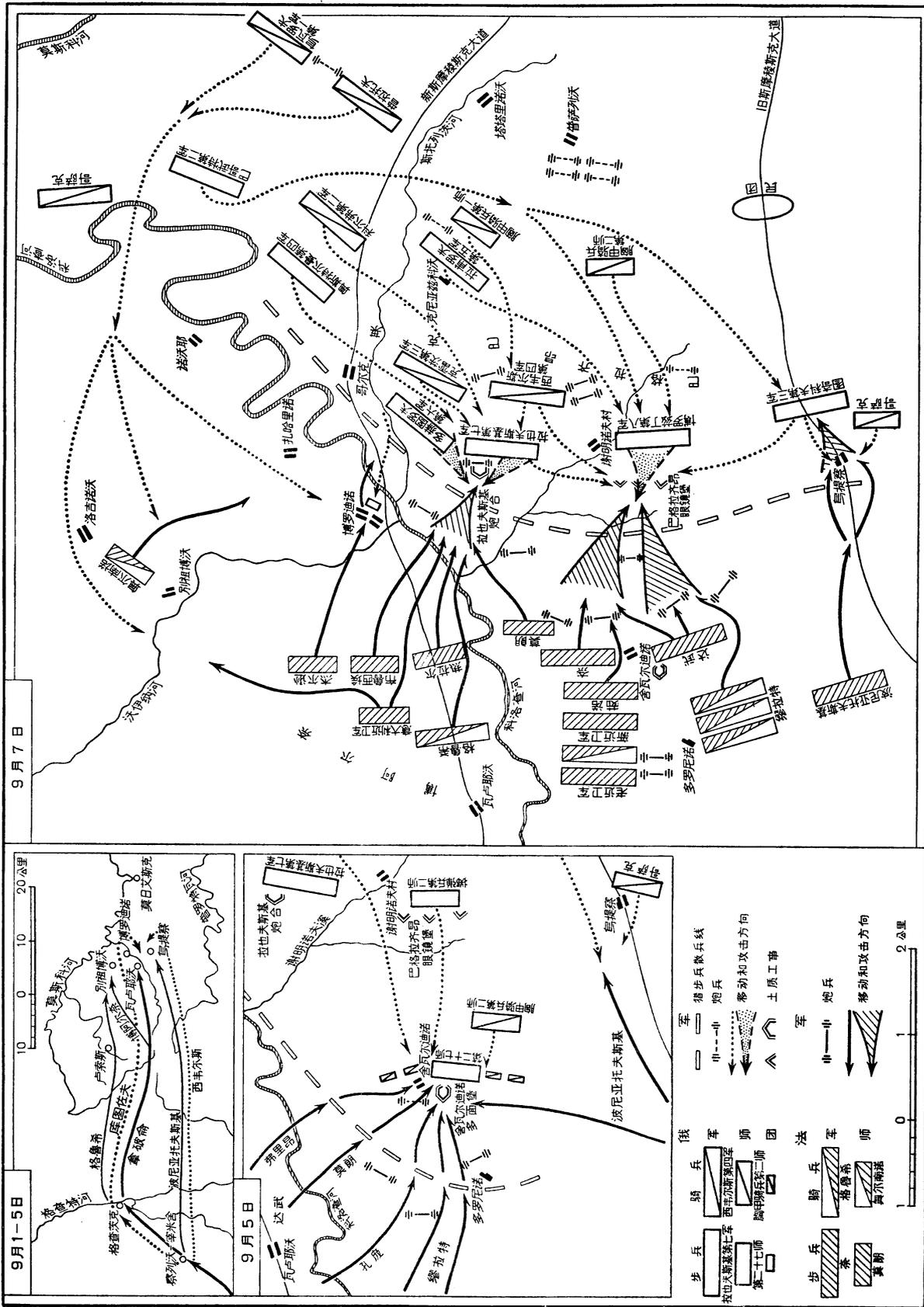
俄文譯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博罗迪諾²⁵⁴

博罗迪諾——俄国的一个村庄，位于科洛查河的左岸，在該河与莫斯科河汇合点的上方 2 英里处。俄国人用这个村庄的名字来称呼 1812 年解决夺取莫斯科問題的那次大規模会战，而法国人則称之为莫斯科会战或莫日艾斯克会战。战场在科洛查河的右岸。俄軍的右翼在从該河与莫斯科河的汇合点起到博罗迪諾止的地方，受到了該河的掩护；左翼成 en potence [拐子形] 向后折到小溪和雛谷的后面，这道雛谷是从极左翼的一点，即烏提察附近通向博罗迪諾的。雛谷后面的两座小山上构筑有不完整的多面堡，即眼鏡堡；其中距中央最近的一个称为拉也夫斯基多面堡，而左面小山上的三个多面堡叫巴格拉齐昂眼鏡堡。两座小山之間另有一道雛谷，与谷后的謝明諾夫村同名；这道雛谷从俄軍左翼起向下通往第一道雛谷，并在距科洛查河約 1 000 碼的地方与其相接。通往莫斯科的大道經過博罗迪諾，而旧道則經烏提察通向俄軍陣地后方的莫日艾斯克。这条長約 9 000 碼的防綫，由将近 13 万俄軍防守，而且俄軍占領的博罗迪諾位于陣地中央的前方。俄軍总司令是庫图佐夫將軍。他的軍隊分为两个軍团，較大的軍团由巴克萊-德-托利指揮，占領了右翼和中央陣地；較小的軍团由巴格拉齐昂指揮，占領了左翼陣地。陣地選擇得极不成功，法軍对左翼的攻击如

博 罗 迪 诺 会 战 (1812年9月5—7日)



9月7日

9月1-5日

0 10 20公里

果得手，就可以完全迂迴右翼和中央，如再能于俄軍右翼退却以前到达莫日艾斯克（而这是完全可能的），那末俄軍就会陷入絕境。然而，庫图佐夫在拒絕采用巴克萊所选择的察列沃-宰米舍村附近的有利陣地之后，已无另作选择的余地了。²⁵⁵

拿破侖亲自指揮的法軍計 125 000 人左右。新历 1812 年 9 月 5 日（旧历 8 月 26 日）法軍将俄軍左翼某些不坚固的战壕內的部队逐走后，准备于 9 月 7 日开始会战。拿破侖的計划是針對庫图佐夫的錯誤拟定的；他对俄軍的中央仅进行監視，而将兵力集中来攻击俄軍左翼，企图在此处突破，然后打通直达莫日艾斯克的道路。为此，欧仁亲王奉命对博罗迪諾进行佯攻，然后奈元帅和达武元帅即对巴格拉齐昂的部队和巴格拉齐昂眼鏡堡进行攻击，而波尼亚托夫斯基則应迂迴烏提察附近俄軍的极左翼。而当会战真正开始时，欧仁亲王应渡过科洛查河，攻击拉也夫斯基眼鏡堡。因此，真正的攻击正面不超过 5 000 碼，平均每碼 26 人，战斗队形纵深之大是前所未有的，这也是俄軍所以受到炮火巨大杀伤的原因。拂曉时，波尼亚托夫斯基的部队向烏提察前进并将它攻占，但是他的对手图奇科夫又把他逐出該地；不过，当后来图奇科夫不得不派一个师去支援巴格拉齐昂时，波兰人又重新占領了这个村庄。6 时，达武直接攻击巴格拉齐昂眼鏡堡的左翼，在前进时遭到十二磅炮的猛烈射击，他仅能用三磅炮和四磅炮还击。半小时以后，奈元帅直接攻击这些眼鏡堡的右翼，眼鏡堡得而复失，随后是一場激烈的战斗，但沒有决定性的結果。

但是，巴格拉齐昂机警地注視着指向他而来的巨大兵力，以及后面的强大預备队和法国近卫軍。真正的攻击方向已无可怀疑了。因此，他集中了一切可以集中的兵力，从拉也夫斯基和图奇科

夫的軍里各抽調一个师，从軍团的預备队中調来近卫軍和擲彈兵，并請求巴克萊把巴哥武特的一个軍全部派給他。这些为数 3 万多人的增援部队立即被派出。巴格拉齐昂仅从軍团的預备队中即得到 17 个近卫营和擲彈兵营，两个十二磅炮連。但是所有这些部队最早也要到 10 时才能赶到并投入战斗；而在这以前达武元帅和奈元帅已經对俄軍的工事进行了第二次攻击，占領了这些工事，将俄軍逼到謝明諾夫雛谷的后面。于是巴格拉齐昂派出他的胸甲騎兵，进行了一場激烈的混战。这时俄軍随着援軍的陸續开到，曾向前推进，但当达武把預备队的一个师投入战斗后，俄軍又被迫退至雛谷后面。双方的損失都非常大，几乎所有的高級軍官非死即伤，巴格拉齐昂本人也受了致命的重伤。到这时，庫图佐夫終於多少参与了一下会战，他派遣多赫图罗夫指揮左翼，并且派自己的參謀长托尔到現地去檢查防御措施的执行情况。剛过 10 时，17 个近卫营和擲彈兵营及瓦西里契柯夫师到达了謝明諾夫村。巴哥武特軍分成几部分：一个师增援拉也夫斯基，一个师增援图奇科夫，騎兵派往右翼。这时法軍繼續在攻击，威斯特伐里亚师在树林內向雛谷的突出部推进，弗里昂將軍已越过雛谷，但是仍未能守住这个陣地。这时（10 时 30 分）俄軍得到从軍团預备队中抽調的博罗茲丁胸甲騎兵和科尔弗的一部分騎兵增援，但他們的队伍过于混乱，不能轉入进攻，而与此同时，法軍却在准备大規模的騎兵攻击。在俄軍陣地中央，欧仁·博阿尔奈于晨 6 时夺下博罗迪諾，渡过科洛查河，紧逼面前的敌人；但是他不久就折回，在上游重新渡河，以便会同意大利近卫軍、布魯西埃师（意大利軍隊）、热拉尔、莫朗以及格魯希的騎兵一起攻击拉也夫斯基的部队和拉也夫斯基多面堡。博罗迪諾仍在法軍手中。博阿尔奈的軍隊因渡河拖延了時間，沒有

能在 10 时以前开始攻击。拉也夫斯基多面堡由帕斯凱維奇师防守，左翼有瓦西里契柯夫支援；多赫图罗夫軍作为預备队。11 时，多面堡被法軍攻克，帕斯凱維奇师完全被打散，并被逐出戰場，但瓦西里契柯夫和多赫图罗夫又将多面堡夺回。这时維尔騰堡公爵欧根的师赶到，于是巴克萊命令奥斯特尔曼軍在后方占領陣地，作为新的預备队。同这个軍一起使用的还有最后一部分尙未动用的俄軍步兵；在預备队中只剩下了 6 个近卫营。12 时，欧仁·博阿尔奈已准备好对拉也夫斯基多面堡进行第二次攻击，然而就在这时，科洛查河左岸出現了俄軍騎兵。²⁵⁶ 博阿尔奈被迫暂时停止攻击，派出部队迎击騎兵。但是俄軍既未能夺回博罗迪諾，又未能通过沃伊納河谷的沼澤地区，只好經 Zodock〔佐多克〕退走，唯一的战果就是在某种程度上打乱了拿破侖的計劃。

与此同时，配置在巴格拉齐昂小山上的奈元帅和达武元帅仍繼續隔着謝明諾夫雛谷向大群的俄軍猛烈射击。法軍的騎兵突然出动了。在謝明諾夫村的右方，南苏蒂极成功地攻击了俄軍步兵，一直到西韦尔斯的騎兵向他的翼側攻击迫使他退回时为止。左面，拉图尔-莫布尔的 3 000 名騎兵分成两个纵队进攻，一个纵队由 2 个薩克森胸甲騎兵团为前导，两次击退了剛剛編成方队的 3 个俄国擲彈兵营，但它的翼側也受到了俄軍騎兵的攻击。波兰的胸甲騎兵团歼灭了俄軍的擲彈兵，但本身也遭到攻击，被迫退向雛谷。在这里由两个威斯特伐里亚胸甲騎兵团和一个波兰枪騎兵团組成的另一纵队又击退了俄軍。这样，有利的条件形成了，奈元帅和达武元帅的步兵便越过雛谷。弗里昂占領了謝明諾夫村，在这里作战的俄軍殘部——擲彈兵、近卫軍和基干部队——最后被击退，并被法軍騎兵彻底击潰。他們混乱地成小股逃向莫日艾斯克，

直到深夜才聚集起来；只有 3 个近卫团还稍有秩序。这样，法军的右翼击溃俄军左翼后，于 12 时就已直接在俄军中央的后方占领了阵地。于是达武元帅和奈元帅请求拿破仑根据他本人的战术原则行事，将近卫军经由谢明诺夫村投到俄军后方以达到最后胜利。但是拿破仑拒绝这样做，而奈元帅和达武元帅自己的队伍也非常混乱，没有增援也不敢进攻。

俄军方面，在欧仁·博阿尔奈停止对拉也夫斯基多面堡的攻击以后，维尔腾堡公爵欧根的军队被调往谢明诺夫，奥斯特尔曼也应把正面转向这一方向，以便从谢明诺夫村方面掩护拉也夫斯基小山的后方。法军炮兵司令官索尔比埃发现这些生力军后，即命令从近卫军炮兵中调来 36 门十二磅炮，并在谢明诺夫村前用 85 门火炮编成一个炮队。当这些火炮向大群俄军轰击时，缪拉特派出了尚未动用的蒙勃伦的骑兵和波兰的枪骑兵。这些骑兵乘奥斯特尔曼的军队展开时突然向他们攻击，使他们陷入了极其危险的境地，但就在这个时候克累茨的骑兵击退了法军骑兵。俄军步兵仍然受到炮火的杀伤，不过双方都不敢前进。约 2 时左右，当欧仁·博阿尔奈确信其左翼已不再受敌军骑兵威胁后，便再次攻击拉也夫斯基多面堡。与步兵从正面攻击的同时，骑兵也从谢明诺夫村扑向多面堡的后方。经过顽强的战斗，多面堡落入法军手中，将近 3 时俄军便退却了。双方虽然在继续炮击，但积极的战斗行动已停止了。拿破仑仍拒绝把他的近卫军投入战斗，因而俄军得以从容地退却。俄军除两个近卫团外，所有的部队都已参加战斗，甚至这两个近卫团，也受到炮火轰击而损失了 17 名军官和 600 名兵士。俄军共损失 52 000 人，还不包括轻伤人员和暂时与部队失掉联系而后来又很快归队的兵士在内。而在会战后的第二天，俄军只

剩下 52 000 人。法軍除近卫軍(步兵 14 000 名、騎兵和炮兵 5 000 名)外,也已全部参加战斗,所以他們击潰了兵力显然比他們要大的敵軍。此外,法軍的炮兵也較弱,主要是三磅炮和四磅炮,而俄軍的火炮有四分之一是十二磅炮,其余都是六磅炮。法軍損失 3 万人;他們繳获了 40 門火炮,总共俘擄了 1 000 人。如果当时拿破侖把近卫軍投入战斗,那末,根据托尔將軍的說法,俄国軍隊无疑是会被歼灭的。但是拿破侖不敢以其最后的預备队——他的軍隊的核心和支柱——来冒險,可能因此而錯过了在莫斯科簽訂和約的机会。

上述的会战情况(在一些細节上与流行的說法有分歧)主要是根据“托尔將軍回忆录”²⁵⁷編写的。我們在前面已經提到过托尔將軍是庫图佐夫的參謀长。这本书是俄軍方面关于这次会战的最好的报告,而且評断正确,因此是一份难得的原始資料。

弗·恩格斯写于 1858 年 1 月 28 日
左右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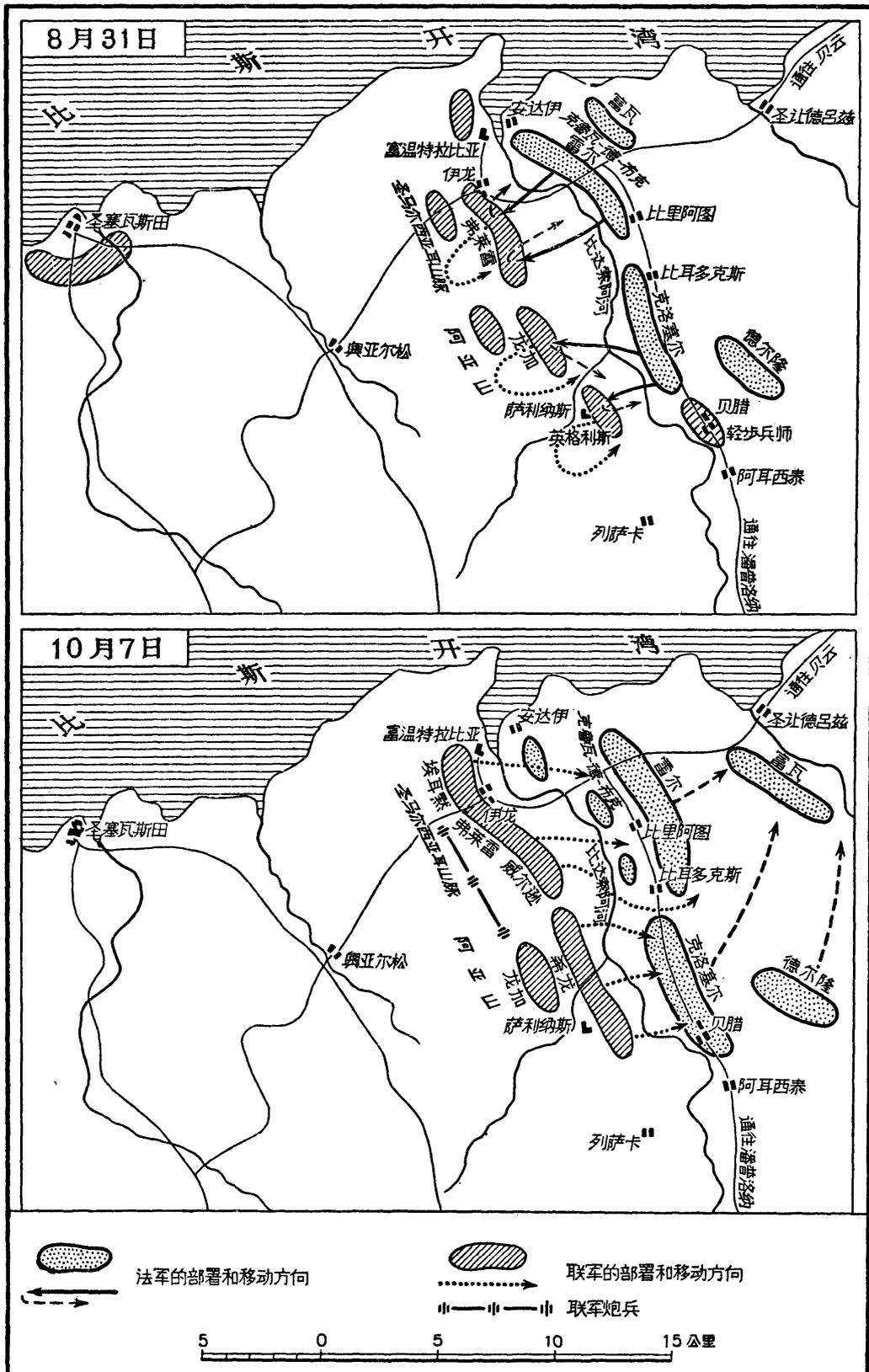
載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 年版
第 3 卷

弗·恩格斯 比达索阿

比达索阿——西班牙巴斯克地区的一条小河；它因苏尔特指挥的法军同威灵顿指挥的英国、西班牙和葡萄牙三国军队曾在河的两岸进行了会战而闻名。苏尔特在1813年維多利亞会战²⁵⁸失败以后，把自己的军队集结在陣地上，陣地的右翼紧靠富温特拉比亚对面的海岸，面临比达索阿河，而中央和左翼沿着一些山脊向圣让德呂茲方向延伸。有一次苏尔特从这个陣地出发企图去給潘普洛納守軍解圍，但被击退了。圣塞瓦斯田被威灵顿包圍，处境极为困难，因此苏尔特决定迫使敵軍撤除包圍。他在比达索阿河下游地区的陣地离通向圣塞瓦斯田的道路上的一个村子奥亚尔松只有9英里；如果苏尔特能够到达該村，那末敌人就不得不撤除包圍。所以到1813年8月底，苏尔特在比达索阿河地区集中了两个纵队。在左翼的一个纵队由克洛塞尔將軍指挥，有2万人和29門火炮，它占领了貝腊（在这个地点后面的河上游都控制在同盟国軍手里）对面山脊上的陣地。同时雷尔將軍率领的18000人和富瓦指挥的7000名預备队部署在下游，即在貝云至伊龙这条道路附近。法軍的后方营垒由德尔隆的二个师防守，他們的任务是抗击同盟国軍右翼的任何迂迴运动。

威灵顿获得关于苏尔特计划的情报以后，采取了一切預防措

比达索阿河会战 (1813年8月31日和10月7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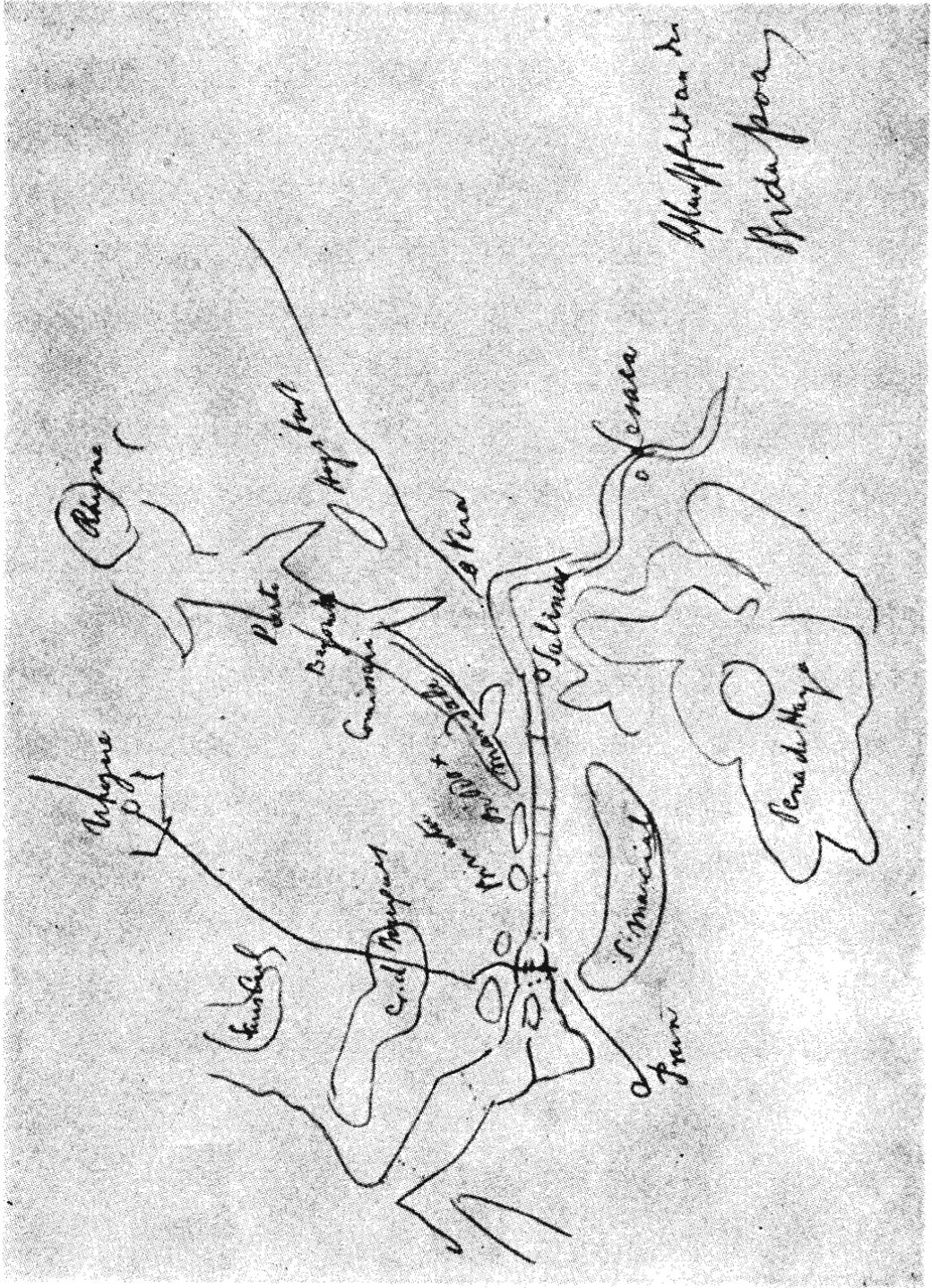
施。他的陣地的最左翼依靠海潮可到达的比达索阿河口得到正面掩护，它有良好的防御工事，尽管防守部队的人数不多；中央是难以通行的圣馬尔西亚耳的陡峭山岭，筑有野战工事，由西班牙弗萊雷部队坚守，第一不列顛师作为預备队部署在他們的左翼的后方，在伊龙道路附近。右翼由西班牙龙加部队和第四英一葡师組成，部署在阿亚山的陡峭山坡上；第七师的英格利斯旅把右翼同在貝腊附近的輕装师以及在更右面（在高地中間）单独作战的队伍連接起来。根据苏尔特的計劃，雷尔应当攻占圣馬尔西亚耳（他打算把它变为今后作战的桥头堡），把同盟国軍击退到他們的右翼陣地——阿亚峡谷，从而为富瓦扫清大道，使富瓦得以沿着这条道路直接进攻奥亚尔松，与此同时，克洛塞尔留下一个师監視貝腊，他应当在这个地点的稍下游的地方渡过比达索阿河，把与他对抗的一切部队击退到阿亚山，从而从側翼支援雷尔的攻击。

8月31日早晨，雷尔部队的几个纵队徒涉过河，以快速猛攻占领了圣馬尔西亚耳的第一个山峰，并向更高的控制周圍地区的山峰推进。但是在这难以通行的地区，他的部队由于指揮不力而陷于潰乱；散兵綫和支援他們的队伍混在一起，在某些地方則乱成一团，而这时西班牙纵队从山上冲下来，把他們赶回到河边。第二次进攻起初比較順利，法軍曾冲到西班牙軍的陣地；但在这里法軍的进攻力量消耗殆尽，西班牙軍隊重新进攻，又把他們打得潰不成軍，赶回到比达索阿河。同时，苏尔特在得知克洛塞尔进行了順利的攻击以及他正迫使当面的葡萄牙、英国和西班牙軍隊后退并向阿亚山緩慢地推进的消息以后，馬上就把雷尔的預备队和富瓦的部队編为纵队以发动第三次即最終一次攻击；这时傳來消息說，防守营垒的德尔隆遭到敌人强大兵力的进攻。由于法軍集中在比达

索阿河下游，暴露了他們攻击的真实方向，威灵頓就命令集中在高地的自己的最右翼的一切部队，去攻击与他們对抗的所有部队。虽然这次进攻被击退了，但它終究是一次很激烈的进攻，而且有可能卷土重来。当时不列顛輕装师的一部分部署在比达索阿河左岸，以便威胁克洛塞尔的进攻部队的翼側。在这种情况下，苏尔特放棄了預定的进攻計劃，把雷尔的部队調回比达索阿河对岸。克洛塞尔部队为通过貝腊附近的桥梁而进行了頑强的战斗，在深夜才摆脱了敌人。这一天由于暴雨，河上淺滩不能通行。同盟国軍用强攻占領了圣塞瓦斯田，而城砦于9月9日投降。

第二次比达索阿河会战是在10月7日威灵頓强渡該河的那天发生的。苏尔特部队的部署几乎沒有改变；富瓦占領了圣让德呂茲的营垒，德尔隆占領了烏尔达克斯和埃諾亞兵营，克洛塞尔占据連接烏尔达克斯和比达索阿河下游的山岭，而雷尔則沿着河流駐扎在克洛塞尔右翼到海岸这一带地方。正面全綫都构筑了工事，而且法軍还加固自己的工事。不列顛軍的右翼同富瓦和德尔隆对陣；中央由西班牙希龙部队和輕装师組成，并以西班牙龙加部队和第四师为預备队，人数总共有2万人，与克洛塞尔对陣；在比达索阿河下游的是西班牙弗萊雷部队、第一和第五英—葡师、埃耳默和威尔逊的独立旅，总共24 000人，他們准备向雷尔进攻。威灵頓采取了一切措施，以保障进攻的突然性。他的部队于10月6日夜間部署在敌人无法監視的一些地点，連兵营的帳篷也使人看不清楚。此外，走私者給他指明了海潮可到达的比达索阿河口的三个在退潮时可通行的淺滩地点，这三个淺滩是法軍所不知道的，法軍以为在这个地段是十分安全的。

10月7日早晨，法軍預备队在远离前綫的后方扎下了营，第



弗·恩格斯在写“比达索阿”条目时画的草图 259

一綫的一个师的許多兵士被派去构筑多面堡，这时第五英国师和埃耳默旅涉水过了河口，向营垒即著名的“长褲汉兵营”前进。当他們剛渡到对岸，圣馬尔西亚耳的火炮就开始射击，另有 5 个纵队又向前推进，准备涉水过河。他們在法軍能作出任何抵抗以前就在右岸整好了队伍；果然，进攻的突然性是完全达到了；法国步兵营由于零散地不按时到达就遭到了失敗，整个战綫和陣地鎖钥克鲁瓦-德-布克高地在任何預备队到达以前就被占領了。弗萊雷占領了曼达累高地以后，迂迴了联接雷尔和克洛塞尔的比利阿图和比耳多克斯兵营，因此法軍只得放棄該兵营。雷尔的部队潰退了，直到苏尔特从埃斯佩累特率領預备队匆促开到以后，才在烏罗尼埃附近制止了他們的潰退。当他还在这里的时候，就得知烏尔达克斯遭到进攻；但是他毫不怀疑进攻的真实方向，因而向比达索阿河下游推进，然而他来得太晚，已不能挽回局势了。同时英軍的中央向克洛塞尔发动进攻，經過正面的和側翼的攻击逐步占領了他的陣地。到傍晚，克洛塞尔手里只剩下山岭的制高点大呂恩高地，而第二天他就撤离了。法軍損失約 1 400 人，同盟国軍的伤亡人数約 1 600 人。突然的襲击十分出色地实现了，法軍实际上只有 1 万人的兵力防守陣地，他們遭到 33 000 名同盟国軍的强力进攻，在任何預备队赶来支援他們以前被逐出了这些陣地。

弗·恩格斯写于 1858 年 2 月 11 日

左右

載于“美国新百科全书” 1858 年版

第 3 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弗·恩格斯 布 达

布达(欧芬)——多瑙河西岸的城市,匈牙利过去的首都,目前是佩斯州首府。这个城市和它的7个郊区的人口(包括1850年划入该市的老欧芬的人口)共45 653人,卫戍部队和大学生不計在內。按直綫計算,布达离維也納135英里,在它的东南;离貝尔格莱德200英里,在它的西北。从前布达同河对岸的佩斯用浮桥相接,自1849年起,改用长1 250英尺的吊桥相接;从1852年起构筑隧道,使桥同城堡連接起来。布达方圓約有9英里;該城圍繞着城堡山建立,城堡山是单独矗立的有慢坡的山岩。中央最高部分称为城堡,它是布达城最合规划的部分,这里有許多美丽的建筑物和广场。城堡的四周有城墙;从城墙到多瑙河經過几个郊区。城市的主要建筑物有:王宮——长达564英尺的长方形建筑物,宮里面有203个房間;两座哥德式的建筑物——圣母升天教堂和圣护軍教堂;兵工厂、典礼宮、市政厅。布达有12座天主教教堂、1座希腊正教教堂、1座犹太教教堂、几个男修道院和女修道院、剧院、許多大的軍事机关、学校和慈善机关。还有几家印书局;出版3种报纸。在城南超出地中海水面516英尺的高地上有1座天文台,佩斯大学的印刷厂也在那里;人們不惜巨資为天文台装置了最好的仪器。在城外各地有硫磺温泉,有羅馬人和土耳其人从前占領这

个地方时修筑的浴池遗址。酒是这个城市的主要貿易貨品（主要是类似勃艮第酒的紅葡萄酒）；酒就在邻近的小山上的葡萄园里酿造，据統計年产量达 450 万加侖。此外还有鑄炮厂和几家繅絲厂、絲絨織造厂、棉織厂、毛織厂和制革厂。多瑙河輪船航运公司的船只在这里建造，近 600 人从事这项工作。布达是匈牙利总督和国家政权代表們固定的駐在地。

有人推測說，这个城市是“安敦尼旅行指南”²⁶⁰ 中提到的古代阿克文庫姆的原址。在匈牙利王国时期，布达是国王的王宮所在地，国王們把布达扩大并美化了；馬特維大帝首先就是这样做的。布达于 1526 年曾被苏里曼大帝統治时期的土耳其人占領，但在第二年即被收复。1529 年，布达重新落入土耳其人手里，被土耳其人一直占領到 1686 年，才最終由洛林公爵卡尔收复；1784 年，布达又成为政府所在地。布达在其整个历史上遭到的圍攻不下二十次。最后一次圍攻发生在 1849 年 5 月，当时匈牙利軍队在戈尔盖的指揮下把奥地利軍队赶到王国的西部边境。至于进一步的行动，曾有两种計劃：一种是扩大战果，坚决追击敌人到他們的本土，在当时向匈牙利推进的俄軍来到以前就打散敌人的兵力，并力图使維也納发生革命；另一种是留在科莫恩前面的防御陣地上，分出巨大兵力去圍攻布达，消灭奥軍在退却时留在那里的守軍。戈尔盖断言，科苏特和克拉普卡坚持后一种計劃；但是克拉普卡說，他不知道科苏特是否下过这样的命令，并否认他自己曾建議采取这种步驟。如果拿戈尔盖的回忆录和克拉普卡的回忆录²⁶¹ 对比一下，那末我們不得不承认，直到現在还不很清楚，进軍布达究竟是誰的过錯，而且克拉普卡所引用的证据在某种程度上也不是无可爭辯的。戈尔盖还断言，其次，他作出这样的决定是由于完全缺乏

野炮彈药和其他的儲备物資，还由于他本人确信軍队会拒絕越过边境。总之，一切进攻行动都被制止了，而戈尔盖率領了3万人向布达推进。采取这种步驟的結果失去了挽救匈牙利的最后机会。而奧軍却获得了在失敗以后整頓兵力的机会，6个星期后，当俄軍出現在匈牙利边境的时候，他們就以127 000人軍队（此外还有两个已經編成的預备軍）重新发动进攻了。因此，圍攻布达是1848—1849年匈牙利战争的轉折点，如果戈尔盖和奧軍之間果真有過叛变性的話，那末大約就在这个时候。

布达城堡仅仅是土耳其人的一个古老城砦的可怜殘迹，过去土耳其人依靠它的城墙經常打退匈牙利軍队和皇帝的軍队的一切进攻。护城壕和斜堤已經和地面一样平了；保存下来的只是城堡的主墙——很高的石砌建筑。城堡的基本輪廓是一个长方的四角形工事，它的各个边都有些弯曲，这样便于进行充分有效的側射。不久以前构筑的塹壕由东面往下伸到多瑙河，掩护了給城堡供水的水导工事。守軍由4个步兵营、大約1个工兵連和必要数量的炮兵組成；他們的指揮官是英勇而果斷的亨齐少将。在城墙上安置了75門火炮。5月4日，在城堡被包圍和遭受野战重炮短時間轰击以后，戈尔盖建議守軍投降。当建議被拒絕的时候，他命令克美蒂攻击水导工事；在所有的火炮的火力掩护下，克美蒂的纵队向前推进，但部署在塹壕里的炮兵用纵射火力向前进的纵队射击，很快就把他們击退了。这就证明：沒有事先的圍攻作业，光靠强攻是决不能攻破城堡的，而且必需有火炮攻击以便一开始就打开可通行的缺口。但当时戈尔盖沒有比十二磅炮更大的火炮，甚至連这种炮的彈药也不够。然而过了一些时候从科莫恩运来了4門二十四磅炮和1門十八磅炮，稍后又运来了6門臼炮。在离城墙西北

角 500 碼的高地上架設了破城炮,于 5 月 15 日开始射击。在前一天,亨齐毫无理由地而且沒有任何获胜希望地对佩斯城进行了轰击。16 日,缺口被打开了,勉强可以通行;但是戈尔盖在第二天夜間决定强攻:一个纵队进攻缺口,其他二个纵队强攻城牆,而克美蒂指揮的第四纵队則夺取水导工事。强攻毫无进展。又恢复了火炮攻击。破城炮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使环繞水导工事的防栅遭到十二磅炮的破坏,城堡的内部也遭到轰击。每天夜間进行佯攻,以騷扰守軍。20 日夜晚准备发动新的强攻。派出原先的四个纵队,攻击目标依旧不变,在 21 日黎明前,纵队向城堡推进。經過了激烈的战斗(在战斗时亨齐亲自指揮防守缺口,受了致命伤),洪韦德²⁶² 第四十七步兵营占領了缺口;随后第三十四步兵营向前推进,同时由克美蒂强攻水导工事,克涅威希指揮的第三軍的队伍强攻維也納門附近的城牆。在城堡内部进行了激烈的战斗,但是不久守軍就投降了。守軍 3 500 人中約 1 000 人被打死,其余的都被生俘。在圍攻战中,匈牙利軍队損失了 600 人。

弗·恩格斯写于 1858 年 2 月 11 日

左右

載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9 年版

第 4 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桥头堡

桥头堡即 tête-de-pont (筑城用語)——一种永备工事或野战工事, 构筑在桥的尽头, 目的是保卫桥梁和保证守桥的军队能够在河的两岸进行机动。桥头堡对于設在大河边或两河汇合处的大型现代化要塞来说是绝对必要的。在这种场合, 对岸的良好筑垒郊区往往成为桥头堡。例如卡斯特尔是美因兹的桥头堡, 埃倫布莱施坦是科布伦茨的桥头堡, 多伊茨是科倫的桥头堡。在革命战争时期, 法军占领克尔以后, 立刻把它变为斯特拉斯堡的桥头堡。在英国, 哥斯港可以看做是朴次茅斯的桥头堡, 虽然那里并没有桥, 而且它也具有另一种非常重要的作用。正如这后一种情况, 設在河对岸或狭窄海峡对岸的工事, 即使没有桥也常常称为桥头堡, 因为这种工事能够掩护登陆兵登陆和准备进攻战役, 起到桥头堡的作用, 并且从战略观点来看, 可以同桥头堡相提并论。至于谈到設在某条大河边的军队的障地, 那末军队在对岸所占据的一切据点都称为它的桥头堡, 不管它们是要塞、筑垒村庄还是一般的野战工事, 因为它们全都保证军队渡到对岸的安全。例如在 1813 年, 拿破仑从俄国退到易北河停下来以后, 汉堡、馬格德堡、維登堡和托尔高就成为他在易北河右岸的桥头堡。在野战筑城中, 桥头堡通常是极

为简单的工事，它由 bonnet-à-prêtre^① 构成，有时由角堡或冠堡（在向河的一面敞开）以及桥前面的多面堡构成。有的时候，小村庄、农用建筑群或其他在桥附近的建筑物，只要经过适当的改造用于防御，都能变为很好的桥头堡，因为在现代轻步兵战术下，这些设施如果一般来说适合防御的话，都可以利用来进行抵抗，这种抵抗力量决不会比按照一切军事学术原则构筑的任何野战工事小，甚至还要大些。

弗·恩格斯写于 1858 年 2 月 11 日

左右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 年版
第 3 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① 见本卷第 131 页。——编者注

弗·恩格斯 彈射器

彈射器（源出于希腊文 *κατά*——“朝向”和 *πάλλω*——“投擲”）——古代的一种軍用器械，用来投擲石头、标枪和其他的发射物；发明于老迪奥尼修斯統治时期的叙拉古。彈射器根据弓的原理发射，它用木头骨架构成，骨架的一部分有伸縮性和彈性，并套有鬃毛或心纜絞成的粗繩。彈射器的大小不一，要看它們是用于野战还是用来射击要塞而定。最大的彈射器能发射长 6 英尺、重 60 磅的梁木，射程为 400 步，而約瑟夫·弗拉維引举的例子是：彈射器投射大石头，射程达 $\frac{1}{4}$ 英里。羅馬人在圍攻耶路撒冷时期使用了 300 架这样的彈射器²⁶³。自尤利烏斯·凱撒时期以来，古羅馬作者对彈射器和弩炮不加区别，其实弩炮最初仅仅是用来投擲石块的。

弗·恩格斯写于 1858 年 2 月 18 日
左右

載于“美国新百科全书” 1859 年版
第 4 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野营

野营〔Camp〕——军队用帐篷、露营或者用能够迅速筑成的任何掩蔽物来度过一夜或更长时间的宿营地。当军队分驻在村庄里或者在战局结束后驻在临时兵营里的时候，称为舍营。兵营是永久性的军营。拿破仑认为帐篷没有用处，宁可让兵士露营，脚靠篝火而睡，用轻便的敞棚和树枝做的东西来挡风。美军少校西布利发明了一种能容纳 20 名骑兵及其装具的帐篷；兵士在帐篷里脚靠篝火而睡，篝火放在帐篷的中央。法国军队从 1837 年起使用露营帐篷。这种帐篷是用浸上橡胶因而是不透水的棉布做的。每个兵士随身携带一块帐篷布；帐篷的各个部分可用卸环很快连接起来。在选择野营地点时，具有重大意义的是：在适当的距离上有很好的饮水，靠近树林，保证获得燃料和构筑掩蔽物的木料。如果军队野营的时间长，那末良好的道路、运河或通航河流对供应军队的生活必需品具有重要意义。必须避免在沼泽或死水旁边设置野营。应当选择使军队有可能进行机动的地方以利防守。骑兵和步兵应尽可能配置在一条线上——骑兵在翼侧，步兵在中央。掩蔽物或临时兵营（这要看地形条件而定）应当排成几道，与正面垂直，从营地的一端伸到另一端。但是对设置野营来说，不可能规定任何普遍适用的规则：司令官应当根据情况决定他的军队配置在一条线上

还是两条綫上,以及确定步兵、騎兵和炮兵相互的位置。野营的警卫部队有:(1)野营卫兵队,任务是維持良好的秩序和紀律,防止逃跑,向营地发警报;(2)巡邏队,由步兵和騎兵担任,分布在营地的前方和翼側;这种巡邏队堵住敌军偵察队的道路,及时通知敌军逼近的消息;(3)小哨,或称战斗警戒部队,由大的分遣队担任,分布在周圍的村庄、农場或小型野战工事內,他們从那里可以監視敌人的調动情况。他們不应离营地过远,以免在遭到攻击时得不到支援。到达野营地点后,立刻要派出必要数量的兵士去組成卫兵队和巡邏队,确定他們应站的哨位,指定分配粮食的地点,并且一般地要发布有关野营外部警卫和內部警卫以及保持营地秩序和清洁等方面的一切命令。

以色列人在他們大批离开埃及时期所設置的野营是历史上提到的最古老的野营之一。它是一个大四角形,按各个不同的部落划分地段;中間是設有会幕的利未人²⁶⁴的野营,还設有正門,即入口处;它和毗連的一块空地同时作为集会場和集市广场。但是要弄清楚古代犹太人或他們的敌人通常所有的軍营的形式、規模和工事几乎是不可能的。

希腊人在特洛伊城郊的野营設在靠近海岸的地方,它是用来保卫被拉到陆地上来的希腊軍舰的;营地按不同的部落划分成各个地段,在向城和向海的两面筑有圍墙,而在营地外面筑有很高的土堤,土堤上設有木塔楼,以便击退被圍者的出击。希腊人的最勇敢的領袖,如阿基里斯和哀杰克斯住在营地的最边端。斯巴达人的营地是圓形的,而且非采取通常的防备措施不可,如布置有哨兵和馬巡队。

羅馬的野营根据季节、軍隊駐留的时间、軍团的数目以及地形

条件和其他等情况而变动。帝国时代的历史学家^①曾提到各式各样的营地，有圆形的、长方形的等等，但是罗马的营地通常是正方形的。野营地点由占卜官决定，他们根据四个方向、以正面朝日出而确定营地位置；它利用日晷进行测量；²⁶⁵边为 700 英尺的正方形被认为足以容纳 2 万名战士。营地分为上下两部分，两部分之间相隔一大块空地，还有从东到西和从北到南两条干綫(decumana 和 cardo)以及许多街道贯穿营地。营地设有四座门，其中主要的是主门和禁卫军门，任何兵士未经许可不能通过这些门，违者处以死刑；营地四周有围墙(围墙同营地内侧界綫间隔 200 英尺)、壕沟和土堤。所有这些工事都由兵士自己构筑，他们使用丁字鎬和鍬子像使用剑和矛一样灵巧；他们填平土地，用随身带来的地桩在工事四周筑起不整齐的齿状栅栏。营地上部中央安置统帅的帐篷(主帅营)，它是边长 200 英尺的正方形；在它四周安置占卜官帐篷、财务官帐篷或军队司库官帐篷、作集市广场和会场用的集会场、次帅的帐篷、护民官帐篷(位于相应军团的对面)和外来的辅助部队司令官帐篷。在下部安置下级司令官帐篷和军团兵士(罗马的骑兵、后备兵、主力兵和长矛兵等)的帐篷，在翼侧是外来的骑兵和步兵队伍的帐篷(他们竭力使这些部队单独驻扎)。帐篷用兽皮复盖，每顶帐篷可容纳 10 个武士和他们的十人长；百人长和旗手在本部队的前面。在营地两部分之间的中间地带(称为 principia)，耸立着一座木板台，它是供统帅主持审判和讲话用的；在那里还有圣坛、神像和不少神圣的战旗。在特殊的情况下，营地用石墙围起来，有时甚至连兵士住的地方也是用石头建造的。整个营地外形

^① 约瑟夫·弗拉维。——编者注

犹如一座城市；这是唯一由罗马人建造的城堡型式。罗马人征服不列颠最永久的纪念碑是把拉丁字 castra(野营)保留为最初曾是罗马军队驻地的许多城市的名称或名称的一部分，例如当卡斯特、莱斯特、伍斯特、切斯特、温彻斯特^①等。

古代野蛮人的野营经常是用各种车辆作为工事围起来的，例如，基姆布利人在他们同罗马人的最后一次会战²⁶⁶时期（公元前101年）所设的野营——这也就是那在基姆布利人失败以后，他们的妻子如此愤怒地出来保卫的营地。

营垒 [Intrenched Camp] 是周围筑有防御工事的野营，它也是筑城工事的一种，因此是为了长期使用的。

弗·恩格斯写于1858年2月18日
左右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9年版
第4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① 英文是 Doncaster, Leicester, Worcester, Chester, Winchester。——编者注

弗·恩格斯 庫霍尔恩

庫霍尔恩(科霍尔恩), 門諾, 范, 男爵——荷兰將軍和工程師; 1641 年生于弗里斯兰, 1704 年 5 月 17 日死于海牙。16 岁升为上尉, 在圍攻馬斯特里赫特时以及后来在塞涅弗、加塞尔、圣丹尼和弗略留斯等会战²⁶⁷ 中都立了战功。在战斗行动的間歇时期, 他钻研筑城学, 目的是要使圍攻者和被圍者双方保持均势, 因为他的同时代人沃邦所創立的新筑城法使被圍者占了很大的优势。他还在比較年輕的时候就已經成为工程師了, 到了中年, 他被公认为荷軍的工程部队的优秀軍官了。奧倫治亲王曾經答应授予他上校軍銜, 但是由于亲王沒有注意履行自己的諾言, 庫霍尔恩憤而辞职, 打算去为法国效劳。然而根据亲王的命令, 扣留了他的妻子和 8 个子女, 作为他回国的人质。这就迫使他迅速回国, 回国以后, 他获得了原先答应給他的軍銜, 以后又接連被提升为炮兵將軍, 并担任要塞工事总监, 后来又担任弗兰德省省长。

庫霍尔恩的一生致力于加强尼德兰的防御手段。在 1674 年圍攻格腊韦时期, 他发明并首先采用了用榴彈射击的小口径臼炮, 即所称的庫霍尔恩炮, 次年, 他成功地渡过了麦士河, 攻占了被认为有江河作可靠掩护的棱堡, 从而受到了沃邦的贊揚。在締結尼姆韦根和約²⁶⁸ (1678 年) 以后, 他着手进一步加固一系列已經設防

的城市；尼姆韦根、布雷达、曼海姆（它的防御工事后来被夷平）和貝亨-沃普-索姆等地的工事都证明他的筑城法是有价值的。在这些要塞中，他认为貝亨-沃普-索姆是他的精心杰作，然而这个要塞經德·洛旺达耳元帅长期圍攻以后于1747年攻破。在1688—1691年战争期間，他服現役。²⁶⁹ 1692年圍攻那慕尔，使他有机会把自己的筑城法同沃邦的筑城法作一番較量，因为那时这两个著名工程师正处在直接敌对的地位：庫霍尔恩保卫为防御城砦而构筑的工事，而沃邦竭力要攻破它。庫霍尔恩頑强地进行了防御，但是在他受了重伤之后，不得不向对手投降，他的对手心胸寬大地承认了他的勇敢和技能。庫霍尔恩后来参加了特拉尔巴赫、灵堡和列日的圍攻，1695年促使收复了那慕尔。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²⁷⁰时期，他接連地圍攻了文洛、斯提文斯威特、魯尔蒙特和列日，1703年，經過三天的重炮射击（被500門庫霍尔恩炮的榴彈火力所加强）攻占了萊茵河畔的波恩。随后他被調到荷兰的弗兰德，在那里他曾数度战胜法軍，并指揮了对居伊的圍攻。这是他的最后一次軍事活动；在这以后不久患脑溢血去世，当时他正等待同馬尔波罗公爵商談新的作战計劃。

庫霍尔恩最重要的著作“构筑要塞的新方法”²⁷¹一书于1685年以对开本在呂伐登出版，被譯成好几种外国文字。他的設計最适合于构筑荷兰式的要塞或那些类似荷兰式的建立在仅仅高出水面几英尺的要塞。只要有可能，他在自己的工事周圍挖两道壕沟，外面的一道灌滿水，里面一道是干的而且寬度通常是125英尺左右；这条內壕是被圍者的屯兵場，而在某种情况下又是騎兵队伍的屯兵場。他的筑城法的理論原則（無論进攻或防御）就是用協同的密集火力去压倒分散的火力。庫霍尔恩作为一个軍事专家，人們

指責他过于浪費人的生命；在这方面他不如爱惜人的沃邦。在为人方面，他直爽、正直和勇敢，憎恨阿諛奉承。他拒絕了某些外国政府对他提出的誘人的建議。英国国王查理二世賜給他騎士的称号。庫霍尔恩死后葬于弗里斯兰省斯內克附近的魏克耳，在那里为他树立了一个紀念碑。

弗·恩格斯写于 1858 年 1 月下半月—
2 月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載于“美国新百科全书” 1859 年版
第 5 卷

弗·恩格斯 布里西亚

布里西亚——倫巴第的一个省，北面与貝尔加莫和提罗耳接壤，西面是維罗纳和曼都亚，南面是克雷莫納，东面是洛迪和貝尔加莫。面积 1 300 平方英里；人口 35 万人。土壤肥沃，适宜于发展最精細的生产部門。主要的經濟部門之一是养蚕业，它每年提供 100 万磅生絲；有 27 家絲織厂，1 046 家紡絲工場。每年能剪优质羊毛約 7 万磅，毛紡厂不下 45 家，生产毛織品和棉織品的工厂 40 家，呢絨工厂 13 家，制造金器、銀器和青銅器的企业 27 家，制造小五金和瓷器的企业 12 家，印刷所 7 家，炼鋼厂和其他金屬冶炼厂 137 家（布里西亚的鋼世界聞名），生产火器和其他武器的工厂 77 家，由于这些武器质量优良，布里西亚在早先被称为 L'Armata [兵工厂]。油类、干酪、小麦、玉蜀黍、干草、亚麻、栗子、植物油和酒是补充的收入来源。該省的貿易主要集中在与它同名的省会。

布里西亚城（古代的布里克西亚）人口有 4 万，位于美拉河畔和加尔查河畔的一座不高的山的山麓。山頂上的設防城堡旧时称为“倫巴第之鷹”。这是一个建設得很好的、可爱的和熱鬧的城市，它因許多噴泉而著名：在街道和廣場上的噴泉不下 72 处，此外在私人住宅內的噴泉有几百处。在古老的大教堂和其他教堂內有偉大的意大利艺术大师繪制的丰富多采的壁画。新的大教堂 (Duo-

mo Nuovo) 奠基于 1604 年, 但是圆顶建筑到 1825 年才竣工。圣阿夫腊教堂的主要装饰物是提香的“不守妇道的女人”^①。共有 20 多个教堂, 而且所有这些教堂都以自己的艺术宝藏闻名。著名的公共建筑物有韦基亚广场上的供市政机关用的迴廊宫; 这个建筑物的美丽的正面遭到 1849 年 4 月炮火的严重损坏。托西宫是由托西伯爵捐献给该城市的, 宫中收藏了许多名画, 其中有拉斐尔的著名作品“救世主”。阿韦罗耳迪宫、费纳罗利宫、勒基宫、马丁南果宫和其他宫殿的绘画陈列馆也都以自己的艺术珍品而驰名。在剧院大街上, 所有房子第二层的正面都装饰着圣经、神话和历史题材的色彩画。十八世纪中叶由魁里尼红衣主教创办的魁里尼图书馆藏有 8 万多册图书, 此外还有大量收藏的珍贵手稿和古物。布里西亚的独一无二的古迹是墓地(Campo Santo)——这是意大利最美丽的墓地; 它在 1810 年建成, 它的正面是半圆形的空地, 四周是坟墓和柏树。布里西亚城是省的行政中心和教区的中心, 同时是商务法院和其他司法机关的所在地。在那里还有各种慈善机关、正教中学、两所文科中学、一所普通中学、植物园、古物博物馆和自然历史博物馆、农业协会、几所高等学校、音乐馆(意大利最古老的音乐馆之一)、赌场、富丽堂皇的剧院, 在城外有每年集市(最热闹和快乐的时期)临时作为演艺场使用的宽广场地。布里西亚的周报叫“布里西亚省报”。布里西亚的近郊于 1822 年发掘出大理石砌造的古罗马的寺院。布里西亚有铁路通向维罗纳和意大利其他城市。

有人认为布里西亚城是由伊特刺斯坎人建造的。在罗马帝国

① 这幅画的比较流行的名称是“基督和有罪的女人”。——编者注

崩潰以后，遭到了哥达人的洗劫，最后落入法兰克人的手中。奥托大帝授与該城以帝国自由城市的特权，但是教皇党人和保皇党人²⁷²之間的斗爭使这个城市遭到許多灾难。某一时候它受維罗那的統治者的控制，但是在1339年为米兰人所統治。1426年它被卡尔馬尼約拉攻占，1438年被皮欽尼諾包圍，1509年投降了法国人，1512年被威尼斯將軍格里蒂占領，但是最后被加斯頓·德·富瓦解放。布里西亚在十六世紀还遭到了三次圍攻，它一直受威尼斯統治，直到这个共和国崩潰²⁷³为止。在拿破侖时期，布里西亚是美拉省省会。在1849年革命时期，布里西亚的居民举行武装起义，反对从1814年起統治他們的奥地利政权。1849年3月30日，海瑙將軍炮轰这个城市；該城支持到4月2日中午，为了免遭毀灭而被迫投降并付出120万美元的贖金。

弗·恩格斯写于1858年2月24日

左右

載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
第3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緬甸

緬甸(阿瓦王国)——东南亚的一个幅員广大的国家,在恒河以东;过去它的領土要比現在大得多。緬甸以前的疆界在北緯 9 度和 27 度之間,长达 1 000 英里以上,寬超过 600 英里。現在緬甸的領土伸展在北緯 19 度 25 分和 28 度 15 分之間,东經 93 度 2 分和 100 度 40 分之間,它的面积从北到南长达 540 英里,寬为 420 英里,总面积約 20 万平方英里。在西面,緬甸同阿拉干省(在 1826 年根据英緬簽訂的条約割让給英国)接壤,还同提彼腊、曼尼普尔和阿薩姆等小国交界;緬甸同这些小国之間隔有崇山峻岭。南面是不久前被英国并吞的勃固省²⁷⁴,北面是上阿薩姆和西藏,东面是中国。根据亨利·尤耳上尉的材料,緬甸人口不超过 300 万。

自从勃固省落到英国人手中以后,緬甸就沒有冲积平原,也沒有出海口,因为緬甸的南部疆界离伊洛瓦底江江口至少有 200 英里,从这个疆界向北,地勢逐漸升高。緩升地带綿延約 300 英里,以后便是陡峭的山地。境內有三条大河流:伊洛瓦底江、它的支流亲敦江、薩尔温江。这些河流发源于北部山脉,流經南部入印度洋。

尽管緬甸遭到掠夺,失去了最富饒的領土,但保留下来的那些土地也决不能說是貧瘠的。森林中有許多珍貴品种的树木,其中

以造船用的柚木最为著名。几乎所有在印度生长的树木的品种在緬甸也都有。緬甸出产质量优良的胶漆和做漆器用的漆。把上等的柚木从森林运往緬甸首都阿瓦,有 15 天的路程。农业和果园业到处都非常落后,要不是土壤肥沃和气候良好的話,这个国家就会是非常贫穷的了。对果树不加任何照料,庄稼的栽种技术水平很低。在蔬菜作物中,种得最多的是葱和辣椒,此外有薯类、馬鈴薯以及为数不多的甜瓜、黃瓜和茄子。居民用嫩竹笋和野芦笋和各种水生植物的多汁根代替非野生的果实。在緬甸出产的水果有芒果、菠蘿、橙、荔枝、面包果(面包树的一种)、木瓜、无花果、巴蕉(这个文明的最凶恶的敌人)。所有这些水果几乎是或者說完全是不加照料而生长的。主要的大田作物是稻米(稻米在某些地区还被用作流通手段)、玉蜀黍、黍、小麦、各种豆类作物、棕櫚作物、甘蔗、烟叶、短纖維棉花和靛藍。甘蔗沒有普遍种植,虽然居民早就知道这种植物,但几乎沒有人知道把甘蔗榨糖的技术。从巴尔米拉棕櫚的液汁中可以提取沒有淨化过的廉价糖。这种棕櫚树的小树林很多,特別在首都的南面。对靛藍的照料很差,完全不能出口。南方的主要作物是稻米,北方則是玉蜀黍和黍。芝麻当牲畜飼料用,到处都种植。在北方山坡上大量种植地道的中国茶树,但奇怪的是,当地居民不泡茶喝(中国茶一般都是泡着喝的),而是吃茶叶,还在茶叶里拌上植物油和蒜。棉花主要栽植在上緬甸各省的旱地上。

在緬甸茂密的森林中有很多野兽,其中主要是象、独角犀牛、虎、豹、野公猪和各种鹿。禽类中常見的是野公鸡,还有各种野鸡、沙鸡和鸕鶿。家畜有犏牛、馬和水牛。象也作为役畜使用。駱駝不詳。山羊和綿羊的数量不多,但人們不关心它們的繁殖。驴子

也很少役使。在緬甸，根本不用狗來看家，而貓却非常多。馬只供乘騎，馬的體高很少超過 132 厘米。在北方馱畜是公牛，在南方用水牛當馱畜。

礦產有金，在不同的河流的河底可以發現金子，它是隨同山上的沙子一起被沖到河底的。在靠近中國邊界的博敦開採銀礦。每年開採的金銀總數將近 100 萬美元。在老撾的東部蘊藏着豐富的鐵礦，但是由於礦石加工的方法太原始，30—40% 的金屬都損失了。在伊洛瓦底江兩岸的石油井，每年提供 800 萬磅的石油。大家知道，老撾有銅、錫、鉛和銻，但是這些金屬中任何一種金屬都未必能大量採掘，因為居民不懂得採礦方法。阿瓦城四周的山地，出產質量優良的石灰石；離首都 40 英里的伊洛瓦底江兩岸，有適合於雕塑用的美麗的大理石；國內琥珀極多，所以在阿瓦它的售價很低，每磅 1 美元；全國到處都蘊藏着硝石、鹼、鹽和煤，不過煤很少使用。石油在緬甸的開採量很大，各階層的居民都把它用作點燈的燃料，還用作驅蟲的藥劑。人們用桶在深 210 至 300 英尺的狹窄的油井里舀取石油，同時井底石油好像噴泉那樣涌出來。國內各地都產松節油，松節油大量向中國輸出。在國內兩個地區的一些小河河底，有東方的藍寶石、紅寶石、黃晶、紫晶以及各種金綠寶石和尖晶石。所有價值在 50 美元以上的寶石都被宣布為王國的財產，並收入國庫。任何一個外國人都不得開採寶石。

從上述情況中可以看出，緬甸人民在採礦業的發展上取得了一些不大的進步。棉織品的整個生產過程是由婦女來完成的。她們使用簡陋的織布機，手工藝或技能比較差。瓷器從中國輸入；英國的棉織品也是輸入品，可是它們在緬甸國內市場上的售價甚至比本地的產品還低廉。緬甸人雖然會煉鐵，但是鋼仍得由孟加拉運

入緬甸；國內某些地區生產絲織品，然而用的是中國生絲。緬甸輸入大量各類商品，而輸出量却比較小。緬甸同中國的貿易極為廣泛，向中國輸出原棉、裝飾用的羽毛（主要是藍松鴉的羽毛）、食用燕窩、象牙、鹿茸、犀牛角和某些比較稀貴的寶石。緬甸以此交換的輸入品有：加工過的銅、黃砷、水銀、硃砂、金屬器皿、銅絲、錫、鉛、硃、銀、金（包括金葉）、陶器、顏料、地毯、大黃、茶葉、蜂蜜、生絲、絲絨、中國燒酒、麝香、銅綠、干果、紙張、扇子、傘、鞋和衣服。全國各地能製造很簡單的金銀飾物。在阿瓦能製造兵器、剪刀和細木工工具；在距阿瓦 40 英里的地方有純白大理石的丘崗，大理石大量被製成偶像雕塑品。貨幣流通不發達。作為流通手段的是未經壓模的鉛、銀和金。由於小額支付的困難，極大部分的交易採取直接的商品交換。貴金屬的轉讓每次必須過秤和檢驗，銀錢業商人為此抽取約 3.5%。年利率在二分五厘和六分之間波動。石油是最普遍的日用品；可以用石油交換硝石、石灰、紙張、漆器、棉織品、絲織品、鐵器、銅器、糖、羅望子等。尤委特-尼（國內銀幣本位）通常是由銀和 10—15% 的銅製成的合金。含銀量不到 85% 的合金不准流通，因為這正是付稅的貨幣所必須達到的金屬純度。

帝國收入的來源是向鄉村征收的房屋稅，鄉村當局根據每個人的支付能力確定分攤數額。稅額各地不一：向每個房主征收的稅額自 6 銖（在卑謬）至 27 銖（在東瓜）不等。服兵役的人、王室領地的農民和從事社會勞動的手工業者免繳這種稅。土地稅的稅額取決於收成。煙草稅用貨幣繳付，其他作物則抽 5% 的實物稅。在王室土地上耕作的農民以一半以上的收成繳稅。在湖泊和江河捕魚，須繳納一定的費用，或按照捕魚量繳納相應數量的干魚。所有這些收入都由王室的官吏集中起來，他們依靠這些收入生活；

每个官吏根据各人所处的地位得到或大或小的地区由自己管轄，并且依靠从該地区得到的收入生活。王室的收入靠出卖专利品获得，其中最主要的是棉花。在这种专利制度下，居民必須把一些商品按照規定的低价供售王室官吏，而王室官吏轉手出售即可获取厚利。例如生产者供售的鉛的价格每維斯(3.6 磅) 5 銖，而国王陛下出售的鉛的价格是 20 銖。根据現有的資料来看，王室的收入每年約 1 820 000 銖，即 227 500 英鎊，此外还应加上在各个地区收来的各种稅款总額 44 250 英鎊。这些錢都供宫廷开銷。緬甸的稅收制度虽然有它的专制性质，但細节非常簡單；国家管理簡單的另一个例子是，采用軍隊靠自己供养或者至少是靠居民供养的方法。軍隊的招募办法各种各样：在某些地方实行招募志願兵的制度，而在另一些地方，每 16 戶必須摊派 2 名配有武器和装备齐全的兵士。此外，他們还必須每月供应这些新兵 56 磅大米，并付給他們 5 卢比。在帕东省，两家供养一个兵士，这两家可以領到 5 英亩不繳稅的土地，但是必須把一半收成交給这个軍人，并且每年付給他 25 卢比，此外还須供給他木柴和其他次要消費品。每个指揮 50 人的指揮官可向 6 戶征收 10 銖(1 銖等于 1.25 美元或 2.5 卢比)，并向 7 戶征收一半的收获量。博(百人长)的生活由 52 戶負担，博任(上校)的薪俸取之于自己的官兵。緬甸兵在良好的条件下是能够很好地作战的；而緬甸軍隊主要的优越性在于他們沒有輜重；兵士在枪的一端挂上自己的鋪盖(吊床)，另一端挂行軍用的飯盒和其他用品，而把自己的粮食(大米)放在袋子里，纏在腰上。

按体形外貌来讲，緬甸人看来是住在印度斯坦和中国之間一帶的种族，他們更像屬於蒙古人的类型，而不像屬於印度人的类型。他們个子矮，身体結实、匀称、丰满而灵活。他們有大顴骨和

斜視眼，臉色黝黑但不烏黑，头发粗硬、光滑和烏黑，鬍鬚非常濃密，比他們邻人（暹罗人）的鬍子还长。艾倫少校在給东印度政府的报告中對他們作了充分的評價，認為他們忠實，富有幽默感，相当机警灵敏，有温和的爱国精神，但眷恋乡土和家庭，对外国人比較不抱成見，願意学习新的手藝，如果不需要花很多腦力的話。他們是有經驗的商人，在很大程度上是天生具有一种进取心；他們有自制力，但并不是非常有耐心的；他們的机警胜过勇猛。虽然他們的天性是不凶殘的，但他們冷漠地容忍了許多国王的暴虐行为；他們不是撒謊者，也不是騙子手，但終究很愛夸口而反复无常。

緬甸人信仰佛教，他們保持的宗教儀式不像在印度和中国任何地方那樣受到其他宗教的影響。緬甸的佛教徒在某些方面不像中国的佛教徒那樣膜拜神像，而緬甸和尚比通常更嚴格地信守貧苦和獨身的誓願。在上世紀末，从緬甸國教分出了两个教派，即古老宗教的两个支派。其中一派遵循的教義在某些方面同泛神論相似，相信神的本原散布于全世界，并存在于自己的創造物中，但是它的发展的最高阶段体現在佛教徒身上。第二种教派的代表則完全否認輪回說，不膜拜佛像，反对佛教徒所采取的寺院制度；他們認為死是进入极乐世界或永久苦难之門，而这取决于死者生前的行为，他們景仰唯一的至高无上的万能之精灵(Nat)。当今的國王^①熱心捍衛自己的宗教，他已經用篝火当众燒死了屬於这两个被宣布为非法的教派的 14 个異教徒。根据尤耳上尉的說法，这两个教派的人数始終很多，但他們举行祈禱儀式是秘密的。

緬甸早期的历史不詳。十一世紀，帝国处于最强盛时期，当时

① 門登。——編者注

它的首都在勃固。到十六世紀初，國家分裂成為互相混戰的許多獨立小公國。1554年，國王莽應龍占領了阿瓦，征服了整個伊洛瓦底江盆地，甚至征服了暹羅。經過一系列變動以後，現今王朝的奠基人雍籍牙（死於1760年）使帝國幾乎重新達到了它以前的版圖和舊日的強盛。後來英國人奪走了緬甸最肥沃和富饒的地區。

緬甸按政體來說是一個純粹的專制國家，國王除了有其他封號以外，還有生死主宰者的稱號，下獄、罰款、拷問或處死都完全取決於國王的最高意志。具體的行政事務由赫魯奧特-達烏，即樞密院掌管，樞密院由預定的王位法定繼承人領導，如果沒有這樣的人，則由王族中的某個親王領導。通常四個大臣參加樞密院，但是他們不固定主管某些部門，他們的活動取決於偶然因素。他們組成上訴審法院，受理要求最後判決的上訴書。同時他們每個人都有全權對那些沒有提交樞密院集體審理的案件作出司法判決。他們從爭訟的財產中扣下10%作為訴訟費用，因此他們從這方面獲得了非常可觀的收入。從緬甸的國家機關各方面的情況來看，不難使人相信，司法是很少維護人民利益的。每一個官吏同時又是掠奪者；法官貪污，警察無能，國內盜賊很多，生命財產沒有保障，沒有任何促使進步的動因。在首都附近，國王的權力使人恐懼和順從，但是離中央越遠，國王的權力也就越弱，而在距離更遠的省份，臣民不重視白象統治者的詔令；在那裡，人們選舉自己的執政者（這種選舉經國王批准），而只給政府繳納少量賦稅。在同中國接壤的省份，有一種很有趣的情況：那裡的人民毫不在乎地在兩國政府（中國政府和緬甸政府）的管轄下生活，兩國政府以平等的權利參與批准這些地方的執政者，但是通常都是明智地選定同一個人。雖然英國各種使團訪問緬甸，傳教士在緬甸的活動也比在

亚洲其他地方更有成績，但是緬甸的內地至今还是真正的 *terra incognita* [未經考察的地方]，現代的地理学家和制图家对这些地方提出了一些荒謬的假設，然而他們对緬甸的具体知識却是非常少的。

見 1858 年倫敦出版的亨利·尤耳上尉的“1855 年受印度总督的委派出使阿瓦王国宫廷的記述”²⁷⁵。

弗·恩格斯写于 1858 年 2 月初和
3 月 8 日之間

載于“美国新百科全书” 1859 年版
第 4 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博馬尔松德

博馬尔松德——波的尼亚灣入口处阿兰群島和瓦尔迪奥島之間的狹窄海峽。博馬尔松德港灣的俄国工事在 1854 年战争期間遭到英法海軍的破坏。7 月底通往博馬尔松德的海峽被 4 艘英国軍艦和几艘小型蒸汽艦封鎖。在这以后不久，开来了由納皮尔和帕塞瓦耳-德申海軍上将指揮的龐大的联軍混合艦队，随后于 8 月 7 日又开来了一些战列艦，艦上有巴拉盖·狄利埃將軍和 12 000 名兵士（主要是法国人）。8 月 16 日，俄軍司令官鮑迪斯科將軍被迫投降。联軍占領該島一直到月底全部工事被炸毀为止。胜利者的战利品計：112 門带炮架的火炮、79 門不带炮架的火炮、3 門臼炮、7 門野炮和 2 235 名俘虏。从軍事观点来看，这次圍攻的意义主要在于：它彻底解决了关于在具有陆地正面的工事中利用暴露的石砌部分的問題。

弗·恩格斯写于 1858 年 3 月 18 日
左右

載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 年版
第 3 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 貝雷斯福德²⁷⁶

貝雷斯福德, 威廉·卡尔, 子爵——英国將軍; 1768年10月2日生于爱尔兰, 1854年1月8日死于肯特。他是瓦特福德的第一个侯爵乔治·貝雷斯福德的非婚生子, 16岁参军, 1790年以前一直在新苏格兰服务。在这时期, 他由于一个共事的軍官的枪枝走火而失去了一只眼睛。他曾經在土倫、科西嘉、西印度(在阿伯克朗比的领导下) 服务, 在印度和埃及在貝尔德领导下服务。1800年回国以后他被提升为名誉上校^①。随即在爱尔兰服务, 参与侵占好望角, 并作为准将在1806年参加攻打布宜諾斯艾利斯, 在該地被迫放下武器, 但后来他逃跑了。1807年他指揮侵占馬德拉的軍队, 并被任命为該島总督²⁷⁷。1808年他获少將軍銜, 在他率領英軍到达葡萄牙之后, 担任了葡萄牙軍队(包括国民軍在內)的全部組織工作。他是起草著名的辛特拉协定条款的全权代表之一; 参加过向科魯尼亚的撤退和該城附近的会战, 掩护約翰·穆尔爵士的軍队登舰²⁷⁸。1809年3月, 貝雷斯福德获元帅称号, 并被任命为葡萄牙軍队总司令, 葡萄牙軍队在他领导下很快变为一支能攻能守的出色的战斗力量。他参加了比利牛斯半島的战争(从战

^① 指具有上校称号但仍按原先軍銜領餉的軍官。——編者注

爭开始一直到 1814 年战争結束)，給予威灵頓以重大支援。但是在他当总司令时期的唯一重大战役中，即阿耳布埃拉会战中，他表现出自己是一个非常平庸的统帅，要不是他部下的一个军官不顾他的命令擅自行动的话^①，会战就失败了。他参加了薩拉芒卡、維多利亞、貝云、奥尔特茲、土魯斯等胜利的会战²⁷⁹。由于这些功績他获得葡萄牙元帅的称号和埃耳瓦希公爵和圣坎波侯爵的封号。1810 年他被选为瓦特福德郡的議會議員（他从未出席过下院會議），1814 年获得阿耳布埃拉和丹甘囊的貝雷斯福德男爵的封号，1823 年他获得子爵的封号。

1814 年，貝雷斯福德負外交使命到巴西去，1817 年在那里組織了对密謀活动的鎮压²⁸⁰。回国以后他担任副炮兵总监的职务，随即获得陸軍將軍称号，最后当炮兵总监（从 1828 年至 1830 年）。由于他在 1823 年援助过唐·米格尔²⁸¹，他失去了葡萄牙元帅杖。在政治方面，他是托利党的积极而坚决的捍卫者，虽然对这一点他没有公开声明过。他的軍事才能主要表现在他对葡萄牙軍隊卓有成效的改組上，葡萄牙軍隊由于他那非常巧妙的和不倦的活动终于成为一支坚强而有紀律的甚至能同法国軍隊媲美的軍隊。1832 年他同他的表妹路易莎結婚，路易莎是土阿姆大主教的女儿，銀行家、百万富翁和“阿納斯塔西烏斯”²⁸²的作者托馬斯·霍普的寡妇。貝雷斯福德沒有子女，因此在他死后，沒有人继承他的封号。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58 年
3 月初和 4 月 9 日之間
載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 年版
第 3 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① 見本卷第 53 頁。——編者注

弗·恩格斯 騎兵

騎兵(法文为 cavalerie, 来源于 cavalier——騎手和 cheval——馬)——騎馬的兵士的总称。馬匹用于乘騎和軍隊編有騎馬的部队, 这自然首先发生在那些自古以来就产馬, 而且气候和青草适于馬匹生长的国家。当欧洲和亚洲热带区的馬很快就退化为笨拙的牲畜或矮种馬的时候, 阿拉伯、波斯、小亚細亚、埃及和非洲北部沿海各国的馬匹却长得很驃駿、善跑、机灵而有耐力。但是, 起初馬匹大概仅用于駕車; 至少在軍事史上, 战車比武装騎手的出現早得多。在埃及的古迹上刻画有許多战車, 却根本沒有騎手, 只有一个例外, 而且就連这个例外显然也是屬於羅馬时期的。但是无疑地, 埃及人至少在被波斯人征服前两世紀左右就拥有大量的騎兵了, 而且在宮廷显貴中往往有人就是这一兵种的司令官。埃及人很可能是在同亚述人作战时期初次遇到騎兵的, 因为在亚述的古迹上常常刻画着騎手; 而且亚述軍隊最早在战争中使用騎兵这一点已經确凿无疑的了。馬鞍大概也是在亚述最早出現的。在較古老的雕塑品上, 武士是騎在沒有鞍子的馬上的; 以后, 我們发现曾有一种类似褥垫或坐垫的东西, 最后, 才有类似現今东方流行的那种高馬鞍。波斯人和米太人有史以来就是善騎的民族。他們虽然还保留着战車, 甚至仍旧对战車比对騎兵这一較年輕的兵种更加重視,

但是，由于騎馬的武士数量众多，騎兵毕竟起了在以往的任何軍隊中沒有起过的作用。亚述、埃及和波斯的騎兵就是至今仍盛行于东方，并且不久前还是北非、亚洲和东欧仅有的那种騎兵，即非正規的騎兵。但是，一当希腊人把本国馬和东方馬杂交改良了馬种而使馬适用于騎兵，他們就立即按照新的原則組成了騎兵这一兵种。所以希腊人既是正規步兵的創建人，也是正規騎兵的創建人。他們把大量兵士編为独立的作战单位，根据他們的使命加以装备，訓練他們協調一致地作战，成橫队和纵队行动，并且保持一定的战术队形，以便能够以大量集中的兵力向前推进，把全部兵力投在敌人正面上的某一点。这样組織起来的軍隊，处处表明比亚洲人用来同他們作战的那些未經訓練的、笨拙不灵的烏合之众优越。我們沒有发现希腊騎兵在波斯人自己建立比較正規的騎兵部队以前同波斯騎手进行会战的例子。但是，沒有疑問，如果說发生过这种会战，其結果也必定像这两国的步兵在戰場上交鋒时的結果一样。騎兵最初仅在希腊产馬区，如特薩利亚和貝奧提亚建立起来；但不久雅典人除了用来担任警戒勤务和成散开队形作战的馬弓手以外，又建立了重騎兵部队。斯巴达人也把青年中的 élite [精华]組成騎兵卫队；但他們并不信賴騎兵，規定騎兵在战斗中必須下馬，像步兵一样地作战。波斯人从小亚細亚的希腊人和曾在波斯軍隊中服务的希腊雇佣兵那里学会了組織正規騎兵，而且无須怀疑，在會和亚历山大大帝作过战的波斯騎兵中，有一大部分或多或少地受过成密集队形正規作战的訓練。但是，他們不能同馬其頓騎兵相比。馬其頓人把騎术訓練作为教育貴族青年的必修科目，并且騎兵在軍隊中享有荣誉。菲力浦和亚历山大的騎兵是由馬其頓和特薩利亚的貴族組成的；只有几个騎兵連是在希腊本土征召的。

这支騎兵由披戴头盔、胸甲、护脛和手持长矛的重装騎手〔cata-phractae〕組成。他們在攻击时通常排成密集队形、长方形纵队或楔形纵队，有时也排成横队。由輔助部队組成的輕騎兵在某种程度上是非正規騎兵，它像現代的哥薩克一样，担任駐軍警戒和成散开队形作战。

格拉奈卡斯河会战(公元前 334 年)是騎兵起决定作用的第一个战例。当时波斯騎兵配置在距徒涉場有一个冲鋒距离的地方。当馬其頓步兵纵队的先头部队剛渡过河，还没有来得及展开时，波斯騎兵便向他們猛冲，以勇猛的攻击把他們赶下河去。这种数次运用均获全胜的战法，直接证明了波斯人已有了一支能与馬其頓人相抗衡的正規騎兵。騎兵只有在訓練有素、指揮得当的情况下，才能趁步兵力量最弱的时机，即由一种战术队形变换为另一种战术队形的时机，突然地攻击步兵而使其措手不及。非正規騎兵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当时，率領亚历山大軍隊前卫的托勒密，一直等到馬其頓重装騎手渡河从翼側攻击波斯軍隊以后，才得以前进。随后，展开了長时间的战斗；但因波斯騎兵排成一綫，沒有預备队，而在波斯軍隊服役的亚洲籍希腊兵最后又背叛了他們，因而波斯騎兵終于被击潰。阿尔貝雷会战(公元前 331 年)是馬其頓騎兵最出色的一次会战。当时，亚历山大亲自率領馬其頓騎兵部队作战，这些部队配置在战斗队形的极右翼，而特薩利亚騎兵为左翼。波斯軍隊試图从翼側迂迴对方，但在决定性时刻亚历山大从后方調来了生力軍，也想迂迴波斯軍隊。这时，波斯軍隊在左翼和中央之間形成空隙，亚历山大立即迅速插入，切断了波斯軍隊左翼同其余部分的联系，彻底击潰了左翼敵軍，并追击到很远的距离。但他又不得不去援救自己的受到威胁的左翼，于是就非常迅速地集合了

自己的騎兵，由敵軍中央的後面穿過，從背後攻擊其右翼，結果贏得了會戰的勝利，從此，亞歷山大便被認為是歷代最優秀的騎兵指揮官之一。在結束會戰時，他的騎兵一鼓作氣地追擊逃敵，次日，先頭騎兵已遠離戰場 75 英里了。十分值得注意的是，在那個世紀，人們對騎兵戰術的基本原則的理解竟和我們現在一樣深刻。趁步兵成行軍隊形或正在變換隊形時加以攻擊；攻擊騎兵時主要攻其翼側；利用敵人橫隊的每個缺口迅速插入，隨後向左右擴展，從翼側和後方迂迴突破口附近的敵軍；迅速而無情地追擊潰敵以鞏固勝利，——這些就是現今每個騎兵軍官所必須懂得的主要的和最重要的原則。亞歷山大死後，我們就再沒有聽到這支希臘和馬其頓的出色的騎兵了。在希臘，步兵重新占了優勢，而在亞洲和埃及，騎兵很快就衰落了。

羅馬人從來不善于騎馬。在羅馬軍團中有少數騎兵，然而他們寧願徒步作戰。他們的馬是劣種的，兵士也不善于乘騎。但是，在地中海南岸卻建立了一支騎兵，它不僅可以和亞歷山大的騎兵媲美，甚至還超過它。迦太基統帥哈米爾卡爾和漢尼拔除自己的努米迪亞非正規騎兵外，還建立了一支頭等的正規騎兵，这样就創立了一個使他們幾乎戰無不勝的兵種。北非的柏伯爾人，至少是住在平原地區的居民，至今仍是一個善騎的民族，而漢尼拔的兵士乘騎的、以空前未有的速度和沖力沖入羅馬步兵陣列的柏伯爾人的駿馬，現在仍用來補充法國最優秀的騎兵團——chasseurs d'Afrique〔非洲獵兵〕團，并被他們視為最好的戰馬。迦太基的步兵，甚至經過兩位偉大的首領長期訓練之後，仍然比羅馬步兵差得多；如果沒有騎兵的協助，步兵在同羅馬軍團作戰時便沒有絲毫獲勝的希望；漢尼拔單靠這支騎兵就在意大利支持了 16 年之久²⁸³，

这支騎兵由于輾轉征战、历尽艰苦（但决不是被敌人战敗）而遭到削弱后，汉尼拔才被迫撤出意大利。汉尼拔所指揮的会战与弗里德里希大帝所指揮的会战有一个共同点，即在大多数会战中騎兵都战胜了头等的步兵；的确，騎兵从来没有树立过像在这两位偉大的統帅指揮下所树立的那样的丰功偉績。哈米尔卡尔和汉尼拔的正規騎兵是由什么民族組成并根据哪些战术原則建立的，我們不确切知道。但是，由于努米迪亚輕騎兵始終同重装的或正規的騎兵有明显的区别，所以我們可以断定，后者不是由柏伯尔部落組成的。重騎兵中很可能有許多外籍雇佣兵和一些迦太基人，但其主要成員极可能是西班牙人，因为这支騎兵是在西班牙国土上編成的，而且甚至在凱撒时代大多数羅馬軍隊中都还有西班牙騎手。由于汉尼拔很熟悉希腊文化，而且还在汉尼拔以前，希腊雇佣兵和冒險家們就在迦太基軍隊中服务，所以未必能怀疑，希腊和馬其頓重騎兵的組織是迦太基重騎兵組織的基础。迦太基騎兵在意大利的第一次作战就解答了它是否优越的問題。在提契諾河会战（公元前 218 年）中，羅馬执政官普卜利烏斯·齐比奧率領騎兵和輕步兵进行偵察时，与汉尼拔指揮的、执行同样任务的迦太基騎兵遭遇。汉尼拔立即向羅馬軍隊攻击。羅馬的輕步兵配置在第一綫，騎兵构成第二綫。迦太基重騎兵攻击了羅馬步兵，将它击潰，随后立即从正面攻击羅馬騎兵，努米迪亚非正規騎兵同时襲击羅馬騎兵的翼側和后方。会战是短促的。羅馬軍隊虽然英勇作战，但是毫无取胜希望。他們不善于乘騎；他們自己的馬成了他們打敗仗的原因。逃跑的羅馬輕步兵徑直向騎兵敗退，企图寻求騎兵的保护，結果許多馬匹受惊，摔下騎手，攪乱了队形。另一些兵士对自己的騎术沒有信心，为了慎重起見，便下馬企图像步兵那样作战。

但迦太基的重騎兵已經冲进了他們的纵深,同时,到处出現的努米迪亚騎兵則在乱成一团的羅馬軍队的周圍奔馳,杀伤逃出的每个兵士。羅馬軍队伤亡惨重,普卜利烏斯·齐比奧本人也負了伤。特雷比亚河会战时,汉尼拔用計将羅馬軍队引誘过河,使他們背水作战。一当他达到这个目的,便以全部兵力发起进攻,迫使羅馬軍队迎战。羅馬軍队和迦太基軍队一样,也是把步兵配置在中央;他們的两翼是騎兵,但汉尼拔用战象与之对峙,而把騎兵用来迂迴和包圍敌人的两翼。会战一开始,羅馬騎兵就因遭到优势敌人的迂迴而彻底失敗,但羅馬步兵打退了中央的迦太基步兵,并向前推进。这时,得胜的迦太基騎兵从正面和翼側攻击了羅馬步兵,迫使他们停止进攻,但沒有能够击潰他們。不过,汉尼拔了解羅馬軍团的坚定性,于是派出1 000名騎兵和1 000名精銳步兵由他的兄弟馬貢率領,迂迴到羅馬軍队的后方。这支生力軍随即攻击羅馬軍队,并突破了第二綫;但第一綫計有1万人,靠攏起来成密集队形冲出了敌陣,然后順着河向下游的普拉岑提亚前进,从那里順利地渡过了河。坎訥会战(公元前216年)时,羅馬軍队有8万步兵和6 000騎兵,迦太基軍队有4万步兵和1万騎兵。拉丁姆的騎兵为羅馬軍队右翼,以奥菲德河为依托;意大利同盟者的騎兵配置在左翼,步兵居中。汉尼拔也将步兵配置在中央,仍以凯尔特和西班牙的部队分列兩側,在他們之間稍后的地方配置有当时已按照羅馬式样装备和編成的非洲步兵。至于騎兵,汉尼拔則将努米迪亚騎兵配置在右翼,这里地形开闊,因而使动作比較机灵和迅速的努米迪亚騎兵能够避开当面的意大利重装騎兵的攻击;全部重騎兵則由哈斯德魯拔率領,配置在左翼河岸上。努米迪亚騎兵虽然使羅馬軍队左翼的意大利騎兵吃够了苦头,但由于它本身是一支非正

規騎兵，因而不能用正規的攻擊摧毀敵軍的密集隊形。在中央，羅馬步兵迅速擊敗了克爾特和西班牙部隊，以後便排成楔形縱隊用來攻擊非洲步兵，但後者卻將它的兩翼收回，成橫隊攻擊動轉不靈的羅馬軍隊，粉碎了它的進攻，以後會戰便長久相持不下。這時，哈斯德魯拔的重騎兵已做好擊敗羅馬軍隊的準備。他們向羅馬軍隊的右翼猛沖，經激戰後，將其沖散，然後，他們像亞歷山大在阿爾貝雷會戰時那樣，由羅馬軍隊中央的後面穿過，從背後攻擊了意大利騎兵，把他們擊潰，並且把他們當作輕而易得的戰利品留給努米底亞騎兵，自己則列隊向羅馬步兵的兩翼和後方總攻。這就決定了會戰的結局。笨拙不靈的羅馬軍隊受到圍攻，支持不住而陷於混亂，結果被擊潰并被粉碎了。從來還沒有過這樣徹底的全軍覆沒。羅馬軍隊損失了7萬人；騎兵生還的僅有70人。迦太基軍隊損失不到6000人，其中有三分之二是在羅馬軍團第一次攻擊時首當其沖的克爾特步兵。而贏得整個會戰勝利的哈斯德魯拔的6000名正規騎兵，死傷不到200人。

在較晚的時期，羅馬騎兵比在布匿戰爭²⁸⁴時期好不了多少。他們分成小隊編入各個軍團，從未形成一個獨立的兵種。除這種屬於軍團的騎兵外，在凱撒時代還有西班牙人、克爾特人和日耳曼人組成的僱傭騎兵；他們都是不同程度的非正規騎兵。羅馬騎兵從來沒有什麼建樹；這個兵種在羅馬如此被輕視，戰鬥力如此薄弱，以致安息的霍拉桑非正規騎兵都成了羅馬軍隊的莫大威脅。然而在帝國東部，人們仍然保持了对馬匹和乘騎的傳統喜愛，而且拜占庭在被土耳其人征服以前一直是歐洲的一個大的馬匹市場和騎術學校。所以我們看到，當查士丁尼在位時，在拜占庭帝國短暫的復興時期，它的騎兵曾達到較高的水平；據史料證明，在卡普亞

会战(公元 554 年)中,宦官納尔塞斯主要靠这一兵种打敗了意大利的条頓族征服者。²⁸⁵

条頓族征服者在西欧各国建立貴族政体,开创了騎兵史上的新紀元。各地貴族都組成騎兵,他們担任铁甲騎士(*gens d'armes*)的勤务,成为一种装备最重的騎兵,不仅騎士,而且連馬匹都披戴金屬的护甲。出現这种騎兵的第一次会战是普瓦提埃会战,公元 732 年,查理·馬尔泰尔在这里击退了阿拉伯人的屢次入侵。法兰克的騎士曾在阿奎丹大公埃德的率領下突破了摩尔人的陣列,并夺取了他們的营地。但这种部队不适于追击,因此,阿拉伯人便在不怕疲劳的非正規騎兵的掩护下,无阻碍地退入西班牙。这次会战便成了以后一連串战争的开端,从此雄壮有力但笨拙不灵的西方正規騎兵便常常同东方的灵活的非正規騎兵作战,互有勝負。德国騎士在几乎整个十世紀中与野蛮的匈牙利騎兵不断較量过,并以其密集队形于公元 933 年在梅澤堡和公元 955 年在雷赫河彻底击敗了后者。²⁸⁶ 西班牙騎士与侵入他們国土的摩尔人作战达数百年,最后战胜了他們。但在十字軍远征期間,当西方的“重装”騎士将战場移到东方敌人的国土上时,便开始打敗仗,在大多数場合都遭到复灭;無論他們自己或他們的馬匹都經受不了东方的气候、长途行軍和合适粮秣的不足。十字軍远征以后,又发生了东方善騎的民族对欧洲的入侵,即蒙古人的入侵。蒙古人侵占了俄国和波兰各地,于 1241 年在西里西亚的瓦尔施塔特同波兰德国的联軍会战。²⁸⁷ 經過長時間的战斗,亚洲人击潰了疲憊的欧洲铁甲騎士。但是,征服者为胜利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以致实力大受亏损。蒙古人沒有繼續前进,不久,他們便由于內訌而不再是一种威懾力量,而且被击退了。騎兵在整个中世紀一直是各国軍隊中的主要兵

种；在东方各国，經常起主要作用的是非正規的輕騎兵；在西欧各国，决定这一时期內每次会战胜負的兵种則是由騎士組成的正規重騎兵。騎兵的这种优势主要不是由于它本身的长处，——因为东方的非正規騎兵不会正規作战，而西方的正規騎兵行动又极不灵活，——而是由于步兵的素质低劣。当时亚洲人同欧洲人一样輕視步兵；步兵的成員都是些沒錢买馬的人，主要是奴隶或农奴；步兵沒有适当的組織，沒有护身甲冑，仅有的武器是矛和劍；它依靠纵深較大的队形有时也能抵御住东方騎兵猛烈但是混乱的冲锋；但它不可避免地要遭受那些不怕攻击的西方重装騎手的踐踏。只有英国步兵例外，它得力于一种厉害的武器——大弓。这一时期欧洲騎兵在軍隊中所占的比重无疑不像几世紀后那样大，甚至也不像現在这样大。騎士的数量不是很多的，我們发现，在多次大会战中，参战的騎士不到 800—1 000 名。但是，他們只要将敌人的重装騎手逐出戰場，通常足以对付任何数量的步兵。这些重装騎手通常排成一列，成橫队作战；后一列为侍从兵，他們的装备一般較輕，而且不齐全。这种橫队一同敌人接触，便立即散开单騎作战，所以会战是以單純的白刃格斗結束的。后来，由于使用了火器，才开始建立纵深的队形，通常为方形；但这时騎士阶层已快沒落了。

在十五世紀，戰場上出現了炮兵，而一部分步兵——当时的射击手——則装备了火枪；与此同时，步兵的性质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个兵种开始由以当兵为职业的雇佣兵編成。德国雇佣兵和瑞士兵就是这种职业兵；他們很快規定了較正規的队形和战术动作。古代的多立斯和馬其頓方陣在一定意义上又复兴了；头盔和胸甲使步兵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抵御騎兵的矛和劍；在諾瓦拉会战

(1513年)²⁸⁸中，瑞士步兵把法国騎士完全逐出戰場，从此，这种勇敢但是笨拙的騎兵就不再使用了。因此，在尼德兰反对西班牙的起义以后，出現了一种新式騎兵——德語为 Reiters〔雇佣騎兵〕(法語为 reitres)，这种騎兵同步兵一样，是用自願报名的办法招募来的，装备有头盔、胸甲、双刃刀和手枪。他們的装备和現代胸甲騎兵的一样重，但比騎士的輕得多。他們很快就表明比全身披戴鎧甲的騎兵优越，从此后者逐漸絕迹，矛也随着絕迹了；双刃刀和短銃火器成了騎兵通用的武器。約在同一时期(十六世紀末)，起先在法国，随后在欧洲其他国家，建立了一种步騎两用兵——龙騎兵。龙騎兵配备火枪，它根据情况有时作为步兵、有时作为騎兵作战。类似这样的兵还在亚历山大大帝时代就曾建立过，称为第馬赫〔dimachae〕，但这种做法长期沒有被仿效。十六世紀的龙騎兵存在了較长时期，但到十八世紀中叶，他們到处都只保留了名称，而失去了原有的两用性质，一般仅作为騎兵使用了。龙騎兵最重要的特征，在于它是最早出現的一种完全不披戴护身器具的正规騎兵。俄皇尼古拉曾试图再次大規模地建立作为真正的两用兵的龙騎兵，但不久就看出，到临陣之际总是不得不把它作为騎兵使用，因此亚历山大二世很快又把龙騎兵改編为像驃騎兵和胸甲騎兵那样很少担任步兵勤务的一般騎兵了。荷兰的偉大統帥奧倫治亲王摩里茨首先在其雇佣騎兵中建立了在某种程度上与現代战术編制相似的編制。他訓練他們以独立的部队成几列橫队进行冲鋒和运动，訓練他們以独立的連和排有条不紊地完成各种轉法和摆脱敌人的动作，排成纵队和橫队，变换正面。这样一来，騎兵战斗的結局就已經不取决于全部騎兵的一次冲鋒，而取决于相互支援的各独立騎兵連和各列橫队的連續冲鋒了。奧倫治亲王摩里茨的

騎兵通常排成纵深为 5 列的队形。其他各国军队的騎兵則成长纵队作战,而在采用横队的地方,其纵深仍为 5—8 列。

在十七世紀,由于耗資过多的重装騎手完全廢除,騎兵的人数有了极大的增长。这一兵种在任何时期任何军队中从来还没有占过这样大的比重。在三十年战争时期,各国军队中一般都有五分之一以至几乎二分之一的人员是騎兵;在个别场合,騎兵比步兵多一倍。这个时期最卓越的騎兵統帅是古斯塔夫-阿道夫。他的騎兵由胸甲騎兵和龙騎兵組成,而龙騎兵差不多总是作为騎兵作战。他的胸甲騎兵比皇帝的胸甲騎兵装备輕得多,而且不久就证明具有无可爭辯的优越性。瑞典騎兵排成 3 列,它一般同大多数国家的军队中以手枪为主要武器的胸甲騎兵相反,慣于持双刃刀向敌人冲锋,而不把時間浪費在射击上。在中世紀,騎兵通常配置在中央,而在这个时期,騎兵又像古代那样,配置在军队的两翼,排成两綫。在英国內战中出現了两名优秀的騎兵指揮官,一个是保皇派陣营中的魯珀特亲王,他以每一騎兵指揮官所特有的“驍勇”著称,但他几乎总是冲锋陷陣,忘掉了对騎兵的指揮,他本人如此全神貫注于眼前发生的事,以致在他身上“勇敢的龙騎兵”的表现常多于指揮才能的發揮。还有一个是属于另一个陣营的克倫威尔。他在必要时表现出同样的驍勇,同时在指揮方面却高明得多;他把军队紧紧掌握在自己手里,經常留有預备队以防意外和用于决定性的机动,同时他善于随机应变,因此一般总是战胜用兵輕率的对手。他只靠騎兵就贏得了馬尔斯頓穆尔和諾伊茲比会战²⁸⁹的胜利。

除瑞典军队和英国军队外,在大多数军队中,使用火器仍是騎兵在战斗中的基本行动方法。在法国、普魯士和奥地利,騎兵被訓練使用馬枪,正像步兵使用火枪一样;射击是整行、整列、整排地在

馬上進行，射擊時停止前進；接敵沖鋒時，橫隊快步前進；距敵人不遠時停止前進，進行齊射，抽出雙刃刀，然後沖鋒。步兵寬橫隊的有效射擊，動搖了人們對已無盔甲護體的騎兵沖鋒的一切信心，因而騎術被忽視，快步行進不會了，甚至在緩步行進時人馬失事的情形也屢見不鮮。訓練大都徒步進行，因而騎兵軍官對如何指揮騎兵作戰毫無所知。固然，法國騎兵有時是揮着雙刃刀沖鋒的，而忠于本民族傳統的瑞典國王查理十二則一貫以騎兵全速沖鋒，不進行射擊，沖散敵人的騎兵和步兵，有時甚至攻占輕型野戰工事，但是，只有弗里德里希大帝及其偉大的騎兵指揮官澤德利茨才承擔了根本改革騎兵的使命，並使騎兵得到了最高的榮譽。弗里德里希從他父親^① 那里繼承下來的普魯士騎兵是由騎着笨拙的馬匹、只受過射擊訓練的重裝騎手組成的，它在莫耳維茨會戰（1741年）中轉眼間就被粉碎了。但是第一次西里西亞戰爭²⁹⁰ 一結束，弗里德里希便立即徹底改組了騎兵。射擊和徒步訓練退居次要地位；騎術受到了特別的重視。

“各種動作均應以最快的速度完成，各種轉法應以輕跑步進行。騎兵軍官應首先把自己的兵士培養成優秀的騎手；胸甲騎兵應像驃騎兵那樣精於騎術，還應熟練地使用雙刃刀。”

騎兵應每日練習騎術。乘馬通過起伏地、超越障礙和劈刺是主要的訓練項目。沖鋒時在敵軍的第一綫和第二綫未被徹底突破前不得射擊。

“每一騎兵連沖鋒前進時，應持雙刃刀砍殺敵人，任何指揮官都不得允許部下射擊，否則應受降級處分；旅長應對此負責。進攻時，首先應以快步前

① 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編者注

进，最后轉为快跑，但要保持密集队形；国王深信，如以此种方法冲锋，敌人必将被粉碎。”“每一騎兵軍官应永远記住，为粉碎敌人必須做到两点：(1)以最大的速度和力量向敌人冲锋；(2)从翼側迂迴敌人。”²⁹¹

从弗里德里希制定的守則中摘录的这两段話，充分反映了他对騎兵战术所进行的全面改革。弗里德里希有一位得力的助手澤德利茨，他一直指揮弗里德里希的胸甲騎兵和龙騎兵。由于澤德利茨的訓練，在七年战争期間，普魯士騎兵在神速地和有組織地冲锋、迅速地变换队形、巧妙地向翼側冲锋、冲锋后迅速集合和变更部署等方面，是任何騎兵都不能相比的。成果很快就明显地表現了出来。霍恩弗里德貝尔格会战时，拜罗伊特龙騎兵团（共10个騎兵連）彻底打敗了奥地利步兵的左翼，击潰21个营，繳获軍旗66面、炮5門并俘擄4000名敌軍。在措尔恩多夫会战中，当普魯士步兵被迫退却时，澤德利茨率領36个騎兵連将得胜的俄国騎兵逐出戰場，然后猛攻俄国步兵，俄国步兵彻底遭到失敗，損失惨重。罗斯巴赫、施特里高、凱塞多尔夫、萊滕以及其他十次会战的胜利，弗里德里希都是靠他的出色的騎兵取得的。²⁹²

法国革命战争爆发时，奥地利人采用了普魯士軍隊的一套制度，但是法国人并没有这样做。实际上，法国騎兵由于革命而瀕于瓦解，而新編部队在战争初期几乎不能使用。法国新征集的步兵在1792年和1793年与訓練有素的英、普、奥騎兵作战时，几乎屡战屡敗。法国騎兵由于完全无力同这些对手較量，因而总是作为預备队使用，以后数年的征战才使它得到改进。从1796年起，每个步兵师都有騎兵支援；然而，維尔茨堡会战时，法国全部騎兵仍被59个奥地利騎兵連击潰（1796年）²⁹³。拿破侖执掌法国政权时，曾全力提高法国騎兵的质量。当时，他不得不訓練质量低劣到

了极点的人員和馬匹。法国人在欧洲无疑是最不善騎的民族，他們的馬用于駕車還不錯，但不适于乘騎。拿破侖本人只是一个不太高明的騎手，他对別人的騎术也采取漠視的态度。然而他进行了重大的改革，从建立布倫兵营以后，他的騎兵（騎的大都是德国和意大利的馬匹）已成了一个不容輕視的对手。在1805年和1806—1807年的战局中，他的騎兵夺取了奥地利和普魯士軍隊的几乎全部馬匹，此外，拿破侖的軍隊得到了萊茵联邦和华沙大²⁹⁴国的精銳騎兵的加强。这样就建成了拿破侖于1809年、1812年和1813年下半年用以作战的那支龐大的騎兵；这支騎兵虽然通常称为法国騎兵，但是很大一部分是德国人和波兰人。革命前不久在法軍中已完全廢除了的胸甲，又部分地被拿破侖在重騎兵中恢复起来。此外，騎兵的編制和装备几乎沒有改变，不过，拿破侖在得到波兰輔助部队的同时，还得到了几团装备着长矛的輕騎兵，这些輕騎兵的服装和装具的式样不久就为其他軍隊仿效。拿破侖彻底改进了騎兵的战术使用原則。他根据师和軍由三个兵种編成的原則，給每个师或軍編入一定数量的輕騎兵，但騎兵的基本兵力，特别是全部重騎兵，則集中留作預备队，用以在有利时机进行强有力的决定性的突击，或在必要时掩护軍隊撤退。这些騎兵突然出現在战場的某一点，常常起到决定性作用；然而他們还是一直沒有取得像弗里德里希大帝的騎兵所取得的那样光輝的战績。其原因部分是步兵战术改变了：步兵多半选择起伏地作战，而且总是列成方队对抗騎兵，这就使騎兵难以取得像普魯士騎兵对敌人正面寬而纵深小的步兵橫队所取得的那样巨大的胜利。同时，沒有疑問，拿破侖的騎兵是不能和弗里德里希大帝的騎兵媲美的，拿破侖的騎兵战术也远不是在各方面都比弗里德里希的战术先进。法

軍由于騎術不精，只得以較慢的步度——快步或正規的輕跑步冲鋒；只在少数情況下才快跑冲鋒。法軍的驍勇和密集隊形的採用，雖然常常彌補了不够迅速的缺點，但他們的冲鋒在現今看來也不能算是高明的。在很多場合，法國騎兵保留了舊的戰術——手持馬槍、勒馬不動地迎擊敵軍騎兵，因此在所有這些情況下他們都遭到了失敗。運用這種戰術的最后一個例子是丹寧科夫會戰（1813年4月5日）²⁹⁵。當時約1200名法國騎兵就是這樣等待400名普魯士騎兵的攻擊，前者雖然占有數量上的優勢，但是仍遭到了徹底的失敗。至于拿破侖的戰術，則使用大量騎兵是他堅定不移的原則，結果，不僅師屬騎兵被削弱得不堪使用，而且在大量使用騎兵時，他又往往忽視兵力應逐次投入戰鬥的原則，而這却是現代戰術的基本原則之一，並且它對騎兵比對步兵更適用。拿破侖把騎兵排成縱隊進行冲鋒，甚至還把整個騎兵軍編成一個龐大的縱隊；從這種隊形中哪怕是調出一個連或一個團來單獨作戰，都是絕對不可能的，更談不到什麼展開了。拿破侖的幾個騎兵將軍也不稱職，連其中最優秀的繆拉特，同澤德利茨比較起來也顯得十分可憐。在1813年、1814年和1815年的戰爭期間，拿破侖的敵人的騎兵戰術有了重大的改進。雖然他們在很大程度上仿效拿破侖的做法——將大量騎兵留作預備隊，因而大部分騎兵常常不參加任何軍事行動，但在許多場合他們還是試圖恢復弗里德里希的戰術。在普魯士軍隊中恢復了原來的精神。布呂歇爾首先較大胆地使用了自己的騎兵，並且一般都獲得了成功。在海瑙伏擊戰（1813年）中，普魯士20個騎兵連擊潰了法軍8個步兵營，並繳獲了18門炮。這次伏擊戰是現代騎兵史上的轉折點，它比呂特岑會戰時同盟國軍的戰術高明得多。在呂特岑會戰中，同盟國軍把18000名

騎兵留作預備隊一直到會戰失敗時止，雖然當時難以找到較適合騎兵作戰的地形。

英國向來沒有採取編組大量騎兵部队的做法，因而常常取勝，雖然納皮爾本人承認當時英國騎兵不如法國騎兵那樣好²⁹⁶。在滑鐵盧會戰（順便插一句，法國的胸甲騎兵這一次是快跑衝鋒的）中，英國騎兵的指揮很出色，它除了有幾次因民族習性發作而失去了控制以外，總的說來行動是成功的。1815年的和約以後，拿破侖的戰術又被弗里德里希的戰術取代，雖然仍舊被規定在大多數國家的軍隊的操典中。騎術得到了較多的注意，雖然仍舊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手持馬槍迎擊敵人的作戰思想已被擯棄；到處恢復了弗里德里希的原則，根據這一原則，任何一個騎兵指揮官如不主動攻擊敵人，而讓敵人攻擊自己，便應受到降級處分。跑步又成為衝鋒的步度；縱隊衝鋒讓位於以一系列橫隊的逐次衝鋒，並採用能保障翼側攻擊的隊形，以及衝鋒時能以獨立的小部隊機動的隊形。然而要做的事還很多。對騎術、特別是對野戰條件下的騎術予以更多的注意，使馬鞍的構造更接近於獵人用的樣式，並相應地改變騎馬的姿勢，而最主要的是減輕馬匹的負荷，——這些就是各國軍隊無一例外地需要做的改進。

現在我們放下騎兵史，來談談騎兵的現代編制和戰術。每個國家騎兵兵員的補充方法總的說來同該國其他兵種的補充方法一樣。不過，某些國家是規定一定地區的人來充當騎兵的，例如：在俄國是小俄羅斯人（在小俄羅斯出生的人），在普魯士是波蘭人。在奧地利，重騎兵在德意志各省和波希米亞補充，驃騎兵僅限於在匈牙利補充，槍騎兵主要在波蘭各地方補充。馬匹的補充方法值得專門提一下。在英國，戰爭時期全部騎兵所需的馬不到1萬匹。

政府采购并不困难,但为了保证军队优先使用約在五齡以下、未曾参加过劳役的馬匹,政府采购三齡的牡馬,其中大部分为約克郡种馬,在馬匹适于服役以前,由政府出資在馬場飼养。英国盛产好馬,并以每匹 20—25 英鎊的价格征购牡馬,这就保证不列顛騎兵配备了无疑是世界上最好的馬匹。俄国同样盛产馬匹,不过质量低于英国。軍馬采购官在帝国的南部和西部各省大都向犹太商人成批采购;然后把不适用的馬轉卖,剩下的馬按毛色分发給各团(在俄国军队中,一个团要选用毛色相同的馬)。团长被当做本团全部馬匹的所有者,他应当用撥給他的大批經費妥善飼养本团的馬匹。馬的服役期限規定为 8 年。起初馬匹由沃倫和乌克兰的各个大养馬場供給,但这些馬野性未改,調教非常困难,因此只得放棄了这种做法。在奥地利,一部分馬匹是买来的,但近来大部分馬匹是由国家养馬場供应的,养馬場每年可提供五齡的軍馬 5 000 匹以上。像奥地利这样盛产馬匹的国家,在极需馬匹的时候,可以依靠国内市場。在 60 年前,普魯士所需的馬匹几乎全部从国外购买,然而目前国内出产的馬匹已能供应全部騎兵,包括常备軍和后备軍的騎兵。常备軍騎兵的馬匹在三齡时就由采购官买来,送到馬場豢养到服役年岁;每年需要 3 500 匹。在动员后备軍騎兵时,国内的所有馬匹像有服兵役义务的人一样,都必须应征;但每征一匹馬,都偿付相当于 40 到 70 美元的代金。在普魯士适于服役的馬比所需的多两倍。法国的产馬量比所有其他欧洲国家都少。法国的馬用来駕車往往不錯,甚至很出色,但一般不适于乘騎。国家养馬場(haras)虽早已建立,但沒有取得其他国家那样的成就。在 1838 年,这些养馬場以及同它有关的軍馬供应处甚至不能为军队提供 1 000 匹由政府采购来的或飼养大的馬。拉罗什-艾蒙將軍认

为,全法国甚至找不到 2 万匹四龄到七龄的适于騎兵勤务的馬。²⁹⁷ 虽然軍馬供应处和养馬場近来已有很大改进,但仍然不能充分滿足軍队的需要。阿尔及利亚提供一种出色的軍馬,法軍的精銳騎兵团—— chasseurs d'Afrique [非洲猎兵] 团——全都配备这种馬,但其余的团几乎一匹也得不到。因此,在动員时,法国人只好从国外——有时从英国,但大都从北德意志——购买馬匹。从北德意志购买的馬,虽然每匹要花費約 100 美元,但是还都不是最好的馬。許多被德国騎兵团淘汰的馬都出現在法軍的队伍里,所以,除了 chasseurs d'Afrique 外,法国騎兵一般都配备着欧洲最坏的馬。

騎兵分为两大类:重騎兵和輕騎兵。它們的实际区别在于馬匹不同。体壮力大的馬和矮小灵活的快馬不可能协调一致地行动。前者在冲锋时动作較慢,但冲击力較大;輕巧的馬跑得較快,冲得猛,尤其适于单騎作战和成散开队形作战,而笨重的或高大的馬在这方面就既不够灵活,也不够机敏。正因为如此,騎兵的这种分类的确是必要的,但是,由于学时髦、凭想像以及模仿一定的民族服装,騎兵又有了各种各样的区别。这些区别就沒有詳細叙述的必要了。大多数国家的重騎兵,至少其中的一部分,是披戴胸甲的,不过这种胸甲远不是枪彈穿不透的;在撒丁,第一列重騎兵装备着长矛。輕騎兵一部分装备馬刀和馬枪,一部分装备长矛。馬枪有滑膛的和綫膛的。在大多数情况下,騎兵还佩带手枪;唯独合众国騎兵配备着轉輪枪。馬刀有直的,有不同程度弯曲的;前一种宜于刺,后一种宜于劈。矛是否比馬刀优越,还是一个爭論的問題。馬刀无疑更适于白刃格斗;矛太长、太重,用来冲锋未必适宜,但在追击潰逃的騎兵时,它成了极有效的武器。几乎所有善騎的民族都指靠馬刀;甚至哥薩克同善于使用馬刀的切尔克斯人作战

时，也不用长矛。手枪除了用来发信号外，别无用处；马枪即使是綫膛的，效用也不很大，如果不是后装的，那永远不会带来很大的实际好处；轉輪枪在好射手的手里，是厉害的近战武器；然而鋒利适用的精制馬刀仍然是騎兵武器之王。

騎兵的馬除負載鞍具和武装的騎手外，还要馱載备用服装、野营用具和飼馬用具，战时还要馱載粮秣。在各国軍隊和各类騎兵中，馬匹在行軍时的总載重量在 250—300 磅之間；这个重量比民用馬匹的載重量大得多。馬匹这种过重的負荷是一切騎兵的最大弱点。在这方面到处需要进行巨大的改革，騎手和行軍装具的重量都可能而且应当減輕，但只要目前的这套規定存在，在判断騎兵的战斗力和耐力时，总是必須注意馬匹的負重量。由身体强健、但体重尽量輕的騎手和健壯的馬匹組成的重騎兵，主要应作为以密集队形进行集中攻击的力量。为此，就需要有体力、耐力和一定重量的負荷，虽然也不能太重而使騎兵行动不便。騎兵的行动应当迅速，但必須以保持最严整的队形为限度。列陣冲锋时，騎兵应勇往直前，扫蕩前进途中的一切障碍。重騎兵的騎手虽然单个可能不会都像輕騎兵那样善騎，但应当有把握地控制自己的坐騎，并学会紧密集攏，严格地照直前进。因此，他們的馬对騎者小腿动作的反应不能过敏，也不能举蹄过急，但要善于快步行进，并学会在長時間輕跑步时严格保持队形。輕騎兵則相反，它的騎手較灵活，馬匹也較快，因此行动迅速，并能到处奔馳。它重量輕的缺点，应以迅速和积极行动来弥补。它极勇猛地冲锋；但当时机有利时，可故作逃跑姿态，以便随后突然变换正面，攻击敵軍的翼側。輕騎兵速度极快，又便于单騎作战，因而特別适于追击。輕騎兵指揮官必須具有比重騎兵指揮官更敏銳的观察力和清醒的头脑。輕騎兵的每

个騎手都应当精于騎术,熟练地掌握自己的坐騎,善于从停止間轉为快跑,在急馳中停住,迅速轉弯和灵活地超越障碍。輕騎兵的馬匹要勇猛迅速,对韁繩和騎者小腿动作的反应敏捷,轉弯灵巧,受过專門的輕跑調教,而且步伐矯健。輕騎兵除用于向翼側和后方勇猛攻击、伏击和追击外,还应担任整个軍队的大部分警戒和巡邏勤务;因此,擅长单騎战斗(純熟的騎术是单騎战斗的基础)是对輕騎兵的主要要求之一。騎兵成横队行进时,队形不应密集,这样就能够随时变换正面和进行其他的机动。

英国在名义上有 13 个輕騎兵团和 13 个重騎兵团(龙騎兵,驃騎兵,枪騎兵;胸甲騎兵只組成两团禁卫軍),但在实际上,从編成和訓練来看,英国的全部騎兵都是重騎兵;騎兵的身材和馬匹的大小差別都很少。真正的輕騎兵勤务英国一向是利用外籍部队担任的:在欧洲利用德国人,在印度利用土著非正規部队。法国有三类騎兵:輕騎兵(驃騎兵和猎騎兵)共 174 个連;基干騎兵(枪騎兵和龙騎兵)120 个連;預备队騎兵(胸甲騎兵和馬枪兵)78 个連。奥地利有重騎兵(龙騎兵和胸甲騎兵) 96 个連和輕騎兵(驃騎兵和枪騎兵) 192 个連。普魯士的常备軍內有重騎兵(胸甲騎兵和枪騎兵) 80 个連,輕騎兵(龙騎兵和驃騎兵) 72 个連;战时可能增加第一类后备軍的枪騎兵 136 个連;第二类后备軍的騎兵未必在任何时候都編成独立的单位。俄国騎兵由重騎兵(胸甲騎兵和龙騎兵) 160 个連和輕騎兵(驃騎兵和枪騎兵) 304 个連組成。作为步騎两用兵的龙騎兵部队現在不再編組了,龙騎兵已編入重騎兵。然而俄国真正的輕騎兵是哥薩克,其数量足够在俄国各个部队中担任各种警戒、偵察和非正規騎兵的勤务。合众国軍队中編有 2 个龙騎兵团,1 个猎騎兵团和 2 个名义上叫做騎兵的团;一般把所有这些团

都叫做騎兵团。实际上，合众国騎兵只是一种騎馬的步兵。

騎兵的战术单位是連，其人数以連长在变换队形时能用口令和动作直接指揮全連为限。一个連的人数在 100 名(英国)到 200 名(法国)之間；在其他国家的軍隊中，人数也不超过这一范围。4 个、6 个、8 个或 10 个騎兵連組成一个团。人数最少的是英国騎兵团(400 到 480 人)，人数最多的是奥地利輕騎兵团(1 600 人)。全团的人数过多，則行动不便；人数过少，則兵力在战争期間会很快耗尽。例如，英国 1 个輕騎兵旅在战局开始后还不到两个月就进行的巴拉克拉瓦会战时只有 5 个兩連制的騎兵团，勉强达 700 人，即相当于俄国 1 个驃騎兵团战时編制人数的一半。特殊編制的有英国的連即半連，奥地利的营即双連，这些都只是为了使团长能够在騎兵团人数众多的情况下进行指揮而設立的中間組織。

弗里德里希大帝以前，所有的騎兵都排成纵深不少于三列的队形。弗里德里希于 1743 年首次把自己的驃騎兵排成兩列，而在罗斯巴赫会战时，他的重騎兵也排成同样的队形。七年战争以后，这种队形为所有其他各国的軍隊采用，而且現在还是唯一被采用的队形。为了便于变换队形，連分为 4 个排；由橫队变纵队(各排向纵深疏开)以及反过来由纵队变橫队，是一切騎兵机动中主要的和基本的动作。其他大多数动作仅用于行軍(三路側敌行軍等)或用于特殊場合(成排或連橫队的密集纵队)。騎兵在战斗中的行动主要是白刃格斗，射击仅占次要位置，冷兵器(馬刀或长矛)是騎兵的主要武器；騎兵的全部力量集中表現在冲鋒上。所以冲鋒是衡量騎兵是否善于进行各种机动、变换队形和占領陣势的准繩。一切給冲鋒造成困难的做法都是錯誤的。冲鋒的威力取决于战士和馬匹在冲鋒将要結束的时机，即同敌人实际接触的时机，是否共

同發揮出最大限度的力量。为了达到这一点，必須以逐漸加快的速度接近敌人，只有当馬匹距敌人近时才全速冲进。但是，实现这种冲锋是騎兵必須解决的任务中差不多最难的一项。以逐漸加快的速度前进时，要保持严整的队形和协调一致是十分困难的，在极不平坦的地形上行动时尤其如此。这里就可以看出，严格照直前进是多么困难，又多么重要，因为假如不是每个騎兵都照直前进，在横列中就要出现挤撞现象，这种现象很快就会由中央波及到两翼，又由两翼波及到中央；战馬因而紧张不安，馬匹的速度和冲力便开始参差不齐，整个队形很快就会乱得不成样子，无法保持整齐的横列，而完全失去唯一能够保障胜利的那种紧密协调。其次，显然，当逼近敌人时，馬匹不愿冲入停立不动或正在移动的敌群，这时騎手就应制止这种现象，否则冲锋必将失利。因此，騎手不仅要有冲入敌陣的坚强决心，而且要能熟练地控制自己的战馬。各国军队的操典对冲锋时的騎兵的行动方法各有不同的规定，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即横队尽可能以慢步开始前进，然后轉为快步，距敌人 300—150 碼时轉为輕跑步，并逐漸加快前进速度，轉为快跑，距敌人 20—30 碼时則全速前进。不过，所有这些规定允許有很多例外，实际上，在各种情况下都必須注意地形的特点、天气、馬匹的状况等等。騎兵对騎兵冲锋时，如双方直接相撞（这种情况在騎兵战斗中极为罕見），則在相撞的一瞬間，馬刀的作用就不大了。这时依靠慣力，一方就可冲倒和驅散对方。精神因素，勇敢，在这里立即化为物质力量；最勇敢的騎兵連就将极其沉着、坚决、勇猛、ensemble〔协调一致〕和齐心合力地前进。因此，任何騎兵如不“勇猛”〔«dash»〕，就不可能有所建树。但只要一方的队伍被冲散，馬刀和个人騎术便开始发挥作用。这时，得胜的騎兵至少有一部分

要离开战术队形，以使用馬刀杀敌取胜。由此可見，成功的冲锋能立即决定战斗的胜负；但是，如果冲锋不继之以追击和单騎白刃格斗，那末战果就不会很大。善于保持战术协调和队形严整的一方，必将大大优越于不能做到这一切的另一方，正因为如此，非正规騎兵无论怎样善战，数量怎样众多，也不能击溃正规騎兵。沒有疑問，就个人的騎术和刀法來說，从来还没有一支正规騎兵能比得上素来善騎的东方各民族的非正规騎兵，但是，就連欧洲最坏的正规騎兵在平地战斗中也总是战胜这种非正规騎兵。从匈奴人在夏龙战败（451年）以后一直到1857年印度西帕依起义²⁹⁸这个期間，就沒有一个例子能說明出色的、但非正规的东方騎兵曾以冲锋打垮过哪怕只是一个团的正规騎兵。非正规騎兵队形散乱，冲锋时互不协调和沒有严整的陣列，因此絲毫也不能动摇密集的、勇猛行进的队形。只有当正规騎兵的战术队形陷入混乱和开始单騎战斗时，非正规騎兵的优越性才能显示出来；但是非正规騎兵直接向敌人乱冲并不能造成这种結果。只有当正规騎兵为追击逃敌而放棄橫队和展开单騎战斗时，非正规騎兵突然向后轉并利用有利时机，才能将前者击败。实际上，从安息人与羅馬人战争的时期起，非正规騎兵对正规騎兵作战的全部战术几乎就是使用这种計謀。在这方面最好的例子是拿破侖的龙騎兵在埃及的作战。无疑地，它是当时最坏的正规騎兵，但总是打败最出色的非正规的騎手——馬木留克兵。拿破侖談到馬木留克兵时說，2个馬木留克兵絕對能打赢3个法国兵，100个法国兵与100个馬木留克兵势均力敌；300个法国兵大都能战胜300个馬木留克兵，而1000个法国兵則总能打败1500个馬木留克兵。²⁹⁹

能較好地保持自己的战斗队形的騎兵部队，不管在冲锋时占

有多么巨大的优势,但还是很明显,甚至这样的部队在成功的冲锋后队形也要相对地受到破坏。冲锋不可能在一切地点都取得同样的决定性胜利;许多兵士不可避免地要卷入单骑格斗或追击;只有比较小的一部分主要是第二列还能大致保持队形。这是骑兵最危险的时刻,只要有很小的一队生力军向它冲击,便能使它前功尽弃。因此,冲锋后迅速集合是真正优良的骑兵的标志,而恰恰在这方面,不仅新编部队,而且有时甚至英勇而有经验的老部队也有严重的缺点。骑烈马的英国骑兵尤其容易失去控制;他们几乎到处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例如在滑铁卢和巴拉克拉瓦)。发出集合信号以后,追击通常由特别指派的或预先规定的几个排或连进行;这时,骑兵的基本兵力重整队形,准备应付任何意外。鉴于冲锋后甚至胜利者都会处于紊乱状态,就迫切需要经常拥有预备队,以便首先在战斗失利时可以使用;因此,骑兵战术的基本规则,总是只把当时拥有的兵力的一部分投入战斗。这种普遍采用的使用预备队的方法,说明大规模骑兵会战中情况变化多端,时而一方居优势,时而另一方占上风,双方互有胜负,直到最后留下的预备队以完整的战斗队形全力向溃乱而惊散的敌群猛冲,并决定战斗的结局时为止。另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地形。没有一个兵种像骑兵这样受地形的影响。泥濘松软的土壤会使骤步变为慢跑步;单个骑手毫不犹豫便可超越的障碍,却能破坏队形和队列的协调一致;尚未劳累的马匹轻易便可越过的障碍,却能把从清早就奔驰而未吃草料的马匹绊倒。同时,意外的障碍又会阻滞骑兵的前进和迫使它变换正面和队形,从而使整个横队处于敌人翼侧攻击之下。繆拉特在莱比锡会战中所进行的总攻就是骑兵攻击不当的一个例子。他把14 000名骑兵排成一个长纵队,去攻击向瓦豪村冲锋而

剛被击退的俄軍步兵。法軍騎兵以快步接近敌人；在距同盟國軍步兵約 600—800 碼处轉为輕跑；馬匹在松土上很快就疲憊了，到他們到达方队的时候，进攻的銳气已經消失了。結果同盟國軍只有少数伤亡严重的步兵营被击潰。大队騎兵繞过其余的方队，穿过步兵的第二綫，但並沒有給步兵以任何杀伤，最后到达了池塘和沼澤地一綫，他們就只得停止前进。这时馬匹已筋疲力尽，队形也混乱了，各团都混杂起来并失掉了指揮；在这种情况下，普魯士两个团和哥薩克近卫騎兵（总数不到 2 000 人）突然攻击法軍騎兵的两翼，迫使法軍狼狽逃窜。当时繆拉特既沒有預备队以应付意外情况，也沒有适当注意前进的步度和距离，結果遭到了失敗。

冲鋒可采用各种队形。战术家把冲鋒分为：*en muraille*〔密集队形的〕冲鋒，即冲鋒的橫队中各連之間根本沒有間隙或仅有很小的間隙；間隙队形的冲鋒，即連与連之間相隔 10—20 碼；*en échelon*〔梯次队形的〕冲鋒，即从一翼开始，各連相继冲鋒，因此，各連不是同时、而是先后接触敌人，假如将一个連列为疏开纵队，跟在构成第一 *échelon*〔梯队〕的連的外翼側的后面前进，那就可使这种冲鋒大为加强；最后一种是纵队冲鋒，它与前几种冲鋒根本不同，因为前几种冲鋒只不过是橫队冲鋒的不同形式。在拿破侖以前，橫队是一切騎兵冲鋒通用的和基本的形式。在整个十八世紀，仅在一种場合，即在必須突破敌人的包圍圈时，騎兵才排成纵队冲鋒。但是，拿破侖的騎兵都是勇敢而不善乘騎的兵士，所以他不得不采用某种新战法来弥补騎兵战术上的缺陷。他开始使騎兵成长纵队冲鋒，这样就迫使前几列騎兵照直狂奔，同时又向选定的冲鋒地点投入比橫队冲鋒时多得多的騎兵。尽量以大纵队作战竟成了拿破侖在 1807 年战局以后各次战局中的一种癖好。他首創了異

常龐大的纵队队形，由于在 1809 年僥幸成功，在以后的各次战局中他就固执地坚持这种队形，尽管这曾使他在会战中不止一次地遭到失敗。他把整师的步兵或騎兵編成纵队，使各营和各团展开，重叠配置。騎兵于 1809 年在埃克繆尔初次作了这种嘗試，当时 10 个胸甲騎兵团成纵队冲鋒，其中第一綫展开 2 个团，其后四綫各展开 2 个团，各綫間的距离約 60 碼。步兵在瓦格拉姆也是这样做的，当时以整师編成纵队，同时各营展开，先后跟进。这种战法用来对付当时慢条斯理的奥地利軍队还不致造成危險，但在以后的各次战局中，以及同行动較积极的敌人作战时，便招来失敗。我們已經看到繆拉特在瓦豪采用这种队形总攻时所招致的悲慘后果；德尔隆在滑铁卢发起的步兵总攻所遭到的致命的失敗，也是由于采用这种队形造成的³⁰⁰。騎兵采用大纵队作战尤其錯誤，因为这样就把最寶貴的兵力变成笨拙不灵的一群人馬，一旦投入战斗，再也无法指揮，因此，無論在正面取得怎样的胜利，当翼側受到指揮灵活的小股敌軍攻击时，它总是束手无策。用編成一个这种纵队的兵力，可以建立第二綫和一两支預备队；用他們来冲鋒，即使不能立即收到突出的效果，但反复几次冲鋒，无疑終会以較小的伤亡而获得較大的战果。事实上，大多数軍队都已擯棄了这种纵队冲鋒的方法，或者只把它当做一种奇特的理論，而在实际的做法上，則使大队騎兵列成数綫，各綫之間留有一个冲鋒距离，在長時間格斗时，每一綫均可支援和替换另一綫。拿破侖还第一次把数个騎兵师編成一个大单位，称为騎兵軍。預备队騎兵的这种組織，作为在一支龐大的軍队中簡化命令傳達的一种手段是极端必要的；但在戰場上，当这些軍作为統一的整体作战时，保留这一級組織則从未带来良好的結果。事实上，这也是我們上面所說的大纵队队形

所以是錯誤的主要原因之一。在現代的歐洲軍隊中，騎兵軍一般都保留了下來；在普魯士、奧地利和俄國的軍隊中甚至还規定了這種騎兵軍在戰場上的標準隊形和作戰的一般原則，這些原則的基礎就是把兵力編為第一綫和第二綫以及預備隊；這些原則也包括配屬給騎兵軍的騎炮兵應如何配置的規定。

我們在上面所談到的騎兵的行動，仅限于騎兵對騎兵作戰而言。但在會戰中使用這一兵種的主要目的之一，而在當前實際上是主要的目的，是對步兵作戰。我們知道，在十八世紀，步兵同騎兵作戰時幾乎從來沒有排成方隊。步兵在迎擊沖鋒時，仍保持橫隊；如沖鋒指向翼側，幾個連就向后折回，排成 *en potence* [拐子形] 來迎擊敵人的沖鋒。弗里德里希大帝曾告誡他的步兵，絕不可排成方隊，除非孤立的步兵營突然受到騎兵的襲擊；如在這一場合排成方隊，

“方隊應直接朝敵人的騎兵前進，擊退他們，並不再理睬他們的沖鋒，而繼續執行自己的任務”。

當時，步兵的縱深較小的橫隊全靠自己有效的火力迎擊騎兵的沖鋒，並且也确实常常擊退了騎兵的沖鋒；但這種橫隊一旦被突破，則必然被粉碎，霍恩弗里德貝爾格和措爾恩多夫會戰的情況就是這樣。現在，在很多場合縱隊代替了橫隊，步兵只要有可能，總是以方隊來迎擊騎兵的沖鋒，這已經成了慣例。誠然，在現代各次戰爭中，有一系列的例子說明，精良的騎兵突然襲擊列成橫隊的步兵而被步兵的火力所擊潰，但這種情況總是例外。現在問題在於騎兵是否有充分把握粉碎步兵的方隊。對這個問題的意見是不一致的；但是，看來公認的論點是：在一般情況下，未被炮火打散的精良的新銳步兵有很大可能抵擋住騎兵，而對於沒有經驗的、長時間

处在敌人炮火下經過一天激战伤亡較大因而筋疲力尽和丧失斗志的步兵，則行动坚决的騎兵占上風。不过也有例外，如德国龙騎兵在加尔西亚-埃尔南迪斯会战（1812年）³⁰¹冲锋时，3个騎兵連中就有1个連击潰了法国新銳步兵的1个方队；然而通常騎兵指揮官并不认为用自己的騎兵去攻击这种步兵是明智的。在滑铁卢会战中，奈元帅以大批法軍預备队騎兵向威灵頓軍队的中央发动总攻，但未能粉碎英軍和德軍的方队，因为被攻击的部队隐藏在丘陵后面很远的距离上，炮火轰击对他們的伤害极小，所以他們几乎完全是新銳的。因此，这种冲锋只能在会战的最后阶段采用，这时步兵因积极作战或是在密集的炮火下消极行动而筋疲力尽，在这种情况下，騎兵冲锋便可取得决定性的效果，特别是当它得到步兵預备队的支援时，就像博罗迪諾和利尼^①两次会战时的情况那样。

这里，我們不能一一闡述騎兵在执行警戒、巡邏、护送等勤务时所能担任的各項职责。但是，在这里簡單叙述一下騎兵战术的一般原則是适宜的。由于步兵日益成为会战的主力，騎兵的战法无疑应当或多或少地服从于步兵的战法。因为現代战术是以三个兵种的配合和相互支援为基础的，所以至少对部分騎兵說来就談不上独立行动。根据这种情况，各国軍队的騎兵总是分为两类：师屬騎兵和預备队騎兵。第一类是編入各步兵师和軍并与步兵隶属同一指揮官的騎兵。它在战斗时的使命，是利用一切可能出現的有利时机来取得胜利，或当步兵遭到优势兵力攻击时，协助步兵退出战斗。它的行动自然有局限性，兵力也不足以独立作战。預备队騎兵是軍队騎兵的主力，它对于整个步兵來說同样起着从屬性

^① 見本卷第 258—263 頁和第 191 頁。——編者注

的作用,就像师屬騎兵与它所在的步兵师的关系一样。因此,預备队騎兵应随时做好准备,以待有利时机进行毀灭性的突击,击退敌人步兵或騎兵的总攻,或伺机进行决定性的騎兵冲鋒。从上面的論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預备队騎兵最适用于大会战的最后阶段,这时它能起而且确实常常起过决定性的作用。澤德利茨率領騎兵取得的那樣巨大的胜利現在已經完全不能設想了,但是,騎兵的作用对現代多数大会战的結局仍有很大影响。騎兵在追击时的作用特別大。步兵在炮兵的支援下,只要保持队形,沉着坚定,就沒有理由惧怕与騎兵作战;但步兵無論由于什么原因而队形混乱时,就会成为向它冲来的騎兵的猎物。遇到騎兵时不能逃跑,因为优秀的騎兵甚至在难以通行的地形上也能前进;以騎兵猛追潰敌,在任何时候都是彻底巩固战果的唯一的好办法。由此可見,無論步兵在会战中起多大作用,騎兵仍然是、而且将永远是一个必要的兵种。現在,像过去一样,任何軍隊如果沒有一支能騎善战的騎兵,就不能指望作战胜利。

弗·恩格斯写于1858年3月初一

6月21日左右

載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9年版

第4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弗·恩格斯 筑城³⁰²

人們有时把这个題目分为防御筑城和进攻筑城两部分，防御筑城規定改造某一地形使之长期或短期适于防御的方法，进攻筑城則包含圍攻的各种規則。但我們在这里把这个題目分为三部分来談：**永备筑城**，即在平时使某地的防御能迫使敌人在进攻时对它采取正規圍攻的一种方法；**圍攻法**；**野战筑城**，即在战争的特殊情况下某地可能暂时具有重要意义，因而构筑非永久性工事予以加强的一种方法。

一、永备筑城

工事的最古老的形式看来是防栅，直到十八世紀末，防栅仍然是土耳其人的民族形式的工事（palanka），甚至現在，印度支那半島上的緬甸人还在广泛使用。防栅是由两列或三列排得很紧密的坚固木桩垂直插入地下构成的，它形成环繞整个被防卫的城市或兵营的圍墙。大流士在向斯基台人进军时，科尔特斯在墨西哥的塔巴斯科附近和庫克船长在新西兰都曾遇到过这种防栅。有时，各列木桩之間填滿泥土；在另一些場合，木桩用藤条牢牢系在一起。下一步是石墙代替了防栅。这种工事使用的時間較长，同时

对它攻击也困难得多。从尼尼微和巴比伦时期起直到中世纪末，在所有比较文明的民族中，石墙是唯一的筑城手段。石墙筑得很高，甚至使用云梯也难以攀登，而且相当厚，足以长时间抵御攻城槌的撞击，并使防御者可以在较薄的、带垛的石质胸墙的掩护下在石墙上自由行走，通过胸墙上的射孔，则可向围攻者射箭或抛丢其他投掷物。为了加强防御，胸墙不久便筑在石墙顶端向外突出的悬石上，悬石之间留有孔隙，使防守者可以看到墙根，如果敌人进到这里，防守者就可以直接从上面投物杀伤他们。至于围绕整个石墙挖掘护城壕作为阻止敌人接近的主要障碍，毫无疑问，这也是在很早时期就有了。最后，紧靠石墙每隔一定距离又增建了一座塔楼，形成石墙的突出部，从这里可以对在两座塔楼之间攻城的军队投物射箭，从侧面防守石墙，石墙的防御能力就达到了最高的发展阶段。在大多数情况下，塔楼比石墙高，用横胸墙与石墙顶隔开，瞰制着石墙，而且每一塔楼本身又是一个小堡垒，在防守者已被迫撤离主墙以后，敌人仍必须分别夺取。如果再补充一点，即在有些城市中，特别是在希腊，在要塞内的制高点上构筑某种城砦（内城），形成内堡和第二道防线，那末我们就把石墙时代筑城工事最主要的特点说得详尽无遗了。

但在十四世纪至十六世纪末这一时期中，炮兵的使用从根本上改变了攻打筑垒地点的方法。从这时起，开始出现大量有关筑城的著作，它们提供了无数的筑城体系和方法，其中一部分或多或少地被采用和推广了，而另外一些——并不经常是最差的——却往往被人们当做纯理论性的笑谈而忽视了，直到较晚的时期，其中一些有益的主张才被比较幸运的后继者重新发掘出来。正像我们所看到的，在旧的石墙体系和新的土质工事体系（仅在敌人从远处

看不到的部分才砌上石头) 之間起了桥梁作用的——如果可以这样說的話——那位作者³⁰³ 的命运就是这样。使用炮兵的直接結果, 是石牆的厚度和塔楼的直徑加大, 而它們的高度减低。这时这些塔楼改称圓台堡 (rondelli), 它們构筑得相当大, 能容納数門火炮。为使防守者也能从石牆上用火炮射击, 又在石牆后面加筑了土堤, 使石牆有必要的寬度。不久我們看到, 这种土质工事开始逐渐排挤石牆, 而在某些場合完全代替了它。德国著名画家阿尔勃萊希特·丢勒发展了这种圓台堡体系, 并使它达到高度完善的境地。他在整个城墙上每隔一定距离設一个圓台堡, 把圓台堡筑成完全独立的堡垒, 各堡均有对护城壕进行纵射的穹窿炮台; 他的石质胸牆沒有掩蔽的部分(即圍攻者可以看到的、成为他們平射的目标的那部分) 高度不超过 3 英尺。此外, 为了加强护城壕的防御, 他建議构筑側防暗堡——一种构筑在护城壕底部、圍攻者看不到的穹窿式工事, 它两面都有射孔, 可以对直到多角形要塞邻近各角的一段护城壕进行纵射。几乎所有这些主張都是新发明; 如果說在他那个时代这些主張除了穹窿以外沒有一个得到人們的贊同, 那末, 我們可以看到, 在后来一些最重要的筑城体系中它們都得到了承认, 并得到了与新时代已改变了的条件相适应的发展。

大約就是在这个时期, 扩大了塔楼的外形发生了变化, 这一变化可以說产生最新筑城体系的开端。圓形的塔楼有一个缺点, 即無論是从中堤(两个塔楼之間的城牆) 或是从相邻的塔楼进行射击, 都不能把塔楼前面的所有各点全部置于火力之下: 在靠近城牆的地方有些小的角度, 敌人一到达那里就位于要塞火力范围之外。为了克服这一缺点, 塔楼被改建成不等边的五角形工事, 其中一边面向要塞内部, 其他四边則面向要塞外面。这种五

角形的工事叫做棱堡。为了避免重复和说不清楚，下面我们先叙述能说明棱堡防御主要特点的一种体系，并指出它的各部分的名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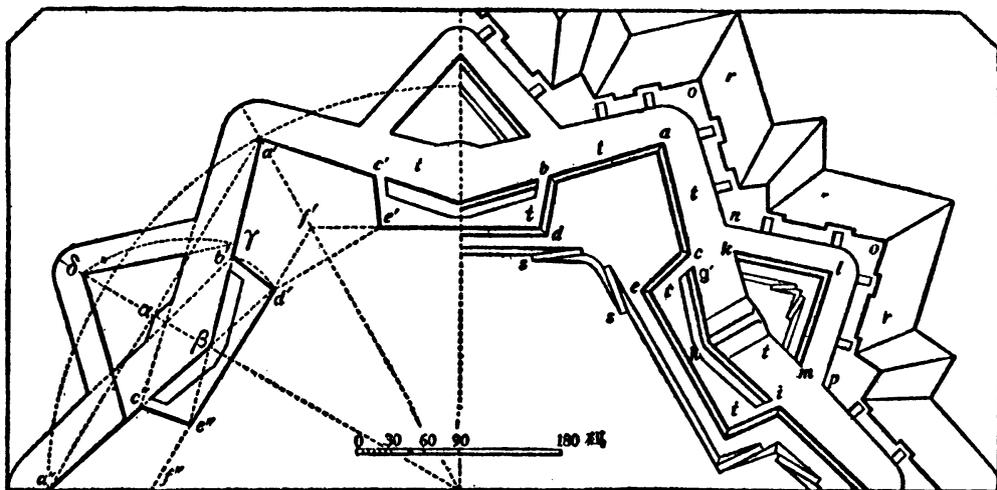


图 1

图 1 所示的是根据沃邦的第一种方法建成的六角形要塞的前三面。左半图是工事外形的几何草图，右半图是详细画出的土堤、斜堤和其他部分。多角形要塞的 $f'f''$ 线并不全部是连续的土堤，其两端 $d'f'$ 和 $e'f''$ 部分没有土堤，这段空间由向前突出的五角形棱堡 $d'b'a'c'e'$ 掩护。 $a'b'$ 线和 $a'c'$ 线构成棱堡的正面； $b'd'$ 线和 $c'e'$ 线构成棱堡的侧面；棱堡正面和侧面交会之点叫交点。从圆心到棱堡顶角的 $a'f'$ 线叫中线。六角形始边的一段—— $e'd'$ 线是中堤。这样，每一座多角形要塞有多少个边，就有多少个棱堡。棱堡有实心的和空心的两种：五角形棱堡内全部填土，填到架炮垒道（土堤上放置火炮的地点）的高度时，叫实心棱堡；土堤从垒道后面起就向棱堡内部成缓坡倾斜时，叫空心棱堡。图 1 中 $dbace$ 为实心棱堡，其右面只画出一半的是空心棱堡。棱堡和中堤合在一起

組成要塞的圍牆，即要塞的核心部分。在棱堡和中堤上，我們首先看到的是架炮壘道上的胸牆，胸牆構築在前面，以便掩護防守者，其次可看到內斜面上的坡道 (*ss*)，這是用以和要塞內部保持交通的。要塞圍牆的高度足以掩護城內房屋不受敵人平射火力的射擊，而胸牆的厚度則足以長時間經受住重炮的轟擊。整個要塞圍牆的周圍有護城壕 *tttt*，護城壕內配置有幾種外圍工事。首先，中堤前有三角堡或半月堡 *klm* —— 一種有兩個正面 *kl* 和 *lm* 的三角形工事，每個正面都有配置火炮的土堤和胸牆。上述一切工事敞開的後面部分叫背面，所以三角堡的 *km* 綫和棱堡的 *de* 綫都是背面。三角堡的胸牆比要塞核心部分的胸牆約低 3—4 英尺，這樣，後者便可瞰制三角堡的胸牆，必要時，要塞核心部分的花炮可超越三角堡進行射擊。中堤和三角堡之間的護城壕內，有一種狹長的獨立工事 *ghi* 叫做凹角堡，主要用來掩護中堤，使它不受敵人破城炮的射擊。這種工事很低而且過於狹窄，不能配置火炮，其胸牆僅能在敵人強攻得利時，使步兵能從護城壕中進行射擊，從翼側掩護半月堡。護城壕外面是隱蔽路 *nop*，它的內側是護城壕，外側是斜堤 *rrr* 的內斜面，斜堤從自己的內緣即斜堤頂 (*crête*) 起成極緩的斜坡向堤外地面傾斜。斜堤頂又比三角堡低 3 英尺或 3 英尺以上，以便要塞的全部火炮都能超越它而進行射擊。在這些土質工事的斜面中，要塞核心部分的外斜面和護城壕內的外圍工事的外斜面 (即內岸)，以及護城壕本身的外斜面 (從隱蔽路向下的部分)，即外岸通常都用石砌。隱蔽路的凸角和凹角構成的寬大的掩蔽地點叫屯兵場，在凸角處的叫凸角屯兵場 (如 *o*)，在凹角處的叫凹角屯兵場 (如 *np*)。為了防止對隱蔽路的縱射，隱蔽路上每隔一定距離攔起一道橫牆，即橫方向的胸牆，只在靠近斜堤的一端留

一个不大的通路。有时还构筑小型工事，用来掩护从凹角堡通过护城壕到三角堡的交通。这种工事叫侧防暗堡，是一条两面用胸墙掩护的狭窄的通路，胸墙的外部表面成缓坡向下倾斜，和斜堤相似。图 1 中这种侧防暗堡位于凹角堡 ghi 和三角堡 klm 之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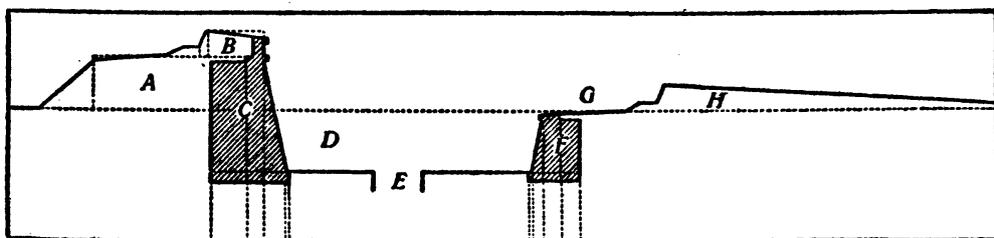


图 2

图 2 所示的断面图可以使上面的介绍更为清楚。A——要塞核心部分的架炮垒道；B——胸墙；C——内岸的石砌部分；D——护城壕；E——水壕，即沿护城壕中央挖掘的较小和较深的壕沟；F——外岸的石砌部分；G——隐蔽路；H——斜堤。胸墙和斜堤后面的梯阶叫踏垛，是步兵超越掩护自己的胸墙进行射击时立脚的地方。从图 1 上可以很清楚地看出：配置在棱堡侧面上的火炮可以射击到相邻棱堡前面的整段护城壕。这样，棱堡的正面 $a'b'$ 由侧面 $c''e''$ 的火力掩护，而正面 $a'c'$ 则由侧面 bd 的火力掩护。另一方面，两个相邻棱堡的相对正面可以用火力控制位于它们之间的三角堡前的护城壕，掩护三角堡的正面。因此，护城壕没有一段不在侧射火力掩护之下，这也就使棱堡体系向前迈进了真正伟大的一步，从而开辟了筑城史上的新纪元。

棱堡的发明者以及棱堡出现的准确年月已无从查考，确实可信的只有：棱堡是意大利发明的，1527 年桑米凯利曾在维罗纳的城墙上修建了两座棱堡。关于在更早以前就有棱堡的一切说法都

是有疑問的。棱堡筑城体系可按一些国家的学派来分类。首先应当談的当然是发明棱堡的那一学派，也就是意大利派。最早的意大利棱堡保留着它的前身的痕迹；它們只是一些多角形的塔楼或圓台堡；如果不算側射火力，它們几乎沒有改变工事原来的性质。要塞的圍墙仍是暴露在敌人平射火力之下的石墙；石墙后面堆积的土堤主要用作配置火炮和进行射击的地点，它的內斜面像古老的城墙一样，仍用石头被复。只是在很久以后，胸墙才开始筑成土质工事，但即使在那时，整个外斜面，仍用石头一直砌到頂端，而且暴露在敌人的平射火力之下。中堤极长，約 300—550 碼。棱堡非常小，相当于大的圓台堡，棱堡的側面总是和中堤相垂直。因为筑城学中有一条原則：有效的側射火力总是从与火力所要掩护的那条綫相垂直的一綫发射的，所以老式意大利棱堡构筑側面的主要目的显然不是为了掩护相邻棱堡的短而远的正面，而是为了掩护长而直的中堤綫。中堤过长时，就在它中間修筑平頂的鈍角棱堡，叫做台堡 (piatta forma)。側面不是从交点修起，而是从正面土堤稍后处修起，这样，交点就向前突出，并用来掩护側面。每一側面都有两个炮台：下层炮台和稍微向后配置的上层炮台。有时还在側面的內岸上与护城壕底相平之处构筑穹窿。这里再加上一条护城壕，那就是最初的意大利棱堡体系的全貌，它既沒有三角堡和凹角堡，也沒有隱蔽路和斜堤。但这种体系很快就得到了改善。中堤縮短了，棱堡加大了。多角形要塞內边(即图 1 中的 $f'f''$ 綫)的长度規定为 250—300 碼。棱堡的側面加长到相当于多角形要塞一个边的六分之一和中堤的四分之一。这样一来，尽管棱堡側面仍与中堤相垂直并且还有其他缺点，但是我們可以看到，这时側面已能較多地掩护相邻棱堡的正面了。棱堡也开始构筑成实心的，

而且在它的中央常构筑封堞，即一种正面和侧面各与棱堡的正面和侧面平行的工事，但其土堤和胸墙比棱堡的土堤和胸墙高，以便从这里可以超越棱堡的胸墙进行射击。护城壕既宽且深，其外岸通常与棱堡正面平行。但是因为这种方向的外岸妨碍棱堡侧面上紧靠交点的那一部分对整个护城壕进行观察和侧射，所以以后这一缺点被克服了，在构筑外岸时使其延长线通过相邻棱堡的交点。后来，又构筑了隐蔽路（十六世纪二十年代至五十年代期间在米兰的城砦中初次出现；1554年塔尔塔利亚曾第一个提到过³⁰⁴）。它用作完成出击的部队集合的地点和撤退的道路，可以说，隐蔽路的出现是防御要塞时巧妙而坚决地采取进攻行动的开端。为了增大隐蔽路的使用效果，又构筑了提供更大场地的屯兵场，从屯兵场的凹角处还可以对隐蔽路进行可靠的侧射。为使敌人接近隐蔽路更为困难，在斜堤上距堤顶约1—2码处又构筑了围栅；不过这样配置的围栅很快就会被敌人的炮火摧毁，因此，在十七世纪下半叶，根据法国人莫丹的建议，围栅移至有斜堤掩护的隐蔽路上。要塞的大门位于中堤的中央；为了掩护大门，又在大门前护城壕的中央构筑了一种半月形的工事；但是和塔楼改为棱堡的原因相同，这种半月堡(demi-lune)不久也改建为三角形工事，即现在的三角堡。这种工事仍然是很小的，但后来发现它不仅可做护城壕的桥头堡，而且还可以掩护棱堡的侧面和中堤不受敌人炮火的破坏，可以在棱堡中线前面构成交叉火力，并可以从侧方有效地掩护隐蔽路，于是便开始把它构筑得大一些了。尽管如此，这种工事仍然很小，因而它的正面的延长线只能在中堤点（即中堤两端之点）与要塞的围墙相交。意大利筑城体系的主要缺点如下：1. 棱堡侧面的方向不好。因为有了三角堡和隐蔽路之后，中堤成为攻击对象的场合愈来愈

少，現在遭受攻击的主要是棱堡的正面。为了很好地掩护正面，应使正面的延长綫在相邻棱堡側面的起点与中堤相交，而这个側面則应与这一延长綫（叫做防守綫）垂直或接近垂直。这样，才能沿整个护城壕和对棱堡前面进行有效的側射。但实际上防守綫既不与棱堡的側面垂直，又不在中堤点与中堤相交，而是在中堤的四分之一、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处与中堤相交。因此，从側面上发射的平射火力与其說可以杀伤攻击相邻棱堡的敵軍，不如說可以杀伤相对側面的守軍。

2. 要塞圍墙只要有一处被敌人打开缺口和攻占，就显然不能保证进行长期防御。

3. 三角堡太小，不足以掩护中堤和側面，而中堤和側面从側方掩护三角堡的火力也很弱。

4. 土墙非常高，而且整个表面都是用石砌的，通常約有 15—20 英尺高的石砌部分暴露在敌人平射火力之下，当然，这个石砌部分很快就会被击毀。我們可以看到，甚至在尼德兰人已证明石砌部分毫无用处以后，仍需要几乎两个世紀的时间，才彻底消除了对不加土掩盖的石砌部分的信賴。

意大利派优秀的工程师和著作家有：桑米凱利（死于 1559 年，他曾构筑希腊納波利-德-罗曼尼亚和干地亚二地的要塞，并在威尼斯附近修建了利多堡垒）；塔尔塔利亚（約 1550 年）；阿尔吉西·达·卡皮、吉罗拉莫·馬吉和扎科莫·卡斯特里奥托——这三人約在十六世紀末都写过有关筑城的著作³⁰⁵）。烏尔比諾的帕乔托則曾修筑过都灵和安特卫普的城砦（1560—1570 年）。稍晚的意大利筑城学著作家有馬尔基、布斯卡、弗洛里安尼和罗塞蒂，他們对意大利筑城体系作了許多改进，但其中毫无独創之处。他們不过是巧妙程度不同的抄襲者；他們大部分的发明都是抄襲德国人丹尼尔·斯佩克尔的，其余的則是抄襲尼德兰人的。上述这些著作家的活动都在十七世紀，当时在德国、

尼德兰和法国筑城学已迅速发展，相形之下，他們的这些活动就黯淡无光了。

在德国，意大利筑城体系的缺点很快就被发现了。第一个指出旧意大利派的棱堡小和中堤长这个主要缺点的，是为查理五世在安特卫普城构筑要塞的德国工程师弗兰茨。在审查要塞构筑计划的会议上，他曾坚持构筑較大的棱堡和較短的中堤，但是阿尔巴公爵和其他西班牙將軍的意見占了上風，这些人除了旧意大利体系及其特有的陈規旧套以外，根本就不想知道其他的东西。其他体系的一些德国要塞的特点，是按丢勒的原則构筑了穹窿暗廊，例如在 1537—1558 年构筑的尤斯特林要塞中，以及几年后在由工程师——有名的約翰大师 (Meister Johann) 构筑的幽里希要塞中都是如此。但是第一个完全摆脱意大利派影响的是修建斯特拉斯堡城的工程师丹尼尔·斯佩克尔(死于 1589 年)，他所創立的原則，成为后来所有棱堡工事体系的依据。他的主要原則如下：1. 构成要塞圍墙的多角形的边愈多，要塞就愈坚固，因为边多了，要塞的各个正面就可以更多地互相支援；所以，需要相互掩护的各个工事配置得愈近似直綫愈好。由此可知，科尔蒙太涅当作新奇的发现提出来，并用以炫耀其数学知識淵博的这个原則，早在 150 年前就为斯佩克尔所熟知。2. 銳角棱堡不好，鈍角棱堡也不好，棱堡的凸角应为直角。在反对銳角形凸角方面他是正确的（目前人們通常认为最小的凸角为 60 度），但是，由于他所处的时代对直角形凸角的偏爱，他也反对鈍角形凸角，实际上鈍角形凸角非常有利，而且是多边的多角形要塞所不可避免的。看来，实质上这是他对当时偏見的让步，因为在他自认为最能显出他的筑城法最大优点的一些設計图中都画有鈍角棱堡。3. 意大利的棱堡太小；棱堡必須是大

型的。因此斯佩克尔的棱堡比科尔蒙太涅的棱堡大。4. 每个棱堡内和中堤上都必须构筑封堞；这是从当时使用的围攻法中得出的结论，用这种围攻法时，堞壕内的高大封堞曾起了很大的作用。不过，按照斯佩克尔的意见，封堞不仅起简单的抵抗作用，而且起更大的作用；他的封堞是预先构筑在棱堡内的真正的二重堡，在要塞围墙被敌人打开缺口并被攻占后，它们就成为第二道防线。因此，人们通常认为把封堞变为永久性二重堡，是沃邦和科尔蒙太涅的功绩，其实应当归功于斯佩克尔。5. 棱堡的侧面——至少是部分侧面，最好是整个侧面——应同防守线垂直，并应从防守线和中堤相交之点构筑起。由此可见，原来人们认为是法国工程师帕岡所首创的、并且是使他享有盛誉的主要原因的这一重要原则，也在比他早 70 年以前就被提出来了。6. 穹窿暗廊是防守护城壕所必需的；因此斯佩克尔在棱堡的正面和侧面上都构筑这种工事，不过仅供步兵使用。如果他把它们构筑得大到足可容纳炮兵，那末他在这方面就达到最新的完善的水平了。7. 要使三角堡发挥作用，便应把它尽可能构筑得大些。因此，斯佩克尔的三角堡是所有曾被提出过的三角堡中最大的。以沃邦与帕岡相比，沃邦的改进大部分在于加大三角堡；而以科尔蒙太涅与沃邦相比，科尔蒙太涅的改进几乎全部在于加大三角堡；但斯佩克尔的三角堡甚至比科尔蒙太涅的三角堡还要大得多。8. 隐蔽路的防御应尽可能地加强。斯佩克尔是第一个了解隐蔽路的重大意义并相应地加强其防御的人。斜堤顶和外岸顶端构筑成 en. crémaillère(锯齿形)，使敌人的纵射不起作用。科尔蒙太涅又借用了斯佩克尔的这一主张，不过他保留了为斯佩克尔所否定的横墙（横在隐蔽路上防纵射的短土墙）。现代的工程师通常都肯定斯佩克尔的方案比科尔蒙太涅的

方案优越。此外，佩斯克尔还是第一个在隐蔽路的屯兵场上配置炮兵的人。9. 任何石砌部分都不应在敌人视界以内，不应暴露在平射火力之下，这样，敌人的破城炮在到达斜堤顶以前，便不能做好射击准备。这一非常重要的原则虽然在十六世纪就为斯佩克尔所确立，但直到科尔蒙太涅为止，从来没有被采用过；甚至是沃邦，也将石砌部分的很大一部分暴露在外（见图 2 C）。从这个简要的叙述中可以看出，斯佩克尔的主张中不仅包含了，而且已明确地提出了整个最新棱堡式筑城的基本原则，甚至是现在，根据他的筑城法仍可构筑出很好的防御工事，如果从他所处的时代来看，他的筑城法确实是非常杰出的。在整个近代筑城史中，人们在每一个著名工程师的杰出主张中都能证明其中某些是从这位伟大的棱堡防御体系奠基人处抄襲来的。斯佩克尔的实际的工程艺术表现在英果尔施塔特、施勒特斯塔特、加根瑙、乌尔姆、科马尔、巴塞尔和斯特拉斯堡等要塞的建筑中，所有这些要塞都是在他的指导下筑成的。

大约在同一时期，尼德兰争取独立的斗争³⁰⁶促成了另一筑城学派的产生。当时，不能指望荷兰城市的古老石墙能抵挡住正规的围攻[regular attack]，因而必须加强这些城市的防御以抵抗西班牙人，但是要按意大利式构筑高大的石质棱堡和封堞，则既没有时间又没有资金。而这里的地形特点（拔海不高）却提供了另外的可能性，于是在建筑堤壩方面素有经验的荷兰人就依靠水来防御。他们的筑城体系与意大利体系完全相反：宽 14—40 码的浅水壕；矮矮的土堤没有任何石砌部分，但有更低的、突出在前面的土堤（前堤）作掩护，用以更好地防守护城壕；护城壕中有大量外圍工事，如三角堡、半月堡（棱堡突出部之前的三角堡）、角堡和冠堡

等^①；此外，在利用地褶方面，也比意大利人好。第一个完全用土质工事和水壕設防的城市是布雷达(1533年)。后来荷兰筑城法又有了某些改善：內岸的一个狭长部分砌了石块，因为有水的护城壕在冬季結冰后，敌人很容易通过；护城壕中构筑了堤壩和水閘，以便趁敌人在干壕底开始对壕作业时放水；最后，还构筑了水閘和拦河壩，以便預先有计划地用水淹沒斜堤脚周圍的地区。写过这种旧的荷兰筑城法的著作家有馬罗魯瓦(1627年)、弗莱塔格(1630年)、費尔克尔(1666年)和美耳德尔(1670年)。曾试图把斯佩克尔的原則用于荷兰体系的有沙伊特尔、諾伊鮑威尔、海德曼和赫尔(都在1670年和1690年之間，都是德国人)。

在所有的筑城学派中，法国派享有最大的声望。在保存到现在的各要塞中，这一派的原則被实际采用的比其他各派的原則加在一起还要多。不过，再也沒有一个派別比它更缺乏自己独創的主張了。在整个法国派中，找不出一一种新的工事、一条新的原則不是从意大利人、荷兰人或德国人那里抄襲来的。但是，法国人巨大的功績是使筑城法和精确的数学原理相結合，規定了各綫之間适当的比例，并根据筑垒地点各种不同的地形条件运用科学理論。人們通常把巴尔勒杜克的埃拉尔(1594年)称为法国筑城之父，实际上这是沒有根据的；他的棱堡的側面与中堤形成銳角，因而比意

^① 角堡是一种由左右两个半棱堡、中堤和三角堡組成的工事，它突出在主壕之前，每一边都有成直綫的土堤和壕沟掩护，土堤和壕沟与要塞圍墙上的棱堡正面的相对位置，使得前者能完全处于后者側射火力的掩护下。冠堡由两个这样的角堡組成(中央是一个棱堡，兩側带半棱堡各一)，双冠堡則由三个角堡組成。为使要塞圍墙能瞰制所有这些工事，它們的土堤必須比要塞圍墙的土堤低，至少要低到三角堡的土堤低于要塞圍墙的土堤的那种程度。当然，这些外圍工事都是在特殊情况下，視地形特点而构筑的。

大利式棱堡的侧面还要不适用。比较著名的是帕岡(1645年),他是法国第一个采用和推广斯佩克尔的侧面应与防守綫相垂直的这一原则的人。帕岡的棱堡很大,其正面、侧面和中堤之间长度的比例极为恰当,防守綫的长度从不超过240碼,因此除隐蔽路外整个护城壕都处于棱堡侧面的步枪火力范围内。他的三角堡比意大利式的大,而且在背面有内堡,即中间工事,以便垒墙被占领后仍可继续抵抗。帕岡还在护城壕中构筑一种独立的狭窄的工事掩护棱堡的正面,这种工事叫堡障,荷兰人已经采用过(第一个采用它的可能是德国人狄利希)。帕岡的棱堡的正面有两道土堤,其中第二道作为二重堡,但两道土堤之间的壕沟毫无侧射火力掩护。使法国派成为欧洲第一的是法国的沃邦元帅(1633—1707年)。虽然他在军事方面真正的荣誉是他在攻打要塞方面的两大发明(跳弹射击和平行壕),但是他作为一个要塞建筑家更为出名。我们关于法国派所谈过的那些东西,在很大程度上是沃邦筑城法的特征。在他所构筑的工事中,我们可以看到极其多种多样的形式,只要是棱堡体系中可能有的他都采用了,但是其中没有一种是独创的;而且除棱堡外,他更少考虑采用其他的形式。不过在各组成部分的布局、各种綫条的比例、断面以及根据极其不同的地形条件运用理论等方面都非常巧妙,与前人的创作相比,确已登峰造极,因此可以说,科学的、成体系的筑城是从他开始的。虽然沃邦对自己的筑城法没有写过什么,但法国的工程师们在研究他所修建的大量要塞的基础上,力求总结出他所遵循的理论原则,结果确定了三种方法,叫做沃邦的第一法、第二法和第三法。

图1就是沃邦第一法的最简单的图解,主要部分的规格如下:多角形要塞的外边,即由一座棱堡的顶端到相邻棱堡的顶端之綫,

平均为 300 碼；該边中間的垂直綫 $\alpha\beta$ 为該边的六分之一，从 a'' 和 a' 点起通过 β 点之綫为防守綫 $a''d'$ 和 $a'e''$ ；从 a'' 和 a' 点起在防守綫上量出相当于 $a''a'$ 綫全长七分之二的一段即为棱堡的正面 $a''c''$ 和 $a'b'$ ；从交点 c'' 和 b' 以 $c''d'$ 或 $b'e''$ 为半徑在防守綫之間画出的弧綫即棱堡側面 $b'd'$ 和 $c''e''$ ； $e''d'$ 綫是中堤。护城壕的画法是：从棱堡頂端以 30 碼为半徑画弧綫，再从相邻棱堡的交点引一直綫成这一弧綫的切綫即为外岸。三角堡的画法是：从中堤点 e'' 以 $e''\gamma$ 为半徑（ γ 点在对面的棱堡正面上距交点 11 碼处）画弧綫 $\gamma\delta$ ，使它与垂直綫 $\alpha\beta$ 的延长綫相交，相交之点即为三角堡的頂端，这一弧綫的弦即为三角堡的正面。三角堡正面这条綫从三角堡頂端起画到与形成主壕外岸的切綫相交为止；三角堡背面的位置也以这条外岸綫来确定；这样，从棱堡側面就能毫无障碍地对整个护城壕进行射击。在中堤之前——而且仅在前面——沃邦还保留了荷兰式的前堤（在他以前，意大利人弗洛里安尼就已这样做过），这种新的工事叫做凹角堡（tanaglia）。沃邦的正面是沿着防守綫划的。三角堡前的护城壕寬 24 碼，外岸与三角堡的正面平行，頂端成弧形。沃邦就是用这种方法把他的棱堡构筑得很寬闊，而側面的突角則經常在步枪火力范围以內。但是这种棱堡构造簡單，只要有一个棱堡的正面被打开缺口，就会使整个要塞不能进行防御。沃邦的那种与防守綫形成銳角的棱堡側面，不如斯佩克尔和帕岡的棱堡側面那样完善，但是他取消了棱堡側面上第二层和第三层沒有掩蔽的火炮，在大部分意大利棱堡和較早的法国棱堡的側面上都有这样配置的火炮，然而从来沒有带来什么特別的好处。沃邦构筑凹角堡的目的是为了以步兵火力加强对护城壕的防御，并掩护中堤不受斜堤頂上敌人破城炮的平射。

但是这一点做得非常不彻底，因为靠近侧面 *e* 的那部分中堤还是完全暴露在敌人配置在凹角屯兵场（见图 1 *n*）的破城炮前。这是一个极大的弱点，因为只要在这里打开缺口，就可以迂迴构筑在棱堡内作为第二道防线的全部二重堡。原因是三角堡还是构筑得太小。沃邦的隐蔽路上没有 *crémaillères* [雉堞]，但构筑横墙，这比斯佩克尔的方法要差得多，因为横墙虽能妨碍敌人对隐蔽路的纵射，但也妨碍防守者自己对隐蔽路的纵射。各种工事之间的交通总的来说是好的，但要进行坚决的出击则仍嫌不足。断面的大小与至今仍到处采用的相同。但沃邦仍然坚持将土堤向外的一面全部用石砌起来，所以至少有 15 英尺高的石砌部分暴露在外。在沃邦的许多要塞中都重复了这个错误，而错误既已犯了，要纠正它，只有付出巨大的代价，用加宽棱堡正面前的护城壕，并构筑堡障式的土质工事的方法来掩护石砌部分。沃邦在一生中多半都遵循第一种方法，但在 1680 年以后，他采用了另外两种方法，目的是要在棱堡被打开缺口以后，仍能继续进行长期防御。为此，他采用了卡斯特里奥托的主张，后者曾提出在护城壕中面对塔楼处构筑独立的棱堡，使塔楼与城墙组成的古老筑城体系合乎时代要求。沃邦的第二法和第三法都与此相符合。三角堡也构筑得比较大；石砌部分的掩蔽有所改进；塔楼内构筑穹窿，但不是整个塔楼完全筑满穹窿。使棱堡和凹角堡之间的一段中堤可能被破坏的那个缺点仍然存在，因而独立棱堡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作用。然而，沃邦认为他的第二法和第三法是非常有效的。当他把兰道的筑城计划（根据第二法）呈交路易十四时，曾说道：“陛下，这就是用尽我的本领也无法夺取的要塞”。但是这并没有保证兰道不失守，该城在沃邦生前即被攻陷三次（1702、1703、1704 年），在他死后不久（1713 年）

又被攻陷一次。³⁰⁷

科尔蒙太涅纠正了沃邦的錯誤，他的方法可以說是达到了棱堡体系的頂峰。科尔蒙太涅（1696—1752年）是工程长官。他的較寬闊的棱堡內可以构筑永久性二重堡和第二道防綫；他的三角堡几乎和斯佩克尔的三角堡一样大，完全掩护了沃邦所暴露在外的那一部分中堤。八面以上的多角形要塞的三角堡向前突出得相当远，以致在圍攻者到达斜堤頂后，三角堡可以从后方射击他們为圍攻邻近棱堡所构筑的工事。圍攻者要避免这种射击，就必須在棱堡上打开缺口以前先压制两个三角堡。需要掩护之綫愈近似直綫，这种大三角堡的相互支援就愈有效。凹角屯兵場用內堡来加强；斜堤頂筑成 en crémaillère [锯齿状]，与斯佩克尔的相同，只是仍然保留橫墙；断面結構极好，石砌部分之前都有土质工事掩护。科尔蒙太涅使法国派发展到了頂点，因为所謂法国派就是指护城壕內有外圍工事的棱堡防御体系。如把1600—1750年間棱堡筑城的逐步发展及其表現在科尔蒙太涅筑城体系中的那种最后結果同上述斯佩克尔的原則相比較，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位德国工程师的惊人天才，因为护城壕里的外圍工事数量虽然大大增加了，但在这150年中，从未发现任何一个重要原則是斯佩克尔所沒有清楚而明确地提出过的。

在科尔蒙太涅之后，梅济埃尔工程学校（約在1760年）对他的体系做了某些不大的改动，其中主要的改动又回到斯佩克尔的旧原則，即側面应与防守綫垂直。但梅济埃尔派最杰出的一点是該派的代表最先在隱蔽路前构筑了外圍工事。在防御能力特別薄弱的地段上，他們在斜堤脚附近在棱堡中綫上构筑了叫做眼鏡堡的独立的三角堡，这样一来，就首次向最新的永久性营垒体系接近了

一步。十九世紀初一个在普魯士供职、于 1807 年在但澤附近被打死的法国流亡分子布斯馬尔，曾再一次試图改善科尔蒙太涅的体系，他的主張相当复杂，其中最杰出的一点是他的三角堡很大，一直突出到斜堤脚，以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替上面談到的眼鏡堡并起到这种眼鏡堡的作用。

和沃邦同时代的、并且不只一次地在圍攻战中成为沃邦勁敌的荷兰工程师庫霍尔恩男爵促成了旧的荷兰筑城法的进一步发展。由于干壕和水壕配合得很巧妙，出击极为便利，各独立工事之間的交通很方便，三角堡和棱堡中的內堡和二重堡安排得很巧妙，因而他的筑城体系甚至比科尔蒙太涅体系的防御能力更大。庫霍尔恩是斯佩克尔的热烈崇拜者，他是唯一能老实地承认他的成就有多少应归功于斯佩克尔的杰出的工程师。

我們看到，在有棱堡以前，阿尔勃萊希特·丢勒就已采用側防暗堡来保证加强的側射火力。在他的四角城堡里，护城壕的防御完全依賴这些側防暗堡，城堡的各角沒有塔楼，这是一种只有几个凸角、頂部平整的四角城堡。构筑要塞时使要塞圍墙完全与多边形的边綫相吻合，因而只有凸角而无凹角，护城壕則以側防暗堡掩护，这就是所謂多边形筑城的原則，丢勒應該算是这种筑城法的創始人。另一种，要塞圍墙构成星状，凸角与凹角相互交替，每一条綫既是側面又是正面，可以用靠近凹角的一段从側面掩护下一条綫前面的护城壕，用靠近凸角的一段控制地面，这样的經始就是凹角形筑城的基础。旧意大利派的代表和旧德国派的部分代表曾提出过这种形式，但在許多年以后它才得到了发展。格奥尔格·林普勒尔（在德国皇帝那里服务的工程师，1683 年在抵御土耳其人的維也納防御战³⁰⁸中牺牲）的体系是介于棱堡体系和凹角形体

系之間的一種中間體系。他所稱為中間棱堡的工事，實際上構成一條完整的凹角綫。他堅決反對前面只有簡單的土質胸牆作掩護的暴露炮台，堅持只要有可能，無論在何處都應構築穹窿炮台，特別是在側面上，在這裡如有 2—3 層掩蔽得很好的火炮，則其射擊效果遠比暴露的側面炮台上從來也不能同時射擊的 2—3 層火炮的效果大得多。他還堅持在隱蔽路的屯兵場上構築炮台（或稱內堡），這是庫霍爾恩和科尔蒙太涅曾採用過的；他還特別堅持在要塞圍牆的突角後面構築雙重的和三重的防綫。在這一方面，林普勒爾的筑城體系超過了它自己的時代因而顯得非常出色。他的要塞的整個圍牆是由獨立的堡壘組成的，每一個堡壘都必須單獨地奪取；他利用大型防禦穹窿的方法和德國最近的工事中所採用的方法幾乎連細節也都一樣。毫無疑問，十七至十八世紀的棱堡體系有多少應歸功於斯佩克爾，蒙塔郎貝爾的成就也就有多少應當歸功於林普勒爾。第一個充分證明凹角形筑城體系比棱堡體系優越的是蘭德斯堡（1712 年），不過假如我們去分析他的論據或描述他的筑城工事，那就談得太遠了。在林普勒爾和蘭德斯堡之後的許多熟練的德國工程師中，我們可以提一提地堡式橫牆（即可供步槍作隱蔽射擊的中空橫牆）的發明人梅克倫堡的布根哈根上校（1720 年）和設壘營房（即構築在向前突出的工事的背面能避開曲射火力的一種大型營房）的發明人維爾騰堡的赫伯特少校（1734 年）；設壘營房內面向要塞圍牆的那部分築有帶射孔的穹窿，面向城市的部分築有兵士住的營舍和倉庫。這兩種工事現在都使用得很廣泛。

因此，我們看到，德國派（幾乎只有斯佩克爾是唯一的例外）從產生的時刻起就反對棱堡。他們想主要用凹角堡代替棱堡，同時

还试图构成良好的内部防御体系，主要的途径是采用穹窿暗廊，这正是法国工程界权威人士视为荒谬绝伦的东西。但是法国在某一时期所推崇的最伟大的工程师之一、骑兵少将蒙塔郎贝尔侯爵（1713—1799年）竟公开地打着旗帜投到德国派方面，他使整个法国工程界大为震惊，直到现在，他们仍在指责他所写的每一句话³⁰⁹。蒙塔郎贝尔激烈地批评了棱堡体系的缺点：侧射火力没有效果；使敌人深信他的炮弹即使没有击中原定的一线，也几乎肯定会使另外一线遭到损失；对曲射火力防护不够；中堤在射击方面完全没有用处；在棱堡的背面不可能构筑又好又大的二重堡，这一点已有事实证明，即当时没有一个要塞筑有这一派理论家所提出的各式永久性二重堡；最后，外圈工事很弱，它们之间的联系很差，缺少应有的互相支援。因此，蒙塔郎贝尔宁愿采取凹角形体系或多边形体系。在这两种体系中，要塞的核心部分都是由许多配置一层或两层火炮的穹窿组成的。穹窿的石砌部分周围都有防平射火力的土质保障或外堡面作掩护，再前面是第二道护城壕。这条护城壕由构筑在外堡面凹角处的穹窿从侧面掩护，这些穹窿则由凹角屯兵场内的内堡或眼镜堡的胸墙掩护。整个这种体系依据下列这一原则：在敌人到达斜堤顶或外堡面时，利用配置在穹窿内的火炮的歼灭性火力给敌人造成障碍，使他无法架设破城炮。不顾法国工程师的一致反对，蒙塔郎贝尔肯定穹窿可以完成这一任务，以后，他甚至设计了若干废除一切土质工事的环形筑城体系和凹角形筑城体系，使整个防御依靠配置4—5层火炮的高穹窿炮台，穹窿的石砌部分只靠自己炮台的火力防护。他在自己的环形筑城体系中曾力图用这种方法使距要塞500码以内的任何一点上都能集中348门火炮的火力，并认为这样巨大的火力优势会使敌人完全

不能架設攻城炮。但是，在这方面，只有在构筑岸防炮台向海的正面部分时，才有他的追随者。在炮击塞瓦斯托波尔时期，充分地证明了舰炮是不可能击毀設有穹窿的坚固圍牆的。塞瓦斯托波尔、喀琅施塔得、瑟堡等良好的炮台，朴次茅斯港(英国)入口处的新炮台，以及現代几乎一切保卫港灣抵御舰队的炮台，都是根据蒙塔郎貝尔的原則修建的。林茨(奥地利)的馬克西米利安式塔楼³¹⁰和科倫独立堡垒的内堡有一部分暴露的石砌部分是模仿蒙塔郎貝尔不太成功的方案构筑的。在陡峻的高地筑城(如普魯士的埃倫布萊施坦)有时也采用暴露的石质堡垒，但其抵抗能力如何还須由实际經驗来确定。

凹角形筑城体系从来沒有被实际采用过，至少据我們所知是如此；但是多边形筑城体系在德国很受重視，并被采用于最新的工事中，而法国人却頑固地抓住科尔蒙太涅的棱堡不放。多边形筑城体系的要塞圍牆通常是頂部平整的土牆，有石砌的内岸和外岸，有构筑在水壕中央的大型側防暗堡，有构筑在土牆后面并以土牆作掩护以便起二重堡作用的大型設垒营房。类似的設垒营房也作为二重堡构筑在很多棱堡工事中，用以封閉棱堡的背面，同时土牆可作为堡障来掩护石砌部分，使它避免遭到远射。

在蒙塔郎貝尔所有的主張中，最成功的是独立堡垒体系，这种体系不但在筑城学方面开辟了新紀元，而且在攻击和防守要塞方面、甚至在总的战略方面也开辟了新紀元。蒙塔郎貝尔主張在重要地点的大要塞周圍的制高点上修建一系列或两列小堡垒，这些堡垒外形上是孤立的，但可以用火力互相支援，而且为大規模出击創造有利条件，使敌人无法轰击要塞本身；在必要时，这些堡垒也可构成軍隊用的营垒。沃邦就已采用过在要塞火炮掩护下的永久性

营垒，但营垒的工事由很长的連續不断的防綫組成，只要一点被突破，就全部陷入敌手。而蒙塔郎貝尔的营垒的抵抗能力則大得多，因为每座堡垒都必须单独夺取，敌人在沒有夺得其中至少三四座堡垒以前，就不可能开始对要塞本身进行圍攻作业。而且，对其中每一座堡垒的圍攻，随时都可能被守軍或者甚至被配置在堡垒后面兵营內的軍队所打断，这样，就保证了积极的野战与正規的要塞战相結合，从而必然大大地加强了防御。自从拿破侖对那些按旧法构筑的要塞置之不顾而率軍深入敌国腹地千百英里，以及1814—1815年同盟国軍也把沃邦为法国留下的三层要塞带毫不在意地留在自己背后而直搗巴黎以后，仅在主壕內或者最多也只在斜堤脚构筑外圍工事的筑城体系已經过时，这一点已十分明显了。这样的要塞对于現代的大軍已失去了牵制的力量。它們使敌人遭受損失的能力达不到它們火炮的作用半徑以外。因此，必須找出阻止突入国境的現代軍队迅速前进的某种新方法，于是蒙塔郎貝尔的独立堡垒体系被广泛采用。特别是科倫、科布倫茨、麦茨、拉施塔特、烏尔姆、科尼斯堡、波茲南、林茨、培斯克拉和維罗那被改筑成可容6—10万人的巨大营垒，但在必要时也可用少得多的守軍进行防御。同时，筑垒的地点在战术上是否优越的問題也已退居次要地位，現在是从战略上着眼来决定修建要塞的地点了。构筑工事的只是那些可以直接或間接阻止胜利的軍队繼續前进的地点，以及本身是个大城市，又是整个省的物质資源集中点因而能为軍队提供巨大优越条件的地点。要塞的位置通常选在大河旁边，特别是两条大河的汇合处，因为这样可迫使进攻軍队分散兵力。要塞圍墙尽可能地簡化了，而护城壕的外圍工事几乎全部取消；人們认为有能够抵御短時間攻击的圍墙就足够了。主要戰場在独立

堡垒的周围，而独立堡垒的防御，主要已不是靠本身垒墙上的火力，而是靠要塞守军的出击。巴黎就是按这种方案修建的最大的要塞；它有简单的棱堡式围墙和几乎都是四角形的棱堡式堡垒；在它的全部筑城工事中没有一个外圍工事，甚至没有一个三角堡。毫无疑问，由于有了这种足可供三个被击败的军团作掩蔽所的新的大营垒，法国的防御力量增强了百分之三十。这一改进的结果，使各种筑城法中所包含的那种有价值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意义；花钱最少的方法现在成为最好的方法，因为目前的防御已不再依靠在要塞城墙内等待敌人，直到他开始围攻作业，然后对他炮击的消极方法，而是依靠以守军的集中的兵力对不得不把兵力分开的围攻者采取攻势的积极方法了。

二、围 攻

希腊人和罗马人把围攻法发展到了相当完善的地步，他们曾使用攻城槌击破城墙，在有良好掩盖的接近车的保护下接近城墙，必要时还使用高出城墙和塔楼的设备，使强攻的纵队可以安全地接近城墙。使用火药以后，这些设备就不再使用了，因为从这时起，要塞的土墙修得较低，但可以对很远的距离进行有效射击，于是围攻者便向斜堤构筑锯齿形或曲线形的接近壕，同时在不同地点配置炮队，以便尽可能迫使被围者的火炮停止射击并破坏他们的石质工事。围攻者一到达斜堤顶，立即构筑高大的塹壕式封壕，以便控制棱堡及其封壕，然后以猛烈的火力打开缺口并准备强攻。攻击点通常是中堤。但是，在围攻的这种方法的这种体系上并没有形成过什么体系，直到沃邦才采用了跳弹射击的平行壕，将围攻过程按一种

方法系統化，这一方法甚至现在还采用，而且仍被称为沃邦圍攻法。圍攻者用足够的兵力四面包圍要塞并选好攻击正面以后，夜間即在距离要塞 600 碼处掘第一道平行壕（一切圍攻作业多半在夜間进行）。这道与被圍攻的多角形要塞的边平行的塹壕，至少应圍繞要塞的三个边或面。抛向敌人一方并在塹壕两边用堡籃（装满土的柳条筐）支住的泥土形成抵御要塞火力的胸墙。在这第一道平行壕內配置跳彈炮队，以便沿攻击的正面进行纵射。如果圍攻的对象是棱堡式六角形要塞，跳彈炮队的数目就要足够对两个棱堡和三个三角堡的正面进行纵射，一般來說，每个正面要用一个炮队。这些炮队射击时，要使炮彈直接跳越工事的胸墙，从側方射入棱堡（三角堡）的正面，使炮彈順着正面飞行杀伤人員和击毀火炮。这样的炮队还用来对隱蔽路的个别地段进行纵射，而臼炮队和榴彈炮队則用来射击棱堡和三角堡的内部。所有这些炮队都有土质胸墙掩护。与此同时，在前面，在两个以上的地点，朝要塞方向挖掘鋸齿形接近壕；挖掘接近壕时，尽可能完全避开要塞的纵射火力。一当发现要塞火力有减弱的迹象，就立即开始在距要塞約 350 碼处掘第二道平行壕。在这里配置破坏炮队，以便完全消灭要塞正面上的炮兵和击毀炮眼。有八个正面需要轰击（两个棱堡及其三角堡的正面以及相邻两个三角堡面向这一边的正面），每个正面由一个与該正面平行配置的炮队进行射击，而每一炮眼則正对要塞上相应的炮眼。从第二道平行壕朝要塞方向构筑新的鋸齿形壕，到距要塞 200 碼处构筑半平行壕，形成鋸齿形壕的新支壕，壕內配置臼炮队。最后，在斜堤脚构筑第三道平行壕，壕內配置重臼炮队。这时，要塞的火炮差不多已完全被压制而停止射击，于是开始向斜堤頂构筑各种曲綫或折綫形的接近壕，以防跳彈火力；这

些接近壕应对着两个棱堡和一个三角堡的頂端。然后在凸角屯兵場构筑淺壕或带胸墙的掩体，供步兵用火器纵射护城壕。如果敌人行动积极，敢于大胆出击，那就必須构筑第四道平行壕，将沿斜堤的全部凸角屯兵場連接起来。在相反的情况下，則从第三道平行壕向凹角屯兵場构筑对壕，并在斜堤上挖掘王冠形壕，即在斜堤頂上沿整个隐蔽路挖掘塹壕。然后，在这条 *couronnement*〔王冠形壕〕內配置反炮台炮队，以便迫使从棱堡側面对护城壕纵射的火炮停止射击，在这以后，再以破城炮轰击棱堡和三角堡的頂端和正面。在預定的破城地点的对面，則挖掘从塹壕起經斜堤和外岸直通到护城壕的爆破用的地道；炸毀外岸后，再构筑新的对壕，經护城壕通到缺口下面，对壕受棱堡側面纵射火力威胁的一面則构筑胸墙作掩护。一当造成缺口并修好在护城壕內的通路，就立即发起强攻。以上是通过干壕强攻的情况，如果通过水壕，那就要用束柴构成堤壩，在面对相邻棱堡側面的一方也要构筑胸墙作掩护。如果夺取棱堡后发现后面还有工事——二重堡，那再构筑淺壕，在缺口处配置新的炮队，打开新的缺口，設法下到壕沟，通过壕沟，重新发起强攻。按照沃邦第一法修建的棱堡式六角形要塞，如果没有二重堡，对这样的圍攻平均可抵御 19—22 天，如果有二重堡，則可抵御 27—28 天。按照科尔蒙太涅的方法所构筑的要塞在上述两种情况下則分別可以支持 25 天或 35—37 天。

三、野战筑城

野战筑城工事具有和軍隊同样悠久的历史。在野战筑城法方面，古代軍隊甚至比現代軍隊掌握得还要好得多。羅馬軍团在敌

人附近扎营时，每夜都要在营地构筑工事。我們也看到，在十七至十八世紀野战工事被使用得非常广泛，而在弗里德里希大帝的各次战争中，駐軍警戒的哨兵通常都构筑輕型的凸角堡。不过，甚至在那时——現在更是如此——构筑野战工事也是为了加强那些由于考虑到战时可能发生重大变化而預先选好的陣地。崩采耳維茨附近弗里德里希大帝的营垒，托列斯-維德拉斯附近的威灵頓防綫，魏森堡附近的法国防綫，以及 1848 年維罗那前面的奧軍工事³¹¹，都是这样构筑的。在这种情况下，野战工事可以使兵力較弱的軍隊成功地抵抗优势的敌人，因而能对战局的結果起重大影响。最初，防綫是連綿不断的，例如，在沃邦的永备营垒中就是如此。但是，这种防綫有缺点，只要一处被突破和占領，全綫就无法防守，因此，現代的营垒都由成一綫或多綫配置的独立多面堡組成，多面堡之間可用火力相互从側面掩护，一当多面堡的火力削弱敌人的攻击，守軍立即可通过多面堡之間の間隙地向敌人出击。这就是野战工事的主要使用方法。但是，它們也可以独立使用，例如用作桥头堡来防守桥梁接近地，以及用作重要通路上的障碍来阻止敌人小部队通过等。除去一切形式比較奇特、而且現在已經过时的工事外，野战工事可分为背面敞开的和背面閉合的两种。屬於前一种的有凸角堡(构成頂端向敌的角形的两段垒牆，前面有护堡壕)或眼鏡堡(有短側面的凸角堡)。眼鏡堡的背面也可能用防栅封閉。現在使用的閉合式野战工事主要是四角形多面堡，这是一种等边的或不等边的四角形工事，周圍是护堡壕和胸牆。胸牆的高度与永备工事的胸牆相同(7—8 英尺)，但沒有它厚，因为这种工事只用来抵御野战炮兵的射击。由于这些工事本身都沒有側射火力，它們的位置应保障能用步枪火力互相从側面掩护。为

了使側射火力有效和加强整个防綫,目前最通用的方案是:构筑配置成一綫的、可以互相从側面掩护的四角形多面堡,并在多面堡之間の間隙地前面构筑简单的凸角堡,从而构成营垒。1849年在多瑙河南岸的科莫恩附近构筑过这样的营垒,匈牙利人曾借以抵擋住兵力上占极大优势的敌人达两天之久。³¹²

弗·恩格斯写于1859年5月—6月
9日左右

載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60年版
第7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弗·恩格斯

步兵

步兵——軍隊中徒步的兵士。除了游牧部落以外，一切民族的軍隊，如果不是全部，那末大部分总是由徒步兵士組成的。例如，甚至在最早的亞洲軍隊——亞述、巴比倫和波斯的軍隊中，步兵至少在數量上是軍隊的主要部分。希臘軍隊最初全由步兵組成。關於古代亞洲軍隊步兵的編成、編制和戰術，我們所掌握的一些貧乏的材料已記述在“軍隊”^①一條中。在那里，讀者可以了解到許多細節，這里就沒有必要再重復了。在本條中，我們只敘述這一兵種在它的歷史發展中最重要戰術特點；因此，我們直接從希臘談起。

一、希臘步兵

希臘戰術的創始者是多立斯人³¹³；多立斯人的後裔斯巴達人使古代多立斯人的戰鬥隊形達到完善的地步。最初，組成多立斯社會的各個階級——不僅構成貴族階級的全權公民，而且無全權的珀里俄科³¹⁴，甚至奴隸——都必須服兵役。他們全編在同一个

① 見本卷第5—9頁。——編者注

方陣內，但每一階級在其中都有特定的位置。全權公民都是重裝的，有護身器具：頭盔、甲冑、銅護脛、大木盾（外包皮革，高度足以掩護整個身軀），同時還有長矛和短劍。他們依據人數編成方陣的第一列或前兩列。後面是無全權者和奴隸，所以每一個斯巴達貴族都有僕役跟隨。這些僕役沒有貴重的護身器具，只靠前列對他們的掩護和自己的盾牌；他們的攻擊武器是投石器、梭鏢、刀子、匕首和狼牙棍。因此，多立斯方陣是有縱深的橫隊：前列是 *hoplitae* 即重步兵，後列是 *gymnetae* 即輕步兵。重步兵用長矛向敵人攻擊來打敗敵人；如果陷入敵陣，他們就拔出短劍，進行白刃格鬥，打開一條前進的道路，而原先在前列的後面投石、擲梭鏢以進行攻擊準備的輕步兵，這時則協助重步兵攻擊，肅清受傷的和還在抵抗的敵兵。由此看來，這一兵種的戰術非常簡單，幾乎沒有什麼戰術機動可言；起決定性作用的是兵士特別是重步兵的英勇、堅定、體力、個人的靈活和技巧。

這種把一個民族的各個階級編在同一个方陣內的宗法式組合，在波斯戰爭³¹⁵後不久就消失了，這主要是由於政治原因；結果，方陣從此就只由重步兵編成，而輕步兵，不論是繼續存在的或者改建為新式輕步兵的，都是成散開隊形單獨作戰。在斯巴達，斯巴達公民和珀里俄科在一起編成重裝方陣，赫羅泰³¹⁶則運送輜重或者作為盾牌手(*hypaspistae*)跟在後面。這種方陣有一個時期曾符合戰鬥的一切要求；但不久，即在伯羅奔尼撒戰爭³¹⁷時期，由於雅典人有了先驅兵，斯巴達人也建立了這種兵。但是他們沒有編成單獨的輕步兵部隊，而是選拔較年輕的兵士去執行先驅兵的職務。當這次戰爭快要結束的時候，全權公民、甚至珀里俄科的人數都大大減少了，斯巴達人就不得不用重裝的奴隸編成方陣，由公民指

揮。雅典人取消了方陣內由貧窮公民、僕役和奴隸中征集來的輕步兵之後，另建立了由輕步兵或普色爾〔psiles〕組成的專門的輕步兵部隊；這種部隊擔當先驅兵的任务；他們都是用遠戰武器裝備起來的，分為投石手（sphendonetae）、弓箭手（toxotae）和梭鏢手（akon-tistae）。後者又叫做培爾塔斯特〔peltastae〕，因為只有他們持有小盾（pelta）。這種起初由雅典貧窮公民中征集來的新式輕步兵，很快就幾乎全部改由僱傭兵和雅典同盟者的部隊編成。自從使用了這種先驅兵以後，笨拙的多立斯方陣就顯得更不適合於單獨作戰了。同時，用來編成這種方陣的人員的質量也愈來愈壞，這在斯巴達是由於尚武的貴族逐漸沒落，在其他城邦是由於在商業和財富的影響下人們逐漸失去了過去那種不怕死的精神。因此，由不太勇敢的人組成的方陣就基本上喪失了它的作用。它成了殿後軍，成了戰鬥隊形中的預備隊，而在它的前面則有先驅兵作戰；先驅兵在受到敵人進逼時退到它的後面，但不論何時都很难指望方陣本身與敵人進行白刃格鬥。只要方陣是由僱傭兵組成的，那末它也就好不了多少。它由於本身笨拙不靈而不適合於機動，甚至在稍有起伏的地形上也是如此，因而只能用來進行消極抵抗。這就使僱傭兵的首領伊菲克拉特進行了兩種改革的嘗試。這位希臘的僱傭兵隊長廢除了重步兵原有的較短的矛（長 8—10 英尺），而改用長得多的矛，使得在密集隊形中，第三列和第四列可以用矛刺到前面，殺傷敵人。這樣，方陣的防禦力量就大大地加強了。另一方面，為了建立一種能以短促而猛烈的攻擊決定會戰結局的力量，他又以輕便的護身器具和利劍裝備了培爾塔斯特，並對他們進行方陣隊形變換的訓練。他們在接到攻擊命令後，即以重步兵的方陣所不能達到的速度前進，在距敵人 10 或 20 碼的地方齊向敵人投擲梭鏢，

持劍冲入敌陣。这样，简单的古代多立斯方陣就让位給复杂得多的战斗队形了，統帅的活动成了胜利的重要条件，战术机动也就成为可能了。埃帕米农达斯第一个創立了直到今天仍然解决几乎一切决战的偉大的战术原則：不要沿正面平分兵力，而把兵力集中在决定性地段进行主攻。在他以前，希腊人作战时排成与敌人平行的战斗队形；第一綫的兵力平均分配在整个正面上；如果一方軍隊在数量上超过敌方軍隊，那它或者构成纵深較大的战斗队形，或者包圍敌軍的两翼。与此相反，埃帕米农达斯則指定一翼攻击，另一翼防御。攻击的一翼由他的精銳部队組成，其中有排成长纵队的重步兵的主力，其后是輕步兵和騎兵。另外一翼当然就薄弱得多，并且配置在后面，而攻击的一翼則应突破敌人的队形，然后纵队即展开或向左（右）轉弯变成橫队，在輕步兵和騎兵的配合下击潰敌人。

在馬其頓統治古希腊人并率領他們远征波斯的时期，伊菲克拉特和埃帕米农达斯所实行的改革，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重步兵的长矛換成了更长的馬其頓长矛。伊菲克拉特的培尔塔斯特重新以完善的形式出現了，这就是馬其頓王亚历山大的盾牌手。最后，埃帕米农达斯在战斗队形中采用的軍隊組織形式，又由亚历山大发展为各兵种联合的形式；这种联合，只有少量騎兵的希腊是从来没有能够做到的。亚历山大的步兵由重步兵的方陣、輕步兵和盾牌手組成。重步兵是战斗队形中的防御力量；輕步兵成散开队形在整个正面上与敌人接战，还用来扩大战果；亚历山大的卫士也是盾牌手，盾牌手虽然是輕装，但仍然能在方陣队形中作有規則的运动，因而是一种在一定程度上既能成密集队形，又能成散开队形行动的步兵。但不論是希腊还是馬其頓，都沒有建立足以同坚固

的方陣對抗的靈便的步兵。為此亞歷山大使用了騎兵。攻擊的一翼是馬其頓貴族組成的重騎兵的主力；盾牌手協同重騎兵作戰，他們在攻擊的騎兵之後跟進，衝入騎兵打開的缺口，鞏固既得的勝利，並在敵人的陣地上鞏固下來。亞歷山大在征服波斯帝國的中部以後，把他的重步兵主要用來擔任所征服的城市的警備勤務。他們很快就從軍隊中完全消失了。這支軍隊經過英勇神速的遠征後，征服了一直到印度河和亞克薩爾特河流域的亞洲部落。這支軍隊主要由騎兵、盾牌手和輕步兵組成；方陣無法參加這種遠征，同時由於所要征服的敵人的特點不同，也就成為多餘的了。在亞歷山大的繼承者的統治時期，他的步兵也同他的騎兵以及他的戰術一樣，很快就完全衰落了。戰鬥隊形的兩翼已完全由騎兵構成，中央是步兵，但步兵的力量很不可靠，以致用戰象來掩護。在亞洲，占優勢的亞洲因素很快就完全獲得統治地位，這使得塞琉古王朝的軍隊幾乎毫無作用。在歐洲，馬其頓和希臘的步兵又獲得了一定的穩定性，方陣戰術也隨之恢復了原先的絕對優勢的地位。輕步兵和騎兵過去所起的作用一直到最後羅馬軍團廢除整個這一套戰法時為止就沒有恢復過，雖然有人也曾花了許多心血，想了許多辦法試圖使方陣具有靈活性，但是沒有成功，方陣就其本質來說，是永遠不能做到這一點的。

方陣的戰術編成和機動是很簡單的。正面為 16 人和縱深通常也為 16 人的隊形（在亞歷山大時代），構成了一個完整的正方形，叫做辛塔格馬〔Syntagma〕，它是隊形變換的單位；16 個辛塔格馬，即 256 行組成一個有 4 096 人的小方陣；4 個小方陣又組成一個完整的方陣。小方陣在戰鬥隊形中的縱深為 16 列；它以辛塔格馬為單位向右轉、或向左轉、或左（右）轉彎變成行軍隊形，不論用

哪一种轉法，都可排成正面为 16 人的密集纵队。当方陣排成横队时，可以将报双数的行插到报单数的行的后面，使每行人数增加一倍来加大纵深，縮小正面；成相反的队形变换时，則每列人数加倍，队形的纵深由 16 人减为 8 人。当敌人突然出现在方陣的后方时，即采用各行反轉行进；这种队形变换后的正面（即每一行不是在原方陣或原辛塔格馬的原位置上），有时可用每个辛塔格馬的各列反轉行进来恢复。如果再加上长矛的使用方法，那我們就把古代重步兵軍事訓練的全部課題都讲完了。当然，輕装部队虽不用来成密集队形作战，但仍然进行方陣队形变换的訓練。

二、羅馬步兵

拉丁語 legio 一詞，最初是被挑选出来服兵役的人的总称，所以是軍隊的同义詞。后来，当羅馬的版图扩大和共和国的敌人的力量增强需要有更多軍隊的时候，軍隊就分成若干个軍团，每个軍团的人数都相当于原来的羅馬軍隊。直到馬利烏斯时代，每个軍团都由步兵和騎兵組成，而騎兵的人数約等于步兵的十分之一。最初，羅馬軍团內步兵的組織看来同古代多立斯方陣是相似的；它編成有纵深的横队作战，披戴重盔甲的貴族和富裕公民編成前数列，貧穷的輕装平民則在他們的后面。但大約到薩姆尼特战争³¹⁸时期，軍团的組織开始有了变化，并且很快变得与希腊方陣完全相反。这种組織在布匿战争时期获得了充分的发展，关于这一点波利比烏斯曾作过詳尽的叙述³¹⁹。每次战争通常都征集 4 个軍团。从这时起，每个軍团都包括四种步兵：輕装兵、长矛兵、主力兵和后备兵。輕装兵是由新兵組成的輕步兵；后备兵是由老兵組成的預

备队；其他两种步兵組成軍队的其余部分，他們是主要的战斗力量，即基干步兵；主力兵是从在作战經驗上仅次于后备兵的人員中挑选出来的，这一点正是他們与长矛兵不同之处。輕装兵戴皮帽，执輕便的圓盾作为护身器具，佩短劍，并备有数支輕梭鏢；其他三种步兵都戴銅盔，着外包薄銅片的皮甲和銅护脛。长矛兵和主力兵除短劍外，每人还有两支 pilum 即投枪：一支輕的，一支很重。重投枪是羅馬步兵所特有的攻击武器。它用硬木制成，装有长铁尖，其重量至少有 10 磅，連同铁尖长约 7 英尺。它只能抛擲很近的距离，大約 8—12 碼，但是它由于分量重，对于当时的輕护身器具来說是很可怕的武器。后备兵除短劍外，还装备有长矛，以代替投枪。每个軍团的組成如下：长矛兵 1 200 人，分編为 10 个中队或連，每个中队为 120 人；主力兵的人数和分編方法同上；后备兵 600 人，分編为 10 个中队，每个中队 60 人；輕装兵 1 200 人，只要不作別用，就分編在上述 30 个中队中，每个中队 40 人，編成后几列。长矛兵构成第一綫，并且每个中队都展开成橫队，其纵深大概为 6 列，各中队之間的間隙与中队正面的寬度相等。因为每列中各人的間隔为 6 英尺，所以一个中队正面的寬度約为 120 英尺，整个軍团的正面寬度則达 2 400 英尺。在长矛兵的后面，第二綫配置有主力兵的 10 个中队，掩护第一綫各中队之間的間隙；主力兵的后面为后备兵；各綫之間都保持适当的距离。輕装兵在正面前和两翼成散开队形作战。如把每行人数增加一倍，战斗队形的正面寬度就可比原来的减少一半，即减少到 1 200 英尺。整个这一战斗队形是用来进行攻击的。

羅馬軍团因其战术单位小，运动性大，几乎在任何地形上都能作战，所以是希腊方陣所望尘莫及的；而希腊方陣则需要平坦的地

形,由于它本身动轉不灵,很快就变成了仅适于防御的队形。当軍团进攻时,长矛兵在距敌人 8 或 12 碼的地方趁希腊方陣的长矛还不能刺到他們以前(他們大概是在这个时候把两列变成一列)向方陣抛擲重投枪,以此打乱方陣的密集队形,然后持劍猛扑方陣。如果个别中队的队形乱了,其結果也不会影响友邻中队;如果会战繼續下去,不能很快結束,主力兵就进到間隙地上,投擲投枪,持劍冲向敌人,使长矛兵有可能摆脱困境,退到后备兵后面进行整頓。只有在绝对需要的情况下,后备兵才进攻,以便最后获得胜利,或保证有秩序地退却。輕装兵与騎兵共同担負警戒勤务,在会战之初与敌人接战,像先驅兵那样行动,并进行追击。长矛兵和主力兵的輕投枪大概主要用在防御中,当敌人还没有逼近到可以使用重投枪的距离时,用它来打乱进攻的敌人的队伍。軍团的向敌行軍可以从任何一翼开始;长矛兵的第一个中队走在前面,其后为主力兵和后备兵的第一个中队;随后,前三者的第二个中队也按同样順序前进,其余依此类推;側敌行軍由 3 个纵队来完成,每种步兵各組成 1 个纵队;輜重位于距敌人最远的地方。如果敌人从后备兵行进的一边出現,軍队就停止前进并将正面轉向敌人;主力兵和长矛兵則通过后备兵各中队之間の間隙占据自己的位置。

第二次布匿战争后,由于罗馬人連年战争和版图的不断扩大,再加上罗馬和整个意大利的一些重要社会变动,普遍兵役制几乎完全没有实现,这时罗馬軍队开始逐渐由来自貧苦階級的志願兵組成,从而形成职业兵的軍队,代替了从前由全体公民組成的民軍。这样一来,軍队的性质就完全改变了,而且因为軍队的补充人員愈来愈坏,建立新的組織就成为日益迫切需要的了。这种新組織的創立人是馬利烏斯。罗馬騎兵不再存在了。保存下来的少量

騎兵由蠻族僱傭兵或同盟者的部隊組成。步兵分為四種的制度廢除了。輕裝兵被同盟者或蠻族的部隊所代替，軍團的其餘部分則由同一類型的基干步兵組成，其裝備與長矛兵或主力兵相同，但是沒有輕投槍。作為戰術單位的中隊為大隊所代替，平均每個大隊為 360 人，最初由 3 個中隊合編成；這樣，當時每個軍團分為 10 個大隊，通常配置成三綫（第一綫 4 個大隊、第二、三綫各 3 個大隊）。大隊排成縱深為 10 列的隊形，每行所占寬度為 3—4 英尺，這樣，軍團正面的總寬度便大大地縮小了（約為 1 000 英尺）。因此，不僅戰術隊形的變換簡化了，而且軍團指揮官的影響也更加直接而有力。每個兵士的武器和裝具都減輕了，但另一方面，每個兵士必須用馬利烏斯發明的叉形木架 (muli Mariani^①) 攜帶自己的大部分行李；這樣，軍隊的 *impedimenta* [輜重] 就大為減少。另一方面，把 3 個中隊合編為 1 個大隊不能不縮小軍隊在起伏地上機動的自由；輕投槍的取消降低了軍團的防禦能力，由於輕裝兵的作用不是經常能完全由外籍的輔助部隊即僱傭兵或安帖錫格納尼（這是凱撒從軍團中派出擔任輕步兵勤務的兵士，但是他們沒有遠戰武器）所能代替的，所以廢除輕裝兵後，軍隊就更難連續作戰，同時也更難避開決定性的格鬥了。適用於這種軍團的唯一作戰形式就是迅速堅決的攻擊。但羅馬步兵仍然由羅馬人組成，至少是由意大利人組成，雖然在凱撒後繼者時代帝國已趨衰落，但在羅馬步兵的民族性質沒有失去以前，它始終保持了自己的悠久的榮譽。可是一旦羅馬籍不再是加入軍團的必備條件，軍隊很快就喪失了穩定性。到圖拉真時代，來自羅馬各行省和沒有被征服國家的蠻族，已成了

① 直譯是：“馬利烏斯之騾”。——編者注

各軍团的主力，从此以后羅馬步兵的特点便消失了。沉重的盔甲已被廢棄，长矛代替了投枪；分編为大队的軍团又变成了笨拙的方陣。这一时期步兵的特点是普遍力求避免与敌人进行白刃格斗，所以弓和梭鏢当时不仅在成散开队形作战时使用，而且在基于步兵成密集队形时也使用了。

三、中世紀的步兵

羅馬步兵衰落了，拜占庭步兵也随着衰落了。强迫征兵这种制度仍然保留着，不过它除了能在軍隊中建立最不适用的部队以外，別无他用。由蛮族和雇佣兵組成的輔助部队，是軍隊中最好的部队，但是就連他們的质量也不高。軍隊中的等級管理制度日益完备，达到了几乎是十足的官僚制度的地步，結果和我們目前在俄国所看到的一样：在花費大量金錢而且部分仅是名义上存在的軍隊中，有了营私舞弊和盜窃国家資財的完善的組織。与东方非正規騎兵作战，使得步兵的作用愈来愈小，同时也使步兵的质量愈来愈坏。馬弓手成了慣用的一种兵；如果不是全部，至少大部分步兵除了矛和劍以外都还装备了弓箭。这样，远战就成了平常的事，而白刃格斗則被认为是某种过了时的东西。当时人們都把步兵看做廢物，故意让它远离戰場，主要用于警备勤务。維利薩里所进行的大多数会战中，只有騎兵单一作战，而当步兵也参加会战时，它总是一触即潰。維利薩里的战术完全依据下述原則：避免白刃格斗，用圍困法战胜敌人。如果說他在同根本沒有投擲武器的哥特人作战时，由于選擇了哥特人的方陣不能行动的起伏地做戰場而成功地运用了这个原則，那末他在同步兵的战法与古羅馬步兵的战法

有某些共同点的法兰克人作战时，以及在同騎兵无疑胜过他的騎兵的波斯人作战时，却遭到了失敗。

征服羅馬帝国的日耳曼軍隊，最初主要由步兵組成，而且成独特的多立斯方陣作战；首領和較富有的人在前列，其余的人在他們后面。他們的武器是劍和矛。但是，法兰克人有短柄的双刃斧，在持劍冲鋒以前像羅馬人擲投枪一样把双刃斧擲入敌陣。他們和薩克森人在一个时期內保持有值得欽佩的优良的步兵，但征服各地的条頓人自己逐漸地轉服騎兵勤务，而步兵則由被征服的羅馬各行省的居民担任。这样一来，在步兵中服役就被鄙視为奴隶和农奴的事，因此，步兵的质量也必然相应地降低了。到十世紀末，騎兵成了在欧洲各地真正决定会战結局的唯一兵种；而步兵，虽然人数在各国軍隊中都比騎兵多得多，但只不过是装备低劣、几乎誰也不想好好地加以組織的一群烏合之众而已。步兵甚至不算作兵了。miles〔兵〕这个詞成了騎兵的同义詞。唯一能够保持大批步兵的地方就是城市，特別是在意大利和弗兰德。城市有自己的民軍，他們自然都是步兵；但由于近郊的貴族无止境的紛爭，民軍保卫城市成为經常性的任务，所以不久又认为用雇佣兵組成的軍隊来代替由市民組成的民軍是比較合适的；然而，为了应付紧急情况，民軍仍然保存了下来。但就是这样，我們也看不出城市步兵比貴族招募来的、在作战时总是留下看守輜重的烏合之众的步兵有什么显著的优越性。至少，在騎士的极盛时期是如此。在这个时期的騎兵中，每个騎士 cap-à-pied〔从头到脚〕全身披戴着甲冑，騎着同样裹以甲冑的战馬。他們的后面都跟随有装备輕得多的侍从兵和其他許多沒有甲冑但装备了弓箭的騎手。在战斗队形中，这些兵是按照类似古代多立斯方陣的編队原則部署的：重装騎士在

第一列，侍从兵在第二列，馬弓手殿后。馬弓手由于武器的关系，不久即成徒步队形作战，而且这逐渐成为一种常规了，因此，他們的战馬就主要用于行軍，而不是用于攻击。装备大弓的英国弓箭手（而在南欧則使用弩），运用这种成徒步队形作战的方法成績特別显著，很可能正是由于这种原因，成徒步队形作战的方法很快在馬弓手中广泛流行。毫无疑问，在法国的长期作战中，重装騎士的馬匹很快就疲憊不堪，而只适于作为运输工具使用。在这种可悲的情况下，配备劣馬的 gendarmes [铁甲騎士] 不得不下馬，組成以最好的一部分步兵（特别是威尔士人）来补充的长矛手方陣，这是十分自然的；同时，备有仍适于攻击的馬匹的騎士，现在就組成有真正战斗力的騎兵。这种队形对于防御战极为适合；黑亲王^①的各次会战都采用了这种队形，并且像大家所知道的，都获得了全胜。新的作战方法很快就被法国人和其他民族采用了，在十四和十五世紀可以认为是几乎通用的战法。这样，經過了一千七百年，我們差不多又回到了亚历山大的战术时代，所不同的仅仅是，亚历山大的騎兵是当时新兴的兵种，是用以加强日趋衰退的重步兵的战斗力的，而这时，由下馬的騎兵組成的重步兵則生动地证明，騎兵正在衰退，步兵又在兴起。

四、步兵的复兴

在佛来米人的城市（当时世界主要的工业区），以及在瑞士的山区，初次出現了在步兵衰退数百年后重新堪称为步兵的軍隊。

^① 威尔士亲王爱德华。——編者注

法国騎士已抵抗不了比利时各城市的織布匠、織呢匠、首飾匠和皮匠，而勃艮第和奧地利的貴族也抵不住瑞士的农民和牧民。在这里起主要作用的是良好的防禦障地和輕武器，此外，佛来米人还有許多火器，而瑞士人則利用当时重装騎士几乎不能到达的地形作战。瑞士人主要装备有既便于刺击又便于砍杀、而且用来白刃格斗也不会觉得太长的短戟；后来他們也有了长矛、弩和火器。而在这以前的一次最有名的会战，即劳平会战(1339年)³²⁰中，他們除了石头以外沒有任何其他远战武器。他們很快就由險峻山地的小防禦战轉入平原进攻战，同时采用了比較正規的战术。他們成纵深的方陣作战；护身器具是輕便的，通常只是前列和兩側的兵士才有，沒有甲冑的兵士則配置在中央。然而，瑞士方陣始終由三个彼此不同的部分組成：前卫、主力和后卫，这就保证方陣具有更大的运动性和編成各种战术队形的可能性。瑞士人很快就成了利用地褶的能手，再加上火器的改进，因而他們能够抵擋騎兵的襲击；在对付装备有长矛的步兵方面，他們想出了各种各样的攻入长矛林立的敌陣的方法，在攻入敌陣后，沉重的短戟就給他們造成巨大的优势，甚至在同披戴铁甲的兵士格斗时也是如此。他們很快就学会了用方队或十字队形，特別是在火炮和輕火器的支援下，击退騎兵的攻击。因此，当步兵剛剛又能做到这一点的时候，騎士的末日就快到了。

約在十五世紀中叶，各城市反对封建貴族的斗争，到处都得到了当时較大的、統一的君主国国王的响应。結果，各君主国建立了雇佣軍隊，一方面是为了鎮压这些貴族，同时也是为了实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除了瑞士人以外，德国人，紧接着欧洲大多数国家都开始豢养大批的雇佣兵。这些雇佣兵是用自願报名的方法招募

来的，他們不管是哪个民族，只要誰給的报酬最多，就給誰效劳。这些部队，在队形編成方面采用了与瑞士人相同的战术原則；他們主要装备长矛，并以营为单位編成纵深同正面人数相等的大方队作战。但是他們的作战条件与防守山地的瑞士人不同；他們不仅要扼守防御陣地，而且要进攻，不仅要在丘陵地上，而且要在意大利和法国的平原上作战。不久，他們又面临着当时輕火器迅速改进的事实。这些情况引起了旧的瑞士战术的某些改变，改变的情况在各个民族中各不相同，但这一战术的基本特点在各民族中仍是相同的，即队形編为三个长纵队，其名称已經固定为前卫、主力、后卫或預备队，虽然实际上并不經常如此。瑞士人的优势一直保持到帕維亞会战。就在这以前的一个时期，德国雇佣兵如果不是完全同瑞士軍隊相等，那也是差不多同它相等了，而在会战以后，德国雇佣兵就被认为是欧洲的头等步兵。法国人因为他們的步兵一直不中用，在这时期曾极頑强地试图組織一支有战斗力的本民族的步兵，然而他們只是以皮卡尔第和加斯科尼两省的本地人組成了一支步兵。这一时期的意大利步兵根本不值一提。而西班牙人，由于岡薩洛·德·科尔多巴在对格拉納达的摩尔人的战争³²¹中最先采用了瑞士的战术和瑞士的武器，他們很快就获得了非常高的声誉，从十六世紀中叶起就被认为是欧洲最好的步兵。当时，意大利人以及步其后尘的法国人和德国人，都把矛的长度由10英尺增加到18英尺，而西班牙人却仍保存着比較方便的短矛，他們由于灵巧，在同持短劍和匕首的对手进行白刃战时，就成了可怕的敌人。西班牙人在西欧，至少在法国、意大利和尼德兰，直到十七世紀末都保持了这种声誉。

瑞士人根据以往的傳統而輕視护身器具，但十六世紀的长矛

手却不贊同这种态度。一当各国军队步兵的战斗素质日漸接近而形成了一种欧洲式的步兵，那种只将少数披戴胸甲和头盔的兵士配置在方陣四周的做法就不够合适了。如果說以前瑞士人认为这种方陣是牢不可破的，那末自从遇到了另一种足以与它相抗衡的方陣后，它就不再是牢不可破的了。在这种情况下，一套护身器具就具有一定的意义。只要它不太妨碍军队的运动性，它就能使军队具有决定性的优势。此外，西班牙人从来不对胸甲抱这种輕視态度，而且重視它們。这样，胸甲、头盔、护臂、护脛和护手又成为每个长矛手的一部分常备装具了。此外，还增加了一种劍，德国人的較短，瑞士人的較长；而有时还有匕首。

五、十六和十七世紀的步兵

在这以前不久，欧洲大陆，除土耳其以外，已經看不到大弓；在十六世紀的前 25 年，法国的加斯科尼人最后一次使用弩。弩到处都被明火枪代替了。这种本身完善程度不等、或确切些說粗糙程度不等的火枪，从此便成了步兵的第二类武器。十七世紀的明火枪是一种构造簡陋的粗笨的武器，口径太大，因而除了射程小以外，不能保证射击最起碼的精度和对长矛手胸甲的穿透力。約在 1530 年左右盛行的一种火器是重火枪，这种枪射击时要擱在叉形脚架上，因为沒有这种支架，射手就不能瞄准。火枪手佩戴有短劍，但沒有护身器具，他們或成散开队形与敌人互射，或成特殊的疏开的队形扼守防御陣地，或在这种陣地上为长矛手作攻击准备。不久，火枪手的人数按比例來說比长矛手增加了很多；在弗朗斯瓦一世在意大利进行的各次会战中，火枪手的人数还比长矛手少得

多,但 30 年以后,就至少是相等了。由于火枪手人数的增加,就必须发明某种战术,以便将火枪手正规地配置在总的战斗队形中。这一点在被称为匈牙利战斗队形 [Hungarian ordinance] 的一套战术中已经做到了,这种队形是帝国的军队在匈牙利与土耳其人作战期间创立的。火枪手在白刃战中不能自卫,所以经常配置在能够退到长矛手后面隐蔽的地方。于是,他们有时配置在两翼,有时配置在四角上;最常见的是在长矛手的方队或纵队的四周,围以一系列火枪手,同时,火枪手受到后列的长矛手的保护。最后,把火枪手配置在长矛手两翼的原则被广泛采用,荷兰人在独立战争时所实行的一套新战术就采用了这一原则。这套战术的特点,就是每一支军队按照瑞士战术或匈牙利战术所分成的三个大方阵再作进一步的划分。每个大方阵列成三线,中间的一线又分为左翼和右翼,两翼之间的间隙至少等于第一线的正面宽度。全军分编为若干个半团,我们把这种半团称为营;每个营的长矛手配置在中央,火枪手配置在两翼。前卫的兵力为 3 个团,通常队形如下: 2 个半团为第一线,构成绵亘的正面;每翼之后又各有 1 个半团;再后面就是其余 2 个半团,同样构成绵亘的正面,与第一线平行。主力和后卫或配置在前卫的翼侧,或配置在前卫之后,但队形通常同上。这里在一定程度上又回到了原先的罗马队形,即分成三线和几个不大的独立单位。

帝国的人以及西班牙人认为,必须把他们庞大的军队分成更多的部分,而不是分成上述三个部分。但是,他们的营,即战术单位,比荷兰人的大得多,作战时不是成横队,而是成纵队或方队,并且战斗队形也没有固定的形式,一直到荷兰独立战争时西班牙人才把他们的军队编成一种大家叫做西班牙旅的战斗队形。4 个这

样的大营(每一个常常由若干个团組成)編成1个方队,四周各有一列或两列火枪手,并且每个角上都有側防火枪手队;这4个营之間保持一定的間隙,配置在正方形的四个角上,而且其中的一角朝向敌方。如果軍队合編为1个旅过于龐大,則可分編为2个旅,这样就构成三綫。第一綫2个营,第二綫4个营(有时只有3个营),第三綫2个营。我們可以看出,如同荷兰的战法一样,这里也在企图恢复过去羅馬的三綫制。

在十六世紀发生了另一个重大的变化:重装騎士队被解散了,雇佣騎兵起而代之。雇佣騎兵像我們現代的胸甲騎兵一样,装备有胸甲、头盔、双刃刀和手枪。这种騎兵比从前的騎兵行动迅速得多,因此对步兵的威胁也就更大;但是当时的长矛手却始終不怕它。由于这一变化,騎兵便統一成为一个兵种,并且在軍队中占相当大的比例,特別是在我們現在所要考察的三十年战争时期。在这时期,雇佣兵制度盛行于欧洲;依靠战争和为了战争而生活的人形成了一个阶层;虽然战术可能因此发展了,但是,人員——組成軍队并决定軍队的 morale [精神状态] 的材料——的质量却当然因此而受到了損害。在中欧充滿了形形色色的雇佣兵队长,他們以宗教和政治糾紛为借口,掠夺和蹂躪整批国家。兵士的品质愈来愈坏,一直到法国革命最后廢除雇佣兵制度时为止。帝国的人作战时采用西班牙旅的战法,一綫配置4个或4个以上的旅,并用同样的方法构成三綫。瑞典人在古斯塔夫-阿道夫时代編成瑞典旅,每个旅由3个营組成,1个营在前,2个营稍后。每个营展开成一綫,中央是长矛手,两翼是火枪手。这两种步兵(他們的人数相等)配置时构成綿亘的陣綫,彼此都能进行掩护。假定命令火枪手构成綿亘的陣綫,这时中央营即前列营的两翼火枪手便站到长

矛手的前面进行掩护，而其他两营的火枪手则各前进到相应的翼侧，与前一个营的火枪手取齐构成一綫。如果预料到有騎兵攻击，那末所有的火枪手都应退避到长矛手的后面，而两翼的长矛手则向前移动，与中央的长矛手取齐成一綫，这样，长矛手就构成綿亘的陣綫。战斗队形是以配置在軍隊中央的各旅編成的两綫构成的，而大量的騎兵则配置在两翼，中間夹杂有小队火枪手。这套瑞典战法的特点是：长矛手，在十六世紀曾是一种具有巨大进攻力量的兵，現在已失去了任何攻击的能力。他們成了單純的防御工具，其任务是掩护火枪手免遭騎兵的攻击；而騎兵不得不重新肩負起攻击的全部重担。这样一来，步兵就失去了原来的地位，而騎兵则恢复了自己的地位。以后，古斯达夫-阿道夫在实战中取消了当时騎兵所慣用的一种战斗方法——射击；他命令騎兵始終要手持双刃刀全速冲锋；从这时起，直到恢复在起伏地上作战时止，凡采用这种战术的騎兵，都可以因为在与步兵較量中取得巨大的胜利而自夸。这种情况，对于十七和十八世紀的雇佣步兵來說，是最严酷不过的判决了，然而从执行各种战斗任务这方面来看，它仍然是历代最有訓練的步兵。

对欧洲軍隊的战术來說，三十年战争总的結果是，無論是瑞典旅或西班牙旅都不存在了，軍隊这时开始配置为两綫，騎兵构成两翼，步兵在中央，炮兵配置在这两个兵种的正面前，或两者之間の間隙上。有时还留有由騎兵編成的或由騎兵和步兵混合編成的預备队。步兵展开成纵深为 6 列的橫队；火枪已經便得多，不用叉形脚架便可进行射击；各国都采用带彈壳的子彈和子彈盒。火枪手和长矛手合編在同一个步兵营內，这就产生了最复杂的战术队形变换；而合編的理由是必須建立所謂防騎兵的步兵营或者就像我

們所說的方隊。即使在編成簡單的方隊時，要將中央的 6 列長矛手拉開，以便從四面保護那些不能抵抗騎兵的火槍手，這也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而要用這種方法把一個營編成十字隊形、八角隊形或其他一些奇特的隊形，那又是多么困難！所以，這一時期的軍事訓練方法比任何時候都複雜，除終身服役的兵士外，無論誰都毫無希望做到哪怕是大大上掌握它。同時，很明顯，在敵人的視界內編成能夠擊退騎兵攻擊的戰鬥隊形的一切嘗試，都完全是枉費心機的。任何有戰鬥力的騎兵，不等這些營的隊形變換完成四分之一的時候，就早已衝到這種營的中央了。

在十七世紀下半葉，長矛手的人數比火槍手大大減少了，因為從長矛手喪失全部進攻力量時起，火槍手就成了步兵的真正的攻擊力量。此外，人們發現當時最厲害的騎兵——土耳其騎兵——經常突破長矛手的方隊，但是他們的攻擊也經常被排成一綫的火槍手以準確的射擊所擊退。因此，帝國的人便在自己的匈牙利部隊中完全廢除了長矛，而有時用 *chevaux de frise*〔拒馬〕來代替它，這種拒馬是到戰場上才裝配起來的，並且拒馬上的尖刃由火槍手攜帶，作為他們常備裝具的一部分。在其他國家中也有同樣的情況，軍隊作戰時根本沒有長矛手，火槍手在受到騎兵攻擊的威脅時，憑借自己的火力和騎兵的支援來抵抗。但是徹底廢除長矛，還是有賴於如下兩種發明：大約在 1640 年法國發明的、並於 1699 年改進為直到現在還在使用的一種方便的武器——刺刀，以及大約在 1650 年發明的燧發機。刺刀當然不能完全代替長矛，但它還是使火槍手有了一定程度的自衛能力，而在这以前，人們認為火槍手通常是靠長矛手來保護的；燧發機簡化了裝彈過程，這樣就不僅能用快射彌補刺刀的不足，而且能以此取得大得多的戰果。

六、十八世紀的步兵

随着步兵装备中长矛的廢除，各种护身器具也就取消了。从此以后，这一兵种就只由装备有带刺刀的燧发枪的兵士組成。这种变革是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头几年，也就是十八世紀的头几年完成的。这时，我們到处都可以看到大量的常备軍，这种常备軍是尽可能用自願报名的方法——这經常与欺騙和强制的手段相結合——招募来的，而在必要时則采用强迫征兵的办法。这些軍隊到这时才固定地分为 500—700 人的营作为战术单位；营为了特定的目的又分为連；几个营組成一个团。这样，步兵組織就有了較固定的形式。用燧发枪射击时所需要的空間比用过去的明火枪射击时要小得多，因此取消了原来的疏开的队形，而采用密集的队形，以便在一个地段上容納尽量多的射手。基于同一原因，战斗部署中各营之間の間隙也最大限度地縮小了；这样，整个正面就构成了一条拉长的綿亘的陣綫：步兵成兩綫在中央，騎兵在兩翼。射击原先是按橫列进行的，而且每列在射击后都退到后面重新装填，这时却按排或連进行了：每排的前三列都按照口令同时射击。这样，每个营都可对面前的敌人不間断地进行射击。每个营在这种寬橫队中都有固定的位置，这种每人都有規定位置的队形就取名为战斗队形。把軍隊編成行軍隊形，使它随时都易于从行軍隊形轉变为战斗队形，并且每个单位都能迅速地在橫队中占据規定的位置，这是极其困难的。在敌人可以到达的範圍內安营也要考虑到这种要求。因此，軍隊轉移和安营的方法，在这一时期大大地改进了，然而，战斗队形的笨拙不灵仍然限制了軍隊的一切运动。同

时，这种队形过于呆板，除了最平坦的地形以外，什么地方都不能采用，这就更加限制了战场的选择范围；但在交战双方受到同样限制时，这种情况就不致使任何一方陷入不利态势。从马尔普拉克会战时起，到法国革命开始时止，一切道路、村镇和庄园对步兵来说都是禁地，甚至沟渠或栅栏也几乎被防守它们的军队视为障碍。

普鲁士步兵是十八世纪最出色的步兵。它主要是由德骚亲王列奥波特建立起来的。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时期，步兵横队的纵深由6列减为4列。列奥波特取消了第四列，将普鲁士军队排成3列。他还采用了装弹铁探条，使他的军队在一分钟之内能装填和发射5次，而其他军队在一分钟之内却只能勉强发射3次。同时，他的军队受过在攻击过程中进行射击的训练。但是因为射击时必须停下来，而整个宽横队又应保持整齐，所以步伐很慢；这就是所谓鹅步。射击从距敌人200码的地方开始；横队以鹅步前进；距敌人愈近，步幅愈小，火力愈强，直到敌人开始退却，或陷入混乱状态，使得骑兵的侧面攻击和步兵的刺刀冲锋把敌人逐出他们所占据的阵地时为止。军队总是编成两线；但是因为第一线中几乎没有间隙，所以第二线很难在必要时支援第一线。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在即位时所承袭的军队和战术就是这样。看来，一个有天才的人，如果不破坏这种战法，就很少有可能改进它，而弗里德里希以他所处的地位和他所拥有的兵源要破坏它是办不到的。但他终于还是制定了一种攻击法和组织了自己的军队，使得他能够依靠比目前撒丁还要小的王国的资源和英国的微薄金钱援助，进行了几乎对整个欧洲的战争。其中的秘诀是很容易道破的。到当时为止，十八世纪的一切会战都是两军对阵的会战；双

方軍隊展開成互相平行的陣綫，在正規的平地戰鬥中廝殺，不講什麼軍事計謀和詐術；較強的一方可能獲得的唯一優勢，就是以其兩翼包圍敵軍的兩翼。而弗里德里希則將埃帕米農達斯所發明的斜形攻擊法運用于綫式戰鬥隊形。他選擇敵人的一翼進行第一次攻擊，並且以進行包圍的那一翼以及中央的一部分部隊去攻擊所選定的一翼，而將其餘部隊控制在後面。這樣，他不僅由於包圍敵軍的一翼而獲得了優勢，而且能以優勢兵力擊潰受到這種攻擊的敵軍。其餘敵軍不可能前來援救，因為他們被固定在綫式戰鬥隊形中的自己的位置上；攻擊部隊在一翼上取得勝利後，其餘部隊立即前進去對中央的敵軍展開正面攻擊；這時，原來已開始攻擊的一翼在粉碎敵人的一翼以後，則轉而猛攻中央敵軍的翼側。這確實是唯一可取的方法，採取這個方法既可以保持綫式隊形，又可以用優勢兵力攻擊敵軍戰鬥隊形的任何一部分。可見，一切都取決於如何組織攻擊的一翼的兵力，所以，弗里德里希總是在笨拙不靈的戰鬥隊形所允許的範圍內盡量加強這一翼。他經常在攻擊的一翼的第一綫步兵之前，配置一綫擲彈兵或精兵作為前衛，以保證在第一次攻擊中就取得最大的勝利。

弗里德里希用來提高其軍隊水平的另一辦法就是改編騎兵。古斯塔夫-阿道夫的理論被遺忘了。騎兵不再依靠雙刃刀和勇猛的攻击取勝，除了極少數例外，已恢復了使用手槍和馬槍作戰的方法。因此，在十八世紀初的戰爭中騎兵攻击成功的戰例不多；在普魯士，騎兵特別被忽視。但是弗里德里希恢復了騎兵持雙刃刀全速冲鋒的老辦法，並且建立了歷史上無與倫比的騎兵。他的很大一部分勝利都是依靠這支騎兵取得的。當他的軍隊成了歐洲模範的軍隊的時候，為了迷惑別國的軍事家，他竟把戰術隊形變換的方

法弄得異常复杂，其实这些复杂的战术队形的变换一点也不适于真正作战，只不过是用以掩飾他取胜方法的簡單罢了。他在这一点上做得很成功，以致他自己的部屬比其他任何人都受騙更深，他們确信这些复杂的編队方法是他的战术的真正实质。这样一来，弗里德里希就不仅給普魯士人从此以后所特有的呆板和机械练兵方法奠定了基础，而且实际上造成了他們以后在耶拿和奧埃爾施太特蒙受空前耻辱的原因。

除了我們上面所談到的一貫成密集队形作战的基干步兵以外，还有一种不参加大会战的特种輕步兵。这种步兵的任务是进行游击战；奧地利的克罗地亚人非常适于进行游击战，但是不适用于任何其他目的。欧洲的其他国家也仿效与土耳其接壤的边屯区³²²的这些半野蛮人組成了自己的輕步兵。但在古代和中世紀直到十七世紀，輕步兵在大会战中曾采用过的散兵战，已完全不采用了。只有普魯士人以及步其后尘的奧地利人，組織了一两个猎兵营。这是由防止偷猎的守卫人和守林人組成的，他們都是打得很准的射手，在作战时分布在整个正面上，射击敌人的軍官；但是他們人数很少，所以不見得有什么作用。散开队形的恢复是美国独立战争的結果。当时，欧洲軍队的兵士被用强制手段和严厉办法控制在队列里，不可能受命去进行散兵战，而在美国，他們却不得不同那些虽未受过常备軍的正規訓練、但射击准确而又善于使用步枪的居民作战。地形对居民是有利的；他們並沒有企图进行他們最初所不会的机动，而是本能地采用了散兵战。这样，累克辛頓和康克德战斗³²³就开辟了步兵史上的新紀元。

七、法国革命时期和十九世紀的步兵

当欧洲同盟的军队侵入革命的法国时，法国人所处的地位与在这不久前美国人所处的地位大致相同，所不同的只是法国人没有那样有利的地形。为了按照旧的线式战术与业已侵入或即将侵入本国的人数众多的敌军作战，法国人必须有受过良好训练的兵士，但是这样的兵士并不多，而没有受过训练的志愿兵却很多。虽然志愿兵曾在时间许可的范围内受过一些线式战术基本动作的训练，但一进入火线，展开成横队的志愿兵的各营便自动地散开，成为散兵群，利用每一地褶，防避敌人的火力；同时，当做一种预备队的第二线，常常一开始就卷入战斗。此外，法国军队的编制也与敌军大不相同。它不是把各营编成单一的、不灵活的横队，而是编成若干个师，每个师由炮兵、骑兵和步兵组成。意外地新发现了一个重大的事实，即问题不在于使营在战斗队形中“严格规定的”位置上作战，而在于使营在接到命令后进入战线和很好地作战。因为法国政府很穷，所以十八世纪的帐篷和庞大的辎重都被取消了；实行了露营；军官个人的行囊，在别国军队中要占运送物资的很大一部分，但在法国已减少到军官可以随身携带的程度。军队不是从兵站仓库领取粮食，而是指靠在经过的地区就地征集。这样一来，法国军队就具有敌人完全料想不到的运动性和易于编组战斗队形的能力。战败时，他们几个小时就摆脱了追击的敌人；进攻时，他们可以在敌人还没有发觉以前就出现在敌人意料不到的地点，出现在敌人的两翼。法国军队的这种运动性，以及同盟国军领导者之间的互相猜忌，使法军得到了一些喘息机会来训练志愿兵和制

定在他們当中开始萌芽的新的一套战术。

我們发现，从 1795 年起，这套新战术已开始具有某种将散开队形和密集纵队結合起来的形式。后来，又增加了横队，但不像以前那样全軍都排成横队，而只是在认为情况需要时个别的营展开成横队。当然，这种必須經過較系統的訓練才能采用的战法，是法国革命的非正規部队到最后才采用的。3 个营組成半旅，6 个营組成旅，2 个或 3 个步兵旅組成师；此外，每个师还有 2 个炮兵連和一定数量的騎兵；若干个这样的师組成軍团。当师与敌人遭遇时，前卫的散兵即占据防御障地，而前卫則在全师到达之前作为散兵的預备队。然后，各旅都組成两个横队和一个預备队，但各营則成纵队，其間隙的大小不固定；战斗队形中的間隙，則由騎兵和預备队掩护。战斗队形已不像从前那样一定要成为綿亘的直綫；它可根据地形向任何方向弯曲，因为这时已不再选择光秃的平地做战场；相反，法国人宁願选择起伏地，他們的散兵在整个战线前构成散兵綫，冲入他們所能攻占的每个村鎮、庄园或小树林。如果第一綫各营展开，那末，这些营通常都很快地变成散开队形；而第二綫各营則总是保持纵队，并且用这种队形向敌人纵深很小的横队攻击，通常都取得很大的战果。由此可見，法軍的战术队形逐渐演变为两綫制，每一綫均由成密集纵队的营組成，这些营配置成 en échiquier [棋盘形]，散兵在正面前，預备队集結在后方。

拿破侖就正是在这一发展阶段遇到了法国革命創立的战术。当他一掌握政权，对此可以有所作为的时候，他便开始进一步发展这一套战术。他把軍队集中在布倫兵营，施以正規訓練。他着重訓練兵士在担任預备队时成密集队形配置在不大的地区內，并迅速展开成横队。他把 2 个或 3 个师編成一个軍，以便于指揮。他

建立了新的行军队形，并使它达到了极完善的地步。这种队形的特点在于把军队分布在相当广阔的地区内，使他们能够依靠当地的物资储备供养自己，同时在于使军队保持一定程度的集中，以便在遭受攻击的一部分军队可能被敌人击溃以前能够在任何一点集合。从1809年战局起，拿破仑就开始创造新的战术队形，例如，由整旅整师组成的长纵队。但是，这种纵队很不成功，以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1813年以后，法国的一套战术成了欧洲大陆各国的共同财富。旧的线式战术和募兵制被彻底废除了。各国都规定每个公民有服兵役的义务，并实行了新的战术。在普鲁士和瑞士每个公民都应服现役，而在其他国家则采用征兵制；青年都要抽签，以确定应服兵役的人。到处都实行预备役制度，将一部分已受过军事训练的人复员回家；这样，平时的开支不大，而战争一旦爆发又能拥有大量受过训练的兵士。

从这时起，步兵的装备和编制起了某些变化，其原因一方面是轻火器生产领域内的进步，另一方面是法国步兵同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人的冲突。一向爱使用步枪的德国人，增加了他们的猎兵营；而感到必须在阿尔及利亚装备射程较远的武器的法国人，终于在1840年建立了一个猎兵营，装备了经过改良、命中率大而射程远的步枪。这个营的兵士学会了各种队形变换，甚至用一种跑步 (*pas gymnastique*) 进行远距离行军，不久就表现出了高度的战斗力，因而又组成了一些新的营。这样，新式的轻步兵就建立起来了，但已经不是由猎人和守林人组成，而是由最健壮灵活的兵士组成。步枪的射击精度和远的射程同兵士的灵活和刻苦耐劳结合起来，因此，这些新建立的部队无可争辩地胜过当时所有的步兵。同时，在基干步兵中也采用了 *pas gymnastique*，现在各国军队已

都把跑步当做步兵的重要训练项目之一——这在过去，甚至拿破仑也会认为是极不合理的。

法国军械师（德尔文和龐沙腊）所设计的新式步枪的成功，很快就引起了新的改进。綫膛枪采用了圆锥形的弹丸。米涅、罗伦兹和威金逊发明了一些新的方法，使弹丸很容易沿枪膛下滑，同时使铅弹在滑至枪膛的下端后扩张而嵌入膛綫，这样，就产生了保证射击效果所必需的旋转运动和力量。另一方面，德雷澤发明了针发枪，这种枪从后面装填，并且不需要专门的导火具。所有这些步枪都能杀伤 1 000 碼距离上的目标，并且像普通的滑膛枪一样容易装填。于是产生了用这些步枪装备所有步兵的想法。英国首先实现了这个想法。早已准备采取这一步骤的普魯士随后也实现了这个想法，接着是奥地利和德意志各小邦，最后是法国。俄国以及意大利和斯堪的那维亚各国，到目前为止仍处于落后状态。这种新武器完全改变了作战的特点，但不是朝着战术理论家所期望的那个方向；所有这些都是基于很简单的数学原因。只要画出这种弹丸的弹道，就可以很容易地说明，在测定目标距离时如果有 20 或 30 碼的误差，就根本不可能命中 300 或 350 碼以外的目标。此外，在教练场上，各种距离都是已知的，而在战场上则是未知的，并且每分钟都在变动。如果步兵配置在防御阵地上，并且有时测量达到正面前显著地物的距离，那末在 300—1 000 碼的距离内对攻击的敌人就将具有巨大优势。对方要消除这种优势，只有迅速跑步前进，在相隔守敌 300 碼的距离外不进行射击，因为在 300 碼以内双方的火力是同样有效果的。在这种距离上，双方成两条严整的散兵綫进行的互射将非常猛烈，大量子弹将命中前哨和预备队，以致勇敢的步兵除了在 40 或 50 碼的距离上进行齐射，一有机

会即向敌人猛扑以外，再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这些原则首先是由普鲁士少校特罗塔从理论上加以阐述的，随后由法国人在不久前的对奥战争³²⁴中成功地运用了。所以这些原则将成为现代步兵战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特别是在运用这些原则来对付像普鲁士的针发枪那样装填迅速的武器时，如果能取得同样良好的效果，那就更是如此。用同一型式的綫膛枪装备所有步兵，就将消除轻步兵和基干步兵之间至今还存在的差别，就将建立一支能够执行任何任务的步兵。显然，这就是这一兵种进一步发展的方向。

弗·恩格斯写于1859年9月—10月
10日左右

原文是英文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60年版
第9卷

俄文译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弗·恩格斯

海軍³²⁵

海軍——一个国君或国家所拥有的軍艦的总称。古代各国海軍虽然往往有很多船只，但是在船只的大小、动力和进攻力方面則根本不能同現代海軍相比。腓尼基、迦太基、希腊和羅馬的海船是一种不能在風暴天气里航行的平底船；海上風暴对于它們是一种致命的威胁；它們只能沿海岸緩慢行駛，夜間則停泊在小港灣或海灣內。对于这种船說来，橫渡希腊与意大利之間的或非洲与西西里之間的海面是一桩危險的事情。这种船承受不住我們現代軍艦常用的那种帆的重压，因此仅备有小帆，它們依靠桨的力量只能緩慢地航行。当时还没有发明罗盘，还不知道經緯度，在航行中唯一的向导是岸标和北极星。进攻手段的效能也很差。弓箭、梭鏢、笨重的弩炮和彈射器是仅有的能用于远距离作战的武器。在海上，在两只交战的軍艦直接接触以前，是不可能給敌方以任何严重的損伤的。因此海战只有两种可能的方法：或者是冲向敌艦，用艦头坚硬的铁尖猛撞敌艦的舷，将它击沉；或者是舷并舷靠攏敌艦，将它鈎住并立刻和它进行接触战。自从第一次布匿战争結束了迦太基的海上霸权³²⁶以后，古代史上就再也找不到具有絲毫研究价值的海战了，而羅馬統治权的建立，很快就消除了以后在地中海发生任何海战的可能。

我們現代海軍真正的誕生地是北海。大約在大批的中歐條頓族人起來為打倒腐敗的羅馬帝國、復興西歐而鬥爭的時候，他們在北海沿岸的同伙——弗里西安人、薩克森人、盎格魯人、丹麥人和斯堪的那維亞人——開始了航海。他們的船是一種穩定的、堅固的海船，龍骨凸起，兩端尖削，他們在這種船上大都只使用帆，並且不怕在波濤洶湧的北海上受到風暴的突然襲擊。盎格魯人和薩克森人就是乘這種船從易北河和埃德爾河的河口航行到不列顛的海岸，而諾曼人則乘這種船進行了海盜式的探險，東面到達了君士坦丁堡，西面到達了美洲。這種敢於橫渡大西洋的船隻的建成，在航海業中引起了全面的革命，因此還在中世紀結束以前，在歐洲所有沿海地區就都採用新式尖底海船了。諾曼人航海時所使用的船大概不太大；排水量無論如何不超過 100 噸，有一根或者最多兩根張着縱帆的桅杆。

在一個長時期內，無論是造船業還是航海業看來都沒有變化；在整個中世紀內，使用的船隻都不大，諾曼人和弗里西安人所固有的那種膽氣也消失了。所有的改進都是意大利人和葡萄牙人做出的，他們成了當時最勇敢的航海者。葡萄牙人开辟了去印度的航綫，兩個在外國服務的意大利人哥倫布和卡博特則繼諾曼人萊夫之後最先橫渡了大西洋。遠涉重洋的旅行成為當時必需的事情，而這就要求有大型的船隻。同時，由於需要給軍艦甚至商船裝備重炮，也要求增大船隻的尺寸和噸位。常備陸軍產生的原因，也同樣成為常備海軍產生的原因，而且只有從這時起，我們才能談到真正的海軍。這時展現在一切海洋國家面前的殖民事業的時代，也就是建立龐大的海軍來保護剛剛开辟的殖民地以及與殖民地的貿易的時代。從此便開始了一個海戰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加頻繁、海

軍武器的发展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有成效的时期。

亨利七世奠定了不列颠海軍的基础，他建造了第一艘軍艦，名为“偉大的哈利号”。亨利七世的继承者^①創立了归国家所有的正规的常备海軍，其中最大的軍艦命名为“上帝的亨利号”。这是到那时为止所建造的一切軍艦中最大的軍艦，它有 80 門火炮：一部分配置在两层普通的連續的火炮甲板上，一部分配置在舰首和舰尾的补助平台甲板上。这艘軍艦有 4 根桅杆，它的吨位約为 1 000 到 1 500 吨。到亨利八世逝世的时候，整个不列颠海軍大約有 50 艘帆船，排水量共計为 12 000 吨，乘員为 8 000 名（包括水兵和海軍陆战队）。这个时期的大型軍艦都很笨重，前甲板和后甲板很高，也就是說舰首和舰尾的上层建筑很高，因此軍艦很不稳定。我們有資料考证的第二艘大軍艦是“海上霸王号”，后来称为“英王号”，它建成于 1637 年，这是我們掌握有近乎完全确凿的武器装备資料的第一艘軍艦。它有 3 层連續甲板、前甲板、后半部甲板、中后部甲板、后甲板和舰尾指揮室；下甲板上 30 門四十二磅和三十二磅炮；中甲板上 30 門十八磅和九磅炮；上甲板上 26 門大概是六磅和三磅的輕炮。此外，它还有 20 門追击炮，在前甲板和后半部甲板上还有 26 門火炮，但在內河执行一般任务时舰上的炮減为 100 門，因为携带全部火炮可能使軍艦負担过重。关于小型战船，我們的資料是极端缺乏的。

1651 年，軍艦分为 6 級。但是，此外还有許多种不列等級的舰船，如三桅橫帆船、圍船，稍后还有炮船、纵火船和座艇。据一份关于 1677 年整个英国海軍舰船的統計材料所載，最大的一艘一級三

^① 亨利八世。——編者注

层甲板舰装备有 26 門四十二磅炮、28 門二十四磅炮、28 門九磅炮、14 門六磅炮以及 4 門三磅炮；最小的两层甲板舰（五級）装备有 18 門十八磅炮、8 門六磅炮、4 門四磅炮，即共計 30 門火炮。整个海軍由 129 艘舰船組成。1714 年海軍共有舰船 198 艘，1727 年共有 178 艘，1744 年共有 128 艘。此后，随着船数的增多，舰船的尺寸也在增大，而随着吨位的增加，武器装备的重量也在增加。

第一艘相当于我們現代巡航舰的英国軍舰，是罗伯特·达德利爵士早在十六世紀末建造的。但是过了整整 80 年以后，这种首先在南欧各国出現的軍舰才被英国海軍广泛采用。有一个时期，英国人对于巡航舰高速性的意义認識不足。不列顛軍舰装备的火炮总是太多，因此舰上的底层炮門仅高出水面 3 英尺，在暴風雨的天气里是无法打开的。此外，武器装备过重，使軍舰的航海性能也大为降低。西班牙人和法国人在保持同样数量火炮的条件下，却增大了軍舰的排水量，因此他們的軍舰能够装备口径更大的火炮，能携带更多的儲备品，而且还具有更大的浮力和高速性。十八世紀上半叶排水量約为 710 吨的英国巡航舰，有 44 門九磅到十二磅的炮和几門十八磅炮。到 1780 年建成了排水量为 946 吨的巡航舰，装备有火炮 38 門（大部分是十八磅的）。从这里我們可以看到明显的改进。在这一时期武器装备与英国軍舰相同的法国巡航舰，排水量平均多 100 吨。大約在同一时期內（十八世紀中叶），較小的軍舰开始比較明确地像現在这样区分为：輕巡航舰、两桅横帆船、小型两桅船和纵帆船。

1779 年发明了一种新式火炮（大概是英国將軍梅耳維耳发明的），这就使大多数国家的海軍的武器装备起了很大变化。这是一

种炮身很短的大口径炮，类似榴弹炮，但它是用来以小量装药在近距离上发射实心弹的。这种炮最初由苏格兰卡伦铁业公司制成，所以叫卡伦炮。这种炮的齐射在远距离射击时无效的，但在抵近射击时对于敌舰的木质部分可造成极严重的破坏。这种炮的炮弹由于飞行速度较小（装药量少），能造成较大的弹孔，更加严重得多地破坏船只的木质部分，造成许多特别危险的裂缝。同时由于这种炮比较轻便，就能比较容易地将几门这样的炮配置在军舰的后甲板、中后部甲板和前甲板上。到1781年，英国海军中已有429艘军舰除普通火炮外还装备了6—10门卡伦炮。我们在阅读法国战争和美国战争时期的海战报告时，应当注意到英国人从来没有把卡伦炮计算在军舰火炮数目之内，例如不列颠巡航舰通常有36门炮，但如果把舰上的卡伦炮包括进去，它实际上就有42门以至更多的火炮。在与革命的法国作战时，英国军舰由于使用卡伦炮，在全舷齐射时所发射的炮弹的重量占优势，这就使得英国人在近距离进行的战斗中获得多次胜利。但卡伦炮毕竟只是临时用来加强80年前就已存在的那种较小型军舰的战斗力的武器而已。各级军舰的尺寸一经增大，便开始不用卡伦炮了，目前这种炮大都被其他型式的花炮所代替。

在军舰结构方面，法国人和西班牙人大大超过了英国人。他们的军舰比不列颠军舰大，外形也比较美观；他们的巡航舰在尺寸和航海性能方面特别优于英国巡航舰。许多年来，英国巡航舰都是仿照1782年缴获的法国“赫柏号”巡航舰建造的。随着军舰长度的增加，舰首和舰尾的高大的上层建筑——前甲板、后甲板和中后部甲板——缩小了，因而提高了军舰的航海性能。这样，军舰就逐步具备了现代军舰那种比较美观的外形和高速性。在这种比较

大的軍艦上，人們不是去增加火炮的數目，而是去加大每一門火炮的口徑、重量和長度，以便能使用全裝藥和達到最大的直射距離，這樣就能在遠距離上開火。二十四磅以下的小口徑炮在大軍艦上已經絕迹。而其餘火炮的口徑也被簡化，每艘艦上不超過兩種口徑，最多三種口徑。因為戰列艦的下甲板最為堅固，所以配置有口徑與上甲板上的相同、但更長更重的火炮，以保證至少有一層火炮能夠向尽可能遠的距離射擊。

約在 1820 年，法國將軍佩克桑有一項對於海軍的武器裝備具有很大大意義的發明。他設計了一種炮尾部有狹小藥室的大口徑火炮，並開始用這種“發射爆炸彈的加農炮”(canons obusiers) 以小射角發射空心彈。雖然在德國早已有人以二十四磅甚至十二磅短管炮使用爆炸彈對築城工事進行過平射，但到當時為止還只有岸防炮台的榴彈炮用空心彈射擊過軍艦。拿破侖非常了解爆炸彈命中軍艦木舷時的破壞作用，因此他在布倫給準備用來征討英國的大部分炮艦裝備了榴彈炮，並且確定了一條規則，即應當用命中后才爆炸的炮彈來射擊軍艦。這時，佩克桑的發射爆炸彈的加農炮的出現，就使軍艦能裝備這樣一種火炮，這種火炮以最低伸的彈道發射爆炸彈，因而能在艦對艦的海戰中使用，並能保證與發射實心彈的舊式火炮相同的命中率。新式火炮不久就被各國海軍用作武器，經過各種改進之後，現在已經成為所有大型軍艦武器裝備中的重要部分。

這以後不久，有人開始嘗試把蒸汽發動機運用到軍艦上，就像富爾頓把它裝在商船上一樣。從內河輪船發展到近海輪船並逐漸發展到遠洋輪船的過程是緩慢的，蒸汽軍艦的發展也同樣緩慢。這是因為當時只有明輪蒸汽艦的緣故。明輪和一部分機器暴露在

敌人的火力之下，只要命中一彈，就不能再用；它們占去了舰上的大部分位置；此外，机器、明輪和煤的重量使舰船的容量大大减小，以致根本談不到給它們装备大量长管重炮的問題。因此明輪蒸汽舰無論如何不能成为战列舰，但是它的航速快的优点，使它能夠同通常在敌人翼側活动以获得战果或掩护退却的巡航舰媲美。目前巡航舰的尺寸和武器装备，正好使海軍能大胆地使用它独立巡航，同时它的优良的航海性能又使它能夠及时退出众寡不敵的战斗。任何巡航舰的航海性能都远远不如蒸汽舰，不过蒸汽舰沒有良好的武器装备，就不可能完成自己的使命。蒸汽舰根本无力同巡航舰进行正规的舷炮战；蒸汽舰上的地方不够，它的火炮必然常常比帆力巡航舰的火炮少。这里比任何地方都适于使用发射爆炸彈的加农炮。蒸汽巡航舰上所减少的火炮数目，可以从发射爆炸彈的加农炮的口徑和所发射的炮彈的重量方面得到弥补。起初这种炮只用来发射爆炸彈，但不久前已开始把它們(特别是舰首和舰尾的追击炮)造得这样重，以致在使用全装药时可以把实心彈发射到很远的距离。此外，由于火炮数量减少，就可以在甲板上設置旋轉平台和敷設滑軌，使全部或大部分火炮能夠移动，以便向任何方向射击。依靠这一点，蒸汽巡航舰的进攻力几乎增加一倍；20門火炮的蒸汽巡航舰可以使用上的火炮数量，至少与装备有40門火炮但每舷只有18門火炮的帆力巡航舰可以使用上的火炮数量相等。因此現代大型明輪蒸汽巡航舰是威力最大的軍舰之一。它在火炮口徑和射程方面的优势，以及它的速度，使它能在帆力舰很难給予任何有效还击的距离上杀伤对方；同时当加速发展会战对它有利时，它还可以利用它发射的炮彈的重量所造成的那种破坏力来做到这一点。明輪蒸汽舰的缺点仍然是：全部发动机暴露在敌人直

接瞄准火力之下，成为一个很大的目标。

对于那些較小的舰船，如輕巡航舰、偵察船以及其他一些在海战中虽然不起什么作用但在整个战局过程中則有很大用处的輕便船只，蒸汽的巨大优越性立即就被承认了，因此大多数国家的海軍都根据需要建造了大量的这一类的明輪船。运输船只的情形也是如此。在运送陆战队登陆时，輪船不但能够把航海時間縮短到最低限度，并且使人們能够几乎絕对准确地計算出到达指定地点的时间。运送軍队的工作大为簡便了，而如果考虑到每个海洋国家都有大量蒸汽商船在必要时可作为运输船只使用，情况就更是如此。正是根据这些理由，茹安維尔亲王在他的一本著名的抨击性小册子³²⁷中說：蒸汽在海战条件方面引起的变化如此之大，以致法国攻入英国，已不再是不可能的了。但是，只要担負决定性行动的軍舰即战列舰还仅仅是些帆力舰，那末蒸汽的利用就不可能使进行大規模海战的条件发生重大变化。

随着螺旋推进器的发明，就有了一种必然使海战发生根本变革并且使所有的軍舰变为蒸汽舰的手段。但是，在发明螺旋推进器以后过了整整 13 年，才在这方面迈出了第一步。在新式軍舰設計和建造方面一貫走在英国人前面的法国人，首先迈出了这一步。1849 年，法国工程师杜毕伊·德·洛姆终于建造了第一艘螺旋推进器战列舰——装备有功率为 600 匹馬力的发动机和 100 門火炮的“拿破侖号”。这艘軍舰不完全依靠蒸汽的力量；螺旋推进器和明輪不同，它使軍舰能够保持帆力舰的整个形状和索具，并且能够随心所欲地只利用蒸汽或只利用帆力或者同时利用二者来航行。因此，这种軍舰随时能够利用帆来节省用煤，以备急需；所以它对加煤站的依賴性比旧的明輪蒸汽舰要小得多。由于它同

时还使用帆，并且由于它的蒸汽发动机的功率还太小，不能使它达到相当于明輪蒸汽舰的速度，所以“拿破侖号”和其他同类的軍舰都被称为輔助蒸汽舰。但是，此后即建成了拥有功率相当强大的蒸汽发动机的战列舰，这种发动机使軍舰能够以螺旋推进器所能造成的最大速度航行。鉴于“拿破侖号”的成功，法国和英国不久就开始建造螺旋推进器战列舰。俄国战争^①又进一步推动了軍舰建造业的这种根本性的改革。当人們已經知道給大部分造得很好的战列舰装上螺旋推进器和机器并不特別困难时，把一切軍舰变为蒸汽舰就只是一个時間問題。現在，任何一个海上强国都不想建造大型帆力舰了。几乎所有新建造的軍舰都是螺旋推进器蒸汽舰，只有少数还需用于某种目的的明輪蒸汽舰例外。而到1870年，帆力舰就差不多像今天手搖紡車和滑膛枪那样过时了。

由于克里木战争的需要，出现了两种新式軍舰。第一种是蒸汽炮艇或臼炮艇，它最初是英国人为了准备攻击喀琅施塔得而建造的。这是一种小船，吃水4—7英尺，装备1—2門远射程重炮或1門重臼炮；炮艇主要在航行困难的淺水中使用，臼炮艇则在远距离轰击筑有工事的海軍兵工厂时使用。这种舰艇能极好地完成它們的使命，在未来海战中无疑将起重要的作用。斯維阿波尔格战斗表明，臼炮艇使舰队获得过去从未有过的那种对要塞轰击而不致遭到还击的能力，因而完全改变了舰队和要塞之間攻防力量的对比。在3000碼的距离上，臼炮艇可以破坏像个城市这样大的目标，而它們本身則由于面积小而十分安全。在相反の場合，

^① 1853—1856年克里木战争。——編者注

炮艇在岸防炮台的配合下也能加强防御，并为进行海战提供至今还十分缺乏的、可作为先驱舰的轻便舰艇。

第二种是炮弹穿不透的装甲浮动炮台，它最初是法国人为了攻击岸防工事而建造的。这种浮动炮台只在金布恩附近试用过³²⁸，即便是用来对付这个小要塞的不坚固的胸墙和生锈的火炮，也没有获得特别大的战果。可是，看来法国人对它很满意，所以此后还是继续试制装甲舰。他们建造了一种炮艇，在其前甲板上设置了一道炮弹穿不透的特别的钢质护板，用以掩护火炮和炮手。但是，如果说浮动炮台尚且笨重不灵，需要拖曳，那末这种炮艇就经常由于船头下沉而根本不适于航行。然而法国人还是建造了一艘包着钢板的蒸汽巡航舰“光荣号”。据说，这艘军舰是炮弹穿不透的，行驶很快，并且完全经得起风浪的袭击。关于这种炮弹穿不透的巡航舰在海战中可能引起的变革有一种最夸大的说法。有人声称，战列舰已经过时，大规模海战的结局已转而由这种装备有一个炮台的、周围裹着炮弹穿不透的装甲的巡航舰来决定了；这种巡航舰好像是任何一艘木质三层甲板舰都敌不过的。这里不是讨论这些问题的地方，但我们可以指出，设计一种足以穿透铁甲或钢甲的威力强大的线膛炮并把它装置在军舰上，比起建造包着很厚的金属板以抵御这种火炮的实心弹或爆炸弹的舰船来，要容易得多。至于“光荣号”，我们毕竟还没有确实知道它是否经得起风浪；据说，由于它不能装载足够的煤，所以在海上依靠蒸汽航行的时间不能超过三天。它的不列颠对手“勇士号”的能力如何，我们还不知道。毫无疑问，在缩减武器和储煤量并且改变舰船构造之后，是可以造成一种完全不怕远距离和中距离射来的炮弹、同时又能很好发挥轮船优点的军舰的。但是，在炮兵学进步

如此迅速的时代，今后是否应当建造这一类军舰，是很值得怀疑的。

目前由于綫膛炮的使用而在炮兵中发生的变革对于海战的影响，看来比装甲舰可能发生的影响要重大得多。每一門名副其实的綫膛炮，都能赋予远距离射击以这样大的精确性，以致原来海軍炮在这种距离上射击效果不大的情况，看来很快就将成为过去。此外，綫膛炮可以使用长炮彈和减装药，因此就能大大减小舷炮的口徑和重量，而如果保持原来的口徑，則可取得比以前大得多的效果。重 56 英担的三十二磅綫膛炮所使用的长炮彈，不但在重量方面，而且在侵彻力、射程和命中精度方面，都超过重 113 英担的 10 英寸滑膛炮的球形炮彈。如果装备綫膛炮，每艘軍艦的进攻力至少可增加两倍。同时，发明一种触及船舷即行爆炸的着发炮彈也有非常迫切的需要。球形炮彈旋轉不定，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因为当它命中目标时，它的着发引信不是經常处在应处的位置，所以不一定会爆炸。但是綫膛炮发射的长炮彈則圍繞纵軸旋轉，总是能够以彈头撞击目标，因此彈头信管上一个简单的着发火帽就能使炮彈触及船舷即行爆炸。迄今所发明的任何一艘装甲軍艦，遭到两层甲板舰的舷炮用这种炮彈进行的两次齐射，恐怕是沒有不被击坏的，更不用說那些穿进炮門而在甲板之間爆炸的爆炸彈了。綫膛炮必然使那种适于使用卡倫炮的近距离战斗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过去；机动重新获得巨大的意义，而由于蒸汽使交战中的舰船不依赖于風向和水的流向，所以未来海战的战法就将更加接近于陆上会战的战法，并且将服从陆上会战的战术原則。

現代海軍的軍艦分为不同的等級，从第一級起到第六級止。

但因为这些等级可以任意更改，所以最好还是用普通的方法来给军舰分类，即把它们分为：战列舰、巡航舰、轻巡航舰、两桅横帆船、纵帆船等等。战列舰是最大的军舰，其任务是在决战中组成战斗队形，并依靠向敌舰发射的炮弹的总重量决定会战的结局。战列舰有三层甲板舰或两层甲板舰，换句话说，它们有三层或两层配置着火炮的掩蔽甲板。这些甲板称为下甲板、中甲板和主甲板（或上甲板）。上甲板的顶上起初只铺有后甲板、中后部甲板和前甲板，而现在则铺有从舰首到舰尾的连续露天甲板。这层露天甲板的各部分仍旧称为后甲板、中后部甲板和前甲板（舰中部的上层建筑部分，称为中前部甲板），并且也配置有火炮，主要是卡伦炮。因此实际上两层甲板舰有三层火炮，而三层甲板舰则有四层火炮。最重的火炮当然配置在下甲板上。火炮配置的位置离水面越高，火炮的重量就越轻。各层甲板上火炮的口径通常是一样的，因此要达到以上要求，就要把火炮本身的重量减轻，这样一来，上甲板上的火炮就只能使用减装药，当然也就只能进行近距离射击了。这方面唯一的例外是追击炮，这种炮配置在舰首和舰尾，即便是配置在前甲板或后甲板和中后部甲板上，也仍然具有最大限度的长度和重量，因为它们是用来进行最远距离的射击的。例如，英国战列舰的舰首炮和舰尾炮不是发射爆炸弹的8英寸和10英寸加农炮便是发射实心弹的五十六磅（口径为7.7英寸）和六十八磅（口径为8.13英寸）加农炮，其中一门装置在前甲板的旋转平台上。英国海军的一级军舰上通常有舰尾炮6门，舰首炮5门。这种军舰上其他的武器装备列于下表：

火炮位置	火炮型式	重量 (英担)	长 度	火炮数目 (門)
下甲板	发射爆炸彈的 8 英寸加农炮	65	9 英尺	4
下甲板	三十二磅炮	56	9 英尺 6 英寸	28
中甲板	发射爆炸彈的 8 英寸加农炮	65	9 英尺	2
中甲板	三十二磅炮	50	9 英尺	32
上甲板	三十二磅炮	42	8 英尺	34
前甲板、后甲板 } 和中后部甲板 }	三十二磅炮	45	8 英尺 6 英寸	6
	三十二磅卡倫炮	17	4 英尺	14
共 計.....				120

較小型的战列艦的武器装备依据相同的原則配备。为了比較起見，我們將法国一級軍艦上的武器装备也列举出来，即：下甲板上有三十磅长管炮 32 門；中甲板上有发射爆炸彈的八十磅加农炮 4 門，三十磅短管炮 30 門；上甲板上有发射爆炸彈的三十磅加农炮 34 門；前甲板、后甲板和中后部甲板上有发射爆炸彈的三十磅加农炮 4 門，三十磅卡倫炮 16 門；共計火炮 120 門。法国的发射爆炸彈的八十磅加农炮的口徑比英国 8 英寸炮的口徑大 0.8 英寸；发射爆炸彈的三十磅加农炮和发射实心彈的三十磅炮的口徑比英国三十二磅炮的口徑稍大一些，因此法国人在发射的炮彈的重量方面占优势。現在，最小的战列艦有 72 門炮；最大的巡航艦有 61 門炮。

巡航艦是只有一层配置着火炮的掩蔽甲板的軍艦，在这层甲板的頂上另有一层露天甲板(前甲板、后甲板和中后部甲板)，在它上面也配置有火炮。英国海軍的巡航艦通常有下列的武器装备：

火炮甲板上有火炮 30 門（或者全部是发射爆炸彈的加农炮，或者一部分是发射爆炸彈的加农炮，一部分是三十二磅长管炮）；前甲板、后甲板和中后部甲板上有三十二磅短管炮 30 門；在舰首的旋轉平台上有重炮一門。因为巡航舰大都是单独行动，并且常常和执行同样战斗任务的敌方巡航舰进行一个对一个人的海战，所以大多数海洋国家都費了不小的力量使巡航舰造得尽可能又大又有威力。不論哪一級軍艦都沒有像巡航舰那样大量地增加吨位。由于美国要求建立一支花錢不多、但十分强大足以使人敬畏的海軍，它是第一个重視由大型巡航舰組成的舰队的巨大优越性的国家，它的这种舰队的每一艘巡航舰都将胜过其他国家用来对付它的任何一艘巡航舰。美国造船家在建造快速船只方面的长处也被利用起来了，在同英国的最近一次战争（1812—1814 年）中許多进行得很好的会战表明，这些美国巡航舰是多么可怕的敌人。虽然現在美国巡航舰同其他国家的巡航舰比較起来，大小上的差别已經不像 30 或 40 年以前那样悬殊了，但直到目前为止，它們仍然堪称同类軍艦中的典范。

次一級的軍艦叫做輕巡航舰。輕巡航舰只有一层配置在露天甲板上的火炮。但是这一級中較大的軍艦有前甲板、后甲板和中后部甲板（但在舰的中間部分沒有連續甲板連接在一起），上面还配置有几門火炮。因此这种輕巡航舰与 80 年前的那种高聳的两端还没有用連續甲板連接起来的巡航舰几乎一样。这种輕巡航舰还是相当坚固的，在它的舰舷上可以装置与更大的軍艦上的火炮口径相同的火炮。它也有三根桅杆，一律使用橫帆。較小的舰艇——两桅橫帆船、纵帆船——有多到 20 門少到 6 門火炮。这类舰艇上只有两根桅杆，两桅橫帆船使用橫帆，而纵帆船則使用纵

帆。它們的火炮口徑必然比大軍艦上火炮的口徑小，通常不超过十八磅或二十四磅，有时則小到十二磅和九磅。进攻力这样小的軍艦是不可能派往会遇到严重抵抗的地方去的。在欧洲海面上，目前到处都开始用蒸汽舰来代替它們；只有在南美和中国等地的沿岸的海面上它們才真正有用，因为在这些地方它們只会遇到弱小的敌人，它們的使命也只是用来升起海上强国的国旗而已。

以上談到的只是目前海軍中的武器装备，但是由于海軍綫膛炮的普遍使用，最近十年內軍艦的武器装备无疑在一切方面都将发生变化。

弗·恩格斯写于1860年11月22日
左右

載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61年版
第12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卡·馬克思
——
福格特先生³²⁹

卡·馬克思写于 1860 年 2 月—11 月
1860 年在倫敦以单行本出版
署名: 卡尔·馬克思

按原文刊印
原文是德文

Herr Vogt.

Von

Karl Marx.



London,

A. Petzsch & Co, deutsche Buchhandlung,

78, FENCHURCH STREET, E.C.

—
1860

“福格特先生”一书第一版的扉页

前 言

在柏林“人民报”、汉堡“改革报”³³⁰ 以及德国其他报纸上，我发表了一项注有“1860年2月6日于伦敦”的声明。声明开头说：

“兹声明：我已采取步骤，准备对柏林‘国民报’³³¹ 起诉，因该报第37号和第41号社论就福格特的小册子‘我对“总汇报”的诉讼’³³² 对我进行诽谤。对于福格特，我准备以后用文字予以回答。”

我为什么决定用文字回答卡尔·福格特，而对“国民报”却采取法律手续呢？这一点，从这一著作中可以看出。

1860年2月间，我向法院控告“国民报”进行诽谤。案件经过四级的预先审理以后，我在今年10月23日收到了普鲁士王国最高法院的一项决定，该决定剥夺了我在终审法院的起诉权；因此，这一案件还未进行公开审理就被撤销了。如果像我有权期待的那样，真的进行了公开审理，那末本著作的前三分之一就可以省去不写，而光转载法院审理的速记记录就够了，这样我也就可以避免用极不愉快的写作来回答对我本人的攻击，从而也就可以不必谈论我自己了。我总是尽量避免谈论自己的，以致福格特指望他的造谣诽谤会取得某些效果。但是，*sunt certi denique fines* [一切总归有个限度]^①。福格特在他那本内容拙劣的书里，——“国民报”

① 贺雷西“讽刺诗集”第1卷，第一首讽刺诗。——编者注

用它所特有的手法叙述了該书的内容，——硬說我干了許多丑事，現在，当我已經完全沒有可能通过法律手續来当众駁斥这类貨色的时候，就只有用文字予以駁斥了。但是，既然我要进行这项工作，那末，除了上述的别无他途的考虑之外，我还有要更詳尽地揭露福格特对我和我党同志所发表的奇談怪論的其他理由：一方面是德国的所謂“自由派”报刊对福格特捏造的揭露发出了几乎一致的欢呼；另一方面是通过对福格特的内容拙劣的书的分析，可以对代表了整个流派的这位人物作一論定。

对福格特言論的答复，使我不得不在某些地方对流亡者历史中的 *partie honteuse*〔阴私〕有所揭露。我在这里只不过行使了“自卫”权利。可是，对流亡者(少数几个人除外)所能責难的，只不过是他們曾經抱过种种幻想，而这些幻想的产生是当时的各种情况使然的；此外，他們还干了一些蠢事，但这些蠢事也是他們所碰到的一种意想不到的特殊环境所必然引起的。当然，我这里所談的不过是流亡者最初几年的情况。如果把大約从 1849 年至 1859 年这一时期各国政府的历史和資產階級社会的历史跟同一时期流亡者的历史比較一下，那就会是給流亡者所能写出的最出色的辯护书。

我早就料到，在福格特的内容拙劣的书出版时，因他的“揭露”的重要性而忧虑地搖頭的那些聰明人，現在将无法理解我怎能花費時間去駁斥这一类胡說；而那些曾經幸災乐禍地在德国、瑞士、法国和美国的报刊上急忙散布福格特的庸俗蠢話和无聊謊言的“自由派”文丐們，却会认为我对付他們和他們的英雄的一套办法是心怀叵測和粗鄙无礼的。But never mind!〔但是这不要紧!〕

对于本书的政治部分和法律部分，无須加以任何特別的說明。

为了避免可能发生的誤会，我只指出下面一点：1848年以前，那些同意维护波兰、匈牙利和意大利的独立不仅是维护这些国家的权利、而且也是维护德国和欧洲的利益的人，在1859年意大利战争中德国对路易·波拿巴所应采取的策略问题上，却表示了截然相反的观点。³³³这种相反的观点是由于对**事实前提**所作的相反估计产生的，而对这些前提的最后结论则应留待将来。至于我，我在这一著作中只准备分析一下**福格特**及其同伙的观点。甚至那些他扬言要加以维护、而且在一群没有判断力的人的**想像**中已经加以维护的观点，实际上都不在我的批判之列。我只准备分析一下他的**确维护过的那些观点**。

最后，在我写这一著作时，给以热情帮助的，不仅有党内的一些老同志，而且还有许多我过去并不知道、其中有的到现在还不相识的流亡在瑞士、法国和英国的人，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卡尔·马克思

1860年11月17日于伦敦

一

硫 磺 帮³³⁴

Clarín: Malas pastillas gasta,
 …hase untado
 Con unguento de azufre.
 (Calderon)^①

在奥格斯堡地方法院里，海尔曼律师委婉地把他的那个长得像球儿似的委任人、疑虚堡的世襲州官³³⁵称之为“圓滿的人物”^②；这位“圓滿的人物”是这样开始他的“长篇历史故事”的：

“在 1849 年的流亡者中間，有一群人以硫磺帮知名，或者也以制刷匠帮这一同样別致的名字著称；这些人起初散居在瑞士、法国和英国，后来逐渐聚集在倫敦，并在那里把馬克思先生推崇为他們的著名首領。这些同行們的政治原則是无产階級专政，等等。”（卡尔·福格特“我对‘总汇报’的訴訟” 1859 年 12 月日内瓦版第 136 頁）

載有这一重要消息的这本“主要著作”³³⁶，出版于 1859 年 12 月。但在八个月以前，即在 1859 年 5 月，这位“圓滿的人物”在

① 克拉林：他胡說八道；
 ……他給自己擦上
 硫磺膏。

（卡德龙“神奇的魔术师”第二幕）。——編者注

② 文字游戏：《abgerundete Natur》既可理解为“身体肥胖的人物”，也可理解为“智力成熟的人物”；海尔曼律师用的是后一意义。——編者注

俾尔“商业信使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³³⁷，这篇文章应当看成是上述更为冗长的“历史故事”的纲要。我们不妨来看一看原来的文字：

俾尔“推销员”这样写道：“从1849年革命发生转折时起，有一帮流亡者逐渐在伦敦聚集，其成员当(!)时在瑞士流亡界以制刷匠帮，或硫磺帮著称。他们的首领是马克思，即科伦‘莱茵报’的前编辑，他们的口号是社会共和国、工人专政，他们的职业是组织同盟和策划密谋。”（这段话又转载在“主要著作”中。第三编，文件第7号，第31、32页）

这帮“在瑞士流亡界”以硫磺帮著称的流亡者，过了八个月以后，在更多的人面前，竟变成了“散居在瑞士、法国和英国”的一大伙人，而且“在流亡者中间”都以硫磺帮著称了。这是卡尔·福格特的老祖宗、不朽的约翰·福斯泰夫爵士^①兴高采烈地讲述的那个关于草绿色麻布衣的老故事。这位爵士现在又借卡尔·福格特的肉身还魂了，而且丝毫也未减当年的风韵。从俾尔“推销员”的原来的文字中可以看出，无论硫磺帮或者制刷匠帮，都是瑞士的土产。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看它们的发展史吧。

我从朋友们那里得知，在1849年到1850年间，的确有一个取名硫磺帮的流亡团体曾在日内瓦盛极一时；并且得知，伦敦西蒂区有一位著名商人西·路·波克罕先生能够提供有关这个独特团体的发生、发展和瓦解的详细细节，于是我就在1860年2月写信给这位我当时还不相识的先生，会面之后，我真的从他那里得到了下

① 见莎士比亚“亨利四世”前篇第二幕第四场。（福斯泰夫在讲述他同一帮恶棍进行械斗的虚构故事时，每提到一次，就把对方的人数加以夸大，而且由于吹嘘得得意忘形，竟一会儿说对方穿的是草绿色衣服，一会儿又说对方穿的是麻布衣服。）——编者注

列扼要材料,現在我把它照抄如下:

“1860年2月12日于倫敦

万茲沃斯路林苑协会18号

敬爱的先生:

尽管我們九年来都住在同一个国家里,而且大部分時間还住在同一个城市里,但是三天以前我們还互不相識。不过您的設想是完全对的:我不会拒絕向您这位流亡中的难友提供您所希望获得的材料。

那末,現在我就來談談**硫磺帮**。

1849年,我們起义者离开巴登以后,有一些年輕人很快就到了日内瓦,其中有的是被瑞士当局送到那里去的,有的是自願去的。这是一些大学生、士兵或者商人,有的在1848年以前在德国就是朋友,有的是在革命时期互相結識的。

当时流亡者的心情很不愉快。所謂的政治领导者彼此推卸失敗的責任。軍事领导者为了退却中的进攻、側敌运动和进攻中的退却而相互責难。流亡者彼此罵对方是資產階級共和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大家都发傳单,这种傳单絲毫无助于使大家平靜下来。仿佛到处都是奸細。除此而外,大多数人的衣着都破烂不堪,而且許多人都面帶飢色。上述年輕人,就在这种可悲的情况下,結成一个亲密的小团体。这些人是:**爱德华·罗森勒魯姆**,一个出生在敖德薩的德国人;曾在萊比錫、柏林和巴黎学过医;

麦克斯·康海姆,弗勞施塔特人,商业職員,革命爆发时是近卫軍炮兵里为期一年的志願兵;

科尔恩,柏林的化学技工、药剂师;

貝克尔,萊茵区的工程师;还有**我本人**。我于1844年在柏林維爾戴中学毕业以后,就在布勒斯勞、革利夫斯瓦特和柏林上大学;1848年革命前夕,我在故乡(格洛高城)当炮手。

我想,当时我們没有一个人超过24岁。我們彼此住得很近,有一个时期,甚至全住在大草地街的同一家房子里。在这个小国家里,很少有机会找到职业,因此,我們的主要任务就是不要因流亡者的普遍貧困而苦恼和沮丧,不要抱有政治上麻木不仁的情緒。气候和自然景色都是非常宜人的,——我們并不否认我們勃兰登堡的过去,我們认为 die Jugend jottvoll [这个地

方是天堂〕^①。我們当中誰要有什么东西，就是大家共有的，如果我們全都一无所有，那我們就会找到一些好心腸的小飯館老板，或者別的好心人，他們一看到我們这些年輕人如此乐观，都乐于賒一点东西給我們。大概我們这些人都显得非常老实而又如痴如狂的緣故吧！在这里，应当以感激的心情提到‘欧罗巴’咖啡店老板伯尔登，他不仅真正是源源不断地‘貸款’給我們，而且还‘貸款’給德国和法国的其他許多流亡者。1856年，在离开了六年以后，我从克里木回来的途中訪問了日內瓦，去偿还我欠他的債務，这只不过是為了向他表示我这个善心的‘浪子’的謝意。这位好心的又肥又胖的伯尔登感到很惊奇，他要我相信，我是給他这种愉快的第一个人，虽然他會借給流亡者一两万法郎，而这些人早已被放逐到四面八方去了，可是他一点也不感到懊悔。他非常热情地問起我的一些密友的情况，但并没有提起債務問題。可惜我能够告訴他的却很少。

言归正傳，我現在还是回头来談 1849 年。

当时我們常常暢怀痛飲和尽情高歌。我記得，我們的座上有过各种不同政治色彩的流亡者，其中包括法国人和意大利人。在这种 *dulci júbilo*〔亲密无間的欢乐气氛〕中度过的愉快夜晚，大家都觉得是整个流亡生活荒漠上的綠洲。有些当时已經是日內瓦州大会議議員或者后来成了議員的朋友們，有时也来参加我們的酒宴，借以休息一番。

目前正在此地的李卜克內西，九年中我只在街上偶然碰見過三四次，当时也常常同我們在一起。有些大学生、博士、过去的中学同学和大学同学，在假期旅行期間，他們往往同我們一起喝酒，往往喝不少杯啤酒和好几瓶物美价廉的馬康葡萄酒。我們有时竟整天整天地、甚至整周整周地在日內瓦湖上遨游而不登岸。我們高唱情歌，手彈吉他，在靠薩瓦或瑞士湖畔的別墅窗前‘討取欢心’。

应当承认，我們这些血气方剛的青年人有时不免干出荒唐的越軌事情来。在这样的时候，那位非常好的、現已去世的阿伯特·加果尔——日內瓦公民法济的一位有点名气的政敌，就用极其友好的語气告誡我們。他說：‘你們真是一些发了瘋的小伙子。不过說实在的，你們在这种毫无乐趣的流亡生活中还能保持这种愉快心情，說明你們的身体并没有变弱，你們的精神并没

^① 柏林方言。——編者注

有顏唐。这可需要相当大的韧性。’这算是这位好心人对我们的最严厉责备了。他当时是日内瓦州大会議議員。

至于决斗，据我所知，只有过一次，那是我同一位 R...n 先生用手枪进行的。但是，决斗的原因根本不是政治性的。我的助手是日内瓦的一位只会讲法語的炮兵，而公证人则是年轻的奥斯卡尔·加累尔，即上述的那位大会議議員的弟弟，可惜他在慕尼黑上大学时，因患伤寒而早逝了。罗森勃魯姆和一位巴登的流亡者——馮·F...g 中尉之間，本来也有一次决斗，但也不是政治性的；这个馮·F...g 中尉后来很快就返回祖国，大概又参加了重建的巴登軍隊。由于恩格斯先生——大概就是那位据说目前住在曼彻斯特、而我从那时以后就不曾见过面的恩格斯先生，——的調解，这次糾紛在进行决斗的当天早晨、没有开始行动以前就順利解决了。这位恩格斯先生当时路过日内瓦，我們在同他的愉快交往中喝了不少瓶酒。要是我没有記錯的話，我們同他会晤之所以感到特別愉快，就是因为我們能够支配他的錢袋。

我們既沒有附和所謂‘藍色的’或者‘紅色的’共和党党魁，也沒有附和社会主义的或者共产主义的政党首領。我們让自己自由而独立地去判断——我并不认为这种判断始終是正确的，——那些帝国摄政、法兰克福議會議員以及其他清談館成員、那些革命的將軍和軍士或者共产主义的达賴喇嘛的政治手腕，我們甚至为此目的，也为了寻开心，創辦了一家周报，报名是：

‘喧 声’

游民群 [Lausbubokratie]① 机关报

这家报纸只出了两期。后来，当法国把我抓起来要驅逐我到这里来的时候，法国警察当局沒收了我的全部文件和日記本，因此我現在已經記不清楚，报纸是因缺乏經費自行停刊的呢还是被当局查禁的。

‘凡夫俗子們’——他們之中有所謂資產階級共和派分子，也有所謂共产主义工人队伍中的人，——給我們起了**硫磺帮**这样一个綽号。有时候，好像

①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这个綽号是送給德国的某一个小議院中或者法兰克福議会中的所有自由主义政党的。我們想永远保存这个綽号。”（波克罕）

我們自己也这样称呼自己。不过无论如何，我們团体仅仅采取了这个德文名詞的敦厚意义。我現在还同一些被驅逐出来的同志和福格特先生的朋友，还同其他一些曾經是、也許現在还是您的朋友的流亡者，保持着非常友好的关系。但我感到高兴的是，我还从来没有听到过有人輕蔑地評論我所提到的**硫磺帮**的成員，無論在政治方面还是在他們的私生活方面都是如此。

这是我唯一知道的一个**硫磺帮**。它在1849—1850年存在于日内瓦。1850年年中，这个危險团体的寥寥无几的成員，除**科尔恩**外，都被迫离开瑞士，因为他們被列为应被驅逐的一类流亡者。从此我們的**硫磺帮**就不再存在了。其他地方是否有过别的**硫磺帮**，究竟在什么地方以及它們的目的是什么，——我都一无所知。

科尔恩大概留在瑞士，在那里当药剂师安家落戶了。**康海姆**和**罗森勃魯姆**，在霍尔施坦的伊德施太特之战前夕离开了。他們两人大概都参加了这场战斗。后来，他們于1851年到美国去了。罗森勃魯姆于同年年底回到英国，于1852年前往澳大利亚；从1855年起，我就再沒有从該地得到过有关他的点滴消息。据說，**康海姆**已經在‘紐約幽默家’担任了一个时期的編輯。**貝克尔**也在当时，即在1850年到美国去了。他現在怎么样了，可惜我不知道底細。

我本人是在巴黎和斯特拉斯堡度过1850年—1851年冬季的。上面已經提到，1851年2月法国警察当局用暴力把我驅逐到英国，而且在三个月当中，把我轉移了25个監獄，在途中，經常給我帶上沉重的铁鐐銬。我把在英国居住的第一年用来学了英語，接着就經商。我对祖国的政治事件时刻都兴趣盎然，但我始終不參與政治流亡团体的任何图謀。我日子过得还不错，或者像英国人所說的：very well, sir, thank you!〔好极了，先生，謝謝您！〕如果您一定要把这段冗长的而且絕不是很有教益的历史看一遍，那得怪您自己了。

順致敬意

忠实于您的

西吉茲蒙特·路·波克罕”

这就是**波克罕**先生的信。也許**硫磺帮**預感到自己在历史上的重要性，所以預先就用木刻把自己的戶籍登記表放进这本历史书

里去,也就是說,在“喧声”报的第一号上刊登了它的創辦人的肖像。

硫磺帮的出类拔萃的先生們,曾經参加 1848 年 9 月司徒卢威领导的共和派起义,后来被关进布魯赫薩尔監獄,一直到 1849 年 5 月,最后当兵参加了维护帝国宪法运动的战斗,結果被赶到瑞士境內。³³⁸ 1850 年,硫磺帮的两位主角——康海姆和罗森勃魯姆到了倫敦,“聚集”在古斯塔夫·司徒卢威先生的周圍。我不曾有同他們結識的荣幸。从政治上說,他們同我是有接触的,因为当时他們企图在司徒卢威领导下成立一个委员会,来同当时由我、恩格斯、維利希等人所领导的倫敦流亡者委员会³³⁹ 相抗衡。順便提一下,該委员会发表的敌視我們的声明,是由司徒卢威、罗森勃魯姆、康海姆、博布秦、格隆尼希和奧斯渥特签署的,并曾在柏林“晚邮报”上发表过。

在神圣同盟全盛时期,燒炭帮(燒炭党人)³⁴⁰ 曾經是警察活动和貴族幻想的淵藪。我們帝国的高亮都亚,为了德国資產階級的更大利益,是否想按照燒炭帮的方式去利用硫磺帮呢?要是再有一个硝石帮多好,那就可以完成警察的三位一体了。卡尔·福格特也許不喜欢硫磺,因为他非常討厭火药味。或者他就像某些病人一样,憎恨特效药的吧?大家知道,庸医拉德馬赫尔是按照治病的药来区分病的。³⁴¹ 如此說来,海尔曼律师在奥格斯堡地方法院对他的委任人的称呼——“圓滿的人物”,拉德馬赫尔所說的“綳得像一面鼓似的肚子”,而更为著名的大夫菲沙尔特叫做“法国式大肚子”^① 的东西,都該归入硫磺病之列了。这样一来,一切福斯泰夫的天性就不只是在—个方面受到硫磺病的折磨了。或許福格特

① 約·菲沙尔特“关于格朗果施、高亮都亚和龐大固埃諸英豪和老爷的業績与名言的惊險长篇历史故事”第 6 章。——編者注

的动物良知提醒他：对疥虫来说，硫磺就意味着死亡，因而多次改变自己皮肤的疥虫是特别厌恶硫磺的吧？最新的研究证明，只有经过蜕皮的疥虫才有繁殖力，从而达到自觉。一方面是硫磺，另一方面是达到自觉的疥虫，真是妙不可言的矛盾！但不管怎样，福格特有责任向他的“皇帝”和德国自由资产者证明：“从1849年革命发生转折时起”，一切不幸都是由日内瓦的硫磺帮造成的，而不是巴黎的十二月帮³⁴²造成的。为了惩罚我多年来对“十二月十日帮”首脑和成员们的粗暴攻击，我得把我封为被他搞得非常臭的、在他的“主要著作”问世以前我毫不知悉的硫磺帮的头目。为了使“令人喜欢的交谈者”的义愤易于为人理解起见，我在这里从我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引述有关“十二月帮”的某些片断（见该书1852年纽约版第31、32和61、62页）。

“这个帮³⁴³在1849年就成立了。它名义上是个慈善团体，实际上是由巴黎流氓无产阶级组成的一些秘密团体，每一个团体都由波拿巴的走狗们领导，总领导人是一个波拿巴派的将军。在这个帮里，除了一些来历不明和生计可疑的贵族中的破落放荡者之外，除了资产阶级可憎的败类中的冒险分子之外，还有一些流氓、退伍的士兵、释放的刑事犯、脱逃的劳役犯、骗子、卖艺人、游民、扒手、玩魔术的、赌棍、私娼狗腿、妓院老板、挑夫、做短工的、拉琴卖唱的、拣破烂的、磨刀的、镀锡匠、叫化子，一句话，就是随着时势浮沉流荡而被法国人称做 *la bohème* [浪荡游民] 的那个五颜六色的不固定的人群。波拿巴把这些跟他同类的分子组成十二月十日帮，即‘慈善会’的核心，因为它的所有成员都像波拿巴一样感到自己是需要靠国内的劳动群众来周济。

这个波拿巴是流氓无产阶级的首领，他只有在这一阶级身上

才能找到他自己的个人利益的大量反映，他把这些由所有各个阶级中淘汰出来的渣滓、残屑和糟粕看做他自己绝对能够依靠的唯一的阶级，这就是真实的波拿巴，这就是 sans phrase〔不加掩饰的〕波拿巴。甚至到后来，当他成了全能者，对他的一部分旧时的同谋者进行清洗，把他们同革命者一起流放到凯恩去的那时候，也仍然是这个样子。他这个老奸巨猾的痞子，把各国人民的历史生活和这种生活所演出的一切悲剧，都看做最鄙俗的喜剧，看做专以华丽的服装、词藻和姿势掩盖最鄙陋的污秽行为的化妆跳舞会。例如，在进攻斯特拉斯堡时，一只受过训练的瑞士兀鹰就扮演了拿破仑之鹰的角色。当他在布倫登陆时，他给几个伦敦僕役穿上了法国军装，于是他们就儼然成了军队。³⁴⁴ 在他的十二月十日帮中，有一万个游手好闲分子应该装做人民，正像聶克·波頓应该扮演狮子^①一样……

十二月十日帮是波拿巴特有的一种党派战斗力量；它对于波拿巴的意义，正如国家工厂对于社会主义工人，别动队³⁴⁵ 对于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意义一样。在他巡游期间，这个帮的成员们成群地聚集在沿途各火车站上，装做迎驾的群众，表示人民的热情，高叫«Vive l'Empereur!»〔“皇帝万岁！”〕，侮辱和殴打共和党人，——所有这些，当然都是在警察保护下干出来的。当他回到巴黎时，这些人就充当了前卫，防止或驱散敌对性的示威游行。十二月十日帮属于他，它是他创造出来的，是完全出自他自己的主意。在其他一切方面，他硬加在自己身上的东西，都是由于情势关系落到他手中的；他所做的一切，都不过是情势替他做好或者是他模仿别人的

① 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第一幕第二场。——编者注

行为罢了。他公开地对资产者大打其关于秩序、宗教、家庭、财产的官腔，暗地里却依靠着舒夫特勒和斯皮格尔勃一流人的团体，依靠无秩序、卖淫和偷窃的团体，这是波拿巴的本色，而十二月十日帮的历史便是他本人的历史……

波拿巴想要扮演一切阶级的家长似的恩人。但是，他要是不能从一个阶级取得一些什么，就不能给另一个阶级一些什么。正如吉兹公爵在弗伦特党时期由于曾把自己的一切财产变成他的党徒欠他的债务而被称为法国最该受感激的人一样，波拿巴也想做法国最该受感激的人，把法国所有的财产和所有的劳动都变成欠他个人的债务。他想窃取整个法国，以便将它再赠给法国，或者更确切些说，以便能够用法国钱再来购买法国，因为他作为十二月十日帮的头目，就不得不收买应归他所有的东西。于是所有一切国家机关、参议院、国务会议、立法团、法庭、荣誉军团勋章、士兵奖章、洗衣房、公共工程、铁路、没有士兵的国民自卫军参谋部以及被没收的奥尔良王室财产，都成了买卖对象。军队和政府机器中的每一个位置，都成了收买的手段。

然而在这种先把法国攫取过来，然后再把它交给法国自己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东西还是在流通时流到十二月十日帮的头目和成员的腰包里去的利息。莫尔尼先生的情妇伯爵夫人勒·，对没收奥尔良王室财产一事曾说过这样一句俏皮话：«C'est le premier vol de l'aigle»[“这是鹰的最初的飞翔”]①，这句俏皮话，对于这只无宁说是乌鸦的鹰的每一次飞翔都可以适用。一个意大利的卡尔斯特派僧人曾对一个夸耀地计算自己还可以受用多年的财产的守

① «vol» 这个字有两个意思：飞翔和盗窃。（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上加的注。）

財奴說過: «Tu fai conto sopra i beni, bisogna prima far il conto sopra gli anni» [“你总是計算你的財產, 但你最好是先計算一下你的年岁吧”] ① 波拿巴和他的信徒每天都对自己說这句话。为了不致算錯年月, 他們把每分钟都計算进去。

钻进宮廷, 钻进內閣, 钻进行政机关和軍隊的上层去的是一群連其中最好的一个也来历不明的流氓, 是一群吵吵嚷嚷的、声名狼籍的、貪婪的浪蕩者。他們穿着华丽的衣服, 装出儼如苏路克的高官显宦那样可笑的庄严的样子。如果我們注意到, 維隆-克勒維尔 ② 是十二月十日帮的道德守护者, 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是它的思想家, 那末, 我們对这个帮的上层人物就能有个清楚的概念了。基佐主持內閣的时候, 曾在一家地方小报上利用这个格朗尼埃作为攻击王朝反对派的工具, 并且通常都給他如下的好評: «C'est le roi des drôles», ‘这是丑角之王’。如果把路易·波拿巴的朝廷及其朋党拿来跟摄政时期³⁴⁶ 或路易十五統治时期的朝廷相提并論, 那是不公正的。因为‘法国已不止一次地有过姘妇的政府, 但是从来还没有过面首的政府’ ③……

波拿巴既被他的处境的自相矛盾的要求所折磨, 并且他作为一个魔术师不得不以日新月異的意外花样吸引观众把他看做拿破侖的替身, 換句話說, 就是不得不每天举行小型的政变, 于是他就使整个資產階級經濟陷于全盘混乱状态, 侵犯一切在 1848 年革命

① 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上加的注。

② 巴尔扎克在其長篇小說“貝姨”中, 把克勒維尔描繪为最淫乱的巴黎庸人, 这个克勒維尔是以“立宪主义者报”报社主人維隆博士为模特儿描摹出来的。(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上加的注。)

③ 德·日拉丹夫人的話。(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上加的注。)

中看来是不可侵犯的东西，使一些人对革命表示冷淡而使另一些人奋起进行革命，以奠定秩序为名而造成真正的无政府状态，同时又抹去整个国家机器的圣光，瀆犯它，使它成为可厌而又可笑的东西。他模仿礼拜特利尔教堂中的圣衣的仪式³⁴⁷ 来在巴黎布置礼拜拿破侖皇袍的仪式。但是，如果皇袍终于落在路易·波拿巴身上，拿破侖的銅像就将从旺多姆圓柱頂上被推下来。”³⁴⁸

二 制 刷 匠 帮

«But, sirrah, there's no room for faith,
truth nor honesty, in this bosom of thine;
it is all filled up with guts and midriff».

(*Shakespeare*)^①

我們在俾尔的原始福音书中讀到：“制刷匠帮或硫磺帮”（“主要著作”，文件，第 31 頁）。我們在“主要著作”中看到：“硫磺帮或者也称制刷匠帮”（第 136 頁）。

从这两种說法来看，硫磺帮和制刷匠帮是一个帮。但是我們已經知道，硫磺帮在 1850 年年中已死亡了，消逝了。那末，制刷匠帮也該消逝了吧？“圓滿的人物”是十二月帮的文明傳播者，而文明同野蛮的區別，用傅立叶的話來說，就在于用复杂的謊言代替簡單的謊言。

这位“复杂的”帝国的福斯泰夫同我們談到了（“主要著作”第 198 頁）一位阿布特，他把他叫做“卑鄙中的最卑鄙的”。福格特对自己用的是原級形容詞，对他的阿布特用的却是最高級形容詞，因而在某种程度上把阿布特升为自己的奈元帅了，这真是了不起的

^① “可是，坏蛋，在你的胸膛里，沒有信义、忠誠和正直的地位，它只是充滿了臟腑和橫隔膜。”（莎士比亚“亨利四世”前篇第三幕第三場）。——編者注

谦逊！当福格特的原始福音书在俾尔“推銷員”上出現的时候，我曾請“人民报”³⁴⁹編輯部不加任何評論地轉載这一原始誹謗书。但編輯部仍然給它加了下列附注：

“上載誹謗书，出自一个名叫**阿布特**的墮落家伙之手。八年前日內瓦德国流亡者公意法庭一致认为他干过各种不名誉的勾当。”（1859年6月11日“人民报”第6号）

“人民报”編輯部认为**阿布特**是福格特的原始誹謗书的作者；它忘記了瑞士有两个里士滿在戰場上³⁵⁰，——除了**阿布特**以外，还有一位**福格特**。

可見，这位“卑鄙中的最卑鄙的”在1851年春发明了他的制刷匠帮，福格特在1859年秋从他的元帅那儿把它偷了过来。他本能地把他那可爱的剽窃习气，从編纂博物学轉移到警探式的著书立說。有一个时期，领导日內瓦工人协会的是一个制刷匠[Bürstenmacher] **藻倫海美尔** [Sauernheimer]。阿布特截取了藻倫海美尔的职业的一半和姓氏的一半，——即截取了职业的前一半和姓氏的后一半——用这两个半截巧妙地拼湊成一个名詞：制刷匠帮 [Bürstenheimer]。起初他除了用这个綽号称呼**藻倫海美尔**以外，还用它来称呼藻倫海美尔的密友：**波恩的康姆**，职业是制刷匠；**宾根的拉尼克尔**，职业是装訂帮工。他把**藻倫海美尔**封为制刷匠帮的將軍，把**拉尼克尔**封为副官，把**康姆 sans phrase** [直截了当地]封为一名制刷匠帮成員。后来，当身为日內瓦工人协会会员的两个流亡者**伊曼特**（現在丹第一个中学里任教）和**席利**（先在特利尔当律师，現在巴黎当律师）促使公意法庭把**阿布特**开除出协会的时候，**阿布特**发表了一篇滿紙謾罵的攻击文，把整个日內瓦工人协会都提升为制刷匠帮的高官显貴。这样，我們便看到了一般的制

刷匠帮和特殊的制刷匠帮。属于一般的制刷匠帮的有日内瓦工人协会，走投无路的福格特曾经从它那里骗取了一份 *testimonium paupertatis* [贫困证明书] 在“总汇报”上发表，并且曾经在席勒纪念会上和罗伯特·勃鲁姆纪念会上（1859年）对之磕头作揖。属于特殊的制刷匠帮的有我提到过的那位我素不相识、从未去过伦敦的藻伦海美尔；被逐出日内瓦、后来经伦敦赴美国的康姆（然而他在伦敦探望过的并不是我，而是金克尔）；最后是那位非驴非马的拉尼克尔，他作为制刷匠帮的副官留在日内瓦，“聚集”在“圆满的人物”的周围。的确，他亲自充当福格特的无产阶级。因为以后我还得回头来谈这位拉尼克尔，所以暂时只初步提供一些有关这个怪物的情况。拉尼克尔是伯桑松流亡者兵营中的一员，黑克尔的进军失败之后，这个兵营由维利希指挥。³⁵¹ 他在维利希的指挥下参加了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后来同维利希一起逃往瑞士。维利希是他的共产主义的穆罕默德，后者原要用火和剑来建立一个千年王国。拉尼克尔是一个爱慕虚荣、夸夸其谈、忸怩作态的花花公子，比暴君还要残暴。在日内瓦，他在盛怒时会疯狂地反对过“议员们”，他还作为新的退尔，特别威胁要“杀死州官”。但是，当瓦洛，这个三十年代的流亡者和福格特的总角之交，把他领进福格特家里的时候，拉尼克尔的凶残的情感却一变而为 «the milk of human kindness» [“人情的乳臭”]^①。像席勒所说的：“这小子是州官手下的”^②。

制刷匠帮的副官成了福格特将军的副官；福格特将军之所以

① 莎士比亚“麦克佩斯”第一幕第五场。引自麦克佩斯夫人在谈到麦克佩斯时说的话：“你充满了人情的乳臭”。——编者注

② “威廉·退尔”第一幕第四场。——编者注

在軍事上未享盛名，只是因为普隆-普隆认为那不勒斯的烏洛阿大尉(by courtesy〔由于礼貌〕甚至被称为將軍)在执行普隆-普隆的«corps de touristes»〔“旅行团”〕在意大利远征中所担任的任务方面，也是够糟糕的，而把他的巴洛留在預备队內，以便进行寻找“失去的战鼓”的大冒險，即将要在萊茵河畔进行的大冒險³⁵²。1859年，福格特把他的拉尼克尔从无产者等級提升为資产者等級，帮他搞了一家商店(专营艺术品、装訂、文具)，此外还保证他得到日內瓦政府的訂貨。制刷匠帮的副官成了福格特的«maid of all work»〔“打杂的女僕”〕、义务听差、密友、列保莱罗、心腹、采訪員、造謠家、告密者，而尤其在脑滿腸肥的杰克^① 堕落之后，又是他的暗探和波拿巴在工人中間的招募人。据瑞士一家报纸不久前报道，有人发现了第三种刺蝟，即兰刺蝟或萊茵刺蝟，它具有狗刺蝟和猪刺蝟的双重特性，是在阿尔夫河畔的巢穴中、洪堡-福格特的田庄上发现的。这种兰刺蝟同我們的拉尼克尔有没有关系呢^②？

Nota bene〔請注意〕：唯一同我有过联系的日內瓦的流亡者，是“新萊茵报”³⁵³ 前編輯部同仁、目前在利物浦經商的恩斯特·德朗克博士，他对制刷匠帮是采取否定态度的。

我对伊曼特和席利的下列信件，只想談这么几句：伊曼特在革命爆发时离开大学，当志願兵参加了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战争。1849年，在席利和伊曼特领导下襲击了卜留姆軍械庫³⁵⁴；他們带着从那里夺得的武器和自己的队伍到了普法尔茨，参加了維护帝

① 在莎士比亚笔下，酒友們把約翰·福斯泰夫爵士叫做杰克。——編者注

② 这是无法翻譯的文字游戏：一方面，德文里«Ran-Igel»(“兰刺蝟”)这一个詞同Ranickel(拉尼克尔)这一名字的語音近似；另一方面，德文里的«Schweini-gel»这一个字有两重意义：“猪刺蝟”和“卑鄙的东西”。——編者注

国宪法的军队。1852年夏初，他們被逐出瑞士，来到了倫敦。

“1860年2月5日于丹第

亲爱的馬克思：

我不明白，福格特怎能把你同日内瓦的事件扯在一起。那里的流亡者都知道，在我們这些人当中，只有德朗克同你有联系。硫磺帮在我去以前就有了，我唯一記得与之有关的一个人是波克罕。

人們把日内瓦工人协会会员們叫做制刷匠帮。这个名称是阿布特取的。协会当时是維利希秘密同盟的苗圃，我是这个同盟的主席。在有許多流亡者参加的工人协会根据我的建議认为阿布特无耻，并宣布他不配同流亡者和工人們交往以后，他急忙发表了一篇誹謗书，攻击我和席利犯了极其荒唐可笑的罪行。在这以后，我們在另一个地方，而且在完全另一些人的参加下重新审查了这件事情。我們要求阿布特证实他对我們进行的攻击，他拒絕了。邓策尔沒有要我或席利进行任何辯护，就提議宣布阿布特是个无耻的誹謗者。这个提議再次获得一致通过。参加这次流亡者會議的，几乎全是議員。很抱歉，我写的材料很不完全，但八年来我回忆这件骯髒事还是第一次。我不願受罪去写这类事情，如果你居然能插手这类骯髒东西，那我将不胜惊奇。

再見！

你的 伊曼特”

有一位俄国名作家^①在日内瓦逗留期間同福格特过从甚密，他用上信結尾的精神給我写了一封信。

“1860年5月10日于巴黎

亲爱的馬克思：

我从发表在‘現代評論’上的爱德华·西蒙的文章³⁵⁵中看到了誹謗您的謔言，深感憤怒。特別使我感到惊奇的是，我原认为既不愚蠢也不凶恶的福格特，道德上竟墮落到了像他在他的小册子里所暴露出来的那样深的地步。我不需要任何证明，就深信您是不会玩弄卑鄙齷齪的陰謀的；而且，尤其使我感到痛心的是，发表这些謔言，正好是在这样的時候：您正賜給学术界一部杰

^① 尼·伊·薩宗諾夫。——編者注

出的著作³⁵⁶（它的使命是改造經濟科学、使之建立在新的更坚实的基础上）的第一部分…… 亲爱的馬克思，請別理会这类下賤勾当；一切严肃认真的、一切有良心的人都站在您一边，但他們期待于您的不是徒劳无益的論战，而完全是別的东西，——他們希望能够尽快地讀到您的出色著作的續編。您的成就在有思想的人中間享有崇高威望；如果有关您的学說在俄国得到广泛傳播的消息能使您感到愉快，那我現在願意告訴您：今年年初，某教授^①在莫斯科举行了一系列关于政治經濟学的公开讲演，第一次讲演就是介紹您最近发表的著作。給您寄上一份‘北方日报’，您可以看出您的名字在我的祖国受到多大重視。再見了，亲爱的馬克思，珍惜您的健康，像往常一样地工作以开导世界，而不要去理会那些瑣碎的蠢事和卑劣的行为。請相信一个忠实于您的人的友誼……”^②

匈牙利前部长瑟美列也写信对我說：

«Vaut-il la peine que vous vous occupiez de toutes ces bavardises?»[“您是否值得去理睬这类流言蜚語呢?”]。

尽管有这类劝告，我为什么还要去插手——用伊曼特的有力的話來說，——福格特的这类骯髒东西呢？这一点，我在本著作的前言中已經簡單地談到了。

現在我們还是回头來談制刷匠帮。現在我把席利的信照抄在下面，包括同“骯髒事情”无关的东西。但是我刪去了有关硫磺帮的部分，因為我們从波克罕的信中已經知道了。此外，我还要給往后的叙述留下几处地方，因为我必須把“我的令人喜欢的題目”搞得相当巧妙，所以我不想一下子就把全部秘密都道破。

“1860年2月8日于巴黎拉斐德路46号

亲爱的馬克思：

从你上月31日的来信中，我得到了有关你的直接消息，感到很愉快；我

① 伊·康·巴布斯特。——編者注

② 薩宗諾夫的信是用法文写的，在手稿里馬克思引用的是法文原文。——編者注

本来就打算 *proprio motu* [主动地] 把你所关心的有关日内瓦事件的必要情况写信告诉你的，现在我就更加乐于这样做了。当我们偶然谈到这一点时，我和所有在日内瓦的熟人的第一个想法都像你信中所写的那样，认为福格特把你同你毫不相识的人攪在一起了。因此，为了维护真理，我应当把有关制刷匠帮，硫磺帮等等的情况告诉你。这样一来，你就会明白你提出的两个问题：‘(1) 制刷匠帮是些什么人，他们是干什么的？(2) 硫磺帮是什么，由什么样的人组成，他们是干什么的？’提得正好。但是首先，我要责备你颠倒了前后次序，因为按照次序，硫磺帮应在前面。如果福格特想用魔鬼去吓唬德国的庸人，或者用燃烧的硫磺去烧灼他们的脑袋，同时借此‘寻开心’，那他确实可以找到比这些毫无恶意的、心情愉快的酒馆常客更好的魔鬼来充当这类角色。我们老一代的日内瓦流亡者毫无恶意地把这帮酒馆常客戏称为硫磺帮，而他们也非常善意地接受了这个绰号。这是繆斯的一帮快活的学生，他们在德国南部的各次起义和后来的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中应过 *examina* [考试] 并进行了 *exercitia practica* [实习]，而在失败之后，便同他们的红色科学的主考人和教师一道在日内瓦聚集力量，准备新的战斗……不言而喻，根本没有到过日内瓦的人或在硫磺帮垮台以后才到日内瓦的人，是决不能把他们归入这个帮的。这个帮纯粹是当地的而且是转瞬即逝的一朵花（其实可以把这一升华物称做硫华），但是，大概由于它的‘喧声’报所散发的革命气息，对瑞士联邦的神经来说是过于强烈的一种气味吧，因此德律埃吹了一口气，这朵花就四处飞散了。很久以后，阿布特才到了日内瓦，又经过好几年，舍尔瓦尔也到了那里，他们‘各行其是’地散发着芳香，但决不是如福格特所说的那样，是在那早已雕零、早已枯萎和早被遗忘的花束中散发着芳香的。

硫磺帮的活动可归纳为这样一句话：**在主的葡萄园里劳动**。此外，他们还编辑自己的‘喧声’报，报上的题词是：**‘留在土地上靠微红的东西过活’**^①。他们在自己的报纸上巧妙而幽默地嘲笑上帝和世人，揭露虚伪的预言家，鞭笞议员们 (*inde irae* [由此招怒]^②)，同时，无论对自己或是对我们这些客

① 这里套用了圣经上的说法：把 *redlich* (诚实的) 改成 *rötlich* (微红的、微红的东西)。——编者注

② 尤维纳利斯的第一首讽刺诗。——编者注

人都不留情，并且以无可争辩的善意和公正，把一切的一切，朋友或敌人都加以漫画化。

他们同你毫无关系，也不曾穿过你的“鞋(会)”³⁵⁷，这是用不着对你说的。但是我也不能对你隐瞒，这种鞋也不会合他们的心意。他们这帮革命的雇佣兵，暂时踩着战事沉寂的拖鞋，等待革命把他们重新激发起来，并把革命的厚底靴（坚决前进的千里靴）再发给他们。而谁要是敢于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工人专政等等去打搅他们的 *siesta* [午休]，那他准会大倒其霉。天啊！他们所干的那件工作，至多需要一个主持狂饮的人，而他们的经济课就是围着酒瓶和它的微红的东西团团转。有一次，一个常同他们一起的奥登林山的可敬的铁匠巴克菲施曾经说过：‘劳动权利当然是好事情，但让劳动义务见鬼去吧！’……

因此，还是让我们把那块被如此不恭地掀开了的硫磺帮的墓碑放回原处吧。说实在的，为了防止以后再有人玷辱硫磺帮的陵墓，应当有一位哈菲兹出来朗诵《*Requiescat in pace*》[“愿它得到安息”]。但是由于没有这样一个人来唱这样一支歌，于是‘他们全都闻过火药味’这句话将成为他们的 *proviatico et epitaphio* [挽歌和墓志铭]，而他们的那位亵渎神圣的历史编纂者却只不过嗅过硫磺味而已。

当制刷匠帮出现的时候，硫磺帮的成员已仅仅存在于传说中，存在于日内瓦市僧们的注册簿上和日内瓦美人儿的心上了。制刷匠和装订工藻伦海美尔、康姆、拉尼克尔等人同阿布特吵了架；因为伊曼特、我和其他人热烈支持他们，于是我们就引起了阿布特的仇视。为此，阿布特被邀参加一次全体会议，流亡者和工人协会作为 *cour des pairs* [贵族法院] 甚至作为 *haute cour de justice* [最高法院] 参加了这一会议。他出席了这一会议，在会上他不仅不坚持他对许多人的攻击，而且直截了当地声称攻击是他捏造的，对他的敌手们来说，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最后他还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在阿布特勇敢地对这一套报复手法进行了辩护，并一再企图使高等法官们相信这套手法的实际作用之后，有人提出了控告他的证据；在这以后，会议断定他进行了恶意诽谤，并且揭露他犯了其他过错，因此判决把他开除。En revanche [为了报复]，他就把高等贵族——最初只是上述的手工业者，——取名为制刷匠帮。你知道，这是上述那个藻伦海美尔的职业和姓氏的一种成功的结合，因而你应当把藻伦海美尔尊崇为制刷匠帮的老祖宗，

但是，你却无权把你自己算做这一族的成員或者归附这一族，不管它是行会或是貴族等級。因为你知道，他們当中从事‘組織革命’的那些人，并不是你的信徒，而是你的敌人。他們把維利希尊崇为天父，或者至少尊崇为羅馬教皇，而把你看做是反基督者或羅馬教皇的敌人，因此，曾經是你在日內瓦教区的唯一拥护者和 *legatus a latere* [特使] 的那个德朗克，除酒会（他在这种会上 *primus inter pares* [在同輩中数第一]）而外，不能参加任何會議。但是，制刷匠帮和硫磺帮一样，純粹是一种曇花似的東西，也被德律埃一口大气吹散了。

阿加西斯的这位学生竟陷入这类日內瓦流亡者的化石中，并且从中取得了出現于他的小册子已提供的那类博物学方面的臆造，这事对 *species Bürstenheimerana* [制刷匠帮种] 來說是格外奇怪的，因为在他的动物研究室里就有一个原始制刷匠帮成員拉尼克爾，正好是从那里搞来的反芻类中的乳齿象的极妙标本。显然，反芻得是不正常的，或者是上述那位学生对反芻的研究是錯誤的……

这就是你所要求的一切，*et au delà* [甚至还超过了]。現在我也想向你提出一点要求，就是我想知道你对扣除部分遺產 *pro patria* [以利于祖国]，*vulgo* [換言之]，以利于国家，把它当做国家主要收入来源这样一个問題是怎样看的；不言而喻，这只是对大宗遺產而言的，并要廢除由穷苦階級負担的一切賦稅……除了遺產稅这个問題以外，我还在思考德国的两个法規：‘土地合并’和‘抵押保險’。我想把这两个法規介紹給法国人，他們对于这些法規簡直一无所知，除少数人以外，他們只看到萊茵河对岸的浓雾和酸白菜。不久前，‘宗教、哲学、政治、科学和文化界’报倒是一个例外；它在抱怨地产过分分散时正确地指出：«Il serait désirable qu'on appliquât immédiatement les remèdes énergiques, dont une partie de l'Allemagne s'est servie avec avantage: le remaniement obligatoire des propriétés partout où les $\frac{7}{10}$ des propriétaires d'une commune réclament cette mesure. La nouvelle répartition facilitera le drainage, l'irrigation, la culture rationnelle et la voirie des propriétés» [“最好是立刻采取在一部分德国土地上已行之有效的坚决措施，即在十分之七的土地占有者都要求重分土地的所有村社中，强制重分土地。重分土地将有助于排澇、灌溉、合理耕作以及田間道路的

鋪設”]。‘世紀報’也談到這個問題；這家報紙本來就有些目光短淺，在觀察德國問題時更是如此，但是，由於它像第歐根尼炫耀自己的破爛外套那樣炫耀它的沙文主義，因而格外饒舌；它竟把這道菜冒充愛國主義，每天加一加熱以饗讀者。這一家沙文主義的報紙在向它的 *bête noire* [駭人的怪物，令人憎恨的東西]①——‘宗教、哲學、政治、科學和文學界’報客氣地說了一聲早安之後，就叫了起來：«Propriétaires ruraux, suivez ce conseil! Empressez-vous de réclamer le remaniement obligatoire des propriétés; dépouillez les petits au profit des grands. O fortunatos nimium agricolae—trop heureux habitants des campagnes—sua si bona—s'ils connaissaient l'avantage à remanier obligatoirement la propriété!»[“土地占有者，聽從這個勸告吧！趕快要求強制重分土地；為了大所有者的利益搶光小所有者。啊，最幸運的鄉下人，——要是他們知道強制重分土地的好處該多好！”]②好像在按所有者的人頭投票時，大所有者會戰勝小所有者似的。

其他方面，我讓事情照常進行，帝王的我給帝王，上帝的我給上帝，‘魔鬼的一份’也是如此。謹向你致老友的敬禮。

你的 席利”

從以上材料可以看出：既然日內瓦在 1849—1850 年有過硫磺幫，而在 1851—1852 年有過制刷匠幫，這兩個團體不論彼此之間或者同我之間，都沒有任何共同之處，那末，我們的議會小丑所發現存在過的“**硫磺幫或制刷匠幫**”，不過是他的非非之想，瀾天大謊，“大得同臆造它的人一個樣”。試想有一個歷史家竟會這樣恬不知恥地斷言：在第一次法國革命時期有過一幫人，他們以«*Cercle social*»³⁵⁸知名，**或者**也以“**雅各賓黨人**”這一同樣別致的名字著稱。

至於他所製造的“**硫磺幫或制刷匠幫**”的生活和活動，那我們

① 直譯是：“黑色的野獸”。——編者注

② 這句話里的拉丁文，是套用味吉爾的長詩“*稼穡詩*”第 2 冊中的詩句的。——編者注

的这位小丑老兄并未为此花任何生产費用。我只举出唯一的一个例子：

这个圓滿的人对他的驚訝的庸俗讀者說：“硫磺帮的主要职业之一，是敗坏住在祖国的人的名譽，使他們不得再反抗敲詐的企图，并拿出錢来〈这句话說得不坏：“他們不得再反抗敲詐的企图”〉，以便这个帮对敗坏他們名譽的那些事实保密。这些人〈即福格特式的 *homunculis* [矮小而可怜的人]〉向德国寄了不是一封信，而是几百封信，公开威胁要把他們参与革命的各种行动揭露出来，如果不把規定的款額限期交到指定地点的話。”（“主要著作”第139頁）

为什么福格特連“一封”信都不公布呢？因为硫磺帮写了“几百封”。即令恐吓信賤得像烏莓子^①，福格特仍然会賭咒发誓地說：我們連一封信也不应当看見。如果明天叫他出席格留特利联盟³⁵⁹的公意法庭，要他对“几百封”“恐吓信”給以說明，那他会从腰里掏出酒瓶，但不是信件，会用手指打一个榧子，把舌头彈得一响，并且会因錫侖式的哈哈大笑而抖动肚子，同他的阿布特一起喊道：“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① 这里套用了福斯泰夫的話（見莎士比亚“亨利四世”前篇第二幕第四場）。——編者注

三

警 察 作 風

“州官想出了多么新奇的花样!”

(席勒)①

“我公开宣布”，——福格特摆出一副小丑姿态，一本正经地说，——“我公开宣布：凡随马克思及其同志参加任何政治阴谋的人，迟早将落入警察手中；这类阴谋已为秘密警察知悉，他们一开始就得到有关这类阴谋的密报，他们在适当时机将孵出这类阴谋来（看来阴谋是鸡蛋，而警察是孵蛋的母鸡）。马克思之流主谋犯当然将逍遥法外，稳坐伦敦（而警察则坐在鸡蛋上）。要为这种论点提出证据，我现在并不为难。”（“主要著作”第166、167页）

福格特“现在并不为难”，福斯泰夫则从来都不“为难”。“满嘴撒谎”——爱怎么撒就怎么撒吧，但是“为难”②吗？那末，你的“证据”，杰克，你的“证据”呢③。

1. 自 供

“马克思自己在他1853年出版的小册子‘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第77

① “威廉·退尔”第一幕第三场。——编者注

② 在德文原文中，《verlogen》（“满嘴撒谎”）和《verlegen》（“为难”）这两个动词发音近似。——编者注

③ 莎士比亚“亨利四世”前篇第二幕第四场。——编者注

頁上說過：‘1849年以後，對無產階級政黨來說，如同1848年以前一樣，只有一條路可走，那就是秘密聯合的道路。因此，從1849年以來，大陸上出現了一系列秘密的無產階級聯合會；警察當局破獲它們，法庭迫害它們，監獄沖散它們的隊伍；而形勢又經常使它們重新恢復起來。’馬克思在這裡把自己委婉地稱為〈福格特說的〉‘形勢’。”（“主要著作”第167頁）

總之，馬克思說：“警察當局從1849年以來破獲了一系列秘密的聯合會”，但是形勢又使它們恢復起來。福格特說：不是“形勢”，而是馬克思“恢復了秘密的聯合會”。於是福格特便證明：每當巴登格的警察當局破獲了瑪麗安娜³⁶⁰的時候，馬克思便按照他同比埃特里的協議又把它恢復起來。

“馬克思自己說的！”現在我不妨引證一下上下文，看一看馬克思自己是怎么說的：

“從1848—1849年革命失敗以來，無產階級政黨在大陸上失去了在這個短短時期中例外地享有的東西：報刊、言論自由和結社權，換句話說，失去了黨組織的種種合法手段。儘管在反動時期，資產階級自由黨和小資產階級民主黨都還是能在它們所代表的階級的社会地位中找到通過這樣或那樣的形式的聯合起來，並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捍衛自己的共同利益所必需的種種條件。1849年以後，對無產階級政黨來說，如同1848年以前一樣，只有一條路可走，那就是秘密聯合的道路。因此，從1849年以來，大陸上出現了一系列秘密的無產階級聯合會；警察當局破獲它們，法庭迫害它們，監獄沖散它們的隊伍；而形勢又經常使它們重新恢復起來。這些秘密團體的一部分，把推翻現存國家政權作為自己的直接目的。這在法國是正當的……另一部分秘密團體則把組織無產階級政黨作為自己的目的，而不考慮現存政府的命運。這在像德國這樣

一些国家里是必要的…… 不容置疑，就是这里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成员也将会再次参加反对 status quo [現存秩序] 的革命，但是，为这一革命做准备工作，为它进行宣傳鼓动、为它进行秘密活动和組織密謀，都不是他們的任务…… 因此，共产主义者同盟³⁶¹并不是一个阴谋家团体……”（“揭露等等”波士頓版第 62、63 頁）³⁶²

但是，連这一点“宣傳”也被殘酷无情的州官痛斥为罪行，当然，得到比埃特里和萊蒂首肯的宣傳不在此例。州官甚至准許“进行宣傳鼓动、进行秘密活动和組織密謀”，但是要有一个前提，就是这些活动的引綫要集中在罗亚尔宮³⁶³，要集中在他所心爱的亨利、海利奧加巴尔·普隆-普隆的手里。可是“宣傳”竟在无产者中間进行！多么卑鄙齷齪啊！

在“揭露”中，在上引的、为法院偵查員福格特巧妙歪曲了的那一段文章下面，我接着說：

“不言而喻，这种秘密团体（如**共产主义者同盟**），对于下面这样一些人來說，吸引力是不大的：这些人一方面在秘密活动的那种庄严的、带有戏剧性的斗篷下面竭力掩盖自身的渺小，另一方面又打算在最近革命到来时滿足自己的一点微不足道的功名心，但是首先千方百計地試图在目前就成为显要人物，在蠱惑宣傳的成果中撈到自己的一份，博得那些民主主义的愛吵吵嚷嚷的饒舌者的拥戴。因此，从**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已分离出了一个集团，或者也可以这样說，已被分离出一个集团，这个集团所要求的即使不是真正的密謀，至少也是密謀的外表，因而坚持同当代的民主主义英雄結成直接的联盟，——这个集团就是維利希-沙佩尔集团。这一集团的特征就是：維利希跟**金克尔**一道，在德美革命貸款的活动中是

以 entrepreneur [承攬人] 的身分出現的。”(第 63、64 頁)³⁶⁴

而福格特究竟怎样把这一段話“委婉地”譯成他的不知所云的警察行話呢？請听一听他是怎样說的：

“只要两个〈党〉还共同行动，它們就得像馬克思自己說的那樣，从事組織秘密团体和敗坏大陆上的团体和一些人的名譽。”(第 171 頁)

不过这个脑滿腸肥的混蛋沒有指出这是馬克思在“揭露”的哪一頁上“自己說的”。

«Egli è bugiardo, e padre di menzogna»[“他是騙子和一切謊言之父”]^①。

2. 穆尔頓革命代表大会

“大胆查理”，“勇敢的卡尔”，vulgo [俗称] 卡尔·福格特，現在給我們讲穆尔頓的失敗。

“很多工人和流亡者都被〈即被李卜克內西〉巧妙地說服了，因此終於決定在穆尔頓召开革命代表大会。各地方团体的代表都应秘密前往該地，他們打算在那儿討論同盟的最后組織工作和起义的最終日期。全部准备工作都絕對保守秘密，通知只由李卜克內西先生的心腹和他的通訊員送发。代表們或步行、或乘船、或騎馬从四面八方向穆尔頓集中，但他們很快就被宪兵逮捕了，因为后者早已知道他們来干什么，从哪儿来，怎么来的。用这种办法抓到的这一伙人，在夫賴堡的奥古斯丁寺院里拘押了一个时候，后来被送到英国和美国去了。李卜克內西先生受到了特別照顾。”（“主要著作”第 168 頁）

① 但丁“神曲”地獄篇第二十三首歌。——編者注

“李卜克内西先生”参加过司徒卢威领导的 1848 年 9 月起义，后来在巴登坐牢，一直到 1849 年 5 月中，巴登爆发武装起义时才获得自由，接着参加了巴登国民炮兵队当炮兵，后来被福格特的友人布倫坦諾当做造反者再度投入拉施塔特囚室。第二次获释后，在维护帝国宪法运动时期参加了由約翰·菲力浦·貝克尔率领的师团，最后同司徒卢威、康海姆、科尔恩和罗森勃魯姆一起越过法国边境，前往瑞士。

当时，我对“李卜克内西先生”和他的瑞士“革命代表大会”的了解，比对伯尔尼鍋匠街本茲酒館老板那里举行的酒館代表大会的了解还要少。在那里，滿桌的議会豪杰們兴高采烈地再次嘟囔他們在圣保罗教堂³⁶⁵說过的話，按号碼相互分配未来帝国的席位，并且听取大胆查理的那一套大吹大擂、粗野笑話、淫詞秽語和夸夸其談来消磨流亡生活中的难熬夜晚；这位大胆查理当时按照德国的古老傳說，多少带着幽默地亲自为自己准备了一份“帝国酒鬼”的特許证。

“傳說”的开头是这样說的：

Swaz ich trinken's hân gesêhen,
daz ist gar von kinden geschêhen:
ich hân einen swêlch gesêhen,
dem wil ich meisterschêfte jêhen.
 Den dûhten becher gar entwiht,
 êr wolde nâpf noch kophe niht,
 êr tranc ûz grôzen kannen,
 êr ist vor allen mannen
 ein vorlauf allen swêlhen
von ûren und von êlhen

wart solcher slünd nie niht getân.①

然而，我們还是回头來談穆尔頓“革命代表大會”吧。“革命代表大會！”“同盟的最后組織工作！”“起義的日期！”“絕對保守秘密的准备工作！”“或步行、或乘船、或騎馬絕對秘密地从四面八方集中”。这位“大胆查理”钻研我在“揭露”中戳穿的施梯伯的那一套手法，显然沒有白費力气。

实际情况是这样：李卜克内西在1850年初担任日内瓦工人协会主席。他建議当时在瑞士的彼此毫无联系的各个德国工人协会联合起来。这个建議被接受了，于是便决定向24个不同的工人协会发出书面通知，邀請它們到穆尔頓集会，討論拟議中的組織問題和創辦共同机关报問題。日内瓦工人协会內部的辯論，通知书的分发，其他24个工人协会內部有关此事的討論，都是公开的，举行穆尔頓代表大會的日期也是公开的。如果瑞士当局要禁止这个大會，那它在开会前一个月就能办到。但是自由派分子德律埃先生的計劃，却是玩弄戏剧性的警察手腕，他当时正在物色一个

① 我們大家都不反对喝酒，——但說实在的，

这全是一种儿戏：

我知道有这么一个酒徒，

他喝起酒来簡直令人吃惊。

他不滿意大高脚杯，

既不願用盂形缸，

也不願用大腹杯，

他喝酒都用大桶，

真不愧为每一个好酒者的崇高典范；

就是大鹿和水牛

也从来不那么大口大口喝。

(引自十三世紀德国的一首打油詩“酒鬼”)。——編者注

他可以一口吞下去的人，以便使当时正在进行威胁的神圣同盟心滿意足。作为工人协会主席在代表大会通知书上署名的李卜克内西，获得了公认的主謀者的荣幸。人們把他同其他代表隔离开来，在夫賴堡塔楼頂上給了他一处免費住所，他能在那里极目远眺，自得其乐，甚至每天有权在塔楼的平台散步一小时。对待他的唯一独特之处，就是把他隔离。他曾多次請求把他同其他代表拘禁在一起，可是每次都遭到拒絕。但福格特懂得，警察当局对自己的«moutons»^①不予隔离，反而要把这些“令人喜欢的交談者”硬塞进被捕者的内部去。

两个月以后，李卜克内西同一位姓格貝尔特的人一起被夫賴堡的警察局长送往伯桑松，在那里，他像他的这位盟内同志一样，得到了法国当局允許前往倫敦的通行证，但是接到警告說，要是他們不按照指定路綫前往，就要把他們发配到阿尔及利亚去。由于这次出乎意料的旅行，李卜克内西失去了他在日内瓦的大部分什物。不过，也应当对卡斯特拉、沙列尔以及当时夫賴堡政府的其他委員們作出应有的評价：他們不論对待李卜克内西，或者对待穆尔頓的所有囚徒，都是非常人道的。这些先生們还記得：不过是几年以前，他們自己也蹲过監獄或者流亡过，而且公开对大科夫塔³⁶⁶ 德律埃强加于他們的那种警察职权表示厌恶。对在押的流亡者的待遇，并不像流亡的“議員們”所想的那樣。因此，目前还在瑞士的一个家伙，某一位議員先生，认为有責任出版一本抨击性小册子，来痛罵所有在押的人，特别是李卜克内西，因为他的“革命”思想超出了議會健全理智的界限。可是“大胆查理”似乎还不滿足于李卜克

① 指專門放进被捕者中間去的密探，旨在刺探必要的情报(直譯是：公羊)。——編者注

內西所受到的“特別照顧”。

我們這位“大胆查理”的全部蹩腳文章的特点，就是帶有剽竊痕迹。在這件事情上也是如此。大家知道，瑞士自由派習慣於對他們的犧牲者散布流言蜚語，說他們犯了進行 *moucharderie* [間諜活動] 的罪行，以便使自己的粗暴驅逐令帶有“自由主義的性質”。法濟驅逐了司徒盧威，公開宣布他是“俄國間諜”。同樣地，德律埃宣布布瓦肖是法國 *mouchard* [間諜]。圖爾特下令在日內瓦大街上突然把席利抓起來送往伯爾尼監獄塔樓以後，也是用同樣手法 *contra* [對付] 他的。《Le commissaire maire fédéral Monsieur Kern exige votre expulsion》[“聯邦委員、市長凱倫先生要求驅逐您”]，——當席利提出為什麼這樣粗暴對待他時，權大無邊的圖爾特這樣回答說。席利說道：《Alors mettez-moi en présence de Monsieur Kern》[“那就讓我見見凱倫先生”]。圖爾特却說：《Non, nous ne voulons pas que M. le commissaire fédéral fasse la police à Genève》[“不行，我們不願聯邦委員先生干日內瓦的警務”。這一回答的邏輯，跟同一個圖爾特在擔任瑞士駐都靈公使時所表現的絕頂聰明相比，可說毫無遜色；在薩瓦和尼斯的割讓已是 *fait accompli* [既成事實] 之後，他寫信告訴瑞士聯邦主席說：卡富爾拚命地反對這種割讓。然而，也許是同鐵路有關的外交問題當時把圖爾特的正常機敏弄遲鈍了。在席利已被極其嚴格地 *secret* [單獨監禁] 在伯爾尼之後，圖爾特才給他的粗暴的警察行動點綴上“自由主義的性質”，才向德國的流亡者，例如芬克博士窺窺耳語：“席利同凱倫秘密勾結，並向他密告日內瓦的流亡者，等等”。甚至日內瓦“獨立報”³⁶⁷ 當時也認為：“把對流亡者進行系統的誹謗提高為國家原則”是日內瓦政府的一種人所共知的罪孽（見附

录 1)。

德国警察当局一提出要求，瑞士自由派政府便把所谓的“首領”驅逐出境，从而破坏了避难权，——这项权利是以殘存的革命軍不参加巴登土地上的最后一战为条件的。后来也輪到了“盲从者”。瑞士政府用形形色色的欺騙手法，迫使成千的巴登兵士接受了回国护照，可是他們一回国就落到早已知道他們“來干什么，从哪儿來，怎么來”的宪兵們手里。随后是神圣同盟的威胁，随威胁而來的是穆尔頓的警察手腕。但是，“自由主义的”联邦委员会³⁶⁸还不敢像“勇敢的卡尔”做得那样过分。它只字未提“革命代表大会”、“同盟的最后組織工作”和“起义的最終日期”。为了面子关系而不得不进行的偵查，結果是一无所获。

外国的“战争威胁”和“政治宣傳傾向”，——这就是“为难的”联邦委员会为了給自己辯护而在一份官方文件中閃爍其詞地提到的一切(見附录 2)。“瑞士自由主义”警察的丰功偉績，决不因造出了“穆尔頓革命代表大会”而达到頂点。1851年1月25日，我的朋友威廉·沃尔弗(“議会的羊群”把他戏称为“議会的狼^①”)从苏黎世写信告訴我：

“联邦委员会采取它慣用的手法，已使流亡者从 11 000 人减少到 500 人，但是，它在沒有把不拥有相当财产或特殊关系的一切人都赶出去以前，是不会安心的。”

不言而喻，为革命奋斗过的流亡者是敌視圣保罗教堂的英雄好汉們的，因为后者以无休止的空談扼杀了革命。这班英雄好汉竟然毫不羞慚地把他們的敌手轉交給瑞士警察当局。

① 文字游戏：德文里的 Wolff 是姓，«Wolf»是“狼”。——編者注

席利到了倫敦之后，福格特的心腹、拉尼克爾这个怪物會亲自写信告訴他說：

“請設法在某一家比利时報紙上搞几栏来刊登声明，并請不要放过机会来使那些卑鄙的德国狗〈議員們〉在美国不得安生，因为他們已把自己出賣給那个大脖子的外交官〈德律埃〉，成了他的工具。”

現在，大家就懂得“大胆查理”所說的下面一段話是什么意思了：

“我竭尽全力限制流亡者的革命奔波，并不遺余力地为他們在大陆上或海外找到栖身之所。”

在“新萊茵报”第 257 号的一篇文章中，可以讀到以下一段話：

“海得尔堡 1849 年 3 月 23 日。我們的友人福格特，左派的先进战士，帝国当代的幽默家，帝国未来的巴罗，防止革命的‘可靠信号手’，正在同——同一些志同道合的人？不！——同一些真正的反动分子联合起来。为了什么目的呢？为了把羈押在斯特拉斯堡、伯桑松和德国边境其他地方的‘个人’派遣到美国去，换言之，就是流放到美国去……卡芬雅克的軍刀制度当做惩罚强加于人的东西，这班先生們却想以基督之爱的名义来得到……大赦死了，——流放万岁！当然，在这里沒有 pia fraus〔虔誠的欺騙〕也是不行的，如竟說什么流亡者自己希望迁移等等。但是，据‘湖濱小报’发自斯特拉斯堡的消息說，这种流放计划在所有流亡者中間掀起了真正的怒潮，等等。他們全都希望很快回到德国，即令像福格特先生所动人地說的那樣，他們不得不因此而冒参与某种‘瘋狂大胆的行动’的風險。”

然而，对“大胆查理”的穆尔頓革命代表大会已經說得够多了。

3. 舍尔瓦尔

«The virtue of this jest will be the incomprehensible lies that this same fat rogue will tell us».

“这场玩笑的妙处，是在听听这个肥胖的无赖会向我们讲些什么海阔天空的谎言。”^①

在我的“揭露科倫共产党人案件”中，有一章专门谈到舍尔瓦尔的密謀³⁶⁹。我在那里指出，施梯伯怎样同舍尔瓦尔（克列美尔的假名）这一工具，怎样同卡尔利埃、格莱夫和弗略里这些产婆，捏造了所谓巴黎德法九月密謀^②，以便弥补引起科倫檢察院不滿的、在“客观犯罪构成”方面的漏洞，因为原来他们认定科倫的囚徒們是有罪的。

科倫案件³⁷¹期間，我所提出的辯护证据，确凿地证明了舍尔瓦尔同我和科倫被告們沒有任何关系，以致同一个施梯伯在10月18日（1852年）还发誓作证，說他的舍尔瓦尔同我們是一伙，而在1852年10月23日（“揭露”第29頁³⁷²）就否认了这项证詞。他在理屈詞穷的情况下，只好放棄把舍尔瓦尔及其密謀同我們扯在一起的打算。施梯伯总归是施梯伯，但施梯伯毕竟还不是福格特。

我认为在这里重复我在“揭露”中所援引过的关于所谓九月密

① 莎士比亚“亨利四世”前篇第一幕第二場。——編者注

② 在我的“揭露”印成之后，我才知道德拉奧德（化名杜普勒）以及普魯士警探貝克曼（当时是“科倫日报”³⁷⁰記者）和佐美尔也都参与了这件事。

謀的說明，是完全不必要的。1852年5月初，舍尔瓦尔回到了倫敦。他原是在1850年夏初，出于工作上的考虑从倫敦移居巴黎的。1852年2月，他被判刑，几个月之后，巴黎警察当局给了他一个逃跑的机会。回到倫敦之初，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我和我的朋友們在1850年9月中就已退出了該协会³⁷³）把他当做一个政治上的蒙难者來欢迎他。但是這場欺騙的寿命并不长。舍尔瓦尔在巴黎的丰功偉績很快便暴露了，而且也就在1852年5月的一次公开會議上，人們把他当做一个无耻之徒赶出了协会。1851年5月初被捕的科倫被告們，仍然在被押偵查中。从密探貝克曼由巴黎寄給他的机关报“科倫日报”的一篇簡訊中，我了解到：普魯士警察当局企图事后捏造舍尔瓦尔及其密謀同科倫被告們有关系。因此，我开始寻找有关舍尔瓦尔的材料。結果我发现，舍尔瓦尔曾在1852年7月向路易-菲力浦統治时期的前大臣和著名折衷主义哲学家馮·雷·^①先生表示甘願充当奥尔良派的密探。馮·雷·先生同巴黎警察局的关系帮助他从巴黎舍尔瓦尔的档案中弄到了一些摘要。在法国警察局的报告中，舍尔瓦尔就是 Chervald nommé Frank, dont le véritable nom est Kremer〔通称为弗兰克的舍尔瓦尔特，他的真姓是克列美尔〕。档案上注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內，他曾經是哈茨費尔特公爵、普魯士駐巴黎公使的密探，他在 complot franco-allemand〔法德密謀〕中是一个叛徒，目前还是法国的密探，等等。科倫案件期間，我把这些材料通知了一个辯护人——律师施奈德尔第二先生，并囑咐他在必要时可以說出这些材料是我提供的。当施梯伯在10月18日开庭时发誓說爱尔兰人舍尔瓦

① 雷繆扎。——編者注

尔——他自己說 1845 年曾因伪造票據在亞琛坐过牢，——仍然被关在巴黎的时候，我立即經当次郵班通知施奈德尔第二：萊茵普魯士人克列美尔化名舍尔瓦尔“仍然”住在倫敦，每天同普魯士警監格萊夫碰头，而这个已被判刑的普魯士罪犯，英国立即会根据普魯士政府的要求把他引渡的。如果把他弄到科倫去当证人，施梯伯的把戏就会全被戳穿。

在施奈德尔第二的压力下，施梯伯终于在 10 月 23 日宣称，他听说舍尔瓦尔好像已从巴黎逃跑，但他又庄严宣誓說，他根本不知道这位爱尔兰人现在何处，也根本不知道他同普魯士警察当局有何关系。实际上，舍尔瓦尔当时已被調到倫敦格萊夫那儿去做临时工作，每周領取固定薪俸。我的材料在科倫陪审法庭上引起的关于“舍尔瓦尔的秘密”的辯論，迫使舍尔瓦尔逃离倫敦。我听说他到澤稷島执行警務去了。我好久不知道他的行踪，直到从紐約出版的“工人共和国报”³⁷⁴ 的一篇日内瓦通訊中，才偶然得知舍尔瓦尔于 1853 年 3 月化名紐金特到了日内瓦，1854 年夏天又从日内瓦跑走了。可見，他在日内瓦会见福格特时，是在我的那本敗坏他的名誉的“揭露”由沙貝利茨在巴塞尔出版几个星期之后。

但是，現在我們还是回头来談福斯泰夫式的“历史故事”吧。

福格特硬說他的舍尔瓦尔假逃出巴黎以后馬上就到日内瓦去了，可是在这以前他曾硬說：舍尔瓦尔在九月密謀暴露前“几个月”，已由共产主义秘密同盟（同上，第 172 頁）从倫敦“轉送”到巴黎去了。这样一来，从 1852 年 5 月到 1853 年 3 月这段時間便完全不見了，而从 1850 年 6 月到 1851 年 9 月这段時間則被縮短成“几个月”。只要有一位福格特能在科倫陪审法庭上发誓說“倫敦共产主义秘密同盟”是在 1850 年 6 月把舍尔瓦尔派到巴黎去的，施梯伯

就会什么也干；只要能看到福格特同他的施梯伯一起汗流浹背地坐在证人席上，我也就会不惜付出一切！賭咒发誓的施梯伯同他的烏儿格莱夫、他的維尔穆特以及他的小玩意儿戈德海姆，同他的 *Bettelvogt*。^①这是多可爱的一帮人啊！福格特的舍尔瓦尔到日内瓦去时，“給紐金特先生很快便与之形影不离的馬克思及其同伙的所有熟人”带去了“介紹信”（第 173 頁）。他“在‘总汇报’的一位記者家里住了下来”，并且得到了——大概是由于我的介紹信（即“揭露”），——接近福格特的机会，后者給了他一項石印工作（同上，第 173—174 頁），而且同他，就像从前同約翰大公、接着又同普隆-普隆那样，发生了某种“学术上的联系”。“紐金特”有一天在帝国摄政³⁷⁵的“办公室”里工作，一位“熟人”认出他就是舍尔瓦尔，并揭穿他是一个 *agent provocateur* [“奸細”]。原来紐金特在日内瓦不仅同福格特打交道，而且忙于“建立秘密团体”的工作。

“舍尔瓦尔-紐金特主持會議、做記錄、担任同倫敦通信的工作。”（同上，第 175 頁）“他騙取了一些不太聰明的、但一般說來是好样的工人們的信任”（同上），但是，“在团体的成員当中，还有馬克思集团的一个婁罗，大家都认为他可能是德国警察当局的一个密探”（同上）。

舍尔瓦尔-紐金特与之“形影不离”的馬克思的“所有熟人”突然变成了“一个婁罗”，而这一个婁罗又分成“留在日内瓦的馬克思的婁罗們”（第 176 頁），后来紐金特不仅“从巴黎”同这些婁罗們“通信”，而且他还像吸铁石一样，把他們“吸引到”在巴黎的“他的

① 文字游戏：Greif, Wermuth 和 Goldheim（小称是 Goldheimchen）是警官的姓；同时《Greif》又有“兀鷹”的意思，《Wermuth》又有“苦痛”和“苦艾”的意思，《Goldheimchen》又有“金黄色的蟋蟀”的意思；《Bettelvogt》直譯是：“乞丐总管”，在这里則为“形形色色敗类的保护人”。——編者注

身边”来(同上)。

又是麻布“衣服”“換成”草綠色衣服的老故事!

舍尔瓦尔-紐金特要建立他的团体的目的是:

“大量制造假鈔票和国庫券，借以动搖专制者的信用和破坏他們的財政制度”(同上，第 175 頁)。

舍尔瓦尔大概是在模仿著名的皮特，大家知道，这位皮特在反雅各宾战争时期曾在倫敦附近建立了一家印制法国假鈔票的工厂。

“紐金特本人已經为此目的准备好各种各样的石版和銅版，已經指定秘密同盟的一些輕信成員，要他們带上一包包这些”——石版和銅版嗎？不是，——“这些假鈔票〈自然，鈔票是在印出以前就包好了的〉动身到法国、瑞士和德国去”(見第 175 頁)，

可是西塞罗-福格特已經手握脫鞘之劍站在舍尔瓦尔-卡提利納的身后。福斯泰夫式的人物的特征是，不仅他們本身是被吹起来的，而且又全都进行吹嘘。瞧，把“革命奔波”限制在瑞士并用一批輪船使流亡者远涉重洋的我們那位大嗓門，瞧，他怎样在舞台上露面，演出什么样的傳奇剧，又怎样把施梯伯同舍尔瓦尔之間在巴黎进行的白刃战的趣聞留諸后世(見“揭露”³⁷⁶)! 他就这样站着，这样运用他的劍^①!

“这整个密謀計劃(同上，第 176 頁)訂得极其可鄙。”“每个工人团体都要对舍尔瓦尔的計劃負責。”已經“出現了来自外国使团方面的秘密詢問”，已經打算“敗坏瑞士、特别是日内瓦州的名声”。

但是州官並沒有睡觉。他对瑞士进行了第一次拯救，——进

① 这里套用了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亨利四世”前篇第二幕第四場中福斯泰夫的話。——編者注

行了一种后来多次重复而且成效日增的實驗。

“我不否认”，——这位身体頗有重量的人叫道，——“我不否认，我为粉碎这些恶毒計劃作出了我的重大貢獻；我不否认，我为此找过日内瓦共和国的警察当局；我至今还感到遺憾（伤心的西塞罗）：某些受騙者的热心，竟成了給詭計多端的主謀者的預告，因而使他逃脫了逮捕。”

但是，不管怎样，西塞罗-福格特已“粉碎了”卡提利納的密謀，拯救了瑞士，給他随时准备着作出貢獻的地方“作出了”他的重大貢獻。几个星期以后，——像福格特說的，——舍尔瓦尔又出現在巴黎，“在那里，他根本不是躲躲閃閃的，而是像任何一个公民那样公开生活的”（同上，第 176 頁）。大家都明白，仿造的 empire [帝国] 的巴黎公民們(citoyens)是怎样公开生活的。

舍尔瓦尔如此“公开”在巴黎游蕩，poor [可怜的]福格特在訪問巴黎时却每次都要躲藏在罗亚尔宮普隆-普隆的桌子下面！

实在很抱歉，为了同福格特的有力的察哈里埃之歌唱对台戏，我不得不援引約翰·菲力浦·貝克尔的如下一封信。德国流亡界的老将約翰·菲力浦·貝克尔的革命活动，从汉巴赫大典³⁷⁷到他以第五基干师师长身分为之战斗的維护帝国宪法的运动（“柏林軍事周刊”的这种无疑公正的意見，证明了他的軍事功勛），早已家喻戶曉了，因此用不着我对写信人再作任何介紹。我只想指出：他的信是写給我在倫敦的一位熟人德国商人萊^①的；我本人同約·菲·貝克尔并不相識；他同我从来没有过政治上的联系；最后，我删去了信前面談到的事务性問題，也删去了有关硫磺帮和制刷匠帮的大部分，因为我們已經从前面的叙述中知道了。（原信目前归

① 萊茵兰德尔。——編者注

在柏林我的案件的证件內)

“1860年3月20日于巴黎

……前几天我得到了福格特 contra [反对] 馬克思的小册子。这一著作使我感到更加难受，因为它完全歪曲了所謂硫磺帮的历史和臭名远揚的舍尔瓦尔的历史（由于我当时住在日内瓦，这类历史我知道得很清楚），而且还非常錯誤地把它們同經濟学家馬克思的政治活动攪在一起。我本人不認識馬克思先生，同他也从来沒有任何接触；相反，福格特先生和他的家庭，我在二十多年前就認識了，因此我同后者的关系要亲近得多；对福格特在这场斗争中所表現的輕率和无耻，我只能表示极大的遺憾和极坚决的譴責。在斗争中，使用歪曲的甚至无中生有的事实是不光彩的。即使責难福格特为拿破侖效劳是毫无根据的，那末，他像一个自杀者一样用以毀灭錦綉前程、破坏和辱沒自己地位和声誉的那种輕率举动，也还是令人感到遺憾的。我衷心希望他用正当方法来根本推翻这种严厉的責难。鉴于到此为止他在这件不愉快事情上的所作所为，我觉得絕對有必要同您談談所謂硫磺帮的历史和‘无可非議的’舍尔瓦尔先生的历史，从而使您能够作出判断：馬克思对硫磺帮和舍尔瓦尔先生的存在和活动究竟有多少責任。

那末，我就来簡單談一下硫磺帮的产生和消亡。关于这个帮，未必有誰能比我提供更确切的情况了。不难理解，我当时住在日内瓦，由于我所处的地位，我不仅能够从头了解流亡界所发生的一切；而且，为了共同事业，我作为一个長輩，认为自己有責任关心这个帮所做的一切事情，以便在必要时能够事先告訴和劝阻流亡者，使他們放棄某些荒誕的图謀，虽然这种图謀是由于不幸、甚至常常是由于絕望心情造成的困境而产生的，是情有可原的。根据三十年的經驗，我十分明白，任何流亡生活都充滿了幻想。”

（以下，大部分都已在波克罕和席利的信中叙述过了。）

“……这个多半是由无业游民組成的团体，被戏称为硫磺帮。这是由偶然聚在一起的年輕人結成的小团体，事先並沒有任何准备，沒有主席和綱領，也沒有章程和教义。他們对秘密同盟或者需要有計劃地达到的任何政治目标或其他目标，連想也沒想过；他們仅仅公开地、甚至过分公开地和坦率地追求效果，达到了无节制的地步。他們同馬克思更没有什么联系，馬克思

對他們的存在肯定也一無所知，同時他們當時同馬克思在社會政治觀點上有很大的分歧。此外，這幫小伙子當時表現了一種自命不凡、獨立不羈的傾向，因此無論在理論上或實踐上，他們未必會服從某個人的權威；他們會嘲笑福格特的那種慈父般的訓誡，會嘲笑馬克思的那種帶傾向性的指示。由於我的大兒子每天都同他們的頭兒們來往，因此他們當中發生的事情，我知道得格外清楚。這個無拘無束的幫和它的一套把戲，其存在時間並沒有超過 1849—1850 年冬季；環境迫使我們的這些英雄們天各一方了。

誰能想到，早就被人遺忘的硫磺幫會在蟄居十年之後被福格特教授點燃起來，用令人窒息的煙味來反對假想的敵人；誰能想到，一些阿諛逢迎的下流報棍子竟像電磁交感導體一樣興高采烈地把這種煙味傳播得更遠。要知道，甚至 *par excellence* [真正] 自由主義的馮·芬克先生，在涉及意大利問題時也談到了硫磺幫，並且用它來說明謙遜的普魯士議院。而布勒斯勞的資產階級，——它似乎總是享有好名聲的，——為了慶祝硫磺幫，竟 *sancta simplicitas* [天真地] 組織了狂歡遊行，並且為了表示自己的善意，還用硫磺熏了城市。

可憐而無辜的硫磺幫啊！*nolens volens* [不管願意不願意]，你都得在你安然去世之後化成一座真正的火山，就像魔鬼用警察嚇唬膽小的庸人一樣，把全世界的笨伯都硫磺一番，使發熱的頭腦燃燒得最旺；我覺得，福格特自己也被你永遠燒傷了喉嚨。

現在來談克列美爾，*vulgo* [即] 舍爾瓦爾。這個政治社會方面的騙子和通常的騙子於 1853 年在日內瓦露面，化名為英國人紐金特。這是跟隨他的那位冒名老婆的婚前的姓，她是一個地道的英國女人。紐金特的英語和法語講得都很流利，但長期避免講德語，因為他大概很想讓別人把他當做真正的英國人。紐金特自己說，他是熟練的石印工人和彩色石印工人，他把彩色石印術帶到了日內瓦。他長於交際，善於安排自己並有利地表現自己。他很快便接受了大學教授們的許多定貨，為博物學和古代藝術制插圖。最初，他深居簡出，後來幾乎光同法國和意大利的流亡者往來。我當時設了一個 *office de renseignements* [問事處]，辦了一家日報——‘勒芒湖信使報’。一位名叫施泰歇爾的巴登流亡者，過去做過實科學校校長，在我那兒擔任編輯。這人在繪畫方面天賦很高，想在彩色石印方面得到深造以後，來改善自己的境況；他拜英國人紐金特為師。施泰歇爾經常告訴我關於這位能干、熱心而

又慷慨的英国男人和那位可爱而又嬌媚的英国女人的种种好事。施泰歇尔又是工人教育协会的音乐教員，有一次他把他的老师紐金特帶到协会去；我在那儿高兴地同他初次結識，他破格地讲起德語来，而且他用的是下萊茵区方言，讲得很流利，因而我对他說：‘您不是英国人。’但他坚持己見，并且解釋說，他的父母在他童年时就把他送进波恩的一个学校里，他在那里一直呆到18岁，因此学会了那里的方言。最近还对这位‘可爱的’人欽佩莫名的施泰歇尔，也帮助紐金特使人相信他是英国人。相反，这件事使我对阿尔比昂的这位假儿子大加怀疑，并且劝告协会的会員們对他要加小心。过了不久，我在法国流亡者协会碰到了这位英国人，我来得很凑巧，他正好在吹嘘他在巴黎起义时期的英雄業績。这时我才明白他也在搞政治。这使我对他产生更大的怀疑；我对他在作战时所表现的‘獅子般的勇猛’——用他的話來說，——开了点玩笑，让他有机会当着法国人在我面前維護他的業績，但是因为他以狗一般的温順接受了我的辛辣的嘲笑，使我很瞧不起他。

从那以后，只要有可能，他就竭力迴避我。同时，他在施泰歇尔的协助下，在德意志工人协会里組織跳舞晚会，他們不費一文地找来了几个乐师——一个意大利人、一个瑞士人和一个法国人。我在这些晚会上又遇到的这位英国人，已經完全是在得心应手的环境中的一个真正的 *maître de plaisir* [主持人] 了；因为狂欢和向女士們献殷勤，比表现獅子般的勇猛，更为他所胜任。但是在工人协会中他并不搞政治；他在这儿只是纵情地跳舞、蹦跳、欢笑、飲酒和唱歌。然而，我从維尔騰堡的一个首飾匠弗里茨那儿得知：这位‘彻底革命的英国人’建立了一个同盟，由他（弗里茨）以及一个德国人、几个意大利人和法国人总共七个成員組成。我要求弗里茨不要参与同这位政治上的技巧运动表演家有关的任何重大事情，要他本人立即退出同盟，并說服他的同仁們也这样做。过了不久，我从一个书販那儿收到了一本馬克思写的关于科倫共产党人案件的小册子，在这本小册子里，舍尔瓦尔已被揭穿是克列美尔，并且已被揭露出是一个騙子和叛徒。我立即产生了这样的想法，紐金特也就是舍尔瓦尔，尤其因为按照小册子所載，他出生于萊茵，——这同他所說的方言相吻合，——而且同一个英国女人同居，这也是与事实一致的。我立刻把我的想法告訴施泰歇尔、弗里茨等人，并且要他們讀讀这本小册子。对紐金特的怀疑很快就傳播开了，——馬克思的小册子起了应起的作用。弗里茨很快就对我說，他已退出了这个‘小同盟’，其他人也会照他的

样子做。他同时也向我公开了該同盟的秘密目的。这个‘英国人’打算伪造国家有价证券来破坏欧洲各国的信用，并准备用换得的款子发动欧洲革命，等等。就在这时，有一位曾在巴黎当过律师的法国流亡者累亚先生，在讲授社会主义。紐金特也在听课；在巴黎案件中作过紐金特的辯护人的累亚，认出他就是舍尔瓦尔，而且立即向他說了。紐金特急切地恳求不要暴露他。我是从一位法国流亡者、累亚的友人那里知道这件事的，而且馬上把这件事通知了大家。紐金特竟然厚顏无耻地又到工人协会去，但人們揭穿他就是法国人舍尔瓦尔和德国人克列美尔，并把他赶了出去。据说，宾根的拉尼克尔曾为此事对他严加斥責。此外，日内瓦警察当局想追究他組織上述小同盟一事，但是，国家有价证券的伪造者已經无影无踪了。

他在巴黎干过瓷器繪画工作，因为我在这儿也干的这项工作，所以我們在业务上有所接触。但是他仍然是那样浮躁、輕佻得不可救药。

我实在不明白，福格特怎么竟敢把这个流氓在日内瓦的荒唐行徑同馬克思这样人物的活动胡扯在一起，竟敢把他称做馬克思的同志或工具，尤其是因为这事涉及的时期，正是馬克思用上述小册子痛斥这个騙子的那个时候。要知道，正是馬克思用自己的小册子揭穿了他，把他赶出了日内瓦，而福格特竟說什么他在日内瓦是为馬克思效劳的。

当我思考自然科学家福格特怎能誤入这种歧途时，我簡直莫名其妙。眼見福格特何等輕率地、何等徒劳地、何等白白地在毀坏他那由于各种情况的偶然凑合而取得的强烈影响，难道不觉得可惜嗎！在这以后，如果大家对福格特的自然科学著作都抱着不信任和怀疑的态度，把它們看成也是浮皮潦草地、敷衍塞責地根据虛假的观念、而不是根据肯定的、經過对事实深入研究而得出的一些科学結論，也就不会使人感到奇怪了！

要成为政治家和学者，光有虛荣心是不够的，否則，甚至克列美尔也可能成为政治家和学者了。遺憾的是，福格特由于他的硫磺帮和他的舍尔瓦尔，自己也墮落到舍尔瓦尔那步田地了。的确，他們之間有一种內在的相似之处，突出地表现在：追求日常幸福、富裕生活和交际乐趣，而对严肃认真的事情采取輕率嘲弄的态度……

希望很快能收到您的友好回信，請接受衷心的問候。

忠实于您的 約·菲·貝克尔

又及：我剛才又翻了翻福格特的小册子，使我感到更为惊奇的是：我看到

制刷匠帮也获得了这种荣誉。这个帮是怎么一回事，你应当知道一些……

其次我也在这本小册子中讀到：福格特硬說什么紐金特-舍尔瓦尔-克列美尔是受馬克思之托来日內瓦的。因此，我认为必須作如下补充：在日內瓦的最后一分钟还冒充英国人的那个紐金特，从来不让人觉察出：他在何时何地曾經同某一个德国流亡者有过联系；因为这对他的化名是根本不利的。甚至目前在这儿，尽管这种做法对他已經沒有像当时在那儿一样有意义，但他仍然拒絕承认这一点，并且否认以往曾經結交过德国人。

在这以前，我总以为福格特是輕率地遭到了別人的愚弄，但是現在，他的所作所为越来越令人感到是心怀叵測的詭計。他并不使我感到兴趣，但是我可怜他那善良而可爱的年迈父亲，毫無疑問，这些事將給他带来許多不愉快的时刻。

我不仅允許您，甚至請求您，为了真理和善举，把我告訴您的这些东西在您的熟人中傳播。

忠实于您的 約·菲力浦·貝”(見附录 3)

4. 科倫共产党人案件

我們且撇开日內瓦帝国摄政的“办公室”不談，来談談科倫普魯士王国陪审法庭。

“馬克思在科倫案件中起了杰出的作用。”毫無疑問。

“科倫审讯了他的同盟的同志們。”一点不錯。

科倫被告們的审前羈押竟拖了一年半之久。

普魯士警察局和大使館，辛凱尔迪及其全班人馬，邮局和地方当局，內务部和司法部，——所有这些在这一年半中都作了极其巨大的努力，要弄出某种 *corpus delicti* [犯罪构成] 来。

因此，福格特为了偵查我的“行动”，掌握了可以說是普魯士国家的輔助手段，甚至从我的 1853 年巴塞尔出版的“揭露科倫共产

党人案件”中占有了真凭实据；这本书是他在日内瓦工人协会里找到的，他把它借去“进行了研究”。现在卡尔这小子准不放过使我害怕的机会了。可是不然！福格特这次“为难”了，他放出了几个他特有的、带恶臭的、窒息性的炮弹^①，然后一边仓皇退却，一边含糊地说：

“科倫案件对我们并没有特殊意义。”（“主要著作”第172頁）

在“揭露”中，除了其他人以外，我还不能不涉及奥·維利希先生。維利希的自我辯护书^②，是从他在1853年10月28日“紐約刑法报”³⁷⁹上把我的著作評論为“对德意志联邦中央警察局的駭人听闻行动的巧妙批判”开始的。我的著作的出版者雅·小沙貝利茨收到我的手稿以后，1852年12月11日从巴塞尔写信告訴我說：

“您对警察当局的不光彩行为所进行的揭露是无与伦比的。您給普魯士的現存制度树立了一座坚实的紀念碑。”

他还补充說，一些权威人士也同意他的看法，而这些“权威人士”的头儿就是卡尔·福格特先生目前在日内瓦的一位朋友。

我的小册子出版七年之后，它使我毫不相識的柏林的艾希霍夫先生——大家知道，艾希霍夫曾被控誹謗施梯伯而受到法庭审讯，——在起訴时发表了如下声明：

① “带恶臭的或窒息性的炮弹主要用于地雷战。为此要用一般可燃物，但其中包括較多的硫磺和尽可能多的羽毛、兽角、毛发以及其他廢物，把它們放入彈壳內并附上导火綫。”（伊·克·普呂米克“普魯士皇家炮兵軍官指南”1820年柏林版第一部分（*J. C. Plümicke. «Handbuch für die Königlich Preussischen Artillerie-Offiziere». Erster Theil. Berlin, 1820*））

② 我在1853年紐約出版的抨击文章“高尚意識的騎士”³⁷⁸里作了答复。

“我仔細研究了科倫共产党人案件，因此，我不仅必須完全維持我最初对施梯伯的控告，控告他違背誓約，而且必須扩大对施梯伯的控告，即控告他在这一案件中的全部证詞都是捏造的……对科倫被告們的判決，仅仅是根据施梯伯的证詞作出的……施梯伯的全部证詞彻头彻尾都是違背誓約的。”（1860年5月9日柏林“福斯报”380第一附刊）

福格特本人也承认：

“他〈馬克思〉煞費苦心地向被告們的辯护人提供材料，向他們发出起訴的指示……

大家知道，在那里〈即在科倫〉，施梯伯、弗略里等密探提出了亲自伪造的假文件作为‘证据’，而且在那里，在这帮警察败类中間揭露出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藏垢納污的丑恶淵藪。”（“主要著作”第169、170頁）

如果福格特用有利于波拿巴主义的宣傳来证明他对政变的仇恨，那末，我为什么不能用揭露这种宣傳的极端卑鄙齷齪来证明“我”同秘密警察当局的“交往”呢？如果警察当局已經掌握了真凭实据，那为什么还要造假的呢？

但是，——福格特教授教訓說，——

“然而打击只是打敗了科倫馬克思同盟的盟員，只是打敗了馬克思派。”

的确如此，普隆涅斯！难道打击最初不是打敗了巴黎的另一个派，接着又打敗了柏林的又一个派（拉登多夫案件），然后又打敗了不来梅的其他一个派（死人同盟）³⁸¹ 等等嗎？

至于說到对科倫被告們的判決，那我不妨引证一下我的“揭露”中与此有关的几段：

“最初，需要警察当局进行創造奇迹的干涉，为的是掩盖案件的那种純粹的傾向性。‘即将进行的揭发将向你們陪审員先生們表明：这一案件并不是具有傾向性的案件’，——澤特（檢察官）用

這句話宣告法庭辯論開始。而現在（在審理末）他更強調傾向性，以便把警察當局所進行的揭發置諸腦後。在進行了一年半的審前偵查之後，陪審員們需要能夠證明犯罪的客觀材料，以期在輿論面前洗刷自己。

在演了五個星期的警察喜劇之後，陪審員們又需要‘純粹的傾向’，以期洗清實際材料的污穢。因此，澤特並不滿足於迫使檢察院作出‘缺乏客觀的犯罪構成’這樣一個判決的材料。他還更進一步。他還企圖證明，反對密謀的法律根本不要求什麼犯罪構成，而純粹是傾向性的法律，可見，密謀的概念只不過是用合法手續燒死政治異教徒的一種借口而已。由於應用被告們被捕以後頒布的新的普魯士刑法典去對付他們，他的企圖獲得了巨大的成就。這個法典似乎包括有減輕懲罰的條款，奴顏婢膝的法庭就以此為借口，允許把它當做似乎具有追究既往的力量的法律來加以應用。可是，如果案件是具有純粹傾向性的案件，那為什麼需要一年半的時間來進行審前偵查呢？這是由於傾向。”（同上，第 71、72 頁）³⁸² “隨著普魯士警察當局親自偽造並暗中偷運的記錄本的真相大白，案件已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現在陪審員們已無法承認被告是有罪還是無罪了；現在他們必須承認的是：被告有罪，還是政府有罪。

宣判被告無罪就等于判決政府有罪。”（同上，第 70 頁）³⁸³

辛凱爾迪在科倫案件時期發給普魯士駐倫敦大使館的一封信，證明當時普魯士政府正是這樣估計業已出現的局勢的；他在这封信里說：“政治警察當局的整個命運，要看這一案件的結局來決定。”因此，他要求用 1 000 塔勒作為報酬找到一個人，能在法庭上代表已經逃之夭夭的證人豪普特。當收到辛凱爾迪的另一封信

时，这样的人的确已經找到了：

“国家檢察官指望：在陪审团組成良好的情况下，即使不进一步采取非常措施，也将作出认为有罪的判决，因此，他〈辛凱尔迪〉要求暂时不要采取任何措施。”（見附录 4）

的确，正是这种科倫陪审員的良好組成，普魯士的辛凱尔迪一施梯伯制度显得庄严和高尚了。“要是科倫人被判罪，柏林就将响起一声巨雷”，——暂时調到普魯士駐倫敦大使館工作的警察敗类在 1852 年 10 月就已經了解这一点，即使警察地雷到 1853 年 3 月底才在柏林爆炸（拉登多夫密謀）（見附录 4）。

由于自由派的怯懦，使得反动派在許多年中横行无阻；这种怯懦表現得愈无止境，自由派事后关于反动时代的叫囂也就愈加响亮。因此，科倫案件时期，我想在普魯士自由派报刊上揭露施梯伯的欺騙的一切尝试，都遭到了失敗。这些报刊在自己的旗帜上用大字写着：謹慎小心是公民的首要职责，而且你将在这种标志下生存。³⁸⁴

5. 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洛桑中央节 （1859 年 6 月 26 日和 27 日）

我們的英雄每次都怀着新的滿意心情逃回到…… 阿尔卡迪亞。我們又在“瑞士遙远的一隅”，在洛桑，在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于 6 月底举行的一次中央节上发现他。卡尔·福格特在这里再一次拯救了瑞士。卡提利納坐在倫敦，而西塞罗則穿着五顏六色的短上衣在洛桑大发雷霆：

«Jam jam intelligis me acrius vigilare ad salutem, quam

te ad perniciem reipublicae». [“現在你会懂得,我关心共和国的得救,比你关心它的灭亡还要热心。”]①

关于上述中央节和“圓滿的人物”在节日期間所干的英雄业绩的原本报告,偶而保存下来了。格·洛美尔先生在福格特协助下编写的报告的卷头上这样写着:“瑞士西部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中央节(1859年在洛桑举行),1859年日内瓦金十字街马尔库斯·瓦奈书店出版”³⁸⁵。我们不妨把这个原本报告和五个月之后出现的“主要著作”比较一下。报告中包括西塞罗-福格特“亲自发表的”演说,他在这个演说的开头吐露了他参加这一节日的秘密。他出现在工人中间,向他们发表演说的原因是:

“最近有人对他提出了严厉的责难,如果这些责难是可靠的,那就必然会根本动摇对他的信任,必然会完全破坏他的政治活动。”“我来到这儿”,——他接着说,——“我来到这儿是为了要在这儿发表演说,公开反对〈上述的〉阴谋诡计。”(报告第6—7页)

有人指控他进行波拿巴主义的阴谋活动,他应当拯救他的政治活动,按照自己的习惯用舌头来保护自己的一张皮。在徒劳无益地舞弄了一个半小时的舌头之后,他想起了狄摩西尼的劝告:“辞令的灵魂就是行动,行动,再行动”。

然而什么是行动?在美洲有一种叫做臭鼬的小兽,它在死亡威胁面前只有一种防御手段,即进攻性气味。它在遭到攻击时,便从自己身体的某一部分喷射出一种液体,把你的衣服烧坏;要是这种液体落在你的皮肤上,那你在一个时期内便不能同任何人接触。这种气味简直奇臭刺鼻,以致一旦猎狗惊起一只臭鼬,猎人们就得

① 西塞罗“反对卡提利纳的演说集”,引自第一篇演说的第4章。——编者注

急忙逃跑，吓得比狼或者老虎跟在后面时跑得还快。对狼和老虎是可以用火药和鉛彈来防御的，但对臭鼬的 a posteriori [屁股] 却一点办法也沒有！

这就是行动！——这位入了“兽国”³⁸⁶ 国籍的演說家自言自语地說，并且立即把臭鼬的芬芳向他的假想的迫害者噴去：

“但是，我坚决要向你們提出下列警告，——提防一小撮卑鄙家伙的詭計，他們的全套計謀是在使工人丢下自己的职业，使工人卷入形形色色的密謀和共产主义的詭計中去；他們在靠工人的汗水过活以后，最后就冷酷地〈当然是在工人流完了汗水之后！〉致工人于死地。現在这一小撮家伙又力图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尽可能多的手段〉把工人同盟引入他們布下的阴險的罗网里去。无论他們說些什么〈即关于福格特的波拿巴主义的詭計〉，但是要知道，他們一心向往的只是剝削工人以达到自私自利的目的，最后让工人听凭命运去摆布。”（报告第 18 頁。見附录）

“臭鼬”是不知耻的，他在議論我和我的那些一贯牺牲自身利益、大公无私地捍卫工人阶级利益的朋友时，竟无耻地說我們在“靠工人的汗水过活”，这种无耻甚至沒有什么新奇。不仅十二月的 mouchards [間諜們] 曾經在路易·勃朗、布朗基、拉斯拜尔等人的背后散布过这类恶毒的誹謗，統治阶级的告密者們也随时随地在同样无耻地对捍卫被压迫阶级利益的先进政治战士和作家造謠中伤。（見附录 5）

不过，在这一行动之后，我們的“圓滿的人物”就无法再保持自己的 sérieux [严肃的声調] 了。这个小丑把他的处于自由状态的“迫害者”比作“在措尔恩多夫村附近被俘的俄国人”，而把他本人比作——請猜猜比作誰？——弗里德里希大帝。福斯泰夫-福格特記得，弗里德里希大帝是从他参加的第一次战役中逃跑的。他却

沒有參加任何戰役就逃跑了，因此就更加偉大！^①

這就是根據原本報告所載，在洛桑中央節上發生的事。而“在這之後，請欣賞一下（用菲沙爾特的話來說）這個討厭的食客、笨拙而骯髒的廚子吧”，^②——看一看他在五個月之後竟給德國庸人熬出了多麼可笑的警察爛粥來。

“有人不惜任何代價在瑞士製造糾葛，準備給中立政策以決定性打擊……我得到通知說：他們打算利用德意志工人教育協會中央節來把工人們驅回工人早就堅決拒絕了的道路上去。他們想用美妙的中央節來組織秘密委員會，委員會應當同德國的志同道合的人進行接觸，應當採取上帝知道（福格特儘管得到了通知，但是不知道這一點）的一些措施。他們散布關於工人積極干預德國政治的各種混亂流言和秘密消息。我立即決定出面反對這類詭計，再一次警告工人們，要他們無論如何不要聽信這一類建議。我在上述演說結尾公開提出了警告，等等。”（“主要著作”第180頁）

西塞羅-福格特忘記他在演說開頭曾當眾洩露了究竟是什麼原因使他參加中央節的秘密，——不是瑞士的中立，而是拯救他自己的一張皮。他的演說對準備就緒的謀害瑞士的行為、對利用中央節的密謀計劃、對秘密委員會、對工人們積極干預德國政治以及“這一類”或任何別“類”建議，都只字未提。對這些施梯伯之歌只

① 在雅科布·費奈迭出版的抨擊性小冊子“保衛自己和祖國反對卡爾·福格特”（1860年漢諾威版）中，科貝斯第387敘述說：他“親眼看到，當我們大家，連同其他四個帝國攝政強迫維爾騰堡政府動用武力、從而使議會能光榮死去的時候，身為帝國攝政的卡爾·福格特竟沒有出面。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當其他四個攝政坐上車子，按約定向會議地點出發，要在那兒同‘殘闕’議會一道對着刺刀挺起胸膛（大家知道，“殘闕”議會是沒有腦袋的）時，——卡爾·福格特竟推上車門，向車夫喊道：‘喂，開車吧，車里已經坐滿了，我隨後就去！’但當各種危險都已過去的時候，卡爾·福格特來了。”（同上，第23、24頁）

② 約·菲沙爾特“關於格朗果施、高亮都亞和龐大固埃諸英豪和老爺的業績與名言的驚險長篇歷史故事”第3章。——編者注

字未提。他的最后的警告不过是誠实的賽克斯的警告，这个賽克斯在老貝利^①法庭上警告陪審員不要听信揭穿他干了盜窃勾当的那些“卑鄙的”暗探們的話。

福斯泰夫-福格特說(“主要著作”第 181 頁):“紧跟着发生的种种事件证实了我的預感。”

怎么，預感？但是福斯泰夫又忘記了，他在前面讲的根本不是什么“預感”，而是得到了“通知”，——得到了关于密謀者的計劃的通知，而且通知得頗为詳細！而紧跟着发生的种种事件，又究竟是——“你真是想像丰富的天使呀，你！”^②——什么样的事件呢？

“‘总汇报’的一篇文章强加給中央节和工人生活一种傾向，这种傾向是它們(即中央节和生活)根本不會想到过的。〈这完全同福格特把这种傾向强加給穆尔頓代表大会和所有工人組織一样。〉在这篇文章发表和它在‘法兰克福报’ 388 上被轉載以后，一位南德意志邦的公使就据以提出了秘密質問，使中央节具有一种意义”，——这种意义是“总汇报”的文章和它在“法兰克福报”上的轉載强加給中央节的嗎？根本不是，——“这种意义，按照硫磺帮的未能实现的計劃来看，是中央节本来应该具有的”。

原来如此！本来应该具有的！

虽然，为了戳穿西塞罗-福格特再一次拯救瑞士的秘密，只要把“主要著作”同記載中央节的原本报告粗略地比較一下就够了；但是我仍然希望查明：有没有什么事实，哪怕是被歪曲了的事实，能成为福格特式的着力的物质³⁸⁹。因此，我就写信給原本报告的編写人，日内瓦的格·洛美尔。洛美尔先生同福格特想必有过友好的交往，因为他不仅在編写关于洛桑中央节的报告时得到过福

① 老貝利是倫敦新門監獄的守護樓的名稱。中央刑事法庭設於此處。——譯者注

② 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十六場(“瑪爾特的花園”)。——編者注

格特的帮助，而且在后来出版的关于日内瓦席勒和罗伯特·勃魯姆紀念会³⁹⁰的小册子中，竭力掩盖福格特在这里又遭到的惨敗。洛美尔先生同我并无一面之交，他在1860年4月13日的回信中写道：

“福格特說什么他曾在洛桑挫敗了一次危險的密謀，这种說法純粹是臆造或謊言。他在洛桑只不过要寻找一个場所，借以发表以后可能出版的演說。他在这一个半小时的演說中，駁斥了說他是被收买的波拿巴主义者这样一种非难。这一讲稿現在还由我完整地保存着。”

一个住在日内瓦的法国人，在被問起福格特的这同一个密謀时，簡短地回答說：

«Il faut connaître cet individu» [“必須认清这个家伙”] (即福格特), «surtout le faiseur, l'homme important, toujours hors de la nature et de la vérité» [“这首先是一个妄自尊大的撒謊者，自然和誠实同他始終是格格不入的”]。

福格特本人在他的所謂“研究”³⁹¹第99頁上說，他“从来沒有自詡为預言家”。但是人們从旧約中知道：驴子看到了預言家所沒有看到的東西。而这样一来也就清楚了：为什么福格特看到了他在1859年11月才对之有預感的密謀，而在1859年6月就已把它“挫敗了”。

6. 其 他

“要是我沒有記錯”，——議會小丑說，——“那末，通告〈即虛構的1850年告无产者的倫敦通告〉無論如何是由馬克思的拥护者、所謂議會的狼草拟的，并被背地塞給了汉諾威警察当局。現在，在‘祖国友人告哥达党人’的通告这一事件中，这条渠道又露出来了。”（“主要著作”第144頁）

渠道露出来了！自然科学的打諳者的 Prolapsus ani〔直腸脫出来〕了嗎？

至于談到“議会的狼”，——为什么議会的狼就像恶梦一样纏着議会小丑，这事我們在下面就会知道，——那末，他曾在柏林“人民报”、“总汇报”和汉堡“改革报”上发表过下列声明：

“声明。1860年2月6日于曼彻斯特

我从一位友人的信中得知，‘国民报’（今年第41号）在根据福格特的小册子写成的一篇社論中，发表了下列意見：

‘1850年曾从倫敦发出告德国无产者的另一个通告，福格特认为，它是由議会的狼，alias〔或者叫〕被囚的狼草拟的，同时被背地塞給了汉諾威警察当局。’我既不會看到这一号‘国民报’，也不會看到福格特的小册子，因此，我只能对上面引证作如下答复：

（1）1850年我住在苏黎世，而不住在倫敦，1851年夏天我才移居倫敦。

（2）我平生既沒有草拟过告‘无产者’的通告，也沒有草拟过告其他人的通告。

（3）至于用汉諾威警察当局詆毀我一事，那末，我要以鄙視的态度把这种无耻的攻击回敬給它的制造者。如果福格特小册子的其他部分也像涉及我的那部分一样丑恶和虚伪，那它真堪与謝努和德拉奧德这样一些先生們的創作媲美。

威·沃尔弗”

由此可見，正像居維叶根据一根骨头就能恢复动物的整个結構一样，沃尔弗按照抽出的一段引文就能正确地想像出福格特的全部文字杂拌。的确，把卡尔·福格特同謝努和德拉奧德并列，他就显得是 primus inter pares〔在同輩中数第一〕了。

我的妻子是前普魯士大臣馮·威斯特华倫先生的妹妹。这成了“并不为难的”福格特的最后一个“证据”，证明我同秘密警察当局之間的 entente cordiale〔誠意协商〕，“证明我特別同‘十字

报’³⁹² 派之間的关系”（“主要著作”第 194 頁）。怎样打退肥胖的福斯泰夫的这类卑鄙攻击呢？要是这位小丑知道我的妻子有一位苏格兰祖先^①，因参加反对詹姆斯二世的解放斗争而被当做叛乱者在爱丁堡市場上丢掉了脑袋，那他也許会原諒她有普魯士大臣这样一个亲屬的吧？大家知道，福格特自己仅仅由于偶然性还在肩膀上留着一个脑袋。在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在日内瓦举办的罗伯特·勃魯姆紀念会（1859 年 11 月 13 日）上，他报告說：

“法兰克福議会左派會好久不能决定派誰去維也納，派勃魯姆去还是派他去。于是最后就抽签，而命运作出了有利于勃魯姆的决定，或者更正确些說，命运作出了反对他的决定。”（“日内瓦席勒紀念会等等” 1859 年日内瓦版第 28、29 頁）

10 月 13 日，罗伯特·勃魯姆从法兰克福去維也納。10 月 23 日或 24 日，法兰克福議会极左派的代表团在去柏林参加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的途中，到了科倫。我会見了代表团的团員們，其中有几个人同“新萊茵报”关系甚密。这些代表們——其中有一个在維護帝国宪法的运动中被战地法庭枪决了，另一个在流亡中死了，有一个还活着，——就福格特对罗伯特·勃魯姆在維也納的使命玩弄的詭計，告訴我一些令人不安和奇怪的情况。但是：

叫我別說話，叫我不作声，
因为保密是我的責任。^②

在上述的日内瓦罗伯特·勃魯姆紀念会上（1859 年 11 月），“圓滿的人物”遭到了冷遇。当他巴結逢迎地跟着他的庇护人詹姆斯·法济，像錫侖一样搖搖晃晃地走进紀念会會場的时候，有一个

^① 阿盖尔伯爵。——編者注

^② 歌德“迷娘”。——編者注

工人喊道：瞧，亨利来了，后面跟着福斯泰夫！当福格特在他的彬彬有礼的笑談中把自己說成是罗伯特·勃魯姆的 alter ego〔第二个“我”〕的时候，人們好不容易才把几个急躁的工人劝住，沒有讓他們冲上讲台去。最后，当他——他忘記他在6月还在預防革命，——現在亲自“再一次号召工人們走向街垒”（“席勒紀念会”第29頁）的时候，場內响起了一陣嘲笑的回声：“街垒！——一堆！”^①但是，国外十分清楚福格特的那一套革命空談究竟值多少錢，因此，这次甚至沒有随之出現通常的“一位南德意志公使的秘密质問”，而且在“总汇报”上也沒有出現任何文章。

福格特的全部施梯伯之歌，从硫磺帮到“前大臣”，不禁使人想起了但丁所說的那类詩歌能手：

Ed egli avea fatto del cul trombetta.^②

① 在德文中«Barrikaden—Fladen»（“街垒—扁餅”）这两个字的尾音相同。——編者注

② 他把他的臀部也变成了喇叭。〔但丁“神曲”地獄篇第二十一首歌。馬克思把康內吉塞尔翻譯的但丁的这句詩的德譯文放在脚注里，并把譯者的姓放在括弧內。〕——編者注

四 泰霍夫的信

“圓滿的人物”又从

«tristo sacco

Che merda fa di quel, che si trangugia».

(Dante)①

中取出了什么东西呢？

泰霍夫的信，1850年8月26日寄自倫敦。

“我能用来評定这类〈即硫磺帮的〉勾当的最好方法，就是在这里引用一个人的信；这个人，凡是認識他的〈！〉，都說他是一个正派人；我所以敢于公布〈公布正派人呢，还是公布信？〉，因为这本来就是专供通知〈通知誰呢？〉用的，而以前妨碍公布的那些顾虑〈誰的顾虑？〉，已經不复存在了。”（“主要著作”第141頁）

泰霍夫于1850年8月底从瑞士移居倫敦。他的信是寄給前普魯士中尉席梅尔普芬尼希（他当时住在伯尔尼）“通知朋友們”的，即通知“集中”的成員們的；“集中”是一个十年前就宣告結束的秘密团体，由侨居瑞士的德国流亡者建立，成員极为复杂，其中有大批議會議員。泰霍夫是这个团体的成員，但福格特和他的朋友們并不是。那末，泰霍夫的信怎么会落到福格特手里，又是誰授权

① “把食物变成粪便的臭皮囊。”（但丁）

〔“神曲”地獄篇第二十八首歌。〕——編者注

他公布的呢？

1860年4月17日，泰霍夫本人从澳大利亚写信告诉我說：

“無論如何，我从来没有理由授权卡尔·福格特先生去干这件事情。”

在泰霍夫这封信本应通知的“朋友們”中間，只有两位还在日内瓦。现在就让他们两位自己來說吧：

“埃^①致席利。1860年4月29日于格劳宾登州的上恩加丁。

当福格特的小册子‘我对“总汇报”的訴訟’出版时，因其中載有泰霍夫1850年8月26日給他的瑞士朋友們的一封信，我們这些还在瑞士的泰霍夫的朋友，便决定以书面形式向福格特表示我們不滿意他这种未經允許擅自发表此信的做法。泰霍夫的信是寄給在伯尔尼的席梅尔普芬尼希的，并应轉抄給朋友們……我感到高兴的是，事情果然不出我們所料：在泰霍夫的朋友中間，即有权持有8月26日这封信的人中間，没有一个人像这位意外得到这封信的人那样利用过它。1月22日，我們給福格特写了一封信，对他这种未經允許擅自公布泰霍夫的信的做法表示不滿，抗議他以后繼續濫用这封信的任何行为，并要求把該信寄回。大約是1月27日，福格特回信說：‘泰霍夫的信本是用来通知朋友們的；得到这封信的一位朋友特地把信交他发表……他只能把信交还給他信的那个人。’

“博^②致席利。1860年5月1日于苏黎世。

給福格特的信是同埃事先商定而由我执笔写的……拉^③不是泰霍夫的信要通知的‘朋友們’之一；然而福格特从信的内容知道信也是給我的，但他不願征得我同意发表这封信。”

为了解开这个謎，我从上引的席利的信中留了一段話备用。这段話是这样的：

“我之所以不得不在这里提到这位拉尼克爾，是因为泰霍夫的信想必是

① 埃梅尔曼。——編者注

② 博伊斯特。——編者注

③ 拉尼克爾。——編者注

通过他而落到福格特手里的；你問起的这一点，我差点儿把它忽略了。这封信是泰霍夫写給同他一起在苏黎世生活过的朋友們——席梅尔普芬尼希、博、埃等人的。我作为这些朋友的朋友和泰霍夫本人的朋友，后来也得到了这封信。当我突然被粗暴地驅逐出瑞士（事先我没有得到任何通知就在日内瓦街上被捕了，并且立即被架走了）的时候，連回住所整理一下东西都不允許。因此，我从伯尔尼監獄写信給在日内瓦的一个可靠的人，即鞋匠师傅屠姆，請他拜托还留在那儿的我的任何一个朋友（因为我不知道誰在当时也同我一起被粗暴地攆走了）把我的东西收拾一下，把其中最貴重的給我寄到伯尔尼来，其余的則暫時代管一下，并請他仔細挑选一下我的文件，千万不要把不能通过法国的东西給我寄来。事情就这样办了，但是泰霍夫的信沒有給我寄来。在留下的文件当中，有几份同議員們当时反对日内瓦流亡者救济金地方委员会（該委员会由三个在日内瓦的公民組成，即屠姆和两个流亡者：貝克尔和我）一事有关；拉尼克爾由于拥护这个委员会而反对議員們，对这些文件是很熟悉的。因此，我力請委员会的會計和档案保管員屠姆通过拉尼克爾的协助，从我的文件中把上述文件找出来。拉尼克爾既然被邀协助檢查我的文件，可能他就以某种方式，說不定是从一位檢查我的文件的人手里搞到了泰霍夫的信。我对于从我这儿轉到他手里的这种占有的轉移（应把它同所有权的轉移加以区别）絲毫不加反对；但是我非常坚持保留我对这封信的所有权。于是我馬上从倫敦写了一封信給拉尼克爾，要他把信寄給我。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从这时起，他的 *culpa manifesta* [明显的罪过] 也就开始了，最初还是 *levis* [輕微的]，但后来，随着他共謀未經許可擅自发表此信而 *magna* [变本加厉] 了，以至发展成 *maxima culpa* [极严重的罪过]，甚至发展到 *dolus* [欺騙] 的地步。我从来不怀疑发表此信是未經允許的，任何收信人都沒有授权什么人去干这件事情；不过，为了弄个水落石出，我要写信給埃問一下。至于拉尼克爾插手公布此信这一点，由于大家都知道他同福格特关系密切，也就无可怀疑了。虽然我絲毫想去批評这种密切关系，但也不能不在这儿指出它跟过去情况是多么不同。要知道，拉尼克爾不仅是最大的議會野心家之一，而且特別对帝国掣政流露出嗜血的情緒。‘我一定要招死这个坏蛋’，——他喊道，——‘即使我因此不得不到伯尔尼去。’为了制止他对一个显要人物采取恐怖手段，差一点要給他穿上精神病患者的拘束衣了。可是現在，当看来他已恍然大悟，从扫罗一变而为保罗的时候，我倒很想看一看，

他在另一方面，即作为**欧洲复仇者**，将怎样脱身。在他究竟是选择欧洲还是美洲而犹豫不决时，他曾说，我经过了艰苦的斗争，但是这已经幸运地结束了，我仍然活着——而且我将复仇！！让拜占庭发抖吧！”

席利的信就是这样。

可见，**拉尼克尔**是从席利的流亡者档案中探出^①泰霍夫的信的。尽管席利从伦敦提出要求，但他没有把信寄回。于是“朋友”**拉尼克尔**把窃取来的信转交给“朋友”福格特，而“朋友”福格特则以他所固有的道德上的委婉宣称他有权公布这封信，因为福格特和**拉尼克尔**也是“朋友们”呀。这样一来，谁写信“通知朋友们”，因而也就是写信给福格特和**拉尼克尔**这样的“朋友们”——arcades ambo〔两个阿尔卡迪亚人〕、〔两个来自阿尔卡迪亚的人〕^②。

我很遗憾，这种别致的法学竟使我想起了遗忘差半、埋没已久的往事。但是**拉尼克尔**既然已经开了头，那我也就不得不奉陪了。

共产主义者同盟是1836年在巴黎成立的，最初用的是另一个名称。它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机构：一定数目的成员组成一个“支部”，同一城市的各支部组成一个“区部”，数目或多或少的区部组成一个“总区部”；整个组织由中央委员会领导，中央委员会由所有区部的代表大会选出，但它有权自行补充其委员，也有权在紧急情况下任命自己的暂时继任者。中央委员会起初设在巴黎，从1840年到1848年初改设在伦敦。支部、区部的领导人和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全是选举出来的。这种民主制度，固然完全不适用于一个策

① 在德文中用的动词是«aufstiebern»,意思是“探出”、“仔细搜寻”，它同警探施梯伯(Stieber)的名字发音相似。——编者注

② 这是拜伦在其小说“唐璜”(第四首歌第九十三节)中曾经用过的味吉尔的话，意思是“两个坏蛋”；这一用语已成了普通用语。——编者注

划阴谋的秘密团体，但至少同一个宣传团体的任务是不矛盾的。同盟的活动，首先是建立公开的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这类协会至今还存在于瑞士、英国、比利时和美国，它们大部分是直接由同盟建立的，或者是由同盟以前的盟员创办的。因此，这类工人协会的組織到处都是一个样子。每星期当中规定一天讨论，一天社会娱乐（唱歌、朗诵等等）。到处都建立了协会的图书馆，而且，凡是有可能的地方，都开班给工人讲授基本知识。在这些公开的工人协会后面进行领导的同盟，既可以把协会用作进行公开宣传活动的极为方便的场所，另一方面，又可以从中吸收非常能干的成员来充实自己和发展自己。由于德国手工业者过着辗转奔波的生活，中央委员会只是在极个别的情况下才需要派遣特使。

至于同盟本身的秘密学说，它经历了法、英两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以及它们的德国变种（例如魏特林的幻想）所经过的各种变化。从布倫奇里的报告³⁹³中可以看出，从1839年以来，除了社会问题以外，宗教问题也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德国哲学从1839年到1846年这一时期内所经历各个不同阶段，都在这些工人团体内部找到了极其热烈的追随者。这个团体的秘密形式起源于巴黎。同盟的主要目的是在德国工人中间进行宣传，这种目的要求它在后来也保持这种形式。我第一次逗留巴黎期间，经常同那里的同盟领导人以及法国大多数工人秘密团体的领导人保持私人交往，但并没有加入其中任何一个团体。在布鲁塞尔（是基佐把我放逐到那里去的），我曾同恩格斯、威·沃尔弗等人成立了一个到目前还存在的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³⁹⁴。同时，我们还出版了一系列抨击性小册子，有的是铅印的，有的是石印的；我们在这些小册子里，对构成当时同盟的秘密学说的那种英、法两国社会主义或共产

主义同德国哲学这二者的杂拌儿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为了代替这种杂拌儿，我們提出把对资产阶级社会經济结构的科学研究作为唯一牢靠的理論基础，最后并用通俗的形式說明：問題并不在于实现某种空想的体系，而在于要自觉地参加我們眼前发生的革命地改造社会的历史过程。在我們的活动的影響下，倫敦中央委员会同我們建立了通訊联系，并在1846年年底派了一个中央委員、钟表匠約瑟夫·莫尔（他后来以一个革命士兵在巴登戰場上陣亡了）到布魯塞尔来，邀請我們加入同盟。我們对这种建議有种种顾虑，但都被莫尔打消了，因为他通知說，中央委员会准备在倫敦召开同盟代表大会，大会上，我們所坚持的各种批判的观点，将作为同盟的理論在正式的宣言中表現出来；他又說，可是为了同保守派分子和反对派分子作斗争，我們必須亲自参加大会，这就涉及到我們要加入同盟这样一个問題了。这样，我們就加入了同盟。代表大会举行了，参加大会的有来自瑞士、法国、比利时、德国和英国的同盟盟員，經過几个星期的激烈辯論以后，通过了由恩格斯和我起草的“共产党宣言”，該宣言于1848年初問世，后来又出版了英文、法文、丹麦文和意大利文的譯本。二月革命爆发时，倫敦中央委员会委托我领导同盟。在德国革命时期，同盟的活动自行中断了，因为已有了更有效的途徑来实现它的目的。1849年夏末，当我再次被赶出法国来到倫敦的时候，我发现那里殘缺不全的中央委员会已經重整旗鼓，并且同恢复起来的德国各区部重新建立了联系。过了几个月，維利希来到了倫敦，根据我的建議，他被吸收参加中央委员会。他是由恩格斯介紹給我的，恩格斯曾担任他的副官参加了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为了对同盟的历史作出全面的介紹，我还要指出：1850年9月15日，中央委员会内部发生了分裂。中央

委員會的多数派，連同恩格斯和我，都決定把中央委員會的會址遷往科倫，該地早就是德國中部和南部的“總區部”的所在地；除了倫敦以外，科倫也是同盟的知識分子的最重要集中地。

我們同時退出了倫敦工人教育協會。中央委員會的少數派，在維利希和沙佩爾領導下，成立了宗得崩德³⁹⁵，它不僅同工人教育協會保持聯繫，而且還同瑞士和法國恢復了從1848年起就已中斷的關係。1852年11月12日，科倫案件的被告們被判罪。過了幾天，根據我的提議，同盟宣告解散。一份關於同盟解散的文件（注明日期是1852年11月），我已經附在我對“國民報”的訴訟案的文件里。這份文件指出，同盟之所以解散，是因為從德國大肆逮捕以來，即從1851年春天以來，同大陸上的一切聯繫實際上都已經中斷了；加之這種宣傳團體也根本不合時宜了。過了幾個月，即1853年初，維利希—沙佩爾的宗得崩德也壽終正寢了。

引起上述分裂的原則性原因，我在“揭露科倫共產黨人案件”一書中已經敘述過了，該書轉載了1850年9月15日舉行的中央委員會會議記錄的摘要。而最直接的實際原因，則是維利希想把同盟卷入德國民主主義流亡者的革命兒戲中去。對於政治形勢的截然相反的估計，使分歧更加尖銳。我只舉一個例子。譬如，維利希認為，普魯士和奧地利在黑森選帝侯國和德意志聯邦問題上的爭執³⁹⁶會引起嚴重的衝突，並會給革命派造成進行實際干涉的機會。1850年11月10日，即同盟分裂以後不久，他發表了一個用這種精神擬成的宣言：“告各國民主主義者書”，這是由宗得崩德中央委員會以及法國、匈牙利和波蘭的流亡者簽署的。相反，恩格斯和我則主張（這一點可以在“新萊茵報評論”（1850年5—10月合刊，漢堡版第174、175頁）上看到）：“所有這一切喧嚷是不会有任

何結果的…… 斗争的双方——奥地利和普鲁士就可以不流一滴血，和平地坐在法兰克福联邦议会³⁹⁷里，但是，它们互相之间的无谓的嫉妒，它们与自己臣民之间的分歧以及它们对俄国最高统治权的不满都不会因此就有任何减少。”³⁹⁸

維利希由于他的个性（不过他无疑是一个能干的人），也由于当时（1850年）记忆犹新的伯桑松事件的影响，对于因意见对立而成为不可避免的、每天都在重复的冲突，是否能作出“公正的”判断，这可以根据下列文件得出结论。

“南錫德国纵队

致德国‘自救’武装协会主席——

俾尔的約·菲力浦·貝克尔公民

公民：

我們謹向你这位由德国全体共和主义流亡者选出来的代表报告，我們已在南錫成立了一个德国流亡者纵队，名叫‘南錫德国纵队’。

組成这里的纵队的流亡者，一部分是以前維祖耳纵队的成員，一部分是會參加伯桑松纵队的成員。他們离开伯桑松，純粹是出于民主的考虑。

問題是維利希干什么事情，很少同纵队商量。因此，伯桑松纵队的基本規章根本不是經全队討論而建立的，而是由維利希武断地提出的，未經纵队同意就执行了。

后来維利希发出的一系列命令，也向我們确凿地证明了他的独断专行；这些命令由耶拉契奇或文迪施格雷茨来发布倒是很合适的，而对一个共和主义者是完全不相称的。

維利希竟下令要从一个即将离队的名叫舍恩的隊員的脚上脫下用纵队的儲蓄給他买的一双新鞋，却不考虑这项儲蓄也有舍恩的一份，因为它主要是靠每人每天从法国得到的10个苏的津貼里积累起来的…… 他想把鞋穿走。維利希却下令把它脫下来。

維利希因为一点小事情——譬如点名或操练时缺席啦、（晚間）迟到啦、日角啦，——竟不問一下纵队就把几个能干的隊員从伯桑松赶走了，赶走时

还对他們說，他們可以到非洲去，因为再不允許他們呆在法国；要是他們不去非洲，他就下令把他們驅逐出去，即驅逐到德国去，因为法国政府給了他处理这事的全权。后来有人向伯桑松省政府問起这件事情，得到的回答是此事并非屬实。維利希几乎每天点名时都說：誰要是不乐意，願意走就可以走，而且越快越好，可以到非洲去，等等。有一天，他甚至籠統地威胁說：誰不服从他的命令，那末，要是不到非洲去，就得送到德国去；为了这件事也向省政府提出了質問。由于每天都有这类威胁，許多人對伯桑松的生活感到厌烦了，因为在那里，像他們所說的那樣，每天都有人叫他們滾蛋。他們說：要是我們願意做奴隶，我們可以到俄国去，或者当初就根本不必在德国干一番什么事业。他們說，够了，要是在伯桑松再呆下去，就得同維利希大鬧一場，因此他們就走了。但是，因为当时哪儿也沒有一个能够收容他們的纵队，另一方面，也因为他們不能靠 10 个苏活命，所以，除了应募到非洲去以外，別无他途，他們也就这样办了。維利希就这样使 30 个正直的公民陷于絕望境地，由于他的过錯，使祖国永远失去了这批力量。

其次，維利希竟非常不明智，因而在点名时总是夸奖他的旧部下，而貶低新来的人。这种做法經常引起糾葛。維利希有一次在点名时甚至說，普魯士人在头脑、心灵和体格方面，或者如他所說的，在体力、德性和智力方面都比南德意志人强得多。南德意志人的特点却是善良，其实他想要說的是愚蠢，但他沒有这个胆量。这样一来，維利希就把当时占大多数的南德意志人惹得恼怒不堪。最后，他还有下面这样一种极其粗暴的行为。

两个星期以前，第七連让一个被維利希亲自下令赶出兵营的名叫巴罗焦的隊員再住一夜，这个連不顾維利希的禁令，把他留在連的駐地里，并且不让維利希的拥护者、狂热的裁縫們走近这个駐地。于是維利希就下令拿繩子，把这群造反的人綁起来。繩子真的拿来了，但是，要彻底执行这一命令，維利希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这就是他們离开的原因。

我們在这里写了这些事，并不是要控告維利希。維利希的品格和意图是好的，我們当中有許多人尊重他，但是，他为了达到他的目的所采取的方法和手段，不能完全使我們滿意。維利希的意图是善良的。然而他自以为是智慧和 *ultima ratio*〔最高理智〕的化身，他把每个即使在小事情上同他对立的人，都当做蠢才或者叛徒。总之，維利希除了自己的意見以外，不承认任何别的意見。他在精神上是一个貴族，也是一个暴君，如果他想干什么，那他是

不擇手段的。但是够了！我們現在已認清維利希了。我們知道他的長處和短處，因此我們就離開了伯桑松。此外，所有人在離開伯桑松的時候都說，他們離開維利希，但他們並不退出德國‘自救’武裝協會。

維祖耳人也是如此……

最後，順致崇高的敬意，並代表南錫縱隊致兄弟般的敬禮和握手。

1848年11月13日由全體大會通過。

代表縱隊並受縱隊委託

秘書 B.

1848年11月14日於南錫”

現在回頭來談泰霍夫的信。就像別的爬蟲一樣，他的信的毒也在尾巴上，也就是在9月3日（1850年）的附筆中。那里談到我的一位早逝的朋友康拉德·施拉姆同維利希先生的決鬥。1850年9月初，在安特衛普進行的那場決鬥中，泰霍夫和法國人巴特爾米充當維利希的助手。泰霍夫在寫給席梅爾普芬尼希“通知朋友們”的信中說：

“他們〈即馬克思及其擁護者〉抬出他們的騎士施拉姆來反對維利希，後者用一大堆極其粗野的話痛罵了他〈泰霍夫想要說的是：他痛罵後者〉一頓，最後引起了一場決鬥。”（“主要著作”第156、157頁）

對於這種荒謬絕倫的捏造，我已經在七年前出版的、上面引證過的抨擊文章“高尚意識的騎士”（1853年紐約版）中駁斥過了。

那時施拉姆還活着。他和維利希都住在美國。

當時維利希的助手巴特爾米還沒有被絞死；施拉姆的一名助手、出色的波蘭軍官米斯科夫斯基還沒有被燒死，而泰霍夫先生也還不會忘記他那封“通知朋友們”的通函。

在上述抨擊文章中，載有我的朋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於1853年11月23日從曼徹斯特發的一封信，信的結尾說：

“在施拉姆和維利希之間鬧到要求决斗的一次中央委員會會議³⁹⁹上，我〈恩格斯〉似乎〈按照維利希的說法〉犯了罪，因為在這件事發生之前不久，我和施拉姆一齊‘離開房間’，因而這就是通盤策劃了這件事。以前，似乎是馬克思〈按照維利希的說法〉‘唆使’施拉姆，而現在為了多樣化，我又充當了這個角色。一個老練的用手槍有經驗的普魯士尉官同一個可能從來沒有摸過手槍的商人之間的决斗，確實是一個把尉官‘掃掉’的頂好辦法。朋友維利希不顧這一點，還到處訴說——口頭上和書面上——似乎我們想槍殺他……施拉姆僅僅是被維利希的蠻橫行為所激怒。他提出同維利希决斗，使我們都大吃一驚。在幾分鐘之前，大概施拉姆本人也不會料到事情有如此的变化。很難想像有比這更不由自主的行動……施拉姆只是應馬克思的個人請求才離開〈會議室〉的，因為馬克思希望不要再繼續胡鬧。

弗·恩格斯”（“騎士等等”第7頁）⁴⁰⁰

從我這方面來說，泰霍夫竟會成為這類愚蠢謠言的傳播者是怎樣出乎我的意料，可以從同一篇抨擊文章的下面一段看出來：

“正如泰霍夫本人返回到倫敦後向我和恩格斯所說的，最初，維利希堅決地肯定，我意欲假施拉姆之手打發高尚人物回陰曹地府，並且他還用書面向全世界披露了這個思想。但是，經過三思之後，他確定了，慣於運用鬼一般滑的策略的我，不會考慮通過與施拉姆的决斗來收拾他。”（同上，第9頁）⁴⁰¹

泰霍夫在寫給席梅爾普芬尼希先生“通知朋友們”的信中所編造的東西，是轉述了別人說過的活。後來在同盟分裂時站在維利希一边的卡爾·沙佩爾，是掀起决斗一事的目擊者，關於這件事他這樣寫信告訴我說：

“1860年9月27日于培德

福德广场彼尔西街5号

亲爱的马克思：

关于施拉姆和維利希之間的丑事，奉告如下：

这件丑事是在中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闹出来的，这是他们俩在讨论时偶然发生的一场激烈争论引起的。我记得很清楚，你本人曾竭力使他们平静下来，要他们言归于好；而且，你就像我本人以及其他在场的中央委员一样，看来对这一突然爆发的冲突感到震惊。

祝好

你的 卡尔·沙佩尔”

最后我还要提一下，施拉姆本人在决斗以后过了几个星期，即在1850年12月31日的一封信里，指责我偏袒維利希。决斗前后，恩格斯和我对决斗一事曾公开向他表示不赞同，这使他当时很生气。他的这封信，以及我从他和米斯科夫斯基那里得到的有关那次决斗的其他文件，他的亲人们都可以查看。这些东西不宜公布。

1857年7月中，当康拉德·施拉姆从美国回到伦敦再来看我时，他这个年轻人的英俊而匀称的身体，已经被不治的肺结核病弄垮了，同时这种病就像光轮似地笼罩着他那别致而漂亮的头部。他以他固有的、从未失去的幽默，笑嘻嘻地首先把他自己的訃告给我看，这是他的一个饶舌的朋友听信了谣言而在纽约的一家德文报纸上发表的。经医生的劝告，施拉姆到泽稷岛的圣埃尔耶去了，恩格斯和我是在那里最后一次看见他的。施拉姆死于1858年1月16日。在安葬他的时候，圣埃尔耶的整个自由派资产阶级和居住在那里的全体流亡者都到了。致悼词的是乔·朱利安·哈尼；他是英国最优秀的人民演说家之一，以前是知名的宪章派领袖，在施拉姆逗留伦敦期间，他们俩很要好。施拉姆不但生性热情、大

胆、有如一团烈火，从不为日常生活忧虑，而且有辨别力，独创的见解，机灵的谈谐和天真的善良。他是我們党的潑息·霍士潑。

現在我們回头来談**泰霍夫**先生的信。他到倫敦几天以后的一个夜晚，曾同恩格斯、施拉姆和我在我們接待他的一家酒店里有过长时间的 rendez-vous [会晤]。他在1850年8月26日写給席梅尔普芬尼希“通知朋友們”的信里，叙述了这次 rendez-vous。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他，在这以后，也許还见过他两三次，但都是非常短暫的。然而，他立刻就看透了我和我的朋友們，看透了我們的头脑、我們的五臟六腑，并背着我們連忙把對我們心理特征的描述寄到瑞士去，同时苦口婆心地囑咐“朋友們”把它秘密复制出来，并且散发出去。

泰霍夫下了一番功夫来研究我的“心”。我是寬宏大量的，不想在这方面学他的样。就像巴黎的浪漫女郎那样，当她的朋友一談到政治时，她就說：«Ne parlons pas morale» [“咱們別談道德吧”]。

現在我們来談一下8月26日的那封信的收信人、前普魯士中尉**席梅尔普芬尼希**。我并不認識这位先生，也从来没有见过他。但我可以根据两封信來說明他。我只做了摘要的**1853年11月23日**的第一封信⁴⁰²，是我的朋友、前普魯士中尉和师团学校教官**威·施特芬**从**切斯特**寄給我的。信里說：

“有一次維利希派来这里（即科倫）一位名叫**席梅尔普芬尼希**的副官。这位副官給我很大荣誉，邀我到他那里去，并且坚决地相信，他有十分把握能够一眼看去就对整个形勢作出估計，比任何其他天天直接注視事实的人估計得更好。因此，当我告訴他，普魯士軍隊的軍官們决不会认为在他和維利希的旗帜下战斗是一种幸福，他們根本无意于 *citissime* [匆忙地]宣布成立維利

希式的共和国的时候，他就很瞧不起我了。使他更为恼怒的是，没有物色到一个没有什么头脑的人同意翻印他随身带来的告军官书，告军官书号召军官们马上公开表示拥护他称之为民主制的‘那个东西’。

他怒气冲冲地离开了‘被马克思奴役的科伦’（他对我这样写的），但是，他在其他某处翻印了这篇废话并散发给许多军官，因此，‘十字报’的‘观察家’得以揭穿这种变普鲁士军官为共和派的巧妙方式的童贞般的秘密。”

在出现这类趣闻时，我还根本不认识施特芬，他是1853年才来到英国的。席梅尔普芬尼希在下引的、写给后来被揭穿是法国警探的赫尔弗的信里，把自己的嘴脸刻划得更清楚了；赫尔弗是一个革命委员会的灵魂，这个革命委员会是席梅尔普芬尼希、叔尔茨、海弗纳尔以及当时金克尔的其他朋友们于1850年年底在巴黎成立的；赫尔弗也是叔尔茨和席梅尔普芬尼希这两员大将的密友。

席梅尔普芬尼希致赫尔弗（1851年寄往巴黎）：

“这里〈即伦敦〉目前发生了如下事情…… 我们已就准备贷款〈金克尔贷款〉的基础一事，向那里〈向美国〉我们认识的每个有势力的人写了信，建议他们首先在一定时期内亲自出面，在报刊上谈谈密谋组织的威力，并且指出，无论德国、法国或者意大利的积极力量，都永远不会离开战场。〈难道历史没有任何日期吗？〉^①…… 我们的工作现在进行得很顺利。如果你把那些过分顽固的人置之不顾，他们就会作出让步，乐于接受向他们提出的种种条件。明天，我把工作料理妥当之后，就同卢格和豪格联系一下…… 我的社会地位同你一样，都很困难。我们的事〈即金克尔的革命贷款一事〉急需办理。

你的 席梅尔普芬尼希”

① 马克思为了嘲笑席梅尔普芬尼希上面一句话的文法错误，在括弧里套用了他稍加改动的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反动议员利希诺夫斯基公爵所说的一句话，这位公爵在一次会议上说：“对历史权利来说，是不存在任何日期的”（«Für das historische Recht gibt es kein Datum nicht»），就是说，他用了在德语上不许可的双重否定。（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416页）席梅尔普芬尼希犯了同样的错误。——编者注

席梅尔普芬尼希的这封信，被收进了阿·卢格在“西方先驅报”（1853年9月11日路易斯維耳出版）上发表的“揭露”中。席梅尔普芬尼希在“揭露”发表以前就在美国了，他从来没有否认过这封信的真实性。卢格的“揭露”成了“来自柏林警察总局档案”这一文件的翻版。該文件是用辛凱尔迪在頁边上的一些筆記和其他一些证件編成的；这些东西要不是法国警察当局从巴黎的席梅尔普芬尼希和赫尔弗那里攫去的，就是从不来梅的杜朗牧师那里“探出”[aufgestiebert]的，要不然，就是在卢格的宣傳协会同金克尔的流亡者协会之間进行“老鼠与青蛙之战”⁴⁰³的时候，由同室操戈的弟兄們自己泄漏給美国的德文报刊的。辛凱尔迪曾談到席梅尔普芬尼希“以为警察在跟踪他”，因而匆忙地中断了为宣傳金克尔革命貸款的主張所作的普魯士之行；他在談話时所用的諷刺口吻是很能說明問題的。在同一“揭露”中，还有“巴黎委员会（即赫尔弗、海弗納尔、席梅尔普芬尼希等等）駐倫敦的代表”卡尔·叔尔茨的一封信，信里說：

“居留这里的流亡者昨天决定吸收布赫尔、弗兰克博士、維也納的瑞茲和即将来此地的泰霍夫参加談判。N. B. [注意]：在泰霍夫来到这里以前，不得用口头或书面向他透露这一决定。”（卡·叔尔茨給巴黎“亲爱的人們的信”，1851年4月16日于倫敦）

泰霍夫 1850年8月26日“通知朋友們”的信，是寄給这些“亲爱的人們”之一——席梅尔普芬尼希先生的。首先他把我的一些見解通知这位“亲爱的人”，这些見解原是我細心隱瞞，而他在我們唯一的一次会晤时，借助所謂 «in vino veritas» [“酒醉吐真言”] 从我这里很快探出来的。

“我”，——泰霍夫先生对“通知朋友們”的席梅尔普芬尼希先生說，——

“我……快结束时說，我一直設想他們〈馬克思、恩格斯等〉要比卡貝式的共产主义的幸福馬廐这种荒唐思想高明一筹”云云。（“主要著作”第150頁）

設想啊！可見，泰霍夫虽然絲毫不了解我們的观点，但他还是把它們設想为不十分“荒唐”，可真是够寬宏大量、謙遜温和的了。

姑且不談学术著作，他只要讀一下他在后面称之为我的“无产者問答书”的“共产党宣言”，他就会看到題为“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文献”这样詳尽的一章，看到这一章的最后一节“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这一节里写道：

“本来意义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体系，圣西門、傅立叶、欧文等人的体系，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間的斗争还不发展的最初时期出現的。关于这个时期，我們在前面已經叙述过了。誠然，这些体系的发明家虽然看到了阶级的对立，看到了統治着的社会本身中的破坏因素的作用。但是，他們看不到无产阶级方面的任何历史主动性，看不到它所特有的任何政治运动。由于阶级对立的发展是同工业的发展步調一致的，所以这些发明家也不可能看到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于是他們就去探求某种社会科学、社会規律，以便創造这些条件。这样，社会的活动就要由他們个人的发明活动来代替，解放的历史条件就要由幻想的条件来代替，无产阶级的逐步組織成为阶级就要由他們特意設計出来的社会組織来代替。在他們看来，今后的世界历史不过是宣傳和实施他們的社会計劃的历史…… 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义，是同历史的发展成反比的…… 所以，虽然这些体系的創始人在許多方面是革命的，但是他們的信徒总是組成一些反动的宗派，他們还总是梦想用試驗的办法来实现自己的社会空想，創辦单个的法

倫斯泰尔, 建立国内移民区 [Home-colonies], 創立小伊加利亚,^① 即袖珍版的新耶路撒冷。”(“共产党宣言”1848年版第21、22頁)⁴⁰⁴

最后一句話把卡貝的伊加利亚——或者如泰霍夫所說的“幸福馬廐”，——直截了当地称为“袖珍版的新耶路撒冷”。

恩格斯和我的观点, 在我們同泰霍夫会晤前許多年就已公开发表了, 而他根本不知道这些观点, 这充分說明了他的謬誤。我們且举几个例子, 让他自己來說明自己:

“他〈馬克思〉嘲笑那些跟在他后面死板地重复他的无产者問答书的蠢材, 也嘲笑維利希式的共产主义者, 就像嘲笑資产者那样。他唯一尊重的人就是貴族, 但这是真正的、知道自己身价的貴族。为了剝夺他們的統治, 他需要力量, 而这种力量只有在无产階級身上才能找到; 因此, 他就为这种力量剪裁了他的一套体系。”(“主要著作”第152頁)

因此, 泰霍夫就“設想”我編写了一本“无产者問答书”。他指的是“宣言”, 其中批判了, 如果泰霍夫願意的話, 也可以說是“譏笑了”形形色色社会主义的和批判的空想主义。不过, 这种“譏笑”却不像他所“設想”的那样輕而易举, 而是需要花一番力气的, 这一点, 他可以从我那部反对蒲魯东的著作“哲学的貧困”(1847年)⁴⁰⁵里看出来。泰霍夫还“設想”我“剪裁了”一套“体系”, 哪儿的話, 我甚至在直接为工人們写的“宣言”里, 也拋棄了一切体系, 而代之以

① 法倫斯泰尔是傅立叶所設計的社会主义移民区; 伊加利亚是卡貝給自己的理想国和后来他在美洲創立的共产主义移民区所起的名称。(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上加的注。)

国内移民区 (Home-colonies) 是欧文給他的示范性的共产主义社会所起的名称。法倫斯泰尔是傅立叶所設計的社会宮的名称。伊加利亚是具有卡貝所描繪的那种共产主义制度的烏托邦幻想国。(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90年德文版上加的注。)

“批判地了解实际社会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⁴⁰⁶。但是，这样一种“了解”，既不能跟在别人后面死板地重复，也不能像做一条子弹带那样来“剪裁”。泰霍夫所“设想”的、并背地塞给我的对贵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相互关系的那种看法，是天真得出奇的。

我“尊重”贵族；“嘲笑”资产阶级；我给无产者“剪裁了一套体系”，以便通过他们来“剥夺”贵族的“统治”。在“宣言”的第一章，即题为“资产者和无产者”（见“共产党宣言”第11页）⁴⁰⁷的一章里，详细地阐明了：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从而这样或那样形式的政治统治，无论对现代无产阶级的生存来说，或者对创造“实现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来说，都是基本的条件。“一般说来，现代无阶级的发展（见1850年1月“新莱茵报评论”第15页）是受工业资产阶级的发展所制约的。只有在工业资产阶级统治下，它才能获得广大的全国规模的存在地位，这种存在地位能够把它的革命提高为全国规模的革命；只有在工业资产阶级的统治下，它才能创造出现代的生产资料，这种生产资料同时又是它所能用以达到革命解放的手段。只有工业资产阶级的统治才能除掉封建社会的物质根基，并且为无产阶级革命铺平它唯一能借以实现的地基。”⁴⁰⁸因此，我在同一“评论”里宣称，没有英国参加的任何无产阶级运动，都是“杯水之浪”⁴⁰⁹。早在1845年，恩格斯就已在他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⁴¹⁰里发挥了同样的观点。因而，在那些还只不过是应该“剥夺”大陆意义上的贵族（泰霍夫正是这样理解“贵族”的）的“统治”的国家里，在我看来，还不具备无产阶级革命的首要前提，也就是还没有全国规模的工业无产阶级。

特别是，我对德国工人对待资产阶级运动的态度看法，泰

霍夫可以在“宣言”里看到非常明确的闡述。“在德国，只要资产阶级采取革命的行动，共产党就同它一起去反对君主专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小市民的反动性。但是，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等等。（“宣言”第23頁）⁴¹¹ 当我被控“造反”而站在科倫资产阶级陪审法庭上的时候，我用同样的精神宣称：“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还存在着阶级，可是已不再有等级了。它的发展就在于这些阶级的斗争，可是这些阶级却联合起来反对等级及其天赋王权。”（“两个政治审判案。2月由科倫陪审法庭审理”1849年版第59頁）⁴¹²

自由资产阶级从1688年到1848年向无产阶级发出的号召，不外是“体系和词句的剪裁”，以便通过它的力量来剥夺贵族的统治。因此，泰霍夫先生从我的秘密理论中抽出来的最本质的东西，不就是最平庸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Tant de bruit pour une omelette!*〔煎鸡蛋引起了多么大的喧闹！〕但是另一方面，因为泰霍夫毕竟知道，“马克思”不是一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所以他沒有别的办法，只好“得到一种印象：马克思的全部活动的目的，是建立他的个人统治”。“我的全部活动”，——把我同泰霍夫先生的唯一一次谈话说得多么客气啊！

其次，泰霍夫在写给由席梅尔普芬尼希“通知朋友们”的信里还透露说，我曾谈了下面这样一种駭人听闻的看法：

“可怜的欧洲是否要毁灭（如果没有社会革命，这是不久一定要发生的），美国到那时是否将牺牲欧洲的利益而利用旧制度，归根到底，都是完全无关紧要的。”（“主要著作”第148頁）

我同泰霍夫的谈话是在1850年8月底进行的。在1850年2

月号“新萊茵报評論”上，也就是泰霍夫从我这里打听出这个秘密前八个月，我曾向德国讀者揭示了下面一件事情：

“現在我們來談一談美国。美国最大的事件是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其意义超过了二月革命。時間仅仅过了18个月，現在就已經可以預料到，这一发现所带来的成果甚至将会比美洲大陆的发现所带来的要大得多…… 世界貿易第二次获得了新的方向…… 这样，太平洋就会像大西洋在現代、地中海在古代和中世紀一样，起着偉大的世界交通航綫的作用；大西洋的作用将会降低，而像現在的地中海一样成为內海。欧洲的文明国家到那时要不陷入像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目前那样在工商业和政治上的依附地位，唯一的条件就是进行社会革命”等等（1850年2月“評論”第2期第77頁）。⁴¹³

旧欧洲“不久将要毁灭”，美国第二天就会登上宝座之类的话，都只是泰霍夫先生說的。我当时对美国最近的将来認識得如何清楚，可以从同一号“評論”的下面一段看出来：“这里不久就会发生疯狂的投机，即使英国資本大量投入这类企业，紐約这一次仍然会成为整个这种投机的中心，而像1836年一样会首先遭到破产。”（“評論”1850年5—10月合刊第149頁）⁴¹⁴ 我在1850年給美国作的这种預測，已由1857年的商业大危机完全证实了。关于“旧欧洲”，我描繪了它在經濟上的蓬勃发展以后，倒是这样写的：“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資產階級社会的生产力蓬勃发展的時候，还談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 大陆的秩序党各派的代表目前所进行的无休止的爭吵是彼此为了使对方丢丑，而决不能导致新的革命；相反地，这种爭吵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目前社会关系的基础十分巩固，——这一点反动派并不清楚，——十分資产阶

級化。一切想阻止資產階級发展的反动企图都会像民主主义者們的一切道义上的憤懣和热情的宣言一样，必然会被这个基础碰得粉碎。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同上，第 153 頁）⁴¹⁵

事实上，欧洲的历史只是从 1857—1858 年的危机以后才又带有一种尖銳的、也可以說是革命的性質。事实上，恰好是在 1849 年至 1859 年这一反动时期，工商业在大陆上得到了前所未聞的大幅度的发展，資產階級政治統治的物质基础也随之加强了。事实上，在那个时期，“民主主义者們的一切道义上的憤懣和热情的宣言”都被經濟关系碰得粉碎了。

泰霍夫把我們談話中认真的東西理解成玩笑，于是对玩笑就更加认真了。他帶着一个参加葬仪的人所有的那种极其严肃的表情，开导他的“通知朋友們”的那位席梅尔普芬尼希說：

“馬克思又說，在革命中，軍官是最危險的因素。从拉斐德到拿破侖，这是一大批叛徒和一連串叛变。应当随时給他們准备好匕首和毒药。”（“主要著作”第 153 頁）

关于“兵老爷們”叛变的一套老生常談，甚至泰霍夫本人也不会认为是我的独创思想。独创之处显然在于要求随时准备好“匕首和毒药”。泰霍夫难道当时不知道，真正革命政府，例如 Comité de salut public⁴¹⁶ 曾給“兵老爷們”准备好了虽然能奏奇功異效但喜劇性較小的手段嗎？匕首和毒药至多能适用于威尼斯的寡头政治。如果泰霍夫把自己写的信再細看一遍，他就会从“匕首和毒药”这些字眼里看出諷刺来。福格特的同謀者、著名的波拿巴派 mouchard [密探] 爱德华·西蒙，在“現代評論”（1860 年巴黎版第 8 期第 528 頁，在他的“福格特先生的訴訟等等”一文中）上譯載

了泰霍夫的信中的上引的一段，并加了如下按語：

«*Marx n'aime pas beaucoup voir des officiers dans sa bande. Les officiers sont trop dangereux dans les révolutions.*

Il faut toujours tenir prêts pour eux le poignard et le poison!

Techow, qui est officier, se le tient pour dit; il se rembarque et retourne en Suisse».

〔“馬克思不很喜欢在他的帮里有軍官。在革命中軍官是危險的因素。应当随时給他們准备好匕首和毒药！

泰霍夫本人是一个軍官，他听到了这种話，于是就乘船回瑞士去了。”〕

照**爱德华·西蒙**的叙述，可怜的泰霍夫被我准备好的“匕首和毒药”吓得魂不附体，以致他立刻躲开，乘船回瑞士去了。而帝国的福格特用黑体字轉載“匕首和毒药”这一处，用以吓唬德国的庸人。然而，同是这个丑角在他所謂的“研究”里却写道：

“西班牙人的刀子和毒药今天放射出奇光異彩——因为問題涉及一个民族的独立。”（同上，第79頁）

附带提一下：西班牙和英国的有关1807年至1814年这一时期的历史材料，早已駁倒了法国人杜撰出来的关于毒药的神話。但对空談政治的人來說，这类神話当然还是原封不动地存在着的。

最后，我来談談泰霍夫信中的“流言蜚語”，并且举一些例子来证明他在历史上的公正态度：

“首先談的是他們同我們之間，即瑞士同倫敦之間的竞争。用他們的話來說，他們应当維護旧同盟的權利，这个同盟由于它的明确的党派立場，当然不能友好地对待在同一範圍（无产階級）內与之并存的另一个同盟。”（“主要著作”第143頁）

泰霍夫这里談的瑞士竞争团体就是上面已經提到过的“革命

集中”，泰霍夫作为这个团体的代表，在一定程度上是反对我們的。它的中央委员会設在苏黎世，领导該团体的主席是一位律师，1848年曾任某个小議会的副議長，1849年曾是德意志某临时邦政府的委員^①。1850年7月，德朗克来到苏黎世，在那里，这位律师先生把一份类似公证的協議交給他这个倫敦同盟的成員，叫他“通知”我。協議的全文如下：

“鉴于有必要把所有真正革命的人士联合起来，同时，尽管不是革命中央委员会的全体委員都能无条件地同意倫敦提出的綱領（1848年的“宣言”），但全都承认下一次革命是无产階級性质的革命，因此，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和‘革命集中’之間已达成了如下協議：

（1）双方同意今后共同进行工作，‘革命集中’通过联合一切革命人士来为下一次革命作准备，倫敦协会通过組織主要是无产階級分子来为无产階級統治作准备；

（2）‘革命集中’指示它的代表和特使，要他們在德国成立支部时，使他們认为适合加入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那些成員注意到有一个主要是为了无产階級利益而建立的組織；

（3）和（4）至于瑞士，其领导权則只应交給‘革命中央委员会’中真正拥护倫敦宣言的人。双方相互交换报告。”

从还在我手中的这份文件里可以看出：这里談的并不是“在同一範圍”（无产階級）內的两个秘密团体，而是在不同範圍內的和具有不同傾向的两个团体的联盟。其次，还可以看出：“革命集中”除了实现它本身的目的以外，还表示願意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某种分支。

这个建議被拒絕了，因为接受这种建議是与同盟的“原則”性不相容的。

^① 契尔奈尔。——編者注

“接着輪到了金克尔…… 他們回答說…… 他們从来没有追求过廉价的荣誉，——恰恰相反！至于金克尔，如果他安分守己的話，他們是会竭誠地让他享有他的廉价的荣誉的。但是，当他在柏林‘晚邮报’上发表了那个拉斯塔特的辯护詞以后，他就不可能平安无事了。他們早已知道各方面都会发出一陣号叫，而且他們已想像到，他們这样做就把自己現有的机关报〈“莱茵报評論”〉的存在孤注一擲。他們的这种担心果然证实了。他們因这一事件破了产，失去了莱茵省的所有訂戶，而不得不使报纸停刊。但这对他們來說是无所謂的。”（同上，第 146—148 頁）

首先，讓我們來核對一下事實：當時“評論”還沒有停刊，三個月以後還出了一期新的合刊，也沒有失去一個萊茵省的訂戶，這一點，我的老朋友約·魏德邁——前普魯士炮兵中尉、當時法蘭克福“新德意志報”⁴¹⁷的編輯能給以證明，因為他當時費心地替我們收報費。此外，只聽說過恩格斯和我的寫作活動的泰霍夫，至少也該讀過他本人批評過的我們對金克尔的辯護詞所作的批評。他給瑞士“親愛的人們”的秘密通知是干什么用的呢？為什麼要向他們“揭露”我們早在五個月以前就已向讀者揭露了的東西呢？上述的批評這樣指出：

“我們早已料到，我們在我們黨的面前揭露‘被俘的’金克尔的這篇辯護詞，會惹起所有溫情的偽善者和民主主義清談家的普遍憤懣。這一點我們是毫不在乎的。我們的任務是无情的批判……為了堅持我們的這種立場，我們情願放棄在民主派當中的廉价的荣誉。我們的斥責絲毫也惡化不了金克尔先生的處境；我們的揭露會使他進入赦免之列，因為我們在揭露中會證明，他說他不是人們所說的那種人的供詞是可靠的，並且我們還宣告說，他不僅應該赦免，甚至應該錄用他擔任普魯士國家職務。況且，他的辯護詞已經公布于世了。”（1850年4月“新萊茵報評論”第70、71頁）⁴¹⁸

泰霍夫說我們在“敗坏”革命的 *petits grands hommes*〔小偉人〕的“名譽”。然而，他并不是从福格特先生的**警察**意义上來理解这种“敗坏名譽”的。相反地，他所指的是我們从披上革命狼皮的羊身上撕掉那种刺眼外皮所採取的行動；我們这样就預先使这些羊免遭普罗凡斯的著名抒情詩人的那种命运，原来这位詩人披上狼皮去打猎，猎犬真以为是一只狼，就把他撕得粉碎了。

泰霍夫特別举出恩格斯的著作“**維護帝国宪法的运动**”（見1850年3月“評論”第70—78頁）⁴¹⁹中偶尔对**济格尔**將軍所作的評論做例子，來說明我們进行一种不光彩的攻擊。

那末，不妨把恩格斯的有案可查的批評跟那些議論同一位**济格尔**將軍的心怀叵測的廢話比較一下，这类廢話是我們同泰霍夫見面大約一年以后，由泰霍夫、金克尔、維利希、席梅尔普芬尼希、叔尔茨、亨·伯·奥本海姆、爱德华·梅因等人領導的倫敦流亡者协会印出來的，而他們这样做，仅仅是因为济格尔贊同卢格的鼓动者协会，而不贊同金克尔的流亡者协会。

1851年12月3日，“**巴尔的摩通訊員**”，这在当时仿佛是金克尔的“通报”⁴²⁰，在一篇題为“**倫敦鼓动者协会**”的文章里对**济格尔**作了如下的評論：

“我們再来看一下，这些把其余一切都看做‘**不成熟的政治家**’的可尊敬的人物，究竟是些什么人。这里有**总司令济格尔**。如果你問历史的繆斯，这个平庸无奇的微不足道的人是怎样达到总司令的地位的，那她就会比被問到低能的拿破侖的情况时更加狠狠。拿破侖至少是‘他伯父的侄儿’，而济格尔只是‘他弟弟的哥哥’。他的弟弟由于发表尖銳的反政府的言論而成为有聲望的軍官，不过，他的这些言論是由于經常为了最平常的腐化行为便遭到逮捕而引起的。年輕的济格尔认为这是在革命起义的最初的混乱时期宣布自己是**总司令和陸軍部长的充分理由**。在不止一次地证明自己具有优良品

质的巴登炮兵队里，有足够的較成熟的和真正的軍官，在他們面前，年輕的、毫无經驗的尉官济格尔不能不感到惶恐不安，而且，当他們必須服从这个无名的、既缺乏經驗又缺乏才能的年輕人的时候，他們感到相当的气憤。但是这里有布倫坦諾，他十分愚蠢，又蓄意叛变，因而能做出任何会毀灭革命的事情。不錯，这尽管是可笑的，但毕竟是事实：济格尔宣布自己是总司令，而布倫坦諾事后承认了他…… 無論如何，值得注意的是在拉斯塔特城下和黑林山脉中的絕望的殊死战中，济格尔把共和国軍队的极其英勇的士兵們交給命运去随意摆布，不給他們派出他答应派去的增援部队，而同时他自己却帶着菲尔施坦堡公爵的肩章，坐着他的輕便馬車在苏黎世城里环游，并且还以引人注意的失敗的統帅的角色自我炫耀。这位成熟的政治家的众所周知的偉大就是如此，他由于可以‘自认’以往有英雄的業績，所以又一次把自己任命为鼓动者协会的总司令。我們这位偉大的熟人，‘他弟弟的哥哥’就是如此。”

为了公正起見，我們也不妨听一下卢格的鼓动者协会通过它的发言人陶森瑙是怎么說的。陶森瑙 1851 年 11 月 14 日在倫敦写的“致澤登施提克尔公民”的公开信中，提到了由金克尔、泰霍夫等人領導的流亡者协会以及其他問題：

“……他們表示相信，为了革命的利益，把所有人都團結起来，是一种爱国义务和一件迫切事情。德国鼓动者协会贊同这种想法，而且它的會員們在多次試圖團結金克尔及其拥护者的过程中已证实了这一点。可是，政治合作的任何基础看来剛剛形成，它就消失了，新的失望随着旧的失望而至。恣意破坏以往的協議，在諒解的假面具下坚持单方面的利益，为了获得多数而进行有系統的欺騙，一些不知名的大人物以有組織才能的党領導人的姿态出現，强迫接受一个秘密財政委員會的企图，以及形形色色不可告人的鬼蜮伎俩，不成熟的政治家們老是想在放逐中通过这类东西来左右祖国的命运，可是，一碰到革命的火焰，这类沽名釣誉的盘算就化为灰烬了…… 金克尔的拥护者公开和正式地攻击我們；在我們难于接近的德国反动报刊上，對我們不利、而对金克尔有利的通訊盈篇累牘；而最后是金克尔到美国去，以便用他在那儿筹备好的所謂德国貸款来迫使我们接受联合，或者更确切些說，接受从屬和依賴关系，而这是每一个从財政上使党合并的发起人所期待的。金克

尔的离开是严守秘密的，因而我們只是从美国报纸上讀到他到达紐約的消息时才知道这件事…… 对于那些不夸大自己的作用、但意識到自己以往功績的严肃革命者，可以毫无愧色地說：至少人民中有一些阶层是支持他們的；这些事实和其他許多东西，就是加入一个按自己方式努力为革命利益服务的同盟的决定性理由。”

其次，有人指責金克尔，說他所募集的款項是“只”供“一个集团”使用的，“他在这儿〈倫敦〉和在美国的全部行动都证明这一点”，由“金克尔本人所提出的多数保证人”也证明这一点。

可是結尾却說：

“我們既沒有答应我們的朋友們要給他們的爱国捐款付息，也沒有答应他們要偿还捐款，但是我們知道，我們会用善意的行动〈实际的服务？〉和认真的會計制度来证明沒有辜負他們的信任；我們也知道，将来當我們公布他們的名字时，他們可以期待博得祖國的感謝。”（1851年11月29日“巴尔的摩警钟报”）

这就是鼓动者协会和流亡者协会的民主主义英雄們三年当中在美国的德文报刊上开展的一种“創作活动”，后来由戈克建立的新旧大陆革命同盟也参加了这种活动。（見附录6）

可是，流亡者在美国报刊上鬧无謂糾紛，是由埃尔斯的两个議員齐茨和律斯勒之間的一場紙上比武开始的。

这里还有一个事实，它能說明泰霍夫的“亲愛的人們”的特性。

席梅尔普芬尼希这位泰霍夫的“通知朋友們”一信的收信人，他在1850年底同赫尔弗、海弗納尔、戈克以及其他入（后来卡·叔尔茨也参加了）一起，在巴黎建立了（如前所述）一个所謂的革命委員會。

几年以前，有人把該委員會当时的一个委員写給这里一个政治流亡者的一封信轉交給我，由我随意处理。这封信还保存在我

这里。

信里有这样的话：

“叔尔茨和席梅尔普芬尼希把持了整个委员会。被当做陪审员那样吸收进来作为列席的其他人物，只不过是為了装装样子而已。这两位先生当时希望很快就能让已完全被他们攫为已有的金克尔去主持德国的事务。特别使他们感到深恶痛绝的是卢格的嘲讽以及马克思的批评和魔鬼般的活动。这两位先生有一次同他们的列席者会面时，妙趣横生地给我们把马克思描绘一番，并且使我们来自马克思方面的恶魔般的危险产生了夸大的看法……叔尔茨—席梅尔普芬尼希提出了消灭马克思的建议。造謠和阴谋、无耻透顶的诽谤都被抬出来当做手段。为此进行了表决，并且作出了一项相应的决议，如果对这种儿戏可以这样称呼的话。1851年初，在‘汉堡指南’的小品文栏里发表的、由路·海弗纳尔根据叔尔茨和席梅尔普芬尼希的上述描绘而编造出来的对马克思的评论，算是执行这项决议的最直接的一步。”

无论如何，海弗纳尔的小品文同泰霍夫的信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尽管它们二者都不能同福格特的“劳斯之歌”媲美。不应当把这一“劳斯之歌”同卡蒙斯的“卢兹之歌”混为一谈。相反地，最初的“劳兹之歌”是彼得·品得的一部英勇而滑稽的史诗⁴²¹。

五

帝国摄政和普法尔茨伯爵

Vidi un col capo si di merda lordo,
 Che non pareva s'era laico o cherco.
 Quei mi sgridò: Perchè se'tu si'ngordo
 Di riguardar più me, che gli altri brutti?
 (Dante)①

福格特遭到譴責后,急不可待地要想证明:为什么恰好是他这个 *bête noire* [可怕的东西,令人恐怖和憎恨的东西]② 引起了硫磺帮的注意。因此,关于舍尔瓦尔和洛桑中央节上“遭到挫折的密謀”这一类軼事,又由“流亡的帝国摄政”这种同样逼真的奇聞来补充。不應該忘記,福格特曾是議會島巴拉塔利亚的总督。⁴²² 他說:

“科拉切克的‘德国月刊’是从1850年年初起出版的。第一期出版之后,硫磺帮就立即通过它的一个成員(他在这以后馬上就动身到美国去了),发表

① 我看到一个髒鬼滿头都是污糞,
 以致看不出他是僧侶还是俗人,
 他向我咆哮:“你为什么老爱瞧着我,
 难道我比別人更污秽!?”

(但丁)

[“神曲”地獄篇第十八首歌。馬克思在引证康內吉塞尔的德譯文时,在脚注里注明了譯者的姓。] ——編者注

② 直譯是:“凶猛的野兽”。——編者注

了一本抨击性小册子，名为‘流亡的帝国摄政福格特及其党羽和阿道夫·科拉切克的“德国月刊”’。这本小册子，‘总汇报’也曾提到过…… 硫磺帮的整整一套在这本小册子里又一次表现出来了。”（同上，第 163 页）

接下去便是又长又臭的叙述：在上述小册子里有一篇由哈根教授写的論加格恩的匿名文章，把它“硬說成是”流亡的帝国摄政福格特写的，所以要这样說，是因为“硫磺帮知道”，哈根

“当时住在德国，正受到巴登警察当局的迫害，只要提到他的名字，都会給他增加极大的麻煩”（第 163 页）。

席利在 2 月 6 日从巴黎寄給我的一封信里写道：

“格萊納，——据我所知，他从未到过日内瓦，——被列入硫磺帮，是由于他写了一篇哀悼文献給‘流亡的帝国摄政’；議員們认为它是德斯特尔写的，因而咒罵他，一直罵到我 correspondendo [写信] 給福格特的一个朋友和同事，使他們弄清真相为止。”

格萊納曾經是普法尔茨临时政府委員。格萊納的統治是“一片恐怖”（見福格特“研究”第 28 页），特別对我的朋友恩格斯來說是如此，因为格萊納曾制造借口下令在基尔希海姆博兰登逮捕他。这一整个悲喜交集的事件，恩格斯本人已在“新萊茵报評論”（1850 年 2 月号第 53—55 页）⁴²³ 上詳細地叙述过了。这就是我所知道的有关格萊納先生的一切。在流亡的帝国摄政无中生有地把我牽連进他同“普法尔茨伯爵”之間的冲突这一点上，“整整一套”“又一次”表现出来了，这位天才的发明家就是按照这一套来編排硫磺帮的生活和活动的。

使我終於同他和好的是真正的福斯泰夫式的幽默，他以这种幽默使普法尔茨伯爵“馬上”动身到美国去。在普法尔茨伯爵像射出一支巴尔芬人的暗箭一样出版了反对“流亡的帝国摄政”的抨击

性小册子之后，恐怖包圍了格萊納。有一种什么东西把他从瑞士赶到法国，后来又从法国赶到英国。他在拉芒什海峡对面也并不感到安全，因而驅使他登上一艘丘納德公司的輪船，繼續前往利物浦；他一到船上，就气喘吁吁地央求船长道：“快点越过大西洋！”而«stern mariner»〔“严峻的水手”〕却回答他說：

“我一定救您脫离州官的暴力！
且让别人把您救出大風浪的怀抱。”^①

^① 席勒“威廉·退尔”第一幕第一場。——編者注

六

福格特和“新萊茵报”

«Sîn kumber was manecvalt»

〔“他的忧愁是多种多样的。”〕

福格特本人声明，他在“主要著作”里“必須”(同上，第 162 頁)“闡明他本人对这个集团〈馬克思之流〉的态度”。但奇怪的是，他所談的冲突，都是他从未经历过的，而他所经历过的冲突，却又是他从来不談的。因此，我不得不把他的荒誕的故事同少許真情实况对照一下。如果翻閱一下“新萊茵报”合訂本(从 1848 年 6 月 1 日至 1849 年 5 月 19 日)，那就会发现，在 1848 年，除了唯一的一次例外，福格特的名字既未見于“新萊茵报”的社論中，也未見于該报的通訊中。他的名字只是出現在有关議會辯論的日常报道中，而且，法兰克福的这些报道的撰写人为了取悅于福格特先生，从来都不忘記认真地写上“他发表的演說”所博得的“掌声”。我們看到，当法兰克福議會右派拥有像利希諾夫斯基那样的喜劇小丑和像馮·芬克那样的馬戏团小丑的联合力量时，左派却只好滿足于福格特一个人扮演的单人滑稽剧。我們了解，他需要夸奖——

«that *important fellow*,

the children's wonder — *Signor Punchinello*,

〔“这个自命不凡的家伙，

孩子們的活宝——潘奇內洛先生，”〕

因此，我們就讓這位法蘭克福的通訊員去為所欲為。1848年9月中以後，報道的語氣開始有了轉變。

在辯論馬爾摩停戰協定中用誇張的革命空談來煽動起義的福格特，在緊要關頭卻竭力阻撓接受那些由普芬斯特瓦得人民集會提出的並得到一部分極左派分子贊同的決議⁴²⁴。在街壘戰失敗，法蘭克福變成一座兵營，並在9月19日宣布戒嚴之後，同是這個福格特卻同意立即討論察哈里埃提出的關於贊同帝國內閣迄今採取的各項措施並向帝國軍隊表示感謝的建議。在福格特登上講台之前，甚至連費奈迭也反對“立即討論”這些建議，他宣稱：在這樣的時刻進行這類辯論，是同議會的尊嚴不相容的。但是福格特勝過了費奈迭。為了懲罰這種做法，我在議會的報道中，在“福格特”這幾個字上加了“空談家”幾個字，這是對法蘭克福通訊員的一種言簡意賅的暗示。

同年10月，福格特不僅不再在當時蠻橫無禮、反動透頂的多數派面前玩弄一套把戲，——這是他自己的事情，——甚至不敢在（代表施潘道要塞的）威美爾曼10月10日代表大約40名議員提出的反對保衛國民議會法⁴²⁵的抗議書上簽名。威美爾曼說得很對，這一法律是對三月革命所爭得的各項人民權利——集會、言論和出版等自由的一種極端無恥的侵犯。甚至艾森曼也提出了類似的抗議。但福格特勝過了艾森曼。當他後來在建立中央三月同盟⁴²⁶期間又開始大擺架子時，他的名字終於在“新萊茵報”（1848年12月29日的一號）的一篇文章中出現了；這篇文章把三月同盟稱做“反革命的不自覺的工具”，把它的綱領駁得體無完膚，而把福格特描繪成一位兩面派人物的一半，另一半是芬克。十多年以後，這兩位“未來的大臣”看出了他們的血緣關係，便把瓜分德國當做

他們團結的座右銘。

不仅是三月同盟后来的“发展”证明我們对它的估計是正确的。海得尔堡人民同盟、布勒斯劳民主同盟、耶拿民主同盟等等都輕蔑地拒絕了它那糾纏不休的拍馬拉攏手段，而曾經加入該同盟的那些极左派代表人物于1849年4月20日发表的退盟声明，也都证明我們在1848年12月29日提出的批評是正确的。然而，心平气和、寬宏大量的福格特却决心要用他的高尚情操使我們慚愧得无地自容，这一点可从下列一段引文中看出：

“‘新萊茵報’第243号，科倫1849年3月10日。‘所謂帝國議會’的法兰克福的所謂‘三月同盟’，竟厚顏无耻地給我們寄来了如下一封石印的信件：

‘三月同盟决定編制一份把自己的版面提供給我們支配的所有報紙的名单，并分发給和我們有联系的一切同盟，以便在这些同盟的协助下，使上述報紙优先得到有关的公告。在把这份名单通知你們时，我們认为没有必要提請你們注意收費的公告对報紙來說是整个企业的主要收入来源的意義。

中央三月同盟理事会

1849年2月底于法兰克福’

‘新萊茵報’也被列入了随信附来的報紙**名单**，——据說这些報紙都把自己的版面提供給三月同盟支配，三月同盟的拥护者都应当把‘有关的公告’优先供給这些報紙刊載，——并且还加了一个**光荣的星标**。現在我們特作如下声明：我們報紙的版面从来没有提供給这个所謂三月同盟支配…… 因此，既然三月同盟也把我們的報紙列入确实把自己的版面提供給它支配的報紙的石印名单，并称为它的机关报之一，那末这簡直是对‘新萊茵報’的誣蔑，是三月同盟的庸俗吹噓……

对于財迷心窍、耽于竞争的爱国志士們关于收費的公告对报纸來說是整个企业的收入来源的意义这个齷齪的意見，我們当然不打算回答。‘新萊茵报’在一切方面都始終和爱国志士們不同，而尤其和他們不同的是，它从来沒有把政治运动看做投机勾当或收入来源。”⁴²⁷

在“新萊茵报”断然拒絕了福格特之流提出的收入来源之后不久，在这个中央商务同盟^①的一次會議上，有人泪流滿面地說該报是“純德国式爭吵”的典范。在我們回答这种哭訴的那篇文章的結尾（“新萊茵报”第 248 号），我們把福格特叫做“一个在省的大学区的小飯館中高喊的人和一名不称职的帝国的巴罗”⁴²⁸。誠然，在皇帝問題上，他当时（3 月 15 日）还没有走上极端。可是我們一眼就看穿了福格特先生，因而能够把他未来的叛变活动——他本人对这种活动暂时也还是不清楚的，——看做既成事实。

不过，在这以后，我們就把福格特及其同伙交給那位年輕的、既有才智又有胆略的施略費尔去摆布。施略費尔是 3 月初从匈牙利来到法兰克福的，从此以后就向我們报告帝国蛙池里的風波。

在这段時間里，福格特竟堕落到这步田地，——当然，这种情况与其說是“新萊茵报”造成的，不如說是他自己造成的，——以致巴塞尔曼敢于在 1849 年 4 月 25 日的會議上把他斥之为“变节分子和叛徒”。

“新萊茵报”的一位編輯弗·恩格斯，由于参加爱北斐特起义而不得不逃亡⁴²⁹。一再想通过法律手續迫使我保持沉默的企图在陪审法庭上遭到失敗，而政变內閣的机关报“新普魯士报”⁴³⁰一再

^① 这是发音近似的文字游戏：《Central-Märzverein》是“中央三月同盟”，《Central-Commerzverein》是“中央商务同盟”。——編者注

揭发“‘新萊茵報’的粗卤无礼的秦波拉索峰^①”，——“同这种粗卤无礼的秦波拉索峰比較起来，1793年的‘通报’也要黯然失色”（見“新萊茵報”第299号）⁴³¹，——在这以后，我本人也很快被驅逐出普魯士了。这种“粗卤无礼的秦波拉索峰”，在普魯士的一个要塞城市里，在得胜的反革命势力企图用无耻的殘暴态度来炫耀一番的时候，是完全适得其所的。

1849年5月19日，出版了“新萊茵報”的最后一号（用紅色油墨印的一号）。在“新萊茵報”存在期間，福格特一直保持忍耐和沉默。一般說来，如果某个議員要表示抗議，总是用一种彬彬有礼的方式来表示的，——大致是这样：

“閣下！我对貴報提出的尖銳批評頗为重視，因为它对所有政党和所有人都是同样严格的。”（見1849年2月11日第219号，韦森东克的抗議）

“新萊茵報”停刊一个星期以后，福格特終於认为久已等待的机会已經到了，在議會不可侵犯这一面盾牌掩护下把长期积聚在他內心深处的“物质”轉变为“力”⁴³²的时刻已經到了。“新萊茵報”的一位編輯威廉·沃尔弗，代替一位已故的西里西亚議員，进入“已处于分崩离析状态”的法兰克福議會。

要了解下面叙述的在1849年5月26日議會會議上出現的情景，就不应忘記：当时德勒斯頓的起义和萊茵省其他地区的局部发动已被鎮压下去，巴登和普法尔茨正面临帝国的干涉，俄国的主力部队正开往匈牙利，最后，帝国内閣简单地宣布議會的一切決議无效。議事日程上有两篇“告德国人民书”：一篇是烏朗特根据多数派的意图草拟的，另一篇則出自三十人委员会中属于中間派的成

^① 秦波拉索峰是南美科迪勒拉山脉的最高峰之一。粗卤无礼的秦波拉索峰，意即粗卤无礼到了极点。——譯者注

員們之手。⁴³³ 會議主席是达姆斯塔德人雷^①，他后来成了兔子，并且也“脱离”了处于“土崩瓦解”状态的議會。我不妨来引证一下記圣保罗教堂里开会情况的官方速記記錄(第 229、228 号)。⁴³⁴

布勒斯劳的沃尔弗：

“諸位先生！我之所以报名发言反对多数派草拟的并在这里宣讀过的告人民书，因为我认为它根本不适合当前的局势，因为我觉得它太軟弱无力了，只能用来当做一篇文章在起草这篇告人民书的那个党的日报上发表，但是不能把它当做告德国人民书。既然剛才还宣讀了另一篇告人民书，那我就順便指出：我要更强烈地反对这一篇，至于反对的理由，我觉得用不着在这里說明。(中間派发出叫喊声：为什么用不着?)我談的只是多数派的告人民书；实际上，它是写得非常温和的，甚至連布斯先生都說不出很多的反对意見，而这当然是对告人民书的一种最坏的介绍。不，先生們，如果你們还想对人民多少起一点影响，那你們就不應該像在告人民书里那样对人民說話；你們不應該談合法性、法制基础以及諸如此类的东西，而應該像各国政府那样、像俄国人那样談非法性，而我所指的俄国人是普魯士人、奥地利人、巴伐利亚人、汉諾威人。(場內騷动和笑声)我把他們全都归在一个共同的名称——俄国人——之下。(全場活跃)是的，諸位先生，就是在这次會議上也有俄国人的代表。你們必須对他們說：‘正如同你們站在合法的立場上一样，我們也站在合法的立場上。’这就是暴力的立場，你們也要順便說明，对你們來說，合法性就是用暴力、用組織精良的作战纵队去对抗俄国人的大炮。如果真的要发表一篇告人民书，那你們就发表一篇直截了当地宣布帝国摄政王^②这个天字第一号人民叛徒不受法律保护的告人民书。(喊声：守秩序！旁听席上响起热烈的掌声)宣布所有大臣也不受法律保护。(騷动又起)喂，別打断我的話；他是天字第一号人民叛徒。”

主席：“我认为，沃尔弗先生違背和破坏了許可的一切界限。他不能当着这个議會把大公——帝国摄政王叫做人民叛徒。因此，我必須叫他守秩序。同时，我最后一次要旁听席上的人不要用这种方式干涉我們的辯論。”

① 文字游戏：Reh〔雷〕是姓，«Reh»是“小鹿”。——編者注

② 約翰大公。——編者注

沃尔弗：“我接受叫我守秩序的要求，我声明：我是要破坏秩序；他和他的
大臣們是叛徒。”（場內喊声四起：守秩序，真是魯莽无礼！）

主席：“我必須剥夺您的发言权。”

沃尔弗：“好吧，那我抗議；我是想代表人民在这里讲话，讲人民所想
的話。我抗議用这种精神草拟的任何告人民书。”（全場情緒非常激昂）

主席：“諸位先生，請允許我讲几句话。諸位先生，剛才发生的意外事件，
我可以說，是議会在这里开会以来的第一个事件。”（的确，它是在这个辯論俱
乐部里发生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事件。）“在这里，还不曾有一个发言人說
过：他存心想破坏秩序，破坏本議会的根基。”（施略費尔在4月25日的會議
上，在同样叫他守秩序时說道：“我接受叫我守秩序的要求，而且我乐意这样
做，因为我希望，完全按照另一个样子要求本議会守秩序的时刻很快就会到
来。”）

“諸位先生，我很遺憾，剛当上議員的沃尔弗先生竟这样地初次登台（雷
是把一切事情都当做喜剧看待的）。諸位先生！我叫他守秩序，是因为他竟
敢粗暴地破坏我們对帝国摄政王大人表示必需的尊敬和关怀的責任。”

會議繼續进行。哈根和察哈里埃发表了长篇演說，一个贊成
多数派的告人民书，另一个反对。最后站起来的是

（吉森的）福格特：“諸位先生！請允許我讲几句话，我是不会使你們听得
疲倦的。議会今天已不是去年开会时的那个样子了，先生們，这是千真万确
的，我們要感謝上蒼（“盲目信仰”的福格特在感謝上蒼！），因为議会已变成这
个样子” [geworden wird]（是的，geworden wird! ①），因为那些不再
相信本国人民，并在决定关头背叛人民事业的人已同議会分道揚鑣了！先生
們，我請求发言（这就是說，剛才这套表示謝意的祈禱只不过是一堆廢話），为
了保护从詩人心中（福格特变得富于灵感了）涌入这篇告人民书里去的水
晶般清彻的激流（保护激流），反对为了堵塞它（然而激流不是早已为告人民
书所吸收了嗎？）而向它投去或向它扔去的不体面的骯髒的东西，——我这样
做，为的是保护这些話（激流就像所有其他东西一样，在福格特那里都变成

① 馬克思嘲笑福格特用錯了動詞形态。——編者注

話》，反对在最近这次运动中聚集起来的、并威胁着要把那里的一切都淹没和弄脏的垃圾。是的，諸位先生！这〈即垃圾〉也就是垃圾和肮脏的东西〈垃圾就是肮脏的东西！〉，有人用这种方式〈哪种方式？〉把肮脏的东西向所有只要能认为是干净的东西投去，我对这类事〈什么事？〉竟能发生，表示极大的愤怒。”（极大的愤怒的福格特，*quel tableau!*〔多妙的一幅图画啊！〕）

他所說的——都是垃圾①。

沃尔弗对烏朗特草拟的告人民书只字未提。主席一再要求他守秩序，他之所以掀起这一場軒然大波，是因为他宣布帝国摄政王和他的所有大臣們都是人民叛徒，并且要求議會宣布他們是人民叛徒。但是，这位“大公——帝国摄政”、这“老朽的哈布斯堡”（福格特“研究”第28頁）和“他的所有大臣們”，对于福格特來說，都是“所有只要能认为是干净的东西”。他同福格尔魏德的瓦尔特一齐歌唱：

des fürsten milte ûz ôsterrîche
fröit dem süezen regen gelîche
beidiu liute und ouch daz lant. ②

福格特是不是那时就已經同約翰大公有“科学关系”，像他后来所承认的那样？（見“主要著作”，文件，第25頁。）

十年以后，同是这个福格特在他的“研究”里（第27頁）說：

“無論如何，下列事实是肯定无疑的：就像法兰克福国民議會的首領們低估了約翰大公的才干一样，法国国民議會和它的首領們也曾低估过路易-拿

① 这里套用了烏朗特所写的詩“歌手的詛咒”中的一行（原詩是：“他所說的——都是鞭策”）。——編者注

② 奧地利的君主，慷慨又好施，
就像柔和的如絲細雨，
撫摩着人們和大地。——編者注

破命的才干；这两个狡猾的家伙之中的每一个，都在自己範圍內使[他的低估者]因所犯的錯誤付出很高的代價。當然，我們決沒有把这两个人等量齊觀。令人驚異的恬不知恥等等（路易·波拿巴的）。——這一切都證明他比老朽的哈布斯堡大為優越。”

在同一次會議上，**沃尔弗**曾通過**济克馬林根**的議員**維爾特**轉告**福格特**，要同他用手槍進行決鬥，可是當上述的**福格特**決定為了國家的福利要保下自己的人皮時^①，**沃尔弗**就以體罰來威脅他。但是，當**沃尔弗**從**聖保羅教堂**走出來，看見**大胆查理**由兩位婦人左右陪伴着的時候，他不禁捧腹大笑起來，並讓他聽天由命去了。雖然**沃尔弗**也是一只有狼牙和狼心的狼，可是他在女性面前卻成了一只羔羊。他所採取的唯一的、而且是不痛不癢的報復手段，就是發表在“**新萊茵報評論**”（1850年4月號第73頁）上的一篇題為“**來自帝國的補充資料**”的文章，該文在談到前帝國攝政時說：

“在這些危急的日子里，中央三月同盟的成員們表現得異常勤奮。他們在離開**法蘭克福**之前，就向各地的三月同盟以及德國人民號召說：‘同胞們！敲十一點鐘了！’他們又從**斯圖加特**發布了一篇呼喚建立國民軍的‘告德國人民書’，——然而，中央三月同盟時鐘的指針卻停在老地方，或者時鐘上的刻度XII就像**夫賴堡**大教堂時鐘上的刻度一樣被弄掉了。總之，告人民書里又說：‘同胞們！敲十一點鐘了！’啊，如果這個鐘點早一些敲響，至少在那時，即

① 科貝斯第一在我們已經提過的雅科布·費奈迭寫的抨擊性小冊子里敘述說：“在**聖保羅教堂**舉行的一次會議上，即在**加布里埃爾·里謝爾**發表了關於皇帝的演說以後受到**加格恩**的擁抱的那次會議上，當**卡爾·福格特**用一種譏笑人的慷慨激昂的神情大喊大叫地去擁抱議員**威美爾曼**時，我向他喊道：‘別耍這一套頑童的鬼把戲了。’於是，**福格特**認為必須用挑釁性的罵人話來侮辱我一頓；可是當我要求他決鬥時，他卻通過一位朋友的長期斡旋，厚着臉皮收回了對我的侮辱。”（同上，第21、22頁）

在中央三月同盟的英雄卡尔·福格特为了滿足他本人的需要和为了滿足庆賀他的那个抱怨派的需要而在紐倫堡^①葬送法兰克尼亚革命时435敲响，那該多好；啊，如果它向你們敲，而且敲穿你們的脑袋，那該多好！…… 摄政政府在夫賴堡政府大厦內設了办公室。卡尔·福格特摄政（他同时是外交大臣和其他許多部的首脑）在这里也非常关切德国人民的幸福。在經過長時間的不分昼夜的研究之后，他完成了一項非常适时的发明：‘帝国摄政政府的护照’。这些护照并不复杂，是石印的，但很漂亮，而且可以免費領取，份数随便。这些护照只有一个小缺点：它們只在福格特的办公室里才有效。也許，某一份护照以后会在某一位英国人搜集的古董堆里找到一席之地。”

沃尔弗沒有学格萊納的样。他並沒有在“評論”“出版之后”“馬上就动身到美国去”，而是又在瑞士呆了一年之久，等待州官的报复。

^① 福格特后来为他的紐倫堡的功績辯解說，因为“他本人的安全得不到保障”。

七 奧格斯堡戰役

在土尔高州公民⁴³⁶ 結束他的意大利戰爭之后不久，伯尔尼州公民就开始了他的奧格斯堡戰役。

“那里〈在倫敦〉很早以前就有一个馬克思集团，〈“总汇报”的〉絕大部分通訊是他們供給的，而且从 1849 年起經常同‘总汇报’保持联系。”（“主要著作”第 194 頁）

尽管馬克思本人从 1849 年底，即从他第二次被逐出法国后才居住在倫敦，但“馬克思集团”却好像很早以前在倫敦就有了。尽管馬克思集团“很早以前就供給‘总汇报’絕大部分通訊”，可是“从 1849 年起”才同它“經常保持联系”。总之，福格特的年表分为两大时期，即“很早以前”到 1849 年为一时期，从 1849 年到“这一”年为另一时期，这也是不足为奇的，因为这位男子汉在 1848 年以前“还没有想到政治活动”。（同上，第 225 頁）

我在 1842—1843 年編輯过旧“萊茵报”⁴³⁷，这家报纸同“总汇报”进行了殊死的斗争。1848—1849 年，“新萊茵报”重新展开了这一論战。由此可见，除了馬克思“很早以前”就同“总汇报”作斗争，而福格特从 1844—1847 年是該报的“經常撰稿人”这一事实以外，在“很早以前到 1849 年”这一时期中还能有什么呢？（見“主要著作”第 225 頁）

現在我們來談談福格特的世界史的第二時期。

我在倫敦的時候，“經常同‘總匯報’”保持“聯繫”，即“從1849年起經常”同“總匯報”保持聯繫，因為“從1852年起”有一位奧利是“總匯報”駐倫敦的主要通訊員。實際上，無論在1852年以前還是以後，奧利同我都沒有任何聯繫。我一生從未見過這個人。他既然老是同倫敦流亡者交往，准就是金克爾流亡者協會的會員。但是，這絲毫也改變不了事情本身，因為：

“我的〈福格特的〉小同鄉，淡黃頭髮的奧利曾是學會英文的老巴伐利亞人阿爾坦赫弗爾過去的先知，他企圖從共產主義的基礎出發在政治和文學方面獲得更高的詩的觀點。最初他是‘總匯報’駐蘇黎世的主要通訊員，從1852年起到他最後完結於瘋人病院為止，一直是該報駐倫敦的主要通訊員”（“主要著作”第195頁）。

Mouchard〔密探〕愛德華·西蒙把這首福格特之歌變成了如下的法語：

«En voici d'abord un qui de son point de départ communiste, avait cherché à s'élever aux plus hautes conceptions de la politique». [“這裡首先就有一個人，他從他的共產主義觀點出發，企圖把自己提高到更高的政治觀點。”]（“政治方面更高的詩的觀點”甚至是愛德華·西蒙也無能為力的。）«A en croire M. Vogt, cet adepte fut l'oracle de la Gazette d'Augsbourg jusqu'en 1852, époque où il mourut dans une maison de fous». [“如果相信福格特先生說的，那末這個魔術師直到1852年死於瘋人病院為止，一直是‘總匯報’的先知。”]（“現代評論”1860年巴黎版第13卷第529頁）

關於自己的“主要著作”和自己的奧利，福格特可以說，«Operam et oleum perdidit» [“枉費了油和功夫”]①。他本人說他的“小

① 普勞圖斯“迦太基人”第一幕第二場；這是一個女侍說的一句話，她抱怨她竟然給自己抹了芬芳的油。這裡是文字遊戲：Ohly（奧利）這個名字和拉丁字oleum（油）的發音相似。——編者注

同乡”从 1852 年起一直到“最后完結于瘋人病院”，都从倫敦为“总汇报”写通訊，而爱德华·西蒙却說，“如果相信福格特說的，那末奥利直到 1852 年死于瘋人病院为止（附带說一句：他現在也还健在），一直是‘总汇报’的先知”。

但是，爱德华·西蒙了解他的卡尔·福格特。爱德华知道，既然决定“相信”他的卡尔，那末，相信他什么，是相信他所說的，还是相信他所說的反面，都完全是一样的。

卡尔·福格特說，“李卜克内西先生代替他（即奥利）去做‘总汇报’的通訊員”。“直到李卜克内西被公开宣布为馬克思派以后，他才被‘总汇报’接受为通訊員。”（同上，第 169 頁）

这次宣布是在科倫共产党人案件进行期間，即 1852 年底发生的。

事实上，李卜克内西在 1851 年春是“晨报”⁴³⁸ 的撰稿人，他給該报写了倫敦工业博覽会的情况。通过“晨报”的关系，他于 1855 年 9 月成为“总汇报”的通訊員。

“他的（馬克思的）同志們所写的东西，沒有一行不是事先告訴了他的。”（同上，第 194 頁）

证据很簡單：“他（馬克思）无条件地控制着自己的人”（第 195 頁），而福格特却是无条件地服从于自己的法济那一帮人。我們在这里碰上了福格特的神話創作的特點：处处流露出吉森或日內瓦的偏狹、小市鎮眼光和瑞士的酒館气味。他把土里土气的习俗，天真地从日內瓦搬到了世界名城倫敦，他让李卜克内西在西头所写的东西，“沒有一行不是事先告訴了”住在四英里外的汉普斯泰特的我。而且我每天为散居在全倫敦的、同世界各地通訊的其他許

多“同志”作拉·格隆尼埃尔式的效劳。这是多么令人鼓舞的終身使命，而又多么有利可图啊！

福格特的师傅爱德华·西蒙，即使不熟悉倫敦的情况，但至少对巴黎的情况是熟悉的，因此，他以无可爭辯的艺术家的敏感，在他那笨拙的“乡下朋友”的图画上，塗抹了大城市的色彩。

«*Marx*, comme chef de la société, ne tient pas lui-même la plume, mais ses fidèles n'écrivent pas une ligne sans l'avoir consulté: *La Gazette d'Augsbourg* sera d'autant mieux servie» (同上, 第 529 頁)。即：“馬克思作为集团的首領，自己是不执笔的，而他的信徒所写的，沒有一行不是事先同他商量过的。‘奥格斯堡报’被操纵得更不用說了。”

福格特感觉到这种修改的全部妙处了嗎？

我同李卜克內西从倫敦写給“总汇报”的通訊沒有任何关系，就像我同福格特从巴黎写給“总汇报”的通訊沒有任何关系一样。一般說来，李卜克內西的通訊是完全值得称贊的，他在“总汇报”上对英国政治所作的批判性論述，同他在同一时期为激进的美国的德文报刊所写的通訊的精神是一致的。虽然福格特本人小心翼翼地翻閱了“总汇报”的許多全年合訂本，寻找李卜克內西通訊中的弱点，但他对这些通訊的內容的批評，却仍然不得限于指出李卜克內西的通訊标志是“两条細的斜杠”（“主要著作”第 196 頁）。

杠划得斜自然证明通訊也写得坏^①，何况还是“細”的！李卜克內西如果不用两条“細杠”而是划上两个肥油油的圓点作他的通訊标志就好了！既然通訊中除了“两条細的斜杠”外沒有任何其他

① 文字游戏：«schief»是“斜”的意思，但同某些動詞連用也有“坏”的意思。——編者注

缺点，那就值得想一想，这些通讯为什么都登在“总汇报”上。但是，为什么又不能登在“总汇报”上？大家知道，“总汇报”刊登各种不同观点的文章，至少在英国政治这类中立性的问题上是这样，此外，这是唯一超出地方意义的为国外所知的德国报纸。在海涅发表过“巴黎来信”，法耳梅赖耶尔发表过“远东来信”⁴³⁹的同一家报纸上，李卜克内西可以安然地发表他的伦敦来信。福格特宣称，在“总汇报”撰稿人当中也有卑劣的人。大家知道，他本人从1844年到1847年就是该报的撰稿人。

至于我本人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我提到恩格斯是因为我们两人根据共同计划和事先取得的一致意见进行工作），那末，在1859年我们的确同“总汇报”有某些“关系”。即我于1859年1、2、3月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了好些社论，其中有的文章详细地批评了“总汇报”所宣扬的“中欧大国论”及其认为奥地利继续统治意大利是对德国有利的那种论点⁴⁴⁰。在战争爆发前不久，经我的同意，恩格斯发表了“波河与莱茵河”（1859年柏林版），这本抨击性的小册子是专门针对“总汇报”而写的，用恩格斯的话来说（他的小册子“萨瓦、尼斯与莱茵”1860年柏林版第4页），是从军事理论的观点来证明：“德国为了自己的防御不需要意大利的任何一块领土；如果仅仅从军事观点出发，那末法国要求占有莱茵河的理由无论如何要比德国要求占有明乔河的理由充分得多”。⁴⁴¹但是，我们在反对“总汇报”及其关于奥地利有必要用暴力统治意大利的理论的同时，我们也反对波拿巴主义的宣传。例如，我在“论坛报”上（参看1859年2月）详细地证明了，«Bas Empire»〔“衰落时期的帝国”〕的财政状况和国内政治状况已经达到了危急点，只有对外战争才能延长法国政变制度的统治以及欧洲反革命的统

治⁴⁴²。我指出，**波拿巴式地**解放意大利只是一种借口，目的是要奴役法国，使意大利屈服于政变制度，把法国的“自然疆界”向德国方面扩张，把奥地利变成俄国的工具以及把各国人民卷进正統反革命同非正統反革命的战争中去。这一切早在前帝国的福格特在日内瓦大发議論以前就发生了。

在“新萊茵报評論”(1850年)发表了沃尔弗的文章以后，我已經把“圓滿的人物”完全忘掉了。1859年春天，一个四月的夜晚，当弗萊里格拉特把福格特的一封信以及随信附来的政治“綱領”⁴⁴³拿来給我看的时候，我又想起了这个有趣的小伙子。这并不是泄露机密，因为福格特的信本来是“为了通知”朋友們而写的，但不是福格特的朋友，而是受信人的朋友。

如果問我在这个“綱領”中发现了什么，那我就这样回答：“政客的空談”。他要求弗萊里格拉特吸收**布赫尔**先生为计划在日内瓦出版的宣傳性报纸的政治通訊員，从这件事情上，我立刻又认出了这个老談諧家。福格特写信的日期是1859年4月1日。大家知道，从1859年1月起布赫尔在他为柏林“国民报”写的倫敦通訊中，表示了同福格特“綱領”絕對矛盾的观点；但是，这位讲求“批評的率直”的人物是青紅皂白一概不分的。

在这一件我认为非常不值得向人道及的事情发生以后，我接到了福格特的“**欧洲现状研究**”这本可怜的著作，这本著作使我确信，他同波拿巴主义的宣傳有联系。

1859年5月9日晚，戴維·烏尔卡尔特就意大利战争問題召开了一个公开的群众大会，当时我在主席台上。大会开始以前，有一位面色阴郁的人物傲慢地走到我跟前。从他臉上的那种哈姆雷特式的表情，我立刻就明白了，“丹麦国里恐怕有些不可告人的坏

事”^①。这就是 homme d'état [政治活动家] 卡尔·布林德。在几句开场白以后，他就說到福格特的“阴谋”，而且富于表情地摇晃着脑袋，向我保证說：福格特从波拿巴政府領取进行宣傳工作的費用；福格特想用 30 000 盾来收买一个南德作家，这个人的名字“可惜”他不能告訴我（很难想像，哪一位南德作家能值 30 000 盾）；而且在倫敦已經有过收买的企图；早在 1858 年当普隆-普隆、法济之流在日内瓦会晤的时候，就討論了意大利战争的問題，他們并指定俄国康斯坦丁大公为匈牙利未来的国王；福格特也曾建議他（布林德）参加自己的宣傳工作；他手头有福格特叛国活动的证据。后来，布林德回到主席台另一端他自己的位子上，靠近他的朋友尤·弗呂貝尔；大会开始了，戴·烏尔卡尔特力图詳細說明，意大利战争是俄法阴谋的产物^②。

① 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第一幕第四場。——編者注

② 福格特当然要把“馬克思集团”对帕麦斯顿勋爵的攻击归之为我仇視他这位自命不凡的人物和他的“朋友”（“主要著作”第 212 頁）。因此，应当簡略地談一下我同戴·烏尔卡尔特及其政党的关系。烏尔卡尔特关于俄国的和反对帕麦斯顿的著作使我感到兴趣，但没有使我信服。为了取得对这个問題的确定看法，我仔細地分析了“汉薩德的議会辯論”和 1807—1850 年的外交藍皮书⁴⁴⁴。这一研究的最初成果就是在“紐約論壇报”上发表的一系列社論（1853 年底）。在这些文章中我根据帕麦斯顿同波兰、土耳其、切尔克西亚等等的会谈，证明他同彼得堡內閣有联系。此后不久，我把这些文章轉載于由厄內斯特·琼斯編輯的宪章派机关报“人民报”上，并且又增加了关于帕麦斯顿活动的几段⁴⁴⁵。同时，“格拉斯哥哨兵”也轉載了这些文章中的一篇（“帕麦斯顿与波兰”⁴⁴⁶），这篇文章引起了戴·烏尔卡尔特先生的注意。在我同他的一次会面之后，他說服了塔克尔先生在倫敦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这些文章的一部分。这些反对帕麦斯顿的小册子，后来以不同的版本共出了 15 000—20 000 册。鉴于我对論述卡尔斯的陷落的藍皮书进行了分析（載于 1856 年 4 月倫敦的宪章派报纸），設菲尔德的外交事务委员会曾来信对我表示感謝（見附录 7）⁴⁴⁷。在翻閱英国博物館保藏的外交手稿时，我發現了一些从彼得大帝时代到十八

当大会快要結束的时候，“晨星报”（曼彻斯特学派的机关报）⁴⁴⁹ 国际栏的編輯孚赫博士走到我面前对我說，一家新的倫敦德文周刊“人民报”剛剛发行；由安·謝尔策尔先生出版、埃德加爾·鮑威尔編輯的工人报纸“新时代”，由于“海尔曼”周报⁴⁵⁰ 的出版者金克尔的阴谋而关闭了；迄今为止一直是“新时代”通訊員的比斯康普知道了这件事以后，放棄了他在英国南部的教員职位，以便在倫敦出版“人民报”来同“海尔曼”周报相对抗。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和倫敦的其他一些团体都支持“人民报”，这家报纸当然也像所有这一类的工人报纸一样，編輯和写稿都是沒有报酬的。虽然孚赫本人是自由貿易派，跟“人民报”有不同的意見，但他不願意有人壟断倫敦的德文报刊，于是就跟倫敦的一些熟人共同建立了一个支援該报的財政委员会。比斯康普已經写信給至今他还不認識的李卜克內西，要求他参加編撰工作等等。最后是孚赫要求我参加“人民报”的工作。

虽然比斯康普从 1852 年起就住在英国，但我們那时还不認識。在烏尔卡尔特召开群众大会的次日，李卜克內西把他帶到我家来。由于缺少時間，最初我沒有滿足为“人民报”撰稿的要求，但答应請求我在英国的德国朋友帮助报纸征求訂戶，給以資助并参加編撰工作。談話中我們說到烏尔卡尔特召开的群众大会，接

世紀末这一时期的英国文件，这些文件揭露了倫敦內閣和彼得堡內閣不断进行秘密合作的事实，而彼得大帝时代是这种关系的起点。到目前为止，我只发表过詳細論述这一题目的著作中的一篇导言，标题是“十八世紀外交史內幕”。这篇导言曾先后在“設菲尔德自由新聞报”以及倫敦的“自由新聞”这两种烏尔卡尔特創办的刊物上发表⁴⁴⁸。自倫敦“自由新聞”創辦时起，我就偶尔为它写点稿子。由此可見，我是一般地研究了帕麦斯頓和英俄外交活动，絲毫也沒有想到，帕麦斯頓勳爵的背后还有卡尔·福格特先生。

着又說到福格特。比斯康普已經讀過福格特的“研究”，並且給了正確的評價。我向他和李卜克內西介紹了福格特的“綱領”和布林德所揭露的內容，但是我就後者指出說，南德意志人總是喜歡把事情加以渲染。使我驚異的是，我發現“人民報”第2號（5月14日）上刊登了一篇題為“作為帝國叛徒的帝國攝政”的文章（見“主要著作”，文件，第17、18頁），比斯康普在該文內提到了布林德說過的兩件事實，即30 000盾（但他說成是4 000盾）和福格特的活動資金來自波拿巴的事。此外，文章充滿了俏皮話，風格同他於1848—1849年同海澤一起在加塞爾出版的“大胡蜂”報⁴⁵¹一樣。同時，倫敦工人教育協會委託它的領導人之一謝爾策爾先生號召在瑞士、比利時和美國的工人教育協會支持“人民報”，同波拿巴主義的宣傳作鬥爭，這件事我是在“主要著作”出版很久以後才知道的（見附錄8）。比斯康普本人把上面提到的1859年5月14日刊登在“人民報”上的文章寄給福格特，福格特同時也經自己的信徒拉尼克爾之手接到了安·謝爾策爾先生的通告。

福格特立刻以他著名的“批評的率直”凭空捏造，把我說成是反對他的陰謀的策劃者。因此，他直截了當地把後來發揮成他的“歷史故事”的一篇綱要發表在前面好幾次引證過的“瑞士商業信使報”150號特別附刊上。這篇原始福音書第一次揭露硫磺幫、制刷匠幫和舍爾瓦爾等人的秘密，上面注明1859年5月23日於伯爾尼（所以比摩門教⁴⁵²福音書所注的日期更晚），標題是“警告”，就其內容來說，很像譯自臭名遠揚的艾·阿布小冊子中的一段文字^①。

① 這裡稍微談談俾爾“推銷員”，即“流亡的帝國攝政”的地方小報“通報”。俾爾“商業信使報”的出版者和編輯是一個叫恩斯特·許列爾的，他從1838年起

我已經提到过，“人民报”根据我的要求轉載了福格特的匿名的原始福音书“警告”。

6月初我离开倫敦到曼彻斯特拜訪恩格斯，在那里为“人民报”收集了25英鎊左右的預訂費。这笔錢是由弗·恩格斯、威·沃尔弗、我以及在我寄到柏林去的一个司法文件中提到过的三位住在曼彻斯特的德国医生提供的，但“好奇的”福格特却把“視綫越过拉芒什海峽”投射到奥格斯堡和維也納去找它的“来源”（“主要著作”第212頁）。关于原財政委员会在倫敦募集的捐款，福格特可以向孚赫博士去打听。

福格特在“主要著作”第225頁上教导我們說：

“但是，要求民主派无代价地做一切事情，一向就是反动派的詭計，而他們自己（不是指民主派，是指反动派）却企图得到索取工資和報酬的特权。”

“人民报”不但让人无代价地編輯和撰稿，而且还要編輯和撰稿人向它付酬，它的詭計是多么反动啊！如果这不足以证明“人民报”与反动派有关，那末卡尔·福格特就惶惑莫解了。

当我在曼彻斯特逗留的时候，倫敦发生了一件极其重要的事。即李卜克内西在霍林格尔（“人民报”的承印人）印刷所里发现了反对福格特的匿名傳单“警告”的校样，他匆匆地看了一遍，立刻认出是布林德所作的揭露，此外，还听排字工人阿·費格勒說，布林德曾把他亲笔写的手稿交給霍林格尔印刷。校样上的修改也是布林德的手笔。两天后李卜克内西收到霍林格尔寄来的校样，他把这份校样轉寄給了“总汇报”。傳单的活字版保留了下来，后来当

是政治流亡者，曾作过驛站长、酒商，破过产，但现在又发了财，因为他的在克里木战争期間領取不列顛—法国—瑞士新兵招募处津貼的報紙，現在拥有1200訂戶。

“人民報”第 7 號（1859 年 6 月 18 日）轉載這份傳單時又利用了這個活字版。

“總匯報”發表了“警告”之後，前帝國的福格特的奧格斯堡戰役就開始了。他控訴“總匯報”轉載了傳單。

在“主要著作”（第 227—228 頁）中福格特模仿了繆爾納：“我是，我是，我是強盜雅羅米爾”[«bin's, bin's, bin der Räuber Jaromir»]⁴⁵³。只是他把動詞 sein〔是〕改成了 haben〔有〕。

“我提出控訴[*ich habe geklagt*]，因為我事先就知道，自命為‘南德文化代表’的那個編輯部的空虛、渺小和卑鄙必然會全部被揭露出來，我提出控訴，因為我事先就知道，這個可敬的編輯部和被它捧上天去的奧地利政策同硫磺幫和革命的殘渣之間的聯繫必然會大白於天下。”

接着還有四個“我提出控訴”。

提出控訴的福格特充滿了偉大^①，朗金說得真好，再沒有比水腫病人更干癟的了。

這位“圓滿的人物”喊道：“我控訴的動機極少含有個人考慮。”

但是，事實並非如此。牛犢在屠宰台上也不會像卡爾·福格特在被告席上這樣彀躄掙扎。當他的“密”友拉尼克爾、萊納赫（曾寫過非常流行的關於福格特的 *chronique scandaleuse*〔丑聞錄〕）和埃斯林根的饒舌的“殘闕”議會議員邁爾在助長他對法庭的恐懼心理的時候，而蘇黎世那邊卻固執地要他趕快“控訴”。在洛桑工人節上，皮毛商羅斯當眾向他宣稱，如果他不進行訴訟，就不再尊敬他了。但是，福格特堅持自己的意見：他根本不想理會奧格斯堡和倫敦的硫磺幫，因此他將保持緘默。不過，他還是突然說話了。

① 原文這裡是無法翻譯的文字遊戲：«geklagt habende»（提出控訴的）和«wird erhaben»（充滿了偉大）的尾音相似。——編者注

各报刊登了关于他的訴訟消息，而拉尼克爾声明說：

“斯图加特人不让他〈福格特〉得到安宁。但是他〈拉尼克爾〉不同意这一点。”

其实是，由于这位“圓滿的人”受到两面夹击，所以，最合适的办法无疑是控告“总汇报”。福格特就雅·費奈迭的攻击（說福格特从事波拿巴主义的陰謀活动⁴⁵⁴）发表的自我辯护书刊登在1859年6月16日的俾尔“商业信使报”上，因而在倫敦是在匿名傳单出現以后看到的。傳单在結尾时威胁說：

“但是，如果福格特想否认这一点——他未必敢于这样做——，将有揭露之二接踵而至。”

福格特出来否认了，而揭露之二却没有接踵而至。这样一来，他在这方面就安全了，只有亲密的熟人那方面还可能找他麻煩，但他对这些人了解得很清楚，知道他們都很怯懦。他可以估計到，他的控訴使得問題愈明朗化，他們就会愈加謹慎，因为揭露“流亡的帝国摄政”的丑行，在一定程度上就等于揭露整个“殘闕”議會。

議員雅科布·費奈迭在他的小册子“保卫自己和祖国反对卡尔·福格特”（1860年汉諾威版）⁴⁵⁵第27—28頁上失口說：

“除了福格特用来叙述他的案件的那些信件以外，我还讀了福格特写的另一封信，这封信比他給勒宁博士的信把福格特的立場揭露得更为清楚，說明他是那些不惜一切代价想使战争局限于意大利的人的帮凶。为了个人的需要，我摘录了这封信的一些地方，只是可惜我不能在这里发表，因为收信人在我保证不拿去发表的前提下才把这封信給我看的。出自个人的和对党的考虑，人們力图用某些方法来掩盖福格特在这件事情上的行为，这些方法無論从党的角度还是从公民对祖国的义务的角度来看，我都认为是不正确的。許多人所采取的謹慎态度使福格特現在还可以像过去那样厚顏无耻地以德国党的領袖的資格出現。但是，我认为，正因为如此，福格特所屬的党应当替

他的行为負一定的責任。”^①

所以，一方面，控告“总汇报”并不冒太大的風險，另一方面，在这个方向轉入进攻还会为福格特將軍提供最有利的作战基地。这是奥地利通过“总汇报”来誣蔑帝国的福格特，是奥地利同共产党人結成联盟！这样，帝国的福格特就成了资产階級自由主义的敌人之間的巨大而奇怪的联盟的有趣的受害者。小德意志派报刊本来就因为福格特是帝国縮小者[Minderer des Reichs]⁴⁵⁶而对他特別賞識的，这一来就更应当为他欢呼并把他大大夸奖一番了！

1859年7月初，我刚从曼彻斯特回来，布林德因为一件与这无关的事情来找我。同他一起来的还有菲德利奥·霍林格尔和李卜克内西。在这次会面的时候我对他说，我认为他是傳单“警告”的作者。他坚决否认了这一点。我逐点复述了他在5月9日对我说的话，事实上那就是傳单的全部内容。这种說法他完全同意，但是，尽管如此，他仍然否认他是傳单的作者。

大約一个月以后，即1859年8月，李卜克内西给我看了“总汇报”編輯部給他的一封信，信中坚决要求他对傳单“警告”中列举的罪状提出证据。根据他的請求，我决定同他一起去圣約翰伍德的布林德家，因为布林德即使不是傳单的作者，他总是在5月初就已经知道了6月初的傳单的内容，此外，他还可以“证明”他所知道的东西。布林德沒有在家，他到某个海濱浴場去了。李卜克内西写

① 并見上面引证过的小册子的第4頁，那里写道：“出自对党的考虑而对福格特加以‘寬容’；由于道德上的不坚定，福格特的密友們明知福格特对祖国干了可耻的勾当，却容許这个福格特公开指控一些人为誣蔑，这些人仅仅說了他們大家都知道、都想过、并且握有证据的話；这一切都引起我的厌恶”等等。

信告訴他我們拜訪的目的。布林德未作答复。李卜克內西又写了一封信。最后收到了下面这样一份儼然是一位政治家写的文件：

“亲爱的李卜克內西先生：

我几乎同时接到您的两封来信(都写錯了地址)。您知道,我决不想干預对我完全陌生的报纸的事务。这次尤其如此,因为正如我以前已經說过的,我与这事毫无关系。至于您提到的那些私下的談話,显然完全是出于誤解;这里发生了某种誤会,有机会时我将对此作口头說明。使您同馬克思徒劳往返,对此我表示遺憾。

充分尊敬您的 卡·布林德

9月8日于圣萊昂納茲”

說布林德与指責福格特“毫无关系”的这份冷淡的外交照会,使我想起了1859年5月27日倫敦“自由新聞”上的一篇匿名文章,翻譯如下:

“康斯坦丁大公——匈牙利未来的国王。”

一个在信中附有名片的通訊員向我們写道:

“閣下!我出席了最近在音乐厅举行的群众大会^①,听到了关于康斯坦丁大公的演說。我可以向您提供另外一事实。去年夏天,日罗姆·拿破侖亲王在日内瓦向他的几个亲信陈述了进攻奥地利和即将重新繪制欧洲地图的計劃。这位亲王曾經同一位瑞士議員詳細談过这个題目,我知道这位議員的名字。日罗姆亲王当时宣称,根据拟定的計劃,康斯坦丁大公应当成为匈牙利国王。

我还知道,今年年初曾有人企图为俄国一拿破侖計劃爭取一些被驅逐出境的德国民主主义者以及在德国国内的有威望的自由主义者。大量金錢用来收买他們 (large pecuniary advantages were held out to them as a bribe)。我很高兴地告訴你們,这种提議遭到了憤怒的拒絕。”(見附录9)

^① 指上面提到过的5月9日由戴·烏尔卡尔特召开的群众大会。

这篇文章虽然没有指出福格特的名字，但对伦敦德国流亡者来说已经够清楚了，它实际上表达了后来发表的传单“警告”的主要内容。“匈牙利未来的国王”一文的作者，由于爱国心切而匿名指责福格特，自然应当迫不及待地抓住奥格斯堡案件提供的大好时机，在法庭上向整个欧洲揭露这种背叛行为。但是，谁又是“匈牙利未来的国王”一文的作者呢？是卡尔·布林德公民。早在5月间，我从文章的形式和内容就已经看出了这一点，现在，当我向“自由新闻”的编辑科勒特先生说明争论的问题的意义并把布林德的外交照会的内容告诉他时，他又正式加以证实。

1859年9月17日，排字工人阿·费格勒先生给我一个书面声明（刊登在“主要著作”中，文件，第30—31页），其中他决未断定布林德是传单“警告”的作者，但是，他证明是他本人（阿·费格勒）和他的老板菲德利奥·霍林格尔在霍林格尔印刷所为传单排版的，原稿是布林德的手笔，并且霍林格尔有一次提到布林德是传单的作者。

根据费格勒的声明和“匈牙利未来的国王”这篇文章，李卜克内西又给布林德写了一封信，要这位政治家为他在“自由新闻”上所宣扬的事实提出“证据”；同时向他说明，现在已经掌握了他参加传单“警告”出版工作的物证。布林德没有答复李卜克内西，却派科勒特先生来找我。科勒特先生来的目的，是代表布林德求我不要公开他是“自由新闻”登载的上述文章的作者。我回答说，我不能承担任何义务：我的谦恭要同布林德的勇气协调一致。

这时奥格斯堡案件开庭的日子临近了。布林德保持缄默。福格特在他的各种公开声明中，企图要我负传单的责任并要我证明传单中所举的事实，把我当做是传单的“秘密作者”。为了对此进行

反击,为了替李卜克内西辯白,为了帮助我认为由于揭露福格特而做了一件好事的“总汇报”,我經李卜克内西告訴“总汇报”編輯部,只要編輯部向我提出书面要求,我准备向它提供有关傳单“警告”的来源的材料。这样就开始了如福格特在“主要著作”第 194 頁上所說的:“目前正在进行的馬克思同科尔布先生的頻繁的通信”^①。所謂我“同科尔布先生的頻繁的通信”就是奥尔格斯先生同一天給我的两封信,要我把許給的材料寄給他,后来寄这份材料时我附了簡短的几句话^②。

奥尔格斯的两封信,更正确些說是同一封信的两种版本,于 1859 年 10 月 18 日到达倫敦,而奥格斯堡案件将在 10 月 24 日开庭审理。因此,我立刻写信給費格勒先生,約他于次日在馬尔波罗街治安法庭內 rendez-vous [会晤],要他对傳单“警告”的声明提出合乎法律形式的 affidavit ^③。我的信他沒有及时接到。因此,在 10 月 19 日^④我不得不違反原来的意图,給“总汇报”寄去了前面

① 科尔布先生的确在“总汇报”第 319 号上提到关于“他没有刊登的馬克思先生的一封非常詳細的信”。但是,这封詳細的信刊登在 1859 年 11 月 19 日的汉堡“改革报”第 139 号附刊上。这封“詳細的信”是我为了公开发表而写的一个声明,我把这个声明也寄給了柏林的“人民报”。[見本卷第 756—759 頁。——編者注]

② 我的附函[見本卷第 755 頁。——編者注]和費格勒的声明均包括在“主要著作”中,文件,第 30、31 頁,奥尔格斯先生給我的信則見附录 10。

③ *Affidavit* 是向法庭作的声明,是代替宣过誓的证詞用的,如有虛假,一切法律后果均由证人負責。

④ 由于我字迹潦草,奥格斯堡法庭把信上日期 10 月 19 日看成 10 月 29 日。福格特的律师海尔曼博士、福格特本人、值得尊敬的柏林“国民报”以及 *et hoc genus omne* [整个这一伙]讲求“批評的率直”的人毫不怀疑,10 月 29 日在倫敦写的信竟能在 10 月 24 日就寄到奥格斯堡。

提到的 9 月 17 日的书面声明以代替 affidavit ①。

大家知道，奥格斯堡的訴訟案变成了一出真正的錯中錯喜劇。当做 Corpus delicti [犯罪构成] 的，是威·李卜克內西寄給“总汇报”并由該报轉載的傳单“警告”。但是，傳单的出版者和作者在玩捉迷藏的游戏；李卜克內西无法把他在倫敦的证人派往奥格斯堡的法庭，“总汇报”的編輯們在法律上陷入困境之后，發揮了一通乏味的政治妙論，海尔曼博士让法庭飽享了一頓“圓滿的人物”关于硫磺帮、洛桑节等等的奇談，最后是法庭不受理福格特的訴訟，因为原告找錯了法院。当奥格斯堡案件結束，关于这件事的报道随“总汇报”到达倫敦的时候，混乱达到了頂点。在这以前，布林德一直像一位英明的政治家那样保持緘默，这时却被我从排字工人費格勒那里得来的证据吓坏了，突然出現在公开的活动場所。費格勒沒有說布林德是傳单的作者，而只說过：菲德利奧·霍林格尔曾对他說布林德是作者。然而費格勒坚决声明，傳单的原稿是他所熟悉的布林德的笔迹并且是在霍林格尔印刷所排印的。即使傳单不是布林德的笔迹，也不是在霍林格尔印刷所排版的，布林德仍可能是傳单的作者。反之，即使布林德不是傳单的作者，傳单也可能是布林德的笔迹，并由霍林格尔承印。

“总汇报”第 313 号載有 11 月 3 日于倫敦的一項声明（見“主要著作”，文件，第 37、38 頁），公民兼政治家的布林德在該声明中宣称，他不是傳单的作者，并且“公布”“下面的文件”以作证明：

(a) “排字工人費格勒在‘总汇报’第 300 号上断言傳单‘警告’系在我的印刷所印刷，并认为卡尔·布林德先生是傳单的作者，純系惡意捏造，特此

① 从費格勒后来于 1860 年 2 月 11 日提出的 affidavit 可以看出，这个 quid pro quo [代替品] 的产生純粹是偶然的，是由于他接到我的信太晚了。

声明。

菲德利奧·霍林格尔

1859年11月2日于倫敦索荷区利奇菲耳德街3号”

(b)“本人十一个月以来一直在利奇菲耳德街3号居住和工作，可以证明霍林格尔先生所說确系实情。

排字工人 約·弗·維耶

1859年11月2日于倫敦”

費格勒在任何地方也沒有断言布林德是傳单的作者。所以，菲德利奧·霍林格尔是先臆造出費格勒的断言，然后再說它是“恶意捏造”。另一方面，既然傳单不是在霍林格尔印刷所印刷的，这位菲德利奧·霍林格尔又从哪里知道卡尔·布林德不是傳单的作者呢？

排字工人維耶为什么根据“十一个月以来”（从1859年11月2日追溯）一直在霍林格尔那里“居住和工作”，就能证明“菲德利奧·霍林格尔所說确系实情”呢？

我用下面的話結束了我对布林德这个声明（“总汇报”第325号，并見“主要著作”，文件，第39、40頁）的回答：“把案件从奥格斯堡移到倫敦，布林德—福格特的全部mystère〔秘密〕就都揭穿了。”

布林德怀着被侮辱的好心人的义憤，又轉而攻击“1859年12月11日的‘总汇报’附刊”：

“我再一次〈我們会記住的〉引用由印刷所老板霍林格尔先生和排字工人維耶签名的文件，并最后一次声明，认为我是經常提到的傳单的作者这样一种已經屬於誹謗性的武断，是明显的謊言。对我的别的武断則是最粗暴的歪曲。”

“总汇报”編輯部在对这一声明所加的按語中指出，“广大讀者

对于这种爭論已經不感兴趣”，因此編輯部要求“与此有关的各位先生不再繼續爭論”；对于这一点，“圓滿的人物”在“主要著作”的末尾是这样評述的：

“換句話說：‘总汇报’編輯部要求被揭露的彻头彻尾的撒謊者馬克思、比斯康普^①、李卜克內西等先生不要再让自己和‘总汇报’繼續丢丑。”

奥格斯堡战役就这样暫時宣告結束。

福格特又用了他的劳斯之歌的声調，他断言，“排字工人費格勒”向我和李卜克內西提供了“伪证”。（“主要著作”第195頁）他說明傳單的来源时这样写道：**布林德**

“可能产生过某种怀疑，并把这些想法到处乱讲。硫磺帮由此就炮制出傳單以及后来的文章，并把它們硬說成是陷入困境的布林德写的”（同上，第218頁）。

帝国的福格特尽管受到邀請，仍然沒有在倫敦重新开始他的未結束的战役，这一方面是由于倫敦是“偏僻地方”（“主要著作”第229頁），同时也是由于有关方面“互相指責对方捏造”（同上）。

这位讲求“批評的率直”的人，只有当双方不为真理而爭論的时候，才认为法庭的干預是适当的。

① 比斯康普于10月20日从倫敦寄給“总汇报”編輯部一封关于福格特事件的信，在信的末尾他要求該报接納他为通訊員。⁴⁵⁷ 这封信我是从“总汇报”那里才知道的。福格特創造了一种道德論，根据这种理論，我既然支持过已經停刊的报纸，就得为該报編輯后来的私人信件負責。那末，福格特应当为科拉切克的“时代呼声”負更多的責任，因为他是科拉切克的“月刊”⁴⁵⁸的有酬的撰稿人。比斯康普在出版“人民报”的这一期間，作了极大的牺牲。为了担任該报編輯，他放棄了多年的职位；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无偿地**进行編輯工作；最后，他为了能按自己的信念行动，牺牲了在例如“科倫日报”这样的德国报纸上发表通訊的机会。其他一切事情，無論过去或現在都与我无关。

我跳过三个月，从 1860 年 2 月初继续讲下去。那时福格特的“主要著作”还没有到达伦敦，但柏林“国民报”的文选这里已经有了，文选中有这样一段：

“由于布林德在同马克思谈话中和在‘自由新闻’上的一篇文章里表示过类似的看法，所以后来马克思派能轻而易举地把布林德说成是传单的作者；利用布林德的这些意见和说法，就可以把传单伪造成像是他的作品一样。”

布林德把全部外交艺术归结为沉默（就像福斯泰夫认为慎重是勇敢的最大要素^①一样），因而布林德又一声不响了。为了要他开口讲话，我在伦敦发表了 1860 年 2 月 4 日写的一封英文通告信（见附录 11）。

这封通告信寄给了“自由新闻”的编辑，其中写道：

“在我采取进一步措施以前，我得揭穿那些显然是同福格特暗中勾结的家伙。因此，我公开声明，布林德、维耶、霍林格尔证明匿名传单并非在索荷区利奇菲耳德街 3 号霍林格尔印刷所印刷的声明是一种可耻的谎言”^②。

我在提出证据以后，用以下的话作为结束：

“根据这一切，我再次把上面提到的卡尔·布林德称做可耻的撒谎者（deliberate liar）。如果我说的有失实的地方，那很方便，他可以向英国法院上诉来反驳我。”

1860 年 2 月 6 日，伦敦的一家报纸（“每日电讯”⁴⁵⁹）以《*The Journalistic Auxiliaries of Austria*》（“奥地利的报界帮凶”）为题重刊了——回头我还要来谈这一点——“国民报”的文选。于是，

① 莎士比亚“亨利四世”前篇第五幕第四场。——编者注

② 我用英文写的是：《deliberate lie》。“科伦日报”译成“可耻的谎言”。我接受了这种译法，虽然译成“蓄意的谎言”更切合原文些。

我就控告“国民报”进行誣蔑，警告“电訊”，我将对该报进行类似的控告，并开始收集需要的訴訟材料。

1860年2月11日，排字工人費格勒向弯街治安法庭提供了一份 affidavit。这份文件重复了他1859年9月17日的声明的主要内容，即傳单的原稿是布林德的笔迹，并且是在霍林格尔印刷所部分由他本人（費格勒），部分由菲·霍林格尔排版的（見附录12）。

排字工人維耶的 affidavit 是更为重要的，布林德再一次地、而且是信心越来越大地在“总汇报”上引证过他的证詞。

因此，除了附原文（見附录13）以外，在这里还把它逐字逐句地翻譯如下：

“去年11月初（具体日期我記不起来了）的一天晚上九、十点钟，菲·霍林格尔先生把我从床上叫起来，当时我住在他家里并給他当排字工人。他递給我一份文件，内容是說：我在过去的十一个月中一直在他那里工作，在这期間，索荷区利奇菲耳德街3号霍林格尔先生的印刷所并没有排印一份标题为‘警告’的德文傳单。我当时感到迷惘，同时由于不知道事情的重要性，就滿足了他的要求，把这份文件重抄了一下并在上面签了名。霍林格尔先生答应給我錢；但我什么也沒有得到。我的妻子后来告訴我，进行这件事的时候，卡尔·布林德先生在霍林格尔先生的房間里等待着。几天以后，霍林格尔太太在我吃飯时把我叫去，領我走进她丈夫的房間，我发现只有布林德先生一个人在那里。他把以前霍林格尔先生曾經給过我的那份文件递給我，恳求我（entreated me）再抄一份并且签上名，因为他需要两份，一份自己保留，一份交給报刊发表。他还說，他将非常感謝我。我又抄了一份并在上面签了名。

我在此声明：上述經過确系实情，并补充下面几点：

（1）文件提到的十一个月中我有六个星期没有在霍林格尔先生那里工作，而是在埃尔曼尼那里工作；

（2）正好是在排印傳单‘警告’的时候，我不在霍林格尔先生的印刷所里工作；

(3) 当时我听到那时在霍林格尔先生处工作的費格勒先生說，他(費格勒)曾經同霍林格尔先生本人一起为上述傳单排版，并且說，原稿是布林德的笔迹；

(4) 当我回到霍林格尔印刷所的时候，傳单的活字版还保留着。由于索荷区利奇菲耳德街 3 号霍林格尔先生承印的德文报纸‘人民报’需要轉載傳单‘警告’，我本人又把它重新排了一次。这傳单刊登在 1859 年 6 月 18 日‘人民报’第 7 号上；

(5) 我曾看見霍林格尔先生把有卡尔·布林德先生亲笔改正了四五处刊誤的傳单‘警告’的一張校样交給住在索荷区教堂街 14 号的威廉·李卜克內西先生。霍林格尔先生曾犹豫要不要把校样交給李卜克內西先生，而李卜克內西先生剛一离开，霍林格尔先生就向我和我的同事費格勒表示后悔，說不該把校样交出去。

約翰·弗里德里希·維耶

今天，1860 年 2 月 8 日，弗里德里希·維耶在弯街治安法庭上当面对我作以上声明并签名。

上述法庭〈弯街治安法庭〉法官 托·亨利”

排字工人費格勒和維耶的两个 *affidavits* 证明，傳单的原稿是布林德的笔迹，在霍林格尔印刷所排版并且由布林德本人校对清样。

这位 *homme d'état* [政治活动家] 在 1859 年 7 月 4 日由倫敦写給尤利烏斯·弗呂貝爾的信中說：

“这里出現了說福格特进行叛卖活动的尖銳指責，我不知道这是誰写的。其中举了一些我們过去没有听到过的似有其事的事实。”

这同一位 *homme d'état* 在 1859 年 9 月 8 日写給李卜克內西的信中說，他

“与这事毫无关系”。

公民兼政治家布林德并不满足于这些成就，除此以外，他还靠

菲德利奥·霍林格尔答应的金錢和自己答应的将来的感謝，誘騙排字工人維耶签名，制造了一份假声明。

他不仅把騙取签名的他自己的作品和菲德利奥·霍林格尔的伪证寄給“总汇报”，而且在第二次声明中“再一次地”“引用”这些“文件”，他还根据这些“文件”义憤填膺地指責我的话是“明显的謊言”。

我把費格勒和維耶的这两份 affidavits 的副本交給各界人士傳閱，接着，布林德、菲德利奥·霍林格尔和布林德的密友医学博士卡尔·沙伊伯勒先生（一个很可爱的文靜的人，他在布林德的政治活动中或多或少地扮演了一个温順的配角）就在布林德家里举行了一次会晤。

1860年2月15日的“每日电訊”发表了一則后来德文报纸轉載的簡訊，譯文如下：

“反对福格特的傳单

致‘每日电訊’的出版者！

閣下！鉴于近来謠言紛紜，我感到有責任向布林德先生和馬克思先生正式声明，他們之中誰都不是前不久出現的反对日內瓦福格特教授的傳单的**作者**。这个傳单出自我手，我应当对此負責。出于我对馬克思先生和布林德先生的尊敬，我感到非常遺憾，因为不以自己意志为轉移的情况使我未能及早发表这一声明。

医学博士 卡尔·沙伊伯勒

1860年2月14日于倫敦”

沙伊伯勒先生把這項声明寄給了我。为了报答他的殷勤，我立即給他寄去了排字工人費格勒和維耶的 affidavits，同时給他写道，他的（沙伊伯勒的）声明既改变不了布林德寄給“总汇报”的伪证，也改变不了布林德和霍林格尔为伪造文件騙取維耶签名的

conspiracy〔陰謀〕。

布林德感到他現在不是站在“总汇报”的可靠的立足点上，而是站在令人害怕的英国法庭上。如果他想使这两份 *affidavits* 和以它們为根据的我的通告信中的“粗暴侮辱”失去作用，那末他和霍林格尔就必须針鋒相对地提出自己的 *affidavits*，但是，刑事案件可不是随便鬧着玩的。

艾塞勒-布林德不是傳單的作者，因为柏塞勒-沙伊伯勒公开声明自己是作者。布林德只是抄写了傳單的原稿，只是把原稿交給了霍林格尔去印刷，只是亲笔校改了清样，只是同霍林格尔制造了伪证并寄給“总汇报”，以便对上面的事实进行反駁。但是，尽管如此，他还是一个被人誤会的无辜的人，因为他不是傳單的作者，也不是出版傳單的主謀。他只是柏塞勒-沙伊伯勒的抄写員。正因为如此，所以1859年7月4日他不知道傳單是“誰”搞出来的，而在1859年9月8日他“与这事毫无关系”。所以，我們为了使他安心，就这样說：柏塞勒-沙伊伯勒是傳單的文字意义上的作者，而艾塞勒-布林德根据英国法律是技术意义上的作者，根据一切文明民族的法律是責任出版者。Habeat sibi!〔随他的便!〕

最后还想对柏塞勒-沙伊伯勒先生說几句。

福格特发表在俾尔“商业信使报”上的攻击我的誹謗书（日期是：1859年5月23日于伯尔尼）的标题是：“警告”。沙伊伯勒于1859年6月初写就，再由他的秘书布林德抄写并出版的傳單的标题也是“警告”，其中列举一些完全肯定的事实，揭露了福格特是“收买”他人的和“被收买的”路易·波拿巴的代理人，此外，文章的署名是X。虽然在代数学上X代表未知数，但是，这也正好是我的姓的最后一个字母。沙伊伯勒的傳單“警告”采用这样的标题和签

名，或许是为了使人得到一种印象，以为这是我对福格特的“警告”的回答吧？沙伊伯勒保证，如果福格特敢于否认揭露之一，他将发表揭露之二。福格特不仅否认了，而且控告沙伊伯勒的“警告”是在进行诽谤。而沙伊伯勒的揭露之二直到现在也没有出现。沙伊伯勒在他的传单上印有“请代为传布”等字样。可是当李卜克内西满足了这种“请求”，通过“总汇报”“传布”这个传单时，“不以自己意志为转移的情况”却在1859年6月到1860年2月这一期间束缚了沙伊伯勒先生的舌头，只有弯街治安法庭的 affidavits 才使他开口讲了话。

不管怎样，福格特的本来的原告沙伊伯勒现在公开声明，对传单中所提的事实负责。因此，奥格斯堡战役并没有以捍卫者福格特的胜利而告终，而是以进攻者沙伊伯勒终于在斗争舞台上的出现而结束。

八

达·达·福格特和他的研究

«SINE STUDIO»^①

大約在意大利战争爆发前一个月，福格特的所謂“**欧洲现状研究**”問世了(1859年日内瓦版)。Cui bono? [对誰有利?]

福格特知道：

“**英国**在行将到来的战争中仍将保持**中立**。”(“研究”第4頁)

他也知道：**俄国**

“定将协同法国，采取**各种手段**来損害奥地利，但不超出公开敌对的界限。”(“研究”第13頁)

他还知道：**普魯士**——但是让他本人告訴我們他所知道的普魯士吧。

“連目光最短淺的人現在也应当明白，在普魯士政府同法国皇帝政府之間存在着協議；普魯士不会为了捍卫奥地利的非德意志省区而拔劍張弩；它将会同意为捍卫联邦疆土所采取的各种必要措施，但同时，它将使联邦或联邦的某些成員不得以任何方式参与奥地利的一边，以便以后，即未来的和平談判中，取得北德平原作为对它所作的这番努力的一种酬劳。”(同上，第19頁)

总之，facit [結論]是：在波拿巴即将对奥地利进行的十字軍征

① «Sine studio»的意思是“不偏不倚”；馬克思标上这一副标题，用以諷示福格特的“研究”(«Studien»)的偏頗态度。——編者注

討中，英国仍将保持中立，俄国将对奥地利采取敌对行动，普魯士将压制好战的联邦⁴⁶⁰ 成員，同时，欧洲将尽力把战争局限在一个地区内。就像过去对俄国作战一样，路易·波拿巴现在将得到最高当局的首肯，充当可以说是欧洲同盟的一位秘密将军对意大利作战。那末，福格特为什么要写这本小册子呢？既然福格特知道英国、俄国和普魯士将采取反对奥地利的行动，那末什么东西迫使他去为波拿巴著书立說呢？但看来除了以“年老糊涂的阿倫特老爹和微不足道的楊的幽灵为首”（同上，第 121 頁）的要吞掉法国人的老一套之外，仿佛还有某种民族运动席卷了“德国人民”；这一运动在各个“議院里和报纸上”都有反应，“而各邦政府却只是緩慢地、不无抵触地同意了这一統治思潮”（同上，第 114 頁）。看来“对即将发生的危險深信不疑”引起德国“人民”“发出了采取共同措施的呼声”（同上）。法国的“通报”（順便提一下，見 1859 年 3 月 15 日的一号）是以“伤心和惊奇的心情”看待这一德国运动的。

它喊道：“在德意志联邦某些邦的議院里和报刊上，正在进行对法国发动一次十字軍征討之类的宣傳。它們譴責法国野心勃勃的計劃，实际上它已放棄了这种計劃；它們譴責法国在策划侵略，实际上它并不需要进行这种侵略”等等。

“通报”在回答这些“誹謗性譴責”时宣称：“相反地，皇帝”在意大利問題上的行为应当“使德国人的头脑深信不疑”：保障德国的統一和德国人的民族利益，在一定程度上是十二月政变的法国的一种梦寐以求的理想，等等。然而，“通报”承认（見該报 1859 年 4 月 10 日的一号）：德国人的某种忧虑，看来可能是由巴黎的某些小册子“挑撥起来的”；这些小册子說，路易·波拿巴在加紧設法給自己的人民一个“久已矚望的机会”，讓他們去 «pour s'étendre

majestueusement des Alpes au Rhin» [“庄严地从阿尔卑斯山扩展到萊茵河”]。

“通报”写道：“但是，德国忘記了，法国是受不允許政府事先进行任何监督的一种立法保护的。”

“通报”的这类声明，就像向馬姆茲伯里伯爵所作的报告一样（見 1859 年 1—5 月关于意大利事件的藍皮书⁴⁶¹），引起了与其所想的适得其反的效果。但是，“通报”未能达到的目的，卡尔·福格特也許达到了。他的“研究”只不过是“通报”上的文章、丹屠出版的小册子和波拿巴的未来地图的德文版汇编。

福格特关于英国的一套政客式廢話只有这样一种意义，就是使他的“研究”的性质昭然若揭。他按照他的法文原著，把英国海軍上将查理·納皮尔爵士变为納皮尔“勳爵”（“研究”第 4 頁）。十二月政变的一帮耍笔杆的朱阿夫兵，从圣馬丁門劇場⁴⁶² 的演出中得知：每一个著名的英国人至少是一个勳爵。

福格特写道：“英国从来就不能在比較长的时期內同奥地利和睦相处。如果暂时一致的利害关系使它們結合一些时候，那末，政治上的必要性总是紧接着又使它們分离。相反地，英国同普魯士倒經常有着非常亲密的关系”等等（同上，第 2 頁）。

果真如此！英国和奥地利反对路易十四的共同斗争，除了几次短时期的停頓以外，从 1689 年起到 1713 年都在进行，也就是說，几乎持續了四分之一世紀。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英国同奥地利一起，对普魯士和法国几乎斗争了六年。只是在七年战争⁴⁶³ 中，英国才同普魯士結成同盟去反对奥地利和法国，但在 1762 年，布特勳爵就已背叛弗里德里希大帝，时而向俄国公使哥利岑提議

“瓜分普魯士”，时而又向奥地利大臣考尼茨提議“瓜分普魯士”。1790年；英国同普魯士結成同盟去反对俄国和奥地利，但这个同盟在当年就解体了。在反雅各宾战争时期，普魯士尽管接受了皮特的資助，但仍然签订了巴塞尔条約⁴⁶⁴而退出了欧洲同盟。相反地，奥地利由于受到英国的唆使，却把这一斗争从1793年继续到1809年，其間只有几次短时期的停頓。拿破侖剛被廢黜，英国还在維也納會議期間就馬上同奥地利和法国签订了一项反对俄国和普魯士的秘密条約⁴⁶⁵（1815年1月3日）。1821年，梅特涅同卡斯尔里在汉諾威締結了一项反对俄国的新协定⁴⁶⁶。因此，当不列颠人自己——历史家和議會里发言的人——多半把奥地利当做 «ancient ally»（老盟友）来談論时，而福格特却在他的原著——丹屠出版的法文小册子里发现了，奥地利和英国，如果撇开它們的“暂时一致”不談，却总是分道揚鑣的，相反地，英国和普魯士却一貫团結无間，所以，林德赫斯特勋爵在对俄国作战期間也在上院对普魯士高喊：«Quem tu, Romane caveto!» [“提防它，啊，羅馬人！”]^①新教的英国厌恶天主教的奥地利，自由主义的英国厌恶保守的奥地利，主張自由貿易的英国厌恶实行保护关税政策的奥地利，有支付能力的英国厌恶破了产的奥地利。但是，在英国的历史中却从未出現撼动心灵的篇章。帕麦斯顿勋爵在他統治英国的三十年当中，的确一有机会就表现出他对奥地利的厌恶，借以掩盖自己对俄国的从屬关系。例如，由于“厌恶”奥地利，他在1848年竟拒絕了奥地利提出的并得到皮蒙特和法国贊同的由英国出面按下列条件对意大利事件进行調停；这些条件是：奥地利退至艾契河和維罗那

① 这里套用了賀雷西“諷刺詩集”中的一行詩，見第1卷，第四首諷刺詩。——編者注

一綫，如果倫巴第願意的話，可以并入皮蒙特，帕尔馬和摩地那可以划归倫巴第，而威尼斯則在一位奧地利大公的管轄下組成一個獨立的意大利國家并獨立制定自己的憲法（見 1849 年 7 月出版的**关于意大利事件的藍皮書第 2 編**，№№ 377, 478）。無論如何，這些條件要比維拉弗蘭卡和約⁴⁶⁷的條件有利。在拉德茨基擊潰意大利人之後，帕麥斯頓本人提出了他早先拒絕過的那些條件。但是，在匈牙利爭取獨立的戰爭時期，當俄國的利益要求相反的做法時，帕麥斯頓就不顧自己對奧地利的“厭惡”，以 1711 年條約⁴⁶⁸為借口，拒絕了匈牙利人向他提出的求援；他甚至拒絕對俄國的干涉提出任何抗議，因為

“歐洲的政治獨立和自由，是同作為歐洲的大國奧地利的存在和完整息息相關的”（在 1849 年 7 月 21 日舉行的下院會議上）。

福格特往下說：

“聯合王國的利益……處處都是同它〈奧地利的利益〉敵對的。”（同上，第 2 頁）

這個“處處”立即變成了地中海。

“英國無論如何想在地中海及其沿岸各國確立自己的影響。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島，馬爾他島和伊奧尼亞群島，敘利亞和埃及，都是英國指向东印度的政策的據點；奧地利利用這些據點處處對英國加以強有力的阻撓。”（同上）

這位**福格特**在原著中，即在十二月政變的衛士們在巴黎丹屠出版的小冊子中讀到的東西，是全都相信的。英國人迄今一直是這樣想的：他們時而同俄國人、時而又同法國人爭奪馬爾他島和伊奧尼亞群島，但決不同奧地利人爭奪這些島嶼。是法國，而不是奧地利，曾經派遣遠征軍前往埃及，目前又在蘇伊士地峽加強自己的地位；是法國，而不是奧地利，征服了非洲北部海岸，并同西班牙結

盟，企图从英国人手里夺取直布罗陀；英国訂立有关埃及和叙利亚的 1840 年七月条約⁴⁶⁹，这是反对法国的，但是同奥地利一起反对法国的；英国在执行“指向东印度的政策”时，处处受到来自俄国方面的，而不是来自奥地利方面的“强有力的阻撓”；在英国同那不勒斯之間发生的一次唯一严重的爭端中，即关于 1840 年的硫磺爭端中，是法国公司，而不是奥地利公司对西西里島硫磺貿易的壟断成了引起摩擦的导火綫⁴⁷⁰；最后，在拉芒什海峽彼岸，一有机会就說要把地中海变为 *«lac français»* [“法国的內海”]，但是从来不說要把地中海变为 *«lac autrichien»* [“奥地利的內海”]。可是，在这里必須注意到一种重要情况。

这种情况就是：1858 年，在倫敦出現了一种欧洲地图，名为 *«L'Europe en 1860»* (“一八六〇年的欧洲”)。这种地图是由法国大使館出版的，它包含某些对 1858 年来說是带有預言性的暗示，例如，倫巴第和威尼斯被并入皮蒙特，而摩洛哥則被并入西班牙。这一地图改画了全欧洲的政治地理，只有法国例外，它好像仍然保留自己的原有版图。原来指定給法国的領土，用一种隱蔽的嘲弄把它們分配給一些不可思議的主人。譬如說，埃及被划归奥地利，而在地图空白处的注釋中却指明，*«François Joseph I, l'Empereur d'Autriche et d'Egypte»*。（弗兰茨-約瑟夫一世，奥地利和埃及的皇帝。）

在福格特面前摆着“一八六〇年的欧洲”地图，这是十二月的指南針。他的所謂英国和奥地利两国之間因埃及和叙利亚而发生冲突，就是从这里来的。福格特預言說：这一冲突“将以消灭敌对国之一而告終”，如果，——幸亏他还及时想起了一个“如果”，——“如果奥地利拥有一支海軍的話”（同上，第 2 頁）。但是，“研究”的

独特的历史知識，在下列一处达到了頂峰：

“拿破侖第一曾經企圖使英格蘭的銀行 [*die englische Bank*] 遭到破產，后者對貨幣採取點數的辦法，而不是採取以往常用的過秤的辦法，在一天之間就擺脫了困境；奧地利的國庫一年 365 天都處在類似的、甚至壞得多的境況中。”(同上，第 43 頁)

大家知道，英格蘭銀行 [*die Bank von England*] (*die englische Bank*——這也是福格特式的幻影) 從 1797 年 2 月到 1821 年曾停止鈔票兌換黃金；在這二十四年中間，英國的鈔票根本不能兌換金屬貨幣，不論按重量或者按點數都是一樣。當停止兌換黃金的時候，在法國還沒有什麼拿破侖第一(雖然波拿巴將軍當時正在進行他的第一次意大利戰役)；而當針綫街^① 恢復鈔票兌換的時候，在歐洲已經沒有拿破侖了。這一類“研究”，甚至使奧地利“皇帝”對提羅耳進行的拉·格隆尼埃爾式的征服也為之遜色。

克呂登納夫人，這位神聖同盟的母親，把善的因素即“北方的白天使”(亞歷山大一世)同惡的因素即“南方的黑天使”(拿破侖第一)加以區別。福格特，這位新神聖同盟的養父，把兩個人——沙皇和凱撒(亞歷山大二世和拿破侖第三)都變為“白天使”。這兩個人命定是歐洲的解放者。

福格特說：皮蒙特“甚至贏得了俄國的尊重”(同上，第 71 頁)。

甚至贏得了俄國的尊重。對一個國家，還能再說什麼呢？在皮蒙特已經把維拉弗蘭卡軍港讓給俄國，而同一位福格特就普魯士購買亞德灣一事⁴⁷¹ 提出了下列警告以後，更是如此：

^① 針綫街是倫敦的一條街，英格蘭銀行的所在地。——譯者注

“一个在異国境内的軍港，同占有該軍港的国家毫无有机联系，这是十分荒謬可笑的，因为这种軍港的存在只是在下列情况下才有意义：在某种程度上把它看做达到未来目的而設的瞄准点，看做用来观测瞄准綫而升起的一面小旗。”（“研究”第 15 頁）

大家知道，叶卡特林娜二世曾經力图在地中海上为俄国取得一些軍港。

对于北方的“白天使”表示无微不至的殷勤，使福格特过分粗暴地破坏了“天生的謙遜”，因为这种謙遜在丹屠出版的原著中还是存在的。他在丹屠出版的“問題的实质，法国—意大利—奥地利”⁴⁷²（1859年巴黎版）这本小册子的第 20 頁上讀到：

“可是，当奥地利政府自己已經侵占了克拉科夫，因而破坏了保证克拉科夫独立的 1815 年条約时，它还有什么理由侈談这些条約不可破坏呢？”^①

福格特把他的法文原著譯成这样的德文：

“这类話竟出自迄今一直厚顏无耻地破坏条約的唯一的政府之口，听起来簡直令人奇怪；在和平时期，它毫无理由地向受到条約保证的克拉科夫共和国伸出罪恶的黑手，并且没有多久就把它并入帝国的版图”（同上，第 58 頁）。

当然，尼古拉廢除了受到 1815 年条約保证的波兰王国的宪法和独立，是出于对 1815 年条約的“尊重”。俄国在 1831 年派軍队占領了克拉科夫，同样也是对这个自由城的不可侵犯性的尊重。1836 年，克拉科夫又被俄国人、奥地利人和普魯士人占領；他們就

① «De quel droit, d'ailleurs, le gouvernement autrichien viendrait-il invoquer l'inviolabilité de ceux» (traités) «de 1815, lui qui les a violés en confisquant Cracovie, dont ces traités garantissaient l'indépendance?»

像对待一个被征服的国家那样对待它，而它根据 1815 年条約在 1840 年还向英国和法国发出呼吁，但是毫无結果。最后，1846 年 2 月 22 日，俄国人、奥地利人和普魯士人又占領了克拉科夫，以便把它并入奥地利。⁴⁷³ 这些条約曾遭到三个北方国家的破坏，而 1846 年奥地利的侵占，只不过是 1831 年俄国入侵的尾声。福格特由于对“北方的白天使”表示客气，竟忘記了波兰的被侵占，并且歪曲了克拉科夫被侵占的历史。^①

俄国“一貫敌視奥地利而同情法国”一事，使福格特对路易·波拿巴的民族解放傾向絲毫不加怀疑，就像“他的〈路易·波拿巴的〉政策現時同俄国的政策极其紧密地結合在一起”（第 30 頁）一事，使他对亚历山大二世的民族解放傾向絲毫不加怀疑一样。

因此，应当把神圣的俄罗斯看成是东方的“解放意願”和“人民和民族的发展”的“朋友”，就像应当把十二月政变的法国看成是西方的这种“朋友”一样。这一口号曾經頒发給十二月二日政变的各个代理人。

“俄国”，——福格特在丹屠出版的“条約的拘束力、签订了条約的列强和皇帝拿破侖第三”⁴⁷⁵（1859 年巴黎版）这一小册子中讀到，——“俄国屬於斯拉夫大家庭，屬於优秀种族…… 有人对法俄两国之間突然产生的騎士协商感到惊奇。其实沒有比这更自然的了：原則相同，目标一致，政府和人民遵守神圣同盟法律不是为了进行欺騙和强制，而是为了使民族运动走上絕妙的道路，并支持这一运动。这种最充分的誠意〈在路易-菲力浦同英国之間只有过 *entente cordiale* [誠意协商]，但在路易·波拿巴同俄国之間却存在着 *la cordialité la plus parfaite* [最充分的誠意]〉已經产生了极其良好的

① 帕麦斯頓曾以引人发笑的抗議愚弄了欧洲，从 1831 年起，他非常积极地参加了反对克拉科夫的陰謀。（見我的抨击文“帕麦斯頓与波兰”⁴⁷⁴ 1853 年倫敦版。）

結果：铁路、农奴解放、地中海上商船停泊場等等。”^①

福格特抓住了“农奴解放”，并且暗示說：

“目前的这一推动……应当把俄国变成解放意願的朋友，而不是解放意願的敌人。”（同上，第10頁）

就像在他的丹屠出版的原著中的看法一样，在这里他也以为路易·波拿巴推动了所謂俄国的农奴解放，为此目的，他把成为这种推动力的英、土、法对俄战争变为“法国战争”（同上，第9頁）。

誰都知道，响亮而坚决地要求解放农奴的呼声，开始于亚历山大一世时期。沙皇尼古拉毕生研究了农奴解放問題；为此，他在1838年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国家产业部，在1843年下詔这个部进行准备工作，而在1847年甚至頒布了一些对农民有利的关于出卖貴族領地的法律⁴⁷⁶，但是到了1848年，由于害怕革命，他又廢除了这些法律。因此，如果說农奴解放問題，在“好心的沙皇”——福格特是这样亲切地称呼亚历山大二世的，——时期已有了极为重大的进展，那显然是由于即使沙皇也奈何不得的經濟关系的发展造成的。此外，按照俄国政府的精神去解放农奴，就会使俄国的侵略性增强千百倍。这种解放的目的只不过是消除障碍，从而使专制扩大到极限；这类障碍就是大专制君主迄今所遇到的俄国貴族中以

^① «La Russie est de la famille des Slaves, race d'élite... On c'est étonné de l'accord chevaleresque survenu soudainement entre la France et la Russie. Rien de plus naturel: accord de principes, unanimité de but... *soumission à la loi de l'alliance sainte des gouvernements et des peuples*, non pour leurrer et contraindre, mais pour guider et aider la marche divine des nations. De la cordialité la plus parfaite sont sortis les plus heureux effets: chemins de fer, *affranchissement des serfs*, stations commerciales dans la Méditerranée etc.», p. 33. «*La Foi des Traités* etc.», Paris, 1859.

农奴制为依靠的无数小专制君主和自治的农民公社，这种公社的物质基础，即公社所有制，是要被所謂解放消灭的。

但是，俄国农奴对解放的理解同政府的理解是不同的，而俄国貴族对解放又有另一种理解。因此，“好心的沙皇”发现，农奴的真正解放同他的专制制度是不相容的，正如好心的教皇庇护九世曾經发现，意大利的解放同教廷的存在是不相容的一样。因此，“好心的沙皇”把进行侵略战争和执行俄国的傳統对外政策（俄国历史学家卡拉姆津說这一政策是“不变的”⁴⁷⁷）看成是延緩国内革命到来的唯一手段。多尔哥魯科夫公爵在其 1860 年出版的“俄国真相”⁴⁷⁸ 一书中，对所謂亚历山大二世統治时期出現了一个千年王国的謊言，进行了致命的批判和駁斥；这类謊言从 1856 年起由俄国的雇佣文人尽心竭力地傳遍全欧，1859 年又由十二月騎士們响亮地給以宣揚，福格特也盲目地在他的“研究”中加以重复。

还在意大利战争爆发以前，“白沙皇”同“十二月英雄”之間訂立的同盟，——按照福格特的說法，这是专门为了各民族的解放而訂立的，——就已在多瑙河各公国經受了考驗，在那里，羅馬尼亚民族的統一和独立，由庫扎上校被选为莫尔达維亚和瓦拉几亚的君主而得到了巩固。⁴⁷⁹

“奥地利拚命抗議，法国和俄国則表示贊同。”（同上，第 65 頁）

在俄国内閣于 1837 年給当时沙皇草拟的报告书（1855 年的“普魯士周刊”⁴⁸⁰ 曾經轉載过）中，我們可以看到：

“俄国不喜欢一下就把有異己分子的国家合并过来…… 无论如何，对已决定要取得的国家，让一些特別的、但完全依从的执政者去治理一个时期，就像我們在莫尔达維亚和瓦拉几亚所做的那样，是更为合适的，等等。”

俄国在把克里木合并之前，它曾宣布克里木的独立。

我們在 1814 年 12 月 11 日的俄国宣言中可以看到：

“波兰人，你們的保卫者亚历山大皇帝向你們呼吁。为了保卫你們的祖国和維護你們的政治独立，你們自己武装起来吧。”

多瑙河各公国啊！从彼得大帝进入多瑙河各公国以来，俄国就关心这些公国的“独立”了。在涅米罗夫會議（1737）上，女皇安娜要求苏丹让多瑙河各公国在俄国的保护下获得独立。叶卡特林娜二世在福克夏尼會議（1772）上，坚持各公国在欧洲的保护下获得独立。⁴⁸¹ 在亚历山大一世統治时期，这种努力仍在繼續进行；在他把貝薩拉比亚变成俄国的一个省（1812 年布加勒斯特和約）⁴⁸² 以后，这种目的就达到了。尼古拉甚至通过基謝廖夫，用至今还有效的“組織規程”为羅馬尼亚人造福，它在全欧洲对这部自由 code [法典] 的欢呼声中建立了极其丑恶的农奴制度。⁴⁸³ 亚历山大二世使多瑙河各公国在庫扎統治下實現的准联合，只不过是把他的前輩执行了一个半世紀的政策向前推进了一步。但福格特发现：由于实行了在俄国藩屬統治之下的这种联合，“各公国将成为阻擋俄国南进的障碍”（同上，第 64 頁）。

因为俄国欢迎庫扎的当选（同上，第 65 頁），所以非常明显：好心的沙皇不遺余力地堵塞了自己“南进的道路”，虽然“君士坦丁堡仍然是俄国政策一貫追求的目标”（同上，第 9 頁）。

把俄国說成是自由主义和民族意願的保护者，并不是什么新貨色。法国和德国的許許多多启蒙学者就曾把叶卡特林娜二世誉之为进步的旗手。“高尙的”亚历山大一世（拿破侖把他貶称为 *Le grec du Bas Empire* [东羅馬帝国时代的希腊人，即拜占庭人]①）

① 轉意是：口是心非的奸詐汉。——編者注

曾扮演过全欧自由主义的英雄。难道他不曾用俄国的文明财富为芬兰造福？难道除了宪法而外，他不曾还把一个俄国首相黎塞留公爵慷慨地赐给法国？难道他不是“赫特里”⁴⁸⁴的秘密领袖，虽然他同时在维罗那会议上通过卖身投靠的沙多勃利昂德路易十八讨伐西班牙的暴乱⁴⁸⁵？难道他不曾通过斐迪南七世的一个接受懺悔的神甫，唆使斐迪南七世征讨起义的西班牙美洲殖民地，而同时却答应北美合众国总统，说他反对欧洲列强对美洲大陆进行任何干涉？难道他不曾派遣伊普西朗蒂充当“神圣的希腊人义勇队的领袖”前往瓦拉几亚，并通过同一个伊普西朗蒂出卖了这支义勇队，同时谋杀了瓦拉几亚起义者的领袖弗拉基米烈斯库？1830年以前，各种语言、诗歌和散文把尼古拉也捧为民族解放的英雄。当他在1828—1829年对马茂德二世开战要解放希腊人时，——恰好是在马茂德拒绝让俄军过境去镇压希腊起义之后，——帕麦斯顿在英国议会宣称：俄国解放者的敌人，必然是世界上的那些龐然怪物——唐·米格尔、奥地利和苏丹——的“朋友”。难道尼古拉为了对希腊人表示慈父般的关怀，不曾给他们派一个俄国将军卡波第斯特里亚伯爵去担任总统？但是，希腊人并非法国人，他们杀死了高尙的卡波第斯特里亚。尽管尼古拉从1830年七月革命爆发时起，主要扮演的是正统派的保护人，但他一刻也没有停止协助“民族的解放”。只要举几个例子就够了。1843年9月爆发的旨在宣布宪法的希腊革命，是由俄国驻雅典公使卡特卡集领导的，此人原先是纳瓦林惨败⁴⁸⁶时海军上将葛伊甸的顶头上司。俄国驻布加勒斯特领事馆曾是1842年保加利亚骚乱的中心。俄国将军杜加美尔于1842年春在领事馆里接见了保加利亚代表团，向它说明了总起义的计划。塞尔维亚应成为起义的后备力量，而俄国将

軍基謝廖夫則应成为瓦拉儿亚的君主。在塞爾維亞起义时（1843年），俄国通过駐君士坦丁堡大使館慫恿土耳其对塞爾維亞人采用暴力，以便随后利用这个借口在反对土耳其人时爭取欧洲的同情和狂信。沙皇尼古拉的解放計劃也絲毫沒有把意大利排除在外。一度曾經是馬志尼派的巴黎机关报“青年意大利”，在1843年11月的某一号上这样写道：

“罗马尼亚新近发生的騷动和希腊爆发的运动，两者之間多少是有联系的……意大利的运动已遭到了失败，因为真正的民主派拒絕参加这一运动。共和派分子不願支持由俄国发起的运动。为了在意大利发动总起义，一切都准备好了。运动应在那不勒斯开始，因为在那里，可能有一部分军队起来领导起义，或者直接投到爱国者方面来。那不勒斯的革命开始以后，倫巴第、皮蒙特和罗马尼亚应随之响应：应当建立以欧仁·博阿尔奈的儿子、沙皇的女婿——洛伊希頓堡公爵为首的意大利帝国。‘青年意大利’粉碎了这个計劃。”

1843年11月20日的“泰晤士报”⁴⁸⁷就“青年意大利”的这一报道指出：

“如果这个偉大目标——建立以俄国公爵为首的意大利帝国——能够实现，那就更好了；但是，在意大利发生的任何突然事件都可能得到另一种更直接的、即使不是那么巨大的好处：引起奥地利惶恐不安，并且轉移它对俄国在多瑙河的一套可怕的(fearful)計劃的注意力。”

1843年，尼古拉对“青年意大利”⁴⁸⁸的号召毫无結果以后，便于1844年3月把布帖涅夫先生派往羅馬。布帖涅夫代表沙皇把一項計劃通知教皇^①，計劃規定，把俄屬波兰割让給奥地利以換取倫巴第，后者应組成以洛伊希頓堡公爵为首的北意大利王国。当时

① 格雷哥里十六。——編者注

羅馬教廷的英文机关报“小报”，于1844年4月就这一建議写道：

“这项美妙的計劃使羅馬宮廷醉心的是：波兰落到了天主教手中，而倫巴第仍然处于天主教皇朝治理之下。但是，羅馬外交界的老手們懂得，虽然奥地利能勉强保卫自己的領地，同时，大概迟早又会失去自己的斯拉夫各省，可是把波兰割让給奥地利，——即使真是这样，——只不过是以后要偿还的一笔債款，一旦以洛伊希頓堡公爵为首的北意大利真的处于俄国保护之下，很快也就必然落到俄国統治之下。因此，这项被推崇备至的計劃就暂时被擱在一边了。”

“小报”在1844年就是这样写的。

奥地利从十八世紀中叶起能够作为一个国家存在的唯一因素，以及它对俄国在东欧的进展的阻撓——虽然这种阻撓是軟弱无力的、不彻底的、胆怯的，但却是頑强的——使福格特发现了“奥地利是东方一切紛爭的策源地”（同上，第56頁）。他带着同他的肥胖外形十分相称的“某种童稚的天真”，把俄国同法国結盟反对奥地利的原因——“好心的沙皇”的解放傾向除外，——說成是因为奥地利对尼古拉在匈牙利革命时期所給予的帮助采取了以怨报德的态度。

“而在克里木战争时期，奥地利已經达到了武装的敌对的中立的最后边缘。不言而喻，这一行动，况且是带有虛伪和狡詐痕迹的这一行动，必然使俄国政府凶狠地反对奥地利，从而把該政府推到法国一边去。”（同上，第10、11頁）

在福格特看来，俄国执行的是温情主义的政策。奥地利由于在1850年华沙会议时損害德国利益向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进军⁴⁸⁹对沙皇所表示的那种感激，仍然不能使知恩的福格特感到滿足。

俄国外交家波茨措-迪-博尔哥在他的1825年10月写于巴黎

的著名紧急报告⁴⁹⁰中，在列举了奥地利反对俄国在东方的干涉计划的各种阴谋詭計之后，这样写道：

“因此，我們的政策要求我們对这个国家〈奥地利〉采取威懾的态度；我們的一切准备都应当使它确信：如果它竟敢采取什么手段来反对我們，那末，一場它从未經受过的极可怕的風暴就会降临在它的头上。”

波茨措用外来的战争和內部的革命来吓唬奥地利，并提議由奥地利占領“它所覬覦的”土耳其“各省”当做一种可能的和平結局，而把普魯士简单地描繪成俄国的一个千依百順的同盟者，在这以后，他接着写道：

“如果維也納內閣承认我們的善良目标和意图，那末皇帝內閣的計劃早就實現了，——这个計劃不仅涉及占領多瑙河各公国和君士坦丁堡，而且还涉及把土耳其人赶出欧洲。”

大家知道，尼古拉和查理十世于1830年簽訂了一項秘密条約，它規定了下列条件：法国允許俄国占領君士坦丁堡，自己取得萊茵河各省和比利时作为补偿；普魯士得到汉諾威和薩克森作为补偿；奥地利获得土耳其在多瑙河流域的一部分省份。在路易-菲力浦时代，在俄国的倡議下，同一个計劃又由摩萊提交給彼得堡內閣。在这以后不久，布隆諾夫就带着这个文件去倫敦，把它当做法国背叛变节的一項证据交給英国政府，并利用它来組織1840年的反法同盟。

现在讓我們来看一看，按照受巴黎原著指使的福格特的想法，俄国該怎样跟法国同心协力地利用意大利战争。俄国“民族的”构成，特别是“波兰民族”，对一个以“民族原則”为其“指路明星”的人來說，看来該引起一些困难的；可是：

“我們对民族原則評价很高，但自由自决原則對我們更可貴”（同上，第

121 頁)。

当俄国根据 1815 年条約占領了絕大部分波兰本土的时候,它就向西部挺进,不仅楔入奥地利和普魯士之間,而且楔入东普魯士和西里西亚之間,以致当时普魯士的軍官們(例如格奈澤瑙)就已經注意到不能容忍同一个非常强大的邻邦有这样的边界关系。然而,只是在 1831 年把波兰人平定下去,使这个地区完全为俄国人所左右时,这个楔子的真正意义才显示出来。必須使波兰俯首听命不过是在华沙、莫德林、伊万城建筑强大工事的一种借口。建筑这类强大工事的真正目的,是在战略上完全控制維斯拉河地区,建立向北、向南和向西进攻的基地。甚至连非常同情信奉东正教的沙皇以及俄国一切事物的那个哈克斯特豪森,也看出这是对德国的一种实际危險和威胁。俄国人在維斯拉河上的設防陣地对德国的威胁,要比法国全部要塞的总和还要大,特别是波兰的全国性反抗一旦停止,而俄国一旦能够把波兰的軍事力量当做自己的侵略力量来支配的时候,更是如此。因此,福格特才这样寬慰德国說:**波兰是根据自由自决变成为俄国的。**

“毫無疑問”,——他說,——“毫無疑問,由于俄国人民党的緊張努力,波兰和俄国之間的鴻沟已經大大縮小了,也許,只需要一种不大的推动力,就可把它完全填平了。”(同上,第 12 頁)

意大利战争应当提供这种不大的推动力。(然而,亚历山大二世在这场战争时期曾深信:波兰还不能胜任福格特給它准备好了的高位。)在“自由自决”的基础上溶化于俄国的波兰,按照万有引力定律,将会成为一个中心体,把被夺走的正在異族統治下受苦受难的前波兰的一些部分吸引过来。为了使这个吸引过程进行得比較容易,福格特劝告普魯士抓住方便时机摆脱“斯拉夫人的附庸”

(同上,第 17 頁),也就是擺脫波茲南(同上,第 97 頁),或許也要擺脫西普魯士,因为只有东普魯士才被认为是“純粹的德国土地”。从普魯士夺走的各个部分,当然馬上就会同俄国所吞沒的中心体合并,而“純粹的德国土地”——东普魯士,将变成俄国的 enclave [插入別国領土中的領土]。另一方面,至于說到在“一八六〇年的欧洲”地图上也被划入俄国版图的加里西亚,那末要知道,使加里西亚脱离奥地利就是使德国擺脫奥地利的非德意志領地的战争的直接目的。福格特想起了:

“1848 年以前,在加里西亚所看到的俄国沙皇的肖像,要比奥地利皇帝的肖像来得多”(同上,第 12 頁),“在俄国为实现这类阴谋而使用特殊手法的情况下,奥地利就可能有充分根据感到惶惶不可终日”(同上)。

但是,不言而喻,为了擺脫“内部敌人”,德国应当安然地允許俄国人把将会支持这类阴谋的“军队推进到边境”(第 13 頁)。虽然普魯士自己会放棄它的波兰各省,但是俄国应当利用意大利战争从奥地利手中夺走加里西亚,正如亚历山大一世在 1809 年就已得到了加里西亚的一部分,作为酬謝他对拿破侖第一所作的只不过是一种戏剧性的支持一样。大家知道,俄国成功地取得了原先归普魯士和奥地利管轄的一部分波兰領土,其中一部分是从拿破侖第一手中搞到的,一部分是在維也納會議上搞到的。按照福格特的意見,在 1859 年,整个波兰同俄国合并的时机已經成熟。福格特并不是要求从俄国人、奥地利人和普魯士人手中解放波兰民族,而是要求先前的整个波兰国家溶化于俄国并灭亡。Finis Poloniae! [結束波兰!]“俄国”这种“恢复波兰”的观念,在尼古拉一世逝世以后立即傳遍了全欧; 1855 年 3 月,戴維·烏尔卡尔特曾在其抨击性著作《*The new hope of Poland*》(“波兰的新希望”)中

揭露了这种观念。

然而，福格特对俄国还不够卖力气。

这位热心的交談者叙述說：“俄国人对匈牙利革命者的态度是異常殷勤的，甚至几乎是亲如手足的，这同奥地利人的行为比較起来，簡直太突出了，因而它不能不产生自己的影响。俄国虽然粉碎了一个党 <nota bene [注意]：在福格特看来，俄国粉碎的并不是匈牙利，而是一个党>，但对它还是既温和又礼貌的，因此，俄国就为下面一种看法奠定了基础，这种看法可大致表述如下：两害相权須取其輕；而在这种場合下，俄国并不是較大的害。”(同上，第 12、13 頁)

普隆-普隆的福斯泰夫是用“異常殷勤、既温和又礼貌”的、甚至几乎是“亲如手足的”态度来描述俄国人在匈牙利的所作所为的，因而使自己变成了傳播幻想的“渠道”；而 1849 年的匈牙利革命就是在这种幻想上碰碎的。戈尔盖的党当时散布要把一个俄国公爵当做匈牙利未来的国王予以信賴，并用这种信賴摧毀了匈牙利革命的反抗力量。^①

1848 年以前，哈布斯堡王朝由于在任何一个种族中都得不到特别的依靠，当然它就把它对匈牙利的統治建立在統治的民族——馬扎尔人身上。附带提一下，梅特涅倒是各民族的最偉大的保护者。他迫使一个民族憎恨另一个民族，但是他需要这些民族，以便强迫它們这样做。因此，他保护它們。我們不妨来比較一

^① 在放棄科莫恩以前曾在匈牙利革命軍中作过战、后来又在切尔克西亚反对过俄国人的一位波兰上校拉品斯基說：“匈牙利人的不幸在于他們不了解俄国人。”(泰奥菲尔·拉品斯基“一八四九年匈牙利主力軍的进軍”1850 年汉堡版第 216 頁)⁴⁹¹。“維也納內閣完全落到了俄国人手里…… 按照他們的建議，把一些領導人杀害了…… 俄国人一方面用种种办法博得同情，一方面迫使奧地利的所作所为变得比任何时候都更令人痛恨。”(同上，第 188、189 頁)

下波茲南和加里西亞。1848—1849年革命之后，在斯拉夫人帮助下击败了馬扎尔人和德国人的哈布斯堡王朝，企图模仿約瑟夫二世，以暴力使德国成分在匈牙利居于統治地位。哈布斯堡王朝由于害怕俄国，不敢投入他們的拯救者——斯拉夫人的怀抱。他們全国的反动势力，在匈牙利与其說是针对他們的战敗者——馬扎尔人，不如說是针对他們的拯救者——斯拉夫人的。因此，奥地利反动势力在同它的拯救者的斗争中，就像瑟美列在其1860年于倫敦出版的小册子“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六〇年的匈牙利”⁴⁹²中所指出的，把斯拉夫人赶回到馬扎尔人的旗帜下面去。可見，奥地利对匈牙利的統治，不論在1848年以前或者以后，都是同馬扎尔人在匈牙利的統治并存的。至于俄国，不管它是不是在匈牙利进行直接或間接的統治，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如果按族系和宗教去統計同俄国相近的一切成分，那就会发现，俄国拥有占居民多数的非馬扎尔人。馬扎尔人在数量上少于按族系同俄国相近的斯拉夫人和按宗教同俄国相近的瓦拉西亞人。因此，俄国在匈牙利的統治就等于匈牙利民族的灭亡，也就是在历史上同馬扎尔人的統治有联系的匈牙利的灭亡。^①

福格特要波兰人通过“自由自决”溶化于俄国，要匈牙利人俯

① 在匈牙利革命战争中声名赫赫的摩里茨·佩尔采尔將軍，在意大利战役时就已脱离了聚集在科苏特周圍的在都灵的匈牙利軍官們，他在一項公开声明中是这样解釋他离去的动机的：一方面是由于科苏特仅仅成了波拿巴派的稻草人，另一方面是由于匈牙利未来将屬於俄国这样一种前途。附带提一下，我曾写給他一封信，要他比較詳尽地解釋一下他的声明，他在回信（注有：1860年4月19日于圣埃尔耶）中写道：“我永远不会变成这样一种工具：帮助匈牙利逃脱双头鷹的毒爪，仅仅是为了随后又把它投入北方熊的致命的怀抱。”

首听命于俄国的統治，从而在斯拉夫各民族中灭亡。^①

然而，福格特对俄国还是不够卖力气。

在奥地利的“非德意志省区”中間，即德意志联邦不应为之“拔劍張弩”去反对法国和反对“完全站在法国一边”的俄国各省区中間，不仅有加里西亚、匈牙利和意大利，而且有波希米亚和莫拉維亚。

福格特說：“俄国是一个坚固的核心，斯拉夫各民族越来越渴望圍繞在它的四周。”（同上，第9—10頁）

波希米亚和莫拉維亚的居民屬於“斯拉夫各民族”。就像莫斯科公国变成了俄国一样，俄国也应当变成泛斯拉夫国。“我們旁边

① 科苏特先生从来没有怀疑过上面發揮的看法的正确性。他知道，奥地利可能殘酷地对待匈牙利，但不可能消灭它。1851年2月15日，他从居塔希亚写信告訴宰相列施德-帕沙說：“約瑟夫二世皇帝是哈布斯堡王朝的唯一英明人物，他用尽了他的全部独特而罕有的智慧，利用了当时还流行的关于他的王朝的威力的傳聞，来使匈牙利日耳曼化，并使它溶化于一个联合的国家中。然而，斗争却使匈牙利获得了新的生命力…… 奥地利从灰烬中起来投入最后一次革命，只不过为了向沙皇、向它的那个从来不给帮助、反而一贯出卖这种帮助的主子双膝下跪。因而奥地利必須为这种帮助付出高昂的代价。”（“科苏特通信集”第33頁）在同一封信中，另外，他还这样写道：土耳其和匈牙利只有联合起来，才能挫敗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阴谋詭計。1851年1月17日，他从居塔希亚写信給戴維·烏尔卡尔特說：《We must crush Russia, my dear Sir! and, headed by you, we will! I have not only the resolution of will, but also that of hope! and this is no vain word, my dear Sir, no sanguine fascination; it is the word of a man, who is wont duly to calculate every chance: of a man though very weak in faculties, not to be shaken in perseverance and resolution etc.》（同上，第39頁）。（“我們一定要摧毀俄国，亲爱的朋友！而且在您的领导下我們一定会摧毀它。我不仅充滿决心，而且滿怀希望——这并不是空話，亲爱的朋友，并不是一个爱激动的人的幻想：这是一个已习惯于对一切良机都加以深思熟慮的人說的話，这个人虽然庸碌无能，但是坚毅果断，不可动摇，等等。”）

有捷克人，我們就会在任何敌人面前都支持不住。”（同上，第 134 頁）我們，即德国，应当竭力摆脱捷克人，也就是摆脱波希米亚和莫拉维亚。“对各个君主的非德意志領地不給以任何保证。”（同上，第 133 頁）“**联邦內再不要任何非德意志省区**”（同上），可是要法国有德意志省区！因此不仅应当“趁目前法兰西帝国沒有侵犯联邦的德意志領土”时“給該帝国以行动自由”（前言第 9 頁），而且应当趁俄国目前只侵犯“**联邦內非德意志省区**”时也“給”俄国以“行动自由”。俄国派兵前往那些构成了俄国“阴谋”的对象的奥地利的“斯拉夫人的附屬地”，有助于德国的“統一”和“民族完整”的发展。当奥地利将在意大利忙于应付路易·波拿巴，而普魯士仍然把德意志联邦之劍装在劍鞘里的时候，“好心的沙皇”将“用金錢、武器和彈药暗中支持莫拉维亚和波希米亚的革命”（同上，第 13 頁）。

可是“我們旁边有捷克人，我們就会在任何敌人面前都支持不住”！

“好心的沙皇”是多么寬宏大量，因为他竟使我們摆脱了波希米亚和莫拉维亚及其捷克人，这些捷克人屬於“斯拉夫各民族”，自然“必須圍繞在俄国的四周”。

但是，我們来看一看：我們这位帝国的福格特把波希米亚和莫拉维亚划入俄国以后，是怎样来保卫德国东部边界的。波希米亚成为俄国的波希米亚！但是，波希米亚位于德国中間，西里西亚使它同俄屬波兰隔开，被福格特俄罗斯化了的莫拉维亚使它同被福格特俄罗斯化了的加里西亚和匈牙利隔开。这样一来，俄国就得到了长 50 德里、寬 25—35 德里这样一部分德意志联邦的領土。它把它的西部边界向西推进了整整 65 德里。然而，由于从艾盖尔河到亚尔薩斯的劳特尔堡按直綫仅仅是 45 德里，因此，法国方面

的楔子，尤其是俄国方面的楔子，就会把德国北部和南部完全切断，形成德国的被分割状态。从維也納直达柏林，甚至从慕尼黑直达柏林，这时都得經過俄国。德勒斯頓、紐倫堡、累根斯堡和林茨就会成为我們同俄国毗連的边防城市；我国在南部的地位，对斯拉夫人來說，至少会变得像在查理大帝以前那样（但在西部，福格特却不允許我們返回到路易十五时代），我們也就得勾銷我国一千年的历史。

同波兰所起的那种作用相比，波希米亚能够起更好的作用。只要把布拉格变成一个設防障地，并在莫尔多瓦河和艾盖尔河流入易北河的汇流处建筑一些輔助堡垒，在波希米亚的俄軍就能够泰然等待一开始就分散地从巴伐利亚、奥地利和勃兰登堡开来的德軍，使其中較强的受到堡垒的迎击，而把較弱的各个击破。

我們来看一看中欧的語言分布图，譬如，就拿斯拉夫的一个权威性資料——沙法里克的 *slovanský zeměvid* ⁴⁹³ 來說吧。在这一分布图上，斯拉夫語言的界綫从施托尔佩附近的波美拉尼亚沿海地区起，經過雅斯特罗夫，到达涅茨河上的荷德捷日以南，然后向西通往梅澤里茨。但是从这里起，它向东南急轉直下。在这里，德国的西里西亚大楔子深深地插在波兰和波希米亚之間。在莫拉維亚和波希米亚，斯拉夫語言又远远地向西移；的确，它同周圍的德語区犬牙交錯，这里也有一些德国城市和一些零星分散的德語区，而且在北方，整个維斯拉河下游和东西普魯士的得天独厚地区都是讲德語的，它們往前移动是不利于波兰的。在波兰語的最西点和捷克語的最北点之間，在德語区中間，有一个孤零零的温德—魯日伊策語区，然而，这个地区几乎割断了西里西亚。

对拥有波希米亚的俄国泛斯拉夫主义者福格特來說，无疑是

知道斯拉夫国家的自然疆界在哪里的。这条疆界从梅澤里茨直通利貝罗澤和呂本，然后到达易北河同波希米亚边境山脉的交叉点以南，再往前通至波希米亚和莫拉維亚的西南部边境。这条綫以东全是斯拉夫地区；混杂在斯拉夫地区里的几块德国的和其他外族的土地，不可能較久地阻碍偉大的斯拉夫整体的发展；况且，它們也沒有权利繼續留在原地方。既然接受了这种“泛斯拉夫主义的現状”，那末不言而喻，在南部也必須对边界进行类似的修改。在南部，也有一个不受欢迎的德国楔子插在北部和南部的斯拉夫人中間，占据了多瑙河谷和施梯里亚阿尔卑斯山脉。福格特不会容忍这一个楔子，而且要使奥地利、薩尔茨堡、施梯里亚和克倫地亚的德国部分完全并入俄国。用“民族原則”的久經考驗的方法来改組斯拉夫—俄罗斯帝国，使一些馬扎尔人和羅馬尼亚人以及各种土耳其人落到俄国手里(要知道，“好心的沙皇”在征服切尔克西亚和消灭克里木的韃靼人时，也是为了給“民族原則”增光)，作为对他們插入北部斯拉夫人和南部斯拉夫人之間的一种懲罰，福格特把这一点解釋成对奥地利的有意刺激。

在这种情况下，我們德国人失去的只不过是东西普魯士、西里西亚、勃兰登堡和薩克森的一部分、整个波希米亚、莫拉維亚以及奥地利(不包括提罗耳，因为它的一部分按“民族原則”应划給意大利)，——失去的只不过是这一切加上我国的民族生存！

但是，我們不妨暫且談一談：如果加里西亚、波希米亚和莫拉維亚变成俄国的，那将会产生什么結果！

在这种現状下，德意志的奥地利，德意志的西南部和德意志的北部便永远也不可能采取一致行动，除非——这会是必然的，——在俄国的领导下。

福格特强迫我們德国人唱他的巴黎人在1815年唱过的歌：

«Vive Alexandre,
Vive le roi des rois,
Sans rien prétendre,
Il nous donne des lois».①

这样，福格特在1859年曾想通过“北方的白天使”和“南方的白天使”之間的同盟来实现的福格特式的“民族原則”，按他本人的意見，首先应当表現在波兰民族在俄国内部的溶化，馬扎尔民族在俄国内部的灭亡和德国民族在俄国内部的消失。

这次我没有提到他的原著即丹屠出版的小册子，因为我掌握了一段頗有說服力的妙不可言的引文，证明他在这里一半隱約其詞一半道破了的、从土伊勒里宫发出的一个口号正在全面地实现。在1859年5月2—16日的一期“思想和行动”⁴⁹⁴上，馬志尼預言了后来发生的事变，他并且指出：亚历山大二世和路易·波拿巴之間締結的同盟的第一条是：«abbandono assoluto della Polonia»（法国完全拒絕支持波兰，福格特則譯为：“最終填平橫在波兰和俄国之間的鴻沟”）。

«Che la guerra si prolunghi e assuma...proporzioni europee, l'insurrezione delle provincie oggi turche preparata di lunga mano e quelle del-l'Ungheria, daranno campo all'Alleanza di rivelarsi... Principi russi governerebbo le provincie che surge-rebbo sulle rovine dell' Impero Turco e del-l'Austria... Constan-

① “万岁！亚历山大，
万岁！王中之王，
你賜給我們法律，
却不要一点报酬。”——編者注

tino di Russia è già proposto ai malcontenti ungheresi》。(見 1859 年 5 月 2—16 日“思想和行动”)(“如果战争继续下去而且发展成欧洲规模的战争,那末,早已准备就绪的现今土耳其各省的起义和匈牙利的起义,就会使同盟有可能采取明显的形式…… 俄国的公爵们将治理在土耳其帝国和奥地利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各个国家…… 俄国大公康斯坦丁已被指定给心怀不满的匈牙利人了。”)

然而,福格特的亲俄是奉命的。在这点上,他仅仅是遵照土伊勒里宫发出的口号办事,仅仅是竭力为德国设下圈套,这些圈套是路易·波拿巴和亚历山大二世商妥为应付反奥地利战争万一发生某种转变时用的;事实上他只是在奴颜婢膝地重复他的巴黎原著中的泛斯拉夫主义词句。实际上,他所干的勾当就是唱“路易之歌”⁴⁹⁵。

«Einan kùning wèiz ih, hêizit hêr Hlûdowîg
ther gêrno Gôde <即各民族> dionôt».

〔“我知道有一个名叫路易的国王;
他非常热忱地为上帝<即各民族>效劳。”〕

我们在前面听过了福格特对撒丁的颂扬,说它“甚至赢得了俄国的尊重”。现在有这样一对比:

他说:“在<普鲁士的>声明里,没有谈到奥地利…… 如果北美和交趾支那之间发生战争,那末,声明也可以这样写的。可是声明里却特别强调了普鲁士的德意志使命,它的德意志职责,旧普鲁士。因此,法国<而按他在第 27 页上所谈的法国是:“归根到底,法国现在不过是它的统治者的形体”>正在通过‘通报’和其他报刊滥加赞扬。——奥地利发狂了。”(“研究”第 18 页)

从路易·波拿巴通过“通报”和十二月政变的其他报刊对普鲁士滥加赞扬来看,普鲁士对自己的“德意志使命”的理解是正确的。真是恬不知耻! 我们不禁想起了:福格特由于对“北方的白天使”

彬彬有礼，說只有奧地利破壞 1815 年條約而且只有奧地利侵占克拉科夫。他現在又同樣友好地為“南方的白天使”效勞。

“這個教會國家，卡芬雅克，這位保守的共和黨代表人物和加格恩的在軍事上的同類貨色〈也是一個對比〉，對這個國家的共和國〈教會國家的共和國！〉犯下了卑鄙的殺人罪〈對一個國家的共和國犯下了殺人罪！〉，然而，殺人罪並未能幫助他獲得總統的職位。”（同上，第 69 頁）

總之，是卡芬雅克，而不是路易·波拿巴對羅馬共和國犯下了“卑鄙的殺人罪”！卡芬雅克的確曾在 1848 年 11 月派遣一個分艦隊前往契維塔未克基亞充當教皇的私人警衛。不過，只是在第二年，只是在卡芬雅克競選總統失敗後過了幾個月，只是在 1849 年 2 月 9 日，教皇的世俗權力才被廢除，羅馬才成立共和國，可見，卡芬雅克不可能消滅在他執政時期還不存在的共和國。由於路易·波拿巴多次莊嚴地保證，說他的目的只是在於阻撓奧地利所計劃的對羅馬國家的入侵，才從國民議會騙到了他遠征羅馬所必需的費用，然後在 1849 年 4 月 22 日派烏迪諾將軍率領 14 000 人前往契維塔未克基亞。大家知道，賴德律-洛蘭和山岳黨決定要為“對羅馬共和國的卑鄙的殺人罪”（因為這同時是對“法國憲法的卑鄙的破壞”和“對國民議會決議的卑鄙的破壞”）進行報復，決定要向所有這一切卑鄙行徑的禍首——路易·波拿巴進行報復，即對他進行審訊，成了 1849 年 6 月 13 日巴黎大災難⁴⁹⁶的開端。我們看到，這位政變的可恥的造謠者卡爾·福格特，為了使各民族、特別是意大利民族的解放者的“路易”先生的使命不致遭到任何懷疑，竟多麼“卑鄙地”、多麼無恥地在偽造歷史。

福格特記得“新萊茵報”曾經寫過：在法國，小農階級同流氓無產階級一起構成了 Bas Empire〔衰落時期的帝國〕的唯一基礎。

他把这句话說成了这样：

“目前的帝国在有教养的人中間沒有拥护者，在法国资产阶级中間沒有拥护者——支持它的只有两类群众：军队和既不会讀也不会写的农村无产阶级。但是这二者构成居民的十分之九。这是能够用来粉碎反抗的組織强大的工具，是一群除了选票就一无所有的抵押債務的奴隶。”(第25頁)

法国的非城市居民，军队也包括在內，不到全体居民的三分之二。福格特把少于三分之二变成了十分之九。他把法国的全部非城市居民，其中約有五分之一是富裕的土地占有者，而另外还有五分之一是无地的和穷苦的人，统统变成了小农，“抵押債務的奴隶”。最后，他根本取消了法国（除了城市以外）的会讀会写的本領。从前他伪造历史，現在他又伪造統計数字，来为他的英雄扩大宝座。現在，这位英雄正在自己把自己摆上这一宝座。

“因此，事实上，归根到底，法国現在不过是它的統治者的形体，馬松（也是一个权威）曾这样談論过这位統治者：他有国家活动家和君主的优良品质，有不可动搖的意志，他严守分寸，有坚定不移的决心，有一颗剛强的心，有高超而富有独创性的智慧，而且特別铁面无情。”(同上，第27頁)

«Wie saeleclîche stât im an
allez daz, daz êr begât!
wie gâr sîn lîp ze wunsche stât!
wie gênt îm so gelîche inein
die fînen keiserlîchen bein».

(*Tristan*)^①

① “在他的一举一动中
能否挑出什么毛病？
他的优美而纖細的身段
加上匀称而至尊的双腿
誰能用言語来描繪？”

(斯特拉斯堡的哥特弗利德“特里斯坦和伊卓尔达”)。——編者注

福格特从他的馬松手中夺过手提香炉，以便亲自把它搖来晃去。他在馬松式的美德目录里加上：“冷靜持重”、“施展計謀的巨大才干”、“蛇一般聰明”、“堅忍”（第 28 頁），随后，像前室的塔西佗那样嘟囔什么“这个統治权的起源是恐怖”，这无论如何是荒謬的。首先，他必須把他的英雄的小丑形象，戏剧性地装扮成偉大人物，因此，“小拿破侖”⁴⁹⁷ 就变成这位“左右未来的人物”（同上，第 36 頁）。

福格特喊道：“如果目前的情况也使他的〈左右未来的人物的〉統治发生变化〈說得多么謙虛：变化！〉，那末我們方面就一定热烈地祝賀成功，虽然現今我們面前并没有出現这样的远景。”（同上，第 29 頁）

这位滿心祝賀成功的頗有同情心的小子装得怎样一本正經，可以从下面这段話看出来：

“但是，在持續和平的局面下，国内状况将因此日益变得更加動蕩不宁，因为法国軍隊同一些有教养的人的党派所保持的关系，例如，就在德意志各邦、在普魯士和奧地利所存在的关系要密切得多；因为正是这些党派能在軍官中間得到响应，所以，有朝一日，皇帝所拥有的政权的唯一有积极作用的支柱可能从他的手中滑掉。”（同上，第 27 頁）

这样看来，在“持續和平”的局面下，“国内状况”已“日益”变得“更加動蕩不宁”。因此，福格特应当竭力使路易·波拿巴易于破坏和平。軍隊，他的“政权的唯一有积极作用的支柱”，有从他的手中“滑掉”的危險。所以，福格特证明：欧洲的任务在于借助意大利的“局部”战争，重新使法国“軍隊”拴在路易·波拿巴的手上。的确，1858 年底，巴登格，这位被巴黎人无礼地称之为“伯父的侄子”的人所扮演的角色，看来要以可怕的結局告終。1857—1858

年的普遍商业危机，使法国工业瘫痪了。^① 政府为了制止危机尖锐化而采用的手段，使这场灾难变成了慢性的，因而法国的商业停滞状态一直拖延到意大利战争爆发。另一方面，1857—1859年粮价暴跌，从而各种 *congrès agricoles* [农户代表大会] 都开得怨气冲天，说由于粮价低落和高额税收，法国农业将无法维持下去。路易·波拿巴发布命令，责成全法国的面包师设置粮仓，企图用这种办法来人为地提高粮价，他的这种可笑企图只不过暴露了他的政府束手无策和仓皇失措。

政变制度的对外政策，只不过是要想扮演拿破仑的企图的一系列失败——只不过是总以正式的退却告终的一些袭击。路易·波拿巴对美利坚合众国使用的阴谋，他想恢复奴隶贩卖所采取的手段⁴⁹⁸，他对英国的装模作样的威胁，就是如此。路易·波拿巴当时对瑞士、撒丁、葡萄牙和比利时——尽管在比利时他甚至无法阻挠安特卫普的设防，——擅自采取的无耻举动，更明显地证明了他在大国面前的惨败。在英国议会里，“小拿破仑”已成了惯用语，而“泰晤士报”在1858年的总结文章中，则带着嘲笑的口吻把“铁人”改称为“树脂人”。其实，奥尔西尼的炸弹已像闪电似的照明了法国的国内状况。事实表明，路易·波拿巴的制度仍然像政变初期一样不巩固。《*Lois de sûreté publique*》⁴⁹⁹ 暴露了他的完全陷于孤立的状态。他不得不把政权让他自己的将军们。法国按照西班牙的方式分成了五个镇守司令区，这是一件破天荒的事情。成

① 的确，正是工业繁荣使路易·波拿巴制度能够维持这么久。由于澳大利亚和加利福尼亚的发现及其对世界市场的影响，使法国的出口额增加了一倍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一般说来，二月革命归根到底因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而遭到了失败。

立摄政政府以后，佩利西埃实际上被认为是法国的最高掌权者。⁵⁰⁰但是恢复 terreur〔恐怖手段〕已不再使人感到可怕了。奥斯特利茨会战的荷兰侄子不是显得令人害怕，而是显得丑陋可笑了。⁵⁰¹蒙塔郎贝尔能在巴黎扮演汉普顿，贝利耶和杜弗尔能在他们的法庭辩护词中道出资产阶级的希望，而蒲鲁东则能在布鲁塞尔宣扬附有 acte additionel〔补充条例〕的路易-菲利浦主义⁵⁰²，可是路易·波拿巴本人却向全欧洲承认了玛丽安娜的威力日益壮大。在夏龙起义⁵⁰³期间，军官们听到巴黎宣布成立共和国的消息后，不是去猛攻起义者，而是首先热心地向省政府打听巴黎成立共和国是不是真的，——这有力地证明了，甚至军队也把复辟帝国看做是一出已演到最后一场的哑剧。巴黎傲慢无礼的军官们的可耻决斗是同使十二月十日帮的头目们声誉扫地的可耻交易同时并存的！英国的帕麦斯顿内阁由于同路易·波拿巴的结盟而倒台了！⁵⁰⁴最后是，国库的状况，只有采取非常手段才能把它充实起来！在1858年底，Bas Empire〔衰落时期的帝国〕的状况就是如此。要么虚有其表的假帝国政权必然垮台，要么必须使由1815年条约所规定的疆界以内的拿破仑帝国的可笑丑剧收场。但是，为此就要求一种局部战争。当时只要出现同欧洲开战的前景，就足以使法国发生爆炸。每一个小孩子都懂得霍斯曼在英国议会里所说的话：

“我们知道，当我们的动摇态度促使法国皇帝的对外政策得到成功时，法国将会支持它的皇帝，但是我们理由认为，一旦我们对他进行坚决的反抗，法国就会把他抛弃。”

一切都由能不能使战争局部化来决定，也就是说，进行战争要得到欧洲最高当局首肯。最初，法国本身需要用一系列虚假的和平谈判和谈判的再三失败来逐步准备战争。但是，路易·波拿巴

在这里也陷入了窘境。英国駐巴黎大使考萊勋爵带着路易·波拿巴提出的并得到英国(得比)內閣同意的建議前往維也納。在那里(見上引的藍皮書),这些建議在英国的压力下出乎意料地被接受了。考萊还没有来得及返回倫敦报告爭端已得到“和平解决”,突然傳來一个消息,說路易·波拿巴已放棄了他自己的建議,而同意俄国提出的建議,即召开會議来商定反对奥地利的措施。只是由于俄国的干預,战争才变成了可能。如果俄国不再需要路易·波拿巴执行它的計劃,——或者是为了同法国共同实现这些計劃,或者是为了通过法国的打击使奥地利和普魯士变成它的优柔寡断的工具,——那末,路易·波拿巴当时就已被推翻了。但是,尽管得到了俄国的暗中支持,尽管得到了在貢比臬贊同普倫貝爾密謀⁵⁰⁵的帕麦斯頓的允許,可是一切仍然取决于德国的行动,因为:一方面,在英国还是托利党内閣当政,另一方面,一旦发生欧洲战争,就可能使当时法国暗中对波拿巴制度所抱的不滿情緒突然迸发。

福格特自己失口說,他唱“路易之歌”,并不是由于同情意大利,也不是由于害怕怯懦而保守的、既束手无策又粗野无礼的奥地利专制制度。相反地,他认为:如果奥地利——順便說一說,它是被迫开始战争行动的,——甚至一开始就在意大利取得了胜利,那末,

“在法国无论如何会爆发革命,帝国会崩潰,一个嶄新的未来会到来”(同上,第131頁)。他认为,“归根到底,奥地利軍队在法国人民的解放力量面前将是支持不住的”(同上);还认为,“所向无敌的奥地利武装力量,在法国、意大利和匈牙利的革命中,会给自己树立敌人,这种敌人必定会把奥地利軍队消灭”。

但是,对福格特來說,重要的并不是使意大利摆脱奥地利的桎

楷，而是使法国俯首听命于路易·波拿巴。

难道还需要证据来证明福格特不过是土伊勒里宫里能操腹語的小丑手中的无数外語傳声筒之一嗎？

不應該忘記，正当路易·波拿巴最初发现自己的解放各民族、特别是意大利民族的使命时，法国正在演出一幕史无前例的戏剧。整个欧洲都对法国拒絕接受 «idées napoléoniennes»⁵⁰⁶ 所表現的那种坚忍不拔的頑强精神而感到驚訝。甚至立法团的 «chiens savants» [“有学問的狗”] 用以欢迎莫尔尼的和平保证所表現的热情；“通报”时而斥責国民对物质利益孜孜以求、时而斥責国民缺乏爱国的毅力、时而斥責国民怀疑巴登格这个統帅的政治智慧和天才等等所用的不滿腔調；告法国各商会的官方安撫 messages [文告]；皇帝的 «étudier une question n'est pas la créer» [“研究問題不等于提出問題”] 的保证，——所有这些大家都还記憶犹新。对这一出異乎寻常的戏剧感到驚訝的英国报刊，滿紙都是好心的胡言乱語，說法国人的性格已发生和平主义的轉变；交易所在議論“会不会打仗”的問題，把它看做是希望打仗的路易·波拿巴同不希望打仗的国民之間的一場“决斗”；人們在打賭誰将获胜，是国民还是“他伯父的侄儿”。我只想从倫敦的“經濟学家”⁵⁰⁷ 杂志引证几处来闡明一下当时的情况，这家杂志是西蒂区的机关报，是意大利战争的預言者，是威尔逊（不久前去世的印度財政大臣和帕麦斯頓的工具）的产儿，它享有很大威望。

“被它所引起的巨大激动弄得惶惶不安的法国政府，現在采取了安撫手段。”（1859年1月15日“經濟学家”）

1859年1月22日的一期“經濟学家”，在一篇題为“法国皇帝的实际权限”的文章里写道：

“皇帝关于意大利战争的计划不论能否实现，但至少有一点是不容争辩的：他的计划遭到了强烈的、看来是出乎意料的反抗；这种反抗表现于法国輿論对计划表示冷漠的态度，表现于对皇帝的计划根本不予同情……他提出要战争，而法国人民却只表现出惊慌和不满，国家纸币贬值，对税吏的恐惧，彻底扑灭了尚武精神和政治热情，国家的商业部门陷入混乱状态，农业地区由于害怕又要征兵和增加捐税而流露出一不满和消极情绪；把皇帝的制度看成是一种反对无政府状态的 *pis aller*（下策）而给以最有力支持的那个政界，也由于同样的原因反对战争；总之，很明显，路易·波拿巴发现各阶级居民都对打仗、甚至对为意大利打仗抱着广泛而深刻的反对态度，这种态度是他不会料想到的。”^①

为了同法国人民的这种情绪相对立，丹屠出版的那一部分原著小册子问世了，这些小册子“以人民的名义”向“皇帝”提出下列要求：“帮助法国最终庄严地从阿尔卑斯山扩展到莱茵河”，并且不再阻挠“尚武精神”和“人民要求解放各民族的意愿”。福格特竟同十二月的娼妇们一鼻孔出气。正当法国坚定地要求和平的意愿引起欧洲惊奇的时候，福格特却发现“现在，这个好动的人民（法国人）看来充满了尚武情绪”（同上，第29、30页），发现路易先生不过是在追随“盛行的时代思潮”，而这种思潮恰好表现在要求“各民族独立”这样一种意愿上（同上，第31页）。当然，他不相信他所写的任何一个字。他在号召民主派同他进行合作来宣传波拿巴主义的

^① 在考萊勋爵离职期间，在巴黎代替他的那位切尔西勋爵写道：《The official disavowal（载于1859年3月5日“通报”）of all warlike intentions on the part of the Emperor, this Imperial message of peace, has been received by all classes of Paris with feelings of what may be called exultation》。（1859年1—5月出版的意大利事件的蓝皮书，№88）。（“皇帝正式放弃一切尚武意图，皇帝的这个和平通告，已为巴黎各阶级异常热烈地接受了。”）

那个“綱領”中，詳盡地說过：意大利战争在法国是不受欢迎的。

“最初，我看不出对莱茵河有什么危险；但危险可能是后来出现的，在那里或者在英国作战也许会使路易·波拿巴变成几乎是众望所归的人物，可是在意大利作战却是不受欢迎的。”（“主要著作”第34页，文件）^①

如果丹屠出版的一部分原著小册子竭力用传统的征服幻影来使法国人民摆脱“和平的昏睡状态”，并竭力使路易·波拿巴的个人愿望借国民的嘴巴说出来，那末，以“通报”为首的另一部分小册子的任务，首先是使德国相信：皇帝厌恶攫取领土，他的理想的使命是要成为解放各民族的救世主。一方面证明他的政策大公无私，另一方面证明他有解放各民族的意愿，这些证据都是很容易背得烂熟的，因为这些证据经常在重复，而且老是在围绕两个基本点转来转去。证明十二月政策大公无私的证据就是克里木战争。证明解放各民族的意愿的证据就是庫扎上校和羅馬尼亚民族。在这里，調子是直接由“通报”定的。見1859年3月15日“通报”論克里木战争。1859年4月10日“通报”是这样論述羅馬尼亚民族的：

“它〈法国〉希望，不論在德国或者在意大利，經条約承认的民族能保存下来，甚至强大起来。——至于多瑙河各公国，那末，他〈皇帝〉會不辞劳苦地帮助这些省份的合法愿望得到胜利，以便确保欧洲的这一部分也有建立在民族利益基础上的秩序。”

^① *Nota bene*〔注意〕：福格特在他的“研究”中，同“通报”和他的丹屠出版的原著小册子一起再三地说：“独特的命运无常使这个人〈路易·波拿巴〉以民族解放者的姿态出现在最前列”（第35页）；“当在民族解放范围内遵循这一政策的时候，必須协助它”，并且“必須等待由这位左右未来的人物来进行这种解放”（第36页）。相反地，福格特在写给民主派先生們的“綱領”中却說：“我們能够而且应当預防来自这种人方面的帮助。”（“主要著作”第34页，文件）

并見 1859 年初丹屠出版的小册子“拿破侖第三和羅馬尼亞問題”⁵⁰⁸。它是这样談論克里木战争的：

“最后，法国为所流的鮮血、为欧洲利益而在东方所耗費的千百万金錢要求过什么补偿呢。”（丹屠出版的“問題的实质” 1859 年巴黎版第 13 頁）

福格特把这个在巴黎一再重复的題目，用德文闡述得非常成功，以致艾·阿布，波拿巴主义的这只噉噉喳喳的喜鵲，竟好像是把福格特的德文譯文倒譯成了法文。見“一八六〇年的普魯士”⁵⁰⁹。在这本书里，我們又碰到了克里木战争和庫扎上校治理下的羅馬尼亞民族。

福格特跟着“通报”和丹屠出版的原著小册子說：“但是有一点，無論如何我們是知道的：法国沒有侵占过〈克里木的〉一寸土地；如果是伯父，在胜利的远征以后就不会满足于在軍事艺术中形成的那种优势的区区成果。”（“研究”第 33 頁）“然而，这就表现出同旧的拿破侖政策不一样的重大区别。”（同上）^①

① 其实，“小拿破侖”纵談解放各民族的空話，也是从真拿破侖那里抄襲来的。例如，1809 年 5 月，拿破侖从雪恩布龙发布了告匈牙利人书，其中就說：“匈牙利人！你們重新获得独立的时刻已經到了…… 我对你們毫无所求。我只希望看見你們成为自由而独立的人民。你們同奧地利的关系是你們的一种災难，等等。” 1797 年 5 月 16 日，波拿巴同威尼斯共和国簽訂了一个条約，它的第一条說：“今后法国同威尼斯共和国应当和睦相处”。三天以后，他在一份秘密紧急报告中向法国督政府公开了他利用这个和約所追求的目的。該紧急报告是这样开头的：“茲送上我同威尼斯共和国所締結的条約，根据这个条約規定，巴拉盖·狄利埃將軍已率領五六千名兵士占領了一个城市。我曾利用这个和約追求各种目的”。他在談到最后一个目的时說：“压制可能在欧洲出現的一切談論，因为現在有人会觉得：我們占領威尼斯是威尼斯人自己热烈要求的一种临时行动。”又过了两天，即 5 月 26 日，波拿巴写信給威尼斯市政委员会說：“在米兰簽訂的条約，暫時可能由市政委员会签字，秘密条款由它的三个委員

好像福格特要向我们证明：“小拿破侖”并不是真拿破侖！福格特可以用同样的权利在 1851 年预言：侄儿——除了斯特拉斯堡冒险、远征布倫和薩托里的腊腸閱兵之外，他根本拿不出什么貨色来同第一次意大利战争和远征埃及相比，——永远不会模仿雾月十八日⁵¹¹，更不会给自己戴上皇冠。然而，在这里却存在着“同旧的拿破侖政策不一样的重大区别”。进行反对欧洲同盟的战争和在欧洲同盟的允许下进行战争，——这是另一个区别。

“光荣的克里木战役”，在这一战役中，法国、英国、土耳其和撒丁联军两年以后“占领了”俄国的半个要塞，但为此却让俄国夺得了土耳其的整个要塞（卡尔斯），并且在巴黎会议上签订和约⁵¹²时不得不谦逊地“请求”敌人“允许”他们能顺利地把自己的军队调回国去，——的确，把这个战役说成是什么战役都可以，只是不能把它说成是“拿破侖式的”。总而言之，它只在巴贊庫爾的小說⁵¹³里

签字。我将始终不渝地竭尽我的全力，向你们证明我是希望巩固你们的自由的，并希望终于看到不幸的意大利，将成为自由的、摆脱一切外国人的羁绊而获得独立的意大利，在世界舞台上得到它应有的地位。”几天以后，他写信给巴拉盖·狄利埃将军说：“接到此信后，即往访威尼斯临时政府，向它说明：根据现在使法兰西共和国同威尼斯共和国联合起来的各项原则，并为了法兰西共和国对威尼斯共和国予以直接保护起见，必须把共和国的舰队提高到令人尊敬的高度。您要利用这一借口占有一切，同时不要忘记，应同威尼斯人和睦相处，并应招募共和国的所有水手为我们服务，但随时随刻都要以威尼斯的名义讲话。简言之，您必须把所有海軍装备和軍舰从威尼斯港调往土倫。根据条约的秘密条款，威尼斯人应向法兰西共和国的土倫舰队提供价值 300 万的装备，但我为了法兰西共和国的利益，意欲占有威尼斯的所有船只和它的全部海軍装备供土倫使用”（见“拿破侖的机密函件”七卷集 1817 年巴黎版⁵¹⁰）。这些命令丝毫不差地被执行了；可是当威尼斯遭受掠夺而失去它的全部陆海軍装备之后，拿破侖竟毫不犹豫地把他新盟国，他曾庄严宣誓要不顾一切危险予以保护的解放了的威尼斯共和国置于奥地利的专制桎梏之下。

才是光荣的。但是克里木战争暴露了许多问题。路易·波拿巴出卖了假盟友（土耳其），以便同假敌人结成同盟。巴黎和约的第一个结果是牺牲了“切尔克西亚民族”，是俄国人完全消灭了克里木的鞑靼人以及使波兰和瑞典的民族希望破灭，这种希望原是寄托在西欧对俄国的十字军征讨上的。而从克里木战争中得出的另一个教训是：路易·波拿巴不敢再进行第二次克里木战争，不敢失掉旧军队和欠下新国债，以换取大家承认法国有足够的财富来 «de payer sa propre gloire» [“为自己的光荣付出代价”]，换取路易-拿破仑的名字在一项欧洲条约里出现，换取“欧洲保守的报刊和王朝的报刊”都照福格特的高度评价（同上，第32页）一致承认“皇帝圣上的勇武、贤明和有节制”，换取当时整个欧洲把真拿破仑才受之无愧的全部 honneurs [荣誉] 都献给他，但只要路易·波拿巴照路易-菲力浦的榜样适当地使自己保留在“实际上明智的疆界之内”，即保留在1815年条约规定的疆界之内，并且一刻也不忘记那根把小丑同他所扮演的英雄分开来的细线。政治上的鬼蜮伎俩、君主和社会状况——这些情况使十二月帮的头目能够起初在法国境内、然后在法国境外扮演拿破仑的角色，——这一切的确都是他的时代所特有的，但对伟大的法国革命的编年史来说却是不适宜的。

“但至少事实仍然是这样：目前法国在东方的政策是符合一个民族（罗马尼亚民族）力求团结的意愿的。”（“研究”第34、35页）

上面已经提到，库扎所保持的位置，或者是留给一个俄国总督，或者是留给一个俄国诸侯的。在“一八六〇年的欧洲”地图上，作为诸侯出现的是梅克伦堡大公。当然，俄国把罗马尼亚的这种解放的全部 honneurs [荣誉] 都归于路易·波拿巴，而它自己则取

得这一解放的一切实际利益。阻碍路易·波拿巴进一步实现他的善良意图的是奥地利。因此，意大利战争应当把奥地利从一种障碍物变为一种工具。

早在 1858 年，土伊勒里宫里能操腹語者就已利用他的无数傳声筒，圍繞“羅馬尼亚民族”这个題目吹奏了各种变調曲。因此，福格特的权威人士科苏特先生于 1858 年 11 月 20 日在格拉斯哥的讲演中就能給以回答：

“瓦拉几亚和莫尔达維亚正在获得一部在秘密外交洞穴里制訂出来的宪法……实际上，它恰好是賞賜給俄国的一部宪章，让它在多瑙河各公国作威作福。”（«It is in reality no more nor less than a charter granted to Russia for the purpose of disposing of the Principalities. »）

因此，路易·波拿巴在这些公国里濫用“民族原則”，是为了掩盖他把多瑙河各公国轉送給俄国，正如奥地利政府在 1848—1849 年濫用“民族原則”，是为了借助塞爾維亞人、斯洛文尼亞人、霍尔瓦提人和瓦拉几亞人等等来絞杀馬扎尔人和德国人的革命一样。

羅馬尼亚人民，——而为他们操心的既有俄国駐布加勒斯特的領事，又有利欲熏心的莫尔达維亞—瓦拉几亞的貴族流氓；其中多数流氓甚至不是羅馬尼亚人，而是一群从外国跑来的形形色色的亡命之徒，仿佛是一个东方的十二月帮，——羅馬尼亚人民一如既往地在极其丑恶的徭役制的桎梏下受苦受难，而这种徭役制只有俄国人借助于“組織規程”才能組織起来的，只有东方的 demi-monde [半上流社会] 才会予以支持的。

福格特为了用自己的一套詞藻去美化从丹屠出版的原著中借用来的智慧，他这样說：

“南方的一个皮蒙特已够使奥地利操心的了，它不需要东方再来一个。”
(同上，第 64 頁)

皮蒙特侵略意大利的土地。因此，多瑙河各公国——土耳其的最不好战的地区——就应当侵占羅馬尼亚土地，即从俄国手中夺取貝薩拉比亚、从奥地利手中夺取特兰西瓦尼亚、泰梅希瓦拉的巴納特和布柯維納嗎？福格特不仅忘記了“好心的沙皇”。他还忘記了，匈牙利在 1848—1849 年間看来絲毫无意于让别人从自己手中夺走这些在一定程度上是羅馬尼亚的土地，拔出劍来回答他們的“痛苦的哀号”；他还忘記了，相反地，正是奥地利发动这个“民族原則的宣傳”去反对匈牙利的。

但是，当福格特一半是根据他从浏览过的轰动一时的一本小册子中得到的印象，十分冷靜地把“各公国的可悲状况……”說成由“希腊人和法納尔人的腐烂毒气”（同上，第 63 頁）造成的时候，福格特的“研究”的淵博历史知識，便又光彩夺目地显露出来了。

他甚至沒有想到，法納尔人（由君士坦丁堡的一个市区得名），就是从十八世紀初起，在俄国人保护下在多瑙河各公国作威作福的希腊人。有一部分就是目前又在俄国人的支配下圍繞“羅馬尼亚民族”这个題目吹得天花乱墜的君士坦丁堡的卖檸檬水小販的追随者。

虽然北方的白天使正从东方推进并为了斯拉夫种族的光荣在消灭各民族，南方的白天使，作为民族原則的旗手，正从相反的方向发动进攻，但仍然

“必須等待由这位左右未来的人物来解放各民族”（“研究”第 36 頁）。

在两位天使和“德国統一的两个最大外敌”采取这些联合行动时，即在“极其密切的联盟”（“研究”第2版的跋第154頁）内采取这些行动时，帝国的福格特，这位絕不是“帝国擴張者”[«Mehrer des Reichs»]想使德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福格特說：“連目光最短淺的人現在也应当明白，在普魯士政府同法国皇帝政府之間存在着協議；普魯士不会为了捍卫奥地利的非德意志省区（当然包括波希米亚和莫拉維亚）而拔劍張弩；它将会同意为捍卫联邦疆土（“非德意志”省区除外）所采取的各种必要措施，但同时，它将使联邦或联邦的某些成員不得以任何方式参与奥地利的一边，以便以后，即未来的和平談判中取得北德平原作为对它所作的这番努力的一种酬劳。”（“研究”第1版第18、19頁）

由于福格特在反对奥地利的战争真正开始以前，就濫肆宣揚土伊勒里宮告訴他的秘密，即普魯士正在采取同“德国的外敌”“秘密一致”的行动，并将为此取得“北德平原”作为“酬劳”，所以，他当然就为普魯士达到它的假目的大大地效劳一番。他使德意志其他各邦政府，無論对普魯士在战争初期的中立意图或者对它在战争进一步发展过程中的軍事准备和对最高指揮权的要求，都产生了怀疑。

福格特說：“德国在当前危机中不論選擇什么道路，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把德国看成是一个整体，它应当毅然决然地走一条确定的道路，然而現在有一个倒霉的联邦議會，等等。”（同上，第96頁）

散布普魯士同“外敌”携手并进，散布这种办法将导致北部平原的被吞沒等等观点，显然是要恢复联邦議会所缺少的統一。特別要使薩克森注意：普魯士已經一度“使它失去了它的某些最好的省份”（同上，第93頁）。“购买亞德灣”（同上，第15頁）一事正在

被揭露中。

“当霍尔施坦要成为普鲁士〈在土耳其战争中〉合作的代价时，声名狼籍的盗窃紧急报告事件突然使谈判发生了根本转变。”（同上，第 15 页）“梅克伦堡、汉诺威、奥登堡、霍尔施坦以及同它们毗邻的……其他德意志兄弟之邦都成了钓饵”，——而且“一有便利机会”——“普鲁士就贪婪地向这种钓饵猛扑过去”（同上，第 14、15 页）。

福格特透露，路易·波拿巴这一次用这些钓饵使普鲁士上了钩。一方面，普鲁士由于同路易·波拿巴达成了秘密“一致”，“用牺牲它的德意志弟兄的利益将会取得”而且必然“取得北海和波罗的海沿岸”（同上，第 14 页）。另一方面，普鲁士

“只有当由厄尔士山脉和菲希特尔山脉构成的分水岭将沿着白美因河延伸，并进而顺美因河流域一直伸展到美因兹时，才会取得自然疆界”（同上，第 93 页）。

德国中心的自然疆界！而且还是以一条河作为分水岭构成的！自然地理领域中的这类发现——露在外面的渠道也应算做这类发现（见“主要著作”），——使得“圆满的人物”同亚·冯·洪堡齐名。福格特在这样地向德意志联邦宣扬要信任普鲁士的领导权的同时，由于不满足于“普鲁士和奥地利因德意志等等的领土而引起的旧竞争”，又发现了它们之间的一种竞争，这种竞争“由于欧洲以外的领土而经常发生”（同上，第 20 页）。这块欧洲以外的领土显然是在月球上。

实际上，福格特不过是把法国政府于 1858 年刊印的“一八六〇年的欧洲”地图变成语言而已。在这幅地图上，汉诺威、梅克伦堡、不伦瑞克、霍尔施坦、黑森选帝侯国以及各式各样的瓦尔德克、安哈尔特、利珀河等等都并入了普鲁士，而 «l'Empereur des

Français conserve ses (!) limites actuelles»——法国人的皇帝却保持着自己的(!)旧疆界。“普魯士到美因河”同时是俄国外交活动的口号(参看上面已提到的1837年的报告书)。由于自然疆界、傳統、宗教信仰、方言和民族差别,就会有一个奥地利的南德意志同一个普魯士的北德意志相对立;德国的**分裂为二**就会由目前存在于德国内部的矛盾的簡化而完成,从而也就会宣布持續不断的三十年战争⁵¹⁴。

总之,按“研究”的第一版来看,普魯士原应得到这种“酬劳”,以报答它在战争时期使德意志联邦的劍保持在劍鞘內所作的一番“努力”。在福格特的“研究”和法国的“一八六〇年的欧洲”地图上,根本不是路易·波拿巴,而是普魯士要求通过法国对奥地利的战争来扩大自己的領土和自然疆界。

然而,只是在奥法战争时期出版的“研究”第二版的跋中,福格特才揭示出普魯士的真正使命。普魯士应当发动“内战”(見第2版第152頁)来建立“統一的中央政权”(同上,第153頁),来使德国加入普魯士君主国。当俄国将从东面迫近,而奥地利将被路易·波拿巴拴在意大利的时候,普魯士則应当在德国发动一場王朝“内战”。福格特向摄政王^①保证說:

“目前”在意大利“进行的鏖战,至少要占去1859年这一年”,“然而德国的統一,如果进行得迅速而坚决的話,只要几个星期就够了,但意大利战役却需要几个月”(同上,第155頁)。

德国的内战只需要几个星期!奥地利軍队就不用說了,因为不管意大利战争是否繼續下去,他們都是会立即行动起来反对普

^① 威廉。——編者注

魯士的，除了奧地利軍隊以外，就照福格特本人所說，普魯士也會遇到“完全處於奧地利影響之下的……巴伐利亞”（“研究”第1版第90頁）的抵抗，會遇到首先受到威脅、已沒有任何理由強迫自己“同情奧地利”（同上，第93頁）的薩克森的抵抗，會遇到“維爾騰堡、黑森—達姆斯塔德和漢諾威”（同上，第94頁）的抵抗，簡言之，會遇到“十分之九”（同上，第16頁）的“德意志邦政府”的抵抗。而且，如福格特進一步證明的，這些邦政府在這樣的王朝“內戰”中當然不會處於無援的境地，何況普魯士是在德國受到“它的兩個最大外敵”威脅的時候發動這場內戰的。

福格特說：“宮廷〈巴登的宮廷〉會追隨普魯士，但是人民——對此不能有任何懷疑，——當然不贊同當權王朝的這類同情。如同上士瓦本一樣，布萊斯高仍然由於同情的和宗教的紐帶，也由於對前奧地利（布萊斯高曾經屬於前奧地利）的往事的回憶，而被緊緊地拴在皇帝和帝國的身上，而且在經過如此長期的分離之後，拴得比人們所料想的還要牢固得多。”（同上，第93、94頁）“除了梅克倫堡”，“也許”還除了黑森選帝侯國，“北德意志籠罩着一片不信任溶合論的氣氛，對普魯士的讓步也作得極為勉強。南德意志對普魯士抱着本能的厭惡情緒，甚至仇恨情緒……這種情緒也是皇黨的一切大叫大嚷所無法壓倒或消滅的。這種情緒活生生地蘊藏在人民當中，任何政府，甚至巴登政府，都不能夠長期地與之抗衡。這樣一來，不管在哪裡，無論在德國人民那裡，還是在德意志聯邦各邦政府那裡，普魯士都得不到真正的同情”（同上，第21頁）。

福格特就是這麼說的。按照同一位福格特的說法，正是因為這樣，由普魯士同“德國的兩個最大外敵”“秘密一致”地發動的王朝“內戰”，卻只需要“幾個星期”。但這還不是全部。

“舊普魯士同政府并肩行動，而萊茵區和威斯特伐利亞則同天主教奧地利并肩行動。如果那裡的人民運動不可能迫使政府轉到奧地利一邊，那末，直接的後果將是君主國的兩部分之間的鴻溝進一步加深。”（同上，第20頁）

因此，如果按照福格特的意見，即使普魯士對奧地利僅僅保持中立也會重新加深萊茵區、威斯特伐里亞同舊普魯士之間的鴻溝，那末，按照同一位福格特的看法，要是普魯士為了把奧地利排除出德國而發動“內戰”，自然就會使萊茵區和威斯特伐里亞完全脫離普魯士。“但是，德國同這些羅馬教會信徒有什麼關係呢？”（同上，第119頁）或者，說實在的，就像他所想的那樣，這些羅馬教會信徒同德國有什麼關係呢？萊茵區、威斯特伐里亞，這都是教皇至上主義的、“羅馬—天主教的”土地，而不是“真正德國的”土地。因此，它們都應當像波希米亞和莫拉維亞一樣被排除出聯邦。福格特向普魯士建議的王朝“內戰”應當加速這一排除過程。的確，法國政府在其1858年出版的“一八六〇年的歐洲”地圖（它已成了福格特的“研究”的指針）上，已把埃及併入奧地利，而把萊茵河各省當做“天主教民族”的土地併入比利時，——這是法國併吞比利時以及萊茵河各省的諷刺公式。福格特比法國政府的地圖更進了一步，并把天主教的威斯特伐里亞也獻上了，這可以解釋為流亡的帝國攝政對待普隆—普隆、威斯特伐里亞前任國王^①之子所採取的“科學態度”。

總起來說：一方面，路易·波拿巴將允許俄國經過波茲南染指波希米亞，經過匈牙利染指土耳其，而另一方面，他自己將使用武力在法國邊境上建立一個獨立統一的意大利，並且全都——pour le roi de Prusse^②，全都只是為了使普魯士有可能通過內戰使德國屈從於自己，而“保證萊茵河各省永遠不受”法國“侵犯”（同上，

① 日羅姆·波拿巴。——編者注

② 文字遊戲：《pour le roi de Prusse》是一個成語，直譯是：“為了普魯士國王”，通常則譯成：“白白地”、“為了裝裝門面”。——編者注

第 121 頁)。

“然而有人說，聯邦的領土受到了來自世仇方面的威脅；世仇的真正目的是攫取萊茵。讓人們去保衛萊茵吧，去保衛聯邦領土吧。”(同上，第 105 頁)

讓人們去保衛聯邦領土，同時把波希米亞和莫拉維亞讓給俄國，讓人們去保衛萊茵，同時在德國發動“內戰”，而內戰的目的却是使萊茵區和威斯特伐里亞脫離普魯士。

“然而有人說，路易-拿破侖……想採用某種方法來滿足拿破侖式的侵略渴望！我們不相信這一點，因為我們眼前有克里木戰役的實例！”(同上，第 129 頁)

除了不相信拿破侖式的侵略渴望和相信克里木戰役之外，福格特 in petto [心里] 還有另一個論據。在意大利的奧地利人和法國人，像基爾肯尼的貓一樣，將互相咬架，直到只剩下尾巴為止。

“這將是一場血流成渠的頑強戰爭，其結局甚至可能不分勝負。”(同上，第 127、128 頁)“法國只有竭盡全力才能同皮蒙特一起贏得勝利，但是要从這種精疲力竭狀態中恢復過來，則需要幾十年。”(同上，第 129 頁)

意大利戰爭的這種曠日持久的前景，使他的敵人膽寒。但是福格特用來延長奧地利抵抗在意大利的法軍的方法，用來癱瘓法國侵略力量的方法，的確是相當別致的。一方面，法國人在意大利得到 carte blanche [活動的自由]^①；另一方面，讓“好心的沙皇”在加里西亞、匈牙利、莫拉維亞和波希米亞進行演習，在奧地利內部玩弄革命陰謀和在奧地利邊境舉行軍事示威，來

“把奧地利的大部分兵力困在君主國的那些會受到俄軍攻擊或者便於俄

^① 直譯是：“空白的格紙”。——編者注

国人玩弄阴谋的地区”(同上,第11頁)。

而最后,由于普魯士同时在德国发动王朝“内战”的结果,奥地利将被迫从意大利调出自己的主力,以保卫它的德意志領地。在这种情况下,弗兰茨-約瑟夫和路易·波拿巴自然不会签订康波福米奥和約⁵¹⁵,而……“两个人都将在意大利流血”。

奥地利既不会在东方向“好心的沙皇”作出让步,不会接受早已提出的把塞尔維亚和波斯尼亚作为赔偿,也不会保证法国取得萊茵河各省,不会同俄国和法国結盟进攻普魯士。决不会!它将頑强地“在意大利流血”。但是,不管怎样,福格特的“左右未来的人物”会义憤填膺地拒絕把萊茵当做这类报酬的。福格特知道:

“当前帝国的对外政策只遵循一个原则,即保存自己的原则。”(同上,第31頁)

他知道路易·波拿巴

“只遵循唯一的一个观念,即保留这个〈对法国的〉統治权”(同上,第29頁)。

他知道,“意大利战争不会給他在法国树立威望”,可是取得萊茵河各省既会使他又会使他的王朝赢得“威望”。他說:

“萊茵河各省——实际上是法国沙文主义者的一种心爱的宿願,如果比較深入地研究一下,也許就会发现只有极少数国民不抱这种願望。”(同上,第121頁)

另一方面,“法国有远見的人們”知道,因而福格特式的“像蛇一般聪明的、左右未来的人物”当然也知道:

“只要德国还存在34个不同的邦政府,就有希望实现这件事〈即法国取得萊茵的自然疆界〉。只要一出現利益一致和組織巩固的真正的德国,——萊茵的疆界就可能永远平安无事了。”(同上,第121頁)

正因为如此，曾在維拉弗兰卡向奥地利皇帝提出以倫巴第换取获得莱茵河各省的保证（見金累克于1860年7月12日在下院的声明）的那个路易·波拿巴，会憤懣地拒絕奥地利提出的建議，即把莱茵河各省让給法国，作为对法国支援反普魯士的一种报酬。

同时，丹屠出版的福格特原著，不仅对德意志在普魯士领导下的統一表现了兴高采烈^①，——这些小册子用一种道貌岸然的人物的語調，駁斥了覬覦莱茵河各省的种种暗示：

“莱茵！莱茵是什么？是疆界。但是疆界将很快就成为时代錯誤。”（“对条約等等的忠实”1859年巴黎版第36頁）^②

誰会来談論莱茵的疆界，来談論巴登格将要根据民族原則建

① «La Prusse est l'espoir de l'Allemagne...l'esprit allemand a son centre à Berlin...l'esprit allemand cherche l'unité de son corps, la vérité de la Confédération. C'est par cet entraînement que s'élève la Prusse... D'où vient-il que, lorsque l'Italie reclame l'intégrité, l'unité nationale, ce que l'Allemagne désire, celle-ci favorise l'Autriche, négation vivante de toute nationalité?... C'est que la Prusse n'est pas encore la tête; c'est que la tête est l'Autriche qui, pesant avec ces forces hétérogènes sur l'Allemagne politique, l'entraîne à des contradictions avec l'Allemagne véritable» (p. 34, «*La Foi des Traités etc.*») [“普魯士是德国的希望……德国精神的中心在柏林……德国精神力求同它的軀体統一，力求組成一个眞正的邦联。普魯士在这一目标的鼓舞下，正积极行动起来…… 当意大利要求完整和民族統一时，德国也在追求这种統一，那末德国为什么竟站在反对一切民族的那个化身——奥地利一边呢？…… 因为普魯士还不占居领导地位；因为占居领导地位的是奥地利，奥地利利用各种力量去压制政治上的德国，使它同眞正的德国处于矛盾状态”（“对条約等等的忠实”第34頁）]。

② «Le Rhin!... Qu'est ce que le Rhin? Une frontière. Les frontières seront bientôt des anachronismes» (l. c., p. 36).

立的千年王国的疆界呢？

“难道法国会提出这样的条件，說它为了正义、为了树立适当的威信、为了欧洲均衡的利益而准备作出的牺牲，要获得报酬嗎？难道它要求萊茵河左岸嗎？难道它对薩瓦和尼斯伯国有一点点儿覬覦之心嗎？”（“問題的实质等等” 1859年巴黎版第13頁）^①

法国放棄薩瓦和尼斯，这是它放棄萊茵的明证！福格特并没有把这一点譯成德文。

战争爆发以前，虽然路易·波拿巴未能引誘普魯士同他达成協議，但让德意志联邦至少相信他引誘过普魯士，对他來說是具有决定意义的。福格特在他的第一版“研究”中竭力散布这一点。在战争时期，对路易·波拿巴來說，更重要的是唆使普魯士采取某些步骤，能向奥地利真正地或虛假地证明存在着这种協議。因此，在战时出版的第二版“研究”中，福格特在一篇专门写的跋中呼吁普魯士征服德国并发动王朝“内战”；同时他在該书的正文中证明，这场战争将是“血流成渠的、頑强的，其結局甚至可能不分勝負”，而且它至少将牺牲萊茵区和威斯特伐里亚，可是在同一书的跋中，他却庄严地宣称：战争“只要几个星期”。但实际上，福格特的声音并不是茜林絲的声音。因此，在于騙人勾当中得到帕麦斯顿这位 bottle-holder [拳击中的副手] 支持的路易·波拿巴，不得不在維拉弗兰卡把他本人捏造的普魯士建議給弗兰茨-約瑟夫看；普魯士

① «La France stipule-t-elle des dédommagements pour les sacrifices qu'elle est prête à faire dans un but d'équité, de juste influence, et dans l'intérêt de l'équilibre européen? Demande-t-elle la rive gauche du Rhin? Elève-t-elle même des prétentions sur la Savoie et sur le comté de Nice?» (p. 13, «*La vraie Question* etc.»).

要在軍事上領導德國的謙遜要求必然成為奧地利締結和約^①的借口，路易·波拿巴不得不為這個和約向法國辯解說：意大利戰爭有變為全面戰爭的危險，而這種戰爭會

“導致德國的統一，因而完成從弗朗斯瓦一世時代以來一直受到法國政策阻撓的事業”。^②

法國借助於意大利戰爭取得了薩瓦和尼斯，從而也就取得了一個障地，一旦萊茵區發生戰爭，這個障地所起的作用要比整整一支軍隊還大，在這以後，“德意志在普魯士領導下的統一”和“把萊茵河左岸割讓給法國”就成了十二月二日英雄的或然率理論中的倒數。1860年出版的《*l'Europe pacifiée*》（“平息了的歐洲”？）地圖，對1858年出版的“一八六〇年的歐洲”作了解釋；在前一種地圖上，埃及已經不再歸奧地利管轄，而萊茵河各省和比利時則併入

① 在維拉弗蘭卡和約締結以後不幾天，“布拉格報”上出現了下列官方聲明。“這個抗議〈想要取得在聯邦監督下的聯邦軍隊的最高指揮權的普魯士的抗議〉明顯地證明：普魯士力爭德意志的領導權，從而力爭把奧地利從德意志排擠出去。因為背信棄義的倫巴第同保存我們在德意志的地位比較起來，其價值簡直是微乎其微的，所以我們把它放棄，以便締結和約，鑒於普魯士的態度，該和約對我們已成了一種迫切的需要。”

② 巴黎“加利尼亞尼信使報”，只是在特別時機和受到官方的特別委託才發表社論的，它在1859年7月22日的一號中寫道：《To give another province to the King of Piedmont, it would not only have been necessary to support a war against two-thirds of Europe, but *German unity would have been realised*, and a work thus accomplished, which ever since the time of Francis I. it has been the object of French policy to prevent》。[“為了再給皮蒙特國王一個省，不僅必須經受得住一場反對歐洲三分之二的戰爭，而且會導致德國的統一，因而完成從弗朗斯瓦一世時代以來一直受到法國政策阻撓的事業。”]

法国，以补偿轉让給普魯士的“北部平原”。^①

最后，培尔西尼在亚田正式宣布：甚至“为了保持欧洲的均勢”，德国的任何进一步集中，都必然会引起法国人向萊茵推进。^②但是，不論在意大利战争以前或者以后，还从来没有一个土伊勒里宮里能操腹語的小丑說过比这位流亡的帝国摄政更加无耻的話。

福格特，这位“新瑞士人、伯尔尼州公民和联邦院⁵¹⁷日内瓦議員”(同上，前言)，是用下列開場白(同上，第37—39頁)来开始他

① 普隆-普隆的专刊“民論报”在1860年7月5日的一篇文章中說：“凭借实力提出要求的时代已經过去了。在这方面，皇帝有非常灵活的手腕，对輿論的感觉非常敏銳……但是，难道普魯士发过誓永远不考虑德国的統一。它能否保证永远不貪婪地窺伺汉諾威、薩克森、不倫瑞克、黑森、奧登堡和梅克倫堡？今天，君主們正在互相拥抱，而且当然是真誠的。但誰知道过几年以后人民会向他們要求什么呢？要是德国在輿論的压力下联合起来了，那末，不允許法国牺牲自己的邻邦来扩张自己的領土，是否公正，是否合理呢？……如果德国人认为有必要改变他們的旧政治制度，而用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去代替軟弱无力的联邦，那末，我們就不能不承认法国有权利要求德国賠償和作出保证。”

② 皇帝的柏克斯尼弗曾在丹屠出版的“英国政治”(1860年巴黎版)⁵¹⁶这一小册子中大显身手。按作者的意思，必須劫取几百万德国人和比利时人，以便改善法国的道德面貌，因为法国南方气质需要同北方人的稳重有較多的混合。在論述了法国由于政治上和軍事上的理由而需要自然本身所賜予它的疆界之后，接着說：“这种兼并(对萊茵各省和比利时的兼并)之所以必要，还有另外一个理由。法国喜欢而且要求合理的自由(une sage liberté)，但南方气质却在法国的社会設施中占居重要的地位。这种气质有妙不可言的特性……但是它缺乏坚毅和果断精神。它需要我們北方弟兄們的頑强性、冷靜而不屈不撓的决心。因此，天意給我們注定的疆界，無論對我們的自由或者對我們的独立來說，同样是必要的。”

的“研究”中的瑞士部分的。他在開場白中建議瑞士對由路易·波拿巴代替路易-菲力浦一事應表示歡欣喜悅。不錯，路易·波拿巴曾要求聯邦委員會採取“反報刊的措施”，但是，“在這方面，拿破侖家族的所有代表人物看來都有十分敏感的皮膚”(同上，第36頁)。皮膚病，不過是皮膚病而已，但它老是糾纏這個家族，因而它不僅隨着家族的血統遺傳，而且還——路易·波拿巴 teste [可以作證]，——僅僅隨着家族的名字遺傳。當然，

“日內瓦在迫害一些無辜的人，對這些可憐人的迫害，是聯邦委員會遵照皇帝的敕命進行的，他們的全部過錯就在於他們是意大利人，設立領事館，壓制報刊，採取各種荒謬的警察措施，最後還有關於割讓達普谷地的談判，這些都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使瑞士把皇帝在紐沙特爾衝突中真正幫過忙這一點忘記了，而且就是為現在反對他最激烈的那個政黨幫過忙”(同上，第37、38頁)。

寬宏大量的皇帝，忘恩負義的政黨啊！皇帝插手紐沙特爾衝突⁵¹⁸，決不是破壞1815年條約的先例，也就是使普魯士受屈辱和對瑞士實行保護的先例。路易·波拿巴，作為“新瑞士人、土爾高州公民和奧貝爾施特拉斯炮兵上尉”，是應該為瑞士“真正幫忙”的。福格特在1859年3月指責瑞士反波拿巴政黨忘恩負義，而皇帝的另一個奴僕圖溫奈爾先生則在1860年6月責備整個瑞士忘恩負義。在1860年6月30日“泰晤士報”上我們可以看到：

“幾天以前，凱倫博士同馮·圖溫奈爾先生在巴黎外交部舉行了會晤，會晤時在座的有考萊助爵。圖溫奈爾向可敬的瑞士代表聲明說，聯邦政府的猶豫和抗議是帶侮辱性的，因為它們看來是由於不信任皇帝陛下政府而產生的。如果想到拿破侖皇帝在許多場合，尤其在紐沙特爾衝突中給 (rendere) 聯邦幫過忙 (services)，那末，這種行為就是極大的忘恩負義。不管怎

样，既然瑞士已盲目得不信任自己的恩人，那就要它自己对后果负责。”

须知，福格特早在 1859 年 3 月就企图除掉瑞士盲目的反波拿巴政党的眼翳了。一方面，他指出“皇帝真正帮过忙”。另一方面，“皇帝所引起的不愉快”，比起国王路易-菲力浦所引起的不愉快来，“簡直就黯然失色了”（同上，第 39 頁）。例如，1858 年，联邦委员会“遵照皇帝的救命”驅逐了“一些可怜人，他們的全部过错就在于他們是意大利人”（第 37 頁）；1838 年，联邦委员会不顾路易-菲力浦的威胁，拒絕驅逐路易·波拿巴，後者的全部过错不过是：他在瑞士策划反路易-菲力浦国王的密謀。1846 年，瑞士不顾路易-菲力浦“摩拳擦掌”，决心同宗得崩德作战：对于爱好和平的国王来说，这就意味着，他的威胁是不足惧的；1858 年，当路易·波拿巴侵犯达普谷地⁵¹⁹的时候，瑞士只不过稍稍装腔作势一番。

福格特自己說：“路易-菲力浦在欧洲苟延殘喘；所有的人，甚至連正統主义的小君主都瞧不起他，因为他不敢执行强有力的对外政策。”（同上，第 31 頁）但是，“皇帝对瑞士的政策，毫無疑問，是一个强大邻邦的政策，这个邻邦知道归根到底它能够取得它想要取得的一切”（同上，第 37 頁）。

于是，福格特用格朗基奧的邏輯作出結論說，让瑞士有一个“知道可以对瑞士为所欲为的强大邻邦”，而不是一个“誰都瞧不起的路易-菲力浦”，“从純瑞士立場来看，这种改变只能令人感到莫大的喜悅”（第 39 頁）。

在为必要的情緒預先作了布置的这个開場白之后，接着就是联邦委员会于 1859 年 3 月 14 日的照会的德文譯文。令人奇怪的是，虽然联邦委员会在照会中引证了 1815 年条約⁵²⁰，虽然同一位福格特把这种引证看成是“伪善”的，但他仍然对这个照会推崇备

至。“带着你们的伪善滚开吧！”(同上,第112页)^①

福格特进而研究“对瑞士中立的首先侵犯将来自哪一方面？”(同上,第84页),他提出了不必要的证据,说这一次无须征服皮蒙特的法国军队,既不会通过辛普朗,也不会通过大柏纳德山口。同时他发现一条并不存在的“经蒙塞尼山隘、经费涅斯特雷利到达斯图腊河谷”(同上,第84页)的陆路。这个河谷其实叫做多腊河谷。因此,瑞士并不受到法国方面的威胁。

“不能同样泰然自若地期待奥地利方面会尊重瑞士的中立,而且各种事实甚至表明,只要一有适当机会,奥地利就想破坏这一中立。”(同上,第85页)“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有一个军在布雷根茨和费耳特基尔希集中。”(同上,第86页)

在这里露出了贯穿“研究”的一条红线,它从日内瓦一直引向巴黎。

其实,得比内閣公布的1859年1—5月关于意大利事件的蓝皮书就说,“有一个奥地利军在布雷根茨和费耳特基尔希附近集中”的传闻,是瑞士波拿巴主义的代理人故意散布的,但是它没有任何事实根据(上引蓝皮书的文件第174号,哈里斯上尉1859年3月24日从伯尔尼写给马姆兹伯里勋爵的信)。洪堡-福格特在这种场合也有了发现,仿佛布雷根茨和费耳特基尔希

“紧靠莱茵河谷,通向这个河谷的有三个有车马道的阿尔卑斯山大通道,

① 实际上,保护瑞士中立的,并不是“条约”,而是同瑞士接壤的各个列强的相互箝制的利益。英国驻伯尔尼代办哈里斯上尉同联邦主席弗雷-埃罗泽会谈以后写信给约翰·罗素勋爵说:“瑞士人懂得……最近时期的事件,大大地改变了同瑞士接壤的各个列强的相对比重,因为在纽沙特尔冲突之后,普鲁士抱着漠不关心的态度,奥地利已被削弱了,而法国则比过去无可比拟地强大了。”

即維阿馬拉、什普留根和伯納丁；后者通向德森，前两者通向科摩湖”（同上，第 86 頁）。

实际上，維阿馬拉首先是經過什普留根，其次是經過伯納丁，再其次便哪儿也不經過了。

“圓滿的人物”在說了这一整套普隆涅斯式的胡言乱語（它是要把瑞士的怀疑从西部疆界轉移到东部疆界）之后，终于接近了他的真正任务。

福格特說：“瑞士有充分权利坚决不承担下列义务：除非为捍卫瑞士本国領土必須使用中立地区，不允許軍用列車利用这条铁路綫（从居洛茲到埃克斯和莎姆伯里）。”（同上，第 89 頁）

于是他要联邦委员会相信：“整个瑞士将像一个人一样来拥护委员会在 3 月 14 日的照会中所拟定的这一政策”。

福格特是在 3 月底发表他的“研究”的。但是路易·波拿巴在 4 月 24 日才让軍用列車利用上述铁路綫，至于他宣战，就更要晚一些。由此可見，具体了解波拿巴作战計劃的福格特，确切知道“对瑞士中立的首先侵犯将来自哪一方面”。他得到了一项明确的指示，要說服瑞士忍受对它的中立的首先破坏，这种破坏的合乎邏輯的后果就是十二月政变帝国兼并了中立的薩瓦地区。他討好联邦委员会，因为他要給 3 月 14 日的照会加上从波拿巴主义的立場来看应具有的意义。联邦委员会在自己的照会中說，瑞士将“一視同仁地”履行它的根据条約而来的中立“使命”。其次，它引用一条条文，根据該条規定，“任何其他国家的任何軍队均不能（在中立的薩瓦地区）驻扎或通过該地区”。委员会只字未提法国人可以使用通过中立地区的铁路。除非作为“保卫自己的領土的措施”，委员会才給联邦保留“用軍队占領”中立地区之权。福格特在这里奉旨

故意歪曲委员会照会的内容，这一点，不仅照会本文可作证明，而且馬姆茲伯里勋爵——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在1860年4月23日的上院会议上发表的声明也可作证明。

馬姆茲伯里說：“当法国军队打算〈在3月14日的联邦委员会照会发出一个多月以后〉通过薩瓦开往撒丁的时候，忠于中立的瑞士政府（瑞士的独立是以这种中立为基础的）首先表示反对，說这些军队无权通过中立地区。”^①

路易·波拿巴同与之有关的瑞士政党究竟用什么論据来打消联邦委员会的疑虑呢？福格特在1859年3月底就已知道法国軍用列車要在1859年4月底破坏中立地区的中立，当然他在3月底就已先料到路易·波拿巴要在4月底用来掩飾自己暴行的那种詞句了。他怀疑“从居洛茲到埃克斯和莎姆伯里铁路綫的先头地段在中立地区范圍内”（同上，第89頁），并且证明“設立中立地区的目的，决不是要中断法国和沙姆伯里之間的联系”，因而上述铁路綫，从道义上說，是繞过中立地区的。^②

我們不妨从另一方面来听听馬姆茲伯里勋爵說的話：

① «When the French troops were about to march through Savoy into Sardinia the Swiss Government, true to the neutrality upon which depends its independence, at first objected that these troops had no right to pass through the neutralised territory».

② 这条铁路在中立地区内，已由联邦主席施坦普弗利和秘书长席斯在1859年11月18日給哈里斯上尉的照会中予以确认。照会中說：«Il pourrait être aussi question d'un autre point qui concerne la neutralité de la Savoie... nous voulons parler du chemin de fer dernièrement construit de Culoz à Chambéry, à l'égard duquel on peut se demander s'il devait continuer à faire partie du territoire neutralisé». [“涉及薩瓦中立的另一款，可能发生問題……我們所指的是新近鋪設的从居洛茲到沙姆伯里的铁路，也許有人会問，它是不是將繼續构成中立地区的一部分。”]

“后来，由于上述理由，即該铁路綫是繞过薩瓦的中立部分的，因而瑞士政府放棄了反对意見，允許法軍通过該地区。我认为他們这样做是錯誤的 (I think that they were wrong in doing so)。我們认为，遵守这个地区的中立，从欧洲利益的观点来看，是十分重要的……因此，我們在 1859 年 4 月 28 日向法国宮廷提出抗議，反对軍队通过該地区开往撒丁。”

这一抗議成了帕麦斯頓攻击馬姆茲伯里同情“奧地利的”借口，因为他“毫无必要地侮辱了法国政府” (had uselessly offended the French government)，完全像福格特在“主要著作”中 (第 183 頁) 攻击“人民报”一样，說它

“用尽千方百計〈当然是为了討好奧地利〉来給瑞士制造困难…… 要弄清‘总汇报’所完全同意的这些傾向，只要讀一讀‘人民报’发表的有关中立和法国人通过薩瓦的文章就够了”^①。

“要弄清”的是：在福格特的“研究”中有一整章是談瑞士的，这一章的唯一任务就是預先为他的那位“左右未来的人物”首先破坏瑞士的中立地区进行辯解。这是兼并薩瓦的第一步，从而也是兼并瑞士法語区的第一步。瑞士的命运取决于瑞士将用什么样的毅力去反对这第一步，将用什么样的毅力去維護它本身的权利，在决定性时刻使用这种权利，并把有关权利的問題变为全欧洲的問題，——而且这一切都必须保证能得到英国政府的同情，而剛发动局部战争的路易·波拿巴还不敢向瑞士提出挑战的时候做到。

① 福格特也攻击“人民报”，說它竭力想使“联邦同一些强大的邻国发生冲突”。当薩瓦实际上已被兼并的时候，波拿巴派的小报“瑞士联邦报”攻击官方的“联邦报”，說“它对薩瓦和法国的看法是下列政策的微弱余音，这种政策从 1848 年起就力图把瑞士卷入欧洲的斗争中去” (見 1860 年 3 月 12 日伯尔尼“联邦报”第 71 号)。我們看到，在波拿巴主义者笔下，这类詞句早就准备好了。

英国政府既已正式插手这件事情，就不可能再后退了。^①因此，“新瑞士人、伯尔尼州公民和联邦院日内瓦議員”就異常努力地来攪乱問題，而把允許法軍通过中立地区說成是瑞士应当使用的权利，說成是对奥地利的一种英勇示威。須知，他毕竟从卡提利納-舍尔瓦尔手中拯救了瑞士啊！

福格特在重复并加强他的那些否认对萊茵的疆界有覬覦之心的原著，即丹屠出版的小册子中所提出的抗議的同时，避免对同一些小册子里所說的放棄薩瓦和尼斯的做法作任何暗示。在他的“研究”中，甚至沒有提到薩瓦和尼斯这两个名称。可是，在1859年2月，薩瓦在都灵的代表，就已經抗議过意大利战争，因为十二月政变帝国兼并薩瓦是同法国結盟的一种代价。这一抗議沒有傳到福格特的耳朵里去。这正像其他所有流亡者都熟知的、路易·波拿巴和卡富尔于1858年8月在普倫貝尔所簽訂的条約的那些条件(发表在“人民报”头几号的某一号上)，沒有傳到他的耳朵里去一样。馬志尼在前面已經提到的一期“思想和行动”(1859年5月2—16日)中，的确曾經預言过：

“但是，如果奥地利在战争一开始就遭到失敗，因而提出它在1848年某一时刻曾向英国政府提出过的那一类条件，即保有威尼斯而让出倫巴第，那时和約将被接受。那时，只有下列条件才能实现，即扩大撒丁王国并把薩瓦

① Had those provinces (Chablais and Faucigny) been occupied by the Federal troops... there can be little doubt they would have remained in them up to this moment. (p. 20, L. Oliphant. *«Universal Suffrage and Napoleon III»*. London, 1860) [如果联邦軍隊占領了这些省份(沙布累和弗西尼)……那末，毫無疑問，它們就会一直駐扎在那里。(劳·奧利芬“普选权和拿破侖第三”1860年倫敦版第20頁)]

和尼斯让給法国。”^①

馬志尼发表他的預言是在 1859 年 5 月中，福格特出版他的“研究”的第二版是在 1859 年 6 月中，但他一个字也沒有提到薩瓦和尼斯。还在馬志尼以前，也在薩瓦的代表以前，早在 1858 年 10 月，即在普倫貝爾密謀之后一个半月，瑞士联邦主席专门用急件通知英国内閣說：

“他有理由认为，路易·波拿巴和卡富尔已签订了关于割让薩瓦的一项有条件的协定。”^②

1859 年 6 月初，联邦主席又把担心薩瓦和尼斯行将被兼并一事通知英国駐伯尔尼代办。^③ 不論是薩瓦代表的抗議，也不論是馬志尼的揭露，还是瑞士联邦政府从 1858 年 12 月到 1859 年 6 月这一时期的担心，这些消息一点儿也沒有傳到福格特这位按其职业是瑞士人的救星的耳朵里去。我們以后会看到，甚至在 1860 年 3

① «Ma dove l'Austria, disfatta in sulle prime, affacciasse proposte equali, a quelle ch'essa affaciò per breve tempo nel 1848 al Governo Inglese, abbandono della Lombardia a patto di serbare il Veneto, la pace... sarebbe accettato: le sole condizioni dell'ingrandimento della Monarchia Sarda e della cessione della Savoia e di Nizza alla Francia, riceverebbero esecuzione».

② 馬姆茲伯里勳爵在他的上述的发言中这样說：«There is a despatch now in the Foreign Office, dated as long back as October 1858... from the President of the Swiss Republic, stating that he had reason to believe that some conditional agreement had been come to between the Emperor of the French and Count Cavour with respect to Savoy». [“目前，在外交部有一份注明日期为 1858 年 10 月的急件……它是由瑞士共和国主席发来的，急件中說，主席有理由认为，法国皇帝和卡富尔伯爵已签订了关于薩瓦的一项有条件的协定。”]

③ 見“論拟議中的薩瓦等地的兼并”第一部藍皮书文件第 1 号。

月，当关于普倫貝爾的秘密已为欧洲家喻户晓时，不知怎么福格特先生对此仍然一无所知。“沉默是奴隶的美德”^①这一题词之所以美化了“研究”，也许是由于它对咄咄逼人的兼并默不作声。但在“研究”中仍然有这样一个暗示：

福格特说：“可是，就假定会发生某种**难于置信**的事情，胜利的代价要付出意大利的土地，不论是南部的或北部的土地……**说实在的，从非常狭隘的德国立场来看……可以真诚地希望法国狼得到意大利的骨头。**”（同上，第129、130页）

意大利北部地区，自然指的是尼斯和薩瓦。在新瑞士人、伯尔尼州公民和联邦院日内瓦議員号召瑞士由于与路易·波拿巴为邻“**从純瑞士的立场来看**”（同上，第39页）“**感到莫大的喜悦**”之后，流亡的帝国摄政突然想起了：“**说实在的，从非常狭隘的德国立场来看**”，他“**可以真诚地希望**”法国狼“**得到骨头**”，也就是得到尼斯和薩瓦，从而也得到瑞士法語区。^②

① 这里套用了海涅“旅行札记”中的一句话（第四部，意大利，第三章，魯卡城）。——编者注

② 福格特的希望是：“从非常狭隘的德国立场出发”，把意大利的“骨头”塞进“法国狼”的喉咙里去，使狼苦于消化不良。这种希望的规模，无疑将越来越大。1860年10月15日的半官方杂志“现代评论”——附带提一下，这家杂志是专门庇护福格特的，——登载了一篇10月8日发自都灵的消息，其中写道：“热那亚和撒丁会成为争取意大利统一的一场新的（法国的）战争的合法代价。我补充说，占有热那亚会成为我们对半岛产生影响的一种必要工具，会成为阻挠一个海軍强国（它是我們协助建立的）有朝一日溜出我們的同盟而加入某个新同盟的一种唯一有效手段。只有把膝盖頂在意大利的胸膛上，我們才能保证赢得它的忠心。奥地利在这件事情上是一个好裁判員，它对这件事情知道得很清楚。我們的压力没有奥地利的那样粗暴，但是比它有力，——这是唯一的区别。”

不久以前，巴黎出版了一本小冊子“拿破侖第三”，不是“拿破侖第三和意大利”或者“拿破侖第三和羅馬尼亞問題”，也不是“拿破侖第三和普魯士”，而是“拿破侖第三”，干脆就是拿破侖第三。這是一本拿破侖第三對拿破侖第三濫肆吹捧的小冊子。這本小冊子由一個名叫**達-達**的阿拉伯人譯成了他祖國的文字。在該小冊子的跋中，這位帶着醉意的**達-達**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激情，因而火熱的詩句洋溢紙上。但在序言中，**達-達**還是够清醒的，因而承認他的著作是奉阿爾及利亞地方當局之命發表，用來在阿爾及利亞國境那邊的當地阿拉伯部落中間散發的，以便使“在一個共同領袖領導下的統一理想和民族理想充滿他們的想像”。這位要建立“阿拉伯民族統一”的共同領袖，——像**達-達**所透露的，——不是別人，正是“慈善的太陽、蒼穹的榮譽——皇帝拿破侖第三”。**福格特**不是別人，正是德國的**達-達**，雖然他寫的不是詩^①。

達-達·福格特把由慈善的太陽和蒼穹的榮譽放射出來的“通報”上的文章、丹屠出版的小冊子和改繪的歐洲地圖轉述成德文，就稱之為“研究”，這種俏皮的稱呼是很成功的，在他快樂的一生中還從來沒有過。這甚至比帝國攝政、帝國酒宴以及他本人發明的帝國護照都更巧妙。這位“有教養的”德國市民認為“研究”是 *bona fide* [誠實的]，因為其中談到了奧地利因埃及而同英國作鬥爭，奧地利同普魯士因歐洲以外的土地而爭吵，拿破侖第一強迫英格蘭銀行把它的黃金過秤，而不是點數，希臘人和法納爾人是不同的種族，從蒙塞尼山隘有一條陸路經過費涅斯特雷利通往斯圖腊河谷等等，——這些事實只是證明了：在反動的十年中，這位市

① 文字遊戲：《*ungereimt schreiben*》意思是“無韻腳的寫作”，即寫的不是詩，同時也有“寫作胡說八道的東西”、“荒誕無稽的東西”等意思。——編者注

民的自由主义脑袋瓜受到了什么样的高压。

然而，奇怪的是，当艾德門·阿布在自己的小册子“一八六〇年的普魯士”（最初叫“拿破侖第三和普魯士”）中，以智者的謹慎把达-达編纂的东西又譯成法文时，同一位厚臉皮的自由主义的德国人，即欢迎把十二月政变的卫士們的原著小册子譯成福格特的非常夸張的德文譯本的那位德国人，竟发瘋似地从自己的舒适的安乐椅上跳了起来。順笔提一下，这只波拿巴主义的吱吱喳喳的喜鵲并未失去狡詐。例如，为要证明波拿巴同情德国，阿布指出，十二月政变帝国把达-达·福格特同洪堡混为一談，就像把拉薩里耳奧-哈克兰德尔同歌德混为一談一样。无論如何，福格特-哈克兰德尔的这种搭配，表现出阿布对他的对象有更为深刻的研究，这种研究是德国的达-达的“研究”中所沒有的。

九 代 理 机 构

«So muosens alle strîten.
in vil angestlîchen zîten
wart gescheiden doch her dan
…der *Vogt* da von Bërne».

(«*Klage*»)

〔“在这紧要关头
全体都参加战斗，
那行列之中有
……伯尔尼的一个州官。”

(“哀歌”)^①〕

在达-达·福格特极其俏皮地注明日期是 4 月 1 日，即 1859 年 4 月 1 日的一个“綱領”中，他呼吁不同色彩的民主主义者为将在日内瓦出版的报纸撰稿，这家报纸将宣传他的“研究”一书中的波拿巴主义亲俄观点。这个“綱領”在拟定的时候自然经过深思熟虑，但是马脚还是穿过吸墨纸做的封皮不时露了出来。不过我们

① 与此相反，哈特曼在“伊威恩”中为了暗示他同伯尔尼的头脑简单的人意见分歧，迫使州官说了如下的话：

«von Bêrn mac wol heizen ich,
wand ich dô niht ze schaffen hân».

〔“纵使把我称为伯尔尼人，
也同伯尔尼毫无瓜葛。”⁵²¹〕

但是，不要把这个哈特曼同福格特的朋友、那位同名的、柔情的、议会的软体动物混为一谈。

并不准备来谈这个问题。

在“綱領”的末尾，福格特请求他的收信人介绍一些“志同道合的人”，这些“志同道合的人”“愿意用同样精神为能够发表他们文章的报章杂志撰稿”。在洛桑中央节上，福格特宣称他已草拟了一个“綱領”，准备聘请

“愿意遵守这个綱領，按适当稿酬在他们所支配的报刊中参加工作的那些人”（“中央节等等”第 17 页）。

最后，在给勒宁博士的一封信中写道：

“你能否帮助我同一些能从法兰克福用这种精神来影响报章杂志的人们取得联系？如果他们将来将版样给我寄来，我愿意对他们的文章付以优厚的报酬。”（“主要著作”，文件，第 36 页）

“綱領”中的“志同道合的人”在洛桑中央节上变成了“那些人”，而“那些人”在给勒宁博士的信中又变成了“人们”，sans phrase [直截了当的] 人们。德国报刊的总财务员和总检查员福格特“所支配的基金”（同上，第 36 页）不仅用来支付“报章杂志上”文章的稿费，而且用来支付“小册子”（同上）的稿费。显而易见，处于这种地位的代理机构是需要相当可观的“基金”的。

«er sante nach allen den hêrren
die im diusken rîchen wâren;
er clagete in allen sîn nôt;
unde bôt in ouch sîn golt rô».

(*Kaiserchronik*)^①

① “他向德国所有公爵
派去了使者，
他向他们哭穷，
也向他们提供黄金。”

（“帝国大事记”）⁵²²。——编者注

但是，要那些人對報章雜誌和小冊子“施加影響”，要他們把自己的文章給福格特“寄來”並付給他們“優厚的”稿酬，其目的究竟何在呢？“這涉及意大利”，如此而已；為了使萊茵河沿岸免於危險，福格特先生“認為最好讓路易·波拿巴在意大利流盡鮮血”（同上，第34頁，“綱領”）。不，“這不涉及意大利”（給勒寧博士的信，同上，第36頁）。“這涉及匈牙利”（給恩城的赫先生的信，同上）。不，這不涉及匈牙利。“這涉及……我不能講的事情”（同上，文件，第36頁）。

同上面談的事情一樣，雄厚“基金”的來源也是矛盾百出的。它來自“瑞士法語區的一個偏僻角落”（“主要著作”第210頁）。不，“來自西方的匈牙利婦女們”（給卡爾·布林德的信，1860年2月13日“總匯報”第44號附刊）。恰恰相反，來自“德國的，特別是奧地利的警察轄區的”masculini〔男人〕（“中央節”第17頁）。他那基金的數目，同基金的目的和來源一樣，也是變幻莫測的。這是“幾個法郎”（“主要著作”第210頁）。這是“不大的一筆基金”（“中央節等等”第17頁）。基金足以向所有願意福格特式地為德國報刊撰稿和寫小冊子的人付出優厚稿酬。最後，連籌集基金的方式也是含糊不清的。基金是福格特“千辛萬苦地積攢起來的”（“主要著作”第210頁）。不，是“供他支配的”（同上，文件，第36頁）。

這位“圓滿的人物”說：“如果我沒有弄錯，用金錢或別的利益促使人的言行違背他的信念，就是收買”（同上，第217頁）。

因此，一個人的信念如果允許他出賣自己，那末這個人是不可能被收買的，而信念與此相矛盾的人也不可能被收買。例如，如果巴黎內閣的外國報刊部願意以半價、半價的半價、甚至免費向瑞士

报刊提供价值 250 法郎的巴黎的日报“石印通讯”，并提请“善意的编辑部”注意，他们一定还会“按成绩”每月领取 50、100 或 150 法郎的补贴，那末，这决不能说是收买。谁也没有强迫其信念同每天的“通讯”和每月的津贴相矛盾的那些编辑部接受“通讯”和津贴。难道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或拉·格隆尼埃尔、或阿布、或格朗基奥、或布耳埃、或“世纪报”⁵²³ 的茹尔丹、或“立宪主义者报”⁵²⁴ 的马丁和博尼法斯、或罗舍·达-达·阿尔伯，是“被收买”的吗？难道有过什么得到报酬的言行是同这些先生们的信念矛盾的？例如，福格特如果曾把几百本他的“研究”免费供给一家过去与他为敌的瑞士报纸的代理人，难道这就是收买吗？福格特建议政论家根据他们的信念在他们所支配的报刊上撰稿，而由卡尔·福格特先生在日内瓦的机构支付稿费，无论如何，这种建议是非常奇怪的。一种情况是一家报纸付给自己的撰稿人稿费，另一种情况是某个第三者用来历不明的钱秘密津贴一些同他毫无关系的报纸的通讯员，甚至是整个国家的报刊的通讯员，福格特把这两件事混为一谈，——这种 quid pro quo [混乱] 证明，德国的达-达多么深刻地“领会”了十二月二日的道德。

“男孩坐在泉源边”^①。但他坐在什么样的泉源边呢？

后来在日内瓦出版的，不是福格特原计划的“新瑞士”周刊，而是达-达的老友奥·布拉斯先生创办的“新瑞士报”。在一个凉爽的 11 月的早上，布拉斯先生使整个日内瓦都感到惊奇地宣称他

“在给福格特的信中，拒绝了福格特想摆在他面前的法国食槽”。

同时他还宣称，他准备为这一指控负法律责任（1859 年 11 月

① 引自席勒的诗“小溪边的男孩”。——编者注

12日“新瑞士报”)。这只公鸡,或者更正确些說,这只闖鸡,以前一直啼叫得很欢,但在自己拉的粪堆上被弄得羽毛零乱之后,就再也不吭气了。这位“新瑞士人、伯尔尼州公民和联邦院日内瓦議員”,这次就在日内瓦,被他的一个“著名的”朋友公开指責为企图用法国金錢进行收买。而这个联邦院日内瓦議員却默不作声。

不要設想福格特会考虑到自己的身分而对“新瑞士报”置之不理。如上所述,对他的指控发表在1859年11月12日的該报上。此后不久,这同一家报纸又发表了一篇对普隆-普隆的辛辣的評述,而日内瓦独裁者詹姆斯·法济的机关报“日内瓦評論”⁵²⁵立即在一篇占四栏篇幅的社論中提出抗議(1859年12月6日的“日内瓦評論”)。該报是«au nom du radicalisme genevois»——以日内瓦激进派的名义提出抗議的。詹姆斯·法济本人对“新瑞士报”也这样看重。从“日内瓦評論”的四栏社論中,不会看不出也有福格特的功劳。社論在某种程度上是在替布拉斯本人辯白;說他不是攻击普隆-普隆的主謀人,而只是受了別人的蒙蔽。按照純福格特式的做法,把 corpus delicti [犯罪构成] 推諉給列·海弗納尔,即福格特在“主要著作”(第188頁)中怀疑他是“皇帝与拿破侖亲王丑史”的作者;福格特的书里并且不可避免地暗示“臭名远揚的巴登前尉官克洛斯曼”为“总汇报”駐伯尔尼的通訊員(參看“主要著作”第198頁)。現在我們稍微談一談主子和奴才,即詹姆斯·法济和卡尔·福格特为了挽回普隆-普隆的名譽,“以日内瓦激进派的名义”于1859年12月6日在“日内瓦評論”上发表的抗議。

布拉斯被指控企图“以侮辱波拿巴王室的亲王来加强他那德国人对法国的看法”。在日内瓦,大家早就知道,普隆-普隆是一个

純粹的自由主義者，他在流放期間曾寬宏大量地拒絕“扮演斯圖加特宮廷甚至彼得堡宮廷內的角色”。像“新瑞士報”上刊登的那篇侮辱性文章那樣說他想要在某个地方建立一个厄特魯里亞王國般的小國，簡直是可笑的。

“拿破侖親王堅信自己的天才和稟賦，他根本瞧不起這些可憐的小王位。”

他寧願在法國“這個高度文明和普遍首創精神的中心”，在他的最德高望重的堂兄的宮廷中，“以親王公民(prince-citoyen)的身分”扮演波扎侯爵的角色。“不管別人怎麼說，他的堂兄是尊重他、喜歡他的”。但是，這位親王不僅是波拿巴的波扎侯爵，他還是意大利、瑞士，一句話，各民族的“大公無私的朋友”。

“拿破侖親王同皇帝一樣，是大經濟學家……如果政治經濟學的健全原理終於在法國取得勝利，那末，毫無疑問，拿破侖親王也是有一份大功勞的。”

他過去和現在都“擁護毫無限制的出版自由”，反對任何預防性的警察措施，“體現了理論和實踐上的最廣義的自由思想”。如果皇帝的耳朵因為受到壞影響聽不進這個埃吉麗亞的忠言，那末，親王就尊嚴地引退，而“毫無怨言”。這無非是“他的功勳引起了歐洲對他進行誹謗攻擊”。

“法國的敵人害怕他，因為他依靠歐洲人民革命的支持，力圖把歐洲人民的獨立和自由歸還歐洲人民。”

總之，未經公認的天才、波扎侯爵、埃吉麗亞、經濟學家、被壓迫民族的保衛者、純粹的民主主義者和——這是可能的嗎？——普隆-普隆 «habile comme général et brave comme tout officier français» (干練如將軍，勇敢如任何一個法國軍官)。

“他在克里木战役的阿尔馬河会战之时和会战之后，都证明了这一点。”而在意大利战争中他“出色地組織了一个5万人的軍团（著名的 *corps de touristes* [旅行团]，我几乎說成 *corps de ballet* [芭蕾舞团]），并且在短時間內完成了艰苦的山地行軍，而他的軍隊一点也沒有感到供应不足”。

大家知道，在克里木的法国兵把害怕炮击叫做 *la maladie Plon-Plonienne* [普隆-普隆病]，而且很可能只是由于食品越来越缺乏，普隆-普隆才离开了这个半島⁵²⁶。

“日內瓦評論”最后得意洋洋地說：“我們介紹了他（即普隆-普隆）的真相。”

烏拉，普隆-普隆將軍！

因此，如果福格特說他的軍費得自“民主主义者之手”，那是不足为奇的。普隆-普隆，这位 *Prince Rouge* [紅色亲王]，是福格特和法济的理想，是所謂欧洲民主的具有魅力的亲王。福格特除了从普隆-普隆手中得到錢以外，不可能从更为純粹的民主主义者手中得到錢了。即使有一部分錢是由普隆-普隆的至圣的堂兄直接給科苏特先生的，然后經匈牙利人之手落到福格特手里，那末这“来源”仍然是“駭人听聞的”。但来自普隆-普隆之手，那就又当別論了！就算福格特在紐沙特尔冲突期間从克拉普卡的女友卡^①伯爵夫人那里得来的那些錢，也許是更嬌嫩的手給的，但不是更純粹的民主主义者之手給的。一个著名的法国作家說，*«Plon-Plon est voluptueux comme Héliogabale, lâche comme Ivan III et faux comme un vrai Bonaparte»* [“普隆-普隆像海利奥加巴尔一样好色，像伊万三世一样怯懦，又像真波拿巴一样虛伪”]。普隆-普隆

① 卡罗利。——編者注

的最糟糕的行为就是把他的堂兄当做 homme sérieux [严肃的人]。维克多·雨果关于路易·波拿巴还可以说: «n'est pas monstre qui veut» [“并非任何人都能按其心願成为巨人”]①, 但自从路易·波拿巴发现了普隆-普隆以后, 波拿巴的雅努斯头的两面就成为: 土伊勒里宫的那个人集中了事业的一面, 罗亚尔宫的那个人集中了小丑的一面。这个假波拿巴, 即自己伯父的侄子而不是自己父亲的儿子⁵²⁷, 比真波拿巴还真; 因此, 法国人总要說: l'autre est plus sûr [另一个更可靠些]。普隆-普隆同时是 Bas Empire [衰落时期的帝国]的唐·吉訶德和休迪布腊斯。哈姆雷特寻思亚历山大的遺骸大概注定要成为啤酒桶的塞子②。假如哈姆雷特看到, 拿破侖的腐烂了的脑袋长到普隆-普隆的肩膀上, 他会說什么呢! ③

虽然福格特的軍費的主要基金“来自法国食槽”, 但是, 为了掩盖这个食槽, 他当然可以向他那些多少有些民主主义情緒的朋友收集“几个法郎”来摆摆样子。这样, 他的基金的来源、数量和收集方法方面的矛盾就迎刃而解了。

福格特的代理活动不仅限于“研究”、“綱領”和招募局方面。在洛桑中央节上, 他向在瑞士的德国工人宣布了路·波拿巴解放各民族的使命, 自然, 这时他用了比他替德国自由主义庸人写的

① 雨果“小拿破侖”結語第1部第1章。——編者注

② 見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第五幕第一場。——編者注

③ 正如福格特所說的, 早在1852年他就該同普隆-普隆一起作一次学术旅行(巴考士的游行?), 一个“蒲魯东主义者”热情地把福格特介紹給普隆-普隆, 因为福格特 «mais do que promettia a força humana» [“超乎人力所及”(卡蒙斯“卢兹之歌”第一首歌)] “对自然历史作了惊人研究”(“主要著作”, 文件, 第24頁)。

“研究”更为激进的观点。一方面福格特在“研究”中通过深入钻研“物质和力”的关系，得到了这样的信念：不能设想“現存的德意志各邦政府是可以动摇的和瓦解的”（“研究”前言第 VII 頁），并且特別向“德国资产者”（同上，第 128 頁）呼吁，要他們“关心”：波拿巴“解放”意大利将会防止德国的“革命”，而同时他又回过来向德国工人解釋說，“奥地利是他們〈德意志各邦君主〉繼續存在的唯一支柱”（“中央节等等”第 11 頁）。

他說：“我剛剛對你們說過，對其他國家來說，德國並不存在，還需要把它建立起來，而且我相信，德國只能建成一個像瑞士聯邦那樣的共和國聯邦。”（同上，第 10 頁）

這些話是他在（1859 年）6 月 26 日說的，可是早在 6 月 6 日，他在“研究”第二版跋中就懇求過普魯士攝政王^①用武力和王朝內戰迫使德國臣服於霍亨索倫王室。用武力實現君主集權，當然是建成一個“像瑞士聯邦那樣的”共和國聯邦的最簡便的辦法。接着，他還發揮了關於“外部敵人”（法國）的理論，認為德國必須追隨外部敵人，以對付“內部敵人”（奧地利）。

他喊道：“如果我必須在魔鬼（哈布斯堡）和魔鬼的祖母（路易·波拿巴）之間進行選擇，那末我會選擇後者；因為她是一個老太婆，就會死去。”

但是，福格特覺得，借口敵視奧地利，直接號召德國投入十二月政變的法國的懷抱，未免太損害他在讀者心目中的名譽了，因此當這段講話刊印的時候，他把這個號召作了如下修改：

“如果問題是要在魔鬼和魔鬼的祖母之間的鬥爭中表明立場，那末我們認為最好是兩者互相殲滅、互相吞掉，這樣我們就省事了。”（“中央節等等”第 13 頁）

^① 威廉。——編者注

最后，虽然福格特在“研究”中把路易·波拿巴吹捧为农民和工人的皇帝，可是这次他却对工人听众說，

“恰恰是絕大多数的巴黎工人目前都已經”轉到“路易·波拿巴方面”。

照法国工人看来

“路易·波拿巴正在做共和国所应当做的一切，他給无产者以工作，使資产者破产等等”（“中央节等等”第9頁）。

总之，路易·波拿巴是**工人专政者**，而且由福格特把他当做工人专政者向瑞士的德国工人吹嘘，不过这位福格特仅仅为了“工人专政”这一字眼，便在“主要著作”中以資产階級身分大发雷霆。

巴黎綱領为在瑞士的十二月代理人規定了在薩瓦兼并問題上的行动計劃。这个綱領包括三点：（1）对于面临危險的謠言尽可能久地完全置之不理，必要时把它說成是奥地利的捏造；（2）在較后的阶段，散布一种路易·波拿巴想把中立区划归瑞士的看法；最后，（3）在兼并实现以后，即以此作为要求瑞士同法国結盟的借口，即作为要求瑞士自願接受波拿巴保护的借口。我們还将看到，主子和奴才，詹姆斯·法济和卡尔·福格特，日内瓦的独裁者和受他庇护的联邦院日内瓦議員，多么忠实地执行了这个綱領。

我們已經知道，福格特在“研究”中絕口不談他的左右未来的人物要为之策划战争的那种观念。在洛桑中央节上，在国民院⁵²⁸里，在席勒和罗伯特·勃魯姆紀念会上，在俾尔“推銷員”上，最后在“主要著作”里，都表現了同样的沉默。但是，这种“观念”比普倫貝尔密謀产生得还要早。早在1851年12月，政变后不几天，在“薩瓦爱国者”上就可以讀到：

“爱丽舍宮前厅里已經在分配薩瓦的官职。它的报纸甚至用这事开心取

乐。”^①

1851年12月6日，法济就已經看出，日內瓦將划归十二月政变帝国。^②

1859年7月1日，当时的瑞士联邦主席施坦普弗利同英国駐伯尔尼代办哈里斯上尉进行了一次談話。他重申了自己的顾虑：如果撒丁在意大利的統治不断擴張，薩瓦將不可避免地被法国兼并。他強調指出，特别是北薩瓦的被兼并将使瑞士的一个翼側完全暴露，并且很快就会導致日內瓦的喪失（見第一部藍皮書“論拟議中的薩瓦和尼斯的兼并”，№ I）。哈里斯把这一点告訴了馬姆茲伯里，后者則委托巴黎的考萊勛爵要求瓦列夫斯基說明皇帝的意图。瓦列夫斯基毫不否认

“法国同撒丁不止一次地商談过合并的問題，皇帝的意見是，如果撒丁擴展成一个意大利王国，那末就有理由期望它向法国作出領土上的让步”（同上，№ IV）。

瓦列夫斯基答复的日期是1859年7月4日，所以是在签定維拉弗兰卡和約以前。1859年8月，巴黎出版了佩特丹的小册子529，其中說欧洲准备兼并薩瓦。同年8月，在瑞士国民議会的夏季會議结束后，福格特偷偷地溜到巴黎，听取普隆-普隆的指示。为了

① «On se partage déjà les places…de la Savoie dans les antichambres de l'Elysée. Ses journaux plaisantent même assez agréablement là-dessus».

② «Peut-être le citoyen Thurgovien que nous avons si bien défendu contre les menaces de Louis Philippe, nous fera-t-il la grâce de vouloir bien se constituer comme médiateur, et reprendre de nous Genève» (1851年12月6日“日內瓦評論”)[“我們曾經很好保护他，使他不受到路易-菲利浦威胁的这位土尔高公民，或許会殷勤地出来充当中間人，以便把日內瓦从我們手里拿走”。]

掩飾这次旅行，他让他的同謀者拉尼克尔一伙人在日内瓦散布謠言，說什么他到費尔瓦德施泰特湖休养去了。

«zê Pârîs lëbt er mangel tac,
vil kleiner wisheit er enpflic,
sîn zerung was unmâzen grôz…
ist êr ein esel und ein guoch,
daz sêlb ist êr zuo Pârîs ouch».^①

1859年9月，瑞士联邦委员会已經看到兼并的危險日益迫近（同上，№ VI）；11月12日，委员会决定向各大国提交一份說明这种看法的备忘录，可是11月18日，施坦普弗利主席和席斯秘书长却向英国駐伯尔尼代办送去一份正式照会（同上，№ IX）。10月，詹姆斯·法济从托斯卡納回来，他这趟奔跑毫无成果，为普隆-普隆的厄特魯里亚王国进行的宣傳归于失敗。回来后，他像往常那样，气势汹汹地大罵兼并是謠言，說什么無論在法国还是在撒丁，都没有人想到兼并的事。随着危險的日益迫近，“日内瓦評論”的信任也日益增长，1859年11月和12月，該报对拿破侖后裔的膜拜（参看前面引证过的关于普隆-普隆的文章）达到了柯利班式的瘋狂程度。⁵³⁰

1860年，准备兼并进入第二阶段。

① “巴黎住了許多天，
聪明沒有长一点，
成了饕餮大肚汉……
飯桶一个駝一头，
至今一成也未变。”

（引自博內留斯“宝石”中的一篇寓言“一个博学的僂神甫的故事”。）——
編者注

置之不理和否认已經不再符合十二月英雄們的利益。这时，已經到了用兼并誘騙瑞士上当的时候了。这时必須实行土伊勒里宮綱領的第二点，因而要尽可能地大声宣揚准备把中立地区交給瑞士。在这件事情上，十二月政变的瑞士娄罗們当然会得到巴黎同时玩弄的权术的支持。所以，1860年1月初，內务部长**巴罗什**向瑞士公使**凱倫**博士宣称，

“如果薩瓦的占有者有所改变，根据1815年条約，瑞士同时也應該获得一条良好的防御綫。”（見上述藍皮书，№ XIII）

早在1860年2月2日，即**图温奈尔**向英国大使**考萊**勋爵声称“可能”兼并薩瓦和尼斯的那天，图温奈尔还告訴考萊：

“法国政府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沙布累和佛西尼永远歸属于瑞士是理所当然的。”（同上，№ XXVII）

散布这种幻想，不仅是要使瑞士容忍十二月政变帝国兼并薩瓦，而且要削弱它以后抗議兼并的效力，敗坏它的名誉，让欧洲人认为它是十二月政策的同謀者，虽然是受騙的同謀者。1860年上任的联邦主席**弗雷-埃罗澤**并没有上圈套，反而向**哈里斯**上尉声称，他对于把中立地区划归瑞士的所謂好处表示怀疑。**哈里斯**也同样对联邦政府提出警告，要它当心波拿巴主义的阴谋，以便

“瑞士不要成为一个也具有兼并野心的和力图扩張自己領土的国家”（同上，№ XV）。

与此相反，英国駐都灵公使**詹姆斯·赫德逊**爵士在同**卡富尔**作了长时间的談話以后，写信給**約翰·罗素**勋爵說：

“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瑞士也渴望兼并薩瓦的部分土地。因此，不要为自己造成任何幻想，如果法国由于有兼并野心而受到譴責，那末瑞士也有同样的罪过…… 因为这个问题被这种双重的夹攻弄得复杂了，所以撒丁的态度倒是可以諒解的。”（同上，№ XXXIV）

最后，路易·波拿巴一撕掉假面具，图温奈尔就毫无顾忌地揭露了瑞士兼并中立地区这句口号的秘密。他在给法国驻伯尔尼代办的紧急报告中，公开嘲笑瑞士对法国兼并萨瓦的抗议。根据什么来嘲笑呢？根据巴黎强加给瑞士的“瓜分萨瓦的计划”（见1860年3月17日图温奈尔的紧急报告）。

瑞士的十二月代理人是怎样参加这种阴谋的呢？1860年1月，詹姆斯·法济最先向英国驻伯尔尼代办表示：沙布累和佛西尼之划归瑞士，并不是路易·波拿巴的诺言，而是瑞士和中立地区居民自己的愿望（同上，№ XXIII）。福格特在这以前从未想到过法国可能兼并萨瓦，这时却突然充满预言家的灵感了。“泰晤士报”是自创刊以来从未提到过福格特名字的，也突然在1月30日的一篇通讯中报道：

“瑞士教授福格特认为，根据他的消息，如果共和国的联邦委员会把辛普朗让给法国自由使用，法国准备使佛西尼、沙布累和热涅瓦等萨瓦的中立地区归属瑞士。”（1860年2月3日“泰晤士报”）

不仅如此！1860年1月底，詹姆斯·法济向英国驻伯尔尼代办保证说，卡富尔（两个月前他曾经同这个人在日内瓦作过长谈）坚决反对向法国作出任何领土上的让步（见上述蓝皮书，№ XXXIII）。可是，当法济向英国担保卡富尔的时候，卡富尔却说法济有兼并野心，以便在英国面前开脱自己（同上，№ XXXIII）。最后，瑞士驻都灵公使图尔特早在1860年2月9日就特意去找英国公使赫德逊，要他相信，

“在撒丁同法国之间决不存在关于将萨瓦转让给法国的协议，撒丁根本不同意同法国交换萨瓦或把萨瓦转让给法国”（同上）。

但是决定性的时刻迫近了。1860年1月25日，巴黎“祖国

报”⁵³¹ 在一篇标题为“薩瓦的願望”的文章中已在为兼并薩瓦制造輿論。在該报 1 月 27 日的另一篇文章中，即用波拿巴風格写的“尼斯伯国”一文中，已經显示出将要兼并尼斯的阴影。1860 年 2 月 2 日，图温奈尔通知英国大使考萊說，法国同撒丁在战前就已达成有关“可能”兼并薩瓦和尼斯的協議。但是，关于法国实际决定兼并薩瓦和尼斯的正式照会在 2 月 5 日才提交考萊勋爵（見 1860 年 4 月 23 日考萊勋爵在上院的演說），2 月 6 日才提交凱倫博士，这样，英国和瑞士两国的公使都得到了中立地区要划归瑞士的明确声明。在这些正式声明以前，詹姆斯·法济就已經从土伊勒里宮获悉，撒丁已經根据秘密条約把薩瓦和尼斯割让法国，条約中沒有任何有利于瑞士的条件。在图温奈尔向考萊勋爵和凱倫博士正式声明以前，法济就得把帝国的药丸裹上糖衣給他的日内瓦臣民服用。因此，2 月 3 日，他让他的盲目的工具約翰·佩里埃在日内瓦国民俱乐部召开一次群众大会，而法济則装做是偶然出席这次大会的，故意說：

“他剛才听說(je viens d’entendre)大家正在談論法国同撒丁签定割让薩瓦的条約。遺憾的是，撒丁政府已于 1 月 27 日在这样的条約上签了字；但是还不应根据这个明显的事实得出結論說，我們的安全真正受到威胁……固然，关于我們对撒丁的中立地区的权利問題，条約中并没有任何保留条件；但是，我們不知道在締約双方的心目中是否存在这样的保留条件…… 人們可能认为这种条件是不言自明的(sous-entendue comme allant de soi)…… 我們不应当只是过早地表示不信任…… 我們应〈对政变帝国〉保持同情……我們应当克制，不发表任何含有敌意的言論。”(見法济的“可以充分信任的”演說，这一欺騙性的杰作載于 1860 年 2 月 3 日“日内瓦評論”)

英国駐伯尔尼代办认为法济的具有先知之明的講話是十分重要的，因此立即电告約翰·罗素勋爵。

关于把薩瓦和尼斯割让法国的正式条约，原定在1860年3月24日签定。所以，不能浪费一点时间。在正式宣布兼并薩瓦以前，还必须正式证实一下十二月政变的日内瓦代理人的瑞士爱国心。因此，3月初，福格特先生在克拉普卡将军的陪同下（他可能是 de bonne foi [诚心诚意地]）前往巴黎，以便对罗亚尔宫的埃吉丽亚、未经承认的天才普隆-普隆施加他的影响，并且当着整个瑞士，利用他个人的威望，促使中立地区划归瑞士。福斯泰夫-福格特在普隆-普隆的豪华的筵席上，——大家知道，在讲究饮食方面，普隆-普隆可以同鲁库鲁斯和康巴塞雷斯媲美，而且，如果布利阿-薩瓦兰能够死而复生，那他对普隆-普隆在这方面的天才、政治经济学、自由思想、统帅才能和个人勇敢，也会感到惊奇，——即在他作为“令人喜欢的交谈者”贪馋地把自己肚子装得满满的普隆-普隆的豪华筵席上，号召瑞士拿出勇气来。（见他的巴黎通信，载于1860年3月8日俾尔“推销员”附刊）瑞士应当表现出

“它的民兵不仅是为了检阅和作士兵游戏才存在的”。“把中立地区割让给瑞士”是一种幻想。“把沙布累和佛西尼让给法国只是第一步，跟着还会有其他步骤”。“踩着民族原则和自然疆界原则这付高跷，可以从日内瓦湖走到阿勒河，最后走到博登湖和莱茵河，——只要两腿足够硬实的话”。

但是，福斯泰夫-福格特——这是问题的实质所在——至今还不相信，法国大臣图温奈尔本人在一个月以前已经正式透露的、而整个欧洲现在都已经知道的事情，即割让薩瓦和尼斯，早在1858年8月就已经在普倫貝尔成了法国参预反对奥地利的交换条件了。他的“左右未来的人物”倒是现在才在神甫的影响下违反自己意愿，投入了沙文主义怀抱，并被迫夺取中立地区。

“显然”，——我们的窘迫的辩护人喃喃地说，——“显然，曾在领导集团

中寻找反对日益发展的教权主义运动的力量，并且认为在所谓的沙文主义中，即在除了夺取某一小块(!)土地以外什么也不管的最愚蠢的民族主义中找到了这种力量。”

福格特被普隆-普隆的厨房的蒸汽陶醉，在俾尔“推销员”上显示了这种勇气之后，一回到巴黎就在同一家报纸上胡謔什么尼斯人绝对同情法国人；因此，他同意大利民族联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尼斯民族”⁵³²这本小册子的作者维吉齐-卢斯卡拉发生了不愉快的冲突。可是这位在普隆-普隆的筵席上扮演文克里特角色的英雄，到了在伯尔尼的国民院发言的时候，他的耀武扬威的号声却变成了外交式的笛奏：建议同这位一向同情瑞士的皇帝安静地继续谈判，并特别坚决地警告不要同东方结成联盟。联邦主席弗雷-埃罗泽暗指福格特说了某些出奇的话，而福格特也满意地获悉“窝州新闻”在赞扬他的演说。“窝州新闻”是布朗施奈先生、拉德腊日阿兹先生和瓦得的其他巨头们的机关报，一句话，瑞士西部铁路的机关报，就像“新苏黎世报”是苏黎世的波拿巴派和东北部铁路的机关报一样⁵³³。在那次出名的奥朗铁路之争中，有五个瓦得的政府顾问多次受到反对方面报纸的指责，说他们每人从巴黎的«Crédit Mobilier»⁵³⁴——瑞士西部铁路的主要股东那里得到1万法郎的股票(20股)，而他们仍然逍遥法外，举此一端，就足以说明“窝州新闻”的老板们是何等人物。

福格特在克拉普卡的陪同下去访问罗亚尔宫的埃吉丽亚不几天以后，詹姆斯·法济也在约翰·佩里埃的陪同下去访问土伊勒里宫的斯芬克斯。大家知道，路易·波拿巴喜欢斯芬克斯这个角色，而且他给他自己的奥狄浦斯们的薪俸，就像过去的法国国王给他的宫廷小丑的薪俸一样。在土伊勒里宫，法济厕身于瑞士和斯

芬克斯之間。如上所述，約翰·佩里埃是他的旅伴。這位約翰是自己的詹姆斯的影子；他所做的全是那個人所希望的，凡是那個人不希望的他就不做；他依靠那個人也為那個人而生，他通過那個人成了日內瓦大會議的議員，他替那個人安排酒宴和準備祝詞，他是那個人的列保萊羅和菲阿蘭。他們倆回到日內瓦時，就有关瑞士的利益來說毫無結果，但就威脅法濟處境的危險來說，却成績輝煌。法濟在公开发言中怒气冲冲地声称，他现在算是恍然大悟，今后他将痛恨路易·波拿巴，就像以前热爱他那样。共和主义者的法济竟对一个扼杀过两个共和国的劊子手爱了九年，真也爱得古怪！法济以极深的造詣扮演一个受騙的爱国志士的角色，使整个日內瓦都沉浸在法济式的热情中，而失掉中立省份未必比失掉法济式的幻想更令人感到痛苦。甚至多年来反对他的貴族反对党的首領德奧多·德·索緒爾也承認，对詹姆斯·法济的瑞士爱国热忱不能再有怀疑。

这位日內瓦的暴君，就在人民的这种欢呼声中急忙上伯尔尼国民院去了。在他出发后不久，他的亲信，即他的巴黎旅伴，一句話，他自己的約翰·佩里埃作了一次非常独特的亚尔古船英雄的远征。由«fruitiers»〔“干酪制造者”〕协会、法济的民主禁卫軍中挑选出来的一帮醉鬼（至少倫敦的“泰晤士报”这样称呼他們），在佩里埃的率領下手无寸铁地坐船去托农，要在中立地区的这个点上举行一次反法示威。为什么举行了这次示威或者为什么要举行这次示威，亚尔古船英雄們能否获得金羊毛，或是丢掉自己的老命，至今誰也不能断定，因为佩里埃的这次亚尔古船英雄的远征，既沒有奧菲士陪伴，也沒有阿波洛尼烏斯为之歌唱。显然，这不过是以約翰·佩里埃及其同伙为代表的瑞士，对中立地区作的一种象征

性的占領。而真正的瑞士，却不得不由于約翰·佩里埃的象征性地占領托农，而无休止地忙于外交上的道歉，向人保证忠誠和对該事表示憤慨，这样一来，当路易·波拿巴真正占領托农和其他中立地区的时候，才真正显得很慷慨大度了。

約翰·佩里埃在日內瓦被捕，在他的口袋里发现了数千法郎。由于佩里埃的誣指，副秘书长兼“日內瓦評論”編輯杜孔米恩先生也被逮捕。他是一个沒有私产的青年，上述两个职位都是靠国务會議主席和“評論”的老板詹姆斯·法济获得的。他承认給过佩里埃錢，那是从建立志願軍基金中挪用的，而日內瓦的激进主义者直到如今还不知道有这样一笔基金。法院偵訊的結果是，首先釋放了杜孔米恩，然后釋放了佩里埃。

3月24日，維克多-艾曼努尔正式把尼斯和薩瓦連同中立地区割让給波拿巴。3月29—30日，同法济一起从巴黎回到日內瓦的約翰·佩里埃发动了他的亚尔古船英雄的远征，在这决定性关头，这种滑稽的示威恰好妨碍了一切严肃的示威。詹姆斯·法济在伯尔尼保证說，“他对发生的事件一无所知”。^①萊蒂在原来的中

① 大家知道，由于北薩瓦被兼并以后，使日內瓦处在法国領土的包圍中，加以法国在托农灣的設防，近来大大加强了旧共和国的反波拿巴情緒。但是，在这种人民情緒真正爆发的同时，也出現了巴黎操纵的、部分为法国警察密探制造的假騷动。例如，在1860年9月22日的“星期六評論”⁵³⁵上可以看到：“一个笨拙的宪兵由于过分热心公务，在托农扣留了一帮所謂的瑞士人，要求他們出示护照，这些所謂的瑞士人就粗暴地侮辱帝国。这些带着完全穩妥的证件的瑞士人原来是法国人…… 在这些人为的冲突中，最令人深思的事实是，法济的一个最亲近的拥护者（朋友佩里埃）同一次最早的和最糟糕的冲突有极大的关系”（“The gravest fact relating to these artificial collisions is, that in one the earliest and the worst of them a close adherent of Mr. Fazy was prominently implicated”）。

立地区夸口說，如果瑞士人真的在这里进行攻击，那末他的皇帝会立即派三个师占領日內瓦。最后，福格特毫不知道这次亚尔古船英雄的远征的秘密，因为在发生这事的前几天，他就向日內瓦警察局告密，說日內瓦策划在薩瓦边界发动一次冲突，——但是給警察局的綫索是假的。关于这一点，我这里有流亡在日內瓦的、福格特的旧友給住在倫敦的一个流亡者的一封信可以說明。信里說：

“福格特散布謠言，說我不断地来往于瑞士西部和薩瓦之間，目的是要制造一次对瑞士有害而对敌視瑞士的国家有利的革命。这件事发生在佩里埃发动阴謀前不几天，这一阴謀，福格特肯定是知道的，而我却同您一样，毫无所知。显然，他企图嫁禍于我，使我毁灭。幸而他也是向警察局长杜伊告发我的，杜伊把我叫去，当他提出第一个問題时，我立即笑着打断他說：‘哈哈，这显然是福格特式的阴謀！’，这使他大为惊異。他让我更詳細地叙述我同福格特的关系。我的供述同时受到一个政府秘书的支持，这人是‘海尔維第’的成員，第二天他就到伯尔尼去参加中央會議，在那里他向福格特的弟弟表示他不滿意卡尔的行为。古斯达夫簡洁地回答說，他从福格特的信中早已看出福格特搞的政治活动是什么。”

如果說最初的沉默和否认以及宣傳信任路易·波拿巴，是为了要轉移瑞士对危险的注意；如果說后来关于要把佛西尼、沙布累和热涅瓦同瑞士合并的叫囂，是要散布法国兼并薩瓦的想法；最后，如果說托农的滑稽剧，是要破坏一切认真的反抗；那末，現在根据巴黎綱領来看，后来发生的真正兼并和变得明显的危险，归根到底則应成为瑞士自願投降，即成为同十二月政变帝国結盟的动因。

这样微妙的任务只有詹姆斯·法济本人才能解决。他的僕从福格特可以提出警告，防止同东方的联盟，但是，只有法济本人才能够捍卫同西方的联盟。他最初是在“日內瓦評論”上暗示了这种联盟的重要性。1860年4月18日，日內瓦流傳一封倫敦来信的

摘要,其中談到:

“請勸告我們的有勢力的同胞們当心詹·法济的建議,他可能建議瑞士放棄自己的中立。这个勸告很可能来自法国政府,詹姆斯·法济至今是它殷勤的代理人……現在他摆出一副善良的瑞士人的姿态同法国的計劃作斗争,但是,一个消息灵通的人士向我保证說,这是阴谋詭計。只要瑞士声明它既不願、也不能繼續作中立国家时,法国政府就会像第一帝国时期那样,采取行动迫使它結盟。”

法济在“日內瓦評論”上对此作了回答:

“当薩瓦归并于法国的那天,瑞士的中立就自行終止,因此,法济的这种勸告也就是多余的了。”

三个月以后,即7月10日,詹姆斯·法济在瑞士国民院发表的演說中证明,他

“一面怒罵和握紧拳头反对波拿巴主义的金融巨头和联邦的男爵們(他指責他們是 *le gouvernement souterrain* [地下政府]),一面走进了波拿巴主义的陣营”。

尽管他似乎极其尖銳地攻击了苏黎世一瓦得的公开亲法的政党,但是这个政党並沒有妨碍他叫囂。

“欧洲,特别是德国拋棄了瑞士。因此,中立已不可能;瑞士必須寻找联盟,但是,到哪里去找呢?”

于是,这位老蠢感家含糊其詞地提到了:

“近亲法国,只要它認識到并改正了非正义的行为,或許仍会成为共和国等等。但是,新政策不应由老朽的金融巨头和联邦的男爵来开始,而应当由海尔維第、由人民来实行。等着吧,即将举行的选举会教会你們該怎么办的。联邦軍队在日內瓦的出現只会受到欢迎。但是,如果他們的出現会使人对日內瓦現行政权机构产生絲毫的怀疑,那就讓他們走开,日內瓦会帮助自己并保护自己。”

于是，7月10日詹姆斯·法济便在国民院陈述了他4月18日在“日内瓦评论”上暗示过的东西——“新政策”，瑞士同法国的联盟，也就是十二月改变的法国兼并瑞士。消息灵通的瑞士人士认为，揭开法济从土伊勒里宫回来后带上的反波拿巴主义的假面具，还为时过早。但是，在玩弄故意信口开河的技巧方面，法济恰好达到了特别出众的足以与帕麦斯顿媲美的高深造诣。

大家知道，声名狼藉的«gouvernement souterrain»〔“地下政府”〕的代表们向国民院提交过一项对施坦普弗利的弹劾案，因为他作为联邦主席，了解情况正确，并且曾经作出过由联邦军队占领中立地区使其不受法国侵犯的正确决定。这项弹劾案被绝对多数否决，但其中并无福格特的一票。

当时有人从瑞士写信对我说：“对卡尔·福格特来说，他没有出席瑞士联邦院讨论对联邦主席施坦普弗利的弹劾案，是很能说明他的为人的。福格特是日内瓦州的代表，而当这个州受到波拿巴的威胁时，他不得不投票赞成坚决捍卫该州利益的施坦普弗利。此外，他本人同这个人有交情并且受过他的恩惠。福格特的父亲和两个兄弟靠在伯尔尼州供职维持生活；他的另一个兄弟新近借施坦普弗利的帮助得到了待遇优厚的联邦一等统计员的职位。因此，福格特当然不可能在记名投票时去反对一位朋友、恩人和有声望的人。另一方面，一位普隆-普隆主义者更不可能公开赞同与波拿巴主义的侵略计划进行殊死斗争的政策。所以，需要逃跑并把脑袋藏起来，但是肥大的屁股仍然露在外面挨揍：现代福斯泰夫的通常的巧计和尘世的命运就是如此。”

从土伊勒里宫发出的对“奥地利主义”的指责，詹姆斯·法济在“日内瓦评论”上，他的僕从福格特在俾尔“推销员”、“研究”和“主要著作”等等上对这种指责的大声重复，终于反跳回来打到瑞士自己身上。大约在4月中旬，米兰的所有墙上都出现了这样的

告示：“拿破侖和瑞士之間的爭執”。其中說道：

“看来，薩瓦对瑞士是一块美味，因而瑞士在奧地利的慫恿下，急忙出来在仅仅同意大利和法国有关的問題上阻碍拿破侖第三…… 英国和北方的一些大国，除奧地利外，一点也不反对兼并薩瓦；只有瑞士，因为受到力图在撒丁的所有联合領地上制造不安和騷动的奧地利的煽动，才表示反对…… 瑞士是一个反常的国家，它不可能长期抗拒偉大的民族原則的逼攻。德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不能服从一种千篇一律的常規。如果瑞士知道这点，那它就該想到，在德森州人們讲的是福斯柯洛和朱斯蒂的語言，那它就不該忘記，瑞士相当大一部分人屬於自称为法国人的那个偉大而慷慨的民族。”

看来，瑞士完全是奧地利的臆造。

虽然福格特本人在这样热衷于把瑞士从奧地利的魔爪中拯救出来，但也委托他的最亲密的同謀者之一、饒舌的士瓦本人、“殘闕”議会的傲慢議員、埃斯林根的卡尔·迈尔（現在是一家珠宝店的老板）去关心拯救德国的事。在圣布勒茲“王冠”酒館中举行的紐沙特尔德意志工人协会的授旗仪式上，这位演說家（“殘闕”議會議員和珠宝商人埃斯林根的卡尔·迈尔）号召德国

“干脆让法国人通过萊茵，因为否則德国的情况就永远不会好轉”。

参加授旗仪式的日內瓦工人协会的两个代表在新年（1860年）后回到日內瓦时，叙述了这件事。在他們的报告得到瑞士西部的其他一些协会的代表們的证实以后，日內瓦协会的領导机关分发了一个通告，要求大家警惕正在瑞士的德国工人中进行的波拿巴主义陰謀。

我不妨引用一下手头的一本筆記本：“回忆第一帝国，甚至那时就有些德国人竭力要促使建立拿破侖的世界統治，希望这个巨大的帝国随着它的統治者的沒落而灭亡，那时至少可以由分崩离析的法兰克帝国各省組成一个統一的德国，因而德国就能够較容易地为自己爭得自由，——这就是政治上的庸

医：为了使活的机体神奇地重新出现健康血液，就把原有的血液放尽；此外，人们指责了那些人，他们干脆否认一个伟大的民族有力量进行自卫并拥有自决权；最后，人们指出，德国期望的救世主已经在意大利出现，他懂得什么是民族解放等等。通告指出，它只是为那些目的良好而手段不当的德国人印发的；同时通告中声明拒绝同那些卖身求荣的政论家和沽名钓誉的旧人物发生联系。”

就在那时候，“海尔维第”的机关报“阿尔高消息报”⁵³⁶抨击了这样的

“逻辑：为要更快地捉住刺蝟并把它重新放掉，应当放它回到田鼠洞里去；根据这种完美的逻辑，为了使勒奥尼达斯们出现，也就应该让埃菲阿尔特们为所欲为。有这么一位名教授，他的做法就像本末倒置的维尔腾堡的乌尔利希公爵一样。这位公爵在骑士的马靴不想再理睬他以后，就想靠农民的‘鞋’从流放地回到家乡；不过，这位教授同鞋的关系已经恶化，因而就同马靴搞上了关系等等”。

对福格特教授先生的这种指责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刊登在“海尔维第”的机关报上。可是，他却因此受到了“希望报”⁵³⁷的更为热情的接待。“希望报”是法国国库出巨额资金于1859年在日内瓦创办的一家大型报纸。“希望报”的任务是宣传兼并萨瓦和莱茵区，颂扬路易·波拿巴的民族解放者的救世主使命。在日内瓦尽人皆知，福格特是“希望报”编辑部的 habitué [常客]，并且是它的最活跃的撰稿人之一。我手头就有详细材料，足以证明上述事实无可怀疑。福格特在他的“研究”中所指的，以及他让他的同谋者、饶舌的士瓦本人、“残阙”议会议员和珠宝商人埃斯林根的卡尔·迈尔在纽沙特尔公开宣布的东西，在“希望报”上有了进一步的发挥。例如，1860年3月25日那一期就这样说：

“如果德国爱国者把唯一的希望建立在对法战争上，那末他们有什么理

由去削弱那个国家的政府，阻止它取得它的自然疆界呢？也许，德国人民根本不赞同这样仇恨法国的吧？不管怎样，确实有一些极其真诚的德国爱国者，特别在最进步的德国民主主义者中间（即帝国的福格特、拉尼克尔、埃斯林根的卡尔·迈尔 tutti quanti [之流的人物]），他们并不认为丧失莱茵河左岸是巨大的不幸；相反地，他们确信，只有在丧失这些地区之后，依靠同欧洲西部的联盟并同欧洲西部的文明合为一体，复兴的德国的政治生活才会开始。”①

“希望报”从福格特那里如此确切地了解了最进步的德国民主主义者的观点之后，就在5月30日的社论中宣称：

“莱茵河左岸的全民投票即将表明，那里所有的人都是倾向于法国的。”

瑞士的讽刺性小报“波斯特伊里”正在不断恶毒嘲笑“希望报”这匹“瘦弱的驽马”，说它除了必须驮着巴考士普隆-普隆的轻巧的月桂冠以外，还得载上他的锡侖的“沉重的肚子”。

报刊如何精确地执行了波拿巴主义的策略，由下列事件可以看出。5月30日，日内瓦“希望报”号召通过全民投票将莱茵河左岸让给十二月政变的法国；5月31日，路易·茹尔丹在巴黎“世纪

① «Si la seule espérance des patriotes allemands est fondée sur une guerre avec la France, quelle raison peuvent-ils avoir de chercher à affaiblir le gouvernement de ce pays et l'empêcher de former ses frontières naturelles? Serait-il que le peuple en Allemagne est loin de partager cette haine de la France? Quoi qu'il en soit, il y a des patriotes allemands très sincères, et notamment parmi les démocrates les plus avancés, qui ne voient pas grand malheur dans la perte de la rive gauche du Rhin, qui sont, au contraire, convaincus que c'est après cette perte seulement que commencera la vie politique d'une Allemagne régénérée, appuyée sur l'alliance et se confondant avec la civilisation de l'Occident européen» («L'Espérance», 25 Mars 1860).

报”上展开了争取兼并莱茵的阵地战，6月初，“北部各省和加来海峡通报”把自己的重炮对准了比利时。在日内瓦的喉舌发出号召前不久，艾德門·阿布在“民論报”上声明，撒丁的扩张迫使皇帝不得不«de prendre la Savoie… c. à d. nous fermerions notre porte»[“占领萨瓦……换句话说，我們要关上自己的大門”]，他接着說，如果德国统一的企图导致普魯士的同样的扩张，«alors nous aurions à veiller à notre sureté, à prendre la rive gauche du Rhin, c. à d. nous fermerions notre porte»[“那末，我們將不得不考虑我們的安全并占领莱茵河左岸，换句话说，我們要关上自己的大門”]。这个輕率的守門人的追随者是头笨牛——“比利时独立报”⁵³⁸的阿·阿·通訊員，約瑟夫·普留东和坐鎮在土伊勒里宮的«Providence»[“天意”]的专职女巫一类人物。不过，“希望报”对德国统一所表示的与众不同的欢欣鼓舞，对那些卖身給奥地利的反对十二月的德国人所作的愤怒揭露，竟达到了令人头晕目眩的程度，以致詹姆斯·法济不得不作一定的外交上的考虑，并且还打算把他的“日内瓦評論”改为“瑞士民族报”，并特意在“評論”上慷慨大度地宣布，非奥地利人也可以反对波拿巴主义。

但是，卡尔·福格特——德国的这位达-达、为德国报刊設立的波拿巴招募局的老板、法济手下的走狗、罗亚尔宮的“令人喜欢的交談者”、普隆-普隆的福斯泰夫、拉尼克尔的“朋友”、俾尔“推銷員”的提詞人、“希望报”的撰稿人、艾德門·阿布的門徒、“劳斯之歌”的歌手——墮落得还要深些。在巴黎，他当着全世界的面，在“現代評論”上同爱德华·西蒙先生亲密合作。讓我們来看看，“現代評論”是什么貨色，爱德华·西蒙先生又是何等人物。

“現代評論”本来是波拿巴派的官方杂志，是完全同“两大陆評

論”⁵³⁹ 相對立的，後者的撰稿人是一些文筆優美的人，即“辯論日報”⁵⁴⁰ 的一些人、奧爾良派、聯合派以及 Collège de France 教授和 Membres de l'Institut⁵⁴¹。既然上述的最後那些官方人物不能直接調給“現代評論”，那就得設法把他們調離“兩大陸評論”，以這種迂迴辦法迫使他們為波拿巴派的“評論”服務。但是，這一策略並沒有取得應有的效果。“現代評論”的所有者甚至認為不能同拉·格隆尼埃爾先生強加於他們的編輯委員會共事。由於土伊勒里宮的能操腹語的人需要發出各種聲音的喉舌，所以“現代評論”變成了半官方的“評論”，而由拉·格隆尼埃爾強加的編輯委員會所編的“歐洲評論”⁵⁴² 則成了官方的“評論”。

現在來談談愛德華 [Edouard]·西蒙先生。他的出身是萊茵普魯士的猶太人，名叫愛德華 [Eduard]·西蒙，但他老是扮最滑稽的鬼臉，把自己裝成地道的法國人；然而不幸得很，他的風格卻時刻都在暴露出他是個譯成法文的萊茵普魯士的猶太人。

在席勒紀念會（1859年11月）以後不久，我在倫敦的一位熟人那里碰到了一個在巴黎住了多年的非常體面的商人，他詳細敘述了巴黎的席勒紀念會、席勒協會等等。我插嘴問他，巴黎的德國協會和會議怎麼同波拿巴的警察相處？他含着幽默的微笑回答我說：

“自然，沒有 *mouchard* [密探] 不出席的會議，沒有 *mouchard* 不參加的團體。為了避免麻煩，我們採取了一個一勞永逸的簡單策略，並且 *probatum est* [已經見效]——我們找來一個熟識的 *mouchard*，立刻把他選入委員會。在所有這類場合，我們總是認為我們的愛德華·西蒙最為合適。您知道，過去替拉馬丁跑腿，替艾米爾·德·日拉丹做夾肉麵包的拉·格隆尼埃爾，現在成了皇帝的寵臣，皇帝的機要文書，同時又是法國書報總檢查官。而愛德華·西蒙是拉·格隆尼埃爾的哈巴狗，〈他獨特地皺了一下鼻子

又补充說>一只臭气熏人的小狗。爱德华·西蒙——您当然不会把这一点归咎于他——不想 pour le roi de Prusse〔白白地〕工作。他认为，只要投身十二月政变制度，对他本人和文明都是无可估量的贡献。这是一个头脑简单、性格卑劣的家伙，但是，他并不缺乏在某些方面策划低级阴谋的能力。拉·格隆尼埃尔已叫他的爱德华·西蒙也去撰写‘祖国报’的社论。这就证明这位机要文书颇有谋略。‘祖国报’的老板、银行家德拉马尔是一个傲慢、固执、小狗一样的 parvenu〔暴发户〕，除了最善于谄媚的人以外，他容不了别的人在一个办公室里同他办公。我们的爱德华·西蒙，尽管他有毒鼠药，但能够像安哥拉猫那样温顺，因此正好合适。如您所知，‘祖国报’在共和国时期是普瓦提埃大街543的最无耻的机关报之一。从十二月政变开始，它就同‘国家报’544和‘立宪主义者报’争夺作为土伊勒里宫的半官方报纸的荣誉，事情刚露苗头，它就为开展狂热的兼并活动做了不少工作。您当然知道，有些乞丐为了从过路人那里骗取几个苏，就躺在街上装发羊癫疯。‘祖国报’确实获得了首先报道萨瓦和尼斯将被兼并一事的荣誉。兼并刚一实现，该报的版面就立即扩大了，因为，按德拉马尔先生所作的天真的解释：«La Savoie et le comté de Nice ayant été annexés à la France, la conséquence naturelle est l'agrandissement de la Patrie»〔“萨瓦和尼斯伯国划归法国的必然结果是祖国①的扩大”〕。谁都会由此想起巴黎一个玩世不恭的人的戏谑，他在回答«Qu'est-ce que la patrie?»〔“什么是祖国”〕这一问题时，毫不犹豫地說：«Journal du soir»〔“一家晚报”〕。如果莱茵河各省一旦被兼并，‘祖国报’和它的版面以及爱德华·西蒙的 salaire〔工资〕，还不知要扩大到什么地步呢！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祖国报’认为废除 tourniquet de la Bourse〔交易所行情表〕是拯救法国的办法，这样可以使交易所的、也就是全国范围的交易重新达到所希望的高峰。爱德华·西蒙也热中于废除 tourniquet de la Bourse，但是，我们的爱德华·西蒙不仅是‘祖国报’社论的作者和拉·格隆尼埃尔的哈巴狗。他是新耶路撒冷的、alias〔或者说〕警察局长的、尤其是帕勒斯特林纳先生的最忠实的朋友和告密者。总之，先生们，〈讲述人最后說〉只要有爱德华·西蒙先生参加的委员会，该委员会就会发出浓郁的警察气味。”

① 文字游戏：«Patrie»意思是“祖国”，也是报纸的名称。——编者注

……先生这时发出了一种格外刺耳的笑声，仿佛在 *odeur de mauvais lieu* [臭气] 和爱德华·西蒙先生之間存在某种完全无法形容的秘密关系。

金累克先生曾經要下院注意十二月代理人所特有的那种外交职能、警察和报刊的令人快意的混淆（1860年7月12日的下院會議）。**爱德华·西蒙先生**，——当然不应当把福格特的远近聞名的^① **爱德华**同福格特的温存的**庫尼貢达**，*alias* [或者說]特利尔的路德維希·西蒙^②混淆起来，——**爱德华·西蒙先生**，即拉·格隆尼埃尔的哈巴狗、德拉馬尔的獅子狗、帕勒斯特林納的密探和一切人的看家狗，显然即使不屬於乳脂，無論如何也屬於十二月十日的灵堡的干酪，屬於第二圈的人物，那里

«s'annida

Ipocrisia, lusinghe, e chi affatura,

Falsità, ladroneccio, e simonia,

Ruffian, baratti, e simile lordura».^③

卡尔·福格特在出版“主要著作”好多个星期以前，就吩咐他的**爱德华·西蒙**在法国报刊上对该书加以評論。**爱德华·西蒙**是

① 文字游戏：«*ruchbar*»意思是“远近聞名的”，也有“发出气味的”意思。——編者注

② 通过温存的庫尼貢达，我的故乡特利尔的一家小报上出現了某种福格特式的攻击我的东西，其中談到我同“总汇报”的“肉体上的接近”。对純洁的庫尼貢达來說，会产生什么样的联想啊！*Very shocking indeed!* [真是有伤大雅！]

③ “集居着
 伪善者，諂媚者，妖术感人者，
 盜窃者，买卖圣职者，詭計多端者，
 欺詐者，誘淫者等等卑鄙齷齪的人”。

（但丁“神曲”地獄篇第十一首歌。）——編者注

适于扮演 *double emploi* [双重角色] 的。首先他私下給拉·格隆尼埃尔先生介绍了“主要著作”的内容，然后就这个机会由他的庇护人派他去“现代评论”工作。“现代评论”编辑部曾经恭顺地提出要求，希望爱德华·西蒙在该报发表文章时至少不要署名，但这种希望落了空。拉·格隆尼埃尔是毫不容情的。爱德华·西蒙在1860年2月15日的“现代评论”上，以论述他的朋友福格特的文章初露头角，这篇文章的标题是《*Un tableau de mœurs politiques de l'Allemagne. Le procès de M. Vogt avec la Gazette d'Augsbourg*》（“德国的政治风俗画。福格特先生对‘奥格斯堡报’的诉讼”），文章的署名是爱德华·西蒙。

这个“罗曼人”爱德华·西蒙不认为：他“为要当一个善良的法国人，就必须辱骂高贵的日耳曼种族”（“现代评论”，同上，第531页），但是，作为“善良的法国人”和“天生的罗曼人”，他至少必须表现他对德国事物是天生的无知。他在论及他的卡尔·福格特时这样说：“他曾经是短命帝国的三摄政之一。”^① 爱德华·西蒙先生当然想不到，*in partibus* [非现实的]^② 帝国在五巨头的统治下呻吟，相反地，“作为法国人”，他以为，既然科伦有三个圣王⁵⁴⁵，就要配上斯图加特的三个议会帝国摄政，这样才能相称。“朋友”福格特在“主要著作”中使用的俏皮话，“常常是远远不符合法国人的口味的”^③。法国人爱德华要补救这一点，并且“要尽力进行淘汰”^④。

① 《Il fut un des trois régents de l'empire éphémère》 (l. c., p. 518).

② *in partibus infidelium* 直译是：“在异教国家中的”。天主教主教被任命为非基督教国家的纯粹有名无实的主教时，在其头銜上添有这种字样。——编者注

③ 《Il dépasserait le but au goût des Français》 (l. c., p. 519).

④ 《Nous nous efforcerons de choisir》 (l. c.).

“朋友”福格特生来就喜欢“鮮艳刺目的色彩”，“在用語方面就不是那么細致入微的”^①。当然罗！“朋友”福格特本来只是一个被人兼并了的德国人，就像达-达是一个被人兼并了的阿拉伯人一样，而爱德华·西蒙則是一个天生的“善良的法国人”和地道的“罗曼人”。奥尔格斯先生和迪策尔先生在詆毀“罗曼种族”时，也曾达到过这等地步嗎？

爱德华·西蒙先生为了給他的上司解悶，所以在巴黎讀者面前描述德国的“三个”殘余圣王之一，并且在这个德国的殘余圣王的同意和吩咐之下，把他描繪成跟在加西莫多帝王的凱旋战車之后的志願战俘。爱德华·西蒙在引证福格特的“主要著作”的一段引文时說：

“可見，福格特先生很少关心締造德国統一的帮助来自何方，只要有人帮助就行了；在他看来，甚至让法兰西帝国来促成他所希望的解决办法，那是最合适的。也許福格特先生在这种情况下廉價(?)出賣了他的过去，而法兰克福議会中跟他一同坐在极左席的老同事們也必然会感到奇怪，为什么这位一切統一政权的死敌，这位无政府主义的热烈拥护者，竟对在法国打败了无政府主义的一位国君表示如此热烈的同情。”^②

① «M. Vogt aime beaucoup les couleurs tranchantes, et il n'est pas précisément un gourmet en matière de langage» (l. c., p. 530).

② «On le voit, M. Vogt se souciait peu d'où vint le secours en faveur de l'unité allemande, pourvu qu'il vint; l'empire français lui semblait même singulièrement propre à hâter le dénouement qu'il désire. Peut-être en cela M. Vogt faisait-il bon marché de ses antécédents, et il dut paraître étrange, à ses anciens collègues qui siégeaient avec lui à l'extrême gauche dans le Parlement de Francfort de voir ce fougueux antagoniste de tout pouvoir unique, ce fervent zéléteur de l'anarchie manifester de si vives sympathies envers le souverain qui l'a vaincue en France» (l. c., p. 518).

爱德华把“流亡的帝国摄政”从法兰克福议会的不“坚定的”左翼换位到极左翼。投票赞成“德国世袭帝王”的人变成了“一切统一政权的死敌”，在法兰克福的各式各样的酒馆党之间宣传必须以任何代价保证“秩序”的中央三月同盟的成员则变成了“无政府主义的热烈拥护者”。这一切都是为了适当突出十二月十日制度在“流亡的帝国摄政”身上猎取到的东西。福格特先生对“在法国打败了无政府主义的那个人”的“如此热烈的同情”就更加有价值了，他供认“让法兰西帝国来缔造德国统一最合适”就更加可贵了，“朋友”西蒙的笨拙的暗示，即“朋友”福格特“也许廉价 (de bon marché) 出卖了他的过去”，就是说，无论如何十二月政变的英雄没有为他付出“太高的代价”，也就更加可以理解了。为了让上峰毫不怀疑“朋友”福格特现在像“朋友”西蒙一样忠实可靠，爱德华·西蒙先生搓着手，眨着左眼，微笑着说：福格特是热衷于秩序的，“如果他对福格特先生了解正确的話，他甚至向日内瓦当局报告过革命的阴谋哩”，这同爱德华·西蒙先生向帕勒斯特林纳先生和拉·格隆尼埃尔所“报告”的一样。

大家都知道，阿布、茹尔丹、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博尼法斯、霍夫曼博士、“希望报”的修道士、“民族报”的骑士、“民论报”的慫恿者、“独立报”、“纪事晨报”、“窝州新闻”等的 penny-a-liner [不值钱的文人]、拉·格隆尼埃尔和西蒙之流的人物、文书、文明传播者、十二月政变的卫士、普隆-普隆主义者、丹屠主义者和拔牙的，所有这一帮人都毫无例外地从同一位圣上的金庫中汲取灵感。这样，达-达福格特就不是一个孤军作战、自行其是的游击队员，而是一个接受津贴、受人教诲、整编入队、与流氓为伍、联合了爱德华·西蒙、归服于普隆-普隆、并且跟他一同被捕一同被绞死的人

物。請問：是否有人付給卡尔·福格特代理人活動費呢？

“如果我沒有弄錯，用金錢或別的利益促使人的言行違背他的信念，就是收買。”（“主要著作”第 217 頁）

普隆-普隆主義就是福格特的信念。因此，即使有人付給福格特現金，那他也決不是被收買。不過，硬幣上的花紋並不像支付方式那樣花樣繁多。

誰知道，普隆-普隆是否已答應他的福斯泰夫擔任賓根之穴的鼠塔⁵⁴⁶的指揮官呢？或者，當阿布在自己的小冊子“一八六〇年的普魯士”里迫使法國自然科學家爭辯同活着的福格特和死去的迪芬巴赫同時通訊的榮譽之後，已答應任命他為研究院的通訊院士？或者，恢復福格特的帝國攝政的職位？

我確實知道，傳聞常把事物變得更加平淡無奇。因此，“同 1859 年以來發生的轉變同時”，據說“令人喜歡的交談者”（不久前還是一個因徹底破產而受到刑事偵查的股份公司的領導人）的事業中也發生了轉變；謹慎的朋友們企圖用下面的話來解釋這件事，即意大利的一個礦業股份公司，鑑於福格特在“礦物學方面”的功勳，贈給他巨額股票，他第一次在巴黎逗留時，就把它們兌換成現金。一些彼此不相識的知道內幕的瑞士人和法國人，幾乎同時寫信對我說，“令人喜歡的交談者”在某種程度上擔任着尼翁（在瓦得）近郊的“拉·貝爾熱里”地產（普隆-普隆為都靈的伊菲姬尼亞^①購買的原屬於一位寡婦的一所府邸）的總監督，報酬相當優厚。我知道有一封信，在這封信中，一位在“1859 年的轉變”後很長時間同福格特過從甚密的“新瑞士人”，在 1860 年初向普·勃·

① 馬克思指撒丁國王維克多-艾曼努爾的女兒克洛蒂爾達。——編者注

勃·先生(住在倫敦芬切尔奇街78号)提到一笔很大的款項,这笔款項是他过去的朋友不是当做賄賂而是当做預支从巴黎中央金庫領取的。

这类的和更坏的傳言流到倫敦,不过,我不认为这些傳言有什么意义。我宁願相信福格特所說的下面的話:

“我(福格特)从何处拿到錢,与任何人无关。我今后仍将努力謀取达到我的政治目的所需要的錢,由于意識到自己的事业的正义性,我今后仍将从我能够拿到錢的地方拿錢”(“主要著作”第226頁),

可見,也包括从巴黎中央金庫拿錢。

政治目的!

«Nugaris, cum tibi, Calve,

Pinguis aqualiculus propenso sesquipede extet». ①

真是太妙了!这是德国人对粗卤的唯物主义的英国人所称为«the good things of this world»〔“現世的福利”〕的唯心主义的說法。

福格特在同一本“主要著作”中,在結束他的关于硫磺帮等等的荒誕故事时同样庄严地宣称:

“現代史的这一段时期就此告一段落。这里我所讲的决不是空洞的幻想;这純粹是事实。”(“主要著作”第182頁)

不管医学博士沙伊伯勒怎么想:福格特这样說,人們为什么不相信他呢?为什么他的代理人活动,不应当像他在“主要著作”中所談到的事实那样純洁呢?

① “你写的全是胡言乱語,禿子,

而且搭拉着你那鼓得过分的肚子”。

(柏西阿斯的第一首諷刺詩)。——編者注

可是我却坚信，与十二月帮的所有其他搞写作的、搞鼓动的、搞政治的、搞秘密活动的、搞宣傳的、吹牛皮的、搞普隆-普隆活动的、謀害别人和毀了自己的那些成員不同，只有福格特才独一无二的把他的皇帝看做是一个«l'homme qu'on aime pour lui-même» [“人們看在他本人面上才喜欢他的人”]。

沃尔弗拉姆·馮·埃申巴赫說：«Swerz niht geloubt, der sündet» [“誰不信仰，誰就有罪”]^①；或者像一支現代歌曲中所唱的：“誰不相信，誰就胡塗”。

① 沃尔弗拉姆·馮·埃申巴赫“巴齐法尔”第9册。——編者注

十 庇护人和同謀者

Principibus placuisse viris non
ultima laus est.

〔博取权貴的欢心，并非无上的荣誉。〕^①

作为自己«good behaviour»〔“品行端正”〕的見证人，前帝国的福格特提出了

“科苏特”和“另外两个人——日内瓦的复兴者法济和科莫恩的保卫者克拉普卡”，他都可以把他們“自豪地称之为自己的朋友”（“主要著作”第213頁）。

我称他們为他的**庇护人**。

在科莫恩战役（1849年7月2日）之后，戈爾蓋達抗匈牙利政府把他撤职的命令，篡夺了匈牙利军队的最高指揮权。

拉品斯基上校在还是科苏特的追随者时所写的书中說：“如果有一位精力充沛的人物领导政府，那末，戈爾蓋的一切阴谋当时就完蛋了。科苏特只需去軍营向军队讲几句话，戈爾蓋的威望就挽救不了自己的垮台……但是，科苏特没有去，他缺乏公开出面反对戈爾蓋的勇气，他在密謀反对这位將軍的时候，却企图向世人为对方的过失辯解。”（泰·拉品斯基“匈牙利主力軍的进军等等”⁵⁴⁷第125、126頁）

^① 賀雷西“书信集”第2册第十七封信。——編者注

科苏特自己承认，戈尔盖对他的蓄謀叛变，是盖昂將軍在若干时日之后正式向他告发的。（見戴維·烏尔卡尔特“居塔希亚的匈牙利流亡者訪問記”）

“誠然，科苏特在塞格得发表的一篇漂亮的演說里讲过，如果他知道有叛徒，那他会亲手杀死他，他指的大概就是戈尔盖。但是，他不仅沒有实现这次多少有些戏剧性的威胁，甚至沒有向他的任何一个部长提过他所怀疑的人；当他同几个人布置反对戈尔盖的可怜的計劃的时候，他同时总是怀着极大的尊敬談起他，甚至于給他本人写措辞极为温和的信。当眼見只有推翻一个危險人物才能拯救祖国时，怎么能够在企图用顫抖的手把他收拾掉的同时，又扶持他，用自己的信任給对方招徠追随者和崇拜者，甚至把全部权力都交到对方手里呢？也許有人能理解这一点，不过我不能。就在科苏特以这种可怜的方式时而贊助、时而反对戈尔盖的时候…… 戈尔盖却比他彻底和坚决地在实现他那陰險的計劃。”（泰·拉品斯基，同上，第 163—164 頁）

1849 年 8 月 11 日，科苏特按照戈尔盖的**命令**发表了一份公开的辞职声明（据称是在阿腊德要塞发表的），把“政府的最高軍政权力”交給戈尔盖，并且宣称：

“最近上帝作为对我国人民的懲罰而使我們在战争中失利后，我們对联合起来的两大强国繼續进行自卫斗争已无获得胜利的希望。”

科苏特在声明的开头就宣布匈牙利的事業已**无可挽救地**毁灭，——并且說成是**上帝的懲罰**，接着便在声明中要戈尔盖“适当地利用”科苏特托付給他的权力，“**向上帝負起拯救**”匈牙利的“責任”。他把匈牙利交給戈尔盖，对他可謂信任之至，但是不把自己托付他，对他可又算信任得太少。他本人对戈尔盖是极不信任的，因而他安排好，在戈尔盖收到他的辞职声明时，他也正好到达了土耳其国土。所以，他的声明是用这几句話結束的：

“只要我的死能对祖国有所裨益，那我将欣然献出我的生命。”

但是，他当做祭品献到祖国祭坛上的，送到戈尔盖手里的，只是执政者的权力，然而他立即在土耳其人的保护下重新篡夺了执政者的称号。

在居塔希亚，这位 in partibus [非现实的] 执政者閣下得到了帕麦斯顿提交議会的关于匈牙利惨剧的第一部藍皮书⁵⁴⁸。他在給戴·烏尔卡尔特的信中写道：他研究了这些外交文件之后，他确信，“俄国在每一个国家的內閣中都安插有自己的奸細，甚至还有自己的代理人”，而帕麦斯顿为了俄国的利益出卖了 dear Hungary [亲爱的匈牙利]。^① 不过当他在南安普頓踏上英国土地时，他向公众說的第一句話却是：«Palmerston, the dear friend of my bosom!» (帕麦斯顿，我亲爱的摯友!)

科苏特在土耳其被拘期滿以后，就搭船前往英国。在途經馬賽时(不过，他没有被允許上岸)，他发表了一篇以法国社会民主主义精神和風格写的声明。踏上英国的領土之后，他立即否认了

“这种新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学說，这一学說無論正确与否，人們都认为它是同社会秩序和财产的不可侵犯性不相容的。匈牙利没有理由也不希望同这些学說有任何瓜葛，原因极为簡單：在匈牙利没有它們存在的条件和絲毫理由。”(請把这番話同馬賽通信比較一下)

他在英国逗留的头两个星期里，每接見一次人，就改变一次他

① 科苏特当时不理解：帕麦斯顿所玩弄的敌視俄国的把戏怎么“能够”欺騙一个具有正常理智的人。«How could a man of any intellect for a single moment believe that the Minister who allowed Russia's intervention in Hungary, would give the word of attack against her?» [“一个稍微有点头脑的人怎么能够相信——即令是一霎时的相信——，一位曾經听任俄国干涉匈牙利的部长，会下令进攻俄国呢?”] (1850年12月17日发自居塔希亚的信。“科苏特通信集”。)

的信條。卡季米尔·鮑蒂揚尼伯爵是这样說明他当时与科苏特公开决裂的理由的：

“促使我采取这一步驟的，不仅是他获得自由后的两个星期內所犯的 *bévue* [过失]，还有我积累的全部經驗以及我先在匈牙利后在流亡中所看到的、所容忍的、所应允的、所忍受的、以及——正如您能想起来的——所掩盖的、所隱瞞的一切，一句話，使我对这个人形成一种确定不移的看法的一切决定了我这样做…… 請允許我指出，科苏特先生在南安普頓、威茲比奇或倫敦，簡言之在英国曾經說的或者可能說的話，都不能使人忘記他在馬賽說的話。在‘年輕的巨人’之国〈美国〉，他又會唱另一种調子，因为，他在別的事情上也是毫无节操的 (*unscrupulous*)，而且像一根蘆葦，風勢一大就弯了下去，因此他 *sans gêne* [滿不在乎地] 背棄自己說的話，并且毫不迟疑地用他所断送的死者的偉大名字，例如用我可怜的堂弟路德維希·鮑蒂揚尼的名字来掩飾自己…… 我可以毫不迟疑地說，在科苏特还未离开英国之前，由于你們向这样一个渺小的人物 (*a most undeserving heart*) 濫加尊敬，你們将因而感到遺憾。”（“科苏特通信集”，鮑蒂揚尼伯爵給烏尔卡尔特先生的信，1851年10月29日于巴黎）

科苏特在美国的时候，到北部他表示**反对**奴隶制，到南部表示**贊成**奴隶制，他那巡迴演出遺留下來的，除了異乎尋常的失望和三百具演說的殘骸外，別无他物。抛开这段奇特的軼事不談，我只想指出，他向侨居美国的德国人，而主要是向德国的流亡者，大力推荐成立一个德国、匈牙利和意大利之間的同盟，但不包括法国在內（不仅不包括政变政府，而且根本不包括法国，甚至不包括法国流亡者及其所代表的法国政党）。他在回到倫敦之后，立刻企图通过一位形迹可疑的人物——西尔莫伊伯爵和在巴黎的基什上校，同路易·波拿巴接触。（見1852年9月28日我給“紐約每日論壇報”的通訊和1852年11月16日我在該報的声明⁵⁴⁹）

1853年，当米兰发生馬志尼策划的暴动时⁵⁵⁰，这座城市到处

張貼了致駐当地的匈牙利軍隊的告示，号召他們參加意大利起义者的行列。告示的署名是：路德維希·科苏特。可是，当起义者失敗的消息剛一傳到倫敦，科苏特就急忙通过“泰晤士报”和其他的英国報紙声明說，这一告示是**伪造的**，这样他就向公众揭露他的朋友馬志尼在說謊。可是，告示是**真实的**。馬志尼从科苏特那里收到这一告示，有科苏特亲笔写的告示的手稿，并且是在科苏特的贊同下才張貼的。馬志尼认为，要推翻奧地利在意大利的暴力統治，意大利和匈牙利必須統一行動，馬志尼起初想用一個更忠實可靠的匈牙利領袖來代替科苏特；但是，当他的企图由于匈牙利流亡者內部的不和而告失敗之后，他寬宥了这位不可靠的盟友，并且寬宏大量地沒有揭露事实的真相，否則，科苏特在英国就会身敗名裂。

大家知道，俄土战争也爆发于1853年。1850年12月17日，科苏特从居塔希亚写信給戴維·烏尔卡尔特說：

“沒有土耳其的統治权，土耳其就将不复存在。而在現時情况下，土耳其对世界自由來說是絕對必需的。”

他在1851年2月15日写給土耳其宰相列施德-帕沙的信里，他的亲土耳其的情緒更加热烈了。他夸夸其談地表示願为土耳其政府效劳。1852年1月22日，当他在美国旅行时，他写信給戴·烏尔卡尔特說：

“您是最理解土耳其和匈牙利的利益是一致的，因此您是否同意維護我在君士坦丁堡的事情？我在土耳其逗留期間，土耳其政府并不知道我是什么人；英国和美国对我的接待以及由于幸运，我甚至想說由于天意使我現在得到的地位，都应当能够向土耳其政府表明：我是土耳其及其未來的一位誠摯的、也許不无影响的友人。”

1853年11月5日，他向克羅謝先生（烏尔卡尔特分子）书面

建議作为土耳其的同盟者到君士坦丁堡去，不过“不是空着手去”（«not with empty hands»），因此，他請求克罗謝先生

“采取私下請求那些乐于相助的自由派人士的办法”，

为他募集款項。

他在这封信里說道：“我憎恨并蔑視制造革命的伎倆”（«I hate and despite the artifice of making revolutions»）。但是，他在烏尔卡尔特分子面前吐露对革命的憎恨和对土耳其人的热爱时，又同馬志尼一道发表宣言，要求把土耳其人逐出欧洲，并把土耳其变成一个“东方的瑞士”，同时在所謂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⁵⁵¹的呼吁书上签名，号召进行革命。

由于科苏特不到 1853 年底就把他于 1852 年在美国用匈牙利名义进行招搖撞騙弄来的錢揮霍一空，同时，克罗謝先生对他的恳求又置若罔聞，所以，这位执政者放棄了他对君士坦丁堡的俠义的拜訪，然而，他派了他的代理人約翰·班迪亚上校^①带着他全力的

① 我本人于 1850 年在倫敦認識了班迪亚和他当时的一位朋友——現在的图尔將軍。他把科苏特亲自弄的证明书給我看，这样他就用簡單的方式打消了我由于他同各式各样的党派——奥尔良派、波拿巴派等——玩弄騙局以及同各个“民族”的警察交往而产生的怀疑。按照这份证明书，他这位早已是克拉普卡手下的科莫恩的临时警察总监，現在被任命为 *in partibus* [非現實的] 警察总监。他作为为革命服务的警察局的秘密首长，自然应当有一条“公开的”門路通向为各国政府服务的警察局。1852 年夏天我发现，他把我托他轉交給一个柏林书商的手稿藏起来，并把它交給了一个德意志邦政府⁵⁵²。当我把这件事以及这个人的其他一些早已引起我注意的特点写信告诉了住在巴黎的一位匈牙利人，以及班迪亚之謎由于消息相当灵通的第三者的参与而被彻底解开时，我便于 1853 年初給“紐約刑法报”寄去一篇由我署名的公开揭露他的文章⁵⁵³。在我至今还保存着的一封信中，班迪亚說，我把他看成間諜是最沒有理由的，因为他一直（这也是事实）避免同我談論有关我党內部的問題。尽

推荐信到那里去。

1858年1月20日，軍事法庭在切尔克西亚的阿迭尔比进行了审讯。尽管法庭“根据穆罕默德-貝伊，即从前伊洛施法耳瓦的約翰·班迪亚的招认和证人的证詞，犯有背叛国家和私通敌人（俄国將軍菲力浦逊）之罪”，一致判决其死刑，然而，这絲毫沒有妨碍他直到此刻仍旧安然地住在君士坦丁堡。班迪亚在他以书面形式交给軍事法庭的供认里还这样說：

“我的政治活动完全受我国的領袖路德維希·科苏特的指揮…… 1853

管科苏特和他的追随者当时沒有同班迪亚断絕往來，然而，我在“刑法报”上的揭发毕竟对他后来在倫敦的行动有所不便，因而，他就更加乐于抓住东方的混乱提供給他的机会，以便在另一个天地中施展他的天才。巴黎和約（1856年）締結后不久，我在英国的报纸上看到，土耳其軍隊的一个上校穆罕默德-貝伊，即从前以約翰·班迪亚知名的一个基督教徒，同一些波兰流亡者从君士坦丁堡乘船前往切尔克西亚，他在那里是塞弗尔-帕沙的总參謀长并且似乎成了切爾克斯人的“西蒙·玻利瓦尔”。我在倫敦“自由新聞”上点出了这位解放者的历史⁵⁵⁴，这家报纸在君士坦丁堡有很大銷路。如正文所指出的，1858年1月20日，班迪亚因图謀叛变切尔克西亚，由泰·拉品斯基上校指揮的波兰軍团的軍事法庭在阿迭尔比判决死刑。由于班迪亚是土耳其的上校，塞弗尔-帕沙认为执行这一判决同对土耳其政府的尊重是不相容的，因此，他把这个罪犯送往特拉比曾德，不久以后，罪犯从該地获釋又回到了君士坦丁堡。在此期間，君士坦丁堡的匈牙利流亡者在为班迪亚热情辯护，攻击波兰人。由于俄国公使館的保护，班迪亚沒有受到土耳其政府御前會議（而且它还得把他当做“上校”和他的妻妾一起加以供养）的追究，由于他的同胞們对波兰人所持的偏見給他的保障，他极为冷靜地在“君士坦丁堡报”⁵⁵⁵上发表了一篇自我辯护书。然而很快来了一个切尔克西亚代表团，把这出戏收了場。匈牙利流亡者正式拋棄了他們的被保护者，尽管是 *de très mauvaise grâce* [非常不乐意]。阿迭尔比軍事法庭的全部公文，其中包括班迪亚的自供和后来在君士坦丁堡交换的文件，都由那里的波兰流亡者寄到了倫敦，并摘要登載在倫敦的“自由新聞”（1858年5月）上。我还将这些文件更为詳細地发表在1858年6月16日“紐約論壇报”上⁵⁵⁶。

年12月22日，我帶着我的政治領袖的介紹信來到君士坦丁堡。”

他往下敘述他後來成了伊斯蘭教徒，並參加土耳其軍隊當了上校。

“根據〈科蘇特〉給我的指示，我必須設法打進派往切爾克西亞沿岸地區作戰的部隊。”

在那里，他必須設法阻止切爾克斯人參加反對俄國的戰爭。他勝利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並在戰爭快結束時從君士坦丁堡寄給科蘇特一份“有關切爾克西亞情況的詳細報告”。他在同波蘭人一起再度出征切爾克西亞以前，接到科蘇特的一項命令，要他同給他明確指定的那些匈牙利人，其中有施泰因將軍（費爾哈德-帕沙），共同行動。

他說：“俄國公使的軍事秘書弗蘭基尼上尉，參加過我們的幾次會議，我們的目的是用和平、緩慢、然而可靠的方法把切爾克西亞拉到俄國人那方面去。在遠征隊離開君士坦丁堡以前（1857年2月中），我接到了科蘇特的來信和指示，他贊同我的行動計劃。”

在切爾克西亞，由於截獲了班迪亞給俄國將軍菲力浦遜的信件，他的叛賣活動被發覺了。

班迪亞說：“根據給我的指示，我必須同一位俄國將軍建立聯繫，我很久都不敢這樣做，但是，最後我接到了非常明確的 *ordres*〔命令〕，使我不敢再猶豫不決。”

阿迭爾比軍事法庭的審訊，特別是班迪亞的自供，在君士坦丁堡、倫敦和紐約引起了極大的轟動。人們一再堅持（而且匈牙利人也是如此）要科蘇特公開解釋，但是毫無結果。直到現在，他對班迪亞在切爾克西亞的使命一事，仍然怯懦地保持沉默。

1858年秋，科蘇特在英格蘭和蘇格蘭到處演講，廉價兜售他

那反对奥地利宗教条约⁵⁵⁷和路易·波拿巴的主張。他要英国人提防他称为俄国的秘密盟友的路易·波拿巴的叛卖計謀，那时他是何等狂热，可以从——例如“格拉斯哥哨兵”（1858年11月20日）上看出来。1859年初，当路易·波拿巴暴露了自己的意大利計劃时，科苏特在馬志尼的“思想和行动”上揭发了他并且要“所有真正的共和主义者”——意大利人、匈牙利人、乃至德国人，不要为这位加西莫多帝王火中取栗。1859年2月，科苏特肯定說，早就属于罗亚尔宫紅色宫廷奸党的基什上校、泰列基伯爵和克拉普卡將軍同普隆-普隆拟定了密謀在匈牙利发动起义的計劃。科苏特威胁說，如果不让他加入这一“秘密同盟”，他就要在英国报刊上发起一場公开辯論。普隆-普隆十分願意为他敞开教皇选举会的大門。5月初，科苏特带着英国护照、化名布朗先生前往巴黎，他急忙赶赴罗亚尔宫，向普隆-普隆詳尽地叙述了他要在匈牙利发动起义的計劃。5月3日晚上，“紅色亲王”用自己的专車把这位前統治者带进了土伊勒里宫，要在那里把他介紹給社会的救星。在同路易·波拿巴会晤时，科苏特一向能言善辯的舌头突然失灵了，因此普隆-普隆只得代他說話，在某种程度上向堂兄陈述了他的綱領。科苏特后来对普隆-普隆几乎一字不差的忠实轉述贊許不已。路易·波拿巴聚精会神地听完了堂弟的陈述之后說：只有一个障碍使他不能接受科苏特的建議，即科苏特的共和主义原則及其同共和派的联系。作为对此的答复，前統治者极其庄重地放棄了共和主义的信念，同时肯定地說，他現在不是、而且从来就不是共和主义者；仅仅是由于政治上的必要和各种情况的特殊凑合，他才不得不参加了欧洲流亡者的共和派。为了证明自己反对共和主义，科苏特以他的国家的名义把匈牙利的王位奉献給普隆-普隆。这

个王位当时还没有廢除。尽管科苏特并不享有拍卖王位的公认的全权，不过，誰要是对他在国外言論經常稍加注意的話，誰就会知道：他早已习惯于像閉塞的容克地主談論他的庄园那样談論他的«dear Hungary»〔“亲爱的匈牙利”〕。^①

科苏特放棄他的共和主义信仰一举，我认为是真心誠意的。他在佩斯要求发給他 30 万弗罗倫皇室費来維持他的行政权的显赫外表；把从前屬于一位奥地利大公夫人的医疗机构交給他自己的妹妹掌管；企图使几个团队用科苏特的名字命名；渴望成立一个宮廷奸党；到了外国却頑固地抓住他在危險时刻所放棄的执政者头衔；他后来的言行，与其說像一个流亡者，倒不如說像一位王位追求者——所有这一切傾向都是同共和主义格格不入的。

洗去科苏特先生身上的共和主义嫌疑的好戏收場之后，照協議付給他 300 万法郎。这样一个協議是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既然要把匈牙利流亡者像軍隊一样組織起来，那就得花錢，既然欧洲所有专制国家在整个反雅各宾战争中都拥有权接受英国的資助，那为什么这位执政者就无权接受他的新盟友的資助呢？作为个人开銷的預支，科苏特立刻得到 5 万法郎，此外，还議定另付相当数量的款項，作为万一战争提前終止时的一种保險費。財政上的远见和傳奇式的敏感是絕不相互排斥的。要知道，早在匈牙利革命期間，科苏特就已明智地想到——他的前財政部长杜舍克当然知道这件事——不領取科苏特紙币，而要銀币或奥地利鈔票。

科苏特离开土伊勒里宮以前，就商定了他要在英国掀起一个

① 这种事情为众人所知是不足为奇的，特别是因为参加这次会晤的至少有两方面的饒舌的人。而且，科苏特在倫敦逗留期間（1859 年夏末），英国报纸就已經公布了这些事实。

爭取中立的運動，使得比內閣的所謂“親奧地利傾向”中立化。眾所周知，輝格黨和曼徹斯特學派的自願支持，使他極為順利地完成了協定中的初步條款。他所進行的從倫敦的市長官邸到曼徹斯特的自由貿易大廳的巡迴講演，同他在1858年秋天的英國——蘇格蘭的巡迴講演恰成對照，那時他向每個聽眾收費一先令，兜售他對波拿巴和瑟堡的憎恨，把這二者說成是 «the standing menace to England» [“對英國的經常威脅”]。

歐洲的匈牙利流亡者，大部分從1852年底起就相繼離開了科蘇特。由於有了靠法國的幫助進攻亞得利亞海沿岸的希望，大多數人又回到他的麾下。他和新爭取過來的追隨者中的軍事人員的談判，並不缺乏“十二月的”余味。為了可以把大部分的法國錢交給他們，科蘇特提升他們的軍銜，例如把中尉晉升為少校。首先，每人得到去都靈的一筆旅費，接着就是一套華麗的軍服（一套少校軍裝價值達150英鎊），最後是預支6個月的軍餉，並許諾在和約簽訂後發一年的軍餉。但是，一般地說，薪俸不是太高的：總司令（克拉普卡）10 000法郎，將軍6 000法郎，准將5 000法郎，中校4 000法郎，少校3 000法郎等等。在都靈集合的匈牙利軍隊幾乎全是軍官，沒有士兵，而我曾不止一次地聽見過匈牙利流亡者的“下層群眾”為此發出沉痛的怨言。

摩里茨·佩爾采爾將軍在看透了這場外交把戲之後，像上面已經提過的，立即拒絕參加，並公開作了聲明。克拉普卡不顧路易·波拿巴的反命令，堅持在阜姆登陸，但是科蘇特卻將匈牙利流亡者軍團留在劇院經理所指定的舞台界限之內。

簽訂維拉弗蘭卡條約的消息剛一傳到都靈，科蘇特害怕把他交給奧地利，就費盡心機，背着他的軍隊，偷偷地跑到日內瓦。在

当时都灵的匈牙利兵营里，无论是弗兰茨-約瑟夫，也无论是路易·波拿巴，都没有像路德維希·科苏特那样招来那么多憎恨。只是由于他这次逃跑过于滑稽，才使得对他的批評略为平靜。科苏特在回到倫敦以后，发表了一封写給他的馴服的大象——格拉斯哥的某位麦克-亚当的信，声明他感到失望，但没有受騙；他在信的結尾用动人的言詞說，他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因此請求給他的信都寄到为他这个亡命者提供了栖身之处的他的朋友弗·普尔斯基的寓所。倫敦报界以超乎盎格魯撒克逊式的粗卤，建議科苏特——如果他願意的話——用波拿巴的津貼在倫敦租賃一所公館；这件事使他确信，他在英国暂时已没有什么戏可唱了。

科苏特除了具有口若悬河的天才以外，每当听众对他表现出明显的不悅或者他无話为自己辯护时，他还有一种非凡的保持沉默的天才。就像太阳一样，他也有亏蝕的时候。他新近給加里波第的信证明，他一生中至少有一次做到了前后一致。他在这封信里警告加里波第不要进攻羅馬，以免侮辱法国人的皇帝，这位“被压迫民族的唯一的靠山”。

像十八世紀上半叶人們把阿尔貝罗尼叫做了不起的紅衣主教一样，也可以把科苏特称做了不起的**朗根施瓦茨**。实质上，他是一个每次都从新的听众那里受到影响的即兴詩人，而不是一个硬要世界接受他的新奇思想的創作家。布朗丹在自己的鋼絲上跳舞，而科苏特則在自己的舌头上跳舞。他同本国人民的气息隔絕了，因而不可避免地要蜕化成为圓滑的老手，并且染上这种人的恶习。即兴詩人的思想不穩定必然要表现为行动上的模稜两可。如果說科苏特曾經是个風奏琴，人民的風暴使它发出过巨大的音响，那他現在只不过是迪奥修斯的耳朵，用来傳達罗亚尔宮和土伊勒里宮

密室的私語而已。

如果把福格特的第二个庇护人**克拉普卡將軍**同科苏特等量齐观，那是非常不公正的。克拉普卡是匈牙利最优秀的革命将領之一。他同 1859 年在都灵集合的多数軍官一样，对路易·波拿巴的看法无異于弗兰茨·拉科西对路易十四的看法。对于他們來說，路易·波拿巴代表法国的軍事威力，这种威力可以用来为匈牙利謀利，但是，仅仅由于地理上的原因，也永远不会对匈牙利有害^①。但福格特为什么要引用克拉普卡的話呢？克拉普卡从未否认过他属于普隆-普隆的紅色宮廷奸党。为了用“朋友”克拉普卡来作“朋友”福格特的保人嗎？克拉普卡在選擇朋友方面并不具有特殊的才干。阿塞尔曼上校是他在科莫恩的密友之一。拉品斯基上校在放棄科莫恩以前曾在克拉普卡手下服务，以后在切尔克西亚的反俄战斗中曾屢建奇功。讓我們听听他对这位阿塞尔曼上校說些什么。

拉品斯基說：“維拉戈什的叛变⁵⁶⁰，在科莫恩的为数众多而又无所事事的參謀軍官当中，引起了极度的恐惧…… 这些衣領綉金的洒了香水的先生

① 虽然我理解克拉普卡的这种立場，但当我在上引的瑟美列的著作里发现了相同的情緒时，我却感到惊奇和不安，因此我坦率地把我对这个问题的見解告訴了他。他最近关于奥地利的让步的声明⁵⁵⁸使我更为不解。我知道，瑟美列在处理公共事务方面不会为个人动机所左右，并且有十分重要的根据使他宣称：匈牙利人得到維也納給的东西后能够在佩斯获得一切；从外部策划的匈牙利起义，尤其是在法国援助下的起义，必然导致俄国在贊助或反对奥地利的情况下进行对匈牙利的干涉；最后，給予特兰西瓦尼亚、斯洛伐克和克罗地亚以及伏伊伏迪納的自治权，在此刻会像在 1848—1849 年那样，使維也納內閣获得这些“民族”的协助来反对馬扎尔人。这全是正确的，但是，如果不令人据此认为你承认 «in usum delphini»⁵⁵⁹ 殘缺不全的維也納版的匈牙利宪法，才能这样說。

們，其中很多人既不会拿枪也不能指揮3个士兵。他們惊慌失措，乱成一团，想尽方法只图逃命。他們利用各种借口脱离主力部队，以便躲进舒适而安全的难以攻破的要塞之内，除了每月签字如数收到薪俸之外，别无他事。他們一想到要进行殊死的防御战就怕得发抖……正是这些坏蛋向將軍撒謊，給他描繪出一片內部混乱、騷动等等的恐怖景象，以便只要能保全他們的生命和财产，促使他尽快地交出要塞。很多人对保全财产特別关切，因為他們在整个革命中的全部意图就是发财致富，而某些人也确实如願以償。这种发财致富对于某些人來說是很容易的，因为往往要过半年時間才清算收款賬目。这为欺詐和蒙騙創造了有利条件，因此，大概有些人盜窃金庫的能力要比他們补充金庫的能力大得多……停战协定締結了；現在人們怎样來利用它呢？要塞內存有足够一整年用的食物，其中有极大数量毫无必要地被运往邻近的村庄；相反地，从周圍地区却没有运进任何食物；附近村庄的农民存有干草和燕麦，尽管他們請求收购这些飼料，然而无人理睬，可是几星期之后，哥薩克人的馬吃光了农民的东西，而我們却在要塞里埋怨缺乏飼料。要塞中的大部分供屠宰用的牲畜，在飼料不足的借口下卖到城外。阿塞尔曼上校或許不知道，鮮肉可以做成腌肉。有一大部分谷物也以开始霉烂为借口被卖掉；这些事情是公开进行的，但更多是暗地进行的。在阿塞尔曼以及諸如此类的家伙的包圍中，克拉普卡自然不得不立即放棄他所想到的任何一个好念头；他周圍的那些先生們所关切的的就是这一点……”（拉品斯基，同上，第202—206頁）

戈尔盖和克拉普卡的回忆录⁵⁶¹都同样确凿地說明克拉普卡缺乏坚毅性格和政治遠見。在科莫恩保卫战中，他所犯的全部錯誤都淵源于此。

“如果克拉普卡除了他的知識和他的爱国心以外，还有自己的坚毅不拔的意志，并且按他自己的見解行事，而不是按他身边的那些蠢貨和懦夫的德意行事，那末，科莫恩的保卫战就会在历史中像流星一样燦然一閃。”（同上，第209頁）

8月3日，克拉普卡获得了一次輝煌的胜利，彻底击潰了圍攻科莫恩的奥地利軍团，使它长期丧失战斗力。紧接着他攻克了腊

布，甚至可以毫不費力地占領維也納，但是，他不知所措，无所事事地在腊布停留了一个星期，随后又返回科莫恩，得到戈尔盖的一封信和后者繳械投降的消息。敌人請求停战，以便使被击潰的奥地利軍团和正从里馬索姆巴特开来的俄国軍队在科莫恩附近集結，然后滿不在乎地把要塞包圍起来。克拉普卡沒有对正在集結的敌方部队进行各个击破，反而又不知所措地犹豫起来，不过，他到底拒絕了奥地利和俄国軍使們提出的停战。于是，——拉品斯基說道，——

“8月22日，尼古拉皇帝的一位侍卫官来到科莫恩…… 但是，——这位俄国的靡菲斯特斐勒司用甜言蜜語說道，——將軍先生，您不会拒絕我們提出的两星期的停战，因为这是我仁慈的皇帝陛下向您請求的。这一席話像烈性毒药似地立即奏效了。奥地利和俄国軍使們的一切努力和劝說都未能取得的东西，这奸滑的俄国人只花三言两語就得到了。克拉普卡經不住这番巧妙的恭維，签署了两星期的停战。从此，科莫恩的陷落就注定了。”

如上所述，在克拉普卡姑息下，阿塞尔曼上校利用停战，在两星期內从要塞中运走足够一整年用的軍粮。停战期滿之后，格拉貝从发格河方面包圍了科莫恩，已逐渐增至4万人的奥地利軍队則在多瑙河的右岸駐扎下来。科莫恩的守軍却因整天在工事里和城內游手好閑而弄得軍心涣散。克拉普卡对包圍要塞的俄国軍团从未发起一次出击，这个軍团还没有参加过一次作战并且只有19 000人。敌人包圍城市的准备工作从未受到过干扰。从簽訂停战协定的那一天起，克拉普卡所准备的一切，实际上不是为了防御而是为了投降。他的全部精力都化在警探活动上面，因为是用来对付那些反对投降的勇敢的軍官們的。

拉品斯基說道：“最后，只要談到奥地利人就有危險，因为那可能被捕。”

9月27日，終於投降了。

“如果考慮到現存力量和把自己的最後希望寄托于科莫恩的那個國家的絕望的處境，考慮到歐洲的總形勢以及可能為科莫恩付出極大犧牲的軟弱無力的奧地利，那末可以說，投降的條件是分外可憐的。”

這些條件“只是有助於那些人迅速逃出科莫恩到國外去”，但是，不論對匈牙利，甚至對落在奧地利人手中的革命將領們，都沒有取得任何保證。此外，這些條件還定得非常匆忙，因而含混不清、模稜兩可，這就為後來海璣破壞這些條件大開方便之門。

這就是**克拉普卡**。如果說**福格特**本來就沒有“性格”，那末，**克拉普卡**就更不能供給他這類貨色。

第三個庇護人是“**詹姆斯·法濟**——日內瓦的復興者”，他的宮廷丑角**福格特**就是這樣稱呼他的。**約翰·菲力浦·貝克尔**下面的信件（同前面引過的信一樣，也是寄給同一位收信人的^①）對法濟的性格描寫得十分成功，以致任何增添都會使之減色。因此，我只預先作一點兒說明。**福格特**的所謂“研究”一書最令人作嘔之處就是：路德教派，甚至加爾文教派對“教皇至上派”的那種偽善的恐懼。例如，他使德國只能進行乏味的非此即彼的選擇，或者向**路易·波拿巴**伸手，或者受奧地利宗教條約的支配，而且“老實說，寧願再一次處在民族屈辱的時期”（“研究”第52頁）。他用清教徒的難聽的鼻音憤懣地號叫，反對

“教皇至上派，這個吮吸全人類骨髓的世敵，這個妖怪”（同上，第120頁）。

顯然，他從未聽說過甚至**老杜班**在**波拿巴**參議院里所透露的

^① 見本卷第443—447頁。——編者注

东西，即：

“在路易·波拿巴制度下，直接从屬於耶穌会的联合会、协会和各种各样的团体比在 *ancien régime* [旧制度] 下数目大为增多；十二月政变帝国的立法和行政机关，已有系統地廢除了政府机构在 1789 年就給教皇至上派的宣傳所加的限制。”

但是，有一点福格特无疑是知道的，那就是：他的本地的波拿巴——詹姆斯·法济先生的統治，是建立在所謂的激进派和教皇至上派之間的多年联合的基础上的。当維也納會議把加尔文教派的老巢日內瓦并入瑞士联邦时，也就把一些信奉天主教的农村居民和教皇至上派僧侶的 *crème* [精华] 連同某些薩瓦区一起并入了日內瓦領土。同“人类的这个世敌，这个妖怪”結成的同盟，使法济成了日內瓦的独裁者，使福格特成了法济的联邦院議員。这就是要預先說明的。

“1860 年 7 月 2 日于巴黎

萊朋友：

我到底要滿足您的願望，把我对詹姆斯·法济先生的看法告訴您……

关于国家的科学如果没有实际运用的艺术就毫无用处，同样，管理国家的艺术如果不以科学和哲学思想为基础，也是毫无結果的。光是科学不能向一个所謂的政治家提供处世的經驗，而他的无能就会很快暴露出来。相反地，一个只是片面地具有管理国家艺术的人，倒更易于掩盖自己知識和精神創造力的不足，被当做一个实际的政治家，获得众多的庸人的拥护。人民在这样一位人物的統治下，能否在文化史上发展，能否有順利发展的必要保证，是盲目兴奋的人无力判断的。特别是在表面上看来一切都进行得很好很順利的时候，一切都是为了自由和文明的时候，情况尤其如此！

我們的詹姆斯·法济先生，就是您可以看到的这种 *species* [类型] 的政治家的絕好样品。确实，这个圓滑的家伙显露出不仅是管理国家的艺术，而且是这方面的整套艺术，每当‘公共福利’需要的时候，他还会变各种各样的戏法并表演 *tours de force* [杂技技艺]，不过，每次他都以习惯的謹慎避

免 Salto mortale [翻筋斗]。这是一个幕后分配角色的内行，机灵的导演和提词者，意大利喜剧演员的 non plus ultra [最完美的] 典范。他的‘坚定精神’，他的那种只求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的做法，假如不是出于他那骯髒的目的的话，那是很值得赞扬的。但是，当人们知道了这个人毫无原则、毫无节操的时候，对他在选择手段时的机灵和运用手段时的圆滑就不会再感到惊奇了。在他统治下的人民的生活中所发生的或萌芽的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被这位政治家厚颜无耻地攫为己有，然后他以自己的名义把它献给那些盲目地相信这一切都是‘法济老爹’做的或者只是靠了他才能有这一切的群众。他施用同样的狡诈，把应由他负首要责任的不得人心的坏事转嫁到别人头上。他在他的政府里不容任何具有独立思想的人存在，他随便地拒绝承认他的同僚们说的话，因此他们不得不为他的种种失败分担责任。他们在忍受他的 à discrétion [无限制的] 专横暴虐的同时，还必须随时准备为人民的幸福和他们的主席的声誉充当替罪羊。就如一位加了冕的统治者，在采取任何措施的时候，即使非常符合人民的利益，在陛下‘恩准’之前，总首先要考虑这种措施是否对王朝不利；法济老爹也是如此，他在做每一件事的时候，也要自问：‘这是否会动摇我的主席宝座？’因此，我们的这位英雄总是使自己的政策适应目前的情况，只顾眼前；今天他在政府会议里扮演喜剧，明天在大会议里来一套魔术杂耍，后天又在某个群众集会上取得轰动一时的成功。至于那些被他的花言巧语所笼络的群众，也乐意有这样一尊偶像，使他们能耳闻目睹、崇拜和景仰；他们变得轻信起来，把暴雨打在屋顶上的声音当做是在热锅里煎鸡蛋。我并不是要说，日内瓦人是不开化的、愚蠢的；正相反，我相信，除了这里，除了日内瓦湖畔，很少有更为活跃的社会生活，很少见为发展公民自由而作的更为强烈的精神努力。以后我还要谈到，既然如此，怎么法济先生总还是能为自己取得多数票。

精力充沛的一代近十五年来在日内瓦取得的一切成就，都被法济本人或通过自己的走卒和崇拜者算做他的执政的功劳。例如，平毁城堡、大规模地扩建和美化州的首府，都称做是他的功劳。其实，任何一届政府，包括法济先生的政府在内，如果对居民坚持要求平毁无用的城堡和扩大因人口过密而变得越来越不卫生的城市一举稍加反对，都会毫不留情地被推翻。因此，这一问题同时也是法济的生存问题，所以他——按功论赏——毅然着手进行并且为完成这事尽力不少，获得了普遍的满意。但是，整一代人应时代的强烈要

求以坚毅的努力創造出来的業績，如果一个人不是极端的自負，是不会把首倡和創建这些業績的功劳归之于个人的。只有整个社会才能創造出某种完整的——而且也只是相对而言——东西，而社会的每个成員只是按其力量和地位作出大小不同的貢獻。盲目相信权威不过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迷信，对于任何正常的发展都是有害的。

我清楚地知道，我們的法济先生同其他人間儿女并没有什么两样；他所做的只是他不能不做的，而他所不做的只是他做不到的；他追求个人的絕對突出，就像整个动物界一样，是为了滿足自己的需要。人們不能要求他是另一个样子，正像不能要求猫自願跳进水里或者要求馬爬上树一样。否則，他就不能成为詹姆士·法济了，如果他不成爲法济，那也許就会成为路易·波拿巴或諸如此类的东西。如果說利用自己的权威任意摆布人民，用詭計蒙蔽人民的眼睛，不是促使人們的精神和道德迅速提高，而是让自己身后留下一个腐化墮落的社会也叫做偉大的話，那末，法济无疑是偉大的，而且不失为那些更为强有力的暴君所嫉羨的对象。

我們这位英雄非常善于在各种矛盾中間蜿蜒前进，而且把这些矛盾变成他的玄妙的罗盘，用来指揮他的国家小舟。有时激进主义給他提供船員，而教皇至上主义向他提供貨运，有时則与此相反，——这要看怎样才能使舵手更为方便而定。因此，国家机器始終处在运动状态中，就像怀表的摆一样不停地摆动。真是妙极了！激进派发誓說事物在前进，教皇至上派却相信它們在后退。二者都是正确的；二者都由于自己的信仰而怡然自得，法济也就仍然作为我主上帝执掌着舵輪。

亲爱的朋友，这一次就写到这里。

致衷心的問候

您的 約·菲力浦·貝克尔”

“1860年7月20日于巴黎

亲爱的萊：

那么說，您认为我也許把法济的面貌描繪得太过分了。絕對沒有，我亲爱的朋友！而且，誰也不能凭主观願望去断人論事，只能按照他的認識和他的內在經驗合乎邏輯地去推断。在这类事情上，誰要是口是心非、言行不一，那他就是对自己不忠实，就是流氓。

法济是在諾依維特的一所兄弟会教徒的学院里受启蒙教育的，讲得一口漂亮的德語，現在已經 65 岁了，可是，看来还在用从这所模范学校得来的印象判断德国和它的人民。一切德国的东西，即便是来自瑞士德語区的也好，都不合他的口味，能获得他賞識的只是极难得的例外。他既是一个天生的日内瓦人，又會长期住在北美合众国，因此对于共和制度、宣傳方法，特别是对于符合他本性的阴谋詭計，都非常諳熟。与其說他是民主主义者，还不如說是煽动分子。他的主要的国务准則和格言是 *laissez aller et laissez faire* 562。如果他能克制自己，不往社会人士希望不靠国家恩典而創辦一点东西的地方插上一手，不去从中掠取荣誉，或者不因掠取不成而从中破坏，像他对付迈尔先生等筹办的 *Banque de Crédit et d'Échange* [信貸交換銀行] 和对付設立商品陈列館的事那样，那末，他的准則和格言倒并不是那么糟糕的。在 1846 年日内瓦革命期間，詹姆斯先生是按照‘离枪声远的兵活得长’这句格言行事的，因而，他考虑如何潜逃要比考虑如何取胜更为煞費苦心。当阿伯特·加累尔，这位整个运动的灵魂，用尽力量解决了这场长期的拉鋸战，而且告訴他已取得彻底胜利的时候，他正准备逃出日内瓦。加累尔是一个事业心很重，从不計較个人名誉的人，他——至少在当时——坚信法济对人民真心热爱，因此，当他看到那位幸而没有仓皇逃跑的英雄在胜利后立即举行的群众大会上儼然以战胜者自居的时候，并没有絲毫不快。加累尔怎么也不会想到革命刚一胜利立即在政府里得到一个职位，因为他不是日内瓦人，而是伯尔尼州的公民，根据那时的联邦法律，他既没有选举权也没有被选举权。誠然，不久以后他取得了公民权，接着被选进大会議，而且得到了国家公文翻譯官的职务。作为血气方剛的日内瓦青年的中心，他成了激进派政府的强有力的支柱。由于他，法济在平民中越来越得人心。詹姆斯·法济用路易·菲力浦时代他在巴黎‘国民报’ 563 任編輯时学会的那一套法国激进派的詞藻，在报刊和讲坛上大肆宣傳經過伪装的他的真正的图謀和願望。然而，尽管他善于招搖撞騙，一年过后，各阶层的人士就已严正地譴責他暗中勾結教皇至上派首脑，不久以后又譴責他有亲法情緒。在瑞士德語区，人們判断事物比較沉着和冷靜，看来很快就識破了他的奸詐。1847 年底，反宗得崩德的战争刚一結束，詹姆斯·法济先生立即来到軍事部办公室，求見奧克辛本將軍；当时奧克辛本和其他軍官都到医院探望伤员去了，因此只有我一人 在办公室。当奧克辛本回来，我向他报告法济先生來訪的事时，他以輕蔑

的表情說：‘嘿，这个装腔作势的伪君子！’这位前瑞士联邦主席和伯尔尼政府首脑奥克辛本將軍先生，几年来一直在瑞士从法国皇帝那里領取退休金，現在对他的这位无疑处于相同地位的旧同僚，或許怀着較好的感情。始終引人注意的一件事是：法济先生还从沒有被瑞士国民議會选进过联邦委員會，尽管他和他的朋友为此作了极大的努力，尽管在这个議會里盛行着一种狹隘的傾向，即保证重要的各州輪流在中央政府里有代表权。法济在联邦政府內无任何权力，联邦政府总是限制着合他心意的州的主权，因此，他对联邦政府总是不願順从并尽可能給它制造障碍。

1849年初，由于我組織西西里軍团，联邦警察局认为对我加以迫害在政治上是很重要的；于是我前往日内瓦，法济在該地对我說，我可以任意从事組織工作，不必理睬联邦委員會。我清楚知道，法济先生只要认为有必要，他可以把任何人輕易地当做牺牲品，即使法律是在牺牲者那一边。后来有一件事使我亲身領略了这种滋味，不过这事說来話长，我在这里就不談了，反正联邦委員凱倫博士和特罗格可以說明其中原委。

在对待流亡者問題上，他借口人道主义，执拗地違抗联邦委員會采取的措施，但是又殘酷而专橫地迫害那些不合他本人心意的流亡者。他特別无情地迫害那些与加累尔关系密切的优秀人物，因为他把加累尔看成是他未来的对手。馬志尼对他比对联邦警察局更具戒心。高个子海因岑在他看来是可惡的，必須立即离开日内瓦州。‘他脚步那样重，仿佛这块土地屬於他似的’，这就是法济天真地举出的要驅逐他的唯一理由。沒有联邦委員會的任何指令，司徒卢威同他的妻子在散步时被逮捕了，并被当做俄国間諜押解出日内瓦州，送往瓦得州。加累尔及时赶到法济那里，要法济承认錯誤。可是結果引起一場長時間的爭吵，因为法济认为声音越大，越装得怒不可遏，就显得越正确。司徒卢威不得不繼續背着俄国間諜的黑鍋。如果我沒記錯的話，這場丑戏是在貝尔格旅館当着一位俄国流亡者赫尔岑先生的面演出的，而日内瓦政府主席很喜欢在赫尔岑先生那里进餐。不管怎样，这位先生同司徒卢威所遭到的不体面的誹謗是不相干的。毫無疑問，法济比司徒卢威更亲俄；我曾經听他在一次宴会上发言，他說：‘让·雅克·卢梭的著作，在俄国比在德国流傳得更为广泛、理解得更为透彻。’显然，他主要是想用这話来嘲弄一下加累尔的德国友人和一切德国人。

这以前，加累尔在政治問題上同法济是一致的。在他同法济由于司徒卢

威事件发生冲突之后，我立即同他談了談，他沉痛地對我說：‘法濟算是完了，坦白說，我再也不能同他共事了；這是一個地道的政治怪物，十足貪婪的畜生；再同他一起，那就是幫助他從內部毀滅人民的事業。只有用一個有自由思想的堅決的反對黨來同他對峙的時候，他才會為了挽救自己的地位而迫不得已地高舉激進派的旗幟。只要光是舊貴族反對他，事情就會越來越不妙，因為他早已同教皇至上派勾勾搭搭，有可能為所欲為。此外，從思想上看，他毫不像瑞士人，他對巴黎比對伯爾尼更感興趣。我早已有足夠的理由同他決裂了；我曾長期把他看做是一個能干的人物，這種習慣看法使我沒有這樣做。不停的內部鬥爭和今天的公開衝突終於促使我同他一刀兩斷。’

聚集在加累爾身邊的都是些具有獨立性格的人，特別是屬於青年政治經濟學派的人；這樣‘聯合起來的’堅決的激進派分子和社會主義分子很快便被人稱為民主派。從此以後，激進派的實質，除了少數例外，只不過是有意識和無意識地對法濟的膜拜而已，法濟現在則在從1815年起就併入日內瓦的薩瓦的天主教農村地區內找到了真正的多數。該地的萬能的教皇至上派僧侶同這個‘激進派’——法濟的產兒結成了同盟。加累爾遭到極其卑鄙的誹謗、迫害并被革職。年輕的民主派還不能像貴族派、聯合起來的老激進派和教皇至上派那樣，對即將來臨的選舉提出自己獨立的名單。雖然詹姆斯·法濟先生拒絕在自己的名單里容納幾個民主主義者的名字，加累爾和他的朋友還是拒絕了貴族派的一切建議，決定這次仍然投票贊成法濟的名單，而把自己的勝利希望寄托於未來。如果法濟真誠地關心進步和大力改善公民的生活，那他就不會抓住總是向後看的教皇至上派的臭尾巴。為了更有效地惡意誹謗和迫害加累爾，‘激進派的’主席閣下的僕從們創辦了一種專事誹謗的小報，使他們的英明的統治者無須乎用自己的罵街來玷污自己的‘通報’——‘日內瓦評論’了；這種罵街一到了他的替罪羊辦的小報上，就更豐富了，至於這些替罪羊，他是隨時都可以將其犧牲的。體質本來很弱的加累爾，經不住這場下流無恥的攻擊，就在那年（1852年）死去了，年僅33歲。我在日內瓦常常聽人說：‘我們善良而高尚的加累爾是我們耶穌會的暴君殘酷復仇的犧牲品！’在後一屆政府選舉中，加累爾的朋友們欣然接受了貴族派的結盟建議，因為後者表示，只要能推翻法濟，在政府中他們只有寥寥數人參加就心滿意足了。要是堅持原則的加累爾，現在大約也會拒絕這種聯盟的；但是他的黨的同志們說，反正法濟先生已給我們看了他同教皇至上派聯盟的好榜樣了；既然法

济不以不体面的教皇至上派的尾巴为耻，为什么我們倒要因体面的貴族派的尾巴害臊呢？既然法济先生可以同无知的教皇至上派携起手来，那我們为什么不能同有教养的貴族派至少是同样并肩前进呢？

在大选(大概是在 1853 年 11 月举行的)中，很多激进派分子，甚至有法济的同僚，都倒向民主派，我們 1846 年的英雄便被压倒的多数推下了主席的宝座。这位前主席因負債累累而窘态毕露。因此，我必須叙述一下他生活中的若干细节。

詹姆斯·法济先生还在进入政府以前就把一笔相当可观的遺產在花天酒地中揮霍一光，以至滿身債務，遭到債權人的无情催逼。他在登上主席宝座之后，就力图尽快地廢除負債人拘捕法，——当然是‘为人身自由起見’。因此，1856 年有一个苦于債務負擔的日内瓦人对我說：‘我們选一个負債人当政府主席，倒也不錯，即使他不能宣布廢除債務，至少可以廢除債務監獄。’

然而，五十年代初，法济先生在經濟上却陷入異常的困境，以致要‘感恩的人民’急急地来援助他，在平毀城堡后的空地上划出一大块建筑用地送給他。这又有什么不應該呢？他帮助平毀了这块地上的城堡，当更有势力的人物都在毫不犹豫地‘合并’这块土地时，他为什么就不能为自己‘合并’那么一小块呢？現在，法济先生可以大量出卖地皮，并为自己盖一座富丽堂皇的府邸。但是很可惜，他随即又为新的債務所累，无力支付为他进行建筑的工人的工資。1855 年初，一个木工因法济欠了他几千法郎在大街上对法济破口大罵：‘給我工錢，你这个流氓，我好給孩子們买面包！’就在这种窘迫的情势下，他丧失了主席的宝座，而且禍不单行，他还遭到了一件更为倒霉的事。那就是激进派的信託机构 Caisse d'Escompte (貼現銀行)不得不停止支付。法济在这一机构中的朋友們也同样身負重債，他們違反規章，給法济和他們自己发放了超过銀行資金的貸款。銀行經理(此人至今仍在獄中)竟然——坏榜样败坏良風尚——挪用了銀行的更多資金。这样一来，Caisse d'Escompte 就面临着一次严重的幸——破产。上百戶节儉的工人家庭的积蓄处于危險中。無論如何，必須用尽一切办法挽救局勢，否則，法济的全部事业就会由于資金亏空而化为泡影。很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已不能直接用 Caisse d'Escompte 的名义去弄錢。但是，剛好这时日内瓦新成立了一个信託机构 Banque Générale Suisse (瑞士通用銀行)。必須为这个銀行搞到大笔款項，使它能夠挽救 Caisse d'Escompte 的錢的退潮，而使法济先生摆脱債務

的來潮。為了被搭救，法濟就得裝成搭救者。事成之後，人們担保給法濟一筆百分之几的優厚酬金，給 Caisse d'Escompte 一筆活命的補助資本。於是，法濟先生抱着這種目的，既 pro domo [為了自己] 也為了 Banque Générale Suisse 前往巴黎。在這裡逗留很多星期之後，傳說他在‘聖上’仁慈的支援下，從 Crédit Mobilier [動產信用公司] 弄到了數百萬法郎的救命錢。那時恰好在準備新的政府大選(1855年11月)，因此，搭救者在到達日內瓦以前就寫信說，他將在最近帶來數百萬巨款。這對於 Caisse d'Escompte 的股東們的受傷的心來說，是一貼能奏奇效的膏藥；對於教皇至上派—激進派的選民們來說，是一把富有魔力的火炬。那時有一幅漫畫，非常逼真地把他畫成一只龐大的天鵝，背著一些金口袋從湖上游進日內瓦港口。一個愛开玩笑的人當時對我說，他在喝啤酒時聽人說，法濟帶回來 5 000 萬法郎，喝葡萄酒時聽人說——帶回來 1 億法郎，喝 extrait d'absynthe [苦艾酒] 時又聽人說——帶回來 2 億法郎。法濟老爹像有一股創造奇迹的力量似的，他的聲譽在他孩子們的心目中又完全恢復起來了。民主派以為自己在選舉中能夠取勝，因而沒有作任何特殊的努力。不久前組織起來的一幫強壯的年輕人——les fruitiers [干酪製造者]——表現得完全像法濟的禁衛軍一樣，他們在大選時用最粗暴的恐怖手段對付選民，因而他們的偶像就又登上了主席的寶座。

但這次很快就明顯地暴露了：教皇至上派不是白白地提供大量選民的，他們也想得到勝利的報酬。有一天，在反宗得崩德戰爭之後被逐出瑞士的夫賴堡主教——終身為煽動者和騷亂者的馬利耶先生，在法濟先生的恩准下，從法國回到了日內瓦，並且開始作‘神聖的’彌撒。這時不滿的呼聲響遍全城，很快整個瑞士都起來響應。這事甚至在那些極端盲從的激進派看來，最忠順的 fruitiers 看來也太過分了。立刻舉行了群眾大會，會上通過對政府主席先生不信任案。他的同僚、政府顧問圖爾特先生，儘管他也只是法濟的信徒和弟子之一，却居然想解脫自己，便毫不留情地攻擊他的主人和庇護人。但是，法濟先生在主教先生到達以前就到外地去了。他一貫是這樣行事的：他拉下屎，讓他的同事們去打掃。不言而喻，馬利耶先生不得不即刻離開這座城市和這個國家。而法濟老爹預先把他圖謀不軌的孩子們申斥一頓之後，從伯爾尼寫信來說他被誤解了，政府沒有把事情做好，他只不過是‘為了維護宗教自由’允許主教來日內瓦看看而已。第一場風波平息之後，受到奇

耻大辱的法济老爹回来了。他用几句先知的格言——这套格言是到处适用的，因而似乎总是真理——轻而易举地恢复了他那摇摇欲坠的威信，使人又相信他对自由和祖国的纯真的热爱；何况他的同事先生们乐意地为他承担了主要的罪责。于是，法济就实现了愿望，他向他那些教皇至上派的朋友们表明：他时刻准备尽一切可能为他们效劳。近几年来，詹姆斯·法济先生已成为家财万贯的阔老了。不仅 Banque Générale Suisse 保证他终身分取一定的利润，而且，作为政府主席，他也没有忘记在他的州内修建铁路等方面照顾自己的利益。上流社会的知名人士在他那富丽堂皇的住宅里（法济在芒勃朗街上的私邸），同 cercle des étrangers [外国人士] 进行着频繁的往来。自皮蒙特认为萨瓦疗养区的‘赌场’同他的国家道德不能并存时起，深表同情的日内瓦共和国主席颇受感动，他像安置逃亡者那样，在自己宽敞的大厅里安置了这样一个赌场。自由万岁！Laissez aller et laissez faire！Allez chez moi et faites votre jeu！〔听之任之！上我这里来压上你的赌注吧！〕

亲爱的，你还需要什么？^①

您的 約翰·菲力浦·貝克尔”

让我离开福格特的庇护人，转而谈谈他的同謀者。

Peace and goodwill to this fair meeting,
I come not with hostility, but greeting.^②

在同謀者当中，我只想讲几个最著名的人物。我們在这个队伍里首先看到的是由弗·察貝尔先生指揮的柏林“国民报”。如果把爱德华·西蒙先生在福格特亲自授意下在“現代評論”上发表的一篇对“主要著作”的书評同“国民报”、“布勒斯劳报”⁵⁶⁴ 等发表的相应的文章比較一下，就可以看出，“圓滿的人物”准备了两个網

① 引自海涅的詩集“还乡曲”。——編者注

② 把和平与美意給在座諸君，

我来不是怀有敌意，而是向你們致敬。

領，一个是为搞意大利战役准备的，另一个是为搞奥格斯堡战役准备的。究竟是什么迫使弗·察貝尔先生，迫使这位“国民报”的平常如此枯燥无味和小心謹慎的钻营之徒和脑滿腸肥的胖汉逾越常軌，把福格特的街头小調化为社論的呢？

在1849年1月26日“新萊茵报”第205号的社論中，第一次詳細地提到了“国民报”。这篇社論开头的話是：“通往席尔达的路标”⁵⁶⁵。然而，路标太长了，不便把它們在这里重新刊印出来。1849年2月17日“新萊茵报”第224号上的社論說：

“柏林‘国民报’是空洞的充实表現。这里举几个新例子。談的是关于普魯士的通告…… 虽然和但是！能够和願望和似乎！认为和希望普魯士政府希望！每个句子都像苦役犯似的，脚上带着上百斤的大鐐，因此非常累贅，每一个‘如果’，每一个‘虽然’，每一个‘但是’，是有血有肉的 *Dr. utriusque juris* [两种法律的^①法学博士]。‘国民报’謹慎地用基督教德国人的又臭又长的廢話掩盖起它的智慧，如果你們也同样謹慎地把它掀开来，那还会留下些什么呢？…… 政客的空談——这是非常明显的，如同 *premier Berlin, en grande tenue* [柏林的社論，非常出色]…… ‘国民报’显然是为有思考力的讀者出版的，就像罗泰克的‘世界通史’一样⁵⁶⁶…… 法国人对这一类純粹用文字表現的思維有一种恰当的說法：«*Je n'aime pas les épinards et j'en suis bien aise; car si je les aimais, j'en mangerais beaucoup, et je ne peux pas les souffrir*». ‘我不喜欢菠菜，这很好；因为如果我喜欢菠菜，我就会吃得很多，可是我极厌恶菠菜’。‘国民报’希望普魯士幸福，因此它希望——换一个內閣。但是有一个內閣——这是它在任何情况下所希望的。这是‘国民报’的庇护人对之明确并且有十足信心的唯一的一件事。”

“新萊茵报”第296号这样說：

① 教会法律和世俗法律。——編者注

“柏林 1849 年 5 月 9 日…… 观察一下柏林的报刊对薩克森革命的态度是很有趣的。‘国民报’只有一种感情——害怕被禁。”

不过，害怕是一种长生不老药，在曼托伊費尔統治的十年当中，“国民报”证明了这一点。

“国民报”证实了波普的話的正确性：

Still her old empire to restore she tries,
For born a goddess Dulness never dies^①.

波普的 Dulness 王国和“国民报”的王国区别仅仅在于：那里“現在的統治者是邓斯第二，正如从前的統治者是邓斯第一”^②，不过在这里进行統治的仍然是那个老傻瓜 Dunce the first [邓斯第一]。

紧步“国民报”后尘的是“布勒斯劳报”，它現在崇拜霍亨索倫王朝的内閣，正像从前崇拜曼托伊費尔内閣一样。1860 年初，我收到如下一封信：

“1860 年 2 月 27 日于布勒斯劳

亲爱的馬克思：

我在‘人民报’上讀了你对‘国民报’的回答和声明。^③ ‘布勒斯劳报’也登載过像‘国民报’上的同样文章，署名的是該报經常撰稿人施泰因博士。就是这位施泰因博士，在柏林国民會議里同德斯特尔一道坐在极左翼，并且提出过反对普魯士軍官的著名建議。这个身材矮小的偉大的施泰因被革掉了自

① 她至今还想恢复自己那古老的統治，

Dulness——这位天生的女神永远不会去世。⁵⁶⁷

Dulness 这个字在譯文中是无法表达的。它的意思比无聊更重，是提高为原则的 ennui [无聊]、死气沉沉、迟鈍愚蠢。作为文体上的特点，Dulness 也就是“新萊茵报”称之为“空洞的充实表現”的东西。

② 亚·波普“邓斯之歌”第 1 册。——編者注

③ 見本卷第 765—766 頁。——編者注

己的教員職位。從新內閣成立的那天起，他就給自己提出了替新內閣進行宣傳的任務——不僅在去年選舉時，而且現在還在進行——，以便把西里西亞的民主派同立憲主義者聯合起來。儘管如此，他要求准許他私人授課的請求卻遭到現任內閣的拒絕，而且不止一次，而是好多次。上屆內閣對於他從事私人授課予以默認，現任內閣卻把這當做違法而加以禁止。為了取得准許，他去过柏林，但是毫無結果，你可以從登載你的聲明的那一號‘人民報’上了解到這件事的詳情。可是現在，布勒斯勞俱樂部根據施泰因博士的倡議在丑角行列里又演出了硫磺幫。儘管如此，施泰因博士、施雷漢、舍姆勞以及他們在立憲主義者中的同伙，還是要遭到一次又一次的侮辱；因為這類人不讓人懷疑他們的愛國心。你對這批寶貝能說什麼呢？”

對我的同事施泰因我能說什麼呢？他的確同我共過事。我有整整半年的時間（1855年）是“新奧得報”⁵⁶⁸的通訊員，這是我在國外時為之寫文章的唯一的一家德國報紙。顯然，施泰因的心是石頭^①做的，不准許他私人授課也不能使之軟化。“新萊茵報”對這位施泰因曾加以長時雕琢，想把他弄成個半人像。例如，第225號上就這樣說：

“科倫 1849年2月16日…… 關於施泰因先生本人，我們還記得這樣的事情：他曾經作為狂熱的立憲主義者起來反對共和主義者，他曾經在‘西里西亞報’⁵⁶⁹上對工人階級的代表進行真正的告密，並為此目的利用了一個同他志同道合的教師，這個人現在是‘法定秩序擁護者同盟’的盟員。協商派議會的所謂民主派，也像這個議會本身一樣可憐。可以預料：為了再度當選，這班先生將承認欽定憲法。這班先生的觀點的特征是：在選舉以後，他們會在民主俱樂部中否認他們在選舉以前在復選人會議上所堅持的東西。

① 此處和下文均為文字遊戲：德文中 Stein〔施泰因〕是姓，«Stein»是“石頭”。

——編者注

这种狡猾的自由主义的小聪明从来不是革命者的外交所固有的。”⁵⁷⁰

当曼托伊費尔又譏貶[wegoktroyiert hatte]欽定議院⁵⁷¹的时候，施泰因证明了：“萊茵报”对他的雕琢沒有白費。那时，尤利烏斯·施泰因博士在“布勒斯劳民主总同盟”里宣称：

“我們〈柏林的极左派〉一开始就认为德国的事业完了…… 現在必須承认，只要德意志的君主們还存在，德国的統一就根本不可能。”（“新萊茵报”第290号）

就是这位施泰因，尽管他不再是一块絆脚石，施韦林却总不願把他当成一块建筑石材使用；这确实是一件使頑石也得掉泪的伤心事。

我不知道我的讀者是否看过“笨拙”杂志，——我指的是倫敦的“喧声”⁵⁷²。这杂志的扉頁上的潘奇是坐着的，他的托比狗悶悶不乐地站在他的对面，耳朵上夹着一只笔。二者都是天生的 penny-a-liner〔不值錢的文人〕的象征。如果允許以小比大的話，那就可以把福格特同丧失了自已机智的潘奇相比，——潘奇的这一 malheur〔不幸〕是在1846年同廢除谷物法⁵⁷³一起发生的。但是，他的同伴托比狗只能用来同他本人或爱德华·梅因相比。如果爱德华·梅因某一天真的死去，他并不需要毕达哥拉斯的灵魂轉生。托比已經在他活着的时候就考虑好这件事了。我决不想肯定說，爱德华·梅因在画家創作扉頁上的花飾时作过模特儿。但是，無論如何，我一生中从未見過人和狗竟这样地相似。不过，这并不奇怪。爱·梅因生来就是个 penny-a-liner，而天生的 penny-a-liner 就是托比。爱·梅因一向喜欢把他伶俐文笔下的丰富产品坚持献給党組織書籍出版机构。由于有了上峰賞賜的綱領，因而

免除了独立思考的劳累；由于感到自己同多少是有組織的群众有联系，因而不再意識到自己还有欠缺；由于想到可得到的軍費，因而暂时甚至忘記了托比职业上的郁闷。因此，我們发现，爱德华·梅因曾經混进了不幸的民主派中央委员会——这个在1848年由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德国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⁵⁷⁴发展起来的有名无实的委员会。在流亡倫敦期間，他是石印傳单最积极的制造者，金克尔用来制造革命的貸款，一部分就耗費在这上面了；当然，这絲毫不妨碍这位爱德华·梅因带着他的全部家私投奔到摄政亲王門下，抱怨大赦，确是乞求恩准他从万茨貝克写些有关外交政策的文章来折磨汉堡“自由射手”。福格特，这位把願意“遵循他的綱領”、为他提供文章的“那些人”都招募起来，并在他們面前揮动他的裝滿軍費的錢袋的人，对于我們的爱德华·梅因，这位由于世道艰难无人願付狗稅而成了丧家之狗的人來說，真是来得适逢其时。托比一听说我打算破坏福格特的党組織書籍出版企业的信用，剝夺它的哈巴狗們的粗制濫造作品的酬金，就发出多么憤然的吠声啊！Quelle horreur! [多么可怕的事!] 福格特給了爱德华·梅因一份指示，同他給爱德华·西蒙的指示一样詳尽，責成他修改“主要著作”。爱德华·梅因也确实使連續5号的“自由射手”（1860年第17—21号）塞滿了“主要著作”中的令人难懂的廢話。⁵⁷⁵但是，多大的差別啊！一方面，爱德华·西蒙在修訂原稿，另一方面，爱德华·梅因却在歪曲它。要有客观地理解原材料的最起碼的才能，无疑才会有抄录印刷品的本事，然而，即便是正确地抄录一行半句，都是我們的爱德华·梅因完全无能为力的。在托比的本性上，甚至缺乏抄襲所必不可少的那种力量。讓我們听一听，

“自由射手”第17号：“現在有人揭穿有家報紙〈“总汇报”〉……也……得

到被福格特痛斥为德国共和派硫磺帮的一个革命政党的帮助。”

福格特在什么时候和在什么地方说过德国共和派硫磺帮呢？

“自由射手”第 18 号：“正是李卜克内西在‘总汇报’上对福格特提出了指责，因为他在该报上重复比斯康普在伦敦‘人民报’上发起的攻击；但是，这些攻击直到马克思把一份伦敦出版的、他硬说是布林德写的传单转寄给‘总汇报’后，才充分发挥了作用。”

福格特撒了许多谎，而且毫无顾虑，但是他的辩护人海尔曼已经禁止他援用这种欺骗的说法；李卜克内西在“总汇报”上“重复”的不是该报刊印的比斯康普的文章。同样地，福格特也没有想到要说是我把传单“警告”转寄给“总汇报”的。恰恰相反，他明确地说：“正是李卜克内西先生……把诽谤性的传单转寄给了‘总汇报’。”（“主要著作”第 167 页）

“自由射手”第 19 号：“布林德明确否认他是传单的作者，而印刷所的老板也证实，传单不是布林德交给他付印的。不过，肯定无疑的是：诽谤书立即用同一个活字版在‘人民报’上转载出来了；马克思促使它在‘总汇报’上发表等等。”

福格特在“主要著作”里一方面转载了菲德利奥·霍林格尔的声明，说传单不是在他的印刷所排版的，另一方面他又转载了我的反声明，说当“诽谤书”再次在“人民报”上刊出时，霍林格尔那里原来的活字版还没有拆掉。倒霉的托比写得真是乱七八糟啊！

“自由射手”第 19 号：“至于那些人（根据泰霍夫的信件，似乎恩格斯和我都说过），他们都是些纯粹理性的人，不理解任何民族。”

不理解任何温情，最可爱的托比，不理解任何温情——在福格特的书里，泰霍夫是这样写的。

“自由射手”第 20 号：“马克思……让决斗者到奥斯坦德去互相射击。泰

霍夫当維利希的助手等等。这件事以后,泰霍夫就同馬克思和他的同盟决裂了。”

爱德华·梅因不滿意于把安特卫普念成奧斯坦德。他大概在倫敦听过有关一个法国人的故事,这位法国人在西头常常抱怨說,英国人写的是倫敦,可是讀成君士坦丁堡。泰霍夫在他写信时平生只見過我一次;而且明确地写着,起初他想同我联合并且参加我的同盟。可是爱德华·梅因却說泰霍夫同我和他从未加入的我的同盟决裂了。

“自由射手”第 21 号:“由于这个事件〈洛桑中央工人节〉,福格特遭到倫敦‘人民报’的猛烈攻击。”

福格特自己在“主要著作”里說,“人民报”上对他进行“猛烈攻击”的日期是——1859年5月14日。(傳单发表于1859年6月18日“人民报”。)而洛桑中央节是在1859年6月26日和27日举行的,也就是在中央节已經引起(按梅因的說法)“猛烈攻击”很久之后才举行的。

列举托比的这些文选已經够了。毫不奇怪,托比在福格特的书里讀到了其中根本沒有的东西之后,还讀到了:

“福格特的这本书将被列入我国最勇敢、最机智、最有益的論战性著作之內。”(“自由射手”第 17 号)

現在,請想像一下这个倒霉的托比吧,他連从印就的书上正确地抄录两行都无能为力;請想像一下这个托比吧,他注定要每天坐在万茨貝克讀世界史,时刻不停地从中摘出那些只用模糊的头一个字母草率标明的大事記,并且把現代的 dissolving views [漸淡和漸換他影的幻灯影] 按原尺寸映現在“自由射手”上! 不幸的万茨貝克的使徒! 幸福的汉堡“自由射手”的讀者!

几天前，倫敦“泰晤士报”刊登了一篇奇特的短評，题目叫做：«A man shot by a dog» [“被狗枪杀的人”]。这篇短評很快就傳遍了英国所有的报刊。看来，托比也懂得射击，因此，如果爱德华·梅因在“自由射手”上高唱：“我是效忠于摄政王的射击手”，那是不足为奇的。

“科倫日报”只限于发表几篇有利于福格特的恶意的短評和瑣碎的誹謗。“主要著作”出版之后一星期，該报散布謠言說，該书业已銷售一空，——也許是为了不用亲自去評論这本书了吧。人間的趣事真不少啊！

1848—1849年“新萊茵报”发行期間，当我们由于波兰、匈牙利和意大利而整天同我們科倫邻居爭論不休的时候，我怎么能料到：这家“科倫日报”会在1859年以民族原則的騎士的面貌出現，而那位平凡的約瑟夫·杜蒙先生将搖身一变而为朱澤培·德尔·蒙特先生！但是，当时自然还没有一个会把更高的精神自由的神恩賜給各民族的路易·波拿巴，而“科倫日报”永远也不会忘記是路易·波拿巴拯救了社会。“新萊茵报”第144号将告訴我們它那时是如何憤怒地攻击奧地利的。

“科倫11月15日（1848年）。当人們获悉奧地利匪徒的一个嗜血成性的奴僕，一个叫做文迪施格雷茨的人竟敢像杀一只狗那样下令枪杀議員罗伯特·勃魯姆的时候，一片憤怒的吼声响彻了整个德国，在这样的时刻来談談两家德国报纸是合乎时宜的。其中一家报纸竭力以稀有的背信棄义来玷辱死者在世的最后那些日子，另一家报纸則以自己可笑的愚蠢一直迫害他到他走进坟墓。我們所指的就是‘科倫日报’和‘萊茵国民大厅’（vulgo Narrhalle [俗称傻瓜大厅]）^①…… ‘科倫日报’第292号写道：‘本月〈10月〉22

① 文字游戏：«Volkshalle»是“国民大厅”，«Narrhalle»是“傻瓜大厅”。——編者注

日，民主派的兴高采烈的領袖們离开了維也納；其中有……**罗伯特·勃魯姆**。’‘科倫日报’登这則消息时，沒有加任何补充，但是，对勃魯姆的誹謗的話是用黑体字排的，以便使讀者留下更深的印象。在以后的几号里，‘科倫日报’干得还要出色。它甚至毫不在乎地轉載宮廷奸党的黑黃小报上的文章，轉載所有奧地利報紙中最下流的報紙——大公妃索菲婭的机关报上的报道……” 以下繼續用引文，其中写道：“‘**罗伯特·勃魯姆**在維也納沒有获得声誉…… 事情是这样：他在大礼堂里說內部敌人是軟弱的，缺乏勇气和耐性；他說，如果除去这些內部敌人，**还存在别的敌人**——他希望他們并不存在——或者如果在城市里还有那么一些人，他們宁願軍閥取胜而不願自由取胜，那末，我們同聚集在城下的敵軍所进行的殊死斗争也应当全力地指向这些人…… 在勃魯姆先生的演說里，充滿了九月党人**576**的癡狂；如果勃魯姆先生說了这些話，那他可就——恕我們直言不諱——**大失体面了**。’‘科倫日报’就是这样写的。”

倫敦所有厕所都通过一些隱蔽得很巧妙的管子把人体的髒物排到太晤士河里。同样地，世界名城也通过一些鵝管笔把它所有的社会髒物都排到一个紙制的藏垢納污的大中心——“每日電訊”里。李比希正确地指出了这种毫无意义的浪費，它弄髒了太晤士河水并使英国失去了肥料。但是，掌管紙制的藏垢納污中心的**勒維**，不仅对化学是內行，对炼金术也是內行。他把倫敦的社会髒物变成报上的文章，是为了随后把报上的文章变成銅，最后又把銅变成金。在紙制的藏垢納污中心的大門上，di colore oscuro [用黑顏色] 写着：«hic…quisquam faxit oletum!» [“此处……随意便溺!”]①，或者像拜倫生动地翻譯的那樣：«Wanderer, stop and—piss!» [“行人，停下来小便吧!”]②

像哈巴谷一样，**勒維**也是 est capable de tout [无所不能] 的。

① 这里套用了柏西阿斯的第一首諷刺詩中的一行詩。——編者注

② 拜倫“墓志銘”。——編者注

他能够就某一件强奸案写一篇三栏篇幅的社論。今年年初，他用臭气熏天的小块爛肉招待过他的为数众多的讲究飲食的讀者。这块爛肉是用一桩訴訟案件的骯髒得使人作嘔的細节巧妙地作成的，这些細节使得法官都不得不把法庭上的妇女和孩子們打发出去。不幸的是，勒維把一个完全无辜的人的名字拉扯进去，当做烹制爛肉的胡椒。由此引来了一桩控告他进行誹謗的訴訟，結果是英国法庭判他有罪并公开譴責他的报纸。大家知道，在英国，誹謗案件的訴訟也同其他訴訟一样，費用是高得惊人的，在某种程度上來說，它們是 *coffre fort* [保險柜，也就是富翁] 的特权。但是，西蒂区一群无业的律师很快发现勒維是一棵搖錢树；于是他們联合起来，为每一个打算控告勒維进行誹謗的人无代价地效劳，以进行投机。因此，勒維自己不得不在他的报纸上大声訴苦，說出現了一种新式的敲詐勒索，即控告勒維进行誹謗。自此以后，控告勒維就成为一桩冒險事业。这引起了双关的解釋；因为正像在倫敦的牆壁上可以讀到：*Commit no Nuisance* 一样，在英国法庭的大門上可以讀到：*Commit Levy* ①。

政治家們称“每日电訊”为“帕麦斯頓的 *mobpaper* [黄色小报]”，然而勒維的粪車装运政治只不过是当做压車物而已。而“星期六評論”杂志却一語道破了勒維的卖价一辨士的报纸的特质，說它是«*cheap and nasty*»(便宜而討厌)。

这家杂志还这样写道：“致命的症状是勒維坚决要骯髒的东西而不要干净的东西；为了給一篇齷齪的文章騰地方，他可以不顾一切地删去最重要的报道。”

① 难以翻譯的文字游戏，英文動詞 «*to commit*» 有几种意思，«*Commit no Nuisance*»是“禁止小便”，«*Commit Levy*»是“审讯勒維”。——編者注

然而，勒維也有他自己的一套假正經。比方說，他對於戲劇中的猥褻描寫嚴加指責，並且攻擊——他簡直是監察官卡托的化身——女芭蕾舞演員們的服裝上面太往下，下面太往上。由於這一類有關道德的攻擊，勒維脫出小難而陷入大災。啊，邏輯！——倫敦的一家戲劇雜誌“演員”喊道，啊，邏輯，你的羞赧哪里去了？可不是，這個流氓（the rogue）大概在暗中竊笑！……“電訊”成了主張舞台上婦女服裝要得體的宣揚者！神聖的丘必特，往下會是什麼呢？至少會是地震和出現耀眼的彗星。禮貌！«I thank thee, Jew, for teaching me that word»（謝謝你，猶太人，你教會我這個詞兒。）^① 像哈姆雷特勸告莪菲莉霞那樣，“演員”勸告勒維躲進修道院，而且是躲進修女院。Get thee to a nunnery, Levy! [到修女院去吧^②，勒維！] 勒維在一座修女院里！«nunnery»大概是 nonaria 的誤植吧^③，因此應該是：“到蕩婦那里去吧，勒維”，而在這種情況下，每個人都會

«multum gaudere paratus,
Si Cynico barbam petulans nonaria vellat».

[“由衷地發笑，
如果蕩婦抓住昔尼克派的〈昔尼克派勒維的〉鬍子撒嬌。”]^④

“每周邮报”断言：勒維 [Levy] 雖然沒有告訴自己的讀者 «X» 是 «U», 但他却把 «I» 寫作 «Y». 的確，摩西在通過沙漠時數點過的

① 莎士比亞“威尼斯商人”第四幕第一場。——編者注

② 莎士比亞“哈姆雷特”第三幕第一場。——編者注

③ 馬克思把英語中的 «nunnery» (修女院)，同與它發音相似的拉丁字 «nonaria» (蕩婦) 連在一起。——編者注

④ 柏西阿斯的第一首諷刺詩第一篇。——編者注

22 000 个利未人 [Levis] 577 中，沒有一个会 用 «Y» 写自己的名字。正像爱德华·西蒙不顾一切要把自己算做罗曼种族一样，勒維渴望把自己当成盎格魯撒克逊种族。因此，对于迪斯累里先生的非英国政策他每月至少要攻击一次，因为迪斯累里这个“亚洲之謎”(the Asiatic mystery)不像“电訊”那样，属于盎格魯撒克逊种族。但是，当大自然之母已坚决地把他的譜系用大号字母徑直地写在他的臉上的时候，攻击迪斯累里先生并把 «I» 写成 «Y» 于勒維又有什么用处呢？那位从 promontory of noses [鼻岬] 给自己弄到一只 finest nose [出色的鼻子] 的神秘的陌生人斯洛肯貝尔吉的鼻子(見“特利斯屈兰·善弟”)，在斯特拉斯堡只不过作了一周談笑的資料^①，而勒維的鼻子却成为倫敦西蒂区足够一年談笑的資料。一位希腊的諷刺詩作者描写某一位卡斯托尔的鼻子，說这只鼻子什么都能替他干：能当鏟子、喇叭、镰刀、锚等等。他用下面的詩句结束了自己的描写：

«Οὕτως εὐχρήστου σκεύους Κάστωρ τετύχηκε,
Ἴβινα φέρων πάσης ἄρμενον ἐργασίας».②

然而，卡斯托尔并没有猜到，勒維用自己的鼻子做什么。一位英国詩人写的这几行詩更为接近些：

«And 'tis a miracle we may suppose,
No nastiness offends his skilful nose».③

① 劳·斯特恩“特利斯屈兰·善弟先生的生平和見解”第4卷，“斯洛肯貝尔吉的故事”一篇。——編者注

② 卡斯托尔有一个万能的工具，
他的鼻子能干各种家务事。

③ 任何臭气都无損于他那灵敏的鼻子，
誰能认为这不是个奇迹。

实际上，勒維的鼻子的大本事在于对臭气具有深情厚誼，在数百里以外就能把它嗅出并吸引过来。这样一来，勒維的鼻子就作为象鼻、触手、灯塔和电訊替“每日电訊”效劳。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勒維是用鼻子写他的报纸的。

自然，这家干净的“每日电訊”，是可以而且应该登载福格特的“*罗斯之歌*”的唯一的英国报纸。在1860年2月6日勒維的报纸上，登载了一篇长达二栏半的文章，标题是：《*The Journalistic Auxiliaries of Austria*》（“奥地利的报界帮凶”），事实上，这是柏林“国民报”两篇社论的简单的、臭气熏天的英译。为了故弄玄虚，文章上注明：《*from an occasional correspondent. Frankfort on the Main, February 2.*》（“临时通讯员，2月2日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我当然知道，“电訊”只有一个通讯员住在柏林，他是被勒維的鼻子以惯有的绝技发现的。因此，我即刻写信给在柏林的我的一位朋友，问他是否能告诉我勒維报纸的通讯员的尊姓大名。但是，我的朋友（甚至亚·馮·洪堡都承认他有学问）却硬说：在伦敦并没有什么“每日电訊”，因而在柏林也就没有它的什么通讯员。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得再去问住在斯普累河流域某城的另一位熟人。回答是：“每日电訊”驻柏林通讯员确有其人，名字叫——**阿貝尔**。我认为这个名字是一种恶意的故弄玄虚。显而易见，阿貝尔只不过是察貝尔的简写而已。察貝尔不会英文，这愚弄不了我。如果阿貝尔作为察貝尔，不会德文就能编辑“国民报”，那末，察貝尔作为阿貝尔，不会英文为什么就不能给“电訊”作通讯员呢？那末，是察貝尔——阿貝尔，还是阿貝尔——察貝尔？怎样从这种巴比伦 [Babel] 中解脱出来呢？我再一次地把柏林的智慧的报纸同勒維的报纸作了比较，发现“国民报”第41号上有这样一段：

“李卜克內西奇怪地补充說：‘我們想使市政府(?)证明我們的簽字真實無誤。’”

这句有“市政府”和察貝尔表示驚訝的問号的話，使人想起那个士瓦本人，他“剛走下海船登上亚洲大陆就問：‘这里有沒有一个貝宾根来的好小伙子?’”

勒維的报上不仅沒有这一整句話，甚至也沒有問号，显而易见，勒維的通訊員不同意弗·察貝尔认为倫敦的治安法官或高級警官(magistrates)就等于柏林市政府⁵⁷⁸的看法。因此，察貝尔不是阿貝尔，阿貝尔也不是察貝尔。这时，我在柏林的其他熟人知道了我苦苦探索的問題。其中的一位写信給我說：“在摩西四經里的22 000个利未人中也有一个阿貝尔，但是写成亚比亥[Abihail]。”另一位写道：“这一次是亚伯[Abel]杀死了該隱，而不是該隱杀死了亚伯。”这样，我就愈来愈糊塗了，直到終於有一家倫敦報紙的編輯以他那种英国式的枯燥的严肃表情使我确信，阿貝尔絕不是虛构，而是柏林的一位犹太作家，他的全名是卡尔·阿貝尔博士。这位可爱的小伙子很长一段时间是施塔尔和格尔拉赫手下的“十字报”的一名热情的奴僕，但是，随着內閣的更迭，他即使沒有改头换面，也改变了色彩。無論如何，变节者的令人厭煩的热情能够說明，为什么勒維的柏林通訊員认为，英国出版自由的存在只是为了他能够公开零售他对于霍亨索倫內閣的贊叹。因此，可以假定，除了倫敦有一个勒維，柏林还有一个阿貝尔，——par nobile fratrum [一对高貴的兄弟]^①。

阿貝尔从一切可能的地方——从柏林、維也納、美因河畔法蘭

① 賀雷西“諷刺詩集”第2卷，第三首諷刺詩。——編者注

克福、斯德哥尔摩、彼得堡、香港等地向勒維提供他的貨色，比德·梅斯特尔的“环繞我的房間的旅行”把戏更为高超。但是，阿貝尔給勒維写的东西不管标上什么地名，他总是用螃蟹作标志。同进两步退一步的艾希特納赫的游行⁵⁷⁹不同，阿貝尔的文章是进一步退两步的。

«No crab more active in the dirty dance,
Downward to climb, and backward to advance»
(*Pope*).^①

阿貝尔具有一种向他的勒維报告大陆国家秘密的无可爭辯的才能。例如，“科倫日报”上刊登了一篇社論，假定是談俄国財政的，又假定是从“波罗的海月刊”上抄来的。阿貝尔等过了一个月，突然把“科倫日报”上的这篇文章从彼得堡寄到倫敦，同时当然暗示出，即使不是沙皇本人，即使也不是俄国財政大臣，至少也是国家銀行的一位經理 *entre deux cigares* [在抽两支雪茄烟之間] 向他透露的秘密統計数字，同时得意地高呼：«I am in a position to state etc.» (“我能够报道，等等”)。或者官方的“普魯士报”伸出了內閣的触角，比方涉及了馮·施萊尼茨关于黑森选帝侯国問題的私人观点。这次阿貝尔一刻也不耽誤，当天就公开从柏林向他的勒維报告关于黑森选帝侯国的問題。一星期以后他报道說：內閣机关报“普魯士报”刊登了如下一篇关于黑森选帝侯国問題的文章，«I owe to myself» (“我认为自己有責任”)請大家注意一星期以前的这事等等。或者他翻譯“总汇报”上的一篇文章，譬如注明地点

① “向下是攀登，向后是前进，
就是螃蟹也不能更灵敏地在泥中跳舞”。

[波普“邓斯之歌”第2册]。——編者注

为斯德哥尔摩。然后，必然要加上这么一句：«I must warn your readers», “我必須向您的讀者們提出警告”，不是要他們警惕从“总汇报”上抄来的文章，而是警惕某篇沒有抄来的文章。当阿貝尔不得不談到“十字报”的时候，他就划十字，祈求自己不要被人认出。

至于阿貝尔的文風，可以象征性地說它是施泰恩·盖沙特、伊西多尔·貝林涅尔勃劳和雅科布·維森里斯勒風格的翻版。

請阿貝尔同意，暫時离題一下。奇特的施泰恩·盖沙特是福格特的另一个同謀者，名叫路·班貝尔格尔。1848年他曾經是美因茲的一家小报的編輯，現在“全靠供养”过活，通过与巴黎的結緣，成了 loup garou [能千变万化的人] 的亲戚和“最簡單意义上的”波拿巴民主主义者。为了了解这个“簡單的意义”，必須知道巴黎交易所的犹太教堂的暗語。施泰恩·盖沙特的“簡單的”民主，也就是伊薩克·貝列拉称之为«la démocratisation du crédit», 即信用民主化的东西，这种信用民主化不仅要使国家的某些地区，而是要使整个国家成为一个賭窟，以便对它 en masse [大量地] 进行欺詐。如果說，在路易-菲力浦时代，寡头的交易所之狼只是无情地猎取集中在最大的資產階級手中的民族財富，那末，在路易·波拿巴的庇护下，在民主主义的交易所之狼看来，一切都是 fish [魚]。他們同羅馬皇帝一起高呼：non olet [沒有臭味]①，而同施泰恩·盖沙特一班貝尔格尔一起补充說：“群众应当做这件事”。这就是施泰恩·盖沙特的最偉大的“簡單”的民主。施泰恩·盖沙特一班貝尔格尔最近以“去意大利，好啊！”⁵⁸⁰ 一书出了名。与此相反，在維護帝国宪法的运动中，他曾傾听过这样的呼声：“哎哟，离开基尔

① 这是羅馬皇帝韦斯帕西安在談到厕所捐时說的話。——編者注

希海姆博兰登!”这个逃离基尔希海姆博兰登和欺騙过萊茵—普法尔茨志願軍的施泰恩·盖沙特一班貝尔格尔（我得到一份关于他的英雄功勛的有价值的手稿）真是太机灵了，所以他不可能嗅不出，十二月政变的充滿鮮血的骯髒的冲积层，对机灵^①的探宝人來說，是含有金子的。于是他到了巴黎，他的朋友伊西多尔·貝林涅尔勃劳(alias〔或者說〕亨·伯·奧本海姆)說得好，在那里，“你感觉自己比你知道的更为自由”。当十二月政变骯髒的土层上突然露出崇高思想的鮮明色彩的时候，认为1858年“流通”开始“停滞”（見 Banque de France〔法兰西銀行〕关于1858—1859年貨幣流通統計表）的施泰恩·盖沙特高兴开了。既是鮮明的民主主义者、而又机灵的施泰恩·盖沙特了解，巴黎的洪水不仅会冲走十二月的土层，而且会冲走他的主要著作的 pro，只留下 contra^②。大家知道，施泰恩·盖沙特一班貝尔格尔扩大了希腊繆斯的数目，增加了第十繆斯，希伯来繆斯——“当代的繆斯”，即他所說的交易所行情表。

現在回过头来談阿貝尔。在阿貝尔的文風中，充滿了世界名城的紙制的藏垢納污中心——“每日電訊”不可或缺的 odor specificus〔特殊气味〕。当阿貝尔的通訊的香气、阿貝尔的学識及其同时从二十个不同緯度上写作的事業心使勒維特別感动的时候，勒維便把阿貝尔亲切而愛撫地称做他的«industrious bug»〔“勤勉的臭虫”〕^③。

① 文字游戏: Gescheidt(盖沙特)是姓,«gescheit»是“机灵”的意思。——編者注

② pro 和 contra,即贊成和反对,在这里是收入和支出的意思。——編者注

③ 波普“邓斯之歌”第1册。——編者注

詩人的正义感已經要求“圓滿的人物”在喜劇結尾时不再同阿貝尔一起陷在倫敦的糞堆里，但是，誰会把他从糞堆里拉出来呢？誰是拯救者呢？拯救者只能是一位骯髒的人，即馮·芬克男爵^①，紅色土地^②上的容克地主，笑容騎士，chevalier sans peur et sans reproche 581。

如前所述，“新萊茵報”早在1848年就已經透露了福格特和芬克的對立的同一性，而福格特本人在1859年就預感到了這一點，那時他在他的“研究”中寫道：

“馮·芬克先生作為新國家自由的宣傳者……已完全接近於可笑的領域”(同上，第21頁)，

即接近了福格特的領域。但是，1860年3月1日，芬克公開說到和解，按約翰·菲力浦·貝克爾的說法，他用“硫磺幫來點綴謙虛的普魯士議會！”大約在這前一年，他曾經向同一個議會推薦過小冊子“波河與萊茵河”⁵⁸²，由於他沒有勒維的鼻子，當然不可能嗅出這本小冊子的硫磺味。當芬克像福格特一樣地扮演意大利人，當芬克像福格特一樣地侮辱波蘭人，當芬克像福格特一樣地要求瓜分德國的時候，這兩個彼此敵對的兄弟就永遠互相擁抱在一起了。

大家知道，同極不可避免地互相排斥。福格特和芬克也同樣地長期互相排斥。兩人都有夸夸其談的毛病，因此誰都認為對方不讓自己說話。

根據拉尼克的證明，福格特是一個大動物學家，芬克也一模一樣，他在伊克爾恩養豬就證明了這一點。

在西班牙戲劇中，每一個主人公都得搭配兩名丑角。在卡德

① 文字遊戲：Vincke [芬克]是姓，《Mistfinke》是“骯髒的人”。——編者注

② 威斯特伐利亞。——編者注

龙的剧作中，甚至給圣基普里安諾这个西班牙的浮士德也配备了莫斯康和克拉林。同样地，反动將軍拉多維茨在法兰克福議會中也有两名滑稽副官：他的喜剧小丑利希諾夫斯基和他的馬戏团小丑芬克。福格特这名自由主义的反丑角却必須独自去做一切事情（这就必然触怒他去反对芬克），因为雅科布·費奈迭只适合扮演潘塔隆这一角色的温情方面。芬克有时喜欢揮动他的小丑的尖帽。例如，他在1848年6月21日的議會會議上这样声明：

“他有时觉得，好像他不是在这样的會議上，而是在戏院里。”

在法兰克福議会的托利党人举行庆祝会时，他以**愚人的公爵**身分为宾客們解悶，坐在酒桶上唱道⁵⁸³：

“我当选为愚人的公爵，
为的就是大吃大喝。”

这也使他的对手感到不愉快。此外，福格特和芬克誰也吓唬不了誰，因而，他們认为最安全的办法是彼此攻击。福斯泰夫-福格特知道大无畏而又无可責难的騎士的价值，vice versa〔反之亦然〕。威斯特伐里亚的巴亚尔曾經在德国大学里研究过法律，他对于羅馬的 Corpus juris⁵⁸⁴ 研究較少，因为他认为，紅色土地的祖先沒有白白把瓦魯斯打敗。于是他更加勤奋地研究条頓法，特别是研究**大学生章程**，他从各个方面研究它的基础，然后把它取名**法律基础**，使它到处聞名。由于受了这种詭辯地深刻研究大学生章程的影响，所以后来他在每一次决斗中都碰上了邓斯·司各脫的某根头发，这根头发在决定性关头成为騎士和流血之間的不可克服的詭辯障碍，就像新婚床上橫在公主和 locum tenens〔代替者〕之間的一把脫鞘的劍一样。这种詭辯障碍总是按照周期性狂热准

时出現，它从 1847 年联合議会⁵⁸⁵ 时代的法庭陪審員宾达的惊險的历史开始，直到 1860 年下院中的普魯士陸軍大臣^① 的同样引人注意的历史为止。因此，我們可以看出，不久前有人指責这位容克地主丧失了他的法律基础，那使他受了多大的冤屈。他的法律基础完全由騙局构成，并非他的过错。而且，由于大学生章程仅仅适用于更高级的法律辯論，所以我們的机灵的容克地主在日常的議會實踐中就以木棒章程去代替它。

有一天，芬克在法兰克福的蛙池中憤怒地把自己的对手福格特罵作“未来的大臣”。当他在伊克尔恩得悉，福格特因为記住了这句名言：

“只要搞到一个官銜，
一年中就是老爷”^②，

不仅成了帝国摄政，而且成为 *in partibus* [非现实的] 外交大臣的时候，他感到震惊，并且对未被公认的按职晋升权憤憤不平。要知道，在 1847 年联合議会上，芬克就作为弗倫特党人出来反对內閣，作为貴族代表出来反对資產階級反对派。因此，当三月革命爆发时，他认为自己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加負有拯救王位的使命。但是，他的对手們都成了現任的大臣，而他本人却只得到了“未来的大臣”的职位，这是他至今一直順利地担任的职位。

为了报复，他抖掉了自己脚上的柏林尘土，到了法兰克福，坐到圣保罗教堂的极右翼，以便作为拉多維茨將軍的小丑、捧場者和打手在这里进行活动。

① 罗昂。——編者注

② 約·菲沙尔特“关于格朗果施、高亮都亚和龐大固埃諸英豪和老爷的業績与名言的惊險长篇历史故事”第 4 章。——編者注

只要得到上級的贊許，芬克^①就是一个狂热的忠誠的奧地利人。他瘋狂地攻击各民族。

“在左面，人們依次热中于所有一切民族——意大利人、波兰人，現在甚至还有馬扎尔人。”(1848年10月23日的會議)

三騎士——芬克、利希諾夫斯基和阿尔宁——演奏了音乐三重唱：

母牛放……公牛叫，
驢子唱低音奏熱鬧，

他們以这样高深的艺术造詣来反对替波兰說話的人(1848年6月5日的會議)，使得主席的小鈴都嘶哑了；而当拉多維茨由于軍事上和地理上的考虑，要求把明乔河划归德意志帝国的时候(1848年8月12日的會議)，芬克为了取悅整个旁听席和博取福格特的秘密叹賞，用头頂地，用双脚鼓掌。法兰克福的蛙池通过一些決議来为王朝奴役波兰、匈牙利和意大利打上德国民意的印記；当德意志民族由于屈辱的馬尔摩停战协定而不得不牺牲自己的要求时，这些決議的主要捧場者、紅色土地的容克地主喊叫得更为兴高采烈了。为了保证在批准停战协定时有多数人贊同，外交人員和其他旁听者从旁听席上溜到了右面的席位上。騙局被揭穿了，拉沃要求重新表决。芬克激烈地反对說，重要的不在于誰进行表决，而在于表决什么(1848年9月16日的會議)。在批准馬尔摩停战协定而引起法兰克福九月起义时，威斯特伐里亚的巴亚尔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以便后来在宣布戒严时，进行猛烈的反动攻击，为他所受的誰也无法补偿的恐惧复仇。

① 原文是«Fink», 而不是 Vincke. Fink 是磧鷄、放蕩者和色鬼的意思。——編者注

由于不满足于自己对波兰人、意大利人和匈牙利人的放肆攻击，他建議选举奥地利的約翰大公担任临时中央政府主席（1848年6月21日的會議），但是有一个絕對必要的条件，即要德国議会的哈布斯堡王朝的执行机关既不执行，也不宣布，甚至根本不用理睬議会的这些平民決議。当他的多数派中的一些伙伴，仅仅是为了換換花样，投票贊同帝国执政者——至少在决定战争与和平問題以及同外国签定条約时——应俯就事先取得議会的同意的时候，这事使他暴跳如雷（1848年6月27日的會議）。芬克在德国議會中发表了极其激烈的演說，企图迫使人們举行对帝国首相施梅林及其同伙的信任投票，以奖励他們和帝国摄政参与卑鄙的、流血的維也納背叛⁵⁸⁶（1848年10月23日的會議），这篇演說駁斥菲沙尔特的誣蔑极为成功：

哦，威斯特伐里亚人的嘴臉，
是多么冷酷的嘴臉！^①

因此，只要在議會撒哈拉大沙漠的上空还没有突然出現小德意志⁵⁸⁷的海市蜃楼，我們的容克地主还没有錯认为他看到一只腋下夹着一个大小与原物相等的內閣大臣的公事包的殞鷗，芬克就会对哈布斯堡王朝保持友好的睦邻关系。由于圣保罗教堂墙上有非同寻常的长耳朵，所以他能引以自慰的是：他在法兰克福对霍亨索倫王朝所大声流露的忠順，将得到柏林的賞識。1848年6月21日，他不是挤滿了人的圣保罗教堂里这样声明过嗎：

“我的选民們派我来不仅是为了代表人民的权利，而且也代表各邦君主

① 約·菲沙尔特“关于格朗果施、高亮都亚和龐大固埃諸英豪和老爷的業績与名言的惊險长篇历史故事”第3章。——編者注

的權利。我一直贊賞一位偉大的選帝侯^①的話，他有一次曾把馬爾克^②的居民稱做他的最忠誠、最恭順的臣民。住在馬爾克的我們以此為榮。”

馬爾克的巴亞爾在那次著名的讲坛戰役中從言論轉向行動，在這次戰役中他贏得了騎士馬刺（1848年8月7日和8日的會議）。當布倫坦諾由於為弗里德里希·黑克爾請求大赦，因而在講台上對霍亨索倫王室的一個親王說了某些模稜兩可的話時，芬克像一头真正忠順的狗一樣狂怒了。他離座衝向布倫坦諾先生，對他高喊：“滾開，流氓！”，並且要把他拉下台來。但是，布倫坦諾站在原地未動。不久，這位容克地主又向他奔去，並且當做挑戰書向他投下了騎士的手套（當然，保留進一步成熟地考慮在法律基礎上可能產生的困難），布倫坦諾拾起手套接受了挑戰說：

“在教堂外面，您想對我說什麼，那隨您的便；但在这里，您別打擾我，不然，小心吃我耳光。”

這個容克地主在自己積累的詞彙中翻騰了一遍，從中又找出幾句罵人話來辱罵左翼，直到賴哈德向他喊道：“馮·芬克，您這個惡棍！”（1848年8月7日的會議）。芬克想用直接轉入日常事務討論的辦法，來取消關於勃蘭登堡內閣和柏林協商派議會之間的衝突的辯論。

他說，“自從弗蘭格爾勝利地進入柏林，局勢已經平靜，證券的價格已經上漲……柏林議會無權發布告人民書，等等。”

協商派剛被驅散，我們的這位大無畏而又無可責難的騎士就更加猛烈地攻擊他們了。

在1848年12月12日的會議上他喊道：“對共和國來說，我們缺少政治

① 弗里德里希-威廉。——編者注

② 指威斯特伐利亞的馬爾克郡。——編者注

的初步教育；前柏林議会的代表們向我們表明了这一点，他們通过決議是为了滿足他們个人的卑鄙的虛榮心。”

這話引起了風暴，他企图用下面的話來使其平息下去，他說，

“他准备反对任何人，騎士般地維護自己的观点”，但是，这位小心謹慎的騎士补充說，“他指的不是本議会的成員，而只是已經解散的柏林議会的成員。”

馬尔克的巴亚尔就这样傲慢地向已被驅散的协商派的全体战士們发出了挑战。其中的一位听到了这种挑战的声音，竭尽全力做出了一件确实聞所未聞的事情：他迫使这位紅色土地上的容克地主亲自來到愛森納赫的戰場上。當我們的巴亚尔在緊要关头找到了邓斯·司各脫的法律上的詭辯的时候，流血看来已經是不可避免的了。他的对手叫格奥尔格·荣克，可是荣誉法要求我們的大无畏而又无可責难的騎士与龙搏斗，但决不是与同名的降龙者^①搏斗。芬克不能把这种固执的思想从自己的头脑中鏟除。他曾經庄严地宣誓，宁願像日本的大名⁵⁸⁸那样切腹自戕，也不願触动这位名叫乔治的、对决斗來說还太年輕^②的人的一根毫毛。但是在圣保罗教堂內，这位頑强的决斗者愈益肆无忌惮地攻击紧鎖在閔斯德監獄里的泰梅和其他反政府的人物（1849年1月9日的會議）。如果說他为了迎合上层而會不嫌繁瑣，那末，他在建立小德意志和大普魯士王国的巨大努力中所表現的忠誠却达到了頂峰。“国王制造者”沃里克同“皇帝制造者”芬克比較起来簡直太幼稚了。

馬尔克的巴亚尔认为，他已經以自己的高尚行为使 1848 年三

① 圣乔治(胜者乔治)。——編者注

② 文字游戏：Jung (荣克)是姓，«jung»是“年輕”的意思。——編者注

月事件中的那些忘恩負義的人深感羞愧。行動內閣⁵⁸⁹垮台的時候，芬克有一段時間從聖保羅教堂消失，但他隨時都在整裝待命。馮·普富爾內閣垮台的時候，也發生過同樣的事情。但是，由於高山不會走向穆罕默德，所以穆罕默德決定向高山走去。在某個腐朽的市鎮當選後，紅色土地的騎士突然以欽定議院議員的身分出現在柏林，迫切希望他在法蘭克福的功勛獲得獎賞。此外，在不剝奪他的任何非議會自由的戒嚴中，這位騎士感到非常舒服。當他同欽定議員一起在宮殿前等待白廳接待的時候，柏林居民用噓聲和嘲笑來歡迎他。由於曼托伊費爾曾經小心地向他暗示過，似乎上面——哪怕是為了要留一個大臣的空缺以資獎賞某些功勛——傾向於從法蘭克福的“皇帝製造者”手中接受小德意志皇冠，因此他聽到這些噓聲和嘲笑就更加高興。芬克陶醉於這種甜蜜的希望，他企圖暫時作為內閣的 dirty boy〔清潔工〕以示效勞。他按“十字報”的指示，草擬了一份上國王的奏折，大聲疾呼地反對大赦，聲明欽定憲法只有在一個必不可缺的條件下他才同意接受，這個條件是這憲法要由一個“強大的國家政權”來重新審查和修訂。他辱罵受到戒嚴之苦的左翼議員等等，同時等待著自己的勝利。

災難臨近了。法蘭克福皇帝代表團到了柏林，4月2日（1849年）芬克提出了一項極端效忠皇帝的修正案，就是曼托伊費爾天真地投票贊成的那個修正案。會議一結束，芬克就瘋了似的跑進鄰近的一家舊貨店，要在那里親自購買一個公事包，紅色天鵝絨裝飾的、金邊黑硬紙面的公事包。第二天早上，這位笑容騎士像孚恩神那樣怡然自得，含著勝利的微笑坐在議會中央的他的席位上，但是，突然響起了一陣“永遠不、永遠不、永遠不”的喊聲。曼托伊費爾的嘴唇嘲弄地抽搐著，而我們的這位無畏的容克地主卻嘴唇發

白，由于內心的激动像一条电鳗一样颤抖着，神色古怪地向他的朋友們暗示：“拦住我吧，否則我要闖禍了”。为了拦住他，“十字报”（許多月来芬克都坚持照該报的指示行事，而該报也把他看做該报的議院奏折草案的教父）第二天发表了一篇題为“祖国在危險中”的文章，其中說道：

“內閣仍然存在，国王^①在回答芬克先生及其同伙时說，他們不必为与他們无关的事情操心。”

这位受了騙的 *sans peur et sans reproche* 騎士蹣跚地从柏林前往伊克尔恩，他所受的愚弄比勒維曾經受到的更甚，当然，这种愚弄也只有未来的大臣才会受到的！

紅色土地上的辛辛納图斯在伊克尔恩苦苦研究了多年实践动物学之后，某一天早上醒来时已經成了普魯士下院反对派的正式首領。他因右的論調在法兰克福不走运，便在柏林唱起左的論調来。究竟他代表的是信任的反对派，还是反对派的信任，那就无法肯定。但是，不管怎样，他在这里也把他的角色演得过火了。不久他就成了对內閣來說是坐在反对派席位上的不可或缺的人物，以致禁止他再离开这个位子。这样，紅色土地上的容克地主就依然是未来的大臣。

在这种情况下，芬克感到了厌烦，締結了他的著名的伊克尔恩条約。福格特非常明显地向他保证：只要普隆-普隆征服了德国大陆上的第一議會島巴拉塔利亚，就让醉鬼們^②住到那里去，并且让

①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編者注

② 馬克思在原文中用的是 *Sch-Oppenheimer* 这个字，此处是文字游戏：*Oppenheim*（奥本海姆）是姓，*«Schoppenheimer»* 系由 *«Schoppen»*（“酒杯”、“ $\frac{1}{4}$ 公升”）而来，这个字可以轉意成“醉鬼”、“嗜酒者”。——編者注

他的福斯泰夫作該島的攝政，福格特就会立即把威斯特伐里亚的巴亚尔任命为自己的內閣首相，并把有关决斗的最高裁決权交給他，并且让他担任真正的秘密筑路总监^①，把他提升到愚人公爵的爵位，最后，他在他管轄的島屿上用来代替貨幣流通的白铁^②上刻鑄出一对暹罗双生子——右面是普隆-普隆的攝政福格特，左面是福格特的大臣芬克，大幅双人像的四周是由葡萄藤环绕的題詞：

“我和你嘴靠嘴
向我的世紀挑战。”^③

① 見小册子《Auch eine Charakteristik des liberalen Abgeordneten von Vincke und erbauliche Geschichte des Sprochhövel-Elberfelder Wegbaues》. Hagen, 1849 [“对自由派議員馮·芬克的又一評論和施普罗赫費耳—爱北斐特的道路建筑的有教益的历史” 1849年哈根版]。

② 文字游戏：《Blech》意思是“白铁”，也有“胡言乱語”的意思。——編者注

③ 此处諷刺地套用了席勒剧本“唐·卡洛斯，西班牙王子”第一幕第九場中的話。——編者注

十一 一件訴訟案

1860年1月底，倫敦收到了兩號柏林“國民報”，報上有兩篇社論，第一篇的標題是“**卡尔·福格特和‘总汇报’**”（“國民報”第37號），第二篇的標題是“**怎样伪造激进傳单**”（“國民報”第41號）。**弗·察貝尔**用这不同的標題发表的两篇社論，不过是福格特的“**主要著作**”加过工的 in usum delphini⁵⁹⁰ 的版本。倫敦是在很久以后才得到这一著作的。我决定馬上在柏林对**弗·察貝尔**的誹謗提起訴訟。

十年来，德国报刊和美国的德文报刊对我进行了层出不穷的謾罵，我只在非常罕見的特殊情况下，即在像科倫共产党人案件那样关系到党的利益时，才在报刊上予以回答。据我看来，报刊有权誣蔑作家、政治家、演員以及其他从事社会活动的人。如果我认为攻击是值得注意的，那末，我这时所遵循的格言是：à corsaire corsaire et demi〔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①。

这一次，情况并不是这样。**察貝尔**攻击我进行了一系列犯法的和可耻的活动，而且是在那些因怀有党派偏見而輕信荒唐透頂事情的讀者面前攻击我的。另一方面，由于我离开德国已有十一

^① 法国諺語，直譯是：以一个半海盜对付一个海盜。——編者注

年之久，這些讀者根本缺乏判斷我這個人的標準。撇開政治上的考慮不談，就是為了我的家庭，為了妻子兒女，我也有責任使察貝爾破壞我名譽的攻擊受到法庭審理。

我提起的訴訟方式，一開始就排斥了像福格特反對“總匯報”訴訟案中出現過的那一類錯中錯的法庭喜劇。即使我異想天開，想在那個因袒護福格特而撤銷了一個刑事案件的法濟法庭上去控告福格特，那末有些極端重要的問題也只能在普魯士、而不能在日內瓦弄清；相反地，察貝爾提出的唯一論點（他可能在福格特那里為這個論點找到證據），是以一些假文件為根據的，而這類文件，察貝爾在柏林能夠像他的朋友福格特在日內瓦一樣輕而易舉提供出來。我控告察貝爾的“控訴書”包括下列幾點：

（1）察貝爾在1860年1月22日“國民報”第37號上的一篇題為“卡爾·福格特和‘總匯報’”的文章里硬說：

“福格特在136頁及以下各頁上說：在1849年的流亡者中間，有一群人以**硫磺幫**或者也以制刷匠幫知名；這些人起初散居在瑞士、法國和英國，後來逐漸聚集在倫敦，並在那里把馬克思先生推崇為他們的著名首領。這些同行們的政治原則是‘無產階級專政’；他們的這種蠱惑人心的幻想開始不僅迷惑了一些較優秀的流亡者，而且還迷惑了維利希志願軍中的一些工人。他們在流亡者中間繼續‘萊茵報’的事業，該報在1849年曾進行反對參加運動的宣傳，並且一貫地攻擊所有議員，因為據說運動僅僅是以爭取帝國憲法為目的的。硫磺幫硬要它的信徒們服從一種極其嚴格的紀律。在他們中間，誰企圖用某種方式取得一點社會地位，誰只要有一點點想要成為獨立的人的願望，就被認為是革命的叛徒；而人們預料這種革命隨時都可能重新爆發，因此必須把革命的士兵準備好，以便把他們投入戰鬥。在這一伙細心保存下來的二流子裏面，經常因為散布流言和散發書信等等而發生糾紛、毆打和決鬥。這個人懷疑另一個人是間諜和反動分子，誰也不相信誰。硫磺幫的主要職業之一，是敗壞住在祖國的人的名譽，使他們拿出錢來，以便這個幫保密，不敗壞

他們的名譽。向德國寄去了不是一封信，而是几百封信，威脅說，要把他們參與革命的各种行動揭露出來，如果不把規定的款額限期交到指定地點的話。根據‘誰要不是無條件地站在我們一邊，他就是反對我們’這個原則，任何反對這些陰謀的人，不僅要在流亡界中敗壞他的名譽，而且要遭到報刊的‘危害’。‘無產者’對不尊重他們的那些民主主義者所進行的告密，塞滿了德國反動報刊的各欄，他們成了法國和德國秘密警察的同盟者。順便說說，福格特為了作進一步的說明，引證了前中尉泰霍夫 1850 年 8 月 26 日的一封長信，信中描述了‘無產者’的原則、陰謀、糾紛和勾心斗角的秘密同盟，從信中可以看出，馬克思怎樣以他那種拿破侖式的高傲態度和智力上的高人一等，來非常嚴酷地對待硫磺幫。”

為了便于理解下一部分，這裡必須指出：察貝爾在上面引證的一段摘錄中仿佛是轉述了福格特的“報道”，往下他為了更好地說明硫磺幫，已經以自己的名義接二連三地抬出了巴黎的舍爾瓦爾案件，科倫共產黨人案件，我寫的有關該案件的小冊子，李卜克內西的穆爾頓革命代表大會和通過我建立起來的李卜克內西同“總匯報”的關係，奧利“也是硫磺幫的一個渠道”，最後還有 1859 年 10 月 20 日比斯康普給“總匯報”的信，然後他用下面的話來結束：

“在比斯康普寫信以後過了一個星期，馬克思也寫信給‘總匯報’，表示願意向該報提供一份‘司法文件’作為反對福格特的證據，這件事我們也許下次還會談到。‘總匯報’的那些通訊員就是這樣。”

從第一號整篇社論中，我只把作為第一點加以轉載的摘錄拿來當做起訴材料，而且只從那里拿來下面這几句：

“〈由馬克思操縱的〉硫磺幫的主要職業之一，是敗壞住在祖國的人的名譽，使他們拿出錢來，以便這個幫保密，不敗壞他們的名譽。向德國寄去了不是一封信，而是几百封信，威脅說，要把他們參與革命的各种行動揭露出來，如果不把規定的款額限期交到指定地點的話。”

我在這裡當然要察貝爾提出**真證據**，來證明他的論點。我在

給我的律師、柏林的法律顧問維貝爾先生的第一封信里說，我向察貝爾不是要“几百封恐嚇信”，甚至也不是一封信，我只要他哪怕是提供出一行字，能揭發我黨的某一個著名同志參與過察貝爾所指的可恥行徑。察貝爾不是只要去找一下福格特，就能馬上得到成打這樣的“恐嚇信”嗎？萬一福格特不能從几百封恐嚇信中提供出一行字，那末他總該能說出遭到過上述勒索的几百個“住在祖國的人”的名字。既然這些人是住在“德國”，那末，柏林的法院無論如何要比日內瓦的法院更易于找到他們。

總之，我控告察貝爾，只就他的第一號社論的一點——用在政治上敗壞住在德國的人的名譽的辦法，來勒索他們的錢。同時，為了反駁他的第一號社論的其餘論點，我列舉了一些事實。在這裡我沒有要求真證據，而是引用了假證據。

關於硫磺幫或者也就是制刷匠幫的問題，約翰·菲力浦·貝克爾的信已講得夠清楚了。要弄清共產主義者同盟的性質和我同這個同盟的關係，可以把科倫的亨·畢爾格爾斯，即科倫共產黨人案件的被判刑者之一，傳到柏林去做證人，要他在法庭上發誓作證。其次，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他的文件中找到了一封寫於1852年11月的信，這封信的真實性可由倫敦和曼徹斯特的郵戳證明。我在信里對他談到了根據我的建議解散同盟一事，也談到了在解散決議中所列舉的理由：自從科倫的被告被捕以來，同大陸上的一切聯繫都斷絕了；這樣一個宣傳協會在目前根本不合時宜了。至於察貝爾無恥地說我“同德國和法國秘密警察”有聯繫這一點，似乎一部分可由科倫共產黨人案件來證實，一部分可由巴黎的舍爾瓦爾案件來證實。我以後還要回過頭來談談後一案件。關於前一案件，我已把我在1853年出版的“揭露科倫共產黨人案件”寄給我

的律師，並請他注意：可以把科倫的律師施奈德爾第二傳到柏林，要他發誓作證，證明我曾參與過揭露警察的下賤勾當。察貝爾斷言，好像我和我黨同志曾以對“不尊重”我們的“那些民主主義者所進行的告密，塞滿了德國反動報刊的各欄”。我對這種斷言提出了相反的事實：除了“新奧得報”以外，我從來沒有——不論是直接地或者間接地——從國外向任何一家德國報紙寄過通訊。根據我在这家報紙上發表的文章——必要時也可根據該報的編輯之一埃爾斯納博士的證詞，——就能證明，我從來不認為有必要提及任何一個“民主主義者”的名字。至於談到“總匯報”上李卜克內西的通訊，那末，他給該報撰稿開始於1855年春天，即在同盟解散三年之後，而且我事先一無所知；此外，在這些通訊中——像“總匯報”的許多全年合訂本證明的，——對英國政策作了符合他的黨的观点的闡明，但是只字未提“民主主義者”。如果李卜克內西在我離開倫敦時給“總匯報”寄去過一份倫敦出現的反對“民主主義者”福格特的傳單，那末，他是有充分權利這樣做的；因為他知道，這份傳單的出版者是一個“民主主義者”；“民主主義者”福格特曾親自邀請他參加他的“民主主義的”宣傳，從而，把他看成是跟他本人相等的“民主主義者”。察貝爾把我變成“‘總匯報’通訊員”的這種可笑的捏造，奧爾格斯先生已在奧格斯堡案件開始前幾天寫給我的一封信（附錄10）中進行了令人信服的反駁；順便說一句，他在这封信中竭力要消除他所想的我对“總匯報”的“自由主義”偏見。最後，察貝爾說“在比斯康普写信以后过了一个星期，馬克思也写信給‘總匯報’”的謊言也就不駁自倒了，因為比斯康普的信是在1859年10月20日寫的，而我根據奧爾格斯的請求轉寄“文件”時所附去的短箋，1859年10月24日已經在奧格斯堡地方法院了，那就

是說，這一短箋不可能是 1859 年 10 月 29 日在倫敦寫的。

為了便于法庭審理起見，我認為有必要給我提出的證據補充一些文件，這些文件將把“民主主義者”察貝爾企圖對我在流亡者中間的地位和我在國外的“陰謀”所進行的丑惡而卑劣的誣蔑，奉還誣蔑者。

最初，即從 1843 年底到 1845 年初，我都住在巴黎，一直住到基佐把我驅逐出境。為了說明我居住巴黎期間我在法國革命黨內所處的地位，我把弗洛孔的一封信寄給了我的辯護人，他以 1848 年臨時政府名義取消了基佐把我驅逐出境的命令，並且邀請我從比利時回到法國（附錄 14）。從 1845 年初到 1848 年 2 月底，我都住在布魯塞爾，一直住到羅日埃把我從比利時驅逐出境。後來，布魯塞爾市政當局把因驅逐我出境而逮捕我和我的妻子的那個警官撤職。在布魯塞爾有一個國際民主協會⁵⁹¹，協會的名譽主席是從荷蘭人手里救出了安特衛普的一位年老的將軍梅利奈。主席是擔任過比利時臨時政府委員的一位律師若特蘭；波蘭人的副主席是前任波蘭臨時政府委員列列韋爾；法國人的副主席是 1848 年二月革命以後成了土伊勒里宮警衛隊長安貝爾；德國人的副主席則是我，我是在布魯塞爾德意志工人協會會員和全體德國流亡者參加的一次公開集會上被選上這個职位的。若特蘭（若特蘭屬於所謂的共和主義者的美國學派，也就是我不熟悉的派別）在“新萊茵報”創辦時期寫給我的一封信和我的朋友列列韋爾寫的無關緊要的短箋，都足以說明我在布魯塞爾民主派中間的地位。因此，我把它們都附在辯護文件里（附錄 14）。

1849 年春我被趕出普魯士，1849 年夏末被趕出法國，隨後我到了倫敦，在那里，在同盟解散（1852 年）和我的多數朋友都離開倫

敦以后，我脫離了所有公開的和秘密的團體，甚至脫離了一切交際活動，雖然——經“民主主義者”察貝爾的許可——還經常向一部分優秀工人作政治經濟學的義務講演。我是在1850年9月15日退出倫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協會的，它在1860年2月6日慶祝成立二十周年；我被邀請參加這次慶祝會，會上一致通過了一項決議，把福格特的下列說法“痛斥為”一種“誹謗”，因為他硬說我“剝削”德國工人，特別是“剝削”住在倫敦的德國工人。當時擔任工人協會主席的彌勒先生，1860年3月1日曾請灣街治安法庭證明這項決議真實無誤。除了這一文件以外，我還給我的律師寄去英國律師、憲章派領袖厄內斯特·瓊斯的一封信（附錄14），他在信里對“國民報”上的《infamous articles》（卑鄙醜惡的文章）表示憤慨（厄內斯特·瓊斯是在柏林出生和受教育的，他比察貝爾更懂得德文），同時他還順便提起我多年給憲章派在倫敦出版的一些機關報無酬撰稿一事。我在這裡也不妨提一下，當工人議會⁵⁹²1853年底在曼徹斯特開會時，倫敦的流亡者當中只有路易·勃朗和我收到了作為名譽會員出席會議的邀請書。

最後，因為正直的福格特確信，我是靠“工人的血汗過活”的（我從來沒有接受過工人的一個生丁，或者向他們索取過一個生丁），因為“民主主義者”察貝爾硬說我在政治上“敗壞住在祖國的人的名譽”，“使他們拿出錢來，以便這個幫保密，不敗壞他們的名譽”，所以我請求“紐約論壇報”——這是第一流的美國的英文報紙，它有20萬訂戶，因而它幾乎同俾爾“推銷員”或察貝爾的“民主派機關報”一樣暢銷，——的managing editor〔主編〕查理·安·德納先生，要求他對我十年來給“論壇報”和“美國百科全書”等等有酬撰稿一事提出書面證明。他寫給我的那封滿紙贊揚的信（見

附录 14)，是我认为必須把它寄給我的律师以回击福格特—察貝尔的第一号臭气彈的最后一个文件。

(2)我們在察貝尔的第二号社論“怎样伪造激进傳单”(1860年1月25日“国民报”第41号)中讀到：

“天知道，从哪里为这家慷慨分发的报纸〈即“人民报”〉弄到錢；人們知道，馬克思和比斯康普都没有多余的錢。”

如果把这一段話孤立起来看，可以看成是惊奇的真誠流露，就如我說：“有一个胖子，我在柏林念大学时就知道他是一个在肉体和精神上都已經墮落了的蠢材——他办过一家孤儿院，他在1848年革命以前的創作活动仅限于給一个小地方的文学小报写过几篇匿名文章——这个胖子怎么会变成了‘国民报’的主編、股东和‘有多余的錢的民主主义者’——只有天曉得。而讀过巴尔扎克的著名小說⁵⁹³和研究过曼托伊費尔时代的那些人是能領会这一点的。”

但是，察貝尔的上一段文字，是在他說我同法国和德国的秘密警察有联系，說我同警察当局秘密勾結而写了許多恐嚇信以进行勒索的一段文字之后写的，并且它把那一段文字同我給法庭的控訴书的第三点中提到的“大量制造假鈔票”这句话直接銜接起来，因而他的那段話就有了完全不同的恶毒的含义。那就是在毫不掩飾地暗示說，我是用了某种不名誉的手段为“人民报”弄錢的。

从曼彻斯特得到的1860年3月3日的 affidavit，可以用来在法庭上駁斥察貝尔。这一 affidavit 中說，由我轉交給“人民报”的全部錢——除了我自己付出的几笔錢以外——都不像福格特所說的是“从拉芒什海峽彼岸”弄到的，而是从曼彻斯特，从我的朋友們的腰包里弄到的（見“奥格斯堡战役”）。

(3)“为了說明”“在馬克思操纵下的‘无产者’的党”的“策

略”，弗·察貝尔在第二号社論里說：

“因此，1852年，对瑞士的工人协会策划了一个大量制造假鈔票的极端可耻的密謀(詳情見福格特的著作)，等等。”

察貝尔就这样把福格特的关于舍尔瓦尔的冒險事件的說法加以改造，把我变成了“大量制造假鈔票”的道义上的禍首和有罪的同謀者。我所掌握的可以用来駁斥“民主主义者”察貝尔的这种說法的证明材料，包括了从舍尔瓦尔加入共产主义者同盟到他在1854年逃出日内瓦的整个时期。卡尔·沙佩尔1860年3月1日在弯街治安法庭上提出的 affidavit，证明舍尔瓦尔是先于我加入倫敦的同盟的；他从1850年夏到1852年春都住在巴黎，他在巴黎不是同我有联系，而是同我所敌視的沙佩尔和維利希的反同盟有联系的；在他假逃出圣伯拉惹監獄和重返倫敦(1852年春)以后，参加了当时公开的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我从1850年9月起就已不再屬於該协会)，一直到他在那里終于被揭发、被宣布为无耻之徒并被开除为止。其次，科倫的律師施奈德尔第二能够发誓作证，在科倫共产党人案件期間，对舍尔瓦尔所进行的揭露，即揭露他同倫敦的普魯士警察有联系等等，是由我发起的。我在1853年发表的“揭露”证明，我在案件結束以后公开地揭露了他。最后，約·菲力浦·貝克尔的信提供了有关舍尔瓦尔在日内瓦生活时期的材料。

(4)“民主主义者”弗·察貝尔在第二号社論里，以大笨蛋的邏輯，对反福格特的傳单“警告”胡謔了一大堆廢話，并且拚命散布流言蜚語，使人怀疑我寄給“总汇报”的費格勒所提出的关于該傳单来源的証詞的可靠性之后，結尾这样說：

“他(布林德)显然不是亲馬克思派的成員，我們觉得，使他变成替罪羊，对于該派來說并不十分困难，而为了对福格特提出的控告有分量，这种控告

就必須由某一个能对此承擔責任的相當的人來進行。馬克思派之所以能夠輕而易舉地把傳單說成是布林德寫的，正是由於後者事先在同馬克思的談話中和在‘自由新聞’上的一篇文章里，表示過類似的看法；利用布林德的這些意見和說法，就可以把傳單偽造成像是他的作品一樣……現在，任何人都可以隨心所欲地把馬克思或者布林德看成是傳單的作者，等等。”

察貝爾在這裡攻擊我，說我用布林德的名義偽造了文件，即傳單“警告”，說我後來寄給“總匯報”一份假證詞，把布林德說成是我所偽造的傳單的作者。從司法上對“民主主義者”察貝爾的這些攻擊加以反駁，既是致命的又是簡單的。這些反駁就是上引的布林德致李卜克內西的信、布林德在“自由新聞”上發表的文章、維耶和費格勒的兩份 affidavits(附錄 12 和 13)以及印出來的醫學博士沙伊伯勒的聲明。

大家知道，在“研究”里嘲笑巴伐利亞政府的這位福格特，在 1859 年 8 月底對“總匯報”提起訴訟。“總匯報”在 9 月就已設法使法庭對案件的審訊延期，然而，儘管予以延期，案件仍然在 1859 年 10 月 24 日審理了。如果在黑暗的王國巴伐利亞發生這類事，那末什麼事不會在光明的王國普魯士發生呢，“柏林有的是法官”這句諺語當然更不用提了。

我的律師、法律顧問維貝爾先生，是這樣草擬我的法庭控訴書的：

“‘國民報’編輯察貝爾博士在登載在本年該報第 37 號和第 41 號的社論里，一再公開地誹謗我，並且特別攻擊我：(1)竟說我現在和過去都用不名譽的和犯罪的辦法弄錢；(2)竟說我偽造匿名傳單‘警告’，並且不僅明明違背事實對‘總匯報’說某位布林德是傳單的作者，而且企圖用一個似乎我相信其內容虛假的文件來為此作證。”

法律顧問維貝爾先生起初選擇了刑事追究的途徑，就是說，他

把察貝尔的誹謗通知檢察官，要当局对察貝尔提出追究。1860年4月18日市法院作出了如下“决定”：

“原件由法律顧問維貝尔先生退回卡尔·馬克思博士先生，并通知：此案不具备使我有理由进行干涉的公众利益（1851年4月14日刑法典施行法規第十六条）。

王国市法院檢察官

签名：利佩

4月18日于柏林”

我的律师向檢察长上訴，1860年4月26日上訴法院作出了第二个“决定”，內云：

“致王国法律顧問維貝尔先生，倫敦的卡尔·馬克思博士先生在此地的受托人。茲退回您今年4月20日控告察貝尔博士进行誹謗的控訴书以及附来的一些文件，并說明：毫无疑問，檢察官在行使刑法典施行法規第十六条所授予的自行决定权时，他所遵循的唯一考虑是，是否有某种明显的公众利益使之有必要进行追究。我在本案中必須与王国檢察官一致地对这个问题給以否定的回答，因此我不接受您的控訴书。

王国上訴法院檢察长

签名：施瓦尔克

1860年4月26日于柏林”

我认为檢察官利佩和檢察长施瓦尔克的这两个駁回，是完全合理的。在世界各国，即是說也包括普魯士国家，所謂的公众利益也就是政府利益。普魯士政府，在追究“民主主义者”察貝尔对我进行誹謗一事上，看不到、也不可能看到“某种明显的公众利益”。普魯士政府的利益倒是在相反的方面。加之，檢察官沒有法官的那种表示自己意見的权利；他必須盲目地服从——甚至違反自己的观点和信念——他的上司的命令，归根到底是司法大臣的命令。

因此，我事实上是完全同意利佩和施瓦尔克两位先生所作的决定的，但是我怀疑利佩援引1851年4月14日刑法典施行法規第十六条在法律上是否正确。沒有一条普魯士立法責成檢察机关要說明理由：为什么它不使用它的进行追究的权利。而且在利佩援引的第十六条中，也沒有談到这一点，那末，究竟为什么要援引它呢？

于是我的律师按民事起訴，这使我松了一口气。如果普魯士政府沒有公众利益要追究弗·察貝尔，那我就更有重大的个人利益来进行自卫。現在我以我自己的名义出現。只要能使弗·察貝尔受到公开审判，至于作出什么样的**判决**，对我是无关紧要的。但是，当我得知存在的問題根本不是从司法上来审查我的起訴，而是从司法上来审查我有沒有**权利**对弗·察貝尔起訴时，請想一想我是感到多么驚訝啊！

根据普魯士的审判程序，任何一个原告在法官办理控告以前，即在对实际宣判进行准备以前，都必須向法官陈述自己的案件，使他深信你是有起訴权的；当我知道这种情况时，感到很惊奇。在預先审查案情时，法官可以要求提出新的证据，或者不接受一部分旧的证据，或者认为根本沒有起訴权。如果法官願意承认有起訴权，那末他就办理起訴，开始辯論的程序，而案件将由作出的判决解决。如果法官否定起訴权，那末他就简单地 per decretum [用命令]、用**决定**的方式来駁回原告。这种訴訟程序不仅是誹謗訴訟所固有的，而且是一般民事訴訟程序所固有的。因此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誹謗訴訟也像其他一切民事訴訟一样，由各审級用这类官方的**决定**駁回，也就是說，永远不予审理。

应当承认，不承认私人在他的私事方面有起訴权的法律，也就破坏了市民社会的最起碼的根本法。起訴权由独立的私人的理所

当然的权利变成了国家通过它的司法官员所赋予的特权。在每次法律爭論中，国家就站在私人 and 把它当做自己私产的法庭的門之間，并随心所欲地把門打开或关上。法官首先作为官吏来作出**决定**，以便然后作为法官来**判决**。同一个法官，他没有审問被告，不經過辯論的程序就**預先作出**是否有起訴权的**决定**，他，譬如說，站在控訴人一边，即作出在某种程度上认为控告合法，也就是在某种程度上对被告不利的决定，——这个法官在后来开庭审訊时应该**不偏不倚地作出**有利于控訴人或被告的**决定**，也就是应该不理睬他自己的預先的决定而作出决定。**乙**打了**甲**一記耳光。在**甲**沒有彬彬有礼地从司法官员那里得到起訴的許可以前，他不能对这个欺負者起訴。**甲**拒絕还给**乙**一块土地，**乙**为了能在法庭上維護自己的所有权，需要取得預先的許可，而这种許可是他可能得到；也可能得不到的。**乙**在报刊上公开地誹謗**甲**，而司法官员也許悄悄地“作出决定”，认为**甲**无权对**乙**提出控告。不难理解，这样一种訴訟程序，就是在純粹的民事訴訟程序中也会鬧出什么样的怪事来。至于各个政党在报刊上相互攻击时所进行的誹謗，那就更沒有什么好說的了！大家知道，在所有国家，甚至在普魯士，法官同其他人是一样的人。要知道，甚至普魯士王国最高法院的副院长之一**哥采**博士先生也曾在普魯士貴族院說，1848年、1849年和1850年的內乱，使普魯士的法学陷于混乱状态，需要一些時間来为之确定方針。誰能担保**哥采**博士沒有算錯确定方針所需要的時間呢？在普魯士，起訴权——例如对誹謗者的起訴权——是以一个官员的**預先“决定”**为轉移的，而这个官员又会由于所謂的“違反职责”（見1849年7月10日暫行条例和1851年5月7日懲戒法）而受到政府懲罰，即予以警告、罰款、强迫調任他职或者甚至帶有侮辱

性地撤銷其司法职务。这样的事，不用說向英国人解釋清楚，就是要他們大致相信，也是很难的！

問題是，我打算发表一本关于我 contra〔反对〕弗·察貝尔的 casus〔訴訟案件〕的英文小册子。艾德門·阿布在写他的“一八六〇年的普魯士”时，如能向他指出整个普魯士君主国内，除了受 Code Napoléon “恩施的”萊茵省以外，沒有一个地方存在起訴权，他会不惜付出一切！⁵⁹⁴ 人們到处都受法院的苦，但是，只有在少数国家里才不許人們向法院提出控告。

在这种情况下，非常明显，我向普魯士法院对察貝尔提出的訴訟，必然暗中变成我因察貝尔而同普魯士法院打官司了。但是，且撇开立法在理論上的冠冕堂皇詞句不談，还是讓我們来看看它在应用中的实际妙处。

1860年6月8日，王国柏林市法院作出了如下“决定”：

“关于1860年6月5日馬克思控告察貝尔进行侮辱的决定

1860年第三十八号案件

(1)起訴因缺乏犯罪构成而予以駁回，因为此間‘国民报’的两篇被指控的社論，只以奧格斯堡‘总汇报’的政治态度和匿名傳单‘警告’一事作为討論对象，而两篇社論中所包含的言論和論断，既然是作者本人的，并不是简单地引证別人的，那末它們就没有越过批評所容許的界限，因而根据刑法典第一五四条的規定，不能认为是应受懲罰的，因为不論从这些言論所采取的形式，或者从产生这些言論的情况来看，也都没有侮辱的意图。

王国市法院刑事庭

处理侮辱案件問題第一委员会 L. S.①

1860年6月8日于柏林”

① loco sigilli——盖章。——編者注

于是，市法院就禁止我对弗·察貝尔起訴，并且使察貝尔从而摆脱了他要对自己的公开誹謗負責这件不愉快的事情！为什么呢？“因缺乏犯罪构成”。檢察机关拒絕为我出面反对察貝尔，是因缺乏任何明显的公众利益。而市法院禁止我自己出面反对察貝尔，是因缺乏犯罪构成。为什么沒有犯罪构成呢？

首先，“因为‘国民报’的两篇社論只同‘总汇报’的政治态度有关”。

因为察貝尔事先无中生有地把我变成了“‘总汇报’的通訊員”，所以他也有权把我变成他同“总汇报”的带有竞争性的狗打架中的替罪羊，而我甚至无权对权大无边的察貝尔的这一“决定”提出控告！硫磺帮，制刷匠帮，complot franco-allemand〔法德密謀〕，穆尔頓革命代表大会，科倫共产党人案件，在日内瓦制造假鈔票，“萊茵报”的事业”，如此等等——所有这一切都“只”同“‘总汇报’的政治态度”有关。

其次，察貝尔并没有“侮辱的意图”，当然沒有！这位好心腸的小子只有想用謊言在政治上和道德上杀害我的意图。

如果“民主主义者”弗·察貝尔在“国民报”上說我大量制造伪币，說我以第三者的名义伪造文件，敗坏住在祖国的人的名誉，用揭发来勒索他們的錢等等，——那末，从法律上讲，察貝尔这时的目的只能是二者居其一：不是誹謗我就是揭发我。如果是前者，察貝尔就应受到法庭的懲罰；如果是后者，他就有責任在法庭上证明他的話有凭有据！“民主主义者”弗·察貝尔的其他主观意图同我有什么相干呢？

察貝尔进行誹謗，但“沒有侮辱的意图”，他想像一位土耳其人一样破坏我的名誉；这个土耳其人砍掉一个希腊人的脑袋，但沒有

使他感到疼痛的意图。

察貝尔“侮辱的”特殊“意图”，——仅仅根据“民主主义者”弗·察貝尔誹謗性地强加在我身上的那些卑鄙齷齪行为來說，就可证明“侮辱”和“侮辱的意图”，——这位好心腸的察貝尔的恶毒的意图，从他的第一号和第二号社論的字里行間全部流露出来了。

福格特的“主要著作”連同附录在內，不下 278 頁。而习惯于 «to draw out the thread of his verbosity finer than the staple of his argument» [“胡謔比說理更高明”]① 的弗·察貝尔，廢話連篇的弗·察貝尔，愚蠢的察貝尔，居然能把这 278 頁压缩成报纸上的五栏文字，而沒有漏掉福格特对我和我党的任何一点誹謗。弗·察貝尔把該书最骯髒的部分編成文选，从不太刺鼻的部分中作出內容摘要。弗·察貝尔习惯于把两个毫无价值的思想——molecules [分子] 拉长到 278 頁，現在把 278 頁压缩成两篇社論，而在这一过程中甚至沒有丢掉一个卑鄙的原子。Ira facit poetam [憤怒出詩人]②。要把察貝尔患水肿病的脑袋像变魔术一般变成具有如此巨大压力的水压机，需要多少憤恨啊！

另一方面，憤恨使他的眼睛发黑，因而他只要能再增加一点卑鄙的詆毀，就不惜把一种神奇的力量，真正神奇的力量加在我的身上。

察貝尔在第一号社論中从描述由我操纵的硫磺帮开始，并順利地把我和我党同志变成“法国和德国秘密警察的同盟者”，同时，他还說，“这些人”痛恨福格特，因为福格特同他們相反，經常地拯救瑞士，然后，他繼續写道：

① 莎士比亚“爱的徒劳”第五幕第一場。——編者注

② 这里套用了尤維納利斯的第一首諷刺詩中的一句話。——編者注

“当福格特去年对‘总汇报’提起訴訟的时候，該报曾收到倫敦的另一个同伙比斯康普的一封信……写信人竟无耻透頂地自己提議願做像李卜克內西先生一样的第二个通訊員。在比斯康普写信以后过了一个星期，馬克思也写信給‘总汇报’，表示願意提供一份‘司法文件’作为反对福格特的证据，关于这个〈指文件，证据还是福格特？〉，我們也許下次还要談到。”

察貝尔是1月22日許下这个諾言的，他1月25日在“国民报”第41号上就兌現了，在那里，他这样写道：

“因此，布林德不承认自己是傳單的作者；比斯康普在10月24日致‘总汇报’的信中第一次……說他是傳單的作者……为了繼續坚持布林德是作者，馬克思于10月29日写信給‘总汇报’。”

由此可見，弗·察貝尔不是一次，而是两次——最初是在1月22日，后来是在1月25日，即在經過了三天考虑之后，——把一种神奇的力量加在我的身上，使我有可能1859年10月29日在倫敦写了一封信，而它在1859年10月24日就在奥格斯堡地方法院里了。而且，这两次他把这种神奇的力量加在我的身上，都是为了要說我寄給“总汇报”的“文件”同比斯康普致“总汇报”的不光彩的信之間有联系，为了把我的信說成是比斯康普的那封信的 *pedisequus* [續篇]。除了憤恨、咬牙切齿的憤恨以外，还有什么东西能使这位弗·察貝尔变成能够相信奇迹的、愚蠢无比的大傻瓜呢？

但是，市法院“繼續辯护”說，察貝尔的第二号社論“只以匿名的傳單‘警告’一事”作为“討論对象”。作为对象？應該說是借口。

艾塞勒-柏塞勒，这一次以“祖国之友”这一名义为掩护，看来在1859年11月寄給民族联盟一封“公开信”⁵⁹⁵，反动的“新汉諾威报”轉載了这封信。“公开信”超出了察貝尔的“民主”的尺度，这种民主用对霍亨索倫王朝表現的卑躬屈节来同在哈布斯堡王朝面

前表現的獅子般勇猛相平衡。“公开信”使“新普魯士報”有机会作出了决不是独创的发现：如果民主一旦开始，它完全不一定就在弗·察貝尔身上和他的“民主派机关报”上了結。察貝尔大动肝火，写了第二号社論：“怎样伪造激进傳单”。

我們这位了不起的察貝尔說道：“在我們邀請‘十字報’同我們一起根据福格特所指的文件和所作的說明来审查傳单(“警告”)的产生經過时，我們希望該报最終承认：当我們在两个月以前說給民族联盟的公开信适用于該报而不适用于我們，写这封信是为該报的篇幅而不是为我們報紙的篇幅时，我們毕竟是說得对的。”

所以，福格特 radicaliter〔激进地〕使“民主主义者”察貝尔知道了激进主义的秘密，察貝尔打算使“十字報”也知道“怎样伪造激进傳单”的秘密，或者像市法院所說的“只以傳单‘警告’一事作为討論对象”。察貝尔究竟是怎样着手干这件事情的呢？

他是从“馬克思操纵下的‘无产者’的党”的“策略”开始的。他先讲“馬克思操纵下的无产者”隱藏在一个工人协会的背后，但以該协会名义从倫敦同国外的各工人协会通訊，“打算敗坏这些协会的名誉”，从事“阴谋活动”，組織秘密同盟等等，最后还伪造一些“必然要引起警察”对各协会进行“迫害”的“文件”，“打算敗坏这些协会的名誉”。于是，为了开导“十字報”“怎样伪造激进傳单”，察貝尔首先解釋說，“馬克思操纵下的‘无产者’的党”怎样伪造警察性质的“信件”和“文件”，但决不是“傳单”。为了叙述“怎样伪造激进傳单”，他繼續叙述說，“馬克思操纵下的无产者”1852年在日内瓦怎样“大量制造假鈔票”，即仍然不是“激进傳单”。为了叙述“怎样伪造激进傳单”，他說，“馬克思操纵下的无产者”1859年在洛桑中央节上怎样采用一些敌視瑞士和敗坏工人协会名誉的“手

腕”，即仍然不是“激进傳单”；他說，“比斯康普和馬克思”怎样用只有“天”才知道其来源的錢出版“人民报”，仍然不是“激进傳单”，而是周报；但在这一切以后，他竭力为福格特的招募局的洁白无瑕的純洁說好話，但仍然不是“激进傳单”。他就这样占用了“怎样制造激进傳单”这篇文章的三又四分之一栏中的两栏。这样一来，对他的文章的三分之二栏來說，匿名傳单的产生經過，只不过是一种借口，借以叙述“朋友”和同謀者弗·察貝尔在“‘总汇报’的政治态度”这一标题下还没有来得及告訴世人的那些福格特的卑鄙齷齪的东西。只是在最后，这位邓斯第一才談到“伪造激进傳单”的艺术，即談到关于傳单“警告”的“产生經過”。

“布林德不承认自己是傳单的作者；比斯康普在10月24日致‘总汇报’的信中第一次厚顏无耻地說他是傳单的作者……为了繼續坚持布林德是作者，馬克思于10月29日写信給‘总汇报’說：‘因为布林德拒絕证实他对我和其他人所說的話，我弄到了隨信附去的文件。’”

察貝尔之所以觉得这一文件的真实性可疑，是因为李卜克內西……“奇怪地”补充說：“我們想使市政府(?)〈这是察貝尔的原文中原来有的問号〉证明我們的签字真实无誤”——而察貝尔永远决定除了柏林市政府以外，不承认其他市政府。察貝尔接着談到了費格勒的声明的内容，这个声明促使布林德把霍林格尔和維耶的证明寄給“总汇报”作证，证明傳单不是在霍林格尔印刷所排印的，也就是說，它并不是布林德写的，同时他还說：

“始終随机应变的馬克思 11月15日对‘总汇报’作了答复。”

察貝尔列举了我的答复中的各点。馬克思說了这……馬克思說了那……“除此以外，馬克思引证”。这就是說，既然我“除此以外”什么也沒有說，那末，察貝尔当然应把我的答复中的各点告訴

給他的讀者？你們不太了解察貝爾！他故意不提掩盖和隱瞞了我的答复中的主要一点。我在11月15日的声明中列举了不同的各点，即（1）……（2）……最后，（3）“……‘人民报’上轉載的”（傳单）“用霍林格尔印刷所还保存的活字版排印，是偶然的。这样一来，也不用证詞，只要把傳单同‘人民报’轉載的傳单加以简单的对照，就可以在法庭上证明傳单出自菲·霍林格尔印刷所”。这一点决定整个問題，察貝爾对自己說。我的讀者們不應該知道这一点。他就这样巧妙地隱瞞了我的答复中的最有說服力的地方，反而硬說我有着令人可疑的随机应变。可見，察貝爾在叙述“傳单的产生經過”时，进行了两次捏造——头一次是日期，另一次是我在11月15日发表的声明的内容。他通过**双重捏造**得出这样的結論：我“**伪造了**”傳单，而且伪造成“看起来像是”布林德的“作品”；我还給“总汇报”寄去了一份假证詞，冒充費格勒的证詞，而且完全是故意这样做的。攻击別人伪造文件，并把伪造文件的責任諉罪于第三者，在柏林市法院看来，“沒有越过批評所容許的界限”，更不包含“侮辱的意图”。

察貝爾在他的“怎样伪造激进傳单”这个处方的結尾，突然想到他还没有把福格特的一个无耻的臆造說出来，他即刻在他的第二号社論的結尾赶紧加了这样一个注解：

“1850年曾发出另一个告德国‘无产者’通告，这个通告〈福格特认为〉是議会的狼，alias〔或者說〕**被囚的狼**起草的，該通告同时被背地塞給了汉諾威警察当局。”

察貝爾这个脑滿腸肥的胖汉和民主主义者，报道了“新萊茵报”一位前編輯的这一警探軼事以后，就笑嘻嘻地向他的讀者告別了。“被囚的狼”这几个字并不屬於福格特，而是屬於弗·察貝爾

的。他的西里西亞的讀者想必知道得很清楚，这里所談的是他們的同鄉、“新萊茵報”的前編輯之一威·沃尔弗。这位好心腸的察貝尔是多么煞費苦心地想知道“新萊茵報”同法国和德国警察当局的关系的詳細情况啊！他的西里西亞人可能会以为这里所談的是他的、察貝尔自己的伯·沃尔弗，是察貝尔的天然上司（natural superior），大家知道，这个人同两位制造假情报的名家——倫敦的路透和巴黎的哈瓦斯——結成“秘密同盟”，按自己的一套方式用电报傳播世界的重大事件。但是，著名的秘密警探济格蒙德·恩格兰德尔是路透社的灵魂，也就是伯·沃尔弗—路透—哈瓦斯这个三位一体的活生生的統一。

尽管有这一切，尽管民主主义者察貝尔沒有侮辱的意图，柏林市法院还是声称，在察貝尔的两篇社論里到底还是“有越过批評所容許的界限的言論和論断”，也就是应受“懲罰的言論和論断”，無論如何是可以成为起訴对象的。那末，察貝尔就出来吧！把察貝尔交給我，让他在法庭面前发抖吧！別动！——市法院喊道。市法院說，两篇社論里所发表的“言論和論断，既然是作者〈察貝尔〉本人的，并不是简单地引证别人的”，那就沒有越过“批評所容許的界限”，不是“应受懲罰的”，因此，不仅不能懲罰察貝尔，而且不能向法庭对他提出控告；“案件应当終止，費用应由原告 a conto〔負担〕”。总之，察貝尔的“言論和論断”的誹謗性部分是“簡單的引证”。Voyons!〔我們走着瞧吧!〕

你們記得，这一章的开头就說，我对誹謗的控告是以察貝尔的两篇社論中的四点为基础的。在关于“人民报”的錢的来源一点中（即上述控告各点的第二点中），察貝尔本人並沒有說他是引证，而且的确也不是引证：

察貝爾(“國民報”第 41 号):

“天知道是从哪里为这家慷慨分发的报纸〈“人民报”〉弄到钱的;人们知道,马克思和比斯康普都没有多余的錢。”

福格特(“主要著作”第 212 頁):

“‘总汇报’的常任通訊員是这家报纸〈“人民报”〉的撰稿人,該报是用来历不明的款項創辦起来的,因为不論比斯康普或者马克思,都没有为此所必需的資金〈即为了用来历不明的款項創辦报纸嗎?〉。

在第二个被指控的地方(上面,第四点),即攻击我以布林德的名义伪造文件的地方,察貝爾甚至明确地声明,他是以自己的,即察貝爾的名义說話的,而不是以福格特的名义說話的。

“我們”,——身为 Dulness 王国的統治者,察貝爾当然要用 pluralis majestatis [至尊的复数],——“我們觉得,使他〈布林德〉变成替罪羊,对于該派〈马克思派〉來說并不十分困难……利用布林德的这些意見和說法,就可以把傳单伪造成像是他的〈布林德的〉作品一样。”(“國民報”第 41 号)

我应当把我所指控的第三个地方(上面,第三点)重新全部“引证”一下:

“因此,1852 年,对瑞士的各工人协会策划了一个大量制造假鈔票(詳情見福格特的著作)的极端可耻的密謀;这个密謀如果不被及时揭发,那就会給瑞士当局带来莫大的煩惱。”

难道这就像市法院断言的那样是“簡單的引证”,或者这是一般的引证?这部分地是从福格特那儿抄襲来的,但决不是引证。

首先,察貝爾本人說他不是引证,而是以自己的名义講話的,他在括弧里向他的讀者說:“詳情見福格特的著作”。現在我們就来看看这个地方吧!日内瓦人都知道,舍尔瓦尔是 1853 年春才到日内瓦的,他的“密謀”和逃亡是在 1854 年春发生的。因此,福格特在日内瓦不敢說“密謀”是在“1852 年……策划”的。他把这个

弥天大謊留給了柏林的好心腸的察貝尔。福格特接着說：

“紐金特〈舍尔瓦尔〉本人已經为此目的〈制造假鈔票等等〉准备好各种各样的石版和銅版。”（“主要著作”第 175 頁）

可見，已經为制造假鈔票准备好了各种各样的石版和銅版，但是还没有伪造出鈔票和国庫券来。与此相反，在察貝尔笔下，已經“制造了”，而且“大量”“制造了假鈔票”。福格特說，按照章程，舍尔瓦尔的密謀的“目的”是：

“通过他自己的手段，即通过大量制造假鈔票和国庫券，来同专制作斗争。”（同上）

察貝尔抹去同专制作斗争，只留下“大量制造假鈔票”。在察貝尔笔下，这便成了普通的刑事罪，甚至是没有用虚伪的政治借口为“秘密同盟”盟員稍加掩飾的刑事罪。察貝尔用这种手法一般地“引证”“主要著作”。福格特不得不把他的荒誕的故事写成一本“书”。因此，他詳加鋪叙，造謠誹謗，塗塗抹抹，乱画一頓，大肆渲染，任意塗改，胡吹乱扯，随便發揮，故意攪乱，引經据典，无中生有，fa del cul trombetta〔把臀部也变成了喇叭〕^①。这样一来，福斯泰夫的灵魂也就透过这些虚构的事实到处显现出来，而他通过他自己的叙述，又无意識地把这些事实变成原来的一无所有了。察貝尔本来要把这本书压缩成两篇社論，并力图不漏掉一点儿卑鄙齷齪的东西，現在却除了每一个虚构的“事实”的 caput mortuum^②以外，他抛掉了一切，把这些誹謗的枯骨一顆接一顆地联成一串，然后虚伪地热心地一顆一顆数弄这些念珠。

我們不妨举出我們正在考察的一件事做例子。我首先揭发出

① 但丁“神曲”地獄篇第二十一首歌。——編者注

② 直譯是：髑髏；轉意是：殘骸。——編者注

来的事实是：舍尔瓦尔是一名外国使馆雇佣的秘密警探，一名 agent provocateur [奸细]，福格特竟把自己的臆想同这一事实搅在一起。他的这段话是这样说的：

“纽金特〈舍尔瓦尔〉本人已经为此目的〈制造假钞票〉准备好各种各样的石版和铜版，已经指定秘密同盟的一些轻信成员，要他们带上一包包这些〈还没有制造出来的〉假钞票动身到法国、瑞士和德国去；但是接着就发生了向警察局的告密，同时可耻地把各工人协会牵连进去，等等。”（“主要著作”第 175 页）

因此，在福格特笔下，当舍尔瓦尔还仅仅准备好了为制造假钞票所必需的铜版和石版的时候，当他的密谋的目的还没有达到的时候，当还缺乏 corpus delicti [犯罪构成] 的时候，当除了他本人以外，谁的名誉也还没有受到败坏的时候，舍尔瓦尔就已经把他自己的行动向警察局告密了。但是福格特的舍尔瓦尔急忙“可耻地”把“各工人协会”牵连到他的“密谋”中去。利用舍尔瓦尔的效劳的外国使馆，就像舍尔瓦尔一样愚蠢，一样急忙地

“在秘密询问中要瑞士警察当局注意工人协会里正在进行着某种政治阴谋活动，等等”。

同时，这帮愚蠢的公使们，没有耐心等待他们委托舍尔瓦尔孵出的密谋成熟起来，而且由于幼稚急躁，竟徒劳无益地败坏了自己代理人的名誉；他们在“边境上”布置下宪兵，以便——“如果事情发展到”他们不让他发展的“地步”，——“抓住”这帮携带他们会阻止制造的“假钞票”的舍尔瓦尔的特使们，

“并利用这一事件来进行一次大搜捕，在搜捕时，大批无辜者要为几个坏蛋干的勾当受到惩罚”。

当福格特往下说到“这整个密谋计划订得极其可憎”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会同意他：这个计划是订得极其愚蠢的，而当福格特大

言不慚地結束說：

“我不否认，我为粉碎这些恶毒計劃作出了我的重大貢獻”

的时候，任何人都懂得这种意見的 *pointe* [要点]①，并且一定会对我们这位快活的家伙捧腹大笑。现在我们把察貝尔的像和尚的編年史一样索然寡味的說法同这比較一下吧！

“因此，1852年，对瑞士的各工人协会策划了一个大量制造假鈔票(詳情見福格特的著作)的极端可耻的密謀；这个密謀如果不被及时揭发，那就会給瑞士当局带来莫大的煩惱。”

在这里，一大堆同样索然寡味的、同样可耻的事实都被装在一个短句里。这些事实是：1852年出現的“极端可耻的密謀”；“大量制造假鈔票”，即普通的刑事罪；蓄意敗坏“瑞士各工人协会”的名誉，即背叛自己的党；可能給“瑞士当局”带来“莫大的煩惱”，即为了大陆上各暴君的利益而反对瑞士共和国的 *agent provocateur* [奸細]；最后是“密謀被及时揭发”。批評在这里失去了福格特叙述中所有的一切据点，——它們完全被巧妙地除去了。只有相信或者不相信。察貝尔用这种方式把整个“主要著作”中只要涉及到我和我党同志的地方都加了一番工。海涅說得很对：沒有一个人像一头发狂的驴子那么危險。

最后，察貝尔在我指控的第四个地方(上面，第一点)，即第一号社論中开头揭露硫磺帮的地方，是这样写的：“福格特在第136頁及以下各頁上說”。察貝尔在这里不說他是否在归納或引证。他避免使用引号。事实上，他不是在引证。这是应当預料到的，因为察貝尔把“主要著作”的第136、137、138、139、140和141頁压缩在大

① 直譯是：中心点。——編者注

約每行由 48 个字母組成的 51 行句子里，这些句子排得密密麻麻，不留一点空白，相反地，他把句子挤压得就像荷兰青魚一样，加之还要在这 51 行句子中为自己的創作找到地盘。他要是碰到一个特別齷齪的句子，他就几乎原封不动地把它放进他的这一包东西里面去。可是，他把这些摘录杂乱无章地摆在一起，不按“主要著作”的頁碼順序，而照他的目的所需要的那样排列。他把福格特一个句子的末尾按在另一个句子的开头。为了构成一个句子，他又利用成打福格特句子中的小詞。凡是福格特笔下的有碍鮮明地表現誹謗的那些修辞学上的廢物，察貝尔都省去了。譬如福格特說：

“敗坏住在祖国的人的名誉，使他們不得反抗敲詐的企图，并拿出錢来。”

察貝尔却說：

“敗坏名誉，使他們拿出錢来。”

在其他場合，察貝尔认为在福格特的缺少風格的叙述里是模稜两可的东西，都加以改动了。例如福格特說：

“……使他們拿出錢来，以便这个帮对敗坏他們名誉的那些事实保密。”

察貝尔則写道：

“以便这个帮保密，不敗坏他們的名誉。”

最后，察貝尔整句整句地加进自己制造的句子，譬如：

“硫磺帮硬要它的信徒們服从一种极其严格的紀律”，同时“他們”——即“这些在流亡者中間繼續‘莱茵报’事业的同行們”——“成了法国和德国秘密警察的同盟者”。

可見，在我提出指控的四个地方当中，根据察貝尔本人的說法，就有三个地方是屬於察貝尔的，而第四个所謂的“引证”，尽管它同其他引证混在一起，但它决不是引证，更不是像市法院所說的

是“簡單的引証”，尤其不像同一个市法院所說的是引証許多“別人（多數）”的引証。相反地，在察貝爾所有談及我的“言論和論斷”里，沒有一行包括“批評和判斷”（“容許的”或“不容許的”）的話。

但是，我們姑且假定市法院的事實前提的真實程度，同它實際上的虛假程度一樣；我們姑且假定察貝爾只是引証了一些對我的誹謗性聲明。難道這種情況真使市法院有禁止我對弗·察貝爾提出起訴的合法權利嗎？在我下面即將引証的“決定”里，普魯士王國上訴法院相反地解釋說：

“根據刑法典第一五六條，無論上述文章里提出的事實是否是作者本人說的話，還是從第三者說的話中引証出來的，均不能使犯罪構成問題有任何改變。”

因此，是引証或者不是引証，“民主主義者”察貝爾都要對他“說的話”負責。市法院已經解釋說，察貝爾對我說了本身就“應受懲罰的”話，但只要這些話是引証，因此就保了險。打倒這種法律上虛假的借口！——上訴法院喊道。這樣，我終於能夠把察貝爾抓住了，法院的大門敞開了，Italiam, Italiam! [意大利，意大利！]①

我的律師向上訴法院控告市法院的決定，而在1860年7月11日得到了如下的“決定”：

“今年1月22日和25日‘國民報’第37號和第41號上發表的題為‘卡爾·福格特和“總匯報”和‘怎樣偽造激進傳單’這兩篇社論，不能看成是對原告、倫敦的卡爾·馬克思博士的誹謗。雖然根據刑法典第一五六條，無論上述文章里提出的事實是作者本人說的話，還是第三者說的話，均不能使犯罪構成問題有任何改變，但仍不能阻止報刊討論和批評黨派的活動及其政論性的爭論，只要論戰形式中沒有侮辱的意圖。而本案中是不能認為有侮辱意

① 味吉爾“亞尼雅士之歌”第3冊。——編者注

图的。

上述文章主要說明了：卡尔·福格特博士为一方和奥格斯堡‘总汇报’为另一方，在最近战争引起的支持意大利人利益或支持奥地利人利益問題上的看法上的冲突；支持奥格斯堡‘总汇报’反对福格特的所謂倫敦德国流亡者参加了这一冲突；这些流亡者的党派糾紛和互相傾軋！

如果在叙述过程中，把原告对这些党派的态度和他部分地参加这些党派的勒索，特别是他提供实际材料来竭力帮助奥格斯堡‘总汇报’同福格特进行論战都归入所考察的問題之内，那末，两篇社論中的有关各点，按原告本人的控訴书里所举的事实来看，与其說遭到了原告所想的反駁，不如說得到了证实。如果他进一步断言，說人們以侮辱他名誉的形式把他同党派的阴谋等量齐观（上述文章把这些阴谋尖锐地斥之为反常的，或者是无原則的和不体面的），那末，这种断言不能认为是**有根据的**。实际上，如果第一篇文章根据福格特的叙述指出說，‘1849年的流亡者逐渐聚集在倫敦，并在那里把馬克思先生推崇为他們的著名首領’，而在談到泰霍夫的信时說：‘……从信中可以**看出**，馬克思怎样以他拿破侖式的高傲态度和智力上的高人一等来非常严酷地对待硫磺帮’，那末，这里实际上只是对福格特所称的硫磺帮作一評定，而不是对馬克思的攻击，在这里反而把馬克思描繪成一个具有优越性和善于駕馭別人的人；文章更沒有把他个人同那些被控进行勒索和告密的人联系在一起。同样地，第二篇文章根本沒有提到原告硬說上述布林德是傳单‘警告’的作者，而是深信他不是的，也沒有提到原告把第三者的分明是不可靠的证件轉寄給奥格斯堡‘总汇报’。至于排字工人費格勒的证詞是值得爭議的，原告在控訴书里引证印刷所老板霍林格尔和排字工人維耶的相反說法时，自己也承认这点。此外，根据原告自己的記述，后来有一位叫沙伊伯勒的人承认自己是这个傳单的作者，而且是在‘国民报’发表两篇文章以后。

因此，必須认为上月21日对王国市法院于同月8日所作的否决决定提出的控告是沒有根据的，因而予以駁回。由于沒有根据的控告被駁回，应立即——为了避免强制追繳，——向市法院收費处繳納25个銀格罗申。

王国上訴法院刑事庭第二处

古特施米特 舒尔采

1860年7月11日于柏林

由此地的法律顧問維貝尔先生轉交哲学博士卡尔·馬克思。”

当我从我的法律顧問先生那里得到这个“决定”的时候，我初看时看漏了开头和結尾；由于我不熟悉普魯士法律，我竟认为摆在我面前的是“民主主义者”弗·察貝尔递交上訴法院的一份为自己辯护的文件的副本。我自言自語地說，察貝尔关于“卡尔·福格特博士和奥格斯堡‘总汇报’的看法”（見附录 15）和“意大利人利益和奥地利人利益”所說的那些話，显然是从供“国民报”用的一篇文章中錯放进他的 plaidoyer〔辯护詞〕里去了。

“民主主义者”弗·察貝尔写的两篇社論几乎共占了六栏，然而，他在专談我的四栏中只字未提这些看法和利益。察貝尔在他的 plaidoyer 中說我

“提供实际材料帮助奥格斯堡‘总汇报’同福格特进行論战”。

他把福格特对“总汇报”的訴訟称之为“总汇报”同福格特的論战。如果訴訟和論战是同一个东西，那末，难道我需要得到檢察官、市法院和上訴法院等等的允許来进行我同察貝尔的論战嗎？但是，察貝尔甚至要人相信，似乎他的两篇社論談到我对“总汇报”的关系的“有关各点”，按我本人“所举的事实来看，与其說遭到我所想的反駁，不如說得到了证实。”与其說——不如說？jus〔法律〕只知道：非此——即彼。察貝尔的“有关各点”究竟是些什么呢？

察貝尔在第一号社論中指出我同“总汇报”的关系的“有关各点”是：

（1）据說李卜克內西是由于我正式給了他一項证明文件，才成了“总汇报”的通訊員的。我給法院的控訴书已揭发了察貝尔的謊言，但是我认为再提出其他“事实”来证明这种荒謬是多余的。

（2）察貝尔說我在 10 月 29 日从倫敦寄給“总汇报”一項“司法文

件”，這項文件在10月24日就在奧格斯堡地方法院里了，他並且認為我舉出的“事實”证明了這“一點”！察貝爾從我給法院的控訴書里舉出的事實中看出來：的確，不問政治見解如何，在福格特還沒有提出訴訟以前就企圖公開硬把我說成是傳單“警告”的作者以後，我寄出有關傳單來源的文件就成了必需的了。（3）察貝爾說我是“總匯報”的通訊員的那“一點”，我已用確凿的文件駁倒了。察貝爾的第二號社論“怎樣偽造激進傳單”里，像早已指出的，談到我同“總匯報”的關係時，只有以下“有關各點”，即說我自己偽造了“警告”，把它嫁禍于布林德，並企圖通過費格勒的假證詞來證明是布林德的粗劣作品。這些“有關各點‘按我的控訴書里’所舉出的事實來看”是不是“與其說遭到了我所想的反駁，不如說得到了證實”呢？察貝爾本人所承認的則與此相反。

察貝爾是否知道沙伊伯勒是傳單“警告”的作者？察貝爾是否相信，根據我自己也承認“值得爭議的”排字工人費格勒的證詞是可靠的嗎？但是，從哪里看得出，我曾硬說察貝爾知道這些和相信這些呢？“相反地”，我的控訴書倒同察貝爾的“有關各點”——即說我“把傳單偽造成像是他的〈布林德的〉作品一樣”，說我後來企圖通過費格勒的證詞來證明它是布林德的粗劣作品等等有關的。

最後，我發現察貝爾提出來給自己辯護的一個論點，至少在我看來是很有趣的。

“如果”，——他說，——“如果他〈原告馬克思〉進一步斷言，說人們以侮辱他名譽的形式把他同黨派的陰謀〈硫磺幫的陰謀〉等量齊觀（上述文章〈即察貝爾的社論〉把這些陰謀尖銳地斥之為反常的，或者是無原則的和不得體的），那末，這種斷言不能認為是有根據的……文章更沒有把他個人同那些被指控進行勒索和告密的人聯繫在一起。”

人們談論羅馬人說：«memoriam quoque cum voce perdidimus» [“但願我們在失去聲音的時候也失去記憶”]，顯然，察貝爾不是這樣的羅馬人。他失去了記憶，但沒有失去舌頭。察貝爾不僅改變硫磺，而且使硫磺幫從晶態變成液態，從液態變成汽態，以使用這種紅色汽體把我弄得頭昏腦脹。他說硫磺幫是一個“黨”，他從來沒有把我同它的“陰謀”“等量齊觀”，他甚至從來沒有把跟我“有聯系的”人同它的“勒索和告密”聯系在一起。勢必要把硫汽變成硫華。

察貝爾在第一號社論（1860年“國民報”第37號）里，是從稱“馬克思”為硫磺幫的“著名首領”開始他的關於硫磺幫的“有關各點”的。察貝爾為了對硫磺幫“作進一步說明”，誠然沒有指出硫磺幫第二名成員的名字，但他指的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因為他引證的那封信，正是泰霍夫談他同我、同弗·恩格斯和康·施拉姆的會晤的。察貝爾說後面兩個人是硫磺幫的配角。他接着又把舍爾瓦爾說成是駐倫敦的密使。然后就輪到李卜克內西了。

“這個李卜克內西，in nomine omen [從名字上就可看出]①，是馬克思的最奴顏婢膝的信徒之一……李卜克內西一到達，就為馬克思效勞，並且取得了他的主子的充分信任。”

李卜克內西後面是“奧利”，“也是硫磺幫的一條渠道”。最後是“倫敦的另一個同伙比斯康普”。這類說法接連不斷地在第一號社論里出現，但是在第二號社論的結尾，又提出了硫磺幫的一個成員，威·沃尔弗——“議會的狼，alias [或者說] 被囚的狼”，——他受託辦理“分發通告”這件重要事情。總之，根據察貝爾的“有關各

① 李卜克內西這個姓的後半——克內西(Knecht)，按德文是“奴隸”、“僕從”的意思。——編者注

点”，**硫磺帮**是由以下成員組成的：**硫磺帮**的首領——**馬克思**；**硫磺帮**的配角——**弗·恩格斯**；**硫磺帮**的倫敦密使——**舍尔瓦尔**；**馬克思**的“最奴顏婢膝的信徒之一”——**李卜克內西**；“也是**硫磺帮**的一条渠道——**奧利**”；倫敦的“另一个同伙”——**比斯康普**；最后是**硫磺帮**的通告起草人——**沃尔弗**。

这样拼凑起来的这个**硫磺帮**，在**察貝尔社論**的前51行里，以各种不同的名称出現：“**硫磺帮**或者也称制刷匠帮”；“在流亡者中間繼續‘**萊茵報**’的事業的同伙們”；“**无产者**”，或者像第二号社論所說的“在**馬克思**操纵下的‘**无产者**’的党”。

这就是**硫磺帮**的人員和名称。**察貝尔**在他的“有关各点”中对**硫磺帮**的組織作了簡短中肯的描述。“**馬克思**”是“首領”。**硫磺帮**形成他的“最亲近的”信徒小圈子，或者像**察貝尔**在第二号社論里所說的，形成“**亲馬克思派**”。**察貝尔**甚至提出了一个特征，可以根据它来識別“**亲馬克思派**”。**亲馬克思派**的成員一生中那怕見到一次**比斯康普**也好。

“他”，——**察貝尔**在第二号社論里說，——“他〈**布林德**〉声明他在一生中从来没有見過**比斯康普**，他显然不是**亲馬克思派**的成員。”

因此，“**亲馬克思派**”，或者本来的**硫磺帮**，——是这个帮的pairie〔貴族〕，应当把它同第三等人區別开来，同一群“信徒”或同“那小心翼翼地保存下来的一伙二流子”區別开来。就是說，首先是首領**馬克思**，然后是本来的“**硫磺帮**”或“**亲馬克思派**”，最后才是一群“信徒們”或“一伙二流子”。分成这三等人的**硫磺帮**，是在純斯巴达式的紀律环境中生活的。**察貝尔**說：“**硫磺帮**要它的信徒們服从一种极其严格的紀律”，可是另一方面，“**馬克思**……非常严酷地对待**硫磺帮**”。不言而喻，在一个組織如此完善的“帮”里，它特

有的“陰謀”，它的“主要職業”，它作為一個幫建立起來的豐功偉績——所有這些都是按照它的首領的命令進行的，并被察貝爾故意描寫成非常嚴酷地對待該幫的首領幹的事情。究竟這個幫的所謂職業是些什麼呢？

“硫磺幫的主要職業之一，是敗壞住在祖國的人的名譽，使他們拿出錢來，以便這個幫保密，不敗壞他們的名譽。向德國寄去了不是一封信，而是几百封信，威脅說，要把他們參與革命的各種行動揭露出來，如果不把規定的款額限期交到指定地點的話……任何反對這些陰謀的人，不僅要在流亡者中敗壞他的名譽，而且要遭到報刊的危害。‘無產者’對不尊重他們的那些民主主義者所進行的告密，塞滿了德國反動報刊的各欄；他們成了法國和德國秘密警察的同盟者，等等。”（“國民報”第37號）

察貝爾關於硫磺幫的這些“有關各點”，是從說我是硫磺幫的“著名首領”開始的。他在逐一列舉了硫磺幫的“主要職業”即勒索金錢和進行告密等等以後，用下面這段話來結束他對硫磺幫的一般描述：

“……他們成了法國和德國秘密警察的同盟者。福格特為了作進一步的說明，引證了前中尉泰霍夫1850年8月26日的一封信……從信中可以看出，馬克思怎樣以他拿破侖式的高傲態度和智力上的高人一等來非常嚴酷地對待硫磺幫。”

察貝爾描述硫磺幫時，開頭是“推崇”我為該幫的“著名首領”，後來他又擔心讀者可能以為在著名首領的後面還有一位不著名的首領，或者可能以為我因被“推崇”為達賴喇嘛而心滿意足了。因此，他在描述的結尾，把我（已經是用他自己的話，而不是用福格特的話）由“著名”首領變成了非常嚴酷的首領，由達賴喇嘛變成了硫磺幫的拿破侖。而他在他的 plaidoyer [辯護詞] 中，正好提出這個地方作為證明，證明他沒有把我同硫磺幫的“黨派的陰謀”“等量齊

观”，而他在他的文章里把这些阴谋“尖锐地斥之为反常的，或者是无原则的和不得体的”。不，不完全是这样！他把我“等量齐观”了，但不是以“侮辱我的名誉的形式”。“相反地”，他给了我荣誉，把我提升为勒索者、写恐吓信的人、mouchards [间谍]、agents provocateurs [奸细]、伪币制造者等等的拿破仑。察贝尔的荣誉概念，显然是从十二月帮辞典中借来的。那里也有“拿破仑式的”这个形容词。但是，我对他提出起诉，正好为了他给了我这种荣誉！我在我的控诉书中提出的“事实”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样地令人信服，以致察贝尔怎么也不愿接受我要他出庭的邀请，——我证明了：他的关于硫磺帮的“有关各点”全是福格特的捏造，察贝尔“引证”这类捏造不过是为了有可能把我“推崇”为这个硫磺帮的拿破仑。但是，难道他不是把我描绘成一个“具有优越性和善于驾驭”别人的人吗？难道我（用他的话来说）没有使这个帮服从纪律吗？他自己叙述了这种驾驭、优越性和纪律表现在哪里。

“硫磺帮硬要它的信徒们服从一种极其严格的纪律。在他们中间，谁企图用某种方式取得一点社会地位，谁只要有一点点想要成为独立的人的愿望，就被认为是革命的叛徒……在这一伙细心保存下来的二流子中间，经常因为散布流言和散发书信等等而发生纠纷、殴打和决斗。”

但是，对于硫磺帮的“党派的阴谋”（承蒙他把我同这些阴谋“等量齐观”），察贝尔并不满足于这种一般的描述。

“马克思派的著名成员”、“取得了他的主子的充分信任的马克思的最奴颜婢膝的信徒之一”李卜克内西，蓄意用“穆尔顿革命代表大会”来败坏瑞士工人们的名誉，在那里他兴高采烈地“把他们交到”正在等待的“宪兵的手里”。“科伦案件期间，硬说是”这“某一位李卜克内西编写了假记录本”（察贝尔当然忘记说，施梯伯的

这个捏造的虛假性，早在案件审理期間就由官方证明了)。“新莱茵报”前編輯之一沃尔弗，从倫敦寄出一份“告无产者的通告”，这个通告“他同时背地塞給了汉諾威警察局”。

察貝尔一方面把如此“著名的”同我有联系的一些人描繪成秘密警察局的代理人，另一方面还把我同一个“著名的”秘密警探、agent provocateur [奸細]和伪币制造者舍尔瓦尔联系起来。他对硫磺帮作了一般描述以后立刻叙述說，“有几个人”，其中包括舍尔瓦尔，怎样“以工人的革命煽动家和秘密警察的同盟者这种双重身分”从倫敦去巴黎，怎样在那里搞“所謂共产党人案件”等等。他在第二号社論里繼續写道：

“因此，1852年，策划了一个大量制造假鈔票（詳情見福格特的著作）的极端可耻的密謀，等等。”

如果“国民报”的讀者答应了察貝尔的坚决邀請，看看福格特著作里的詳情，那末，他們会找到些什么呢？那就是：舍尔瓦尔是由我派到日内瓦去的，在我的直接领导下策划了“大量制造假鈔票的极端可耻的密謀”等等。被察貝尔引向福格特那里去的讀者还会找到下列东西：

“然而，馬克思的个人态度在这种場合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已經指出过，有些事情不管是馬克思自己干的或是通过他帮里的某个成員干的，都完全无关紧要，因为他反正无条件地統治着他的人。”

但是，察貝尔仍然不滿足于自己所干的。他迫不及待地在他的两篇社論的結尾低声地对他的讀者讲出他最后的話。他說：

“他〈布林德〉声明他一生中从来没有看見过比斯康普；他显然不是亲馬克思派的成員。我們觉得使他〈布林德〉变成替罪羊，对于后者〈亲馬克思派〉來說并不十分困难…… 馬克思派之所以能够輕而易举地把傳单說成是布

林德写的，正是由于……后者在同馬克思的談話中和在‘自由新聞’上的一篇文章里表示过类似的想法；利用布林德的这些意見和說法，就可以把傳单伪造成像是他的〈布林德的〉作品一样。”

那末，这就是說，是“馬克思派”，或者“亲馬克思派”，alias〔或者說〕硫磺帮把傳单伪造成像是布林德的作品一样的？察貝尔叙述了这种假定之后，就用下面一句話干巴巴地概括它的意思說：“現在，任何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把馬克思或者布林德看成是傳单的作者。”

那就不是馬克思派或者布林德，也不是布林德或者亲馬克思派，vulgo〔俗称〕硫磺帮，而是布林德或者馬克思，sans phrase〔干脆就是〕馬克思。馬克思派，亲馬克思派，硫磺帮等等都不过是对馬克思、馬克思其人的泛神論的称呼。察貝尔不仅把馬克思同硫磺帮的“党”“等量齐观”，他还把硫磺帮化为馬克思这样一个人。这位察貝尔竟敢在司法机关面前說，他在他的社論里……沒有以“侮辱荣誉的形式”把“原告”馬克思同硫磺帮的“阴谋”“等量齐观”。他捶胸頓足地发誓說，他“更沒有”把我个人同被他“指控为进行勒索和告密的人联系在一起”！我心里想，察貝尔在法庭当众开庭时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啊！什么样的角色啊！我舒暢地喊了一声，再一次拿起我的法律顧問寄給我的文件重新看了一遍；我觉得我在末尾看到了弥勒、舒尔采一类的名字，于是我馬上就确信我弄錯了。摆在我面前的材料根本不是察貝尔的 plaidoyer〔辯护詞〕，而是由古特施米特和舒尔采签署的上訴法院的“决定”，这项决定剝夺了我对察貝尔的起訴权，而且，因我提出“控告”，罰我 25 个銀格罗申，并应立即交給柏林市法院收費处，以免强制追繳。我真是 attonitus〔大吃一惊〕。但是，当我重新細看“决定”时，我就不再感

到惊奇了。

例 一

察貝尔在 1860 年“国民报”第 37 号社論中写道：

“福格特在第 136 頁及以下各頁上說：在 1849 年的流亡者中間，有一群人以硫磺幫，或者也以制刷匠幫知名；这些人起初散居在瑞士、法国和英国，后来逐漸聚集在倫敦，并在那里把馬克思先生推崇为他們的著名首領。”

古特施米特先生和舒尔采先生在 1860 年“国民报”第 37 号上讀到：

“实际上，如果第一篇文章根据福格特的叙述指出說：‘1849 年的流亡者逐漸聚集在倫敦，并在那里把馬克思先生推崇为他們的著名首領’。”

察貝尔說：在 1849 年的流亡者中間，一群以硫磺幫、或者也以制刷匠幫知名的人逐漸聚集在倫敦，并在那里把我推崇为他們的著名首領。在古特施米特先生和舒尔采先生笔下，察貝尔却是这样說的：1849 年的流亡者逐漸聚集在倫敦（这实在是不正确的，因为大部分流亡者都聚集在巴黎、紐約和澤稷島等地），并把我推崇为他們的著名首領，人們沒有給过我这种荣誉，察貝尔和福格特也沒有强加給我这种荣誉。古特施米特先生和舒尔采先生在这里决不是在归納，而是在引证，因为他们把察貝尔在任何地方也沒有发表过的詞句放在引号內，当做他第一号社論中“根据福格特的叙述”“归結的”一点。显然，摆在古特施米特先生和舒尔采先生面前的是一份我和讀者毫不知道的“国民报”第 37 号秘密版。这就是产生这一切誤解的原因。

“国民报”第 37 号秘密版同該号公开版的区别，不仅是一些句子中的異文。公开版的第一号社論的全部内容同秘密版的該社論的内容，除几句话以外，毫无共同之处。

例 二

察貝尔在把我推崇为硫磺帮的首領以后，在“国民报”第37号上写道：

“这些同行們〈硫磺帮〉……在流亡者中間繼續‘萊茵报’的事业…… 硫磺帮的主要职业之一，是败坏住在祖国的人的名誉，使他們拿出錢来……‘无产者’……所进行的告密，塞滿了德国反动报刊各栏，他們成了法国和德国秘密警察的同盟者。福格特为了进一步說明〈說明这个“硫磺帮”还是“无产者”〉，引证了……泰霍夫的……一封信……信中描述了‘无产者’的原則、阴謀等等；从信中可以看出来，馬克思怎样以他的那种拿破侖式的高傲态度和智力上的高人一等来非常严酷地对待硫磺帮。”

在察貝尔把我封为1849年流亡者的首領以后，古特施米特先生和舒尔采先生在“国民报”第37号上讀到：

“如果它〈“国民报”的第一篇文章〉往下談到泰霍夫的信說：‘从信中可以看出，馬克思怎样以他的那种拿破侖式的高傲态度和智力上的高人一等来非常严酷地对待硫磺帮’。”

如果法官們拥有給予或剝夺私人起訴权的大权，那末，古特施米特先生和舒尔采先生不仅有权利，而且有义务不承认我有对察貝尔起訴的权利。他們 in nuce^①报道的“国民报”第37号秘密版社論的內容，完全排除了任何 corpus delicti〔犯罪构成〕。的确，察貝尔在秘密版上发表了什么呢？首先，他給予我不应得的荣誉，使聚集在倫敦的1849年的全体流亡者把我“推崇”为他們的“著名首領”。难道我是因为这点“控告”他的嗎？其次，他給予我同样不应得的荣誉，說我“非常严酷地对待”某一个同我毫无联系的硫磺帮，譬如說，就像我在1848—1849年非常严酷地对待察貝

① 处于萌芽时期；这里的意思是：簡略地。——編者注

尔之流那样。我是因为这点“控告”察貝尔的吗？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如果立法允許司法官員“决定”，而且是秘密“决定”某个人是否有权控告另一个人（譬如因在“国民报”上进行誹謗），那会造成怎样的混乱。原告根据也許有一万份发行量的“国民报”第 37 号公开版提出控告，而法官則根据为他准备的一份該号“国民报”秘密版作出决定。用这种程序，甚至 *corpus delicti* [犯罪构成] 的同一性也很少有保证了！

普魯士立法在每个案件中都使私人的起訴权取决于法官的裁夺。它是从这样一种观点出发的，即国家是慈父般的政权，应当保护和管理国家的孩子们的私人生活。但是，甚至从普魯士立法的观点来看，上訴法院的“决定”也是令人奇怪的。普魯士立法显然是想消除各种琐碎无聊的控告。因此，——如果我对普魯士立法的精神的理解是正确的，同时有充分理由假定它的目的并不是系統地拒絕审判，——因此，它給法官以駁回起訴的权利，但是，这只是对 *prima facie* [初看起来] 沒有起訴的对象，因而对起訴 *prima facie* 缺乏根据而言的。这是否适用于本案呢？市法院承认，察貝尔的社論实际上針對我說了一些“侮辱荣誉的”，因而是“应受懲罰的”話。它保护弗·察貝尔以对抗我的合理报复，只是因为弗·察貝尔“简单地引证了”自己的誹謗。上訴法院說：不論是引证的或者不是引证的，从法律观点来看，侮辱荣誉都应受懲罰；但是它否認察貝尔的社論中有侮辱荣誉的話——引证的或者不是引证的、侮辱我个人的話。因此，市法院和上訴法院对犯罪构成本身的看法不仅是不同的，甚至是直接对立的。一个发现有侮辱我的话，另一个却說沒有。法官在对犯罪构成的看法上的这种矛盾，确凿证明了在这里 *prima facie* 起訴对象是有的。如果帕庇尼亚努斯和

烏尔皮安努斯說，报上的这些話是侮辱荣誉的，可是穆西烏斯·賽沃拉和馬尼利烏斯·布魯土斯相反地却說，报上的这些話是不侮辱荣誉的，那末，奎里特⁵⁹⁶的人民将会怎样想呢？为什么人民不應該同烏尔皮安努斯和帕庇尼亚努斯一起相信，察貝尔在“国民报”第37号和第41号上发表的东西是侮辱我的荣誉的呢？如果我要奎里特的人民相信：穆西烏斯·賽沃拉和馬尼利烏斯·布魯土斯給了我一份秘密证詞，从这一证詞来看，察貝尔的“侮辱荣誉的”一些言論和論断根本不是說我的，那末，奎里特的人民就会聳聳肩，好像在說：à d'autres! [你讲給別人听吧!]

因为上訴法院是决定犯罪构成問題的最后—个审級，也就是說，它应当最終决定：察貝尔的两篇社論实际上是不是侮辱了我的荣誉，有沒有侮辱我的意图，因为上訴法院否认这种犯罪构成，所以，就只留下一个問題可以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訴，即上訴法院的决定实际上是不是建立在法律的錯誤基础上的？上訴法院在“决定”中实际上确认：察貝尔硬說硫磺帮进行“无原則的、不体面的密謀”、“告密和勒索金錢”；这个硫磺帮，就是同一个察貝尔在同一篇社論里直截了当地称做“馬克思派”或者“亲馬克思派”的，而馬克思則被认为是該派著名的和非常严酷的“首領”。上訴法院是否有合法的权利不认为这是侮辱我荣誉的做法呢？我的辯护人、法律顧問維貝尔先生在他递交最高法院的控訴书中对这一点指出：

“誠然，〈察貝尔〉在哪儿也沒有直接說馬克思勒索金錢，从事告密和制造假鈔票。但是，难道在下面一句話里这点說得还不够清楚嗎：馬克思是追求上述犯罪的和不道德的目的的一个派的首領？任何沒有成見的、头脑健全的人都不会否认，要是某一个团体的目的和主要活动是違法乱紀，这样一个团体的首領就不仅会贊同該团体的陰謀詭計，而且会亲自布置和指导这类陰謀詭計，并享受它的成果；毫無疑問，这个首領不仅作为参加者，而且作为思想

上的鼓舞者，負有双重責任，即使沒有一件事能證明他直接參加了某種違法亂紀行動。在〈上訴法院的〉值得爭議的決定中表明的觀點，可能造成如下的結果：一個人的好名聲在想要敗壞它的人們面前是沒有保障的。誹謗者為了誹謗甲，不必說甲殺了人，只需說某處有一個干殺人勾當的幫，而甲是這個幫的头子就夠了。上訴法院的觀點會保障這個誹謗者逍遙法外。如果誹謗者違背事實地把第三者誣稱為強盜或者強盜頭，這個誹謗者都應受到誹謗罪的懲罰，那才是正確的。”

從常人的理智來看，誹謗實際上是存在的。從普魯士立法的觀點來看，這種誹謗是否存在呢？上訴法院說：不存在，我的辯護人說：存在。如果上訴法院不顧市法院的意見而作出決定說：引證形式不能使誹謗者免受追究，那末，為什麼最高法院不應當不顧上訴法院的意見而作出決定說：千頭萬緒的條虫式的誹謗形式也不能使他免受追究呢？我的辯護人就這個法律問題，就上訴法院在犯罪構成問題上所犯的這一法律的錯誤，上告到最高法院，也就是在一定程度上上告到“阿雷烏泊果斯”^①。最高法院作了如下“決定”：

“（一）您今年8月23日對王國上訴法院刑事庭於今年7月11日就‘國民報’編輯察貝爾博士侮辱卡爾·馬克思博士一案所作決定提出的控告，經審查有關文件後，認為理由不足而予以駁回。（二）王國上訴法院並不認為‘國民報’的兩篇被指控的社論在客觀上有侮辱起訴人名譽之處，也沒有發現其中有侮辱起訴人的意圖，因此，駁回對侮辱的起訴是正確的。確定客觀上是否侮辱榮譽，是否有侮辱的意圖，實際上是對事實的裁決，只有當上訴法官的決定在這點上犯了法律的錯誤時，才能對他的決定向王國最高法院提出控告。（三）但本案中沒有這種錯誤。（四）您須將這項決定的費用25個銀格羅申在一周內交本地王國市法院收費處。

王國最高法院

馮·施利克曼

1860年10月5日於柏林

交本地法律顧問維貝爾。”

^① “阿雷烏泊果斯”是古代雅典的最高法院，意指最權威的審判。——譯者注

为了便于审查起見，我把最高法院的“决定”的各个組成部分編上号：

在这一点中，馮·施利克曼先生說，对上訴法院的申訴已被“駁回”。在第二点中，馮·施利克曼先生对上訴法院和最高法院相互之間的职权范围讲了一些有教誨作用的但显然同案件无关的空話。在第四点中，命令維貝尔在一周内把 25 个銀格罗申交柏林市法院收費处，这是“决定”的結果，但当然不是决定的原因。

然而，决定“駁回”的理由是什么呢？对我的辯护人的极其詳尽的控訴书的答复是什么呢？这就是：

第三点：“但本案中**没有**这种錯誤〈法律的錯誤〉。”

如果把第三点这句话里的那个詞儿“**没有**”去掉，那末理由就是：“但本案中有这种錯誤〈法律的錯誤〉。”到那时，上訴法院的决定就会被宣告无效。因此，这项决定之所以仍然有效，仅仅因为上面一句话里插了一个詞儿“**没有**”，而馮·施利克曼先生就借助这个詞儿代表最高法院“駁回”法律顧問維貝尔先生的控訴书。

Αὐτόματος ἔφη [他自己說的]。**沒有！**馮·施利克曼沒有反駁我的辯护人所闡明的法律理由，他**沒有**討論它，他甚至**沒有**提到它。当然，馮·施利克曼先生有作出他的“决定”的充足理由，但是他避而不談。**沒有！**这个詞儿的证明力仅仅依靠了权威，即依靠說这个詞儿的人的等級地位。“**沒有**”本身是什么也证明不了的。“**沒有！**” Αὐτόματος ἔφη。

最高法院就这样禁止我控告“民主主义者”弗·察貝尔。

我同普魯士法院的官司也就到此結束。

十二 附 录

1. 席利被驅逐出瑞士

席利的一封关于他被驅逐出瑞士的信，說明了非議員的流亡者所受待遇的一例；可惜限于篇幅，我只能加以摘录。信的开头叙述两个德国流亡者，席利的友人比和伊^①离开日内瓦之后，在游历瑞士时被捕；随后德律埃使他們重获自由，他們又返回日内瓦。

席利接着写道：“我受他們的委托，去訪問法济，想弄清他們是否还会遭到迫害，法济安慰我說：他，作为州当局的首脑，将不泄露他們的化名，联邦当局也沒有发来有关他們的任何命令；不过，如果我按他的話和他的声明去找一下司法部門和警务部門的首长日拉先生，那就更好。我按他的話办了，取得了近乎同样的效果，我留下了我的住址，以备万一联邦当局有什么命令下来。数周之后，一位警吏来找我，要我說出比和伊的地址。我拒絕了，跑去找上述的日拉。他威胁說，如果我不說出他們的地址，就要驅逐我。我回答說，按照我們先前的約定，他們可以把我当做 *intermédiaire* [調停人]，但决不能把我当做 *dénonciateur* [告密者] 叫来。于是他对我說：«Vous avez l'air de vouloir vous interposer comme ambassadeur entre moi et ces réfugiés, pour traiter de puissance à puissance». [“您似乎想承担一位大使的职責，在我和这些流亡者之間进行調停，就像是两个平等

^① 比斯康普和伊曼特。——編者注

国家間举行談判一样。”]我回答說:«Je n'ai pas l'ambition d'être accrédité ambassadeur près de vous». [“我没有在您这儿当大使的奢望。”] 确实,我也没有受到任何大使的礼遇,便被撵出門外了。在回来时,我得知比和伊二人刚被找到,遭到逮捕而且被带走了,既然如此,我可以认为上述的威胁已经消除了。但是我沒有考虑到4月1日;在1852年的这个倒霉的日子,一位警吏在街上拦住我,要我跟他去市政局,說局里似乎要問我什么事。在那里,国务参事图尔特,管理驅逐流亡者事务的日内瓦委員(当时在日内瓦管理同样事务的联邦委員特罗格的 *ad latus* [助理員])对我說,我已被驅逐,因此他应当立即把我送到伯尔尼,他表示非常遺憾,因为州当局对我沒有任何恶感,但是联邦委員坚持要驅逐我。我請求引我去見联邦委員,但他回答說:«Non, nous ne voulons pas, que le comissaire fédéral fasse la police ici». [“不行,我們不願联邦委員干这儿的警务。”]但是这同他先前的話是自相矛盾的,而且完全把他的日内瓦国务参事的角色演糟了,因为这个角色在于用自由派的姿态抵制联邦当局的驅逐要求,而只是在暴力下让步,但同时甚至高兴地或者恭順地听命于 *gentle pressure* [輕微的压力]。这一角色的另一特点是:背着被驅逐的人說他是奸細,为了‘正义事业’不得不加以驅逐…… 所以,图尔特事后对流亡者們說,他应当把我赶走,因为我同联邦委員勾結,而且同他一起反对他的(图尔特的)旨在保护流亡者的措施,也就是我同那位——使图尔特非常遺憾——下命令驅逐我的委員进行秘密活动! *Quelles tartines* [真是胡說八道!] 多么虚伪和矛盾! 而且这一切是为了少許的 *aura popularis* [一时的声望]。当然,这位先生之所以官运亨通,只是由于能隨風轉舵。联邦委員會里就只缺少这位日内瓦大会議和日内瓦国务會議的議員,瑞士联邦院或国民院的議員,生来糊塗的参事来确保瑞士的安宁;难怪这样写着: *Providentia Dei et confusione hominum Helvetia salva fuit* [神的意志和人的迷惘拯救了海尔維第]。”

席利到达倫敦之后,向雷贊(下面要談到这个人)影响下的日内瓦“独立报”送去一項抗議图尔特誹謗的声明,这家报纸不久前尖銳地抨击过“自由派 *faiseurs* [耍花招的] 在驅逐流亡者出瑞士时”所使用的愚蠢的誹謗攻击;這項抗議沒有被接受。

席利继续写道：“从日内瓦市政局出来，就进了监狱，第二天，在警察的押送下，乘邮车从监狱去伯尔尼，德律埃先生把我在伯尔尼的一座所谓古塔内严密监禁了两星期……”

德律埃在同被监禁的席利的通信(往下将谈到这些信件)中把全部过错都推给日内瓦州，可是图尔特又说全是联邦当局的过错，日内瓦州当局对席利决没有任何恶感。不久前，日内瓦的法院侦查员雷赞向他作过同样的保证。关于这位先生，席利这样写道：

“趁1851年夏日日内瓦举行联邦射手节的机会，雷赞作了用法文和德文出版的‘联邦射手节通报’的编辑，并聘请我为撰稿人，答应给我300法郎的报酬；我的工作是在*flagrante delicto* [现场]记录委员会主席图尔特的德文欢迎词和告别词。这个任务(我要对图尔特表示感谢，虽然是过迟的感谢)对我来说是轻而易举的，因为他差不多每次都用同一套热烈的言词向不同的射手代表团讲话，只是根据他所祝贺的是伯尔尼的熊、还是乌利的牛或是联邦的其他组织而稍加改变；因此当重弹‘一旦发生危险，我们将如何如何’的老调时，我可以安然搁笔。雷赞问我为什么这样做时，我就回答：«c'est le refrain du danger, je le sais par cœur». [“这个关于危险的老调我已经背熟了。”]但是，雷赞并没有付给我辛辛苦苦应得的300法郎，而是唉声叹气地给我100法郎，但要我继续为他准备在日内瓦创办的政治性刊物撰稿，他创办这个刊物的目的是为了不依赖任何现存党派，在各个方面，特别是对当时的‘自由主义的’法济—图尔特政府进行斗争，尽管他本人也是属于这个政府的。他非常适合于这样的事情，像他自己经常吹嘘的，准备«d'arracher la peau à qui que ce soit» [“剥掉任何人的皮”]…… 为此目的，当我因为联邦射手节的劳累在瑞士旅行的时候，他委托我为这一事业斡络关系，这事我已照办，回来后还向他做了书面汇报。但是，在这期间刮起了完全不同的一股风，以全速把他从海盗航行中吹进现存政府的安静的港湾。J'en étais donc pour mes frais et honoraires [这样，我就得自己承担一笔花销和失去一笔报酬]，我一直要他偿付这笔报酬，但都白费劲，虽然他已经成为一个富翁…… 在我被捕前不久他还向我发誓说，他的朋友图尔特向他保证，根本谈不到我会被驱逐的问题，因此我不必采取措施来防备日拉的威

胁等等…… 我在監獄古塔 *de profundis* [深处] 給他写了一封信，請他給我一点欠我的錢，并請他解釋发生的事（指我的被捕等），尽管他向送信人保证滿足我的要求，但一直没有給我回信。

……数月后，科（一个可靠的沒有成見的人）写信告訴我，我被驅逐是流亡的議員們一手造成的，这一点已由拉尼克爾在信中的附言 *mordicus* [确凿] 证实了。許多深知底蘊的人也表示了这种看法，后来我曾經得到机会亲自同他們談过这件事情…… 然而我可不是鬣狗萊納赫那样的議會野心家，每天把已經归天的帝国摄政福格特从帝国的坟墓中拉到伯尔尼的餐桌上，使他自己像‘被鎖鏈鎖住的普罗米修斯’的化身那样坐着，而 *entre poire et fromage* [在吃最后一道甜食的时候] 便把木乃伊及其化身貪婪地吞下去，引起普遍的震惊。的确，我不是議會功勳的崇拜者。恰恰相反！但是，难道这些先生們因此就想通过把我驅逐出帝国——瑞士也包括在帝国之内，因为在瑞士埋葬了帝国宪法和最后一次帝国国会閉幕式——的办法来对我施加报复嗎？我倒是认为，他們要对我进行迫害，恐怕是如我前信中說的：由于議會对我、貝克爾和几个日内瓦公民組織的日内瓦流亡者委員會感到憤懣…… 究竟为什么这些先生們要夺取流亡者之間分配救济金的权利，他們的意見是不一致的。他們之中有一些人（包括巴登小議會的邓策尔）采取的办法同我們的做法不同，他們不是打算用这些錢来帮助特別困难的工人，而是想**主要**用来安撫有职业的受难者、革命英雄、过慣好日子的祖国的儿子們…… 手工工人們說得好，*Is fecit cui prodest* [对誰有利，誰就干]。由于我的活动确实对这些先生們不便，因此就产生了他們利用自己在領導阶层中的威信来清除我的想法。大家知道，他們曾利用过 *aurem principis* [上司的耳朵]，总之，他們离这只耳朵很近，要低声說些我如何不安分的話是很方便的，特別是，他們不止一次地在 *princeps* [首領] 图尔特的周圍聚集过……”

席利讲述了他从伯尔尼古塔出来被押送过巴塞尔法国国界之后說：

“至于流亡者的放逐費用，我希望这笔費用决非由联邦國庫負擔，而是由神圣同盟支付。在我們踏上瑞士国土一段時間以后，有一天，奧里珈公主同

伯尔尼的俄国代办正在伯尔尼的一家旅館里进餐。Entre poire et fromage. (同可怕的萊納赫 sans comparaison[不能相比]), 公主对她的对方說: «Eh bien, Monsieur le baron, avez-vous encore beaucoup de réfugiés ici?» [“哦, 男爵先生, 你們这里还有很多流亡者嗎?”] 那一位回答說: «Pas mal, Princesse, bien que nous en ayons déjà beaucoup renvoyé. M. Druey fait de son mieux à cet égard, et si de nouveaux fonds nous arrivent, nous en renverrons bien encore». [“不少, 公主, 虽然我們已經送走許多。德律埃先生正在尽力而为, 如果我們得到新的救济金, 我們还会送很多人走。”] 这段话是当时侍候他們的一个侍役听到后轉告我的, 在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中, 他曾是我指揮下的一名志願兵。”

在席利被驅逐的时候, 他的行李神秘地丢失了, 再也沒有找到。

“这些东西怎么会在哈佛尔从德国移民的車輛的行李堆中突然失踪(我們在巴塞尔由移民局代办克林科关进这节車輛, 克林科受到联邦当局委派, 把我們遣送到哈佛尔, 而且流亡者的行李同移民的行李是完全混在一起的), 至今还是一个謎; 这只有借助流亡者的名单和他們的物品单才能发生。或許瑞士駐哈佛尔領事——商人万納尔更清楚这事, 我們是先到他那里再繼續被遣送的。他答应全部賠償損失。后来德律埃在給我的一封信中也证实了这一諾言, 为了在联邦委员会辯护我的起訴, 我把这封信寄給了伯尔尼的律師福格特。但是他至今沒有寄还这封信, 也沒有对我寄給他的信作任何答复。而 1856 年夏天我遭到联邦委员会的坚决駁回, 而且对这个决定并没有作任何說明……

但是, 所有这些以及宪兵押送和帶着手铐等等的驅逐, 如果同遣送所謂巴登人中的較輕罪犯回国相比, 同在睦邻協議的幌子下以特殊的关切进行的遣送相比, 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后者領有特制的通行证和回国后立即去地方当局登記的命令, 他們得不到从事自己职业的机会, 只能用各种各样方法贖自己的罪。用这种办法引渡过来的这些人(因为引渡这个詞是最合适的)所默默忍受的痛苦, 还有待历史家来記載和复仇者来报复。

瑞士的塔西佗在談到瑞士的時候說，‘一個人如果被人指出缺點而仍不失為偉大’就應該對那個人加以贊揚。值得這樣贊揚的材料並不缺乏；這種贊揚不會損害它一根毫毛……*qui aime bien châtie bien* [愛得深，責得嚴]。實際上，我這方面總是对瑞士怀着始終不渝的同情。我非常喜歡這個國家和人民。瑞士人隨時準備熟練地使用保存在家裡的火槍，以維護光榮的歷史傳統，維護經濟中的優良的現代成果，因而在我的心目中，他們非常值得尊敬。他們應當得到別人的同情，因為他們同情別人爭取美好命運的鬥爭。瑞士的一個農民為德國南部起義失敗感到煩惱，他說，‘我寧願讓我們上帝的那一對最好的天使死掉也比這好’。也許，他不會用他自己的馬車為這事去冒險，寧可拿他自己的生命和火槍去冒險。因此，瑞士人即使由於有自己的世襲產業和為了保衛這些產業而保持中立，他們的心灵深處並不是中立的。況且包藏着他的美好的內核的中立的舊殼，顯然受不了這一切外人的踐踏——這正是中立的實質——，它很快會破碎，於是氣氛也就澄清了。”

席利的信就是這樣。他在伯爾尼監獄的塔樓中，不可能同德律埃會面，但是同這位先生通了信。席利寫信問他被捕的理由，並要求允許他向伯爾尼的律師維斯進行法律上的諮詢，德律埃在1852年4月9日這樣答复說：

“……日內瓦當局決定把您驅逐出該州，命令逮捕您并把您解送到伯爾尼由我部處理，因為您是最不安分的流亡者之一，企圖窩藏伊和伯，而您是有責任向當局報告這兩個人的。由於以上原因，並且由於您繼續留在瑞士將損害瑞士聯邦的國際關係，所以聯邦委員會決定把您驅逐出瑞士國境等等……由於逮捕您的目的並不是要把您提交刑事法庭或違警法庭，而是考慮國家安全所採取的一種措施……所以您沒有必要向律師諮詢。此外，在按照您的請求允許您同律師維斯先生會晤以前……我想知道這次會晤的目的。”

席利經過再三申請才被允許給他在日內瓦的朋友寫的一切信件，事先都經過德律埃先生的檢查。席利在一封信中用了這樣的話：«*Vae victis*» [“嗚呼，戰敗者”]。於是，德律埃在1852年4月19日給他的信中寫道：

“您給雅^①先生的信中說：«Vae victis»…… 您是否想說，联邦当局以对待战败者的态度对待您？如果是这样，那末这是一种欺騙性的攻击，我必須对此提出抗議。”

席利在 1852 年 4 月 21 日答复大权在握的德律埃說：

“联邦委员会参事先生，我不认为这样形容对我采取的措施就应当被指責为欺騙性的攻击；至少这种指責不能使我放棄我是受到殘酷对待的想法；恰恰相反，一个被监禁者从监禁他的人那里得到这样的回答，我认为是更增加了殘酷。”^②

1852 年 3 月底，在席利被捕和其他非議員流亡者被驅逐以前不久，反动的“日內瓦报”刊登了各色各样的关于日內瓦的德国流亡者策划共产主义密謀的謠言：特罗格先生正在忙于收拾窩藏着 84 条共产毒龙的德国共产分子的窠穴等等。除了这家反动的日內瓦报纸以外，还有属于議會帮的伯尔尼的一个文丐——可以設想是卡尔·福格特，因为他在“主要著作”中不止一次地标榜自己有从共产主义流亡者手中拯救瑞士的荣幸——用笔名«SS»在“法兰克福报”上散布类似的謠言。例如，他写道，由共产主义者組成的日內瓦德国流亡者救济委员会由于不合法地分配救济金而垮台，已由一些正派人(議員)組成的一个委员会取代，这些人将很快結束这种混乱現象；其次，日內瓦的独裁者看来终于开始服从联邦委員的命令，有两个属于共产主义派别的德国流亡者被捕，并已从日內瓦解到伯尔尼等等。巴塞尔出版的“瑞士国民报”⁵⁹⁷在 1852 年 3 月 25 日第 72 号上刊登了日內瓦的答复，其中提到：

“任何不具成見的人都知道，正像瑞士仅仅致力于巩固和根据宪法发展

① 雅科比。——編者注

② 席利和德律埃通信的原文是法文。——編者注

自己的政治成果那样，本地留下的少数德国流亡者所做的只是赚取每日的面包和一些毫无危害性的事情，关于共产主义的神话，只是庸俗的幻想家和政治上或本身有利害关系的告密者的臆想。”

文章指出“法兰克福报”驻伯尔尼议会的通讯员就是这样的一个告密者，然后以下面的话作为结束：

“本地的流亡者认为，他们中间有许多像往昔的‘帝国的比德曼和巴塞尔曼之流’的所谓‘正派人’，他们由于怀念祖国的肉锅⁵⁹⁸，企图以这种反动的卑鄙勾当来求得本国君主的宽恕；但愿他们立即一路顺风，免得再败坏流亡者和让他们避难的政府的名声。”

流亡的議員們知道，席利是这篇文章的作者。3月25日的巴塞尔“国民报”发表了这篇文章，4月1日席利就无缘无故地被捕了。《Tantaene animis celestibus irae?》〔“神灵的怒火是不是这样强烈?”〕^①

2. 穆尔顿革命代表大会

在穆尔顿的丑闻之后，日内瓦的德国流亡者（不包括流亡的議員）“向联邦最高司法和警务部”提交了一份抗议书。我只引证其中的一段：

“……君主們并不满足于他们迄今所取得的外交成就。为了清除瑞士的流亡者，他们对瑞士摩拳擦掌，用军事占领相威胁；联邦委员会至少在一份官方文件中表明了它对这样一种危险的忧虑。紧随着又发生了驱逐事件，这次驱逐是以著名的穆尔顿代表大会为理由，并且肯定说由于为此而进行的侦查，突然发现了政治宣传的倾向。这种说法受到现有事实的坚决驳斥……”

^① 味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第1册。——编者注

在法律上，必須确认，凡是存在法治的地方，只有法律规定应受惩罚的行为才能施以法律惩处；这一点也适用于驅逐出境，如果这种驅逐没有公开变成警察暴行的話。这样或許有人要对我们指出外交的意义，說出于尊重强邻和保持国际关系而不得不这样做的吧？果真如此，那就让瑞士联邦的十字躲在土耳其的新月后面吧，后者会在逮捕流亡者的密探敲土耳其政府的大門时給他看它的双角，而不是出面认罪；要是这样，那就发給我們去土耳其的护照吧，等大門在我们身后关上，把开瑞士的自由堡垒的那些钥匙当做 *feudum oblatum* [采邑从屬关系] 的标志交給神圣同盟吧，以便往后可以把这些钥匙当做神圣同盟侍卫官的勳章来佩帶，上面的銘文是：*Finis Helvetiae!* [海尔維第的末日!]"

3. 舍尔瓦尔

我从約翰·菲力浦·貝克尔的信中看出，帝国的福格特所提到的“馬克思的战友”或舍尔瓦尔的“战友”，除了現在居住在倫敦的施泰歇尔先生以外，不可能是別人。虽然我已經听到过不少对他的卓越而全面的艺术天才的贊揚，但这以前我还没有認識他本人的荣幸。由于貝克尔的信，我們才得以会面。下面就是我的“战友”写給我的一封信。

“1860年10月14日于倫敦
西中心区薩謝克斯街17号

亲爱的馬克思先生：

承蒙您寄給我福格特的小册子的摘要，我非常乐意就小册子中提到的紐金特(舍尔瓦尔-克列美尔)的問題为您提供一些說明。1853年3月，我从意大利旅行回来时到了日内瓦。紐金特差不多同时也到达日内瓦，我是在一个石印厂認識他的。我那时刚开始从事石印工作，由于紐金特在这方面有丰富的知識，又是一个非常热情、能干、勤勞的人，所以我接受了他的建議同他在一个工作場工作。如果撇开小品文和小册子作者們慣用的夸張手法不談，福

格特所提到的紐金特在日內瓦的活動，同我當時所聽到的差不多是一致的。成績是非常小的。我只認識這伙人當中的一個人，這是一個和藹、勤勞但同時也非常輕浮的年輕人；由於他是主要人物之一，所以很容易理解紐在這伙人中主宰一切，別的人不過是好奇的聽眾罷了。我相信既沒有制成石版也沒有制成銅版，但是我聽到紐談起過這樣的事。我的熟人多半是日內瓦人和意大利人。我知道，後來福格特和其他我不認識的德國流亡者把我看做奸細。但是，我並沒有因此而感到不安，真相遲早會大白的；我甚至不責怪他們，因為當時確實有不少奸細，而且認出他們來並不總是容易的，因此就易于引起懷疑。我幾乎可以肯定，自從紐金特被逐出日內瓦以後，他沒有同那里的任何人通過信。後來我接到他兩封信；他邀請我去巴黎完成一件關於中世紀建築學的工作，這工作我也做了。我在巴黎見到紐金特的時候，他完全不問政治，也不同別人通訊。根據以上所說情況，至少可以做出結論說，所謂‘馬克思的戰友’可能指的是我，因為我沒有看到也沒有聽說紐金特曾邀請其他任何人到巴黎去過。福格特先生當然不會知道，我從來也沒有（無論間接也好或者直接也好）同您接觸過，如果我不遷居倫敦，通過一個偶然的機會有幸認識您和府上的人，或許永遠不會同您接觸。

向您和您家尊貴的眷屬致衷心的問候

赫·卡·施泰歇爾”

4. 科倫共產黨人案件

我在本節內引用的關於科倫案件期間普魯士駐倫敦大使館和它同大陸上普魯士當局通信的論述，是以奧·維利希在“紐約刑法報”（1853年4月）上發表的“間諜活動的受害者。威廉·希爾施的辯護書”⁵⁹⁹為根據的。這是被監禁在漢堡監獄的希爾施的自供；希爾施是警監格萊夫及其代理人弗略里的主要工具，並在他們的委托和領導下偽造了由施梯伯在共產黨人案件期間提出的偽記錄本。這裡我摘錄希爾施回憶錄中的幾段話：

“德意志协会（在工业博览会期间）受到警察三巨头——普鲁士警务顾问施梯伯、奥地利的一位库贝施先生和不来梅警察局长洪泰耳的共同监视。”

由于希尔施表示愿意担任 mouchard [密探]，因而同普鲁士驻伦敦大使馆秘书阿尔伯茨进行第一次会晤。希尔施对这次会晤写道：

“普鲁士驻伦敦大使馆同它的密探们指定的接头地点安排在一个适合接头的地方。庙关弗利特街的‘雄鸡’小酒店是不引人注意的，如果入口处没有一只金公鸡作招牌，不是专门要找这家酒店的人就很难发现它。我经过一个狭窄的入口进到这家古老的英国酒店内部，当我问到查理先生时，一位身体结实的先生出来说他就是，他和蔼地微笑着，就像我们两人已经是老相识了。这位大使馆代表显得心情非常愉快，而掺水的白兰地使他的情绪更加高涨，以致一时他似乎忘掉了我们会见的目的。查理先生或者大使馆秘书阿尔伯茨（他立刻给我讲了他的真实姓名）首先声明他本来同警务毫无关系，但是他准备起中介作用……第二次是在黄金广场布鲁尔街 39 号他当时的住所里会面的，在这里，我初次认识了警监格莱夫；这是个道地的警察型的人，中等身材、深色头发以及同样颜色的 par ordre [按官吏式] 修剪的联鬓鬍子——上唇髭同颊鬍连在一起，下巴剃得精光。他两眼无神，但由于经常同小偷和骗子打交道而习惯地显得非常紧张……格莱夫先生也像阿尔伯茨先生一样，最初对我说他叫查理。但这位新的查理先生至少态度更为严肃；他大概认为首先必须考验我一番……我们的初次会晤结束时，他要我向精确地报告革命流亡者的活动……第二次会面时，格莱夫向我介绍了他称之为‘他的右手’的人，并接着说：‘即他的密探之一’。此人年纪很轻，身材高大，服饰雅致，介绍时又自称为查理先生；看来全体政治警察都用这个化名。于是，我现在就得同三个查理打交道。新来的这个人好像更引人注意些。他说‘他以前也是革命者；但是，只要我跟他一起走，什么都可以办到’”。格莱夫有一个时期离开了伦敦，他同希尔施告别时“直截了当地说，新查理先生总是按照他的委托办事的，即使有些事我觉得奇怪，也可以毫无顾虑地相信他；我不应当因此而感到不安。为了解释得更清楚，他补充说：‘内阁有时需要这种或那种东西；主要的是文件；如果搞不到它们，就应当会另想办法！’”

希尔施繼續說，最后一个查理是弗略里，他

“以前从事勒·維提希主編的‘德勒斯頓日报’的发行工作。在巴登，根据他从薩克森弄来的介紹信，临时政府把他派往普法尔茨組織民軍等等。当普魯士人进入卡尔斯卢厄时，他被俘，如此等等。1850年底或1851年初他突然又在倫敦出現。他一到倫敦就使用德·弗略里这个姓，并且用这个姓混入流亡者中間，至少从表面上看，他的生活是很苦的。他同流亡者一起住在流亡者委员会設的流亡者集体宿舍，并領取救济。1851年初夏，他的生活状况突然好了起来，他住进一套相当好的住宅，年底同一个英国工程师的女儿結了婚。后来我們看到他在巴黎当密探…… 他的真姓是克劳澤；他的父亲是鞋匠克劳澤，在15—18年前由于在德勒斯頓刺杀雪恩貝尔格伯爵夫人和她的侍女，同巴克霍夫和貝澤勒尔一起在德勒斯頓被判处死刑…… 弗略里-克劳澤常常对我說，他从14岁起就为一些政府工作”。

施梯伯在科倫法庭公开审判时承认，就是这个弗略里-克劳澤，直接在格萊夫手下任普魯士警察密探。在我的“揭露科倫共产党人案件”一书中，关于弗略里我是这样說的⁶⁰⁰：

“弗略里虽然不是警察娼妓中的瑪丽花 [Fleur de Marie]，但他毕竟是一支花^①，它将要开放，那怕仅仅是一支 fleurs-de-lys [百合花]^②。”

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应驗了。在共产党人案件发生后几个月，弗略里在英国由于伪造行为被判处几年 hulks [在作監獄用的船上服苦役]。

希尔施繼續說，“弗略里作为警监格萊夫的右手，当格萊夫不在时，直接同普魯士大使館联系。”

① 文字游戏：«fleur»是“花”，Fleury [弗略里]是姓。——編者注

② 在法国土語中，把在犯人身上所烙的字母 T. F. (travaux forcés, 即苦役) 称之为 Fleurs-de-lys [百合花]。(恩格斯在“揭露”1885年版上加的注。)

同弗略里有联系的有麦克斯·罗伊特，此人曾經从沙佩尔—維利希集团当时的档案保管員奧斯渥特·迪茨那里偷窃过信件。

希尔施說：“施梯伯从普魯士駐巴黎公使哈茨費尔特的密探，即臭名远揚的舍尔瓦尔那里得知舍尔瓦尔本人写給倫敦的信件，并通过罗伊特打听出这些信的所在，于是弗略里受施梯伯的委托在罗伊特的帮助之下进行了偷窃。就是这些偷来的信件，施梯伯先生在科倫陪审法庭上恬不知耻地以‘本来面目’提出来作证…… 1851年秋，弗略里曾經同格莱夫和施梯伯一起住在巴黎；这以前，施梯伯通过哈茨費尔特伯爵的介紹同这位舍尔瓦尔，或更正确些說，同約瑟夫·克列美尔，打通了关系，他希望借助这个人来策划一件密謀。为此目的，施梯伯、格莱夫、弗略里等先生以及另外两个警探貝克曼^①和佐美尔，在巴黎同著名的法国密探律西安·德拉奥德（化名杜普勒）进行了商議，并且向舍尔瓦尔作了相应的指示，他应根据这些指示制造他的信件。弗略里常常在我面前譏笑施梯伯和舍尔瓦尔之間的那次寻衅；以斯特拉斯堡和科倫的一个革命联盟書記的身分，在舍尔瓦尔按**警察局命令**建立的协会里出現的施米特，不是別人，正是弗略里先生…… 毫無疑問，弗略里是倫敦唯一的普魯士秘密警察局的密探，向普魯士大使館提出的一切建議都要經過他的手…… 格莱夫和施梯伯两位先生在許多場合都信賴他的意見”。弗略里通知希尔施說：“格莱夫先生已經告訴您应当如何行动…… 法兰克福中央警察局的意見是，首先必須**保证政治警察局的存在**，至于我們采取什么手段做到这一点，那是无关紧要的；巴黎九月密謀已經使这方面前进了一步。”

格莱夫回到倫敦，对希尔施的工作表示滿意，但是，他提出进一步要求，要关于“**馬克思派的同盟的秘密會議**”的报告。

这位警监最后說：“à tout prix [無論如何] 要提供关于同盟會議的报告；您怎么做隨您的便，只是任何时候都不要越出真实的界限。我本人太忙。”

① 这就是在案件中作为阿尔宁出現的那个人物。（馬克思在“揭露”1875年版上加的注，本附录4作为补遺附在那里。）

他在当时以及后来許多年曾担任“科倫日报”駐巴黎記者。（恩格斯在“揭露”1885年版上对馬克思的注所作的补充。）

德·弗略里先生将代表我同您一起工作。”

如希尔施所說，格萊夫当时正忙于同莫帕通信（通过德拉奥德-杜普勒），以便安排所謂舍尔瓦尔和吉佩里希从圣珀拉惹監獄的假逃。由于希尔施肯定：

“馬克思在倫敦沒有建立同盟的任何新中央协会…… 格萊夫同弗略里商定，在这种情况下，我們暂时只有自己作出关于同盟會議的报告；格萊夫自願負責使这些文件显得真实，而他的建議总是会被接受的。”

这样，弗略里和希尔施就着手工作。照希尔施說，他們关于由我召开的同盟秘密會議的报告的内容是，

“进行了各种討論，接納了同盟新盟員，在德国某个角落建立了一个新支部，設立了某种新組織，在科倫的馬克思的被監禁的朋友們有无获釋的希望，收到某人的信件等等。至于最后一点，弗略里通常都用那些在德国的由于政治偵查而已經被怀疑的人，或者进行某种政治活动的人；然而还得經常靠幻想来帮忙，于是有时就会出现这样一个同盟盟員，他的名字世界上可能根本就不存在。但是格萊夫先生认为报告很好，à tout prix [無論如何]必須把它搞出来。一部分报告是由弗略里单独起草的，但多数場合我都得帮助他，因为就是細小的記載他也不能用应有的文体写出来。报告就这样写成了，格萊夫先生毫不犹豫地为报告的真实性的担保”。

希尔施往下談到，他和弗略里如何拜訪了布萊頓的阿·卢格和爱德华·梅因（托比的紀念物），如何偷窃了他們的信件和石印的通訊。不仅如此。格萊夫—弗略里在斯坦伯里的印刷所（費特尔巷）里租用了一台石印机，同希尔施一起自己动手伪造“激进傳单”。其中有些东西对“民主主义者”弗·察貝尔是有教益的。請他听吧：

“由我（希尔施）拟定的第一个傳单，根据弗略里的建議，叫做‘致农业无产階級’；有許多份数印得不坏。格萊夫把这些印好的傳单当做馬克思派的

东西散发出去，为了做得更像一些，他在用上述方法伪造的所謂同盟會議的报告中，还加上了几句有关散发这种傳单的話，以說明傳单的来源。类似的伪造品，标题是‘致人民的儿女’，也准备好了；我不知道，这一次格萊夫先生把誰說成是文章的作者。这种把戏后来停止了，主要是因为在这上面花了很多錢。”

舍尔瓦尔在所謂从巴黎逃出以后，到了倫敦，起初以每周1鎊10先令的工資为格萊夫工作；

“为此，他有責任提供关于德法两国流亡者的交往的报告。”

但是，被工人协会公开揭露是个 mouchard [密探] 而且被赶出协会的

“舍尔瓦尔，当然要把德国流亡者和他們的机关报說得根本不值得注意，因为在这方面他无法提供一点消息。但是，他却为格萊夫提供了一个关于非德国的革命政党的报告，他作这个报告的本領賽过了閔豪森”。

随后，希尔施又轉回到科倫案件。

“格萊夫先生委托弗略里完成的同盟报告，其中凡是涉及科倫案件的，已經有人不止一次地詢問过格萊夫先生这些报告的内容…… 为这件事也規定了明确的任务。据說有一次馬克思用‘酒館’的地址同拉薩尔通信，而国家檢察官先生希望对此加以偵查…… 国家檢察官的要求看来是更天真的，他希望确切了解拉薩尔从杜塞尔多夫給科倫被监禁的勒澤尔的經濟援助…… 这些錢似乎实际上应当来自倫敦。”

在第三章第四节里已經提到，弗略里受辛凱尔迪之托应当在倫敦搜罗一个人，以便在科倫陪审法庭上代表失踪的证人豪^①等等。在詳細叙述了这个插曲以后，希尔施繼續写道：

“这时，施梯伯先生固执地要求格萊夫尽可能搞到他寄来的同盟會議記錄的原本。弗略里說，只要給他配备几个人，他就能够搞出原本記錄来。但是，

① 豪普特。——編者注

这就必須得到馬克思的一些朋友的笔迹。我利用后一句話从我这方面拒絕了這項建議；這個問題弗略里只再提过一次，以后就沒有再談起。这时候，施梯伯先生突然带着倫敦召开的同盟中央协会會議記錄本在科倫出現……当我从報紙报道的記錄摘要中认出这同格萊夫委托弗略里捏造的報告絲毫不差的时候，感到了更大的惊異。这就是說，格萊夫先生或施梯伯先生本人用某种办法制造了一个副本，因为在这个所謂的原本記錄中有签名，而在弗略里呈遞的記錄中則是从来都没有签名的。关于这种令人惊異的現象，我从弗略里本人那里只听到这样說：‘施梯伯什么都会干，这事会博得热烈的喝采！’”

当弗略里得知“馬克思”把所謂在記錄上签了名的那些人（李卜克內西、林格斯、烏尔麦尔等）的真实签名在倫敦治安法庭立案的时候，他起草了下面这封信：

“致柏林王国警察总局。d. d. ①于倫敦。馬克思和他的朋友企图证明同盟記錄上的签名为伪造，他們打算在这里把这些签名立案，以后作为真实签名向陪审法庭提出。凡是熟悉英国法律的人也都知道，那些法律在这方面是可以多方利用的，为真实性作保证的人，实质上自己就沒有提出真正的保证。报道这件事情的人，在事关真伪时并不害怕說出自己的名字。貝克尔，利奇非耳德街4号。”“弗略里知道貝克尔的地址，这是一个德国流亡者，同維利希住在一所房子里，所以后来很容易使人怀疑这封信是馬克思的敌人維利希写的……弗略里事先就为即将由此产生的非議感到高兴。他以为人們讀到这封信时一定已經很晚，等到搞清这信的真伪时，案件早已結束了……用貝克尔署名的这封信的收件人是柏林警察总局，但是沒有寄往柏林，却送給‘科倫法兰克福旅館警官戈德海姆’了，这封信的信封寄到了柏林，里面附了一張字条：‘科倫的施梯伯先生对这些将作詳尽說明’……施梯伯先生沒有利用这封信；他之所以不能利用是因为他被迫放棄了整个記錄本。”

关于記錄本希尔施說：

“施梯伯先生〈在法庭上〉說，两星期前他已經得到这个記錄本，并且在使

① de dato——即日。——編者注

用它以前慎重考虑过；他继续说道，记录本是他通过一个名叫格莱夫的信使得到的…… 就是说，格莱夫把他自己的作品带给了他；但是，这怎么能同戈德海姆先生的书信吻合呢？戈德海姆先生向大使馆写道：‘记录本所以提供得这样晚，是为了不让因怀疑它的真伪而提出的质询起作用’…… 10月29日星期五，戈德海姆先生到了伦敦。施梯伯先生已意识到无法替记录本的真实性辩护；因此他派了一个使者同弗略里就地商谈这个问题。他们讨论能否用某种办法搞到一个证明它的真实性的证据。商谈毫无结果，他什么也没有弄到手就离开了，而使弗略里陷于绝望中。为了不致损害高级警官们的名誉，施梯伯只好决定出卖他。从施梯伯先生不久以后发表的声明来看，我才知道这就是弗略里惶恐不安的原因。弗略里先生感到不知所措，采取了最后一个办法。他给我带来一份手稿，要我照它临摹一项声明，并签上李卜克内西的名字，然后向伦敦市长宣誓，说我是李卜克内西…… 弗略里告诉我，手稿的字迹出自写记录本的那个人，是戈德海姆先生〈从科伦〉带来的。但是，如果施梯伯先生的记录本是通过信使格莱夫从伦敦得到的，那末，戈德海姆先生怎么能够在格莱夫重回伦敦的时候从科伦带来所谓的记录本原稿呢？…… 弗略里交给我的仅仅是几句话和签名……” 希尔施“尽量精确地照着笔迹拟出一项声明，说下一签名人（即李卜克内西）声明，马克思及其同伙所立案的他的签名是伪造的，只有现在这个签名才是唯一真实的。当我结束了我的工作，手上拿着幸而现在还在我这里的手稿〈指弗略里交给他临摹的手稿〉的时候，我向弗略里说明了我的顾虑，坚决拒绝了他的要求。这使他颇感惊异。起初他很难过，后来他说要自己去宣誓…… 为了更可靠起见，他想要普鲁士领事证明他的签名是真的，因此他首先去领事的办公厅。我在一个小酒馆等他。他回来的时候，证实签名的事已经办妥，此后他打算到市长那里去宣誓保证签名正确无误。但是，这里事情进行得并不顺利；市长要求别的保证人，而弗略里却找不出来，于是宣誓的事便吹了…… 夜间很晚我还见到德·弗略里先生一次，这也是最后一次。正好在这一天，他遭遇了一件意外的不愉快的事情，因为他在‘科伦日报’上读到了施梯伯先生牵涉到他的声明！德·弗略里先生以充分的哲理自慰：‘但是我知道，施梯伯没有别的办法，否则他就得把自己的名誉败坏了’…… 德·弗略里先生在我们最后几次见面的一次中对我说：‘要是科伦人被判罪，柏林就将响起一声巨雷。’”

弗略里同希尔施的最后几次会面是在 1852 年 10 月底；希尔施的自供注明的日期是 1852 年 11 月底；而 1853 年 3 月底就响起了“柏林的巨雷”（拉登多夫密謀）^①。

① 恩格斯在“揭露科倫共产党人案件”第 3 版（1885 年）上，給馬克思在第 2 版（1875 年）增加的附录 4 添了下面一段話：

讀者看一看施梯伯本人給他的两个同謀者弗略里-克勞澤和希尔施下的評語，那是很有趣的。“黑书”⁶⁰¹ 上对头一个人（第 2 卷第 69 頁）这样說道：

“№ 345. 克勞澤，卡尔·弗里德里希·奧古斯特，德勒斯頓人，1834 年由参加謀杀德勒斯頓的雪恩貝尔格伯爵夫人而被判处死刑的前管家、以后（处死以后？）为粮食經紀人的弗里德里希·奧古斯特·克勞澤和现在还活着的他的未亡人約翰·罗津（父姓居尼茨）的儿子；他于 1824 年 1 月 9 日生在离德勒斯頓不远的科維希附近的魏茵貝格豪澤。1832 年 10 月 1 日进入德勒斯頓的貧民学校，1836 年被德勒斯頓附近的安东城的孤儿院收容，1840 年受坚信礼。后来到达德勒斯頓的商人格魯勒那里当学徒，但是次年就因多次偷窃而受到德勒斯頓市法院的偵訊和判处徒刑，审前羈押期間也計入刑期之內。获釋后，住母亲处，沒有任何职业。1842 年 3 月，由于撬鎖行窃又被抓起来解送法院并判处四年苦役。1846 年 10 月 23 日出獄后回到德勒斯頓，同一些慣盜来往。后来为被釋犯人收容所收留，把他安置在雪茄烟工場作工。他在那里連續工作到 1848 年 3 月，表現一般。但是，很快他又游手好閑起来，开始訪問起政治团体来了（充当政府密探，如他本人在倫敦向希尔施說的；見上面）。1849 年初，任德勒斯頓的共和主义者文人埃·勒·維提希（現在住在美国）編輯的‘德勒斯頓日报’的送报員，1849 年 5 月，参加德勒斯頓起义，为索菲街街垒上的指揮員，起义被鎮压后，逃往巴登，1849 年 6 月 10 日和 23 日受巴登临时政府全权委托組織民軍并为武装起义者征收給养。后来为普軍俘虜，1849 年 10 月 8 日自拉施塔特逃出。（完全同后来舍尔瓦尔从巴黎“潜出”一样。但是往下才是眞正的芳香的警察的花束，——不要忘記，这是在科倫案件两年后付印的。）据 1853 年 5 月 15 日柏林‘政論家’第 39 号刊登的摘自紐約印行的汉堡商店伙計威廉·希尔施的著作‘間諜活动的受害者’的报道（施梯伯，你眞是个有預見的天使！），1850 年底或 1851 年初，克勞澤化名为查理·德·弗略里以政治流亡者的身分出現于倫敦。他最初頗为潦倒，但自 1851 年起，景况好轉，当他被共产主义者同盟接收为盟員之后（施梯伯臆想的接收），开始曾充任各

5. 誹 謗

科倫共产党人案件結束以后，有人大肆散布——特別是在美国的德文报刊上——福格特式的誹謗，說我对工人們进行“剝削”。我的几个住在美国的朋友——約·魏德迈、阿·雅科比博士(紐約的私人开业医生，科倫共产党人案件的被告之一)和阿·克路斯(华盛顿合众国海軍部職員)发表了一篇文章，詳細反駁这种荒唐誹謗(注有：1853年11月7日于紐約)，同时指出，如果問題是要博得小市民的欢心，那我有权对自己的私事保持沉默。“但是，当自

国政府的代理人，但因进行欺詐而遭到多方責难。”

施梯伯就这样酬謝他的朋友弗略里；此外，上面已經說过，科倫案件結束后几个月，他因伪造罪在倫敦被判几年苦役。

关于可敬的希尔施，同书第58頁上說：

“№265。威廉·希尔施，汉堡商店伙計。他大概是出于自願而不是作为流亡者去倫敦的。〈这种毫无目的的謊言是为了什么呢？要知道，戈德海姆曾經想在汉堡逮捕他！〉在倫敦同流亡者来往甚密，参加了共产党。他扮演双重角色，一方面参加革命党的活动，另一方面又为大陆各国政府效劳，充当对付政治犯和伪币制造者的密探。他在后一种职责中采用极卑鄙的欺詐、撞騙、甚至伪造，因此必須对他严加防范。他甚至同一些家伙勾結伪造紙币，目的似乎只为向警察当局揭发有人伪造貨幣，以取得优厚的奖賞。双方〈警察的和非警察的伪币制造者〉逐渐看出他的原形来了。他从倫敦轉到汉堡，生活极为潦倒。”

施梯伯关于他的倫敦的下手們就是这样写的，他曾經不断地发誓保证他們“誠实和可靠”。而特別有趣的是：这个典型的普魯士人絕不可能說出简单的眞理。他完全无法克制自己，不能不在从文件中引来的眞假事实之間插入一些毫无目的的謊言。根据这种职业謊言家——現時这种人比任何时候都多——的证詞，成百成千的人被判处監禁。这也就是現時人們所謂的拯救国家。

已應該**面对** crapule [恶棍]、小市民和堕落的游蕩者时，我們认为沉默对事业是有害的，因此，**我們打破了沉默。**”⁶⁰²

6. 老鼠与青蛙之战

在我过去引证过的小册子“高尚意識的騎士”的第5頁上，可以看到：

“……1851年7月20日建立鼓动者协会，而在1851年7月27日成立德国流亡者俱乐部。正是从这一天起……才开始了‘流亡者’和‘鼓动者’之間的斗争，这一斗争在大洋两岸展开，这是偉大的老鼠与青蛙之战。

誰使这架小小的豎琴发出响声？
那是我吸取振奋人心的詞汇的泉源，
为的是我能够用鮮明的色彩，
来描画世界上从未見过的战斗。

同命运注定要我歌唱的这次战斗相比，
一切以往的战斗都只是大宴会上的花朵：
因为一切有不可思議的勇敢精神的人，
都在这次光荣的战斗中拔劍相斗。

(博雅多“恋爱中的罗兰”第二十七首歌)”⁶⁰³

我并不想在这里細述“这次光荣的战斗”，也不想詳談代表流亡者协会的**哥特弗利德·金克尔**和代表新旧大陆的**革命同盟的阿·戈克**于1852年8月13日达成的“**同盟条約的初步協議**”（以这个标题 verbotenus [全文] 发表在所有美国的德文报刊上）。我仅仅指出一点，除了少数例外，双方的全体**議員**流亡者都参加了

化装舞会(当时每个政党为了顾全体面,都避开卡·福格特之流的名字)。

德国庸人的西番蓮哥特弗利德·金克尔,在結束他的愉快的革命周游美国的乞討旅行的时候,发表了“关于德国国民促进革命貸款的札記”(注有:1852年2月22日紐約州埃耳米腊),其中表示的观点,至少具有极其简单的好处。哥特弗利德认为,搞革命就像建铁路一样。只要有錢,要铁路就可以得到铁路,要革命就可以得到革命。国民的胸中应当怀有革命的热望,而搞革命的人的口袋里則应当有現金,因此,一切都要看是否有“一支不大的、装备精良的、有大笔金錢的队伍”。不难看到,英国重商主义之風使这些庸俗的头脑有了多么荒唐的思路。既然这里的一切,甚至«public opinion»〔“輿論”〕,都是靠股份制造的,那为什么不来一个“促进革命”的股份公司呢?

科苏特当时同样在美国为革命求乞,哥特弗利德在同他公开会面时,頗为文雅地說:

“贈送的自由,即使来自执政者您的純洁之手,对我來說也是一块干硬的面包,我将用我的羞愧的眼泪来湿润它。”

因此,这个对礼物如此挑剔的哥特弗利德向执政者保证,如果执政者用右手把“来自东方的革命”奉送給他,那末他,哥特弗利德将用右手把“来自西方的革命”作为等价物交給执政者。七年后,这个哥特弗利德在他自己創办的“海尔曼”周报上說,他是一个罕見的始終如一的人,他在拉施塔特軍事法庭上曾宣布摄政王是德国皇帝,他就經常遵守着这句格言。

原来的三执政之一、革命貸款的出納員奧斯卡尔·賴辛巴赫伯爵,于1852年10月8日在倫敦公布了一份收支決算,声明他将

辞去这一事务，并且說：“无论如何，我不能也不会把錢移交給金克尔等公民”。同时，他建議股東們把貸款的临时收据兌換庫存現金。他說，辞去出納員职务等等

“是出于政治上和法律上的考虑…… 貸款的設想落空了。只有而且必須着手貸款才能兌現的两万美元因而沒有筹到…… 創辦一种杂志以作思想宣傳的建議，沒有得到响应。只有政治騙子和革命狂人才会认为現在貸款可以完成，认为目前有可能对各党派同样公正地、从而是大公无私地、真正革命地把錢加以应用”。

但是，哥特弗利德的革命信念不是这样容易动摇的，他为此搞到了一个“決議”，使他能够用另一种招牌来繼續他的事业。

賴辛巴赫的那份決算中包含着有趣的材料。

他說：“后来由委员会付給別人而不是付給我的那些款項，不能让保证人負責，这一点我已經提請委员会在凭据兌現和結賬时注意。”

根据他的 *compte rendu* [決算]，收入共有 1 587 鎊 6 先令 4 辨士，其中有倫敦 2 鎊 5 先令，有德國 9 鎊。支出共計 584 鎊 18 先令 5 辨士，开支項目如下：金克尔和希尔盖特納尔的旅費 220 鎊；其他人的旅費 54 鎊；石印机 11 鎊；印制临时收据 14 鎊；石印通訊、郵費等 106 鎊 1 先令 6 辨士；根据金克尔的指示等支出 100 鎊。

革命貸款只有 1 000 鎊，哥特弗利德·金克尔把它存入韦斯明斯特銀行以备即将成立的德国临时政府最初的支付需要。尽管如此，为什么临时政府始終沒有成立呢？或許德国认为，現有的 36 个政府已經够它受的了。

未落入倫敦中央金庫的一些美国貸款至少在某些場合找到了爱国用途，例如，1858 年春天哥特弗利德·金克尔交給卡尔·布林德先生 100 鎊，要他把这笔錢变成“激进傳单”等等。

7. 反对帕麦斯顿的論战

1856年5月6日于設菲尔德考恩西耳大厅

博士：

您在“人民报”上发表了对卡尔斯文件的卓越 *exposé* [叙述]，鉴于您对公众的这一巨大贡献，設菲尔德外交事务委员会委托我向您表示热烈的感谢。

謹致

敬礼

书记 威·賽普尔斯

致卡尔·馬克思博士①

8. 安·謝尔策尔先生的声明

安·謝尔策尔先生自三十年代起就参加工人运动，享有声誉，1860年4月22日他从倫敦写信給我：

“尊敬的公民：

在福格特小册子的卑鄙謊言和无耻誣蔑中，有一处涉及我个人，我不能不对此提出抗議。在6月2日‘瑞士商业信使报’第150号的附刊上刊印的文件第7号中这样說：‘我們知道，目前倫敦正在采取新的步驟。有安·謝·……签名的信件从該地寄給各个团体和个人等等’。看来，这些‘信件’使卡·福格特先生在他的书中的另一个地方这样写道：‘今年(1859)年初似乎出现了政治宣傳的新地盘。这一机会立刻被利用来尽可能地重新赢得一些影响。这方面的策略多年来未曾改变。像一支古老的歌曲所說的“誰都一

① 原著所附的这封信是英文。——編者注

点也不知道”的一个委员会，通过同样完全不为人所知的主席或书记分发信件等等。经过这种方法的试探之后，有几个“流浪弟兄”在一个地区内出现了，他们立即着手组织秘密团体。别人准备损害其名誉的那个协会，却丝毫不知道几个人搞团体的阴谋；甚至以协会名义发出的通讯，协会多半也完全不知道；但是，信中总是说“我们的协会”等等。后来不可避免的、根据截获的文件进行的警察侦讯，也往往是针对整个协会的等等。’

为什么卡尔·福格特先生不把他在文件第7号中所引用的信件全部转载出来呢？为什么他没有把他所根据的来源‘探测’一下呢？他本来不难了解，公开的伦敦工人教育协会在公开的会议上指定了一个通讯委员会，我曾经荣幸地被选入该委员会。既然福格特先生谈到不为人所知的书记等等，那末我是很乐于不为他所知的，但是，我可以满意地说，成千的德国工人都知道我，这些工人从福格特现在所诽谤的人们那里获得科学知识。时代变了。秘密结社的时期已经过去。当工人协会内公开讨论各种问题而每次会议都有局外人作为来宾列席的时候，再谈论秘密会社或小团体就是荒谬的了。由我签名的信总是起草得任何人也不会因之受到丝毫损害。对我们在伦敦的德国工人来说，重要的只是了解大陆上的工人协会的情绪，创办一家能够捍卫工人阶级利益并同敌对阵营的雇佣文巧作斗争的报纸。当然，没有一个德国工人会想到去为某个波拿巴的利益进行活动，能够这样做的只有福格特之流的人物。我们肯定比福格特先生更为憎恨奥地利的专制制度，但是，我们并不期望由外国专制君主来使它崩溃。各国人民都应当自己解放自己。福格特先生认为自己有权采取的手段，恰恰是我们用来反对他的阴谋而被他看做是犯罪行为的那种手段，这不是怪事吗？如果福格特先生断言，他没有从波拿巴那里领取薪金，办报的钱是从民主派手中得来的，并且想以此为自己开脱，那末，像他这样有学识的人，怎么能够愚蠢到去指责和怀疑那些关心自己祖国的幸福和为创办报纸作宣传的工人们呢？

顺致崇高的敬意

安·谢尔策尔”

9. 刊登在 1859 年 5 月 27 日“自由新聞”上的布林德的文章

The Grand Duke Constantine to be King of Hungary ①

A Correspondent, who encloses his card, writes as follows:—

Sir, — Having been present at the last meeting in the Music Hall, I heard the statement made concerning the Grand-Duke Constantine. I am able to give you another fact:—

So far back as last summer, Prince Jérôme Napoléon detailed to some of his confidants at Geneva a plan of attack against Austria, and prospective rearrangement of the map of Europe. I know the name of a Swiss senator to whom he broached the subject. Prince Jérôme, at that time, declared that, according to the plan made, the *Grand-Duke Constantine was to become King of Hungary*.

I know further of attempts made,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present year, to win over to the Russo-Napoleonic scheme some of the exiled German Democrats, as well as some influential Liberals in Germany. Large pecuniary advantages were held out to them as a bribe. I am glad to say that these offers were rejected with indignation.

10. 奥尔格斯先生的信

尊敬的先生：

我今天得到李卜克内西先生的通知，說您願把一份关于反对福格特的傳

① 馬克思在本章內引用的英文文件，他本人已在其他章內全部譯出，这里把文件用原文刊出；文件的譯文見本卷第 514 頁。——編者注

单的**来源**經過的司法文件提供我們使用。我恳切地請求您尽速把这一文件寄来,以便我們能够把它提交法庭。寄时并請挂号,一切費用当由我們負担。此外,敬爱的先生,自由党有时对“总汇报”是估計不足的;我們(編輯部)在忠实于政治信念方面已經受了各种考驗。如果您的判断不是根据某一篇文章,而是根据我們的全部工作,那您就会确信,没有任何一家德国报纸像我們这样从容不迫地但是坚持不懈地为德国人民的統一和自由、强盛和文明、精神上 and 物质上的进步,为提高他們的民族感和道德水平而努力工作,也沒有一家报纸获得比我們更大的成果。您必須根据效果来判断我們的活动。再次恳求您盛情地滿足我的要求。

順致崇高的敬意

忠实于您的 海爾曼·奧爾格斯

10月16日于奧格斯堡

同一天写的第二封信只是第一封信的摘要,如奧爾格斯先生所說,“为更慎重起見,也已寄走”;这封信中包含同样的要求,即請把“李卜克內西先生所說的、您要提供我們使用的一份关于反对福格特的著名傳单的来源的文件立即寄来。”

11. 反对卡·布林德的通告信

这里只引用我在1860年2月4日写的反对布林德的英文通告信^①的最后一段:

“在我采取进一步措施以前,我想揭穿那些显然是同福格特暗中勾結的家伙。因此,我公开宣布,布林德、維耶、霍林格尔证明匿名傳单不是在索荷区利奇菲耳德街3号霍林格尔印刷所印刷的声明是蓄意的謊言。第一,以前在霍林格尔那里当过排字工人的費

^① 見本卷第762—764頁。——編者注

格勒先生准备宣誓证明，上述傳单是在霍林格尔印刷所印刷的，是布林德先生亲笔写的，并且有一部分是霍林格尔亲自排版的。第二，通过法律手續可以证实，这个傳单和‘人民报’上的那篇文章是用同一个活字版印出的。第三，将会证实，維耶并没有在霍林格尔那里連續工作十一个月，尤其是印这个傳单时他没有在他那里工作。最后，还可以举出一些证人，維耶本人曾向这些人承认，是霍林格尔要他在‘奥格斯堡报’上发表的分明是虛假的声明上签名的。据此，我再一次指出上述卡尔·布林德是預謀的造謠者。

卡尔·馬克思”

摘自 2 月 3 日的倫敦“泰晤士报”^①

Vienna, January 30 th. —The Swiss Professor Vogt pretends to know that France will procure for Switzerland Faucigny, Chablais and the Genevese, the neutral provinces of Savoy, if the Grand Council of the Republic will let her have the free use of the Simplon.

12. 費格勒的 AFFIDAVIT

特此声明如下：

經“人民报”（当时在倫敦出版的德文报纸）后来在 1859 年 6 月 18 日第 7 号上轉載并再次在奥格斯堡“总汇报”（“奥格斯堡报”）上轉載的德文傳单“警告”，部分是倫敦索荷区利奇菲耳德街 3 号非德利奥·霍林格尔先生排版的，部分是当时在非德利奥·霍林格尔先生那里工作的我本人排版的，而且这一傳单是在倫敦索荷区利奇菲耳德街 3 号非·霍林格尔先生的印刷所印

^① 譯文見本卷第 601 頁。——編者注

刷的。上述傳單的原稿是卡尔·布林德先生的亲笔。我曾看到，菲·霍林格尔先生把傳單“警告”的校样交給住在倫敦索荷区教堂街 14 号的威廉·李卜克內西先生。菲·霍林格尔先生最初曾犹豫是否要把校样交給威·李卜克內西先生，在李卜克內西先生离开以后，他就向我和我的同事約·弗·維耶表示后悔，說不該把校样交出去。

1860 年 2 月 11 日在密多塞克斯郡弯街治安法庭当面对我作以上声明。
首都治安法官托·亨利。

阿·費格勒^①

盖 章

13. 維耶的 AFFIDAVIT^②

One of the first days of November last — I do not recollect the exact date — in the evening between nine and ten o'clock I was taken out of bed by Mr. F. Hollinger, in whose house I then lived, and by whom I was employed as compositor. He presented to me a paper to the effect, that, during the preceding eleven months I had been continuously employed by him, and that during all that time a certain German flysheet «Zur Warnung» (A Warning) had not been composed and printed in Mr. Hollinger's Office, 3, Litchfield Street, Soho. In my perplexed state, and not aware of the importance of the transaction, I complied with his wish, and copied, and signed the document. Mr. Hollinger promised me money, but I never received anything. During that transaction Mr. Charles Blind, as my wife informed me at the time, was waiting in Mr. Hollinger's room. A few days later, Mrs. Hollinger called me down

① 費格勒的 Affidavit 的原文是英文。——編者注

② 譯文見本卷第 521—522 頁。——編者注

from dinner and led me into her husband's room, where I found Mr. Charles Blind alone. He presented me the same paper which Mr. Hollinger had presented me before, and entreated me to write, and sign a second copy, as he wanted two, the one for himself, and the other for publication in the Press. He added that he would show himself grateful to me. I copied and signed again the paper.

I herewith declare the truth of the above statements and that:

1) During the 11 months mentioned in the document I was for *six* weeks *not* employed by Mr. Hollinger, but by a Mr. Ermani. 2) I did not work in Mr. Hollinger's Office just at that time when the flysheet: «Zur Warnung» (A Warning) was published. 3) I heard at the time from Mr. Voegele, who then worked for Mr. Hollinger, that he, Voegele, had, together with Mr. Hollinger himself, composed the flysheet in question, and that the manuscript was in Mr. Blind's handwriting. 4) The types of the pamphlet were still standing when I returned to Mr. Hollinger's service. I myself broke them into columns for the reprint of the flysheet (or pamphlet) «Zur Warnung» (A Warning) in the German paper «Das Volk» published at London, by Mr. Fidelio Hollinger, 3, Litchfield Street, Soho. The flysheet appeared in No. 7, d. d. 18th June, 1859, of «Das Volk» (The People). 5) I saw Mr. Hollinger give to Mr. William Liebknecht, of 14, Church Street, Soho, London, the proofsheets of the pamphlet «Zur Warnung», on which proofsheets Mr. Charles Blind with his own hand corrected four or five mistakes. Mr. Hollinger hesitated at first giving the proofsheets to Mr. Liebknecht, and when Mr. Liebknecht had withdrawn, he, F. Hollinger, expressed to me and my fellow workman Voegele his regret for having given the proofsheets out of his hands.

Declared and signed by the said Johann Friedrich Wiehe at the Police Court, Bow Street, this 8th day of February, 1860, before me *Th. Henry*, Magistrate of the said court.

Johann Friedrich Wiehe

L. S.

14. 摘自訴訟文件

临时政府。法兰西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

以法国人民的名义

1848年3月1日于巴黎

勇敢而正直的馬克思：

法兰西共和国是所有自由之友的避难所。暴政把您放逐，自由的法兰西向您、向所有为神圣事业和各国人民的友好事业而斗争的人们敞开着大门。法国政府的每一代表都应当以这种精神来理解自己的职责。

致兄弟般的敬礼

临时政府委员 斐迪南·弗洛孔^①

1848年5月19日于布鲁塞尔

亲爱的馬克思先生：

我非常高兴，从我们的朋友維尔特那里获悉您准备在科倫出版“新莱茵报”，該报的计划他已经给了我。必須让这一报纸使我们能在比利时了解到德国民主事业的情况，因为从“科倫日报”、奥格斯堡“总汇报”、从我们在布鲁塞尔能够得到的德国其他贵族报纸以及从我们的“比利时独立报”（該报的所有特約通訊都是以符合我們的资产阶级贵族利益的观点写成的）上都不可能了解到关于这方面的可靠消息。維尔特先生告诉我，他准备去科倫同您一起参加创办“新莱茵报”的工作。他以您的名义答应把該报寄给我，由我寄“社

^① 原著所附的弗洛孔的这封信是法文。——編者注

会辯論报”⁶⁰⁴給您作为交换。我也非常希望就我們两国的共同事业和 您交换信件。为了两国的利益，必須使比利时人和德国人彼此不致生疏，因为正在法国酝酿的事件必将提出有关我們两国的問題。我在巴黎呆了十来天后回到这里，在那期間我曾經尽最大努力去了解这个偉大首都的情况。在那里停留的最后几天，我了解到了五月十五日事件的內情。我甚至出席过国民議会的會議，正好在开会时人民闖进会场里来了…… 我观察了巴黎人民所采取的立場，听到了法兰西共和国当前的主要活动家的讲演，于是我明白，资产阶级情緒中将出現对二月事件的强烈反应；毫无疑问，五月十五日事件将会加速这种反应。但是，这又无疑将很快引起新的人民起义…… 法国不久就会求助于战争。为了对付这一情况，我們应当考虑在这里和在您那里我們的共同行动。如果战争首先向意大利发动，我們將得到一个喘息的机会，…… 如果战争的矛头立刻指向我們的国家，那末我还不知道我們应当怎样做，在这种情况下我們需要听取德国人的建議…… 現在我准备在星期日的“社会辯論报”上发表您即将出版新报纸的消息…… 我打算今年6月底去倫敦。如果您有机会給您在倫敦的朋友写信的話，劳駕請他們接待我。

最忠实于您的

律·若特兰律师^①

1860年2月10日于布魯塞尔

亲爱的馬克思：

很久沒有得到您的消息，接到您最近的来信非常高兴。您抱怨事情进行緩慢和我沒有立即答复您向我提出的問題。怎么办呢，岁数愈大就愈懶得动笔了。但是，我希望您相信我的观点和感情是始終未变的。我看到，您的最近一封信是由您口授而由您的亲近的秘书，您的可爱的夫人笔录的，那末，馬克思夫人还没有忘記这个布魯塞尔的老隱士。請向她轉达我衷心的問候。

亲爱的同志，請保持您对我的友誼。

致兄弟般的敬礼

列列韦尔^②

① 原著所附的若特兰的这封信是法文。——編者注

② 原著所附的列列韦尔的这封信是法文。——編者注

1860年2月11日于倫敦肯辛頓劍橋廣場5号

亲爱的馬克思：

我在“国民报”上讀到反对您的一些卑鄙齷齪的文章，这些文章作者的謊言和恶意使我深为震惊。我认为，每个認識您的人都有义务——尽管这种证明是多么多余的——对您的高尚、正直和大公无私的品德給以应有的评价。我感到自己有双重义务：我記得，您多年来曾經毫无报酬地給我的小型杂志“寄語人民”⁶⁰⁵、后来又給“人民报”写过許多文章，这些文章对人民的事业十分重要，对报纸是非常宝贵的。請允許我表示这一希望：請您严厉地懲罰那对您进行誹謗的卑鄙和怯懦的人。

我的亲爱的馬克思，請接受我的最衷心的敬意

厄內斯特·琼斯

致卡尔·馬克思博士^①

1860年3月8日于紐約“論壇报”編輯部

敬爱的先生：

在答复您的要求的时候，我非常高兴地告訴您，我个人知道您同美国的各种出版物有联系。大約在九年前，我邀請您为“紐約論壇报”撰稿，从那时起这种撰稿工作就沒有間断。就我記憶所及，您經常为我們写稿，从沒有一星期間断。您不仅是我們报纸的最宝贵的撰稿人之一，而且也是报酬最优厚的撰稿人之一。我可以指出的您的唯一缺点是，您有时表現了对美国报纸來說是太过分的德国人的感情。这一点在对俄国和法国問題上都表現出来过。在涉及沙皇制度和波拿巴主义問題时，我有时感到，您对德国的統一和独立表現了过多的兴趣和过大的关心。在最近的意大利战争問題上，这一点大概表現得特別明显。在同情意大利人民方面，我和您是完全一致的；我和您一样不信任法国皇帝的誠意，一样不相信他会給意大利自由，但是，我并不像您和其他德国爱国者那样，认为德国的情况令人耽心。

我必須补充一点，您在所有經過我手的您的文章中，对劳动阶级的幸福和进步一直表示最深切的关怀，您的許多文章都是直接論述这个問題的。

^① 原著所附的琼斯的这封信是英文。——編者注

近五六年来，我不止一次地充当中間人，把您的作品交給“普特南氏月刊”606（一家水平很高的文学刊物）以及“美国新百科全书”（我也是它的編輯，您曾經給它寄来过一些非常重要的文章）。

如果您还需要其他的說明，我乐意为您效劳。

現在仍然忠实于您的

“紐約論壇报”主編 查理·安·德納

致卡尔·馬克思博士①

15. 丹屠出版的小册子

我已經指出，丹屠出版的小册子成了德国的达-达从中汲取世界史方面的智慧，特別汲取“拿破侖的救世政策”方面的智慧的源泉。“拿破侖的救世政策”本来是“民主主义者”弗·察貝尔的最近一篇社論中的用語。法国人自己怎样評價和認識这些小册子，可以从巴黎周刊“星期日邮报”1860年10月14日第42号的一段摘录中看出：

“至于当前情况，你随便拿起十本小册子，就会看到其中至少有九本的构思、整理和写成……是經過誰呢？經過职业小說家、写歌曲的、作輕歌剧的和教堂杂役！

报上談論起北方各大国之間的秘密会談，談論起正在复活的神圣同盟了嗎？那好，于是便有一位令人喜欢的、文艺性相当高的、甚至（在当时）是相当自由主义的歌曲作者跑到丹屠先生那里，給他一本按格朗基奧先生的文章改写出来的又臭又长的小册子，其响亮的标题是‘联合’。利美腊克先生对同英国結盟也許表示过不滿吧？那好，立刻便有一位得过格雷哥里大帝勋章的沙特勒（从他的風格判断，他是某个教堂的杂役）登載了或者轉載了一篇关于‘英国对法国的罪行和过失’的可笑的长篇报告。‘吉耳里教父’607的作者

① 原著所附的德納的这封信是英文。——編者注

(艾德門·阿布)已經认为必須用普魯士君主制度的政治秘密来教育我們，他在劇院遭到慘敗后又來向柏林議會提出明智的建議。據說，克萊維爾先生最近打算澄清被貝利先生弄得非常混亂的巴拿馬地峽問題；毫無疑問，在10月21日的王公會晤之后數日，我們所有書店的櫥窗里都會出現一種華麗的玫瑰色的小冊子，它的標題是‘由歌劇院芭蕾舞班寫的華沙會見記’。

文學小神們之侵入政治領域，初看不可理解，却是同許多原因有聯系的，這里只舉一個最直接最明顯的原因。

在智慧和感情幾乎普遍衰退的情況下，這些從事使讀者開心的可悲職業的先生們，不知道怎樣才能震動和喚醒他們的讀者。他們總是不斷重復他們老一套的幽默歌曲和笑話。他們自己也像他們要為之解悶的那些人一樣受到苦悶、悲傷和沮喪的煎熬。正是由於他們已經無計可施，才在絕望中有的去寫交際花回憶錄，有的去寫外交小冊子。

然後，某位從未認真研究過一小時政治的和內心根本沒有任何信念影子的要筆杆的冒險家突然對自己說：‘我得掀起一場軒然大波！要使那些本能上迴避我的人都來注意我，我該做些什麼呢？寫一本關於列奧塔爾事件的小冊子還是關於東方問題的小冊子？应当向驚異的世界去揭露我從來沒有去過的女客廳的秘密還是我更不熟悉的俄國政治問題的秘密？应当用伏爾泰的風格來表露自己對名聲敗壞的女人們的憂傷，還是用福音書的風格來表達對於受到伊斯蘭教的狂熱迫害、掠奪和屠殺的不幸的馬龍派的悲哀？應當寫里格爾博什小姐的贊美詩還是教皇世俗政權的辯護書？我堅決選擇政治。我用國王和皇帝來娛樂我的讀者，比用蕩婦好得多。’我們的名士派的編外人員在說過這番話以後，就去翻閱‘通報’，在交易所的柱廊下躑躅了幾天，拜訪了一些官吏，終於摸清了首都的好奇心或宮廷的興致的風向；然後就選擇這股風可以適當吹滿的一個標題，於是他的大功就告成了。現在他的書可以認為已經寫好了；因為目前在小冊子里只有兩種東西是重要的：一是標題，一是作者和‘上等人物’之間可能有的那種關係。

知道了這些情況，還需要對充斥市場的小冊子的價值加以說明嗎？如果有一天你能鼓足全部勇氣把它們從頭到尾讀一遍，你會為它們的作者所表現的空前無知、不可容忍的輕率、甚至道德墮落而驚異不止。這里我所說的還不是其中最壞的…… 每年水平都有所降低，每年都暴露出精神退化的新現象，每年都增加一些使我們感到羞愧的文學上的恥辱。事情已經到了這樣的

地步，甚至最乐观的人有时也对前景表示怀疑，并忧心忡忡地自问：我们能够摆脱这种处境吗？”

上面我引用了“国民报”关于“拿破侖的救世政策”的一段話。“曼彻斯特卫报”⁶⁰⁸——它以报道的消息多半准确可靠而聞名全英国——駐巴黎的一个通訊員以独特的方式报道了这样一則趣聞：

«Paris, November, 8... Louis Napoleon spends his gold in vain in supporting such newspapers as the «National-Zeitung».
(路易-拿破侖在支持像“国民报”这样的报纸方面白白浪费了自己的金錢。)
(1860年11月12日“曼彻斯特卫报”)

不过，我认为一向消息灵通的“曼彻斯特卫报”的通訊員这一次却弄錯了。据说，弗·察貝尔为了证明他没有被奥地利收买，已投入波拿巴派的陣营。至少柏林是这样告诉我的。同邓斯之歌中的簡直一模一样！

16. 补 遺

(a) 卡尔·福格特和“水泥”公司

正当最后几个印張付印的时候，我偶然得到了“时代呼声”（1860年）10月号。流亡的議員的机关报“德国月刊”过去的出版者，从而在某种程度上說是“流亡的帝国摄政”的文化上司的阿·科拉切克，在第37頁上談到他的朋友卡尔·福格特时說：

“日内瓦‘水泥’股份公司（参加經營的不是別人，正是卡尔·福格特先生自己）建立于1857年，而1858年股東們就已經一文不名，檢察官立即以欺詐罪監禁了一位經理。进行逮捕的时候福格特先生正在伯尔尼，他急忙赶回

来，被捕者被釋放了，案件暗中了結，‘以免出丑’，但股東們却損失了一切。照这个例子来看，不能說财产在日内瓦是受到足够保护的，卡尔·福格特先生在这方面的錯誤就显得更奇怪了，因为像我們前面所說的，他是上述公司的理事之一；然而，在法国如有这类案件就到理事中間去寻找罪犯，把他們关进監獄并用他們的财产来滿足股東們在民事訴訟中的要求。”

約·菲·貝克尔在他的信中(第十章)談到使詹姆斯·法济先生投入十二月怀抱的銀行事件，那就用它来同这事比較一下吧。这种細节极有助于解决小拿破侖如何成了他那时代的最偉大人物之謎。大家知道，小拿破侖本人不得不在 coup d'état [政变] 和……克利希⁶⁰⁹ 之間进行选择。

(b) 科苏特

下面摘录的同科苏特談話的記錄确凿地证明，科苏特对俄国是匈牙利的主要危險这点了解得多么清楚。这篇記錄是現在 House of Commons [下院] 的最有名的激进派議員之一作的。

“1854年5月30日晚在……同科苏特先生談話的記錄

……恢复匈牙利的严格法制(他說, 即科苏特說)可以重建匈牙利和奧地利的联盟并阻止俄国在匈牙利找到同盟者。他(科苏特)将絲毫不反对恢复法制。他准备劝告他的同胞, 当这种恢复可以达到的时候, 就要充滿信任地接受它, 他保证自己决不会妨碍这种轉变。他本人不打算返回匈牙利。他本人不想促使奧地利采取这种方針, 因为他不相信奧地利将回到法制, 除非到了万不得已的地步。他允許我說这就是他的观点, 必要时, 他将公开证实这种观点, 但是由于他不指望奧地利会自願放棄它那傳統的中央集权計劃, 他不会提出任何建議…… 要是 1848 年, 他是会同意派遣匈牙利軍队去击退皮蒙特人的攻击的(科苏特先生在 1848 年走得更远, 他靠在佩斯的議會中的一篇激烈讲话, 做到派匈牙利軍队去鎮压意大利的“叛乱者”), 但是, 他不会利用这些軍队来占領奧地利的意大利, 就像他不会允許外国軍队进入匈牙利

一样。”^①

一切时代，人民創造神話的幻想力都表現在发明“偉人”上面。最有說服力的这类例子毫無疑問是西蒙·玻利瓦尔。至于科苏特，例如，他被人頌揚为消灭匈牙利封建制度的人。然而他同三項偉大措施（实行普遍征稅、廢除农民的封建义务、无偿地取消教会什一稅）毫無关系。普遍征稅的法案（首先免除了向貴族征稅）已經由瑟美列提出；廢除徭役等法案由薩博耳奇的議員博尼什提出，而什一稅則是教会通过它的叶凱尔法魯希神甫自己放棄的。

（c）艾德門·阿布“一八六〇年的普魯士”

我在第八章末尾表示了这种看法：艾·阿布的小册子“一八六〇年的普魯士”或如最初用的标题“拿破侖第三和普魯士”，是重新譯回法文的达-达·福格特用德文編写的丹屠小册子的摘要。对这种看法所能提出的唯一怀疑是，这位遭受失敗的喜剧作家艾·阿布根本不懂德文。但是，难道吉耳里 *compère* [教父] 不能在巴黎找一位 *commère allemande* [德国教母] 嗎？誰可能是这位 *commère*，还是一个謎。大家知道，“一八六〇年的普魯士”这一小册子是作为路易·波拿巴的巴登-巴登之行⁶¹⁰ 的記要发表的；这本小册子应当事先把他的建議告訴摄政王并向普魯士說明，像小册子的結束語中所說的，普魯士有十二月二日制度这个 «un allié très utile qui est peut-être appelé à lui (Preußen)» «rendre de grands services, pourvu qu'elle s'y prête un peu» [“非常有用的同盟者，也許，这个同盟者的职责就是替它〈普魯士〉大力效劳，只

^① 同科苏特会谈的記錄的原文是英文。——編者注

要它稍稍迁就的話”]。《*pourvu qu'elle s'y prête un peu*》譯成德文就是：“在普魯士把萊茵省賣給法国的条件下”；这个秘密已被艾·阿布在1860年春天用法文（見第九章“代理机构”）在“民論報”上透露。在这种足以加重別人罪过的情况下，我不应当根据簡單的猜測，就把某人說成是艾·阿布这位失敗的喜劇作家和丹屠出版的小册子的作者的德国提詞人。但是，現在我有权声明，吉耳里 *compère* [教父] 的德国 *commère* [教母] 不是別人，正是福格特的温存的庫尼貢达——特利尔的路德維希·西蒙先生。对阿布的小册子写过著名的回答的那位倫敦的德国流亡者^① 未必猜到了这一点！ 611

^① 西·路·波克罕。——編者注

卡·馬克思 給“总汇报”編輯的信

1859年10月19日于[倫敦]
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
格拉弗頓坊9号

閣下：

我参加德国报刊工作时，攻击过“总汇报”，“总汇报”也攻击过我。但当“总汇报”履行在我看来是报刊的首要职责，即揭发招搖撞騙的职责时，决不会有碍于我尽力帮助它。附去的文件，要是在倫敦这里，是具有司法文件的作用的^①。不知在奧格斯堡是否如此。我之所以要取得这份文件，是因为布林德不肯承认他向我和其他人說过的話，我把这些話又告訴了李卜克內西，他对匿名傳单里所进行的揭露也就毫不怀疑了。

您的順从的僕人 卡尔·馬克思博士

載于1859年10月27日
“总汇报”第300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总汇报”

^① 有关此点見本卷第514—517頁。——編者注

卡·馬克思
致“改革报”、“人民报”和
“总汇报”編輯部的声明⁶¹²

1859年11月7日于倫敦

我从汉堡的一位朋友寄給我的“自由射手”第132号中看出，**爱德华·梅因**认为他有責任以他那公认的权威干預**福格特**案件。他的邏輯的 Horsepower〔馬力〕，或者更正确些說，他的邏輯的 donkeypover〔驴力〕集中表現在这样一个极妙的論断上：既然他同**布林德**的关系很好，而**布林德**却没有給他寄去匿名傳单的副本，可見我給奧格斯堡“总汇报”寄去的原本一定是 *falsum*〔假貨〕。由于他还有一点儿小聪明，他自然避免直截了当地这样說；他是轉弯抹角地說的。

不过，我希望**爱德华·梅因**先生能够证明我的時間毫无价值，因此，我可以用攻击德国庸俗民主派这样的事情来把它浪費掉。

从1850年底起，我就同倫敦的德国流亡团体断絕了一切关系，这个团体团結的唯一基础是同我作对，在我抽去这一基础之后，这个团体就立即瓦解了。由于像**梅因**这样一些代理人的努力，例如他公开鼓动支持**金克尔**派反对**卢格**派，瓦解的过程就特別加速了。那以后的9年中，我一直是“紐約論壇报”的撰稿人，这家报纸有20万訂戶，讀者范围大致同“自由射手”相同。我是否有一次

提到过哪一位德国的庸俗民主主义者？我是否用片言只語回敬过对我的卑鄙攻击？虽然过去 5 年中，德国报刊，特别是美国的德文报刊，曾滿紙是这些英雄好汉們对我的攻击。

不錯，这期間我攻击过**爱德华·梅因**先生有責对之敬仰的“偉大的”民主主义者，但我沒有誹謗过他們。例如，我攻击过偉大的民主主义者**帕麦斯顿勋爵**。由于不仅英国的派系不同的报纸——从宪章派的“人民报”到**烏尔卡尔特**先生的“自由新聞”都刊載了我的“誹謗”，而且倫敦、設菲尔德和格拉斯哥沒有我的参与就把它翻印了至少 15 000 个单行本，我的罪过就更加不可寬恕了。此外，我在这时期还揭露过偉大的民主主义者**路易·波拿巴**，最初是在我的德文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这一著作虽然在德国境内到处遭到沒收，但在美国流傳很广，当时倫敦的宪章派机关报刊登过它的摘要⁶¹³。我直到今天还在“論壇报”上“誹謗”“偉大的民主主义者”**波拿巴**，分析他的財政制度，他的外交，他的作战方法，他的 *idées napoléoniennes* [拿破侖观念]。**路易·波拿巴**給“紐約时报”寄过一封公开信，感謝它对这些“誹謗”攻击进行了反击。七年前，我在“揭露共产党人案件”一书中甚至揭露了“偉大的民主主义者”**施梯伯**，該书在巴登—瑞士边境上被毀掉了。这一点，**梅因**先生怎么也得諒解我的。現在这种誹謗是符合民主作風了，因为它是在“上司的恩許”下散布的。除了**爱德华·梅因**先生的报纸以外，**約瑟夫·杜蒙**先生在科倫的报纸^①也证明我常常弄錯時間。1848 年和 1849 年，当我敢于在“新萊茵报”上出面来維護匈牙利、意大利和波兰民族时，指摘和叫囂得最凶的是誰呢？不

① “科倫日报”。——編者注

正是約瑟夫·杜蒙先生在科倫的報紙嗎？不錯，當時路易-拿破侖·波拿巴還沒有把“自由主義的”恩惠賜予各民族。至於“新萊茵報”過去的編輯們始終未改變自己的觀點，這是從前的約瑟夫·杜蒙先生、現在的朱澤培·德爾·蒙特從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戰爭初期發表的“波河與萊茵河”一書中也看出的。對於“狹義的”愛德華·梅因式的民主，我在經過九年的不加理睬之後，只不過表示了兩次（而且是最近）：一次是反對科蘇特，另一次是反對哥特弗利德·金克爾先生。的確，我在“人民報”上對金克爾在“海爾曼”中的漂亮詞句從純粹文法觀點上提出過一些意見。除了那篇標題為《Quid pro quo》的論維拉弗蘭卡和約的文章⁶¹⁴以外，這就是我給“人民報”寫過的全部東西。但是在愛德華·梅因看來，“善良的民主主義者”似乎有權破壞句法的“專橫的”規則，正如有權從共和主義陣營轉向保皇主義陣營一樣。

在這封信的結尾，我處於同黑格爾在他的“邏輯”開頭時所處的正好相反的窘境。他是想從“有”到“無”，而我則想從“無”到“有”，即從愛德華·梅因到福格特案件。為了不多費筆墨，現在向卡爾·布林德提出以下問題：

（1）5月9日在烏爾卡爾特所組織的大會的講台上，布林德有沒有把內容同“警告”這個傳單完全符合的關於福格特的一些消息告訴過我？

（2）布林德是不是在5月27日倫敦的“自由新聞”上發表過一篇題為“康斯坦丁大公——匈牙利未來的國王”的匿名文章，其內容基本上同傳單“警告”的一樣，只是沒有提到福格特的名字？

（3）布林德有沒有委託別人在倫敦索荷區利奇菲耳德大街3號菲·霍林格爾印刷所自費印刷上指的那個傳單？

不管梅因民主派怎样支吾搪塞，也不管偉大的陌生人、“卓越的法学家”約瑟夫·杜蒙先生是否乐意，总是有这样一个问题：誰叫印刷“警告”这个傳单的？奥格斯堡“总汇报”只是因为翻印这个傳单而受到法庭追究。福格特认为必須在全世界面前洗清的只是这个傳单上对他的指控。在印发傳单的人面前，正如罗伯特·皮尔說的：three courses open to himself [摆着三条路]。或者他是有意撒謊。我不认为卡尔·布林德会这样。或者他后来确信使他有权印刷这个傳单的消息是伪造的。那他更應該进行解釋。最后，或者他手中有证据，但由于个人考虑，他想暗中了結这全部事情，并且用寬宏大量的謙遜精神来忍受那些扔向我而不是扔向他的臭鸡蛋。但是，在为了弄清 in partibus [非现实的] 德国帝国摄政和 de facto [实际的] 法国皇帝之間的关系这样重要的事情上，难道不應該把一切个人考虑都置之度外嗎？

卡尔·馬克思

載于1859年11月19日“改革报”
第139号附刊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改革报”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1936年
出版的卡·馬克思“福格特
先生”一书

卡·馬克思 致“总汇报”編輯部的声明

福格特很了解自己的同伙，他玩了一套很巧妙的手法，把揭露他的来源从所謂民主营垒轉嫁到社会主义营垒。但从我这方面來說，我对助长这种 *quid pro quo* [概念的混乱] 一点也不感觉兴趣，所以不能对布林德在“总汇报”第 313 号上发表的声明置之不理。

(1) 5 月 9 日在烏尔卡尔特組織的群众大会的讲台上，布林德曾把在傳单“警告”上对福格特提出的全部指控告訴过我。这些細节他也告訴过別人，例如弗萊里格拉特。从内容和語言上来看，他的口头讲述和印出的傳单完全相同，所以 *de prime abord* [一开始] 便很自然地认为傳单是他写的。

(2) 在 5 月 27 日倫敦的“自由新聞”上出現了一篇題为“康斯坦丁大公——匈牙利未来的国王”的布林德的匿名文章，这篇文章基本上是傳单“警告”的先声。布林德在这篇文章中說，他認識德国的自由派和倫敦的民主派，有人建議他們宣傳波拿巴主义以获取 «large bribes» [“巨額賄賂”]。当快要审理福格特的訴訟的时候，“自由新聞”的主編多·科勒特先生来找我，他代表布林德請求我不要利用我知道的上述文章为誰所写这一实情。我回答科勒特先生說，我不能承担任何义务，我的謙恭取决于布林德的言行。科

勒特先生也认为这是完全正当的。

(3)菲德利奥·霍林格尔的声明簡直可笑。菲德利奥·霍林格尔知道他印刷傳单**不标明印刷地点**是正式破坏了英国的法律。所以他擅自给自己造了一个同这个 pécadillo [小过] 毫不相干的证明。“人民报”上轉載的傳单用霍林格尔印刷所还保存的活字版排印,是偶然的。这样一来,也不用证詞,只要把傳单同“人民报”轉載的傳单加以简单的对照,就可以在法庭上证明傳单“出自菲·霍林格尔印刷所”。把案件从奥格斯堡移到倫敦,布林德—福格特的全部 mystère [秘密] 就都揭穿了。

卡尔·馬克思

1859年11月15日于倫敦
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
园格拉弗頓坊9号

載于1859年11月21日“总汇报”
第325号附刊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总汇报”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在1936年
出版的卡·馬克思“福格特
先生”一书

卡·馬克思 对“奧格斯堡报”的訴訟⁶¹⁵

1860年2月4日于倫敦
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
公园格拉弗頓坊9号

致“自由新聞”編輯

閣下：

您記得，在1859年5月27日“自由新聞”上曾有一篇題为“康斯坦丁大公——匈牙利未来的国王”的文章。这篇文章用德国流亡者所熟悉的形式揭穿了日内瓦的福格特先生，虽然文章沒有指出他的名字。它揭露福格特是波拿巴的代理人，在意大利战争爆发时，曾建議德国的自由派和倫敦的德国民主派接受《large bribes》〔“巨額賄賂”〕。作者为这种行賄企图遭到憤怒的反击感到非常高兴。我肯定，这篇短文的作者是卡尔·布林德先生。如果我弄錯了，您可以反駁我。不久以后，在倫敦散发了德文的匿名傳单，标题是《Zur Warnung》（“警告”）。这个傳单实际上可以看做是“自由新聞”上那篇文章的翻版，只是引用了較多的細节和福格特的名字。倫敦的德文报纸《Volk》（“人民报”）轉載了这个匿名傳单，后来奧格斯堡的“总汇报”（“奧格斯堡报”）又从該报把它轉載了，这以后，福格特认为該报誹謗他而提出控告。与此同时，我接到了当

时在“人民报”的承印人霍林格尔那儿工作的排字工人費格勒先生的书面声明，声明說，傳单是在霍林格尔印刷所印刷的，并且是卡尔·布林德先生亲笔写的。我当时已經通知您，这份声明已轉寄給“奥格斯堡报”了。在奥格斯堡法院拒絕對这一案件作出判决之后，布林德先生終於在“奥格斯堡报”上发表了文章。他不仅断然否认匿名傳单是他写的，而且郑重其事地宣称，傳单根本不是在霍林格尔印刷所印刷的。为了证实后面这一点，他发表了霍林格尔本人和自称在霍林格尔印刷所連續工作了十一个月的一个名叫維耶的排字工人签过字的声明。我已經在“奥格斯堡报”上^①对布林德、霍林格尔和維耶的联合声明作了答复，但是布林德再一次提出反駁并且又举出霍林格尔和維耶作证。一开始就从个人目的出发把我看做是傳单的匿名作者的福格特，当时发表了用最下流的造謠中伤来攻击我的小册子。

在我采取进一步措施以前，我想揭穿那些显然是同福格特暗中勾結的家伙。因此，我公开宣布，布林德、維耶、霍林格尔证明匿名傳单不是在索荷区利奇菲耳德街3号的霍林格尔印刷所印刷的声明是蓄意的謊言。第一，以前在霍林格尔那里当过排字工人的費格勒先生准备宣誓证明，上述傳单是在霍林格尔印刷所印刷的，是布林德先生亲笔写的，并且有一部分是霍林格尔亲自排版的。第二，通过法律手續可以证实，这个傳单和“人民报”上的那篇文章是用同一个活字版印出的。第三，将会证实，維耶并没有在霍林格尔那里連續工作十一个月，尤其是印这个傳单时他没有在他那里工作。最后，还可以举出一些证人，維耶本人曾向这些人承认，是

① 見本卷第760—761頁。——編者注

霍林格尔要他在“奥格斯堡报”上发表的分明是虛假的声明上签名的。据此,我再一次指出上述卡尔·布林德是預謀的造謠者。

如果我說得不对,那他可以通过英国法院很容易地駁倒我。

卡尔·馬克思

1860年2月4日以傳单形式印行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傳单譯的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1936年出版的卡·馬克思“福格特先生”一书

卡·馬克思 致德国报纸編輯部的声明

茲声明：我已采取步驟，准备对柏林“国民报”起訴，因該报第37号和第41号社論就福格特的小册子“我对‘总汇报’的訴訟”对我进行誹謗。对于福格特，我准备以后用文字予以回答，因为为此需要詢問一些現時不在欧洲的人。

因此，暫時我只談談下面的情况：

(1)根据“国民报”所編的文选来看，——尽管我作了一切努力，但直到現在無論在倫敦书商那里或者在以前曾收到过福格特寄的所謂“研究”的熟人那里，我都沒有能够找到福格特的这本小书——福格特所写的胡言乱語不过是他九个月前在他私人的“通报”即俾尔“商业信使报”上所发表的文章的进一步發揮。当时我让倫敦轉載他的誹謗书，不加任何評論。这样一个简单的办法在一个了解人而且知道他們之間的相互关系的地方，就足够評定一位教授先生的了。

(2)福格特先生对我的征討的借口，同意大利征討的借口一样，是“观念”。这就是，似乎我是匿名傳单“警告”的作者。根据我用英文发表的通告（我附上一份）您可以看出，我找到了办法迫使

布林德先生和他的婁羅們或者默认这个借口是謊言，或者由英国法院来揭穿他們的謊言。

卡尔·馬克思

1860年2月6日于倫敦
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
公园路格拉弗頓坊9号

載于1860年2月10日“人民报”
第35号；1860年2月10日“科倫
日报”第41号；1860年2月11日
“改革报”第18号；1860年2月17
日“总汇报”第48号附刊(有歪曲)
和其他德国报纸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人民报”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在1936年
出版的卡·馬克思“福格特
先生”一书

卡·馬克思 給“每日電訊”報編輯的信

閣下：

您在您今天的報上刊登了一封題為“奧地利的報界幫凶”的信，充滿了對我的誹謗和誣辱。這封仿佛是在美因河畔法蘭克福寫的信，大約是在柏林寫就的，它實質上不過是1月22日和25日柏林“國民報”上登載的兩篇文章的荒誕而冗長的重述而已。這家報紙得為自己的誹謗行為而受到普魯士法院的審理。福格特發表對我的誹謗書的虛偽借口是：好像我是匿名的德文傳單《Zur Warnung》（“警告”）的作者。這種傳單起初是在倫敦流傳，後來由奧格斯堡“總匯報”轉載。從附上的報上的消息可以看出，我已向我的對手們提出把這個問題提交英國法院審理。

最後我要求：如果您不希望作為一個犯誹謗罪的被告而被傳到法庭，那您就得在下期報紙上刊登一項對您的輕率行為 amende honorable〔表示歉意〕的聲明，因為您竟敢輕率地侮辱一個人，而這個人的個人品德、過去的政治活動、他的著作和他的社會地位——這一點您應該承認——都是您毫不了解的。

您的順從的僕人 卡尔·馬克思博士

1860年2月6日於倫敦哈佛斯托克
小山梅特蘭公園路格拉弗頓坊9號

第一次用俄文發表於“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4年版第25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接手稿譯的

卡·馬克思 給“总汇报”編輯部的信

1860年2月21日于曼彻斯特牛津街
特隆克利夫小林坊6号

私人性质的信

我从奥格斯堡“总汇报”編輯部收到注明日期是1859年10月16日的两封信，其中一封有这么一些話，原話如下：

“請您相信，我們將以特別的感激利用一切机会，要向您，可尊敬的馬克思先生，表示我們的謝忱。”

我并不希望也不期待奥格斯堡“总汇报”的“謝忱”和“特別的感激”，这一点，我的10月19日的复信^①已經十分清楚地证明了。但是，我在这种情形下特意期待的是什么呢——最低限度是 common fairness [一般的公正]，即任何一家英国报纸（無論它的派系如何）都不敢違背的这种公正。

“特別的感激”和“謝忱”表現如下：

(1) 我的第一个声明沒有被刊登^②，而是登載了布林德的无耻的声明以及用 conspiracy [陰謀] 手段弄得的两份伪证。汉堡的“改革报”却立即刊登了我的声明。

① 見本卷第755頁。——編者注

② 見本卷第756—759頁。——編者注

(2)我曾不得不采用 *douce violence* [温和的压力] 使我答复布林德的声明能够被刊载。^①

但是,我的合法要求被忽視了,我的声明不是刊载在刊登布林德的攻訐的同一地方,即主要的一号报纸上。

(3)奥格斯堡“总汇报”刊载了布林德的第二个声明,他在声明中恬不知耻地称我说的话是明显的谎言,并且又引用了維耶和霍林格尔的那两份应受刑事处分的证詞。該报声称它认为問題已經完全清楚,从而剝夺我的答复的机会。

(4)2月6日我把最近一个声明連同用英文写的通告^②一并寄給奥格斯堡“总汇报”。非常可敬的編輯部把我的声明置之不理,但却刊载了布林德的声明,而他的声明却是由于有了我的通告才写的。不錯,报纸避免轉載这位偉大的外交家附上的 *billet doux* [情书]。其次,它刊载了注明的日期比我的声明迟三天(就是:2月9日于倫敦)的比斯康普的声明。最后,在該报深信“科倫日报”、“人民报”等等早已刊载了我的声明以后,它才决定登載我的声明,但是……同时却殷勤地竟自負起了书报檢查的責任,对我的声明作了任意的修改。1842—1843年我在科倫遭受过普魯士王国的双重书报檢查⁶¹⁶,但是我从来没有料到,1860年我还得受到科尔布博士先生及其同伙的书报檢查。

我认为对这种行为作更詳細的說明是毫无益处的。

卡·馬克思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4年版第25卷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譯的

① 見本卷第760—761頁。——編者注

② 見本卷第762—766頁。——編者注

卡·馬克思
給“自由射手”和“改革報”
編輯部的信⁶¹⁷

愛德華·梅因先生在“自由射手”第 17—21 号上大放厥詞，对此我只談下面一点：

我正在进行的控告柏林“国民报”誹謗的訴訟，就足够从法律上說明福格特的小册子了。他的同謀者愛德華·梅因不能企求同样的荣誉。我能够为愛德華·梅因做的是：在那本将在訴訟结束后出版的小册子中，分配給愛德華·梅因先生一个合乎他身分的席位。

卡尔·馬克思

1860 年 2 月 28 日于曼彻斯特

載于 1860 年 3 月 7 日“改革報”
第 29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改革報”

卡·馬克思
致“总汇报”和其他德国
报纸編輯部的声明⁶¹⁸

1860年2月初，承蒙“总汇报”編輯部发表了我的声明。这个声明开头几句话如下：

“茲声明：我已采取步骤，准备对柏林‘国民报’起訴，因該报第37号和第41号社論就福格特的小册子‘我对“总汇报”的訴訟’对我进行誹謗。对于福格特，我准备以后用文字予以回答。”^①

1860年2月，我在柏林对“国民报”的主編弗·察貝尔的誹謗行为起訴。我的律师、法律顧問維貝尔先生，最初选择了**刑事追究**的途徑。檢察官在1860年4月18日作出决定拒絕“干預”弗·察貝尔，因为据说**缺乏公众利益**，所以沒有理由这样做。1860年4月26日，他的拒絕为檢察长所批准。

于是我的律师提出**民事訴訟**。王国市法院在1860年6月8日决定**不受理**我的起訴，因为弗·察貝尔的确实有侮辱名誉的“言論和論断”，似乎是由简单地引证別人的詞句构成的；并且其中并没有“侮辱的意图”。王国**上訴法院**1860年7月11日的决定又宣布：**引证**的形式絲毫不能改变文章的应受懲罰与否的問題，但是文

① 見本卷第765頁。——編者注

章中有侮辱名誉的地方同我“个人”没有关系。此外，“本案中”“不能认为”有侮辱的意图。王国上诉法院这样就承认了市法院不承认我有起诉权的决定。今年10月23日我收到王国最高法院1860年10月5日的决定。最高法院认为，“本案中”没有“发现”王国上诉法院有任何“法律的错误”。因此，不受理对弗·察贝尔起诉的决定仍然有效，案情也就没有得到公开审理。

我对福格特的答复将在近日问世。

卡尔·马克思

1860年11月24日于伦敦

载于1860年12月1日“总汇报”
第336号附刊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总汇报”

注 釋
索 引

注 釋

- 1 弗·恩格斯写的“军队”这一条目是他为“美国新百科全书”写的首批条目之一。出版百科全书的发起人之一查理·德纳于1857年4月邀请马克思参加百科全书的编写工作，马克思接受恩格斯的意见，同意为百科全书撰写若干条目。同时恩格斯也答应帮助马克思写一些军事和军事史的专题条目。以后恩格斯为了给马克思创造条件去完成经济研究工作，而把大部分条目的编写工作承担了起来。马克思主要负责编写许多军事活动家和政治活动家的传略，恩格斯在这方面也帮助马克思阐明军事方面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为百科全书撰写条目的工作中的合作，正如他们长期共同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稿一样，是两位科学共产主义奠基人之间的友谊的光辉范例之一。

在德纳和马克思预约的、由恩格斯承担写的首批条目中间就有“军队”这一条。这个条目要概括叙述武装力量、军事学术、战略和战术的发展的历史，同时还要评述与恩格斯同时代的军队的状况和组织。恩格斯在写这个综合性条目的同时，还必须写预约的首批条目中的其他许多条目，所以这个任务就更加复杂了。尽管如此，恩格斯和马克思一起于1857年7月着手收集资料，8月动手写，不超过9月24日就完成了这个条目。在“军队”这一条中，恩格斯在一定程度上总结了他多年来对军事、军事史以及他那个时代的各次战争的經驗所进行的深刻的研究。为了写这个条目，恩格斯利用了許多专门的资料，从古代历史家和军事著作家（希罗多德、色诺芬、萨吕斯提乌斯、波利比乌斯、维格齐等）的著作到十九世纪的著作家威金逊、克劳塞维茨、若米尼和吕斯托夫等人的作品，同时还利用了各种参考书刊。恩格斯在他写的条目中提到了其中一些资料。在恩格斯的准备材料中保存下来的，有他从1855年在哥达出版的吕斯托夫的“尤利乌斯·凯撒时代的军事和他的

統帥藝術”(《Heerwesen und Kriegführung G. Julius Cäsars》, Gotha, 1855) 一書, 以及“不列顛百科全書”(《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第7版(1842年版第3卷)的“軍隊”這一條中所作的摘錄。馬克思為了這個條目也從有關戰爭史的各個問題的科學著作和參考書刊中作了摘錄。他從1837年在倫敦出版的威金遜的三卷集著作“古代埃及人的風俗和習慣”(《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Ancient Egyptians》, London, 1837) 以及從希羅多德、修昔的底斯、波利比烏斯、約瑟夫·弗拉維和其他古代歷史學家的著作中所作的摘錄也保存下來了。馬克思收到已寫好的這一條目之後, 在1857年9月25日給恩格斯的信中給以極高的評價。他着重指出, 恩格斯在這一條目中以軍隊史為例成功地說明了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關係的發展之間的聯繫。同時, 馬克思也對古代僱傭軍隊(迦太基人的僱傭軍隊)的產生以及十五至十六世紀意大利人和東方各民族軍事的发展問題提出了一系列批評意見。馬克思認為這些問題在條目中沒有得到充分的闡述。後來, 恩格斯在給“美國新百科全書”寫“軍隊”的補充條目“炮兵”、“騎兵”、“築城”和“步兵”時, 都很認真地考慮到了這些意見。

“美國新百科全書”(《New American Cyclopaedia》) 是一部科學參考書, 它是由“紐約每日論壇報”編輯部的一些美國資產階級進步的新聞工作者和出版者出版的。百科全書的編輯是查·德納、里普利少校和其他一些人。百科全書由紐約的出版公司“丹·阿普耳頓公司”於1858—1863年出版, 共16卷, 1868—1869年按原版重印。美國和歐洲的許多知名學者都參加了百科全書的編寫工作。就它包羅的各門知識的廣博和參考資料的豐富來說, 這是當時最好的書籍之一。雖然百科全書的編輯們帶有資產階級的局限性, 這部書也和其他資產階級的百科全書一樣具有折衷主義色彩, 但是“美國新百科全書”仍然收進了許多反映進步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人士的观点的條目。在百科全書中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占有特殊的地位; 他們不顧編輯部向作者提出的不得闡明黨派观点的条件, 而採取了革命無產階級的、唯物主義的立場來寫這些文章。

“美國新百科全書”的條目是不署名的。只是在第二、五和十六卷上附有篇幅最大的條目的作者名單。名單上提到馬克思是“軍隊”、“炮

兵”、“貝尔納多特”、“玻利瓦尔”、“騎兵”、“筑城”、“步兵”和“海軍”等条目的作者(实际上,这些条目除了“貝尔納多特”和“玻利瓦尔”之外都是恩格斯写的)。至于其余的条目,則根据他們之間的书信、查·德納給馬克思的信件、馬克思登录寄往紐約的条目的筆記本和其他档案材料(为写这些条目所作的提要 and 摘录等)来确定出自馬克思或者恩格斯的手笔。共发现有 67 个条目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另外还有两个短条目——“阿本斯堡”和《Cartouch》——很可能被百科全书的編輯部大大删节过了。編輯部在条目发表时常常改动原稿。这两个短条目本卷没有收入正文,而收入相应的注釋中(見注 53 和 252)。

“毕洛夫”这个条目没有收入本版,因为我們没有找到的这一条目的原稿,根据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以及保存下来的有关这一条目的准备材料来判断,已被百科全书的編輯部删改得面目全非了。

在本卷准备过程中,查明了一系列至今仍被某些西歐书志学家毫无根据地硬說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条目的真正作者。例如,被人們硬說是馬克思写的“阿布德-艾尔-喀德”和“宪章主义”这两个条目的作者是某个威廉·汉弗莱,“伊壁鳩魯”这一条的作者是德国自由派記者海爾曼·腊斯特,“社会主义”这一条的作者是 P. 葛德文,“黑格尔”这一条的作者是亨利·斯密斯。

馬克思和恩格斯給“美国新百科全书”撰写条目从 1857 年 7 月繼續到 1860 年 10 月,就我們所知道由他們撰写的条目刊载于百科全书第一至五卷、第七卷、第九卷和第十二卷。1868—1869 年百科全书重印时,这些条目没有改动,以后在作者在世时就没有再印过。苏联在 1933 年才第一次把“美国新百科全书”中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条目收集在一起編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十一卷第二部。本版刊印的这些条目是最完全的。——第 5 頁。

2 恩格斯在这里把古埃及步兵的战术单位假定为“营”。——第 5 頁。

3 *Testudo* (直譯是:“龟甲”)——在用攻城槌破坏敌人要塞的圍牆时以及在其他的圍攻作业中,为了保护圍攻者而采用的一种遮棚。

接近車 (*vinea*——直譯是:“葡萄园”)——在古代圍攻要塞时用树条編成并复以湿皮革和草皮的一种护棚。——第 6 頁。

- 4 指約·加·威金遜“古代埃及人的風俗和習慣”1837年倫敦版第1卷第67—68頁(J. G. Wilkinson.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Ancient Egyptians». Vol. 1, London, 1837, p. 67—68)。——第6頁。
- 5 “聖經”，“以西結書”第21章第22節和第26章第8節。——第7頁。
- 6 希羅多德“九卷史”第7卷。——第8頁。

7 指希臘波斯戰爭(公元前500—449年)時期規模最大的幾次會戰。在希波戰爭中，希臘城邦保衛了自己的獨立，回擊了征服小亞細亞各希臘城市並多次征討巴爾干半島(其中主要的幾次發生在公元前492、490、480和479年)的波斯強國。從公元前479年起，希臘人取得了戰爭的主動權，並於公元前449年與波斯王締結和約，迫使他放棄侵略愛琴海區域的野心並承認小亞細亞希臘人的獨立。在戰爭過程中，古希臘的主要奴隸制國家——斯巴達和雅典的軍事力量大大加強了。

公元前490年9月，米太雅第統率的雅典人和普拉迪人的軍隊在馬拉松盆地(阿提卡)擊潰了數量上占絕對優勢的波斯軍隊。這次會戰決定了波斯人第一次入侵阿提卡的失敗結局。

公元前480年7月在溫泉關會戰中，希臘一支人數不多的同盟軍在斯巴達王勒奧尼達斯的指揮下兩天內英勇地擊退了薛西斯的龐大的波斯軍隊的進攻，阻擋了他們通過溫泉關峽谷進入希臘中部的道路。第三天，波斯人繞過了希臘人。勒奧尼達斯將主力撤出戰鬥，而率領300名斯巴達人繼續防守山道，在眾寡不敵的戰鬥中英勇陣亡了。

公元前479年秋季在普拉迪(希臘中部)會戰中，斯巴達人包散尼和雅典人亞立司泰提統率的希臘聯合部隊大敗波斯軍隊。同年，希臘登陸隊在米卡列角(小亞細亞沿岸)擊潰了波斯軍隊，並且毀壞了被拖到岸上用以構成營壘的波斯船隻。這些勝利徹底消除了波斯侵犯巴爾干的威脅。——第8頁。

- 8 公元前334年5月，馬其頓王亞歷山大東征時期，在小亞細亞西北部的格拉奈卡斯河地區，馬其頓軍隊和波斯軍隊進行了第一次大規模會

战, 結果馬其頓軍隊击潰了波斯軍隊。——第 8 頁。

- 9 从梭倫改革时期(公元前 594 年)起, 雅典奴隶制共和国的自由民, 根据每年农田收入的多寡划分为四个财产等級。这种等級划分也是雅典軍事組織的基础。头两級的人享有很大的政治特权, 但必須服兵役, 并且开支很大(第一等級的人要建造战船, 第二等級的人要当騎兵)。第三等級的公民在政治权利方面受到限制, 但他們組成軍隊中的骨干——重装步兵。第四等級(貧民)是只有少量财产的公民, 长期被剝夺担任任何职务的权利, 最初不服兵役; 但是后来由他們組成輕步兵。——第 9 頁。
- 10 恩格斯所說的“雅典同盟者”是指加入雅典海上同盟(最初叫做提洛同盟)的希腊各城邦(主要位于爱琴海諸島和小亚細亚沿海地区)。雅典海上同盟是希腊波斯战争时期在公元前 478 年建立的。这个同盟起初具有平等国家联合的性质, 但是随着雅典力量的增长, 雅典使同盟者屈服于它的权势下, 并把它們变成納貢者。雅典海上同盟于公元前五世紀末瓦解。公元前 378 年, 雅典人又局部地恢复了同盟, 但新的同盟仅存在到公元前 355 年。——第 10 頁。
- 11 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 431—404 年)是希腊城邦的两个集团——雅典海上同盟和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之間的战争。这次战争是由雅典和斯巴达爭夺希腊霸权的斗争、希腊城邦的貿易竞争以及雅典奴隶主民主制和斯巴达奴隶主貴族寡头制之間的政治矛盾所引起的。雅典奴隶制国家的內部危机和雅典同盟者对雅典独裁統治的不滿的增长, 終于促成了斯巴达的胜利。根据公元前 404 年的和約規定, 雅典应交出几乎整个舰队并承认斯巴达的領導地位。——第 10 頁。
- 12 西西里远征 是雅典人于公元前 415 年为了征服西西里的希腊各城邦, 首先是叙拉古而举行的。雅典指望通过这次远征在地中海西部建立統治权, 扩充資源以打击其主要竞争者——斯巴达。西西里战争持續到公元前 413 年, 以雅典海軍和陆軍圍攻叙拉古遭到惨敗而告終。这次惨敗改变了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力量对比, 使希腊城邦的斯巴达集团

- 处于有利地位。——第 11 頁。
- 13 珀里俄科 是古代斯巴达的无全权的特殊等級。珀里俄科占有土地和財產，而他們当中最富裕的还占有奴隶。他們享有人身自由，甚至享有某些自治权，但是被剝夺了其余的一切政治权利。——第 13 頁。
- 14 赫罗泰 是被斯巴达征服的南伯罗奔尼撒的农民。赫罗泰是斯巴达国家的財產，他們耕种归斯巴达人个人使用的土地，向斯巴达人交納国家規定的地租（約占收成的一半）。赫罗泰不断举行起义，但都被奴隶主殘酷地鎮压下去了。——第 13 頁。
- 15 列夫克特累（貝奧提亚）会战是貝奧提亚战争（公元前 378—362 年）期間忒拜军队和斯巴达军队之間于公元前 371 年进行的一次会战。在这次战争中，民主派执政的忒拜对寡头政体的斯巴达于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后在希腊建立的霸权进行了斗争。在列夫克特累会战中，忒拜統帅埃帕米农达斯在战争史上第一个采用“斜形战斗队形”，不沿正面平均分配兵力，而把强大的突击力量集中在左翼，即主要突击方向上。埃帕米农达斯的战术規定防御战和进攻战相結合，騎兵和步兵协同动作。列夫克特累会战的敗北摧毁了斯巴达的威力并引起了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的瓦解。忒拜在希腊暂时取得了优势。——第 13 頁。
- 16 忒拜及其同盟者的军队在埃帕米农达斯的統率下远征伯罗奔尼撒半島时，于公元前 362 年在曼提涅亚（伯罗奔尼撒）采用列夫克特累会战所采用的战术，击败了斯巴达军队。但是，忒拜人遭到的惨重損失及其統帅的陣亡，使得他們不能巩固胜利。忒拜未能保持住在希腊的霸权。——第 13 頁。
- 17 指公元前 440 年雅典军队对塞莫斯城（在爱琴海东南部的塞莫斯島上）的圍攻。加入雅典海上同盟的塞莫斯島的居民对雅典的专橫統治不滿，并为了脫离同盟而举行起义。为了鎮压起义者，雅典派出了以伯利克里为首的强大的海軍远征队。經過数月圍攻，塞莫斯城被迫投降，塞莫斯島上重新建立了雅典的更为专橫的統治。——第 14 頁。

- 18 恩格斯所說的希臘的被征服在这里是指希臘各城邦屈从于馬其頓王的統治。菲力浦二世在位時，馬其頓強國大大地擴大了自己的勢力，力圖征服整個巴爾干半島。菲力浦依靠希臘各城邦的政治寡頭，利用他們之間的競爭并干涉他們的沖突，從公元前 357 年起逐漸地鞏固了自己在希臘的地位。公元前 339 年，形成了以雅典為首的希臘城邦的同盟，以對抗馬其頓。同盟的軍隊于公元前 338 年被菲力浦的軍隊擊潰。結果，希臘反馬其頓的民主運動被鎮壓下去，希臘各城邦的政權落入了菲力浦的傀儡們手中。公元前 337 年，在科林斯召開的全希臘會議通過決議宣布馬其頓王為全希臘軍隊的統帥，從而鞏固了馬其頓對形式上仍然被認為是“獨立的”希臘城邦的統治。——第 16 頁。
- 19 公元前 331 年在阿爾貝雷（說得確切些，是在亞述城市阿爾貝雷西北的高加米拉村）進行過一次古代規模極大的會戰。在這次會戰中，馬其頓王亞歷山大的軍隊擊潰了波斯王大流士三世的軍隊。馬其頓軍隊在阿爾貝雷取得了勝利，并奪取了波斯兵營及其全部輜重和錢財，這對馬其頓王亞歷山大征服波斯帝國起了決定性的作用。——第 16 頁。
- 20 亞該亞同盟 是伯羅奔尼撒的一些奴隸制城邦為了對抗馬其頓以及鎮壓奴隸和城市貧民的運動而于公元前 280 年成立的同盟。該同盟擁有雄厚的兵力，并且擺脫了馬其頓君主國的控制。公元前 146 年該同盟的軍隊被羅馬人擊潰，它的領土并入馬其頓，后者从公元前 148 年起成為羅馬的一個行省。——第 18 頁。
- 21 特里布斯 是古羅馬的行政區單位。從塞爾維烏斯·土利烏斯王實施改革的時期（公元前六世紀）起，羅馬的城區劃分為 4 個特里布斯。同時，還有幾個郊區的特里布斯。每個特里布斯中凡占有土地的自由民都列入該特里布斯的戶籍簿。在按地區劃分特里布斯之前，更古老的方法是按部落和氏族劃分（“特里布斯”一詞的原意是“部落”）。這種方法是原始公社制度的殘余。——第 19 頁。
- 22 在古羅馬史的早期把構成居民中的特權集團并須在騎兵中服兵役的富裕公民叫做騎士。後來，屬於騎士階層的、羅馬奴隸主中的商業高利貸者，也叫做騎士。——第 19 頁。

- 23 古羅馬的第一次國內戰爭（公元前 88—82 年）是由兩個敵對的奴隸主集團的代表之間爭奪政權的鬥爭引起的。一個集團以奴隸主貴族的走卒魯齊烏斯·科爾奈利烏斯·蘇拉為首，另一個集團則以依靠商業高利貸階層並討好城鄉平民的凱尤斯·馬利烏斯為首。這次戰爭是在奴隸主和奴隸之間以及奴隸主貴族和自由民的民主階層之間尖銳的階級沖突的情況下進行的，戰爭以馬利烏斯派的失敗和蘇拉專政的建立而結束。這是消滅羅馬共和國和建立帝國的一個步驟。——第 20 頁。
- 24 指穆士拉河（北非）地區的會戰。在公元前 109 年的這次會戰中，由昆圖斯·采齊利烏斯·梅泰魯斯統率的羅馬軍隊擊敗了努米迪亞王尤古爾塔的軍隊。這是羅馬人在他們一開始失利的尤古爾塔戰爭（公元前 111—105 年）中所獲得的第一次勝利。後來，尤古爾塔在戰爭中被羅馬人打敗。
- 恩格斯在這裡引用了羅馬歷史學家薩呂斯提烏斯的著作“論尤古爾塔戰爭”第 48—53 章。——第 20 頁。
- 25 羅馬的每一級軍事單位都有特殊的軍徽。從凱尤斯·馬利烏斯時代起，軍團的軍徽是固定在矛杆上的銀鷹。——第 20 頁。
- 26 羅馬和伊皮羅斯（希臘西北部）王皮洛士之間的戰爭發生於公元前 280—275 年。爭奪的主要目標是意大利南部的希臘城市，不論羅馬或是打算在西方建立龐大帝國的伊皮羅斯王，都力圖征服這些城市。戰象的使用在皮洛士的戰術中起了巨大的作用。在戰爭初期羅馬遭到兩次慘敗，但後來在迦太基的援助下擊潰了皮洛士的僱傭軍隊、並把他逐出了亞平寧半島。對皮洛士的勝利加速了羅馬對意大利南部的征服。——第 21 頁。
- 27 指第二次馬其頓戰爭（公元前 200—197 年）時期公元前 197 年的基諾斯克法耳會戰。在這次會戰中，羅馬軍隊在梯特·昆克提烏斯·弗拉米尼努斯的指揮下擊潰了馬其頓王非力浦五世的軍隊。馬其頓在失敗後軍事力量被摧毀了，而羅馬在希臘的勢力則鞏固下來了，這就使羅馬後來在希臘建立了自己的統治。——第 22 頁。
- 28 同盟戰爭（公元前 90—88 年）是羅馬同反抗羅馬統治而舉行起義的意

大利各部落之間的战争；这些部落和羅馬共和国有着“同盟关系”（这是羅馬奴隶主統治他們所征服的部落和民族的一种形式）。脱离羅馬并結成联盟的古意大利人的运动被鎮压下去，但是在战争过程中，羅馬不得不滿足他們所提出的給予他們羅馬公民的权利这一主要要求（最初采用只向“忠实的同盟者”让步的办法以瓦解联盟）。起先加入羅馬国籍是有一定政治限制的，后来漸漸地所有自由的古意大利人都可以加入了。——第 22 頁。

29 羅馬高卢（相当于法国南部的旧行省——普罗凡斯）是高卢的一部分，早在公元前二世紀末被羅馬人占領。——第 22 頁。

30 指羅馬作家維格齐的著作“軍事簡述”（《Epitome rei militaris》）。——第 26 頁。

31 德意志皇帝对意大利的远征 是德意志封建主为掠夺意大利城市和霸占土地而举行的侵略性远征。首次举行远征的是 962 年在羅馬登上帝位（所謂神圣羅馬帝国的帝位）的皇帝奥托一世。这种远征在十至十三世紀最为頻繁，后来虽然德意志帝国已衰落，国内封建割据加剧，但是这种远征一直延續到十六世紀。

十字軍远征 是西欧的大封建主，騎士阶层和意大利商业城市在十一至十三世紀打着把耶路撒冷和其他“圣地”的基督教圣迹从穆斯林的統治下解放出来的宗教旗帜而向东方进行的軍事殖民运动。十字軍远征的倡导者和鼓舞者是天主教会和力图取得世界霸权的羅馬教廷，而主要軍事力量則是騎士阶层。想要借远征摆脱封建主压迫的农民也参加了远征。在历史上有名的八次十字軍远征是：1096—1099 年、1147—1149 年、1189—1192 年、1202—1204 年、1217—1221 年、1228—1229 年、1248—1254 年和 1270 年。在上述几次远征中，十字軍对它所到的国家的居民，不論是伊斯兰教居民或天主教居民，都进行了搶劫和蹂躪。十字軍的掠夺目标不仅仅是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和突尼斯的伊斯兰教国家，而且有基督教的拜占庭帝国。但是，十字軍在东地中海沿岸占領的地区并不巩固，不久就被穆斯林夺回去了。——第 26 頁。

32 指英法百年战争（1337—1453）中的几次大規模会战。战争的起因是两

国封建貴族的侵略野心，例如英法之間爭奪弗兰德地区的工商业城市（英国羊毛的主要买主）以及英国国王覬覦法国王位。在战争初期，英軍占領了法国西南部的大部分地区，但是在十四世紀六十至七十年代，被占領的領土几乎全部被收复了。英国封建主趁十四世紀末和十五世紀初法国封建主发生內訌的机会，于1415年恢复了軍事行动，并且很快就占領了包括巴黎在內的整个法国北部。但是，在法国展开的反对外国侵略者的人民战争，终于把侵略者逐出了法国領土。英軍手中只剩下一个加来港。

在文中所提到的几次会战(1346年8月26日的克雷西会战、1356年9月19日的普瓦提埃会战和1415年10月25日的阿津庫尔会战)中，以自由农民組成的步兵为基干的英国軍队，巧妙地利用英国大弓对法国弩的优势，并利用下馬的騎士同弓箭手之間的緊密的协同动作，击败了以紀律松弛的騎士队为主力的法国軍队。——第26頁。

- 33** 指蒙古征服者在进犯俄罗斯領土(1237—1240)后，于1241—1242年侵入中欧时期，欧洲各国反对蒙古征服者的战争。除了波兰的領土以外，莫拉維亞、匈牙利和达尔馬威亞也都成了这次战争的戰場。蒙古人在与欧洲騎士作战时获得了一連串的勝利，他們的先遣部队几乎到达了威尼斯。但是，由于在征服俄罗斯各公国时所遇到的抵抗削弱了他們的力量，同时由于受到了巨大的損失，他們不得不退回到他們在东欧和亚洲的領地。——第28頁。
- 34** 指十四至十五世紀瑞士各州反对外国侵略者——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战争，以及1474—1477年瑞士人同企图并吞瑞士联邦的勃艮第公爵大胆查理之間的战争。在这两次战争中，瑞士人捍卫了自己的独立，并表明由自由农民和市民組成的、組織严密和團結一致的步兵比騎士队优越。——第28頁。
- 35** 指馬基雅弗利于1519—1520年写的“兵法七卷”(«I sette libri dell'arte della guerra»)一书。——第30頁。
- 36** 法国国王弗朗斯瓦一世的軍队在他的威尼斯同盟者的支援下，于1515年9月13—14日在馬利尼亞諾(意大利北部)击败了米兰公爵的瑞士

- 雇佣军队。这是 1494—1559 年意大利战争中的一次大规模会战。在这个战争的过程中，意大利不止一次地遭到法国、西班牙和德国侵略者的侵犯，成了法国、西班牙和德意志帝国争夺亚平宁半岛统治权的长期斗争的场所。除意大利各公国君主外，英国、瑞士和其他国家都在不同时期参加过这一斗争。这一斗争的最后结局是法国人被逐出意大利，而意大利陷入西班牙的统治。——第 30 页。
- 37** 法国国王弗朗斯瓦一世的军队和查理五世（德意志皇帝和西班牙国王）的军队于 1525 年 2 月 24 日在帕维亚会战。法军惨败，法王弗朗斯瓦本人被俘。这次会战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西班牙在意大利战争中的最后胜利（1559 年法国才最后放弃了统治意大利的野心，意大利的大部分领土落入了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手中）。在帕维亚会战中，在查理五世的军队中服务的德国雇佣兵和有效地使用火器抵抗法国骑士队的西班牙步兵起了巨大的作用。——第 31 页。
- 38** 指 1566—1609 年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在这次革命中，资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同反对在十六世纪统治尼德兰（现在的比利时和荷兰）的专制的西班牙的民族解放战争是结合在一起的。尼德兰的北方行省荷兰和西兰是革命的堡垒，后来成为在斗争中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荷兰共和国（联合省共和国）的核心。荷兰在对西班牙战争中取得了胜利，并于 1609 年获得了独立（尼德兰南部仍处于西班牙人的统治之下）。1621 年，荷兰和西班牙之间又发生战争，这一战争与欧洲的三十年战争交织在一起。在三十年战争之后，荷兰的独立于 1648 年最后巩固下来。——第 31 页。
- 39** 1618—1648 年的三十年战争是整个欧洲战争，它是由新教徒和天主教徒间的斗争而引起的。在捷克发生的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压迫和天主教反动势力的进攻的起义是这场战争的开端。后来参加战争的欧洲国家组成两个阵营。西班牙和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同德意志天主教诸侯打着天主教的旗帜并在罗马教皇的支持下进攻新教国家——捷克、丹麦、瑞典、荷兰共和国和经过宗教改革的德意志各邦。新教国家曾得到法王——哈布斯堡王朝的对手——的支持。德国是这次斗争的

主要場所，是戰爭參加者的軍事掠奪和侵略的對象。

三十年戰爭分為四個時期：捷克時期(1618—1624)，主要的鬥爭是在捷克新教徒和皇帝天主教陣營之間進行的，結果捷克戰敗。1625年，英國、荷蘭和丹麥在法國的協助下結盟，共同反對西班牙和奧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丹麥時期(1625—1629)，這個時期一開始，戰爭就具有全歐洲的性質。但是，丹麥軍隊被皇帝天主教的軍隊擊潰。1630年，瑞典參戰，它在保護新教諸侯的旗幟下，力圖在波羅的海南岸站住腳。瑞典時期(1630—1635)以瑞典軍隊的一連串勝利開始，但在1634年瑞典軍隊被皇帝和西班牙的聯合部隊擊潰。1635年法國公開站到瑞典和新教諸侯方面。法國瑞典時期(1635—1648)，戰爭在第一階段具有反抗封建專制歐洲的反動勢力的性質，最後變成了互相競爭的外國侵略者對德國的一系列的入侵。這次戰爭於1648年以締結威斯特伐里亞和約而結束。這一和約加深了德國的政治分裂。——第33頁。

40 上面提到的是三十年戰爭瑞典時期中的三次會戰。

古斯達夫-阿道夫的軍隊於1631年9月17日在萊比錫（即在布雷滕費耳德）和1632年4月15日在巴伐利亞的雷赫河地區擊潰了由梯利統率的皇帝天主教軍隊。1632年11月16日，古斯達夫-阿道夫在呂特岑（薩克森）擊敗了由華倫斯坦統率的皇帝軍隊。——第34頁。

41 邊屯區——十六至十九世紀奧地利帝國南部地區（斯洛文尼亞、克羅地亞、斯拉窩尼亞和巴納特）被稱為邊屯區，那里的居民（邊屯區居民）必須服邊防兵役才能使用土地。——第35頁。

42 奧地利王位繼承戰爭（1740—1748）時期，弗里德里希二世的軍隊於1741年4月10日在莫耳維茨（西里西亞）擊敗了奧地利軍隊。

1740—1748年的戰爭是由於歐洲許多封建國家，首先是普魯士，對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領土野心引起的。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帝查理六世逝世後因沒有男嗣而由其女兒瑪麗-泰莉莎繼承王位。奧地利王位繼承權的追求者拒不承認瑪麗-泰莉莎的繼承權。在這次戰爭中普魯士的主要同盟者是法國和巴伐利亞，薩克森在1742年以前也

是普魯士的同盟者，但后来参加了奥地利陣营。英国因力图削弱其貿易和殖民的競争者——法国的势力而站在奥地利一边，撒丁、荷兰和俄国也給予奥地利軍事上和外交上的援助。普魯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在这次战争中曾两次背叛自己的同盟者，单独与奥地利媾和（在1742年和1745年）。战争結果，普魯士获得了它所佔領的西里西亚，但是，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其他領地仍屬於瑪麗-泰莉莎。——第36頁。

- 43 指欧洲的封建专制国家的同盟反对革命的法国的战争。資產階級貴族的英国也积极参加組織反革命的同盟。1792年2月，开始对法国进行武装干涉的普魯士和奥地利在英国和沙皇俄国的支持下締結了軍事同盟。在1792年8月10日法国宣布成立共和国和1793年1月法王路易十六被处决之后，英国、荷兰、西班牙、那不勒斯、撒丁以及德意志和意大利的許多小邦于1793年都公开参加了反法同盟。法国对这一同盟（即第一次反法同盟）参加国的战争延續到1797年。

法国在資產階級革命时期进行的解放的正义的战争，自反革命的大資產階級于1794年夏天掌握政权后就开始具有征服其他民族的侵略战争的性质。——第38頁。

- 44 指英国的13个北美殖民地爭取独立的革命解放战争（1775—1783）。北美殖民地反对英国統治的起义的原因是：已形成的美国資產階級民族渴望独立和力图扫清英国殖民統治給資本主义发展造成的障碍。因此，这次起义具有資產階級革命的性质。由于北美人取得了胜利，就建立了独立的資產階級国家——美利坚合众国。——第38頁。

- 45 七年战争（1756—1763）是由欧洲封建专制国家的侵略野心和法英两国的殖民競争引起的。英国联合普魯士共同反对奥地利、法国、俄国、薩克森和瑞典的同盟。1756—1757年普魯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的軍隊曾多次战胜奧軍和法軍，但是，俄国軍隊于1757—1760年在普魯士取得的胜利，使普魯士的胜利果实化为烏有。这次战争以締結巴黎和約和胡貝尔茨堡和約而告終。根据巴黎和約，法国必須把它最大的殖民地（加拿大、东印度的几乎全部法国領地等）让給英国，这就巩固了英

国的殖民势力和海上势力。胡貝尔茨堡和約恢复了普魯士、奥地利和薩克森等国战前的疆界。——第 41 頁。

- 46 因克尔芒 会战是克里木战争（1853—1856）时期俄国军队和英法军队于 1854 年 11 月 5 日（10 月 24 日）进行的会战。会战以俄国军队的失败而告终，但俄军的积极行动和联军特别是英军遭到的惨重损失，迫使联军放棄立即向塞瓦斯托波尔强攻而轉入对这个要塞的长期圍攻。在恩格斯的“因克尔芒会战”一文中对这次会战作了詳細的叙述（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0 卷第 594—599 頁）。——第 42 頁。
- 47 在比利牛斯半島战争（1808—1814）时期，巴达霍斯 要塞（西班牙西南部）两次遭到由威灵頓統率的同盟国英国、西班牙和葡萄牙军队的圍攻。在这次战争中，在英国与拿破侖法国作战的同时，西班牙和葡萄牙人民反对法国占領者的民族解放斗争在半島的全部土地上展开了（在許多地方采取游击战的形式）。1811 年 3 月被法军占領的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巴达霍斯要塞在同年 5 月遭到同盟国军的圍攻。圍攻持續到 1811 年 6 月初，由于圍攻部队伤亡重大和法国預备队开到而撤除（在恩格斯的这一条目的末尾不确切地指出，圍攻是在 1811 年 5 月 16 日阿耳布埃拉会战后过了几天撤除的——这一不确切的地方在該条目刊出后被發現，从 1858 年 2 月 18 日恩格斯給馬克思的信中可以看出，这是因为恩格斯使用的一个資料有錯誤）。1812 年 2 月巴达霍斯要塞再次遭到同盟国军的圍攻，在同年 4 月 6 日的强攻胜利以后，就轉到同盟国军的手里。——第 53 頁。
- 48 郎卡斯特王室的远亲亨利·都鐸的部队与約克王朝的英王理查三世的军队于 1485 年 8 月 22 日在 博斯威尔特（英国萊斯特郡）进行会战，会战以理查的失败和陣亡而告终。胜利者被宣布为国王亨利七世。薔薇战争（1455—1485）——两个爭夺王位的英国封建世系的代表之間，即約克派（他們的徽章上飾有白薔薇）和郎卡斯特派（他們的徽章上飾有紅薔薇）之間的战争——以这次会战而結束。这次战争使古老的封建世系几乎完全灭絕，結果新的都鐸王朝获得政权，在英国建立了专制政体。——第 60 頁。

- 49 指爱·霍尔的編年史：“高貴而光榮的郎卡斯特王室和約克王室的联合”（《The Union of the Noble and Illustre Famelies Lancastre and York》），1542年在倫敦出版。——第60頁。
- 50 英国内战 是力图恢复斯图亚特王朝查理一世的专制統治的貴族保皇派与議會拥护者之間在十七世紀中叶資產階級革命时期进行的。在第一次內战（1642—1646）初期，主張与国王妥协的分子領導下的議會軍遭到失敗。但是在战争的进程中，克倫威尔領導的較为坚决的資產階級化的貴族和資產階級的代表在軍隊中的地位得到加强。克倫威尔成功地改組了議会的武装力量。在“新模范”軍里，代表农民和手工业者广大阶层的、要求采取有力的革命措施的民主主义分子有很大的影响。由于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內战有了轉机，国王被战敗。但是由于保皇派叛乱和苏格兰封建貴族支持查理一世，1648年春天爆发了第二次內战，这次內战于1648年8月以革命軍隊的新的胜利而告終。1649年查理一世被处死，在英国建立了資產階級共和国。——第61頁。
- 51 从保存下来的、馬克思根据許多英文資料作出的摘录中可以看出，恩格斯在写“艾雷”这一条目时，在选择需用材料方面，馬克思給他很大的帮助。在这些摘录中有下面这本小册子的摘录：理·艾雷“向切尔西軍事委员会的申述”1856年倫敦版（R. Airey. «Adresses before Military Board at Chelsea». London, 1856）。条目后面部分的引文即摘自这本小册子。——第63頁。
- 52 大軍（Grande armée）是指从1805年起在拿破侖战争的主要战区內作战的法兰西帝国武装力量的主要集团。在大軍的編成里，除法軍之外，还有被拿破侖征服的国家（意大利、荷兰、德国、波兰和其他一些国家）的軍隊。——第64頁。
- 53 指1809年奥法战争时期在阿本斯堡、兰德斯胡特、埃克繆尔和累根斯堡（巴伐利亚）地区进行的历时五天的会战（1809年4月19—23日）。在战争过程中，拿破侖法国遭到奥地利軍隊的頑强抵抗，在尽了最大的努力和付出了重大的代价之后取得了胜利。奥軍的頑强抵抗說明了欧洲各国人民反对拿破侖压迫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累根斯堡会战虽

以奧軍的敗退而結束，但奧軍的战斗力却保存下来了。

恩格斯大約在写“阿斯佩恩”这个条目的同时，还写了一条題为“阿本斯堡”的短条目，叙述累根斯堡会战的一个阶段，即阿本斯堡会战。該条目 1858 年刊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第 1 卷，它很短，估計原稿可能被百科全书編輯部删节了許多。“美国新百科全书”刊载的全文如下：“阿本斯堡——巴伐利亚王国雷根州的一个小城，居民 1200 人。有人以为此地就是羅馬阿巴西努姆城的旧址。城郊有温泉和华丽的古城堡廢墟。1809 年 4 月 20 日，波拿巴曾在阿本斯堡城下与奧軍会战，并将奧軍击潰；奧軍在这次会战中損失火炮 12 門，兵士 13 000 人。这次胜利是兰德斯胡特和埃克繆尔会战胜利的前奏，并打开了通往維也納的道路。”——第 64 頁。

- 54** 1815 年 6 月 18 日，拿破侖的軍队在滑铁卢(比利时)被威灵頓指揮的英国和荷兰軍队以及布呂歇爾指揮的普魯士軍队击潰。这次会战在 1815 年的战局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它預定了第七次反拿破侖同盟(英国、俄国、奥地利、普魯士、瑞典、西班牙和其他国家)的最后胜利和拿破侖帝国的崩潰。同盟国軍在滑铁卢会战中取得胜利，是因为英国步兵頑强作战，經受住了拿破侖軍队多次的攻击，同时还因为布呂歇爾軍队及时赶到，援救了英国和荷兰軍队。——第 66 頁。
- 55** 指 1813 年 10 月 16—19 日(4—7 日)的萊比錫会战，这是第六次欧洲国家(俄国、奥地利、普魯士、英国、瑞典、西班牙等国)同盟的軍队与拿破侖法国的軍队在 1813 年战局中的一次决战。在这次历史上称为“民族之战”的会战中，双方参战人数达 50 万人。同盟国軍队的胜利决定了同盟国在整个战局中的最后胜利，并使德国从拿破侖的統治下解放出来。——第 70 頁。
- 56** 1812 年开始的英美战争是由于英国統治階級力图恢复它在十八世紀美国資產階級革命后丧失的在北美的統治地位而引起的。美国武装力量在对英国的斗争中，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支持。人民群众认为英国人的行动有使殖民制度复辟的危險，并把这次斗争看做是第二次独立战争。可是，美国資產階級的某些集团却把向邻国擴張領土的計劃同这

个战争联系起来。1812年，战争的形势有利于英军，但是，1813年美军终于肃清了同加拿大接壤的密歇根州的英军。1814年，英国虽然暂时还占领着华盛顿，但是由于在对拿破仑的战争中力量消耗殆尽，并由于美国海军的顺利行动而遭到重大损失，被迫于1814年12月在承认战前地位的基础上在根特缔结和约。军事行动在1815年1月停止。——第73页。

- 57 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见注42)时期，法国军队在萨克森的摩里茨的指挥下，于1745年5月11日在丰特努瓦(比利时)会战中击溃了英国—汉诺威、荷兰和奥地利联军。

在英美战争期间，英美军队于1814年7月5日在契珀瓦(在加拿大与美国的边境)进行会战，结果美军获胜。——第74页。

- 58 恩格斯用流行于西欧的“克兰”这个术语表示组成阿富汗各部落的大的氏族联合组织(贺利)。——第78页。

- 59 逊尼派和什叶派是伊斯兰教中的两个主要派别。这两个派别是在被认为是伊斯兰教奠基人的穆罕默德的继承人之间发生内讧后于七世纪形成的。——第78页。

- 60 莫卧儿是十六世纪初从中亚细亚东部侵入印度的突厥侵略者，1526年他们在印度北部建立大莫卧儿帝国(欧洲人称这个帝国的统治者为大莫卧儿，而他们自称为鉢諦沙赫)。在当时人的心目中，莫卧儿帝国的创始人是成吉思汗时代蒙古侵略者的直系后裔，这就是“莫卧儿”一词的由来。莫卧儿帝国的势力扩张得很大，在十七世纪中叶征服了印度的大部分和阿富汗的一部分地方。但是，由于农民起义和印度各民族对伊斯兰教侵略者的反抗加强，以及他们经常的内讧和封建割据趋势的日益加强，大莫卧儿帝国便衰落下去，到十八世纪上半叶实际上已完全瓦解。——第78页。

- 61 马拉提人是印度境内居住在德干西北部地区的一个部族。从十七世纪中叶起，这个部族开始了武装斗争，反对莫卧儿封建主的异族统治，他们沉重地打击了大莫卧儿帝国并加速了它的崩溃。在这一斗争进程中建立了一个马拉提人的独立邦。这个邦的封建上层人物不久就走上了

侵略戰爭的道路。十七世紀末，馬拉提邦被封建內訌所削弱，但是在十八世紀初，又形成了一個以最高統治者——派施華為首的諸馬拉提王國的强大聯盟。馬拉提封建主為了稱霸印度而與阿富汗人進行鬥爭，1761年遭到慘重的失敗。由於參加稱霸印度的鬥爭和馬拉提封建主的內部糾紛而弄得筋疲力盡的諸馬拉提王國，在1803—1805年英國馬拉提戰爭中被東印度公司征服。——第79頁。

62 錫克教徒是十六世紀旁遮普的一個教派。它們旨在使印度教和伊斯蘭教和解的平等教義成了從十七世紀末起來反對印度封建主和阿富汗侵略者的農民的指導思想。以後錫克教徒本身分化出封建上層分子，其代表人物（謝爾達爾）領導了錫克教徒各公國。十九世紀初這些公國在一個謝爾達爾朗吉特·辛格的統治下聯合了起來，由他治理的錫克教徒國家包括整個旁遮普和鄰近一些地區。1845年英國殖民者利用錫克教顯貴中的叛變分子，挑起了和錫克教徒的衝突，於1846年使錫克教徒國家變成了一個藩屬。1848年錫克教徒舉行起義，可是於1849年被完全征服。——第80頁。

63 還在1837年11月就開始的伊朗軍隊對赫拉特的圍攻一直持續到1838年8月。伊朗的沙赫穆罕默德向赫拉特的進軍不僅是伊朗和阿富汗，而且是英國和俄國在這一地區的矛盾尖銳化的結果。英國政府力圖加強英國在阿富汗的勢力和削弱俄國當時在伊朗已經鞏固的勢力，並且力圖把不利於伊朗的貿易條約強加於伊朗，因此它聲稱，沙赫的行動是敵視英國的行動，要求撤除對赫拉特的包圍。由於沙赫拒絕這個要求，英國政府就斷絕了同伊朗的外交關係，並於1838年派分艦隊開入波斯灣，以戰爭相威脅。伊朗的沙赫被迫撤除圍攻，後來又被迫同意與英國簽訂貿易條約。

馬克思寫的“對波斯的戰爭”一文（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127—132頁）敘述了對赫拉特的圍攻。從恩格斯的摘錄中可以看出，他闡明這次事件以及與此有關的1838—1842年英國和阿富汗戰爭的主要資料是下面這本書：約·威·凱“阿富汗戰爭史”1851年倫敦版第1—2卷（J. W. Kaye. «History of the War in Afghanistan». Vol. I—II, London, 1851）。——第81頁。

- 64 1838 年准备入侵阿富汗的英国军队经过与阿富汗接壤的信德地区(印度西北部),这给以后英国殖民者侵占该地区造成了方便。对阿富汗的战争开始时,东印度公司用威胁和强暴的手段迫使信德的封建统治者同意英军通过他们的辖区。1843 年英国人要求当地的封建主承认自己是东印度公司的藩属,并且在镇压了举行起义的俾路支各部落(信德的土著居民)后宣布该地区并入不列颠印度。——第 81 页。
- 65 西帕依 是英国殖民者在印度本地人中间招募的雇佣兵,他们受英国军官指挥。在英印军队中的西帕依部队被英国人用来征服印度和对印度邻近国家(阿富汗、缅甸等)进行侵略战争。然而成为英国统治的支柱的西帕依却受到印度人民群众对殖民制度共同的不满情绪的侵袭,这在 1857—1859 年印度规模极大的民族解放起义期间尤其明显。——第 83 页。
- 66 指科尔蒙太涅的著作“军事建筑学即筑城法”1741 年海牙版(«Architecture militaire, ou, l'art de fortifier». La Haye, 1741)。——第 89 页。
- 67 1703 年 11 月 15 日在斯拜尔巴赫河(德国西部)会战中,法军战胜了德意志帝国军队;法国步兵的刺刀冲杀决定了战斗的结局。

这次会战发生于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4)期间,而这次战争是由于西欧国家为瓜分已经衰落的封建西班牙在欧洲的领地和它的殖民地的斗争以及英、法在海上的竞争和对殖民地的竞争引起的。法王路易十四力图吞并西班牙君主国,而在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断绝了男嗣以后,达到了选自己的孙子菲力浦·波旁继承西班牙王位的目的。英国、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这个王朝的代表也是德意志皇帝)、荷兰、萨瓦公国、葡萄牙、普鲁士和德意志其他各邦就结成同盟反对法国和西班牙。战争是在四个地区即意大利、西班牙、德国西部和西南部以及尼德兰进行的。它的结果是西班牙帝国的部分领土被瓜分,法国弄得民穷财尽。根据乌得勒支和约(1713)和拉施塔特和约(1714),法国国王必须放弃法兰西君主国和西班牙君主国合并的计划,虽然西班牙王位已保留给菲力浦·波旁;在尼德兰和意大利的西班牙领地交

給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在戰爭中獲利最多的英國達到了削弱法國在海上和殖民地的勢力的目的，獲得了直布羅陀、梅諾爾卡島嶼以及在北美的一些法國殖民地，而且有把黑奴販運到西班牙殖民地的權利。——第 90 頁。

- 68 从 1857 年 9 月 10 日恩格斯給馬克思的信以及馬克思和恩格斯手写的准备材料中可以看出，“巴克萊-德-托利”这一条目是他們的共同著作，虽然最后文字上的修飾是由馬克思完成的。作者在編写該条目时所利用的資料，除了参考书刊以外，还有馬尔田斯条約和协定汇编、1827 年巴黎出版的若米尼的著作“拿破侖的政治和軍事生涯”第 4 卷（«Vie politique et militaire de Napoléon». Tome 4, Paris, 1827）、1856 年萊比錫出版的德国历史学家伯恩哈尔迪的著作“托尔伯爵生平事迹”（«Denkwürdigkeiten aus dem Leben des Grafen von Toll». Leipzig, 1856）。在这些书中，对 1812 年卫国战争历史的叙述是带有片面性的，有时还作了极大的歪曲，这不能不影响到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中对这段历史的某些方面所作的闡述，因为他們在当时缺乏比較客观的資料。这一条目也未能例外，其中不确切地說明了任命米·伊·庫图佐夫为俄軍总司令的原因、庫图佐夫放棄格查茨克附近（确切些說是察列沃-宰米舍附近）陣地的动机以及他在指揮俄軍后来的軍事行动中的作用。这里无根据地把巴克萊-德-托利与庫图佐夫相对立。巴克萊-德-托利虽然是俄国的杰出的軍事长官和爱国者，但是他在战略上的天才、对战争性质的理解、作战經驗以及在軍隊和人民中的威信方面都远远不如偉大的俄国統帅。正是因为这些情况，亚历山大一世皇帝在輿論的压力下不得不收斂起自己对統帅庫图佐夫的反感，同意任命他为总司令。——第 92 頁。

- 69 指 1807 年 2 月 7—8 日（1 月 26—27 日）法俄軍隊的普略西什-埃勞（东普魯士）会战——第四次反法同盟（英国、俄国、普魯士和瑞典）战争中最殘酷的会战之一。1806 年普軍被拿破侖軍隊击潰以后，东普魯士就成了这次战争的主要戰場，拿破侖的武装力量在那里遇到了同盟国俄普軍隊的頑强抵抗。拿破侖在普略西什-埃勞尽管伤亡巨大，但是未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結果，法軍暂时中止了行进，而且它截断俄軍和

俄国边境的联络的尝试也没有成功。——第 92 頁。

- 70 在俄国和瑞典战争(1808—1809)期间,俄军在巴克萊-德-托利的统率下于 1809 年 3 月从芬兰开入瑞典本国领土,这使瑞典贵族为贵族寡头政治的利益而限制王权的反国王古斯塔夫四世的密谋提前实现。古斯塔夫四世在 1809 年 3 月被推翻,不久他的叔父塞德曼兰公爵被宣布为国王查理十三。同年 9 月,瑞典被迫与沙皇俄国締結弗里德里希斯哈姆和約,把芬兰割让与俄国。

恩格斯把俄军横渡波的尼亚灣的进军比做过去瑞典人自己进行的一次规模較小的类似的军事行动,亦即 1657—1658 年丹麦和瑞典战争期间 1658 年 1 月底瑞典国王查理十世·古斯塔夫的军队横渡封冻的大、小貝尔特海峡向丹麦领土的进军。查理-古斯塔夫入侵丹麦迫使丹麦签订对瑞典有利的和約。——第 92 頁。

- 71 指“拿破侖执政时期法国历史回忆录,与拿破侖一同作俘虏的將軍們編于圣海倫島,根据完全由拿破侖亲自校訂的原稿刊印”1823 年巴黎版(«Mémoire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de France, sous Napoléon, écrits à Sainte-Hélène, Par les généraux qui ont partagé sa captivité, et publiés sur les manuscrits entièrement corrigés de la main de Napoléon». Paris, 1823)。——第 92 頁。

- 72 根据富尔的计划,拿破侖一旦入侵,俄国的武装力量应分为三个軍团,其中第一軍团应依靠 1811—1812 年在德里薩(立陶宛)特別构筑的营垒,頂住敌人的主力突击,而第二軍团应在敌人的翼側和后方机动。根据弗里德里希二世时代普魯士陈腐的战略和策略的精神制定的这个计划分散了俄军的兵力,使他們必然被在数量上占优势的敌人各个击破。拿破侖的战略意图基本上建立在富尔计划的錯誤上。但是,俄国指揮部(其中包括巴克萊-德-托利)对于这个计划的錯誤是清楚的,它在支持富尔计划的亚历山大一世实际上不参与指揮作战以后,就及时定下决心放棄德里薩营垒并退向俄国内地以便俄国第一軍团和第二軍团会合。——第 93 頁。

- 73 1812年8月16—17日(4—5日),拿破侖軍隊同掩護巴格拉齊昂和巴克萊-德-托利軍隊(這兩支軍隊於1812年8月3日(7月22日)會合)的主力退却的俄國部隊在斯摩棱斯克附近發生會戰。拿破侖想強使俄軍進行決戰沒有成功。他以巨大傷亡的代價占領了俄國後衛部隊在主力被擊退以後所放棄的城市。斯摩棱斯克會戰是1812年衛國戰爭中著名的會戰之一,這次會戰表明了俄國軍隊和人民抵抗入侵的征服者的力量的增長,也顯露出拿破侖迅速殲滅俄軍的圖謀的破產。會戰以後,拿破侖試圖締結和約,但沒有成功。——第93頁。
- 74 指在格查茨克西南的察列沃-宰米舍附近的陣地,俄軍於1812年8月29日(17日)抵達該地。俄軍根據上任不久的總司令米·伊·庫圖佐夫的決定放棄了這個陣地,庫圖佐夫打算在兵力較占優勢的情況下與法軍進行決戰,而這需要贏得時間,並需要預定的援軍與主力會合。由於這個緣故,俄軍從察列沃-宰米舍退到博羅迪諾。——第93頁。
- 75 這裡提到的是在第六次歐洲國家反拿破侖法蘭西的同盟戰爭中1813年戰局的一系列會戰。1812年拿破侖軍隊在俄國的潰敗成了歐洲各國人民反對拿破侖統治的起義信號。1813年2月,在俄軍進入波蘭和德國以後,締結了與拿破侖作戰的俄普同盟。1813年春天,英國、俄國、普魯士、瑞典、西班牙和葡萄牙組成了反拿破侖同盟,同年秋天,奧地利也公開參加了同盟。在1813年戰局中,拿破侖雖然取得了一些勝利,但是他的軍隊已被同盟國軍擊潰,並被趕出了德國。
- 1813年5月20—21日(8—9日)在包岑(薩克森)會戰中,拿破侖軍隊戰勝了同盟國俄普軍隊,但是同盟國軍在巴克萊-德-托利統率的俄國後衛部隊的掩護下秩序井然地撤退。次日,從包岑撤退的俄國部隊在格爾利茨附近與法軍進行後衛戰,俄軍取得了勝利。
- 在1813年10月16—19日(4—7日)的萊比錫會戰(見注55)中,巴克萊-德-托利指揮同盟國軍的中路。——第94頁。
- 76 見注44。——第95頁。
- 77 在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1789年10月5日和6日從巴黎走到凡爾賽的群眾與國王近衛軍發生流血衝突,結果迫使國王路易十六返

回巴黎，从而粉碎了宫廷在凡尔赛准备的反制宪議會的反革命阴谋。

1791年2月19日在巴黎发生了人民骚动，国王眷屬试图逃往国外是这次骚动的起因。——第95頁。

- 78 万第战争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1793年3月在万第省发动的反对法兰西共和国的反革命叛乱引起的。大多数叛乱者是受反革命的教士和贵族唆使和指挥的当地一部分农民。英国政府的代表给予叛乱者积极的帮助。1793年6月万第人围攻并夺取了共和国军队所防守的索穆尔城，但不久就遭到一连串失败。叛乱于1795年被平定，但是在1799年和以后的年代中又多次试图叛乱。——第95頁。
- 79 热月九日(1794年7月27—28日)是颠覆雅各宾党人的政府、建立大资产阶级的统治的反革命政变。——第95頁。
- 80 这里列举的是1796—1797年战局中的一系列会战，在这次战局中，由波拿巴将军率领的法国军队侵入意大利北部，击溃了同盟国奥地利和皮蒙特(撒丁)军队。在前面提到的蒙多維会战中，波拿巴的军队大败皮蒙特军队，从而迫使皮蒙特国王单独媾和。由于奥军在洛迪的失败，波拿巴军队占领了米兰。波拿巴获得胜利的里沃利会战(1797年1月14—15日)在夺取意大利北部的战斗中起了决定性作用，最后决定了整个战局有利于法国的结局。奥地利人被迫将曼都亚要塞交给法国人，并于1797年10月缔结有利于法国的和约，这一和约意味着第一次反法同盟的彻底瓦解。——第95頁。
- 81 波拿巴和他手下的将军们利用反法同盟失败后在意大利加强起来的反专制制度运动，在支援意大利共和派的幌子下力求在意大利以“女儿”共和国的形式建立法国的统治。1798年3月，在法国武装力量的支持下罗马共和国宣告成立；教皇庇护六世逃跑。但是在1799年，在第二次反法同盟的各国军队进入意大利以后，意大利的各个共和国被推翻，并在罗马地区恢复了教皇的政权。随着法国在意大利统治的恢复，拿破仑先把一部分教皇国领土并入附庸的意大利王国，而于1809年又把教皇国划入法兰西帝国。——第96頁。
- 82 远征埃及是1798年法国陆海军在波拿巴将军统率下向埃及的进军，

其目的是要在近东确立法国的殖民統治，侵占当时属于土耳其的埃及和叙利亚，并且在英国与印度的交通綫上打击英国。由于法国舰队于1798年8月1日在艾布基尔被英国納尔逊海軍上将的分舰队歼灭，由于亚·瓦·苏沃洛夫統率下的俄奥軍队在意大利北部战胜了法軍以及海軍上将費·費·烏沙可夫指揮的俄国分舰队在地中海的胜利行动，波拿巴在埃及的胜利就化为烏有。1799年秋天，波拿巴把軍队留在埃及，自己返回法国，而在1801年这支軍队被迫向英軍投降。——第96頁。

- 83 霧月18—19日(1799年11月9—10日)波拿巴將軍和他的拥护者实行政变，結束了法国資產階級反革命的发展进程。政变的結果建立了被任命为第一执政的拿破侖·波拿巴的軍事专政。——第96頁。
- 84 在1800年6月14日馬連峨会战(意大利北部)中，得到关于奥軍部署的不确实情报的拿破侖的軍队受到突然的攻击。尽管如此，奥軍仍然遭到了失败。馬連峨会战的胜利以及法国另一支軍队在德国西南部与奥軍作战的胜利，促使1798年底由英国、奥地利、俄国、西班牙、那不勒斯和土耳其組成的第二次反法同盟瓦解。由于这次胜利，拿破侖的政权得到了巩固。——第96頁。
- 85 大軍——見注52。——第96頁。
- 86 在第三次欧洲国家(英国、奥地利、俄国和那不勒斯王国)反拿破侖法国的同盟战争时期，1805年10月奥地利馬克將軍的軍队在烏尔姆地区被法軍包圍，結果被迫投降。——第97頁。
- 87 拿破侖反对第五次同盟(奥地利、英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战争时期，在1809年7月5—6日瓦格拉姆会战中拿破侖軍队战胜了奥地利軍队。为了庆祝这次胜利，貝尔蒂埃获得了瓦格拉姆公爵的封号。奥地利在这次失败以后，承认自己为战败国，并于1809年10月在苛刻的条件下与拿破侖締結了和約。——第97頁。
- 88 指拿破侖軍队被击潰和同盟国軍进入巴黎以后，1814年4月由參議院

建立的、达来朗担任主席的临时政府。临时政府促成了波旁王朝的复辟。——第 98 頁。

89 “貝尔蒂埃元帅回忆录” 1827 年巴黎版第 1—2 部 (《Mémoires du maréchal Berthier》. Part. I—II, Paris, 1827)。——第 98 頁。

90 恩格斯写的“阿尔及利亚”这一条目被“美国新百科全书”編輯部作了某些修改。从 1857 年 9 月 22 日恩格斯給馬克思的信中可以看出，在我們未曾获得的該条目的原稿中有关于阿尔及利亚人民在阿布德-艾尔-喀德的领导下进行反对法国征服者的解放战争的記述和关于毕若元帅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活动的評述。大概由于在百科全书中已經列入关于阿布德-艾尔-喀德的专门条目，并且預定把向馬克思預約的“毕若”一条（見本卷第 221—224 頁）也列入，所以这些地方都被編輯部删略，該条目的內容就受到了損害。在条目中还有編輯部篡改的其他痕迹。

恩格斯在写这一条目时，糾正了资产阶级的历史文献和参考书刊——当时他唯一能够弄到的資料——对阿尔及利亚历史所作的有偏見的說明(其中他利用了 1846 年萊比錫出版的“維干德百科辞典”第 1 卷 (《Wigand's Conversations-Lexikon》. Bd. I, Leipzig, 1846) 里的“阿尔及尔”这一条目，第 108 頁上的引文看来是从这一条目中摘录来的)。但是，由于当时对非洲国家的历史根本没有深入研究，个别問題上某些陈腐的片面的論点就必然会从恩格斯所掌握的資料滲入到他写的条目中，例如，在說明基督教国家在与阿尔及利亚海盜的斗争中的作用(大家知道，这些国家本身就广泛地从事海上掠夺)以及法国人最初占領阿尔及利亚的情况和动机問題上，都表现出这种情况。——第 99 頁。

91 庫魯格魯人 是土耳其人与阿尔及利亚妇女結婚所生的后代。——第 100 頁。

92 欧洲人过去称位于埃及西部的北非伊斯兰教国家为 貝尔貝萊国家 或 巴巴尔国家。——第 102 頁。

93 1827 年 4 月 30 日，阿尔及尔的德依侯賽因在他的官邸举行的招待会

上，因法国政府未偿还欠阿尔及利亚臣民的債而与法国总領事德瓦尔发生爭执，并且为了反击德瓦尔的橫蛮无礼的挑畔行为，用蒲扇打了他的臉。这一由法国領事挑起的事件成了查理十世政府于 1827—1829 年对阿尔及利亚海岸实行封鎖的借口。封鎖以后，法国殖民者于 1830 年开始征服这个国家。——第 103 頁。

94 这里說的是查理十世政府打算在法国政府实际控制阿尔及利亚并使奥斯曼帝国本身在財政上更加依賴法国的条件下，在形式上将阿尔及利亚交給土耳其政府管理。根据这些条件，在阿尔及尔打算建立特別政府(由于土耳其政府的軟弱和它沒有管理远方領地的能力，这个政府必然成为法国的傀儡)；阿尔及利亚的四个港口交給法国，并給予法国經營珊瑚业的权利；苏丹对于法国在把阿尔及尔“归还”苏丹的問題上的“援助”应付給法国 2 000 万法郎。利用土耳其軍隊征服阿尔及利亚，也是法国統治集团的打算。但是由于 1830 年法国資產階級七月革命使得奥尔良王朝替代了波旁王朝，同土耳其政府的談判就停止了。七月王朝走上了在阿尔及利亚建立法国的直接統治的道路。——第 104 頁。

95 在克洛塞尔元帅指揮下的法軍向控制在阿尔及利亚起义者手中的康士坦丁区的远征是在 1836 年秋天进行的。法軍試圖以强攻占領康士坦丁城，但被阿尔及利亚的部队击退。次年秋天，接替克洛塞尔担任阿尔及利亚总督的当雷蒙將軍率兵进行了第二次远征。这一次法軍以强攻占領了康士坦丁，但付出了很大伤亡的代价。法国兵士对該城居民进行了殘暴的迫害。——第 108 頁。

96 阿尔及利亚人在阿布德-艾尔-喀德的领导下进行的反对法国征服者的解放斗爭从 1832 年持續到 1847 年。阿布德-艾尔-喀德依靠阿尔及利亚广大的居民，在他的控制下联合了一些阿拉伯部落，取得了战果，因而迫使法国人于 1834 年承认阿尔及利亚西部(几个沿海城市除外)为独立的阿拉伯国家。法国殖民者經常違反与阿布德-艾尔-喀德簽訂的条約，一再侵入阿尔及利亚西部。1839—1844 年期間，阿布德-艾尔-喀德的国家經过了頑强的斗爭以后被征服，他自己也不得不退到摩洛

- 哥。1845—1847年，阿布德-艾尔-喀德在阿尔及利亚西部重新领导群众的解放起义。这次起义被血腥镇压以后，他在撒哈拉绿洲区继续领导进行反对法国侵略者的游击战。1847年阿布德-艾尔-喀德被俘。然而在这以后，不论在阿尔及利亚西部还是东部，阿尔及利亚人反殖民主义的起义都没有停止过。——第108頁。
- 97 馬拉布特 是伊斯兰教派的代表，修道士；他們积极参加北非各国人民反对欧洲征服者的解放斗争。——第109頁。
- 98 *Bureau Arabe* (阿拉伯局) 是法国在阿尔及利亚处理与当地居民直接有关的问题的军事行政机关的名称。在每个被征服的阿尔及利亚的区都設有这种局，它們拥有极大的权力。——第109頁。
- 99 从1857年9月10日恩格斯給馬克思的信以及保存下来的恩格斯摘自若米尼写的1827年巴黎出版的“拿破侖的政治和軍事生涯”(«Vie politique et militaire de Napoléon». Paris, 1827)等书的准备材料中可以看出，这一条目的初稿是由恩格斯編写的。初稿由馬克思补充了取自法国参考书刊1854年巴黎出版的“傳記集”第3卷(«Biographie universelle». T. 3, Paris, 1854)、拿破侖回忆录(«Mémoires pour servir a l'histoire de France, sous Napoléon...» Paris, 1823)等书的材料，并經他校閱后寄往紐約。——第112頁。
- 100 指俄土战争(1787—1791)时期，1788年俄軍对黑海北岸的土耳其人的据点奥查科夫要塞的长期圍攻和占領。——第112頁。
- 101 在考斯丘什科领导下的波兰民族解放起义时期，1794年6月下旬格先的部队在奥什米亚納和索雷附近击败了波兰軍队。同年8月，俄軍击破了防守維尔諾(維尔紐斯)城的波軍抵抗，进入該城。
由于起义被镇压，1795年奥地利、普魯士和沙皇俄国对波兰进行第三次瓜分，这次瓜分使波兰国家最后灭亡。——第112頁。
- 102 指1796年俄軍圍攻和占領杰尔宾特城，这是对波斯沙赫阿加-穆罕默德于1795年入侵格魯吉亚时大批屠杀和奴役居民的报复。——第

113 頁。

103 圍攻但澤（格但斯克）是在拿破侖第一同第四次歐洲國家反法同盟的戰爭時期拿破侖軍隊於 1807 年 3 月發起的。由普魯士軍隊和同盟國俄國部隊組成的要塞守軍對占優勢的敵軍進行了頑強的抵抗。要塞於 1807 年 5 月底投降。——第 114 頁。

104 “彗星”（《*Der Komet*》）是德國自由派的文學日報，1830—1848 年在萊比錫出版。

“晚報”（《*Abend-Zeitung*》）是德國資產階級的文學報紙，1817—1857 年在德勒斯頓和萊比錫出版。——第 117 頁。

105 萊比錫的席勒協會和德國文學家聯合會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聯合了決心為德國的出版自由和宣傳自由主義思想而鬥爭的德國作家。——第 117 頁。

106 “薩克森祖國報”（《*Sächsische Vaterlands-Blätter*》）是德國自由派的報紙，從 1837 年起在德勒斯頓出版，而從 1841 年起在萊比錫出版。——第 117 頁。

107 “德國天主教”是 1844 年在德意志許多邦中發生的、有中小資產階級廣大階層參加的宗教運動。這個運動反對天主教會中的神秘主義和偽善的各種極端表現，並以宗教的形式反映了四十年代資產階級對德國反動制度的不滿。“德國天主教徒”反對羅馬教皇的最高權位以及天主教會的許多教條和儀式，竭力使天主教適應於德國資產階級的需要。——第 117 頁。

108 在薩克森軍隊槍殺萊比錫的人民示威後的第二天，即 1845 年 8 月 12 日在萊比錫的練馬場上舉行了市民大會。這次示威旨在反對薩克森政府迫害“德國天主教徒”運動的參加者，而這次示威的導火綫則是薩克森皇太子約翰到萊比錫時舉行的軍事檢閱。約翰太子被認為是這次迫害的禍首。——第 117 頁。

109 祖國聯合會是一個廣泛的民主組織，它是在法國資產階級二月革命和德意志各邦的資產階級三月革命所引起的革命運動高漲的情況下，于

1848年3月底在萊比錫建立的。領導這個組織的是勃魯姆、盧格、叶凱爾等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共和派分子。該聯合會在薩克森各地都設有分會。——第117頁。

- 110 預備議會是指1848年3月31日至4月4日在美因河畔法蘭克福舉行的德意志各邦社會人士會議。預備議會的絕大多數代表屬於君主立憲派。這些代表拒絕共和民主派少數關於在德國建立聯邦共和制和在全德國國民議會召開之前將預備議會成為制憲機構的提議。以黑克爾和司徒盧威為首的一部分共和派由於自己的提議未獲通過而離開了預備議會，但是以勃魯姆為首的一部分比較溫和的共和民主反對派仍然留下，並且參加組織自由派提出的五十人委員會。溫和的共和派在委員會中一共只得到12個席位。該委員會必須根據與聯邦議會（舊德意志聯邦的反革命機關）的協議，保證全德國國民議會的召開。預備議會還制定了“德國人民的基本權利和要求”的草案，這個文件僅僅在口頭上宣布了一些資產階級自由，但是沒有觸及當時德國半封建專制制度的基礎。

法蘭克福議會是指1848年5月18日在美因河畔法蘭克福召開的全德國國民議會，其目的是制定全德憲法。議會的多數是由自由派資產階級代表以及歸附於它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組成的。左派的溫和激進分子聚集在羅伯特·勃魯姆的周圍。由於自由派多數的膽怯和妥協以及小資產階級左翼的動搖和不徹底性，議會不僅沒有成為真正統一德國的機構，而且變成了失去實際權力、引導群眾離開革命鬥爭的純粹的爭論俱樂部。1849年夏天議會停止了活動。——第118頁。

- 111 1848年10月6日爆發的維也納人民起義是由於大資產階級所支持的反革命保皇派試圖消滅1848年奧地利資產階級三月革命的成果、恢復專制制度而引起的。德皇派遣維也納守備部隊征討革命的匈牙利的命令是這次起義的直接導火綫。經過1848年10月24日到11月1日的激烈戰鬥之後，起義被德皇軍隊鎮壓。維也納人失敗的原因在於起義者陣營中缺乏統一，他們的小資產階級的領導者優柔寡斷以及由於德意志各邦的資產階級的叛變而使支持維也納的運動削弱。維也納的十月起義是奧地利和德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發展中的最高峰。——第118頁。

- 112 1792年6月20日在巴黎发生了人民群众的武装示威游行，群众冲入了王宫。这次发动是由吉倫特派(大资产阶级党派)組織的，其目的是对国王路易十六施加压力，迫使他撤銷关于吉倫特派內閣辞职的决定，但結果成了反对王权和反对宫廷与外国干涉者勾結的示威游行。示威游行表明了人民群众反君主制度的情緒的增长。后来事件发展为1792年8月10日的人民起义，結果在法国推翻了君主制度，建立了共和国。——第119頁。
- 113 指反对第二次同盟战争时期，1800年拿破侖对意大利北部的进軍，这次进軍以馬連峨会战(見注84)的胜利而告終。——第119頁。
- 114 大陆体系，也叫做大陆封鎖，拿破侖第一于1806年宣布这样一項措施，禁止欧洲大陆各国和英国进行貿易。——第119頁。
- 115 关于临时政府，見注88。——第120頁。
- 116 馬克思指1829年巴黎出版的“布里昂先生关于拿破侖、督政府、执政时代、帝制时期、复辟时期的回忆录”(«Mémoires de M. de Bourrienne sur Napoléon, le Directoire, le Consulat, l'Empire et la Restauration». Paris, 1829)。据推測，这些回忆录的大部分是过去拿破侖的外交官維耳馬雷写的，他专门編造这类著作。——第120頁。
- 117 在1756—1763年的七年战争(見注45)期間，普魯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的軍队于1757年12月5日在西里西亚萊滕(呂廷)会战中击败了奥地利軍队。——第122頁。
- 118 在1756—1763年的七年战争期間，弗里德里希二世的普魯士軍队于1757年6月18日在科林(捷克)被奥地利軍队击败。
1759年8月12日(1日)庫奈斯多夫(普魯士)会战，是七年战争中規模最大的会战之一，在这次会战中俄国軍队大敗弗里德里希二世的軍队。普軍失敗的后果是1760年俄国軍队暂时占領柏林。只是由于俄国同它的盟国——奥地利和法国——之間的矛盾，以及亲普魯士的彼得三世登上俄国王位，普魯士才免于复灭。——第122頁。

- 119 在“美国新百科全书”第二卷中刊登这一条目时，百科全书編輯部把它与另一作者写的“浮动炮台”（«Floating batteries»）一条合并在一起，作为专门的一个条目。看来这一条目是由某个美国专家編写的，其中包括了恩格斯在写完«Battery»这一条目并寄往紐約后的时期关于美国造船的資料。——第 125 頁。
- 120 見注 31。——第 128 頁。
- 121 1805 年 12 月 2 日（11 月 20 日）俄奧軍隊和法国軍隊之間进行的 奧斯特利茨（莫拉維亞）会战以拿破侖第一的胜利而結束。奥地利在这次失败后退出第三次同盟并同拿破侖締結普勒斯堡和約。俄国和英国繼續作战，于 1806 年組成新的即第四次反拿破侖法国的同盟。——第 128 頁。
- 122 本条目的大部分是由馬克思写的。他对貝姆作了政治上的評定，以及对条目全文进行了最后校訂和文字上的潤飾。同时馬克思几乎一字不改地轉抄了恩格斯在 1857 年 9 月 18 日給馬克思的信中以及恩格斯为馬克思而写的专题短評中对作为軍事活动家的貝姆的評定，以及对他在 1830—1831 年波兰起义时期和 1848—1849 年在特兰西瓦尼亚的革命战争时期的軍事活动的估价。此外，恩格斯帮助馬克思選擇和校正傳記材料。——第 132 頁。
- 123 指 1813 年保卫由拿破侖軍隊占領的但澤（格但斯克），当时該城被普俄軍隊包圍。該城被圍困十一个月半，在此期間，守軍（其中有波兰軍隊）經受住了三次正規圍攻，但是最后被迫投降。——第 132 頁。
- 124 指下面这本书：約·貝姆“1819 年以前波兰王国炮兵使用康格里弗燃燒火箭的經驗” 1820 年魏瑪版（J. Bem. «Erfahrungen über die Congrevschen Brand-Raketen, bis zum Jahre 1819 in der königl. poln. Artillerie gesammelt». Weimar, 1820）。——第 132 頁。
- 125 指 1825 年 12 月 14 日彼得堡十二月党人的起义。——第 132 頁。
- 126 1831 年 5 月 26 日（14 日）在沃斯特罗侖卡附近由吉比奇統率的沙皇

軍隊擊敗了波蘭起義軍。

1830—1831年波蘭起義是由沙皇制度的民族壓迫和警察壓迫引起的。1830年11月29日(17日)在華沙以軍事政變開始的這次起義，具有人民起義的性質，結果趕走了沙皇軍隊。但是波蘭政府和軍隊中的小貴族的領導人實行投降政策，阻撓廣大的人民群眾參加民族解放運動，同時表現了對烏克蘭和白俄羅斯土地的侵略野心。資產階級民主派代表未能廢除農奴的依附關係，因而起義沒有得到農民的應有支持。1831年2月開始的戰事的最後結局是：波蘭政府於1831年9月8日(8月26日)投降，把華沙交給沙皇軍隊。波蘭起義雖然遭受了失敗，但是在波蘭人民的解放鬥爭中起了巨大的作用，並且具有重大的國際意義。——第133頁。

- 127 這裡說的是貝姆沒有實現的參加葡萄牙內戰(1828—1834)的打算。這次內戰是在以1828年奪得葡萄牙王位的唐·米格爾為首的專制主義者(封建教權派)和聚集在瑪麗亞·達·格洛麗亞女王及其父親唐·彼得魯周圍的立憲主義者(資產階級自由派)之間進行的。——第133頁。
- 128 維也納流動自衛軍是貝姆在維也納1848年十月起義(見注111)的日子里組織的。它表現出自己是一支最有紀律、最有戰鬥力和最勇敢的起義武裝部隊；其成員大多數是維也納的工人和手工業者。——第133頁。
- 129 洪韋德(匈牙利文是«honvéd»——“祖國保衛者”)是中世紀匈牙利步兵的名稱。1848—1849年資產階級革命和民族解放戰爭時期，1848年夏天由匈牙利政府組織的匈牙利民族軍隊的兵士在匈牙利開始被叫做洪韋德。——第134頁。
- 130 塞克列人是居住在特蘭西瓦尼亞東部山區的匈牙利人。——第134頁。
- 131 貝姆軍隊向巴納特(塞爾維亞伏伊伏迪納的一個地區，當時屬於匈牙利)的進軍是在1849年舉行的。1848年革命初期，在伏伊伏迪納塞爾維亞人的民族運動加強了，同時也掀起了城鄉民主階層反封建的鬥爭。但是由於當地自由資產階級分子的軟弱和叛變，民族運動不久就被與

奥地利反革命結成同盟的反动貴族和僧侶的代表控制。塞尔維亞人爭取自治的运动被哈布斯堡王朝利用来反对革命的匈牙利。1848年夏天，伏伊伏迪納的塞尔維亞人与匈牙利人之間发生战事，而这由于巴納特(那里除了塞尔維亞人外，还住了相当多的匈牙利人、德意志人和羅馬尼亞人)的塞尔維亞居民与非塞尔維亞居民之間的冲突而复杂化。1849年春天，貝姆和匈牙利將軍佩尔采尔的軍队在巴納特多次击败奧軍和伏伊伏迪納的塞尔維亞人，但是这些胜利并不能影响以后对匈牙利人不利的革命战争的总进程。在塞尔維亞的伏伊伏迪納以及在特兰西瓦尼亞和其他当时屬於匈牙利的民族地区，与反革命势力的斗争由于匈牙利資產階級貴族革命分子在民族問題上的錯誤立場而受到阻碍，他們懂得与被压迫民族合作的必要性太晚，直到1849年7月28日才頒布民族权利平等的法律。——第135頁。

- 132 在匈牙利民族解放战争时期，海瑙統率的奧軍在1849年8月9日泰梅希瓦拉(提米希瓦拉)会战中击败了力图扼守自己的陣地直到与匈牙利总司令戈尔盖率領的北方軍团会合的匈牙利南方軍团。在这次失败以后过了四天，北方軍团就向沙皇軍队投降。匈牙利的資產階級革命被鎮压下去了。——第135頁。
- 133 1850年秋天，在阿勒頗(哈勒布)城阿拉伯居民起来反对当地的基督教徒和土耳其当局，后来发展为反对土耳其統治的起义。起义被土耳其軍队殘酷地鎮压下去了。——第135頁。
- 134 “立宪自卫軍”是按照法国資產階級革命时期通过的1791年宪法，在廢除过去的国王近卫軍以后担負保卫国王及其宮廷的職責的特种部队。1792年5月，立法議会在民主运动的压力下通过了解散“立宪自卫軍”的法令。——第136頁。
- 135 吉德是欧洲許多国家的軍队中專門担任軍队的向导的部队；在拿破侖战争时期的法国軍队中，吉德担任拿破侖司令部的警卫勤务，同时是他的私人卫队。——第136頁。
- 136 这里列举的是法国反对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反法同盟的战争时期的一系列会战。

在波拿巴將軍統率法軍向意大利進軍時期，1796年9月4日法軍在羅韋雷托（意大利北部）附近擊敗了奧軍。

1798—1799年波拿巴遠征埃及和敘利亞時期，他的軍隊從1799年3—5月圍攻曾屬於土耳其的敘利亞要塞聖讓得阿克（阿克），但是沒有成功。

就在這次遠征時期，在1799年7月25日艾布基爾會戰中由英土艦隊運送到埃及海岸登陸的土耳其登陸隊被法軍殲滅。

在1806年10月14日耶拿（紹林吉亞）會戰中，法軍在拿破侖的指揮下擊潰了一部分普軍。就在同一天，拿破侖的元帥達武的部隊在奧埃爾施太特附近擊敗了普軍的主力。普軍在這兩次會戰（這兩次會戰常常通稱為耶拿會戰）中遭到的失敗使法軍佔領了普魯士大部分領土，并使普魯士——第四次反法同盟的參加國——向拿破侖法國投降。

里沃利會戰——見注80，馬連峨會戰——見注84，奧斯特利茨會戰——見注121，埃勞會戰——見注69。弗里德蘭德會戰在本卷正文中有記述，見第114頁。——第136頁。

- 137** 指第五次反拿破侖法國同盟戰爭時期，當拿破侖的主力因同奧地利作戰而被牽制住的時候，英國艦隊於1809年7月向些耳德河口進行的遠征。英軍在奪得伐耳赫倫島以後，未能利用它作為對安特衛普以及法軍在比利時和荷蘭的其他據點展開軍事行動的基地，而且4萬名登陸部隊由於飢餓和疾病損失了約1萬人，因而被迫於1809年12月撤離該島。——第136頁。
- 138** 拿破侖第一的軍隊和俄普軍隊在呂特岑（薩克森）的會戰發生在1813年5月2日（4月20日）。在這次會戰中，拿破侖付出了巨大傷亡的代價迫使俄普軍隊退却，這次退却秩序井然。——第137頁。
- 139** 從保存下來的準備材料中可以看出，這一條目的前面部分是馬克思寫的。條目中關於博斯凱參加1853—1856年克里木戰爭的一節是恩格斯寫的（參看1857年9月22日他給馬克思的信）。——第138頁。
- 140** 俄軍和英、土、法聯軍於1854年10月25日（13日）在巴拉克拉瓦附近進行會戰；在這次會戰中，英軍儘管佔了有利陣地，但是由於指揮不

当而遭到很大損失，英方很大一部分輕騎兵被歼灭。在恩格斯的“巴拉克拉瓦会战”（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586—593頁）一文中对这次会战作了詳細的叙述。——第139頁。

- 141 指1855年9月8日（8月27日）英法軍隊向塞瓦斯托波尔的工事采取的强攻。这次强攻的結果是，法軍以巨大伤亡的代价占領了馬拉霍夫岡。經過11个月保卫塞瓦斯托波尔的英勇战斗，俄国守軍按照指揮部的命令放棄了这个城市，因为指揮部认为繼續保卫該城已沒有意义。恩格斯写的“塞瓦斯托波尔的夺取”和“战争的決定性事件”（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589—593頁，第614—623頁）两篇文章中叙述了9月8日的强攻。——第139頁。

- 142 “农村和城市总汇报”（*«Journal général de la Cour et de la Ville»*）是法国貴族的日报；从1789年9月15日到1792年8月10日在巴黎出版。在1789年10月30日以前，布律恩是这家报纸的編輯。——第140頁。

- 143 科尔德利俱乐部 是法国資產階級革命时期1790年在巴黎建立的人民俱乐部之一。俱乐部的这个名称是从它的集会地点过去的法兰西斯科教派科尔德利修道院而来的，它的正式名称是“人权及公民权之友社”。它与雅各宾俱乐部同样地在法国的政治生活中起了巨大的作用。科尔德利俱乐部最初联合了革命的資產階級代表以及后来組成雅各宾集团的右翼（丹东派）和左翼（阿貝尔派）的各派小資產階級代表。随着革命的深化，左派分子在俱乐部取得了优势。在雅各宾革命民主专政（建立于1793年6月2日）时期，俱乐部是阿貝尔派的堡垒，它一直存在到1794年3月阿貝尔派被击潰。

在革命时期和以后的年代里都用“科尔德利”这个詞称呼屬於雅各宾左派的或是接近他們的革命者。——第140頁。

- 144 指法国資產階級革命时期，1791年7月17日巴黎的手工业者和工人在馬尔斯广场举行的反君主制度的示威。科尔德利俱乐部的首領們領導了这次发动，他們草拟了向制宪議會提出的要求国王退位的請願书。示威遭到軍隊和拉斐德率領的巴黎資產階級区的国民自卫軍部队

的枪杀。1791年7月17日的事件表明人民群众和革命资产阶级为一方与轉到反革命方面的大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派为另一方之間的深刻分裂。——第140頁。

145 由于外国干涉者军队的进攻和国内反革命势力的活跃，1792年9月2—5日在巴黎发生了人民騷动。巴黎群众占領了監獄，設立了对被監禁的反革命分子进行审判的临时人民法庭。許多积极的反革命分子被处决。这次紅色恐怖是革命人民的自卫行动。——第140頁。

146 在革命法国同第一次欧洲国家反法同盟的军队緊張作战时期，1793年9月6—8日在岡德斯霍特（弗兰德）会战中法国军队击败了同盟国英国、汉諾威、荷兰和奥地利的军队。——第140頁。

147 1793年夏天，吉倫特派（大工商业资产阶级党派）联合反革命保皇党人在吉倫特省发动反革命叛乱，并且在前面提到的卡耳瓦多斯省和法国西部、西南部和东南部的其他許多省发动叛乱。吉倫特派在保护各省自治权和联邦权的幌子下反对雅各宾政府，反对支持政府的革命群众。1793年秋天，吉倫特派的反革命“联邦制”运动被法兰西共和国的军队鎮压了。

社会拯救委员会（Comité de salut public）是1793年4月建立的法国革命政府的中央机关。在雅各宾专政时期（1793年6月2日—1794年7月27日），委员会在与国内外反革命的斗争中，在依靠下层阶级解决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热月九日反革命政变以后，委员会丧失了领导作用，并于1795年10月被解散。——第140頁。

148 在丹东和他的战友被处死之后幸存的、代表在革命年代成长起来的所謂新资产阶级的利益的丹东派，与其他反革命分子一起积极地参加了1794年热月九日的政变（关于政变見注79）。——第141頁。

149 指1795年葡月12—13日（10月4—5日）保皇党人在巴黎的暴动被波拿巴將軍率領的政府军队鎮压。——第141頁。

150 指1796年秋天巴貝夫派（杰出的空想共产主义者巴貝夫的拥护者，他

們力求以革命推翻現存制度，消滅私有制，建立財產公有制)在巴黎格列涅爾兵營的起義。1796年5月巴貝夫和他的親密戰友被捕以後，巴貝夫派試圖從監獄把被捕者拯救出來，並且試圖在推翻督政府和恢復1793年雅各賓憲法的口號下在格列涅爾兵營(他們在該兵營的兵士中間進行了革命宣傳)發動起義。巴貝夫派的起義被軍隊殘酷鎮壓了。

督政府(由五個督政組成，每年改選一人)是法國行政領導機關，它是根據1794年雅各賓革命專政失敗後所通過的1795年憲法建立的。在1799年波拿巴政變以前，督政府是法國的政府，它支持反對民主力量的恐怖制度，並維護大資產階級的利益。——第141頁。

- 151 1797年10月17日的康波福米奧和約結束了法國同參加第一次歐洲國家反法同盟的奧地利的戰爭。根據條約，法國得到了比利時、伊奧尼亞群島和阿尔巴尼亞的一部分。奧地利必須協助將萊茵河左岸讓給法國，並且放棄自己在意大利北部的領地，這塊土地劃入在法國保護下成立的南阿尔卑斯共和國。同時，過去威尼斯共和國的大部分領土以及曾屬於這個共和國的伊斯的利亞和达尔馬威亞的一部分土地讓與奧地利。——第141頁。
- 152 指法國反對第二次歐洲國家同盟的戰爭時期，1799年8—10月布律恩將軍率領的法國和荷蘭軍隊对在荷蘭登陸的英俄軍隊進行的成功的戰鬥。英俄遠征的目的是要把法國人趕出荷蘭(荷蘭被法國占領並宣告成立傀儡的巴達維亞共和國以後，已成了依附于法國的國家)，在該國恢復革命前的君主制度和奪取荷蘭的艦隊。同盟國軍總司令約克公爵被布律恩軍隊擊敗以後，不得不于1799年10月18日簽訂阿尔克馬投降書，根據投降書他必須遣返8000名法國和荷蘭的戰俘，並且從荷蘭撤走自己的軍隊。——第141頁。
- 153 布倫兵營是拿破侖第一為了通過拉芒什海峽入侵英國而于1803—1805年設立的軍事基地。兵營內集中了12萬名登陸部隊。由於法國艦隊在同英國作戰中失敗，並且在歐洲又組成了有俄國和奧地利參加的新的即第三次反法同盟，拿破侖被迫放棄了他的入侵計劃。——第142頁。

- 154 指 1814 年 3 月 31 日第六次同盟的軍隊進入巴黎以後，法國參議院通過的關於廢黜拿破侖和在法國恢復波旁王朝的法令。——第 142 頁。
- 155 “百日”是指拿破侖恢復帝制的短暫時期，從 1815 年 3 月 20 日他從厄爾巴島回到巴黎起，到同年 6 月 22 日他在滑鐵盧失敗後第二次退位時為止。——第 142 頁。
- 156 1832 年秋天，英法艦隊封鎖荷蘭港口，法軍圍攻安特衛普的城砦，企圖迫使荷蘭履行 1831 年倫敦條約的條件，即承認在 1830 年資產階級革命後脫離尼德蘭王國的比利時獨立和把安特衛普交給比利時人。雖然被圍者進行了頑強的抵抗，但是要塞在 1832 年 12 月底仍然投降。——第 144 頁。
- 157 瓦朗西恩劑是由硝石、硫磺和火藥製成的混合燃燒劑；在法蘭西共和國反對第一次歐洲國家同盟的戰爭時期，1793 年奧英軍隊圍攻法軍防守的瓦朗西恩城時第一次使用了這種混合燃燒劑。——第 144 頁。
- 158 指 1853—1856 年克里木戰爭時期，1854 年 9 月 13 日（1 日）至 1855 年 9 月 9 日（8 月 28 日）法國、英國、土耳其和撒丁聯軍對塞瓦斯托波爾的圍攻。——第 148 頁。
- 159 指 1853—1856 年克里木戰爭時期，1855 年 8 月 9—11 日（7 月 28—30 日）英法艦隊對位於芬蘭灣入口處的俄國要塞斯維阿波爾格（蘇奧緬林納）的不成功的炮擊。關於這次炮擊見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英法對俄戰爭”一文（“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1 卷第 559—560 頁）。——第 148 頁。
- 160 從 1857 年 9 月 18 日馬克思給恩格斯的信中可以看出，馬克思參與了這一條目的材料挑選工作，他從關於軍用橋的參考書刊中做了許多摘錄，並把這些摘錄寄給了恩格斯。——第 152 頁。
- 161 希羅多德“九卷史”第 4 卷第 83 章；第 7 卷第 36 章。——第 152 頁。
- 162 阿利安“亞歷山大的遠征”第 5 冊第 3 章。——第 152 頁。
- 163 紀元前 55 年，在凱撒征服高盧時期（公元前 58—51 年）羅馬軍隊追擊

潰敗的日耳曼人，在萊茵河的中游地区渡河，在右岸停留了 18 天。渡萊茵河是为了显示羅馬的軍事威力和恐吓日耳曼部落，在凱撒的高卢战争札記第四册中記載了这次渡河情况。——第 152 頁。

164 “福拉尔对波利比烏斯的‘历史’短評” 1754 年巴黎版第 3 卷第 82 頁 («Abregé des commentaires de M. de Folard sur l’Histoire de Polybe». Vol. 3, Paris, 1754, p. 82)。——第 153 頁。

165 1846—1848 年美国对墨西哥的战争是由于美国种植場奴隶主和大資產階級对墨西哥土地的侵略野心引起的。这次战争的結果，美国侵占了墨西哥几乎一半的領土，其中包括整个得克薩斯、加利福尼亚北部、新墨西哥等地区。——第 154 頁。

166 恩格斯对馬克思写“貝尔納多特”这一条目給予很大帮助，他在 1857 年 9 月 21 日和 22 日的信中，向馬克思提供了关于貝尔納多特的軍事活动（其中包括他参加拿破侖于 1806 年对普魯士的战争和 1809 年对奥地利的战争）的許多实际材料。恩格斯对貝尔納多特在这些战争中的作用所作的評述，几乎被馬克思一字不改地抄在他写的条目里了。

馬克思为了对这个首先是政治家和外交家的貝尔納多特作出全面的評述，收集了大量的傳記材料，保存下来的馬克思从参考书刊和历史文献中所作的摘录可以证明这一点。——第 157 頁。

167 在 1794 年 6 月 26 日的弗略留斯（比利时）会战中，茹尔丹將軍指揮的法国軍隊击潰了科堡公爵的奥地利軍隊。这个胜利严重地打击了第一次反法同盟；法国的革命軍隊因而能够占領比利时，并在荷兰和萊茵河西岸发动积极攻势。1794 年 10 月初，法国軍隊渡过魯尔河，占領幽里希要塞；并于同年 11 月 4 日迫使馬斯特里赫特要塞投降。——第 157 頁。

168 法国軍隊于 1796—1797 年在意大利北部同奥地利軍隊作战期間，在波拿巴將軍的倡导下于 1797 年入侵伊斯的利亚（威尼斯共和国的一个省）。根据同奥地利簽訂的康波福米奧和約，波拿巴让出了包括伊斯的利亚在內的威尼斯的最后一部分領土。——第 158 頁。

- 169 果月十八日(1797年9月4日),根据波拿巴將軍所支持的督政府成員的命令,政府軍占領了立法团大厦,逮捕了勾結流亡貴族和准备君主制政变的保皇党議員。督政府本身也进行了改組,对保皇党分子采取鎮压措施。具有政变性质的果月十八日事件反映了督政府的資產階級制度的不穩固和它的左右动搖;它在遭到保皇党威胁时向左轉,而在畏惧民主运动时又向右轉。——第158頁。
- 170 指所謂 牧月三十日(1799年6月18日)政变。在政变期間,由于法軍在德国和意大利的軍事失敗以及共和国經濟和財政状况的恶化,公众不滿情緒日益增长,这就迫使立法团更換了督政府的成員,把三个露骨的反动分子赶出了督政府。——第159頁。
- 171 奥埃尔施太特会战——見注136。——第160頁。
- 172 提尔西特和約 是拿破侖法国同参加第四次反法同盟的战敗国俄国和普魯士在1807年7月7日和9日簽訂的和約。和約条件对普魯士极为苛刻,使普魯士丧失很大一部分領土(其中包括易北河以西的全部屬地)。俄国没有丧失什么土地,反而获得了普魯士割让給它的別洛斯托克地区。但是,亚历山大一世必須承认法国在德国占領的地方和拿破侖在那里所修改的疆界,以及拿破侖对伊奧尼亚群島的統治权,同意成立华沙大公国(这是法国在俄国边界上的一个进攻基地),并参加对英国的封鎖(即所謂大陆封鎖)。
法国同丹麦的反对瑞典的軍事同盟于1807年10月31日在楓丹白露簽訂。——第160頁。
- 173 見注137。——第161頁。
- 174 雷恩布龙——維也納的一座宮殿,奥皇的夏宮;奥地利軍队在1809年的戰爭中失敗以后,拿破侖第一于1809年秋季在这座宮殿里迫使奥地利接受媾和条件。——第162頁。
- 175 弗里德里希斯哈姆和約——見注70。——第163頁。
- 176 布加勒斯特和約 是为結束1806—1812年俄土战争而于1812年5月28日(16日)簽訂的和約。和約規定貝薩拉比亚和南高加索的一些省

- 份割給俄国；土耳其应給予塞尔維亚以内政自治权和确认从前同俄国所达成的关于承认莫尔达維亚和瓦拉几亚拥有某些自治权的协定。同土耳其簽訂这一和約，是由俄軍的胜利和俄軍司令官米·伊·庫图佐夫的外交手腕所促成的，它使俄国能够抽出大量兵力去对付拿破侖法国。——第 164 頁。
- 177** 指俄国和英国之間以及英国和瑞典之間簽訂的旨在反对拿破侖法国的和平和同盟条約。——第 164 頁。
- 178** 指俄国和瑞典于 1812 年 8 月 30 日(18 日)在亚波(土尔庫)簽訂的公約，这个公約实际上形成了两国反对拿破侖法国的軍事同盟。公約还規定，如果丹麦拒絕把挪威让給瑞典国王，那末俄国有义务給瑞典軍事援助以反对丹麦。而瑞典也有义务支持沙皇政府的領土要求，其中包括对拿破侖統治下的华沙大公国的領土要求。——第 165 頁。
- 179** 英国和瑞典之間的軍事同盟条約于 1813 年 3 月 3 日在斯德哥尔摩簽訂。該条約規定，瑞典軍隊去欧洲大陆参加反拿破侖軍隊的軍事行动，而英国資助瑞典以實現这一目的。条約的第二条規定英国有义务支持瑞典占有挪威的要求。——第 165 頁。
- 180** 指俄国和普魯士同拿破侖第一于 1813 年 6 月 4 日簽訂的休战协定。休战的最初期限到 7 月 20 日，后来延长到 8 月 10 日。在休战期間，亚历山大一世、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和貝尔納多特于 1813 年 7 月 12 日在特拉亨貝尔格(西里西亚)城堡会晤，同盟国对今后的作战計劃达成了協議。在休战期間进行的和談破裂以后，奥地利正式加入了反拿破侖的同盟。1813 年 8 月恢复了軍事行动。——第 165 頁。
- 181** “西班牙舰队”这一条目的初稿是由恩格斯大部分根据馬克思收集的材料編写的，馬克思寄給恩格斯的材料是他从各种資料中所作的附有評注的摘录。在馬克思的这些准备材料中有几段話，恩格斯一字不改地收入了本条目。馬克思收到恩格斯写好的稿子以后，校正了一些实际材料，把这个条目的最后定稿轉寄紐約。——第 168 頁。
- 182** 原文书名是«Expeditio Hispanica in Angliam. Vera Discrip-

tio», A. D. 1588. ——第 168 頁。

- 183 彼·帕斯·薩拉斯“我国元首唐·菲力浦国王命令在里斯本港口集結的最幸运的舰队。关于海輪的綜合报告” 1588 年里斯本版 (P. Paz Salas. «La felicissima armada que el rey don Felipe ñuestro Señor mando juntar en el Puerto de Lisboa. Relación sumaria de los nauios». Lisboa, 1588)。——第 168 頁。
- 184 原文手稿叫«Details of the English Force assembled to oppose the Spanish Armada»。——第 169 頁。
- 185 “来自爱尔兰的关于西班牙舰队从苏格兰海岸的北部島屿向西班牙航行中，在爱尔兰西海岸附近遭到損失和灾难的确实报道” 1588 年倫敦版 («Certaine Advertisements out of Ireland, concerning the losses and distresses happened to the Spanish Navie, upon the West coastes of Ireland, in their voyage intended from the Northerne Isles beyond Scotland, towards Spaine». London, 1588)。——第 171 頁。
- 186 在“艾阿庫裘”这一条目中对会战的叙述，是恩格斯使用馬克思收集的材料編写的，馬克思把这些材料連同 1857 年 9 月 21 日給恩格斯的一封信一起寄到曼彻斯特。条目的結尾部分是馬克思写的。这里对埃斯特罗及其拥护者的評述，同馬克思在 1854 年为“紐約每日論壇报”写的“埃斯特罗”一文（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0 卷第 401—408 頁）中所作的評述是一致的。——第 172 頁。
- 187 在 1824 年 8 月 6 日的胡宁（秘魯）会战中，玻利瓦尔指揮的哥倫比亚、智利和秘魯軍队勇敢地越过安第斯山脉，击败了西班牙軍队。这一会战发生在拉丁美洲各国反对西班牙殖民統治的解放斗爭的最后阶段。在斗爭的第一时期（1810—1815），解放运动导致某些独立共和国（委內瑞拉等国）的成立，但是由于它們彼此隔絕和克里奥洛貴族上层脱离人民，几乎又到处恢复了西班牙的統治。自 1816 年起开始了爭取独立的斗爭的新阶段。在过去的总督管轄地拉普拉塔宣告成立了独立共和

国。西蒙·玻利瓦尔重新恢复了争取委内瑞拉、新格拉纳达（哥伦比亚）、基多（厄瓜多尔）独立的战争，这一战争促使这些地区于1819—1822年建立大哥伦比亚共和国。1821年，墨西哥的解放战争重新恢复。在拉普拉塔（阿根廷）共和国军队的支持下，智利于1817年宣告独立，而秘鲁则于1821年宣告独立。玻利瓦尔的哥伦比亚军队于1824年为支援秘鲁共和国军队的进军，彻底打击了西班牙在拉丁美洲的统治。西班牙残余部队于1826年被赶出了秘鲁沿岸地区。独立战争的结果是，在过去西班牙统治的地方成立了独立共和国：墨西哥、中美合众国（后来分裂为五个共和国）、大哥伦比亚（后来分裂为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玻利维亚、阿根廷、巴拉圭、秘鲁和智利。——第172页。

- 188 指霍·塞·弗洛雷斯“埃斯帕特罗。他的军事和政治活动以及他当前的巨大成就的历史”（J. S. Florez: «Espanero. Historia de Su vida Militar y Política y de los grandes Sucesos contemporáneos»）。这部四卷集著作的第一版于1843年在马德里出版。马克思用的是第二版，第二版的第一卷和第二卷出版于1844年，第三卷和第四卷出版于1845年。

米·奥·普林西佩、R. 希龙、R. 萨托雷斯、阿·里博特“埃斯帕特罗：他的过去、现在和将来”1848年马德里版（M. A. Principe, R. Giron, R. Satorres, A. Ribot. «Espanero: su pasado, su presente, su porvenir». Madrid, 1848）。——第173页。

- 189 本条目的主要传记材料是马克思收集的。他还对全文作了最后校订和文字上的修饰。恩格斯在1857年9月22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对军事活动家布吕歇尔作了总的评价并评述了他在他所参加的主要战局中的行动。马克思把恩格斯的信中的这些意见写入了本条目的有关部分。这一评述经马克思用事实材料以及对军事长官布吕歇尔的活动更详细的分析加以补充后，就构成本条目的基本内容。恩格斯从本条目中引证的繆弗林所著关于1813年和1814年战局的一书（这本书也是马克思的主要参考资料）中所作的摘录，也证明他曾参加本条目的写作。——第174页。

- 190 指 1787 年普魯士在英国政府支持和資助下对荷兰的武装干涉。这次武装干涉的目的，是使总督奥倫治的威廉五世重新执政。后者在 1784 年由于革命运动而被逐出荷兰。这次革命运动旨在反对貴族和商业寡头的联盟，是由主張对殖民对手——英国进行积极斗争的資產階級政党“爱国者”领导的。荷兰資產階級的武装力量对恢复总督权力和寡头政治制度的普魯士軍隊沒有能够认真抵抗。——第 175 頁。
- 191 格·勒·布呂歇尔“1793 年和 1794 年战局日志”1796 年柏林版 (G. L. Blücher. «Kampagne-Journal der Jahre 1793 und 1794». Berlin, 1796)。
1794 年战局中，普魯士軍隊参加第一次反法兰西共和国的同盟軍隊作战，在摩塞尔河以南地区和莱茵河左岸 (普法尔茨) 获得了一定的战术上的胜利，但因同盟国英奧軍隊在比利时被击潰以及奧軍在德国西部败北，普軍司令部不得不在 1794 年秋天将它的軍隊撤到莱茵河右岸。——第 175 頁。
- 192 指 1795 年 4 月 5 日普魯士单独同法兰西共和国締結的巴塞尔和約。这个和約的簽訂是法軍胜利的結果，也是法国在外交上善于利用第一次反法同盟参加国之間的矛盾，首先是普魯士与奥地利之間的矛盾的結果。法国与普魯士媾和是反法同盟瓦解的开始。1795 年 7 月 22 日，西班牙在巴塞尔也同法兰西共和国单独簽訂和約。——第 175 頁。
- 193 “道德协会”——普魯士爱国团体之一，于 1806 年普魯士被拿破侖法国战败之后創立。它联合了自由貴族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代表。协会的宗旨是宣傳反拿破侖的解放战争的思想，支持在普魯士进行温和的自由主义改革。1809 年，对协会活动十分担心的普魯士国王应拿破侖的要求取締了协会。然而协会繼續秘密存在，直到拿破侖战争結束。——第 176 頁。
- 194 1813 年 5 月 26 日 (14 日)，布呂歇尔指揮的俄普軍隊派騎兵埋伏在海瑙城 (西里西亚) 附近，击潰了拿破侖軍隊的前卫。——第 176 頁。
- 195 見注 180。——第 176 頁。

- 196 繆弗林“我的生活中的事件以及对 1813 年和 1814 年战局的回忆”1853 年倫敦版第 225 頁(Müffling. «Passages from my Life, together with Memoirs of the Campaign of 1813 and 1814». London, 1853, p. 225)。从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摘录来看，他們使用的是繆弗林的书的上述英譯本。該书德文第一版于 1851 年在柏林出版。后面一段引文(在第 183 頁上)也是引自繆弗林的这本书(英文版第 327 頁)。——第 177 頁。
- 197 在 1813 年 8 月 26—27 日(14—15 日)的德勒斯頓会战中，拿破侖的軍队击败了奥地利元帅施瓦尔岑堡指揮的同盟国奥地利、普魯士和俄国軍队(波希米亚軍团，即主力軍团)。同盟国軍在会战中所以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施瓦尔岑堡没有采纳巴克萊-德-托利提出的反击拿破侖軍队的翼側的計劃。波希米亚軍团在困难条件下退却时受到俄軍后卫的成功的掩护。——第 178 頁。
- 198 萊茵联邦是 1806 年 7 月在拿破侖第一的保护下成立的德国南部和西部各邦的联盟。由于 1805 年击潰了奥地利，所以拿破侖能够在德国建立这种軍事政治堡垒。最初有 16 个邦(巴伐利亚、維尔騰堡、巴登等)参加这个联邦，后来又有 5 个邦(薩克森、威斯特伐里亚等)加入，它們实际上成了拿破侖法国的藩屬。这些邦的軍队都参加了拿破侖的侵略战争，包括 1812 年对俄国的战争。1813 年拿破侖的軍队失败后，联邦便瓦解了。——第 182 頁。
- 199 1814 年 2 月 4 日至 3 月 19 日，参加第六次反法同盟的同盟国代表同拿破侖第一的全权代表在夏提荣城(塞納河畔)举行和談。同盟国提出媾和的主要条件是拿破侖放棄法国征服的一切領土以及法国恢复到 1792 年的疆界。由于拿破侖坚决拒絕这个条件，和談破裂。——第 183 頁。
- 200 拿破侖的皇家近卫軍的新編部队自 1807 年起称为新近卫軍，以区别于以前編成的近卫部队，即所謂老近卫軍。对編入新近卫軍的兵士和軍官要求的条件較低，另一方面，新近卫軍是补充老近卫軍的固定后备部队。——第 183 頁。

- 201 指反法同盟战胜拿破侖后，第六次反法同盟的主要参加国（俄国、奥地利、英国和普魯士）同法国于1814年5月30日簽訂的巴黎和約。根据这个和約，法国丧失了自1792年以来征服的所有領土，仅边境附近的几个要塞和西薩瓦除外。这些地方后来根据第二个巴黎和約又从法国手中夺过来，第二个巴黎和約是在拿破侖短期重新执政和第二次被推翻后，原来那些战胜国同法国于1815年11月20日簽訂的。第二个巴黎和約使法国恢复到1790年1月1日的疆界。——第190頁。
- 202 大概是指下面这部著作：帕拉韦“关于亚洲和印度波斯古代发明的火药和火器的筆記”1850年巴黎版（Paravey. «Mémoire sur la découverte très ancienne en Asie et dans l'Indo-Perse de la poudre à canon et des armes à feu». Paris, 1850）。——第193頁。
- 203 指七世紀阿拉伯人征服美索不达米亚、伊朗、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和其他国家并建立阿拉伯伊斯兰教王国的时期。——第194頁。
- 204 恩格斯指拜占庭炼丹家馬可·格雷克的著作“制敌之火”。——第194頁。
- 205 指“罗吉尔·培根修道士論艺术和自然界的秘密以及論魔法的荒誕的信”（«Epistola Fratris Rogerii Baconis de secretis operibus artis et naturae, et de nullitate magiae»）。这一著作的写作時間，像作者的誕生年代一样，至今沒有确凿查明。在十九世紀軍事学术史方面的文献中，往往将这一著作的写作年代确定为1216年。在恩格斯的这一著作中也沿用这一年代。但根据后来的查考，这一著作是写于十三世紀四十年代。該书第一版于1542年在巴黎发行。——第194頁。
- 206 霍·安·孔代“阿拉伯人在西班牙的統治史，根据阿拉伯人的各种手稿和回忆录写成”1820—1821年馬德里版第1—3卷（J. A. Conde. «Historia de la dominación de los árabes en España, sacada de varios manuscritos y memorias arábicas». T. 1—3, Madrid, 1820—1821）。

1118年，阿腊貢国王阿尔丰斯一世的军队圍攻自712年以来被穆斯林侵占的薩拉哥沙城(阿腊貢)并收复了它。收复薩拉哥沙是雷允吉斯达(即收复八世紀初阿拉伯人侵入时期被阿拉伯人和非洲柏伯尔人(“摩尔人”)所侵占的比利牛斯半島領土)的一个阶段。在八至九世紀就已开始的雷允吉斯达中，西班牙的加斯梯里亚和阿腊貢两国以及葡萄牙起了主要作用。十二世紀下半叶，由于阿里莫哈德王朝侵入比利牛斯半島，雷允吉斯达曾一度停止。阿尔摩哈德是伊斯兰教的一个教派，它联合了周圍山地的柏伯尔部落，并且在其第一个伊瑪目-哈利发阿布德-艾尔-穆敏时期曾統治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摩洛哥和西班牙南部伊斯兰教地区。十三世紀初，加斯梯里亚和阿腊貢在其他国家的十字軍的支援下，击潰了阿尔摩哈德王朝并恢复了雷允吉斯达。1236年，加斯梯里亚人收复了哥多瓦——以前的哥多瓦伊斯兰教王国(于1031年崩潰)的首都，而到十三世紀末，伊斯兰教的統治地区只限于南部的格拉納达伊斯兰教国。西班牙人繼續同这个伊斯兰教国进行斗争，于1492年终于占領这个国家。恩格斯在后面提到的是雷允吉斯达历史中的一系列事件。——第194頁。

207 普魯士的德意志騎士是1190年十字軍远征时建立的条頓騎士团的騎士。十三世紀，騎士团通过征服和殘杀东普魯士的立陶宛居民而侵占了东普魯士，使东普魯士成为騎士团侵略波兰、立陶宛和俄罗斯各公国的堡垒。1237年，条頓騎士团和另一个德意志騎士团(即利沃尼亚騎士团，它也是在波罗的海沿岸建立的)合并。1242年楚德湖会战(冰上激战)以及1410年格吕沃尔德大战中，騎士团都被击败，于是逐渐衰落，后来仅保存了一小部分領地。——第195頁。

208 1495年7月6日在福尔諾沃(意大利北部)会战中，意大利北部封建国家的军队进攻法王查理八世的军队。法王查理的军队在对意大利进行掠夺性的征討之后，經過亚平宁山脉返抵法国。拥有强大的炮兵的法軍在会战中取得了胜利。这次会战发生在1494—1559年意大利战争(見注36)初期。——第197頁。

209 見注35。——第197頁。

- 210 在法国国王亨利二世联合德意志新教諸侯共同反对西班牙国王和德意志皇帝查理五世的战争时期，在1554年8月13日朗蒂（弗兰德）会战中，西班牙军队迫使法军撤除了对朗蒂城的围攻并退回法国边境。——第197頁。
- 211 西班牙对尼德兰的战争——見注38。——第198頁。
- 212 指在德国的三十年战争（見注39）中的瑞典时期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的军队和德意志帝国的军队之间的会战。1630年12月，古斯塔夫-阿道夫的军队逼近奥得河畔的格累芬哈根要塞，并在两次强攻之后迫使守军放棄了要塞。1631年4月，古斯塔夫-阿道夫的军队以猛攻夺取了奥得河畔法兰克福。在这两次会战中，瑞典炮兵起了很大的作用。——第200頁。
- 213 1709年9月11日馬尔普拉克（比利时）会战是1701—1714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見注67）中规模最大的会战之一。在这次会战中，英奥荷联军在薩瓦亲王奥伊根和馬尔波罗公爵的指揮下击败了維拉尔元帅的法军。——第201頁。
- 214 指圣雷米編的两卷集“炮兵学笔记”1697年巴黎版（《Mémoires d'Artillerie》. Paris, 1697）。文集中包括經過編者系統整理和校訂的法国炮兵軍官的許多著作。——第201頁。
- 215 卡·奥·斯特倫澤“炮兵学原理”1760年利格尼茨版（C. A. Struensee. 《Anfangsgründe der Artillerie》. Liegnitz, 1760）。格·弗·泰佩尔霍夫“普魯士炮手，或論炮彈的飞行——假定空气阻力与速度的平方成正比”1781年柏林版（G. F. Tempelhoff. 《Le Bombardier prussien ou du mouvement des projectiles en supposant la résistance de l'air proportionnelle au carré des vitesses》. Berlin, 1781）。——第203頁。
- 216 指夏恩霍斯特的著作：“炮兵手册”1804—1814年汉諾威版第1—3卷（《Handbuch der Artillerie》. Bd. 1—3, Hannover, 1804—1814）；“軍官手册——軍事学的实用部分。第一部分：炮兵”1787年汉

- 諾威版(«Handbuch für officiere, in den anwendbaren Theilen der Krieges-Wissenschaften. Erster Theil von der Artillerie». Hannover, 1787)。——第 203 頁。
- 217** 格·維加“射击教范(附射表)”1787年維也納版(G. Vega. «Praktische Anweisung zum Bombenwerfen mittelst dazu eingerichteter Hilfstafeln». Wien, 1787); 托·摩尔拉“炮兵論文”1784年塞哥維亞版(T. Morla. «Tratado de artilleria». Segovia, 1784); 約·哥·霍伊尔“常用炮兵辭典”1804—1812年杜賓根版(J. G. Hoyer. «Allgemeines Wörterbuch der Artillerie». Tübingen, 1804—1812); 弗·古·魯弗魯瓦“炮兵讲义”1811—1814年德勒斯頓版第1—3部(F. G. Rouvroy. «Vorlesungen über die Artillerie». Th. 1—3, Dresden, 1811—1814)。——第 203 頁。
- 218** 在第一次反法兰西共和国的欧洲同盟战争时期, 1793年9月14日在皮尔馬森斯(德国西部)会战中, 普魯士軍隊击败了法国摩塞尔軍团。在这次会战中, 普軍成功地使用了大量炮兵。——第 206 頁。
- 219** 馬克思在写本条目时使用的主要資料, 从保存下来的他的摘录来看, 有以下著作: 摩·瓦格納“阿特拉斯上空的三色旗, 或阿尔及利亚和法国的征服”1854年倫敦—紐約版(M. Wagner. «The Tricolor on the Atlas; or Algeria and the French Conquest». London—New-York, 1854); 丹·斯特恩“1848年革命史”1850年巴黎版第1卷(D. Stern. «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de 1848». Vol. 1, Paris, 1850)。可能馬克思还使用了关于毕若在阿尔及利亚活动的材料, 这些材料在恩格斯写的“阿尔及利亚”这个条目的初稿中曾引用过, 但在刊印时被百科全书編輯部删掉了(見注 90)。从恩格斯在1857年9月17日和22日給馬克思的信中可以看出, 恩格斯也曾为本条目收集过材料。——第 221 頁。
- 220** 奥尔达耳(卡塔卢尼亚)会战以及上述的圍攻战发生于1808—1814年比利牛斯半島的战争期間(見注 47)。——第 221 頁。
- 221** 百合花是波旁王朝的徽号。——第 221 頁。

- 222 百日——見注 155。——第 221 頁。
- 223 指法国軍隊为了鎮压 1820—1823 年西班牙第二次資產階級革命而对西班牙进行的武装干涉。西班牙国王斐迪南七世于 1822 年 7 月 7 日试图占領革命的馬德里遭到失敗以后，秘密請求神圣同盟（由沙皇俄国、奥地利和普魯士于 1815 年結成的欧洲君主的反动联盟）援助他鎮压革命。根据神圣同盟維罗那會議的決定，应由法国援助斐迪南。昂古列姆公爵指揮的法国軍隊于 1823 年进入西班牙，在該国恢复了专制制度，他們在西班牙一直駐留到 1828 年。——第 221 頁。
- 224 指巴黎工人和站到工人这一边的巴黎小資產階級阶层于 1834 年 4 月 13—14 日举行的反对資產階級七月王朝制度、爭取成立共和国的起义。巴黎事件是对当时在里昂爆发的强大的无產階級起义的响应，里昂起义还引起了法国其他一些城市的革命发动。正像里昂起义一样，巴黎起义也是由秘密組織——民主共和的人权社領導的。起义者的主力是巴黎工人，他們同政府的軍隊进行了两天殘酷的街垒战。与鎮压起义同时发生的是軍人集团的肆无忌惮的暴行和政府对于民主派的迫害。——第 222 頁。
- 225 塔弗納条約是毕若和阿布德-艾尔-喀德之關於 1837 年 5 月 30 日在塔弗納河地区簽訂的。1835 年法国殖民者破坏 1834 年同阿布德-艾尔-喀德所簽訂的和約，重新向他发动了战争，以夺取被他解放的阿尔及利亚西部。由于没有取得重大結果，同时又需要抽調兵力去鎮压阿尔及利亚东部爆发起义的地区，法国政府只得批准毕若所簽訂的新和約。根据塔弗納条約，法国被迫再次承认在阿尔及利亚西部地区（不包括法国控制的某些沿海城市——阿尔及尔、奥兰、阿尔澤等）阿布德-艾尔-喀德的国家的独立。1839 年，和約再一次被侵略者背信棄义地破坏了。阿尔及利亚人在阿布德-艾尔-喀德的领导下重新恢复了对法国侵略者的解放战争（关于这次战争見注 96）。——第 222 頁。
- 226 到 1844 年，毕若和其他的法国將領通过收买当地封建主和采取恐怖手段对付阿尔及利亚部落的方法，征服了阿尔及利亚西部。毕若以摩洛哥苏丹拒絕交出轉到摩洛哥的阿布德-艾尔-喀德为借口，率領軍隊侵

- 入摩洛哥領土。1844年8月，毕若通过背信棄义的进攻，在伊斯利河地区击潰了摩洛哥人的武装力量。同时，法国舰队毀坏了丹吉尔城和摩加多尔城。但是，在英国对在北非的法国領地扩大的趋势感到不安而进行干涉的威胁下，法国殖民者被迫暂时放棄对摩洛哥的占領。毕若根据1844年9月10日的丹吉尔条約，迫使苏丹逐走阿布德-艾尔-喀德和解散摩洛哥的边防部队，然后把自己的軍隊撤出了摩洛哥領土。——第223頁。
- 227** 毕若和基佐之間分歧的原因之一是，毕若想利用鎮压1845—1847年阿尔及利亚起义的机会，进一步侵占北非（他于1847年5月远征卡比利亚就是为了这一目的）和再度入侵摩洛哥。一贯实行掠夺殖民地政策的基佐政府当时怕毕若的行动会进一步加剧已經很尖銳的英法矛盾。——第223頁。
- 228** 指1848年2月24日七月王朝被推翻后所成立的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政府成員极大多数是温和的資產階級共和派。——第224頁。
- 229** 馬克思指在各个时期出版的毕若的著作，这些著作叙述法国殖民者在阿尔及利亚所进行的各次战争和对这个国家实行侵略和殖民化的計劃。——第224頁。
- 230** “玻利瓦尔-伊-龐特”这个条目是馬克思在拉丁美洲各国爭取独立的战争史(1810—1826)还没有被人深入研究的时期写的。当时相当流傳的是一些出于自私动机而参加这一战争的欧洲冒險家所出版的书籍和回忆录。他們中間有很多人在拉丁美洲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后来就对独立斗争进行歪曲。这一类书有：法国人杜庫德雷-霍尔斯坦的回忆录(这个人一度是玻利瓦尔的參謀长，后来成为他的私敌)，英国人希皮斯利的著作(这个人是从玻利瓦尔軍隊里开小差出来的)和“密勒將軍回忆录”(这是曾参加秘魯独立斗争的威廉·密勒的一本札記，但它已被他的兄弟約翰別有用心地修改过了)。这些书对拉丁美洲人民及其許多領導者所进行的运动作了极片面的評述。例如，在这些书中給玻利瓦尔硬加了許多捏造的坏品质（奸詐、傲慢和怯懦），而他确实存在的缺点（在他晚年依靠保守的貴族和僧侶的时候特別明显表现出来

的那种好摆排場和貪恋权力的作風)就更被大大夸張了。玻利瓦尔为反对联邦分离主义分子、爭取拉丁美洲各共和国統一而进行的斗争被說成是独裁意图的表现,此外还公然歪曲事实,如杜庫德雷-霍尔斯坦錯誤地硬說玻利瓦尔在 1810 年拒絕参加爭取委內瑞拉独立的斗争等等。

实际上,正如后来一些客观的研究所证实的,西蒙·玻利瓦尔在爭取拉丁美洲独立的斗争中起了卓越的作用,他在这个斗争中一个时候曾团結了克里奥洛地主(西班牙人血統的拉丁美洲人)中的爱国分子、資產階級和人民群众(包括印第安人和黑人)。玻利瓦尔的活动尽管有很大的矛盾,但仍然促使拉丁美洲許多国家摆脱了西班牙的压迫,并在这些国家里建立了共和政体,实行了某些进步的資產階級的改革。

馬克思除了上面提到的这些书以外没有别的資料,而这些书的作者所采取的偏袒态度当时知道的人也不多。因此馬克思对玻利瓦尔个人就不免有了片面的看法,这反映在他写的条目中。上述著作过分夸大玻利瓦尔追逐个人权力,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馬克思对玻利瓦尔的态度。在玻利瓦尔的政策中,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所坚决反对的波拿巴主义的特点非常明显。尽管如此,馬克思并没有忽視玻利瓦尔活动的进步的一面(例如他解放了黑奴),并且整个說来,对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反殖民主义运动評价很高,认为这是解放运动和革命运动。——第 225 頁。

- 231** 指宣布拿破侖皇帝为意大利王国国王的仪式,意大利王国于 1805 年在意大利北部成立,以代替被消灭的意大利(旧称南阿尔卑斯)共和国。拿破侖妻子的前夫的儿子欧仁·博阿尔奈被任为总督。——第 225 頁。
- 232** 1810 年 4 月 19 日在加拉加斯城推翻了殖民制度,成立了由克里奥洛地主、商人和知識分子的代表所組成的政府。在米兰达和玻利瓦尔领导的激进爱国社的影响下,1811 年 7 月 5 日在加拉加斯召开的議會宣告成立独立的委內瑞拉共和国。加拉加斯事件是在拉丁美洲其他国家中反抗西班牙殖民政权的信号。从墨西哥到智利,到处展开了拉丁美洲起义者同西班牙殖民主义者之間的斗争。在邻近委內瑞拉的新格拉納

达（現在的哥倫比亞），西班牙人的政权在首都波哥大、海港城市卡塔黑納和基多省（現在的厄瓜多尔）的同名首府被推翻了，但西班牙人的政权不久又在基多省的首府恢复。在委內瑞拉共和国于1812年7月覆灭以后，卡塔黑納成了为恢复委內瑞拉共和国而斗争的一个堡垒。在后来进行的斗争中，第二委內瑞拉共和国（1813年8月—1814年7月）的成立是个鮮明的事件，但斗争的結果在大部分殖民地（不包括拉普拉塔）暂时恢复了西班牙人的政权。这个时期民族解放力量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领导运动的克里奥洛地主实行了狹隘的阶级政策，他們沒有滿足农民的要求，仍然保持黑奴制度和不平等地对待印第安人。——第225頁。

- 233** 馬克思从1829年倫敦出版的“密勒將軍回忆录”第2卷第277、278頁（《Memoirs of General Miller》. Vol. II, London, 1829, p. 277, 278）引录了蒙特威尔德的話。在这本书（关于該书見注230）中对玻利瓦尔参加逮捕米兰达的动机作了片面的說明。从玻利瓦尔对蒙特威尔德的回答来看，他当时真誠相信米兰达可能叛变。——第226頁。
- 234** 引自杜庫德雷-霍尔斯坦“忆西蒙·玻利瓦尔”1830年倫敦版第1卷第170—171頁（H. L. V. Ducoudray Holstein. 《Memoirs of Simon Bolivar》. Vol. I, London, 1830, p. 170—171）。該书于1829年在紐約写成，在法国和英国用不同的书名出版。从馬克思的摘录中可以看出，他使用的是上述英譯本。——第228頁。
- 235** 新格拉納达联邦共和国是在新格拉納达各城市和省份进行反西班牙統治的起义之后于1813年成立的。共和国統一了控制在起义者手里的地区，这些地区根据联邦条約互相連結在一起，并承认新格拉納达国会的最高权力。由于西班牙人从本国获得大量增援部队而在兵力上占优势，以及各地区自治政府之間內部的紛爭，共和国于1816年覆灭。——第229頁。
- 236** 指海地共和国，它的成立是由于圣多明哥島（島的西部屬於法国，东部屬於西班牙，西班牙于1795年把东部让給法国）的黑奴和黑白混血种

人起义，以及他們从 1790 年起对法国、英国和西班牙殖民者不断进行解放斗争的結果。1804 年該島宣告独立，1806 年在島的西南部成立共和国。——第 231 頁。

237 H. L. V. Ducoudray Holstein. «Memoirs of Simon Bolivar». Vol. II, London, 1830, p. 10—11. ——第 232 頁。

238 指的是委內瑞拉起义軍和在新格拉納達的西班牙軍隊之間的會戰。在 1816 年宣告成立第三委內瑞拉共和国以后，玻利瓦尔領導的委內瑞拉爱国者繼續为委內瑞拉的解放进行斗争，于 1819 年 5—7 月进行了通过安第斯山脉到新格拉納達的解放进军。8 月 7 日在波亚卡河地区发生了决战；西班牙軍隊在决战中被击潰。玻利瓦尔軍隊的胜利使新格拉納達大部分地区获得了解放，并于 1819 年 12 月成立了大哥倫比亚联合共和国。加入联合共和国的有委內瑞拉、新格拉納達，而基多（厄瓜多尔）在赶走西班牙人以后于 1822 年也加入了大哥倫比亚联合共和国。——第 235 頁。

239 累翁島的革命 是由里埃哥和基罗加上校領導的有革命情緒的軍官于 1820 年 1 月在累翁島南部发动的反西班牙专制制度的起义，他們的口号是恢复 1812 年宪法（这一宪法在 1814 年被斐迪南七世的政府廢除）、取消宗教裁判所和召开議會。起义的領導者利用了政府为鎮压拉丁美洲的爱国者而調集到加迪斯（累翁島的港口城市）地区的远征軍兵士的不滿情緒。累翁島事件是西班牙第二次資產階級革命（1820—1823）的开端，这次革命遭到国内反动势力和法国干涉軍的鎮压（見注 223）。革命失敗的原因之一是，夺得政权的資產階級沒有滿足农民群众的土地改革的根本要求，从而使农民群众脫离了革命。1820—1823 年的革命打击了西班牙专制制度，粉碎了西班牙派遣龐大武装力量去美洲的西班牙殖民地鎮压蓬勃的民族解放运动的計劃。——第 236 頁。

240 草原牧民 是居住在南美北部草原上的自由牧民，大部分是印欧混血种人。西班牙代理人博韦斯利用草原牧民对克里奥洛地主的敌視态度，招募他們参加軍隊，这支軍隊在 1813—1814 年与委內瑞拉和新格拉納

- 达的爱国者作战。1816年，草原牧民的队伍在他们的新的领袖印欧混血种人帕埃斯的领导下，加入了答应给农民分土地的玻利瓦尔的解放军。草原牧民的骑兵参加了玻利瓦尔军队的许多次会战，其中包括上述1821年6月24日的胜利的卡拉博博会战，由于这次会战，西班牙人几乎完全被赶出委内瑞拉。——第236頁。
- 241 1821年，西班牙殖民政权在中美一些地区（西班牙的鎮守司令区危地馬拉）由于当地爱国者的起义而被推翻。这些地区的拉丁美洲国家宣告独立，在短时期归并于墨西哥以后，于1823年成立联邦即中美合众国，这个联邦于1839年分裂为5个共和国：危地馬拉、洪都拉斯、薩尔瓦多、尼加拉瓜和哥斯达黎加。巴拿馬（新格拉納达总督管轄地的組成部分）由于1821年的起义而加入了大哥倫比亚共和国。——第237頁。
- 242 指玻利維亞制宪會議于1826年秋天通过的玻利維亞共和国的宪法。
Code Napoléon（拿破侖法典）是拿破侖于1804年公布的民法。恩格斯称它为“資產階級社会的經典法律全书”。这部法典对已經走上資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欧洲許多国家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的立法影响很大。——第238頁。
- 243 巴拿馬大陆會議于1826年6月22日至7月25日举行。會議通过了拉丁美洲各共和国“永久邦联”的決議、互相防御条約和軍事协定。但是會議的决定没有得到任何一个拉丁美洲共和国的批准。同召开會議有关的建立拉丁美洲联邦的計劃，正像后来由玻利瓦尔提出的規模較小的成立“安第斯联邦”（由他統治的三个共和国——秘魯、玻利維亞和大哥倫比亚組成）計劃一样，由于缺乏实现計劃的經濟前提以及拉丁美洲各国的地主資產階級集团之間互相冲突而遭到破产。在拉丁美洲国家本身，統治階級內部各个集团之間发生了斗争。随着这些矛盾的尖锐化，玻利瓦尔的政权于1827年在秘魯和1828年在玻利維亞被推翻了，而大哥倫比亚也由于委内瑞拉于1829年和厄瓜多尔于1830年脱离它而瓦解。——第238頁。
- 244 H. L. V. Ducoudray Holstein. «Memoirs of Simon Bolivar».

Vol. II, London, 1830, pp. 232—236. ——第 241 頁。

- 245 书目是馬克思按照查·德納的要求附在条目里的(見馬克思于 1858 年 2 月 14 日給恩格斯的信和查·德納于 1858 年 1 月 25 日給馬克思的信)。在这个书目中有杜庫德雷-霍尔斯坦的著作的法文本(«Histoire de Bolivar, par le général Ducoudray Holstein; continuée jusqu'à sa mort par Alphonse Viollot». Tt. I—II, Paris, 1831.)。在对第二本书的說明中有一个因疏忽而产生的錯誤:該书的作者是約翰·密勒,但是在秘魯共和国軍隊中服务的不是他,而是他的兄弟——威廉·密勒將軍,这本书是以后者的名义写的。正确的书名是: J. Miller. «Memoirs of General Miller, in the Service of the Republic of Perú». Vol. 1—2, London, 1828—1829. 第三本书的全名是: 古·希皮斯利“南美俄利諾科河和阿普雷河地区远征記; 远征軍于 1817 年 11 月离开英国而加入委內瑞拉和加拉加斯的爱国者的队伍” 1819 年倫敦版 (G. Hippiisley. «A 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to the Rivers Orinoco and Apure, in South America; which sailed from England in November 1817, and joined the Patriotic Forces in Venezuela and Caraccas». London, 1819)。——第 241 頁。
- 246 指法国反对第二次欧洲国家同盟战争时期于 1800 年 12 月 3 日发生的霍根林登(巴伐利亚)会战。在这次会战中,莫罗指揮的法国軍隊击败了約翰大公的奥地利軍隊。——第 242 頁。
- 247 克勞塞維茨在他的“論战争”(«Vom Kriege»)一书的第二部分开头說明了这一思想。該书第一版于 1832—1833 年在柏林出版。——第 242 頁。
- 248 “美国新百科全书”編輯部在該条目的末尾补充了一些关于美国馬枪改进的情况,并举出了該条目写成以后出現的一些事实。——第 246 頁。
- 249 1854 年英国軍隊采用的恩菲耳德式步枪像法国的米涅式步枪(1849)一样,都运用擴張式彈丸的原理:底部掏空的彈丸通过枪口部分进入膛,在射击时彈丸由于火药的作用而擴張,然后被压进膛綫,膛綫使彈

丸具有旋轉运动。——第 246 頁。

250 指北美殖民地爭取独立的战争(見注 44)。——第 247 頁。

251 見注 56。——第 248 頁。

252 恩格斯在写“霰彈”这一条目的同时，还对它最靠近的術語 «cartouch» 写了一个短条目。下面是在 1859 年出版的“美国新百科全书”第 4 卷上刊印的这个短条目的原文(可能已被删节)：

“*Cartouch*(法文是 *cartouche*)这一術語在旧的軍事著作中有时作为‘霰彈’的同义詞使用。在其他場合这个術語还用来表示步兵的子彈盒。

在建筑和雕塑中，«cartouch» 是檐口的砌体或裝飾橫撐，以及一般上面刻有某种标志或題詞的各种浮雕裝飾物。”——第 249 頁。

253 在 1701—1714 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期間，法国元帅維拉尔指揮的法国和巴伐利亚联軍于 1703 年 9 月 20 日在霍赫施泰特会战中击败了奥地利軍队。——第 257 頁。

254 恩格斯在“博罗迪諾”这一条目中，清楚地說明了这次大会战的巨大規模和双方軍队在会战中所表現的頑强和坚毅精神，并且比許多西欧軍事历史著作的作者更客观地描述了这次会战的經過，但是在闡述这一事件的某些方面不免有不确切的地方。德国历史学家伯恩哈尔迪写的論托尔將軍一书在这方面对恩格斯的观点有一定的影响。恩格斯在本条目的末尾提到这本书，而这本书里包含托尔本人和他的傳記作者的許多片面看法。恩格斯写的这一条目中的不确切地方主要是对会战結果的估价(恩格斯傾向于认为这次会战对拿破侖軍队來說是一次胜利的会战)，以及对俄軍总司令米·伊·庫图佐夫在这次会战中的作用的估价。庫图佐夫所选定的陣地和俄軍的部署决不是像条目中所說的那样是錯誤的。俄軍的左翼最为薄弱，但庫图佐夫在会战中巧妙地使用了他所留下的大量預备队，可靠地支援了俄軍左翼。拿破侖被迫放棄迂迴俄軍左翼而把主攻方向轉移到俄軍陣地中央附近，其原因就在这里。庫图佐夫在会战中不是被动的，他不断地影响会战的进程，他打乱和打破了拿破侖的計劃。俄軍騎兵根据庫图佐夫的命令成功地襲击法

軍左翼的后方从而減弱了法軍的压力，特別鮮明地证明了这一点。这次会战的总的結局对拿破侖是极为不利的。他未能消灭俄軍的主力，而自己却遭到巨大的損失。会战表明，俄軍不仅能够坚守陣地，而且能够进行歼灭性的打击。会战的結果为战争朝着有利于俄国方向轉变和拿破侖軍隊失败准备了条件，在当时条件下俄軍放棄莫斯科尽管是被迫的，但是合适的。

后来經過研究調查对有关双方兵力和損失的資料也作了重大的更正。根据这些資料，法軍在会战时有 135 000 人和 587 門火炮，俄軍有 120 000 人和 640 門火炮；法軍死伤 58 000 人，俄軍損失約 40 000 人。——第 258 頁。

255 見注 74。——第 259 頁。

256 指庫图佐夫为了迂迴法軍左翼的进攻部队而派烏瓦罗夫的騎兵軍和普拉托夫的哥薩克軍进行襲击。俄国騎兵在法軍的側翼和后方出現，迫使拿破侖停止在中央的攻击，这就使庫图佐夫有可能重新部署兵力来反击拿破侖以后的攻击。——第 261 頁。

257 指泰·伯恩哈尔迪“俄罗斯帝国步兵上将卡尔·弗里德里希·托尔伯爵生平事迹”1856年萊比錫版第1—4卷(Th. Bernhardi. «Denkwürdigkeiten aus dem Leben des kaiserl. russ. Generals von der Infanterie Carl Friedrich Grafen von Toll». Bd. 1—4, Leipzig, 1856)。——第 263 頁。

258 在比利牛斯半島战争(1808—1814)期間，威灵頓指揮的同盟国英国、西班牙和葡萄牙軍隊在 1813 年 6 月 21 日的維多利亞会战中，击败了約瑟夫·波拿巴的法国軍隊。这次会战是爭取比利牛斯半島摆脱拿破侖軍隊控制的斗争中的重要阶段。——第 264 頁。

259 这里刊載的示意草图是弗·恩格斯根据对 1813 年比达索阿河地区会战的記述和这些会战的計劃而画的，取材于 1840 年倫敦出版的威·弗·帕·納皮尔“1807 年至 1814 年比利牛斯半島和法国南部的战争史”第 6 卷附录 5 (W. F. P. Napier. «History of the War in the Peninsula and in the South of France from the year

- 1807 to the year 1814». Vol. VI, London, 1840. Explanatory Sketch № 5)。在恩格斯的草图中作了如下标记：烏罗尼埃、魯涅、长褲汉、普埃托、巴荣訥特、霍格斯巴克、科米薩里、克魯瓦-德-布克、比里阿图、比耳多克斯、曼达累、貝腊、薩利納斯、伊龙、圣馬尔西亚耳、累薩卡、阿亚山。右下角写有“比达索阿战场”的字样。——見第 268—269 頁間的插图。
- 260 指公元 300 年左右編写的一本名叫“安敦尼旅行指南”(«Itinerarium Antonini»)的书；在这本书中指明了羅馬帝国最重要的交通綫、交通綫上的地点以及它們之間的距离。——第 271 頁。
- 261 阿·戈尔盖“1848—1849 年我在匈牙利的生活和活动”1852 年萊比錫版 (A. Görgei. «Mein Leben und Wirken in Ungarn in den Jahren 1848 und 1849». Leipzig, 1852)；格·克拉普卡“回忆录。1849 年 4—10 月”1850 年萊比錫版 (G. Klapka. «Memoiren. April bis Oktober 1849». Leipzig, 1850)。——第 271 頁。
- 262 洪韦德——見注 129。——第 273 頁。
- 263 約瑟夫·弗拉維“犹太战争”第 3 册第 5 章。
在由犹太人反羅馬人統治的起义引起的犹太战争 (公元 66—73 年) 期間，羅馬統帥弗拉維·韦斯帕西安于公元 68—70 年圍攻耶路撒冷，在韦斯帕西安称帝以后，圍攻战由他的儿子梯特指揮。羅馬人占領了城牆，被圍者在耶路撒冷的神庙和城內街道上进行了長時間的抵抗。——第 276 頁。
- 264 利未人 是古犹太人神职人員的特別等級。
会幕——据聖經上的傳說，是一种流动神庙。
在聖經中記述了以色列人的营地，見摩西第四經民数記第 1—2 章。——第 278 頁。
- 265 占卜官——古羅馬的祭司，他們在政治生活中起很大作用；在国家采取每一个重要行动之前，他們都要依据鳥鳴和鳥飞等等来占卜凶吉。
日晷——古代的天文仪器。——第 279 頁。

- 266 指公元前 101 年韦尔切利（意大利北部）的会战，在这次会战中，羅馬統帥馬利烏斯战胜了日耳曼部落基姆布利人。这一胜利結束了羅馬人同多次入侵高卢南部与意大利的基姆布利人和条頓人的斗争（公元前 113—101 年）。——第 280 頁。
- 267 所列举的一系列战事发生于 1672—1679 年法国联合英国（英国于 1674 年脫离联盟）和瑞典对荷兰、西班牙和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战争时期。这次战争是由法国和荷兰之間进行商业竞争和路易十四企图侵占尼德兰南部（屬于西班牙）和北部引起的，战争的結果是：路易十四王朝夺得西班牙領地，扩充了領土，但是法国人沒有达到击潰荷兰这个主要目的。——第 281 頁。
- 268 尼姆韦根和約 是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政府 1678 年同荷兰和西班牙以及 1679 年同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簽訂的和約，这个和約結束了自 1672 年开始的这些国家同法国之間的战争。根据这个和約，法国获得了弗兰契康帖和西屬尼德兰的几个城市，并把战时所占领的馬斯特里赫特城堡和奧倫治王室的世襲土地归还給荷兰；荷兰則承认法国在圭亚那和塞內加尔侵占的殖民地。——第 281 頁。
- 269 指 1688—1697 年法国同欧洲同盟之間的战争头三年的軍事行动，欧洲同盟就是所謂的奧格斯堡同盟，其成員有荷兰、英国、西班牙、以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为首的德意志帝国、薩瓦、瑞典以及德意志和意大利的一些諸侯。战争于 1697 年以簽訂里斯維克和約而告終，和約确认作了某些变更的战前疆界。法国应承认英国 1688 年的政变，这次政变使法王路易十四的敌人荷兰总督奧倫治的威廉登上英国的王位。
下面提到的是这次战争以后几年的事件。——第 282 頁。
- 270 1701—1714 年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見注 67。——第 282 頁。
- 271 M. Coehoorn. «Nieuwe Vestingbouw». Leeuwarden, 1685.
——第 282 頁。
- 272 教皇党人 和 保皇党人 是十二世紀至十五世紀羅馬教皇和德意志皇帝进行斗争期間在意大利成立的两个政党。教皇党人是教皇的拥护者，

- 是意大利城市中商业手工业阶层的上层。保皇党人主要是拥护皇帝的封建貴族的代表人物。——第 286 頁。
- 273** 指波拿巴將軍在意大利北部作战期間，法国軍隊于 1797 年对威尼斯的占領，这一占領招致威尼斯共和国（成立于五世紀）的灭亡，法国和奥地利根据康波福米奧条約（見注 151）瓜分了它的領土。——第 286 頁。
- 274** 英国殖民主义者从十九世紀初开始征服緬甸。第一次緬甸战争（1824—1826）的結果，东印度公司的軍隊占領了与孟加拉交界的阿薩姆省以及沿海的阿拉干和典那沙冷，根据 1826 年 2 月 24 日簽訂的英国人强加于緬甸人的楊端波条約，上述地区脫离緬甸。按照这个条約的規定，緬甸还賠款 100 万英鎊。第二次緬甸战争（1852）的結果，英軍占領了勃固省。——第 287 頁。
- 275** H. Yule. «A Narrative of the Mission sent by the Governor-General of India to the Court of Ava in 1855». London, 1858. ——第 294 頁。
- 276** 恩格斯写的这一条目的初稿經馬克思作了重要补充后，作为定稿寄到紐約。从馬克思和恩格斯所作的摘录以及恩格斯于 1858 年 3 月 11 日給馬克思的信中可以看出，他們为写这一条目，从各种資料中收集材料。恩格斯主要是利用納皮尔写的关于比利牛斯半島的战争一书（見注 259），而馬克思則利用各种参考书和百科全书。——第 296 頁。
- 277** 列举的是英国几次征服殖民地的远征，貝雷斯福德参加了这些远征。
- 1806 年，英国利用当地荷兰移民布尔人的反荷兰殖民政权的起义，占領了好望角（海角殖民地）周圍的南非土地。他們以荷兰（当时拿破侖的附庸）参加拿破侖反英战争为入侵的借口。海角殖民地于拿破侖战争結束後正式归并英国。
- 1806 年，由波彭上尉和貝雷斯福德將軍指揮的英国远征軍企图夺取屬於西班牙（当时拿破侖法国的盟国）的布宜諾斯艾利斯。貝雷斯福德的队伍沒有遭到西班牙殖民政权的严重抵抗，而占領了布宜諾斯艾

利斯，但是后来被阿根廷爱国軍包圍而不得不投降。1807年英国人向拉普拉塔河口派出的新的远征軍也遭到了失敗。

貝雷斯福德的部队于1807年底借口保卫葡屬馬德拉島不受法国人的侵略而占領該島。英国人控制該島一直到1814年。——第296頁。

- 278** 辛特拉（葡萄牙）协定——英軍总司令达尔林普尔和法軍总司令茹諾于1808年8月30日在葡萄牙簽訂的軍事协定。根据协定，法国应从葡萄牙撤走自己的部队（这些部队于1807年秋天进入該地）。这个协定是1808年法軍被英葡軍队击败和比利牛斯半島到处爆发反拿破侖統治的人民起义胜利的結果。1808年夏天，法国占領軍几乎完全被赶出了西班牙。虽然法軍的处境危急，但是根据协定条款，英国有义务用自己的軍舰把茹諾的部队送回法国。茹諾的这些部队回法国后被拿破侖編在二十万軍队里，这支軍队1808年11月由拿破侖率領再度入侵比利牛斯半島。

在法軍再度入侵比利牛斯半島期間，穆尔將軍指揮的撤退的英国軍队于1809年1月16日在科魯尼亞（西班牙）击退了苏尔特元帅的部队的进攻，并在貝雷斯福德师的掩护下于1月17日和18日在科魯尼亞港搭上舰船，开往英国。——第296頁。

- 279** 指比利牛斯半島战争（1808—1814）后期的几次会战，在这几次会战中由威灵頓指揮的同盟国英国、西班牙和葡萄牙軍队击败了法軍。

在1812年7月22日薩拉芒卡会战中，威灵頓的部队击退了遭到巨大損失的馬尔蒙元帅的軍队。在1813年6月21日維多利亞会战（見注258）之后，法軍主力被逼退到比利牛斯山脉，到1813年底，战争轉到法国領土上了。在1813年12月9—13日貝云（法国西南部）城郊的战斗中，威灵頓的部队向苏尔特元帅的軍队的营垒进攻，迫使法軍后退。

1814年春天，第六次反法同盟的軍队在法国发动总攻期間，威灵頓的进攻部队于2月27日在奥尔特兹和4月10日在土魯斯战胜了苏尔特的軍队。4月18日在拿破侖退位以后，苏尔特同威灵頓簽訂了休战协定。——第297頁。

- 280 指貝雷斯福德参加鎮压 1817 年在巴西东北部的佩囊布庫省爆发的反葡萄牙殖民主义者的民族解放起义。宣布为成立独立的共和国而斗争的起义者遭到了失败。后来领导争取脱离葡萄牙的运动的土地贵族分子于 1822 年宣告成立独立的巴西帝国，他们在巴西保持了反动的君主制度和黑奴制。——第 297 頁。
- 281 指貝雷斯福德帮助唐·米格尔亲王领导的葡萄牙反动的地主教权派鎮压 1820—1823 年的葡萄牙资产阶级革命。1823 年 5 月受英法外交使节的反革命将军和军官发动叛乱，在葡萄牙恢复了君主专制和封建制度。——第 297 頁。
- 282 指托·霍普的小说：“阿納斯塔西烏斯，或希腊人的回忆录（写于十八世纪末）” 1819 年伦敦版第 1—3 卷（《Anastasius: or Memoirs of a Greek; written at the close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Vol. I—III, London, 1819）。——第 297 頁。
- 283 意大利是迦太基统帅汉尼拔进行第二次布匿战争（公元前 218—201 年）的主要战场。公元前 218 年，汉尼拔率领雇佣军队由西班牙出发越过阿尔卑斯山向意大利北部进军。公元前 218 年 10 月，汉尼拔在提契諾河打败了前去迎战的执政官的军队之一的先头部队，同年 12 月又在特雷比亚河击溃了两支联合军队。汉尼拔突入意大利中部后，于公元前 216 年 8 月在阿普利亚的坎訥迎头击溃了罗马军队（恩格斯在下面详尽地叙述了这三次会战）。然而，罗马军队在西班牙和西西里的胜利以及它在北非的登陆，迫使迦太基元老院从意大利召回汉尼拔，从而使汉尼拔的胜利化为乌有。公元前 202 年，汉尼拔在扎馬会战中战败。战争以迦太基接受苛刻条件签订和约而告终。——第 301 頁。
- 284 布匿战争（公元前 264—241 年、218—201 年和 149—146 年）是古代两个最大的奴隶制国家——罗马和迦太基——为了确立在地中海西部的统治，为了争夺新的土地和奴隶而进行的战争。第一次布匿战争的结果，迦太基被迫把对西西里和附近岛屿的统治权让给了罗马。第二次布匿战争的结果，迦太基丧失了舰队和所有非洲以外的领地（西班牙、巴利阿里群岛等）并必须向罗马缴付巨额赔款。第三次布匿战争的

- 結果，羅馬人粉碎了迦太基的實力，消滅了迦太基國家；迦太基城被毀滅。——第 304 頁。
- 285** 指 554 年的卡西里努姆河（在意大利西南部的卡普亞城附近）會戰。在這次會戰中，拜占庭統帥納爾塞斯打敗了日耳曼部落法蘭克人和阿勒曼尼人。會戰一開始，法蘭克人便深深地插入拜占庭軍隊的中央，但後來，納爾塞斯的騎兵從翼側迂迴並從背後攻擊，結果被圍殲。納爾塞斯軍隊打退了法蘭克人和阿勒曼尼人的侵襲，並消滅了東哥特人的意大利王國（493—554 年）的殘余兵力（其主力早在同法蘭克人作戰前就已被摧毀），在短時期內在意大利確立了奴隸制的東羅馬帝國（拜占庭）的統治。——第 305 頁。
- 286** 德意志國王捕鳥者亨利希一世的軍隊在梅澤堡會戰（933 年）中以及他的繼位者奧托一世的軍隊在雷赫河會戰（955 年）中打敗了十世紀侵入德國領土的匈牙利人。這兩次勝利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亨利希一世改組了德國騎士隊而取得的。——第 305 頁。
- 287** 1241 年 4 月 9 日在利格尼茨（累格尼察）城附近的瓦爾施塔特會戰中，波蘭和德國封建主的聯軍被入侵中歐的蒙古征服者打敗（關於這次入侵見注 33）。——第 305 頁。
- 288** 在 1513 年 6 月 6 日的諾瓦拉（意大利北部）會戰中，為米蘭公爵服務的瑞士僱傭軍隊打敗了以騎士為主力的法軍，並迫使法軍越過阿爾卑斯山退回法國。因此，法國國王路易十二於 1513 年對意大利進行的侵略性征討就告失敗。這次征討是 1494—1559 年意大利戰爭期間外敵對亞平寧半島多次入侵中的一次（見注 36）。——第 307 頁。
- 289** 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在 1644 年 7 月 2 日馬爾斯頓穆爾（約克郡）會戰和 1645 年 6 月 14 日諾伊茲比（北安普頓郡）會戰中，議會軍擊潰了英國國王查理一世的反革命軍隊。在這兩次會戰中，克倫威爾統率的騎兵起了決定性作用。這支騎兵的核心是農民和手工業者組成的隊伍，他們有優良的戰鬥素質，嚴明的紀律和對革命職責的認識。這兩次會戰，特別是第二次會戰的結局，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議會軍在 1642—1646 年第一次內戰（見注 50）的勝利。——第 308 頁。

- 290 西里西亚战争是全欧性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見注 42）的一部分。它包括从弗里德里希二世侵入西里西亚起到他与奥地利人締結第一次单独和約为止的普奥战争（1740—1742），即第一次西里西亚战争以及从 1744 年 8 月重新爆发战争时起到弗里德里希二世締結新的单独和約为止的普魯士与奥地利及其同盟者薩克森之間的战争（1744—1745 年），即第二次西里西亚战争。这两次战争反映了普魯士和奥地利爭夺中欧霸权的斗争，弗里德里希二世的主要目的是掠夺并控制波兰富饒的西里西亚省。——第 309 頁。
- 291 恩格斯用自己的話引用了弗里德里希二世制定的各种守則中的一系列規定，如引自 1742 年 3 月 17 日的“騎兵战斗守則”，1742 年 3 月 21 日的“驃騎兵团团长和全体軍官守則”，1744 年 7 月 25 日的“騎兵軍官与敌人遭遇时的行动守則”，1748 年 8 月 14 日的“騎兵少将守則”等。——第 310 頁。
- 292 这里列举的是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40—1748）和七年战争（1756—1763）时期所发生的几次会战。在这几次会战中，騎兵的行动起了极大的作用。
- 1745 年 6 月 4 日在西里西亚的霍恩弗里德贝尔格会战（有时叫施特里高会战）中，普軍在弗里德里希二世的統率下打败了奥地利和薩克森联軍；1745 年 12 月 15 日在凱塞多尔夫（薩克森）会战中，普軍击潰了薩克森軍队，使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有可能与奥地利和薩克森在德勒斯頓簽訂和約，結束第二次西里西亚战争（見注 290）。
- 1757 年 11 月 5 日在罗斯巴赫（普魯士梅澤堡区）会战中，弗里德里希二世的軍队打败了法国以及同普魯士为敌的德意志各邦的联軍。
- 关于萊滕会战（1757 年 12 月 5 日），見注 117。
- 1758 年 8 月 25 日（14 日）在措尔恩多夫（东普魯士）附近，弗里德里希二世同俄軍作战，結果双方損失惨重，未分勝負。俄軍的抵抗，打破了弗里德里希二世关于各个击破敌人的計劃，并为后来俄軍的順利进攻准备了条件。——第 310 頁。
- 293 法兰西共和国反对第一次反法同盟的战争期間，1796 年 9 月 3 日在維

尔茨堡（巴伐利亚）会战中，奥軍在卡尔大公的統率下打敗了茹尔丹將軍的法軍，法軍被迫退到萊茵河西岸。奥軍使用大量騎兵作战对这次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第 310 頁。

294 华沙大公国 是拿破侖第一在 1807 年根据提尔西特和約划出早先归并普魯士的波兰領土的一小部分所建立的附庸国；1809 年，奥地利被击潰后，又把奥地利占有的波兰領土的一部分并入华沙大公国。根据 1814—1815 年維也納會議的決議，华沙大公国的領土被普、奥、俄三国瓜分。

萊茵联邦——見注 198。——第 311 頁。

295 1813 年 4 月 5 日（3 月 24 日）在薩克森的丹宁科夫（或默克恩）附近，同盟国俄普軍队在俄国將軍彼·赫·維特根施坦統率下打敗了欧仁总督的法軍。——第 312 頁。

296 W. F. P. Napier. «History of the War in the Peninsula and in the South of France from the year 1807 to the year 1814». Vol. III, London, 1831, p. 272. ——第 313 頁。

297 拉罗什-艾蒙“騎兵，或騎兵部队的編成、組織和訓練方面的必要改革”1828 年巴黎版第 1 部第 140 頁（La Roche-Aymon. «De la cavalerie, ou des changements nécessaires dans la composition, l'organisation et l'instruction des troupes à cheval». 1-re partie, Paris, 1828, p. 140）。——第 315 頁。

298 451 年在卡塔洛温平原（現在法国的馬尔納河岸夏龙城附近），阿梯拉率領的突厥族游牧掠夺者——匈奴人——与西羅馬統帥艾修斯率領的軍队展开了激战。艾修斯的軍队由日耳曼人、羅馬人、高卢人等族的兵士組成；阿梯拉的軍队中也有被匈奴人征服的欧洲很多部落的战士。匈奴騎兵击潰了艾修斯軍队的中央，但后来因翼側受到攻击，遭到很大伤亡而被迫撤退。艾修斯軍队获得了胜利，但由于內部不和而未能把匈奴軍队全部歼灭。

西帕依起义 是 1857—1859 年在印度反对英国統治的一次規模极大的人民起义。起义于 1857 年春天在孟加拉軍队中由当地居民編成

- 的所謂西帕依部队中爆发，并蔓延到印度北部和中部的广大地区。起义的基本动力是农民和城市的貧苦手工业者。本地的封建主所领导的这次起义，由于印度的封建割据、宗教和种姓的区别以及殖民者在軍事上和技术上的优势而遭到失敗。——第 320 頁。
- 299** 見拿破侖回忆录“对 1816 年巴黎出版的‘論軍事学术’一书的十七条意見”，第三条意見：騎兵。刊載于《Mémoire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de France, sous Napoléon, écrits à Sainte-Hélène, Par les généraux qui ont partagé, sa captivité, et publiés sur les manuscrits entièrement corrigés de la main de Napoléon》. Tome premier, Paris, 1823, p. 262 (书名的翻譯見注 71)。——第 320 頁。
- 300** 1815 年 6 月 18 日在滑铁卢会战（見注 54）中，德尔隆將軍所統率的一个軍奉拿破侖的命令以它的 4 个师（每师編成 1 个纵队）向威灵頓的同盟国軍左翼攻击。纵队中各营前后配置。这种队形在一开始攻击时就使該軍損失了很大一部分。——第 323 頁。
- 301** 比利牛斯半島战争（1808—1814）期間，1812 年 7 月 23 日在加尔西亚-埃尔南迪斯会战中，編入威灵頓的英国軍队的德意志軍团的騎兵襲击了在薩拉芒卡会战（見注 279）中失敗而后退的法軍的后卫，这支騎兵突破并冲散了步兵的方队，捕獲了数百名俘虏。——第 325 頁。
- 302** “美国新百科全书”編輯部在 1859 年将本条目刊載于百科全书第七卷时，附上了美国已有的和正在修建的筑城工事一覽表，該表根据 1859 年 10 月的材料制成。在表內还注明用于建筑、修理和改进这些工事的費用。——第 327 頁。
- 303** 指德国工程师丹·斯佩克尔和他的著作：“要塞建筑学” 1589 年斯特拉斯堡版（《Architectura von Vestungen》. Strassburg, 1589）。——第 329 頁。
- 304** 指 1554 年在威尼斯出版的尼·塔尔塔利亚的著作：“各种研究和发明”（《Quesiti et inventioni diverse》）第 6 册。該书第一版于 1546

- 年在威尼斯发行。——第 334 頁。
- 305 加·阿尔吉西“論筑城”1570 年威尼斯版 (G. Alghisi. «Delle fortificationi». Venetia, 1570); 吉·馬吉和札·卡斯特里奥托“論城市筑城”1564 年威尼斯版 (G. Maggi e J. Castriotto. «Della fortificatione delle città». Venetia, 1564)。——第 335 頁。
- 306 見注 38。——第 338 頁。
- 307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4)期間,在法国人手中的兰道要塞(德国西部)于 1702 年受到德意志帝国軍队圍攻并被占領。1703 年法国人又占領这座要塞,次年帝国軍队再次圍攻該要塞,經過三个月的圍攻,要塞被迫投降。1713 年兰道城又被法軍占領。——第 343 頁。
- 308 指 1683 年 7 月抵御土耳其軍队圍攻的維也納防御战。这次防御战以 1683 年 9 月 12 日奧、德、波联軍击潰土耳其軍队而告終。在这次击潰土軍的战斗中,由揚·薩比斯基率領前来援救奥地利首都的波兰軍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維也納会战阻止了土耳其軍队向中欧推进。——第 344 頁。
- 309 蒙塔郎貝尔在筑城方面的主要著作是“垂直筑城即研究直綫、三角、四角及各种多角形筑城方法的經驗”1776—1786 年巴黎版第 1—5 卷 («La Fortification perpendiculaire, ou Essai sur plusieurs manières de fortifier la ligne droite, le triangle, le quarré et tous les poligônes». Tt. 1—5, Paris, 1776—1786)。——第 346 頁。
- 310 馬克西米利安式塔樓是 1828—1836 年按奥地利大公馬克西米利安·德斯特的專門設計修筑在林茨城周圍的 32 座塔樓。这些塔樓是准备用作独立堡垒来进行防御的。——第 347 頁。
- 311 崩采耳維茨营垒是构筑在西里西亚的野战筑城工事,是七年战争(1756—1763)时期根据普魯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命令从 1760 年开始修建的。1760—1762 年間弗里德里希二世的軍队曾数次在該营垒内进行防御,抵抗俄国軍队和奥地利軍队。

托列斯-維德拉斯(托列治-維德拉什,在里斯本附近)營壘是1810年根据威灵頓的命令修建的,它用来掩护英葡軍隊抵抗法軍。这一營壘有三列坚固的工事,在比利牛斯半島战争(1808—1814)中起了重要的作用;1810—1811年,依靠这座營壘阻止了馬森納元帅的法軍对里斯本的进攻。

法国魏森堡防綫(亚尔薩斯)是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4)时期由維拉尔元帅的軍隊于1706年修建的。維拉尔元帅的軍隊曾在这里进行防御,抵抗德意志帝国的軍隊。以后,科尔蒙太涅将这一防綫加以改进。在法兰西共和国反对第一次反法同盟的战争(1792—1797)期間,法軍和奧軍曾为爭夺这一防綫进行过特別激烈的战斗。

关于維罗那前面的奧軍工事及其在1848年奥地利反革命軍隊对皮蒙特軍隊作战时的作用,見弗·恩格斯的著作“波河与莱茵河”和“奥地利如何控制意大利”(“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247—299頁和第213—220頁)。——第352頁。

- 312 1848—1849年匈牙利人反对奥地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时期,匈牙利軍隊于1849年7月2日和11日凭借科莫恩(科馬罗姆)要塞的營壘两次抗击了奧軍的優勢兵力。要塞本身于1849年两次(1—4月和7—9月)抵御了长期的圍攻,直到9月27日才被奧軍攻占。——第353頁。
- 313 多立斯人是古希腊部落的主要集团之一,于公元前十二至十一世紀从北方移居到伯罗奔尼撒半島和爱琴海南部島屿。与早先定居在希腊的部落(亚該亚人、伊奥尼亚人、伊奥利亚人)比較,多立斯人在社会制度方面保持較多的古老的父权制特点。然而原始公社制的瓦解,使得多立斯人也分化出了氏族貴族,在公元前八至六世紀形成了奴隶制国家,其中以斯巴达为最强大。——第354頁。
- 314 珀里俄科——見注13。——第354頁。
- 315 希腊波斯战争——見注7。——第355頁。
- 316 赫罗泰——見注14。——第355頁。
- 317 伯罗奔尼撒战争——見注11。——第355頁。

- 318** 薩姆尼特戰爭(公元前 343—341 年、約 327—304 年和 298—290 年)是在羅馬爭奪意大利中部統治權的鬥爭時期羅馬人和薩姆尼特人(居住在亞平寧中部山區的意大利部落集團)之間的戰爭。戰勝薩姆尼特人是鞏固羅馬奴隸制國家和使意大利各部落統一於羅馬政權之下的重要里程碑。——第 359 頁。
- 319** 指波利比烏斯的“四十卷通史”第 6 卷。
布匿戰爭——見注 284。——第 359 頁。
- 320** 1339 年 6 月 21 日在勞平(伯爾尼附近)會戰中,由自由農組成的瑞士步兵擊敗了奧、德、意封建主的同盟軍。這次會戰是瑞士各州爭取獨立的鬥爭(見注 34)的重要階段。——第 366 頁。
- 321** 指 1481—1492 年加斯梯里亞和阿臘貢聯合王國(西班牙君主國)對格拉納達伊斯蘭教國進行的戰爭,這次戰爭是從摩爾人手中奪回比利牛斯半島,即雷克吉斯達(見注 206)的結束階段。這次戰爭以西班牙人占領格拉納達而告終。——第 367 頁。
- 322** 邊屯區——見注 41。——第 376 頁。
- 323** 1775 年 4 月 19 日在累克辛頓和康克德(馬薩諸塞),英國正規部隊被成散開隊形作戰的美國起義者打敗。這次戰鬥揭開了英國北美殖民地爭取獨立的戰爭的序幕。——第 376 頁。
- 324** 指 1859 年 4 月 29 日到 7 月 8 日法國和撒丁王國(皮蒙特)為一方與奧地利為另一方進行的戰爭。這次戰爭是拿破侖第三發動的,他力圖在“解放”意大利的幌子下掠奪土地並依靠有成效的“局部性”戰爭在法國鞏固波拿巴政體。意大利大資產階級和自由貴族則指望依靠戰爭使意大利在沒有人民群眾參加的情況下統一於統治皮蒙特的薩瓦王朝的政權之下。然而拿破侖第三躡於廣泛開展的反對意大利壓迫者——奧地利王朝的民族解放運動,力圖保持意大利政治上的分裂局面,擔心戰爭繼續打下去會招致軍事上的困難,所以在法國皮蒙特軍隊獲得幾次勝利後,於 7 月 11 日背着撒丁與奧地利單獨締結了維拉弗蘭卡和約。戰爭的結果,法國得到了薩瓦和尼斯,倫巴第歸併於撒丁。威尼斯地區仍

归奥地利人管轄。

特罗塔“关于迄今使用的远射程小型火器对步兵战斗行动的影响问题的研究”1857年維登堡版(Trotha. «Beitrag zur Erörterung der Frage: Welchen nothwendigen Einfluß haben die bis jetzt gebräuchlichen weittragenden Handfeuerwaffen auf das Gefecht der infanterie?» Wittenberg, 1857)。——第381頁。

- 325 “美国新百科全书”編輯部在本条目末尾附加了一段叙述美国海軍从1775年起发展情况的資料。其中引用了到百科全书第十二卷出版时(1861年)为止有关美国海軍編成的資料。恩格斯写的这个条目載于“美国新百科全书”第十二卷,是在該卷出版前几个月写成的。——第382頁。
- 326 公元前264—241年的第一次布匿战争(見注284)中羅馬人最初无力对付迦太基的龐大海軍,后来他們建立了当时最强大的舰队,并借此屡败迦太基舰队。結果迦太基的海軍被击潰。战船上的接舷跳桥帮助羅馬人取得了这一胜利。——第382頁。
- 327 指1844年出版的茹安維尔亲王的小册子“論法国海軍的現狀”(«De l'état des forces navales de la France»)。——第389頁。
- 328 克里木战争(1853—1856)期間,保卫德涅泊—布格灣入口处的一座俄国的小要塞金布恩,于1855年10月17日(5日)遭到英法联合舰队的轰击。参加这次轰击的有法国三个装甲浮动炮台。——第391頁。
- 329 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是对庸俗民主主义者,波拿巴主义的代理人卡尔·福格特的誹謗性著作“我对‘总汇报’的訴訟”的答复,福格特的这一著作是反对馬克思及其所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福格特的小册子出版于1859年12月,而在1860年1月,柏林的一家资产阶级报纸“国民报”就用两篇社論轉述了該小册子的誹謗性內容。馬克思为了正在形成中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利益,决定用文字回答福格特,

而对“国民报”所进行的誹謗則向法院提出控告。从1860年1月底起，馬克思就着手为写一本反对福格特的书和对“国民报”提出訴訟收集材料。为此目的，他写信給許多同他在政治活动和革命活动中有过联系的人，請他們提供揭露福格特的材料。从1860年2月中起，馬克思开始把控告“国民报”編輯察貝尔的材料寄往柏林，寄給他的法律顧問維貝尔律师。但是在1860年4—10月这一期間，馬克思的起訴却被普魯士的各級司法机关毫无理由地拒絕了。

馬克思在准备和寄发訴訟材料的同时，繼續撰写抨击福格特的著作。他研究了十八世紀至十九世紀的政治史和外交史，从論述外交政策問題的书籍和报纸中作了大量摘录，并且到曼彻斯特去找恩格斯，以便查閱由恩格斯保存的那些反映无产阶级革命家活动以及他們同各种敌对派別进行斗争的书信和文件。1860年9月，馬克思基本上写完了这一抨击性著作；但是，在普魯士的各級司法机关駁回了他对察貝尔的控訴书之后，他又补写了“一件訴訟案”这一章，对普魯士的司法制度进行了非常有力的批評。馬克思于11月写完抨击福格特的著作，把它題名为“福格特先生”。

“福格特先生”这一抨击性著作于1860年12月1日問世：它由倫敦貝奇出版社出版，由希尔什菲尔德印刷厂印刷。該著作在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世时没有再版过。“福格特先生”一书的第四篇附录（“科倫共产党人案件”）曾被轉載，被当做1875年出版的馬克思的“揭露科倫共产党人案件”一书的經作者同意的（第二）版本的补充。1885年出版“揭露”的第三版时，恩格斯对这一附录稍微作了补充。

“福格特先生”这一著作的第一个俄譯本是在1933年出版的。——第397頁。

330 “人民报”（《*Volks-Zeitung*》）是德国的民主派日报，1853年起在柏林出版。

“改革报”（《*Die Reform*》）是德国的资产阶级自由派日报，1848—1892年在汉堡出版。——第401頁。

331 “国民报”（《*National-Zeitung*》）是德国的资产阶级日报，1848—1915年用这一名称在柏林出版。——第401頁。

332 C. Vogt. «Mein Prozess gegen die «Allgemeine Zeitung»». Genf, im Dezember 1859.

“总汇报”(«*Allgemeine Zeitung*»)是德国的保守派日报,1798年创刊;1810年至1882年在奥格斯堡出版。在五十至六十年代,该报支持在奥地利领导下统一德国的计划。——第401頁。

333 馬克思在这里指的是他同拉薩尔在德国统一和意大利统一問題上的分歧(見本卷說明第XXVIII頁)。

关于意大利战争,見注324。——第403頁。

334 硫磺帮原是十八世紀七十年代耶拿大学学生联合会的名称,这个联合会由于它的成員搗乱生事而恶名昭著;后来“硫磺帮”成了普通用語。——第404頁。

335 馬克思經常用卡尔·福格特的姓同中世紀官吏——德意志帝国皇帝的州官(叫做“福格特”或“兰德福格特”)——名称的巧合来嘲笑他。“疑虛堡的世襲州官”,即世間不存在的一个城堡的州官(*nihil*按拉丁文的意思是一无所有),是約翰·菲沙尔特的諷刺小說“关于格朗果施、高亮都亚和龐大固埃諸英豪和老爷的業績与名言的惊險长篇历史故事”的卷头提到的人物。菲沙尔特的这部作品是拉伯雷的长篇小说“巨人傳”的德文改写本,于1575年問世。馬克思在下面引用了这部作品中的話。——第404頁。

336 馬克思这样来称呼他所分析的福格特的“我对‘总汇报’的訴訟”一书,以別于福格特用同一題目在报刊上发表的其他一些单篇文章。——第404頁。

337 馬克思指福格特的“警告”一文,該文写于5月23日,发表在1859年6月2日“瑞士商业信使报”第150号附刊上。

“瑞士商业信使报”(«*Schweizer Handels-Courier*»)是资产阶级日报,在瑞士的俾尔城(在伯尔尼州)出版。1853—1909年用这一名称出版。五十至六十年代该报反映了波拿巴主义的观点。馬克思有时諷諷该报为俾尔“推銷員”。——第405頁。

338 巴登共和派起义发生于1848年9月底，是由古斯塔夫·司徒卢威为首的一批德国流亡者发动的，9月21日从瑞士进入巴登地区。在巴登民主派的武装队伍和当地市民自卫团的支持下，司徒卢威宣布成立德意志共和国。几天以后，起义遭到巴登军队的镇压，司徒卢威和其他许多参加起义的人被捕，他们被判处长期徒刑，并押往布鲁赫萨尔城（在巴登）监狱去执行。1849年5月，巴登爆发新的起义，司徒卢威和其他政治犯一起被起义者释放。

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指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于1849年3月28日通过的宪法）是1848—1849年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后一个阶段。宪法遭到了德意志大多数邦政府的否决。1849年5月，萨克森、莱茵普鲁士、巴登和普法尔茨爆发了支持宪法的起义。但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对起义者丝毫不加援助。1849年7月，运动最终被镇压下去。恩格斯在“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127—235页）和“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91—104页）这两本著作中评述了这一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第410页。

339 1849年9月马克思被选入伦敦德国流亡者救济委员会，该委员会附设于当地的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中。为了消除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流亡者想把伦敦流亡者中的无产阶级分子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的企图，委员会根据马克思和共产主义者同盟其他领导人的建议改组成为有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领导的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1850年9月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声明退出流亡者委员会，因为该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都受到了维利希—沙佩尔的冒险主义、宗派主义派别的影响。——第410页。

340 烧炭党人（carbonaro——直译是：烧木炭工人）是十九世纪前三分之一存在于意大利、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存在于法国的密谋性团体的成员。意大利的烧炭党人包括城市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军官、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代表人物。他们所抱的目的是实现民主解放、恢复意大利的统一和实行政治改革。法国的烧炭党人包括各种政治派别的代表人物，他们抱着推翻波旁王朝的目的。——第410页。

- 341 馬克思把拉德馬赫爾称为庸医,是暗示他的一本书名:約·哥·拉德馬赫爾“为不被学者們承认的一位从事炼丹术的老庸医的合理的实用医学辯护、对二十五年中采用这門学科的临床結果所作的真实說明”(J. G. Rademacher. «Rechtfertigung der von Gelehrten misskannten, verstandesrechten Erfahrungsheillehre der alten scheidekünstigen Geheimärzte und treue Mittheilung des Ergebnisses einer 25 jährigen Erprobung dieser Lehre am Krankenbette»).——第410頁。
- 342 馬克思把参加1851年12月2—4日波拿巴派政变的人称为十二月帮,这次政变的結果是在法国建立了以拿破侖第三为首的第二个帝国(1852—1870)的反革命制度。在策划这次政变中,1849年創立的波拿巴派的秘密的十二月十日会(这样称呼这个会,是为了紀念該会的庇护人路易·波拿巴于1848年12月10日被选为法兰西共和国总统)起了巨大的作用。馬克思在下面对该会作了評述。——第411頁。
- 343 馬克思在摘录“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时,把“会”均改为“帮”。——第411頁。
- 344 指七月王朝时期路易·波拿巴通过武装叛乱实行政变的企图。1836年10月30日他在一些贊成波拿巴主义的軍官的帮助下发动了斯特拉斯堡駐防軍的两个炮兵团,但只經過几小时叛乱分子就被解除了武装。路易·波拿巴本人被捕并被流放到美洲。1840年8月6日他利用法国波拿巴主义抬头的机会,和一小撮密謀家一起在布倫登陆,企图在当地駐防軍队中发动叛乱。这个企图也遭到了完全的失敗。路易·波拿巴被判无期徒刑,但他1846年就逃往英国去了。——第412頁。
- 345 国家工厂是1848年二月革命后由法国临时政府(其中大半是資產阶级共和党人)建立起来的。建立国家工厂的目的是想使路易·勃朗組織劳动的思想在工人中丧失信用,另外是想利用按軍事方式組織起来的国家工厂的工人来反对革命的无产阶级。但是这个分裂工人阶级的挑撥性計劃沒有成功,而且国家工厂的工人更加受到了革命思想的熏陶,因而使得資產阶级政府采取了关闭这类工厂的措施。这种做法引起了

巴黎无产阶级的极大愤怒，成了巴黎无产阶级 6 月 23—26 日起义的原因之一，在起义期间，起义者利用了国家工厂内已有的军事组织。起义被镇压后，政府于 1848 年 7 月 3 日下令解散国家工厂。

别动队是临时政府为了对付革命的人民群众而在 1848 年 2 月 25 日下令建立的；这支队伍主要由流氓无产阶级组成，曾被用来镇压 1848 年的无产阶级六月起义。——第 412 页。

346 指 1715—1723 年法国奥尔良王室的非力浦摄政时期，当时路易十五还处于童年。——第 414 页。

347 特利尔教堂中的圣衣是保存在特利尔教堂里的天主教圣物，据说是耶稣在受刑时脱下的圣衣。特利尔教堂中的圣衣是朝圣者的崇拜物。——第 415 页。

348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173—175 页和第 225—227 页。——第 415 页。

349 “人民报”(《Das Volk》)是一家周报，从 1859 年 5 月 7 日至 8 月 20 日在伦敦用德文出版。该报是作为伦敦的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正式机关报而创办的。第 1 号由德国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埃拉尔特·比斯康普编辑出版。从第 2 号起，马克思就积极地参加了该报的出版工作，他非正式地为该报撰稿，经常提出建议和帮助，为报纸审稿，组织对该报的物质援助等等。在 6 月 11 日的第 6 号上，该报编辑部正式宣布马克思、恩格斯、弗莱里格拉特、威·沃尔弗和亨·海泽为该报撰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3 卷第 683 页)。从 7 月初起，马克思实际上是该报的编辑，该报成了无产阶级革命者的机关报。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革命理论问题和无产阶级斗争的策略问题的研究，在“人民报”上得到了反映。他们在该报上阐明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搏斗，对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代表人物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该报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出发，分析了 1859 年奥意法战争的各个事件、德国统一问题和意大利统一问题，揭露了英国、普鲁士、法国、俄国和其他反动国家的对外政策，对波拿巴主义及其公开的和隐蔽的拥护者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

在“人民报”上刊載了馬克思为他的著作“政治經濟学批判”所写的序言、馬克思的五篇文章（其中包括一組未完成的文章《Quid pro quo》）、恩格斯的九篇文章、恩格斯給馬克思的著作“政治經濟学批判”所写的評論、馬克思在比斯康普参加下写成并发表在“报刊述評”栏的对德国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报纸“海尔曼”的評論。此外，許多文章和政治評論都帶有馬克思直接参加編輯工作的痕迹。該报总共出版了16号。1859年8月20日該报因缺乏資金而停刊。——第417頁。

- 350 說戰場上有两个里士滿，或还有一个里士滿，指出現意料之外的第二个敌手。原出处为莎士比亚的悲剧“理查三世”(第五幕第四場)。——第417頁。
- 351 1848年4月，巴登爆发了共和派的起义，弗·卡·黑克尔是起义的领导人之一。黑克尔的队伍和其他起义队伍都被政府軍队击潰了。起义遭到了失敗。有一些参加巴登起义的人后来参加了維利希于1848年11月在伯桑松(法国)組織的由德国流亡者——工人和手工业者組成的一支队伍。队伍的战士从法国政府那里得到津貼，但在1849年初津貼便停发了。后来这支队伍編入了志願軍分队，在維利希指揮下参加了1849年5—7月巴登—普法尔茨起义軍的作战行动。——第418頁。
- 352 馬克思用寻找“失去的战鼓”的大冒險来諷刺福格特在报刊上予以支持的法国拿破侖第三和波拿巴主义集团想夺取萊茵河左岸的企图。馬克思把波拿巴主义者的这些計劃同莎士比亚“終成眷屬”一劇中的一些滑稽可笑情节(第三幕第五場和第六場，第四幕第一場和第三場)相比拟。在該剧中，巴洛队长去寻找一面失去的战鼓，而終于被他的老同事揭穿是一个胆小鬼、吹牛家、出卖灵魂的人。馬克思用巴洛来指福格特。——第419頁。
- 353 “新萊茵报。民主派机关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 Organ der Demokratie》)从1848年6月1日到1849年5月19日每日在科倫出版，总編輯是馬克思。参加編輯部的有恩格斯以及威·沃尔弗、格·維尔特、斐·沃尔弗、恩·德朗克、斐·弗萊里格拉特和亨·毕尔

格尔斯。

作为民主派中无产阶级一翼的战斗机关报，“新莱茵报”起了人民群众的教师的作⽤，它动员人民群众起来向反革命作斗争。确定报纸对异常重要的德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问题的立场的社论，通常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

“新莱茵报”的坚决的、不妥协的立场，战斗的国际主义精神，它对普鲁士政府以及科伦地方当局的政治上的揭发，——这一切使得该报在创刊后的最初几个月里就受到封建保皇派和自由派资产阶级报刊的攻击，并受到政府的迫害，这种迫害在1848年11—12月普鲁士实行反革命政变以后更变本加厉了。

“新莱茵报”不顾种种迫害和警察局的刁难，英勇地捍卫了革命民主派的利益，捍卫了无产阶级的利益。1849年5月，在反革命全面进攻的情况下，普鲁士政府借口马克思没有普鲁士国籍而下令把他驱逐出境。马克思的被驱逐和“新莱茵报”其他编辑的被迫害，使该报停刊。1849年5月19日“新莱茵报”用红色油墨印出了最后一号即第301号。在致工人的告别书中，该报的编辑们宣布：“无论何时何地，他们的最后一句话始终将是：工人阶级的解放！”——第419页。

354 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争取脱离丹麦的民族解放战争，在法国二月革命和德国三月革命的影响下，于1848年3月开始，打打停停，一直进行到1850年6月底。普鲁士统治集团考虑到德国社会舆论站在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一边，便于1848年4月发动了虚张声势的反对丹麦的战争，他们在战争过程中步步出卖了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革命军队，使其终于遭到了失败。

民主主义者在特利尔工人和附近居民点的支援下于1849年5月17—18日袭击卜留姆军械库。夺取武器和发动保卫帝国宪法的起义，是这次参加袭击者的目的。虽然军械库一度被起义者所占领，可是运动很快就被赶到的政府军队镇压下去。——第419页。

355 “现代评论”（《*Revue contemporaine*》）是法国的双周刊，1851—1870年在巴黎出版。第二共和国时期，它是正统派和奥尔良党人联合组成的秩序党的机关刊物；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之后，它成了波拿巴主

义者的机关刊物。

爱德华·西蒙写的“福格特先生对‘奥格斯堡报’的訴訟”一文，刊載在1860年2月15日出版的一期“現代評論”上。馬克思对該文的評論見本卷第480—481、502—504和第616—619頁。——第420頁。

356 指卡·馬克思“政治經濟学批判”一书（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3—177頁）。——第421頁。

357 这里提到的“鞋会”，原来是1525年农民战争前夕在德国活动的的一个秘密的革命农民协会；席利用以指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席利強調硫磺帮成員和共产主义者同盟之間并无任何联系。——第423頁。

358 *Cercle social*（社会小組）是民主知識分子的代表所建立的組織，于十八世紀末法国資產階級革命最初几年在巴黎进行活动。*Cercle social*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的地位可以从下面的事实中看出：社会小組的思想家克·福适主張平均分配土地、限制过多的财产并主張对凡有劳动能力的公民都給予工作。克·福适对法国革命文献中所宣布的形式上的平等所作的批判，促使“瘋人派”的領導者雅克·卢对这一問題发表了大胆得多的言論。大多数資產階級的雅各宾派革命家对 *Cercle social* 的思想家們、特別是“瘋人派”所表露的平均社会主义思想都持否定态度。——第425頁。

359 格留特利联盟 是瑞士小資產階級改良主义組織，它是作为手工业者和工人的教育协会于1838年建立的。1901年格留特利联盟加入瑞士社会民主党，而在1925年最終同它融为一体。“格留特利”这一名称是強調該組織的瑞士民族性。据傳說，1307年瑞士有三个州的代表在格留特利草地集会，締結了联盟，共同反对奥地利統治，包括反对奥地利的州官。馬克思用这一事件来諷刺福格特。——第426頁。

360 巴登格 是拿破侖第三的綽号，他之所以获得这一綽号，是因为他曾在1846年穿着一个名叫巴登格的泥水匠的衣服逃出監獄。

瑪麗安娜(Marianne)是法国一个反对波拿巴主义的共和派秘密

团体的名称,产生于1850年。它在第二帝国时期所抱的目的是反对拿破侖第三。——第428頁。

361 共产主义者同盟是第一个无产阶级的国际共产主义組織。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建立以前,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在思想上和組織上因結各个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和先进工人,曾經进行了巨大的工作。为此,1846年年初,他們在布魯塞尔組織了共产主义通訊委员会。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反对魏特林的粗鄙的平均共产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以及对正义者同盟(即工人和手工业者的秘密組織,創建于三十年代中,在德国、法国、瑞士和英国都有它的支部)的成員特別有影响的蒲魯东小资产阶级空想的頑强斗争中,捍卫了科学共产主义的思想。在倫敦的正义者同盟领导机构深信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是正确的,于1847年1月底建議他們加入同盟,参加同盟的改組工作并根据他們所宣布的原則草拟同盟綱領。馬克思和恩格斯表示同意这样做。

1847年6月初,在倫敦召开了正义者同盟的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作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載入史册。恩格斯和威·沃尔弗参加了代表大会的工作。大会决定把組織名称改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并用无产阶级政党的战斗性的国际主义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代替模糊不清的旧口号“人人皆兄弟!”。大会还审查了恩格斯积极参加起草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新的盟章明确规定了共产主义运动的最終目的,删除了某些使組織帶有阴谋性质的条款;民主原則成为同盟組織的基础。最后,这个章程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被批准(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572—577頁)。馬克思和恩格斯都参加了1847年11月29日—12月8日在倫敦举行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工作。他們在許多天的論战中捍卫了代表大会一致通过的科学共产主义的原則。馬克思和恩格斯受大会委托起草了一个綱領性的文件,即1848年2月发表的“共产党宣言”(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61—504頁)。

由于法国革命爆发,在倫敦的同盟中央委员会于1848年2月底把同盟的领导权移交給了以馬克思为首的布魯塞尔区部委员会。在馬克思被驅逐出布魯塞尔并迁居到巴黎以后,巴黎于3月初成了新的中央

委員會的所在地。恩格斯也当选为中央委員。1848年3月下半月—4月初，中央委員會組織了數百名德國工人（他們多半是共產主義者同盟盟員）回國參加已經爆發的德國革命。馬克思和恩格斯在3月底所寫成的“共產黨在德國的要求”（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3—5頁）是共產主義者同盟在这次革命中的政治綱領。

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他們的擁護者于1848年4月初返抵德國，他們堅信，由於德國落后，德國工人四分五裂和政治覺悟不高等情况，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兩三百名共產主義者同盟盟員難以對廣大人民群眾產生顯著的影響。鑒於这种情况，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必須參加民主運動的極左的、實際上是无產階級的側翼。他們加入了科倫的民主協會并介紹他們的擁護者參加民主派組織，以便在那里堅守革命无產階級的立場，批判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不徹底性和動搖性，推動他們採取堅決的行動。同時，馬克思和恩格斯指示他們的擁護者注意組織工人協會，对无產階級進行政治教育，為組織群眾性的无產階級政黨創造條件。當時，馬克思主編的“新萊茵報”（見注353）已成為共產主義者同盟盟員的領導和指導中心。

1849年4月，馬克思、恩格斯和他們的擁護者退出了民主協會。工人群眾已經有了政治經驗，他們对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已經大失所望，這一切使當時已經有可能在實踐上提出建立独立的无產階級政黨的問題。但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沒有能夠實現這一計劃。不久，德國西南部爆發了起義。这次起義的失敗成為德國革命的終結。

革命的進程表明，“共產黨宣言”中所闡明的共產主義者同盟的觀點是唯一正確的，同盟是革命活動的一所很好的學校；它的成員堅決果斷地參加了各地的運動，他們在報刊、街壘和戰場上堅守着最革命的階級——无產階級的陣地。

革命的失敗沉重地打擊了共產主義者同盟。同盟的許多盟員不是被關進監獄，就是逃亡國外，地址丟失了，聯繫中斷了，各地支部的活動停頓了。德國國外的同盟組織也遭到了巨大的損失。

1849年秋天，同盟的多數領導人聚集于倫敦。由於馬克思和恩格斯所領導的經過改組的新中央委員會的努力，到1850年春天，以前的組織已經恢復，共產主義者同盟的活動也日益活躍起來。馬克思和恩

格斯在 1850 年 3 月所写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7 卷第 288—299 頁)中,总结了 1848—1849 年的革命并提出了建立摆脱小资产阶级的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在“告同盟书”中第一次阐明了不断革命的思想。1850 年 3 月,进行共产主义宣传的新机关刊物“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出版。

1850 年夏,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内部在策略问题上的原则性分歧达到了很尖锐的程度。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坚决反对維利希—沙佩尔派集团提出的宗派主义冒险主义的策略,它无视客观规律和欧洲的现实政治形势而主张立即发动革命。与此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竭力强调,在反动派进攻的情况下,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宣传科学共产主义和为未来的革命战斗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干部。1850 年 9 月中,維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分裂活动终于导致了与该派的分裂。1850 年 9 月 15 日的会议(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635—641 頁)根据马克思的建议,把中央委员会的职权移交给科伦区部委员会。德国各地共产主义者同盟支部一致拥护伦敦中央委员会多数派的决定。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示,科伦的新的中央委员会于 1850 年 12 月起草了新的盟章(马克思加了标记的全文,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7 卷第 626—629 頁)。1851 年 5 月,由于警察的迫害和盟员的被捕,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的活动实际上已经停顿。1852 年 11 月 17 日,在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发生后不久,同盟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宣告解散。

共产主义者同盟起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它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学校,是无产阶级政党的萌芽、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的前身。——第 429 頁。

- 362** 見卡·馬克思的著作“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521—522 頁)。这一著作于 1853 年 1 月在瑞士巴塞尔印成单行本(福格特用的就是这种版本)。该著作最初在美国波士顿的一家民主报纸“新英格兰报”(«Neu-England-Zeitung»)上陆续发表,到 1853 年 4 月底,该报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马克思在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中所引证的“揭露”,根据的是波士顿出版的小册子。

——第 429 頁。

- 363** 罗亚尔宫 是巴黎的一座宮殿。第二帝国时期它是拿破侖第一的弟弟日罗姆·波拿巴和他的儿子約瑟夫·拿破侖亲王（綽号普隆-普隆）的公館。——第 429 頁。
- 364**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522 頁和第 525 頁。
“德美革命貸款”指金克尔和小資產階級流亡者的其他领导人于 1851—1852 年企图在德国的流亡者和出身于德国的美国人中間举借的貸款，其目的是募集經費用于在德国立即喚起革命。为了举借貸款，金克尔于 1851 年 9 月到了美国。举借“革命貸款”的企图遭到了失敗。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們的許多著作中尖刻地嘲笑了金克尔这一企图的冒險性，认为这是一种有害的、无成果的、在革命运动处于低潮时人为地喚起革命的尝试。——第 430 頁。
- 365** 1848 年 5 月 18 日至 1849 年 5 月 30 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圣保罗教堂举行了法兰克福国民議会的會議。——第 431 頁。
- 366** 大科夫塔 是在十八世紀以招搖撞騙出名的卡利奧斯特罗伯爵（朱澤培·巴尔扎莫）臆造出来的一个埃及祭司的名字。卡利奧斯特罗說，这个埃及祭司是一个什么共济会“埃及分会”的全能全知的首領，他自己則是該会的創建者和活动家。——第 433 頁。
- 367** “独立报”（*L'Indépendant*）是瑞士資產階級民主周报，1851—1852 年用这一名称在日内瓦出版。——第 434 頁。
- 368** 联邦委员会 是瑞士政府名称。——第 435 頁。
- 369** 1851 年 9 月，維利希—沙佩尔集团地方支部的成員在法国遭到了逮捕；該集团是 1850 年 9 月从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分裂出来的。这一集团采取了小資產階級的密謀策略，无视现实形势，打算立即組織起义，因而使法国和普魯士警察当局得以在领导巴黎的一个支部的奸細舍尔瓦尔的帮助下制造了所謂德法密謀案件。1852 年 2 月，被捕者被判罪，罪名是策划政变。警察当局給奸細舍尔瓦尔安排了越獄潜逃。普魯士警察当局想把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的共产主义者同盟說成是德法密謀的参

加者，这种企图遭到了彻底破产。1851年9月在巴黎被捕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康拉德·施拉姆，由于缺乏罪证很快就被釋放了。施梯伯在科倫案件中所提供的旨在证明被告們参加德法密謀的种种假证詞，馬克思已在“揭露科倫共产党人案件”一书的“舍尔瓦尔的密謀”一章（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72—487頁）中駁得体无完肤了。——第437頁。

370 “科倫日报”（*«Kölnische Zeitung»*）是德国的日报，从1802年起用这一名称在科倫出版；在1848—1849年革命时期和随之而来的反动时期，該报反映了普魯士自由資產階級胆怯的和叛变的政策。——第437頁。

371 科倫共产党人案件（1852年10月4日—11月12日）是普魯士政府策动的一次挑衅性的案件。国际共产主义組織共产主义者同盟（1847—1852）的11名成員被审讯，罪名是“进行叛国性密謀”。控告的物证是普魯士警探們假造的中央委员会會議的“原本記錄”和其他一些伪造文件，以及警察局从已被开除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維利希—沙佩尔冒險主义集团那里偷来的一些文件。根据伪造文件和虛假证詞，7名被告被分別判处3年至6年的徒刑。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个案件的組織者的挑衅行为和普魯士警察国家用来反对国际工人运动的卑鄙手段，进行了彻底的揭露（見恩格斯“最近的科倫案件”一文和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揭露科倫共产党人案件”，“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49—456頁和第457—536頁）。——第437頁。

372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88頁。——第437頁。

373 倫敦 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 是1840年2月由正义者同盟的卡·沙佩尔、約·莫尔及其他活动家在倫敦創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后，在协会里起着領導作用的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地方支部。1847年和1849—1850年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参加了协会的活动。在馬克思和恩格斯領導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和宗派主义冒險主义的少数派（維利希—沙佩尔集团）之間的斗争中，协会站在少数派一边，因此1850年9月17日馬克思、恩格斯和他們的許多拥护者退出了协

- 会。自五十年代末起，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了教育协会的活动。这个协会一直存在到 1918 年为英国政府所封閉。在二十世紀，許多俄国政治流亡者曾訪問过这个协会。——第 438 頁。
- 374 “工人共和国报”（《*Republik der Arbeiter*》）是 1850—1855 年威·魏特林在紐約出版的一家工人报纸；該报反映了宗派主义的平均共产主义代表人物的观点。——第 439 頁。
- 375 卡·福格特是帝国摄政政府的五个成員之一，該摄政政府由法兰克福国民議会的“殘闕”議会在斯图加特成立，以代替从 1848 年 6 月起存在于德国的、以帝国摄政約翰大公为首的所謂中央政权，它公开奉行反革命方針。在保守派議員和大批自由派議員离开議会之后，議会有被解散的危險，因而法兰克福国民議会便于 1849 年 6 月初把会址迁往斯图加特。摄政政府想借助議会手段来保证实施法兰克福議会制訂的而为德意志各邦君主拒絕的帝国宪法，这种企图遭到了完全的失敗。6 月 18 日，“殘闕”議会为維尔騰堡的軍隊所驅散。——第 440 頁。
- 376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472—487 頁。——第 441 頁。
- 377 汉巴赫大典于 1832 年 5 月 27 日在巴伐利亚普法尔茨地方的一个城堡汉巴赫附近举行，这是資產阶级自由派和激进派代表組織的一次政治性示威。参加大典的人发言号召全体德国人團結一致，反对德意志各邦君主，为爭取資產阶级自由和制宪改革而斗争。——第 442 頁。
- 378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9 卷第 537—571 頁。——第 448 頁。
- 379 “紐約刑法报”（《*New-Yorker Criminal-Zeitung*》）是德国小資產阶级流亡者的代表于 1852 年在紐約創办的周报“美文学杂志和紐約刑法报”（《*Belletristisches Journal und New-Yorker Criminal-Zeitung*》）的簡称。1853 年 3 月 18 日至 1854 年 3 月 10 日用这个名称出版。
- 馬克思指奧·維利希的誹謗性文章“卡尔·馬克思博士和他的‘揭露’”。該文发表在这家报纸的 1853 年 10 月 28 日和 11 月 4 日两号上。——第 448 頁。

- 380 “福斯报”(«*Vossische Zeitung*»)即“柏林政治和学术問題王国特权报”(«*Königlich privilegierte Berlinische Zeitung von Staats- und gelehrten Sachen*»),是以該报創办者福斯得名的日报,1785年起用这一名称在柏林出版。——第449頁。
- 381 拉登多夫案件是1854年在柏林举行的对小資產階級民主主义者拉登多夫、格尔克、法肯塔尔、勒維等人的审判案;他們是因投向警察局的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汉茨的告密而于1853年被捕的。他們被誣告进行阴谋活动,被判处期限不同的徒刑(从3年到5年)。
 死人同盟是十九世紀四十年代至五十年代初存在于不来梅的一个密謀組織。1852年为警察局破获。——第449頁。
- 382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532—533頁。——第450頁。
- 383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530頁。——第450頁。
- 384 馬克思在这里套用了下面两句話:(1)“安静是公民的首要职责”(这是普魯士大臣舒連堡-克涅特在耶拿之役战败后于1806年10月17日发表的告柏林居民书中所說的話);(2)“你将在这一标志下获胜”(据羅馬历史学家克薩里亚的尤西比阿斯的記載,君士坦丁一世在公元312年战胜馬克森提烏斯前夕,据說在天空中看見了一个带有这样題詞的十字架)。——第451頁。
- 385 «*Das Centralfest der Deutschen Arbeiterbildungsvereine in der Westschweiz (Lausanne, 1859)*». Genf, 1859, Markus Vaney, rue de la Croix d'Or. ——第452頁。
- 386 暗指1851年出版的卡·福格特“兽国研究”一书的书名,該书是用庸俗唯物主义观点写成的。——第453頁。
- 387 Jacob Venedey. «*Pro domo und Pro patria gegen Karl Vogt*». Hannover, 1860.
 科貝斯第一是費奈迭的綽号,由亨·海涅的詩“科貝斯第一”而来。海涅在这一諷刺詩中嘲笑雅科布·費奈迭是庸夫俗子的典型。科貝斯在科倫的方言中意思是雅科布(雅科布·費奈迭生于科倫)。——

- 第 454 頁。
- 388 “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 Journals*»)是德国的资产阶级日报,十七世纪至 1903 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第 455 頁。
- 389 諷刺地指 1855 年出版的德国生理学家毕希納的“力和物质”一书的名称。毕希納和福格特同为庸俗唯物主义的代表。——第 455 頁。
- 390 “日内瓦席勒紀念会。附本年的罗伯特·勃魯姆紀念会”1859 年日内瓦版(«*Die Schiller-Feier in Genf. Nebst einem Nachtrag enthaltend die diesjährige Todtenfeier für Robert Blum*». Genf, 1859)。——第 456 頁。
- 391 卡·福格特“欧洲现状研究”1859 年日内瓦和伯尔尼版(C. Vogt. «*Studien zur gegenwärtigen Lage Europas*». Genf und Bern, 1859)。——第 456 頁。
- 392 “十字报”(«*Kreuz-Zeitung*»)是对一家反动透頂的德国日报“新普魯士报”(«*Neue Preußische Zeitung*»)的称呼(因在报头上印有一个十字章图形);該报从 1848 年 6 月起在柏林出版;是反革命的宫廷奸党和普魯士容克地主的喉舌。——第 458 頁。
- 393 指“瑞士的共产主义者。根据从魏特林那里发现的文件。委员会給苏黎世州政府的报告书全文”1843 年苏黎世版(«*Die Kommunisten in der Schweiz nach den bei Weitling vorgefundenen Papieren. Wörtlicher Abdruck des Kommissionalberichtes an die H. Regierung des Standes Zürich*». Zürich, 1843)。报告人是約·卡·布倫奇里。——第 464 頁。
- 394 布魯塞尔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或称德意志工人协会)是馬克思和恩格斯于 1847 年 8 月底建立的,其目的是对侨居比利时的德国工人进行政治教育并向他們宣傳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在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拥护者的领导下,协会成为团结比利时的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合法中心,并同佛来米和瓦倫工人俱乐部保持直接联系。协会中的优秀分子加入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布魯塞尔支部。1848 年法国资产阶级二月

革命以后，由于該协会成員被比利时警察当局逮捕和驅逐出境，协会的活动即告停止。——第 464 頁。

395 宗得崩德（特別联盟）是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瑞士的反动天主教諸州的单独联盟，馬克思和恩格斯用这一名称来諷刺 1850 年 9 月 15 日脫离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以后成立了独立的組織和自己的中央委员会的維利希—沙佩尔宗派主义冒險主义集团。——第 466 頁。

396 德意志联邦 是 1815 年 6 月 8 日在維也納會議上成立的德意志各邦的联盟。德意志分成三十六个邦，它們各自保持着封建专制制度，这就加深了德国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分散状态，阻碍了德国的进一步发展。

1848—1849 年革命被摧毁以后，在普魯士和奥地利之間爆发了一场爭夺德意志霸权的斗争。奥地利企图恢复在革命时期实际上已經瓦解的德意志联邦。普魯士希望通过建立一个在它保护下的德意志各邦的联盟，来巩固自己的霸权。1850 年秋，奥普之間的斗争因黑森选帝侯国而在它們之間引起的冲突尖銳化了。黑森选帝侯国的革命事件使奥普两国找到了干涉其內政的借口，而且每一方都希望充当运动鎮压者的角色。为了回答奥地利軍隊进駐黑森选帝侯国，普魯士政府宣布动员，并且也向那里进军。可是在沙皇尼古拉一世的压力下，普魯士沒有經過严重的反抗就向奥地利让步了。——第 466 頁。

397 联邦議會 是德意志联邦的中央机关，它由德意志各邦的代表組成，会址設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联邦議會是德意志各邦政府实行反动政策的工具。——第 467 頁。

398 馬克思引自“国际述評（三）”，該文发表在 1850 年“新萊茵报。政治經濟評論”第 5—6 期合刊上（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7 卷第 535 頁）。

“新萊茵报。政治經濟評論”（*Neue Rheinische Zeitung. Politisch-ökonomische Revue*）是馬克思和恩格斯于 1849 年 12 月創辦、1850 年 11 月停刊的杂志。它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理論和政治的机关刊物，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48—1849 年革命期間出版的“新萊茵报”的繼續。該杂志从 1850 年 3 月至 11 月总共出了 6 期，其中有一

期是合刊(5、6 两期合刊)。杂志在倫敦編輯,在漢堡印刷。杂志的絕大部分材料(論文、短評、書評)都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此外他們也約請他們的支持者如威·沃尔弗、約·魏德迈、格·埃卡留斯等人撰稿。馬克思主义創始人在杂志上发表的著作有:馬克思的“法兰西階級斗争”,恩格斯的“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和“德国农民战争”,以及其他一些著作。这些著作总结了 1848—1849 年的革命,进一步制定了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論和策略。杂志由于德国警察的迫害和資金缺乏而停办。——第 467 頁。

399 这里提到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中央委员会會議是在 1850 年 8 月底举行的。——第 470 頁。

400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9 卷第 552—553 頁。——第 470 頁。

401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9 卷第 557 頁。——第 470 頁。

402 在馬克思的抨击文“高尚意識的騎士”中,发表了这封信的全文,該信写于 11 月 22 日(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9 卷第 566—567 頁)。——第 472 頁。

403 暗指古希腊的諷諧叙事詩“老鼠与青蛙之战”,这是一部对荷馬叙事詩的模拟詩,作者不詳。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抨击性著作“流亡中的大人物”中对宣傳协会和流亡者俱乐部(馬克思在这里称它为流亡者协会)以及对这两个小资产階級的流亡組織之間的相互关系作了詳尽的評述(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360—380 頁)。——第 474 頁。

404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4 卷第 500—502 頁。馬克思在这里以及下面均引自 1848 年 2 月在倫敦出版的“共产党宣言”德文第一版。——第 476 頁。

405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4 卷第 71—198 頁。——第 476 頁。

406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4 卷第 479 頁。——第 477 頁。

407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4 卷第 478—479 頁。——第 477 頁。

- 408 馬克思引自他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階級斗争”(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21頁)。——第477頁。
- 409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125頁。——第477頁。
- 410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269—587頁。——第477頁。
- 411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503頁。——第478頁。
- 412 馬克思引自他在对民主主义者萊茵区域委員會的审判中的发言(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302頁)。
- 对民主主义者萊茵区域委員會的审判是在1849年2月8日举行的。卡·馬克思、卡·沙佩尔和律师施奈德尔第二曾出席科倫陪审法庭受审。他們被控的罪名是煽动叛乱，根据是民主主义者萊茵区域委員會曾于1848年11月18日发表了号召拒絕納稅的呼吁书，认为这是动员群众起来反对普魯士即将来临的反革命的一种手段(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39頁)。陪审法庭宣判被告无罪。这次审判的記錄登載在1849年2月19、25、27和28日“新萊茵报”第226、231、232和233号上，并且还发表在下列小册子中：“两个政治审判案。由科倫二月陪审法庭审理”1849年科倫“新萊茵报”出版发行社版(《Zwei politische Prozesse. Verhandelt vor den Februar-Assisen in Köln》. Köln, 1849. Verlag der Expedition der «Neuen Rheinischen Zeitung》)。——第478頁。
- 413 引自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国际述評(一)”(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262、263和264頁)。——第479頁。
- 414 引自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国际述評(三)”(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510頁)。——第479頁。
- 415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513—514頁。——第480頁。
- 416 *Comité de salut public* (社会拯救委員會)——見注147。——第480頁。
- 417 “新德意志报”(《*Neue Deutsche Zeitung*》)是民主派日报。該报从

- 1848年7月1日至1850年12月14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德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约瑟夫·魏德迈是该报编辑之一。——第483頁。
- 418 引自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哥特弗利德·金克尔”(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351—352頁)一文。
-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篇文章是针对因参加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而在拉施塔特法庭受审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哥·金克尔的那种卑鄙行为的。金克尔在他的1849年8月4日的辩护词中,企图否认自己曾参加革命运动,并赞扬了霍亨索伦王朝。——第483頁。
- 419 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224—232頁。——第484頁。
- 420 马克思諷刺地把金克尔的机关报“德国通訊員”同法国政府的报纸“通报”相提并論。
- “通报”(《*Moniteur*》)是法国日报“总汇报”(《*Le Moniteur universel*》)的简称;該报从1789年至1901年在巴黎出版;1799年至1869年是正式政府机关报。——第484頁。
- 421 马克思为了譏笑福格特,把他的小册子“我对‘总汇报’的訴訟”称为“劳兹之歌”(《*Lausiade*》),即“虱子之歌”(来自德文《*Lause*》——“虱子”),这是同十八世紀末英国诗人彼得·品得的一首諷刺詩《*The Lousiad*》——“劳兹之歌”(来自英文《*louse*》——“虱子”)相类似的东西。
- “卢兹之歌”是文艺复兴时期偉大的葡萄牙诗人路易斯·卡蒙斯所写的叙事詩。——第487頁。
- 422 马克思把福格特的地位比作塞万提斯的小說“唐·吉珂德”中的桑科·判扎在巴拉塔利亚島上虛构的总督职位,以諷刺他身为帝国摄政(見注375)的表面权力。——第488頁。
- 423 見弗·恩格斯的著作“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187—189頁)。——第489頁。
- 424 1848年8月26日,丹麦同只是虛張声势地参加了什列斯維希—霍尔施

坦战争（見注 354）的普魯士在馬尔摩簽訂了停战协定；該协定葬送了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的革命民主成果，而实际上保存了丹麦在那里的統治权。1848 年 9 月 16 日，法兰克福国民議會不顾坚持要对丹麦繼續进行革命战争（这是德国人民爭取德国統一斗争的一部分）的德国民主力量的反抗，以 21 票多数批准了停战协定。这一决定引起了德国民主力量的极大憤慨。1848 年 9 月 17 日，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东北郊的普芬斯特魏德草地举行了很多人参加的人民集会，通过了一项决定，要求把投票批准馬尔摩停战协定的那些議員宣布为卖国賊，要求左派分子退出国民議會。当許多极左派代表同意普芬斯特魏德人民集会的上述要求时，卡尔·福格特出来反接受这些要求。由批准停战协定所引起的人民运动，9 月 18 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轉变为起义，結果遭到了政府軍队的殘酷鎮压。——第 492 頁。

425 指法兰克福国民議会在 1848 年 10 月 9 日通过的“保卫制宪国民議會和中央政权机关官員的法律”。这个法律規定，侮辱国民議會議員或中央政权机关代表的人（帝国摄政、他的大臣和官員們），要处以徒刑。这个法律是国民議會多数派和帝国政府在法兰克福九月起义后采取的鎮压人民群眾的措施之一。——第 492 頁。

426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中央三月同盟及其在德国各城市的分支，是在 1848 年 11 月底由法兰克福国民議會的左翼議員們組織的。同盟宣称它們的目的是保卫德国 1848 年三月革命的成果。同盟的領導人是一些小資产階級民主主义者，如弗呂貝尔、西蒙、卢格、福格特等。馬克思和恩格斯从 1848 年 12 月起就已經开始在“新萊茵报”上抨击領導同盟的小資产階級民主派領袖們的不彻底和不坚决的政策，指出这种政策对革命的敌人有利。——第 492 頁。

427 引自卡·馬克思“三月同盟”一文（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6 卷第 394—396 頁）。——第 494 頁。

428 見卡·馬克思“法兰克福三月同盟和‘新萊茵报’”一文（“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6 卷第 424—425 頁）。——第 494 頁。

429 見恩格斯的著作“爱北斐特”（“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6 卷第

596—599 頁) 和“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7 卷第 140—153 頁)。——第 494 頁。

430 指 1848 年 11 月—12 月初普魯士發生的政變，它以反革命勢力得勝告終。普魯士政變的結果是：成立了極端反動的勃蘭登堡—曼托伊費爾內閣，解散了國民議會。

“新普魯士報”(«*Neue Preussische Zeitung*»)——見注 392。——第 494 頁。

431 見“十字報”一文(“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6 卷第 585 頁)。——第 495 頁。

432 見注 389。——第 495 頁。

433 告德國人民書是詩人烏朗特以溫和的民主派的名義草擬的；他們的意圖是，使自己的政治路線同自由資產階級的路線接近。在這一告人民書中沒有任何具體的行動綱領，而只限於軟弱無力地呼喚德國人民支持實施帝國憲法。

第二個告人民書是由國民議會三十人委員會提出的，它同樣是一個徒勞無益的呼喚書，其內容是：要求不承認國民議會及其決議的那些德意志邦的軍隊，宣誓效忠帝國憲法。

三十人委員會是 1849 年 4 月 12 日由法蘭克福國民議會成立的，以便制訂使帝國憲法付諸實施的種種措施，原因是普魯士國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對議會加在他頭上的皇冠採取模稜兩可的態度。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起初表示他是否同意，要看德意志其他統治者的態度而定；1849 年 4 月 28 日他聲明，拒絕接受帝國憲法，放棄皇冠。——第 496 頁。

434 在這裡以及在其他論及法蘭克福國民議會的地方，馬克思所利用的速記記錄，後來以單行本出版，題名“美因河畔法蘭克福德國制憲國民議會會議速記記錄”1848—1849 年美因河畔法蘭克福版(«*Stenographischer Bericht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r deutschen constituirenden Nationalversammlung zu Frankfurt am Main*». Frankfurt am Main, 1848—1849)。——第 496 頁。

435 1849年5月初，位于法兰克尼亚中部地区的巴伐利亚的紐倫堡，爆发了大規模的人民运动，抗議巴伐利亚政府拒絕接受帝国宪法。1849年5月13日在紐倫堡举行的規模巨大的人民集会是运动的高潮，参加这次大会的有5万人。卡尔·福格特出席了大会，他在会上用一套虛假的革命詞句作掩飾，規劝人民抛开坚决的行动。福格特的叛卖行为以及領導运动的民主派的动摇态度使人民遭到了失敗。

抱怨派 (*Heuler*) 是1848—1849年期間德国民主共和派对资产阶級立宪派的称呼，而后者則把前者称为煽动者 (*Wühler*)。——第500頁。

436 馬克思諷刺地这样称呼路易·波拿巴，因为波拿巴曾經在瑞士的土尔高州受教育，并获得了土尔高州名誉公民的称号。——第501頁。

437 “萊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 (*«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 Handel und Gewerbe»*) 自1842年1月1日至1843年3月31日在科倫出版。該报是萊茵省一些反对普魯士专制政体的资产阶級人士創办的。該报會吸收几个青年黑格尔分子撰稿。1842年4月卡·馬克思开始为“萊茵日报”撰稿，同年10月起成为該报編輯之一。“萊茵日报”也发表了弗·恩格斯的許多文章。在馬克思担任編輯期間，該报日益具有明显的革命民主主义性质。政府对“萊茵日报”进行了特別严格的檢查，后来把它封閉了。——第501頁。

438 “晨报” (*«Morgenblatt»*) 是文学日报“知識界晨报” (*«Morgenblatt für gebildete Leser»*) 的簡称，1807年至1865年在斯图加特和杜宾根出版。1840—1841年，該报會发表过弗·恩格斯的几篇有关文艺問題的通訊。——第503頁。

439 指十九世紀三十至四十年代亨·海涅从巴黎寄給奥格斯堡“总汇报”发表的文章，以及四十年代初德国东方学家雅·法耳梅賴耶尔在同一报纸上刊登的特写。海涅把他在“总汇报”上发表过的大部分文章編成单行本，书名是“法国紀事” (1832年) 和“呂太斯” (1854年)。法耳梅賴耶尔的特写于1845年編成两卷集，取名为“来自东方的片断”。——第505頁。

- 440 馬克思对“总汇报”亲奧立場的批判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311—315頁。

“紐約每日論壇報”(《*New-York Daily Tribune*》)是1841年至1924年出版的美国報紙。这份由著名的美国記者和政治活动家霍拉斯·格里利創办的報紙，在五十年代中以前是美国輝格党左翼的机关报，后来成为共和党的机关报。在四十至五十年代，該报采取了进步的立場，反对奴隶占有制。参加該报工作的有許多著名的美国作家和記者，从四十年代末起，曾經受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查理·德納是該报的編輯之一。馬克思从1851年8月开始为該报撰稿，一直到1862年3月，共达十年以上；寄給“紐約每日論壇報”的大量文章，都是恩格斯应馬克思的請求而写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給“紐約每日論壇報”写的文章，包括了国际和国内政治、工人运动、欧洲各国的經濟发展、殖民地扩張、被压迫国家和附屬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等最重要的問題。在欧洲的反动年代，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这家銷路很广的美国報紙，通过具体材料揭露了資本主义社会的弊病以及它所固有的不可調和的矛盾，并且指出了资产階級民主的局限性。

“紐約每日論壇報”編輯部常常对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的文章采取为所欲为的态度，有些文章被删去作者的署名作为編輯部的社論发表，有时編輯部还对文章加以篡改。馬克思曾經对編輯部的这种做法不止一次地提出抗議。从1857年秋天起，美国爆发了經濟危机，“紐約每日論壇報”的經濟状况也因此受到影响，这时馬克思不得不减少自己給該报写稿的数量。在美国国内战争开始时，馬克思完全停止了給該报写稿；“紐約每日論壇報”同馬克思的决裂，主要是由于編輯部中主張与蓄奴州妥协的人数增多以及該报离开了进步立場而引起的。——第505頁。

- 441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636頁。

恩格斯的小册子“波河与萊茵河”——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247—299頁；这本小册子中的对“中欧大国”論的批評見第249—251頁。——第505頁。

- 442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189—194頁。

《*Bas Empire*》(“衰落时期的帝国”) 在历史文献中有时用来代表拜占庭帝国, 以及后来的罗马帝国; 以后逐渐成了代表正在衰落和瓦解中的国家的普通用语。——第 506 頁。

443 1859 年 4 月初, 福格特把他的政治“綱領”寄給弗萊里格拉特和其他許多人, 在这个綱領中, 他根据波拿巴派宣傳的精神, 主張德意志联邦在即将发生的法奥战争中采取中立态度。——第 506 頁。

444 “汉薩德的議會辯論”(《*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 是关于英国議會两院會議的报告; 因出版者为托馬斯·寇松·汉薩德而得名, 从 1803 年起定期出版。

藍皮书 (Blue Books) 是英国議會和外交部发表的資料和外交文件的总称。藍皮书因藍色的封皮而得名, 英国从十七世紀开始发表藍皮书, 它是英国經濟史和外交史的主要官方資料。——第 507 頁。

445 見卡·馬克思“帕麦斯頓勳爵”这一組文章(“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9 卷第 387—461 頁)。

“人民报”(《*The People's Paper*》) 是宪章派的周刊, 1852 年 5 月由革命宪章派的領袖之一、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厄·琼斯在倫敦創辦。从 1852 年 10 月至 1856 年 12 月, 馬克思和恩格斯經常为該报撰稿, 同时还对該报的編輯工作給以帮助。“人民报”除了刊登馬克思和恩格斯專門为該报撰写的一些文章以外, 还轉載了他們在“紐約每日論壇报”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在这个时期, 該报始終捍卫工人階級的利益和宣傳社会主义思想。琼斯和資產階級激进派的接近, 曾經使馬克思和恩格斯停止为“人民报”撰稿并使他們和琼斯的关系一度破裂。1858 年 6 月該报轉到了資產階級实业家的手中。——第 507 頁。

446 指馬克思的“帕麦斯頓勳爵”这一組文章中的第三篇(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9 卷第 405—417 頁); 1853 年 11 月 26 日“格拉斯哥哨兵”用“帕麦斯頓与俄国”的标题轉載了这篇文章; 在后来的一个出版物的目录中标題改为“帕麦斯頓与波兰”(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9 卷注 295)。——第 507 頁。

447 卡·馬克思的“卡尔斯的陷落”这一著作发表在 1856 年 4 月 5、12、19

和 26 日“人民报”上(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1 卷第 673—712 頁)。

外交事務委員會(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s)是十九世紀四十至五十年代烏尔卡尔特及其拥护者在英国許多城市建立的社会团体,其目的主要是与帕麦斯顿的政策作斗争。——第 507 頁。

- 448 卡·馬克思曾經計劃写一部关于十八世紀英国和俄国外交史的著作,这里指該著作的未完成的导言;1856 年 6 月—1857 年 4 月首先在“設菲尔德自由新聞报”和倫敦“自由新聞”上以《Revelations of the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18th Century》[“十八世紀外交史的內幕”]为标题发表。1899 年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艾威林在倫敦出版单行本,标题是“十八世紀外交秘史”(《Secret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自由新聞”(《The Free Press》1855—1865 年在倫敦出版)和“設菲尔德自由新聞报”(《The Sheffield Free Press》1851—1857 年在設菲尔德出版)是烏尔卡尔特及其拥护者創办的英国資產階級報紙。——第 508 頁。

- 449 “晨星报”(《The Morning Star》)是英国的一家日报,自由貿易派的机关报,1856 年至 1869 年在倫敦出版。

“曼彻斯特学派”是反映工业資產階級利益的英国經濟思想中的一派。这一派的拥护者,即自由貿易派,主張貿易自由和国家不干涉經濟生活。自由貿易派的宣傳中心是曼彻斯特,在曼彻斯特領導这一运动的是 1838 年組織反谷物法同盟的两个紡織厂厂主——科布頓和布莱特。在四十至五十年代自由貿易派組成了一个单独的政治集团,后来这个集团加入了英国自由党。——第 508 頁。

- 450 “新时代”(《Die Neue Zeit》)是一家工人报纸,由德国流亡者主办;1858 年 6 月至 1859 年 4 月在倫敦出版。

“海尔曼”(《Hermann》)是德国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机关报“海尔曼。倫敦德文周报”(《Hermann. Deutsches Wochenblatt aus London》)的簡称,1859 年起在倫敦用德文出版;从 1859 年 1 月至 7

- 月，哥特弗利德·金克尔任該报編輯。——第 508 頁。
- 451 “大胡蜂”(«*Die Hornisse*»)是小資產階級民主派海澤和克耳納办的德文報紙，1848—1850 年在加塞尔出版；1848—1849 年比斯康普曾为該报撰稿。——第 509 頁。
- 452 摩門教徒是 1830 年在美国成立的宗教教派的成員。該派的創始人約瑟夫·斯密特(1805—1844)由于得到所謂的神的启示而写了一本“摩門經”。在这本充滿荒誕无稽的臆想的書里，以先知摩門的名义讲述了仿佛古代曾經发生过的以色列部落向美洲迁移的故事。——第 509 頁。
- 453 这里馬克思写得不够确切。这句话不是出自繆尔納，而是出自格里耳帕尔策。見弗·格里耳帕尔策“女始祖”第三幕。——第 511 頁。
- 454 1859 年 6 月 7 日“总汇报”第 158 号发表了雅科布·費奈迭的一封信，其中着重揭露了福格特同約瑟夫·拿破侖亲王的联系。——第 512 頁。
- 455 見注 387。——第 512 頁。
- 456 馬克思諷刺地把福格特称作“帝国縮小者”(«*Minderer des Reichs*») 与中世紀德国帝王常用的称号“帝国扩大者”(«*Mehrer des Reichs*»)相对照。并参看本卷第 566 頁。
- 小德意志派报刊是反映主張建立小德意志的人的观点的报刊，他們贊成在普魯士领导下統一德国，而把奥地利排斥在外。——第 513 頁。
- 457 見 1859 年 10 月 27 日“总汇报”第 300 号。——第 519 頁。
- 458 “时代呼声”(«*Stimmen der Zeit*»)是德国小資產階級的月刊；自 1858—1862 年由阿·科拉切克首先在哥达出版，后来在魏瑪、萊比錫、海德爾堡和維也納同时出版。
- “月刊”(«*Monatsschrift*»)是德国小資產階級的杂志“德国政治、科学、艺术和生活月刊”(«*Deutsche Monatsschrift für Politik,*

- Wissenschaft, Kunst und Leben»)的簡称, 1850年由阿·科拉切克在斯图加特出版, 1851年在不来梅出版。——第519頁。
- 459 “每日電訊”(《*Daily Telegraph*》)是英国自由派的日报, 从十九世紀八十年代起是英国保守派的日报; 1855年至1937年用这一名称在倫敦出版; 1937年同“晨邮报”合并以后改名为“每日電訊和晨邮报”(《*Daily Telegraph and Morning Post*》)。——第520頁。
- 460 指德意志联邦——見注396。——第527頁。
- 461 “关于意大利事件的通信。1859年1月至5月。按女王陛下手諭在1859年提交議會两院”倫敦版(《*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the Affairs of Italy. January to May 1859. Presented to both Houses of Parliament by Command of Her Majesty. 1859*》. London)。——第528頁。
- 462 圣馬丁門劇場是巴黎的一个剧院, 1851年十二月政变时, 在該剧院附近曾发生波拿巴兵痞毆打共和党人的事件。——第528頁。
- 463 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見注42。
七年战争——見注45。——第528頁。
- 464 巴塞尔条約——見注192。——第529頁。
- 465 馬克思指的是法国、奥地利和英国之間于1815年1月3日在維也納會議时期簽訂的关于反对俄国和普魯士的一个秘密同盟条約, 其目的是不让普魯士完全占領薩克森国王的領地, 并且阻撓把前华沙大公国的全部土地并入俄国。这一秘密条約的簽訂, 反映了以往参加反拿破侖同盟各国之間的矛盾急剧尖銳化, 几乎发展成公开的冲突。——第529頁。
- 466 指1821年10月英国国王乔治四世訪問汉諾威时, 由梅特涅和卡斯尔里簽訂的奥地利和英国之間的一項协定。該协定旨在反对俄国在希腊問題上所采取的政策。——第529頁。
- 467 維拉弗兰卡和約——見注324。——第530頁。

- 468 指薩特馬爾和約，這是在匈牙利民族解放運動失敗以後，哈布斯堡王朝和匈牙利貴族於 1711 年 5 月 1 日在薩特馬爾城（匈牙利）所訂立的一項協定。薩特馬爾和約鞏固了哈布斯堡王朝在匈牙利的統治，而且也加強了匈牙利貴族統治農民的權力。同時，按照薩特馬爾和約的規定，貴族還從哈布斯堡王朝手中得到了一系列政治上的讓步。——第 530 頁。
- 469 指英國、俄國、奧地利和普魯士為一方，土耳其為另一方於 1840 年 7 月 15 日所簽訂的倫敦公約，公約規定向土耳其蘇丹提供軍事援助，去反對幕後受到法國支持的埃及的帕沙穆罕默德-阿利。倫敦公約反映了歐洲列強，主要是英國、法國和俄國在爭奪近東霸權中的競爭。——第 531 頁。
- 470 根據英國政府和西西里王國（那不勒斯王國）政府在 1816 年簽定的條約，西西里王國不得給予其他國家以有損英國利益的貿易特權。1838 年那不勒斯國王授予法國公司在西西里島開採硫磺的專利權，結果引起了英國的強烈抗議。為了迫使那不勒斯國王撤銷自己的決定，英國政府於 1840 年命令它的地中海艦隊開始軍事行動。那不勒斯被迫實現了英國的要求。——第 531 頁。
- 471 1858 年 8 月，俄國和撒丁王國達成了一項協定，使俄國的一家輪船和貿易公司暫時享有利用皮蒙特港維拉弗蘭卡東部的權利，該港位於地中海尼斯附近，是專供船隻停泊和修理以及裝添燃料用的。
1853 年，普魯士向奧登堡公國購買了亞德灣的一部分岸邊地帶，用於建立軍港（軍港取名威廉港，建於 1855—1869 年）。——第 532 頁。
- 472 «La vraie question. France—Italie—Autriche». Paris, 1859.
——第 533 頁。
- 473 1846 年 2 月，波蘭各地準備舉行以波蘭民族解放為目的的起義。起義的主要發起人是波蘭革命民主主義者（鄧波夫斯基等人）。但是由於貴族階級分子的背叛和起義領導人被普魯士警察當局逮捕，總起義被破壞了，只有個別地方爆發革命。2 月 22 日，起義者僅僅在按照維也納

- 条約于 1815 年宣布为奥地利、俄国和普魯士保护下的自由城的克拉科夫取得了胜利，并建立了国民政府，該政府发表了廢除封建义务的宣言。克拉科夫起义于 1846 年 3 月初被鎮压下去。1846 年 11 月奥地利、普魯士和俄国签订了关于克拉科夫并入奥地利帝国的条約。——第 534 頁。
- 474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9 卷第 405—417 頁。——第 534 頁。
- 475 «La foi des traités, les puissances signataires et l'empereur Napoléon III». Paris, 1859. ——第 534 頁。
- 476 指 1847 年 11 月 8 日（20 日）的敕諭；根据該敕諭規定，地主領地凡因債務而拍卖时，农奴有权贖买自己和土地（詳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2 卷第 723—724 頁）。——第 535 頁。
- 477 見卡拉姆津“俄罗斯国家历史”1835 年圣彼得堡版第 11 卷第 1 章第 23 頁。——第 536 頁。
- 478 P. Dolgoroukow. «La vérité sur la Russie». Paris, 1860. ——第 536 頁。
- 479 俄国竭力要巩固自己在巴尔干的勢力，因而支持巴尔干各国人民进行反对土耳其統治的民族解放运动。俄国同也想加强自己在巴尔干的勢力的法国一起，共同支持莫尔达維亚和瓦拉几亚合并和建立羅馬尼亚国家的願望。1859 年 1 月，在俄国和法国的协助下，庫扎上校被选为这两个公国的君主（执政者）。統一的羅馬尼亚国家建于 1862 年。——第 536 頁。
- 480 “普魯士周刊”（«Preußisches Wochenblatt»）是德国保守派的周报，1851—1861 年在柏林出版。——第 536 頁。
- 481 涅米罗夫會議从 1737 年 8 月 15 日至 11 月 11 日在乌克兰的一个小城涅米罗夫举行，它是在俄土战争时期（1735—1739）由土耳其倡議召开的，1737 年奥地利站在俄国一方参加战争。俄国代表团提出把莫尔达維亚和瓦拉几亚变成俄国保护下的独立公国，作为訂立和約的条件之一。土耳其拒絕了在會議上提出的大多数建議，重新采取了軍事行动。

福克夏尼會議 从 1772 年 7 月 27 日至 8 月 28 日在福克夏尼小城（羅馬尼亞的莫尔达維亞）舉行，其目的是停止土耳其于 1768 年發動的俄土戰爭。俄方在會議上同時也提出了讓瓦拉几亞和莫尔达維亞在歐洲列強共同保護下獲得獨立的建議，然而土耳其拒絕了俄國代表們提出的這一要求及其他要求。會議毫無結果，戰爭又重新爆發。——第 537 頁。

482 見注 176。——第 537 頁。

483 1831 年組織規程是多瑙河各公國（莫尔达維亞和瓦拉几亞）的第一部憲法。1828—1829 年俄土戰爭結束後，根據 1829 年締結的阿德里安堡和約規定的條件，俄軍占領了這些公國，這部憲法是按照這些公國的俄國行政當局首腦巴·德·基謝廖夫的建議通過的。根據組織規程，每個公國的立法權交給大土地占有者選出的議會，而行政權交給由土地占有者、僧侶和城市的代表所選出的終身國君。規程鞏固了大貴族和上層僧侶的統治地位，保持了原有的封建制度，同時，規程列入了若干資產階級的改革：廢除國內關稅，實行貿易自由，司法和行政分立等。在 1848 年革命時期，組織規程被廢除。——第 537 頁。

484 “赫特里”（更確切些說應當是“費里克·赫特里”）是希臘的一個秘密團體，成立於 1814 年，中心在敖德薩，在希臘各大城市均有支部；該團體的目的是準備武裝起義反對土耳其的統治。沙皇政府曾暗中支持“赫特里”。——第 538 頁。

485 關於路易十八干涉西班牙，見注 223。——第 538 頁。

486 納瓦林會戰（納瓦林是希臘的城市和港口）是 1827 年 10 月 20 日土埃艦隊同由英國海軍上將愛·康德林頓指揮的英法俄聯合分艦隊之間的一場會戰。歐洲列強把該聯合分艦隊開進希臘領海，是為了武裝調停土耳其和希臘起義者之間的戰爭。在土耳其司令部拒絕停止對希臘居民進行殘酷迫害以後開始的這一會戰，使土埃艦隊全軍覆沒，並加速了 1828—1829 年俄土戰爭的爆發，在這一戰爭中俄國取得了勝利。在納瓦林會戰中起了杰出作用的是俄國分艦隊，特別是由米·彼·拉扎列夫指揮的“阿速夫號”旗艦。——第 538 頁。

- 487 “泰晤士报”（*The Times*）是英国一家最大的保守派日报；1785年创刊于伦敦。——第539頁。
- 488 “青年意大利”是意大利资产阶级革命家的一个秘密组织，存在于1831—1848年；创始人是馬志尼。它所抱的目的是“从下面”（用革命方法）争取意大利的统一并成立意大利共和国。——第539頁。
- 489 指在尼古拉一世調停下普魯士和奧地利的代表1850年10月在華沙所進行的談判，其目的是調整兩國之間的關係，因為這兩個國家爭奪德意志霸權的鬥爭，在1848—1849年革命以後，特別是在由於黑森選帝侯國（見注396）和由於什列斯維希—霍爾施坦而引起了衝突之後，更加尖銳了。儘管普魯士同丹麥在1850年7月訂立了柏林和約，規定要在什列斯維希—霍爾施坦恢復革命前情況，但普魯士仍繼續幫助這兩個公國同丹麥作鬥爭。奧地利首相施瓦爾岑堡要求允許奧地利軍隊進入什列斯維希—霍爾施坦，以便完全制服這兩個公國，但是遭到了普魯士政府的反對。不願意看到普魯士強大並力圖保持德意志封建割據狀態的尼古拉一世皇帝在華沙表示堅決支持奧地利。普魯士和奧地利之間的衝突，1850年11月底兩國政府首腦在捷克城市奧里繆茨（奧洛摩茨）舉行會談時得到了解決。按照1850年11月29日簽署的奧里繆茨協定，普魯士被迫放棄它要主宰德意志的貪求，並且在什列斯維希—霍爾施坦和黑森選帝侯國問題上向奧地利讓了步。由於簽署了這一協定，派奧地利的一個軍團前往霍爾施坦。——第540頁。
- 490 指1825年10月16日（4日）俄國駐法國大使波茨措-迪-博爾哥給總理大臣涅謝爾羅迭伯爵的緊急報告。這個緊急報告是對1825年8月18日（6日）涅謝爾羅迭按亞歷山大一世的指示草擬的通令的答复，通令征詢俄國駐外使節對西方強國在東方問題上所採取的對俄政策的實質和對俄外交路線的意見。——第541頁。
- 491 Th. Lapinski. «Feldzug der Ungarischen Hauptarmee im Jahre 1849». Hamburg, 1850. ——第544頁。
- 492 B. Szemere. «Hungary, from 1848 to 1860». London, 1860. ——第545頁。

- 493 指的是“斯拉夫各国”地图，是捷克斯拉夫学家巴維尔·約瑟夫·沙法里克为他的“斯拉夫民族志”(«Slovanský národopis»)一书繪制的，該书出版于1842年。——第548頁。
- 494 “思想和行动”(«Pensiero ed Azione»)是由馬志尼主編的意大利資產階級民主派的机关报；1858—1859年在倫敦出版，1860年在罗迦諾和热那亚出版，每月两次。
- 下面引证的馬志尼的宣言，由馬克思譯成了英文，并加上了簡短的引言发表在“紐約每日論壇报”上(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406—407頁)。——第550頁。
- 495 “路易之歌”是中世紀一位无名詩人的詩作，用法兰克方言写于九世紀末。該詩是献給西法兰克王路易三世的頌詞，贊揚他在881年打败了諾尔曼人。——第551頁。
- 496 1849年6月11日，小資產階級民主派領袖賴德律-洛兰在立法議会上提議把路易·波拿巴总统和他的部长們交付法庭审判，因为他們違背宪法，即派法国軍隊包圍羅馬，以便消灭羅馬共和国和恢复教皇的世俗权力。議會中保守的多数派否决了这一提議之后，小資產階級民主派企图在1849年6月13日組織抗議違背宪法的大規模游行示威。游行示威被政府軍隊驅散。山岳党——立法議會中的小資產階級党团——的一些著名活动家被剝夺了議員的权利并遭到了迫害；其中一部分流亡国外。6月13日事件暴露了山岳党領袖們的犹豫不決以及他們領導人民群众革命运动的无能为力(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39—73頁)。——第552頁。
- 497 “小拿破侖”是維克多·雨果在1851年法国立法議會會議上发表演說时給路易·波拿巴起的綽号；1852年，雨果的抨击性著作“小拿破侖”(«Napoléon le Petit»)問世以后，这一綽号得到了广泛的流傳。——第554頁。
- 498 1852年法国政府制定了一个从非洲(包括葡屬非洲領地)把黑人迁移到法屬西印度殖民地种植場去劳动的計劃。这个实际上恢复了奴隶买卖的計劃的实行，引起了法国和葡萄牙之間的冲突。——第555頁。

499 馬克思所指的 *«lois de sûreté publiques»* (社会治安法) 即 1858 年 2 月 19 日由立法团通过的所謂“嫌疑犯处治法”。該法律授予政府和皇帝以无限权力，可以把一切敌視第二帝国制度的嫌疑分子流放到法国和阿尔及利亚各地去，或者驅逐出法国領土。——第 555 頁。

500 1858 年 1 月 27 日的命令，按照西班牙(在西班牙，軍区的司令——鎮守司令握有絕對权力)的榜样，把第二帝国的領土划分为五个軍区，分別由元帅管轄。

关于摄政和建立樞密院的命令是在 1858 年 2 月 1 日，在奥尔西尼行刺拿破侖第三以后不久頒布的。佩利西埃为樞密院成員之一，如果皇太子即位时年岁尚幼，樞密院就成为摄政會議。——第 556 頁。

501 拿破侖第三是拿破侖第一的弟弟，即 1806—1810 年期间占据荷兰王位的路易·波拿巴的儿子。馬克思称拿破侖第三为“奥斯特利茨会战的侄子”，是暗示下面这个事实，即 1851 年十二月二日的政变正好安排在拿破侖第一粉碎了同盟国俄奥軍队的奥斯特利茨会战(1805 年 12 月 2 日)的周年紀念日。——第 556 頁。

502 曾发表文章譴責第二帝国制度的法国政論家蒙塔郎貝尔，在 1858 年底受到了法庭审讯。拿破侖第三赦免了被告，但是，蒙塔郎貝尔拒絕赦免，要求宣判无罪。馬克思諷刺地把这个案件比作是对十七世紀英国資產階級革命的卓越活动家之一約翰·汉普敦的审讯，汉普敦在 1636 年曾拒絕向皇家收稅官交納未經下院批准的賦稅——“造船費”。对汉普頓的审判案大大促进了英国社会中反对专制政体的反对派的壮大。

蒲魯东于 1858 年在布魯塞尔出版了“教会所恪守的正义”(«La Justice poursuivie par L'Eglise»)这本小册子，在小册子中，蒲魯东把波拿巴王朝和奥尔良王朝作了对比以后，认为奥尔良王朝宣布的带有必須进行一些民主改革的保留条件的管理原則比較好。馬克思諷刺地把这些保留条件比作是 *Acte additionel* (补充条例)是拿破侖第一在他从厄尔巴島回来以后于 1815 年在法国实行的宪法条例。——第 556 頁。

- 503 指 1858 年 3 月 6 日在索恩河岸夏龙发生的軍队的共和主义发动,发动遭到了失敗。——第 556 頁。
- 504 因法国政府曾指責英国允許政治侨民避难,故帕麦斯顿在法国的威胁下于 1858 年 2 月在下院提出了一个外侨管理法案。根据这一法案,参加阴谋活动的外国人,同英国人一样,要受到严厉的惩罚。这个法案在群众抗議运动的压力下被下院否决了,帕麦斯顿也被迫辞职。——第 556 頁。
- 505 指 1858 年 7 月法国皇帝拿破侖第三和撒丁政府首脑卡富尔在普倫貝尔(法国)簽訂的一项关于法国和撒丁王国(皮蒙特)在对奥地利作战中結成同盟的秘密协定。拿破侖第三答应給卡富尔以軍事援助,以便使倫巴第和威尼斯摆脱奥地利的統治并把它們并入撒丁王国,王国应为此把薩瓦和尼斯割让給法国。在普倫貝尔会晤期間,决定了法国和撒丁对奥地利作战的問題,这场战争爆发于 1859 年 4 月(見注 324)。
- 1858 年秋,帕麦斯顿(他当时领导反对得比一迪斯累里托利党内閣的輝格党反对派)应拿破侖第三的邀請,到貢比臬去闡明他对行将爆发的法国反对奥地利的战争的态度。在会見时,帕麦斯顿并不反对把奥地利人从意大利赶出去。——第 557 頁。
- 506 暗指 1839 年在巴黎出版的路易·波拿巴“拿破侖观念”(Napoléon-Louis Bonaparte. «Des idées napoléoniennes». Paris, 1839) 一书。——第 558 頁。
- 507 “經濟学家”(«*The Economist*»)是英国的經濟和政治問題周刊,1843 年起在倫敦出版,大工业资产阶级的机关刊物。——第 558 頁。
- 508 «Napoléon III et la question roumaine». Paris, 1859. ——第 561 頁。
- 509 艾·阿布“一八六〇年的普魯士”1860 年巴黎版 (E. About. «La Prusse en 1860». Paris, 1860)。——第 561 頁。
- 510 «Correspondence secrète et confidentielle de Napoléon».

- 7 vols. Paris, 1817. ——第 562 頁。
- 511 馬克思用 腊腸閱兵 來譏諷路易·波拿巴總統于 1850 年 10 月 10 日在薩托里平原（凡爾賽附近）舉行的總閱兵。在總閱兵時，路易·波拿巴用腊腸、冷盤野味、香檳酒和雪茄烟款待士兵和軍官們，企圖借此收買軍隊，以便來日發動政變。
- 關於波拿巴的意大利戰爭和遠征埃及，見注 80 和 82。
- 關於路易·波拿巴的斯特拉斯堡冒險和遠征布倫，見注 344。
- 霧月十八日——見注 83。——第 562 頁。
- 512 指巴黎條約，即 1856 年 3 月 30 日由法國、英國、奧地利、撒丁、普魯士和土耳其的代表為一方和俄國代表為另一方在巴黎會議上所簽訂的和約，也就是結束了 1853—1856 年的克里木戰爭的和約。在戰爭中遭到失敗的俄國應當讓出多瑙河河口和南貝薩拉比亞的部分地區，放棄對多瑙河各公國的保护權，同意黑海中立化，即禁止外國的軍艦通過海峽，同意俄國和土耳其在黑海不能有海軍軍械庫和艦隊；俄國把卡爾斯歸還給土耳其，以此來換回聯軍在克里木所占領的塞瓦斯托波爾和其他城市。在會議上，法國不支持英國要高加索脫離俄國的要求，不支持奧地利要貝薩拉比亞併入土耳其的要求。在會議上形成的法俄兩國的接近，後來有了加強。——第 562 頁。
- 513 巴贊庫爾“塞瓦斯托波爾陷落前的克里木遠征”第 1—2 卷 (Bazan-court. «L' Expédition de Crimée jusqu'à la prise de Sébastopol». Tomes I—II)。第一版 1856 年出版於巴黎。——第 562 頁。
- 514 三十年戰爭——見注 39。——第 568 頁。
- 515 暗指 1797 年 10 月 17 日的康波福米奧和約——見注 151。——第 572 頁。
- 516 «La politique anglaise». Paris, 1860. ——第 576 頁。
- 517 聯邦院 是瑞士聯邦議會（國會）的兩院之一。另一院為國民院。——第 576 頁。

518 紐沙特尔 (德国称作: 諾恩堡) 从 1815 年起是瑞士的一个州 (过去是普魯士霍亨索倫王朝統治下的一个小公国), 同时又隶属于普魯士君主国。由于 1848 年 2 月资产阶级革命的結果, 紐沙特尔宣布脱离普魯士而成为独立的共和国。由此发生了普魯士同瑞士共和国之間的冲突, 这一冲突于 1856 年秋在瑞士当局把得到普魯士国王支持的、没有成功的紐沙特尔保皇党人暴动的参加者逮捕以后, 达到了特別尖銳的程度。1857 年春, 由于其他列强 (其中包括法国) 的外交干涉, 冲突才得到解决; 普魯士国王不得不放棄对紐沙特尔的要求, 而瑞士政府也釋放了被捕的保皇党人。——第 577 頁。

519 宗得崩德 是瑞士七个經濟落后的天主教州在 1843 年締結的单独联盟, 目的是要反抗瑞士实行进步的资产阶级改革, 維護教会和耶穌会教徒的特权。1847 年 7 月, 瑞士代表會議关于解散宗得崩德的決議成了宗得崩德 11 月初向其他的州采取軍事行动的导火綫。1847 年 11 月 23 日宗得崩德的軍隊被联邦政府的軍隊击潰。在宗得崩德进行战争期間, 反动的西欧强国奥地利和普魯士企图干涉瑞士, 維護宗得崩德。路易-菲力浦政府保护了宗得崩德, 这实际上就是采取了支持这些强国的立場。

达普谷地 是位于瑞士瓦得州和法国交界处的一个山谷。1814—1815 年維也納會議承认它是瑞士領土, 但后来法国拒絕承认这一决定。1862 年以前, 达普谷地由于其战略意义历来是法国和瑞士必爭之地。1862 年, 瑞士把这个谷地的一部分割让給法国, 从路易·波拿巴政府得到了領土賠償。——第 578 頁。

520 瑞士联邦委員會在 1859 年 3 月 14 日发送給一些国家的照会中声称: 意大利境内一旦发生战争, 瑞士將維護自己的領土不受侵犯和保持中立, 并根据維也納會議的決議, 將占領薩瓦中立地区 (北薩瓦)。

宣布瑞士“永久中立”的維也納會議, 在 1815 年 6 月 9 日的最后決議案中, 宣布北薩瓦的沙布累省和弗西尼省为非中立地区, 并規定, 在出現战争威胁或同瑞士为邻的各国之間发生战争的情况下, 瑞士有权用自己的武装部队占領这两个省, 而賁成撒丁王国在上述情况下必須从这些省撤出自己的軍隊。——第 578 頁。

- 521 馬克思引用“哀歌”(«Klage»)作为本章的題詞,这是十二世紀一位佚名作者的一首中古德文叙事詩;馬克思可能引自“尼貝龙根之歌”的附录。
“伊威恩,或獅子伴随的騎士”是中世紀德国詩人哈特曼·馮·奧艾的一首华丽的叙事詩,該詩的基本思想是为荣誉牺牲个人幸福;作者是根据十二世紀法国作家克雷田·德·特魯瓦的同名小說改写成德文的。——第 588 頁。
- 522 “帝国大事記”是十二世紀的一首中古德文叙事詩,以半神話的形式叙述了从凱撒到 1147 年的羅馬和德意志帝王的历史。我們現有的該詩印本的作者据估計是十二世紀上半叶的德国詩人康拉德。——第 589 頁。
- 523 “世紀報”(«Le Siècle»)是 1836 年至 1839 年在巴黎出版的日报;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它反映了单纯要求温和的宪政改革的那部分小资产阶级的观点;五十年代成了温和共和派的报纸。——第 591 頁。
- 524 “立宪主义者报”(«Le Constitutionnel»)是法国资产阶级的日报;1815 年至 1870 年在巴黎出版;在四十年代是奥尔良党人温和派的机关报;它在 1848 年革命时期反映了聚集在梯也尔周围的反革命资产阶级的观点;1851 年十二月政变后成了波拿巴派的报纸。——第 591 頁。
- 525 “日内瓦評論”(«Revue de Genève»)是瑞士资产阶级报纸“日内瓦評論和瑞士报纸”(«Revue de Genève et Journal Suisse»)的简称。該报是激进党的机关报,1842 年起在日内瓦用法文出版;該报用这个名称出版到 1861 年。在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具有波拿巴派的倾向。1861 年与“瑞士民族报”合并。合并后改名“瑞士民族报”,副标题是“日内瓦評論和瑞士报纸”。——第 592 頁。
- 526 拿破侖亲王子于 1854 年在克里木指揮一个师。他没有足够的軍事才能,在軍隊中沒有声望,因此托病力求解脫軍事领导职务,而后便擅自返回巴黎。——第 594 頁。
- 527 馬克思暗指关于拿破侖第三是非婚生子的傳言,他的父亲被正式认为

- 是拿破侖第一的弟弟, 荷兰国王路易·波拿巴。——第 595 頁。
- 528 国民院——見注第 517。——第 597 頁。
- 529 昂·佩特丹“論薩瓦的合并”1859 年巴黎版(A. Petétin. «De l'annexion de la Savoie». Paris, 1859)。——第 598 頁。
- 530 柯利班 是古代崇奉女神基別拉的祭司; 他們在举行宗教仪式时奏乐舞蹈, 兴奋若狂。——第 599 頁。
- 531 “祖国报”(«*La Patrie*») 是法国的一家日报, 1841 年創刊; 1850 年該报反映联合保皇派、即所謂秩序党的利益; 1851 年十二月二日政变以后成了波拿巴派的报纸。——第 602 頁。
- 532 Vegezzi-Ruscalla. «*La nazionalità di Nizza*». 3ed. Nizza, 1860. ——第 604 頁。
- 533 “窩州新聞”(«*Nouvelliste Vaudois*») 是瑞士的一家資產階級报纸。1798 年創刊, 1914 年以前在洛桑出版。
“新苏黎世报”(«*Neue Zürcher-Zeitung*») 是瑞士的一家資產階級报纸; 1821 年开始用这个名称在苏黎世以德文出版; 在十九世紀五十至六十年代采取了亲波拿巴的立場。——第 604 頁。
- 534 指 *Société générale du Crédit Mobilier* (动产信用公司)——貝列拉兄弟在 1852 年开办的一家法国大股份公司。該公司同拿破侖第三政府有密切联系, 在政府的庇护下进行投机活动。它大規模地参加了法国、奥地利、匈牙利、瑞士、西班牙和俄国的铁路建設。1867 年該公司破产, 1871 年倒閉。——第 604 頁。
- 535 “星期六評論”(«*Saturday Review*») 是英国保守派周刊“政治、文学、科学和艺术星期六評論”(«*Saturday Review of Politics, Literature, Science and Art*») 的簡称, 1855—1938 年在倫敦出版。——第 606 頁。
- 536 指瑞士的大学生联合会“海尔維第”, 于 1858 年由阿劳、洛桑和伯尔尼等城市的同名联合会(以伯尔尼为中心)合并而成。在瑞士的許多城市

都有带自由主义色彩的类似的联合会，而有的联合会甚至带有民主主义的色彩（第一个“海尔維第”联合会于1832年在苏黎世建立）。馬克思提到的“海尔維第”联合会曾于1859—1860年反对过波拿巴派把薩瓦划归法国的計劃。

“阿尔高消息报”（*«Aargauer Nachrichten»*）是瑞士的一家资产阶级自由派报纸，1854—1918年在阿劳（阿尔高州）出版。——第611頁。

537 “希望报”（*«L'Espérance»*）是波拿巴派的报纸，1859—1862年在日内瓦出版。——第611頁。

538 “比利时独立报”（*«L'Indépendance belge»*）是资产阶级日报，1831年在布鲁塞尔创刊；是自由派的机关报。——第613頁。

539 “两大陆评论”（*«Revue des deux Mondes»*）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政论性的双周刊，1829年起在巴黎出版。——第614頁。

540 “辩论日报”（*«Journal des Débats»*）是法国资产阶级的日报“政治和文学辩论报”（*«Journal des Débats politiques et littéraires»*）的简称，1789年创刊于巴黎。七月王朝时期为政府的报纸，奥尔良派资产阶级的机关报。1848年革命期间，该报反映了所谓秩序党的反革命资产阶级的观点。1851年政变以后成了温和奥尔良派的机关报。——第614頁。

541 联合派（*«fusion»*——“联合”）主张拥护法国波旁王朝长系的正统派同拥护幼系的人即奥尔良派联合。

Collège de France（法兰西学院）是法国最早的高等学校之一；1530年在巴黎建立。

Membres de l'Institut de France——法兰西研究院院士。法兰西研究院是法国最高的科学和艺术机关，由包括法兰西科学院在内的许多最重要的科学院联合组成。——第614頁。

542 “欧洲评论”（*«Revue européenne»*）是波拿巴派的月刊，1859—1861年在巴黎出版。1862年与“现代评论”杂志合并。——第614頁。

- 543 指普瓦提埃大街委员会，即所謂秩序党的领导机关。秩序党是法国两个保皇派——正統派（波旁王朝的拥护者）和奥尔良派（奥尔良王朝的拥护者）——的联合組織。这个产生于 1848 年的保守的大资产阶级的政党，从 1849 年到 1851 年十二月二日政变期间，在第二共和国的立法議會中一直占据领导地位。路易·波拿巴集团利用了該党反人民政策的破产来达到波拿巴的目的。——第 615 頁。
- 544 “国家报”（《Le Pays》）是法国的一家日报，1849 年创办于巴黎；第二帝国时期（1852—1870）是拿破侖第三政府的半官方机关报；該报有一个小标题“帝国报”（《Journal de l'Empire》）。——第 615 頁。
- 545 科倫大教堂中有一个三圣王的圣堂，按基督教的說法，他們是到伯利恒来朝拜剛降生的耶穌的三个星相家。根据傳說，这三个星相家的遺骸就保存在这个圣堂里（参看海涅“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話”第 7 章）。——第 617 頁。
- 546 鼠塔 是位于宾根城下萊茵河中間的岩石上的一个塔；那里，河水經過岩石而形成的狭窄的河身被称为 宾根之穴。有人认为，塔的名称同关于美因茲主教哈托（十世紀）的傳說有关，他由于把飢餓者燒死而受到懲罰，在这个塔中被老鼠吃掉。——第 620 頁。
- 547 見注 491。——第 623 頁。
- 548 “关于匈牙利事件的函件。1847—1849 年。根据女王陛下的命令于 1850 年 8 月 15 日提交議會两院” 倫敦版（《Correspondence relative to the Affairs of Hungary. 1847—1849. Presented to both Houses of Parliament by Command of Her Majesty. August 15, 1850》. London）。——第 625 頁。
- 549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412—415、443—444 頁。——第 626 頁。
- 550 指意大利革命家馬志尼的拥护者于 1853 年 2 月 6 日在米兰发动的、受到匈牙利革命流亡者支持的起义。起义者大多数是意大利的爱国工人，他們的目的是要推翻奧地利在意大利的統治。可是，由于起义是根

- 据密謀性策略組織的，又沒有估計到現實的形勢，所以很快就遭到了失敗。馬克思在他的許多文章（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593—594、599—602、624—625頁）中對這次起義作了評價。——第626頁。
- 551 歐洲民主派中央委員會 是根據馬志尼的倡議於1850年6月在倫敦成立的。該委員會是聯合各國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流亡者的組織。這個無論在其成分上和思想立場上都極端複雜不一的組織存在得不久；由於意大利和法國民主派流亡者之間的关系尖銳化，歐洲民主派中央委員會於1852年3月實際上已經瓦解。——第628頁。
- 552 指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流亡中的大人物”這本小冊子的手稿（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259—380頁）。——第628頁。
- 553 見卡·馬克思“希爾施的自供”一文（“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44—48頁）。——第628頁。
- 554 見馬克思“切爾克西亞的叛徒”一文（“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179—180頁）。——第629頁。
- 555 “君士坦丁堡報”（*Journal de Constantinople*）是一家土耳其報紙，從1846年起用法文出版，由土耳其政府給予津貼，是一個半官方報紙，同時也是法國影響在土耳其的傳播者。每月出版六次。——第629頁。
- 556 見卡·馬克思“歷史上有趣的一頁”一文（“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508—515頁）。——第629頁。
- 557 宗教條約 是天主教會的首腦羅馬教皇與某些國家的政府簽訂的條約，這一條約確定了天主教會在國家中的地位與特權。根據1855年奧地利和羅馬之間簽訂的宗教條約，奧地利的天主教會獲得了自治權、與羅馬直接聯系的權利、承受財產的權利，設立了最高宗教檢查機構並對學校施加巨大的影響。——第631頁。
- 558 指奧地利皇帝弗蘭茨-約瑟夫1860年10月20日頒布的十月宣言，宣言准許帝國的各民族區享有某種自治權。宣言對聯邦國家制度的擁護

- 者特别是对匈牙利人作了不彻底的让步,但对集权派、主要是奥地利德意志人来说,则是对立的。然而,翌年初,十月宣言就由于颁布了1861年2月26日的特許状而被取消,后者重新提出了奥地利帝国的集中制原则。——第635頁。
- 559 *«In usum delphini»*——直譯是:“供皇太子用”,轉意是:經過刪削、篡改。1668年,为法国的王位继承者(皇太子)出版了一批古代經典作家的作品,书中“可非难”之处均被删去,此后,这一用語便流傳起来。——第635頁。
- 560 1849年8月13日,匈牙利革命軍队在維拉戈什向尼古拉一世派往匈牙利鎮压革命的沙皇軍队投降,虽然匈牙利軍队还有力量繼續作战并拥有相当可观的資源,但是,軍队总司令戈尔盖,为了匈牙利貴族中的反革命分子和温和的自由派分子的利益而叛变投降。——第635頁。
- 561 見注261。——第636頁。
- 562 *«Laissez aller et laissez faire»*——“听之任之”——是資產階級自由貿易派經濟學家的信条,他們主張貿易自由,主張国家不干涉經濟範圍內的任何事务。——第642頁。
- 563 “国民报”(«*Le National*»)是1830年至1851年在巴黎出版的一家法国日报;是温和的資產階級共和派的机关报。——第642頁。
- 564 “布勒斯劳报”(«*Breslauer Zeitung*»)是1820年在布勒斯劳(弗罗茨拉夫)創立的德文日报,十九世紀五十至六十年代奉行保守派的方針。——第647頁。
- 565 見卡·馬克思“柏林‘国民报’致初选人”一文(“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234—246頁)。
- 席尔达——城市名称,該城居民——席尔达人是十六世紀末流傳在德国民間的同名故事(«*Schildbürger*»)里所描写的人物,他們是庸人的无知和愚蠢的象征。——第648頁。
- 566 “新萊茵报”用这一称呼来諷刺“国民报”的讀者,暗指当时一本名著的副标题:卡·罗泰克“从历史認識的萌芽时期到現在的全部历史;供有

思考力的历史之友参考” 1813—1818 年夫賴堡和康斯坦茨版(K. Rotteck. «Allgemeine Geschichte vom Anfang der historischen Kenntniß bis auf unsere Zeiten; für denkende Geschichtsfreunde». Freiburg und Konstanz, 1813—1818)。——第 648 頁。

567 这一首两行的短詩是馬克思从英国詩人亚历山大·波普于 1728—1743 年所写的諷刺詩集“邓斯之歌”(«Dunciad») 第一册中引来的。詩集的名字来自英語«dunc», 意即：蠢貨、笨蛋。作家在詩中辛辣地描繪了他的論敌，把他們安頓在 *Dulness* (愚昧) 的王国里。启蒙运动时期最重要的主题：理智对愚昧和野蛮的斗争是“邓斯之歌”的基础。——第 649 頁。

568 “新奥得报”(«*Neue Oder-Zeitung*») 是德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日报，1849—1855 年在布勒斯劳(弗罗茨拉夫)以本名出版。該报是在 1846 年出版的天主教反对派的“奥得总汇报”(«*Allgemeine Oder-Zeitung*») 編輯部发生分裂之后于 1849 年 3 月創办的。“新奥得报”采取了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方針，在五十年代，它被认为是德国最激进的报纸，受到了政府机关刊物的迫害。报纸的領導人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泰梅、施泰因和埃尔斯納(后者从 1855 年 9 月起任該报主編)。1855 年馬克思是該报駐倫敦的通訊員。——第 650 頁。

569 “西里西亚报”(«*Schlesische Zeitung*») 是德国的一家日报，从 1742 年起在布勒斯劳出版；在 1848—1849 年革命前夕和革命期間是君主立宪集团的机关报。——第 650 頁。

570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6 卷第 355—356 頁(“施泰因”一文)。

协商派議會(协商議會)即普魯士国民議會，1848 年 5 月为“同国王协商”制定宪法在柏林召开。1848 年 12 月普魯士政变时被解散。

欽定宪法是在 1848 年 12 月 5 日解散普魯士国民議會的同时頒布的。根据这个宪法，实行两院制，第一議院因年齡和財產資格的限制变成了享有特权的“貴族院”；根据 1848 年 12 月 6 日的选举法，只有所謂“独立的普魯士人”才有資格参加选举第二議院議員的两級选举。按照宪法，国王享有广泛的权力，并且明文規定，可以修改宪法条文，这一切

便利了反革命势力以后的进攻。——第 651 頁。

571 1849 年 4 月 28 日，勃兰登堡—曼托伊費尔政府解散了普魯士国民議会第二議院，这个議院是根据 1848 年 12 月 5 日的反民主的欽定宪法选举出来的。解散的原因是：在第二議院里有相当数量的反对派分子，特别是他們贊成法兰克福全德国民議会制定的帝国宪法。——第 651 頁。

572 “笨拙”（《Punch》）是英国資產階級自由派的幽默周刊“笨拙，或倫敦喧声”（《Punch, or the London Charivari》）的簡称，1841 年起在倫敦出版。

“喧声”（《Kladderadatsch》）——諷刺性漫画周刊，1848 年起在柏林出版。——第 651 頁。

573 旨在限制和禁止从国外輸入谷物的 谷物法，是为大地主的利益而从 1815 年起在英国实行的。工业資產階級在貿易自由的口号下为反对谷物法而斗争，他們終於使谷物法在 1846 年被廢除。——第 651 頁。

574 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召开的第一屆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于 1848 年 6 月 14—17 日举行。出席大会的有德国各城市的 89 个民主組織和工人組織的代表。代表大会通过決議，将一切民主团体联合起来，并为此成立了区域委员会及其领导机关德国民主派中央委员会，会址設在柏林。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員的有弗呂貝尔、劳、克利盖、梅因，当选为候补委員的有拜尔霍費尔、許帖和安內克。但是由于小資產階級领导的軟弱和动摇，德国民主运动在通过这个決議以后，仍然是涣散的和无組織的。——第 652 頁。

575 馬克思指爱德华·梅因的誹謗性文章“卡尔·福格特对奥格斯堡‘总汇报’和馬克思派的斗争”，載于 1860 年 2 月“自由射手”第 17—21 号。

“自由射手”（《Der Freischütz》）是德国的資產階級报纸，偏重文学和艺术，1825—1878 年在汉堡出版。——第 652 頁。

576 “九月党人”是十八世紀末法国資產階級革命期間雅各宾党人的敌人对雅各宾党人的称呼，这些人誣蔑雅各宾党人在 1792 年九月的日子里

- 极端残酷无情(見注 145)。——第 656 頁。
- 577 利未人——見注 264。——第 659 頁。
- 578 *Magistrat* 在德国是市政府；在英国, *magistrates* 是治安法官, 也是高級警官。——第 661 頁。
- 579 艾希特納赫的游行(确切的名称是: 舞蹈游行)是中世紀以来每年圣灵降临节在卢森堡的城市艾希特納赫举行的游行, 目的是对 1374 年猖獗过的圣維特舞蹈病不再复发表示感謝。游行者不用普通的步伐, 而是做一些前进和后退的复杂动作。——第 662 頁。
- 580 “去意大利, 好啊!” 1859 年伯尔尼和日内瓦福格特出版社版(«Juchhe nach Italia». Bern und Genf, Vogt's Verlag. 1859)。班貝尔格尔的这本“去意大利, 好啊!” 在出版时并没有标明作者。——第 663 頁。
- 581 馬克思諷刺地套用了唐·吉訶德的綽号 愁容騎士, 把芬克叫做 笑容騎士。
- Chevalier sans peur et sans reproche* (大无畏而又无可責难的騎士)是中世紀法国騎士比埃尔·杜·特賴耳·巴亚尔的綽号, 后来已經成为普通用語(無論在直接意义上或是在諷刺意义上)。——第 665 頁。
- 582 馬克思指弗·恩格斯的匿名小册子“波河与萊茵河”(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3 卷第 247—299 頁)。——第 665 頁。
- 583 1848 年 7 月 11 日, 帝国摄政約翰大公到达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法兰克福国民議会的保守派为表示对他尊敬, 举行宴会, 芬克也出席了这次宴会。——第 666 頁。
- 584 *Corpus juris civilis* (民法大全)是調整羅馬奴隶制社会的財產关系的一部民法汇编; 它是六世紀查士丁尼皇帝在位时編纂的。——第 666 頁。
- 585 联合議會是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为了获得向国外借款的保证以摆脱

- 財政困難，于 1847 年 4 月在柏林召集的各省等級議會的聯合會議。由于國王拒絕滿足議會資產階級多數派的最微薄的政治要求，后者拒絕給國王以借款的保證。國王為了進行報復于同年 6 月解散了聯合議會；这样就加重了國內的反抗情緒，加速了德國的革命。——第 667 頁。
- 586 指德國和奧地利資產階級在對待 1848 年維也納十月起義（關於這次起義，見注 111）問題上的反革命立場。在法蘭克福國民議會的多數派和中央政權的活動中特別表現出這種立場，它們以調停為借口實際上陰謀抵制對革命的維也納進行援助。芬克狂熱地支持了這種立場。——第 669 頁。
- 587 見注 456。——第 669 頁。
- 588 大名是中世紀日本的大封建主、領主諸侯。——第 671 頁。
- 589 “行動內閣”是人們對 1848—1849 年革命時期從 1848 年 6 月執政到同年 9 月的普魯士奧爾斯瓦特—漢澤曼內閣的稱呼（見弗·恩格斯的文獻“行動內閣的垮台”，“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5 卷第 460—462 頁）。——第 672 頁。
- 590 *In usum delphini*——見注 559。——第 675 頁。
- 591 指民主協會，該協會于 1847 年秋在布魯塞爾成立。協會把無產階級革命者（其中主要是德國的革命流亡者）、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進步分子團結在自己的隊伍中。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協會的成立起了積極的作用。1847 年 11 月 15 日，馬克思當選為該協會的副主席，比利時的民主主義者律·若特蘭被推選為主席。在馬克思的影響下，布魯塞爾民主協會成了國際民主主義運動的巨大中心之一。在法國資產階級二月革命時期，布魯塞爾民主協會中的無產階級一翼曾設法武裝比利時工人開展爭取民主共和國的鬥爭。但在 1848 年 3 月初馬克思被驅逐出布魯塞爾和協會中最革命的分子遭到比利時當局迫害以後，比利時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就不能領導勞動群眾反對君主政體的運動了。民主協會的活動就成了更狹窄和純地方性的了，到 1849 年，活

动实际上已告停止。——第 680 頁。

- 592 1854 年 3 月 6 日至 18 日在曼彻斯特召开的工人議會，是鉴于 1853 年英国无产阶级群众性罢工运动的高漲，而由以琼斯为首的一批宪章派分子发起建立的。这一批人早在 1853 年底(馬克思在这里把这一日期当做召开工人議会的日期是不确切的)，就提出成立广泛的工人組織“群众运动”的思想，这一組織的任务是把工联以及未加入組織的工人联合起来，而首先是使全国各地的罢工协调起来。这一組織应当由定期召开的工人議會领导，工人議會由沒有加入組織的工人群众大会和工联的會議选出的代表組成。在曼彻斯特召开的工人議會討論并通过了“群众运动”綱領，成立了由五人組成的执行委员会。被选为議會名誉代表的馬克思曾給議會写了一封信(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0 卷第 133—134 頁)，在 3 月 10 日的会上宣讀了这封信。馬克思在信里提出在英国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群众性政党的任务。

但是，組織“群众运动”的尝试沒有成功，因为工联的大多数領袖都不給以支持，同时都对政治斗争抱有成見。1854 年夏季罢工运动的低落，也对广大工人群众参加运动产生了不利的影響。1854 年 3 月以后，工人議會再沒有召开會議。——第 681 頁。

- 593 看来是指巴尔扎克的小說“失去的幻想”。——第 682 頁。

- 594 *Code Napoléon* (見注 242)曾在德国西部和西南部法国人占領的地区实行，萊茵省归并于普魯士后在該省仍繼續采用。——第 688 頁。

- 595 祖国之友协会——十九世紀五十至六十年代存在的由倫敦德国流亡者成立的共和协会；卡·布林德、斐·弗莱里格拉特和菲·霍林格尔等人都是該协会会员。

民族联盟——是德国自由资产阶级的一个政党，它主張在君主专制的普魯士领导下把德国統一成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奥地利除外)；該联盟是 1859 年 9 月在法兰克福的一次代表大会上建立的。联盟的基本核心是亲普魯士的哥达党；該党于 1849 年 6 月在哥达城成立，它的成員是反革命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即在普魯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拒絕国民議會給他加冕和国民議會左翼多数派通过关于

建立帝国摄政的決議之后，退出法兰克福議会的右翼自由派。

祖国之友协会致民族联盟的“公开信”1859年11月发表在德国的一些报纸上。在这封信里，用模糊不清的說法譴責了在普魯士领导下統一德国的王朝計劃。——第691頁。

- 596 奎里特——这是古羅馬全权公民的正式名称。——第714頁。
- 597 “瑞士国民报”(«*Schweizerische National-Zeitung*»)是一家資產階級日报，1842年起在巴塞尔出版。——第723頁。
- 598 席利套用了已經成为諺語的著名說法“惋惜埃及的肉鍋”。据聖經故事，当被俘的犹太人从埃及逃跑时，其中一些胆怯的人由于道路的艰难和飢餓，开始惋惜他們做奴隶的日子，因为那时至少还可以吃飽肚子。——第724頁。
- 599 希尔施的文章“間諜活动的受害者”发表于1853年4月1、8、15和22日“美文学杂志和紐約刑法报”各号上。馬克思在自己的文章“希尔施的自供”中对这篇文章作了评价(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44—48頁)。——第726頁。
- 600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515頁。——第728頁。
- 601 指警官維尔穆特和施梯伯合著的一本书：“十九世紀共产主义者的陰謀”1853年柏林版第1册、1854年柏林版第2册 («*Die Communisten-Verschwörungen des neunzehnten Jahrhunderts*», Berlin, Erster Theil 1853, Zweiter Theil 1854)。該书的第一册叙述了工人运动的“历史”(它是警察的指南)，在它的附录中轉載了若干落到警察手里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文件。第二册的全文是一份同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有联系的人的“黑名单”以及他們的履历史。——第734頁。
- 602 馬克思指約·魏德迈和阿·克路斯的声明“致‘紐約刑法报’編輯部”，这篇声明載于1853年11月25日“紐約刑法报”。——第736頁。
- 603 見卡·馬克思的抨击性文章“高尚意識的騎士”(“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537—571頁)。——第736頁。

- 604 “社会辯論報”(«*Le Débat social*»)是比利时的一家日报,它是資產階級激进派和民主派的机关报;1844年至1849年在布魯塞爾出版。——第747頁。
- 605 “寄語人民”(«*Notes to the People*»)是英国的一家周刊,宪章派的机关报,1851—1852年在倫敦由厄·琼斯編輯出版。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支持这个杂志,参加該杂志的編輯和出版工作,并且从1851年6月至1852年4月間在这个杂志上发表了許多文章。——第748頁。
- 606 紐約的一家杂志“普特南氏月刊”曾經发表过恩格斯应馬克思的請求而写的一篇文章“欧洲軍隊”(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463—538頁),这篇文章是“紐約每日論壇報”編輯查·德納向馬克思約的稿。在写作过程中,馬克思曾帮助恩格斯,为他在英国博物館搜集資料。——第749頁。
- 607 指艾·阿布的三幕喜剧“吉耳里”。——第749頁。
- 608 “曼彻斯特卫报”(«*The Manchester Guardian*»)是英国資產階級的报纸,是自由貿易維護者(自由貿易論者)的机关报,后来成为自由党的机关报,1821年創刊于曼彻斯特。——第751頁。
- 609 克利希是1826—1867年巴黎的債務監獄。——第752頁。
- 610 指拿破侖第三为了同普魯士摄政王威廉会晤所作的巴登-巴登之行;会晤在1860年6月举行。——第753頁。
- 611 指西·波克罕的匿名小册子“拿破侖第三和普魯士。一个德国流亡者对艾德門·阿布的小册子‘一八六〇年的普魯士’的回答”1860年倫敦版(«*Napoleon III. und Preußen. Antwort eines deutschen Flüchtlings auf die Broschüre «Preußen in 1860» von Edmond About*». London, 1860)。波克罕的小册子是在馬克思的协助下写成的。——第754頁。
- 612 馬克思的这个声明没有在“人民报”和“总汇报”上发表。——第756頁。

- 613 1852年12月11日和18日宪章派报纸“人民报”第32号和第33号发表了关于馬克思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評論。評論中摘要引证了这一著作。——第757頁。
- 614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503—523頁(«Quid pro quo»)和第684—695頁(“报刊述評”)。——第758頁。
- 615 馬克思不止一次地把这个作为傳单单独发表的声明称作通告，因为他曾經把这个声明連同1860年2月6日的声明(見本卷第765—766頁)一起寄給几家德国报纸。——第762頁。
- 616 指普魯士政府对馬克思于1842—1843年編輯的“萊茵报”实行的特別严格的双重书报檢查。——第769頁。
- 617 从馬克思的1860年札記中可以看出，他曾經把这个声明寄給“自由射手”报。但是，这家报纸没有发表这一声明。——第770頁。
- 618 馬克思也曾經把这个声明寄給“人民报”和“改革报”。——第771頁。

人名索引

三 画

万当, 多米尼克·勒奈 (Vandamme, Dominique-René 1770—1830) ——法国将军, 拿破侖法国历次战争的参加者, 1813年在庫尔姆附近率全軍投降。——第93頁。

大流士一世·希斯塔斯普 (Darius I Hystaspes 公元前550—486) ——古波斯王 (公元前522—486) ——第7、152、327頁。

大胆查理 (Charles le Téméraire 1433—1477) ——勃艮第公爵 (1467—1477); 曾企图侵占瑞士; 正文中諷刺地把卡尔·福格特同他相比。——第430—434、436、499頁。

四 画

牛頓, 伊薩克 (Newton, Isaac 1642—1727) ——偉大的英国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和数学家, 力学科学的創始人。——第202頁。

孔代, 霍賽·安东尼奥 (Conde, José Antonio 1765—1820) ——西班牙历史学家, 阿拉伯語文学家, 写有許多关于阿拉伯人統治西班牙的历史著作。——第194頁。

邓斯·司各脫, 約翰 (Duns Scotus, Johann 1265左右—1308) ——中世紀

哲学家, 經院哲学家, 唯名論(唯物主义在中世紀的表現)的代表人物。——第666、671頁。

切尔西子爵 (Chelsea, Viscount) ——英国外交官, 1859年为駐巴黎大使館秘书。——第559頁。

天主教徒斐迪南五世 (Ferdinand V le católico 1452—1516) ——加斯梯里亚国王 (1474—1504) 和执政者 (1507—1516), 阿腊貢国王, 称斐迪南二世 (1479—1516)。——第101頁。

卞尼格先, 列文·奥古斯特·泰奥菲尔 (列昂节·列昂节也維奇) (Bennigsen, Levin August Theophil (Леонтий Леонтьевич) 1745—1828) ——在俄国当將軍, 原籍汉諾威, 謀杀保罗一世的参加者; 曾参加反对拿破侖法国的战争, 1807年为总司令, 在1812年卫国战争中为俄軍总參謀长。——第112—115頁。

日拉丹, 艾米尔·德 (Girardin, Émile de 1806—1881) ——法国资产阶级政論家和政治活动家, 三十至六十年代(断續地)担任“新聞报”編輯, 以政治上毫无原則著称; 1848年革命前为基佐政府的反对派, 在革命时期是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 立法議會議員 (1850—1851); 后为波拿巴主义者。——第614頁。

- 日拉丹, 德尔芬娜·德 (Girardin, Delphine de 1804—1855) —— 法国女作家, 艾米尔·德·日拉丹的妻子。——第 414 頁。
- 文迪施格雷茨, 阿尔弗勒德 (Windischgrätz, Alfred 1787—1862) —— 公爵, 奥地利元帅; 1848 年指揮鎮压布拉格和維也納起义; 1848—1849 年率領奥地利軍隊鎮压匈牙利革命。——第 118、133、467、655 頁。
- 文秦格罗迭, 斐迪南·費多罗維奇 (Винцингероде, Фердинанд Фёдорович 1770—1818) —— 男爵, 俄国將軍, 原系德国人, 反对拿破侖法国战争的参加者。——第 179、187—189 頁。
- 丹东, 若尔日·雅克 (Danton, George-Jacques 1759—1794) —— 十八世紀末法国資產階級革命著名活动家之一, 雅各宾党右翼領袖。——第 140 頁。
- 丹屠, 爱德华·昂利·茹斯坦 (Dentu, Edouard-Henry-Justin 1830—1884) —— 法国丹屠出版社老板之一, 波拿巴主义者。——第 528—530、533—535、550、559、560、564、573、576、583、586、749、753、754 頁。
- 韦森东克, 胡果 (Wesendonck, Hugo) —— 杜塞尔多夫的普魯士律師, 1848—1849 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議會議員, 屬於左派; 1849 年为第二議院議員, 屬於极左派。——第 495 頁。
- 韦斯帕西安 (梯特·弗拉維·韦斯帕西安) (Titus Flavius Vespasianus 9—79) —— 羅馬皇帝 (69—79)。——第 663 頁。
- 戈德海姆 (Goldheim) —— 普魯士警官, 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初是在倫敦的普魯士警察局密探之一。——第 440、732、733、735 頁。
- 戈克, 阿曼特 (Goegg, Amand 1820—1897) —— 德国記者, 小資產階級民主主义者, 1849 年是巴登临时政府成員, 革命失敗后逃离德国, 七十年代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第 486、736 頁。
- 戈尔盖, 阿尔都尔 (Görgey, Arthur 1818—1916) —— 1848—1849 年匈牙利革命的軍事活动家, 匈牙利軍隊总司令 (1849 年 4—6 月); 曾依靠反动軍官和資產階級中的反革命派, 对革命战争实行怠工。——第 271—273、544、623、624、636、637 頁。
- 尤巴一世 (Juba I 死于公元前 46 年) —— 努米迪亚国王, 龐培及其拥护者反对凱撒的战争 (公元前 49—46) 的积极参加者之一。——第 101 頁。
- 尤耳, 亨利 (Yule, Henry 1820—1889) —— 英国的东方学家、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 四十至五十年代在东印度公司任工程师。——第 287、292、294 頁。
- 尤古尔塔 (Jugurtha 公元前 160 左右—104) —— 努米迪亚国王, 公元前 111—106 年同羅馬进行了頑强不屈的战争。——第 20 頁。
- 尤維納利斯 (德齐姆斯·尤尼烏斯·尤維納利斯) (Decimus Junius Juvenalis 生于一世紀六十年代——死于 127 年后) —— 著名的羅馬諷刺詩人。——第 422、690 頁。
- 比松, 路易·安得列 (Pichon, Louis-André 1771—1850) —— 男爵, 法国外交家和政治活动家, 三十年代初为阿尔及利亚的民政长官。——第 107 頁。
- 比拉戈, 卡尔 (Birago, Karl 1792—1845) —— 奥地利軍事工程师, 曾研究出一种舟桥体系, 十九世紀中叶被許多

- 欧洲国家采用来装备军队。——第 153 頁。
- 比德曼, 卡尔 (Biedermann, Karl 1812—1901)——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政論家, 温和的自由派; 1848 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議會議員, 属于中間派, 后来成为民族自由党人。——第 724 頁。
- 比林古乔, 万諾乔 (Biringuccio, Vanuccio 1480—1539)——意大利化学家和冶金工程师, “論烟火制造术”一书的作者。——第 198 頁。
- 比斯康普, 埃拉尔特 (Biskamp, Elard)——德国民主主义者, 新聞工作者, 德国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 曾参加倫敦的德国流亡者办的刊物“人民报”編輯部, 該报在馬克思直接参与下出版。——第 508、509、519、653、677、679、682、691、693、696、705、706、709、717、769 頁。
- 比埃特里, 比埃尔·瑪丽 (Pietri, Pierre-Marie 1809—1864)——法国政治活动家, 波拿巴主义者; 曾任巴黎警察局长 (1852—1858)。——第 428、429 頁。
- 巴登格——見拿破侖第三。
- 巴卑尔 (Baber 1483—1530)——亚洲統帥和征服者, 印度的鉢諦沙赫 (1526—1530), 大莫臥儿国家和王朝的奠基人; 帖木儿的后裔。——第 77 頁。
- 巴亚尔, 比埃尔 (Bayard, Pierre 1475 左右—1524)——法国騎士, 同代人称頌他是勇敢和高貴的榜样, 是“大无畏而又无可責难的騎士”。——第 665、666、668、670、671、674 頁。
- 巴克萊-德-托利, 米哈伊尔·波格丹諾維奇 (Барклай-де-Толли, Михаил Богданович 1761—1818)——著名的俄国統帥和軍事活动家, 1814 年起为元帥, 反对拿破侖法国战争的参加者, 在 1808—1809 年俄国瑞典战争中为俄軍指揮官, 曾任陸軍部长 (1810—1812), 1812 年卫国战争时期为俄軍指揮官之一, 1813—1814 年任俄軍和俄普軍隊指揮官。——第 92—94、114、177、258—261 頁。
- 巴贊庫尔, 塞扎尔 (Bazancourt, César 1810—1865)——法国作家, 波拿巴主义者。——第 562 頁。
- 巴哥武特, 卡尔·費多罗維奇 (Баргвут, Карл Федорович 1761—1812)——俄国將軍, 反对拿破侖法国战争的参加者。——第 260 頁。
- 巴尔扎克, 奧諾萊·德 (Balzac, Honoré de 1799—1850)——偉大的法国现实主义作家。——第 414、682 頁。
- 巴塞尔曼, 弗里德里希·丹尼尔 (Bassermann, Friedrich Daniel 1811—1855)——德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 温和的自由派, 巴登議會議員; 1848—1849 年革命时是巴登政府在联邦議會中的代表, 法兰克福国民議會議員, 属于中間派右翼。——第 494、724 頁。
- 巴格拉齐昂, 彼得·伊万諾維奇 (Баграцион, Петр Иванович 1765—1812)——公爵, 杰出的俄国統帥, 苏沃洛夫各次远征和反对拿破侖法国战争的参加者, 1812 年卫国战争时期为俄軍指揮官之一。——第 93、258—261 頁。
- 巴布斯特, 伊万·康德拉提也維奇 (Бабст, Иван Кондратьевич 1824—1881)——俄国經濟学家, 历史学家和政論家, 曾先后任高加索大学 (1851 年起) 和莫斯科大学 (1857 年起) 的政治經濟学教授; 六十年代初曾开讲政治經濟学課程。——第 421 頁。

巴罗，奥迪隆 (Barrot, Odilon 1791—1873) ——法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1848年2月以前是自由主义的王朝反对派的首領；1848年12月至1849年10月领导为各君主专制集团的反革命联盟所支持的內閣。——第436、494頁。

巴罗什，比埃尔·茹尔 (Baroche, Pierre-Jules 1802—1870) ——法国政治活动家，法学家，波拿巴主义者，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以前和以后曾数度入閣。——第600頁。

巴拉盖·狄利埃，路易 (Baraguay d'Hilliers, Louis 1764—1812) ——法国將軍，法兰西共和国和拿破侖法国历次战争的参加者，阿希尔·巴拉盖·狄利埃的父亲。——第561頁。

巴拉盖·狄利埃，阿希尔 (Baraguay d'Hilliers, Achille 1795—1878) ——法国將軍，1854年起为元帅，波拿巴主义者；1854年指揮波罗的海的一支法国远征軍。——第295頁。

巴特勒，賽米尔 (Butler, Samuel 1612—1680) ——英国諷刺詩人，“休迪布腊斯”一詩的作者。——第595頁。

巴特米，艾曼紐尔 (Barthélemy, Emmanuel 1820左右—1855) ——法国工人，布朗基主义者，七月王朝时期和巴黎1848年六月起义时期秘密革命团体的参加者，后流亡英国，为倫敦的法国布朗基主义流亡者协会的领导人之一；追隨維利希—沙佩尔冒險主义宗派集团；1855年因刑事罪被处死刑。——第469頁。

五 画

龙加，弗朗西斯科 (Longa, Francisco) ——西班牙軍官，后为將軍，反对拿破

侖統治的解放战争 (1808—1814) 的参加者，游击队指揮員之一。——第267、268頁。

白恩士，亚历山大 (Burnes, Alexander 1805—1841) ——英国軍官，英国在中亚細亚进行殖民擴張的組織者之一；1836—1838年在喀布尔执行特殊使命，1839—1841年任喀布尔英軍司令部政治顧問。——第80、81、83頁。

尼古拉一世 (Николай I 1796—1855) ——俄国皇帝 (1825—1855)。——第32、167、307、533、535—541、543、637頁。

司徒卢威，古斯塔夫 (Struve, Gustav 1805—1870) ——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职业是記者；1848年4月和9月巴登起义和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领导人之一；革命失敗后逃离德国；在英国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領袖之一；曾参加美国内战，站在北部方面。——第410、431、434、643、644頁。

叶凯尔法魯希 (Jekelfalussy) ——匈牙利神甫，1848—1849年是齐普斯的主教。——第753頁。

叶卡特林娜二世 (Екатерина II 1729—1796) ——俄国女皇 (1762—1796)。——第112、113、533、537頁。

兰热朗，亚历山大·費多罗維奇 (路易·亚历山大·安德罗) (Langeron, Александр Федорович (Louis-Alexandre-Andrault) 1763—1831) ——伯爵，在俄国当將軍，原系法国人，反革命流亡分子，反对拿破侖法国战争的参加者。——第177、178、182、184、187頁。

兰德斯堡，海尔曼 (Landsberg, Hermann 1670—1746) ——德国軍事工程

- 师, 写有許多筑城学方面的著作。——第 345 頁。
- 卢梭, 让·雅克(Rousseau, Jean-Jacques 1712—1778)——杰出的法国启蒙运动者, 民主主义者, 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第 643 頁。
- 卢格, 阿尔诺德(Ruge, Arnold 1802—1880)——德国政論家, 青年黑格尔分子, 资产阶级激进派, 1848 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議會議員, 属于左派, 五十年代是在英国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領袖之一; 1866 年以后成为民族自由党人。——第 473、474、484、485、487、730、756 頁。
- 古特施米特(Guthschmidt)——普魯士法官。——第 702、710—712 頁。
- 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Gustav II Adolf 1594—1632)——瑞典国王(1611—1632), 著名的統帥和軍事改革家。——第 33—35、200、308、370、371、375 頁。
- 古斯塔夫四世·阿道夫(Gustav IV Adolf 1778—1837)——瑞典国王(1792—1809), 1809 年由于軍事陰謀而被赶下王位。——第 92、142、160、163、164 頁。
- 汉尼拔(Hannibal 公元前 247 左右—183)——杰出的迦太基統帥。——第 18、72、301—303 頁。
- 汉普頓, 約翰(Hampden, John 1594—1643)——十七世紀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著名活动家, 代表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貴族的利益。——第 556 頁。
- 汉薩德, 托馬斯·寇松(Hansard, Thomas Curson 1776—1833)——英国出版商; 曾发表議会會議报告。——第 507 頁。
- 汉密尔顿, 詹姆斯(Hamilton, James 死于 1580 年)——苏格兰貴族, 苏格兰女王瑪丽·斯图亚特的拥护者。——第 61 頁。
- 皮特(小皮特), 威廉(Pitt, William, the Younger 1759—1806)——英国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領袖之一; 反对十八世紀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战争的主要組織者之一, 曾任首相(1783—1801 和 1804—1806)。——第 441、529 頁。
- 皮尔, 罗伯特(Peel, Robert 1788—1850)——英国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温和派(人称皮尔派, 即因他而得名)的領袖, 曾任內务大臣(1822—1827 和 1828—1830), 首相(1834—1835 和 1841—1846), 在自由党人的支持下廢除了谷物法(1846)。——第 759 頁。
- 皮洛士(Pyrrhus 公元前 319—272)——伊皮罗斯皇帝(公元前 307—302、296—272), 古代的著名統帥。——第 21 頁。
- 皮阿尔, 曼努埃尔·卡洛斯(Piar, Manuel Carlos 1782—1817)——委內瑞拉—哥倫比亚將軍, 南美西班牙殖民地独立战争的参加者, 1817 年以策划陰謀反对玻利瓦尔的罪名被处死刑。——第 232、233 頁。
- 皮欽尼諾, 尼古洛(Piccinino, Niccolo 1386—1444)——意大利雇佣兵队长, 1426—1443 年在意大利城市混战中为米兰軍队的指揮官。——第 286 頁。
- 圣西門, 昂利(Saint-Simon, Henri 1760—1825)——偉大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第 475 頁。
- 圣雷米, 比埃尔·苏里雷·德(Saint-Remy, Pierre Surirey de 1650 左右—1716)——法国將軍, 1703 年起为法

国炮兵副司令。——第 201 頁。

圣普里，艾曼努尔·弗朗佐維奇（吉約姆·艾曼紐尔·吉尼亚尔）(Saint-Priest, Эммануил Францович (Guillaume-Emmanuel Guignard) 1776—1814) ——伯爵，在俄国当將軍，原系法国人，反革命流亡分子，反对拿破侖法国战争的参加者。——第 187、189 頁。

圣阿尔諾，阿尔芒·雅克·阿希尔·勒卢阿·德 (Saint-Arnaud, Armand-Jacques-Achille-Leroy de 1801—1854) ——法国將軍，1852 年起为元帅，波拿巴主义者；1836—1851 年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1851 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組織者之一，曾任陸軍大臣 (1851—1854)，1854 年任克里木法軍总司令。——第 56、109、223 頁。

圣伊雷尔伯爵，路易·文桑·約瑟夫·勒·布朗 (Saint-Hilaire, Louis-Vincent-Joseph Le Blond, comte de 1766—1809) ——法国將軍，拿破侖法国历次战争的参加者。——第 70 頁。

瓦罗尔，泰奧菲尔 (Voirol, Théophile 1781—1853) ——男爵，法国將軍，拿破侖法国历次战争的参加者，1833—1834 年任阿尔及利亚总督。——第 108 頁。

瓦魯斯 (普卜利烏斯·昆提利烏斯·瓦魯斯) (Publius Quintilius Varus 公元前 53 左右—公元 9) ——羅馬政治活动家和統帥，日耳曼行省总督 (7—9)，日耳曼部落起义时在条多堡森林会战中陣亡。——第 666 頁。

瓦耳埃尔，让·弗洛朗·德 (Vallière, Jean-Florent de 1667—1759) ——法国將軍，1720—1747 年法国炮兵司令，按照自己的办法改編了法国炮兵。——

第 204 頁。

瓦西里契柯夫，伊拉里昂·瓦西里也維奇 (Васильчиков, Илларион Васильевич 1777 左右—1847) ——俄国將軍，后为軍事和国家活动家；反对拿破侖法国战争的参加者。——第 260、261 頁。

瓦列夫斯基伯爵，亚历山大·弗洛里安·約瑟夫·科倫納 (Walewski, Alexandre-Florian-Joseph Colonna, comte de 1810—1868) ——法国外交家和國家活动家，拿破侖第一和波兰的瓦列夫斯卡婭伯爵夫人的儿子；1830—1831 年波兰起义的参加者，起义失敗后流亡法国；外交大臣 (1855—1860)；曾主持巴黎會議 (1856)。——第 598 頁。

加累尔，阿伯特 (Galeer, Albert 1816—1851) ——瑞士教师和文学家；民主主义者，1847 年反对瑞士宗得崩德的战争和 1849 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日内瓦大会議議員，最初是法济的拥护者，后为反对派的首領。——第 407、642—644 頁。

加累尔，奧斯卡尔 (Galeer, Oskar) ——前者的兄弟，大学生。——第 408 頁。

加丹，克劳德·馬蒂約·德 (Gardane, Claude-Mathieu de 1766—1817) ——法国將軍和外交家，拿破侖法国历次战争的参加者，1807—1808 年住在德黑兰执行特別使命。——第 80 頁。

加格恩，亨利希 (Gagern, Heinrich 1799—1880) ——男爵，德国資產階級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自由派；法兰克福國民議會議員和議長，屬於中間派右翼，曾任帝国首相 (1848 年 12 月—1849 年 3 月)，1849 年 5 月后为哥达党的領袖之一。——第 489、499、552 頁。

加里波第，朱澤培 (Garibaldi, Giuseppe

- 1807—1882)——意大利革命家，民主主义者，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1848年在对奥战争中率领志愿军站在皮蒙特军方面奋勇作战；1849年是罗马共和国保卫战的主要组织者；五十至六十年代领导意大利人民为民族解放和全国统一而斗争。——第634页。
- 加尔西亚·德·拉·库埃斯塔，格莱哥里奥(Garcia de la Cuesta, Gregorio 1741—1811)——西班牙将军，反对拿破仑统治的解放战争(1808—1814)的参加者。——第136页。
- 卡托(老卡托)(马可·波尔齐乌斯·卡托)(Marcus Porcius Cato (Major) 公元前234—149)——罗马政治活动家和作家，贵族特权的维护者；公元前184年被选为监察官，他监察之严格是人所共知的。——第658页。
- 卡贝，埃蒂耶纳(Cabet, Étienne 1788—1856)——法国政论家，空想的和平共产主义的卓越代表人物，“伊加利亚旅行记”一书的作者。——第475、476页。
- 卡姆朗(Kamran)——阿富汗沙赫马茂德的儿子，1829年起是赫拉特的执政者。——第80页。
- 卡萨斯——见拉斯·卡萨斯，曼努埃尔·马利阿。
- 卡博特，约翰(卡博托，卓万尼)(Cabot, John (Caboto, Giovanni) 1450左右—1498)——为英国服务的意大利航海家，1497年发现了北美洲的一部分海岸。——第383页。
- 卡蒙斯，路易斯(Camões, Luis 1524左右—1580)——文艺复兴时期的葡萄牙伟大诗人，史诗“卢兹之歌”的作者。——第487、595页。
- 卡富尔，卡米洛·本佐(Cavour, Camillo Benso 1810—1861)——伯爵，意大利国家活动家，保皇派自由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了的贵族的思想和领袖；撒丁政府首脑(1852—1859和1860—1861)，依靠拿破仑第三的帮助，奉行在萨瓦王朝领导下自上而下地统一意大利的政策，1861年主持第一个统一的意大利政府。——第434、583、584、600、601页。
- 卡德龙·德·拉·巴卡，彼得罗(Calderon de la Barca, Pedro 1600—1681)——杰出的西班牙剧作家。——第404、665页。
- 卡提利纳(鲁齐乌斯·赛尔吉乌斯·卡提利纳)(Lucius Sergius Catilina 公元前108左右—62)——罗马政治活动家，贵族，反对贵族共和国密谋的组织者。——第441、442、451、583页。
- 卡瑟克特，乔治(Cathcart, George 1794—1854)——英国将军，1854年任克里木英军师长。——第56页。
- 卡希加尔，璜·曼努埃尔(Cajigal, Juan Manuel 1757—1823)——西班牙将军，1813—1815年为镇压南美西班牙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西班牙军队指挥官。——第227页。
- 卡芬雅克，路易·欧仁(Cavaignac, Louis-Eugène 1802—1857)——法国将军和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三十至四十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1848年任阿尔及利亚总督(3月起)，后为法国陆军部长(5月起)，极端残酷地镇压了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政府首脑(1848年6—12月)。——第108、436、552页。
- 卡塔卡集，加甫利尔·安东诺维奇(Ka-

- такази, Гавриил Антонович 1794—1867)——俄国外交家,原系希腊人,駐希腊公使(1833—1843),参政官。——第 538 頁。
- 卡緬斯基,米哈伊尔·費多托維奇(Каменский, Михаил Федотович 1738—1809)——伯爵,俄国元帅,1806 年在反对拿破侖法国战争中任总司令。——第 113 頁。
- 卡拉姆津,尼古拉·米哈伊洛維奇(Карамзин, Николай Михайлович 1766—1826)——俄国杰出的历史学家和作家,亚历山大一世的御用历史編纂学家。——第 536 頁。
- 卡普策維奇,彼得·米哈伊洛維奇(Капцевич, Петр Михайлович 1772—1840)——俄国將軍,反对拿破侖法国战争的参加者。——第 185 頁。
- 卡波第斯特里亚,約翰(Капо d' Istrias, Johannes 1776—1831)——伯爵,希腊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1809—1822 年在俄国供职,曾任俄国外交副大臣(1815—1822);希腊总统(1827—1831);奉行亲俄政策,为外国間諜刺杀。——第 538 頁。
- 卡尔-艾曼努尔二世(Carlo-Emanuel II 1751—1819)——撒丁国王(1796—1802)。——第 141 頁。
- 卡尔-路德維希-約翰(Karl Ludwig Johann 1771—1847)——奥地利大公,元帅,在历次对法战争(1796、1799、1805 和 1809)中任总司令,曾任陸軍大臣(1805—1809)。——第 64、65、69、97、157 頁。
- 卡尔第五列奧波特,洛林公爵(Karl V Leopold, Herzog von Lothringen 1643—1690)——奥地利元帅,1683—1688 年任奧土战争(1683—1699 年)中奧軍指揮官。——第 271 頁。
- 卡尔利埃,比埃尔(Carlier, Pierre 1799—1858)——巴黎警察局长(1849—1851),波拿巴主义者。——第 437 頁。
- 卡尔馬尼約拉,弗兰契斯科·布桑奈(Carmagnola, Francesco Bussone 1380 左右—1432)——意大利雇佣兵队长;1426—1432 年在对米兰的战争中,任威尼斯和佛罗倫薩联軍指揮官。——第 286 頁。
- 卡斯特拉(Castella)——瑞士政治活动家,激进主义者,1847—1856 年是夫賴堡(弗里布尔)州政府成員。——第 433 頁。
- 卡斯特里奧托,扎科莫(Castriotto, Giacomo 死于 1562 年)——意大利軍事工程师。——第 335、342 頁。
- 卡斯尔里子爵,罗伯特·斯图亚特(Castlereagh, Robert Stewart, Viscount 1769—1822)——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陸軍和殖民大臣(1805—1806、1807—1809),外交大臣(1812—1822)。——第 529 頁。
- 卡斯提耳奧,曼努埃尔(Castillo, Manuel 死于 1816 年)——哥倫比亚將軍,南美西班牙殖民地独立战争的参加者,1815 年是卡塔黑納城防司令,玻利瓦尔的反对者。——第 227、230 頁。
- 弗略里,查理(Fleury, Charles 生于 1824 年)(真名为卡尔·弗里德里希·奧古斯特·克劳澤 Carl Friedrich August Krause)——倫敦商人,普魯士的間諜和警探。——第 437、449、726—734 頁。
- 弗呂貝尔,尤利烏斯(Fröbel, Julius 1805—1893)——德国政論家和进步书籍出

- 版者，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德国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法兰克福国民会议議員，属于左派；革命失败后流亡美国，1857 年回到欧洲；后为自由党人。——第 507、522 頁。
- 弗龙兹堡，格奥尔格(Frundsberg, Georg 1473—1528)——为德意志皇帝和土瓦本联盟效劳的德国雇佣軍司令，曾参加意大利战争，1525—1526 年又参加镇压土瓦本和薩尔茨堡大主教轄区的农民起义。——第 31 頁。
- 弗朗斯瓦一世(François I 1494—1547)——法国国王(1515—1547)。——第 30、197、368、575 頁。
- 弗拉米尼努斯(梯特·昆克提烏斯·弗拉米尼努斯)(Titus Quinctius Flaminius 公元前 228 左右—174)——罗马統帥和国家活动家，执政官(公元前 198)，在第二次馬其頓战争(公元前 200—197)中为罗马軍队指揮官。——第 22 頁。
- 弗拉基米烈斯庫，土多尔(Wladimir-tesco, Tudor 1780 左右—1821)——罗马尼亚民族英雄，1821 年瓦拉几亚反对大土地占有者和土耳其压迫的人民起义領袖。——第 538 頁。
- 弗洛孔，斐迪南(Flocon, Ferdinand 1800—1866)——法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論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改革报”編輯之一；1848 年为临时政府委員。——第 680、746 頁。
- 弗洛雷斯，霍賽·塞貢多·德(Florez, José Segundo de 生于 1789 年)——西班牙资产阶级自由派历史学家和政論家。——第 173 頁。
- 弗洛里安尼，比埃尔·鮑洛(Floriani, Pier Paolo 1584—1638)——意大利軍事工程师，写有筑城学方面的著作。——第 335、341 頁。
- 弗萊雷，曼努埃尔(Freire, Manuel 1765—1834)——西班牙將軍，反对拿破侖統治的解放战争(1808—1814)的参加者。——第 267—269 頁。
- 弗萊隆，路易·瑪麗·斯坦尼斯拉(Fréron, Louis-Marie-Stanislas 1754—1802)——十八世紀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家，后为热月反革命領袖之一。——第 141 頁。
- 弗萊塔格，亚当(Freitag, Adam 十七世紀)——尼德兰軍事工程师，旧的尼德兰筑城学派的奠基人之一。——第 339 頁。
- 弗萊特斯，彼得罗·馬利阿(Freites, Pedro Maria 死于 1817 年)——委内瑞拉軍官，南美西班牙殖民地独立战争的参加者。——第 232 頁。
- 弗萊里格拉特，斐迪南(Freiligrath, Ferdinand 1810—1876)——德国詩人，初期是浪漫主义者，后来成为革命詩人，1848—1849 年是“新萊茵报”編輯之一，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五十年代脱离革命斗争。——第 506、760 頁。
- 弗雷-埃罗澤，弗里德里希(Frey-Hérosé, Friedrich 1801—1873)——瑞士軍官，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自由主义者；1848 年为联邦委员会委員，国民院議員；1854 和 1860 年为瑞士联邦主席。——第 579、600、604 頁。
- 弗雷莫薩，艾曼努埃尔(Fremosa, Emanuel)——西班牙水兵，1588 年西班牙舰队远征的参加者之一，被英国人所俘。——第 171 頁。
- 弗雷德，法比安(Wrede, Fabian 1760—1824)——伯爵，瑞典將軍，1816 年

- 起为元帅；1810年負特別使命出使巴黎，曾促成貝爾納多特当选为瑞典王位的继承人。——第162頁。
- 弗雷德，卡尔·菲利浦 (Wrede, Karl Philipp 1767—1838) ——巴伐利亚將軍，1814年起为元帅；曾指揮巴伐利亚軍隊，这支軍隊自1805年起参加拿破侖法国战争，而自1813年起参加反对拿破侖法国的战争。——第183、187頁。
- 弗雷德里克六世 (Frederik VI 1768—1839) ——丹麦—挪威国王 (1808—1814)，后为丹麦国王 (1814—1839)。——第162、166頁。
- 弗里昂，路易 (Friant, Louis 1758—1829) ——法国將軍，拿破侖法国历次战争的参加者。——第260、261頁。
- 弗里德里希二世 (Friedrich II 1712—1786) ——普魯士国王 (1740—1786)。——第36、38、39、41、122、174、202、203、302、309—313、318、324、352、374—376、453、528頁。
- 弗里德里希-威廉 (Friedrich-Wilhelm 1620—1688) ——勃兰登堡选帝侯 (1640—1688)。——第670頁。
- 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 (Friedrich-Wilhelm I 1688—1740) ——普魯士国王 (1713—1740)。——第36、309頁。
-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 (Friedrich-Wilhelm III 1770—1840) ——普魯士国王 (1797—1840)。——第165、175、176、190頁。
-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 (Friedrich-Wilhelm IV 1795—1861) ——普魯士国王 (1840—1861)。——第673頁。
- 弗兰克——見舍尔瓦尔，茹利安。
- 弗兰克，古斯塔夫 (Franck, Gustav) ——奥地利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初侨居倫敦。——第474頁。
- 弗兰茨 (Franz 十六世紀) ——德国軍事工程师。——第336頁。
- 弗兰茨-約瑟夫一世 (Franz-Joseph I 1830—1916) ——奥地利皇帝 (1848—1916)。——第531、572、574、634頁。
- 弗兰基尼，維克多·安东諾維奇 (Франкенин, Виктор Антонович 1820—1892) ——俄国軍官，后为將軍，克里木战争 (1853—1856) 的参加者，反对高加索山地居民战争的参加者。——第630頁。
- 弗兰格尔，弗里德里希·亨利希·恩斯特 (Wrangel, Friedrich Heinrich Ernst 1784—1877) ——將軍，普魯士反动軍閥的著名代表人物；1848年11月普魯士反革命政变和驅散普魯士国民議會的主要参加者之一。——第670頁。
- 布特伯爵，約翰·斯图亚特 (Bute, John Stuart, Earl of 1713—1792) ——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曾任首相 (1761—1763)。——第528頁。
- 布耳埃 (Bullier) ——法国新聞工作者，波拿巴主义者。——第591頁。
- 布賴登，威廉 (Brydon, William 1811—1873) ——英国軍医，英国阿富汗战争 (1838—1842) 的参加者。——第84頁。
- 布林德，卡尔 (Blind, Karl 1826—1907) ——德国新聞工作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巴登革命运动的参加者；五十年代为在倫敦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領袖之一；后为民族自由党人。——第507、509、510、513—

- 524、590、653、683、684、691、693—696、702—706、709、710、738—745、755、756、758—764、766、768、769 頁。
- 布萊克, 罗伯特 (Blake, Robert 1599—1657) ——英国海軍上將, 十七世紀英国資產階級革命的參加者, 克倫威爾的助手; 五十年代在英国西班牙戰爭中任艦隊司令, 曾同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的海盜作過斗争。——第 102 頁。
- 布赫爾, 洛塔爾 (Bucher, Lothar 1817—1892) ——普魯士官員, 政論家; 1848 年是普魯士國民議會議員, 屬於中間派左翼; 1848—1849 年革命失敗后流亡倫敦, 柏林“國民報”通訊員; 后为民族自由黨人, 拥护俾斯麥。——第 474、506 頁。
- 布尔蒙, 路易·奧古斯特·維克多·德 (Bourmont, Louis-August-Victor de 1773—1846) ——法国將軍, 1830 年起为元帥, 保皇黨人; 1830 年为侵略阿尔及利亚法国远征軍指揮官。——第 104 頁。
- 布拉斯, 奧古斯特 (Braß, August 1818—1876) ——德国新聞工作者, 德国 1848—1849 年革命的參加者, 革命失敗后流亡瑞士, 1859—1860 年是“新瑞士報”的主編, 后为俾斯麥的拥护者。——第 591、592 頁。
- 布利阿-薩瓦蘭, 昂塞爾姆 (Brillat-Savarin, Anthelme 1755—1826) ——法国作家, “味覺的生理作用”一書的作者。——第 603 頁。
- 布瓦肖, 让·巴蒂斯特 (Boichot, Jean-Baptiste 生于 1820 年) ——法国政治活动家, 共和黨人, 立法議會議員 (1849), 1849 年六月十三日起義的參加者, 后流亡国外。——第 434 頁。
- 布律恩, 吉約姆·瑪麗·安 (Brune, Guillaume-Marie-Anne 1763—1815) ——法国元帥, 十八世紀末法国資產階級革命活动家, 右派雅各賓黨人—丹東分子, 后为波拿巴的拥护者, 法兰西共和國和拿破侖法国历次戰爭的參加者。——第 140—143 頁。
- 布伯納·馮·利提茨, 斐迪南 (Bubna von Litić, Ferdinand 1768—1825) ——伯爵, 奧地利將軍和外交家, 原系捷克人; 1813—1814 和 1815 年参加反对拿破侖法国的戰爭。——第 187 頁。
- 布根哈根 (Buggenhagen 十八世紀) ——梅克倫堡的軍事工程師。——第 345 頁。
- 布隆諾夫, 菲力浦·伊万諾維奇 (Бруннов, Филипп Иванович 1797—1875) ——男爵, 俄国外交家, 駐倫敦公使 (1840—1854、1858—1860), 后为駐倫敦大使 (1860—1874)。——第 541 頁。
- 布呂歇爾, 格布哈爾德·勒勃萊希特 (Blücher, Gebhard Leberecht 1742—1819) ——普魯士元帥, 1793—1794 年参加反对法兰西共和國的戰爭, 1806、1813—1814 和 1815 年在反对拿破侖法国的戰爭中任指揮官。——第 160、165、174—192、312 頁。
- 布帖涅夫, 阿波利納里伊·彼得羅維奇 (Бутенев, Аполлинарий Петрович 1787—1866) ——俄国外交家, 曾任駐土耳其大使 (1830—1842), 1843—1856 年任駐羅馬公使, 后于 1856—1858 年任駐土耳其公使。——第 539 頁。
- 布魯西埃, 让·巴蒂斯特 (Broussier, Jean-Baptiste 1766—1814) ——法国將軍, 拿破侖法国历次戰爭的參加者。——第 260 頁。

布克斯格夫登, 費多尔·費多罗維奇 (Буксгөвден, Федор Федорович 1750—1811)——伯爵, 俄国將軍, 1805 和 1806 年曾参加反拿破侖法国的战争。——第 113 頁。

布里昂, 路易 (Brion, Louis 1782—1821)——哥伦比亚批发商, 南美西班牙殖民地独立战争的参加者; 玻利瓦尔的拥护者; 原系荷兰人。——第 231—233 頁。

布里昂, 路易·安都昂·福韦勒·德 (Bourrienne, Louis-Antoine Fauvellet de 1769—1834)——法国外交家和政治活动家, 拿破侖·波拿巴的同学和私人秘书 (1797—1802), 駐汉堡代办 (1804—1813), 后投波旁王朝。——第 119—120、142 頁。

布倫坦諾, 罗侖茲 (Brentano, Lorenz 1813—1891)——巴登小資產階級民主主义者, 职业是律师; 1848 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議會議員, 属于左派; 1849 年领导巴登临时政府, 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失败后流亡瑞士, 后迁居美国。——第 431、485、670 頁。

布倫奇里, 約翰·卡斯巴尔 (Bluntschli, Johann Caspar 1808—1881)——瑞士法学家和反动的政治活动家; 对革命运动参加者实行警察迫害的策划者之一; 瑞士政府于 1843 年設立的瑞士境内德国流亡者活动調查委员会委員和該委员会于 1843 年公布的工作报告的起草人。——第 464 頁。

布斯, 弗兰茨·約瑟夫 (Buß, Franz Joseph 1803—1878)——德国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普魯士霸权的反对者, 凶恶的教权派, 国會議員。——第 477 頁。

布斯卡, 加布里奧 (Busca, Gabrio 約 1540—1601)——意大利軍事工程师, 写有筑城学方面的著作。——第 335 頁。

布斯馬尔, 昂利·让·巴蒂斯特 (Bousmard, Henri-Jean-Baptiste 1749—1807)——法国軍事工程师, 1792 年起是反革命流亡分子, 为普魯士服务, 1807 年领导但澤防御战抵抗拿破侖部队; 写有筑城学方面的著作。——第 344 頁。

布朗, 乔治 (Brown, George 1790—1865)——英国將軍, 比利牛斯半島战争 (1808—1814) 的参加者, 1854—1855 年任克里木英軍师长。——第 56 頁。

布朗丹 (Blondin 1824—1897) (真名为让·弗朗斯瓦·格拉韦勒 Jean-François Gravelet)——著名的法国踩鋼絲技巧运动演員。——第 634 頁。

布朗基, 路易·奧古斯特 (Blanqui, Louis-Auguste 1805—1881)——法国革命家, 空想共产主义者, 許多秘密社团和密謀活动的組織者, 1830 年和 1848 年革命的积极参加者, 法国无产阶级运动最著名的领导者, 曾多次被判徒刑。——第 453 頁。

布朗沙德 (Blanchard)——英国軍官, 1828 年曾研究出一种舟桥体系。——第 154 頁。

布朗施奈, 路易 (Blanchenay, Louis 1800—1881)——瑞士資產階級政治活动家; 国民院議員 (1848—1860); 海关监督 (1861—1873)。——第 604 頁。

布朗德尔, 弗朗斯瓦 (Blondel, François 1617—1686)——法国建筑师和軍事工程师, 写有筑城学和炮兵学方面的著作。——第 202 頁。

六 画

- 丢勒, 阿尔勃莱希特 (Dürer, Albrecht 1471—1528) ——偉大的德国画家和版画家; 曾研究筑城学问题。——第 329、336、344 頁。
- 迈尔, 卡尔 (Mayer, Karl 1819—1889) ——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1849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議會議員, 革命失敗后流亡瑞士。——第 511、610—612 頁。
- 色諾芬 (Xenophon 約公元前 430—354) ——古希腊历史学家和哲学家, 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家。——第 12 頁。
- 朱斯蒂, 朱澤培 (Giusti, Giuseppe 1809—1850) ——意大利諷刺詩人。——第 610 頁。
- 成吉思汗 (1155 左右—1227) ——蒙古統帥和征服者, 蒙古帝國的創建者。——第 78 頁。
- 老迪奧尼修斯一世 (Dionysius the Elder 公元前 431 左右—367) ——叙拉古暴君 (公元前 406 左右—367)。——第 276 頁。
- 伏尔泰, 弗朗斯瓦·瑪丽 (Voltaire, François-Marie 1694—1778) (眞姓为阿魯埃 Arouet) ——法国自然神論哲学家, 諷刺作家, 历史学家, 十八世紀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著名代表人物, 反对专制制度和天主教。——第 616、750、754 頁。
- 华倫斯坦, 阿尔勃莱希特 (Wallenstein, Albrecht 1583—1634) ——三十年战争时期的統帥, 1618—1630 和 1632—1634 年任帝国軍队的指揮官。——第 34 頁。
- 乔治二世 (George II 1683—1760) ——英国国王和汉諾威选帝侯 (1727—1760)。——第 112 頁。
- 乔治四世 (George IV 1762—1830) ——摄政王 (1811—1820) 和英国国王 (1820—1830)。——第 190 頁。
- 亚历山大一世 (Александр I 1777—1825) ——俄国皇帝 (1801—1825)。——第 93、94、113—114、119、132、163—166、180、190、532、535、537、543、550 頁。
- 亚历山大二世 (Александр II 1818—1881) ——俄国皇帝 (1855—1881)。——第 307、532—537、540—542、547、550、551、565、571、572 頁。
- 齐茨, 弗兰茨 (Zitz, Franz 1803—1877) ——德国律师,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 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議會議員, 屬於左派, 1849 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 1848—1849 年革命失敗后流亡美国。——第 486 頁。
- 齐比奧 (普卜利烏斯·科尔奈利烏斯·齐比奧) (Publius Cornelius Scipio 死于公元前 211 年) ——罗马統帥, 执政官 (公元前 218), 后为西班牙总督 (公元前 217—211)。——第 302、303 頁。
- 考尼茨, 温采尔·安东 (Kaunitz, Wenzel Anton 1711—1794) ——公爵, 奥地利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 所謂文明的专制制度的拥护者; 十八世紀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凶恶敌人, 曾任首相 (1753—1792)。——第 529 頁。
- 考萊伯爵, 亨利·理查·查理·威尔斯里 (Cowley, Henry Richard Charles Wellesley, Earl 1804—1884) ——英国外交家, 駐巴黎大使 (1852—1867)。——第 557、559、577、598、600、602 頁。
- 安貝尔 (Imbert) ——法国社会主义者,

- 1834年里昂起义的参加者，四十年代侨居比利时，布魯塞尔民主协会副主席，1848年二月革命后为土伊勒里宫警卫队长。——第680頁。
- 安德森，罗伯特（Anderson, Robert 死于1696年）——英国数学家和軍事工程师，写有許多炮兵学方面的著作。——第202頁。
- 安娜·伊万諾夫娜（Анна Ивановна 1693—1740）——俄国女皇（1730—1740）。——第537頁。
- 多斯特-穆罕默德（Dost Muhammad 1793—1863）——阿富汗艾米尔（1826—1839和1842—1863）。——第80—82、85頁。
- 多赫图罗夫，德米特利·謝尔盖也維奇（Дохтуров, Дмитрий Сергеевич 1756—1816）——俄国將軍，反对拿破侖法国战争的参加者，1812年卫国战争时期任軍长。——第260、261頁。
- 多尔哥魯科夫，彼得·弗拉基米罗維奇（Долгоруков, Петр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1816—1868）——公爵，俄国政論家和历史学家，自由主义者，1859年流亡国外，六十年代出版了反对派的許多报刊杂志，曾为赫尔岑的“钟声”撰稿。——第536頁。
- 吉恩，約翰（Keane, John 1781—1844）——英国將軍，1839年在英国阿富汗战争（1838—1842）中任英軍指揮官。——第81頁。
- 吉茲公爵——見洛林的昂利第二。
- 吉佩里希，約瑟夫（Gipperich, Joseph）——德国裁縫，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屬于維利希—沙佩尔冒險主义宗派集团的一个巴黎支部的成員，1852年2月所謂巴黎德法密謀案件的被告之一；后来流亡英国。——第730頁。
- 艾倫（Allen）——英国軍官。——第292頁。
- 艾雷，理查（Airey, Richard 1803—1881）——英国將軍，1854—1855年任克里木英軍軍需长，后为英軍兵站总监（1855—1865）。——第63頁。
- 艾森曼，哥特弗利德（Eisenmann, Gottfried 1795—1867）——德国政論家，医生；1848—1849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議會議員，屬于中間派，后屬于左翼。——第492頁。
- 艾希霍夫，卡尔·威廉（Eichhoff, Karl Wilhelm 1833—1895）——德国社会党人，五十年代末因在刊物上揭露施梯伯的密探活动而受法庭审讯；第一批第一国际史学家之一。——第448頁。
- 列施德-帕沙（Reshid Pasha 1802—1858）——土耳其国家活动家；曾多次担任总理大臣和外交大臣等职。——第546、627頁。
- 列列韦尔，約阿希姆（Lelewel, Joachim 1786—1861）——杰出的波兰历史学家和革命活动家；1830—1831年波兰起义的参加者，为波兰流亡者民主派領袖之一，1847—1848年为布魯塞尔民主协会委员会委員。——第680、747頁。
- 列奥波特，安哈尔特—德騷公爵（Leopold, Fürst von Anhalt-Dessau 1676—1747）——普魯士元帅，参加过許多次战争，曾改編普魯士的步兵。——第374頁。
- 米涅，克劳德·埃蒂耶納（Minié, Claude-Étienne 1804—1879）——法国軍官，新式步枪的发明者。——第41、42、59、217、253、380頁。
- 米格尔，唐（Miguel, Dom 1802—1866）

- 葡萄牙亲王，1828—1834 年为国王，葡萄牙专制教权派的首領。——第 297、538 頁。
- 米兰达，弗朗西斯科 (Miranda, Francisco 1750—1816) ——委內瑞拉將軍和政治活动家，南美西班牙殖民地独立战争的領導者之一，1811—1812 年为委內瑞拉軍总司令。——第 225、226 頁。
- 米太雅第 (Miltiades 死于公元前 489 年) ——古希腊統帥和国家活动家。——第 10 頁。
- 米斯科夫斯基，亨利克·路德維克 (Miskowsky, Henrik Ludvic 死于 1854 年) ——波兰軍官，匈牙利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被鎮压后流亡土耳其，后迁居倫敦。——第 469、471 頁。
- 毕若·德·拉·比貢利，托馬·罗伯尔 (Bugeaud de la Piconnerie, Thomas Robert 1784—1849) ——法国元帥；奥尔良党人，七月王朝时期是众議院議員，曾指揮軍隊鎮压 1834 年巴黎共和派的起义，侵略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战争的組織者之一，1841—1847 年为阿尔及利亚总督，1848—1849 年为阿尔卑斯軍团总司令，立法議會議員。——第 221—224 頁。
- 毕罗兄弟，加斯帕尔 (死于 1469 年) 和让 (死于 1463 年) (Bureau, Gaspard et Jean) ——法国軍事工程师，三十至五十年代曾領導法国炮兵，对炮兵作了一系列改进。——第 196 頁。
- 毕洛夫，弗里德里希·威廉，登內維茨伯爵 (Bülow, Friedrich Wilhelm, Graf Dennewitz 1755—1816) ——普魯士將軍，反对拿破侖法国战争的参加者。——第 165、179、182、187、188 頁。
- 毕达哥拉斯 (Pythagoras 公元前 571 左右—497) ——古希腊数学家，唯心主义哲学家，奴隶主貴族的思想家。——第 651 頁。
- 毕尔格尔斯，亨利希 (Bürgers, Heinrich 1820—1878) ——德国激进派政論家，“萊茵报”撰稿人 (1842—1843)，1848 年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科倫支部成員，“新萊茵报”編輯之一；1850 年起是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員，因科倫共产党人案件 (1852) 被判处六年徒刑，后为进步党人。——第 678 頁。
- 达·达 (Dá-dá) ——阿拉伯政論家，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受阿尔及利亚当局的委托把一些波拿巴派的抨击性小册子譯成本国語言。——第 586—588、591、613、618、619、749、753 頁。
- 达武，路易·尼古拉 (Davout, Louis-Nicolas 1770—1823) ——法国元帥，拿破侖第一的亲密战友之一，拿破侖法国历次战争的参加者。——第 64、66、97、114、132、159、160、175、259—262 頁。
- 达德利，罗伯特 (Dudley, Robert 1574—1649) ——英国海軍軍官和发明家，写有航海学方面的著作。——第 385 頁。
- 达来朗-貝里戈尔，沙尔·莫里斯 (Talleyrand-Perigord, Charles-Maurice 1754—1838) ——公爵，著名的法国外交家，外交大臣 (1797—1799、1799—1807、1814—1815)，法国出席維也納會議 (1814—1815) 的代表，駐倫敦大使 (1830—1834)。——第 158、166 頁。
- 达斯普雷，康斯坦丁 (D'Aspre, Constantin 1761—1809) ——男爵，奥地利將軍，反对法兰西共和国和拿破侖法国战争的参加者。——第 161 頁。

- 达尔格倫，約翰·阿道夫 (Dahlgren, John Adolf 1809—1870)——美国海軍軍官和軍事發明家，1863年起为海軍上將，写有許多海軍軍械方面的著作。——第 213 頁。
- 托尔，卡尔·費多羅維奇 (卡尔·弗里德里希)，1829年起为伯爵 (Toll, Карл Федорович (Karl Friedrich) 1777—1842)——俄国上校，后为將軍，反对拿破侖法国战争的参加者，1812年卫国战争时期为第一西方軍团的軍需长，从 9月起为主力軍的軍需长。——第 260、263 頁。
- 托雷，米格尔·德·拉 (Torre, Miguel de la 死于 1838 年)——西班牙將軍，1820—1822 年为鎮压南美西班牙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西班牙軍隊总司令。——第 234、236、237 頁。
- 托勒密·拉格 (Ptolemaeus Lagi 公元前 360 左右—283)——馬其頓統帥，馬其頓王亚历山大各次远征的参加者，公元前 323 年起为总督，后为希腊化的埃及国王 (公元前 305—285)，托勒密王朝的奠基人。——第 9、300 頁。
- 托勒密，克羅狄烏斯 (Ptolemaeus, Claudius 二世紀)——著名的古希臘天文學家和地理學家。——第 99 頁。
- 托里拆利，厄万乔里斯塔 (Torricelli, Evangerista 1608—1647)——杰出的意大利物理學家和數學家。——第 202 頁。
- 托尔斯頓森，倫納爾特 (Torstensson, Lennart 1603—1651)——三十年战争时期的瑞典統帥，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改編炮兵时的主要助手，1641—1645 年为瑞典軍隊的总司令。——第 200 頁。
- 伊万三世 (Иван III 1440—1505)——莫斯科大公 (1462—1505)。——第 594 頁。
- 伊丽莎白 (Elizabeth 1533—1603)——英国女王 (1558—1603)。——第 27、60、61、169 頁。
- 伊曼特，彼得 (Imandt, Peter)——德国教員，民主主义者，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敗后流亡瑞士，后迁居倫敦；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拥护者。——第 417—421、423、717、722 頁。
- 伊文思，乔治·德·雷希 (Evans, George de Lacy 1787—1870)——英国將軍，自由党政治活动家，議會議員；1854 年任克里木英軍師長。——第 56、59 頁。
- 伊布拉希姆 (Ibrahim)——阿尔及尔德依。——第 102 頁。
- 伊菲克拉特 (Iphicrates 約公元前 419—353)——雅典統帥，僱傭軍指揮官。——第 10、14、356、357 頁。
- 伊普西朗蒂，亚历山大 (Ypsilanti, Alexander 1792—1828)——希腊民族解放运动的活動家，莫尔达維亞一八二一年起义的組織者，起义失敗后逃往奥地利，被捕并一直監禁到 1827 年。——第 538 頁。
- 西蒙，爱德华 (Simon, Edouard 1824—1897)——法国政論家，生在柏林。波拿巴的密探。——第 420、480、481、502—504、613—619、647、652、659 頁。
- 西蒙，路德維希 (Simon, Ludwig 1810—1872)——特利尔的律師，小資產階級民主主义者，1848—1849 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議會議員，屬於左派；曾流亡瑞士。——第 616、754 頁。
- 西摩爾 (Seymour)——英国海軍上將，

- 1588年曾指揮分舰队追逐西班牙的舰队。——第171頁。
- 西塞罗(馬可·土利烏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 公元前106—43)——杰出的羅馬雄辯家和国家活动家,折衷主义哲学家。——第441、442、451、452、454、455頁。
- 西布利,亨利·霍普金斯(Sibley, Henry Hopkins 1816—1886)——美国軍官,軍用帳篷的发明者。——第277頁。
- 西哀士,艾曼紐尔·約瑟夫(Sieyès, Emmanuel-Joseph 1748—1836)——法国神甫,十八世紀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家,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第159頁。
- 西尔莫伊(Szirmay)——伯爵,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初匈牙利侨民,科苏特駐巴黎的特使。——第626頁。
- 西韦尔斯,卡尔·卡尔洛維奇(Сиверс, Карл Карлович 1772—1856)——伯爵,俄国將軍,反对拿破侖法国战争的参加者。——第261頁。
- 西諾普的第欧根尼(Diogenes of Sinope 約公元前404—323)——古希腊哲学家,昔尼克学派創始人之一,該学派反映了人民中貧困阶层对有产者統治的消极抗議。——第425頁。
- ## 七 画
- 庇护九世(Pius IX 1792—1878)——羅馬教皇(1846—1878)。——第536、552頁。
- 孚赫,茹尔(尤利烏斯)(Faucher, Jules (Julius) 1820—1878)——德国政論家,青年黑格尔分子;貿易自由的拥护者,曾侨居英国,为“晨星报”的撰稿人,1861年回到德国,进步党人。——第508—510頁。
- 但丁·阿利格埃里(Dante Alighieri 1265—1321)——偉大的意大利詩人。——第430、459、460、488、616、697頁。
- 佐美尔(Sommer)——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初是在巴黎的普魯士警探。——第437、729頁。
- 伽利略,伽利萊(Galilei, Galileo 1564—1642)——偉大的意大利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力学原理的創始人,为先进的世界观而斗争的战士。——第202頁。
- 伯利克里(Perikles 公元前490左右—429)——雅典国家活动家,战略家(公元前444—429),曾促进奴隶主民主制的巩固。——第11、14頁。
- 别尔努利,約翰(Bernoulli, Johann 1667—1748)——杰出的瑞士数学家,格罗宁根(荷兰)大学和巴塞尔大学的教授,以微分学和积分学以及力学方面的著作而出名。——第202頁。
- 車尔尼曉夫,亚历山大·伊万諾維奇(Чернышев, 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1786—1857)——俄国軍官,1812年起为將軍,国家活动家,反对拿破侖法国战争的参加者,1809—1812年为駐拿破侖第一司令部的軍事外交代表,1828—1852年为陸軍大臣。——第163、164頁。
- 努米迪亚的梅泰魯斯(昆图斯·采齐利烏斯·梅泰魯斯)(Quintus Caecilius Metellus Numidicus 公元前二至一世紀)——羅馬政治活动家和統帥,公元前109年为执政官,公元前109—107年在朱古达战争(公元前111—105)中为羅馬軍队指揮官。——第20頁。
- 李比希,尤斯图斯(Liebig, Justus 1803—1873)——杰出的德国学者,农业化

- 学的創始人之一。——第 656 頁。
- 李卜克內西, 威廉(Liebkecht, Wilhelm 1826—1900)——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 德国社会民主党創建人和領袖之一;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 407、430—433、503—505、508—510、513—517、519、522、525、653、661、677、679、684、691、693、703—706、708、732、733、741—745、755 頁。
- 里謝尔, 加布里埃尔(Riesser, Gabriel 1806—1863)——德国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曾出来保护犹太人的平等权利, 1848—1849 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議會議員, 最初属于中間派右翼, 1848 年 9 月起为中間派左翼。——第 499 頁。
- 里巴斯, 霍賽·費里克斯(Ribas, José Félix 1775—1814)——委內瑞拉將軍, 南美西班牙殖民地独立战争的参加者。——第 225—230 頁。
- 呂克納尔, 尼古拉(Luckner, Nicolas 1722—1794)——法国元帅, 法兰西共和国反对第一次欧洲国家同盟的战争的参加者。——第 95 頁。
- 呂利埃尔, 約瑟夫·馬尔塞倫(Rulhières, Joseph-Marcelin 1787—1862)——法国將軍和政治活动家, 拿破侖法国历次战争的参加者, 三十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 1848—1849 年为制宪議会和立法議會議員和陸軍部长, 1851 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辞职。——第 223 頁。
- 狄更斯, 查理(Dickens, Charles 1812—1870)——偉大的英国现实主义作家。——第 455、576 頁。
- 狄利希, 威廉·舍弗尔(Dilich, Wilhelm Scheffer 1575 左右—1655)——德国軍事著作家, 軍事学术和筑城学教科书的作者。——第 340 頁。
- 狄摩西尼(Demosthenes 公元前 384—322)——杰出的古希腊演說家和政治活动家, 雅典的反馬其頓派的領袖, 奴隶主民主制的拥护者。——第 452 頁。
- 辛紐尔(Signeul)——十九世紀初瑞典駐巴黎总領事。——第 162 頁。
- 辛凱尔迪, 卡尔·路德維希·弗里德里希(Hinckeldey, Karl Ludwig Friedrich 1805—1856)——普魯士政府官員, 1848 年起为柏林警察总监, 1853 年起为內务部警察司司长。——第 447、450、451、474、731 頁。
- 辛辛納图斯(魯齐烏斯·昆克提烏斯·辛辛納图斯)(Lucius Quinctius Cincinnatus 公元前五世紀)——羅馬貴族, 执政官(公元前 460), 独裁者(公元前 458 和 439), 据傳說, 他生活儉朴, 亲自耕种。——第 673 頁。
- 麦迪納-西多尼亚公爵, 阿隆索·佩雷斯·德·古斯曼(Medina Sidonia, Alonzo Perez de Guzman, duque de 1550—1615)——西班牙国王菲力浦二世的寵臣, 1588 年为西班牙舰队司令。——第 169 頁。
- 麦克諾頓, 威廉·海伊(Macnaghten, William Hay 1793—1841)——英国外交家, 駐喀布尔公使(1838—1841), 英国在中亚細亚进行殖民擴張的組織者之一, 在发动英国阿富汗战争(1838—1842)中起了主要作用。——第 81—83 頁。
- 麦克唐納, 雅克·埃蒂耶納·約瑟夫·亚历山大(Macdonald, Jacques-Étienne-Joseph-Alexandre 1765—1840)——

- 法国元帅(1809年起),拿破侖法国历次战争的参加者。——第64、132、177、178、184—188、219頁。
- 亨利四世(Henri IV 1553—1610)——法国国王(1589—1610)。——第32、33、61頁。
- 亨利七世(Henry VII 1457—1509)——英国国王(1485—1509)。——第384頁。
- 亨利八世(Henry VIII 1491—1547)——英国国王(1509—1547)。——第60、384頁。
- 亨利,托马斯(Henry, Thomas 1807—1876)——英国治安法官。——第522、744、746頁。
- 亨齐,亨利希(Hentzi, Heinrich 1785—1849)——奥地利将军,1849年匈牙利革命軍圍攻布达要塞时,为要塞的奥地利守軍指揮官。——第272、273頁。
- 希龙,彼得罗·奥古斯丁(Girón, Pedro Augustin 1778—1842)——西班牙将军,反对拿破侖統治的解放战争(1808—1814)的参加者。——第268頁。
- 希罗多德(Herodotos 約公元前484—425)——古希腊历史学家。——第8、152頁。
- 希皮斯利,古斯达夫(Hippisley, Gustav)——英国軍官,英国志願軍为西班牙殖民地独立斗争而远征南美(1817—1818)的参加者和远征記的作者。——第241頁。
- 希尔施,威廉(Hirsch, Wilhelm)——汉堡的店員,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初为在倫敦的普魯士警探。——第726—734頁。
- 希尔盖特納尔,格奥尔格(Hillgärtner, Georg)——德国小資产階級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革命失敗后流亡国外。——第738頁。
- 利佩,列奥波特(Lippe, Leopold 1815—1889)——伯爵,普魯士国家活动家,法学家,1860年为柏林檢察官,后任司法大臣(1862—1867)。——第685、686頁。
- 利美腊克,波倫(Limayrac, Paulin 1817—1868)——法国新聞工作者,曾为法国許多大报撰稿,1861—1868年任“立宪主义者报”主編,波拿巴主义者。——第749頁。
- 利迭尔斯,亚历山大·尼古拉也維奇(Лидерс, Александр Николаевич 1790—1874)——俄国將軍,1849年为参加鎮压匈牙利革命的俄軍軍长,1853—1856年为参加克里木战争的俄軍指揮官。——第135頁。
- 利希頓施坦,約翰(Liechtenstein, Johann 1760—1836)——公爵,奥地利將軍,1809年起为元帅,反对拿破侖法国战争的参加者。——第69頁。
- 利希頓施坦,温采尔(Liechtenstein, Wenzel 1767—1842)——公爵,奥地利軍官,后为將軍,反对拿破侖法国战争的参加者,1814年为施瓦尔岑堡元帅的副官。——第187頁。
- 利希諾夫斯基,費里克斯(Lichnowski, Felix 1814—1848)——公爵,普魯士軍官,反动分子,法兰克福国民議會議員,屬于右翼;在1848年9月法兰克福起义时被人民打死。——第491、666、668頁。
- 苏,欧仁(Sue, Eugène 1804—1857)——法国作家,著有一些小市民的伤感的社会小說。——第728頁。
- 苏路克,法斯廷(Soulouque, Faustin

- 1782 左右—1867)——海地黑人共和國總統，1849 年自立為帝，稱法斯廷一世。——第 414 頁。
- 苏尔特，尼古拉·让 (Soult, Nicolas-Jean 1769—1851)——法國元帥，國家活動家，拿破侖法國歷次戰爭的參加者，在 1808—1814 年比利牛斯半島戰爭中為法軍指揮官，七月王朝時期任陸軍大臣(1830—1834、1840—1845)，外交大臣(1839—1840)和首相(1832—1834、1839—1840 和 1840—1847)。——第 53、54、159、160、175、221、264—269 頁。
- 苏克雷，安东尼奥·霍賽 (Sucre, Antonio José 1795—1830)——南美將軍和政治活動家，南美西班牙殖民地獨立戰爭的領導者之一，玻利瓦爾的擁護者，玻利維亞總統(1826—1828)。——第 172、237、238 頁。
- 苏里曼一世·坎努尼(苏里曼大帝) (Suleiman I el Kanuni (The Magnificent) 1494—1566)——土耳其蘇丹(1520—1566)。——第 102、271 頁。
- 苏沃洛夫，亚历山大·瓦西里也維奇 (Сувор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Васильевич 1730—1800)——偉大的俄國統帥。——第 112 頁。
- 苏赫帖連，彼得·科尔尼洛維奇 (Сухтелен, Петр Корнилович 1751—1836)——俄國將軍，軍事工程師和外交家，原系荷蘭人，反對拿破侖法國戰爭的參加者；1808 年指揮圍攻斯維阿波爾格要塞，1809 年起任駐斯德哥爾摩大使。——第 163 頁。
- 沙佩爾，卡尔 (Schapper, Karl 1812—1870)——德國和國際工人運動的著名活動家，正義者同盟的領導者之一，共產主義者同盟中央委員會委員，1848—1849 年革命的參加者；1850 年共產主義者同盟分裂時為冒險主義宗派集團的領袖之一；1856 年重新同馬克思接近；第一國際總委員會委員。——第 429、466、470、471、683、729 頁。
- 沙列爾，茹利安 (Schaller, Julien 1807—1871)——瑞士國家活動家，夫賴堡(弗里布爾)州政府首腦(1848—1856)。——第 433 頁。
- 沙貝利茨，雅科布 (Schabelitz, Jakob 1827—1899)——瑞士出版家和書商，資產階級激進派；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初同馬克思和恩格斯有來往。——第 439、448 頁。
- 沙法里克，巴維爾·約瑟夫 (Šafárik, Pavel Josef 1795—1861)——傑出的斯洛伐克語文學家、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捷克和斯洛伐克民族運動的自由派代表人物；奧地利斯拉夫主義綱領的擁護者。——第 548 頁。
- 沙多勃利昂子爵，弗朗斯瓦·勒奈 (Chateaubriand, François-René, vicomte de 1768—1848)——著名的法國作家，反動的国家活動家和外交家，曾任外交大臣(1822—1824)，法國出席維羅那會議(1822)的代表。——第 538 頁。
- 沙伊伯勒，卡尔·亨利希 (Schaible, Karl Heinrich 1824—1899)——德國醫生和作家，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1849 年巴登—普法爾茨起義的參加者，後流亡英國。——第 523—525、621、684、702、704 頁。
- 沙伊特爾，約翰·伯恩哈特 (Scheitherr, Johann Bernhard 十七世紀)——德國軍事工程師，斯佩克爾的追隨者，寫有築城學方面的著作。——第 339 頁。

- 沃邦, 塞巴斯提安·勒·普雷特尔(Vauban, Sébastien le Prêtre 1633—1707)——法国元帅, 军事工程师, 写有許多筑城学和圍攻理論方面的著作。——第 89、198、281、282、330、337、338、340—344、347、350—352 頁。
- 沃里克伯爵, 理查·尼維尔(Warwick, Richard Nevill, Earl 1428—1471)——英国封建主, 在紅白薔薇战争(1455—1485)中起巨大作用; 他操纵了立王事宜, 因此得外号“国王制造者”。——第 671 頁。
- 沃龙佐夫, 米哈伊尔·謝明諾維奇(Воронцов, Михаил Семенович 1782—1856)——公爵, 俄国国家活动家, 將軍, 反对拿破侖法国战争的参加者; 1844—1854 年为高加索駐軍总司令和高加索总督。——第 189 頁。
- 沃尔柯特, 約翰(Wolcot, John 1738—1819)(笔名为彼得·品得 Peter Pindar)——英国諷刺詩人。——第 487 頁。
- 沃尔弗, 威廉(Wolff, Wilhelm 1809—1864)——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家, 职业是教师, 西里西亚农奴的儿子; 学生运动的参加者, 1834—1839 年被关在普魯士監獄, 1846—1847 年为布魯塞尔共产主义通訊委员会委員, 1848 年 3 月起为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員, 1848—1849 年为“新萊茵报”編輯之一, 法兰克福国民議會議員;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 435、456、457、464、495—500、506、510、695、705、706、709 頁。
- 沃尔弗, 伯恩哈特(Wolff, Bernhard 1811—1879)——德国新聞工作者, 1848 年起为柏林“国民报”所有人, 德国第一个电訊社(1849)的创办人。——第 695 頁。
- 沃尔弗, 克利斯提安(Wolff, Christian 1679—1754)——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和数学家。——第 202 頁。
- 沃尔弗拉姆·馮·埃申巴赫(Wolfram von Eschenbach 約 1170—1220)——中世紀德国詩人, 騎士詩“巴齐法尔”的作者。——第 622 頁。
- 杜科, 罗日(Ducos, Roger 1747—1816)——十八世紀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家, 大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职业是律師。——第 159 頁。
- 杜蒙, 約瑟夫(Dumont, Joseph 1811—1861)——德国资产阶级新聞工作者, 温和的自由派; 1831 年起为“科倫日报”发行人; 改姓蒙特。——第 655、757、759 頁。
- 杜朗, 魯道夫(Dulon, Rudolph 1807—1870)——德国牧师, 反官方教会的“光明之友”运动的拥护者; 1853 年流亡美洲。——第 474 頁。
- 杜肯, 阿伯拉罕(Duquesne, Abraham 1610—1688)——侯爵, 法国海軍上将, 1680—1683 年曾对阿尔及利亚和的黎波里采取軍事行动。——第 102 頁。
- 杜帕, 比埃尔·路易(Dupas, Pierre-Louis 1761—1823)——法国將軍, 拿破侖法国历次战争的参加者。——第 161 頁。
- 杜隆, 弗朗斯瓦·沙尔(Dulong, François-Charles 1792—1834)——法国律師和政治活动家, 1831 年起为众議院議員, 属于自由主义反对派。——第 221—222 頁。
- 杜班, 安得列·瑪丽·让·雅克(Dupin, André-Marie-Jean-Jacques 1783—

- 1865) —— 法国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奥尔良党人, 后为波拿巴主义者。——第 638 頁。
- 杜邦·德·勒坦, 比埃尔·安都昂 (Dupont de l'Étang, Pierre-Antoine 1765—1840) —— 法国將軍, 拿破侖法国历次战争的参加者, 1808 年在西班牙作战时在拜兰附近率本师投降。——第 141 頁。
- 杜舍克, 弗兰蒂舍克 (Dušek, František 1797—1873) —— 匈牙利国家活动家, 原系捷克人, 瑟美列革命政府的财政部长(1849)。——第 632 頁。
- 杜瓦諾, 奥古斯特·爱德华 (Doineau, Auguste-Edouard 生于 1824 年) —— 法国軍官, 1853 年起为阿尔及尔的某阿拉伯局局长, 1856 年因杀死一个阿尔及利亚人被陪审法庭判处死刑, 1857 年被拿破侖第三改为无期徒刑; 1859 年遇赦。——第 109 頁。
- 杜弗尔, 茹尔·阿尔芒·斯坦尼斯拉 (Dufaure, Jules-Armand-Stanislas 1798—1881) —— 法国律师, 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 奥尔良党人; 因参加政治审判而大有名声; 1848 年为制宪議会议員, 1848 年 10—12 月为卡芬雅克政府的內务部长。——第 556 頁。
- 杜毕伊·德·洛姆, 斯坦尼斯拉·沙尔·昂利·罗朗 (Dupuy de Lôme, Stanislas-Charles-Henri-Laurent 1816—1885) —— 法国軍事工程师, 造船工程师。——第 389 頁。
- 杜孔米恩, 埃利 (Ducommun, Elie 1833—1906) —— 瑞士国家活动家和新聞工作者, 激进派, 1855 年起为“日内瓦評論”編輯。——第 606 頁。
- 杜庫德雷-霍尔施坦 (Ducoudray Holstein) —— 法国軍官, 南美西班牙殖民地独立战争的参加者, 写过一本关于玻利瓦尔的具有偏見的书。——第 240 頁。
- 杜木里埃, 沙尔·弗朗斯瓦 (Dumourier, Charles-François 1739—1823) —— 法国將軍和十八世紀末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政治活动家, 吉倫特党人; 1792—1793 年为北部革命軍队指揮官; 1793 年 3 月背叛法兰西共和国。——第 140 頁。
- 杜加美尔, 亚历山大·奥西波維奇 (Дюгамель, Александр Осипович 1801—1880) —— 俄国將軍和外交家, 1842 年和 1848 年負特別使命出使多瑙河各公国。——第 538 頁。
- 貝姆, 約瑟夫 (Bem, Joseph 1795—1850) —— 波兰將軍, 民族解放运动活动家, 1830—1831 年起义的参加者; 1848 年参加維也納革命斗争; 匈牙利革命軍领导者之一; 后在土耳其軍队中服务。——第 132—135 頁。
- 貝多, 瑪丽·阿尔丰斯 (Bedeau, Marie-Alphonse 1804—1863) —— 法国將軍和政治活动家, 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 三十至四十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 第二共和国时期为制宪議会和立法議会副議長, 1851 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逃离法国。——第 223 頁。
- 貝列拉, 伊薩克 (Péreire, Isaac 1806—1880) —— 法国銀行家, 波拿巴主义者, 1852 年与其兄艾米尔·貝列拉一起创办股份銀行 Crédit Mobilier (动产信用公司), 写有許多关于信用問題的著作。——第 663 頁。
- 貝西埃尔, 让·巴蒂斯特 (Bessières, Jean-Baptiste 1768—1813) —— 法国

- 元帅，法兰西共和国和拿破侖法国历次战争的参加者。——第 65、136—137 頁。
- 貝林涅尔勃劳，伊西多尔——見奧本海姆，亨利希·伯恩哈特。
- 貝里公爵夫人，瑪丽·卡洛琳·斐迪南·路易莎(Berry, Maria-Caroline-Ferdinande-Louise, duchesse de 1798—1870)——正統派法国王位追求者尚博尔伯爵的母亲；1832 年企图在万第发动暴乱推翻路易-菲力浦。——第 221 頁。
- 貝利耶，比埃尔·安都昂(Berryer, Pierre-Antoine 1790—1868)——法国律师和政治活动家，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議會和立法議會議員，正統主义者。——第 556 頁。
- 貝利多尔，貝尔納·福雷·德(Belidor, Bernard-Forest de 1693—1761)——法国軍事工程师，写有許多筑城学、炮兵学和数学方面的著作。——第 202 頁。
- 貝雷斯福德，威廉(Beresford, William)——英国天主教教士，土阿姆(在爱尔兰)大主教。——第 297 頁。
- 貝雷斯福德，威廉·卡尔(Beresford, William Carr 1768—1854)——子爵，英国將軍和政治活动家，托利党人，許多次殖民远征的組織者和領導者之一，1808—1814 年参加比利牛斯半島的战争，葡萄牙軍总司令(1809—1823)；英国軍械总长(1828—1830)。——第 53、296—297 頁。
- 貝雷斯福德，乔治，瓦特福德侯爵(Beresford, George, Marquis Waterford 死于 1826 年)——英国貴族，威·卡·貝雷斯福德之父。——第 296 頁。
- 貝克曼(Beckmann)——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初是在巴黎的普魯士警探，“科倫日报”駐巴黎記者。——第 437、438、729 頁。
- 貝克尔，約翰·菲力浦(Becker, Johann Philippe 1809—1886)——制刷工人，德国和瑞士三十至四十年代民主运动的参加者；以瑞士軍官的身分参加了反对宗得崩德的战争；1848—1849 年革命的积极活动家，在巴登—普法尔茨起义时曾指揮巴登民团，起义失敗后逃离德国；六十年代是第一国际的著名活动家之一，国际各次代表大会的参加者，“先驅”杂志編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 431、442—447、462、467、638—647、665、678、683、720、725、752 頁。
- 貝克尔，麦克斯·約瑟夫(Becker, Max Joseph 死于 1896 年)——萊茵区的工程师，民主主义者，1849 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起义失敗后，流亡瑞士，后迁居美国。——第 406、409 頁。
- 貝克尔，哥特弗利德(Becker, Gottfried 1827—1865)——德国新聞工作者，1849 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1853 年流亡美洲，美国内战的参加者；約翰·菲力浦·貝克尔之子。——第 444 頁。
- 貝尔德，戴維(Baird, David 1757—1829)——英国將軍，1800—1802 年为侵略埃及的英国远征軍指揮官。——第 296 頁。
- 貝尔蒂埃，让·巴蒂斯特(Berthier, Jean-Baptiste 1721—1804)——法国軍事工程师，貝尔蒂埃元帅的父亲。——第 95 頁。
- 貝尔蒂埃，路易·亚历山大(Berthier,

- Louis-Alexandre 1753—1815) —— 法国元帅, 法兰西共和国和拿破侖法国历次战争的参加者, 曾任拿破侖第一的陆軍总参謀长。——第 95—98、142、183 頁。
- 貝尔納多特, 让·巴蒂斯特·茹尔 (Bernadotte, Jean-Baptiste-Jules 1763—1844) —— 法国元帅, 法兰西共和国和拿破侖法国历次战争的参加者; 1810 年被瑞典国王查理十三收为义子, 成为王位继承人和瑞典摄政王; 1813 年参加了反对拿破侖第一的战争; 瑞典和挪威的国王, 称查理十四·約翰 (1818—1844)。——第 93、113、136、157—167、175、177、179—181 頁。
- 貝尔加尔德, 弗里德里希·亨利希 (Bellegarde, Friedrich Heinrich 1756—1845) —— 伯爵, 奥地利元帅, 反对拿破侖法国战争的参加者。——第 161 頁。
- 貝尔穆德斯, 霍賽·弗朗西斯科 (Bermudez, José Francisco 1782—1831) —— 委內瑞拉將軍和政治活动家, 南美西班牙殖民地独立战争的参加者, 玻利瓦尔的反对者。——第 229 頁。
- 克賴, 帕尔 (Kray, Pál 1735—1804) —— 奥地利將軍, 原系匈牙利人, 反对法兰西共和国和拿破侖法国战争的参加者。——第 157 頁。
- 克罗謝 (Crawshay) —— 十九世紀五十年代英国新聞工作者, 烏尔卡尔特的拥护者。——第 627 頁。
- 克路斯, 阿道夫 (Cluß, Adolph 死于 1889 年以后) —— 德国工程师,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 1848 年是美因茲工人教育协会的书記, 1849 年流亡美国; 华盛顿海軍部職員; 五十年代同馬克思和恩格斯經常通信, 曾为德国、英国和美国許多工人和民主报纸撰稿。——第 735 頁。
- 克美蒂, 迪約尔吉 (格奧尔格) (Kmetz, György (Georg) 1810—1865) —— 匈牙利將軍, 匈牙利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革命失敗后流亡土耳其并加入土耳其国籍, 改名为伊斯馬伊尔-帕沙, 获土耳其將軍銜并参加克里木战争 (1853—1856)。——第 272、273 頁。
- 克列美尔 —— 見舍尔瓦尔, 茹利安。
- 克倫威尔, 奥利弗 (Cromwell, Oliver 1599—1658) —— 十七世紀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貴族的領袖, 1653 年起为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护国公。——第 308 頁。
- 克涅威希, 卡洛伊 (Knezich, Karl 1808 左右—1849) —— 匈牙利將軍, 1848—1849 年革命时期为匈牙利革命軍指揮官。——第 273 頁。
- 克呂登納, 巴尔巴拉·尤莉婭 (Krüdener, Barbara Juliane 1764—1824) —— 男爵夫人, 女作家, 虔誠主义的宣揚者; 十九世紀时誤傳建立神圣同盟的主張是她提出的。——第 532 頁。
- 克提西阿斯 (Ctesias 公元前五世紀中叶至公元前四世紀初) —— 古希腊历史学家和医生, 写有古代印度和波斯历史方面的著作。——第 193 頁。
- 克里斯提安-弗雷德里克 (Christian-Frederick 1786—1848) —— 丹麦亲王, 1813—1814 年是总督, 1814 年是挪威国王, 1839—1848 年是丹麦国王, 称克里斯提安八世。——第 166 頁。
- 克拉里, 欧仁妮·貝尔納丁娜·德吉烈 (Clary, Eugénie-Bernardine-Désirée 1777—1860) —— 貝尔納多特的妻子。——第 158 頁。

克拉普卡, 迪約尔吉(格奥尔格)(Klapka, György (Georg) 1820—1892)——匈牙利將軍, 1848—1849年革命时期为匈牙利軍隊指揮官之一; 1849年6—9月是科莫恩要塞卫戍司令, 1849年流亡国外; 五十年代同波拿巴集团有联系, 1867年大赦后回到匈牙利。——第271、594、603、604、623、628、631、633、635—638頁。

克劳澤, 卡尔·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見弗略里, 查理。

克劳塞維茨, 卡尔 (Clausewitz, Karl 1780—1831)——普魯士將軍和資產階級最杰出的軍事理論家; 1812—1814年在俄国軍隊中服务。——第242頁。

克萊維尔, 路易·弗朗斯瓦 (Clairville, Louis-François 1811—1879) (眞姓为尼古勒 Nicolaie)——法国剧作家。——第749頁。

克萊斯特, 弗里德里希·亨利希·斐迪南·艾米尔 (Kleist, Friedrich Heinrich Ferdinand Emil 1762—1823)——普魯士將軍, 后为元帅, 反对拿破侖法国战争的参加者。——第182、184、185、187頁。

克利奧米尼三世 (Cleomenes III 公元前255—219)——斯巴达王 (公元前235—221)。——第12頁。

克利斯特恩, 約翰·威廉 (Christern, Johann Wilhelm)——匿名出版的諷刺性小册子“1847年4月艾塞勒博士和柏塞勒男爵出席省議會會議旅途散記”的作者。——第524、691頁。

克洛斯曼 (Cloßmann)——德国軍官, 小資產階級民主主义者, 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 后侨居瑞士。——第592頁。

克洛塞尔, 倍尔特兰 (Clausel, Bertrand 1772—1842)——伯爵, 法国將軍, 1831年起是元帅; 1809—1814年参加比利牛斯半島战争, 阿尔及利亚总督 (1830—1831 和 1835—1837)。——第104、108、264、267—269頁。

克洛蒂尔达, 薩瓦公主 (Clotilde 1843—1911)——撒丁国王維克多-艾曼努尔二世的女儿, 1859年起是拿破侖亲王的妻子。——第620頁。

克累貝, 让·巴蒂斯特 (Kléber, Jean-Baptiste 1753—1800)——法国將軍, 法兰西共和国反对第一次欧洲国家同盟的战争的参加者。——第157頁。

克累茨, 基普里揚·安东諾維奇 (Крейц, Киприян Антонович 1777—1850)——伯爵, 俄国將軍, 反对拿破侖法国战争的参加者。——第262頁。

克累尔費, 卡尔 (Clerfayt, Karl 1733—1798)——奥地利元帅, 奧土战争 (1788—1789) 的参加者, 1794—1795年在反对法兰西共和国战争中任奧軍总司令。——第74、157頁。

八 画

門登 (死于1878年)——緬甸国王 (1853—1878)。——第292頁。

弥勒 (Müller)——1860年为倫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主席。——第681頁。

雨果, 維克多 (Hugo, Victor 1802—1885)——偉大的法国作家。——第554、555、561、562、595、631、752頁。

孟多薩——見胡尔塔多·德·孟多薩。

味吉尔 (普卜利烏斯·味吉尔·馬洛) (Publius Vergilius Maro 公元前70—19)——杰出的羅馬詩人。——第425、463、701、724頁。

- 帖木儿-沙赫(1746—1793)——阿富汗沙赫(1773—1793)。——第79頁。
- 叔尔茨, 卡尔(Schurz, Karl 1829—1906)——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 曾流亡瑞士; 后为美国国家活动家。——第473、474、484、486、487頁。
- 岡薩勒斯(Gonzalez)——西班牙軍官, 十九世紀初为镇压南美西班牙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西班牙軍隊指揮官。——第229頁。
- 舍尔瓦尔, 茹利安(Cherval, Julien)(真名为約瑟夫·克列美尔 Joseph Crämer)——普魯士警探和奸細, 曾钻进共产主义者同盟队伍, 同盟分裂后曾领导属于維利希—沙佩尔冒險主义宗派集团的一个巴黎支部, 1852年2月所謂巴黎德法密謀案件的被告之一; 在警察局的帮助下越獄逃跑, 1853—1854年化名紐金特在瑞士进行密探活动。——第422、437—447、488、509、584、677、678、683、696、698、705、706、709、725、726、729—731、734頁。
- 昂古列姆公爵, 路易·安都昂(Angoulême, Louis-Antoine, duc d' 1775—1844)——法国国王查理十世之子, 1823年曾指揮法国軍隊镇压西班牙资产阶级革命。——第221頁。
- 芬克(Fink)——在日内瓦的德国侨民。——第434頁。
- 芬克, 格奥尔格(Vincke, Georg 1811—1875)——男爵, 普魯士政治活动家, 1848—1849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議会的右派領袖之一; 1849年为第二議院議員, 属于右派, 五十至六十年代被选入普魯士議會下院, 温和的自由主义者。——第444、491、492、665—674頁。
- 奈, 米歇尔(Ney, Michel 1769—1815)——法国元帅, 法兰西共和国和拿破侖法国历次战争的参加者。——第184、186、187、205、259—262、325、416頁。
- 奈穆尔公爵, 奥尔良的路易·沙尔·菲力浦·拉法埃尔(Nemours, Louis-Charles-Philippe-Raphael d'Orléans, duc de 1814—1896)——法国国王路易-菲力浦的第二个儿子, 將軍, 三十至四十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 1848年二月革命后流亡英国。——第223頁。
- 彼得一世(Пётр I 1672—1725)——1682年起为俄国沙皇, 1721年起为全俄皇帝。——第507、537頁。
- 彼得魯一世(Pedro I 1798—1834)——巴西皇帝(1822—1831), 葡萄牙国王, 称彼得魯四世(1826), 后把葡萄牙王位让给自己的女儿瑪丽亚二世·达·格洛丽亚。——第133頁。
- 金克尔, 哥特弗利德(Kinkel, Gottfried 1815—1882)——德国詩人和政論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 被普魯士法庭判处无期徒刑, 后越獄逃跑, 流亡英国; 在倫敦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領袖之一, “海尔曼”周报編輯(1859), 反对馬克思和恩格斯。——第418、429、473、474、483—486、502、508、736、738、756、758頁。
- 金累克, 亚历山大·威廉(Kinglake, Alexander William 1809—1891)——英国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議會議員(1857—1865), 自由党人。——第573、616頁。
- 居萊, 伊格納茨(Gyulay, Ignaz 1763—1831)——伯爵, 奥地利將軍, 反对拿破侖法国战争的参加者。——第183頁。

- 居維叶, 若尔日 (Cuvier, George 1769—1832) ——法国大自然科学家, 以比較解剖学、古生物学和动物分类学方面的著作而聞名。——第 457 頁。
- 居斯丁伯爵, 亚当·菲利浦 (Custine, Adam-Philippe, comte de 1740—1793) ——法国將軍和政治活动家, 法兰西共和国反对第一次欧洲国家同盟的战争的参加者。——第 95、157 頁。
- 林格斯 (Rings, L. W.)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 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初侨居倫敦,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拥护者。——第 732 頁。
- 林格尔加特 (Ringelgardt) ——科倫某剧院經理, 后来 (1832 年起) 为萊比錫某剧院經理。——第 116、117 頁。
- 林普勒尔, 格奥尔格 (Rimpler, Georg 1636—1683) ——德国軍事工程师, 写有筑城学方面的著作。——第 344、345 頁。
- 林德赫斯特男爵, 約翰·辛格尔頓·柯普利 (Lyndhurst, John Singleton Copley, Baron 1772—1863) ——英国国家活动家, 法学家, 托利党人; 曾任大法官 (1827—1830、1834—1835 和 1841—1846)。——第 529 頁。
- 法济, 让·雅克 (詹姆斯) (Fazy, Jean-Jacques (James) 1794—1878) ——瑞士国家活动家和政論家, 激进派, 日内瓦州政府首腦 (1846—1853 和 1855—1861), 实行亲波拿巴政策。——第 407、434、436、458、503、507、592、594、598、599、601、602、605—609、613、623、638—647、676、717、719、752 頁。
- 法特赫·琼格 (Fath Dschung) ——阿富汗沙赫舒扎之子, 1842 年做过几个月阿富汗沙赫。——第 85 頁。
- 法特赫汗 (Fath-Khan 死于 1818 年) ——阿富汗沙赫馬茂德的大臣。——第 80 頁。
- 法尔奈澤, 亚历山大 (亚历山大罗), 帕尔馬公爵 (Farnese, Alexander (Alessandro), duc de Parma 1545—1592) ——西班牙統帥和国家活动家, 1578—1592 年任尼德兰总督。——第 169、170 頁。
- 法耳梅賴耶尔, 雅科布·菲利浦 (Fallmerayer, Jakob Philipp 1790—1861) ——德国历史学家和旅行家。——第 505 頁。
- 图拉真 (馬可·烏尔皮·图拉真) (Marcus Ulpius Trajanus 53—117) ——羅馬皇帝 (98—117) 和統帥。——第 25、362 頁。
- 图温南, 路易·埃蒂耶納 (Thouvenin, Louis-Étienne 1791—1882) ——法国軍官和軍事发明家。——第 41 頁。
- 图温奈尔, 爱德华·安都昂 (Thouvenel, Edouard-Antoine 1818—1866) ——法国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 波拿巴主义者, 外交大臣 (1860—1862)。——第 577、600—603 頁。
- 图尔, 伊什特万 (Türr, Istvan 1825—1908) ——流亡土耳其的匈牙利軍官, 曾参加克里木战争, 站在联軍方面; 参加过切尔克斯人反对俄国的战争。——第 628 頁。
- 图尔特, 阿伯拉罕·路易 (Tourte, Abraham Louis 1818—1863) ——瑞士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第 434、601、646、718—720 頁。
- 图奇科夫, 尼古拉·阿列克謝也維奇 (Тучков, 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еевич 1761—1812) ——俄国將軍, 反对拿破侖法

- 国战争的参加者，1812年卫国战争时期任軍长。——第259、260頁。
- 佩里埃，約翰(Perrier, John)——瑞士政治活动家，激进主义者，大会議議員(1852和1856—1860)，法济的拥护者。——第602、604—607頁。
- 佩尼亚，米格尔(Peña, Miguel 1781—1833)——委內瑞拉律師和政治活动家，南美西班牙殖民地独立战争的参加者，玻利瓦尔的拥护者；1812年任拉瓜拉总督，委內瑞拉脱离哥伦比亚独立后任派斯政府內务和司法部长。——第226頁。
- 佩特丹，昂塞尔姆(Petétin, Anselme 1807—1873)——法国政論家，初为共和党人，后为波拿巴主义者；薩瓦省长(1860—1861)。——第598頁。
- 佩克桑，昂利·約瑟夫(Paixhans, Henri-Joseph 1783—1854)——法国將軍，軍事工程师和发明家，写有許多炮兵学方面的著作。——第212、213、387頁。
- 佩尔采尔，摩里茨(Perczel, Moritz 1811—1899)——匈牙利將軍，匈牙利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敗后流亡土耳其，1851年迁居英国。——第545、633頁。
- 佩蒂昂，安·亚历山大·薩貝斯(Petion, Anne Alexandre Sabès 1770—1818)——西印度政治活动家和將軍，曾参加海地摆脱殖民統治的解放斗争，海地共和国总統(1807—1818)。——第231、232頁。
- 佩利西埃，让·雅克(Pelissier, Jean-Jacques 1794—1864)——法国將軍，1855年起为元帅，三十至五十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曾任克里木法軍总司令(1855—1856)。——第109、556頁。
- 佩勒蒂埃，让·巴蒂斯特(Pelletier, Jean-Baptiste 1777—1862)——法国將軍，拿破侖法国历次战争的参加者，七月王朝时期曾任法国許多炮兵学校校长之职。——第132頁。
- 帕岡，布列茲·弗朗斯瓦·德(Pagan, Blaise-François de 1604—1665)——法国軍事工程师，写有筑城学方面的著作。——第337、340、341頁。
- 帕連，彼得·阿列克謝也維奇(Пален, Петр Алексеевич 1745—1826)——伯爵，俄国將軍和国家活动家，彼得堡軍事总督(1798—1801)，謀杀保罗一世的組織者之一和参加者。——第113頁。
- 帕尔馬公爵——見法尔奈澤，亚历山大。
- 帕拉韦，沙尔·伊波利特·德(Paravey, Charles Hippolyte de 1787—1871)——法国工程师和东方学家。——第193頁。
- 帕乔托，弗兰契斯科(Paciotto, Francesco 1521—1591)——意大利軍事工程师。——第335頁。
- 帕埃斯，霍賽·安东尼奥(Páez, José Antonio 1790—1873)——委內瑞拉將軍和政治活动家，南美西班牙殖民地独立战争的領導者之一，1814年起为投向民族解放运动的草原牧民部队指揮，1826—1830年反对玻利瓦尔，領導委內瑞拉脱离哥伦比亚独立的斗争，1831—1863年(断續地)为委內瑞拉总統。——第229、234—238、240頁。
- 帕英达汗(称号为薩腊弗腊兹汗 Sarafra-Khan)(Payinda-Khan 死于1800年)——阴谋反对阿富汗沙赫澤曼的首領。——第79頁。

- 帕迪利亚, 霍赛 (Padilla, José 1778—1828) ——哥倫比亚將軍, 南美西班牙殖民地独立战争的参加者, 1828 年以策划阴谋反对玻利瓦尔的罪名被处死刑。——第 237、239 頁。
- 帕帕契諾·丹东尼, 亚历山大罗·維多里奧 (Papacino d'Antoni, Alessandro Vittorio 1714—1786) ——撒丁軍事工程师, 写有許多炮兵学和筑城学方面的著作。——第 202 頁。
- 帕塞瓦耳-德申, 亚历山大·斐迪南 (Parseval-Deschênes, Alexandre-Ferdinand 1790—1860) ——法国海軍上将, 1854 年任波罗的海分舰队司令。——第 295 頁。
- 帕勒斯特林納 (Palestrina) ——法国警官。——第 615、619 頁。
- 帕庇尼亚努斯, 艾米利烏斯 (Papinianus, Aemilius 140 左右—212) ——著名的羅馬法学家, 奴隶占有制度的彻底保护者。——第 713、714 頁。
- 帕麦斯顿子爵, 亨利·約翰·坦普尔 (Palmerston, Henry John Temple, Viscount 1784—1865) ——英国国家活动家, 初为托利党人, 1830 年起为輝格党領袖之一, 依靠該党右派; 曾任外交大臣 (1830—1834、1835—1841 和 1846—1851), 內务大臣 (1852—1855) 和首相 (1855—1858 和 1859—1865)。——第 167、507、508、529、530、534、538、556—558、574、582、609、625、657、739、757 頁。
- 帕斯·薩拉斯, 彼得罗·德 (Paz Salas, Pedro de 十六世紀) ——关于西班牙舰队报告书的編写者。——第 168 頁。
- 帕斯凱維奇, 伊万·費多罗維奇 (Паскевич, Иван Федорович 1782—1856) ——公爵, 俄国元帅, 反对拿破侖法国战争的参加者, 1831 年夏起为鎮压 1830—1831 年波兰起义的俄軍总司令, 1832 年起为波兰王国的总督, 1849 年为参加鎮压匈牙利革命的俄軍总司令。——第 261 頁。
- 波普, 亚历山大 (Pope, Alexander 1688—1744) ——英国詩人, 启蒙运动古典主义的代表人物。——第 649、662、664、751 頁。
- 波旁王朝——法国王朝 (1589—1792、1814—1815 和 1815—1830)。——第 166、221 頁。
- 波洛克, 乔治 (Pollock, George 1786—1872) ——英国將軍, 后为元帅, 英国阿富汗战争 (1838—1842) 的参加者。——第 84、85 頁。
- 波克罕, 西吉茲蒙特·路德維希 (Borkheim, Sigismund Ludwig 1825—1885) ——德国新聞記者, 民主主义者, 1849 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 起义失敗后逃离德国; 1851 年起是倫敦商人, 同馬克思和恩格斯保持友誼关系。——第 405—409、420、421、443、754 頁。
- 波将金, 格里哥里·亚历山大罗維奇 (Потемкин, Григори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739—1791) ——公爵, 俄国国家活动家, 元帅, 在 1787—1791 年俄土战争中任总司令; 叶卡特林娜二世的寵臣。——第 112 頁。
- 波茨措-迪-博尔哥, 卡尔·奧西波維奇 (Поццо-ди-Борго, Карл Осипович 1764—1842) ——伯爵, 俄国外交家, 原系科西嘉人; 1814—1821 年是駐巴黎公使, 1821—1835 年为大使, 后为駐倫敦大使 (1835—1839)。——第 540 頁。

波利比烏斯 (Polybius 約公元前 201—120)——杰出的古希臘历史学家,通史方面第一批著作的作者之一。——第 359 頁。

波尼亚托夫斯基,約瑟夫(Poniatowski, Józef 1763—1813)——公爵,波兰政治和軍事活动家,將軍,1809—1813 年参加拿破侖法国的战争。——第 259 頁。

波尼亚托夫斯基,斯塔尼斯拉夫·奧古斯特(Poniatowski, Stanislaw August 1732—1798)——波兰国王,称斯塔尼斯拉夫二世·奧古斯特(1764—1795)。——第 119 頁。

波拿巴——見拿破侖第一。

波拿巴王朝——法国皇朝(1804—1814、1815 和 1852—1870)。——第 577、592、599 頁。

波拿巴,路易(Bonaparte, Louis 1778—1846)——拿破侖第一之弟,荷兰国王(1806—1810)。——第 595 頁。

波拿巴,路易——見拿破侖第三。

波拿巴,日罗姆(Bonaparte, Jérôme 1784—1860)——拿破侖第一之弟;威斯特伐利亚国王(1807—1813),1850 年起为元帅。——第 570 頁。

波拿巴,律西安(Bonaparte, Lucien 1775—1840)——拿破侖第一之弟,1799 年霧月十八日(11 月 9 日)政变的組織者之一;曾任駐西班牙公使(1800—1802)。——第 162 頁。

波拿巴,約瑟夫(Bonaparte, Joseph 1768—1844)——拿破侖第一之長兄,那不勒斯国王(1806—1808)和西班牙国王(1808—1813)。——第 158 頁。

波拿巴,約瑟夫·沙尔·保尔,拿破侖亲王(Bonaparte, Joseph-Charles-Paul,

Prinz Napoleon 1822—1891)——日罗姆·波拿巴之子,拿破侖第三的堂弟,在其長兄死后(1847)改名日罗姆,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議會和立法議會會議員,1854 年为克里木法軍師長,在 1859 年奧意法战争中为軍長;綽号普隆-普隆和紅色亲王。——第 56、419、429、440、442、507、514、544、570、576、592—595、598、599、603、604、612、613、619、620、631、635、673、674、740 頁。

罗素,約翰(Russel, John 1792—1878)——英国国家活动家,輝格党領袖,曾任首相(1846—1852 和 1865—1866),外交大臣(1852—1853 和 1859—1865)。——第 579、600、602 頁。

罗昂,阿尔勃莱希特(Roon, Albrecht 1803—1879)——普魯士国家活动家和軍事活动家,1873 年起为元帅,普魯士軍閥代表人物之一,曾任陸軍大臣(1859—1873)和海軍大臣(1861—1871),曾改編普魯士軍隊。——第 667 頁。

罗泰克,卡尔(Rotteck, Karl 1775—1840)——德国資產階級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自由主义者。——第 648 頁。

罗倫茲,約瑟夫(Lorenz, Joseph 1814—1879)——奥地利軍官和軍事发明家。——第 380 頁。

罗宾斯,本杰明(Robins, Benjamin 1707—1751)——英国数学家和軍事工程师,写有許多数学和炮兵学方面的著作。——第 202 頁。

罗西奥,璜·赫尔曼(Roscio, Juan Germán 1769—1821)——委內瑞拉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南美西班牙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参加者,曾任委內瑞拉副總統(1819—1820),后为大哥倫比亞副

- 總統(1820—1821)。——第234—236頁。
- 罗日埃,沙尔·拉图尔(Rogier, Charles-Latour 1800—1885)——比利时资产阶级国家活动家,温和的自由主义者;1847—1852年任内政大臣。——第680頁。
- 罗塞蒂,多美尼科(Rossetti, Domenico 十七世紀)——意大利军事工程师,写有筑城学方面的著作。——第335頁。
- 罗陀斯的麦姆农(Memnon Rhodus 死于公元前333年)——波斯国王大流士三世的希腊雇佣军队的首領。——第9頁。
- 罗陀斯的阿波洛尼烏斯(Apollonius Rhodus 公元前三世紀)——古希腊詩人和語法学家,长詩“亚尔古船英雄的远航”的作者。——第605頁。
- 罗曼納侯爵,彼得罗·卡罗-伊-苏雷达(Romana, Pedro Caro y Surede, marques de la 1761—1811)——西班牙將軍,1807—1808年为北海和波罗的海沿岸的西班牙軍軍长,反对拿破侖統治的解放战争(1808—1814)的参加者。——第160頁。
- 罗德里格斯-托里塞斯,曼努埃尔(Rodrigues Torices, Manuel 1788—1815)——哥伦比亚政治活动家,南美西班牙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参加者;1812—1814年任卡塔黑納總統,后为新格拉納达(哥伦比亚)領导人之一。——第227頁。
- 罗伊特,麦克斯(Reuter, Max)——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初是在倫敦的普魯士警探。——第729頁。
- 罗伊斯-普劳恩,亨利希(Reuß-Plauen, Heinrich 1751—1825)——公爵,奧地利將軍,反对法兰西共和国和拿破侖法国战争的参加者。——第69頁。
- 罗森堡-奥尔西尼,弗兰茨·謝拉弗(Rosenberg-Orsini, Franz Seraph 1761—1832)——公爵,奧地利將軍,反对法兰西共和国和拿破侖法国战争的参加者。——第69頁。
- 罗森勃魯姆,爱德华(Rosenblum, Eduard)——德国大学生,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起义失败后逃离德国。——第406—409、431頁。
- 拉·馬尔,霍賽(La Mar, José 1778—1830)——秘魯將軍和政治活动家,南美西班牙殖民地独立战争的参加者,玻利瓦尔的反对者,秘魯總統(1827—1829)。——第172、239頁。
- 拉·格隆尼埃尔,路易·埃蒂耶納·阿尔图尔·杜布罗伊-埃尔昂(La Guéronnière, Louis-Étienne-Arthur Dubreuil-Héliou 1816—1875)——法国政論家和政治活动家,五十年代为波拿巴主义者。——第504、532、591、614—617、619頁。
- 拉比,比埃尔(Lapie, Pierre 1779—1850)——法国軍事工程师和地形測繪师。——第162頁。
- 拉沃,弗兰茨(Raveaux, Franz 1810—1851)——德国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議會科倫議員,屬于中間派左翼;駐瑞士的帝国專員,1849年6月是帝国五摄政之一;巴登临时政府委員,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失败后逃离德国。——第668頁。
- 拉菲特,雅克(Laffitte, Jacques 1767—1844)——法国大銀行家,政治活动家,

- 奥尔良党人，金融資產階級代表。——第 167 頁。
- 拉科西，費倫茨（弗蘭茨）（Rákóczi, Ferencz (Franz) 1676—1735）——十八世紀初匈牙利反對哈布斯堡王朝統治的民族解放運動的領導人。——第 635 頁。
- 拉薩爾，斐迪南（Lassalle, Ferdinand 1825—1864）——德國小資產階級政論家，律師，1848—1849 年曾參加萊茵省的民主運動；六十年代初參加工人運動，是全德工人聯合會（1863）創建人之一；支持在反革命普魯士的霸權下“自上”統一德國的政策，在德國工人運動中創立了機會主義的派別。——第 663、731 頁。
- 拉馬丁，阿爾丰斯（Lamartine, Alphonse 1790—1869）——法國詩人，歷史學家和政治活動家，四十年代為資產階級共和黨人；1848 年任外交部長，是臨時政府實際上的首腦。——第 614 頁。
- 拉圖爾-莫布爾，瑪麗·維克多·尼古拉（Latour-Maubourg, Marie-Victor-Nicolas 1768—1850）——法國將軍，後為軍事活動家，拿破侖法國歷次戰爭的參加者。——第 261 頁。
- 拉羅什-艾蒙伯爵，安都昂·沙爾·埃蒂耶納·保爾（La Roche-Aymon, Antoine-Charles-Étienne-Paul, comte de 1772—1849）——法國將軍和軍事著作家，寫有許多騎兵方面的著作。——第 314 頁。
- 拉尼克爾（Ranickel）——德國手工業者，職業是裝訂工，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德國 1848—1849 年革命的參加者，革命失敗後流亡瑞士。——第 417—419、423、424、436、461—463、509、511、512、599、612、613、665、720 頁。
- 拉登多夫（Ladendorf）——德國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哲學家，1854 年曾被誣控犯有進行陰謀活動的罪行而被判五年徒刑。——第 449、451、734 頁。
- 拉美西斯二世（Ramses II）（希臘人的傳統叫法為塞索斯特里斯 Sesostris）——埃及法老（公元前 1317—1251）和統帥。——第 5 頁。
- 拉多維茨，約瑟夫（Radowitz, Joseph 1797—1853）——普魯士將軍和國家活動家，宮廷權奸的代表人物，1848—1849 年是法蘭克福國民議會右派領袖之一。——第 666—668 頁。
- 拉品斯基，泰奧菲爾（Lapinski, Theophile 1827—1886）——波蘭上校，匈牙利 1848—1849 年革命的參加者，後改名帖泰菲克-貝伊到土耳其軍隊中服役，在切爾克西亞同俄國作戰（1857—1858）。——第 544、623、624、629、635—637 頁。
- 拉也夫斯基，尼古拉·尼古拉也維奇（Раевский, 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 1771—1829）——俄國將軍，反對拿破侖法國戰爭的參加者。——第 258—262 頁。
- 拉摩里西爾，克利斯托夫·路易·萊昂（Lamoricière, Christophe-Louis-Léon 1806—1865）——法國將軍和政治活動家，溫和的資產階級共和黨人；三十至四十年代曾參加侵占阿爾及利亞，1848 年積極參加鎮壓六月起義，後為卡芬雅克政府的陸軍部長（6—12 月），對路易·波拿巴政府採取反對立場，1851 年十二月二日政變後被驅逐出境。——第 223 頁。
- 拉格爾比埃爾克，古斯達夫（Lagerbjel-

- ke, Gustav 1777—1837)——伯爵,瑞典外交家,1810—1813年任駐巴黎臨時全權代表。——第162頁。
- 拉斯·卡薩斯,曼努埃爾·馬利阿(Las Casas, Manuel Maria)——委內瑞拉軍官,1812年為拉瓜拉衛戍司令,玻利瓦爾的擁護者。——第226頁。
- 拉斯拜爾,弗朗斯瓦(Raspail, François 1794—1878)——卓越的法國學者,自然科學家,政論家,社會主義者,靠近革命無產階級;曾參加1830年和1848年革命,制憲議會議員。——第453頁。
- 拉賈,璜·哈辛托(Lara, Juan Jacinto 1778—1859)——委內瑞拉將軍,南美西班牙殖民地獨立戰爭的參加者。——第172頁。
- 拉賈比,瑪麗·德尼(Larabit, Marie-Denis 1792—1876)——法國政治活動家,七月王朝時期是眾議院議員,屬於自由主義反對派;後為波拿巴主義者。——第221頁。
- 拉德茨基,約瑟夫(Radetzky, Joseph 1766—1858)——伯爵,奧地利元帥,1831年起為意大利北部奧軍指揮官,1848—1849年殘酷地鎮壓了意大利的革命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1850—1857年2月為倫巴第一威尼士王國的總督。——第530頁。
- 拉德馬赫爾,約翰·哥特弗利德(Rademacher, Johann Gottfried 1772—1849)——德國醫生,以與眾不同的疾病治療分類法而聞名。——第410頁。
- 拉斐爾·桑蒂(Raffaello Santi 1483—1520)——文藝復興時期偉大的意大利畫家。——第285頁。
- 拉斐德,瑪麗·約瑟夫·保爾(Lafayette, Marie-Joseph-Paul 1757—1834)——法國將軍,十八世紀末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和1830年資產階級七月革命時期大資產階級的領袖之一。——第95、140、480頁。
- 阿貝爾,卡爾(Abel, Karl 生于1837年)——德國語文學家和新聞工作者,“每日電訊”的柏林通訊員。——第660—664頁。
- 阿利安,弗拉維(Arrianus, Flavius 約95—180)——希臘作家,歷史學家和地理學家,寫有許多古代史著作。——第152頁。
- 阿倫特,恩斯特·摩里茨(Arndt, Ernst Moritz 1769—1860)——德國作家,歷史學家和語文學家;德國人民反對拿破侖統治的解放鬥爭的參加者;仍未擺脫民族主義的束縛;1848—1849年為法蘭克福國民議會議員,屬於中間派右翼。——第527頁。
- 阿塞爾曼,費倫茨(Assermann, Ferencz 1821—1893)——匈牙利軍官,匈牙利1848—1849年革命的參加者。——第635—637頁。
- 阿罕默德-沙赫·杜蘭尼(Ahmed Shah Durrani 1724—1773)——阿富汗沙赫(1747—1773),阿富汗國家的創建者。——第77、79頁。
- 阿加西斯,路易·讓·魯道夫(Agassiz, Louis-Jean-Rudolphe 1807—1873)——瑞士自然科學家,在他的自然科學見解中含有極端反動的观点,達爾文主義的敵人。——第424頁。
- 阿革西拉烏斯二世(Agesilaus II 約公元前442—358)——斯巴達國王(約公元前399—358)和統帥。——第14頁。
- 阿姆斯特朗,威廉·喬治(Armstrong, William George 1810—1900)——英

- 国发明家和厂主,以发明特种綫膛炮而聞名。——第 154 頁。
- 阿盖尔伯爵,阿契波德·坎伯尔(Argyll, Archibald Campbell, Earl 1629—1685)——苏格兰貴族,1685年5—6月领导反对詹姆士二世的暴动;暴动失败后被处死。——第 458 頁。
- 阿里斯門迪,璜·巴蒂斯塔(Arismendi, Juan Baptista 生于 1770 年)——委內瑞拉將軍和政治活动家,南美西班牙殖民地独立战争的参加者,1819 年为哥伦比亚副总统。——第 229—233、235 頁。
- 阿伯克朗比,拉尔夫(Abercromby, Ralph 1734—1801)——英国將軍,1795—1797 年为远征西印度法国人的英軍指揮官。——第 296 頁。
- 阿布,艾德門(About, Edmand 1828—1885)——法国新聞工作者,波拿巴主义者。——第 509、561、587、591、613、619、620、688、750、753 頁。
- 阿布特(Abt)——德国新聞工作者,小資产階級民主主义者,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初侨居日內瓦,因造謠中伤被开除出日內瓦德意志工人协会。——第 416、417、420、422、423、426 頁。
- 阿布德-艾尔-喀德(Abd el Kader 1808—1883)——1832—1847 年阿尔及利亚人民反对法国侵略者的民族解放斗争的領袖;1847 年被法国人所俘,1852 年得到拿破侖第三的許可移居土耳其。——第 101、108、222、223 頁。
- 阿布德-艾尔-穆敏(Abd el Mumen 1094—1163)——非洲西北部和西班牙南部阿里莫哈德王朝伊斯兰教国家第一个哈利发(1130—1163)。——第 194 頁。
- 阿布德-艾尔-拉赫曼(Abd el Rahman 1778—1859)——摩洛哥苏丹(1822—1859)。——第 223 頁。
- 阿尔宁,哈利(亨利希)(Arnim, Harry (Heinrich) 1824—1881)——伯爵,德国外交官,俾斯麦的反对者,1874 年因攫取外交文件被判罪。——第 729 頁。
- 阿尔宁-博伊岑堡,阿道夫·亨利希(Arnim-Boytzenburg, Adolf Heinrich 1803—1868)——伯爵,普魯士国家活动家,反动的普魯士容克的代表人物,曾任內务大臣(1842—1845)和首相(1848年3月19—29日);1848 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議會議員,1849 年为第二議院的右派領袖之一。——第 668 頁。
- 阿尔巴,費南多·阿瓦勒斯(Alba, Fernando Alvarez 1507—1582)——公爵,西班牙統帥和国家活动家,1567—1573 年为尼德兰总督。——第 32、336 頁。
- 阿尔伯茨(Alberts)——十九世紀五十年代是普魯士駐倫敦大使館秘书。——第 727 頁。
- 阿尔吉西·达·卡皮,加拉索(Alghisi da Carpi, Galasso 1523 左右—1573)——意大利建筑师。——第 335 頁。
- 阿尔貝罗尼,朱利奧(Alberoni, Giulio 1664—1752)——西班牙国家活动家,紅衣主教;1717—1719 年任国王菲力浦五世的首相。——第 634 頁。
- 阿尔坦赫弗尔,奧古斯特·約瑟夫(Altenhöfer, August Joseph 1804—1876)——德国新聞工作者,奧格斯堡“总汇报”的編輯之一。——第 502 頁。

九 画

保罗一世(Павел I 1754—1801)——俄

- 国皇帝(1796—1801)。——第 113 頁。
品得,彼得——見沃尔柯特,約翰。
- 洪堡,亚历山大(Humboldt, Alexander 1769—1859)——偉大的德国学者,自然科学家和旅行家。——第 419、567、579、587、660 頁。
- 荣克,格奥尔格(Jung, Georg 1814—1886)——德国政論家,青年黑格尔分子,“新萊茵报”发行負責人之一;小資产階級民主主义者;1848 年为普魯士国民議會議員,屬于左翼。——第 671 頁。
- 侯賽因(Husseïn 1773 左右—1838)——阿尔及尔德依(1818—1830)。——第 103 頁。
- 若特兰,律西安·列奥波特(Jottrand, Lucien Leopold 1804—1877)——比利时法学家和政論家,四十年代是小資产階級民主主义者;布魯塞尔民主协会主席。——第 680、747 頁。
- 律斯勒,古斯塔夫·阿道夫(Roesler, Gustav Adolf 1818—1855)——德国教师和新聞工作者,1848—1849 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議會左派議員,1850 年起侨居美洲。——第 486 頁。
- 耶拉契奇,約西普(Јелачић, Josip 1801—1859)——伯爵,奥地利將軍,克罗地亚、达尔馬威亚和斯拉窩尼亚总督(1848—1859),曾积极参加鎮压匈牙利和奥地利 1848—1849 年革命。——第 64、467 頁。
- 胡尔塔多·德·孟多薩(Hurtado de Mendoza)——委內瑞拉政治活动家,南美西班牙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参加者,玻利瓦尔的拥护者。——第 228 頁。
- 美耳德尔,赫拉尔德(Melder, Gerard 十七世紀)——尼德兰軍事工程师,写有筑城学方面的著作。——第 339 頁。
- 玻利瓦尔-伊-龐特,西蒙(Bolívar y Ponte, Simon 1783—1830)——杰出的南美政治活动家,南美西班牙殖民地独立战争的主要领导者之一,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統(1819—1830)。——第 225—241、629、753 頁。
- 南苏蒂伯爵,埃蒂耶納·瑪麗·安都昂·尚比昂(Nansouty, Étienne-Marie-Antoine Champion, comte de 1768—1815)——法国將軍,拿破侖法国历次战争的参加者。——第 261 頁。
- 英格兰,理查(England, Richard 1793—1883)——英国將軍,1854—1855 年任克里木英軍师长。——第 56、59 頁。
- 英格利斯,威廉(Inglis, William 1764—1835)——英国將軍,1809—1814 年参加比利牛斯半島战争。——第 267 頁。
- 济格尔,弗兰茨(Sigel, Franz 1824—1902)——巴登軍官,小資产階級民主主义者,1848—1849 年巴登革命运动的参加者,1849 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时为巴登革命軍总司令,后为副总司令;后来流亡瑞士和英国;1852 年迁居美国,内战参加者,站在北部方面;阿尔伯特·济格尔之兄。——第 484、485 頁。
- 济格尔,阿尔伯特(Sigel, Albert 1827—1884)——巴登軍官,新聞工作者,小資产階級民主主义者;1848—1849 年巴登革命运动的参加者;1853 年侨居美国,内战参加者,站在北部方面。——第 484、485 頁。
- 拜倫(Byron)——勋爵,为 1588 年同西班牙舰队作战的英国海軍部队司令。

- 第 170 頁。
- 拜倫, 乔治 (Byron, George 1788—1824)
——杰出的英国詩人, 革命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第 463、656 頁。
- 契尔奈尔, 賽米尔·埃尔德曼 (Tzschirner, Samuel Erdmann 1812 左右—1870) ——德国律師, 小資產階級民主主义者, 1848—1849 年革命时期为薩克森議會中极左派領袖, 德勒斯頓 1849 年五月起义的領導者之一, 1849 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 革命失敗后流亡瑞士, “革命集中”中央委員會委員; 后来迁居英国。——第 482 頁。
- 契查哥夫, 巴維尔·瓦西里也維奇 (Чичагов, Павел Васильевич 1767—1849) ——俄国海軍上将和国家活动家, 海軍大臣 (1807—1811), 1812 年任莫尔达維亞 (多瑙河) 軍团和黑海舰队总司令, 同年 11 月指揮軍队进驻拿破侖第一潰退的軍队后方。——第 93、164 頁。
- 柏里——見塞西耳, 威廉。
- 柏西阿斯 (奧魯斯·柏西阿斯·弗拉克斯) (Aulus Persius Flaccus 34—62)
——羅馬諷刺詩人。——第 621、656、658 頁。
- 欧仁亲王——見博阿尔奈, 欧仁。
- 欧文, 罗伯特 (Owen, Robert 1771—1858) ——偉大的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第 475 頁。
- 欧勒, 列奧納特 (Euler, Leonard 1707—1783) ——偉大的数学家、机械专家和物理学家, 瑞士人, 曾在彼得堡科学院 (1727—1741 和 1766—1783) 和柏林科学院 (1741—1766) 工作。——第 202 頁。
- 勃朗, 路易 (Blanc, Louis 1811—1882)
——法国小資產階級社会主义者, 历史学家, 1848 年临时政府成員和卢森堡委員會主席; 采取同資產階級妥协的立場, 1848 年 8 月流亡英国, 是在倫敦的小資產階級流亡者領導人之一。——第 453、681 頁。
- 勃魯姆, 罗伯特 (Blum, Robert 1807—1848) ——德国小資產階級民主主义者, 职业是新聞記者; 領導法蘭克福國民議會中的左派; 1848 年 10 月参加維也納保卫战, 在反革命軍占領維也納后被枪杀。——第 116—118、418、456、458、459、597、655、656 頁。
- 勃兰登堡, 弗里德里希·威廉 (Brandenburg, Friedrich Wilhelm 1792—1850) ——伯爵, 普魯士將軍和国家活动家, 反革命內閣的首腦 (1848 年 11 月—1850 年 11 月)。——第 670 頁。
- 迪茨, 奧斯渥特 (Dietz, Oswald 1824 左右—1864) ——德国維斯巴登的建築家,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曾流亡倫敦,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員會委員, 1850 年同盟分裂后屬於維利希—沙佩尔冒險主义宗派集团, 是該集团中央委員會委員; 后来是美国內战的参加者。——第 728 頁。
- 迪策尔, 古斯塔夫 (Dietzel, Gustav 1827—1864) ——德国学者, 法学家。——第 618 頁。
- 迪凱特, 斯蒂文 (Decatur, Stephen 1779—1820) ——美国海軍准将, 1815 年为对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的黎波里作战的分舰队司令。——第 103 頁。
- 迪芬巴赫, 恩斯特 (Dieffenbach, Ernst 1811—1855) ——德国自然科学家, 吉森的地质学教授 (1850)。——第 620 頁。

- 迪斯累里,本杰明,1871年起为贝肯斯菲尔德伯爵(Disraeli, Benjamin, Earl of Beaconsfield 1804—1881)——英国国家活动家和作家,托利党领袖之一,十九世纪下半叶为保守党领袖;曾任财政大臣(1852、1858—1859和1866—1868),首相(1868和1874—1880)。——第659頁。
- 洛美尔,格奥尔格(Lommel,Georg)——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年4月巴登起义的参加者,后流亡瑞士。——第452、455、456頁。
- 洛里斯頓,雅克·亚历山大·贝尔纳·罗(Lauriston, Jacques-Alexandre-Bernard Law 1768—1828)——法国将军,后为元帅和国家活动家,拿破仑法国历次战争的参加者。——第93頁。
- 洛旺达耳,烏尔里克·弗雷德里克·瓦德马尔·德(Lowendal, Ulric-Frédéric-Woldemar de 1700—1755)——法国将军,1747年起为元帅,原系丹麦人,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任法军司令。——第282頁。
- 洛林的昂利第二,吉兹公爵(Henri II Lorraine, duc de Guise 1614—1664)——弗伦特党活动家之一。——第413頁。
- 洛伊希頓堡公爵,马克西米利安·欧仁·约瑟夫·拿破仑(Leuchtenberg, Maximilien-Eugène-Joseph-Napoléon, duc de 1817—1852)——欧仁·博阿尔奈的儿子,1839年与尼古拉一世的女儿結婚。——第539、540頁。
- 約翰(Johann)——德国工程师,十六世纪中叶构筑了幽里希要塞。——第336頁。
- 約翰(Johann 1782—1859)——奥地利大公,元帅,反对拿破仑法国战争的参加者,1809年为奥地利军队指挥官之一,1848年6月至1849年12月是德意志帝国摄政王。——第65、70、440、496—498、669頁。
- 約克,汉斯·大卫·路德維希(Yorck, Hans David Ludwig 1759—1830)——普鲁士将军,1821年起是元帅,反对拿破仑法国战争的参加者。——第177、182—186頁。
- 約克公爵,弗雷德里克·奥古斯特(York, Frederick August, Duke of 1763—1827)——英王乔治三世次子,1795年起为元帅,曾任英军总司令(1798—1809、1811—1827);在他指挥下的军队在十八世纪末的历次对法战争中屡遭败北。——第141頁。
- 約瑟夫二世(Joseph II 1741—1790)——瑪丽-泰莉莎女皇的共同执政者(1765—1780),所谓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1780—1790)。——第545、546頁。
- 約瑟夫·弗拉維(Joseph Flavius 約37—95)——犹太历史学家和军事长官,写有许多关于古犹太和古罗马历史的著作。——第276、279頁。
- 威廉一世(Wilhelm I 1797—1888)——普鲁士亲王,摄政王(1858—1861),普鲁士国王(1861—1888);德国皇帝(1871—1888)。——第181、568、596、652、737、753頁。
- 威廉第二(Wilhelm II 1777—1847)——黑森-加塞尔选帝侯(1821—1847);1813—1814年参加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第182頁。
- 威金逊(Wilkinson)——英国军械工厂主和发明家。——第380頁。
- 威金逊,約翰·加德納(Wilkinson, John

- Gardner 1797—1875) ——英国旅行家, 古埃及学家, 写有許多关于埃及的著作。——第 6 頁。
- 威尔逊, 約翰 (Wilson, John 1780—1856) ——英国軍官, 后为將軍, 比利牛斯半島战争 (1808—1814) 的参加者。——第 268 頁。
- 威尔逊, 詹姆斯 (Wilson, James 1805—1860) ——英国资产階級經濟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自由貿易論者, “經濟学家”杂志的創办人和編輯; 1853—1858 年任财政部秘书长, 1859—1860 年为印度财务大臣。——第 558 頁。
- 威尔逊, 霍拉斯·海伊曼 (Wilson, Horace Hayman 1786—1860) ——英国东方学家, 曾研究过医学和化学, 写有許多关于梵文和梵文文学的著作。——第 194 頁。
- 威尔斯里, 理查·科利 (Wellesley, Richard Colley 1760—1842) ——侯爵, 英国国家活动家, 曾任印度总督 (1798—1805), 駐西班牙大使 (1809), 外交大臣 (1809—1812), 爱尔兰总督 (1821—1828, 1833—1834), 曾殘酷地鎮压了爱尔兰的民族解放运动。——第 225 頁。
- 威灵頓公爵, 阿瑟·威尔斯里 (Wellington, Arthur Wellesley, Duke of 1769—1852) ——英国統帥和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人; 1808—1814 和 1815 年在反对拿破侖法国的战争中任統帥; 曾任軍械总长 (1818—1827), 英軍总司令 (1827—1828, 1842—1852), 首相 (1828—1830), 外交大臣 (1834—1835)。——第 191, 264, 268, 297, 325, 352 頁。
- 威斯特华倫, 斐迪南·馮 (Westphalen, Ferdinand von 1799—1876) ——普魯士国家活动家, 曾任內务大臣 (1850—1858), 反动派; 馬克思夫人燕妮·馬克思的異母兄。——第 457 頁。
- 查理大帝 (Charlemagne 742 左右—814) ——法兰克国王 (768—800) 和皇帝 (800—814)。——第 548 頁。
- 查理二世 (Charles II 1630—1685) ——英国国王 (1660—1685)。——第 283 頁。
- 查理五世 (Charles V 1500—1558) ——西班牙国王, 称查理一世 (1516—1556) 和所謂神圣羅馬帝国的皇帝 (1519—1556)。——第 102, 197, 336 頁。
- 查理七世 (Charles VII 1403—1461) ——法国国王 (1422—1461)。——第 29, 196 頁。
- 查理八世 (Charles VIII 1470—1498) ——法国国王 (1483—1498)。——第 30, 196, 197 頁。
- 查理十世 (Charles X 1757—1836) ——法国国王 (1824—1830); 被 1830 年的七月革命赶下王位。——第 104, 541 頁。
- 查理十世·古斯塔夫 (Charles X Gustav 1622—1660) ——瑞典国王 (1654—1660)。——第 92 頁。
- 查理十二 (Charles XII 1682—1718) ——瑞典国王 (1697—1718)。——第 35, 309 頁。
- 查理十三 (Charles XIII 1748—1818) ——瑞典国王 (1809 年起), 后为瑞典和挪威国王 (1814—1818)。——第 162, 163, 166 頁。
- 查理·馬尔泰尔 (Charles Martell 688 左右—741) ——法兰克的宮相, 715 年起是法兰克王国的实际执政者。——第 305 頁。
- 查士丁尼一世 (Justinian I 483—565)

- 拜占庭皇帝(527—565)。——第304頁。
- 科尔恩, 阿道夫(Korn, Adolf 1822—1904)——普魯士軍官(1845年以前), 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 革命失敗后流亡瑞士, 1857年迁居阿根廷。——第406、409、431頁。
- 科尔布, 古斯塔夫·爱德华(Kolb, Gustav Eduard 1798—1865)——德国新聞工作者, 奥格斯堡的“总汇报”編輯之一。——第516、769頁。
- 科尔弗, 費多尔·卡尔洛維奇(Корф, Федор Карлович 1774—1826)——男爵, 俄国將軍, 反对拿破侖法国战争的参加者。——第260頁。
- 科尔多巴——見費南德斯·德·科尔多巴, 岡薩洛。
- 科尔多巴, 霍賽·馬利阿(Córdoba, José Maria 1799—1829)——哥倫比亚將軍, 南美西班牙殖民地独立战争的参加者。——第172頁。
- 科尔特斯, 艾尔南(費南多)(Cortes, Hernan(Fernando) 1485—1547)——西班牙殖民者, 阿西德克人(墨西哥人)国家的征服者。——第327頁。
- 科尔蒙太涅, 路易·德(Cormontaigne, Louis de 1696左右—1752)——法国將軍, 軍事工程师, 写有許多筑城学方面的著作。——第89、336—338、343—345、347、351頁。
- 科苏特, 拉約什(路德維希)(Kossuth, Lajos (Ludwig) 1802—1894)——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領袖, 在1848—1849年革命中领导資产階級民主派, 匈牙利革命政府首脑; 革命失敗后逃离匈牙利, 五十年代曾向波拿巴主义者集团求援。——第271、545、546、564、594、623—635、737、752、753、758頁。
- 科勒特, 科勒特·多布森(Collet, Collet Dobson)——英国新聞工作者和社会活动家, 烏尔卡尔特派机关报“自由新聞”編輯(1859—1865)。——第515、760頁。
- 科拉切克, 阿道夫(Kolatschek, Adolph 1821—1889)——奥地利新聞工作者和政治活动家, 1848—1849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議会議員, 属于小資产階級民主派; “德国月刊”(1850—1851)和“时代呼声”(1858—1862)两杂志的出版者。——第488、489、519、751頁。
- 科耳亚多, 路易斯(Collado, Luis 十六世紀)——西班牙軍事工程师。——第197頁。
- 科洛夫拉特-克拉科夫斯基, 約翰·涅波穆克·卡尔(Kolowrat-Krakowsky, Johann Nepomuk Karl 1748—1816)——伯爵, 奥地利將軍, 1809年起是元帅, 反对法兰西共和国和拿破侖法国战争的参加者。——第65頁。
- 哈丁, 亨利(Hardinge, Henry 1785—1856)——子爵, 英国軍官, 后为元帅和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人, 比利牛斯半島战争(1808—1814)的参加者。——第53、297頁。
- 哈根, 卡尔(Hagen, Karl 1810—1868)——德国历史学家, 政治活动家, 1848—1849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議会議員, 属于极左派; 1855年起在伯尔尼任教授。——第489、497頁。
- 哈尼, 乔治·朱利安(Harney, George Julian 1817—1897)——著名的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宪章派左翼領袖之一; “北极星报”和許多其他宪章派报刊的編輯, 同馬克思和恩格斯有来往。——

- 第 471 頁。
- 哈澤德 (Hased) —— 十三世紀初的印度詩人。—— 第 194 頁。
- 哈瓦斯, 奧古斯特 (Havas, Auguste 1814—1889) —— 法國通訊社所有人之一。—— 第 695 頁。
- 哈菲茲, 沙姆謝丁·穆罕默德 (Hafiz, Schems-ed-Din-Mohammed 約 1300—1389) —— 波斯大詩人, 原籍是塔吉克, 塔吉克文學的古典作家。—— 第 423 頁。
- 哈里斯, 愛德華·阿爾弗勒德·約翰 (Harris, Edward Alfred John 1808—1888) —— 英國軍官和外交官, 駐伯爾尼代辦 (1858—1867)。—— 第 579、581、584、598—602 頁。
- 哈斯德魯拔 (Hasdrubal) —— 迦太基統帥, 第二次布匿戰爭 (公元前 218—201) 的參加者。—— 第 303、304 頁。
- 哈米爾卡爾·巴爾卡 (Hamilkar Barkas 約公元前 270—228) —— 迦太基統帥和國家活動家, 公元前 247—241 年在西西里島領導反羅馬人的鬥爭, 公元前 237—約 228 年為侵略西班牙的遠征軍指揮官; 漢尼拔之父。—— 第 301、302 頁。
- 哈茨費爾特, 馬克西米利安 (Hatzfeldt, Maximilien 1813—1859) —— 伯爵, 普魯士外交家, 1849 年起任駐巴黎公使, 1856 年巴黎和會的參加者。—— 第 438、729 頁。
- 哈布里 (Chabrias 約死於公元前 357 年) —— 雅典統帥。—— 第 14 頁。
- 哈布斯堡王朝 —— 自 1273 年起至 1806 年 (斷續地) 所謂神聖羅馬帝國皇朝、西班牙王朝 (1516—1700)、奧地利皇朝 (1804 年起) 和奧匈帝國皇朝 (1867—1918)。—— 第 544—546、669、691 頁。
- 哈克蘭德爾, 弗里德里希·威廉 (Hackländer, Friedrich Wilhelm 1816—1877) —— 德國作家。—— 第 587 頁。
- 哈克斯特豪森, 奧古斯特 (Haxthausen, August 1792—1866) —— 普魯士官員和作家, 寫過一本專門描述俄國土地關係中村社制度殘余的著作, 從政治觀點來看他是一個反動的農奴主。—— 第 542 頁。
- 哈特曼, 摩里茨 (Hartmann, Moritz 1821—1872) —— 奧地利作家, 四十年代中是“真正的社會主義者”, 法蘭克福國民議會議員, 屬於極左派。—— 第 588 頁。
- 哈特曼·馮·奧艾 (Hartmann von Aue 約 1170—1210) —— 中世紀德國的抒情和敘事詩人。—— 第 588 頁。
- 哈特曼, 格奧爾格 (Hartmann, Georg 1489—1564) —— 德國機械專家和物理學家。—— 第 198 頁。
- 施特芬, 威·(Steffen, W.) —— 前普魯士軍官, 科倫共產黨人案件 (1852) 被告證人, 1853 年流亡英國, 後遷美國; 五十年代同馬克思和恩格斯很接近。—— 第 472、473 頁。
- 施梅林, 安東 (Schmerling, Anton 1805—1893) —— 奧地利國家活動家, 自由主義者; 1848 年為法蘭克福國民議會議員, 屬於中間派右翼, 1848 年任帝國內務大臣 (7—12 月), 首相兼外交大臣 (9—12 月)。—— 第 669 頁。
- 施梯伯, 威廉 (Stieber, Wilhelm 1818—1882) —— 普魯士警官, 迫害共產主義者同盟盟員的科倫案件 (1852) 的策劃者之一, 並且是這一案件的主要證人; 同維爾穆特合編“十九世紀共產主義者的陰謀”一書; 普魯士政治警察局局長

- (1850—1860)。——第 432、437—441、448、449、451、459、708、726—729、731—735、757 頁。
- 施塔爾，弗里德里希·尤利烏斯 (Stahl, Friedrich Julius 1802—1861)——德國法學家和極端反動的政治活動家，1840 年起為柏林大學教授。——第 661 頁。
- 施利克曼 (Schlickmann)——普魯士法官。——第 715、716 頁。
- 施萊尼茨，亞歷山大 (Schleinitz, Alexander 1807—1885)——伯爵，普魯士國家活動家，反動分子，曾任外交大臣 (1848 年 6 月、1849—1850、1858—1861)。——第 662 頁。
- 施坦普弗利，雅科布 (Stämpfli, Jakob 1820—1879)——瑞士資產階級國家活動家，激進主義者；瑞士聯邦主席 (1856、1859 和 1862)。——第 581、598、599、609 頁。
- 施奈德爾第二，卡爾 (Schneider II, Karl)——德國法學家，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1848 年是科倫民主協會主席和民主主義者萊茵區域委員會委員；1849 年 2 月 7 日“新萊茵報”案件中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辯護人；1849 年 2 月 8 日民主主義者萊茵區域委員會案件的被告之一；1849 年為第二議院議員，屬於極左派；科倫共產黨人案件 (1852) 的辯護人。——第 438、439、679、683 頁。
- 施瓦爾克 (Schwarck)——普魯士王國上訴法院檢察長。——第 685、686、771 頁。
- 施瓦爾岑堡，卡爾·菲力浦 (Schwarzenberg, Karl Philipp 1771—1820)——公爵，奧地利元帥和外交家，反對拿破侖法國戰爭的參加者，1813—1814 年為反法同盟聯軍總司令。——第 183、184、186—188、190 頁。
- 施韋林，馬克西米利安 (Schwerin, Maximilien 1804—1872)——伯爵，普魯士貴族和官僚的代表之一，曾任宗教、教育和衛生事務大臣 (1848 年 3—6 月)，法蘭克福國民議會議員，屬於右派；後來成為民族自由黨人。——第 651 頁。
- 施韋特，亨利希·弗里德里希 (Schwedt, Heinrich Friedrich 1709—1788)——最後一代勃蘭登堡—施韋特侯爵 (1771—1788)。——第 174 頁。
- 施拉姆，康拉德 (Schramm, Conrad 1822 左右—1858)——德國工人運動著名的參加者，共產主義者同盟盟員，1849 年起僑居倫敦，“新萊茵報。政治經濟評論”的發行負責人，1850 年共產主義者同盟分裂時支持馬克思；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戰友。——第 469—472、705 頁。
- 施拉普奈爾，亨利 (Shrapnel, Henry 1761—1842)——英國將軍和軍事發明家。——第 249 頁。
- 施略費爾，古斯塔夫·阿道夫 (Schlöffel, Gustav Adolf 1828 左右—1849)——德國大學生和新聞工作者，革命者，德國和匈牙利 1848—1849 年革命的積極參加者。——第 494 頁。
- 施略費爾，弗里德里希·威廉 (Schlöffel, Friedrich Wilhelm 1800—1870)——西里西亞的廠主，民主主義者；1848 年為法蘭克福國民議會議員，屬於左派。——第 497 頁。
- 施泰歇爾 (Stecher, G. K.)——前巴登實科中學校長，革命失敗後逃離德國；曾從事石印研究。——第 444、445、725、

726 頁。

施泰因, 尤利烏斯 (Stein, Julius 1813—1889)——西里西亞的教師, 政論家、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 1848 年為普魯士國民議會議員, 屬於左派; 1849 年為第二議院議員, 屬於極左派。——第 649—651 頁。

施泰因, 馬克西米利安 (Stein, Maximilien 1811—1860)——奧地利軍官, 匈牙利 1848—1849 年革命時任革命軍參謀長, 革命失敗後流亡土耳其, 改名費爾哈德-帕沙; 曾在切爾克西亞同俄國作戰(1857—1858)。——第 630 頁。

十 画

賓達, 羅伯特 (Benda, Robert 1816—1899)——德國政治活動家, 自由主義者, 1859 年起為眾議院議員, 1867 年為國會議員; 後來成為民族自由黨人。——第 667 頁。

倍克, 克利斯提安·丹尼爾 (Beck, Christian Daniel 1757—1832)——德國哲學家, 寫有許多古典文學和歷史著作。——第 11 頁。

紐金特——見舍爾瓦爾, 茹利安。

愛德華, 威爾士親王 (外號黑親王 the Black Prince) (Edward, Prince of Wales 1330—1376)——英國國王愛德華三世之子, 英法百年戰爭時期的統帥之一。——第 365 頁。

熱拉爾, 埃蒂耶納·莫里斯 (Gérard, Etienne-Maurice 1773—1852)——伯爵, 法國將軍, 後為元帥和政治活動家, 拿破侖法國歷次戰爭的參加者。——第 260 頁。

特羅塔 (Trotha 十九世紀)——普魯士軍官, 曾研究步兵戰術問題。——第 381

頁。

特羅格, 約翰 (Trog, Johann 1807—1867)——瑞士國家活動家, 國民院議員(1848—1857), 聯邦法院法官(1852—1856)。——第 643、718、723 頁。

夏綠蒂 (Charlotta 1796—1865)——郡主, 律西安·波拿巴的女兒。——第 162 頁。

夏恩霍斯特, 格爾哈特 (Scharnhorst, Gerhard 1755—1813)——普魯士將軍和軍事活動家; 1806 年普魯士軍隊被拿破侖打敗後任軍事改革原則制訂委員會主席; 陸軍大臣(1807—1810)和總參謀長(1807—1813); 在 1813 年反對拿破侖的解放戰爭中起了卓越的作用。——第 176、203 頁。

班迪亞, 亞諾什 (約翰) (Bangya, János (Johann) 1817—1868)——匈牙利新聞記者和軍官, 匈牙利 1848—1849 年革命的參加者; 革命失敗後成為科蘇特的國外密使, 同時也是秘密警探; 後來改名穆罕默德-貝伊到土耳其軍隊中服務, 在切爾克斯人反俄戰爭時期作為土耳其間諜在高加索活動(1855—1858)。——第 628—630 頁。

班貝爾格爾, 路德維希 (Bamberger, Ludwig 1823—1899)——德國政論家, 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 1849 年巴登—普法爾茨起義的參加者; 五十年代流亡法國, 後為自由主義者, 國會議員。——第 663、664 頁。

索菲婭 (Sophia 1805—1872)——奧地利大公妃, 弗蘭茨-約瑟夫皇帝之母, 對反動的宮廷奸黨的政策有很大影響。——第 632、656 頁。

索緒爾, 德奧多·德 (Saussure, Théodor de 1824—1903)——瑞士國家活動家,

- 作家, 艺术家, 貴族反对派的首領; 大會議議員 (1854—1856 和 1858—1872)。——第 605 頁。
- 索尔比埃, 让·巴特米 (Sorbier, Jean-Barthélemy 1762—1827) ——法国將軍, 拿破侖法国历次战争的参加者, 1810—1812 年任近卫炮兵司令。——第 262 頁。
- 桑兹 (Sands) ——英国上校, 十九世紀二十年代曾参加南美西班牙殖民地独立战争。——第 237 頁。
- 桑塔·克魯斯侯爵, 阿尔瓦罗·德·巴桑 (Santa Crus, Alvaro de Bazan, marqués de 1526—1588) ——西班牙海軍上将, 1576—1588 年任西班牙海軍指揮官。——第 169 頁。
- 桑坦德, 弗朗西斯科·德·帕烏拉 (Santander, Francisco de Paula 1792—1840) ——哥倫比亚將軍和政治活动家, 南美西班牙殖民地独立战争的参加者, 大哥倫比亚副总统 (1821—1828), 玻利瓦尔的反对者, 1828 年以策划阴谋反对玻利瓦尔的罪名而被驅逐出境; 1832—1837 年为新格拉納达 (哥倫比亚) 总统, 自由党的首領。——第 234、235、237、239 頁。
- 桑米凱利, 米凱萊 (Sanmicheli, Michele 1484—1559) ——意大利建筑师和軍事工程师, 棱堡筑城学最初代表之一。——第 332、335 頁。
- 納皮尔, 查理 (Napier, Charles 1786—1860) ——英国海軍上将, 1854 年任波罗的海舰队司令。——第 295、528 頁。
- 納皮尔, 威廉·弗兰西斯·帕特里克 (Napier, William Francis Patrick 1785—1860) ——英国將軍和軍事史学家, 比利牛斯半島战争 (1808—1814) 的参加者。——第 313 頁。
- 納迪尔-沙赫 (Nadir Shah 1688—1747) ——波斯沙赫 (1736—1747), 統帥和征服者, 1738—1739 年对印度进行了掠夺性的远征。——第 78 頁。
- 納尔塞斯 (Narses 472 左右—568) ——拜占庭統帥, 阿尔明尼亚人, 是皇帝查士丁尼实行他的在意大利恢复奴隶制这一反动政策的助手之一。——第 305 頁。
- 拿破侖亲王, 日罗姆——見波拿巴, 約瑟夫·沙尔·保尔。
- 拿破侖第一·波拿巴 (Napoleon I Bonaparte 1769—1821) ——法国皇帝 (1804—1814 和 1815)。——第 39—42、47、50、64—66、69—73、80、83、84、92—98、113—115、119、120、122、128、132、136、141—143、147、155、157—166、175—191、204—206、216、218、219、221、225、233、259、261—263、274、277、286、310—313、320、322、323、348、378—380、387、411、412、414、415、480、484、529、532、537、543、554、558、561—563、571、586、594、595、610、677、702、707、708、712 頁。
- 拿破侖第三 (路易·拿破侖·波拿巴) (Napoleon III Louis Bonaparte 1808—1873) ——拿破侖第一的侄子, 第二共和国总统 (1848—1851), 法国皇帝 (1852—1870)。——第 43、138、208、209、224、403、412—415、428、443、484、498、501、514、524、526—528、532、534—536、547、550—568、570—578、580—587、590、592—598、601、604—607、609—611、613、618、619、622、626、631—635、638、639、641、643、646、655、663、740、748—751、753、757、758 頁。

- 拿騷的摩里茨，拿騷伯爵（奧倫治親王）（Maurice of Nassau, Prince of Orange and Count of Nassau 1567—1625）——尼德蘭總督（1585—1625），軍事活動家和尼德蘭獨立戰爭時期的統帥。——第 31、32、201、307 頁。
- 茹爾丹，路易（Jourdan, Louis 1810—1881）——法國政論家，聖西門學說的擁護者，後為波拿巴主義者，1849 年起為“世紀報”編輯。——第 591、612、619 頁。
- 茹爾丹，讓·巴蒂斯特（Jourdan, Jean-Baptiste 1762—1833）——法國將軍，1804 年起為元帥；法蘭西共和國反對第一次歐洲國家同盟的戰爭的參加者。——第 157 頁。
- 茹爾尼亞克·聖梅阿爾，弗朗斯瓦·德（Jourgniac Saint-Méard, François de 1745—1827）——法國軍官和政論家，保皇黨人。——第 140 頁。
- 茹安維爾親王，奧爾良的弗朗斯瓦·斐迪南·菲力浦·路易·瑪麗（Joinville, François-Ferdinand-Philippe-Louis-Marie, duc d'Orléans, prince de 1818—1900）——路易·菲力浦之子，四十年代曾參加侵占阿爾及利亞，1848 年二月革命勝利後流亡英國。——第 108、389 頁。
- 恩斯特第三（Ernst III 1784—1844）——薩克森—科堡公爵（1806—1826）和薩克森—科堡—哥達公爵，稱恩斯特第一（1826—1844）；反對拿破侖法國戰爭的參加者。——第 182 頁。
- 恩格斯，弗里德里希（Engels, Friedrich 1820—1895）（傳記材料）。——第 408、410、464—466、469—472、475—477、483、484、491、494、505、510、653、678、705、706、758 頁。
- 恩格蘭德爾，濟格蒙德（Engländer, Sigmund 1828—1902）——奧地利記者，1848 年流亡英國，密探。——第 695 頁。
- 恩格爾加爾特，安東·叶甫斯塔菲耶維奇（Энгельгардт, Антон Евстафьевич 1795—1872）——俄國將軍，曾參加鎮壓 1830—1831 年波蘭起義和匈牙利 1848—1849 年革命。——第 134 頁。
- 席利，維克多（Schily, Victor 1810—1875）——德國民主主義者，職業是律師，1849 年巴登—普法爾茨起義的參加者，後逃離德國，第一國際會員。——第 417—425、434、436、443、461、463、489、717—724 頁。
- 席勒，弗里德里希（Schiller, Friedrich 1759—1805）——偉大的德國作家。——第 117、413、418、427、456、490、591、593、597、614、674 頁。
- 席斯，約翰·烏爾利希（Schless, Johann Ulrich 1813—1883）——瑞士資產階級政治活動家，瑞士聯邦聯邦委員會秘書長（1848—1881）。——第 581、599 頁。
- 席梅爾普芬尼希，亞歷山大（Schimmelpfennig, Alexander 1824—1865）——普魯士軍官，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1849 年巴登—普法爾茨起義的參加者，後流亡國外，追隨維利希—沙佩爾冒險主義宗派集團；美國內戰的參加者，站在北部方面。——第 460—462、469—474、478、480、484、486、487 頁。
- 泰梅，約多庫斯·多納圖斯·胡貝爾圖斯（Temme, Jodokus Donatus Hubertus 1798—1881）——德國法學家，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1848 年為普魯士

- 国民議會議員，屬於左派；1849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議會議員。——第 671 頁。
- 泰列基，拉斯洛 (Teleki, László 1811—1861) ——伯爵，匈牙利政治活动家和作家，匈牙利 1848—1849 年革命时任匈牙利共和国駐法国代表，革命失败后留在法国。——第 631 頁。
- 泰霍夫，古斯塔夫·阿道夫 (Techow, Gustav Adolf 1813—1893) ——普魯士軍官，小資產階級民主主义者，柏林 1848 年革命事变的参加者，普法尔茨革命軍总參謀长，1849 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失败后流亡瑞士，1852 年迁居澳大利亚。——第 460—463、469—472、474、476—480、653、654、677、702、705、707、712 頁。
- 泰佩尔霍夫，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 (Tempelhoff, Georg Friedrich 1737—1807) ——普魯士將軍和軍事著作家，写有数学和炮兵学方面的著作。——第 203 頁。
- 泰米斯提烏斯 (Themistius 317—約 387) ——希腊政治活动家，雄辯家和折衷主义哲学家，亞里士多德著作的評述者。——第 193 頁。
- 庫克，詹姆士 (Cook, James 1728—1779) ——著名的英国航海家，完成了三次环球航行。——第 327 頁。
- 庫扎，亚历山大魯 (Cuza, Alexander 1820—1873) ——羅馬尼亚政治活动家，1859—1866 年为多瑙河两公国莫尔达維亚和瓦拉几亚 (于 1862 年成立了統一的羅馬尼亚国家) 的君主 (执政者)，称亚历山大·約翰一世；由于反动派的阴谋，他被迫退位并流亡国外。——第 536、537、560、561、563 頁。
- 庫埃斯塔——見加尔西亚·德·拉·庫埃斯塔，格萊哥里奧。
- 庫霍尔恩 (科霍尔恩)，門諾 (Coehoorn, Menno 1641—1704) ——男爵，荷兰將軍，軍事工程师，写有許多筑城学方面的著作。——第 89、281—283、344、345 頁。
- 庫图佐夫，米哈伊尔·伊拉里昂諾維奇 (Кутузов, Михаил Илларионович 1745—1813) ——公爵，偉大的俄国統帥。——第 93、258—260、263 頁。
- 哥采 (Götze) ——普魯士法学家，十九世紀五十年代任普魯士最高法院副院长。——第 687 頁。
- 哥提埃，雅克·路易 (Gautier, Jacques-Louis) ——法国新聞工作者，保皇党人，十八世紀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是“农村和城市总汇报”編輯之一。——第 140 頁。
- 哥倫布，克里斯托弗尔 (Colombo, Cristosoro 1451—1506) ——发现美洲的杰出的航海家，为西班牙服务；热那亚人。——第 383 頁。
- 哥尔茨，卡尔·亨利希·弗里德里希 (Goltz, Karl Heinrich Friedrich 1772—1822) ——普魯士將軍和外交家，反对法兰西共和国和拿破侖法国战争的参加者，1814—1822 年任駐巴黎公使。——第 175 頁。
- 哥利岑，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維奇 (Голицын, Александр Михайлович) ——俄国外交家，十八世紀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任駐倫敦公使。——第 528 頁。
- 海涅，亨利希 (Heine, Heinrich 1797—1856) ——偉大的德国革命詩人。——第 454、499、505、584、647、699 頁。
- 海澤，亨利希 (Heise, Heinrich 死于

- 1860年)——德國民主主義者和政論家,“大胡蜂”報編輯之一(1848—1850),德國1848—1849年革命的參加者,後僑居英國。——第509頁。
- 海爾-艾德-丁·巴巴羅薩(Cheireddin Barbarossa 1467左右—1546)——土耳其海盜,阿爾及爾執政者(1518—1546)。——第101頁。
- 海瑙,尤利烏斯·雅科布(Haynau, Julius Jacob 1786—1853)——奧地利將軍,曾殘酷鎮壓1848—1849年意大利和匈牙利的革命運動,由於殘暴,得綽號“瘋狂的鬣狗”。——第286、638頁。
- 海爾曼(Hermann)——德國法學家,1859年是福格特對“總匯報”提出訴訟時的律師。——第404、410、516、517、653頁。
- 海德曼(Heidemann 十七世紀)——德國軍事工程師,在荷蘭工作。——第339頁。
- 海因岑,卡爾(Heinzen, Karl 1809—1880)——德國激進派政論家,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反對馬克思和恩格斯;曾參加1849年巴登—普法爾茨起義,後流亡瑞士,以後又遷居英國;1850年秋定居美國。——第643頁。
- 海弗納爾,列奧波特(Häfner, Leopold 生于1820年)——奧地利新聞工作者,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德國1848—1849年革命的參加者,後流亡國外。——第473、474、486、487、592頁。
- 海利奧加巴爾,或埃拉加巴爾(Heliogabalus, or Elagabalus 204—222)——羅馬皇帝(218—222),他的名字成了揮霍、獨裁和淫亂的象徵。——第429、594頁。
- 烏凡諾,迪埃哥(Ufano, Diego 十六至十七世紀初)——西班牙軍事工程師,寫有炮兵學著作。——第197頁。
- 烏洛阿,吉羅拉莫(Ulloa, Girolamo 1810—1891)——那不勒斯將軍,1848—1849年意大利民族解放和革命運動的參加者,革命失敗後流亡法國,1859年奧意法戰爭中為托斯卡納軍隊指揮官。——第419頁。
- 烏朗特,路德維希(Uhland, Ludwig 1787—1862)——德國浪漫主義詩人,1848—1849年為法蘭克福國民議會議員,屬於中間派左翼。——第495、498頁。
- 烏迪諾,尼古拉·沙爾(Oudinot, Nicolas-Charles 1767—1847)——法國將軍,1809年起為元帥,拿破侖法國歷次戰爭的參加者。——第69、184、186、188頁。
- 烏迪諾,尼古拉·沙爾·維克多(Oudinot, Nicolas-Charles-Victor 1791—1863)——法國將軍,奧爾良黨人,1849年為進犯羅馬共和國的反革命軍隊指揮官。——第552頁。
- 烏爾班,卡爾(Urban, Karl 1802—1877)——奧地利軍官,1850年起為將軍,原系羅馬尼亞人,1848年曾領導奧地利奸細挑起的特蘭西瓦尼亞羅馬尼亞人反對匈牙利政府的分立暴動;曾參加鎮壓匈牙利的1848—1849年革命。——第134頁。
- 烏爾利希(Ulrich 1487—1550)——1498年起為維爾騰堡公爵;1519年被逐;企圖利用1525年農民起義恢復自己的統治;1534年重就維爾騰堡公爵之位。——第611頁。
- 烏爾麥爾,約翰(Ulmer, Johann)——共產主義者同盟盟員,十九世紀五十年代

- 初侨居倫敦，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支持馬克思和恩格斯。——第 732 頁。
- 烏尔卡尔特，戴維(Urquart, David 1805—1877)——英国外交家，反动的政論家和政治活动家，亲土耳其分子；三十年代在土耳其执行外交任务，1847—1852 年为議會議員，曾揭露帕麦斯頓和輝格党人的对外政策。——第 506—508、514、543、546、624—628、757、758、760 頁。
- 烏尔皮安努斯，多米提烏斯(Ulpianus, Domitius 170 左右—228)——著名的羅馬法学家和国家活动家。——第 714 頁。
- 格魯希侯爵，艾曼紐尔(Grouchy, Emmanuel, marquis de 1766—1847)——法国將軍，1815 年起为元帅，拿破侖法国历次战争的参加者。——第 260 頁。
- 格拉貝，巴維尔·赫里斯托弗罗維奇(Граббе, Павел Христофорович 1787—1875)——俄国軍事和国家活动家，曾参加鎮压 1830—1831 年波兰起义和 1849 年沙皇軍队对革命匈牙利的干涉。——第 637 頁。
- 格雷哥里十六(Gregory XVI 1765—1846)——羅馬教皇(1831—1846)。——第 539 頁。
- 格隆尼希(Grunich)——德国小資产階級民主主义者；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初侨居倫敦。——第 410 頁。
- 格貝尔特，奧古斯特(Gebert, August)——梅克倫堡的細木工，在瑞士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成員，后迁居倫敦，1850 年同盟分裂后屬于維利希—沙佩尔冒險主义宗派集团，并为該集团的中央委員。——第 433 頁。
- 格爾拉赫，恩斯特·路德維希(Gerlach, Ernst Ludwig 1795—1877)——普魯士法学家，反动政治活动家，“新普魯士报”的創办人。——第 661 頁。
- 格奈澤瑙，奧古斯特·威廉·安东(Gneisenau, August Wilhelm Anton 1760—1831)——普魯士將軍和軍事政治活动家，1825 年起为元帅；在德国人民反对拿破侖統治的解放战争中起了卓越的作用，1806 年普魯士軍队被拿破侖打败后参加制訂軍事改革的原則，1813—1814 年和 1815 年是布呂歇爾軍队的參謀长。——第 176、177、186、192、542 頁。
- 格萊夫(Greif)——普魯士警官，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初是普魯士在倫敦的諜报机关領導人之一。——第 437、439、726—733 頁。
- 格萊納，路德維希(Greiner, Ludwig)——德国法学家，小資产階級民主主义者，1849 年是普法尔茨革命临时政府的成員；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后迁居美国。——第 489、490、500 頁。
- 格里蒂，安得列阿(Gritti, Andrea 1455 左右—1538)——威尼斯統帥和国家活动家，1510—1521 年在意大利战争中任总司令，1523—1538 年为威尼斯总督。——第 286 頁。
- 格里博瓦尔，让·巴蒂斯特·德(Gribeauval, Jean-Baptiste de 1715—1789)——法国將軍，1764—1789 年(断續地)任法国炮兵总监，在改編炮兵中起巨大作用。——第 41、200、204、205、207 頁。
- 格朗基奧，阿尔西德·比埃爾(Grandguillot, Alcide-Pierre 1829—1891)——法国政論家，波拿巴主义者，1859 年起是“立宪主义者报”的主編，“国家

- 報”編輯(1863—1865)。——第 578、591、749 頁。
- 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 阿道夫 (Granier de Cassagnac, Adolphe 1806—1880) ——法国新聞記者, 无原則的政客, 1848 年革命前是奥尔良党人, 后为波拿巴主义者; 立法团議員 (1852—1870), 站在极右翼立場; 曾为“立宪主义者报”撰稿。——第 414、591、619 頁。
- 埃德 (Eudes 665—735) ——阿奎丹公, 法兰克人抵御阿拉伯人入侵斗争的参加者。——第 305 頁。
- 埃拉尔, 让 (Errard, Jean 1554—1610) ——法国軍事工程师和数学家, 写有筑城学方面的著作。——第 339 頁。
- 埃利安努斯 (Ælianus 二世紀) ——希腊軍事著作家。——第 193 頁。
- 埃菲阿尔特 (Ephialtes) ——希腊人, 公元前 480 年向波斯人密告了近抄温泉关的道路, 而使斯巴达国王勒奥尼达斯率領的隘口保卫者全都战死。——第 611 頁。
- 埃梅尔曼, 卡尔 (Emmermann, Karl) ——莱茵省的林务官, 1849 年为巴登—普法尔茨革命軍步兵分队指揮; 革命失敗后流亡瑞士。——第 461、462 頁。
- 埃帕米农达斯 (Epaminondas 公元前 420 左右—362) ——杰出的古希腊統帅和国家活动家, 特維的奴隶主民主制領袖之一。——第 13、72、74、357、375 頁。
- 埃倫伯勒伯爵 (1844 年受封), 爱德华·罗 (Ellenborough, Edward Law, Earl of 1790—1871) ——英国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人, 印度总督 (1842—1844), 海軍首席大臣 (1846), 印度事务督察委员会主席 (1858)。——第 84 頁。
- 埃克斯毛思, 爱德华·佩留 (Exmouth, Edward Pellew 1757—1833) ——英国海軍上将, 1816 年为对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的黎波里作战的舰队司令。——第 103 頁。
- 埃斯帕特罗, 巴尔多梅罗 (Espartero, Baldomero 1793—1879) ——西班牙將軍和国家活动家, 进步党領袖, 西班牙摄政 (1841—1843), 政府首脑 (1854—1856)。——第 173 頁。
- 埃耳默 (Aylmer) ——英国軍官, 比利牛斯半島战争 (1808—1814) 的参加者。——第 269 頁。
- 埃耳芬斯頓, 威廉·乔治·基特 (Elphinstone, William George Keith 1782—1842) ——英国將軍, 1841 年在英国阿富汗战争 (1838—1842) 中为喀布尔英軍指揮官。——第 82、83 頁。
- 埃耳芬斯頓, 蒙特斯图亚特 (Elphinstone, Mountstuart 1779—1859) ——英国外交家和东印度公司的官員, 1808—1809 年任駐喀布尔大使, 1819—1826 年为孟买省督。——第 80 頁。
- 埃尔隆——見德魯埃·德尔隆, 让·巴蒂斯特。
- 埃尔曼尼 (Ermani) ——倫敦的出版者和书商。——第 521、745 頁。
- 埃尔比昂, 艾米尔 (Herbillon, Émile 1794—1866) ——法国將軍, 四十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 1855 年任克里木法軍师长。——第 109 頁。
- 埃尔斯納, 卡尔·弗里德里希·摩里茨 (Elsner, Karl Friedrich Moritz 1809—1894) ——西里西亚的政論家和政治活动家, 激进主义者, 1848 年是普魯士国民議會議員, 属于左派; 五十年代是“新奧得报”的編輯之一。——第

- 679 頁。
- 馬貢 (Mago 死于公元前 203 年)——迦太基統帥，第二次布匿戰爭 (公元前 218—201) 的參加者；漢尼拔的兄弟。——第 303 頁。
- 馬可·格雷克 (格拉古) (Marcus Craecus)——中世紀拜占庭煉金術者。——第 194 頁。
- 馬吉, 吉羅拉莫 (Maggi, Girolamo 1523 左右—1572)——意大利軍事工程師和著作家。——第 335 頁。
- 馬松, 奧古斯特·米歇爾·貝努瓦 (Masson, Auguste-Michel-Benoît 1800—1883)——法國作家。——第 554 頁。
- 馬志尼, 朱澤培 (Mazzini, Giuseppe 1805—1872)——意大利革命家, 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 意大利民族解放運動領袖之一；1849 年為羅馬共和國臨時政府首腦, 1850 年是倫敦歐洲民主主義者中央委員會組織者之一；在五十年代反對波拿巴法國干涉意大利人民的民族解放鬥爭。——第 550、583、584、626—628、631、643 頁。
- 馬森納, 安得列 (Masséna, André 1756—1817)——法國元帥, 法蘭西共和國和拿破侖法國歷次戰爭的參加者。——第 65、96、97、141、143、161 頁。
- 馬特維 (馬提阿什)·科爾文 (Matthias (Matyas) Corvinus 1440—1490)——匈牙利國王 (1458—1490)。——第 271 頁。
- 馬羅魯瓦, 賽米爾 (Marolois, Samuel)——法國數學家, 十七世紀上半葉在尼德蘭工作, 舊的尼德蘭築城學派的奠基人之一。——第 339 頁。
- 馬里尼約, 聖地亞哥 (Mariño, Santiago 1788—1854)——委內瑞拉將軍, 南美西班牙殖民地獨立戰爭的領導者之一, 曾一度為玻利瓦爾的反對者。——第 227—229、231、233、235 頁。
- 馬基雅弗利, 尼古洛 (Machiavelli, Niccolò 1469—1527)——意大利政治思想家, 歷史學家和作家, 資本主義關係產生時期意大利資產階級的思想家之一。——第 30、197 頁。
- 馬尼利烏斯·布魯土斯 (Manilius Brutus)——羅馬法學家。——第 714 頁。
- 馬拉特斯塔, 西吉茲蒙多·龐多爾福·迪·里米尼 (Malatesta, Sigismondo Pandolfo di Rimini 1417—1468)——意大利雇傭兵隊長。——第 197 頁。
- 馬姆茲伯里伯爵, 詹姆士·霍華德·哈里斯 (Malmesbury, James Howard Harris, Earl of 1807—1889)——英國國家活動家, 托利黨人, 十九世紀下半葉為保守黨的著名活動家；曾任外交大臣 (1852、1858—1859), 掌璽大臣 (1866—1868、1874—1876)。——第 528、579、581、582、584、598 頁。
- 馬利耶, 埃蒂耶納 (Marilley, Étienne 1804—1889)——夫賴堡主教 (1846—1879), 夫賴堡 (弗里布爾) 1848 年 10 月 24 日反民主暴亂的煽動者。——第 646 頁。
- 馬利烏斯, 凱尤斯 (Marius, Caius 公元前 156 左右—86)——羅馬統帥和國家活動家, 曾任執政官 (公元前 107、104—100、86)。——第 20、359、361、362 頁。
- 馬丁 (Martin)——法國新聞工作者, “立憲主義者報” 撰稿人, 波拿巴主義者。——第 591 頁。
- 馬丁涅斯·德·雷卡爾德, 璜 (Martinez de Recalde, Juan 死于 1588 年)——

- 西班牙海軍上將，1588年任西班牙艦隊副司令。——第169、171頁。
- 馬其頓王亞歷山大 (Alexander the Great 公元前356—323) ——古代著名的統帥和國家活動家。——第8、15—17、27、72、152、193、299—301、304、307、357、358、365、595頁。
- 馬其頓的菲力浦二世 (Philip II of Macedonra 公元前382左右—336) ——馬其頓王 (公元前359—336)。——第15、17、299頁。
- 馬茂德二世 (Mahmoud II 1785—1839) ——土耳其蘇丹 (1808—1839)。——第538頁。
- 馬茂德-沙赫 (Mahmoud Shah 死于1829年) ——阿富汗沙赫 (1800—1803和1809—1818)，後為赫拉特的統治者。——第79、80頁。
- 馬茂德·比哈爾 (Mahmoud Bihar) ——古札拉特沙赫 (1458—1511)。——第145頁。
- 馬茂德·伽色尼 (Mahmoud Ghazni 971—1030) ——版圖包括霍拉桑、錫斯坦和阿富汗的突厥人的伽色尼國家元首 (998—1030)，統帥和征服者，曾對印度進行了多次掠奪性遠征。——第77、78頁。
- 馬爾散伯爵，斐迪南 (Marsin, Ferdinand, comte de 1656—1706) ——法國元帥和外交家，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中為法軍指揮官。——第256頁。
- 馬爾基，弗蘭契斯科 (Marchi, Francesco 1504—1577) ——意大利軍事工程師，寫有築城學方面的著作。——第335頁。
- 馬爾蒙，奧古斯特·弗雷德里克·路易·德 (Marmont, August-Frédéric-Louis de 1774—1852) ——法國元帥，拿破侖法國歷次戰爭的參加者，1814年4月投靠波旁王朝，1830年七月革命時期為查理十世軍隊的指揮官。——第181、182、184—186、188、189頁。
- 馬爾科姆，約翰 (Malcolm, John 1769—1833) ——英國外交家和東印度公司的官員，曾任駐德黑蘭公使 (1799—1801、1808—1809、1810)，1826—1830年為孟買省督，寫有許多有關印度和波斯的著作。——第79頁。
- 馬爾波羅公爵，約翰·丘吉爾 (Marborough, John Churchill, Duke of 1650—1722) ——英國統帥和政治活動家，1702—1711年在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中任英軍總司令。——第256、257、282頁。
- 馬克，卡爾 (Mack, Karl 1752—1828) ——奧地利將軍，1805年在反對拿破侖法國戰爭中為奧軍指揮官。——第97頁。
- 馬克思，卡爾 (Marx, Karl 1818—1883) (傳記材料)。——第401—403、405、409—410、416、418—422、424、435—439、442—449、451、454、457、458、464—467、469—479、482、486—492、494、501—511、513—520、523、524、546、614、615、628、635、649、653、659、660、675—689、701—711、714—716、735、739、742—750、755—758、760—765、767—772頁。
- 馬克思，燕妮 (Marx, Jenny 1814—1881) (父姓為馮·威斯特華倫 geb. von Westphalen) ——卡爾·馬克思的妻子，他的忠實朋友和助手。——第457、458、680、747頁。
- 馬克西米利安一世·約瑟夫 (Maximi-

- lien I Joseph 1756—1825)——巴伐利亚选帝侯(1799年起)和国王(1806—1825),拿破侖法国战争的参加者,1813年轉向欧洲国家反法同盟方面。——第97頁。
- 馬克西米利安第二·艾曼努尔(Maximilien II Emanuel 1662—1726)——巴伐利亚选帝侯(1679—1726),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为巴伐利亚军队指揮官。——第256頁。
- 馬克西米利安,德斯特(Maximilien, d'Este 1782—1863)——奥地利大公,將軍,特种形式要塞建筑“馬克西米利安式塔楼”(即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发明者。——第347頁。

十 一 画

- 荷馬(Homerus)——半傳說中的古希臘叙事詩人,“伊利亚特”和“奧德賽”的作者。——第9、27頁。
- 梯利,約翰(Tilly, Johann 1559—1632)——伯爵,三十年战争时期的德国統帥,1610年起为天主教联盟军队指揮,1630—1632年为皇帝和天主教联盟的联軍指揮。——第34頁。
- 密勒,約翰(Miller, John)——曾参加南美西班牙殖民地独立战争的英国將軍威廉·密勒的兄弟,有偏見地編写成的威廉·密勒回忆录的出版者。——第241頁。
- 莽应龙——緬甸国王(1550—1581)。——第293頁。
- 陶森瑙,卡尔(Tausenau, Karl 1808—1873)——奥地利政治活动家,小資产階級民主派左翼的著名代表,1848年革命时期是維也納民主联合会中央委员会的首腦,1849年起侨居倫敦。——第485頁。
- 許列尔,恩斯特(Schüler, Ernst 1807—1881)——德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論家,小資产階級民主主义者;1833年起侨居瑞士,教师,1853年起出版“瑞士商业信使报”,五十至六十年代宣傳波拿巴主义思想。——第509頁。
- 莎士比亚,威廉(Shakespeare, William 1564—1616)——偉大的英国作家。——第405、410、412、416、419、426、427、429、437、439—442、449、453、455、458、472、489、507、520、544、580、595、603、609、613、620、658、666、674、690、697頁。
- 威美尔曼,恩斯特·威廉·爱德华(Zimmermann, Ernst Wilhelm Eduard)——施潘道市长,法兰克福国民議會議員,屬于左派。——第492、499頁。
- 得比伯爵,爱德华·乔治·杰弗里·史密斯·斯坦利(Derby, Edward George Geoffrey Smith Stanley, Earl of 1799—1869)——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領袖,后为保守党領袖之一;首相(1852、1858—1859和1866—1868)。——第557、579、633頁。
- 曼頓,約瑟夫(Manton, Joseph 1766左右—1835)——英国武器专家和发明家。——第61頁。
- 曼托伊費尔,奧托·泰奧多尔(Manteuffel, Otto Theodor 1805—1882)——男爵,普魯士国家活动家,貴族官僚的代表;曾任內务大臣(1848—1850),首相兼外交大臣(1850—1858)。——第649、651、672、682頁。
- 培根,罗吉尔(Bacon, Roger 1214左右—1294)——英国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科学上实验方法的拥护者;法兰西

- 斯科教派僧侶。——第 194 頁。
- 培尔西尼伯爵, 让·日尔貝尔·維克多·菲阿兰 (Persigny, Jean-Gilbert-Victor Fialin, comte de 1808—1872) ——法国国家活动家, 波拿巴主义者, 立法議會議員 (1849—1851), 1851 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組織者之一, 內务大臣 (1852—1854 和 1860—1863), 后为駐英国大使 (1855—1858, 1859—1860)。——第 576、605 頁。
- 盖昂, 理查·德博弗尔 (Guyon, Richard Debaufre 1803—1856) ——土耳其將軍, 称胡尔施德-帕沙, 原系英国人; 匈牙利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革命失敗后流亡土耳其; 1853 年为高加索土耳其軍隊指揮官。——第 624 頁。
- 盖沙特, 施泰恩——見班貝尔格尔, 路德維希。
- 基什, 米克洛什 (Kiss, Miklós 生于 1820 年) ——匈牙利軍官, 民主主义者, 流亡者, 科苏特在法国和意大利的代理人, 同波拿巴主义者集团有过联系。——第 626、631 頁。
- 基佐, 弗朗斯瓦·比埃尔·吉約姆 (Gizot, François-Pierre-Guillaume 1787—1874) ——法国資產階級历史学家和国家活动家, 1840 年至 1848 年二月革命期間实际上操纵了法国的內政和外交, 代表大金融資產階級的利益。——第 223、414、464、680 頁。
- 基謝廖夫, 巴維尔·德米特利也維奇 (Киселев, Павел Дмитриевич 1788—1872) ——伯爵, 俄国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 1829—1834 年为莫尔达維亞和瓦拉几亞省长, 1835 年起一直为有关农民問題的各个秘密委員會的委員, 1837 年起任国家产业大臣; 主張实行温和的改革。——第 537、539 頁。
- 勒宁 (Loening) ——德国出版者。——第 512、589、590 頁。
- 勒維, 約瑟夫·莫澤斯 (Levy, Joseph Moses 1812—1888) ——“每日電訊”的創辦人之——和发行人。——第 656—662、664、665、673 頁。
- 勒澤尔, 彼得·格尔哈特 (Röser, Peter Gerhard 1814—1865) ——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职业是制雪茄烟工人; 1848—1849 年为科倫工人联合会副主席;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 科倫共产党人案件 (1852) 的被告之一, 被判处六年徒刑; 后来成为拉薩尔派。——第 731 頁。
- 勒奥尼达斯 (Leonidas) ——斯巴达国王 (公元前 488 左右—480); 在希腊波斯战争期間率領斯巴达人的队伍, 在温泉关英勇地抗击波斯人。——第 611 頁。
- 勒庫尔布, 克劳德·雅克 (Lecourbe, Claude-Jacques 1759—1815) ——法国將軍, 法兰西共和国反对欧洲国家同盟的战争的参加者。——第 142 頁。
- 朗恩, 让 (Lannes, Jean 1769—1809) ——法国元帅, 拿破侖法国历次战争的参加者。——第 66、69、70、113、114、159 頁。
- 朗金, 卡西烏斯 (Longinus (Longin), Cassius 213 左右—273) ——希腊哲学家, 新柏拉图主义者。——第 511 頁。
- 朗东, 雅克·路易·塞扎尔·亚历山大 (Randon, Jacques-Louis-César-Alexandre 1795—1871) ——伯爵, 法国將軍, 1856 年起为元帅, 三十至四十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 曾任陸軍部长和陸軍大臣 (1851 和 1859—1861), 阿尔及利亚总督 (1851—1858)。——第 109 頁。

- 朗吉特·辛格 (Randschit Singh 1780—1839) ——旁遮普的执政者 (1797—1839)。——第 80 頁。
- 朗根施瓦茨, 馬克西米利安 (Langenschwarz, Maximilien 生于 1806 年左右) ——德国即兴诗人, 曾试图創立科学的即兴詩理論。——第 634 頁。
- 梅因, 爱德华 (Meyen, Eduard 1812—1870) ——德国政論家, 青年黑格尔分子;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1849 年革命失敗后流亡英国; 后成为民族自由党人。——第 484、651、652、654、730、756—759、770 頁。
- 梅桑, 尼古拉·約瑟夫 (Maison, Nicolas-Joseph 1771—1840) ——法国將軍, 后为元帅和政治活动家, 拿破侖法国历次战争的参加者。——第 176 頁。
- 梅利奈, 弗朗斯瓦 (Mellinet, François 1768—1852) ——比利时將軍, 原系法国人, 1830 年比利时资产阶级革命和比利时民主运动的积极参加者, 布鲁塞尔民主协会名誉主席。——第 680 頁。
- 梅特涅, 克雷門斯 (Metternich, Clemens 1773—1859) ——公爵, 奥地利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 反动派; 曾任外交大臣 (1809—1821) 和首相 (1821—1848), 神圣同盟的組織者之一。——第 529、544 頁。
- 梅拉斯, 米哈埃尔·弗里德里希·貝奈狄克特 (Melas, Michael Friedrich Benedikt 1729—1806) ——奥地利將軍, 1799—1800 年在意大利領土上进行的对法战争中任奧軍总司令。——第 96 頁。
- 梅耳維耳, 罗伯特 (Melville, Robert 1723—1809) ——英国將軍, 曾发明海軍火炮, 1779 年称卡倫炮。——第 385 頁。
- 莫丹 (Maudin 十七世紀) ——法国軍事工程师。——第 334 頁。
- 莫帕, 沙尔勒曼·艾米尔 (Maupas, Charlemagne-Émile 1818—1888) ——法国律师, 波拿巴主义者, 巴黎警察局长 (1851), 1851 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組織者之一, 警務大臣 (1852—1853)。——第 730 頁。
- 莫朗, 沙尔·阿列克西斯·路易·安都昂 (Morand, Charles-Alexis-Louis-Antoine 1771—1835) ——法国將軍, 拿破侖法国历次战争的参加者。——第 260 頁。
- 莫斯克腊, 华金 (Mosquera, Joaquin 1787—1877) ——哥伦比亚政治活动家, 南美西班牙殖民地独立战争的参加者, 1830 年任哥伦比亚总统。——第 240 頁。
- 莫里耳奧, 帕布洛 (Morillo, Pablo 1778—1837) ——西班牙將軍, 曾参加反对拿破侖統治的解放战争 (1808—1814), 1815—1820 年为鎮压南美西班牙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西班牙軍隊总司令。——第 230、234—236 頁。
- 莫拉勒斯, 托馬斯 (Morales, Thomas 1781—1844) ——西班牙將軍, 1813—1823 年为鎮压南美西班牙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西班牙軍隊指揮官。——第 232 頁。
- 莫尔, 約瑟夫 (Moll, Joseph 1812—1849) ——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 职业是钟表匠; 正义者同盟领导人之一,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員, 1848 年 7—9 月是科倫工人联合会的主席, 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委員; 1848 年科倫九月事件后流亡倫敦,

- 不久改名回到德国，在各地进行宣傳鼓动；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在牟尔克战役中牺牲。——第465頁。
- 莫尔尼伯爵，沙尔·奥古斯特·路易·約瑟夫 (Morny, Charles-Auguste-Louis-Joseph, comte de 1811—1865) ——法国政治活动家，波拿巴主义者，立法議會議員 (1849—1851)，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組織者之一，曾任內务部长 (1851年12月—1852年1月)，立法团議長 (1854—1856、1857—1865)。——第413、558頁。
- 莫尔蒂埃，爱德华·阿道夫·卡季米尔·約瑟夫 (Mortier, Édouard-Adolphe-Casimir-Joseph 1768—1835) ——法国元帅，拿破侖法国历次战争的参加者。——第114、184、186、188頁。
- 康姆，弗里德里希 (Kamm, Friedrich 死于1867年) ——德国手工业者，小资产階級民主主义者，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革命失敗后流亡瑞士；日內瓦德意志工人协会会员；1852年流亡美洲。——第417、418、423頁。
- 康海姆，麦克斯 (Cohnheim, Max) ——德国小资产階級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巴登革命运动参加者；革命失敗后逃离德国。——第406、409、410、431頁。
- 康格里弗，威廉 (Congreve, William 1772—1828) ——英国軍官和軍事发明家，1808年发明火箭，称为康格里弗火箭。——第132頁。
- 康太腊克，霍賽 (Canterac, José 1779左右—1835) ——西班牙將軍，1816—1824年任鎮压南美西班牙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塞尔納將軍部队的參謀长。——第172頁。
- 康罗貝尔，弗朗斯瓦·塞尔坦 (Canrobert, François-Certain 1809—1895) ——法国將軍，1856年起为元帅，波拿巴主义者；三十至四十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积极参加者之一；1854年任师长，后任克里木法軍总司令 (1854—1855)。——第56、109頁。
- 康巴塞雷斯，让·雅克·雷日伊 (Cambacérès, Jean-Jacques-Regis 1753—1824) ——法国国家活动家，法学家，国民公会主席 (1794—1795)，后任执政，拿破侖第一的亲近助手之一，“民法典”的編纂人之一。——第603頁。
- 康内吉塞尔，卡尔·路德維希 (Kannegießer, Karl Ludwig 1781—1861) ——德国詩人和翻譯家。——第459、488頁。
- 康斯坦丁，巴甫洛維奇 (Константин Павлович 1779—1831) ——俄国大公，1814年起任波兰軍总司令，实际上是波兰总督 (1814—1831)。——第132頁。
- 康斯坦丁，尼古拉也維奇 (Константин Николаевич 1827—1892) ——俄国大公，尼古拉一世的次子，海軍上将，曾領導海軍部門 (1853—1881) 和舰队 (1855—1881)。——第507、514、551、741、758、760、762頁。

十二画

琼斯，厄內斯特·查理 (Jones, Ernest Charles 1819—1869) ——杰出的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无产階級詩人和政論家，革命的宪章派領袖之一，“北极星报”編輯之一，“寄語人民”和“人民报”

- 的編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 507、681、748 頁。
- 賀雷西 (昆图斯·賀雷西·弗拉克) (Quintus Horatius Flaccus 公元前 65—8) ——杰出的羅馬詩人。——第 401、529、623、661 頁。
- 傅立叶, 沙尔 (Fourier, Charles 1772—1837) ——偉大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第 416、475、476 頁。
- 雅科比, 阿伯拉罕 (Jacobi, Abraham 生于 1832 年) ——德国医生,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 科倫共产党人案件 (1852) 的被告之一, 陪审法庭宣告无罪; 后流亡美国。——第 735 頁。
- 腊格倫男爵, 菲茨罗伊·詹姆士·亨利·索美塞特 (Raglan, Fitzroy James Henry Somerset, Baron 1788—1855) ——英国將軍, 1854 年起为元帅; 以威灵頓的參謀官身分参加反对拿破侖法国的战争 (1808—1814 和 1815), 曾任总司令办公室軍务秘书 (1827—1852), 軍械总长 (1852—1854), 克里木英軍总司令 (1854—1855)。——第 56、63 頁。
- 舒扎·沙赫 (Shudsha Shah 死于 1842 年) ——阿富汗沙赫 (1803—1809 和 1839—1841), 英国的傀儡。——第 79—83、85 頁。
- 舒尔采 (Schultze) ——普魯士法官。——第 702、710—712 頁。
- 提摩太 (Timotheos 死于公元前 354 年) ——雅典統帥和国家活动家。——第 14 頁。
- 提香·魏切利奧 (Tiziano Vecellio 1477 左右—1576) ——文艺复兴时期偉大的意大利艺术家。——第 285 頁。
- 提斯卡尔, 安东尼奥 (Tiscar, Antonio 死于 1845 年) ——西班牙海軍軍官, 1811—1815 年为鎮压南美西班牙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西班牙軍队指揮官。——第 227 頁。
- 黑森选帝侯——見威廉第二。
- 黑克尔, 弗里德里希·卡尔 (Hecker, Friedrich Karl 1811—1881) ——巴登共和主义者, 小資产階級民主主义者, 1848 年 4 月巴登起义的領導者之一, 起义失敗后流亡瑞士, 后迁居美国, 北美內战的参加者, 站在北部方面。——第 418、670 頁。
- 黑格尔, 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 (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1770—1831) ——德国古典哲学最大的代表, 客观唯心主义者, 极全面地发展了唯心主义辯证法。——第 758 頁。
- 斐迪南四世 (Ferdinand IV 1285—1312) ——加斯梯里亚和累翁的国王 (1295—1312)。——第 195 頁。
- 斐迪南七世 (Ferdinand VII 1784—1833) ——西班牙国王 (1808 和 1814—1833)。——第 173、538 頁。
- 斐迪南·馮·艾斯泰大公 (Ferdinand von Este, Erzherzog 1781—1830) ——奥地利元帅, 反对拿破侖法国战争的参加者。——第 159 頁。
- 凱撒 (凱尤斯·尤利烏斯·凱撒) (Caius Julius Caesar 公元前 100 左右—44) ——著名的羅馬統帥和国家活动家。——第 22、23、72、152、276、302、304、362 頁。
- 凱倫, 約翰·康拉德 (Kern, Johann Conrad 1808—1888) ——瑞士資产階級政治活动家、法学家和外交家; 1849 年是土尔高州政府首腦, 联邦法院院长, 1857—1883 年为駐巴黎公使。——第 434、577、600、602、643 頁。

- 凱勒曼, 弗朗斯瓦·克利斯托夫(Kellermann, François-Christophe 1735—1820) —— 法国將軍, 1804年起为元帥, 法兰西共和国反对欧洲国家同盟的战争的参加者。——第95頁。
- 富歇, 約瑟夫(Fouché, Joseph 1759—1820) —— 十八世紀末法国資產階級革命和拿破侖帝国的活动家, 革命时期是雅各宾党人, 拿破侖第一时代为警务大臣, 以毫无原則著称。——第161頁。
- 富尔, 卡尔·路德維希·奧古斯特(Phull, Karl Ludwig August 1757—1826) —— 普魯士將軍, 1806年任普軍总參謀长, 1806—1812年在俄国軍隊中服务。——第93頁。
- 富尔頓, 罗伯特(Fulton, Robert 1765—1815) —— 美国工程师和发明家, 造成了第一艘輪船。——第387頁。
- 富瓦, 加斯頓·德(Foix, Gaston de 1489—1512) —— 法国統帥, 1512年为意大利战争时期某次远征意大利时的法軍指揮官。——第286頁。
- 富瓦, 馬克西米利安·塞巴斯提安(Foy, Maximilien Sebastien 1775—1825) —— 法国將軍和政治活动家, 自由派, 比利牛斯半島战争(1808—1814)的参加者。——第264、267、268頁。
- 費格勒(Voegele, A.) —— 1859年是倫敦霍林格尔的印刷所排字工人。——第510、515—523、683、684、693、694、702、704、742—745、763頁。
- 費奈迭, 雅科布(Venedey, Jakob 1805—1871) —— 德国激进派政論家, 1848—1849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議會議員, 屬于左派; 1848—1849年革命后成为自由党人。——第454、492、499、512、666頁。
- 費特赫-阿利-沙赫(Feth-Ali-Shah 1762—1834) —— 波斯沙赫(1797—1834)。——第80頁。
- 費南德斯·德·科尔多巴, 岡薩洛(Fernández de Córdoba, Gonzalo 1453—1515) —— 西班牙統帥, 对格拉納達伊斯兰教国战争(1481—1492)的参加者。——第367頁。
- 費尔克尔(Völker 十七世紀) —— 軍事工程师, 旧的尼德兰筑城学派的奠基人之一。——第339頁。
- 費尔哈德-帕沙 —— 見施泰因, 馬克西米利安。
- 萊夫, 埃里克森(Leiv, Erikson 約 975—1020) —— 挪威航海家, 十一世紀初曾到达北美洲海岸。——第383頁。
- 萊蒂, 阿尔芒·弗朗斯瓦(Laity, Armand-François 1812—1889) —— 法国軍官和政治活动家, 路易·波拿巴策划的斯特拉斯堡叛乱的参加者(1836), 1857年起为參議員。——第429、606頁。
- 萊喀古士(Lycurgus) —— 傳說中的古斯巴达立法者。——第12頁。
- 萊納赫, 阿尔諾德(Reinach, Arnold 1820左右—1870) —— 德国小資產階級民主主义者, 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 后流亡瑞士。——第511、720、721頁。
- 萊斯特伯爵, 罗伯特·达德利(Leicester, Robert Dudley, Earl of 1532左右—1588) ——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的寵臣, 1588年为奉命保卫英国抵禦西班牙入侵的英軍司令。——第169頁。
- 萊斯托克, 安东·威廉(L'Estocq, Anton Wilhelm 1738—1815) —— 普魯士將軍, 1806—1807年参加反对拿破侖法

- 国的战争。——第 113 頁。
- 萊茵兰 德爾, 格奧爾格·弗里德里希 (Rheinländer, Georg Friedrich)——巴黎流亡者聯盟盟員, 后僑居倫敦。——第 442、638、639、641 頁。
- 斯皮爾曼 (Spearman)——英國軍官; 十九世紀初曾改編英國野戰炮兵。——第 206、208 頁。
- 斯坦伯里 (Stanbury)——倫敦一家印刷所老板。——第 730 頁。
- 斯圖亞特, 查理·威廉 (Stewart, Charles William 1778—1854)——英國將軍, 政治活動家和外交家, 1813—1814 年參加反對拿破侖法國的戰爭。——第 166 頁。
- 斯佩克爾 (斯佩克林), 丹尼爾 (Speckle (Specklin), Daniel 1536—1589)——德國軍事工程師, 棱堡築城學創始人之一。——第 335—339、341、343—345 頁。
- 斯特恩, 勞倫斯 (Sterne, Laurence 1713—1768)——著名的英國作家; 伤感主義的奠基人之一; “特里斯屈蘭·善第先生的生平和見解”一書的作者。——第 659 頁。
- 斯特倫澤, 卡爾·奧古斯特 (Struensee, Karl August 1735—1804)——普魯士數學家、經濟學家和國家活動家。——第 203 頁。
- 斯特拉斯堡的哥特弗利德 (Gottfried von Straßburg 十二世紀末至十三世紀初)——中世紀德國詩人, 騎士詩“特里斯坦和伊卓爾達”的作者。——第 553 頁。
- 菲阿蘭——見培爾西尼, 讓·日爾貝爾·維克多。
- 菲埃羅, 曼努埃爾 (Fierro, Manuel)——西班牙將軍, 在鎮壓南美西班牙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的西班牙軍隊中服務, 1813 年 7—8 月為加拉加斯總督。——第 227 頁。
- 菲沙爾特, 約翰 (Fischart, Johann 1545 左右—1590)——德國諷刺作家。——第 410、441、454、667、669 頁。
- 菲茨威廉, 威廉 (Fitzwilliam, William 1526—1599)——英國國家活動家, 愛爾蘭總督 (1572—1575 和 1588—1594)。——第 171 頁。
- 菲洛斯特拉特 (Philostratus 170 左右—245)——希臘雄辯家, 詭辯學派哲學家 and 作家。——第 193 頁。
- 菲力浦二世 (Philipp II 1527—1598)——西班牙國王 (1556—1598)。——第 168 頁。
- 菲力浦五世 (Philipp V 公元前 237 左右—179)——馬其頓王 (公元前 221—179)。——第 22 頁。
- 菲力浦遜, 格里哥里·伊萬諾維奇 (Филиппсон, Григорий Иванович 1809—1883)——俄國將軍, 曾參加征服高加索。——第 629、630 頁。
- 普隆-普隆——見波拿巴, 約瑟夫·沙爾·保爾, 拿破侖親王。
- 普富爾, 恩斯特 (Pfuel, Ernst 1779—1866)——普魯士將軍, 反動軍閥的代表人物之一, 1848 年 9—10 月任首相兼陸軍大臣。——第 672 頁。
- 普赫納, 安東 (Puchner, Anton 1779—1852)——男爵, 奧地利將軍, 1848—1849 年為在特蘭西瓦尼亞同匈牙利革命軍隊作戰的奧軍指揮官。——第 134 頁。
- 普呂米克 (Plümicke, J. C.)——德國軍官, “普魯士皇家炮兵軍官手冊”一書的

- 作者。——第 448 頁。
- 普尔斯基，弗兰齐舍克(Pulszky, Ferencz 1814—1897) ——匈牙利政治活动家，作家和考古学家，原系波兰人，匈牙利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五十年代为“紐約每日論壇报”撰稿，1867 年大赦后回匈牙利，議會議員(1867—1876 和 1884—1897)。——第 634 頁。
- 普劳图斯，梯特·馬克齐烏斯(Plautus, Titus Maccius 公元前 254 左右—184) ——古羅馬大詩人，喜劇作家。——第 502 頁。
- 普伊澤伯爵，約瑟夫·热涅維也夫(Puisaye, Joseph-Geneviève, comte de 1755—1827) ——法国將軍，保皇党人，1793—1797 年朱安党人反革命叛乱的領導者之一；后为流亡者。——第 140 頁。
- 普加乔夫，叶梅連·伊万諾維奇(Пугачёв, Емельян Иванович 1742 左右—1775) ——1773—1775 年俄国农民和哥薩克的最大一次反封建起义的領袖。——第 112 頁。
- 普林西佩-伊-維达烏德，米格尔·奧古斯丁(Principe y Vidaud, Miguel Augustin 1811—1866) ——西班牙資產階級作家，写有許多西班牙历史和文学方面的著作，屬於进步派。——第 173 頁。
- 博尼什，沙穆埃尔(Bónis, Samuel 1810—1879) ——匈牙利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科苏特的拥护者。——第 753 頁。
- 博尼法斯，路易(Boniface, Louis 生于 1796 年) ——法国新聞記者，波拿巴主义者。——第 591、619 頁。
- 博韦斯，霍賽·托馬斯(Boves, José Thomas 死于 1814 年) ——西班牙軍官，反对克里奥洛地主的草原牧民部队首領，1814 年以前草原牧民部队曾被西班牙人利用来鎮压南美西班牙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第 228、229 頁。
- 博雅多，馬提奧·馬利阿(Boiardo, Matteo Maria 1434—1494) ——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詩人，“恋爱中的罗兰”一詩的作者。——第 736 頁。
- 博斯凱，比埃尔·約瑟夫·弗朗斯瓦(Bosquet, Pierre-Joseph-François 1810—1861) ——法国元帥，資產階級共和主义者，后为波拿巴主义者，三十至五十年代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1854 年任克里木法軍師長，后任軍長(1854—1855)。——第 56、138—139 頁。
- 博布秦，弗里德里希·亨利希·卡尔(Bobzin, Friedrich Heinrich Karl 生于 1826 年) ——德国手工业者，1847 年为布魯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会员；1849 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后流亡倫敦；曾和司徒卢威一起領導倫敦德国資產階級民主主义流亡者协会。——第 410 頁。
- 博阿尔奈，欧仁(Beauharnais, Eugène 1781—1824) ——亲王，法国將軍，拿破侖第一的妻子前夫所生之子，拿破侖法国历次战争的参加者；1805—1814 年为意大利总督。——第 64、161、259—262、539 頁。
- 博內留斯，烏尔利希(Bonerius, Ulrich) ——中世紀德国詩人，傳教的修道士，寓言集“宝石”的作者，該书是根据古羅馬文献写成的，并于 1350 年出版。——第 599 頁。

博伊斯特, 弗里德里希(Beust, Friedrich 1817—1899)——普魯士軍官, 因政治信仰退職, 1848年是科倫工人联合会委员会委員, “新科倫報”編輯之一(1848年9月—1849年2月), 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 革命后流亡瑞士, 任教育学教授。——第461頁。

博罗茲丁, 尼古拉·米哈伊洛維奇(Бороздин, Николай Михайлович 1777—1830)——俄国將軍, 反对拿破侖法国战争的参加者。——第260頁。

十三画

雍籍牙(1711—1760)——緬甸国王(1753—1760)。——第293頁。

瑟美列, 貝尔塔兰(Szemere, Bertalan 1812—1869)——匈牙利政治活动家和政論家; 匈牙利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 曾任內务部长(1848)和革命政府首腦(1849年5—8月); 革命失败后逃离匈牙利。——第421、545、635、753頁。

葛伊甸, 洛金·彼得罗維奇(Гейден, Логин Петрович 1772—1850)——俄国海軍上将, 在1827年納瓦林会战中为分舰队司令, 1828—1829年俄土战争时期为俄国地中海舰队总司令。——第538頁。

楊, 弗里德里希·路德維希(Jahn, Friedrich Ludwig 1778—1852)——德国作家和政論家, 德国体操运动的組織者; 德国人民反对拿破侖統治的解放斗争的积极参加者; 民族主义者。——第527頁。

詹姆斯(James)——英国軍官。——第61頁。

詹姆斯二世(James II 1633—1701)——

英国国王(1685—1688)。——第458頁。

詹姆斯, 乔治·潘恩·雷恩斯福德(James, George Payne Rainsford 1799—1860)——英国作家, 写有許多历史小說。——第61頁。

塔克尔(Tucker)——倫敦出版商。——第507頁。

塔拉尔, 卡米尔(Tallard, Camille 1652—1728)——法国元帅, 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初期任法軍指揮官。——第256、257頁。

塔西佗(普卜利烏斯·科尔奈利烏斯·塔西佗)(Publius Cornelius Tacitus 約55—120)——著名的羅馬历史学家。——第554、722頁。

塔梅尔兰(帖木儿)(1336—1405)——中亚細亚的統帅和征服者, 东方幅員广大的国家的奠基者。——第78頁。

塔尔塔利亚, 尼古洛(Tartaglia, Niccolo 1499左右—1557)——意大利数学家, 同时研究炮兵学和筑城学問題。——第197、334、335頁。

雷, 泰奧多尔(Reh, Theodor)——德国律师, 1848—1849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議會議員, 屬于中間派左翼。——第496、497頁。

雷贊, 比埃尔(Raisin, Pierre 1820—1870)——瑞士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大会議議員。——第718、719頁。

雷尔, 奧諾萊·沙尔·米歇爾·約瑟夫(Reille, Honoré-Charles-Michel-Joseph 1775—1860)——法国將軍, 后为元帅和政治活动家, 比利牛斯半島战争(1808—1814)的参加者。——第264、267—269頁。

雷必达(小雷必达)(馬可·艾米利烏斯·

- 雷必达)(Marcus Aemilius Lepidus (Minor) 公元前 89—12) —— 羅馬国家活动家, 尤利烏斯·凱撒的拥护者, 执政官(公元前 46—42), 后三执政之一(公元前 43—36), 与另外两个执政——屋大維和安东尼比較起来在三执政中起次要作用, 于公元前 36 年被剝夺三执政的权力。——第 164 頁。
- 雷繆扎, 沙尔·弗朗斯瓦·瑪丽 (Rémusat, Charles-François-Marie 1797—1875) —— 伯爵, 法国国家活动家和作家, 奥尔良党人, 曾任內务大臣(1840); 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議會和立法議會議員, 外交部长(1871—1873)。——第 438 頁。
- 雷卡尔德——見馬丁涅斯·德·雷卡尔德, 璜。
- 雷希施塔特公爵, 約瑟夫·弗朗斯瓦·沙尔·波拿巴 (Reichstadt, Joseph-François-Charles-Bonaparte, duc de 1811—1832) —— 拿破侖第一和瑪丽-路易莎之子; 曾被波拿巴派推举为法国王位继承人。——第 163 頁。
- 蒙勃倫, 路易·比埃尔 (Montbrun, Louis-Pierre 1770—1812) —— 伯爵, 法国將軍, 拿破侖法国历次战争的参加者。——第 262 頁。
- 蒙尼埃, 昂利·博納温士尔 (Monnier, Henri Bonaventure 1805—1877) —— 法国諷刺画家和作家。——第 573 頁。
- 蒙特威尔德, 多敏古 (Monteverde, Domingo 1772—1832) —— 西班牙海軍軍官, 1812—1813 年为鎮压南美西班牙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西班牙軍队指揮官, 米兰达投降后任委內瑞拉鎮守司令(軍区司令)。——第 226—228 頁。
- 蒙塔尔沃, 弗朗西斯科 (Montalvo, Francisco 1754—1822) —— 西班牙將軍, 1812—1816 年为新格拉納达(哥倫比亚)总督。——第 230 頁。
- 蒙塔郎貝尔, 沙尔 (Montalembert, Charles 1810—1870) —— 法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論家, 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議會和立法議會議員, 奥尔良党人, 天主教派的首領; 1851 年十二月二日政变时支持路易·波拿巴, 但不久成为反对派。——第 556 頁。
- 蒙塔郎貝尔侯爵, 馬尔克·勒奈 (Montalembert, Marc-René, marquis de 1714—1800) —— 法国將軍, 軍事工程师, 曾研究出一种新筑城法, 在十九世紀被广泛采用。——第 89、345—348 頁。
- 路易——見拿破侖第三。
- 路易十二 (Louis XII 1462—1515) —— 法国国王 (1498—1515)。——第 197 頁。
- 路易十四 (Louis XIV 1638—1715) —— 法国国王 (1643—1715)。——第 102、201、257、342、528 頁。
- 路易十五 (Louis XV 1710—1774) —— 法国国王 (1715—1774)。——第 41、414、548 頁。
- 路易十六 (Louis XVI 1754—1793) —— 法国国王 (1774—1792), 十八世紀末法国資產階級革命时被处死。——第 95、136 頁。
- 路易十八 (Louis XVIII 1755—1824) —— 法国国王 (1814—1815 和 1815—1824)。——第 98、120、142、538 頁。
- 路易·波拿巴——見拿破侖第三。
- 路易-菲利浦 (Louis-Philippe 1773—1850) —— 奥尔良公爵, 法国国王 (1830—1848)。——第 104、108、221—223、

- 438、534、541、556、563、577、578、598、642、663 頁。
- 路透, 保罗·尤利烏斯 (Reuter, Paul Julius 1816—1899) ——1851 年在倫敦創辦路透通訊社。——第 695 頁。
- 福雷, 埃利·弗雷德里克 (Forey, Elie-Frédéric 1804—1872) ——法国將軍, 后为元帅, 波拿巴主义者; 三十至四十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 1851 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积极参加者之一, 1854—1855 年为克里木法軍指揮官。——第 56 頁。
- 福拉尔, 让·沙尔 (Folard, Jean-Charles 1669—1752) ——法国軍官, 軍事理論家和著作家。——第 153 頁。
- 福斯柯洛·烏果 (Foscolo, Ugo 1778—1827) ——著名的意大利詩人。——第 610 頁。
- 福格特, 卡尔 (Vogt, Karl 1817—1895) ——德国自然科学家, 庸俗的唯物主义者, 小資產階級民主主义者; 1848—1849 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議會議員, 属于左派; 1849 年 6 月为帝国五摄政之一, 1849 年逃离德国, 五十至六十年代是路易·波拿巴雇佣的密探, 对无产阶级革命家进行誣蔑性攻击的积极参加者之一。——第 401—405、409、410、416—424、426—444、446—449、451—463、480、481、484、487—495、479—537、540—554、557、559—592、594—599、601—605、607、609—613、615—623、635、638、639、647、648、651—655、660、663—668、673—678、679—684、690—694、696—704、707—712、720、723、725、726、735、737、739—743、749、751—754、756、758—765、767、770—772 頁。
- 福格特, 艾米尔 (Vogt, Emil 1820—1883) ——瑞士法学家, 卡·福格特之弟。——第 609 頁。
- 福格特, 阿道夫 (Vogt, Adolf 生于 1823 年) ——瑞士医生, 卡·福格特之弟。——第 609 頁。
- 福格特, 古斯塔夫 (Vogt, Gustav 1829—1901) ——瑞士法学家, 政論家和政治活动家, 激进主义者, 1860—1862 年为統計局局长, 卡·福格特之弟。——第 607、609 頁。
- 福格特, 菲利浦·弗里德里希·威廉 (Vogt, Philipp Friedrich Wilhelm 1786—1861) ——德国医生, 三十年代初居住在瑞士, 1835 年起为柏林高等学校医学教授, 追随自由派, 卡·福格特之父。——第 447、609 頁。
- 福格尔魏德的瓦尔特 (Walther von der Vogelweide 約 1170—1230) ——德国中世紀抒情詩人。——第 498 頁。
- 塞里姆一世·亞烏茲 (勇猛者) (Selim I Jauz 1467—1520) ——土耳其苏丹 (1512—1520)。——第 101 頁。
- 塞里姆·庫泰米 (Selim Eutemi 死于 1515 年) ——麦提扎 (阿尔及利亚) 艾米尔。——第 101 頁。
- 塞亚, 弗朗西斯科·安东尼奥 (Zea, Francisco Antonio 1770—1822) ——哥伦比亚政治活动家, 南美西班牙殖民地独立战争的参加者, 玻利瓦尔的拥护者, 哥伦比亚副总统 (1819), 后为大哥伦比亚副总统 (1819—1820)。——第 233、235 頁。
- 塞费尔-帕沙 (Sefer Pasha) ——切尔克西亚王公; 听命于土耳其, 曾参加俄土战争 (1826—1828); 1855—1859 年领导切尔克斯山民同俄国作战。——第

629 頁。

塞尔納，霍賽·德·拉 (Serna, José de la 1770—1832) ——西班牙將軍和政治活動家，1816—1824 年為鎮壓南美西班牙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的西班牙軍隊指揮官。——第 172、173 頁。

塞西耳，威廉，柏里男爵 (Cecil, William, Baron Burleigh 1520—1598) ——英國國家活動家，首席大臣 (1558—1598)。——第 168 頁。

塞琉古王朝 (Seleucus) ——統治亞洲最大的希臘化王國的王朝 (公元前 312—64)。——第 358 頁。

塞万提斯·德·薩維德拉，米格爾 (Cervantes de Saavedra, Miguel 1547—1616) ——偉大的西班牙現實主義作家。——第 595 頁。

塞巴斯提昂尼，奧拉斯 (Sébastieni, Horace 1772—1851) ——伯爵，法國將軍和外交家，1840 年起為元帥；拿破侖法國歷次戰爭的參加者。——第 185 頁。

塞普提米烏斯·謝維路斯 (魯齊烏斯·塞普提米烏斯·謝維路斯) (Lucius Septimius Severus 146—211) ——羅馬皇帝 (193—211) 和統帥。——第 25 頁。

奧托一世 (Otto I 912—973) ——日耳曼王 (936—973) 和所謂神聖羅馬帝國皇帝 (962—973)。——第 286 頁。

奧里珈 (Ольга 1822—1892) ——俄國女大公，尼古拉一世的女兒，後為維爾騰堡王后。——第 720 頁。

奧魯治·巴巴羅薩 (Horuk Barbarossa 1473 左右—1518) ——土耳其海盜，阿爾及爾統治者 (1515—1518)。——第 101 頁。

奧熱羅，比埃爾·弗朗斯瓦·沙爾 (Au-

gereau, Pierre-François-Charles 1757—1816) ——法國將軍，1804 年起為元帥，法蘭西共和國和拿破侖法國歷次戰爭的參加者。——第 141、143、187 頁。

奧當奈爾，恩利克·霍賽 (O'Donnell, Enrique José 1769—1834) ——西班牙將軍，反對拿破侖統治的解放戰爭 (1808—1814) 的參加者；1819 年中在加迪斯地區任鎮壓南美西班牙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的遠征軍軍長。——第 236、237 頁。

奧本海姆，亨利希·伯恩哈特 (Oppenheim, Heinrich Bernhard 1819—1880) ——德國政治活動家，經濟學家和新聞記者，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1848 年是柏林“改革報”編輯之一，1849—1850 年流亡國外；後為民族自由黨人。——第 484、664 頁。

奧登堡親王，格奧爾格·彼得·弗里德里希 (格奧爾基·彼得羅維奇) (Oldenburg, Georg Peter Friedrich (Георгий Петрович), Prinz 1784—1812) ——俄國皇帝亞歷山大一世的女婿，1809—1812 年任特維爾省、雅羅斯拉夫里省和諾夫哥羅德省總督，俄國交通總監。——第 162 頁。

奧馬爾公爵，奧爾良的昂利·歐仁·菲力浦·路易 (Aumale, Henri-Eugène-Philippe-Louis d'Orleans, duc d' 1822—1897) ——法國國王路易·菲力浦之子，四十年代曾參加侵佔阿爾及利亞，任阿爾及利亞總督 (1847—1848)，1848 年二月革命後流亡英國。——第 108、223 頁。

奧倫治親王——見奧倫治的威廉三世。

奧倫治的威廉三世 (William III of Orange 1650—1702) ——尼德蘭總

- 督 (1672—1702), 英国国王 (1689—1702)。——第 281 頁。
- 奧利芬, 勞倫斯 (Oliphant, Laurence 1829—1888)——英国旅行家和新聞記者; 1855 年以“泰晤士報”通訊員身分在高加索活動。——第 583 頁。
- 奧利, 卡尔·弗里德里希·克利斯提安·海尔曼 (Ohly, Karl Friedrich Christian Hermann 1825—1881)——德国新聞記者, 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 1848—1849 年革命的參加者, 革命失敗後流亡瑞士, 後遷居倫敦; “總匯報”通訊員。——第 502、677、705、706 頁。
- 奧克蘭伯爵, 喬治·伊登 (Auckland, George Eden, Earl of 1784—1849)——英国國家活動家, 輝格黨人, 曾多次擔任內閣大臣, 1836—1842 年任印度總督。——第 81 頁。
- 奧克辛本, 約翰·烏爾利希 (Ochsenbein, Johann Ulrich 1811—1890)——瑞士將軍和資產階級國家活動家, 激進主義者, 後來是自由派領袖之一, 反宗得崩德戰爭時期, 任聯邦代表會議議長, 聯邦政府首腦 (1847—1848); 1848 年為國民院議長和聯邦委員會委員。——第 643 頁。
- 奧古斯都 (Augustus 公元前 63—公元前 14)——羅馬皇帝 (公元前 27—公元前 14)。——第 24、25 頁。
- 奧古斯特 (August 1779—1843)——普魯士親王, 將軍和軍事活動家, 反對拿破侖法國戰爭的參加者, 1808—1843 年任普魯士炮兵司令之職, 並領導改編炮兵。——第 186 頁。
- 奧古斯滕堡公爵, 克里斯提安·奧古斯特 (Augustenborg, Christian August, Herzog 1768—1810)——丹麥貴族, 將軍, 1810 年 1 月被瑞典國王查理十三收為養子, 稱查理-奧古斯特。——第 162 頁。
- 奧斯坦-薩肯, 法比安·威廉莫維奇 (Остен-Сакен, Фабиан Вильгельмович 1752—1837)——俄國將軍, 1826 年起為元帥, 反對拿破侖法國戰爭的參加者。——第 177、178、182、185、186 頁。
- 奧斯渥特, 歐根 (Oswald, Eugen 1826—1912)——德国新聞記者, 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 1848—1849 年巴登革命運動的參加者; 革命失敗後逃離德國。——第 410 頁。
- 奧斯特爾曼-托爾斯泰, 亞歷山大·伊萬諾維奇 (Остерман-Толстой, 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1770—1857)——伯爵, 俄國將軍, 反對拿破侖法國戰爭的參加者。——第 261、262 頁。
- 奧爾良王朝——法國王朝 (1830—1848)。——第 413、414 頁。
- 奧爾格斯, 海爾曼 (Orges, Hermann 1821—1874)——德国新聞記者, 1854—1864 年為奧格斯堡“總匯報”編輯之一。——第 516、618、679、741、742 頁。
- 奧爾西尼, 費利切 (Orsini, Felice 1819—1858)——意大利革命家, 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和共和主義者, 意大利民族解放和統一鬥爭的著名參加者之一; 因行刺拿破侖第三而被處死。——第 555 頁。
- 奧爾蘇費也夫, 查哈爾·德米特利也維奇 (Олсуфьев, Захар Дмитриевич 1773—1835)——俄國將軍, 反對拿破侖法國戰爭的參加者。——第 185 頁。

十四画

歌德, 約翰·沃尔弗干格 (Goethe,

- Johann Wolfgang 1749—1832)——偉大的德国作家和思想家。——第455、458、587、637、666頁。
- 瑪麗-伊麗莎白-阿馬利亞(Marie Elisabeth Amalie 1784—1849)——普法爾茨—茨魏布呂肯—比肯斐特系的巴伐利亞公威廉的女兒。——第97頁。
- 蒲魯東, 比埃爾·約瑟夫(Proudhon, Pierre-Joseph 1809—1865)——法國政論家, 經濟學家 and 社會學家, 小資產階級思想家, 無政府主義創始人之一。——第476、556頁。
- 魁里尼, 安吉洛·馬利阿(Quirini, Angelo Maria 1680—1755)——意大利紅衣主教和作家。——第285頁。
- 豪格, 恩斯特(Haug, Ernst)——德國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 奧地利軍官, 意大利1848—1849年革命的參加者; 革命失敗後流亡英國, “宇宙”周刊的編輯之一。——第473頁。
- 豪普特, 海爾曼·威廉(Haupt, Hermann Wilhelm 約生于1831年)——德國店員, 共產主義者同盟盟員, 科倫共產黨人案件的被捕者之一, 在偵查期間變節招供, 在審判前由警察局釋放, 逃往巴西。——第450、731頁。
- 察赫, 安東(Zach, Anton 1747—1826)——男爵, 奧地利將軍。——第69頁。
- 察貝爾, 弗里德里希(Zabel, Friedrich 1802—1875)——德國自由派政論家, 柏林“國民報”編輯(1848—1875)。——第647、648、660、661、675—697、699—716、730、749、751、771、772頁。
- 察哈里埃, 亨利希·阿爾伯特(Zachariae, Heinrich Albert 1806—1875)——德國法學家; 法蘭克福國民議會議員(1848—1849), 屬於中間派右翼。——第492、497頁。
- 赫爾, 克利斯托夫(Heer, Christoph 死于1701年)——德國數學家和軍事工程師, 寫有築城學著作。——第339頁。
- 赫爾弗, 古斯達夫(Hörfel, Gustav)——奧地利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 1850年起僑居巴黎, 1852年2月所謂巴黎德法密謀案件的被告之一, 法國警探。——第473、474、486頁。
- 赫爾岑, 亞歷山大·伊萬諾維奇(Герцен, 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1812—1870)——偉大的俄國革命民主主義者, 唯物主義哲學家, 政論家和作家; 1847年僑居國外, 在國外建立了俄國自由印刷所, 並出版“北極星”文集和“鐘聲”報。——第643頁。
- 赫德遜, 詹姆斯(Hudson, James 1810—1885)——英國外交家, 駐都靈公使(1851—1863)。——第600、601頁。
- 赫伯特, 約翰·安東(Herbort, Johann Anton 十八世紀)——維爾騰堡軍事工程師, 寫有築城學著作。——第345頁。
- 維斯(Wyß)——十九世紀五十年代伯爾尼的律師。——第722頁。
- 維加, 格奧爾格(Vega, Georg 1756—1802)——男爵, 奧地利軍官和數學家, 對數表制作者。——第203頁。
- 維隆, 路易·德吉烈(Véron, Louis-Desiré 1798—1867)——法國新聞記者和政治活動家, 1848年前為奧爾良黨人, 後為波拿巴主義者, “立憲主義者報”的所有人。——第414頁。
- 維耶, 約翰·弗里德里希(Wiehe, Johann Friedrich)——排字工人, 1859年在倫敦霍林格爾的印刷所工作。——第518、520、521、523、684、693、702、742—

- 744、746、763、769 頁。
- 維貝爾(Weber)——普魯士法學家，1860年柏林“國民報”訴訟案件中馬克思的律師。——第 678、681、684、685、701、703、714—716、771 頁。
- 維格齊(弗拉維·維格齊·雷納特)(Flavius Vegetius Renatus 四世紀末)——羅馬軍事著作家。——第 26 頁。
- 維吉齊-盧斯卡拉，卓文納勒(Vegezzi-Ruscalla, Giovenalle)——十九世紀中叶意大利政論家，小冊子“尼斯民族”的作者。——第 604 頁。
- 維耳馬雷，沙爾·馬克西姆·德(Villemairest, Charles-Maxime de 1785—1852)——法國文學家，編寫了許多假的回憶錄。——第 120 頁。
- 維森里斯勒，雅科布——見拉薩爾，斐迪南。
- 維特根施坦，彼得·赫里斯提安諾維奇(Витгенштейн, Петр Христианович 1768—1842)——伯爵，俄國將軍，後為元帥；反對拿破侖法國戰爭的參加者，1813年4—5月任俄普聯軍總司令。——第 176、187 頁。
- 維利希，奧古斯特(Willich, August 1810—1878)——普魯士軍官，因政治信仰退伍，共產主義者同盟盟員，1849年巴登—普法爾茨起義的參加者，是1850年從共產主義者同盟分裂出來的冒險主義宗派集團的領袖之一；1853年僑居美國，美國內戰的參加者，站在北部方面。——第 410、418、420、424、429、448、465—473、476、484、654、676、683、726、729、732 頁。
- 維利薩里(Belisar 505 左右—565)——拜占庭統帥，曾同波斯人、汪达尔人、東哥特人和法蘭克人作過戰，是皇帝查士丁尼一世實行他的在北非和意大利恢復奴隸制這一反动政策的助手之一。——第 363 頁。
- 維克多-艾曼努爾二世(Viktor Emanuel II 1820—1878)——撒丁國王(1849—1861)，意大利國王(1861—1878)。——第 575、606 頁。
- 維克多，克勞德·維克多·佩蘭(Victor, Claude-Victor Perrin 1764—1841)——法國將軍，1807年起為元帥，拿破侖法國歷次戰爭的參加者。——第 176、184、186、188 頁。
- 維爾特(Würth)——德國政治活動家，法蘭克福國民議會議員。——第 499 頁。
- 維爾特，格奧爾格(Weerth, Georg 1822—1856)——德國無產階級詩人和政論家，共產主義者同盟盟員，1848—1849年為“新萊茵報”的編輯之一；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 746 頁。
- 維爾騰堡公爵，歐根(Württemberg, Eugen 1788—1857)——俄國將軍，反對拿破侖法國戰爭的參加者，保羅一世妻子的侄子。——第 261、262 頁。
- 維爾騰堡公爵，斐迪南·弗里德里希·奧古斯特(Württemberg, Ferdinand Friedrich Auguste 1763—1834)——奧地利元帥，反對法蘭西共和國和拿破侖法國戰爭的參加者。——第 183、187 頁。
- 維爾穆特(Wermuth)——漢諾威警察廳長，科倫共產黨人案件(1852)的證人，與施梯伯合編“十九世紀共產主義者的陰謀”一書。——第 440 頁。

十五 画

墨萊伯爵，詹姆斯·斯圖亞特(Murray, James Stuart, Earl of 1531 左右—

- 1570)——蘇格蘭女王瑪麗·斯圖亞特的哥哥, 1567年起為蘇格蘭攝政王, 曾進行反對瑪麗·斯圖亞特及其擁護者的鬥爭。——第 61 頁。
- 劍橋公爵, 喬治·威廉·弗雷德里克·查理 (Cambridge, George William Frederick Charles, Duke of 1819—1904)——英國將軍, 1854 年任克里木英軍師長, 英軍總司令 (1856—1895)。——第 56、59 頁。
- 黎塞留公爵, 阿爾芒·艾曼紐爾·杜·普勒西 (Richelieu, Armand-Emmanuel du Plessis, duc de 1766—1822)——法國國家活動家, 十八世紀末法國資產階級革命開始後流亡俄國, 1813 年回到法國, 曾任內閣首相兼外交大臣 (1815—1818 和 1820—1821)。——第 538 頁。
- 緬施科夫, 亞歷山大·謝爾蓋也維奇 (Меншиков, 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 1787—1869)——公爵, 俄國軍事和國家活動家, 1853 年任駐君士坦丁堡特命全權大使, 克里木陸海軍總司令 (1853—1855 年 2 月)。——第 55、56 頁。
- 摩萊, 路易·馬蒂約 (Molé, Louis-Mathieu 1781—1855)——伯爵, 法國國家活動家, 奧爾良黨人, 曾任首相 (1836—1837、1837—1839), 第二共和國時期為制憲議會和立法會議員。——第 541 頁。
- 摩爾拉, 托馬斯 (Morla, Thomas 1752—1820)——西班牙將軍, 最高洪達委員, 1808 年投向法國占領者, 曾任約瑟夫·波拿巴政府的陸海軍大臣。——第 203 頁。
- 魯珀特親王 (Rupert, Prince 1619—1682)——英國將軍, 保皇黨人, 十七世紀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期間為第一次國內戰爭 (1642—1646) 中的皇家騎兵隊指揮官。——第 308 頁。
- 魯庫魯斯 (魯齊烏斯·李奇尼烏斯·魯庫魯斯) (Lucius Licinius Luculus 約公元前 106—57)——羅馬統帥, 以家產富有和舉行豪華宴會而聞名。——第 603 頁。
- 魯勉采夫, 彼得·亞歷山大羅維奇 (Румянцев, Пет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725—1796)——伯爵, 傑出的俄國統帥, 元帥, 國家活動家, 1768—1774 年俄土戰爭中任俄軍指揮官。——第 112 頁。
- 魯弗魯瓦, 弗里德里希·古斯塔夫 (Rouvroy, Friedrich Gustav 1771—1839)——薩克森軍官, 寫有許多炮兵學方面的著作。——第 203 頁。
- 德·梅斯特爾, 克薩維埃 (De Maistre, Xavier 1763—1852)——法國作家, 將軍, 十八世紀末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期間流亡俄國, 他的作品反映了反革命貴族的情緒。——第 662 頁。
- 德納, 查理·安德森 (Dana, Charles Anderson 1819—1897)——美國進步新聞工作者, “紐約每日論壇報”和“美國新百科全書”編輯之一。——第 681、748、749 頁。
- 德瓦爾 (Deval)——法國駐阿爾及利亞領事 (1815—1827)。——第 103 頁。
- 德律埃, 昂利 (Druey, Henri 1799—1855)——瑞士國家活動家, 激進主義者, 聯邦委員會委員 (1848—1854), 司法和警務部部長 (1848 年起), 1850 年為瑞士聯邦主席。——第 422、424、432、434、436、717、719、721、722 頁。
- 德朗克, 恩斯特 (Dronke, Ernst 1822—

- 1891)——德国政論家,起初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和“新萊茵报”編輯之一;1848—1849年革命失敗后流亡日内瓦,后于1851年迁居英国;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拥护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脫离政治活动而經商。——第419、420、424、482頁。
- 德尔文,昂利·古斯塔夫(Delvigne, Henri-Gustav 1799—1876)——法国軍官和軍事发明家。——第41、380頁。
- 德魯埃·德尔隆·让·巴蒂斯特(Drouet d'Erlon, Jean-Baptiste 1765—1844)——伯爵,法国將軍,后为元帅,拿破侖法国历次战争的参加者。——第264、267、268、323頁。
- 德斯特尔,卡尔·路德維希·約翰(D'Estler, Karl Ludwig Johann 1811—1859)——德国社会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职业是医生;共产主义者同盟科倫支部成員,1848年为普魯士国民議會議員,属于左派;1848年10月起为德国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委員,在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中起了卓越作用;后流亡瑞士。——第489、649頁。
- 德雷克,弗兰西斯(Drake, Francis 1540左右—1596)——英国航海家,海軍上将,1588年曾参加击潰西班牙艦队。——第170頁。
- 德雷澤,約翰·尼古勞斯(Dreyse, Johann Nicolaus 1787—1867)——普魯士軍事发明家和厂主。——第380頁。
- 德拉奧德,律西安(Delahodde, de la Hodde, Lucien 1808—1865)(假名为杜普雷 Duprez)——法国政論家,复辟时期和七月王朝时期一些秘密革命团体的参加者,警探。——第437、457、729頁。
- 德拉馬尔,德奧多·卡季米尔(Delamarre, Théodore Casimir 1797—1870)——法国銀行家,政論家,1844年起为“祖国报”所有人,波拿巴主义者。——第615、616頁。
- 德拉腊日阿茲,路易·昂利(Delarageaz, Louis-Henri 1807—1891)——瑞士政治活动家,激进主义者,傅立叶的拥护者,“窩州新聞报”編輯。——第604頁。

十六画

- 默尔納,卡尔·奧托(Mörner, Karl Otto 1781—1868)——男爵,瑞典軍官,曾促成貝尔納多特当选为瑞典王位的继承人。——第162頁。
- 賴哈德,約瑟夫·馬丁(Reichard, Joseph Martin 1803—1872)——德国法学家,小資产階級民主主义者,法兰克福国民議會議員,1849年普法尔茨革命临时政府成員,起义被鎮压后流亡美国。——第670頁。
- 賴德律-罗兰,亚历山大·奧古斯特(Ledru-Rollin, Alexandre-Auguste 1807—1874)——法国政論家和政治活动家,小資产階級民主派領袖之一,“改革报”編輯,1848年是临时政府成員,制宪議会和立法議會議員,在議會中領導山岳党,1849年6月13日示威游行后流亡英国。——第552頁。
- 賴辛巴赫,奧斯卡尔(Reichenbach, Oskar 生于1815年)——伯爵,西里西亞地主,小資产階級民主主义者,1848

- 1849 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議会議員，1850 年起侨居英国，后迁美洲。——第 737 頁。
- 諾特，威廉(Nott, William 1782—1845)——英国將軍，英国阿富汗战争(1838—1842)的参加者。——第 81、84、85 頁。
- 諾德曼，約瑟夫·阿尔曼德(Nordmann, Joseph Armand 1759—1809)——奥地利將軍，反对拿破侖法国战争的参加者。——第 65 頁。
- 諾伊鮑威尔 (Neubauer 十七世紀)——德国軍事工程师。——第 339 頁。
- 澤曼-沙赫(Seman Shah)——阿富汗沙赫(1793—1800)。——第 79 頁。
- 澤特，奧托·約瑟夫·阿尔諾德(Saedt, Otto Joseph Arnold 1816—1886)——普魯士法官，1848 年起任科倫檢察官，科倫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起訴人。——第 449、450 頁。
- 澤德利茨，弗里德里希·威廉(Seydlitz, Friedrich Wilhelm 1721—1773)——普魯士將軍；在 1756—1763 年七年战争时期是騎兵部队的指揮官，对改編普魯士騎兵起过重大作用。——第 36、309、310、312、326 頁。
- 澤登施提克尔，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卡尔·泰奥多尔(Seidensticker, Georg Friedrich Karl Theodor 1797—1862)——德国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因参加 1831 年哥丁根暴动而被判处徒刑，1845 年流亡美洲，从事新聞工作。——第 485 頁。
- 鮑威尔，埃德加尔(Bauer, Edgar 1820—1886)——德国政論家，青年黑格尔分子，五十至六十年代初住在国外，1858—1859 年为倫敦“新时代”編輯。——第 508 頁。
- 鮑迪斯科，雅柯夫·安得列也維奇(Бодиско, Яков Андреевич 生于 1794 年)——俄国軍官，后为將軍；克里木战争(1853—1856)初期是博馬尔松德要塞司令。——第 295 頁。
- 鮑蒂揚尼，卡茲美尔(卡季米尔)(Batthyány, Kasmer (Kasimir) 1807—1854)——伯爵，匈牙利国家活动家，匈牙利貴族自由派的代表人物，1849 年任匈牙利革命政府外交部长，革命被鎮压后逃离匈牙利。——第 626 頁。
- 鮑蒂揚尼，拉約什(路德維希)(Batthyány, Lajos (Ludwig) 1809—1849)——伯爵，匈牙利国家活动家，匈牙利貴族自由派集团的代表人物；曾領導匈牙利政府(1848 年 3—9 月)，执行与奥地利君主制妥协的政策；革命被鎮压后遭枪杀。——第 626 頁。
- 穆尔，約翰(Moore, John 1761—1809)——英国將軍，1808—1809 年任在葡萄牙的英軍总司令。——第 296 頁。
- 穆西烏斯·賽沃拉(Mucius Scaevola)——羅馬法学家。——第 714 頁。
- 穆罕默德(Muhammad 570 左右—632)——阿拉伯傳教士，被认为是伊斯兰教的創始人，按伊斯兰教的說法是先知，即“安拉的使者”。——第 194、418、672 頁。
- 穆罕默德汗(Machmud Khan)——白沙瓦执政者(1818—1834)。——第 80 頁。
- 穆罕默德-阿利(Mohammed Ali 1769—1849)——埃及执政者(1805—1849)，实行过許多进步的改革；1831—1833 年和 1839—1840 年曾进行过反对土耳其苏丹的战争，其目的是要使埃及成为

不依赖于土耳其的独立自主的国家。
——第 103、104 頁。

霍尔, 爱德华(Hall, Edward 1498 左右—1547)——英国編年史家。——第 60 頁。

霍普, 托馬斯(Hope, Thomas 1770 左右—1831)——英国古玩家和作家。——第 297 頁。

霍夫曼(Hoffmann)——新聞記者, 波拿巴主义者。——第 619 頁。

霍华德, 查理(Howard, Charles 1536—1624)——英国海軍上将, 1585—1618 年领导海軍部, 1588 年任英国舰队总司令, 該舰队击潰了西班牙舰队。——第 169、170 頁。

霍斯曼, 爱德华(Horsmen, Edward 1807—1876)——英国自由党国家活动家, 1855—1857 年任爱尔兰事务大臣。——第 556 頁。

霍伊尔, 約翰·哥特弗利德(Hoyer, Johann Gottfried 1767—1848)——普魯士將軍和軍事史学家, 写有許多筑城学和炮兵学方面的著作。——第 203 頁。

霍林格尔, 菲德利奥(Hollinger, Fiedelio)——倫敦一家印刷所老板, 曾承印“人民报”。——第 510、513、515、517、518、520—524、653、693、694、702、742—745、758、761、763、764、769 頁。

霍亨索倫王朝——勃兰登堡选帝侯世家(1415—1701), 普魯士王朝(1701—1918)和德意志皇朝(1871—1918)。——第 596、670、691 頁。

霍亨索倫, 卡尔·安东(Hohenzollern, Karl Anton 1811—1885)——普魯士將軍和国家活动家, 政府首脑(1858 年 11 月—1860 年)。——第 649、661 頁。

霍亨索倫-海辛根, 弗里德里希·弗兰茨·克薩維尔(Hohenzollern-Hechingen, Friedrich Franz Xaver 1757—1844)——公爵, 奥地利將軍, 后为元帅, 反对拿破侖法国战争的参加者。——第 66、69、137 頁。

十七画

薛西斯(Xerxes 公元前 519 左右—465)——古波斯国王(公元前 486—465)。——第 6、9、152 頁。

賽尔, 罗伯特·亨利(Sale, Robert Henry 1782—1845)——英国上校, 英国阿富汗战争(1838—1842)的参加者。——第 84 頁。

賽普尔斯(Cyple, W.)——1856 年为設菲尔德外交事务委员会書記。——第 739 頁。

謝努, 阿道夫(Chenu, Adolphe 約生于 1817 年)——法国七月王朝时期一些秘密革命团体的参加者, 密探和奸細。——第 457 頁。

謝尔策尔, 安得列阿斯(Scherzer, Andreas 1807—1879)——德国裁縫, 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为属于維利希—沙佩尔冒險主义宗派集团的一个巴黎支部的成員, 所謂 1852 年 2 月巴黎德法密謀案件的被告之一; 后流亡英国, 倫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领导人之一, “新时代”出版者和“人民报”撰稿人。——第 508、509、739、740 頁。

繆拉特, 約阿希姆(Murat, Joachim 1767—1815)——法国元帅, 拿破侖法国历次战争的参加者, 那不勒斯国王(1808—1815)。——第 160、175、262、312、321—323 頁。

繆弗林, 弗里德里希·斐迪南·卡尔

(Muffling, Friedrich Ferdinand Karl 1775—1851)——男爵, 普魯士將軍, 后为元帥, 軍事活動家和著作家, 反对拿破侖法国战争的参加者。——第 177、186、191 頁。

十八画

魏特林, 威廉 (Weitling, Wilhelm 1808—1871)——德国工人运动初期的著名活动家, 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理論家之一; 职业是裁縫。——第 464 頁。

魏德迈, 約瑟夫 (Weydemeyer, Joseph 1818—1866)——德国和美国工人运动的卓越活动家; 1846—1847 年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 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下, 轉到科学共产主义立場上,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 德国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新德意志报”主編之一 (1849—1850); 革命失敗后, 流亡美国, 曾参加內战, 站在北部方面; 为馬克思主义在美国的宣傳奠定了基础;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 483、735 頁。

薩肯——見奧斯坦-薩肯, 法比安·威廉莫維奇。

薩尔, 沙尔·瑪丽·德 (Salles, Charles-Marie de 1803—1858)——法国將軍, 三十至五十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 1855 年为克里木法軍軍长。——第 223 頁。

薩克森—科堡公爵——見恩斯特第三。

薩美提克一世 (Psammetich I)——埃及法老 (公元前 663—610) 和統帥。——第 6 頁。

薩宗諾夫, 尼古拉·伊万諾維奇 (Сазонов, 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1815—1862)——俄国新聞記者, 自由主义者, 四十年代初流亡国外, 为各种杂志和报纸撰稿。——第 420、421 頁。

薩腊弗腊茲汗——見帕英达汗。

薩呂斯提烏斯 (凱尤斯·薩呂斯提烏斯·克里斯普斯) (Caius Sallustius Crispus 公元前 86—約 35)——羅馬历史学家。——第 20 頁。

薩瓦里, 安·让·瑪丽·勒奈, 罗維戈公爵 (Savary, Anne-Jean-Marie-René, duc de Rovigo 1774—1833)——法国將軍, 政治活动家和外交家, 拿破侖法国历次战争的参加者, 警務大臣 (1810—1814), 阿尔及利亚总督 (1831—1833)。——第 107、108 頁。

薩瓦亲王奧伊根 (Eugen, Prinz von Savoyen 1663—1736)——奧地利統帥和国家活动家。——第 256、257 頁。

十九画

龐沙腊侯爵, 沙尔·路易·塞扎尔·杜·波尔 (Poncharra, Charles-Louis-César du Port, marquis de 1787—1860)——法国軍官和軍事发明家。——第 380 頁。

二十画

薩倫海美尔 (Sauernheimer)——德国制刷工, 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初流亡瑞士, 日内瓦德意志工人协会主席。——第 417、423 頁。

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名

三 画

小丑——意大利假面喜剧中的人物，一个正在热恋的僕人，常常在陷入窘境时能巧妙地对付过去。——第 491、666 頁。

四 画

以西結——聖經中的先知。——第 7 頁。

文克里特——半傳奇式的瑞士軍人；相傳在 1386 年 6 月 9 日，当瑞士人同奥地利公爵列奧波特三世的軍隊在森帕赫（琉森州）城下作战时，他舍身杀敌使瑞士人取得了作战的胜利。——第 604 頁。

巴洛——莎士比亚的喜剧“終成眷屬”中的人物。——第 419 頁。

巴考士——古羅馬人的酒神和快乐之神。——第 595、612 頁。

邓斯第一——亚·波普的叙事詩“邓斯之歌”中的人物。——第 649、693 頁。

邓斯第二——亚·波普的叙事詩“邓斯之歌”中的人物。——第 649 頁。

五 画

丘必特——按羅馬神話为最高的神，雷神，相当于希腊諸神中的宙斯。——第 25、658 頁。

加西莫多——維·雨果的小說“巴黎圣母院”中的人物；加西莫多这个名字已成了丑陋的化身。——第 618、631 頁。

六 画

扫罗——見保罗。

吉耳里——艾·阿布同名喜剧中的人物。——第 753、754 頁。

列保萊罗——莫扎特的歌剧“唐璜”中的人物，唐璜的僕人。——第 419、605 頁。

伊菲姬尼亚——古希腊神話中国王亚加米农的女儿，在希腊人出发远征特洛伊时被亚加米农作为牺牲祭祀神明祈求寬恕。——第 620 頁。

休迪布腊斯——十七世紀英国詩人巴特勒同名諷刺詩中的人物，喜欢濫推論和爭辯，善于用三段論法来证明最荒謬的論点。——第 595 頁。

艾塞勒和柏塞勒——德国作家約·威·克利斯特恩匿名出版的諷刺性小册子“1847 年 4 月艾塞勒博士和柏塞勒男爵出席省議会议途散記”中的两个滑稽人物。——第 524、691 頁。

亚伯——据聖經說是亚当的次子，由于遭到长兄該隱的嫉妒而被杀害。——第 661 頁。

亚比亥——聖經中的人物。——第 661 頁。

亚尔古船英雄——希腊神話中的英雄，曾乘“亚尔古”船前往科耳希达寻求由巨龙看守的金羊毛；公元前三世紀罗陀斯的阿波洛尼烏斯在自己的长詩“亚尔古船英雄的远航”中曾歌頌了他們这次航行（神話中的詩人和歌唱家奧菲士也参加了这次航行）。——第 605—607 頁。

七 画

孚恩神——按古羅馬神話是最低的神，相当于希腊的薩蹄尔神；森林和田野的保

护神。——第 622 頁。

里士滿——莎士比亚的历史剧“理查三世”中的人物。——第 417 頁。

亨利四世——莎士比亚同名历史剧中的人物。——第 429、459 頁。

克拉林——卡德龙的歌剧“神奇的魔术师”中的人物。——第 404、666 頁。

克勒維尔——巴尔扎克的小說“貝姨”中的人物，是暴发戶、貪財者和貪淫好色分子的典型。——第 414 頁。

八 画

杰克——見福斯泰夫。

法拉蒙德——傳奇式的法兰克国王，相傳为五世紀时候的人。——第 142 頁。

拉薩里耳奧——十六世紀中叶問世的一部匿名西班牙中篇小說“来自托尔梅斯河的拉薩里耳奧及其种种不幸”中的人物；狡猾騙子手的典型。——第 587 頁。

波頓——莎士比亚的喜劇“仲夏夜之梦”中的人物。——第 412 頁。

波扎侯爵——席勒的悲劇“唐·卡洛斯”中的主要角色之一；一个企图影响暴君的、高尚的、有自由思想的內侍官。——第 593 頁。

阿波罗——古希腊神話中的太阳神和光明之神，艺术的保护神。——第 25 頁。

阿基里斯——古希腊神話中圍攻特洛伊的一位最勇敢的希腊英雄，荷馬“伊利亚特”中主要人物之一。——第 278 頁。

九 画

保罗——据聖經說是基督教使徒之一；在信基督教之前叫扫罗。——第 462 頁。

胜者乔治——神話中的基督教“圣徒”，降龙者。——第 671 頁。

哀杰克斯·铁拉孟——荷馬“伊利亚特”

中人物之一，特洛伊圍攻的参加者。——第 278 頁。

科貝斯第一——亨·海涅的同名諷刺詩中的主人公；雅科布·費奈迭的綽号。——第 454、499 頁。

哈巴谷——聖經中的先知。——第 656 頁。

哈姆雷特——莎士比亚同名悲劇中的主要人物。——第 506、595、658 頁。

柏塞勒——見艾塞勒和柏塞勒。

柏克司尼弗——狄更斯的小說“馬丁·切斯維特一生”中的人物，是个伪君子，假好人。——第 576 頁。

十 画

浮士德——歌德同名悲劇中的主要角色。——第 666 頁。

茜林絲——希腊神話中的妖女，人首鳥身，她們用歌声誘迷航海者，并使他們喪身。——第 574 頁。

退尔，威廉——关于十三世紀末十四世紀初瑞士人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解放戰爭的民間傳說中的英雄；神射手，曾射死奧地利州官（Landvogt）；席勒的同名劇中的主要角色。——第 418 頁。

埃吉丽亚——按羅馬神話是一位聰慧的有預知能力的女神。——第 593、603、604 頁。

庫尼貢达——伏尔泰哲学小說“老实人”中的女主人公。——第 616、754 頁。

唐·吉訶德——塞万提斯同名小說中的主要人物。——第 595 頁。

高亮都亚，或大噪門——十六世紀德国作家約·費沙尔特的小说“关于格朗果施、高亮都亚和龐大固埃諸英豪和老爷的業績与名言的惊險长篇历史故事”中的主要人物，仿拉伯雷小說“巨人傳”中

卡岡都亞的形象創造出來的人物。——第 410、441 頁。

十一画

莫斯康——卡德龍的歌劇“神奇的魔術家”中的人物。——第 666 頁。

莪菲莉霞——莎士比亞的悲劇“哈姆雷特”中的女主人公。——第 658 頁。

基普里安諾——卡德龍的歌劇“神奇的魔術家”中的人物；一個同浮士德相像的典型人物。——第 666 頁。

十二画

閔豪森——德國文學中一個肆無忌憚的吹牛家和撒謊者的名字，他的名字已成了普通名詞。——第 731 頁。

斯洛肯貝爾吉——英國作家勞·斯特恩的小說“特利斯屈蘭·善第先生的生平 and 見解”中的人物；一個陌生人，他的大鼻子使許多城市驚惶不安。——第 659 頁。

舒夫特勒和斯皮格爾勃——席勒的悲劇“強盜”中的人物；喪盡天良的打劫劫舍、殺人放火的暴徒。——第 413 頁。

雅努斯——古羅馬的神，有前後兩副面孔；雅努斯的轉義就是口是心非的人。——第 595 頁。

雅羅米爾——格里耳帕爾策的悲劇“女始祖”中的主要角色。——第 511 頁。

普留東，約瑟夫——法國作家和漫畫家昂利·蒙尼埃創造出來的一個自滿自負而又眼光狹小的小市民典型。——第 613 頁。

普隆涅斯——莎士比亞的悲劇“哈姆雷特”中的人物；一個狡猾多嘴的廷臣。——第 449、580 頁。

普羅米修斯——希臘神話中一個狄坦神，

他從神那里盜走了火，帶給人們；宙斯把他鎖縛在懸崖上，令鷹啄食他的肝臟，以示懲罰。——第 720 頁。

十三画

該隱——據聖經說是亞當的長子，出於嫉妒殺死了自己的弟弟亞伯。——第 661 頁。

福斯泰夫——莎士比亞一些著作（“溫莎的風流娘兒們”、“亨利四世”）中的人物，愛吹牛的懦夫，諸謔者，酒徒。——第 405、410、416、419、427、439、441、453、455、458、459、489、520、544、603、609、613、620、666、674、697 頁。

奧菲士——按希臘神話是位詩人和歌唱家，他的歌聲使猛獸俯首，頑石點頭；他曾參加亞爾古船英雄們尋求金羊毛的遠航。——第 605 頁。

奧狄浦斯——古希臘神話特維城志中的主人公，索福克勒斯悲劇中的主要角色；據傳說，他猜中了斯芬克斯的謎語，因而使特維城逃脫了吸血怪物的毒手。——第 604 頁。

十四画

瑪麗花——歐仁·蘇的小說“巴黎的秘密”中的女主人公，是一個在罪犯中長大的姑娘，但保持了高貴的品德和少女的純潔；作者給她取了一個花名，即百合花，因為百合花長在污泥中，但花瓣潔白耀眼。——第 728 頁。

十五画

摩西——據聖經說摩西是從埃及法老的迫害下解救了古猶太人的先知（“出埃及記”）。——第 658、661 頁。

潑息·霍士潑（霍士潑字面意義為“急性

人”)——莎士比亚的历史剧“理查二世”和“亨利四世”中的人物;一个充滿热情的勇敢高貴騎士的典型。——第472頁。

潘塔隆——意大利民間假面喜劇中的人物,威尼斯商人,一个富有、吝嗇而又愚蠢的老头儿。——第666頁。

潘奇——英国民間木偶喜劇中的人物;他背駝,鼻长,好鬧,滑头和愛說俏皮話。——第651頁。

潘奇內洛——意大利假面喜劇中的人物,好說俏皮話和愛插科打諢。——第491頁。

十六画

錫侖——按希腊神話是酒神狄奧尼蘇斯的同伴。——第426、458、612頁。

十七画

賽克斯,比耳——狄更斯的小說“奧利佛尔”中的角色;强盜。——第455頁。

十九画

靡菲斯特斐勒司——歌德的悲劇“浮士德”中的主要人物之一。——第637頁。

期 刊 索 引

二 画

- “十字报”(《Kreuz-Zeitung》)——見“新普魯士报”。
- “人民报”(《Volks-Zeitung》)——柏林出版。——第401、457、516、649、756、766、769頁。
- “人民报”(《The People's Paper》)——倫敦出版。——第507、739、748、757頁。
- “人民报”(《Das Volk》)——倫敦出版。——第417、508—511、519、522、582、583、653、654、682、693、694—696、743、745、758、761—763頁。

三 画

- “小报”(《Tablet》)——倫敦出版。——第540頁。
- “大胡蜂”(《Die Hornissen》)——加塞尔出版。——第509頁。
- “工人共和国报”(《Republik der Arbeiter》)——紐約出版。——第439頁。

四 画

- “月刊”(《Monatsschrift》)——見“德国月刊”。
- “比利时独立报”(《L'Indépendance belge》)——布魯塞尔出版。——第613、619、746頁。
- “巴尔的摩警钟报”(《Baltimore Wecker》)

——第486頁。

- “日内瓦报”(《Journal de Genève》)——第723頁。
- “日内瓦評論和瑞士报纸”(《Revue de Genève et Journal Suisse》)——第592、594、598、599、602、606—609、613、644頁。

五 画

- “电讯”(《Telegraph》)——見“每日电讯”。
- “世紀报”(《Le Siècle》)——巴黎出版。——第425、591、612頁。
- “石印通訊”(《Lithographierte Correspondenz》)——巴黎出版。——第591頁。
- “汉堡指南”(《Hamburger Anzeiger》)——第487頁。
- “立宪主义者报”(《Le Constitutionnel》)——巴黎出版。——第414、591、615頁。
- “加利尼亚尼信使报”(《Galignani's Messenger》)——巴黎出版。——第575頁。
- “民論报”(《L'Opinion nationale》)——巴黎出版。——第576、613、619、753頁。
- “民族报”(《Les Nationalités》)——巴黎出版。——第619頁。
- “北方日报”(《La Gazette du Nord》)——巴黎出版。——第421頁。
- “北部各省和加来海峡通报”(《Le Propa-

- gateur du Nord et du Pasde-Calais》)
——利尔出版。——第 613 頁。
“布拉格报”(《Prager Zeitung》)——第 575 頁。
“布勒斯劳报”(《Breslauer Zeitung》)——第 647、649 頁。
“布里西亚省报”(《Giornale della provincia Bresciana》)——第 285 頁。

六 画

- “刑法报”(《Criminal-Zeitung》)——見“美文学杂志和紐約刑法报”。
“农村和城市总汇报”(《Journal Général de la Cour et de la Ville》)——巴黎出版。——第 140 頁。
“自由射手”(《Der Freischütz》)——汉堡出版。——第 652—654、756、770 頁。
“自由新聞”(《The Free Press》)——倫敦出版。——第 508、514、515、520、629、684、710、741、757、758、760、762 頁。
“西里西亚报”(《Schlesische Zeitung》)——布勒斯劳(弗罗茨拉夫)出版。——第 650 頁。
“西方先驅报”(《Herold des Westens》)——路易斯維耳出版。——第 474 頁。

七 画

- “希望报”(《L'Espérance》)——日内瓦出版。——第 611—613、619 頁。
“改革报”(《Die Reform》)——汉堡出版。——第 401、457、516、756、759、766、768、770 頁。
“时代呼声”(《Stimmen der Zeit》)——哥达出版。——第 519、751 頁。
“两大陆評論”(《Revue des deux Mondes》)——巴黎出版。——第 613、614 頁。
“社会辯論报”(《Le Débat social》)——布

- 魯塞尔出版。——第 746、747 頁。
“君士坦丁堡报”(《Journal de Constantinople》)——第 629 頁。
“每日电訊”(《Daily Telegraph》)——倫敦出版。——第 520、521、523、656—660、664、767 頁。
“每周邮报”(《Weekly Mail》)——倫敦出版。——第 658 頁。

八 画

- “青年意大利”(《La Jeune Italie》)——第 539 頁。
“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 Journal》)——第 455、723、724 頁。
“知識界晨报”(《Morgenblatt für gebildete Leser》)——斯图加特和杜宾根出版。——第 503 頁。
“阿尔高消息报”(《Aargauer Nachrichten》)——第 611 頁。
“宗教、哲学、政治、科学和文学界”(《L'Univers religieux, philosophique, politique, scientifique et littéraire》)——巴黎出版。——第 424、425 頁。
“波斯特伊里”(《Der Postheirid》)——左洛图恩出版。——第 612 頁。
“波罗的海月刊”(《Baltische Monatschrift》)——里加出版。——第 662 頁。
“国家报”(《Le Pays》)——巴黎出版。——第 615 頁。
“国民报”(《National-Zeitung》)——見“瑞士国民报”。
“国民报”(《Le National》)——巴黎出版。——第 642 頁。
“国民报”(《National-Zeitung》)——柏林出版。——第 401、457、466、506、516、520、521、647—649、660、675、676、681、

682、684、688、689、691、696、701—703、
705、707、709、711—715、748、751、765、
767、770、771 頁。

九 画

“独立报”（《L'Indépendant》）——日内瓦
出版。——第 434、718 頁。

“前进”（《Vorwärts》）——萊比錫出版。
——第 117 頁。

“祖国报”（《La Patrie》）——巴黎出版。
——第 601、615 頁。

“欧洲评论”（《Revue européenne》）——巴
黎出版。——第 614 頁。

“纪事晨报”（《The Morning Chronicle》）
——倫敦出版。——第 619 頁。

“科伦日报”（《Kölnische Zeitung》）——第
437、438、519、520、655、656、662、729、
733、746、757、766、769 頁。

“星期日邮报”（《Courrier du Dimanche》）
——巴黎出版。——第 749 頁。

“思想和行动”（《Pensiero ed Azione》）
——倫敦出版。——第 550、551、583、
631 頁。

“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Belletristisches Journal und New-Yorker Criminal-Zeitung》）——第 448、628、629、726
頁。

“总汇报”（《Allgemeine Zeitung》）——奧
格斯堡出版。——第 401、404、418、
440、455、457、459、461、489、501—505、
510—513、516—519、521、523—525、
582、590、592、616、617、652、653、662、
663、675—677、679、683、684、688、689、
691、693、694、696、701—704、742、
743、746、755、756、759—769、771、772
頁。

“总汇通报”（《Le Moniteur universel》）

——巴黎出版。——第 159、484、495、
509、527、528、551、558—561、586、644、
750、765 頁。

“柏林军事周刊”（《Berliner Militär-Wochenschrift》）——第 442 頁。

“柏林政治和学术问题王国特权报”
（《Königlich privilegierte Berlinische Zeitung von Staats-und gelehrten Sachen》）——第 449 頁。

“政论家”（《Publicist》）——柏林出版。
——第 734 頁。

“政治和文学辩论日报”（《Journal des Débats politiques et littéraires》）——
巴黎出版。——第 614 頁。

“政治、文学、科学和艺术星期六评论”
（《Saturday Review of Politics, Literature, Science and Art》）——倫敦出版。
——第 606、657 頁。

十 画

“海尔曼”（《Hermann》）——倫敦出版。
——第 508、737、758 頁。

“泰晤士报”（《The Times》）——倫敦出
版。——第 539、555、577、601、605、
627、655、743 頁。

“格拉斯哥哨兵”（《The Glasgow Sentinel》）
——第 507、631 頁。

“纽约时报”（《The New-York Times》）——
第 757 頁。

“纽约刑法报”（《New-Yorker Criminal-Zeitung》）——見“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

“纽约幽默家”（《New-Yorker Humorist》）
——第 409 頁。

“纽约每日论坛报”（《New-York Daily Tribune》）——第 505、507、626、629、
681、748、749、756、757 頁。

十一画

- “晨星报”(《*The Morning Star*》)——倫敦出版。——第 508 頁。
- “推銷員”(《*Коммивояжер*》)——見“瑞士商业信使报”。
- “通訊員”(《*Correspondent*》)——見“德国通訊員”。
- “寄語人民”(《*Notes to the People*》)——倫敦出版。——第 748 頁。
- “現代評論”(《*Revue contemporaine*》)——巴黎出版。——第 420、480、502、585、613、614、617、647 頁。
- “商业信使报”(《*Handels-Courier*》)——見“瑞士商业信使报”。
- “曼彻斯特卫报”(《*The Manchester Guardian*》)——第 751 頁。
- “勒芒湖信使报”(《*Le Messager du Léman*》)——日內瓦出版。——第 444 頁。
- “笨拙，或倫敦喧声”(《*Punch, or the London Charivari*》)——第 651 頁。
- “彗星。知識界茶話报”(《*Der Komet. Unterhaltungsblatt für gebildete Stände*》)——萊比錫出版。——第 117 頁。
- “設菲尔德自由新聞报”(《*The Sheffield Free Press*》)——第 508 頁。
- “晚报”(《*Abend-Zeitung*》)——德勒斯頓和萊比錫出版。——第 117 頁。
- “晚邮报。民主派报纸”(《*Abend-Post. Demokratische Zeitung*》)——柏林出版。——第 410、483 頁。

十二画

- “喧声”(《*Kladderadatsch*》)——柏林出版。——第 651 頁。
- “喧声”(《*Rummeltipuff*》)——日內瓦出版。——第 408、410、422 頁。

- “湖濱小报”(《*Seeblätter*》)——康斯坦茨出版。——第 436 頁。
- “联邦报”(《*Der Bund*》)——伯尔尼出版。——第 582 頁。
- “联邦射手节通报”(《*Journal du tir fédéral*》)——第 719 頁。
- “莱茵国民大厅”(《*Rheinische Volks-Halle*》)——科倫出版。——第 655 頁。
- “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 Handel und Gewerbe*》)——科倫出版。——第 501 頁。
- “普魯士报”(《*Die Preussische Zeitung*》)——柏林出版。——第 662 頁。
- “普魯士周刊”(《*Preussisches Wochenblatt*》)——柏林出版。——第 536 頁。
- “普特南氏月刊”(《*Putnam's Monthly*》)——紐約出版。——第 749 頁。

十三画

- “福斯报”(《*Vossische Zeitung*》)——見“柏林政治和学术問題王国特权报”。
- “經濟学家”(《*The Economist*》)——倫敦出版。——第 558 頁。
- “奧格斯堡报”(《*Аугсбургская газета*》)——見“总汇报”。
- “瑞士民族报”(《*La Nation suisse*》)——日內瓦出版。——第 613 頁。
- “瑞士国民报”(《*Schweizerische National-Zeitung*》)——巴塞尔出版。——第 723 頁。
- “瑞士联邦报”(《*Eidgenössische Zeitung*》)——苏黎世、伯尔尼出版。——第 582 頁。
- “瑞士商业信使报”(《*Schweizer Handels-Courier*》)——俾尔出版。——第 405、417、509、512、524、597、603、604、609、613、681、739、765 頁。

“新时代”(《Die Neue Zeit》)——倫敦出版。——第 508 頁。

“新奧得報”(《Neue Oder-Zeitung》)——布勒斯勞(弗罗茨拉夫)出版。——第 650、679 頁。

“新瑞士報”(《Neue Schweizer Zeitung》)——日內瓦出版。——第 591—593 頁。

“新普魯士報”(《Neue Preußische Zeitung》)——柏林出版。——第 457、473、494、661、663、672、673、692 頁。

“新德意志報”(《Neue Deutsche Zeitung》)——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第 483 頁。

“新蘇黎世報”(《Neue Zürcher-Zeitung》)——第 604 頁。

“新漢諾威報”(《Neue Hannoversche Zeitung》)——第 691 頁。

“新萊茵報”(《Новая Рейнская газета》)——見“新萊茵報。民主派機關報”。

“新萊茵報評論”(《Revue der Neuen Rheinischen Zeitung》)——見“新萊茵報。政治經濟評論”。

“新萊茵報。民主派機關報”(《Neue Rheinische Zeitung. Organ der Demokratie》)——科倫出版。——第 405、419、436、458、491—495、501、552、648—651、655、665、676、680、689、694、695、700、706、709、712、746、757、758 頁。

“新萊茵報。政治經濟評論”(《Neue Rhei-

nische Zeitung. Politisch-ökonomische Revue》)——倫敦、漢堡出版。——第 466、477、479、483、484、489、499、500、506 頁。

十 四 画

“演員”(《The Players》)——倫敦出版。——第 658 頁。

“窩州新聞”(《Nouvelles Vaudoises》)——洛桑出版。——第 604、619 頁。

十 五 画

“論壇報”(《Tribune》)——見“紐約每日論壇報”。

“德國月刊”(《Deutsche Monatschrift》)——斯圖加特出版。——第 488、519、751 頁。

“德國通訊員”(《Der Deutsche Correspondent》)——巴爾的摩出版。——第 484 頁。

“德勒斯頓日報”(《Dresdner Zeitung》)——第 728、734 頁。

十 八 画

“薩瓦愛國者”(《Le Patriote savoisien》)——莎姆伯里出版。——第 597 頁。

“薩克森祖國報”(《Sächsische Vaterlandsblätter》)——德勒斯頓和萊比錫出版。——第 117 頁。

地名索引*

二 画

卜留姆——德国的一个居民点。——第 419 頁。

三 画

凡尔赛——巴黎的郊区。——第 95 頁。
 干地亚(伊腊克利昂)——第 335 頁。
 万第省——第 95 頁。
 万茨貝克——第 652、654 頁。
 土倫——第 142、296、562 頁。
 土魯斯——第 297 頁。
 土尔高——瑞士的州。——第 501、577、598 頁。
 上秘魯——見玻利維亞。
 上阿薩姆——第 287 頁。
 上士瓦本——公国。——第 569 頁。
 上恩加丁——瑞士的区。——第 461 頁。
 下埃及——地区。——第 6 頁。
 下秘魯(秘魯)——第 237、238 頁。
 下克賴恩——第 178 頁。
 下比利牛斯省——第 138、157 頁。
 下夏朗德省(海濱省)——第 224 頁。
 小亞細亞——第 24、298、299 頁。

小俄罗斯——見烏克蘭。
 小卡比利亚——見卡比利亚。
 小喀布尔山口(小喀布尔)——第 84 頁。
 小貝耳特海峽——第 92 頁。
 大西洋——第 383、479、490 頁。
 大貝倫——柏林附近的一个居民点。——第 165 頁。
 大呂恩山——在西班牙。——第 269 頁。
 大貝耳特海峽——第 160 頁。
 大伯納德山口——見大聖伯納德山口。
 大聖伯納德山口——在阿尔卑斯山。——第 579 頁。

四 画

中国——第 145、193、194、287、289、290—293、396 頁。
 牛津——第 190 頁。
 文洛——第 282 頁。
 扎布——第 101、109 頁。
 夫賴堡——第 430 頁。
 牙买加島——第 230 頁。
 丰特努瓦——比利时的一个居民点。——第 74 頁。
 尤斯特林(科斯特申)——第 336 頁。

* 括弧中是现代地图上的名称,在正文中看不出所在地点的地名,則加有簡短的說明。

用黑斜体字排印的頁碼表示:这一地名在本頁中作为会战地点和国际条約簽訂地点,同时在正文中或注釋中有相应的說明。——編者注

- 丹第——第 417、420 頁。
- 丹宁科夫——德国的一个居民点。——第 312 頁。
- 不来梅——第 449、474、727 頁。
- 不倫瑞克——第 112、567、576 頁。
- 开封府(开封)——第 145、193 頁。
- 开伯尔山口——第 84 頁。
- 木尔河——第 64 頁。
- 木耳德河——第 179、180 頁。
- 孔岑多夫(德罗哥斯拉夫)——西里西亚的一个居民点。——第 176 頁。
- 孔迪納馬卡省——第 229 頁。
- 韦廷——第 180 頁。
- 韦耳河——第 188 頁。
- 韦尔杜——第 185 頁。
- 厄尔巴島——第 71、94、98、120 頁。
- 厄勒布魯——第 162、164 頁。
- 厄尔士山脉——第 178、567 頁。
- 太子港——第 231 頁。
- 太平洋——第 479 頁。
- 太晤士河——第 656 頁。
- 切斯特——第 280、472 頁。
- 切尔西——倫敦的区。——第 63 頁。
- 切尔克西亚——第 507、544、549、629、630、635 頁。
- 日内瓦——第 404—409、417—420、422、425、432—434、439、440、443、444、446—448、452、455、456、458、461、462、489、503、506、507、514、523、526、576、577、579、583、585、588、591、592、597—599、601—603、605—608、610、611、623、633、638—640、642—647、676、683、689、692、696、709、717—719、722—726、741、751、752、762 頁。
- 日内瓦州——第 408、441、609、719 頁。
- 日内瓦湖——第 407、603、640 頁。
- 什普留根山口——在阿尔卑斯山。——第 580 頁。
- 什列斯維希——第 166 頁。
- 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第 419、540 頁。
- 比斯科拉——第 101 頁。
- 比里阿图——第 269 頁。
- 比利牛斯半島——第 296 頁。
- 比利牛斯山脉——第 136 頁。
- 比达索阿河——第 264—269 頁。
- 比耳多克斯——第 269 頁。
- 比贊貝尔格山——第 64、65 頁。
- 比碩夫斯韦尔达——德国的一个居民点。——第 178 頁。
- 巴西——第 239、297 頁。
- 巴薩——第 195 頁。
- 巴黎——第 71、98、108、119、120、133、138、140—142、158、161、162、166、177、182—185、187、188、190 (1814 年条約)、191、221、225、241、348、349、406、409、412、415、417、420、421、437—443、446、449、463、464、473、474、480、486、489、502、504、530、533、534、540、556、557、559、561、562 (1856 年条約)、563、573、575—577、579、586、590、598—601、603、604、606、612—614、621、626、628、629、631、639、641—644、646、663、664、677、678、680、683、695、709、711、726、728、729、731、734、746、747、751、753 頁。
- 巴登——第 406、431、465、495、569、728、734 頁。
- 巴登-巴登——第 753 頁。
- 巴比倫——第 328、660 頁。
- 巴納特——历史区。——第 135 頁。
- 巴耳赫——位于土尔克斯坦南部的一个国家。——第 77 頁。
- 巴塞尔——第 175、338、439、447、448、

529、720、721、723 頁。
 巴塞洛納——委內瑞拉的城市和省。——
 第 227、229、232 頁。
 巴伐利亞——第 97、256、257、548、569、
 684 頁。
 巴里馬省——第 235 頁。
 巴倫西亞——第 229、232、236、237 頁。
 巴達霍斯——第 53、54 頁。
 巴尔勒杜克——第 339 頁。
 巴赫契薩賴——第 55 頁。
 巴斯克地区(巴斯克)——第 264 頁。
 巴拿馬——第 238 頁。
 巴拿馬地峽——第 236、237、750 頁。
 巴拉克拉瓦——第 63、138、318、321 頁。
 巴拉吉薩爾——喀布尔的郊区。——第
 83 頁。

五 画

包岑——薩克森的一个居民点。——第
 93、176、178、179 頁。
 发格河——第 637 頁。
 立陶宛——第 113 頁。
 左阿德奇——第 109 頁。
 甘达馬克——第 85 頁。
 瓜阿基尔——第 237 頁。
 丘基薩卡(苏克累)——玻利維亞的省。
 ——第 173 頁。
 叶夫帕托利亞——第 55 頁。
 札格达拉克山口(札格达拉克)——在阿
 富汗。——第 84 頁。
 白沙瓦——第 77、79、80、84、85 頁。
 白美因河——第 567 頁。
 北海——第 103、171、383、567 頁。
 北德平原——第 526、566 頁。
 东瓜——第 290 頁。
 东印度——第 530、531 頁。
 卢果日——第 135 頁。

卢森堡——第 175 頁。
 卢卑克——第 160、175—176 頁。
 兰斯——第 187—189 頁。
 兰道——第 342 頁。
 兰格尔——城市和高原。——第 187、190
 頁。
 汉堡——第 114、119、120、142、176、274、
 466、544、735、756 頁。
 汉諾威——第 112、159、454、512、529、
 541、567、569、576 頁。
 汉普斯泰特——倫敦附近的一个居民点。
 ——第 503 頁。
 皮蒙特——第 141、142、315、374、529—
 532、539、551、555、562、565、571、575、
 579、581—583、598—602、610、613、647
 頁。
 皮卡尔第——历史区。——第 367 頁。
 皮斯托亚——第 28 頁。
 皮尔馬森斯——第 206 頁。
 印度——第 76、78—82、84、85、193、194、
 288、292、294、296、317、383、558 頁。
 印度河——第 6、77、79、81、358 頁。
 印度洋——第 76、287 頁。
 印度斯坦半島——第 78、291 頁。
 印度支那半島——第 327 頁。
 印斯特堡(切尔尼亚霍夫斯克)——第 92
 頁。
 尼翁——第 620 頁。
 尼斯——第 434、505、574、575、583—
 585、598、600、602、603、606、615 頁。
 尼罗河——第 5、77 頁。
 尼門河——第 112、242 頁。
 尼尼微——古代城市。——第 328 頁。
 尼姆韦根(奈梅根)——第 281 頁。
 弗兰德——历史区。——第 170、171、
 256、281、282、364 頁。
 弗略留斯——第 157 (1794 年会战)、281

- 頁。
- 弗里斯兰省——第 281、283 頁。
- 弗里德兰德(普拉夫丁斯克)——第 114、136、205 頁。
- 弗里德里希斯哈姆(哈密納)——第 163 頁。
- 弗劳施塔特(弗斯霍瓦)——第 406 頁。
- 弗雷德里克施塔德——第 166 頁。
- 加来——第 170 頁。
- 加兹尼——第 77、80、81 (1839 年强攻)、84 (1842 年軍事行动) 頁。
- 加塞尔——第 281、509 頁。
- 加迪斯——第 173、226、230 頁。
- 加根瑙(阿格諾)——第 338 頁。
- 加里西亚——第 132、543、545—547、549、571 頁。
- 加斯科尼——历史区。——第 367 頁。
- 加拉加斯——第 225、227—229、234、237、239—241 頁。
- 加尔查河——第 284 頁。
- 加尔西亚-埃尔南迪斯——第 325 頁。
- 加利福尼亚——第 479、555 頁。
- 瓦豪——德国的一个居民点。——第 321、323 頁。
- 瓦得(窩州)——瑞士的州。——第 620、643 頁。
- 瓦兰壬——瑞士的一个居民点。——第 97 頁。
- 瓦滕堡——第 179 頁。
- 瓦特福德郡——第 297 頁。
- 瓦格拉姆——第 97、155、161、205、219、323 頁。
- 瓦納日里斯山脉——在阿尔及利亚。——第 99 頁。
- 瓦拉河——第 142 頁。
- 瓦拉儿亚——第 134、536—539、541、560、564、565 頁。
- 瓦尔那——第 63 頁。
- 瓦尔德克——德国的一个居民点。——第 567 頁。
- 瓦尔迪奥——波的尼亚灣中的一个島。——第 295 頁。
- 瓦尔施塔特(列格尼茨凱地区)——西里西亚的一个居民点。——第 305 頁。
- 圣亚田——第 576 頁。
- 圣丹尼——比利时的一個居民点。——第 281 頁。
- 圣烏昂——法国的一个居民点。——第 185 頁。
- 圣卡洛斯——南美洲的一个居民点。——第 235、236 頁。
- 圣海倫島——第 92、143、159 頁。
- 圣布勒茲——瑞士的一个居民点。——第 610 頁。
- 圣迪济埃——第 190 頁。
- 圣埃尔耶(圣赫尔耶尔)——第 471、545 頁。
- 圣塞瓦斯田——第 264、268 頁。
- 圣萊昂納茲——英国的一个居民点。——第 514 頁。
- 圣伯納德山口——見大圣伯納德山口。
- 圣彼得堡——第 113、132、164、662 頁。
- 圣彼德罗——南美洲的一个居民点。——第 225、240 頁。
- 圣让德呂茲——第 264、268 頁。
- 圣让得阿克(阿克)——第 136 頁。
- 圣馬特欧——委內瑞拉的一个居民点。——第 226 頁。
- 圣馬尔塔——第 225、229、230 頁。
- 圣馬尔西亚耳山脉——在西班牙。——第 267、269 頁。
- 卡昂——第 119 頁。
- 卡倫——第 247 頁。
- 卡普亚——第 303 頁。

卡柏略港——第 226、227、229、237、238 頁。

卡比利亚——历史区。——第 109、138、223 頁。

卡列里亚——第 92 頁。

卡斯特尔——第 274 頁。

卡魯帕諾——第 229、231 頁。

卡茨巴赫（卡查瓦）河——在西里西亞。——第 177—178、191 頁。

卡皮托里山——在羅馬。——第 19 頁。

卡耳瓦多斯省——第 140 頁。

卡塔黑納——第 226、227、229、230、236、237、239 頁。

卡塔卢尼亚——西班牙的区。——第 221 頁。

卡拉庫塔——第 240 頁。

卡拉博索——第 228、233、235 頁。

卡拉博博——第 236 頁。

卡拉米特灣——第 55 頁。

卡尔斯——第 507、562、739 頁。

卡尔斯堡（阿尔巴-尤利亚）——第 134 頁。

卡尔斯卢厄——第 728 頁。

卡尔斯巴德（卡罗維发利）——第 94 頁。

布达——今布达佩斯的右岸部分。——第 270、271—273 頁。

布倫——第 142、311、378、387、412、562 頁。

布隆（布尔諾）——第 159 頁。

布累——第 221 頁。

布累丁——第 179 頁。

布日伊——第 100、107 頁。

布日伊灣——第 100 頁。

布尔日——第 133 頁。

布尔果斯——第 136 頁。

布雷达——第 282、339 頁。

布雷根茨——第 579 頁。

布萊頓——第 730 頁。

布萊斯高——地理区域。——第 569 頁。

布拉格——第 548 頁。

布拉亨斐特——德国的一个居民点。——第 181 頁。

布魯塞尔——第 465、556、680、746、747 頁。

布魯赫薩尔——第 410 頁。

布里恩——第 119、182、183 頁。

布里恩-拉-維伊——第 183 頁。

布里夫-拉-盖阿尔德——法国的一个居民点。——第 140、143 頁。

布里西亞（較确切的称呼：布雷夏）——城市和省。——第 284—286 頁。

布列塔尼——第 141 頁。

布柯維納——第 134、565 頁。

布勒斯劳（弗罗茨拉夫）——第 406、496、649—651 頁。

布加勒斯特——第 164、537、538、564 頁。

布宜諾斯艾利斯——第 296 頁。

布倫海姆或布林德海姆——第 256—257 頁。

六 画

考布——德国的一个居民点。——第 182 頁。

老撾——地区。——第 289 頁。

圭亚那——第 233 頁。

地中海——第 6、17、99、101—103、270、301、382、479、530、531、533、535 頁。

好望角——第 296 頁。

伍斯特——英国的一个居民点。——第 280 頁。

匈牙利——第 30、135、271、272、313、369、403、494、495、507、514、515、544—547、551、557、565、570、590、624—628、631、632、634、635、638、655、668、741、

- 752、753、758、760、762 頁。
- 因克尔芒——第 42、139 頁。
- 当卡斯特——英国的一个居民点。——第 280 頁。
- 危地馬拉——第 239 頁。
- 朴次茅斯——第 274、347 頁。
- 交趾支那(南部)——印度支那的省。——第 551 頁。
- 伏伊伏迪納——地区。——第 635 頁。
- 朱尔朱腊山脉——在阿尔及利亚。——第 99 頁。
- 兴都庫什山脉——第 76、77 頁。
- 米兰——第 96、158、334、561、609、626 頁。
- 米卡列角(薩姆松山)——第 8 頁。
- 华沙——第 113、119、132、133(1831 年强攻)、540(1850 年談判)、542 頁。
- 华盛頓——第 735 頁。
- 伐耳赫倫島——第 136、161 頁。
- 伐利亚多利德——第 136 頁。
- 吉森——第 497 頁。
- 吉倫特——法国的省。——第 140 頁。
- 吉約姆山——法国的一个居民点。——第 195 頁。
- 达普谷地——第 577、578 頁。
- 达尔馬威亚——历史区。——第 64 頁。
- 达达尼尔海峡——第 152 頁。
- 列日——第 282 頁。
- 列里达——第 221 頁。
- 列姆堡(里沃夫)——第 132、133 頁。
- 列夫克特累——希腊的一个居民点。——第 13、74 頁。
- 艾盖尔河——第 547、548 頁。
- 艾契(阿迪杰)河——第 529 頁。
- 艾布基尔——第 136 頁。
- 艾登科本——第 175 頁。
- 艾阿庫裘——秘魯的城市和省。——第 172—173 頁。
- 托恩(托倫)——第 93、160 頁。
- 托农(托农-勒-班)——第 605、606 頁。
- 托尔高——第 274 頁。
- 托尔托薩——第 221 頁。
- 托列斯-維德拉斯(托列治-維德拉什)——第 352 頁。
- 托斯卡納——地区。——第 28、599 頁。
- 西头——倫敦的区。——第 503、654 頁。
- 西藏——第 287 頁。
- 西兰島——丹麦群島中的一个島。——第 160 頁。
- 西印度——第 296 頁。
- 西西里島——第 382、530 頁。
- 西里西亚——第 27、174、176、177、305、309、542、547—549 頁。
- 多尔芒——法国的一个居民点。——第 185 頁。
- 多伊茨——第 274 頁。
- 多恩堡——德国的一个居民点。——第 159、160 頁。
- 多腊河(多腊-里帕里亚河)——在意大利。——第 579 頁。
- 多瑙河——第 64、65、152、155、164、256、270、272、353、539、541、549、637 頁。
- 多瑙河各公国——見莫尔达維亚和瓦拉几亚。
- 安納河——第 188、189 頁。
- 安大略湖——在美国。——第 248 頁。
- 安哈尔特——邦。——第 567 頁。
- 安特卫普——第 144、161、335、336、469、555、654、680 頁。
- 安斯巴赫——德国的一个居民点。——第 175 頁。
- 安哥斯土拉(玻利瓦尔城)——第 233—235 頁。
- 亚田——見圣亚田。

亚述——第 6 頁。
 亚琛——第 439 頁。
 亚波(土尔庫)——第 164、165、166 頁。
 亚德灣——第 532、566 頁。
 阿尔薩斯——第 547 頁。
 亚拉巴馬州——第 154 頁。
 亚克薩尔特河(錫尔河)——第 358 頁。
 伊龙——第 264 頁。
 伊万城——第 542 頁。
 伊利湖——在美国。——第 248 頁。
 伊赫劳(伊赫拉伐)——第 159 頁。
 伊扎尔河——第 64 頁。
 伊克尔恩——德国的一个居民点。——
 第 665、667、673 頁。
 伊洛瓦底江——第 287、289、293 頁。
 伊德施太特——德国的一个居民点。——
 第 409 頁。
 伊奥尼亚群島——第 530 頁。
 伊斯利——摩洛哥的一个居民点。——
 第 222—223 頁。
 伊斯的利亚省——第 158 頁。

七 画

希腊——第 9、10、12、14、16、25、299、
 301、328、335、357、382、538 頁。
 灵堡——第 282 頁。
 但澤(格但斯克)——第 114 (1807 年圍
 攻)、132 (1813 年圍攻)、344 頁。
 努米迪亚——北非古国。——第 23 頁。
 佛日——第 182 頁。
 佛西尼——第 583、600、601、603、607、
 743 頁。
 肖蒙——第 182、190 頁。
 肖美尼耳——法国的一个居民点。——
 第 183 頁。
 平——瑞士的一个居民点。——第 366
 頁。

劳特尔堡(洛特布尔)——第 547 頁。
 杜宾(迪宾)——德国的一个居民点。——
 第 180 頁。
 杜塞尔多夫——第 731 頁。
 辛普朗山口——第 579、601、743 頁。
 辛特拉——葡萄牙的一个居民点。——
 第 296 頁。
 坎訥(坎涅)——意大利的一个居民点。
 ——第 73、303—304 頁。
 坎大哈——城市和省。——第 77、79—
 81、84、85 頁。
 君士坦丁——城市和省。——第 100、
 101、107—110 頁。
 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第 103、
 104、142、383、537、539、541、565、627—
 630、654 頁。
 沙布累——第 583、600、601、603、607、
 743 頁。
 沙勒罗瓦——第 120 頁。
 那慕尔——第 282 頁。
 那累夫河——第 113、133 頁。
 那不勒斯——第 43、530、531、539 頁。
 吕本——第 549 頁。
 吕根島——第 142、174 頁。
 吕伐登——尼德兰的一个居民点。——
 第 282 頁。
 吕特岑——在薩克森。——第 34 (1632
 年会战)、136、137 (1813 年会战)、176、
 181、312 頁。
 苏瓦松——法国的一个居民点。——第
 188、189 頁。
 苏格兰——第 60、61、171、247、386、630
 頁。
 苏黎世——第 435、457、461、462、482、
 485、502、511、608 頁。
 苏伊土地峽——第 530 頁。
 麦生——第 180 頁。

- 麦茨——第 138、348 頁。
麦土河——第 281 頁。
麦提扎平原——在阿尔及尔。——第 101 頁。
伯納丁(圣伯納迪諾)山口——在阿尔卑斯山脉。——第 580 頁。
伯桑松——第 418、433、436、467、468、469 頁。
伯热尔——法国的一个居民点。——第 185、186 頁。
伯尔尼——第 431、434、460—462、509、524、579、582、584、598、599、601、602、604—607、644、646、718、719、720、721、723、751 頁。
伯尔尼——瑞士的一个州。——第 141、501、576、583、585、592、609、642 頁。
利尼——比利时的一个要塞。——第 191、325 頁。
利多——第 335 頁。
利馬——第 237、238 頁。
利珀河——第 567 頁。
利物浦——第 419、490 頁。
利沃尼亚——第 92 頁。
利貝罗澤——第 549 頁。
沃尚——法国的一个居民点。——第 186 頁。
沃倫——第 314 頁。
沃利亚——华沙附近的一个居民点。——第 133 頁。
沃尔塔河——第 141—142 頁。
沃伊納河——在博罗迪諾附近。——第 261 頁。
沃庫略尔——法国的一个居民点。——第 182 頁。
沃耳加斯特——第 164 頁。
沃斯特罗侖卡——第 133 頁。
里海——第 113 頁。
里昂——第 120 頁。
里米尼——第 197 頁。
里沃利——第 95、136、141 頁。
里斯本——第 168、169 頁。
里帕赫——第 137 頁。
里摩日——法国的一个居民点。——第 221、224 頁。
里馬索姆巴特(里馬夫斯卡-索博塔)——第 637 頁。
貝云——第 90、264、297 頁。
貝腊——第 264、267、268 頁。
貝里-奧-巴克——法国的一个居民点。——第 188 頁。
貝亨-沃普-索姆——第 282 頁。
貝耳特——見大貝耳特海峽。
貝恩布克——第 180 頁。
貝奧提亚——希腊的一个地区。——第 10、299 頁。
貝尔加莫——第 284 頁。
貝尔格萊德——第 270 頁。
貝薩拉比亚——第 115、537、565 頁。
克尔——第 274 頁。
克朗——法国的一个居民点。——第 188、189 頁。
克萊納——历史区。——第 64 頁。
克魯瓦-德-布克——第 269 頁。
克什米尔——第 76 頁。
克倫地亞——第 549 頁。
克罗奇(克罗托希策)——第 177、178 頁。
克罗地亚——第 635 頁。
克雷西——法国的一个居民点。——第 26、73 頁。
克雷莫納——第 284 頁。
克拉科夫——第 533、534、552 頁。
克拉科夫共和国——第 533 頁。
克里木——第 42、43、55、59、208、407、536、560、561、594 頁。

克里特島——第 10 頁。
 克里布洛維茨——西里西亞的一個居民點。——第 174 頁。
 克利斯提阿納(奧斯陸)——第 166 頁。

八 画

阜姆(里耶卡)——第 633 頁。
 卑謬——緬甸的一個居民點。——第 290 頁。
 帖津——第 85 頁。
 林茨——第 65、347、348、548 頁。
 肯特——第 296 頁。
 奈塞河(尼斯河)——第 177、178 頁。
 明喬河——第 505、668 頁。
 易北河(拉巴河)——第 165、175、177、178—180、242、274、383、548、549 頁。
 京斯敦——第 230、231 頁。
 金布恩——第 391 頁。
 尚波貝爾——法國的一個居民點。——第 185、186 頁。
 杰爾賓特——第 113 頁。
 委內瑞拉——第 225、226、228、230、231、234—238、240 頁。
 昂格呂爾——法國的一個居民點。——第 187 頁。
 直布羅陀——第 195、531 頁。
 法爾西斯坦(法爾斯)——歷史區。——第 7 頁。
 岡德斯霍特(昂德斯科特)——第 140 頁。
 孟買——第 82 頁。
 孟加拉——第 289 頁。
 彼得堡——見聖彼得堡。
 彼得斯堡——德國的一個居民點。——第 182 頁。
 佩斯——今布達佩斯左岸部分。——第 134、270、273、632、635、752 頁。
 佩斯州——第 270 頁。

佩魯賈——第 28 頁。
 居伊(尤伊)——比利時的一個居民點。——第 282 頁。
 居洛茲——第 580、581 頁。
 居塔希亞——第 546、624、625、627 頁。
 舍利夫(舍利夫河)——在阿爾及利亞。——第 99 頁。
 舍斯堡(錫吉希瓦腊)——第 135 頁。
 舍爾舍耳——第 101 頁。
 帕東省——第 291 頁。
 帕斯托——第 229、237 頁。
 帕維亞——第 31、60、367 頁。
 帕爾馬——第 530 頁。
 帕爾特河——在薩克森。——第 181 頁。
 帕勒帕邁塞斯山脈——第 77 頁。
 羅尼河——第 143 頁。
 羅韋雷托——意大利的一個居民點。——第 136 頁。
 羅馬尼亞——第 539 頁。
 羅提埃爾——見拉羅提埃爾。
 羅斯托克——第 174、191 頁。
 羅斯巴赫——第 310、318 頁。
 羅馬——國家和城市。——第 18、24、96、361、382、539、552、634 頁。
 羅馬區——第 162 頁。
 羅馬尼亞——第 563 頁。
 羅馬人的高盧——第 22 頁。
 羅馬帝國的多瑙河各省——第 24 頁。
 拉瓜拉——第 226、229 頁。
 拉波帕——在哥倫比亞。——第 230 頁。
 拉特考——第 160、176 頁。
 拉姆別薩(拉姆別茲)——第 101 頁。
 拉施塔特——第 158、348、485、734、737 頁。
 拉芒什海峽——第 170、171、490、531、682 頁。
 拉羅提埃爾——法國的一個居民點。——

- 第 183、184、190 頁。
拉-維利亞-德爾-諾爾特——第 231 頁。
拉普拉塔——第 239 頁。
拉普厄爾塔——第 228 頁。
拉費爾——法蘭西的一個居民點。——第 202 頁。
拉費爾-尚佩努瓦茲(費爾-尚佩努瓦茲)——法蘭西的一個居民點。——第 185 頁。
波河——第 595、665、758 頁。
波城——在法蘭西。——第 138、157 頁。
波恩——第 282、417、445 頁。
波爾多——第 173 頁。
波哥大——第 227、229、230、234、235、238—240 頁。
波茲南——第 348、543、545、570 頁。
波察洛——意大利的一個居民點。——第 141 頁。
波羅的海——第 92、169、567 頁。
波的尼亞灣——第 92、295 頁。
波斯(伊朗)——第 76、79—81、113、298、357 頁。
波斯尼亞——第 572 頁。
波希米亞——見捷克。
波希米亞山脈(捷克森林)——第 64 頁。
波美拉尼亞——第 164、174、176 頁。
波美拉尼亞沿海地區——第 548 頁。
阿肯——第 180 頁。
阿亞山——在西班牙。——第 267 頁。
阿累河(今威納河,拉瓦河)——第 114 頁。
阿托克——第 77 頁。
阿提卡——古希臘的一個地區。——第 10 頁。
阿富汗——第 76—79、81—85 頁。
阿賈德——第 624 頁。
阿薩姆——第 287 頁。
阿蘭群島——第 295 頁。
阿本斯堡——第 64(見注 53)、97 頁。
阿雷基帕——城市和省。——第 173 頁。
阿維尼翁——第 140—142 頁。
阿波耳達——第 159 頁。
阿斯佩恩——第 64—70、73 頁。
阿迭爾比(阿迭爾比耶夫卡)——高加索的一個居民點。——第 629、630 頁。
阿津庫爾——法蘭西的一個居民點。——第 26、60、73 頁。
阿克文庫姆——古代城市。——第 271 頁。
阿查古阿斯——第 234 頁。
阿德勒克拉——奧地利的一個居民點。——第 161 頁。
阿卡爾納尼亞——希臘的省。——第 10 頁。
阿特拉斯山脈——第 99、101 頁。
阿普雷河岸聖費南多(聖費南多)——第 235、236 頁。
阿瓦——第 288—290、293 頁。
阿瓦——王國。——見緬甸。
阿拉干——第 287 頁。
阿拉伯——第 298 頁。
阿勒河——第 603 頁。
阿勒頗(哈勒布)——第 135 頁。
阿利丹——阿富汗的一個居民點。——第 84 頁。
阿利康特——第 195 頁。
阿耳布埃拉——西班牙的一個居民點。——第 53—54、297 頁。
阿耳布埃拉河——第 53 頁。
阿爾澤——第 107 頁。
阿爾夫河——第 419 頁。
阿爾圭塔——第 229 頁。
阿爾馬——克里木的一個居民點。——第 56 頁。

阿尔馬河——第 55—59、138、594 頁。
 阿尔及尔——城市和省。——第 100—
 104、110、224 頁。
 阿尔及利亚——第 41、50、99—110、138、
 194、222—224、433 頁。
 阿尔貝雷(埃尔比勒)——第 16、17、27、
 300、304 頁。
 阿尔卡迪亚——希腊的一个地区。——
 第 13、451 頁。
 阿尔卑斯山脉——第 18、528、559 頁。

九 画

晋河——第 64 頁。
 恒河——第 287 頁。
 香港——第 662 頁。
 信德——第 76、81、82 頁。
 紅色土地——見威斯特伐里亚。
 柏林——第 116、406、443、448、449、451、
 458、505、510、548、573、648—650、660、
 661、669、670、672、673、675、676、678、
 679、681、682、685、688、697、702、715、
 716、732—734、751、767、771 頁。
 欧芬(老欧芬)——德国对布达城的称呼。
 ——第 270 頁。
 亲敦江——在緬甸。——第 287 頁。
 城堡山(沙什廷)——第 270 頁。
 迦太基——第 382 頁。
 突尼斯——城市和国家。——第 99 頁。
 幽里希——德国的一个居民点。——第
 157、336 頁。
 玻利維亞——第 173、238、239 頁。
 拜罗伊特——第 175 頁。
 迪昂維耳——法国的一个居民点。——
 第 183 頁。
 封丹-勒韦克——比时的一个居民点。
 ——第 120 頁。
 查姆帕尼尔——第 145 頁。

俄利諾科河——第 234、241 頁。
 英果尔施塔特——第 338 頁。
 革利夫斯瓦特——第 406 頁。
 南錫——第 467、469 頁。
 南安普頓——英国的一个居民点。——
 第 626 頁。
 胡宁——第 172 頁。
 胡安格里耶哥——第 229 頁。
 济腊(高迪-济腊)盐沼——在阿富汗。
 ——第 77 頁。
 济克馬林根——第 499 頁。
 叙拉古——第 11、276 頁。
 叙利亚——第 24、530、531 頁。
 契珀瓦河——第 74 頁。
 契維塔未克基亞——第 552 頁。
 哈雷——第 160、180、181 頁。
 哈根——第 674 頁。
 哈佛尔——第 721 頁。
 耶拿——第 136、160、175、191、376 頁。
 耶尔河——在法国。——第 186 頁。
 耶路撒冷——第 276 頁。
 勃固——緬甸的城市和省。——第 287、
 293 頁。
 勃艮第——历史区。——第 28 頁。
 勃兰登堡——第 548、549 頁。
 威尼斯——城市和共和国。——第 286、
 335、530、531、561、562、583 頁。
 威茲比奇——第 626 頁。
 威斯特伐里亚省——第 570、571、574、
 665、670—673 頁。
 美拉省——第 286 頁。
 美拉河——第 284 頁。
 美因河——第 567、568 頁。
 美因茲——第 182、187、274、567、663、
 頁。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第 118、458、467、
 483、492、493、499、589、619、652、660、

661、667、673、729、767 頁。
 洛迪——第 95、284 頁。
 洛特——法国的省。——第 136 頁。
 洛桑——第 451、452、454、456、488、511、589、597、654、692 頁。
 洛鮑島——多瑙河上的島，在維也納附近。——第 64、65、69、70 頁。
 洛斯-塔古阿涅斯——第 227 頁。
 施潘道——第 492 頁。
 施特廷(茲杰辛)——第 164、175、191 頁。
 施涅勒-得伊赫謝耳(斯科拉)河——在西里西亞。——第 178 頁。
 施托尔佩——第 548 頁。
 施拉赫坦——柏林附近的一个居民点。——第 142 頁。
 施魏德尼茨(斯維德尼察)——第 176 頁。
 施勒特斯塔特(塞累斯塔)——第 338 頁。
 施特里高(斯特舍哥姆)——第 310 頁。
 施特腊耳宗德——第 165 頁。
 施梯里亚——第 549 頁。
 施梯里亚阿尔卑斯山脉——第 549 頁。
 科林——第 122 頁。
 科倫——第 116、182、274、347、348、405、427、437—439、445、447、449—451、458、466、472、473、478、617、650、655、677—679、683、689、726、728、729、731—733、746、757、769 頁。
 科摩湖——在意大利。——第 580 頁。
 科馬尔——法国的一个居民点。——第 338 頁。
 科茨克——第 132 頁。
 科莫恩(科馬罗姆)——第 271、272、353、544、623、628、635—638 頁。
 科洛查(科洛奇)河——第 258—261 頁。
 科勒阿——阿尔及尔的一个居民点。——第 101 頁。
 科西嘉島——第 296 頁。

科多尼約——第 95 頁。
 科尔貝尼——法国的一个居民点。——第 189 頁。
 科布倫茨——第 182、274、348 頁。
 科希斯坦——历史区。——第 76 頁。
 科斯維希——德国的一个居民点。——第 734 頁。
 科魯尼亞(拉科魯尼亞)——第 169、170、296 頁。
 科尼斯堡(加里宁格勒)——第 348 頁。
 科尼斯瓦尔塔——德国的一个居民点。——第 93 頁。

十 画

郎城——第 187、188、189、190 頁。
 桑城——第 119、187 頁。
 桑坦德——第 171 頁。
 高卢——古国。——第 23 頁。
 宾根——第 417、446、620 頁。
 根特——第 98、195 頁。
 秘魯——第 172、173、237—239、241 頁。
 旁遮普——第 76、79、80 頁。
 貢比臬——第 98、557 頁。
 敖德薩——第 406 頁。
 席尔达(席尔道)——德国的一个居民点。——第 648 頁。
 俾尔——第 467 頁。
 俾路支——第 76 頁。
 班堡——第 95、98 頁。
 班特恩——德国的一个居民点。——第 112 頁。
 倫敦——第 171、225、231、241、294、401、403—406、410、418、420、427、433、435、438—442、450、451、457、460、462、463、465、466、470—474、481、482、484—486、501—504、506—510、512、514—520、522、523、531、541、545、557、607、

- 621、626—630、632—634、653、654、656、657、659—662、675、676、678—681、683、685、691、692、695、701—703、709、711、712、718、725—735、738—740、743—745、747、748、754—758、760—762、765—767、769、772 頁。
- 倫巴第——第 225、284、530、531、539、573、575、583 頁。
- 热那亚——第 585 頁。
- 热涅瓦——第 601、607、743 頁。
- 夏龙——第 185、186、320、556 頁。
- 夏提荣——第 183、184 頁。
- 茹安维尔——法国的一个居民点。——第 182 頁。
- 茹瓦尔河岸拉費尔特——法国的一个居民点。——第 185、188 頁。
- 納瓦林(皮洛斯)——第 538 頁。
- 納波利-德-罗曼尼亚(納夫普利昂)——第 335 頁。
- 泰尔諾夫(塔尔努夫)——第 132 頁。
- 泰梅希瓦拉(提米希瓦拉)——第 135 頁。
- 泰梅希瓦拉的巴納特(提米希瓦拉)——地区。——第 565 頁。
- 索雷——維尔諾(維尔紐斯)附近的一个居民点。——第 112 頁。
- 索繆尔——法国的一个居民点。——第 95 頁。
- 索利曼(苏来曼)山脉——第 77 頁。
- 索姆皮伊——法国的一个居民点。——第 185 頁。
- 紐約——第 411、439、448、469、479、486、630、711、734、735、748 頁。
- 紐約州——第 737 頁。
- 紐倫堡——第 500、548 頁。
- 紐沙特尔——第 97、98、577、611 頁。
- 涅茨(諾特茨)河——第 548 頁。
- 涅布拉——第 195 頁。
- 涅貝尔——巴伐利亚的一条小河。——第 256 頁。
- 涅米罗夫——乌克兰的一个居民点。——第 537 頁。
- 哥斯港——第 274 頁。
- 哥多瓦——第 195 頁。
- 哥伦比亚——第 225、236—240 頁。
- 哥耳德貝克——德国的一个居民点。——第 178 頁。
- 爱丁堡——第 458 頁。
- 爱尔兰——第 171、296 頁。
- 爱尔福特——第 175、187 頁。
- 爱北斐特——第 494 頁。
- 爱森納赫——第 182、671 頁。
- 海瑙(霍努夫)——第 176、312 頁。
- 海牙——第 281 頁。
- 海地島——在加勒比海。——第 231 頁。
- 海得尔堡——第 436 頁。
- 海尔曼施塔特(錫比島)——第 135 頁。
- 海尔斯貝尔格(利茲巴尔克-瓦尔明斯基)——第 114 頁。
- 庫庫塔——第 237 頁。
- 庫馬納——城市和省。——第 227、229、231、232 頁。
- 庫斯科——第 173 頁。
- 庫拉索島——第 226、233 頁。
- 庫尔黑森——見黑森—加塞尔。
- 庫奈斯多夫——德国的一个居民点。——第 122、203 頁。
- 格洛高(格沃古夫)——第 406 頁。
- 格土利亚——非洲大陆上的古国。——第 101 頁。
- 格尔利茨——德国的一个居民点。——第 93 頁。
- 格劳宾登——瑞士的州。——第 461 頁。
- 格查茨克——第 93 頁。
- 格腊韦——第 281 頁。

- 格腊迪斯卡——第 158 頁。
格累芬哈根(格里菲諾)——第 200 頁。
格拉斯哥——第 564、634、757 頁。
格拉納达——第 367 頁。
格拉奈卡斯(科尔扎苏)河——第 8、9、17、300 頁。
烏克蘭——第 314 頁。
烏里治——倫敦的郊区。——第 253 頁。
烏迪訥——第 158 頁。
烏提察——博罗迪諾附近的一个居民点。——第 258、259 頁。
烏默欧——第 92 頁。
烏罗尼埃——第 269 頁。
烏希·拉·維耳——法国的一个居民点。——第 186 頁。
烏希·勒·夏托——法国的一个居民点。——第 188 頁。
烏尔姆——第 97、338、348 頁。
烏尔克河——第 188 頁。
烏尔比諾——第 335 頁。
烏尔达克斯(烏尔达)——第 268、269 頁。
特利尔——第 417、616、754 頁。
特洛伊——第 278 頁。
特魯瓦——第 184、187 頁。
特魯希約——第 236 頁。
特累姆森——第 101、107 頁。
特薩利亚——历史区。——第 10、22、299 頁。
特雷比亚河——第 303 頁。
特里耳波尔——巴黎附近的一个居民点。——第 185 頁。
特兰西瓦尼亚——第 134、135、565、635 頁。
特拉納——第 183 頁。
特拉比魯德(特拉布松)——第 629 頁。
特拉尔巴赫(特拉宾-特拉尔巴赫)——第 282 頁。
特拉亨貝尔格(日米格卢德)——第 165、176 頁。
馬賽——第 141、625 頁。
馬士临——第 230 頁。
馬其頓——历史区。——第 357 頁。
馬連峨——第 96、136、242 頁。
馬加里塔島——第 229—231、235 頁。
馬格德堡——第 180、274 頁。
馬利尼亚諾(梅累尼亚諾)——第 30、197 頁。
馬斯特里赫特——第 157(1794 年圍攻)、281(1673 年圍攻)頁。
馬德里——第 136、173、225 頁。
馬德拉島——第 296 頁。
馬拉松——第 8、10、72 頁。
馬拉开波——第 237、240 頁。
馬拉霍夫岡——在塞瓦斯托波尔附近。——第 139 頁。
馬尔克——威斯特伐里亚的一个居民点。——第 670、671 頁。
馬尔摩——第 492、668 頁。
馬尔他島——第 530 頁。
馬尔納河——第 184、185、187、188 頁。
馬尔托斯——第 195 頁。
馬尔普拉克——比利时的一个居民点。——第 201、374 頁。
馬尔希斐特——地区。——第 64—66 頁。
馬尔斯頓穆尔——英国的一个居民点。——第 308 頁。
埃及——第 5、6、24、96、136、278、296、298、301、320、530、531、570、575、586 頁。
埃勞——見普略西什-埃勞。
埃諾亞——西班牙的一个居民点。——第 268 頁。
埃耳米腊——第 737 頁。
埃佩尔訥——法国的一个居民点。——

第 185 頁。
 埃倫布萊施坦——德国的一个居民点。
 ——第 274、347 頁。
 埃托日——法国的一个居民点。——第
 186 頁。
 埃托利亚——希腊的省。——第 10 頁。
 埃尔斯——第 486 頁。
 埃尔比斯——法国的一个居民点。——
 第 188 頁。
 埃耳斯特尔——德国的一个居民点。——
 第 179 頁。
 埃德尔河——第 383 頁。
 埃德斯沃尔——第 166 頁。
 埃德斯海姆——德国的一个居民点。——
 第 175 頁。
 埃克斯——見埃克斯-累-班。
 埃克斯-累-班——法国的一个居民点。
 ——第 580、581 頁。
 埃克西迪——法国的一个居民点。——
 第 221 頁。
 埃克繆尔——德国的一个居民点。——
 第 64、323 頁。
 埃斯林——奧地利的一个居民点。——
 第 64—69、73、137 頁。
 埃斯林根——第 511、610、611 頁。
 埃斯佩累特——法国的一个居民点。——
 第 269 頁。
 埃斯特勒馬杜腊——西班牙的省。——
 第 53 頁。

十一画

通哈——第 229、235 頁。
 捷克——历史区。——第 159、177、179、
 313、546—549、566、570、571 頁。
 都灵——第 141、202、335、434、545、583、
 585、600、601、620、633—635 頁。
 梯叶里堡——第 185、186、188 頁。

莎姆伯里——第 580、581 頁。
 培斯克拉——第 348 頁。
 雪恩布龙——第 162、561 頁。
 荷德捷日——第 548 頁。
 設菲尔德——第 739、757 頁。
 措尔恩多夫——第 310、324、453 頁。
 密多塞克斯——英国的郡。——第 744
 頁。
 得伊赫謝耳——見施涅勒-得伊赫謝耳。
 朗蒂——法国的一个居民点。——第 197
 頁。
 朗律特——法国的一个居民点。——第
 184 頁。
 康克德——第 376 頁。
 康波福米奧——意大利的一个居民点。
 ——第 141、158、572 頁。
 崩港——第 100、107、194 頁。
 崩采耳維茨(博列斯拉維策)——西里西
 亚的一个居民点。——第 352 頁。
 累翁島——第 236、237 頁。
 累特河——第 188、189 頁。
 累克辛頓——第 376 頁。
 累根斯堡——第 64、97、548 頁。
 曼达累——西班牙的一个小岡。——第
 269 頁。
 曼都亚——第 284 頁。
 曼海姆——第 182、282 頁。
 曼彻斯特——第 408、457、469、510、513、
 633、678、681、682、768、770 頁。
 曼尼普尔——第 287 頁。
 曼提涅亚——古希腊的一个城市。——
 第 13、74 頁。
 梅里——法国的一个居民点。——第
 187、190 頁。
 梅澤堡——第 305 頁。
 梅迪納-德-里欧-塞科——第 136 頁。
 梅济埃尔——第 343 頁。

梅澤里茨(門茲熱奇)——第 548 頁。
 梅克倫堡——第 164、567、569、576 頁。
 梅克倫堡—施韋林(梅克倫堡)——邦。
 ——第 174 頁。
 基多(厄瓜多爾)省——第 229、237 頁。
 基青根——巴伐利亞的一個居民點。——
 第 256 頁。
 基爾——第 166 頁。
 基爾卡——秘魯的一個居民點。——第
 173 頁。
 基爾肯尼——第 571 頁。
 基爾魏勒——德國的一個居民點。——
 第 175 頁。
 基爾希海姆博蘭登——德國的一個居民
 點。——第 489、663 頁。
 莫市——法國的一個居民點。——第 188
 頁。
 莫龍根(莫隆格)——波蘭的一個居民點。
 ——第 160 頁。
 莫德林(諾沃格奧爾基也夫斯克)——第
 542 頁。
 莫拉維亞——第 546—549、566、570、571
 頁。
 莫耳維茨(馬魯克維策)——第 36、309
 頁。
 莫納加爾——卡比利亞的一個狹谷。——
 第 138 頁。
 莫姆波斯——哥倫比亞的一個居民點。
 ——第 235 頁。
 莫日艾斯克——第 258、259、261 頁。
 莫斯科——第 84、93、97、165、258、263、
 421 頁。
 莫斯科河——第 258 頁。
 莫斯塔加內姆——第 107 頁。
 莫爾多瓦河——第 548 頁。
 莫爾達維亞(莫爾多瓦)——第 135、536、
 537、541、560、564、565 頁。

莫爾施海姆——德國的一個居民點。——
 第 175 頁。

十二画

腊布(迪厄尔)——第 636 頁。
 閔斯德——第 175、671 頁。
 腓尼基——近東的古國。——第 382 頁。
 登內維茨——德國的一個居民點。——
 第 165 頁。
 敦克爾克——第 170 頁。
 喜馬拉雅山脈——第 77 頁。
 富溫特拉比亞——第 264 頁。
 雅典——第 8—14、356、538 頁。
 雅斯特羅夫——第 548 頁。
 溫泉關——希臘的山隘。——第 8、72 頁。
 溫徹斯特——英國的一個居民點。——
 第 280 頁。
 喀布爾——第 77、79—82、83、84、85 頁。
 喀布爾河——第 77 頁。
 喀琅施塔得——第 347、390 頁。
 費特厄——第 189 頁。
 費涅斯特雷利——第 579、586 頁。
 費耳特基爾希——第 579 頁。
 費爾瓦德施泰特湖——第 599 頁。
 菲姆——第 186、188、189 頁。
 菲紹(菲紹浴場)——第 133 頁。
 菲利普維耳——第 109 頁。
 菲希特爾山脈——第 567 頁。
 凱恩——第 412 頁。
 凱斯(歐克)——在海地島。——第 231、
 232 頁。
 凱塞多爾夫——德國的一個居民點。——
 第 310 頁。
 凱則爾斯勞頓——第 175 頁。
 提羅耳——第 64、284、532、549 頁。
 提彼腊——第 287 頁。
 提契諾(德森)河——第 302—303 頁。

- 提尔西特(苏維埃斯克)——第 114、160、176 頁。
- 黑森——第 576 頁。
- 黑森—加塞尔(庫尔黑森)——选帝侯国。——第 466、567、569 頁。
- 黑森—达姆斯塔德——第 569 頁。
- 黑河——第 139 頁。
- 黑林山脉——第 485 頁。
- 萊茵区——第 406、541、569—576、611、615 頁。
- 萊茵省——第 117、483、495、688、754 頁。
- 萊茵河——第 24、152、159、181、182、187、256、282、419、424、445、505、528、559、560、571—575、579、590、603、610、612、613、665、758 頁。
- 萊茵河各省——見萊茵区。
- 萊茵普魯士——見萊茵省。
- 萊滕(呂廷)——西里西亚的一个居民点。——第 122、203、310 頁。
- 萊比錫——第 33 (1631 年会战)、34、70 (1813 年会战)、93、114、117、119、166、179—181、321、406 頁。
- 萊斯特——第 280 頁。
- 普諾——第 173 頁。
- 普魯特河——第 92 頁。
- 普瓦提埃——法国的一个居民点。——第 26 (1356 年会战)、73、305 (732 年会战) 頁。
- 普法尔茨——第 175、419、489、495、728 頁。
- 普倫貝尔——第 557、583、584、597、603 頁。
- 普勒塞克——法国的一个居民点。——第 136 頁。
- 普烏土斯克——第 113 頁。
- 普劳茲尼茨(普魯西策)——西里西亚的一个居民点。——第 177 頁。
- 普略西什-埃劳(巴格腊提奧諾夫斯克)——第 92、113、114、136 頁。
- 普拉迪——希腊的古代城市。——第 8、10、13、72 頁。
- 普拉岑提亚(皮阿琴察)——第 303 頁。
- 博敦——第 289 頁。
- 博登湖——第 603 頁。
- 博朗山口——第 81、82 頁。
- 博伯尔河——第 178 頁。
- 博內尔島——在加勒比海。——第 232 頁。
- 博尔格托——意大利的一个居民点。——第 95 頁。
- 博罗迪諾——第 93、122、205、218、258—263、325 頁。
- 博特威尔霍——苏格兰的一个居民点。——第 61 頁。
- 博馬尔松德海峡——第 295 頁。
- 博斯威尔特——英国的一个居民点。——第 60 頁。
- 博斯普魯斯海峡——第 152 頁。
- 斯內克——尼德兰的一个居民点。——第 283 頁。
- 斯巴达——第 8、12、13、355、356 頁。
- 斯普累河——第 660 頁。
- 斯图腊河——在意大利。——第 579、586 頁。
- 斯图加特——第 499、617 頁。
- 斯洛伐克——第 635 頁。
- 斯特拉斯堡——第 274、336、338、409、412、436、562、659、729 頁。
- 斯德哥尔摩——第 157、160、163、164、167、662 頁。
- 斯摩棱斯克——第 93 頁。
- 斯拜尔巴赫(斯拜尔)河——在巴伐利亚。——第 90 頁。
- 斯提文斯威特——第 282 頁。

斯維阿波尔格(苏奧緬林納)——第 148、150、163、214、390 頁。

十三画

瑟堡——第 347、633 頁。

璫堡——第 159 頁。

雷赫河——第 34(1632 年会战)、305(955 年会战)頁。

滑铁卢——第 66、70、71、73、94、142、147、191、313、321、323、325 頁。

葡萄牙——第 133、296、297、479、555 頁。

賈拉拉巴德——第 84、85 頁。

路易斯維耳——第 474 頁。

福克夏尼——第 537 頁。

福尔諾沃(福尔諾沃-迪-塔罗)——意大利的一个居民点。——第 197 頁。

新西兰島——第 327 頁。

新苏格兰——第 296 頁。

新格拉納达(哥倫比亞)——共和国。——第 227—229、231、234—236、241 頁。

塔弗納河——在阿尔及利亚。——第 223 頁。

塔巴斯科——第 327 頁。

塔腊果納——第 221 頁。

塔腊門托河——在意大利。——第 158 頁。

塞臧——第 185、188 頁。

塞納河——第 184、186、187、191 頁。

塞格得——匈牙利的一个居民点。——第 624 頁。

塞涅弗——比利时的一个居民点。——第 281 頁。

塞莫斯——第 14 頁。

塞尔維亞——第 538、539、572 頁。

塞瓦斯托波尔——第 55、59、148、212、347 頁。

蒙多維——第 95 頁。

蒙米賴——法国的一个居民点。——第 185、186 頁。

蒙博戎——第 142 頁。

蒙特罗——法国的一个居民点。——第 187 頁。

蒙特卡耳——第 235 頁。

蒙馬特尔——第 190 頁。

蒙塞尼山隘——在阿尔卑斯山。——第 579、586 頁。

奥菲德(奥方托)河——在意大利。——第 303 頁。

奥亚尔松——第 264、267 頁。

奥查科夫——第 112 頁。

奥雷斯山——在阿尔及利亚。——第 99 頁。

奥格斯堡——第 97、256、404、410、510、516—518、679、691、704、742、755、761 頁。

奥康尼亚——哥倫比亞的一个居民点。——第 239 頁。

奥庫馬雷——委內瑞拉的一个居民点。——第 231、232 頁。

奥什米亚訥——維尔諾(維尔紐斯)附近的一个居民点。——第 112 頁。

奥埃尔施太特——第 160、161、175、376 頁。

奥得河畔法兰克福——第 200 頁。

奥兰——第 101、108、109 頁。

奥兰省——第 109、222 頁。

奥登堡——第 567、576 頁。

奥登林山——第 423 頁。

奥尔达耳——西班牙的一个居民点。——第 221 頁。

奥尔特茲——法国的一个居民点。——第 297 頁。

奥克斯斯河(阿姆河)——第 17 頁。

奥克尼群島——第 171 頁。

奧斯坦德——第 653、654 頁。
 奧斯特利茨(斯拉夫科夫)——第 128、
 136、159、175、556 頁。
 奧布河——第 183、184、187 頁。
 奧布河岸巴尔——第 183 頁。
 奧布河岸阿尔西——第 190 頁。

十四画

察列沃-宰米舍——第 259 頁。
 赫拉特——第 76、79、80、81 頁。
 赫尔辛堡——第 163 頁。
 赫尔曼德河——在阿富汗。——第 77 頁。
 赫希斯特——第 182 頁。
 赫布里底群島——第 171 頁。
 赫勒斯滂海峡——見达达尼尔海峡。
 維厄-梅宗——第 185 頁。
 維也納——第 64、70、116、118、119、133、
 134、158、162、270、271、344 (1683 年防
 御战)、458、474、510、529 (1815 年秘密
 条約)、548、557、635、637、656、661、743
 頁。
 維罗那——第 284—286、332、348、352、
 529、538 頁。
 維登堡——第 180、274 頁。
 維特里——巴黎附近的一个居民点。——
 第 190 頁。
 維福尔——法国的一个居民点。——第
 185 頁。
 維斯拉河——第 542、548 頁。
 維阿馬拉——阿尔卑斯山的山口。——
 第 580 頁。
 維多利亞——委內瑞拉的一个居民点。
 ——第 226、227 頁。
 維多利亞——西班牙的一个居民点。——
 第 264、297 頁。
 維尔諾(維尔紐斯)——第 112 頁。
 維尔茨堡——第 310 頁。

維尔騰堡——第 445、569 頁。
 維拉戈什(施里亚)——第 635 頁。
 維拉弗兰卡——意大利的一个居民点。
 ——第 530、573、574、598、633、758 頁。
 維拉弗兰卡(維耳夫朗舍)——法国的一个
 居民点。——第 532 頁。

十五画

緬甸——第 287—294 頁。
 慕尼黑——第 408、548 頁。
 墨西哥——第 154、239、327 頁。
 魯尔蒙特——第 282 頁。
 蓬特科尔沃——法国的一个居民点。——
 第 162 頁。
 德里——第 79、194 頁。
 德森——瑞士的州。——第 580、610 頁。
 德勒斯頓——第 178、495、548、728、734
 頁。
 撒丁——見皮蒙特。
 撒丁島——第 585 頁。
 撒哈拉——第 99 頁。
 摩地那——第 530 頁。
 摩洛哥——第 99、223、531 頁。
 摩塞尔河——第 182 頁。
 潘帕塔尔——馬加里塔島上的一个居民
 点。——第 231 頁。
 潘普洛納——西班牙的一个居民点。——
 第 264 頁。
 潘普洛納——哥伦比亚的一个居民点。
 ——第 235 頁。
 十六画
 澳大利亞——第 446、555 頁。
 暹罗(泰国)——第 292、293 頁。
 澤稷島——諾曼底群島中的一个島嶼。
 ——第 439、471、711 頁。
 錫斯坦——第 77 頁。

默克恩——德国的一个居民点。——第 181 頁。

賴辛巴赫——第 177 頁。

穆尔頓——第 430、432、433、435、436、455、677、689、708、724 頁。

穆罕默迪亚——第 194 頁。

諾让——第 184、187 頁。

諾瓦拉——第 306 頁。

諾伊茲比——第 308 頁。

諾依維特——第 642 頁。

霍拉桑——第 76、79、304 頁。

霍尔施坦——第 166、409、567 頁。

霍根林登(霍恩林登)——第 242 頁。

霍賈克山口(霍賈克)——第 81 頁。

霍赫施泰特(赫希施泰特)——巴伐利亚的一个居民点。——第 257 頁。

霍恩弗里德貝尔格——第 310、324 頁。

十七画

繆尔豪森——第 175 頁。

謝倫山——在巴伐利亚。——第 256 頁。

謝明諾夫村——博罗迪諾附近的一个居民点。——第 205、260—262 頁。

謝明諾夫雛谷——在博罗迪諾附近。——

第 258、260、261 頁。

十八画

魏克耳——尼德兰的一个居民点。——第 283 頁。

魏登塔耳——德国的一个居民点。——第 175 頁。

魏森堡(維桑堡)——第 352 頁。

魏森費耳斯——第 181 頁。

薩瓦——第 434、505、574、575、580—585、597、598、600—603、606—608、610、611、613、615、644、743 頁。

薩利河——第 180 頁。

薩克森——第 117、137、178、179、541、549、566、569、576、728 頁。

薩博耳奇(薩博耳奇-薩特馬尔)——匈牙利的州。——第 753 頁。

薩拉芒卡——城市和省。——第 136、297 頁。

薩拉哥沙——城市和省。——第 194 頁。

薩特里日河——第 17、81 頁。

薩尔河——第 182 頁。

薩尔温江——在緬甸。——第 287 頁。

薩尔茨堡——第 549 頁。

譯 后 記

本卷是根据“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第十四卷(1959年出版)翻譯或校訂的。

在譯校馬克思“福格特先生”一著的过程中参考了德文原文。

参加本卷譯校工作的有罗焚、傅子荣、朱中龙、馮申、籍維立、孙魁、胡尧之、湯鈺卿、季丰、李成毅、胡君亶、詹汝琮。参加資料工作的有馮如馥、陈瑞林、陈家英。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編譯局